

中国现代、当代名人传记选

# 毛泽东

中国现代当代名人传记选

# 毛泽东自传

毛泽东口述 斯诺撰写 潘汉年题名



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

——斯诺(1936 年)

## 第一章 一颗红星的幼年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我的父亲(1)是一个贫农，当他年轻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他当了一年多的兵(2)。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村上，由于拼命地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设法赎回了他的田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成为中农了。在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获六十担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这就是说，每人约七担——这样，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靠了这个剩余，父亲积聚了一点资本，不久又买了七亩田，使我家达到“富”农的状态。这时，我们可以每年在田里收获八十四担谷。

当我十岁，我家只有十五亩田的时候，一家五口是：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自己。在我们增加了七亩田之后，祖父逝世，但又添了一个小弟弟和两个妹妹。不过我们每年仍有三十五担谷的剩余(3)，因此，我家一步步兴旺起来了。

这时，父亲还是一个中农，他开始做贩卖粮食的生意，并赚了一点钱。在他成为“富”农之后，他大部分时间多半花在这个生意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把自己的儿子们都放在田里做工。我在六岁时便开始耕种的工作了。父亲的生意并不是开店营业的。他不过把贫农的谷购买过来，运到城市商人那里，以较高的价格出卖。在冬天磨米的时候，他另雇一个短工在家里工作，所以在那时他要养活七口。我家吃得很节省，但总是够饱的。

我七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四书》。我的塾师管

教甚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因此，我在十三岁时，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为那个城是在某处一个山谷里面的。我飘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过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约八里。

但，回家之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点。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我这次反抗行为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我第一次胜利的“罢工[罢课]”（4）。

我刚认识几个字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要我记家账了。他要我学习打算盘，因为父亲一定要我这样做，我开始在晚间计算账目。他是一个很凶的监工。他最恨我懒惰，如果没有账记，他便要我到田间做工，他的脾气很坏，时常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他们一个钱不给我们，给我们吃最粗粝的东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总给雇工是吃鸡蛋和咸鱼片，但很少给过肉。对于我，则既没有蛋也没有肉。

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了这个问题时常吵闹。

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

但当我十三岁时，我找到了一种有力的理由和我的父亲辩论，我引经据典，站在父亲自己的立场上和他辩论。父亲常(常)喜(欢)责(备)(5)我不孝和懒惰。我则引用经书上的话来和他相对，说为上的应该慈爱。至于说我懒惰，我的辩解是大人应较年轻的人多做工作，而父亲的年纪既然比我大上三倍(6)，他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并且我说我到了他那样大的时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这个老人继续“积聚财物”，在那个村里可以说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买田，但是他向别人押来很多的田。他的资本增加了两三元。

我的不满增加起来了。辩证的斗争在我们的家庭中不断地发展着。(在说话的时候毛很幽默地引用这些政治术语，他一面笑一面追述这些事件——史诺(7))有一件事，我特别地记得。当我在十三岁左右时，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争执。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愤恨他，离开了家。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想劝我回去。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点，我便跳下去。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从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利时，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我怯懦屈服时，他骂得更厉害。

回想到这一点，我以为我父亲的苛刻，结果使他失败。我渐渐地仇恨他了，我们成立了一个真正的“联合战线”来反对他。这对于我也许很有益处，这使我尽力工作，使我小心地记账，让他没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的父亲读过两年书，能够记账。我的母亲则完全不识字。两人都出身农家。我是家庭中的“学者”。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戒，读了《岳飞传》[《精忠传》]、《水浒传》、《反唐》[《隋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8)，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的，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我的同学大多也是如此。我们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够背诵出来，并且一再地谈论它们。关于这类故事，我们较本村的老年人还知道得多。他们也欢喜故事，我们便交换地讲听。我想我也许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

最后我在十三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然而我还继续求学，找到什么书便读，除了经书以外。这使父亲十分生气，他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当他有一次，因对方在中国旧式法庭中，引用了一句适当的经书而使他的官司打败以后。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门遮盖起来，使我的父亲看不见灯光。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很欢喜的书，叫做《醒世良言》[《盛世危言》](9)。该书的作者们都是主张革新的老学者，他们以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由于缺少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并想将它们介绍到中国来。我的父亲认为这一类的书是浪费时间的。他要我读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的如经书那类的实际东西！

我继续读中国文学中的古传奇和小说。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于是我便进行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

们用不着耕种田地，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的。

在少年与中年时期，我的父亲是一个不信神佛的人，但母亲则笃信菩萨。她对自己的孩子们施以宗教教育，所以我们都因父亲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而感觉难过。九岁的时候，我便认真地和母亲讨论父亲没有信心的问题了。(10)自那个时候以及以后，我们都想了许多办法来改变他的心，但没有效果。他只是责骂我们。因为我们受不住他的进攻，我们退而想新的计划。但他无论如何不与神佛发生关系。

不过，我的读书渐渐地对我发生影响：我自己愈来愈怀疑神佛了。我的母亲注意到这一点，责备我不该对神佛冷淡，但我父亲则不说什么。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账，在途中碰见一只老虎。老虎因不提防而立即惊逃，但我的父亲却格外地害怕，后来他对于这次奇迹的逃生，仔细想过。他开始想他是不是开罪了菩萨。自那时起，他对于菩萨比较恭敬起来，有时也偶尔烧香。但是当我愈来愈不信神佛时，他老人家却并不管。他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向神祷告。

《醒世良言》[《盛世危言》](11)引动我继续求学的欲望。我也已经厌恨田里的工作了。这自然是父亲所反对的。我们为了这事发生争执。最后我从家庭中出走。我到一位失业的法律[法科](12)学生家里去，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此后，我在一位老秀才面前攻读了更多的经书，并读了许多当代论著和几本书。

在这时候，湖南发生一桩影响我的一生的事件。在我们读书的小小私塾的房屋外面，我们一班同学看见许多从长沙回来的米商[豆商](13)。我们问他们为什么大家都离开长沙。他们说是城中发生了大乱子，并把这件事告诉我们。

原来那年发生一个大饥荒，在长沙有好多万人没有东西吃。嗷嗷待哺的老百姓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巡抚，请求救济，但他却傲慢地回答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有粮食？城里多得很，我向来就没有缺少过。”当他们听到巡抚的回答，大家都十分愤怒。他们召集民众大会，举行一次示威运动。他们攻进满清衙门，砍倒作为衙门象征的旗杆，并把巡抚赶走。过后，布政使骑着马出来了。他告诉老百姓，政府准备设法救济他们。他这话显然是诚恳的。但皇帝（或许是慈禧太后吧）不高兴他，责备他与“暴徒”发生密切关系，并将他撤职。一位新巡抚来了，马上下令捉拿为首的乱党。其中有许多人被砍却头颅，挂在柱子上示众。

这事件，我们在私塾里讨论了数日之久。它给予我一个深刻的印象。许多学生都同情“乱党”，但只是站在旁观的立场。他们并不了解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有）（14）什么关系。他们不过把这事当做一个具有刺激性的事件，感觉兴趣而已。然而我永不忘却它。我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我的家人一样的普通良民，于是我深恨对待他们的不公平了。

此后不久，“哥老会”（全国闻名的一种秘密结社）的会员和当地的一个地主发生冲突。他在法庭上控告那些会员，他是一个很有势力的地主，判决自然是有利于他的。“哥老会”会员失败了。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向这个地主和政府反抗，他们退到一个山（15）上去，在那里建筑了他们的山寨。官兵派来打他们，同时那地主散布一个谣言，说他们揭竿造反的时候杀死了一个孩童来祭旗。当时叛徒的领袖叫做“磨刀石彭”（16）。叛徒最后战败，彭被迫逃亡。结果他被捕砍头。然而在我们这般学生的眼光中，他是一位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造反。



第二年，新谷还没有成熟，冬米已吃完的时候，我们一村发生食粮恐慌。穷人向富户要求帮助，他们发动了一个“吃米不给钱”的运动。我的父亲是一个米商，他不顾本村缺少粮食，将许多米由我们的乡村运到城里。其中一船米被穷人劫去，他气得不得了。但我对他不表同情。同时，我以为村人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发生影响，即一个小学校中有一个“激烈”的教员。他之所以被目为“激烈”，是因为他反对神佛，想把神佛取消。他教人民把庙宇改为学校。他成为一个被大家议论的人。然而我钦慕他，并同意他的意见。

这些密切发生在一起的事件，给予我这已经有着反叛性的青年头脑以一个永久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意识，尤其是在我读了一个谈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它讲到日本的占领高丽与台湾，中国的失去安南、缅甸等。(17)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痛心，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

我的父亲要我在一个与他有关系的米店做学徒。最初我并不反对，以为这也许是很有趣的。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新学校。于是不顾我父亲的反对，立志进那个学校。这学校在我外祖母的县城里(18)。我的一个姨表在那里当一个教员(19)，他将这个学校告诉我，并将“新法”学校的变迁情形讲给我听。那里是不大注重经书的，西方的“新知识”教授得较多。教育方法又是很“激进”的。

于是我与我的另一个表弟进了那个学校，注了册(20)。我自称为湘乡人，因为我知道那学校只收湘籍学生。但后来我发现各地人都可以进去，我才把我的真籍贯说出来，我付了十四吊铜板，做我五个月的膳宿费及购买各种文具用品之用。我

的父亲终于让我入学了，因为朋友劝他，说这种“高等”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离家有五十里。这时我是十六岁。

在这个新学校中，我读到了自然科学和西洋学术的新课程。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教员中有一位日本留学生，他戴了一个假辫子。假辫子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每个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未看见过那么多的儿童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是地主的子弟，穿着华丽的衣服；很少有农民能将他们的子弟送到那样一个学校去读书。我穿得比旁的学生都蹩脚。我只有一套像样的袄裤。一般学生是不穿长袍的，只是教员穿，至于洋装，只有“洋鬼子”才穿。许多有钱的学生都轻视我，因为我常穿破烂的袄裤。但是，在这些人之中我也有几个朋友，而且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有一个现在成了作家，住在苏联。

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又不为人所喜。做一个湘乡人非常重要，而且是湘乡的某一区人也很重要。湘乡分为上区、中区，与下区，上区的学生与下区的学生不断地打架，完全是因为乡土观念。双方好像要拼个你死我活似的。在这“战争”中，我总是采取中立地位，因为我不是那一区的人。结果三区的人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觉十分苦痛。

我在这学校里有很大的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教经书的，因为我古文作得不错。然而我的志趣并不在经书。我正在读我表兄送给我的两本关于康有为改革运动的书。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而又读，一直到我能够背诵出来。我很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并十分感激我的表兄——当时我以为他是非常前进(进步)(21)的，但后来他变成了一个反革命分子，变成一个劣绅，并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间的大革命时代参加反动工作。

许多学生不喜欢“假洋鬼子”，因为他的辫子是假的，但我很喜欢听他谈日本的情形。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过一个日本歌，叫做《黄海之战》。我记得当中几句很美的句子：

麻雀唱歌，夜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野何等可爱。  
石榴花红，杨柳叶青，  
正是一幅新鲜的图画。

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日本的美，我又从这歌曲中感觉到它对于战胜俄国的光荣和武功的发扬。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我们今日所知道的野蛮的日本。

这一切，都是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

我又记得在这个时候，在新皇宣统[溥仪]已统治了两年的时候，我才最初听到皇帝[光绪]与慈禧太后都死去的消息。那时我还没有成为一个反君主的人。老实说，我认为皇帝以及大多官吏都是诚实、良好，和聪明的人。他们只需要康有为的变法就行了。我心醉于中国古代的著名君主——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的史实，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籍。同时，我还读了一点外国的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论美洲革命的文章里，我初次听到美国，记得文中有这样一句：“八年之苦战后，华盛顿胜利而造成其国家。”在一本《世界大英雄传》的书中，我又读到，拿破仑，俄国喀德琳[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登[惠灵顿]，葛拉德斯吞[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及林肯。  
(22)

我开始渴想到长沙去，那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的省会，离我家有一百四十里，我听说这城市是非常大的，有许许多多居民，许多学校和一个巡抚的衙门。这简直是一个伟大的地方！这时我很想到那里去，进那个为湘乡人办的中学。是年冬，我

请求我在高小时的一位教员介绍我前去。他答应了，于是我步行到长沙，心中极端地兴奋，一半生怕被摒，几乎不敢希望真入那个伟大的学校做一学生。而使我惊异的，我很容易地就录取了。但是政局变动得很厉害，我在那里只读了半年。

附注：

- (1)据《西行漫记》载，毛泽东的父亲叫毛顺生，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
- (2)据《西行漫记》载："他当了好多年的兵。"
- (3)据《西行漫记》载："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
- (4)括号内文字为新版责任编辑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 (5)括号内文字为新版责任编辑所加。
- (6)据《西行漫记》载："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
- (7)史诺即埃德加·斯诺。括号内文字是斯诺笔录时附注的。
- (8)括号内文字为新版责任编辑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 (9)字为新版责任编辑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 (10)《西行漫记》载："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
- (11)括号内文字为新版责任编辑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 (12)括号内文字为新版责任编辑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 (13)括号内文字为新版责任编辑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 (14)括号内文字为新版责任编辑加。
- (15)据《西行漫记》载，这个山叫"浏山"。
- (16)据《西行漫记》载："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彭铁匠的人。"
- (17)据《西行漫记》载："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
- (18)即湘乡县。编者注。
- (19)据《西行漫记》载："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
- (20)据《西行漫记》载："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

(21)括号内文字为新版责任编辑校订。

(22)此段括号内文字均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 第二章 在动乱中成长起来

当我在长沙的中学读书时，我第一次读到报纸，报名《民力》，是民族主义派的革命的报纸，里面有反抗满清的广州起义及在一个湖南人(23)领导下的七十二烈士就难的情形。我读了以后，极为感动，并发现《民力》里面充满了有刺激性的材料，同时我也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和同盟会的会纲。这时，长沙正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异常，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校的墙壁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有点糊里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崇拜，我不很明了他们和新领袖的区别。所以在我的文章中，我主张应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并以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其时“反对外资”建筑川汉铁路的运动开始，成立议会制度的要求也普遍地展开，但结果皇帝只是下诏组织“咨议会”。于是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了。他们以反对留辮的方式来表示他们的反满的情绪。我和一个朋友毅然剪去发辮，但约好相继剪去的一般人却不履行他们的诺言。因此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击他们并强力剪去他们的发辮，结果有十个人做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者”。这样，在短期内，我已经从嘲笑“假洋鬼子”的假发辮进步到要求普遍地剪发了。政治观念是如何地可以转变一个人的观点啊！

关于蓄辮我和一个法律学校的朋友发生争论，各人执持了相反的理论。这法科学生引用经书上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等话来辩论。可是我和反对蓄辮的人们在反满的政治基础上造成了相反的理论，使他开口不得。

武汉起义(一九一一年十月)之后，湖南宣布戒严。政局在急遽地变动。一天，有个革命党得了校长允许，到一个中学里

面作煽动的演讲。当场有六七个学生起来声援他，痛斥满清并号召大家起来建立民国。每一个人都专心一意地听着。

听过这个演讲四五天之后，我决心加入革命军，决定和几个朋友到汉口去，同时我们向同学募一些钱。听说汉口非常潮湿，必须穿雨鞋，我就向驻扎城外的一个军队朋友那里去借。我被卫兵拦住，这个地方已经变成十分活跃了，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大批地在开到街中去。

当时，叛军正在沿着粤汉路进窥长沙，战事已经开始。在城外发生一次大战。同时城内也起了叛乱。城门被中国的劳工们攻了下来。我靠了其中一个劳工的帮助，重新回进城中。然后站在一块高地上观战，直等到最后看到衙门上飘起了写着“汉”字的白旗。我回到自己的学校，那里已在军队的看守下了。

第二天，一个都督政府成立，但新都督和副都督并未做得长(24)，一般地主和商人不同意他们。不到几天后，我去访问一个朋友时，看见他们的尸首横陈街上。作为地主和军阀们的代表，谭延? 打倒了他们。

现在有许多学生参加军队了。学生军已经组成，不过我不喜欢学生军，认为他们的基础太复杂。决定还是参加正规军队来帮助完成革命。清帝尚未逊位，这正是奋斗的时候。

我的饷银是七元一月——不过，已经多于目下我在红军的饷银了——其中我每月要用去两元吃饭。我还要买水，因为士兵都要从城外挑水进来，而我是学生，不屑做挑水的工作。

此外多余的饷银都用在报纸上，我变成它们的热心读者了，在当时与革命有关的报纸就是《湘江日报》。其中讨论到社会主义，我从这上面初次知道这个名词。我也和其他学生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几本关

于社会主义和它的原理的小册子，并热心地写信和同班的同学讨论这个问题，但只有一个人的回答表示同意。

我同队中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极欢喜他们。其余的人都是平庸之辈，而且有一个是流氓。我又劝了两个学生参加军队，我和队长及一般弟兄都合得来。我能写，读过一点书，他们很佩服我的“博学”。我能够帮助他们做写家信之类的事情。

革命的结局还没有决定。满清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国民党内部又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在湖南听说战事是不可避免的了。当时有许多军队都组织起来反对满清和袁世凯。湘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湘人准备起事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成立了协定，预计的战事停止，南北“统一”，而南京政府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决定继续求学。这时，我已经做过半年兵士了。

我开始留心报纸上的广告——彼时有许多学校开办，而且都用广告来吸收新生；我并没有特别的标准来判断学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一个警官学校的广告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就去报名。但是，在受试以前，我看到一个制皂“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而且还可以有一点津贴。这个广告是动人的。它指出制造肥皂有巨大的社会利益，可以富国富民。于是我变换了进警官学校的念头，决定做一个制皂工程师。我又在这里交纳一元报名费。

这时，我有一个朋友做了法科学生，他怂恿我进他的学校。我又读了这法律学校的动人广告，里面保证了许多了不得的事情。它答应在三年之内教完一切关于法律的学科，保证学成可以立即做官。我的朋友不断地对我称赞这个学校，直到我最后写信回家，详述广告上的保证并请家人寄学费给我。我将自己的前途画成一幅光明的灿烂的图画给家人看，将自己画成一个



法律学家和大官。于是我付去一元向法律学校报名，同时等待父母的回音。

但其中忽然又有了变动。这回是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另一个朋友劝我，以为国家正在作经济战争，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够建立国家经济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得胜了，我再花一元到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去注册而且录取了。不过，这时我还继续留心广告，有一天看到广告，描写一个高等商业公立学校的优美。它是政府开办的，课程繁多，听说里面教员都是极能干的人。我断定还是到那里学成商业专家比较好，出了一块钱去报名，随后将我的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父亲很知道有了商业智慧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而且留在那里——有一个月。

我发现在这新学校中的困难就是一大半课程都是用英文教的，而我和一般同学一样，英文程度很坏，简直只认识字母。此外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校中没有英文教员。我讨厌这种情形，就在月底退学，并继续阅读广告。

我在学业上的第二次冒险是在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应了入学考试，以第一名被录取。这是一个大学校，有许多学生，毕业的也很多。校中有一个国文教员十分地帮我，因为我有文学的倾向。这位先生借了一本《御批通鉴辑览》给我，其中有乾隆的诏谕和批评。

这时，一个政府办的刊物在长沙出版。这是一个巨大的烽火，我们学生觉得它非常意味。不久，谭延？被袁世凯赶走了。现在袁执掌着民国的政务，同时准备他的登基。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并且，在我读过《御批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

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宝贵的。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中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25)。我读了亚当·斯密士[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物种起源》]和约翰·斯陶德·密尔[约翰·穆勒]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混合起来。(26)

那时，我住在湘乡县同乡会馆里。那里还有许多士兵——都是“退伍”或被解散的人，没有事做，也没有钱。会馆中的学生和兵士总是在吵架，有一夜，他们之间爆发了武力的冲突。兵士们攻打学生并且要杀死他们。我逃到洗澡间里去躲避，一直等到打完。

这时我没有钱用，因为家里不给我金钱，除非我进学校。又因为会馆不能再住下去，我开始寻找新的托身之所。同时，我恳切地考虑了我的“职业”，并以为我最适宜于教书。于是我又开始留心广告了。现在我注意到湖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动人的广告，我高兴地读了它的优点：不收学费，膳宿费很便宜。两个朋友也劝我进去。其实是他们要我帮他们预备入学论文。我将自己的意志写信给家里，得到他们的同意。我代两个朋友做了论文，自己做了一篇。结果一齐录取——实际上，是我被取了三次。那时我并不以为抢替是一件不好的事，这仅仅是一种友谊。

在这个师范学校中，我做了五年学生，并且居然拒绝了此后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真的毕业了。在湖南师范学校中，我的生活上发生许多事件。在这一时期，我的政治观念开始确定，并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会行动的经验。

新校中有许多规则，只有极少几条我是同意的。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中的必修课程。我希望专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我并无特殊兴趣，我不读它们，于是这些课程的分數大都很坏。我最讨厌的就是必修的静物写生。我以为这是透底的愚笨。我总想画简单的东西，快快画完就离开课室。记得有一次画一幅“半日半石”（是李太白的一句名诗）（27），我用一条直线和上边半个圆圈来代表。还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就算数了，我称之为鸡蛋。结果画图得到四十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的分數都非常好，这样和其他课程的坏分數扯平。

这里有个国文教员、绰号“袁大胡子”，他揶揄我的文章，并斥为新闻记者式的作品。他看不起我的模范梁启超，以为他只是半通。我只得改变我的风格，攻读韩愈的文章，和熟记经史中的典故。所以，谢谢“袁大胡子”，必要时我现在还可以做一篇清通的古文。

教员中给我最强烈的印象的就是一个英国留学生杨怀中[杨昌济]，过后我和他非常友好。他教伦理学。他是一个观念主义[唯心主义]者，同时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心力》[《心之力》]。那时我也是一个观念主义[唯心主义]者，我的文章大受杨教授的赞赏。给我那篇文章一百分。（28）

另外有一个教员常给我看旧的《民报》，我总是十分高兴地读它。从这上面我愈加清楚同盟会的活动和会纲了。一天读《民报》，看到一篇记述两个中国学生漫游中国的文章，并说

他们已达(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使我大为感动。我要学他们的榜样，不过没有钱，我想还是先游历湖南。

次年夏，我开始以步行游湘省，走了五个县城。有一个同学叫萧瑜，陪伴着我。我们一文不名地走了这五县，乡下人给我们吃饭和睡觉的地方。不论我们到达什么地方，总是受到欢迎和善遇。这个和我一起旅行的家伙，萧瑜，后来变成了南京国民党的职员，在一个以前做湖南师范学校校长，后来变成南京高级官吏的人手下做事，并被委做故宫博物院的管理。后来萧被人告发盗卖故宫中最宝贵的东西，并且在一九三四年带了这笔款子潜逃。现在他避居大连。

我感觉自己需要几个亲密的同道。一天，我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热心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前来和我接触。我指明要坚强不屈，愿意为国牺牲的青年。广告登出后，我得到三个半答复。一是罗章龙，他后来加入共产党随后又背叛党。其余答复是两个青年的，后来变成极端的反动分子。“半”个回答是一个不加可否的青年的。他叫李立三。李听完我所讲的一切话，然后一声不响地走开，过后我们的相识并且进而成为友谊。(29)

但是，渐渐地我在我的四周建立了一群青年，这样造成了日后一个团体的核心，后来这个团体(30)对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和国事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一群严肃的青年，他们没有时间去讨论琐细的事情。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有一个宗旨。他们没有时间谈恋爱或“罗曼史”，他们以为在国家如此危急，如此急迫需要知识的时候，是不能讨论女人或私事的。我对于女人本无兴趣。我的父母在我十六岁时就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人，不过我并没有和她一起住过——此后也未有。我不以她为我的妻子，那时根本也不去想她。除了不谈女人——普通在这时期的青年的生活中极为重要——以外，(31)

我的同伴连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都不谈的。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和我谈起“买肉”的事情，并且当面叫用人(32)来和他商量，叫他去买。我动怒了，以后就不和他来往。我和朋友只谈大事，只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

我们又是热心的体育家，在寒假中，我们在田野里，山上山下，沿着城墙，跨越溪流地行走。天雨时我们就脱去衣服，名之为“雨淋浴”。阳光灼烁时，我也剥去衣服，名之为“日光浴”。春风和暖时，我们又算是一种新运动，叫“浴风”。在已经结霜的天气，我们还露宿田陌间，或是十一月，我们还在寒溪中游泳。凡此种种，都算是“体格训练”。也许这对我的身体大有裨益，后来我是何等的依靠它！在我屡次横越华南，和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的时候。

我和其他城镇里许多学生和友人建立了广大的通信关系。渐渐地我开始了解一个有着更密切联络的组织的必要了。在一九一七年，我和几个友人发起了新民学会。会员约七八十，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中成了有名的人物(33)。会员的大部分，在一九二七年清党时期都被杀了。同时，在中国其他部分，像这类的激进团体都由那时在中国政治上占有势力的战斗青年纷纷组织起来。

这许多团体大半都是在陈独秀编辑的著名新文化运动杂志——《新青年》影响下组织起来的。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阅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

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

我是一九一三年入师范学校的，于一九一八年毕业。(34)

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我一共用了一百六十元——连所有学费在内！在这个数目里面，一定有三分之一是用在报纸上面的，因为经常订阅书报费每月约需一元，此外我还时常向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父亲责备我，说是浪费。他说这是在废纸上面花钱。不过我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而且从一九一一到一九二七，当我和中国最初的红军一部分爬上井冈山时，我从未停止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末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更打断我回家的心向。是夏，我决定到北平——那时叫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在大战时，法国就是用这个方法招募中国青年的。在出国以前，这般青年预备先在北平读法文。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在这一群留学生中，有许多是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后来大半都变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我陪了几个湖南学生到北京去，不过，虽然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并且他们受新民学会的帮助，但我本人并没有到欧洲去，我认为我对于本国还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为在中国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时间……

北平在我看来非常浪费，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杨昌济](35)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后来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结果被张作霖处决。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

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在我服务北大时所遇的人中，有两个现在是南京的高级官吏，一个是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还有个加入共产党随后又成了所谓“第三党”的党员，再有一个则后来加入加利福尼亚的“三K党”。(36)在这里我也遇到了杨开慧，而且发生恋爱，后来结了婚。她是我的好友杨教授的女儿。

我对于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同时我的头脑愈来愈激烈。至于所以会如此的背景则上面已经讲过了。不过，当时我还在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37)，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不过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不穷的欣赏。

一九一九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也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学借了十块钱给我，使我能买票到浦口。旅途中，我在曲阜下车访孔子墓。我去看了孔子和门徒濯足的溪水，圣人幼时所居的小村，我看见孔子手植的树。我又访问颜回的住处和孟子的生地。在旅途中，我还登游过泰山，就是冯玉祥将军退隐时写爱国诗的地方。

不过当我到达浦口以后，又是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笔款子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回转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积极的活动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动向的团体。这个书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大混蛋张敬尧。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罢课来反对张。要求将他撤换，同时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去煽动反对张敬尧，当时孙中山在西南活动。张为报复起见，就禁止《湘江评论》出版。

这件事过后，我代表新民学会到北平去，并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将反张的斗争扩大而为普遍地反军阀的运动了。在北平我做了一个通讯社的社长，来推动反军阀工作。在湖南，这个运动得到了相当的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闿打倒，并在湖南成立了一个新政体。这时，学会中开始分成两派，左翼和右翼——左翼主张实行一个社会、经济，及政治的彻底改革的纲领。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次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时，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那时，我也见过胡适，访问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学生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随后我回长沙，开始



组织这个协会。(38)我在那里得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里的活动，那时学会会有一个湖南“独立”的计划。

一九二二年冬，我第一次将工人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39)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40)的《社会主义史》。一九二二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与杨开慧结婚。(41)

附注：

(23)此“湖南人”即黄兴。新版责任编辑注。

(24)据《西行漫记》载，新都督和副都督分别是“哥老会”的两名首领焦达峰和陈作新。

(25)舆图，即地图。新版编辑注。

(26)此段括号内文字均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27)据《西行漫记》载，李白的这句诗为：半壁见海日。

(28)此段括号内文字均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29)此处《西行漫记》中有不同记载为：“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新版编者注。

(30)这个团体即后来建立的新民学会。新版编者注。

(31)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谈论女人，通常是当时那个年龄的青年人生活中的一件占有重要位置的事情。新版编者注。

(32)用人，即仆人。新版编者注。

(33)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夏曦、何叔衡、郭亮、蔡和森、萧铮等。新版编者注。

(34)据《西行漫记》载，毛泽东是1912年进湖南师范学校的。

(35)括号内文字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36)据《西行漫记》载，这几个人依次分别是陈公博、张国焘、谭平山和康白情。

(37)据《西行漫记》载，这个北大学生名叫朱谦之，原文为 Chu Hsun-pei。

(38)在《西行漫记》中这个协会叫“改造湖南联盟”。

(39)一译考茨基。

(40)一译柯卡普。

(41)此段括号内文字为新版编者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 第三章 揭开红史的第一页

一九二二年夏，我赴沪参加会议，共产党就在这个会议上成立。(42)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占着领导的地位，无疑地，他们都是中国知识界中最灿烂的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做图书馆助理员时，已经很快地倾向马克思主义了，而陈独秀对于引导我的兴趣到这方面来，也大有帮助。我第二次赴沪时，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历史的上海第一次会议中，除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参加会议的一共十二人。是年十月，共产党第一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其中的一员。当时在其他省县中也有组织成立……(43)同时，在法国，许多工读生组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组织几乎同时成立……在德国也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不过较迟，党员中有朱德。在莫斯科和日本也有支部成立。(44)

到了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支部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公务人员、印刷工人及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个以上的工会，当时我是支部的书记。是冬，猛烈的劳工运动开始。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学生和工人之间，在农民中的工作极少。多数大矿山和全部学生实际上都已组织起来。在学生和工人的战线上都有许多斗争。一九二二年冬，湖南赵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工人领袖(一个叫黄爱，一个叫庞人铨)，结果引起了一个广大的激动，开始反对他。在这两个被杀的工人中，有一个是右翼劳工运动的领袖(即黄爱)。右翼运动的基础是工业学校的学生，而且是反对我们的。不过在这一次和许多次其他的斗争中，我们援助它。在工会中，无政府主义者也

有相当势力，当时各工会已经组织到“全湘劳工组合”[湖南全省劳工会]里面。可是，我们和他们妥协，并且用协议的方法阻止了他们许多次鲁莽而无用的举动。(45)

我被派到上海来帮助组织反赵运动。是冬(一九二二年)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会议。我心中想去参加，可是我忘掉开会地点的地名，找不到任何同志而失去参加的机会。我回转湖南，并竭力推动工会的工作。是年春，发生许多次罢工，为了争取较高的工资、较好的待遇，和争取工会的承认。多数罢工都是胜利的。五月一日湖南发动了一次总罢工，这件事指出了中国劳工运动空前力量的成功。

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是一九二三年在广州召开的，通过了那历史的决议案：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并组织联合战线以反对北洋军阀。我跑到上海去，并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次春(一九二四年)我到广州去，并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大会。三月间回沪，将我在共产党执行部的工作和我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中的工作合并起来。当时部中还有的几个人，就是汪精卫和胡汉民。我和他们一起工作，调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步骤。是夏，黄埔军官学校成立，加伦(现在叫伐西里·布留契尔将军，任苏维埃远东红军总司令之职)担任顾问，还有其他从苏联来的苏维埃顾问。国共的合作开始采取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是年冬，我回湖南休养——在上海时，我生了病。可是回到湖南后，我组成了本省伟大农民运动的核心。

在以前我还未充分了解农民中阶级斗争的程度，可是在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以后，和在随之而来的政治活动的大浪中，湖南农民变成十分地活动了。我利用我所休养的家庭，发动一个农村组织运动，在仅仅几个月内，我们组织了二十个以上的农民协会，同时引起了地主的怨毒，要求将我逮捕。赵省长派兵来抓我，我逃到广州。到达广州时，黄埔学生刚打败了

两个著名的军阀(46)，全城和国民党都充满了乐观的空气。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后，蒋介石先生被任为总司令，汪精卫任政府主席。

我成了《政治周刊》的主编，这是一个国民党的刊物，后来曾极力攻击国民党右翼。我同时又成了训练农民运动组织者的负责人，并开了一个训练班来训练他们。听讲的有二十一个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古来的学生。在我到广州后不久，我成了国民党宣传部的部长。

我写作越来越多了，同时在共产党农民工作中负有特殊责任。根据我的研究和在组织湖南农民的工作中所得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叫《中国社会各阶层(级)的分析》，另一本叫《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在第二本小册中，我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施激进的土地政策和积极地组织农民，陈独秀反对这个意见，并拒绝以中共中央机关的名义出版。后来，它在广州的《农民月刊》和《中国青年》上发表。至于第二本书则是以小册子的形式在湖南出版的。这时我开始不满意陈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渐渐远离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最高峰。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中工作，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一九二六年春，在国民党左右翼和解而国共也重行合作以后，我回到上海。是年五月，国民党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之下开第二次大会。在上海，我指导着共产党的农民部，并被派到湖南做农民运动的视察员。同时，在国共合作之下，于一九二六年秋开始这历史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五个县份(47)的农民组织和政治状况，并作就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方面采取新路线。次春初旬，当我抵武汉时，那里正在举行各省农民代表会议，我就去参加并

讨论建议我的主张，即实行广泛的土地分配。大会决议把我的建议提交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但党中央将它否决了。

当第五次大会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召开时，党还是在陈独秀的把持之下，他不顾一切地反对，还是坚持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当时我对于党的政策非常不满。今日之下，我想假若当时农民运动能更彻底地组织和武装起来作反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现在的情势就要大大地不同了。中国苏维埃的势力必定较现在大为强盛。

可是陈独秀十分不同意我的见解。他不了解农民在革命中的任务，并将当时农民的前途估计过低，因此，在大革命的危机前夜所召开的第五次大会上，不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策。我的意见，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竟不加以讨论，因为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为陈独秀所把持，拒绝将它提出考虑。大会将“地主”定为拥有五百亩以上的人——要在这种基础上发展阶级斗争，是全然不适合和不切实际的，而且忽视了中国土地经济的特质——这样就撇开了土地问题。不过，在大会过后，一个“全中国农民协会”组织起来，我成了它的第一任主席(48)。

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农民运动在湖北、江西、福建，尤其是湖南，发展成为一个惊人的军事力量，虽然共产党的态度对它很冷淡。高级官吏和军事长官开始要求镇压它，说农民协会是“流氓协会”(49)，它的行动和它的要求都是非分的。陈独秀将我调开湖南，因为那里发生了几桩事件，他要我负责，并且猛烈反对我的观念。

四月间，南京和上海开始了反共的运动。在广州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一次暴动，有几十个农人和工人被杀。此后不久国共就分裂了。

许多共产党领袖现在都奉命离开武汉，到苏联或上海或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到四川，我请求陈独秀派我到湖南去，任省委员会的书记，但是十天之后，陈命我速回，责备我组织一个反对当时统治湖南的人的运动。(50)党里的事务现在是一塌糊涂了。几乎每个人都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而国共合作的解体不久也使他没落。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贺龙和叶挺的部队，与朱德合作，领导了历史的“南昌暴动”(51)，并组成了后来变成红军的第一个部队。一星期后，八月七日，党的中央委员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罢免陈独秀书记之职。自一九二四年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大会起，我一直是党的政治局中的人员，并促成了这次决议(罢免陈独秀)。党采取了一个新路线，放弃所有合作的希望。开始了长久的公开的争夺政权的斗争。

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一个运动，就是后来叫做“秋收暴动”(52)的。我在那里的计划是要实现五点：共产党省党部完全与国民党脱离；组织农工革命军；没收大中小地主的财产；脱离国民党，在湖南建立共产政权；组织苏维埃。当时第五点为共产国际所反对，直到后来才进展成为一个口号。

到了九月，靠了湖南的农民协会，我已经组成一个普遍的暴动，并成立农工军第一队。我的部队有三个主要的来源——农民本身，安源的矿工和国民党中叛变的军队。这个早期的革命军队叫做“第一农工军第一师”(53)，是经过省委员会批准后组织起来的。但是湖南省委会的和我部队的总纲领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所反对，不过，它好像只采取一种观望的政策并未作切实的反对。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而仆仆往返于安源矿工及农民自卫军之间时，我被几个民团捕获。那时常有大批赤化嫌疑犯被枪毙。他们命令将我解到民团总部，要在那里杀死我。不过，我曾向

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我想用它贿赂护送兵来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佣的兵，他们并没有特殊的兴趣看我被杀，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我。但是那个解送我的副官不肯答应，因此我决定还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团总部二百码的地方才有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挣脱了，跑到田野里去。我逃到一块高地，在一个池塘的上面，四周都是很长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日落。士兵们追赶我并且强迫几个农民一同搜寻。好几次，他们走到非常近的地方，有一两次近得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可是不知怎样地没有发现我，虽然有七八次我抛却希望，觉得一定再要被捕了。最后，到了薄暮的时候，他们不搜寻了。我立即爬越山岭，走了整夜。我没有鞋子，我的脚伤得很厉害。在路上我碰到一个农民，他和我很要好，给我住宿，随后又领我到邻县去。我身上还有七块钱，拿它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食物。当我最后安抵农民自卫军的时候，我的衣袋中只有两个铜元了。

随着第一师的成立，我成了它的前敌委员会的主席，一个武汉军校的学生成了它的指挥员，不过他多少是因了他部下的态度而不得不就任这个职位的。(54)不久，他就弃职加入国民党。现在他在蒋介石先生手下，供职南京。

这个小小的军队，领导着农民暴动，向湘南移动。它冲破了成千成万军队，作了许多次战争，吃了许多次败仗。当时的军纪很坏，政治训练的水准很低，而官兵中有许多动摇分子，所以“开小差”的人很多。在第一届司令逃走后，军队改组，剩下来的队伍约有一团人，换了一个新的司令。后来他(55)也叛变了。但是在最初的团体中有许多人还是忠诚到底，到今天还在军队中。(56)当这一小队人最后爬上井冈山(一个近乎不毛的山寨，以前为盗匪盘据)时，军队的数目只有一千左右了。



因为“秋收暴动”(57)的计划没有被中央委员会批准,又因为部队受了严重的损失,同时从城市的观点看来这个运动好像一定要失败的,现在中央委员会坚决地排斥我了。将我从政治局和前敌委员会中革出。湖南的省委会也攻击我,称我们为“劫掠运动”(58)。可是我们依然带着我们的军队,留在井冈山,一面确切觉得我们在执行正确的路线,而以后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我们的正确。新的兵士添加进来,这一师又补充起来了。我成为它的司令。

从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秋,第一师以井冈山为根据地。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最初的苏维埃,成立于茶陵,在江西、湖南省边境上,同时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也选举出来。(59)在这个苏维埃,及以后几年中,我们依据了迟缓但是有规律的发展,建立了一个民主的纲领,伴随着一个温和的政策。这使井冈山备受党中央“盲动主义者”谴责,他们要实施一个恐怖政策,劫掠和杀戮地主并焚烧他们的财产以摧毁他们的胆量。第一师的前敌党委会拒绝采用这种策略,于是被一般盲动者戴上了“改良主义者”的帽子。我备受他们的攻击,因为不实行一个更“激烈”的政策。

一九二七年冬,两个以前盘据井冈山附近的盗魁加入了红军。这使我们的力量增加三团左右。这两个人(60)虽然以前是盗匪,曾率领部下投效国民革命军,现在更准备与反动势力斗争。当我留在井冈山上的时候,他们始终是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执行党的一切命令。可是到后来,到他们单独留在井冈山时,他们又回复了昔日的强盗脾气,结果被农民杀死。因为那时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已经苏维埃化,能够保卫自己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来到井冈山,我们的力量合并起来了。我们共同拟了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六县的苏维埃区,我们要稳定和加强湘赣粤三省接境区域的共产党政权,并以此为

根据地逐渐发展到更广大的区域中去。这种策略与党中央办法相反，他们有着迅速扩展的妄想。在军队本身，朱德和我不得不与两种倾向搏斗：第一，要想立即进攻长沙，这我们以为是“冒险主义”；第二，要想退到广东省境之南，这我们以为是“退却主义”。当时我们的见解，以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有二：平均地权和建立苏维埃政体。我们要武装群众以加速这种过程。我们的政策要实现自由贸易和善待被俘的敌军，一句话，就是民主的中庸。

一九二八年秋，一个代表会议在井冈山召开，到会的有井冈山以北的苏区代表。当时各苏区的党员对于上述的政策还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这种异点彻底地消除了。一小部分人以为在这种基础上，我们的前途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大多数人信仰这个政策，因此，党决议提出，宣布苏维埃运动一定会胜利的时候，很容易地就通过了。不过党中央还没有对这个运动批准。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冬，当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的决议录的报告到达井冈山时，才得到批准。

关于在那个会上所采取的新路线，我和朱德是完全同意的。从那时起，党的领袖和在乡村中从事苏维埃运动的领袖间的争点完全消除，而党的调和与一致又重新建立起来了。

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案综括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经验，南昌、广州和秋收暴动的经验，决定应该强调土地革命运动。这时，红军开始在中国其他部分出现，贺龙在西面，徐海东在东面，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农工红军。同时，在一九二七年冬，在邻近福建的江西省东北境上，也发动了一个运动，后来并由此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有一些红军部队都跑到海陆丰去，并在那里成

立了一个苏维埃，但因为它信奉盲动主义，很快地就被破坏了。一部分部队从那个区域里出来，与朱德和我取得联络。(61)

当我们在井冈山上“对冒险主义斗争”的时期中，我们击败了两次军队夺山的企图。井冈山证明了是我们所建立的这一种流动部队的绝好根据地。那里有很好的天然防御，并出产足够的收成来供给一个小小的部队。它的周围有五百里，直径约八十里。在当地，它的名字是另外一个，叫“大小五镇”（真正的井冈山是附近的一个山）(62)。

山上的情况，因来了这样多的军队，变得十分恶劣了，军队没有冬季制服，食粮也极度稀少。有几个月，我们简直靠南瓜过日子，士兵们喊出一个他们自己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尽南瓜！”——因为在士兵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留下彭德怀在井冈山，我和朱德冲破了军队的封锁，一九二九年一月，我们在这个久经战阵的山上所造的第一个居留地就算是终结了。

现在红军开始在江西一带作战，并且顺利地迅速发展起来了。我们在闽西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并和当地的红军联合起来。我们分出军力，继续占领三县并建立了苏维埃。因为在红军到达之先，那里已经有了武装的群众运动，这样，保证了我们的胜利，并且使我们能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很快地加强了苏维埃政权。

附注：

(42)这里明显有误。《西行漫记》记载为：“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43)据《西行漫记》载，当时其他党中央组织有：上海的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李达和李森；湖北的董必武、许

白昊、施洋；陕西的高崇裕；北京的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广州的林伯渠、彭湃；山东的王尽美和邓恩铭等。

(44) 据《西行漫记》载：在法国，党的创始人有周恩来、李立三、向警予、罗迈和蔡和森；在德国，有朱德、高语罕和张申府；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瞿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45) 此段括号内文字为编者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46) 这两个军阀即云南的杨希闵和广西的刘震寰。新版编者注。

(47) 这五个县即：长沙、醴陵、湘潭、衡山和湘乡。新版编者注。

(48) 在《西行漫记》中，“第一任主席”译为“第一任会长”。

(49) “流氓协会”在《西行漫记》中译为“痞子会”。

(50) 在《西行漫记》中，此处为：“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51) 即南昌起义。编者注。

(52) 即秋收起义。编者注。

(53) 这个军队在《西行漫记》中称做“工农第一军第一师”。

(54) 《西行漫记》中，这个“前敌委员会的主席”译作“前敌委员会书记”，而那个“武汉军校的学生”名叫余洒度。

(55) 此人叫陈浩。编者注。

(56) 例如：罗荣桓、杨立三等将领。编者注。

(57) 即秋收起义。编者注。

(58) 《西行漫记》译为“枪杆子运动”。编者注。

(59) 据《西行漫记》载，这个苏维埃政府“主席是杜修经”。

(60) 据《西行漫记》载：这两个人就是王佐和袁文才。王、袁都被任为团长，毛泽东任军长。

(61) 据《西行漫记》载：江西的运动是由方志敏和邵式平领导的；海陆丰的运动是彭湃领导的。“广州暴动”即“广州起义”。编者注。

(62) “大小五镇”在《西行漫记》中称做“大小五井”，“五井这个名称是从山麓五口大井得来的，即大、小、上、下、中五井，山上的五个村就是以这五口井相称”。编者注。

## 第四章 英勇忠诚和超人的忍耐力

红军的情况在物质和政治两方面，都开始有进步了，但其中还有许多恶劣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个弱点，这反映了训练的缺乏、民主政治的夸大观念和组织的松懈等等。还有一个倾向不得不与之搏斗的，就是“流氓性”(63)——不喜欢在政府的严重工作中安身，喜欢变动和新的事物。还有一种是军阀主义的残余，有些官长虐待甚至殴打弟兄，并且随意反对对自己个人所讨厌的人，而对其余的表示好感。

许多这些弱点，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闽西的一个会议召开后，都一一克服了。会议中讨论了各种改进的思想，消除许多误解，并采用新计划，这样奠定了红军中崇高的意识领导的基础。在这以前，这些上面提过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并且为党中“托派”和军事领袖所利用以削弱这个运动的力量。这时我们展开了对“托派”的猛烈斗争，好几人被剥夺了他们在党中和军队中的职位。我们发现了他们在战时常领导红军陷入艰难的地位，企图毁坏红军；在几次败仗以后，他们的计划是十分明显了。经验显示了他们的错误，将他们从负责的职务中革除，并且在这个会议后它们就失势了。(64)

福建会议开辟了建立江西苏维埃政权的道路。次年，赣南全部掌握于红军手中。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一个重要的地方会议在赣南召开，讨论苏维埃以后的纲领。到会的有党政军的地方代表。会中，土地政策经过长时期的辩论，而对“机会主义”(为反对重新分配土地的人所领导)的斗争是克服了。大会决议实施土地分配和加速苏维埃的建立。当时，红军只是成立了地方苏维埃和县苏维埃。在大会上，大家决议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兴国。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援助。

渐渐地，红军对群众的工作进步了，军纪加严，而组织群众的新技术也在发展起来。早在井冈山时，红军已经对战斗员订下了三条简单的规则，即：服从命令；不没收任何贫农的财产；将一切没收地主的物品立即交给政府处置。在一九二九年的会议后，对于取得农民帮助的工作异常努力，在上述的三条之外，另加了八条规则：

- 一、当你离开一个人家，将一切门板(睡觉用)放到原处；
- 二、归还你所睡的草褥并将它卷好；
- 三、对老百姓要谦和并随时加以帮助；
- 四、归还一切借用的物品；
- 五、赔偿一切损坏的物件；
- 六、和农民以诚相待；
- 七、购买一切物品须付钱；
- 八、讲卫生，尤其是要在距离人家很远的地方设立厕所。(65)

这八点的施行，愈来愈见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士兵的规律，要他们记忆并时时复诵。另有三种任务要教给红军，当做它的基本宗旨的：第一，誓死与敌人斗争；第二，武装群众；第三，捐钱帮助战争。

除开这种运动的政治基础不算，红军的战术也进步了，这是顺利的军事发展的原因。在井冈山时，我们有四个口号，都是游击战术的主要方法，红军就是靠了它发展起来的。这四个字一条口号是：“敌进我退”，“敌停我扰”，“敌避我攻”，“敌退我追”，最初为许多人所反对，他们不主张采用这种战术，可是许多经验证明了它们的正确。凡是红军脱离了这种战术的时候，一般总是失败的。红军的人数很少，较敌人少一二十倍；它的资源和军需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巧妙地把计策和游击战术联合起来，才有希望战胜有着广大富庶根据地的敌人。

红军战术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在攻击时集中它的主力，而随后能加以迅速地分散。这就是说，要避免阵地战，而在运动中要用尽各种方法和敌人的部队接触并且击溃它。根据这种方策，虽然许多有经验的军人不赞成，红军发展了这种神奇的运动战，和迅速而有力的“速战”。

在一般苏维埃区的发展中，红军是偏于一种“波浪式”的发展的，而不是那种不平衡的前进——以“飞跃”获得的前进，并不巩固所占领的土地的前进。这种政策是切乎实际的，正和上述的战术一样，是从多年所积聚的军事政治的经验而来的。这些战术受当时中国共产党书记李立三的严厉批判，他说红军的方法是一种“新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李立三希望攻击而不要防御，前进而不要巩固后方；对大城市加以惊人的攻击，伴随着暴动和极端主义。当时，李立三路线把持了苏维埃区以外的党部，并且势力很大，并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红军接受这种路线，不顾在战地中官长的判断。其结果为进攻长沙和进攻南昌的失败。可是在这几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游击队的活动，并且打开它的后方让敌人进来。

一九二九年秋，红军移到赣北，攻击和占领了许多城市并击退敌军多次。当红军距南昌极近时，它突然折向西面进取长沙。在这次进军中，我们和彭德怀的部队会合。彭已经占领过一次长沙，不过终因受强大优势敌人的包围而退却。彭是一九二九年四月退出长沙的，此后，即在赣南一带活动，结果大大地增加了他的军队。一九三〇年四月他在瑞金重与朱德和我会合，并在一个会议后，决定他应该在湘赣边区活动，而朱德和我则移到福建去。一九三〇年六月，我们重新建立了联络。并开始第二次进攻长沙。我们的军队都合并为第一方面军，以朱德为总司令，我为政治委员。在这种领导下，我们到达了长沙城外。

这时，中国农工革命委员会已经组织起来，我被选为主席。当时红军在湖南的势力很广大，在江西也差不多。我的名字流传湖南农民之间，因为捕获到我有十万重赏，不论生死，被悬赏缉捕的还有朱德和其他共产党。我在湘潭的土地（靠了这个地租我在大革命时代曾用以组织湖南的农民运动），现在为政府没收了。我的妻妹被处决。其余的后来都释放了。（66）

红军的威信在农民中大为增高，而且竟达到我的家乡湘潭。因为我听说当地的农民都相信我不久就要回转家乡，并有一天，一架飞机飞过家乡时，他们断定这就是我。他们警告耕种我的土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的旧田庄，看看有没有树木被砍伐。假若树木被砍伐的话，他们说，我要向蒋介石先生索偿！

不过第二次进攻长沙失败了。大批援军开到，城中驻扎了大军，此外，在九月间，新的军队更源源开来攻击红军。在这次围攻中，只发生了一次主要的战争，此役我们消灭敌军两旅。不过，我们并没有能攻下长沙城，在几周后，我们就退回江西去了。

这次失败，帮助我们毁坏“李立三路线”，并拯救了红军，使它没有向武汉进攻，这是当时李所要求的。当时红军的主要工作是招募新兵，开辟新的苏维埃区，尤其是巩固整个已经掌握在红军手中的区域的苏维埃政权，因为这一类计划，如进攻长沙等并非急务，而且含有机会主义的元素。不过，假如在第一次占领时只是作为暂时的举动，并不想守住这个城和建立一个政权，那么它的影响可以说是有益的。因为革命运动所引起的反应是非常大的。所谓错误是关于战略一方面的，就是在后方的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巩固时，企图以长沙为根据地。

但李立三将当时红军的战斗力量和民族政治背景的革命因素估计过高，深信革命已接近成功，而且不久就可以取得全



国的政权。这种信仰更因受了当时的久长而疲竭的内战的鼓励，它使前途好像大大地偏护李立三。可是红军的意见以为：敌人正在准备大举进攻苏维埃，只要内战(67)一停止；而且现在不适于艰险的“盲动主义”和冒险。

在湖南事件之后，红军回到江西，尤其是占领吉安之后，在军队中，“李立三主义”被克服了，李本人的错误已经证明，不久他更失去在党中的势力(李现在莫斯科“研究”)。不过，在“李立三主义”确定地埋葬以前，在军队中有一个很危险的时期。一部分军队倾向李的路线，并要求与其他军队脱离。不过，这一部分的指挥员——彭德怀猛烈地与这种倾向搏斗，并能维持他部下的统一和对高级指挥的忠诚。但有一些红军部队公开叛乱了，并逮捕江西苏维埃的主席和许多官吏，并根据李立三路线从政治方面攻击我。这件事在富田发生，就叫“富田事变”(68)。富田靠近吉安，是当时苏区中心，这件事产生了一种激动，许多人都以为革命的前途全要看这次斗争的结局如何了。但，因了党部的健全，红军部队的忠诚和农民的拥护，这次叛变很快也就镇压下去了。为首的被捕，其余叛徒都经缴械消灭。我们的路线重新加强，坚决地镇压“李立三路线”。结果，以后的苏维埃运动获得了重大的进展。

现在南京政府彻底感觉到江西苏维埃的革命潜力之大了，在一九三一年底开始对红军的第一次的围剿。国军总共有十万人，开始包围红苏区，分五路进犯，当时红军共动员两万人来对付这些军队。靠了巧妙地利用计策战术，我们冲破了第一次围剿，获得了绝大的胜利。依据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我们以主力分别攻击各个部队。让敌军深入苏维埃领土，然后以超越敌军的人数对与大军隔离的部队突然加以攻击，占据了优势的阵地，使我们可以暂时包围敌人，这样反转了数量上远占优势的敌军的战略利益。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围剿完全失败。我相信假若红军在这以前没有能得到以下

三个条件，胜利是不可能的。三个条件是：在集中指挥下的我们力量的巩固；“李立三路线”的清算；党部对肃清红军及苏区中的“AB团”及反革命分子的胜利。

休息了只有四个月。第二次围剿开始了，由现任军政部长何应钦做最高指挥。他的军力超过二十万。分七路进攻苏区。一时苏区的情势好像很危险。因为苏维埃政权非常弱小，资源有限，而且国军的物力几乎各方面都远胜苏区。但红军仍就抱定了前此得胜的同一战略应付这一次进攻。让敌军的纵队深入苏区后，我们的主力突然集中在敌军第七路[第二路]，打败好几个团，并摧毁了它主要的进攻的力量。在我们攻击以后，马上接二连三地依次击败了第三、第六和第七路。第四路不战而退，第五路一部分被击溃。在十四日之内红军作战七[六]次，行军八日，以决定的胜利结果这次战争。随着六路的溃崩或退却，第一路，蔡廷锴是指挥之一，没有大打就退了。(69)

三[一]个月后，以三个最有能力的指挥为辅，蒋介石先生率领三十万人作“赤区最后一次的清剿”。蒋企图以狂风骤雨的方法扫荡“赤匪”。他开始以每天八十里的行军进入苏维埃领土的心脏。这恰恰给予了红军所最擅长的战斗条件，它立即证明了这个战术的严重错误。以仅有三万人的主力，靠了一串灿烂的战略，我们的部队，在五日之前攻击了五个不同的纵队。在第一战，红军俘获许多部队和大量军火、大炮和军需品。到了九月，第三次围剿已经失败，十月间蒋撤回他的军队。(70)

现在，红军进入了一个较为平和及成长的时期，很快地扩展起来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召开，建立了苏维埃中央政府，以我为主席，朱德被选为红军总司令。同月，“宁都暴动”(71)发生，万余政府军叛变而加入红军……

现在，红军开始采取它自己的攻势，占领了好几个城市。从一九三二年起一直到长征西北为止，我个人的时间几乎全部限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军事指挥交给朱德和其他人。

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围剿开始，也许是最艰险的一次。在第一战，敌军两师被缴械，两个师长及三万人被俘。另一师，当时最精锐的一师，接着被消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师长重伤。这些捷战证明了战略有着决定的作用，第四次围剿不久就结束了。(72)

到第五次——最后一次围剿，蒋动员了近百万的军队并采用了一个新的战略和战术。在第四次围剿时，蒋已经采用德国顾问的建议，开始利用封锁和堡垒制度了。到第五次围剿，他把全部信赖都放在这上面。用他的军队来实施严密的封锁和整个地包围苏区，他谨慎地推进。一面建造汽车路、堡垒和壕沟，避免主力和红军接触，并且仅仅在堡垒的后面作战，只是完全在飞机、大炮和机关枪的掩护之下，作短短的推进。

这时期，我们铸了两个大错。第一是在一九三三年“闽变”时，未曾与蔡廷锴的军队密切联合；第二是采取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战略，放弃以前用计诱敌的策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想与占优势的军队作阵地战，在这方面，无论在技术上或精神上，红军都非所长。

因了这些错误的结果，和国军的采取新策略，加以在数量上、技术上远胜于红军的军队，红军不得不一九三四年进行改变它在江西的生存条件，因为它很快地在恶化起来了。而当时民族政治的情势，也影响了我们移到西北去活动的决议。在日本侵略“满洲”和上海之后，苏维埃政府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就和日本正式宣战了。自然，这种宣战，在当时是不能发生效力的。跟着我们又发表宣言，号召中国各军结成联合战线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早在一九三三年，苏维埃政府就宣布它情

愿根据三个条件和任何军队合作，这三个条件是：停止内战和对苏维埃及红军的攻击；保障群众结社、集会、言论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武装人民对日抗战。

这个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开始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在苏维埃首都——瑞金召开，对过去革命的所有成就加以检讨。会中我作了一个长报告，并且会中选出了今日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全体人员，如今日存在着的。不久长征的准备开始了，这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着手的，恰在发动第五次围剿一年之后。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主力抵贵州遵义。接下去四个月，红军几乎一直在流动之中，并发生了最激烈的战争。经过许许多多困难，跨越几个最高最险的山道，经过凶恶土番所居的地方，经过无垠的草原，经过严寒和酷热，经过风雪和暴雨，背后面对着全部国军的一半的追击，经过所有这些天然的障碍，沿途并与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和陕西的地方军队作战，最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到达了陕西，并建立了在中国伟大的西北的根据地。

这次红军光荣的进军和胜利地到达陕西，第一是因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二是因为苏维埃人民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技巧、英勇、坚决和几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的热忱。中国的共产党在以前、现在和将来，将永远忠诚于马列主义，并对每一个机会主义者作斗争。这种决心解释了它的不可克服性和它的最后胜利的必然性。它的不可克服性的另一理由，就是在革命干部中的人材的特别精干、英勇和忠诚。许多，许多优秀的同志，许多献身于革命的人，都在一个宗旨下工作，造成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他们和那些未来的同志，将要领导革命到最后胜利。

现在，我们正努力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族统一联合战线，邀请真心抗日的各党、各派、各军来参加我们的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要想和日本帝国主义搏斗及拯救自己的国家，这种战线是必需的，同时在中国建立彻底民主的政府也是必需的。今后我的工作和目标，与党的红军的工作及目标相同，必须向这种成功做去。

附注：

(63)这里的"流氓性"，即指"流寇思想"。编者注。

(64)这次会议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即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托派"即"托洛茨基派"。编者注。

(65)此八条即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主要内容。序号为编者所加。

(66)据《西行漫记》载：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和妹妹，还有其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人的妻子，以及他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其中妻子和妹妹被杀害。编者注。

(67)此处的"内战"是指"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战争"。编者注。

(68)据《西行漫记》载，"富田事变"的哗变者是第二十军的刘铁超。

(69)此段括号内文字为编者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70)此段括号内文字为编者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71)"宁都暴动"，即宁都起义，是由董振堂、赵博生领导的，国民党二十八路军两万余人起义后参加红军，从而建立了五军团。赵博生后来在江西作战时牺牲，董振堂曾任红五军军长。

(72)第四次反围剿，红军先后歼灭了国民党第五十九师、第五十二师和第十一师。蒋介石当时曾写信给他的战地司令官陈诚，说他认为这次失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陈诚是不赞成搞这种"围剿"的。他当时对人说，在他看来，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身职业"，也是一种"无期徒刑"。这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陈诚的总司令职务立即被解除。编者注。

## 附录一 毛泽东论中日战争

记者于去年七月初旬踏进陕北，在那里停留了四个月。曾遍游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并与前线红军相处一月。在保安我遍访了其中高级官吏，并与毛泽东先生详论许多事情。现在把关于中日问题的议论用问答体写出，以飨读者。

记者问：你们主张全国联合起来，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战而将其驱出中国。这是不是说中国现在已无须外援而能单独战胜日本？

毛答：首先我要提醒你，中国和日本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东方的治乱问题是一个世界的问题。日本暗中自有其同盟国——如德、意等——同时中国要想抗日成功也必须在其他强国中找到援助。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外援，中国就不能和日本决战，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抗日以前一定要找到外援。

中国蓄有巨大的潜力，在伟大的斗争期中，一定能经组织而成为无比的抵抗线。中国人民在过去的斗争中已经深切地了解这种力量，并且找到了运用它的良方。中国的大众靠了长久的政治经验，已能熟练地运用他们极有效的武器去反抗他的敌人。

我们坚信中国人民决不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坚信在战场中，他们要动员他们的巨大潜力以抵抗日本，以他们最大的精力和侵略者的挑战周旋，在这个斗争中，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假如中国单独地作战，自然牺牲较大，战期较长，因为日本有精良的军备，此外它也有它的同盟国。所以要想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牺牲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者，中国首先要在自己的境内组成联合战线，其次还要将它扩展到关心太平洋和平的列强。

问：在何种条件之下，中国人民能战胜日本的军力？

答：三个条件能保证我们的胜利：一、中国反日本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成立。二、世界反日战线之组成。三、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人民革命之发动。但其中最主要的自然还是中国人民本身的联合。

问：请问这样的战争要拖延到多久？

答：这要看中国政治动员的力量，中国及日本的许多有条件的因素，和国际援助中国的程度以及日本革命发展的迟速而定。假如中国的政治动员是强有力地匀称，假如在纵的和横的方面都是有效地组织起来，假如明了自身利益受日本帝国主义威胁的国际方面大量地予中国以援助，假如日本革命很快地爆发的话，那么战期是短的，而且很快地就能得到胜利。假如这些条件不能具备的话，那么这次战争是非常长久。但结局日本还是要败的，只不过我们的牺牲重大，且成为全世界的一个苦痛的时期，所以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都已准备和任何国家联合以缩短战期。但假如无人与我们联合，我们还是要单独地干的。

问：请问此种战争之政治及军事的发展趋向？

答：这里包括有两个问题——列强的政策，和国军的战略。

现在，日本的大陆政策大家知道它是已经决定的了。那些以为再牺牲一点中国的主权，作经济上、政治上或领土上的妥协和让步，就可以停止日本的侵略的人，是在运用乌托邦的战略。

我们深知不仅是华北，连长江下游，南方的海口都包括在日本的大陆计划里面。同样地清楚，日本海军是要封锁中国沿海及夺取菲律宾、安南、暹罗、马来和荷属东印度的。在战争

中，日本必企图将那些地方作为军事根据地，将英法美和中国隔断，同时独占南太平洋中的几个海，这些计划都包括在日本海军战略中，这是我们在几本小册子上看到的。而且这种海上战略必与陆上战略相互协调。

在那时，中国自然要处于一种极端困难的地位。但中国大众是相信可以去克服这种困难的，只有住在中国海口的阔人才是必败论者。他们怕失去他们的财产。

关于中国的经济问题，军火的供给等，即日本海军的封锁及商业停顿等问题，一定会引起列强的反应。假如他们袖手旁观，让日本很容易地封锁中国如封锁“满洲”一样，那么，日本方面的工作自然是大大地减轻了。

理论地说，我们的战略自然是“内部战线”的战略。这就是说，假如外国——英、美、法、苏等国要冲破日本的封锁，他们自己会组织成一个“外部战线”的。那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就要受到内外夹攻。这样在短时期内，就可以包围和粉碎日本的“皇军”了。

有许多人以为只要日本抓到几个中国的沿海要镇，实行封锁以后，中国就不能和日本继续作战了。其实这是不通的。只要看我们的战史就能驳倒它了。这解释就是，我们已在境内的全体人民中，组成了一个岩石般的坚体。因为每一个人都准备为他们的政府而战，每个人都是自动的，有意识的为着本身的利益和正义而战。此外人民都是被有才能、有力量、有决断，同时对于他们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需求有着深切了解的人所领导的。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所得的便利，更十分巨大。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民族，只要还有寸土未在侵略者的军刀之下，就还不能说是被征服。就算日本能占据拥有一二万万人口的土



地，要打败我们，还差得很远。我们仍有很大的力量去抵抗日本军阀，而且叫日本在整个战期中要非常艰苦地去防御后方。

关于军火方面，因日本不能夺取我们内地的兵工厂，这已经够中国军队用许多年了，同时它也不能禁止我们从它的手中夺取大量的军火。只要全中国的人民联合起来反日，那么运用这种战策以战胜日本是有多大的可能性啊！

在经济方面，中国自然不统一。可是中国这种经济的不平衡的发展和日本高度集中的经济相比，在战时反而于我有利。譬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部分隔绝，对于中国，并不如将纽约隔绝时使美国所感受的困难。而且，日本要隔绝中国是不可能的，它就不能封锁中国的西北，因为日本即使在大陆上也还是靠着海军力的。所以问题的中心还是在中国人民的统一和动员。

问：在中日战争中，你以为日本会不会发生革命呢？

答：日本的革命不仅可能而且是必然的。在日本碰到第一次大败后，革命就要不可避免地发动了。

问：你以为苏联及外蒙是否要参加这次战争以助中国？并发生于何种情势之下？

答：当然苏联也不是一个孤独的国家，它不能漠视远东的事变。它是不得不动的。还是让日本征服全中国后，以之为攻击苏联的根据地呢？还是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以获独立，而与中国的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想苏联一定是采取后一条路途的。

我们相信只要中国人民开始抗战，并需要和苏联以及其他友邦建立友好的同盟时，那么苏联一定会做与我握手的先锋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世界的事业，苏联既是世界的一部分，它自然不会较英美更守中立。

问：中国人民是否立须夺回全部失土还是仅将日本驱出华北及长城之外？

答：中国必须立即夺回全部失土，不仅要保卫长城以内的土地，还要夺回“满洲”。但我们并不将朝鲜包括在内，虽然从前是中国的殖民地。但是，假如朝鲜的人民想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锁链的话，我们自然要加以热烈的援助。

问：假如战争延至极久而日本不败，那么能否承认日本征服满洲以求和平？

答：不可能的！中国人民决不能让日本占有中国寸土！

问：如何才能将人民至善地武装，组织及训练起来以参加战争？

答：人民必须有组织自己及武装自己的权利，当大众获得经济的、社会的，及政治的自由时，他们力量将十分地伟大，在那时才可以看出我们民族的真正力量。

反日义勇军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获得行动的自由，武装了他们自己，遂成了不可征服的力量，假使中国人民一旦有了训练、武装及组织，他们一样的也会成为不可克服的力量的。

问：在此次“解放战争”中当用何种战略？

答：这战略就是游击战，在一条？迥的、流动而不定的战线上，战略的成功全靠在困难的地域中能有高度流动性，就是迅速地攻击和迅速地退却，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将是一种大规模的游击战，而非单纯的阵地战，非长壕重兵、坚垒之战。我们的战略是依战地而定的，即游击战。

但这并不是放弃重要的军事点，那还是可以看情形而作阵地战的。但是，中枢战略一定要是游击战，而且对于别动队和

游击队要有重大的信赖。堡垒战必须利用，但只是辅助的，在战略上根本是次要的。

在地理方面来说，战场是如此广大，所以我们能以最高的效率和效力，和日本从事流动的战争，因为他们的军事机构是呆滞的，时时要防御当前的掩袭。在狭隘的战场上，极度集中和尽力防御一二要镇，会失去我们在地理上、经济组织上的利益，而且正重复了阿比西尼亚的错误。在战争初期，我们的战略必须注意避免重大决战。同时要渐渐地摧绝敌军战斗精神、军纪以及现有的军事效率。

阿国的错误，姑不论其内部政治上的弱点，正在他们想保有一条深广的战线，使法西斯蒂能轰炸，能使用毒气，能将技术上较强的战事机构作滞重的集中，给阿国以致命的有机的伤害。

除去中国正规军外，我们还须在农民中组成，指导，以及政治地、军事地建立大量的游击队和别动队。在满洲，这种典型的反日义勇军的成功，只不过是全国农民中可以动员起来的潜力的极小表现而已。有适当的领导和组织，这种队伍可以使日人朝夕奔忙，忧愁得要死。

要晓得这次战争是在中国境内的，这就是说日本的周围全是“敌忾同仇”的中国人，这样日人必须积藏他们所有的给养，同时还要看守它；各交通线上都要有兵驻守，而且在他们根据地——满洲——日本也要驻有重兵。

在战程中，中国军队可以捕获许多日本俘虏、枪械军火。这样，到了某时期，我们就可以渐渐和日本作阵地战，可以利用堡垒、深壕了。因为在战程中，反日军力的技术设备一定会大大地进步。同时还可以从重要外援中加强起来。在长期占领中国的糜费重压下，日本的经济是要崩溃，同时在无数不定的

艰苦战争之中，他们的军心是要涣散的。当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粉碎于中国抵抗的暗礁上以后，中国人民中潜伏大量的人力，还可以送出无数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的人民到前线来。

这些以及其他因素，决定了这次战争，使我们能对日本的坚垒和军事根据地加以最后的决定的打击，将占领的日军驱出中国。

我们将欢迎并款待被俘的，被解除武装的日本官兵。我们将不杀他们而兄弟一般地款待他们；因为我们和日本的无产阶级士兵并无仇恨。我们要用尽方法使他们觉悟，和他们联合起来，打倒他们国内的法西斯军阀。反法西斯的日本士兵是我们的朋友，因为他们和我们的目的是相同的。

## 附录二 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

在外表看起来，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女士简直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妇。其实，她的性格是非常活泼的。很少有人看见她穿长衣服，十年来总是穿着那一套红军的制服，皮带上挂着手枪；她曾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剿共军队对过阵，在前线上运伤兵。到后方去，调护病人，组织女军，而且，在北上战役中曾受过伤，甚至几乎送了性命。(1)

自与毛泽东同居以来，九年之中终日是奔走劳碌，七年之中生过五个孩子，但这些孩子全送给了人家，她自己一个也不要。

红军由江西总退却时，她随军同行，直到陕境，步行二万五千里。她先后被炸伤廿几处，到现在，身上还找得到累累的创痕。

她现在二十七岁，但反抗的火焰毫未消灭。在这八千英里的退却中，她受尽了人间的痛苦。受伤以后，先叫人抬着走，以后换人背着，用骡马驮着，到最后人和马全没有了，便只好步行。而同时，在长征途中又产生了一个小孩，她真是受尽痛苦的人了。

在红军中大家都叫她“女司令”。本为江西永新县云山人，是一个小地主的女儿，她父亲也曾当过一任县长。

她曾进过教会小学，她妹妹嫁给毛泽东的弟弟泽覃。泽覃为国军所杀，而她的妹妹也至今生死不明。

她由小学校出来后，就在本县参加妇女运动，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是年八月一日至廿日之南昌女共军抵抗国军一役，即由她领导。

她同毛泽东是在民国十七年结的婚。她在共军中曾先后担任政治教授，看护，妇女组织的领袖；而在战时，她又是军人——总之，随时随地，她全有工作。

附注：

(1)括号内文字为编者加。

## 附录三 斯诺眼里的毛泽东

斯诺眼里的毛泽东(见附注 1)

小村庄在西北很多，但是城市不论大小却不常见。除了红军草创的工业以外，西北完全是个农业区，有些地方，还是半游牧区。因此，纵马登上崎岖的山顶，看到下面苍翠的山谷中保安的一片古老城墙，确实使人觉得十分意外。

在唐朝和金朝的时候，保安曾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边防要塞。至今人们犹可在一条狭仄的隘口两旁，看到堡垒的残迹，被下午的阳光染成一片火红色。当年蒙古人的征略大军，就是通过这条隘口大举倾入这个山谷里来的。保安还有一座内城，从前驻扎过边防军；最近经过红军修缮的一道高大的用作防御的砖墙，围绕着约莫一英里见方的地方，就是现在保安城所在。

我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南京同他打了十年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用最近采用的正式头衔，就是“ 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 ” 的主席。旧名“ 中华工农苏维埃共和国 ” 已在共产党开始实行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的时候放弃了。

周恩来的电报已经收到，他们正等待着我，“ 外交部 ” 里已替我预备好一个房间，我暂时成了苏维埃国家的客人。我到了后，保安外侨的人数顿然剧增。另外的一个西方侨民就是一个称做李德同志的德国人。

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关于毛泽东，我可以单独写一本书。我跟他谈了许多夜晚，谈到各种广泛的问题，我也从士兵和共产党员那里听到关于他的许多故事。我同他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有大约两万字。他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他怎样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一个领袖，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怎样成长壮大起来，他统统告诉了我。他向我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我。他又告诉我许多其他著名的红军战士的故事，从朱德一直到那个把藏有苏维埃政府档案的两只铁制文件箱背在肩上走了长征全程的青年。

从这样丰富的未经利用、不为人知的材料中，我怎么能够用寥寥数百个字把这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家的故事告诉你们呢？我不想作这样压缩的尝试。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我以后还要根据他所告诉我的情况，把他个人历史的那个丰富的激动人心的纪录写进本书。但是我在这里想要谈一些主观的印象，还有关于他的令人感到兴趣的少数事实。

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以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



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但是我并不想宣布历史的判决。同时，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以外，毛泽东作为个人也是一个使人感到兴趣的人物。因为，虽然他的名字同蒋介石一样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可是关于他的情况却很少知道，因此有着各种各样关于他的奇怪传说。我是访问他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

毛泽东有能够从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南京曾经一再宣告他死了，可是没有几天以后，报上的新闻栏又出现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跃如昔。国民党也曾经好几次正式宣布“击毙”并埋葬了朱德，有时还得到有“千里眼”的传教士的旁证。尽管如此，这两个著名人物多次遭难，可并不妨碍他们参与许多次惊人壮举，其中包括长征。说真的，当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报上正盛传毛泽东的又一次死讯，但我却看到他活得好好的。不过，关于他的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看来是有一些根据的，那就是，他虽身经百战，有一次还被敌军俘获而逃脱，有世界上最高的赏格缉拿他的首级，可是在这许多年头里，他从来没有受过一次伤。

有一个晚上，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曾在欧洲学习、精通医道的人——给他作全面体格检查，我正好在他的屋子里，结果宣布他身体非常健康。他从来没有得过肺病或任何其他“不治之症”，并不像有些想入非非的旅行家所谣传的那样。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尽管他跟大部分红军指挥员不一样，吸烟没有节制。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和李德（另一个烟瘾很重的人）

进行了独特的植物学研究，遍尝各种的叶子，要寻出烟叶的代替品来。

毛泽东现在的夫人贺子珍——从前是小学教员，现在本人也是个共产党的组织者——却不及她丈夫幸运。她受到过十多处伤，是炸弹碎片造成的，不过都是表面的伤。正当我离开保安以前，毛氏夫妇新生了一个女孩子。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曾生了两个孩子。她是一个中国名教授的女儿，数年前被何键杀害。

毛泽东现年(一九三七年)四十四岁。在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这次大会的出席者，代表着当时生活在红色法律下的九百万左右的人民。说到这里，我要附带插入几句话。据毛泽东的估计，中央苏维埃政府在一九三四年直接控制下的各区最高人口数字如下：江西苏区三百万；鄂皖豫苏区二百万；湘赣鄂苏区一百万；赣湘苏区一百万；浙闽苏区一百万；湘鄂苏区一百万；总共九百万。有些估计高达此数的十倍，令人难以置信，大概是把红军或红色游击队所活动的各个地区全部人口加在一起而得出来的。我把中国苏区人民有八千万的数字告诉毛泽东的时候，他就笑了起来，并且说，要是他们真的有这样广大的面积，革命就差不多胜利了。不过当然，红色游击队的地区，人口还有好几百万。

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几乎所有组织里，他都是一位委员——如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财政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因为政治局有着决定党、政、军政策的大权。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

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做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一个个都这样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还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

红军正在保安盖起几所新建筑，但当我在哪里的时候，住处是非常原始的。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过了，但因为是一个湖南“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

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

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八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唱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

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挥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红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附带说一句，“赤匪”中间流行的一首最有趣的歌曲叫《红辣椒》。它唱的是辣椒对自己活着供人吃食没有意义感到不满，它嘲笑白菜、菠菜、青豆的浑浑噩噩，没有骨气的生活，终于领导了一场蔬菜的“起义”。这首《红辣椒》是毛主席最爱唱的歌。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

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甚至在长征途上，红军似乎也收到无线电新闻广播，在西北，他们还出版着

自己的报纸。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他似乎觉得很难理解，像英国那样工人有参政权的国家，为什么仍没有一个工人的政府。我的答案恐怕并没有使他满意。他对于麦克唐纳表示极端的蔑视，他说麦克唐纳是个“汉奸”——即英国人民的头号叛徒。

他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看法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他相信罗斯福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又问到许多关于美国新政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问题。他所提问题表明他对于这两个政策的目标都有很明白的了解。他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做走江湖的骗子，但认为墨索里尼能干得多，一个真正的权术家，有历史知识，而希特勒，却不过是资本家的没有意志的傀儡。

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主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不会实现独立的。他问到我关于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领袖的情况。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黑人问题，把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对照。我指出美国的黑人和苏联的少数民族在历史和心理背景上有着某些很大的不同，他对此也表示有兴趣。有兴趣——但是并不同意我。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

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我常常在想毛泽东自己对于武力、暴力以及“杀人的必要性”等问题的责任感。他年轻的时候，就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转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只能是在哲学上开始的。虽然他出身农民，但在年轻时候，本人却不曾怎么受过地主的压迫，像许多共产党员那样。还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据我的推想，阶级仇恨对他来说大概基本上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

他的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宗教感情的东西。我相信他的判断都是根据理性和必要作出的。因此我认为他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大概基本上起着一种节制的作用。我觉得他想把他的哲学，即“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任何大规模行动中的权衡标准，而在这个思想范围内，人命的宝贵只是相对的。这在中国的领袖人物中间显然是很不平常的，因为从历史上来说，他们往往置权宜于伦理之上。

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

有一次，毛泽东曾经花了整整一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他靠挨家挨户替农家做工换饭吃，有时候甚至靠行乞。有一次他几天不吃饭，只吃些硬豆和水——这又是一种“锻

炼”肠胃的方法。他早年在这次农村漫游中所结交的友谊，日后对他是有很大价值的，因为十年以后，他开始把湖南的成千上万的农民组成了有名的农民协会，这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成了苏维埃最初的基础。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两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在那次暴动中他的省里有几个饥饿的农民因到衙门要粮而被砍了头。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

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 1 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二十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在六千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在最近几年中，他只要“叛变”投向国民党，就可以升官发财，这也适用于大部分红军指挥员。

这些共产党人十年来忠于主义的坚定性，你如不知道中国收买其他造反者的“银弹”的历史，是无法充分估计的。

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我有机会核对他的许多话，结果往往发现这些话是对的。他对我进行了几次不太过分的政治宣传，但是同我在“非匪区”所受到的政治宣传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

由于在今天中国政局上的极大重要性，他的关于共产党政策的一些主要讲话，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因为在今天，西北全境以及其他各地武装和非武装的中国人民似乎都拥护他们的许多政策，因此，这些政策很可能成为造就中国命运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手段。

附注：

(1)此文是《西行漫记》中文版重译本第三篇《在保安》的第一节《苏维埃掌权人物》，有删节。据编者考证，此篇曾以《毛泽东印象记》为名，出版过单行本。题目为编者所加。



# 编后：《毛泽东自传》出版的前前后后

## 伟大的人物 伟大的故事

本书责任编辑：丁晓平

在毛泽东诞辰 108 周年和逝世 25 周年前夕，尘封 64 载的传奇之书《毛泽东自传》，日前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今年 4 月 19 日，一本 1937 年出版的《毛泽东自传》惊现于古城西安。10 天之后当我从北京飞赴西安，看到这本尘封了 64 载的传奇之书的那一刻，我仍然按捺不住我这颗因激动而颤抖的心灵，它仿佛是一位饱经沧桑的圣者，给我讲述那穿越历史时空隧道的悠远而有神奇、神秘而有新鲜的故事。

《毛泽东自传》是一本十分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而在解放前的“国统区”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发行《毛泽东自传》非常罕见，这是因为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领袖的传略只能以别的书名或以“隐蔽”的方式出版。而且由潘汉年亲笔题写书名的也是第一次发现。

《毛泽东自传》是一本真实生动、自然亲切，又撼人心魄的好书，捧读它，就好象是在面对面地聆听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你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没有做作，没有浮躁，没有功利，也没有传奇。这些故事有的平常得犹如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童年，有的意外得超乎我们的肤浅的想象，但读起来仍然是那么的从容而又漫不经心，宽容中又蕴藏着坚忍不拔，善良、英勇、顽强、自信、拼搏等等这些形容词，在毛泽东的故事面前已经黯然失色。

全书以第一人称口述，就好像是在讲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毛泽东其特殊的经历和磨难，在其述说中也变得平静如水，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感到是在聆听自己朋友的故事，真实可信，又风趣幽默。经过查阅考证各种文献资料，《毛泽东自传》出版的前前后后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 毛泽东为什么向一个外国人讲述自己的生平？

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西方新闻记者。1936年7月15日，他在宋庆龄先生和我地下党的帮助下，到达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陕西保安县（即志丹县）。第二天毛泽东就接见了，并与他进行了关于抗战形势的谈话，即本书附录中的《毛泽东论中日战争》。

同时毛泽东还建议斯诺到前线去看看。斯诺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到前线生活了一个月，对中国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把自己在陕甘宁边区所听、所见、所记的事情写了一系列通讯，首先在英美报刊发表，客观公正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内外的影响。而《毛泽东自传》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篇。

在此期间埃德加·斯诺给毛泽东列了一个关于毛泽东“个人历史”的问题表，请求毛泽东谈谈自己的革命经历。但毛泽东对此不感兴趣。“不管怎样，他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传的。”斯诺就非常着急，力争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比其他问题上提供的情况更为重要。”斯诺说：“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

在当时，国民党多年来把红军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的土匪，只知道烧杀抢掠，共产共妻，四处散布谣言迷惑人民大众。毛泽东仍不表态，斯诺就接着说：“外边还有许多关于你已经

死去的传说，有人说你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说你是一个无知的农民，还有人说你是一个病得半死的肺结核病人，有的强调说你是一个发狂的狂热分子。"毛泽东对此感到非常意外，"人们竟然会花费时间对他进行种种猜测。"为了避谣，正人视听，纠正这类传说，以便有利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再一次审阅了斯诺列的那些问题。最后毛泽东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我要的就是这个！"斯诺叫道，非常的高兴。毛泽东第一次把自己的身世尽可能地告诉了这个外国记者。斯诺按照当时在场给毛泽东任英文翻译的吴黎平的口译，认真记录下来，写了《毛泽东自传》。斯诺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每次和毛泽东谈话时"全由一个留学生吴黎平任翻译。我的记录用英文写出后，交吴氏译为中文，然后让毛泽东加以修正。毛氏对于任何条文节目，都一定要求其详尽和精确。"而据吴黎平1979年所讲："关于毛泽东个人革命经历部分，斯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黄华译成中文，经毛泽东仔细审阅后做了少数修改，交黄华照改后退给斯诺。"而斯诺在写作时为使用第一人称叙述和妻子海伦·斯诺还有过争议，斯诺要妻子把毛泽东的生平材料压缩一下，为他的书做些摘要，他准备用第三人称把其中某些部分重新写一下，海伦惊呆了，当即提出异议"这可是经典著作，是无价之作！"海伦认为毛泽东的生平材料是斯诺著作的心脏和脊梁，不能改动原材料，而应用毛泽东的原话，用第一人称才更完美。斯诺采纳了妻子的建议。因此，在《毛泽东自传》及以后的斯诺写毛泽东生平的作品中都用的是第一人称。

## 《毛泽东自传》当年是怎么出版的？

《毛泽东自传》是 1937 年 11 月 1 日当时的进步书社——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上海四马路黎明书局(现在的福州路)经售。据山西太原的郝三丁先生提供的有关《毛泽东自传》当年出版后的"广告资料"中介绍，"本书是毛泽东先生亲向美国著名记者史诺氏(即斯诺)口述生平事迹的忠实记录。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原文首先在《亚西亚》(英文杂志，即 Asia)上分四期发表，经本社译出在《战时旬刊》中连续刊出，曾引起读者莫大的注意。现原文最后一章已由航空寄到本社，经汪衡先生全部译出，并请周民先生详加校正……"据考证，1937 年 2 月 1 日，由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编辑的《文摘》月刊创刊，16 开，彩色封面，每期达 200 页，共出版 8 期，名誉社长钱新之，社长吴南轩，主编为孙寒冰等人，总经售是黎明书局。1937 年 8 月 1 日出版的第 2 卷第 2 期，在"人物种种"栏目内，开始刊载"毛泽东自传(特译稿)"。

卢沟桥事变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文摘》月刊改版为《文摘战时旬刊》，在其第 1 号(1937 年 10 月 14 日出版)继续刊载《毛泽东自传(2)》，直到第 6 号全部刊载完毕。而黎明书局创办于 1930 年，孙寒冰是负责人，徐毓源为经理，起初规模很小，只有四五个人，没有出过多少书，在 1936 年前后，上海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后，伍蠡甫、冯和法先后加盟黎明书局。出版时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孙寒冰四处奔走活动，并得到在上海负责统战工作的潘汉年(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大力支持，《毛泽东自传》才得以出版，并在 19 天之后再版，发往当时的北平、南京、开封、安庆、成都等 15 个分发行所和全国各大书局代售。

## 《毛泽东自传》中"解放后未公开发表过的照片"的来历

更令我们惊喜的是，《毛泽东自传》中那张毛泽东站在陕北农家小院中的全身照片，照片中还有一只觅食的母鸡，这是解放后还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十分珍贵。据陕西省档案馆资料，此照片的拍摄者是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香港建义利有限公司董事长田一明先生。

1937年，当时只有23岁的田一明先生受当时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派到陕北处理公事，4月，在当时七贤庄红军联络处李克农主任的安排下乘一辆装满补给品的篷布卡车，一路颠簸到达延安。时任苏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安排他晋见毛泽东等领导人。

毛泽东当时住在延安北门靠左边的土山下的一所小院落里，陪田一明同去的还有延安县长王正身。田一明先生在一份赠送给陕西省的资料中说："记忆中的窑门是朝东开的，窑洞的土炕上放了一块担任床用的木板，上边放着洁白的棉被和卧具，显示着毛主席还不习惯睡土炕。炕沿上放着一张长方形的小桌，桌上放着几本书和茶具。室内靠门窗亮处放着一张长方形方桌和椅子，墙上钉着一幅大的作战用的军事地图。室中央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条桌和几把木制椅子。落座后，毛主席还和我们来家常，问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在谈话快要结束的时，我提出想为毛主席照一张相，他慨然应允。我们一同走出窑洞的门，在院中选一光线比较好的角度。我当时用的是德国AGFA牌的相机，胶片是Film Pack，一张一张地抽换。

因此，对光和抽换胶卷要费一点时间，毛主席站在天井中毫无着急之意，还一再说：慢慢来。当我要按下快门时，忽然有一只小鸡走到毛主席的身后，我正要赶那只小鸡时，毛主席

摇摇手说：不要赶，留上小鸡在身后更有生活气息。"据说，这张照片的底片目前保存在新华社。

此外，《毛泽东自传》插页中有毛泽东关于"抗日"的手书题词，落款处有一朱印"毛泽东印"，此印章的作者目前不知是谁，还是一个谜。

中国现代、当代名人传记选

# 毛泽东传

金冲及主编

## 一、出乡关

曾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五千年前，舜帝南下巡视，来到湘江流域。在一座山上，他让人演奏起动听的“韶乐”，竟引来凤凰起舞。后人就把这座山叫做韶山，被它环抱的一块狭长的谷地便是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冲。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韶山冲农民毛贻昌家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泽东，字咏芝（后改润之）。他们家的头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了。母亲生怕他也不能长大成人，便抱他到娘家那边的一座石观音小庙，叩拜一块巨石，认做干娘，还取了个小名，叫石三伢子。

韶山毛氏原籍江西。明朝开国时，始祖毛太华随军远征南谿（今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内），在当地娶妻生子。明朝洪武十三年（一三八一年），毛太华年老移居湖南湘乡县。十年后，他的两个儿子又迁到邻近的湘潭县韶山冲。这里位于湘潭、宁乡、湘乡三县的交界处，地处湘江中游西岸四十公里，群山环抱，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从此，毛氏宗族在这里垦荒务农。到毛泽东这一辈，已传二十代，大约五百年了。

尽管韶山来历的传说是那样美丽，毛泽东出生时，这里的现实环境却同旧中国其他闭塞而贫穷的乡村没有多少两样。冲里住着六百多户人家。祖父毛恩普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因为家境窘迫，不得不把祖传的一些田产典当给别人。毛恩普只有一个儿子，去世的时候，孙子毛泽东长到了十岁。

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十七岁开始当家理事，因为负债被迫外出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长了不少见识，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还乡后，赎回毛恩普典出去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增加到二十二亩，每年能收八十担稻谷。



湘潭有着在湘中很有点影响的米市。毛顺生善于经营，后来又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牛生意，资本逐渐滚到两三千元，还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是个财东了。

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父亲的这种性格，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顺生和大多数走上坡路的农民一样，试图按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儿子。毛泽东从六岁起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帐。特别是十四到十五岁大约两年的时间内，他成天在地里跟家中雇的长工一同干活。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父亲的严厉感受很深，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于是，犁、耙、栽、割，全套农活，他都样样在行。还常常跟长工争胜，抢重活干，养成了山区农家子弟的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怕艰难，对农民的疾苦也体会很深。

毛顺生期望儿子将来成为同他一样生财有道的精明的人。一旦发现儿子的行为不合自己的准则，便用高压手段来管教，父子冲突就不可避免。对毛泽东来说，却促成了他最初的反抗心理。

一九六年的冬至这一天，毛顺生设酒席宴请生意场上的朋友，吩咐十三岁的毛泽东帮着招待客人。毛泽东不愿意做这些事，父亲生气了，就骂他懒而无用，为子不孝。他当着客人反驳道：“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毛顺生更加生气，举手就要追打。他便跑到家门前的池塘边，声称父亲再要逼近，就跳下水去。在母亲的调解下，一场风波才和平解决。从此，毛泽东悟出

一个直观的道理：在压力下如果温顺示弱，反会遭受更多的打骂，只有用坚决反抗的办法，才能保护自己。

毛泽东对父亲最大的“不孝”，大概要算默默的抗婚了。十四岁那年，毛顺生给他包办娶了个十八岁的媳妇罗氏，实际上是为家里添个劳力。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这桩婚事，从未和她同居。父亲也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毛罗氏”作为毛泽东的原配妻子写进毛氏家谱。

同父亲比较起来，给少年毛泽东影响更大更深的是他的母亲。母亲姓文，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人称文七妹。娘家在湘乡县唐家坨（后改为棠桂阁），同韶山冲只有一山之隔，相距十余华里。文家也以务农为业，家境小康。七妹十八岁时和毛顺生结婚，共生五男二女，但四个都夭折了，只剩下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

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文七妹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辈。她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常背着丈夫送米给讨荒的人。平时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孩子。毛泽东九岁时和母亲认真讨论过用什么办法让父亲也信佛的问题。十五岁那年，母亲病了，他还专程到过南岳衡山进香许愿。当时他未必懂得多少佛教的道理，但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同情贫弱，乐于助人。

附近一个毛姓农民，曾收下定金把猪卖给了毛顺生。过几天父亲派毛泽东去赶猪时，猪价已涨了。这个农民叹气，埋怨自己运气不好，还说少了几块钱对富人不打紧，对穷人家却是个大空缺。毛泽东听后就在这桩买卖退掉了。

毛泽东十一岁那年，毛顺生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七亩田产，毛泽东和母亲的态度是一致的，都觉得应该设法周济毛菊生渡过难关，不应该乘机买他的田产。毛顺生却认为用钱买田是天经地义的事。母子俩的劝说自然

没有效果，却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建国后，他多次对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

毛泽东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一九一八年夏，他从长沙赴北京前夕，十分挂念在外婆家养病的母亲，特地请人开了一个药方寄给舅父。次年春返回长沙，便把母亲接来就医。十月五日，文七妹患瘰疬（俗称疔子颈）病逝，终年五十二岁。毛泽东日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和泪写下一篇情义深长的《祭母文》。他这样追念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当时，毛泽东还给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母亲对他的影响力，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母亲去世后，毛泽东把父亲接到长沙住了一阵。父亲后来不再干涉他的选择，继续供他上学。毛泽东是很感激的。毛顺生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患急性伤寒去世，时年五十岁。

父母的教养对儿童成长的关系很大，学堂的教育则影响着少年未来的发展。

毛泽东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湘乡唐家坨的外婆家度过的。外祖父家虽是务农的，但有一个舅舅在开馆教读，毛泽东有时也在那里听听。直到一九二二年八岁时，父母把他接回韶山入私塾开始读书。十六岁前，中间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其余时间内他先后在韶山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六处私塾读书。毛泽东后来把自己的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

夫子”。在上学期期间，他早晚还要放牛拾粪，农忙时也参加收割庄稼。

这时，科举已经废除，新式学堂已经开设。西学东渐、赴东瀛求学已成时代风气。就在毛泽东八岁接受启蒙那年，后来对他影响很大的恩师杨昌济和他钦佩的文化巨人周树人（鲁迅）先后去了日本。在韶山，私塾仍是儿童们求学的唯一选择。父亲供他念书，没有多大的雄心，无非是略识几个字，便于记帐或打官司等。毛泽东照例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这些普及读物入门，去接触他从小注定要接受的儒家文化传统。随后是点读“四书”“五经”。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他小时候读过的《诗经》和《论语》。

毛泽东不大喜欢这些枯燥难懂的经书，但他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仍然学得很好。自幼烂熟于胸的知识，是很难抹去的，成年后常会自然地使用。以后，读了《左传》，使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六年“孔夫子”的教育，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

少年时的毛泽东很相信孔孟之道，而老师照本宣科的教法对他没有吸引力。一九〇八年在井湾里私塾就读时，他最爱读被塾师称为“闲书”和“杂书”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在学校里，老师不让读，他用课本挡住偷着读；在家里，父亲不让读，他就用布把窗户遮住，使父亲看不见灯光。

毛泽东读了这些故事，他就和小朋友乃至村里的老人们互相讲述。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这一点纳闷了很久。他

开始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他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

农民们自然常要反对这种不平等。《水浒》里汇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在后来艰难备尝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传》一直是他放在手边常常阅读的书。

毛泽东在旧小说里关注的事情,在现实社会中也发生了。一九一一年四月,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起因是荒年粮价飞涨,有人率全家投塘自尽。饥民们涌到巡抚衙门请愿,反而遭到枪击,当场打死十四人,打伤的更多。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毁了外国洋行、轮船公司、税关。清政府派兵镇压,暴动者的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二十年后,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也是在这里牺牲的),被杀者的头颅高高挂在南门外示众。

几个卖兰花豆的湘乡小贩逃出长沙,把饥民暴动的消息传到了韶山。大家愤激地议论了好几天。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对这件事逐渐淡忘了,毛泽东却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觉得那些参加暴动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结果无辜被杀。这使他很痛心。几十年后,他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节,韶山一带又闹粮荒。饥民们组织起来“吃大户”,劫走了毛顺生准备运往县城卖出一批大米。毛顺生气得要命,毛泽东并不同情父亲,“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一个叫李漱清的维新派教师从外地回到韶山,毛泽东很钦佩他,常去听他讲各地见闻,特别是维新变法的故事。这期间,读到一本十几年前出版的叫《盛世危言》的书,作者是郑观应,书里讲社会要改良,毛泽东非常喜欢。这

样，他开始知道一些发生在山外的当今中国的大事，感到中国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了。毛泽东也不愿再守着老样子不变了。

他十六岁了，足迹所及只限于韶山冲和唐家坨。父亲本来打算送他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可是他到外面继续求学的愿望更迫切。恰好在这时，表哥文詠昌告诉他，离韶山五十里的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在讲授新学。他听了很动心，便先后请八舅文玉清、堂叔毛麓钟和表哥王季范劝说父亲。毛顺生听后，觉得儿子进洋学堂也许是件有利的好事，就同意了。

一九一一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他人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转折。他的激动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帐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东山小学堂在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台山下。同旧式私塾相比，它除了传统的经籍外，还有些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新科目。在这里，毛泽东才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经死了，新皇帝宣统已在朝两年。他依然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来帮助他。毛泽东这时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特别喜欢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他并不知道，此时孙中山主张的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思潮，已代替康、梁的维新变法思想而成为时代的主流。但革命派把主要精力放在联络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上面，没有在思想启蒙上下很大工夫。革命派所办的刊物在内地也不能公开流传。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刊印《新民丛报》，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在国内风靡一时。湖南又是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梁启超曾主讲于长沙的时务

学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要从维新派那里接受政治启蒙是很自然的事情。

《新民丛报》已经在一九一七年停刊。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时，表哥文詠昌曾借给他一套自己保存的合订本。他读了又读，上面的一些文章差不多能背出来，还写下一些批注。在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表明他当时对君主立宪和封建专制两种国家体制的理解。从相信孔孟到崇拜康梁，从赞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到主张以英、日为楷模进行立宪变法，是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第一个梯阶。更重要的是，梁启超的《新民说》深入接触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主张从“变化民质”入手来寻求社会改革的途径。这个思路开五四时期主张改造国民性的先河，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持续了较长时期，他以后组织的新民学会的会名显然就是从这里来的。

他开始注意中国以外的事情。从一位在日本留过学的教员那里了解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强大起来的事情后，非常羡慕。他从同学萧子暲（即后来的著名诗人萧三）手中借来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被书中描写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事迹感染，还书时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究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

一九一一年春天，东山小学堂的贺岚冈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因为毛泽东成绩优异，贺老师愿



意带他前往读书。他第一次坐轮船到长沙，顺利地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

长沙是湖南的省城。这时，中国已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湖南是革命党人活动十分活跃的地方，反对清政府的宣传特别激烈。驻守长沙的新军也越来越倾向革命。

初到省城，十八岁的毛泽东的眼界顿时开阔得多了，感受到一种和乡下完全不同的社会气氛。他第一次看到革命派办的《民立报》，成为它的热心读者，接触到许多革命言论。当他在这张报纸上读到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时，思想受到巨大的冲击。他后来说：“宣统三年三月十九日（即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引注）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

毛泽东就是这“跃跃欲试”者当中的一个。一天，他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达他的政见，尽管他当时这种构想还很幼稚，连孙中山和康梁之间政治主张的分歧也不太清楚。

为了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还和一些积极分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十几个答应剪辫子、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的辫子给强行剪掉了。这多少透露出他少年时代就具有的那种说到做到、果断利索的行动风格。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派代表赶来长沙，要求湖南革命党人立即举义响应。一位代表还到湘乡驻省中学介绍武昌起义的情况。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讲演，二十多年后毛泽东仍记忆犹新：“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他自己更是兴奋



异常，觉得正在进行的激烈战斗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决定投笔从戎，北上武汉参加革命军。正当他和几个朋友整装待发的时候，长沙革命党人于十月二十四日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湖南军政府。毛泽东随即投入长沙革命军。他不愿参加学生军，而是投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

在当兵期间，他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外，把每月七元的军饷大多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了解时事政治。他读报读得十分认真，以后成为他一生的习惯。有一天，他从《湘汉新闻》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其实，当时他所看到的社会主义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毛泽东却很有兴趣，和士兵们讨论，还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学提出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可是，反应很冷落，只有一个人回信表示同意。

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大多数省份已宣告独立。袁世凯通过南北议和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清王朝宣布退位后，人们普遍兴高采烈，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毛泽东也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他一共当了半年兵。

他开始关注报纸上的招生广告，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他先后报考了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都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

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读了半年。留下一篇被国文教员柳潜称为“实切社会立论”的作文，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文章劈头就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看来，关于

救国之道，他继续沿着梁启超开启民智、塑造新民的路子在思考。这是毛泽东留下的第一篇完整文章。全文仅六百字，老师的批语却有一百五十字，说作者“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还批给其他同学“传观”。

毛泽东觉得这种学校中刻板的校规和有限的课程，远不能使他满足。不久，柳潜借给他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共一百一十六卷。他读得很认真。读完后，收获很大，愈发觉得在学校里读书还不如自学。毛泽东对他认定了的事，是敢于采取哪怕惊世骇俗的行动的。他断然决然地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退学，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

他订了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他的学习十分勤奋，像牛进菜园一样，不停歇地埋头读了大量中外书籍。他兴趣最大、收获最多的是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特别是严复翻译的书，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他几乎一一读过，可以说相当集中地接受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他在这个图书馆第一次看到那里墙上挂着的一张世界大地图，那是每天经过时都要看到的。他才知道世界原来是多么大，中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湘潭县在地图上根本没有。这个发现，对一个走出乡关才一年多的知识青年来说，感受该是多么新鲜和强烈！

又一个半年过去了。

毛泽东的自学生活虽然“极有价值”，但已难以为继。他遇到了难题：父亲不支持他这种似乎是漫无目的的读书，拒绝继续供给费用。同时，他寄居的湘乡会馆也被

占了，住进了些被遣散的湘乡籍士兵，经常滋事打架。这里不能再住下去了。

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来设计自己的未来，而对人生的选择似乎还处于徘徊状态。这时，他已是不乏阅历的快满二十岁的青年了。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06—107 页。

毛泽连的回忆（1973 年 2 月），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 3 月版，第 8 页。

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1964 年 8 月 18 日。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09 页。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10、111 页。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10、111 页。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6 页。

毛泽东：《本会总记》，《湘江评论》第 4 号，1919 年 8 月 4 日。这里说的“本会”，即湖南学生联合会。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16 页。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20 页。

## 二、师范生

毛泽东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这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发出的一则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毕业后即可担任教师的招生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一年前，他考入全省高等中学的试题就是《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他以梁启超的“以教育为主脑”之说立意下笔。现在，再三权衡，觉得自己将来还是最适合当教师。

一九一三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四师是春季开学，一师是秋季开学，因此他重读了半年预科，到一九一八年暑期在一师毕业，前后共做了五年半师范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面对着滔滔北流的湘江：东侧靠着粤汉铁路。隔江望去，西岸是郁郁葱葱的岳麓山。周围的大自然环境是那么优美。经常驰过的火车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又不时传来时代的气息。

第一师范创建于一九一三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讲学的城南书院。同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只有一江之隔。一九一二年改称现名。它的规模、教师力量和设备，都是毛泽东以往读过的几所学校所不能比拟的。校章规定的教育方针“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各种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很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学校还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与毛泽东差不多同时，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第一师范，其中有蔡和森、张昆弟、

陈章甫、罗学瓚、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萧子枬等。本来已是秀才，比毛泽东大十七岁的何叔衡，也一起考了进来。在当时的湖南，一师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前进，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当毛泽东进入一师时，中国正处于令人难熬和困惑的沉闷岁月。皇朝变成了共和，中国却并未由此获得新生。人们在革命前所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不仅没有到来，相反，在很短的时间里，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又演出复辟闹剧，各路军阀的割据混战愈演愈烈，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严峻的现实不允许人们长期沉浸在迷惘之中。新一代在探索着新的出路。

毛泽东当时还是个正在求学的学生。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他为自己规定的读书目的是什么呢？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诸如将来要当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这以前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说：“齎其躬（意思是：即便自己粉身碎骨）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

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字华生，长沙板仓人。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尤喜程朱之学。一九一三年留学日本，改名怀中，意思是身在异邦，心系中土。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以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的博学和高尚人格，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在自己的周围。

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而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他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假期里有时也放弃回家的机会，到板仓杨宅请教。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一九一四年，毛泽东和同学们曾组织一个哲学小组，还请杨先生担任指导。师生之间，相交甚深。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七月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这对青年毛泽东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难以磨灭的。

杨昌济在长沙的学生先后以千百计，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对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看来，杨昌济一开始便把这个学生看作“异材”的。

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一九一五年的日记中

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从四月到八月，毛泽东共去拜访了黎锦熙近二十次。九月，黎离湘赴京，在教育部做教科书特约编辑员。两人仍书信不断，相交介乎师友之间。黎很看重他，在这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七十七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对青年毛泽东都留下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很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当时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积了有好几网篮。后来送回韶山存放。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籍报刊一起烧掉了。一位塾师先生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

幸存的这个笔记本，是一个九行直格本。前面有他手抄的屈原《离骚》、《九歌》，后头毛泽东把它题为《讲堂录》，是一九一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的听课笔记，也间有读书札记。主要是修身和国文两门课的内容。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

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在近代以来成为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有贺长龄、陶澍、魏源一批人，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倡导变革。在维新运动中，出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变法志士。辛亥革命时期，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禹之谟等更走在前列。这一批又一批的人物，绝大多数曾就读于岳麓书院。

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影响。他是湖南衡阳人，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晚年因隐居在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他著述宏富，在学术上能独树一帜，富于批判精神。他崇尚实学，主张“理依于气”，强调“行”在认识过程的作用，颇能开一代风气之先。

近代湖南，还出了一个曾国藩，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兴将相”集团，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曾国荃等。他们也都曾受教于岳麓或城南书院。一方面执守理学，同时又师承王船山的实学。曾国藩便着力传刻《船山遗书》，糅和理学与实学，贯通内圣和外王。他镇压太平天国时打



着“保卫名教”的旗号，同时又严格地整军治政。他还是早期洋务活动的代表人物，影响很大。

一心修学储能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他一跨进一师大门，就体会到这种特殊的气氛。每逢集会，学生们就高唱校歌：“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杨昌济也是岳麓书院的毕业生。在他的倡导下，研究船山学问在一师成为风气。毛泽东尤其用功，还经常到杨的好友刘人熙创办的船山学社听课。同时，还细读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讲堂录》里抄写了好些曾国藩的话，如：“涤生（“涤生”是曾国藩的号——引注）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看来，他很赞成扎实、厚重的人生风格。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曾国藩还是个既“传教”又很能“办事”的人物。稍后，他在一封信中同时提到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几个近代风云人物，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

这个命题出自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本意是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一九一六年，在岳麓书院办学的一位校长，把这四个字写成硕大的横匾挂在讲堂正门。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实事求是”的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

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状况。毛泽东沿着注重实际的路子吸吮传统思想中的优秀遗产。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顾炎武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学说，颜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讨论，尽有千万义，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观点，都影响着毛泽东。他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还特别说到顾炎武，推崇他“经世要务，一一讲求。……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

一九一七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湖南俗话称“游学”为“打秋风”。指穷知识分子靠作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钱饷口，形同乞丐。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回到一师，读过毛泽东游学笔记的同学，说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为了纪念这次旅行，他和萧子升还换上游学时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

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毛泽东自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动荡风云。在一师期间，他总共花了一百六十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和买书上面。他每天读报的时间很长，还常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学校的课堂并不平静。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并于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这时，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易永畦同学因病去世了。五月二十三日，学友会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在挽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徕，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这是首长达四十行的五言古风，也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留下手迹的最早诗作。它同《明耻篇》封面题词一起，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对民族危艰的沉重忧虑，和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学子抱负。

外患常同内政相联系。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开始复辟帝制。杨度等出面网罗名士，组织筹安会。湘中一度风传在京谋职的黎锦熙也被拉了进去。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九日写去一信：“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还劝

黎离开北京这块“腐臭之地”，“急归无恋”。后来弄清了这是误传，他才如释重负，又驰函致歉。

反袁声浪日益高涨，就连昔日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也起而响应。毛泽东当时担任校学友会文牒，主持把三人有关时局的言论编印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在校内外广为散发。已在一师毕业的陈昌在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赐《汤康梁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控制着北京政权。曾参与策划护国战争的梁启超，转而致力于南北和解，以防事久引发革命危机。毛泽东对袁世凯称帝深恶痛绝，但对袁氏所培植和依赖的北洋军阀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因而很赞成梁氏的主张。六月下旬，他赶回韶山看望病卧在床的母亲，因南方军队在银田寺一带骚扰，被阻隔途中，越发认为政局应该稳定。

七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他两次写信给萧子升，陈述对时局的看法。他说：“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和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中央举措，究可佩服。”这里，他把段祺瑞、黎元洪反袁的“南部诸英”列在一起称赞。

湖南人这时驱逐了袁世凯任命的都督汤芑铭。他列举驱汤后的一些消极现象，诸如“暴徒乘机报复”，“自推长官”，无视中央而不得统一等，忧心忡忡地觉得“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意此次竟演此恶剧”。看来，在反袁

前后，毛泽东对国家和政府的看法还处于彷徨时期，露出了后来一度信奉过的“无血革命”的端倪。

当时，国内报刊传出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将要改组的消息。大隈重信是制造《二十一条》的罪魁，许多人希望他下台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善。毛泽东却在七月二十五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而且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一九三七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这位二十四岁的师范生果然言中。

如果把毛泽东在一师的学习生活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一九一六年正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转折。前期，他更多地关注传统典籍。后期，他把重点放在哲学、伦理学上，社会实践也更加广阔和丰富了。不管在前期还是后期，他学习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求救济时危的真理，可是它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和当时的思想界状况是息息相通的。

辛亥革命后几年的痛苦经历，对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是件好事。旧的路子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道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惊醒了世人。许多人认识到，共和制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和巩固，关键是缺少一场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先觉者们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也是一个根本原因。这样，先进分子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思想文化领域，主张着重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一九一五年九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

《新青年》)。他撰文强调,“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

这就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很快,在《新青年》周围聚集起一大批先进青年。这个杂志及其撰稿人的文章,铸造了一代人的信仰和品格。这是一代真正有别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旧式士大夫的新人。

在《新青年》众多的读者和追随者中,就有毛泽东。当时,杨昌济为这个杂志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发现,毛泽东读了《新青年》后,“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毛泽东自己后来也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毛泽东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态,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因为哲学便于研讨思想,伦理学便于阐发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这样,改造哲学、伦理学,就同变化民质、改造国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了。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思想界是相当普遍的。

一九一七年前后,毛泽东读了不少哲学、伦理学书籍。在哲学和伦理学之间,他更有兴趣的是伦理学。在他看来:“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罗学瓚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这里说的是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毛泽东把它十分工整地抄录下来。从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次年第一学期,杨昌济给学生们的讲授伦理学,

采用的课本是十九世纪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该书由蔡元培从日文转译过来，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三年出版，约十万字。毛泽东除认真听讲外，细读了这本书，用红黑两色画了大量的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叉等符号。还在书中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绝大多数是抒发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和人生观，以及对原著的引申或批判，小部分是对原著的赞同语和章节提要。他批阅的这本书后来被一位同学借去，直到一九五一年，托周世钊还给了毛泽东。

他当时为什么这样下工夫去读这本书？毛泽东从周世钊手里接过它时，有过解释。他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毛泽东贯穿《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的基本观点，是哲学上的二元论。他说得很明白：“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他认为，事情有的是发生于自然的，有的是得之于人为的。后来他说自己早年信奉过康德的心物二元论，大概就是指这样的观点。

二元论的特征是调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青年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自然观方面，他说：“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其范围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创作”。这是他从原来接受的唯心主义观念中逐渐解脱出来、走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二元论的通病，是一进入社会历史领域，便作出唯心的解释。毛泽东也是这样。他说：“实则全世界文明历



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也”；“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

如此强调主观观念的决定作用，对青年毛泽东来说，有它的必然性。知识界中推崇思想革命的社会时尚，本身就很容易夸大精神的作用，过分强调主观对改造社会的能力；再加上毛泽东本人长期以来耳濡目染的，主要是孔、孟、程、朱、陆、王以及新康德派、新黑格尔派的思想。杨昌济说自己以《伦理学原理》为教本，“所讲不限于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之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强调主观能动性的陆（九渊）、王（守仁）学派更为杨昌济推重，毛泽东当然也受到熏陶。他常和蔡和森、张昆弟等讨论宋明理学，研读过朱熹编的《近思录》、《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等，对朱熹、王守仁都很佩服。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便常用这些观点来作比较，发挥原著的一些论述。诸如“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等等。

中国近代社会正处在空前剧烈的变动中，旧的传统秩序渐趋崩溃，外患内乱迭起相承，政治舞台风云变幻，这就使“尚动”“主变”成为人们寻找出路的重要倾向。这个时代特点同样体现在毛泽东的探索中，并蕴含着浓厚的辩证法色彩。

一九一七年，他曾提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的观点。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他写道：“此世界中变化万殊。”还把它运用到人类社会的考察当中，说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治乱交替的过程，声称特别喜欢战国七雄、楚汉相争、三国鼎立那些“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时代。认为：“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用这个观点看当今中国，他说：“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



化所必要也。”对于中国社会,他的意思是“必须再造”,再造的办法,是“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因此,“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字里行间,洋溢着改造社会的乐观激情。他后来从大乱求大治的想法,看来是早有伏笔的。

在“动”中求变、求新,其内在依据是什么呢?毛泽东当时特别重视两个概念。一个是“差别”。他说:“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如阴阳、上下、大小、彼此、好恶、美丑、是非、正反、明暗、胜负等等。“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另一个概念是“抵抗”,即各种差别引起的压力和反抗。毛泽东特别赞同泡尔生提出的世界一切事业和文明“无不起于抵抗决胜”的观点,称其“无抵抗则无动力”的论述,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他过去那种向往社会“大同”境界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觉得即使人们真的进入了“大同”社会,“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把“差别”、“抵抗”这两个概念,和“动”、“变”及“成毁”联系起来,表明毛泽东当时的认识已接近矛盾构成事物并实现转化的辩证法观点,还多少同社会历史发展有所联系。他后来关于矛盾普遍性的理论,大体也滥觞于此。

五四前期,毛泽东的思想中有一个最突出的根本点,就是首先要把握住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它的意思,是在面对万千事物时,要从大处着眼,首先抓住它的根本。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以后,他也常强调要善于抓住要领,抓住主要矛盾,强调纲举才能目张,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而在当时,他心目中

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很有些像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心目中的“道”（老子）、“理式”（柏拉图）、“绝对精神”（黑格尔），总之是宇宙生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则。朱熹就曾说万事万物皆源于“一本”，“大本不立，小规不正”。杨昌济讲课时，也特别强调，“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皆由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神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此所谓贯通大原也。”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给北京的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集中表述了对“本原”的看法。

他把“本原”通俗地说成是“宇宙之真理”，认为它是支配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拯救中国，也必须从寻求本原开始。他表示，目前和将来一段时间里，自己“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原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

这样，毛泽东开出了自己的救国药方：“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原。本原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他大声疾呼：“今吾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这封信是了解早年毛泽东的思想的珍贵资料。八月三十一日，黎锦熙收到信后，在日记里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把“本原”落实到“人心”上面，就是应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就是伦理道德的建设。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把自己这时的主张概括为两个，一个是“精神上之个人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

针对封建专制和束缚个性的三纲五常的旧道德，主张个人主义，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毛

泽东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始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他认为，人类的目的是实现自我。但他在个人主义前面加上“精神”两个字，却有他自己的特色。这种个人主义强调“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力求达到最高境界，使“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正鹄”不能只是“纯然利己”，而是应该实现的理想和价值。例如，看到自己所爱的人有难，关键的时候，“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浹，吾意始畅”。否则，自己的生活就不圆满，就“未达正鹄”。依此类推，“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他甚至极端地说：“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这种理解，已经超出了西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原义，包含着新道德观的萌芽。

关于“现实主义”。毛泽东认为，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不能脱离现实去追求虚幻的理想和价值，要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自我”。他说：“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一方面，他反对空谈，“凡吾思想之所及，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道德行为必须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反对盲目动作。

毛泽东写道：“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极高”是指追求独立不羁。“极卑”是指我终究又“一毫跳不出此自我以外之世界”。这个矛盾，他已觉察到了，但一时还不能完整地加以说明。

毛泽东在哲学、伦理学的王国里寻觅着、遨游着。他从中外文化里汲取营养，又闪烁着他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智慧之光。他这个时候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宇宙之真

理”。夸大精神力量的唯心主义，在他的思想中无疑占有很大比重。这期间，他还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作文，深受杨昌济的赞赏，得了一百分。

但他这时的思想并没有定型，还在探索过程中。当他写下《伦理学原理》批注时，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道：“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未定。”既然还“茫然未定”，就得继续向前探索。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中，这类状况是常见的。由于他坚持把改造社会、匡济民族危亡作为出发点来进行理论探索，决定了他思想中的积极方面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由于他坚持一种从我做起、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从而使他在进行理论探索的时候，一直特别注重自我思想修养的磨练。

毛泽东从来把读“无字之书”看得比读“有字之书”更重要。或许，他当时的实际活动比保存下来的几篇文字表现得更富有个性和朝气，对他以后思想发展产生的作用也许也更大。

说来很有趣，毛泽东这样一位后来举世注目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却是体育论文。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新青年》上刊载了一篇《体育之研究》，全文约七千字，署名二十八画生。这个“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是杨昌济把他的文章推荐给陈独秀的。

他在文章里开宗明义，把体育和国力联系起来，说：“国力恭（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认为：身体是知识和道德的载体。在中学和中学以上，应该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针对重文轻武的颓风，他提出一个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因为体育锻炼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等许多好处，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

先驱也”。可以说，《体育之研究》主要不是对体育这个运动形式的研究，毛泽东是想借此提倡武勇世风和充满朝气的奋斗向上的人生观。

这期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后来十分著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还向读者详细介绍了自己编的一套体操。他当时采用的锻炼项目很多，如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

所谓风浴，张昆弟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记载：“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概。”所谓雨浴，有一个夏天的夜晚，狂风暴雨，雷鸣电闪，毛泽东一个人爬上岳麓山顶，再返回来。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中所说“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的情趣。

毛泽东青年时代最喜欢的锻炼项目，是游泳。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这个爱好，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江宽水深，是天然的游泳场。他时常约二三好友到这里挥臂击水。还在学校组织了一个有近百人参加的游泳队，晚饭后到湘江里畅游一番。同班好友罗学瓚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日的日记里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渡，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凉。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也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气力，不得谓非运动中之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毛泽东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

里。” 游泳，不单是强健了体魄，更激发了他的自信和意志。

毛泽东强调一个人要有坚强的意志。他在《讲堂录》的笔记中就写下：“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与流俗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陆象山曰：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无非使心地光明）。”以后，在他的一生中确实一直表现出那种坚忍不拔、冲破重重阻力、一往无前的惊人毅力，而这种惊人的毅力又是建立在对事情能“见得透”的基础上的。这是他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毛奇（molkt）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一九一七年六月，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近二十个项目。全校有四百多名学生参加，当选者三十四人，毛泽东得票最高。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而“胆识”一项，则为他所独有，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

毛泽东的胆识，半年后有过一次受到众口称赞的显露。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护法战争期间，北洋军队从湖南衡宝一线沿铁路线向北溃退。长沙市民很是惊慌。一师位于南郊，靠近粤汉铁路，是溃军必经之地，随时可能遭受劫掠。学校当局准备将师生疏散到城东暂避。担任学友会总务的毛泽东提出，可以让正在受军事训练的学生自愿军负责守卫。校方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一些零散溃兵途经校门口，都不敢轻易闯入。十八日，有一支三千多人的溃军因为不知长沙的虚实，在一师以南的猴子石一带徘徊。毛泽东把几百个学生自愿军分成三队，拿着木枪，分布到

猴子石附近几个山头上。同时，和附近的警察分所联络，由他们鸣枪呐喊，学生自愿军大放鞭炮。在这种突然袭击下，本来就张皇失措的溃兵不敢抵抗。毛泽东便派人去交涉，他们全部缴了枪。长沙免去了一场兵灾。

对毛泽东来说，这件小事是他平生搞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事后，人们称毛泽东“浑身是胆”。他的大胆却不是盲目蛮干，而是基于对情况的明了和事先的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同班同学邹蕴真问他：“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毛泽东回答说：“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旧，只得闭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

第一师范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生活。毛泽东的社会活动日益扩大了。一九一七年十月学友会改选时，他担任总务，还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从前这两个职务都是由教员担任的。学友会会长由学监方维夏代理，毛泽东实际上主持工作。学友会开展了许多课余活动，如成绩展览会、讲演会、辩论会、运动会等。这年上半年，学校曾办了一期工人夜校，由教员上课，办得不成功，中途停下了。这学期还办不办？由谁来办？大家看法不一。毛泽东认为这是学校同社会联系的重要途径，应该办下去，而且要办好。方维夏同意他的意见，并决定由三、四年级的学生来办，由学友会教育研究部具体负责。

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写了一则《夜学招学广告》，用语是一般工人能懂得的大白话，倾吐出为失学工人分忧解难的拳拳之心：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



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这则广告先托警察贴到街头，并没收到预期效果，只有九个工人来报名。毛泽东遇到难题总是先从弄清情况着手。他召集同学们分析原因。最后弄明：上学不要钱，工人觉得不会有这样的好事；不识字的人本来就不会去看街上的广告；让警察去贴广告，人们有惧怕心理。找到原因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又带着印好的广告，分头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边分发边宣传，细细解释。五天后，就有一百多人报名。毛泽东把这次活动的过程写进了《夜学日志》，说工人要求入学的心情，“如嗷嗷待哺也”，他们分发广告时，“大受彼等之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这大概是毛泽东最初体会到：做下层群众的工作，非做得周密细致不可。

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其中大多数是一师的学友，包括有些已毕业的。他们大多是杨昌济的学生，都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这当中，也有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正在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就是看到毛泽东张贴的《征友启事》后结识的。他们多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没有少爷公子的浮华，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朴实而充满朝气。节假日，他们经常到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处聚会，或臧否人物、议论世事，或登高吟咏、斗韵唱和，相约不谈身边琐事。正如毛泽东后来追忆的那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从一九一六年开始，他们讨论最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他们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猛烈冲击，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动，“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发生这种“一个翻转”的剧烈思想变动的，自然也包括毛泽东在内。在这个基础上，一九一七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开始商量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

要成立团体，首先得有章程。一九一八年三月，毛泽东和邹鼎丞开始起草会章。萧三的日记说道：“三月三十一日，二兄（即萧子升——引注）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草新学会简章。二兄意名为新民学会云。”“四月八日，接二兄手书，力主子出洋。附来润之所重草新民学会简章。”“四月十三日，夜，润之来，明日新民学会开成立会。”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是个星期天。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

萧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十三人，再加上没有到会的李和笙（维汉）、周世钊等人。这样，最初的会员就有二十余人。经过讨论，通过了会章，以“新民”为会名，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章还规定了几条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看来，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团体。成立会上选举萧子升为总干

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它的会章重点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含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当时达到的思想水平，受杨昌济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但它和毛泽东当时的实际想法也有距离。对此，毛泽东稍后曾有一个说明，他说：“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于是表决会章的条文如次……”。联系到萧子升后来一直不赞成激烈变革、主张温和改良的思想，被他认为是“不见诸行事”而“颇加删削”的条文内容，大致属于毛泽东当时更高远的理想追求。

三个月后，他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七月二十六日，他就新民学会的组织活动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在回信中说：“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看来，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杨昌济老师那种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去回避政治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正是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一道探求中国的出路的。

这时，会员多数已经从学校里毕业或即将毕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更好的施展抱负呢？学会成立之初，讨论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许多人不愿“堆积”在湖南一地，想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处去学习和考察。毛泽东也认

为，这样做每个人都可以去开辟一个方面，对将来大有好处。“向外发展”，成了会员的共识。

两个月后，毛泽东也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他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这年他满二十五岁。此时的中国，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毛泽东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

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6年2月29日。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摘自长沙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纪念馆馆藏资料。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毛泽东：《非自杀》，湖南《大公报》，1919年11月23日。

毛泽东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同此。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

杨昌济：《论语类抄》，《杨昌济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毛泽东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的批语。所引这段话，是对《沁园春·长沙》中“到中流击水”一句的解释。

邹蕴真1977年4月回忆记录，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毛泽东：《沁园春》（1925 年秋）。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 1 号（1920 年冬）。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 1 号（1920 年冬）。

蔡和森 1918 年 8 月 27 日致毛泽东信，《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1—52 页。

### 三、五四大潮的洗礼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祖国首都——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到北京去？那是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恰在毛泽东从一师毕业、面对着选择今后生活道路的时候，法国到中国招募华工。蔡元培、李石曾等在北京组织华法教育会，搞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杨昌济此前已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把这个消息传回家乡。这时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乱，政权不断更迭，“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都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期到京打前站。蔡和森在北京同杨昌济商量后，又拜访了北大校长蔡元培，两次写信促毛泽东等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迅速北上。信中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一行到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这时，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的青年已达五十多人，是全国来的人最多的省份。毛泽东他们发起这个活动时，“并未料到后来的种种困难”。到京后，“会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几经联系，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开办了留法预备班，接受湖南青年入学。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还为他们筹措路费而四处奔走。

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瓚在一封家信中说：“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

朋友们分赴各预备班学习以后，毛泽东留在北京。同行来京的罗章龙这时考进了北大预科，毛泽东却没有按杨昌济的希望去报考。这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同时也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有关。此外，当时教育部还有一个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

不进大学，总得要找一个托足之地，以获得生活来源。十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八元。但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是相当称心的，可以阅读各种新出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对他来说该是怎样的兴奋和刺激！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还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是有帮助的。一个是一九一九年一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

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

章，这时自然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对陈独秀，毛泽东是崇拜的，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后来回忆，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

他既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的言论和行谊自然更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这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李大钊是在古老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十五日，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面。从而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还认识了谭平山、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这样一些后来颇为著名的人物，并同来自湖南的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他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大，思想越来越激进。在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也很受影响。当时无政府个人主义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北大学生朱谦之，他比毛泽东还小六岁。两人却颇为投机，朱谦之常常来看望毛泽东，相互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在北京，毛泽东起初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先生家中。其他会员分住湖南在京设立的会馆。往来相聚，诸多不便。不久，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个人搬进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八个人挤住在三间民房小屋里，每屋有一铺通炕，人多炕窄，只能骈足而卧。棉被又大，摊不开，只好合盖。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们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生活是清苦而紧促

的，但古城北京丰富多采的景色却是心理上的一种补偿。杨先生的女儿杨开慧，更给他以情感的慰藉。毛泽东进一师读书时，杨开慧只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如今已出落为十八岁的大姑娘了。经常来往于杨先生家里，毛泽东和她的认识逐渐加深，建立起恋爱关系。他们一同漫步在故宫河畔和北海公园，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还有倒垂湖面的杨柳枝头悬挂着的冰柱。隆冬时节，毛泽东满怀兴致地要去看一看大海。他约了萧子暲和罗章龙一同坐车去天津。走到大沽口，只看见一片冰雪，不过仍很满足。他还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工厂调查过。这些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一九年春天，毛泽东要回湖南。原因是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再则，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就要启程出洋。三月十二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转道上海送别了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赴法青年。

这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在北京，色彩缤纷的新世界一下子涌现到他的面前，他也许还不能立即同它融为一体，他对一下子接触到的种种新思想一时也还来不及完全消化。但这些毕竟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迈出了从湖南走向全中国的第一步。

作为湖南青年赴法的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许多赴法会友都曾恳邀他同行。一些会友到了法国后，还来信劝他出洋。罗学瓚在信中说得更恳切：“惟弟甚愿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学。若少迟延，时光既过，人事日多，恐难有多时日求学矣。……润之兄啊！你是一个有志的人，是我们同伴中所钦佩的人，你如何带一个头，权且努力于研究学问的事呢？弟近来想及诸兄如此刻都出外求学，学他十年八载。异日回国，……各抒所学以问世，发为言论作社会之唤醒提倡者。”



他仍然留了下来。他当时怎么解释已不得而知，稍后在一封信中却有过明确的说法。他说留在国内探索有许多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这不仅不影响吸收西方知识，还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

毛泽东始终是主张出洋，主张吸收西方知识的。就是上面这封信中，他称自己“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往前说，早在新民学会成立时，他就计划过到日本去。往后说，直到一九二一年九月，他还计划在国内再作三四年的预备，然后“赴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

这些设想，都没有实现。一方面，随后发生的一个又一个的政治事件接踵而至，吸引着他投身其中，无法脱身。同时，也和他上述对中西方文明的认识有关。在留学成为时尚乃至时髦的风气中，毛泽东坚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国情，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学习外国，并且对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都采取分析的态度，确有其不同流俗之处，这也许是他以后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契机。

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的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在这里任教。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六节课。工资不多，毛泽东觉得这样

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同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加强联系，直接投身到社会活动之中。

一个月后，五四运动就爆发了。

中国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之一。四月三十日，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要求，反而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山东攫取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消息传来，北京学生在五月四日首先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立刻震动了全国。中国人民长期郁积的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政府当局卖国行径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五月九日，长沙的报纸冲破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新闻封锁，纷纷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商量改组现在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据当时已参加新民学会的蒋竹如回忆：“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我正在一师十三班的自习室里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同志把我叫了出去。并告诉我：北京派来了两个代表，……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二十五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第二天，我们便分途进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

五月二十五日，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二十余名各校学生代表汇集楚怡小学，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邓中夏后，便由邓通报北京学运情况。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三天后，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六月三日，在学联的组织下，长沙二十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

学生联合会的会址设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该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任会长。它的工作人员也大多是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住的修业小学离商专很近，有时就住在商专就近指导。“可以说，他是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七月九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它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当月已发展到四百多个。这对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思想的提出，可能也会有影响的。

五四运动使一些先进分子带着头脑中积存下来的问题开始更深入的思索。他们下工夫研究并介绍各种新思想。全国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湖南长沙各校也出版了十多种刊物，如《新湖南》、《女界钟》、《岳麓周刊》等，但影响都不大。湖南学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并聘请他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毛泽东准备了十多天，《湘江评论》创刊号在七月十四日正式出版了。它标明自己“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辟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全用白话文。该刊共出五期。

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全力投入《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只好代笔补白。那时正是酷暑时节，蚊叮虫咬，一般人不胜其苦，而毛泽东总是挥汗疾书，常至夜半。一天早上，太阳出来老高了，商专学生易礼容来找毛泽东，他还未睡醒。易礼容掀开蚊帐，不料惊动了一群臭虫，“它们在他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这种情况，想来不止一夜。一个多月内，毛泽东竟为《湘江评论》写了四十篇文章。文章写好了，还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他此时的生活异常艰苦。修业小

学给他的薪水除吃饭外就没有剩余，他的行李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身上的灰布长衫和白布裤穿得也很破旧。在这种窘困生活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

一个时代潮流发生急速转折的历史时刻，引起人们思想上的震荡和变动，无论在广度上和深度上，是平时多少年都难以比拟的。

毛泽东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很能反映他在这个时候的思想和心情。他热情欢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是怎样传播和研究这股新思潮的呢？他把近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社会变革归结为一点：“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用平民主义打倒强权统治，这是他当时的思想基调。

以往，毛泽东一直着重致力于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的“大本大原”，用以解释一切，很少注意决定精神观念的社会物质基础。如今，在五四运动大潮的有力冲击下，他的视野顿时变得开阔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他开始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也转向整个社会的改造问题了。

他意识到：“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贵族、资本

家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无非就是“知识”、“金钱”和“武力”这样一些东西。显然，毛泽东的思想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已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他表示，今后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连载于第二、三、四期上面。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以往，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一直在教育圈子里，总是极力推崇圣贤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殷切期待“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出世，担当起改造人们思想和世界的重任。如今，他感到需要有一个“透底的变化”了。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实际中，他开始看到过去他没有发现的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民众联合的基础是什么？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他在这篇文章中作为主词使用的，不再是“我”如何，而是“我们”。这种用语上的差别，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深刻变化。

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是只看重单纯个人的力量，而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内，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关于民众联合起来后的行动方法，毛泽东说存在着两种主张。一种是以马克思为首的激烈派，一种是以克鲁泡特金为首的温和派。他当时的思想矛盾在于：一方面称颂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打倒强权。后一点，在他当时的思想中显得更为突出，在《创刊宣言》中被作为行动方针提了出来：“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他不赞成暴力革命，是想避免社会“起大扰乱”，还觉得强权者也是人，是我们的同类，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得到的仍是强权。

一个人思想上发生剧变，常常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蜕变过程，不是一步就可跨到的。毛泽东在这时选择的仍是温和的改良道路，觉得“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些”。

然而，军阀统治下的现实，却毫不“温和”。八月中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被迫停办了。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

这个杂志只存在一个多月，在湖南却发生了很大影响。创刊号印了两千份，立刻卖完了，再印两千份，仍不能满足需要。不少进步青年，如任弼时、郭亮、萧劲光，就是在《湘江评论》的直接影响下开始觉悟的。这个杂志，在省外也引人注目。北京、上海、成都的一些报刊，都转载过它的文章。在北京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期，刊载一篇文章《介绍新出版物》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

都的《星期日》”。 “《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个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这期《每周评论》的主编和这篇介绍文章的作者，正是胡适。

这时的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和李大钊进行着“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这次论争，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开始分化。论争双方的主要人物都是毛泽东所敬重的，对这场论争的实质，他似乎一时还不能完全了解。从根本上说，他一向看重要探求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不能只是枝节地去解决问题。他当时写道：“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 他又是注重实际的，所以并不忽视对种种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

毛泽东听过胡适关于实验主义的讲演，曾把实验主义列为近代思想变革的标志之一。他计划筹组一个问题研究会，并起草了一个章程，于九月一日发向各地，邓中夏还把它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这个《章程》提出了需要研究的七十一项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国际、技术等许多方面。恰在这时，长沙一个叫赵五贞的女学生不满父母包办婚姻，在花轿里割颈自杀，轰动了社会。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个事件，让刚刚加入新民学会的周南女校学生李思安等去调查，于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九篇文章，对封建婚姻制度、妇女解放的问题做了一番扎扎实实的分析研究，激励人们奋起反抗黑暗的封建社会。

社会主义，在五四运动后期已逐步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但当时人们眼中的社会主义，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流行于北美的工读主义等等。它们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



的混合物。一切都在讨论和试验之中，毛泽东也在比较和试验之中。在当时诸种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一度占据优势。因为它在中国这块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比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占先了一步。在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都一度倾向于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是毛泽东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旅程中经历过的一个中间环节。

一年前，一九一八年六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就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踏遍岳麓山的各个乡村，想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他们在这里自学，相互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自己挑水拾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这一实验，很快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中断了。

到北京后，毛泽东又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一九一九年三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说新村“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接着，北京大学的王光祈等又组成三个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试图用这种和平的、以典型示范的方式来创建新生活和新社会。这些，在青年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初到北京的毛泽东也受到它的感染。

他回到湖南后，虽然一直忙于学生运动和办刊物，但仍草拟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作为他改造社会的一种构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他把其中的《学生之工作》一章公开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

毛泽东是这样来设计他的理想社会蓝图的：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



工厂，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等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今不敢言‘模范国’、‘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则诚陈义不高，简而易行者矣。”(21)这种主张同他在《湘江评论》上提倡的“无血革命”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认为，岳麓山一带，是实施新村建设的最适宜之处。他把《学生之工作》公开发表出来，目的是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

毛泽东这个建设新村的梦想还没有来得及尝试付诸实施，就被现实生活中极其紧迫的驱逐张敬尧的斗争打断了。这是客观环境迫使他这样做的。

张敬尧是皖系军阀，一九一八年三月率北洋军进入湖南就任督军。主政湘事期间，作恶多端。如：纵兵劫抢，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等等，五四运动爆发后，始终敌视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湖南人民从心底发出了反抗的呼声。

毛泽东正从事教育工作和舆论鼓吹，张敬尧却蛮横地摧残教育并封禁了《湘江评论》。这些，也不能不给予毛泽东强烈的刺激，使他难以平静下来。当八月中旬张敬尧强迫解散学联时，他就开始考虑进行一场驱张运动。九月中旬，毛泽东在商专召集原学联干部酝酿驱张问题，指出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尽可能策动教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他明确地把驱张运动视为爱国运动的继续和深入。

十二月二日，重新恢复的湖南学联联络各界代表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遭到张敬尧军队的武力镇压。这一事件更激怒了湖南人民。毛泽东连续两天参加长沙各界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的会议。六日，学联

公开发表驱张宣言，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决定一致罢课。

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这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地发动起来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他以小学教师的身分成为这场驱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长沙各校总罢课的同一天，派出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处请愿联络。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率领赴京的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住在北长街一个叫福佑寺的喇嘛庙里。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到京后，经与各方协商，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毛泽东很注重新闻舆论的力量，又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起草发出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

为了要求撤惩张敬尧，代表团在京先后进行过七次请愿活动。毛泽东还作为请愿代表，义正词严地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了驱张要求。

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目。日益病重的杨昌济特地致信当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可惜，毛泽东的这位恩师不久就病逝了。毛泽东曾多次到医院探护杨昌济。杨昌济病逝后，他到法源寺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守灵，并发起募捐，抚恤遗属，操办后事。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又同蔡元培、章士钊、

杨度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公布杨昌济病逝的消息，介绍他的生平。

驱张运动发生了明显效果。张敬尧的罪行逐渐大白于天下。在各方一致声讨下，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但最终迫使张氏溜出湖南的，靠的还是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已参加国民党的谭延闿在南方政府的旗号下率湘军再入长沙。时间是一九二二年六月。

在一九二二年六月，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从武昌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认为包括驱张在内的“这两年的运动，效力还不十分大”，今后“要预备充分的能力”，“锻炼一班好同志”，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毛泽东曾在这封信前加了一个按语，对自己倾全力投入的驱张运动作了反思。他说：“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但驱张“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22）。

的确，第二次北京之行，是为着驱张而来。但毛泽东却是把驱张放到改造社会的整个方案中去思考的。湖南究竟应该如何改造？中国究竟应该如何改造？新民学会应该向何处发展？这些，都是盘旋在他脑际的大问题。

对新村式的改良，毛泽东仍保持着一定的热情。到北京后，他就和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取得联系，并正式加入了这个团体。一九二二年二月，他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并写信向长沙的新民学会做了介绍，说：“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23）一种学理是否正确，最终要靠实践来检验。看来，毛泽东对工读互助运动，既喜欢又茫然。他还需要继续观察它在实践中的效果。他曾到周作人的寓所，拜访这位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人。谈话内容，不见记载，但可以推想也是以“新村”为主要话题的。

驱张以后，湖南怎样建设？毛泽东起草了一份改良性质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于三月十二日寄给在京的老师黎锦熙，表示这些虽然是“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但在中国如果连这样一些事也不去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驱张以后，一班志同道合的湖南进步青年做什么？毛泽东设想，自己邀上一些人，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试试看，在里面“实行共产的生活”（24）。

这个时候，毛泽东和李大钊接触更是频繁。他们多次讨论了赴俄留学和女子留学之事。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进北平前，还在西柏坡这样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由于李大钊的影响，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了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当时，和毛泽东交往甚密的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举办的“亢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会晤毛泽东，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他二月间给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说：“即我，历来很懵懂，狠不成材，也狠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狠有研究的价值。”三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又前往黎锦熙住处长谈到深夜，讨论改造中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社会主义的问题，黎锦熙也主张中国的问题应该从“根本解决”下手。

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问题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透彻了解，他是不肯轻易地作出判断的。问题越重要，就越是如此。他觉得，自己对于“种种

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25）。通过驱张运动的实践，再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了解，他意识到，“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自己也一样，未曾详细研究，因此如同“睡在鼓里”（26）。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似乎一时还不愿去做“详细研究”。他历来不是一个只从书本里寻求真理的人，再加上他“脑子不能入静”（27），更想做的还是在他看来更现实的一些具体事情。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由旅沪的一些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毛泽东决定到上海，同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同时，萧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也将要从上海启程，可以乘便送行。

四月十一日，毛泽东离京赴上海。中途，他特意下车去游览了孔子的故乡——曲阜，还登了泰山。对孔子这一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人，他仍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二十五天后，五月五日，毛泽东一行到达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今安义路六十三号）。这时，新民学会从北京、长沙、天津到上海的会员达十二人。五月八日，由毛泽东主持，在半淞园开了一天会，送别赴法会友，同时讨论了会务。讨论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28）五四时期，不少讲新思潮的青年，常常耳食了些新名词，立刻生吞活剥，虚骄浮躁地大发种种议论。新民学会这次讨论会强调“潜在切实”，正是有感而发。大家还议定了介绍新

会友四个条件：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29)

五月十一日，在沪会友送别了萧三等六人。毛泽东还想试一试他一度醉心的工读互助生活，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实验过互助工读团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经过亲身实践，他很快察觉这种团体生活中难以克服的弊端，立刻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30)

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讨湖南建设问题。毛泽东同彭璜等几经讨论，草拟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上海的《天问》周刊及《时事新报》发表。六月十一日，湘人痛恨的张敬尧被逐出长沙，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在湖南建设民治这个新问题，立刻提到湖南人的面前。十四日，毛泽东将原先写好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发表于上海《申报》。这个月内，毛泽东还接连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阐明他的主张。毛泽东深深感到，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根除的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减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认为，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

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谈话中，自然也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

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31)

在他“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和南陈北李这两位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巨人相继晤谈，可说是毛泽东第二次离开湖南的巨大收获。他又要回湖南了，他这时的事业还在湖南。

六月二十六日，张敬尧军队全部撤出湖南省境。在外从事驱张活动的湘籍人士相继回到长沙。七月七日，毛泽东经武汉返回后，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不久，又被聘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级任（班主任）。这时，他的心情是愉快的。

回湘后，毛泽东就着手办两件大事，一件是关于当前的，一件是关于长远的。

关于长远的，他着力于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把眼光主要地转向俄国。还在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便两次写信告诉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表示自己不打算到法国勤工俭学，而准备“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毛泽东还准备在两三年后组织一个“留俄队”，他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32)为什么想要去俄国呢？因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33)。

回到长沙，毛泽东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七月三十一日，湖南《大公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宣称：“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文化书社所面对的工作对象，比新村和自修大学时要广得多。他当时说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再是宽泛的“新思潮”。他说：“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



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可以看出，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开始寄托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榜样上。

他们租了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作为文化书社的社址，还请刚刚就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写了招牌。毛泽东以“特别交涉员”的身分，多方筹措资金，努力扩大营业范围，先后和省外六七十个单位发生业务往来。文化书社经营的书刊，如《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译著，以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编辑的刊物《劳动界》，都体现了毛泽东追求的“新文化”的希望之光。这些书刊都很畅销，社里总是供不应求，反映出当时湖南社会中对介绍新思潮的出版物的迫切需求。文化书社社址，后来事实上也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对内对外的秘密联络机关。

创办文化书社后，毛泽东又和方维夏、彭璜、何叔衡等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八月二十二日，筹备会议在长沙县知事公署举行，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具体工作安排是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实地考察，提倡赴俄勤工俭学。九月十五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正式成立，毛泽东被推为书记干事。经毛泽东推荐，湖南《大公报》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在青年中产生广泛影响。俄罗斯研究会还先后介绍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十六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赴俄国留学。

关于当前的，是和驱张运动一脉相承而来的湖南自治运动。这是毛泽东回长沙后投入的第二件大事。

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腐败而又专横，打着“武力统一”的旗号，连年发动对南方的征伐战争，许多人自



然把希望寄托在地方自治或联省自治上面。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曾表示赞同。李大钊甚至说过：“依我看来，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中国。”(34)这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小的。在北京，他就同罗章龙讨论过，想把湖南搞成中国的先进地区，就像西方古希腊的斯巴达、德国的普鲁士那样。(35)从上海回湖南后，尽管他已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但对社会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望。不在实践中尝试一下，人们是很难轻易放弃自己选择过的思想武器的。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曾在七月九日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七月二十二日，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禡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他的目的是笼络人心，维护他还没有巩固的统治，抵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再度干预。但湖南社会各界，由于长期深受北洋军阀之苦，由于谭延闿当时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再加上毛泽东等此前对湖南自治的广泛宣传，许多人对谭的诺言寄予很大希望。各种社团和知识界人士纷纷发表主张，提倡“民治主义”、“湖南自治”。

谭延闿发表“禡电”时，毛泽东正在韶山乡下休息。九月一日，他赶回长沙，立即参加湖南自治的讨论。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个人或联名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上连续发表十四篇文章，系统地提出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

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有意把“湘人治湘”和“湘人自治”相混淆，实质是想借湖南人的家乡观念，为他们这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开路。毛泽东提出，湖南人民要求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为“湘人治湘”是“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

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36)他要求把“湖南自治”搞成发自主层的政治运动。他心目中的榜样是俄国，“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37)。

湘人自治采取什么形式呢？毛泽东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38)他觉得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国“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39)。“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40)

毛泽东号召湖南带个头，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他认为，湖南在驱张成功后，已经摆脱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可能率先这样去做。他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等等。

毛泽东这种近乎惊世骇俗的构想是大胆的，但又是空想的。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还存在的内在矛盾：这个用来率先示范的“湖南共和国”其实近似一种放大的“新村”；由各种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联合起来，用舆论的力量来推动谭延闿实行湖南自治，又近似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鼓吹的“呼声革命”。只要有会，他都还想试一试。

湖南自治的舆论声势已成。毛泽东希望能进一步推动起一种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此同时，谭延闿也担心呼声日高的自治运动发展下去后，他会控制不住，就匆忙地在九月十三日召集“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推

举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会”的起草员，来草拟一部“省宪法”，然后召开制宪会议。毛泽东当然不能罢手。形势的发展，迫使他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实际运动中去。

谭延闿官办自治的方案刚发表，毛泽东、彭璜和《大公报》主编龙兼公就动议搞一个民办自治的文件。稿成后题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这个文件利用谭延闿原来所作的开明姿态，承认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省政府“实在是一个革命政府”，认为在这“千载一时的机会”，由这个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是比较现实的。同时提出：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的湖南乃建设告成”。

这个文件于十月五日至六日在长沙《大公报》上公开发表，签名者达三百七十七人，几天后增加到四百三十六人。毛泽东为实施这个文件多方筹划奔走。七日，他参加湖南学联召开的省城各团体、各报馆代表联席会议，决定双十节举行自治运动游行请愿，推举龙兼公、毛泽东起草《请愿书》。八日，他又出席省教育会召集的“第二次筹备自治运动之各界联系会议”，到会代表四百三十六人，由毛泽东担任主席，详细讨论了宪法会议选举和组织法要点，并推举方维夏等将讨论结果提交湖南省政府。

十月十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到达督军府门前时，彭璜等代表向谭延闿递交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在省议会门前，出于对包办“制宪”的不满，还有人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

谭延闿接下了《请愿书》，但对所提各项要求却在事后断然拒绝。十一月下旬取谭而代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

惕，更撕下开明的伪装。他们知道毛泽东是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便制造谣言，说是毛泽东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还想捣毁省议会。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诘问，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的恐怖气氛。毛泽东不得不在《大公报》上登出《辩证函》，郑重声明：“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

警察没有再采取什么行动。但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好似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也从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告诉朋友，“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41）。十一月下旬，他决定离开省城休息些日子，到了江西萍乡。

在萍乡，毛泽东又从行动回到了思考。原来设想的路走不通了，必须另外开辟一条新路。他一向是个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能够在探索中不断扬弃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想法的人。

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同一天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等新民学会会员写了五封信。其中三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教训。

给向警予的信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并且从这个失败中得出结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给李思安的信说：我们须“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这个“他们”，自是指谭延闿、赵恒惕之流。

给罗章龙的信说：“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须“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毛泽东总是扎扎实实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又一次的自我剖析和扬弃。事实的教训，使他终于摆脱开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使他更加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下这个决心实在是来之不易的。一旦下定了决心，他再也没有回过头。

到十一月底，他还做完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把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并在一些信件上写了提要或按语，在十二月间印制出来。这是对他和新民学会两年多来思想探索的道路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回顾。

毛泽东在《通信集》中一封讨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信件上加写了一段重要的话：“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

这些运动之外的“主张”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42）

这时的蔡和森，正在法国。自一九二一年五月上海半淞园会议之后，新民学会会员主要分在法国和长沙两地活动。留法的会员到今年冬天已达到十八人。第一批赴法的蔡和森等已能阅读法文书刊，“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革命书刊。这使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比毛泽东等稍早一点，也更深一些。上海半淞园会议要求法国会友定期会集，组织座谈。萧三把这个精神带了到法国。一九二一年七月五日至十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十五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会，通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现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争论。会议委托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等。

萧子升的信写于八月初。他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蔡和森的信写于八月十三日。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其中,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的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这两封信在路途上时,毛泽东正为自治运动忙得不可开交。他大约在十一月份看到它们,这时正好已抛弃实行湖南自治的幻想。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于十二月一日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会友写了长达四千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作出明确的选择:“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引注)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是他从无情的实际生活中得出的结论。

萧子升随后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于九月十六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复,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表明他两年多来经历了一条多么曲折的心路历程啊!四十年后,他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43)

在表明这种态度时,毛泽东刚过完二十七岁的生日。

蔡和森 1918 年 6 月 30 日致毛泽东信,《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3—44 页。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 1 号(1920 年冬)。

罗学瓚致祖父、叔祖父信,1918 年 10 月 16 日。

《北京大学日刊》,1919 年 1 月 28 日。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 1 号(1920 年冬)。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 1 号(1920 年冬)。

毛泽东致舅父母信,1919 年 4 月 28 日。

罗学瓚致毛泽东信,1919 年 11 月 14 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7—68 页。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 年 3 月 14 日。

据萧三 1918 年 3 月 31 日记载:“二兄来坐已久,……又述润之等赴日本求学之计划。”

毛泽东致杨钟健信,1921 年 9 月 29 日。

蒋竹如:《湖南学生的反日驱张斗争》(1962 年 2 月 24 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80—582 页。

蒋竹如：《湖南学生的反日驱张斗争》（1962年2月24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0—582页。

易礼容：《有关新民学会的史料几则》（1979年7月7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5页。

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湘江评论》第1号，1919年7月14日。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

毛泽东：《健全会之成立及进行》，1919年7月21日临时增刊第1号。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

毛泽东：《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

(21)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

(22)毛泽东：对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致毛泽东、彭璜信的按语，1920年11月。

(23)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

(24)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25)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26)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

(27)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20年6月7日。

(28)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29)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30)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20年6月7日。

(31)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0、133页。

(32)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

(33)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34)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新潮》第1卷第2号。

(35)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从湖南到北京)》(1979年5月)，《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0页。

(36)毛泽东：《“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3日。

(37)毛泽东：《释疑》，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27日。

(38)毛泽东：《“全自治”与“半自治”》，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3日。

(39)毛泽东：《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6日、7日。

(40)毛泽东致罗章龙的信，1920年11月25日。

(41)毛泽东致罗学瓚信，1920年11月26日。

(42)毛泽东对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致毛泽东、彭璜信的按语，1920年11月。

(43)毛泽东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3日。

## 四、建党初期的实干家

二十七岁的毛泽东，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一九二一年冬天，他和杨开慧结婚。

杨开慧生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六日，比毛泽东小八岁。她跟着母亲在长沙县板仓乡下度过童年。父亲杨昌济留学归来后，迁居长沙城。一九一八年又随父亲迁居北京。杨昌济病逝后，一九二一年二月和哥哥杨开智扶柩回到长沙。不久进湘福女中选修班读书。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她便到湖南学联做宣传工作。

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中，和她相爱了。杨开慧后来回忆说：“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毛泽东也有许多信给她，表示爱意。还写过一首《虞美人》寄给杨开慧，上阕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大概只有在热恋中的深情男子，才会写出这样温柔缠绵的词句。

杨开慧还说：“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享一个命运”。

这些话写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杨开慧牺牲前把它藏于长沙板仓住所的墙缝里，直到一九八三年才被发现。这也是他们爱情史上的一段佳话。

他们结婚的时候，杨开慧只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毛泽东任主事的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这天晚上，他们花六块银元办了一桌宴席，招待长沙的几位亲友。从此，

杨开慧一直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并在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婚燕尔之际，毛泽东牵挂着新民学会的活动。他和蔡和森、何叔衡等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从根本上确立新民学会发展正确方向的时机也已成熟。长沙的会员好些日子没有开会了，他和何叔衡等商定，一九二一年元月一日至三日在潮宗街文化书社举行学会的新年大会。这几天，正好是各机关和学校放假的时候。在发出的通知里，根据巴黎会友的提议，列了“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等十二项讨论内容，要求会员先研究准备，届时“拨冗到会，风雨无阻”。

元旦这天，下了一场雪。邹蕴真回忆：“那天早饭后，一人徒步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书社是租用旧公馆的一部分，坐北朝南，前面一道高墙，中间开个黑漆大门，进门是个方砖铺成的空坪，空坪北面有一长排房屋，靠东的两间木房，就是书社作为营业处承租的铺面。空坪东边靠近营业处前面，有个长方形厅堂，里面放着一张长方桌和一些小方凳，就是我们开会的会场。开会期间，天气阴冷，时飞小雪，但到会的仍踊跃，无中间缺席者。”

到会的有十多人。会议由何叔衡主持。先由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召开蒙达尔尼会议的讨论结果，然后着重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的方法、眼前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畅所欲言地展开讨论。

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有人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东亚”，有人不主张用“改造”二字，认为宜用“促社会进化”。毛泽东发言说：“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

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一月二日付以表决。到会者十八人中有十四人赞成“以改造中国及世界”或“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

一月二日，讨论第二个问题时，仍先由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的意见，接着他把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五种：一、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供大家讨论。何叔衡第一个发言，说他“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泽东紧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似。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表决结果，毛泽东等十二人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两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三人弃权。

一月三日，讨论第三个问题，即眼前如何着手。大家提出研究、宣传、联络、经费、基本事业（办学校、书社、印刷局等）和建立组织等六项。熊瑾玎等谈到“有组党之必要”，全体同意把“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着手方法”之一。

在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毛泽东表示：“我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

能留作会议纪念的,是毛泽东整理的新年大会全部记录。不久,他又把这份记录铅印出来,作为《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分寄给长沙及省外、国外的会员。

当时在《湖南通俗报》做主编的谢觉哉,在元旦这天刚被毛泽东、何叔衡、周世钊介绍加入新民学会,他参加了后两天的讨论,在元月三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新民学会开会,关于主义争辩甚厉。……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

巴黎和长沙的两次大会,说明新民学会已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学会七十四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的约三十一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有三十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并同情革命。只有熊梦飞等二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

和新民学会多数会员分道扬镳的,还有主张温和改良的萧子升。毛泽东一九一一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和他认识了。在湖南一师又是同学,萧早毛泽东三年毕业,两人曾一同“游学”,相交甚深。萧子升很有活动能力,书法很好,但有公子气。他从法国回来后,同毛泽东争论了好几个晚上,谁也没有说服谁。大革命时期,他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国共分裂后,当过故宫博物馆监守,国民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后来长期旅居海外。晚年曾回忆说:“一九二一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中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

这个“秘密组织”,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新年大会前后,毛泽东没有把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事情在新民学会公开。

一九二一年八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

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看来，长沙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

十一月间，毛泽东便收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正式委托。他们还将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毛泽东，还寄来了《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十一月左右，毛泽东曾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内容之一就是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因陈乘海轮赴广东，就任孙中山军政府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到长沙来。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时间大约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

不久，毛泽东写信告诉蔡和森这位建党热情最高的朋友：“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

在筹组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毛泽东还进行着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一九二二年十月，他同时收到北京、上海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便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的在校学生中物色对象，建立团组织。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就是毛泽东物色的建团工作骨干。他在一九二二年底的日记中多次写道：

十一月十九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见毛，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十二月二日，“泽东来此。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为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咐多找真同志。”

十二月十五日，“接泽东复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团结一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的问题你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在本学期开一次会’”。

十二月十六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十二月二十七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日记几次出现“找真同志”的字眼。可以看出毛泽东积极慎重、注意质量的建团方针。北京、上海一些地方在建团时，由于缺乏经验，忽视质量，成员复杂，以至不得不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宣布解散。湖南的团组织避免了这段弯路。它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日，即新民学会新年大会结束后十天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立时有团员十六人，到七月份发展到三十九人。其中有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

当时，毛泽东已父母双亡，他先后把小弟弟毛泽覃和从小在他家里长大的堂妹毛泽建接来长沙读书，只留大弟毛泽民在家理事。毛泽东把自己献给了革命，对家庭也有了新的想法。

一九二一年二月，他带着毛泽覃回韶山过春节。年三十晚上，毛泽东和弟妹们围着火塘守岁。毛泽民告诉哥哥，家里起了一次火，修屋用了不少钱，前些时候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家事已是一年不如一年。毛泽东听后开导说，国乱民不安生，要舍家为国，走出去干点事。家里的房子可以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那几头牛，还是让别人

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着。剩下的谷子，春耕时卖给上下屋场的人吃。

过完春节，毛泽民随毛泽东离开韶山到了长沙，被安排在一师附小做校务，同时在工人补习学校学习。从此，毛泽东全家投身革命活动，毛泽建、毛泽覃、毛泽民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毛泽东对个人的思想修养和改造一直十分认真地对待，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给彭璜的信中对自己性格中的长处和弱点作了坦率的剖析：“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情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青年毛泽东的这种性格，在他以后的日子里仍多少可以看得出来。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采纳蔡和森此前“事须秘密”，“潜在运动”的建议，常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名义，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毛泽东还时常向长沙《大公报》推荐马克思主义文稿。该报主笔龙兼公是他的朋友。毛泽东还通过第一师范工人夜校，在工人中展开工作。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长沙工人和学生数百人冒雨举行了庆祝国际劳动节游行。据李达回忆：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交换各地工作经验，“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刚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

毛泽东是一九二一年六月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知的。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六点，他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



的小火轮。旅费由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协助筹集。他们走得很突然，也没有让亲友送行。当时和何叔衡同在《湖南通俗报》工作的谢觉哉在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借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

这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十二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与会。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四十五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十九岁。十五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二十八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以后改变整个中国面貌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成立起来的。他们或西装革履，或身着长袍，是一色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当时并不特别引人注目。

代表们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会址设在不远处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家里，门牌是贝勒路树德里三号。七月二十三日正式开会，最后一天（三十一日）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进行。大家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做记录。会议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关于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会议确定要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的确，毛泽东有着许多实际活动经验，

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书呆子’‘神经质’”。

八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因身体不舒服，便住在船山学社，以养病为主。他抓紧时间读了些书，特别“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已晓得非读不可了”。

他的心情是愉快的。要做的事情很多，怎样开展工作？党的“一大”会议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办法。各地党组织的工作，一般从两方面着手：一、利用职业关系进行宣传和发展党员；二、想法接近工人，组织工人运动。毛泽东也是这样开始他建党初期的活动的。

回湘不久，他被聘为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随即辞掉一师附小主事职务，推荐何叔衡接任。他们觉得党需要有一个加强理论学习和宣传的公开场所，便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学。

创办自修大学是毛泽东的夙愿。早在一年多以前他就设想过。毛泽东先后起草了自修大学的《组织大纲》和《创立宣言》。里面说“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采取自学为主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并注意劳动，“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学校发出的《入学须知》中申明：“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九月开学时，入校者只有一人，即后来著名的共产党员夏明

翰。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省长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的罪名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时，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已经培养了来自湖南三十四个县和外省四个县的二百多名青年。

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同时，毛泽东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十月十日，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

支部租了小吴门外清水塘二十二号一处平房，作为秘密活动机关。清水塘在城郊，地方比较偏僻，所住多为菜农，菜畦里有两口水塘，上塘水浊，下塘水清，由此得名。门前有一条路直通小吴门，人来人往不大引人注意。毛泽东和杨开慧从一九二一年十月搬到清水塘，一直住到一九二三年四月离开长沙。

湖南党支部成立后，毛泽东着手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为了接近工人，他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赤脚穿了草鞋，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同他们做朋友。先后在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冶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吸收一些先进分子入党。在学生中，首先是在自修大学、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等基础较好的学校发展党员，有的学校还建立了支部。毛泽东还两次到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建立党支部。两次到安源煤矿了解情况，并于一九二二年二月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由李立三任书记，是湖南党组织领导的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夏曦、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毛泽民、黄静源、杨开慧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入党的。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包括江西萍乡安源）已有中共党员三十人。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等，后来增加郭亮。区委机关仍设在清水

塘二十二号。杨开慧实际上担任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

这个期间,毛泽东还以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身分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湘区团组织建设的工作。一九二二年六月七日至十五日,他连续三次给当时在团中央机关工作的张秋人写信,报告和联系团务。六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长沙地方团员大会,在团执行委员会下面,特设立了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社会教育运动、妇女运动、政治宣传等七个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十分自然,中共“一大”闭幕后,便把发展工人运动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所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中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十月,在长沙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

尽管毛泽东在一师时办过工人夜校,但从事工人运动对他仍是件缺乏经验的陌生事情。他办事历来不尚空谈,而是脚踏实地,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在湖南从事工运,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争取湖南劳工会。这是个在湖南工人中较有基础而又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的工人团体。它只作经济斗争,组织原则是“铲除领袖的合议制”,绝对打破领袖观念和男女界限,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长沙成立。主要创始人是黄爱和庞人铨,会员约七千人。

劳工会拥有不少群众,黄、庞二人在工人中也有相当威信。要把他们争取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泽东首先仔细了解和分析了劳工会的情况,从中看出一些有利因素。如:黄爱、庞人铨都是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为人正直,纯洁;黄爱还先后受过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是在征得陈独秀的支持后由沪返湘组织劳工会

的。劳工会领导第一纱厂工人反对省政府把纱厂租给华实公司的斗争遭到失败，正需要人帮助指导。于是，毛泽东从帮助黄爱、庞人铨入手，指定专人同黄、庞联系，还多次约他们到清水塘住处恳切交谈。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毛泽东同黄、庞商议改组劳工会，并在《劳工周刊》上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一文，对改组劳工会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劳工会的目的不仅在从事经济斗争，“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是旧的行会式组织方式要不得，要有民主产生的人员精干的办事机构。三是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要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黄、庞的赞同和采纳，他们随即对劳工会进行改组，把原来各工团的合议制，改变为书记制，将过去的八个部集中为书记、教育、组织三个部，黄爱还邀请毛泽东助理会务。他们接受毛泽东“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先后成立了土木、机械、印刷等十多个工会。劳工会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十二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到桂林和孙中山会商。途经长沙曾作停留。毛泽东在文化书社接待了他，介绍黄爱、庞人铨和马林见面，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给他们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的情况。马林在随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曾这样谈到沿途的观感：“这次南方旅行我觉得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最重要的时期。……在若干省城里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十分感兴趣。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青年组织总的说来实际上并没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

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底举行了罢工”。

马林走后，毛泽东请易礼容转告黄爱、庞人铨，邀他们到清水塘谈话。事后，毛泽东对易礼容说：“谈得很好，他们的见解看法同我们是一样的，愿意同我们一起干”。

十二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市民和学生，举行示威，反对美、英、日、法等国在华盛顿召开“共同支配中国”的所谓太平洋会议。黄、庞分任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当时的记者报道说：“劳工会的‘老虎的和平’的传单，从经济的立场，揭穿太平洋的内壁，鼓吹阶级斗争，鼓吹劳动者武装，鼓吹全国、全世界的劳动者的大团结，色彩是很鲜明的。”这是改组后的劳工会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在全国影响很大。黄爱、庞人铨也在斗争中洗刷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黄爱、庞人铨因组织长沙纺织工人罢工，遭军阀赵恒惕逮捕，次日晨被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牺牲前，黄爱被砍三刀后仍用力高喊：“大牺牲，大成功”。

黄、庞遇难后，毛泽东立即联合长沙各界在船山学社两次召开追悼大会，发行纪念特刊。为冲破赵恒惕对舆论的封锁，毛泽东把李立三从安源调回，指示他去常德动员黄爱六十岁的父亲同去上海，向各界控诉赵的罪行。随后，毛泽东也借机赴上海，组织反赵运动，出席上海追悼黄、庞大会。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追悼黄、庞，抗议赵恒惕摧残工运罪行的浪潮。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中特别说道：“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黄爱五四时期曾在天津参加觉悟社，

和周恩来交情甚深。周在德国得知黄、庞被杀，悲愤地写下《生别死离》一诗，表示决心要用鲜血来浇灌“共产花开”，让“赤色的旗儿飞扬”！

通过改组和指导湖南劳工会的活动，毛泽东初步获得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他深知依靠和培养骨干、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于是指派党内干部，先后组建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这个名称，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定下来的。除路矿等方面的一部分产业工人外，湖南省会长沙主要是手工业工人聚集的城市，行业很多，工人多达十万人。毛泽东领导湖南党组织先后组建了长沙泥木工会、长沙人力车工会、长沙笔业工会、长沙理发工会、长沙缝纫工会、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等。各工会和俱乐部的秘书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毛泽东还亲自兼任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的秘书。从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三年初，先后领导发动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

斗争高潮是从安源工人大罢工开始的。

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共有工人一万七千人。由于株洲同长沙已有铁路相通，它同长沙的联系比同江西省会南昌要方便得多，所以由湖南党组织领导，是湖南党组织领导范围内最大的工矿企业。早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到萍乡休息，到过安源考察，注意到这里的工人所受的残酷剥削。他们每天劳动长达十二个小时，工资低微。矿井又没有安全设备，不断出现伤亡事故。

一九二一年冬，安源路矿一些工人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派毛泽东前往。他两次到安源，后一次还带了李立三等一同前往。下到又黑又脏的煤井，同工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疾



苦。他告诉工人们应该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还打了个比方，说：路上有点小石子，大老板抬脚随便一踢，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合成团，大老板搬也搬不动。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决定把这里作为发展工人运动的基本立足点。年底，派李立三到安源开辟工作，以后又陆续派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到安源工作。

毛泽东很强调争取以合法形式开展斗争，先把脚跟站稳，逐步开展工作。他告诉李立三要利用当时社会上兴起的平民教育运动，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发现和培养骨干。李立三到安源，用的就是办平民教育的名义。他通过关系打听到萍乡县知事是举人出身，喜欢古文骈体，反对白话文，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请求立案，果然很快得到批准。这个县知事还把呈文加上头尾，作为布告张贴。一九二二年一月，安源建立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主任，朱少连任副主任，取得了合法地位。一九二二年“五一”劳动节这天，安源工人举行了声势较大的示威活动。

五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当听说“五一”游行喊的口号中有“中国共产党万岁”时，他告诫大家，一定要稳当，一下把共产党公开出去，要是反动派向你们要共产党怎么办？有的人就会害怕。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要讲究斗争策略，不然就要吃亏。现在要紧的是把工人组织起来。

此后，工人俱乐部注意斗争策略，采取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方式，把俱乐部活动同工人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加入俱乐部的工友增加了许多。九月初，毛泽东第五次来安源，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分析安源斗争形势，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接着又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罢工方案。毛泽东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策略，以争取社



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九月十四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罢工宣言提出十七项政治和经济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安全胜利”。这年冬天，毛泽东第六次来安源，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在会上作了全国工运情况的报告。临行前，毛泽东指示安源党组织，趁罢工胜利，发展一批优秀工人入党。安源党团组织迅速发展，到一九二三年就发展了十三个党支部和二十六个团支部，还建立了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第七次到安源。这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残酷镇压，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安源路矿当局也扬言要取缔工人俱乐部。来安源前，毛泽东就召集安源党组织负责人到长沙开会研究对策。他指示要暂避锋芒，取稳重步骤，不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弯弓待发之势，做好罢工的充分准备。安源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回来后一方面找矿局谈判，严词指明当局有请军队解散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如果这样做，势必引起工人再度罢工，整个矿区将遭受破坏。同时在工人中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做好充分准备。这就使矿局陷于被动，终于不敢动作。

一九二二年十月，紧接安源罢工胜利之后，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

当时，官府搞土木工程的“义务工差”很多，工价又低，这是泥木工人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工人罢工的基本目的是争取营业自由权，并要求长沙县知事把工价调到三角四分。十月六日，罢工开始后，毛泽东奔走呼号，使全国一些地方的工会发来声援电，长沙《大公报》几乎每天都报道罢工消息。但长沙县公署拒绝接受工人提出的条

件。工人们决定请愿，县公署又张贴布告，禁止请愿，否则依法惩办，还说工人中有“暴徒”。一些工人害怕再度发生黄、庞事件，找毛泽东商量。毛泽东对他们分析说，现在的形势与黄、庞领导罢工时大不相同了。一方面，工人有组织，社会各界同情我们；另一方面，此事和赵恒惕直接关系不大，没有赵的眼色，长沙县知事周瀛干不敢杀人。

十月二十三日，数千泥木行业工人开进了县公署围墙。毛泽东穿着一件对襟衫在队伍中间指挥。他手上带着一个口哨，吹一声口哨，工人喊一句口号，连吹连喊，工人的情绪越发高涨。周瀛干始终不敢出来。最后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只好出面，答应次日上午召集公团会议，请泥木工人派代表出席协商。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亲自担任泥木工人首席代表，率领几名工人代表到省政务厅同吴景鸿谈判三小时，迫使吴答应由泥木工人行具一个呈文，说明要求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交省政府赵恒惕批准。毛泽东当场将吴和工人代表的谈话记录下来，并起草呈文。第二天，《呈省长文》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毛泽东在“呈文”里采取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和分化打击的策略，特别指出：营业自由，载在宪法，工价之争，官府不必过问。泥木工人以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既蒙省长维持，复承政务厅吴厅长于今日工等代表晋见之时，代表省长表示允照工等主张办理”，请省长明白批示，以安人心云云。赵恒惕不得不照此批准。至此，泥木工人经过二十天罢工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更大规模地开展湖南工人运动，毛泽东开始筹划全省统一的工人组织。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新河站开成立大会，大会由毛泽东主持，全省三十多个工会组

织各派代表参加。与会代表一致赞成组建全省工团联合会，随即又召开联合会第一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推为主席并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发表演说。会后，毛泽东参加起草了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章程。十一月五日召开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选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同时发布宣言通告全国。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两大地方组合”之一，另一个是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称是搬用的外来名词，很难被工人群众所理解。在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这个名称便不再使用了。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做的一件大事，是同赵恒惕政府进行了三天说理请愿斗争。

当局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深感不安。他们制造谣言，说干工运的是“过激派”，得了外面的钱，搞无政府主义，要推翻现在的省政府等。同时还放出将对工人采取严厉镇压手段的口风，并发生了长沙西区警察署突然摘下人力车工会会牌等挑衅事件。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利用赵的省宪法，展开说理斗争。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分，率领所属各工会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瓚等二十三人，会见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省警察厅长石成金。十二日，又会见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十三日，直接会见赵恒惕本人。他们就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关于结社、集会自由，表明工界本身的态度等十个问题展开谈判。迫使赵恒惕等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还承认省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有自由结社、和平集会的权利，“不受何种特别法令的限制”，“完全有效”。毛泽东等还申明：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它于工人有利，但目前尚难做到，故以民治主义为原则，绝不是官厅文告说的

无政府主义。赵恒惕等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确是深恶痛绝，但对社会主义却茫然无知，因而表示“均以工人采这种态度极为得当”。

工人的要求基本上得到解决，毛泽东等立刻以《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县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为题，披露说理斗争详实情况，刊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的长沙《大公报》上。赵恒惕像吞下一颗酸涩的果子，很不是滋味。事后他对左右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就不能立足了。

的确，经过两年工人运动的锻炼，毛泽东已经成长为一个老练的革命家。在斗争实践中，他依靠组织和群众，培养骨干，注重策略，利用矛盾，争取舆论，以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后来毛泽东身上表现出来的出色的领袖才干，这时已初见端倪。他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罢工十次，胜利及半胜利九次，失败一次，“大引起社会之注目”。同时也获得党内的高度评价。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曾这样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自一九一七年四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刊发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六年过去了。从五四、建党到工人运动，陈独秀越来越赏识毛泽东的才干。一九二三年一月他着手筹备党的三大，便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安排好湘区工作，离开清水塘，离开妻子杨开慧和刚刚半岁的儿子毛岸英，秘密地前

往上海。这时，长沙街头已贴出赵恒惕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的布告。

邹蕴真：《新民学会成立会和一九二一年新年会议概况》，《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5页。

《谢觉哉日记》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26、27页。

萧子升：《毛泽东青年时代》，引自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综述》，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75页。

周佛海：《扶桑籍影溯当年》，引自《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71页。

毛泽东致蔡和森信，1921年1月21日。

蔡和森致毛泽东信，1920年8月13日。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谢觉哉日记》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1979年3月14日、17日），《“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5页。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21年9月28日。

《马林赴华回忆》（1935年8月19日），《“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0页。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

陈独秀：《党务、政治宣传、劳动运动情况及今后计划》，1922年6月30日。

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1923年8月1日，原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

毛泽东：《省宪下之湖南》，中共中央理论月刊《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

《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1923年6月。

## 五、在国民党内工作

离湘赴沪后不久,毛泽东又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先期到达广州,和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等,为中共三大做准备工作。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三十一号召开。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身分出席。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还在去年八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留下的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只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国民党在社会上有威信,又在南方建立了根据地。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几经挫折,深感中国革命要改弦易辙,对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西湖会议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就陆续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对这样做,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四月离开长沙时,他在湖南自修大学主办的《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提出:中国的反动势力太大了,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共产党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将同“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合作,以“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到广州后,他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是“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阵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从五四时期倡导民众大联合,到这时主张建立联合阵线,他的思路是连贯的。

在三大上，对国共要不要合作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围绕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却发生了争论。张国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去搞党内合作，否则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张国焘的观点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多数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在发言中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阵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

大会选出九名正式委员、五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五个人中有三个人原来是新民学会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根据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时他三十岁，刚好是“而立”之年。

三大后，中央机关暂留广州。这时起，毛泽东开始接触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他曾和李大钊、陈独秀到廖仲恺家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还常去培正路简园谭延闿住处。谭被赵恒惕迫出湖南后，这时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建设部长，正在为讨伐赵恒惕做准备。毛泽东通过他加强对国民党内部情况的了解和联系，也为中共湘区委采取联谭倒赵的政策创造条件。这时，国民党本部刚好要派国民党元老覃振回湖南，毛泽东便托他带信给李维汉，要湘



区委协助覃在湖南筹备国民党组织。当时，在湖南的国民党党员只有邱维震一个人。

此后，毛泽东一直挂念这件事情。九月，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办公，便委派他回湖南贯彻三大决议，指导湘区委筹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林伯渠，还给了他一个中央党部筹备员的名义。

此前，湘区委接受他的建议，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和覃振、邱维震成立了筹备组。由于谭延闿率军讨赵，湖南战事甚紧，工作没有完全展开。九月，谭败退广东，局势稍稍稳定下来。十六日，毛泽东回到湖南，随即同夏曦商定了筹建和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具体步骤：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在常德、衡阳等地建支部，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湖南总支部。二十八日，他写信给在广州的林伯渠等，汇报了这个计划，说当天便“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并建议委任夏曦为筹备主任。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十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使湖南在大革命时期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这次回湘，毛泽东和杨开慧仍住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二十二号。开慧上有老母，下有孩子，负担很重，生活清苦。毛泽东回来后她格外高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毛岸青也于十一月降生了。可是刚住了三个月，毛泽东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离湘赴上海。临行前，毛泽东强抑感情，作《贺新郎》相慰：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到上海，是为了参加即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的通知说：“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会议决一致的主张。”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是个很重要的日子。在孙中山主持下，国共两党的精英，同处于广东高等师范学院那座有着高高塔楼的礼堂内，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分出席。他的座位是三十九号，会议期间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他多次发言，除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发表意见外，还针对国民党内的右派观点申明自己的主张。

一月二十八日，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写上国民党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这个提案显然是针对共产党员跨党、反对孙中山容共政策的。李大钊率先驳斥方的谬论，诚恳地解释了共产党的做法。廖仲恺等人起而支持。在大会气氛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毛泽东趁机发言：“主席！主席！三十九号发言，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轻易否决了。

二十九日，大会在是否通过“请采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发生了激烈争论。所谓比例选举制，是西方国家选举制度之一。它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在选票总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其议员席位的名额。提案人黄季陆发言说：“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

因为现在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力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他的意图是保护当时在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的地位，很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毛泽东发言反驳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多数代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大会没有通过这个提案。

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三十日上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他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他于二月中旬到上海，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六月初，杨开慧和母亲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到上海，一家便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今威海卫路五八三弄）。

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工作，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办公。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傖等分任各部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沈泽民、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等共产党员，也都担负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社会上一时称环龙四十四号为“国共群英会”。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那时也设在上海。国共合作一段时间后，需要总结经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问题》等决议案，强调“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

——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并“以宣传工作为主”，宣传国民党一大精神，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要求民权的主张。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分设组织、宣传、工农、妇女各部，毛泽东担任组织部长。

会后，他以中央局秘书身分，起草并与陈独秀联合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如《中共中央通告》第十四号（五月十九日）、第十五号（七月二十一日）、第十七号（九月十七日）、第二十一号（十一月一日）等。这些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右倾。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孙科等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十八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又提出“弹劾共产党案”。针对这些情况，在第十五号《通告》里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这个概念，要求全党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另一方面，“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右派的言论、活动，“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毛泽东正是本着这种原则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坚持工作。执行部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党员重新登记。老党员也都要经过填表和审查后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作为组织部的秘书，毛泽东具体负责这件事。有些老党员摆资格，认为“毛头小伙子不配问我们的履历”。据罗章龙回忆，“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他们三人交谈，我和润之不认识此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一打听，才知是辛亥革命后当过四川省长的谢持，现在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实际上是个反对改组的右派。“他到我们这里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都要填”。因为未得允许，谢持便“一怒而去。润之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

以放宽点”。给了这个台阶，谢持还是填了表。那些以老党员自居的人也都按规矩办了。

右派分子自然仍不会罢休。成立上海第四区党部时，右派为争取领导权，先是请孙中山出面为他们说话，但遭到拒绝。然后孤注一掷，决定雇佣流氓打手，混入会场干扰。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同左派商量，动员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出席会议，由王荷波组织纠察队，控制会场，制止流氓混入，保证了成立会顺利进行。

叶楚傖是执行部三个常委之一，算是负责人。八月一日，他竟策划一些国民党人在上海南方大学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当即激起左派的反对。第二天，右派分子闯入上海执行部机关，殴打邵力子。事件发生后，由毛泽东领衔，同恽代英、施存统、沈泽民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傖“主持不力，迹近纵容”。

毛泽东事实上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同叶楚傖等右派的斗争也公开化了。这年十一月十七日，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向他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执行部十四人致孙中山的信，反映“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部内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于停顿”，希望派员解决。孙中山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无暇处理此事。叶楚傖等人“用尽办法、把毛赶走”。加上积劳成疾，毛泽东就在十二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叶楚傖很高兴，特地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祝贺”。

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久，中共四大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并确认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这是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重大进展。大会还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

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共两党组织各界群众，广泛传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精神，形成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接着，五卅运动席卷全国，把大革命推向高潮。同时，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也进一步分化。以一九二五年八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为标志，国民党内部逐步形成以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新右派。这就使国共合作的关系更加复杂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从湖南归来，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到达广州。这时，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因政府事繁，不能兼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事，于十月五日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

毛泽东到任后，为了纠正此前宣传工作无计划、不敏捷、不普遍的缺陷，首先着眼健全宣传工作体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原来管辖的范围实际上只及广东一省，同其他省市党部宣传部门没有联系。毛泽东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通过报刊和交通工具向各省市宣传部布置宣传要点，一是要求他们定期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到一九二六年五月毛泽东离开宣传部时，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的省市已达十二个。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快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作党务报告时，欣喜地说：有一件事可以乐观，就是本党在海内外的宣传工作很有进步，“本党在以前对于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不很统一，现在说可以比较的统一了”，在深入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

在国民革命错综复杂的风风雨雨中，宣传工作的成效不只表现在它的规模和数量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贴近时事的深刻内容和战斗风格。

毛泽东刚刚主持宣传部工作，国民党内部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林森、邹鲁、叶楚傖、张继、谢持等少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自称的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他们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职务，停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等，史称“西山会议派”。他们在一些地方设立“国民党分部”，操纵上海的《民国日报》，大造反苏、反共，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舆论。这以前，戴季陶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

一个新的尖锐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的面前：为了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对国民党内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分裂活动，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的调查表时，在说明他的政治主张后，已经指出中产阶级存在着左翼和右翼，对待两者的态度应当有根本的区别。他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毛泽东在理论宣传上做出了可贵的努力。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



第四期上，发表了国共合作以来他的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文章劈头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在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毛泽东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乃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文章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中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具有动摇不定的矛盾态度。例如，“有一个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乃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因此，这个阶级的“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时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个分析是深刻的，在当时是独具特色的。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农民》和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青年》，都先后转载这篇文章，随后又在广州汕头出单行本。几十年后，作者把它作为开卷篇收入《毛泽东选集》。

从主编《湘江评论》开始，毛泽东一向看重报刊舆论的社会作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在反击新老右派的斗争中，他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据沈雁冰（茅盾）回忆：该报当时“对外不公开，所以通信地址就设在毛泽东的寓所。毛泽东已编了四期，后因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会后忙于其他工作，有一个多月没有出版。我去接编的是第五期”。

为什么要办《政治周报》？毛泽东在《发刊理由》中说得很明白：“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对反革命的宣传，他说：“我们现在不能再放



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怎样进行反攻？在方法上“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在他自己主编的四期上，毛泽东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揭露一切反革命宣传的实质，是“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

“联合战线”就是后来说的统一战线的意思。那时，许多人担忧，分裂出一个国民党右派，对国民革命是一个很大的不幸。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的许多文章，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历史必然性。他的基本观点是：在革命和反革命两大阵营的决斗中，中间派不是倒向这边，就是倒向那边；划分左派和右派的标准，是看他对待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态度，对待国共合作的态度，对待工农的态度；西山会议派就是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事实上做了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工具。从国民党自身的历史和结构成分来看，国民党右派分裂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因为它“并不足以阻碍中国的国民革命”。

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的高潮，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分出席，席位是第十三号。会前，他被指定为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五位成员之一，并为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严厉批评西山会议派的言论和行为。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一大”以来的《宣传工作报告》。他还参与起草《宣传决议案》、《宣传报告决议案》和《党报决议案》。

大会二百七十八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大多数，使会议得以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分别给以党纪处分。

一月十八日在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节外生枝，说国民党内所以发生两派纠纷，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活动而不肯公开造成的。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以上三样办法，如果办到，其纠纷将不解自解。”毛泽东等相继作了反驳。毛泽东发言说：关于共产党人的身分，“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关于共产党的活动，“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至于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问题，“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这些发言得到很多代表的赞成。袁同畴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常委会批准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他又调进萧楚女、沈雁冰等一些共产党员。宣传部“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实际上宣传部的工作都是共产党做的”。

但是，这次大会在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对势力正在坐大的国民党新右派却没有触动。“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了解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危险。为了排除这种危险，他们准备向新右派（戴季陶）作出让步。”在选举问题上，他们甚至一开始就打算退让，决定“只应有两名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只是由于出席会议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们强烈反对，才使新选出的三十六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七名，二十四名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六名。蒋介石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国民革命军里，他原来只是一个军的军长，此时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的总监。这就为他篡夺领导权埋下了隐患。后来，毛泽东谈到国民党二大时说：“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中国共产党出于善意的退让并没有使联合战线内部的矛盾因此缓和下来，相反，倒是更壮了国民党新右派的胆。二大结束后才两个月，蒋介石就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三月二十日，他无中生有地说共产党人私调中山号军舰要劫持他离开广东，借此逮捕了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在广州实行戒严，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员，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

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住所，同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商量对策。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也在那里，他们俩都主张反击，毛泽东建议动员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密赴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但遭到拒绝。随后，他又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正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恩来回

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等对情况的分析是：黄埔军校有五百多共产党员，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五个军的军长和蒋介石有矛盾，而蒋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掌握了一个叶挺独立团，从力量上看是可以反击的。只要我们态度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支持我们。

这些建议都被拒绝。当时正率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广州访问的依文诺夫斯基也不同意，他是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中事实上处于决策地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主张妥协。三月二十九日还发出指令说，“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蒋介石确实很快从中山舰事件陷入的政治危机中“拔出来”了。不到两月，他就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借口避免“党内纠纷”，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来指导出席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讨论是否接受此案时，一连七天都没有结果。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陈独秀商定的意见，要求与会的共产党员签字接受。毛泽东没有签字，全会表决时也没有举手。具有讽刺味道的是，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都激烈地反对《整理党务案》，以至声泪俱下。但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此案。

根据《整理党务案》，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离开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位置。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另一件事情了。

那就是农民运动。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周刊，1923年7月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

《中共中央第十三号通告》，1923年12月25日。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4年1月。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4年1月。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2页。

大德：《上海执行部小史》，《现代史料》第1集，1933年。

大德：《上海执行部小史》，《现代史料》第1集，1933年。

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毛泽东：《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政治周报》第1期，1925年12月5日。

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6年1月。

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插话，1943 年 11 月 17 日。

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 3 期。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1943 年 11 月 27 日。

## 六、走向农民运动

对农民，毛泽东自然是熟悉的。他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然而，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他的认识仍然经历了一个过程。

建党初期，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恽代英一九二三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

陶行知当时所提倡的乡村教育，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在实践上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是彭湃。一九二二年他开始在广东海丰老家活动，一九二三年一月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使这里成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的地区。

中国早期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正全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毛泽东，没有完全忽视农民问题。一九二三年四月，湖南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胜利后，毛泽东派工会领导成员、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辟农运工作。白果乡的农民在水口山做工的很多，那里有较好的工作基础。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在九月中旬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农工会搞了一些平粜阻禁的斗争。白果乡正好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家乡，他自然不能容许，在十一月派兵镇压了那里的农民运动。

刘东轩、谢怀德回白果开辟农运时，毛泽东已到广东出席中共三大。

参加这次大会的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张说：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

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

不过，当时三大的主要议题，中共中央注意的焦点，是如何推进国共合作，认为农民运动还不是眼前最要紧的任务。三大虽然也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却没有花力气去具体组织实施。担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自己，一时也无暇去做。

但中国农民作为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毕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九二三年七月，陈独秀在《前锋》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的一篇文章。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介绍了广东海丰和湖南衡山白果两处农运的情况，说：“由上述的两桩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呵。”

时机似乎已逐渐走向成熟，关键是要有得力的人到实践中去艰苦地摸索。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正巧有了这样一次机会。

他先在长沙板仓岳母家过完春节，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韶山冲。

农村过年，拖的时间长，又是农闲时节，毛泽东一回来，看望他的乡亲不少。他和杨开慧也四处串门。他接触最多的，是早年由他带到长沙的学校里当校役、这时刚从



安源矿上回来的共产党员毛福轩，还有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毛新枚等。他通过各种渠道做了不少社会调查。

钟志申是毛泽东的小学同学。当听说他一九一八年曾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走了当地恶霸成胥生的团丁时，毛泽东很是兴奋。他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我“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这时，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常去夜校查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根据他的要求，夜校还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如讲“手”、“脚”两个字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们用这些事实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

从三月起，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夜校的学员大多成了农协骨干，夜校场所一般也是秘密农协的会址。不久，这种秘密农协发展到二十多个。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六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他在自家阁楼上主持了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等的入党仪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由毛福轩任支部书记。

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共韶山支部的这些最早成员后来都先后为革命献出了自

己的生命。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谈起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毛福轩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都那样努力，一直担任到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建立中共韶山支部后，毛泽东还注意发展一些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小学教师加入国民党，于七月初在韶山建立起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并指派共产党员李耿侯、钟志申等分别担任宣传、组织工作。这方面的活动，当时湘区青年团委派来韶山工作的贺尔康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如七月五日：“民校（国民党——引注）今日到韶山李氏祠开会。我到会时才八点钟，……到下午七点钟闭会，共开会四次，讨论有三项：一、党务问题；二、反帝国主义问题；三、乡村的教育问题。”八月一日：“晚饭后，邀请国校（国民党——引注）同志到吉新堂开第一次成立区分部大会。到会者同志十人，又区党委员三人，由润之主席。到十一点钟才散会。”

当时，湖南仍处于军阀赵恒惕统治下，国民党基层组织同共产党、农协一样，都是秘密的。这些组织的公开活动，大多利用“雪耻会”的名义进行。贺尔康七月五日日记说到的“反帝国主义问题”，就是指毛泽东召集国民党区党部会议，商量在各乡雪耻会的基础上组织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的问题，毛泽东还在七月十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雪耻会来源于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的事件。五月三十日，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又在南京路上向抗议的群众开枪，打死十三名工人、学生，伤者更多。全国迅速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抗议怒潮。湖南许多地方成立了“雪耻会”。毛泽东同毛福轩、钟志申等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

在韶山一带成立了二十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开展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检查洋货、禁止销售洋货等活动。这些正是国民革命的一项基本内容。

不过，农民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毛泽东深知这一点。

七月间，韶山大旱，田地龟裂，又正是青黄不接、粮食奇缺的时节。地主却乘机囤积居奇，高抬谷价。毛泽东便召集中共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粜。他派人同当地土豪、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成胥生不仅拒绝，还把谷子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要毛福轩等率领数百名农民带着锄头、箩筐等，连夜奔赴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成胥生见农民人多势众，被迫开仓平粜，其他地主也就不再敢闭粜。这是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

对这个时期毛泽东在韶山的活动，贺尔康在日记里还有许多记载：七月十二日，“下午润芝先生来舍邀我同去行人家（即串门——引注）。”“九点钟，国校（国民党——引注）开会，成立第四区分部。一点又十五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虽（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七月二十一日（阴历六月初一日），“到韶山南岸毛润之家，上午而他已他往，未在家。就翻阅最近的报纸，看了半天。下午三时润之才回来，此时C（共产党——引注）人也随时到了几个，等到六时C人还未到齐；世校（共产党、雪耻会、农协负责人合称——引注）开会后，天已暗了，我因不能走，就宿了。”八月四日（阴历六月十五日），“下午到南岸润之处，是C·Y·的常会期”。“晚同润

之到玉提凹小毛氏祠，民校（国民党——引注）开会，十二点钟时才返”。

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虽不长，却很有章法，在偏僻的山村搞起了各种组织。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当时颇具影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中介绍说：“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年二月间起而组织。到十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从此即开始作经济政治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这种种运动，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

毛泽东的活动，自然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成胥生密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八月二十八日，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逮捕毛泽东。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了这封密电，写了一封信交人赶快送到韶山。据毛泽民的夫人王淑兰回忆：“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谭家冲开会，……送来信后，家里就派人去谭家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的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

这时，毛泽东已到了长沙。就在赵恒惕的眼皮下举行秘密会议，向中共湘区委报告韶山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还到湘江边上，橘子洲头，回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师范生生活，写下有名的《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时的毛泽东，风华依然，但已非只是“书生意气”了。

九月到广州后，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对个人经历作了这样的概括：“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学业”一栏里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时间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时，他正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分析了“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所谓“半无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毛泽东那时把他们划分为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还有“小资产阶级”中的自耕农和“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他又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上写了一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无疑为他的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而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当时，中共中央虽然也成立了农民部，但工作主要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的。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

农民。”从此，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三月十九日，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创办于一九二四年七月，目的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此前已有五届毕业生，共四百五十四人。最初的主办人是彭湃。毛泽东接办第六届，地址在广州附近的番禺学宫。经过筹备，这届讲习所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正式开课，收有来自二十个省区的三百二十七名学生。同一天，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毛泽东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便全力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这届农讲所共开设二十五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八门，教员多是有实际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如彭湃、阮啸仙等。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多的，共二十三个课时。

毛泽东从六月初开始讲这门课。从保存下来的学员课堂笔记里反映出，毛泽东严肃地回顾并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拥护。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

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自觉地认清这个关键性问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这方面工作中，再也没有改变。这就为他以后能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当然，对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他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探索。

毛泽东历来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他在农讲所提倡学员研究各省的农民问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还主持拟定了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三十六个调查项目，要求学生根据家乡的实际情况一一填写。毛泽东很珍视这些调查材料，后来丢失了，到六十年代谈起时还说很可惜。

当时，彭湃领导的以广东海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最为成功。八月间，毛泽东又组织师生到那里实习两周，大大加深了对农民运动的了解。《中国农民》报道说：“赴海丰实行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

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这一天，北伐军先头部队叶挺独立团已攻占湖南醴陵。所到之处，都有当地工农群众直接给以各种援助。十一日占领长沙。七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国共合作策略和民众运动政策等问题。会议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但对农



民运动的限制很多，认为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等。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和中央的这个认识已有所不同。他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内容有三类：一是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一是农讲所教员的专题研究报告，如《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的调查材料。原来准备出版五十二种，后来受条件限制只出版了二十六种。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之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不知道轻重本末。由此，他进一步阐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



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农民运动蓬勃高涨的事实面前，认为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这种看法，逐渐为国民革命队伍中不少人所承认。这时，毛泽东最富特色的贡献是：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比较具体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同盟军这个问题，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毛泽东并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度已走在前列。《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发表后，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九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全文转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还要求中央宣传部的羊牧之根据毛泽东的见解充实宣传内容。

这时，毛泽东无疑已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

在毛泽东完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时，北伐军相继在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前锋直指武汉。农讲所的目的，本来是要把经过训练的干部派回农村，向农民宣传革命，发展农民运动。为了配合快速推进的北伐战争，第六届农讲所在九月间结束。学员们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

送走农讲所学员后，十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这时北伐军已攻占武昌，会议主要讨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国民党最近政策等大问题，历时半月。出席这次联席会议的人中，共产党员占四分之一，国民党左派还稍多一些，再加半左派，“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右派、中派（以丁惟汾为有力领袖，戴季陶亦出席数次，未发言）共约占四分之一，但不敢多说话”。“孙科说：‘即〔只〕要找于树德、

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 ” 会议发表宣言，重申继续执行国民党一大和二大的决议。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十一月上旬，他让杨开慧和母亲携岸英、岸青回到湖南，自己离开广州乘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中共中央农委原已决定设立，但组织一直没有健全。毛泽东到任后方才正式办公。

毛泽东主持中央农委工作后，立刻把自己的重点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到对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农民运动作出通盘的部署。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并于十一月十五日得到中央局批准。这个《计划》提出，农民运动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条件而又在国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大力开展起来。“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因为这四省是北伐战争准备首先推进的地区，发展这里的农民革命，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统治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历来的主张。“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这个以重点带动全局的设想，使全党的农运工作有了一条具体的行动路线。《计划》还要求“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不愿只是坐在大城市里去指导农民运动。为了实施《目前农运计划》，十一月下旬他赴长江沿线一带视察，联络江西、湖南、湖北诸省国民党省党部，商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

在南昌，毛泽东会晤了林伯渠。林此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委。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记载：“晚开会晤润之。归寓已十二

时矣”。第二天，他们又一同访问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和该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以争取支持。晚上，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宴请林伯渠、毛泽东等。这是郭沫若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后来他把此事写进回忆录《洪波曲》，感觉毛泽东“静如处子”，很有些像汉初的张良。由于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多方面地做工作，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二十九日作出决定：江西选送一百五十名学员到武昌农讲所，并负担经费一万三千元。林伯渠在这天的日记中说：“十一时开十一次政委会，议决农讲经费、农民协会补助费、合作社各案。”

这时候，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毕业于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的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朱友互、王首道等三十多名学员回湖南后，成为农运骨干。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派往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有二百零三人，农民协会会员从四十万人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凡有农协的地方，农民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的经济斗争，并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湖南有些县成立县务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有农协和工会的代表，群众团体实际上已参与政权的工作。

像急风暴雨般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在人们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成了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

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包括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坐不住了。“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是“扰乱了北伐后方”。一些中间派分子也开

始动摇起来，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防人利用。联合阵线内部潜伏的危机越来越表面化了。

关于农民运动的争论，也反映到党内。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武汉。在汉口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筹商农讲所事情。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八日，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分在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

这次会议错误地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案说：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向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个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事实上，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和他的日益向右并不是这种策略所能限制得了的。推行的实际结果，只是单方面地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在会上，陈独秀还说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

会上不少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广东区委的负责人重申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主张。中共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赞同湖南区委的主张，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毛泽东讲了他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但讨论没有展开下去。毛泽东还在会上提醒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这些

重要提示都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会议最终还是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

以十二月会议为标志，毛泽东对陈独秀右倾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了。陈独秀本来是他非常敬重的人物，如今，在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等重大问题上，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毛泽东已开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当然他这时的考虑并不成熟，对陈独秀的观点一时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对。几个月后他曾解释说：我后来的观点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

当面对着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出决断时，毛泽东历来主张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把事实先切实地弄清楚。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的问题，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恰好在这时，他收到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禱！”十二月十七日，他从汉口到了长沙。

正在举行的湖南农民、工人代表大会在二十日下午联合举行欢迎会，欢迎会的《通告》上这样介绍毛泽东：“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去岁回湘养病，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欢迎大会主席在致词时，称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

工农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提出许多问题，由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整理，请毛泽东一一作了解答。他还参加了大会的议案起草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四十个决议案，肯定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

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毛泽东认为，“此次决议各案大体还算切实”。这同“十二月会议”的方针明显地是两条路。

接着，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下乡考察农民运动。行前，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将巡视重要意义六项“通告各县党部，要求协助作好考察工作”。

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开始，毛泽东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农村革命的沸腾生活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在考察中，他亲眼看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事。

在韶山，他听说长期骑在农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可以踏上去打滚。闻讯赶来的宁乡县高露乡的农会干部告诉他，这个乡的国民党区分部实行的是“二民主义”，因为他们取消平粜米，还把领头争取平粜的鞋匠关进县监狱，取消了“民生主义”。在银田寺，人们告诉他原团防局长汤峻岩等自民国二年以来就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最先被杀的竟是两个无辜的乞丐。

在湘乡县，农会干部汇报，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留在乡下的小劣绅怕打入另册，却愿意出十块钱要求参加农会。

在衡山县白果乡，人们告诉他，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也只好听便。也有坏消息：当他到衡山县城时，得知县监狱里竟关着一些乡农协委员长和委员。

在醴陵县，农民告诉他，有个绰号叫“乡里王”的土豪易萃轩，最初极力反对农协，后来又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一面又把儿子送到何键的部队里去。毛泽东还在醴陵见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原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瓚，罗在这里担任中共的县委书记。

在许多地方，他还看到农会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给他们戴高帽子游乡，甚至枪毙罪大恶极之徒；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押，不准退佃；还推翻了过去维护封建统治的都团机构，人们谈论都总、团总，都说：“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农会组建起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民还禁烟禁赌，组织起来修道路、修塘坝等。

一切似乎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又似乎才刚刚开始。这些新鲜活泼的生动事情，使毛泽东大大打开了眼界，为之兴奋不已。社会上出现的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也使他忧虑不已。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更清楚了。

二月五日，他回到长沙后，立刻向中共湖南省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的错误。中共湖南省委一九二七年二月写给中央的《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说：“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紧接着，中共湖南省委和省农协，在实践中纠正了右倾偏向，从而为几个月后大规模的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住进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十六日，致信中共中央，在简要报告考察行



程后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报告了自己在考察过程中纠正了几个主要错误：“（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对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十点意见。他认为，在农村尚未建立联合战线之前的革命暴动时期，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的这种说法今天看来未必周全，但他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推翻在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难以办到的，这些也是当时湖南农村中的事实。毛泽东还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

这最后一句话，是针对陈独秀说的。陈在“十二月会议”上讲过，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目前还只能是宣传，不能实行。

一回到武汉就赶写出这封信，可见他心情之急迫。他是多么希望中共中央能接受这些来自革命实践的呼声啊！然而，这封信对中央并没有发生作用。在信的末尾，他说考察的“详细情况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指中共中央——引注）处察核，并登导报（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引注）”。



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快写成了，有两万多字。“报告”叙述了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认为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说农民革命“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报告还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三月五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战士》周刊首次刊登了该文的部分章节。十二日，《向导》周刊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四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

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诞生后不久，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也于四月四日在武昌呱呱坠地了。近在咫尺，可是父亲到第四天才见到自己的新生儿。这段时间，毛泽东太忙了。几天之内，毛泽东又新添了三个职务，都是关于农民运动的：三月三十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组成，毛泽东担任常务委负兼组织部长。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五人组成土地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间普遍的革命现象”。四月四日，先期已开课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补行正式的开学典礼。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

从湖南农村回武汉后，毛泽东深感正在筹备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必须尽快开学。同时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将原定只招收湘、鄂、赣三省学员的计划加以扩大，农讲所直接由中央办理，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个提议得到批准。于三月七日开课，学员有来自十七个省的七百三十九人。

设在武昌的中央农讲所明确地规定：它的使命，“是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为此，须“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

在主办广东第六届农讲所时，毛泽东就注意到学员的军事训练，在武昌中央农讲所的《规约》中，更赫然写明：“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每个学员还发了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规定每天训练两小时，每周野外军事演习一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发生后，军事训练每天增至四个小时。这期有许多学员在半年后成为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骨干。其中有一个陈慕平回乡后在井冈山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里做事，对毛泽东与袁文才的会面起了作用。

武汉国民政府是国共合作的政府。要解决农民问题，仍需要在国民党内尽可能地统一认识。三月十日至十七日，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他和邓演达、陈克文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为《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案》。十六日，全会正式通过《对农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宣言》明确表示：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致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为止”。这些提法，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

从四月八日到五月六日，土地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两次委员会，五次扩大会，四次专门审查会。这时正是四一二政变的前后，政治局势异常严峻，如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成为更加紧迫的问题。土地委员会每次会议都讨论得热烈而详细。毛泽东总是力陈己见，往往成为会议的中心发言人之一。

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要废除封建制，使农民得到解放。在当前来说，“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它的直接作用是：“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21）这确是解决当时武汉政府面对的困境的唯一出路。

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认为是没收土地。“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22)

怎样实施没收土地呢？毛泽东提出的步骤是：一般地说，先搞“政治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以乡、区土地委员会按人口重新分配，然后再搞“经济没收”，即“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但不同地区又要有不同要求。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如湖南，已经可以实行经济没收了，办法是不向地主缴租。(23)

会上的争议很大。最后议定：当前只能做政治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都应加以保护，地主及佃农制度尚不能完全消灭。会议相应地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等七项决议案。

五月九日，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五位土地委员会成员，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土地委员会报告》，并附上七项决议案，“敬候”“核夺”。

正是这一天，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结束了。

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革命面临重大转折的非常状态下召开的。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十八日，他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三月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议为非法。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百九十三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号通缉令

上。四月十九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第二期北伐，向河南的奉系军队进攻。四月二十二日，武汉方面中央委员联名发表讨蒋声明，号召人们“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

宁汉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中国一时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逆转。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既要对付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又要继续北上讨伐旧军阀张作霖，处境艰难，内部情况又很复杂。怎样在这种极端危急的状况下拯救革命，怎样对付武汉政权以外的敌人，怎样看待这个政权内很不可靠的同盟者，怎样把革命深入下去实行土地革命，……许多尖锐的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成为党的五大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五大在四月二十七日开幕。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项决议。这些决议强调要争取领导权，但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会议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中国革命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只是在突变的形势面前的脱离实际的空谈。一回到现实，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身上，认为这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等采取一味迁就的政策。会议期间，汪精卫还到会讲了话。大会选出三十一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十四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仍当选总书记。

毛泽东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上，他是个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一如既往，他当时最关注的是农民问题。会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泽东把这个方案提交大会，被大会拒绝

了，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大会虽在原则上肯定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仍没有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内容也限定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所议决的范围内，同时还强调必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实际上是要先取得汪精卫的同意。

汪精卫能同意吗？当然不能。于是，前面所说的肯定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等等都成了一些空话。

如何看待土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是对武汉政府前进还是倒退的试金石。连土地委员会花了那么大力气制订出来、上报“敬候”“核夺”的那一个并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在中共五大结束的第四天（五月十二日），就被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委员会否决了。谭延闿在讨论时说：“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

毛泽东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而党的五大却不能改弦易辙，自己的主张又不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理解。他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奔涌的长江水流，或许诗句更能表达出他内心的忧虑：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后来，毛泽东曾解释过他当时写这首《菩萨蛮·黄鹤楼》中说到的“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24）

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果然急转直下了。

五月十七日，驻宜昌的夏斗寅率所部独立十四师进攻武汉，发表反共通电。毛泽东组织中央农讲所的四百余人枪编入叶挺部队，配合讨伐叛乱。

五月二十一日，驻长沙的许克祥率所部第三十五军独立三十三团发动叛乱，湖南的工农运动顷刻间浸入血泊之中，史称“马日事变”。六月三日，毛泽东任常委的全国农协发出声讨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对许克祥“立予免职查办”。他还和蔡和森在武汉租界的一家旅社里接待逃亡出来的湖南工农干部，详细了解情况。并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25）。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时，又以大量事实说明马日事变的真相是许克祥部队向湖南省农协进攻。

六月六日，朱培德在江西以“礼送出境”的名义逐走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六月十日，汪精卫赴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会议。九天后，冯玉祥又赴徐州同蒋介石会谈。幕后的交易表明：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已是势所必然。

在这期间，毛泽东和谭平山、邓演达等，以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委的名义，连续发表四个《训令》，要求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严惩屠杀民众的反动派，揭露蒋冯的徐州会谈是“谋反前敌武装同志及国民政府”。要求国民政府保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号召各级农协严密组织，武装自卫。

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寻找出路。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根据湖南情况，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拒绝了，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气得和他大闹一场。



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担任书记。这个意见在会上没有讨论，还引来一些非议。因为马日事变后，毛泽东、蔡和森都先后要求回湖南工作，有人便说他们要在党内组织“左派”。三个月后，蔡和森解释说：“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26）

这时的湖南省委，由于遭受马日事变的严重打击，已接近瘫痪。从眼前的紧迫形势来看，湖南的位置十分重要，必须尽快恢复强有力的党的工作。这样，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

毛泽东立刻赶赴长沙开展工作，决定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联系。随后又到衡阳召开会议，再三强调：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这时，唐生智也回到长沙，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公开打出反对共产党的旗帜。

毛泽东针锋相对，主持制定《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明确提出“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推翻唐生智的统治”最终靠什么呢？这个计划把“武装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认为保存工农武装有三种办法：“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



毛泽东到湖南刚十天就被召回武汉。七月四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

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保存农民武装的两种策略：

“1. 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2. 此外尚有两条路线：a. 上山；b. 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上山”，作为一条出路，被毛泽东突出地提了出来。

193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三大队临别演讲中，谈到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过程时也说：“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我没有去。”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94页。

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1924年1月5日《中国青年》。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5页。

引自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394页。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页。

王淑兰60年代的回忆。

绮园：《第一届至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介绍》，《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

绮园：《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中国农民》第9期，1926年11月。

《国民党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6年11月。

《林伯渠日记》（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林伯渠日记》（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页。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04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4、338页。

毛泽东：《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2月16日。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1927年4月4日。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盛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5日。

(21)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9日。

(22)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2日。

(23)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22日。

(24)毛泽东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的批注。

(25)袁任远：《石门南乡的起义》，《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29页。

(26)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页。

## 七、霹雳一声暴动

在七月四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还说过一句话：“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句话是针对着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而说的。他们在这样紧急的局势面前，依然忽视掌握军队，没有研究如何应付武汉政府随时可能背叛的严重局面，一旦突然事变发生，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果然，只过了十一天，标志着大革命失败的全局性事变发生了——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中国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历史的进程，陡然发生逆转。

这种逆转的到来，而且来得那样快，许多共产党员根本没有精神准备。到处在搜捕，到处在屠杀。党内思想相当混乱，在大革命时期习惯于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各级党组织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剧变的局势，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刚刚经过改组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五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关头断然决定了三件事：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

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这个重大课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上来。在国民党已经实行极端残酷的屠杀政策时，不这样做，就等于坐以待毙。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李立三在两年多后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

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但这次起义也有深刻的教训：没有直接到当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夺取海口，准备在取得外援后攻打大城市，结果失败了。

毛泽东这时仍隐蔽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中共中央实行紧急疏散时曾准备派他到四川去，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并且武装起义条件正趋成熟的湖南。中央就把他暂时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筹划湖南的秋收起义。

毛泽东最初把准备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那时，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武装约有千人驻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县，正在南下的南昌起义军有可能调出一部分兵力开赴汝城支援，浏阳、平江一带的农民武装也可以向这一带集中。八月初，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要点是：“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连络。”他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的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为中坚，这样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这个计划，经中共中央常委通过后转发湖南省委。

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提出：“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即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注），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要求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团结在它的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由农会通告，对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一律不缴租，对五十亩以下的地主实行减租，自耕农土地不没收；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

地的分配。并要求全党“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中共中央这个大纲对湖南秋收暴动的部署,依照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的意见,规定:“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

八月七日,毛泽东出席在汉口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总方针的两个方面提出有独到见解的看法。

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指蒋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这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反对专做军事运动或专做民众运动这两种各走极端的做法。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提出批评,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认为：一、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建议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没收。二、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在于《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三、对自耕农中的富农、中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要确定方向。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不让大家再讨论土地问题，并且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

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经验中’学习。”毛泽东所以能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重要论断，正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他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在于：在事实的教育下，能够迅速看清问题的实质，作出合乎实际的新的理论概括，用来改正自己原有的思想，指导今后的行动。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在此之前，中共湖南省委也有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武装斗争。八月九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批评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提出的“由湘南组织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计划。指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他强调说，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将近四十年后，他先后同两批外国朋友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当然，从“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到学会打仗，这是需要经历一个不短的过程的。

他在八月十二日秘密回到长沙。投入实际工作前，他首先对正在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认真的调查。趁送家属回板仓村老家的机会，他在杨开慧家里，邀请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回长沙城里，他又征询由湘潭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的意见。经过同他们的会商，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包括“没收一切土地”等。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了解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这些新的认识，都是他在实地调查中获得的。

带着调查中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他从八月十八日起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对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他都发表了重要意见。

第一，举什么旗的问题。南昌起义时，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八七会议作出的是同样的规定。中共中央还认为，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更需要团结他们共同斗争。毛泽东坚决主张：湖南秋



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左派国民党旗帜”。

第二，暴动问题。当时，中共中央也好，党内普遍的看法也好，都认为暴动主要应该依靠农工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面对控制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如果单靠地方性的农民暴动，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命军队参加，作为骨干，那些分散的农民暴动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通常终归于失败。这已有不少惨痛的事实可以证明。但对这个问题抱反对或怀疑态度的人不少，因此，毛泽东便以强烈的语调说：“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第三，土地问题。八七会议决定的是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毛泽东提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并且提到：“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

第四，暴动的区域。当时，原定作为起义中心区域的湘南的局势已起变化。由于唐生智部队南下，湘南同长沙事实上已被隔绝。中共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湖南省委经过反复讨论，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

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据省委书记彭公达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八月十九日，中共湖南省委将湖南秋收暴动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报告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共中央，报告了他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

八七会议虽然正确地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实行这个总方针，还有许许多多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党对这些新问题又十分缺乏经验。能够在这样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如此旗帜鲜明地而又切合实际地提出和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代表不同的意见，确实充分显示出毛泽东的过人胆识和求实精神。难怪瞿秋白在一个多月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要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和毛泽东的信件后，在八月二十二日召开常委会研究。在讨论中，有的人指名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夺得政权”的论断和中央不同，说中央才是“纯粹信任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复信，虽然在原则上表示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是对的，但又批评说：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并且提出“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如果就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这是不对的”；还主张在土地问题上“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这些批评和指责，显然是脱离实际情况的，说明中央要改变已有的成见、倾听并接受毛泽东来自实践的呼声，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复信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中符合实际情况的部分贯彻执行，对不切实际的批评给予答复。

八月三十日，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中直截了当地写道：中央复信“指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如兄所说”。第一，“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实在是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第二，“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订了明确的暴动纲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对斯诺说：“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下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五）组织工农兵苏维埃。”

形势的发展使中共中央的认识也逐渐有了变化。时隔三周，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等两个文件，宣布“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然而，中央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仍和毛泽东并不一致。

秋收起义的行动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迫的局势，不容许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之间的争论充分发展下去。

当时，在湘赣边界存在着几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一支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在国民党当

局加紧镇压措施的情况下，必须迅速决定行止，不能再延搁了。

八月下旬，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在湘赣边界的江西修水山口镇举行会议，决定合编为一个师：警卫团为第一团，驻修水；浏阳工农义勇队为第三团，驻铜鼓；平江工农义勇队分别补入这两个团。因为卢德铭已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由余洒度任师长。此外，安源铁路煤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福、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可以合编为一个团。这几支部队就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的主要力量。

八月三十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湘赣边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确定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在第二天清晨乘火车从长沙前往安源。他走前先送杨开慧回板仓，要她照顾好自己的母亲，管好三个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这次分手竟成了他们的最后离别！

九月初，毛泽东穿着农民服装赶到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负责人宁迪卿、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会议讨论了军事和农民暴动的布置，确定分为三路，从赣西修水、铜鼓和安源三地起义，进击湘东，会攻长沙；同时布置了湘赣边界各县的农民暴动，以配合军事行动。在这三路中，以中路为主力军。那就是驻在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准备会合驻在修水的警卫团，一起向浏阳进攻，“因为这路军事势力较厚，地势较险，浏阳又逼近长沙，

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所以，会议决定毛泽东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在会后赶到铜鼓，直接指挥这一路的行动。对安源工作也作了布置：以安源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暴动后进攻萍乡和醴陵，对长沙取包围之势，但决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使敌人断绝我们的退路”。

九月六日，毛泽东在安源得知留在长沙的湖南省委常委决定的暴动日期：九日开始破坏铁路，十一日各县暴动，十五日长沙暴动。他立刻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向在铜鼓的第三团下达起义计划和部署，通知他们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名称统一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要他们立刻将这个决定和行动计划向在修水的师部和第一团转达。

这时，国民党内两派间的宁汉对立没有结束。唐生智的主力当时还在东征前线，湖南的兵力比较薄弱，但他们仍在加紧镇压活动。八月中旬，唐生智指令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致电驻防萍乡的师长胡文斗，注意防范，并调集其他军队准备呼应。九月六日，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长沙市共产党组织给各支部关于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随即宣布：从九月八日起，“特别戒严五日，每日晚十时，即断绝交通，并于中秋日加紧戒严，军警停止放假，日夜满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动。”

毛泽东在安源作好安排后，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长裤，装作安源煤矿的采购员，由潘心源陪同赶往铜鼓。不料，走到湖南浏阳张家坊村，被民团巡逻查房队抓住，在押送民团总部的途中，机智地脱险。这段经历，他在三十年代曾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过：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

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他于九月十日到达铜鼓的第三团(那就是原来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团部，宣布把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向浏阳进发。而在这前一天，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已按原定日期爆发；湖南省委组织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在修水率第一团宣布起义，但没有来到铜鼓同第三团会合，而是单独向平江方向推进。战斗打响前，去武汉报告工作的卢德铭赶回部队，就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总指挥。十日深夜，安源工农武装和矿警队起义，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向萍乡方向前进。这就形成三路分别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的态势。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 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21)

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地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从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并不统一，进攻目标却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这个计划本来是难以实现的。当起义军师部和第一团在十一日到达平江东郊金坪时，由于起义前夕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部队受到巨大损失。第三团也在十四日进攻浏阳东门市时因力弱而失利。第二团出师后最初发展顺利，在十二日和十六日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但因国民党正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几乎全部溃散。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湖南去调查时，夏明翰告诉他：“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22)毛泽东看到这种实际情况，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五千人锐减到一千五百余人，受到严重挫折。九月十五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来准备在第二天发动的长沙暴动。

在湘赣边界起义的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起义军立刻需要作出抉择：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如果退却的话，向哪里退却？继续进攻长沙，是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不这样做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斗争方面，以往也只有过向城市进攻的经验。但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这样做只会导致全军覆没。面对如此两难的抉择时，这个决心是很不好下的。

九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



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这是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张的，起义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抱有这种情绪。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提出这个主张，在当时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23）。

对初创时期的弱小的革命军队来说，为了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特别是转向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这个决定，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后退，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时说道：列宁曾经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俄国搞革命取得胜利，我们中国军阀分割，先到敌人控制薄弱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24），不过，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

就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作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城市的决议。决议指责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中



央这个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无法执行了。

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会议结束，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师指战员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满怀信心地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

当时，南下的路途上也充满险情。在这前后，湖南省国民党当局已调兵到浏阳一带“追剿”；江西当局也派兵到铜鼓、萍乡一带“堵击”。周斓获悉起义军“系全国著名共产党首领毛泽东在主持”后，“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车炳谦营长于二十四日全部赴浏阳协剿，一面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这给工农革命军的转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起义军在文家市住了两夜，便沿湘赣边界南下。因为湘军战斗力强，赣军战斗力较弱，工农革命军便沿江西一侧前进。这一带都是山区，道路难行，疾病蔓延，还有国民党军队不时围追堵击。毛泽东头戴竹笠，走在战士行列中，同战士交谈，鼓励战士们勇敢向前。行军途中，接到宋任穷从江西省委带回的信件，得知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有一支我党所领导的武装，有几十支枪。这以前，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曾听王兴亚谈到过这个情况，现在又得到了证实。但详细的情况还不清楚。

工农革命军的行军路线几乎是直线向南的，当进到江西省萍乡县上栗村时，得知萍乡县城驻有国民党的重兵，

不能通过，便改道在芦溪宿营。第二天清晨，向莲花方向前进，因为侦察不力，情况不明，后卫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仓促应战，造成人枪各损失三百。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后卫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只有二十三岁。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毛泽东十分痛惜这位年轻将才的牺牲，愤怒地斥责侦察不力、指挥错误的第三团团长沙先俊：“还我卢德铭！”这已是九月二十五日了。

当天，工农革命军到莲花县甘家村。由于一挫再挫，总指挥牺牲，部队情绪十分低落。这时，莲花县党组织派人前来联络。工农革命军得知莲花县农民自卫军前几天攻城失败，被关押的有九十多人，而国民党在莲花城的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队，战斗力不强。毛泽东召开前委会，一致决定攻打莲花县城。第二天清晨，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在当地工农群众配合下，一举攻克县城。砸开牢房，救出被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打开县政府粮仓，将粮食分发给贫苦群众。这是从文家市南下后攻下的第一个县城，使连连受挫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又兴奋起来。

这时，起义军领导层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原来并不归湖南省委领导，也没有把毛泽东任书记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真正放在眼里。前委从安源通知他率第一团到铜鼓和第三团会合进攻浏阳时，他没有理睬，却自行下令进攻平江，遭受严重损失。以后，只是“因情形不明，不得已，乃将部队回头，跟着三团退”（25）。到文家市后，他又主张经浏阳进攻长沙，同毛泽东发生严重争执，但原来是他上级而又坚决支持前委的总指挥卢德铭已回部队，对他还有约束作用。卢德铭牺牲后，他对前委领导不尊重的态度便越来越明显起来。进莲花县城后，毛泽东去参加他召集的军事会议，得知他警惕性不高，将抓获的县保安队长放走，严厉地批评他：县保安队离城里只有几公里，我们这些人的生

命都交在你手上了，你还开什么会？余洒度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轻蔑地说：“什么！你怕死吗？我可以担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工农革命军从莲花开拔，朝永新方向前进，因为天色尚早，毛泽东提议再往前走十里后宿营。余洒度私下又十分不满地说：“我当什么师长，连十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行军途中十分艰苦。毛泽东的脚被草鞋绳擦破，步履艰难。战士们临时捆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他坚决不肯。同他一起行军的谭希林回忆道：“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毛泽东同志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这使他同战士们的关系十分融洽。

当时的局势依然是严峻的。起义军转兵南下以来，一路艰苦战斗，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因为怕艰苦不辞而别；疟疾流行，病员增多，一些人掉了队，少数伤病员因缺医短药死在路旁。一些长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党组织也不健全。在这支队伍里行进的赖毅回忆说：“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26)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保持，很难继续前进。

起义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三湾的。九月二十九日，部队翻过山口，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宿营。这里群山环抱，追敌已被摆脱，又没有地方反动武装，比较安全。部队在村里住了五天。这是工农革命军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整的机会。进村的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由陈浩担任，实际上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而余洒度这时对起义已因悲观失望而灰心丧气了）；下辖一、三两个营，还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一个，共有七百多支枪；改编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是一个需要有极大魄力才能实行的了不起的改革。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有重大意义。

在三湾，毛泽东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27)这多少已提出了武装斗争要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的思想。他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介绍，派人同宁冈县党组织和驻在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的袁文才部取得了联系。

十月三日，毛泽东在部队离三湾出发前，对刚刚进行了改编的部队全体指战员作动员。他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

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28)这些话，在部队处境艰难、不少人情绪消沉的情况下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在继续行军途中人们纷纷议论：“毛委员不怕，我们还怕什么？”“贺龙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

起义军当天到达宁冈县古城。宁冈是一个深山中的偏僻小县，古城曾是县城所在，这时已很荒凉，人口稀少。在这里，召开了两天前委扩大会议，参加的还有前来联络的宁冈县委（当时称区委）书记龙超清和袁文才部文书陈慕平（他原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人少了，但是很精干，大有希望。会议着重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认为在井冈山落脚是理想的场所。对原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地方武装要从政治上军事上对他们进行团结和改造，并尽快先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拿起武器，展开武装斗争？这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愿所决定，而是近代中国具体国情的产物，是在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下不得不作出的反应。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主动地选择要走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只是在国民党对它使用武器后才不得不拿起武器的。毛泽东后来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过自己的亲身体会。他说：

“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校教员，也没学过

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29)他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30)这就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

这里所讲的“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对毛泽东自己来说，便是在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实行了“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的结合。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 4 月版，第 121 页。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 年 2 月 1 日），《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 9 月版，第 267 页。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 3 月版，第 27 页。

《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 3 月版，第 3 页。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 年 8 月 7 日。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 年 8 月 7 日。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 年 8 月 7 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5 月版，第 458 页。

谭震林：《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第 10 页。

毛泽东在中共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7年8月9日。

毛泽东同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谈话记录，1965年3月23日。

毛泽东会见参加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外宾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22日。

《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央通讯》第3期。

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96、97、100、101页。

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7年9月28日。

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27年8月22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70、372页。

潘心源：《秋收暴动之始末》，《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21页。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13日。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52、53页。

(21)这首词，作者后来作过修改，将其中的“修铜”、“便”、“平浏”、“沉”，分别改为“匡庐”、“要”、“潇湘”和“愁”。

(22)《任弼时报告》，1927年9月27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23)《苏先俊报告》，1927年9月17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26—127页。

(25)《余洒度报告》，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 3 月版，第 133 页。

(26)赖毅：《毛泽东同志在连队发展党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第 176 页。

(27)《熊寿祺关于秋收起义的几次回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第 153 页。

(28)谭政：《三湾改编前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第 141 页。

(29)毛泽东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4 年 6 月 23 日。

(30)毛泽东同出席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一些国家与地区代表的谈话记录，1964 年 7 月 9 日。



## 八、上井冈山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总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大革命时期，这几个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比较好；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庄，周围各县农业经济可供部队筹措给养；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进可攻，退可守。陈伯钧回忆说：“敌人在山的周围转一圈要一个星期，我们只要一天时间，就能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的打击敌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这里确实是一块理想的落脚点。

这里过去长期有“山大王”，现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王佐部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互相配合，互相呼应。

袁文才、王佐虽早年就参加绿林组织，但大革命时期都受过革命风暴的洗礼。一九二六年，袁文才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佐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也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一九二七年七月，他们曾会同永新、永福、莲花的暴动队伍一度攻克永新县城，组成赣西农民自卫军，由王兴亚任总指挥，贺敏学、王佐、袁文才任副总指挥。这是王兴亚不久后在安源会议上发言谈到这两支队伍的由来。自卫军占领了永新县城二十多天，因为国民党军队有五个团来攻，袁、王两部就退回宁冈、遂川境内的井冈山。刚担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的永新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是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学的同学。他和一批共产党员（其中有贺敏学

的妹妹贺子珍），率领一部分农民自卫军携枪随同退到井冈山麓的茅坪。永新县委也到了山上。这是袁、王能够欢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上山的思想基础。袁文才、王佐是当地人，他们的队伍在这一带有着不小的影响。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事情并不那样简单。他们两人虽然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前来的这支工农革命军毕竟没有多少了解，还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会不会“火并山寨”，夺取他们原有的地盘，心中难免存有疑虑。在古城会议期间，袁文才的代表曾表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请工农革命军“另找高山”。据何长工回忆，当时工农革命军中，“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这是关系到工农革命军能不能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跟的关键性决策。袁、王部队的人数虽不多，但在当地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许多群众拥护他们。尽管他们存在一些弱点，仍是能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如果当时采取了有些人所主张的那种狭隘和鲁莽的做法，而不取得他们的支持，就很难设想能在井冈山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来。

怎样说服和争取这两支农民武装？毛泽东选定先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文才入手，再通过他去做王佐的工作。

他从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的谈话中已经知道，他们最看重枪，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支。袁部有一百五六十人，只有六十支枪。于是，毛泽东向前委提议，准备一下子送他们一百支枪，将袁文才的全部人员都武装起来。前委成员听到这个大胆的设想，有的人表示怀疑，余洒度坚决反对。经过毛泽东反复说明，才以多数通过。（余洒度脱离工农革命军后，到湖南省委告了状，说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打长沙城市的指示，逃避斗争，到山区同绿林为伍，并送了大批枪支。所以，这年年底湖南省委代表何资深到中共中央汇报时说，“润之在赣时曾有一大错误”。）

古城会议后，毛泽东从绿林重义气、多猜疑的特点出发，只带几个随员到宁冈大仓村去会见袁文才。那是十月六日。袁文才原来还有些怕，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下二十多人，二十多条枪。见到毛泽东只来几个人，他就比较放心了，埋伏的人始终没有出来。见面后，毛泽东说明是由江西省委介绍来找他们的，充分肯定他们“劫富济贫”的革命性，同时说到工农革命军目前的困难。双方谈得很投机。毛泽东当场宣布送给他们一百支枪，这很出袁文才的意料，也使他很受感动。袁文才向毛泽东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回赠给工农革命军六百块银元，并同意革命军在茅坪（这是一个有六十多户人家的村子）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当然，问题并不是在一次见面中就能全部解决的。袁文才当时对毛泽东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话讲得很客气，但显然又包含着推托的意思。至于王佐的态度如何，那时还不知道。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时间而不能操之过急。

因此，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先向湘南的酃县方向挺进，筹些款子，熟悉周围环境，探听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后的情况，而把留守部门和伤病员安置在茅坪，请袁文才代管。不久，又应袁文才的要求，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党员军事干部到袁文才部队里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的关系一天天密切起来了。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抵达酃县水口村，在这里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展社会调查。他从得到的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失败的消息，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余洒度和苏先俊在这里脱离了工农革命军。不久，毛泽东得知湘军正从茶陵分两路前来进攻工农革命军，就派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第一营的两个连到茶陵游击扰乱湘军后方，打破它的进攻；毛泽东自己率团部、第三营和第一营的一个连在二十二日转入江西遂川县境。途中休息时，他同副连长张宗逊交谈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

在遂川的大汾镇，部队在清晨突然遭到遂川县地主武装靖卫团三四百人的袭击，因为人地生疏，仓促应战，前卫的第三营同团部失去联系而辗转南下，以后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毛泽东率领团部和特务连撤退，一直退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最初收集到的失散人员共四十多人，部队状况十分狼狈。当时担任连指导员的罗荣桓后来回忆说：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吃饭时，炊事担子也跑丢了，没有办法，几个战士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伸手从饭箩里抓着吃。饭后，毛泽东站起身来，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

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烈地感染了战士们，提着枪站起来，向排头看齐。

毛泽东率领这一部分队伍继续向井冈山转移。他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行动很困难，但仍坚决不坐担架，坚持拄着棍子步行。随后第一营第一连赶了上来。队伍行进到井冈山西南的荆竹山下，还有一百多人，在一个小村子里宿营。陈士渠回忆说：“我们知道今天要上山了，当时心里说不出有种什么味道，一方面感觉到我们原来人数就不多，加上三营被隔断，显得更少了；另一方面，看样子只有上井冈山，能得个地方休息休息，感到高兴。”这时王佐派人接应他们上山，部队在十月二十七日到了茨坪。接着，第一营的两个连也从茶陵赶到茨坪，部队的人多了。毛泽东等送了七十支枪给王佐部队。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元。他们在茨坪住了几天，又回到北麓的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上，袁文才、王佐是有很大功劳的。

工农革命军到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军队和地方建党工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形成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所以，毛泽东把这件事看作一切的根本。

在三湾改编时，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军队要在党的领导下，并且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那时时间匆促，许多措施还来不及落实。部队到酃县水口村后，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叶家祠主持了六名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都来参加。会场的墙上挂着一块写有“CCP”的红布。他详细地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意思，然后带着六名新党员举起右手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到遂川大汾镇，另一个连也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不久，

各连的党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支部布置党员要做好三件事：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帮助他们解除顾虑；培养和发展新党员。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各项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显得十分活跃。

在军队内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井冈山附近各县，在大革命时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很多是外地回来的学生，也有当地农会的骨干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多数党组织给打散了。但不少党员仍在坚持斗争。毛泽东采取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做法。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召集在井冈山“打埋伏”的永新、宁冈、莲花县部分党员开座谈会。十一月上旬，又在茅坪召开宁冈、永新、莲花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第二年一月攻克遂川后，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分析形势，要求大家在斗争中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他还从军队里抽调一批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基层去开展建党工作。

到一九二八年二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初步恢复发展起来，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委，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各县的区、乡两级大都建立起党的组织。前委还同万安县委建立了联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他多次同袁文才谈心，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线不清等问题，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袁文才十分佩服，对部下说：“跟毛委员一起干革命不会错。”毛泽东又几次上山同王佐交谈。王佐逢人就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应王佐的要求，毛泽东

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派曾经留学法国的何长工到王佐部当党代表，做团结、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何长工经过耐心的多方面的工作，逐步消除了王佐原有的戒心，特别是帮助王佐消灭了他多年的宿敌尹道一后，取得王佐的信任，使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经征得袁、王同意后，在他们部队里也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工农革命军又派了二十多名党员干部，分任袁、王部的连长、排长和党代表。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了提高。一九二八年初，王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二月中旬，袁、王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起，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重要变动，国民党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两集团之间的战争爆发。唐生智控制的两湖军队全部投入战争。江西的朱培德部也将主力调往赣北。井冈山周围各县，国民党兵力空虚，只留下一些地主武装靖卫团和挨户团。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向外发展的大好机会。

十一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前委讨论，认为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动攻势。攻击的方向是攻打茶陵县城，由团长陈浩和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第一营和特务连执行。毛泽东因为脚背被草鞋磨破而溃烂，无法随军前去。十八日拂晓，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但是，军队在茶陵一个多月并没有做群众工作，每天的活动还只是三操两讲和两点名。在茶陵，成立了人民委员会，县长谭梓生是部队派的，其他人员仍是旧的，依然坐堂审案，派款派捐靠商会，群众很不满。宛希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立刻回信，要他们改变做法，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工农



兵政府。工人谭震林被选为主席。这是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工农革命军还帮助茶陵组织了赤卫队。

十二月下旬，李唐战争告一段落。湘军第八军的独立团和当地地主武装向茶陵反扑。原来被打散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营，这时已在张子清率领下到茶陵和第一营会合。他们在经过激战后退出茶陵县城。团长陈浩因遭到挫败而严重动摇，公开声称工农革命军没有前途，把部队往南带，企图到湘南投靠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正好那时毛泽东的脚背溃烂稍有好转，得知湘军反扑的消息后赶来茶陵，在茶陵湖口赶上队伍。宛希先、张子清等向他报告了陈浩等的背叛活动。毛泽东当晚召集团营干部紧急会议，果断地扣押了陈浩一伙，将工农革命军全部带回宁冈砦市。

在砦市河滩上召开全团指战员会议，毛泽东宣布前委决定：处决陈浩等人，任命张子清为第一团团长的、何挺颖为党代表、朱云卿为参谋长。他还接受工农革命军在茶陵不做群众工作的教训，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使初创的人民军队一开始便有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毛泽东所以能不受历来旧观念的束缚，提出新的学说，不仅是因为他原来就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独立见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够密切注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大胆地作出新的概括。

当工农革命军从茶陵撤到宁冈前，同遂川相邻的赣西南万安县农民武装再次进攻县城。为了声援万安的起义，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掉头南下，在一九二八年一



月四日攻占遂川县城，并在这里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在遂川形成的。

工农革命军要执行三大任务，必须有严明的群众纪律来保证。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将要登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遂川荆竹山的村边，向在大汾遭敌军突然袭击而一度被打散的部队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他宣布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在城里过了旧历年。部队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就在城里把部队集合起来，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过去，老百姓对旧军队的欺压人民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骚扰，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他们在刚接触到工农革命军时，并不了解这支军队和旧军队是截然不同的，往往用同样的心情来对待。这个问题不解决，工农革命军便无法接近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自身也无法存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口头的宣传是没有用的，根本的是要靠工农革命军的行动表现。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老百姓根据实际观察，流传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从

此，改变了工农革命军同群众的关系。这是工农革命军能够从小到大发展起来并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所在。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受挫、失败后，国民党当局曾误以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经消灭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是几支无足轻重的小队伍。万安起义和工农革命军先后攻占茶陵和遂川县城，使国民党江西当局受到很大震惊，于是发动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

一九二八年初，赣军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以一个团和一个营进攻万安，又以一个营进占宁冈东部的新城，那是宁冈的县城，也是井冈山北出的大门，自然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构成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在遂川时，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总结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的经验，提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当得知赣军一个营进驻宁冈新城后，他在二月四日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从遂川赶回井冈山。前委经过讨论，乘赣军以为工农革命军主力仍在遂川而疏于戒备的机会，制定利用晨雾发动袭击、围三阙一、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二月十八日，经过数小时激战，攻占宁冈县城，全歼守军一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俘虏近三百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

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俘虏那么多国民党正规军，这对工农革命军是个过去没有经验的新问题。当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把俘虏押回宁冈碛市时，途中出现过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等行为。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立刻提出优待俘虏的政策。他向广大指战员说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士兵是被作为壮丁抓来的穷人，不应该打骂他们，而要进行说服，教育他们反戈一击。而且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

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以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优待俘虏的事实，戳穿了国民党散布的“共匪见人就杀”的宣传。赣军的《九师旬刊》上，对这种做法发出了“毒矣哉”的惊叹！

随着茶陵、遂川、宁冈等县先后建立起县工农兵政府，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问题也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没有健全的政权，便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得不到群众的全力支持和人力物力的援助，这样的军事行动便会成为流寇式的行动。毛泽东对建立和健全政权这个问题，是看得很重，抓得很坚决的。他的做法，还是先从一个点取得具体经验做起。攻克茶陵时，他因伤没有随军入城。一九二八年一月攻克遂川后，在他指导下，由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起草的《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三十条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通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政纲》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正式人民委员会，为全县执掌政权的机关”；“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工农平民从前的欠债、欠租、欠税、欠捐，一律停止偿还和缴纳”；等等。这个“临时政纲”集中反映了当地劳动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成为井冈山以至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蓝本。当然，这个最初的临时政纲也有它的缺点，如把资本家同地主、土豪劣绅、反动政府官吏等列在一起，“一概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还规定“凡土豪劣绅、奸商、反动派，准许工农平民就地自由捕捉，并烧毁他们的房屋”等。这些还需要在以后的实践中继续探索，才能一步步完善起来。

这样，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师两个团，并且同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旧政权，建立起新的工农政权以及赤卫队、游击队。土地改革开始了试点，取得初步经验，但尚未普遍展开。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矗立起来，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蓬勃发展的时候，三月初，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

为什么湘南特委的代表能够到主要位于江西境内的井冈山来发号施令呢？这同当时的特殊环境有关。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同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都有联系。但边界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组织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湖南省委任命的，这些历史原因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使毛泽东一直主要向湖南省委报告和请示工作。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春，湖南省委多次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对井冈山的指导责任就落到湘南特委身上。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决定湘东特委和赣西南特委“合并归湘南指挥”。

周鲁是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他到井冈山后，根据中共中央上年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十二月三十一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这样，使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对毛泽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但他的革命意志

没有一点动摇，积极地担当起师长的职务。他在队前向指战员讲话：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是中国有句俗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湘南特委代表命令他将部队开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动。毛泽东把队伍带到湖南酃县中村（在井冈山边沿地区），停下来整训，搞土改试点。尽管如此，井冈山中心区域宁冈仍因主力外出而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一个多月，遭受很大损失。

这种挫折只是暂时的。当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驻军酃县中村时，两件使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了：一件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扫除原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一片阴影，毛泽东又可以在部队中发挥领导作用了；另一件是得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取得巨大成功后遭到强大敌军追击，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毛泽东立刻派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西进资兴，接应从郴县撤出的湘南农军；自己率第一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国民党追击部队。四月二十日，他同团长张子清又指挥第一团占领酃县县城并在城西阻击追敌，掩护朱德部撤退。

四月二十四日前后，毛泽东率第一团返回宁冈砦市，同先两天到达砦市的朱德、陈毅的部队会合。这时，朱德四十二岁，毛泽东三十四岁，从此开始了他们长时期密切合作的战斗生涯。毛泽东见到朱德时说：“这次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竟没有整倒你们！”朱德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接着，他们在龙江书院举行两部营以上干部会，确定将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各项决定，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共辖六个团。在中共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第四军军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在由湘南郴州、

耒阳等县农民编成的第三十、三十三两个团开回湘南后把军以下的师的番号撤销，由军部直辖四个团，那就是：由南昌起义军全部组成的第二十八团，由湘南宜章农民军组成的第二十九团，由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组成的第三十一团，由袁、王部队组成的第三十二团，兵力从原来的一千多人增加到六千多人，其中的主力是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六月，按中共中央规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朱毛红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以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的，有两千多人、近千支枪，训练严格，装备齐整，作战有经验。他们的到来，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力。

在朱毛会师时，湘军第八军第一师占领了茶陵、酃县，赣军第二十七师占领了永新、吉安、遂川等地。四月下旬，赣军第二十七师的两个团从永新、遂川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四军军委会议，决定采取“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集中力量击破战斗力较弱的赣军。月底，朱德和王尔琢按计划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先在遂川五斗江击溃赣军一个团，乘胜追击，在永新城附近又击溃赣军另一个团的一个营，一举攻占永新县城，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进剿”。

毛泽东进驻永新城后，在五月二日以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向江西省委和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朱毛两部会师后的组织状况和打退赣军第二次“进剿”、缴获三百支枪的胜利。报告说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采取对内对外都使深入的策略”：对内加强军队和党的建设，对外帮助地方发动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并建议成立湘赣边界特委。中共

中央六月四日写了回信，赞同这个方针，并确定成立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同时和湖南、江西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由于交通不便，这封信直至十一月才送到。

在从永新撤回井冈山的路上，毛泽东和陈毅边走边谈地交谈了一天。毛泽东讲了他这个时期一直在思考的一些大问题，他讲到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谈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历史作用和陈独秀的错误；详细说明了对当前党内思想尚不统一的诸多问题的看法；描述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工农政权的构想；并指出陈毅他们在湘南站不住脚的原因是地处交通要道，敌人过于强大；还指出现在从上到下都很“左”、很危险。这些论述深深打动了陈毅的心，使他对毛泽东十分钦佩。

五月四日，在宁冈砦市举行朱毛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毛泽东讲话祝贺两军会师胜利，并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全军每个指战员认真执行。

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要求重在斗智，而不能单靠斗力。毛泽东把这十六字诀称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它正是从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出发，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从而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就是由它发展起来的。

在这一军事原则的指导下，他们又接连打退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两次“进剿”。一次是五月中旬。赣军五个团在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率领下再占永新，向宁冈进攻。朱德、王尔琢率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在草市坳全歼赣军第七十九团，乘胜



奔袭，在当天正午第二次收复永新城，杨如轩带伤逃回吉安。工农革命军缴获迫击炮七门、山炮二门、光洋二十余担，粉碎了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另一次是六月下旬。这次国民党军队“进剿”的规模更大。赣军改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部为主力，杨如轩为前线总指挥，以五个团占领永新。湘军吴尚部也出动三个团向酃县、茶陵逼近，配合赣军的进攻。红四军以小部钳制湘军，集中主力打击赣军。在朱德和陈毅、王尔琢分别率领下，六月二十三日红四军在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歼灭赣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第三次占领永新城，击破了赣军的第四次“进剿”。根据地军民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

三下永新城，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是朱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巨大胜利。谭震林回忆道：“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朱德也说过：“三打永新消灭了朱培德的主力。朱培德的主力被打垮了，国民党其他军队就不敢配合了。三打永新是一个关键，是根据地发展和红军发展的关键，与后来红军取得胜利有关。”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县各一小部分，遂川县北部，酃县东南部，割据区域的面积达七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共有五十多万人。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里的话来说：“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边界全盛时期内，在毛泽东领导下，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以分田为中心内容的土地改革在边



界范围内全面展开。没有这些，便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可言。

自从三月间湘南特委代表强行取消前委以后，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顿时失去中心，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这种状况，给边界工作带来极大损害。为此，毛泽东多次提出组织边界特委的要求。当工农革命军粉碎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时，经中共江西省委同意，五月二十日在宁冈茅坪由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总结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批评右倾悲观思想，反对逃跑主义，重申建设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强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不能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大会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坚定了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由陈毅接任。为了统一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在宁冈茅坪建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四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三个委员会，使工作全面展开。边界各县、区、乡工农兵政府都成立土地委员会小组，领导土地革命。

领导土地革命，在边界特委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湘赣边界更是交通阻塞的农业区域，居民几乎都是农民。这里的土地，大半在地主手里。向地主租种土地的农民，每年要把收获量的一半以上缴给地主，还要受其他种种压迫和剥削。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最强烈的渴望。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军事斗争和土地革命是分不开的。没有

胜利发展的军事斗争，不能保障农民获得和占有土地，而没有土地革命，不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军事斗争也不可能得到广大农民的真心实意的支持，难以坚持下去，只会归于失败。红军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扩大，它们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取得人数众多的农民的这种由衷支持。

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地区的最初阶段，发动群众的主要内容，是在进行革命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但单单这样做，显然是不够的。

毛泽东对土地改革的工作早已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他通过在宁冈、永新等地的社会调查，得知湘赣边界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合理。三月中旬至四月上旬，他以湖南省委讨论过的《土地纲领》草案为依据，在湖南酃县中村和桂东沙田进行过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通过访贫问苦和诉苦会、斗争会发动群众，然后插牌分田。这是边界最早分田的地方。经过实践中的摸索，毛泽东把《土地纲领》草案中“分配土地以区为单位”改为基本以乡为单位；把按照“工作能力”和“消费量”分配土地改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被分配掉的地主也给以生活出路。虽然工农革命军在中村和沙田停留的时间不长，同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合后又向宁冈转移，这里的分田成果没有能巩固下来，但这些试点经验，为以后边界土改的全面铺开创造了条件。

五月至七月，当湘赣边界割据进入全盛时期时，在边界各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五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政策，把它看作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之一。毛泽东从红四军中抽调大批干部到各县、区、乡，发动群众，指导分田。六月十五日，湖南省委代表给省委的报告中描述边界土地革命开展的实际状况说：“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

永新的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权利），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照他们这种方法，每人可分谷八担，大小人口一样的多。”

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地区的土地革命，带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大变动。它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连永新县有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山嫁人分了地。广大贫苦农民从分得土地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中，看清了红军确实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就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永新在井冈山地区各县中，人口多，经济发达，有兵源，有粮食，有给养，又有宁冈作为后方。毛泽东决心抢在国民党军队反攻前，争取以一个月时间把永新根据地建设起来。他在军中抽调出大批干部和遂川、茶陵、酃县的负责人集中在永新一县加紧工作。他对湖南省委刚派去工作的杨克敏说：“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的‘会剿’。”

毛泽东自己也三次到永新县西乡的塘边村，先后住了四十多天，调查研究，领导分田，并总结了塘边的分田经验，制订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那时，贺子珍正在塘边工作，对毛泽东由敬佩而逐渐产生爱慕。毛泽东告诉她，自己结过婚，有三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现在杳无音讯。两人在塘边村结为伴侣。

对建设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一直把它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粟裕回忆道：“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民的屁股。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

在边界的全盛时期，党、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毛泽东总结道：当时边界党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由于政策得当，加上地形有利，湘赣两省“进剿”军又不尽一致，才有了四月至七月的各次胜利。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生气勃勃地进入全盛时期时，一个沉重的打击突然到来，那就是在中共湖南省委错误指导下导致的“八月失败”。

湖南省委经多次破坏后，到一九二八年四月间工作渐趋正常。五月，省委机关由湘潭迁到安源，安源到宁冈只有四五天路程，同井冈山的联系便更加密切起来。省委曾先后派湘东特委委员袁德生、醴陵县委书记杜修经等为巡视员，多次来到井冈山。

湖南省委对井冈山发出的指示，最初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他们在五月间给毛泽东、朱德等的信中，强调目前应该积极的，是更加深入湘赣边界的斗争，造成群众割据，“应以宁冈做军事大本营”。这些主张，毛泽东表示同意。他在六月十六日以边界特委名义给湘、赣两省委转中共中央的信中，再次申述坚持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湘赣边界武装

割据的三条理由：“A、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但湖南省委到六月十九日的信中却提出：“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同月二十六日，又致信边界特委：“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并致信四军军委：“希望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规定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和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以毛泽东为书记；派杜修经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

湖南省委这个指示，使毛泽东十分为难。三月间，他已有过奉湘南特委之命进军湘南而使井冈山根据地遭受损失的惨痛教训。现在，统治阶级正处在暂时稳定时期，湖南的国民党兵力又比江西强得多，向湘南进军显然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对上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但他这时已对事情看得很清楚了，决心力持异议。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进行讨论，杜修经、袁德胜也参加了。会议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

会后，毛泽东在七月四日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写了报告，陈述作出这个决定的六条理由：一、红四军正根据中央和湖南省委批准的计划，建

设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根据地，洗刷“近于流寇”的“遗毒”，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起来，不宜轻率变动。二、“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三、“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四、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这都是因为“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的缘故。因此，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建设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求得巩固的基础，这“绝非保守观念”。五、湘南各县经济破产，土豪打尽。四军此刻到湘南去，经济困难绝不可能解决。六、“伤兵增到五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这六条不能冒进湘南的理由，总结了以往全国暴动的经验教训，对情况分析得实实在在，把道理讲得十分透彻。他最后写道：“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禱！”

七月中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分两路反击。湖南省委巡视员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一味坚持要执行省委的命令，乘红二十八、二十九团占领湖南酃县、毛泽东等远在江西永新的机会，附和红二十九团（成分主要是湘南宜章县的农民）不习惯过山上的艰苦生活、想回家乡的情绪，把大队拉向湘南，军委做工作也阻止不住。毛泽东在永新从陈毅信中得到这个消息，非常着急，立刻给陈毅等回信，派茶陵县委书记江华带队火速送去。这封信要求红军大部队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事，断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动，因为“敌人太强大，去了必然失败”。干部会讨论了毛泽东的信，第

二天往回走。但到了湘赣交界的沔渡时，第二十九团官兵硬是不过河，有的撂下枪，声言不回湘南就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十八团也被迫跟着南下。

红四军这两个团到湘南后，攻打郴州先胜后败，第二十九团士兵便不听指挥，自行散回家乡。一个原来有相当战斗力的团只余下约二百人，编入第二十八团。这件事说明，要把农民武装改造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这个团溃散后，第二十八团撤到桂东。

毛泽东正在永新领导军民以游击战术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十一个团近一个月。八月中旬，他又抵制了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送来的要求红四军向湘东发展的《补充指示》。接着，得知红四军大队在湘南失败，他立刻决定以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和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自己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湘南迎回第二十八团。

国民党军队乘红四军主力远离的机会发动猛攻，侵占边界各县城和平原地区，焚烧房屋，屠杀人民，湘赣边界遭受严重摧残。杨克敏在不久后写的一个综合报告中说：“这个时期要算是边界极倒霉的时期，割据的区域，只有井冈一块地方，宁冈也丧失了，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一时闹得乌烟瘴气。恰恰那时割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忽然失败了，分了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当时有一句口号：‘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真是太不值得。我们别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农民收不到谷，才是真真的大失败呢！”这次惨痛的教训，史称“八月失败”。

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日夜兼程南下，于八月二十三日在湘南桂东同大队会合。毛泽东见到军委书记陈毅时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马上就得输，取得教训



就行了。”第二十八团在受到挫折后，情绪低落，见到毛泽东率队来接十分高兴，有的人说这是“第二次会师”。在桂东县城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

返回井冈山途中，毛泽东得知有的红军战士因为饥饿，吃了农民地里的苞米，就通知部队集合，就地进行群众纪律教育。他亲自在一块竹牌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光了，违犯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土里，请收下。

留守井冈山的何挺颖、朱云卿等，指挥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凭黄洋界天险抵抗国民党军队四个团的猛烈进攻，后来用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打中敌军冲锋密集区。敌军指挥官以为红四军主力已回井冈山，立刻命令部队撤退。毛泽东听到这个喜讯，挥毫写下《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井冈山根据地虽然在八月间遭受严重摧残，但朱毛红军返回后，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损失不大，“在一个失败之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回师后，部队稍有休息，各种组织有切实的整顿，军队训练也有进步。毛泽东、朱德随即率领红军大队开展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取得三战皆捷的胜利：九月十三日，红四军主力攻克遂川县城；十月一日，在茅坪附近的坳头垅伏击成功，歼敌一个营，并乘胜收复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县城；接着，红四军主力又在龙源口歼敌一个营，第四次占领永新县城。这样，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会剿”被打破了。



在这段时间内 ,原国民党第八军吴尚部毕占云营长率一百二十多人起义 ;原国民党军向成杰部营长张威也率一连多人投入红军。他们分别改编为红四军特务营和独立营。

针对湘赣边界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 ,毛泽东指导边界各县党组织进行整顿。经过整顿 ,党员数量虽减少 ,战斗力仍得到了增强。

十一月初 ,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的六月四日的指示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终于同中央联系上了。六日 ,在茨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会上 ,根据中央来信指示 ,成立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 ,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五人组成 ,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

一年多来的井冈山斗争 ,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 ,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 ,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结果。其中 ,有成功的经验 ,也有失败的教训 ,它们都是宝贵的财富 ,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前进的新起点。随着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逐步恢复 ,毛泽东对一年多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 ,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他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一月先后写成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 》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 ,便是这种总结和概括的集中表现。

为什么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 ? 这既是个重大理论问题 ,也是个现实问题。当时 ,党内还有人对上井冈山这件事有非议 ,跟随上山的也有人对红军能不能站住脚有怀疑。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人们便不能在斗争中看清发展的前途 ,就不能懂得怎样恰当地对待周围的环境 ,也不能

从根本上回答红军中一部分人存在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这种奇事的出现有它独特的原因和相当的条件: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白色政权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造成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第二,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长期存在的地方,是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深刻影响、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大大起来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决定着小块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是没有疑义的。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一个要紧的条件。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他进一步阐明: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而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

毛泽东阐述“工农武装割据”是党领导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密切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这是湘赣边界斗争的主要经验。

毛泽东相当突出地提出了“中间阶级”的问题。他写道:“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过重的打击是主因。”过重打击中间阶级的结果,使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他具体地分析对待小资

产阶级的态度，指出：“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怎样对待中间阶级，是一个关系到能不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队伍、夺取革命胜利的根本问题。而要团结中间势力，就必须坚决纠正那种打击中间势力的“过左的政策”。这个问题，此时还只是刚刚提出，以后在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他所以能认识这个问题，正是从实际斗争生活中经过冷静观察和深入思考得来的。

对政权问题，毛泽东也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见解。他看到边界各地存在一种现象：“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做法，是违背民主制度、违背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的。因此，毛泽东得出结论：“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

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区域各项政策中最基本的内容。在十月上旬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和修改，在十二月间正式加以颁布。这个《土地法》规定：分配土地，主要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遇特殊情况时得以几个乡或区为单位；分配后，主要归农民个别耕种。它是一九二七年冬天到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井冈山地区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这场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几个县的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在此以前是没有这种经验的。这个初次制定的土地法还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

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这些，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改正了。尽管如此，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革命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提高，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在实践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毛泽东多次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央通过多种方式，向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介绍井冈山斗争这个在当时最完整、最成熟的经验。从一九二八年夏季起，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政治通讯》等刊物上经常登载有井冈山斗争内容的文章。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讲道：“惟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这样做，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影响，帮助许多红军和根据地领导人开阔了眼界，加快了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进程，推动了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

这时，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五军主力第一、三纵队七百多人向井冈山进发。毛泽东、朱德派何长工率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前往莲花县迎接。十二月十一日，在宁冈新城举行庆祝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两军的会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成为全国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军。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取得了显著成绩，创造了比较完整的经验，从而在处境艰难的广大革命者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正如毛泽东所说：“边界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可是，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来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有它的弱点。第一，井冈山虽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

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反复“进剿”和经济封锁，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这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南北又难以发展，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两个弱点，在初期并不明显，随着红军力量的不断扩大便逐渐暴露出来。当时在第二十八团当连长的粟裕评论道：“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21）

井冈山斗争的恢复和发展，不仅震惊了江西、湖南两省国民党当局，也使国民党中央政府逐渐感到它已成为心腹之患。陈毅在第二年九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反动政府方面，以为八月失败朱毛部队业已消灭，至少是不能为大患，不期卷土重来又复如前，使他们大吃一惊，又因蒋桂战争在未发动前肃清朱毛、打破井冈成为湘赣两方共同需要，乃有本年一月之三省会剿的进攻。”（22）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七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两省“会剿”代理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由湘赣两省集中了六个旅约三万兵力，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分五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国民党方面集中这样巨大的兵力向井冈山进攻，在以前还从来不曾有过。

面对着如此严峻的局势，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至七日，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共六大决议，并着重研究如何粉碎国民党军队这次“会剿”的部署。当时井冈山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陈毅第二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隆冬之际，边界崇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履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柏路会议经过讨论，决定采取“攻势的防

御”方针：由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三十团和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由于井冈山地势险要，工事坚固，“八月失败”时只留少数兵力仍能守住，又估计红四军主力下山后，将会吸引开相当数量的进攻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所以，会上把这种做法称作“围魏救赵”。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人从井冈山茨坪等处出发，经遂川，向赣南进军。沿途张贴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宣布红军的宗旨是：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中华。宣传党的各项基本政策：“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布告以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共同署名，“朱毛红军”的名声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开。

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就这样踏上新的征途，向着广阔的赣南地区进军了。

陈伯钧：《井冈烽火岁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52页。

何长工：《改造袁、王与“双枪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47页。

何资深在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报告记录，1927年12月28日。

苏兰春：《回顾宁冈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第 91 页。

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6 月版，第 5 页。

陈士渠：《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第 198 页。

赖毅：《给茶陵县纪建委员会的信》，《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6 月版，第 331 页。

中共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1928 年 3 月 10 日。

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的报告，1928 年 5 月 2 日。

《谭震林同志的谈话》，《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 3 月版，第 24 页。

朱德：《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谈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第 8 页。

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 年 6 月 15 日。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 年 2 月 25 日。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版，第 7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59 页。

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信，1928 年 6 月 19 日。

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指示信 ,1928 年 6 月 26 日。

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 1928 年 7 月 4 日。

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7 月版，第 51 页。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 ,1929 年 2 月 25 日。

(21)《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版，第 79 页。

(22)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 年 9 月 1 日。



## 九、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

寒冬腊月，一场大雪过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多人，乘国民党“会剿”部队还没有合围，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当晚，歼灭遂川大汾的国民党守军一个营，突破了封锁线。接着，经上犹、崇义县境继续南行，击溃沿途的地主武装，不战而占领没有国民党正规军设防的大余县城。

这时，红四军主力已脱离原有的根据地，周围环境和井冈山斗争时期完全不同：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连报信的群众也没有。红军一时很难适应这种状况。

国民党的追兵却来得很快。战斗力比较强的李文彬第二十一旅三个团，悄悄地逼近大余城，突然发起猛攻。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一部在县城东北高地进行阻击。但因事先没有得到报信，仓促应战，兵力未能集中，战斗失利，受到不小损失。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受重伤，不久牺牲。

在强敌紧追下，为了避免硬拼和争取主动，红四军主力采取盘旋式打圈子的做法，在撤出大余后，经过粤北的南雄，再转入赣南的信丰、安远、寻乌。

但是，脱离根据地后的流动作战毕竟是艰难的。正如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蹙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国民党军队轮番穷追，红军耳目闭塞，连战不利。一月底，红四军主力在寻乌的圳下村宿营，拂晓时又遭到国民党军刘士毅旅一部的偷袭。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和朱德等还没有起床，就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突围时，毛泽东曾同朱德等短时间失散。跑出了危险

区，他同军部的一些人员会合，坐在路旁休息。见到别人吃饭，他才感到饿了，但带着饭的警卫员也跑散了，只得向曾志“讨饭吃”。

这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沿途人烟稀少，红军衣单粮缺。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下，“红四军前委曾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是分散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放弃了这个计议”。毛泽东、朱德会合后，率领部队以每日四十五公里的速度强行军，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在这里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为了应付紧急军事行动时指挥能够敏捷，会议决定“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一天的会议刚刚开完，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前来通知，“追剿”军正在前来包围罗福嶂。红四军主力立刻向明朝瑞金转移。

这时，国民党方面误以为红军已难坚持。“追剿”军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得意地向“会剿”军总司令致电报捷：朱毛部“自寻乌属之吉潭圩附近被职旅给与重创后，即狼狈向项山罗福嶂逃窜”，仍未能立足。他宣称：该旅现正分路堵截追剿，“以绝根株”。不料，厄运已将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

红军采取盘旋式或打圈子的做法，并不只是为了摆脱强敌跟追，更重要的是要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使它兵力分散，暴露出弱点来，以利于红军在有利时机能集中兵力歼其一部，恢复主动地位。这种机会果然来了，那就是二月十日的大柏地战斗。

大柏地在瑞金以北，有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山高林密，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红四军主力在二月九日抵达大柏地。这天，正是旧历除夕，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都跑到山上去了。紧紧尾追红军的刘士毅旅两个团，态度骄横，孤军冒进，穷追不舍，想抢头功。红军指挥员纷纷向军部请战。毛泽东主持前委扩大会议，认为可以在大柏地打伏

击战；决定布置成长形“口袋阵”，以主要兵力埋伏在瑞金通往宁都的道路两侧的高山茂林中，以一部分兵力引诱刘士毅进入伏击圈。当晚，红军各部分别进入预定阵地。

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红军一部把刘士毅部两个团诱进“口袋阵”底部，东、西侧伏兵向后迂回出击，扎住“袋口”。红军各部向敌军一齐发起猛攻。这是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的关键一仗。尽管红军弹药缺乏，体力疲惫，指战员还是拿起刺刀、石头、枪托同敌军拼搏。朱德军长带队冲在前头。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这时也提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鏖战至第二天下午，才全歼被围敌军，俘虏正副团长以下八百余人，缴枪八百余支，水旱机关枪六挺，刘士毅旅残部溃退赣州。这是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打了这个胜仗，整个局面顿时改观。红四军摆脱了被动局面，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大柏地不是红军的根据地。由于当地群众几乎都跑到山上去了，红军虽然打了大胜仗，指战员吃饭却成了问题。毛泽东、朱德鉴于这种特殊情况，采取灵活办法，批准各部可以动用群众家里的粮、油、菜，同时，留下借条，出布告，说明日后偿还。毛泽东十分重视要取信于民。事隔五十多天，当红四军第二次路过大柏地时，他命令军需处按借条向老百姓赔还现洋，只能多给，不许少付。军需处干部挑着现大洋，办完了这件事，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当地老百姓说：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

近一个月的流动作战，使红四军尝够了脱离根据地的苦头：得不到休养生息的环境，不能取得粮食、被服和人

力的补充,伤病员难以安置,更缺乏当地群众的密切支援。事情很明显,红军要积蓄和发展力量,不断战胜敌人,就必须建立根据地,依托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

东固在江西省吉安县境内,地处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接壤处,离上述县城都有一百多华里,群山重叠,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地势险要,只有五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早在一九二七年二月,这里已有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在吉安求学的共产党员回到东固,恢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暴动,建立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发展成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共有枪七百支,在东固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战争,主要领导人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原赣西特委书记李文林。他们从一九二八年四月起,曾多次派人送信到井冈山去,介绍东固的情况,沟通了这两块根据地的联系。

东固革命根据地有着自己的特色: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割据结合起来。红军是公开的,武装斗争是公开的,他们是游击队而不是守土的赤卫队。农民协会在实际上管理着农村的一切行政事务。“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完全秘密着。”这种特殊的形式,在红军的力量还不大而反动统治势力又无力顾及的情况下是很有效果的。

大柏地战斗胜利后,红四军主力乘胜在二月十三日进占宁都县城。接着,在十七日抵达东固,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

毛泽东在东固传达和讲解了中共六大的决议案。听取了当地党组织和军队负责人对东固斗争情况的介绍。他把这种秘密割据经验写信告诉湘、赣边界特委，并指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

红四军在东固休整了一个星期，消除了疲劳，取得了补给，伤病员也得到安顿。东固成为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重要出发点。但在这里得知井冈山已在有着极大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围攻下失守，彭德怀已率部突围下山。这样，救援井冈山的计划无法实现。

二月中、下旬，赣军主力李文彬旅三个团向东固进逼，其他军队也对东固取包围之势。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会议认为，此时若以东固为阵地同强敌作战是不利的，将会使这个地区原来秘密割据的优势完全丧失。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动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同时，留下毛泽覃等一批干部，加强当地的领导力量，并送给红二、四团二百支枪。红四军于二月二十五日离开东固。有人曾主张各团分路走，毛泽东不同意，认为那样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坚持集中行动，沿赣闽边界转移。

这时，国内政治局势正酝酿着一场重大变动。蒋介石同控制两湖地区的桂系军阀之间的战争已一触即发。这将是一场大仗。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奉命北调，准备参加对桂系军阀的作战，顾不上再“追剿”红军，赣南敌方兵力空虚，使红四军的行动更处于主动地位，能够从容地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红四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应该指向哪里？中共福建省委在红四军离开东固的上一天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建议“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汀、武平、上杭一带来作一短时间

的休息”，并指示长汀、上杭、武平三县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向他们报告当地的情况，“同时把省委的意见提供给他们参考”。

毛泽东、朱德同意这个意见，因为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平和一带，在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下，已经建立起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同时，在福建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几支地方部队如长汀一带的郭凤鸣旅、龙岩一带的陈国辉旅等本来都是土匪，战斗力不强，便于红四军的发展。

三月十一日，红四军进入闽西长汀县境内。他们在四都镇击溃郭凤鸣部一个团。长汀县委负责人段奋夫赶到红四军军部，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长汀县和郭凤鸣部的情况。会议决定进攻长岭寨，夺取长汀城，消灭郭凤鸣部。十四日，红四军分三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歼敌两千余人，缴枪五百余支，击毙旅长郭凤鸣，乘胜占领长汀城，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长汀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有几万人口，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还有小型的兵工厂和被服厂。红四军长期在山区转战，不曾进入过这样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许多新的问题提到他们面前。毛泽东历来重视社会调查，把它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他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邀请长汀城里的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教书先生、佃农、游民等各阶层的人开座谈会，了解长汀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风俗民情。根据调查中了解的实际情况，发动群众，并制定各项城市政策。在红四军《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中指出：

“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工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军阀的走狗，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要没收。乡

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 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

长汀的信息，自然比赣南山区要灵通得多。在这里，毛泽东确切地获知：蒋介石和桂系军阀已经决裂，国民党阵营内部的一场大混战已不可避免。面对这种新的局势，经过通盘考虑，红四军前委决定比较放手地在赣南闽西二十多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

三月二十日，红四军前委在举行扩大会议后，向中央报告：“ 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并强调“ 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

这是一个重大而正确的战略决策。赣南闽西地域宽广，境内山峦起伏，林木茂密，回旋余地大，适宜于发展游击战争；党和群众的基础好，物产比较丰富，能为坚持武装割据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并且距离大城市远，交通不便，军队往来和聚集都很困难，这些都是红军发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这个战略决策的实施，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孕育着“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 这条正确路线的萌芽。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在长汀对红四军进行整编，把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成立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纵队。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的要求，将原有的红四军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政治部，由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



任；每个纵队设立政治部，由党代表兼主任；支队、大队两级不设政治部，只设党代表。红四军在长汀还筹到大批款项和物资。红军战士每人发了两套军服，五块大洋。军容焕然一新。

依据东固游击区秘密割据的经验，红四军帮助长汀党组织秘密发展党员，比原来扩大了两倍；组成二十个秘密农民协会，五个秘密工会，成立了总工会。并且召开各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建立了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

红军在长汀停留了十七天，在这里获悉，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已经转战到达赣南；由于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北调，准备投入蒋桂战争，造成赣南军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全军迅速回师赣南。

四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江西瑞金，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刚刚收到的中共中央“二月来信”。会后，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复信。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指出：“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并从红军不是本地人、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和愈是恶劣环境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等方面，说明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复信批评那种把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同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写道：“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复信提出：“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



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四月上旬，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国民党军队无暇顾及红军的行动。十一日，毛泽东在宁都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同意彭德怀率部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实行近距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并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

会后，毛泽东率领第三纵队到兴国县城，分兵发动群众，并开展社会调查，指导建立兴国革命委员会。他在兴国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制定兴国县《土地法》，根据中共六大决议和实际情况，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性的改动。还主办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亲自担任主要课程的讲授，以推动兴国《土地法》的切实执行。

月底，他率第三纵队同第一、第二纵队会合。会合后，红四军攻克宁都县城，取得歼敌五百余人、缴枪一百多支的胜利。

从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赣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于都、兴国、宁都三县建立起县级革命政权，群众初步发动起来，赣南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

五月中旬，蒋桂战争结束，赣南方面的国民党驻军回防，对红军压力加重。而在闽西方面，地方军阀陈国辉旅主力却因粤桂战争爆发，赴广东参战，兵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避实就虚，再次入闽。

这是红四军第二次入闽。闽西的革命形势已有很大发展，当地群众对红四军的了解也比他们第一次入闽时清楚多了。在闽西党组织配合下，红四军于五月二十三日奔袭龙岩县城，将守军陈国辉部一个营全部歼灭。为了诱使陈

国辉旅主力回援，红四军又主动撤出龙岩，在二十五日一举攻占永定县城，成立闽西第二个县级革命政权——永定革命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六月三日，再占龙岩，成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由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任主席。

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

五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六月十四日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复信还指出:红四军中向来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复信指出:

“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基础。

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通过的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七月上旬，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那时，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县蛟洋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到蛟洋后，发现党代会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提议会议推迟一周召开，由代表先在本地区进行调查。他自己也参加调查，并为大会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作准备。二十日至二十九日，代表大会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闽西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并且论述了实现这个任务的三项基本方针：深入土地革命；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在毛泽东指导下，大会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比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又有新的发展：对大小地主加以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会后，闽西在六百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约八十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会议后期，毛泽东因疟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转移到苏家坡。以后，又到永定县金丰山区养病。在这期间，红四军打破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

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在九月下旬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并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大会。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作“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让他继续养病。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第二年，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到一个结论。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中共红四军“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

这以后，毛泽东留在上杭临江楼继续治病。经过一位名医吴修山十多天的治疗，病情明显好转。正逢重阳节，看到院中黄菊盛开，填了一首《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十月下旬，毛泽东随闽西特委机关撤出上杭县城，转往苏家坡，又休养了一个多月。

毛泽东这次病得很重。在转往苏家坡的途中，他对曾志说过：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国民党却造谣说，他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毛泽东病故的误传，第二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很高的评价：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个“讣告”，虽因传闻失实而来，但它透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地位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以后，毛泽东虽又多次遭受“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打击，但他们仍不敢完全抹煞毛泽东的地位，同这个事实多少也有关系。

中共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

“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

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

不久，陈毅到达上海，八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说到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委员会确定，以中央八月二十一日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这封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陈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得到很大提高。他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身边工作的人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封信，也就是“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

“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



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陈毅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做解释和纠正的工作。

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在他养病的蛟洋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来信。这时，他的健康正在恢复，便随前来迎接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中共中央收信后，在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说道：“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半年后，当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



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应该说，在探索的过程中，面对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种坦诚的党内争论的发生是正常的，最后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党内的思想，急需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随后，他和朱德、陈毅率队伍到达上杭县古田村，为红四军九大的召开作了认真的准备。他在军内外进行了周密的调查，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起草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等八个决议草案。

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在上杭古田举行。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近三万字，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它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必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之一。必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把宣传工作当成“第一个重大工作”。

第二，确立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并且尖锐地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决议规定，党的各级会议都必须讨论军事工作，一经形成决议，“通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在下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党内要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无论担任什么军职的党员干部，都应该参加党的会议，报告工作，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第三，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决议提出，在省级地方政权未建立前，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担负的工作：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的指挥；作战、宿营、给养等，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的指挥。在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当地政权机关的工作，如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等。决议批评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发

展下去，便有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

第四，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决议从红四军的组成和处在农村分散游击环境的实际出发，指出对红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决议》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和社会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克服的办法。

第五，规定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决议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制度。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长官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切实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坚决废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长官，自觉地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克服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在军政关系上，要求红军指战员严格尊重人民政权机关，巩固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军民关系上，要求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对敌军的工作上，要求在坚决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的同时，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其他各部分红军也先后照此来做，大大加快了人民军队建设的进程。

毛泽东没有满足于古田会议取得的巨大成功。紧接着，他又继续思考着“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这时，他收到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元旦贺信，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

表性。一月五日，他给林彪写了回信，也就是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写道：“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认清楚。”认清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与游击队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伴随红军与游击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政权（苏维埃）之存在与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他强调指出：红军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苏维埃“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二十年后，他把这封信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又在“重要因素”前加了一个“最”字，把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表达得更明确了。

毛泽东在信中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他批评林彪等“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并且明确地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这是继古田会议后又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它进一步纠正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一部分人中滋长起来的单纯流动游击的错误观念，要求大家毫不动摇地确立“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从而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开辟和巩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形成“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格局。如果没有树立起这样的深刻观念，就不可能有以后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也不可能使中国革命能在符合本国实际国情的条件下胜利发展。

这时，国民党当局又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十四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进犯的主力仍是赣军金汉鼎部第十二师。闽西革命根据地，在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后，经过七个多月的经营，已得到初步巩固。于是，朱德、毛泽东在一月上旬决定率红四军回师赣南，吸引金汉鼎部离闽回赣，打破他们的第二次“会剿”。中共闽西特委得知后，来信要求红四军留下一个纵队。毛泽东对送信人说：敌军是跟着我们走的，不会留在闽西跟你们走。他还写了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在赣南和赣西地区，留在那里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通过游击战争发展群众武装，实力和编制都有扩充。一月间，赣西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它们和其他游击队合编为红六军，由黄公略任军长。红四军在回赣南的途中，接到有关报告，就派前委委员陈毅、宋裕和先行赶去，协助黄公略做筹备工作，迎接红四军返赣。陈毅并担任了红六军政治委员。

红四军回师赣南，不仅达到了“离开闽西，巩固闽西”的预期目的，而且在赣南分兵到各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大大促进了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当时担任红四军参谋处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毛泽东同志每到一地，总是挤出时间做社会调查，以便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凡是有地方党组织的，都找当地干部谈话，指导他们总结斗争经验，指出当前的任务和工作，着重讲党的政策和策略。”

在认真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二月六日至九日，毛泽东同中共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协商后，主持召开红四军

前委、赣西特委(赣南特委代表没有来得及赶到)和红五、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通常称为二七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深入土地革命。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认为,有在江西“首先胜利夺取全省政权之可能”。会议批评了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的迟迟不分配土地、不废债务、不武装工农和按劳动力分配土地的错误。会上通过的《土地法》明确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为了实行统一领导,组成红四、红五、红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的共同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曾山等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并将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

“二七会议”后,在兴国等六个县的全境和永丰等县的部分地区,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了分田运动。经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内真正出现了一场农村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根本变化。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他们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以后,热烈地拥护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这就是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在大革命失败后极端艰难的环境中能得到坚持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毛泽东十多年后同斯诺谈到二七会议确定的纲领时说:“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我们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到三月中旬,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也成立起来。这样,便基本上实现了前委一年前向中央提出的公开割据闽赣边界二十余县的计划,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革命根据地应该怎样巩固和发展的问題 ,在毛泽东三月十八日主持起草的共同前委第三号通告中 ,提出了要实行“ 傍着发展的工作路线 ”和“ 同时扩大同时深入 ”的工作方针。

所谓“ 傍着发展 ” ,就是“ 傍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 ,及建立新的红色区域后再促进它去发展 ”。红四军代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这条工作路线作了这样的具体说明 :“ 鉴于过去的经验 :‘ 傍着发展有成效 ,流动游击只徒劳。 ’ ” “ 凡有党或有一小点政权的地方 ,红军一去配合起来 ,傍着这一块区域发展 ,立刻大有成效 ,政权也建立了 ,土地也分配了 ,群众的武装也扩大了。尤其是这一块分了田的政治影响深入群众 ,及这一块政权在敌人数次会剿之后不但不消灭 ,还继续扩大与发展 ,使群众更能认识他本身的力量而奋勇的斗争起来 ,更便利搞更有效的扩大赤色区域达到我们的任务。 ” 同这相反 ,“ 无党的地方 ,红军一去 ,用下很多的功夫 ,努力发动群众 ,创造群众组织 ,建立党 ,不怕你作半个月也好 ,作十天或两三天也好 ,只要红军一走 ,靖卫团一回来 ,仍旧是白色政权 ,红军的努力只留些政治影响 ,其次就一切没有了。 ” 这也就是毛泽东历来所说的“ 波浪式地向前扩大 ”。显然 ,这是一条符合实际情况而行之有效的路线。所谓“ 同时扩大同时深入 ” ,就是在一定时间和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个地区 ,同时深入这一地区 ,发动群众 ,开展土地革命 ,建设红色政权。

建立农村根据地 ,积蓄革命力量 ,以此为依托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这一套很有特色的做法是赣南、闽西等苏区和红军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从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 ,只经过短短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由于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而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 ,在当地党组织的密切配合



下，迅速开辟了赣南和闽西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红军的战斗力也不断提高，作战规模越来越大，这就为下一阶段红军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作了重要准备，也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开创新局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版，第 82 页。

上海《民国日报》，1929 年 2 月 9 日。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现状的报告》，1929 年 9 月 1 日。

红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1929 年 3 月 20 日。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报告（第 2 号），1929 年 6 月 6 日。

红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1929 年 4 月 13 日。

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的信，1929 年 2 月 24 日。

红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1929 年 3 月 20 日。

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 年 9 月 29 日和 10 月 4 日。

第一次苏维埃区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 年 5 月 16 日。

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 年 9 月 29 日和 10 月 4 日。

刘安恭在 1929 年 10 月红四军进攻梅县的途中大埔县虎市时牺牲。

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 年 11 月 28 日。

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情况报告，1930 年 9、10 月间。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6页。

第一次苏维埃区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年5月16日。

## 十、反对本本主义

坚持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极为突出的特点。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再到开辟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不管局势怎样险恶，他从不放松对周围环境的现状和来源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行动方针，并且十分注意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修正或充实原有的想法。这是他所以能够不断提出创见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但人们的认识并不是那样容易取得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争议经常发生，有时甚至相当尖锐，严重地妨碍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这种争议，有的发生在红四军内部，有的发生在它同上级领导机关（包括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

毛泽东在青年时起就表现出对事情总不满足于枝枝节节的解决，而是力求从大本大原上去探索。这种争议多次地反复地出现，自然引起他要从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思考。

这个认识过程，正如他以后在《实践论》中所总结的：“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他看来，认识开始于实践，认识又有待于深化。“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这样就达到理性认识的阶段。这个飞跃很重要：“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毛泽东正是从“反复了多次”的事实中看到：这些争议背后潜藏着的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从实际出发，另一种是只从主观愿望或某些书本上的现成结论出发。从这两种不同思路出发，可以对同一事物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和决策。因此，要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必须从这个根本问题上着手。

当然，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认识，也需要有个过程。毛泽东最初提出的是反对形式主义，也就是要反对那种不顾实际情况的需要，只是一成不变地从形式上来考虑问题，特别是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去执行上级指示。

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后，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严厉地批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查当时环境”，“只知形式的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结果招致边界与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红四军七大前后发生的那场激烈争论也是如此。最初争论的热点是红四军在当时情况下要不要设立军委。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引起这场争论的原因之一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些人坚持设立军委的理由看起来是冠冕堂皇的：“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但这些说法完全是形式主义的：“现在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对这些实际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的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数同志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设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呢？”毛泽东还指出，这些人攻击红四军党内有家长制，“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他从争论中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现象是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之不

同。”“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什么一种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呢？！”“请问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并且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

因此，他在起草红四军九大决议案时，把“唯心观点”列入需要纠正的“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写道：“唯心观点，在红军党员中是非常浓厚的，其结果对政治分析，对工作指导，对党的组织，都有非常大的妨碍。因为政治上的唯心的分析和工作上的唯心的指导，其必然伴随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的方法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了三条：“（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同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相对立的，便是毛泽东一向倡导的重视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实际是复杂的，调查研究应该是周密而系统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写道：“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在这以前，毛泽东曾作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社会调查，湖南那五个县是大革命时代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做的，但这些材料因为马日事变和井冈山失守而损失了。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回师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在赣南逐步形成一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一九三一年五月，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在

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环境比较安定。这样长时间的停留，在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是少见的。

毛泽东利用红四军正分散在安远、寻乌、平远发动群众的机会，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这是他以前还没有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调查的目的性很明确。毛泽东说过：这正是对“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参加调查会的有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共十一人。寻乌这个县，正介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处，明白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毛泽东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八万多字。这个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经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状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订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他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但他还有不满足的地方，觉得：“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

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和进行寻乌调查同一个月，毛泽东写出了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是《调查工作》，六十年代公开发表时改成这个名字）。这是毛泽东多年来从事调查研究理论的总结。

文章劈头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他倡导要到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毛泽东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文章尖锐地批评党内讨论问题时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强调必须把上级所作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毛泽东接着又阐述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他从这里得出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换句话说：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文章强调：“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调查的对象是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要明了整个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不是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自以为是地指手画脚，瞎说一顿。文章指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适应正在变化的客观环境，毛泽东及时地指出，调查工作不能只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干部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所进行的寻乌调查，便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自然是针对以往许多人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或盲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状况提出的。文章中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可以说已初步形成。毛泽东十分重视这篇文章。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它已经散失。到六十年代初，又重新找到。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一年三月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给各

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三月十一日，毛泽东特地为它写了一段说明：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一九三一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反对本本主义》的写成，反映出毛泽东在认识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飞跃”。这个“飞跃”，确实是他“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后”才产生的，反过来又可以使他更自觉地用来指导此后的实践。

一九三一年六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寻乌出发，再次进入闽西，经武平到上杭，分兵发动群众。这时，闽西革命根据地已正式形成，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和各级民主政权已先后成立。根据地人口约八十五万人，占闽西各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并且出现了具有生产互助性质的耕田队。毛泽东到上杭县才溪乡进行社会调查后，召开区乡工作人员和耕田队长会议，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搞生产，要求把耕田队改成互助组；教育区乡工作人员依据群众自愿入股原则，创办出售油、盐、布匹和收购土特产品的合作社，来促进物资交流，解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

六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汀县南阳（现属上杭县）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通常称为南阳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邓子恢代表闽西特委汇报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半年来的形势和各项工作的经验教训。会议讨论了经过毛泽东审改的《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决议中明确规定，对土



地分配除原有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增加了“抽肥补瘦”。

以后，毛泽东在这年十月又做过兴国调查。这次调查的特点是：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他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而没有这种调查，就不能有农村的基础概念。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他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毛泽东在整理后记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第二年二月，毛泽东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有关通告的精神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他在信中先分析了当地农村工作面对的实际问题：“现在春天到了，各地农民动手耕田的还很少，这件事值得我们注意。”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原因之一是田没有分定。信中说：“关于田没有分定一层，在现在红色区域是个大问题。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信中要求省苏维埃政府通令各级各地政府贴出布告，“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这样，又纠正了井冈山以来《土地法》中关于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经过实践中的反复探索，终于形成

了一套比较完备而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又在他起草的一个通知中写道：“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有了后一条补充，就把《反对本本主义》中所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表述得更加完整了。

毛泽东在长期的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出一整套科学的工作方法：极端重视对实际事实的周密调查，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到客观事物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和变动状况，集中群众智慧又经过审慎的深思熟虑，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来指导工作，而不是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二手材料，轻率地决定政策。这种科学的工作方法，自觉地贯穿在他日后领导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中，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并用以教育全党和全体人民。这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极其重要的原因。离开这一点，便谈不上真正理解毛泽东。

第一次苏维埃区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年5月16日。

毛泽东复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2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42、43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82、183页。

毛泽东：《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1931年2月28日。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  
1931 年 4 月 2 日。

## 十一、不打南昌打吉安

正当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再度进入闽西并召开南阳会议的时候，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错误，同两年多前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相比，有着不同的特点：前一次是在革命遭受严重挫败时带有浓厚拼命色彩的蛮干，这一次却是在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大规模爆发、革命运动又明显走向复兴时，由于对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作出过分夸大的估计而发生的急性病式的冒险行动。

李立三起草的决议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从“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出发，特别强调：“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这些主张，自然同毛泽东等坚持先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李立三曾在六月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

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 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蔽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等：“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信中说：“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同时，又以强硬的语调提出：“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在南阳开了一个星期后，在六月十九日又移到长汀县城继续进行。“会议对红军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以及红军的整编工作和闽西地方工作等问题，都作了讨论和决定。汀州会议是红军战略由以游击战为主逐步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赶到长汀，在联席会议上作了两天传达中共中央精神的报告。据涂振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会议接受了这个报告提出的意见，认为：“长江（流域的）反动统治正是非常混乱，走向更急激的崩溃。争取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非常的迫切。决定很快的集中，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同时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

对涂振农传达的意见，毛泽东、朱德曾表示反对。朱德后来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过：“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他又说：“除了毛

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 尽管如此，他们在执行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置，从而避免了使红军遭受大的损失，并在斗争中继续得到发展。

联席会议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由红四军第三纵队和赣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成立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全军团共一万多人，内有共产党员四千人，有枪七千支。红一军团成立后，使赣南、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开始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朱德签发命令：“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月底，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队离开长汀，经广昌、瑞金于七月九日绕道到达兴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随总部前进，公布了由他从中央带来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

当时，蒋、阎、冯之间的中原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国民党在江西的驻军兵力不足。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得知红军夺取南昌、九江的计划后十分震惊，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蒋介石又调第十八师两个旅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毛泽东、朱德等到达吉安县陂头，七月十四日出席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召集的中共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大家认为，吉安的国民党军队正凭险死守待援，工事坚固，如果硬攻将会造成很大伤亡。决定主力红军暂时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二十日，红军进入永丰城。当天下午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

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朱德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二十四日攻占樟树镇，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营。

为了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樟树召开中共红一军团前委扩大会议。这时，涂振农已离开红一军团总部。会议从缴获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的配置情况，认为如按中共中央命令直接进攻南昌，敌军第十八师两个旅正处在红军东部侧后，威胁较大，南昌城郊池塘较多，又有坚固工事，不易攻克；如在樟树停留，又有受敌军三个旅夹击的可能。为了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会议决定西渡赣江北上，再视情况向南昌对岸推进。这是避实就虚的正确决策。

红一军团西渡赣江后，在七月二十七日进抵高安、上高地区。这时，鲁涤平判断红军将要进攻南昌，急调三个旅加强南昌防务。二十九日，朱德、毛泽东下达“相机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八月一日，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个纵队进占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并从实地侦察敌情。罗炳辉回来后，说明南昌国民党军队防务严实，不宜进攻。朱德、毛泽东立即下令红一军团“撤围南昌向安义、奉新北上”。这是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的地区。红一军团在安义、奉新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并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进攻南昌、九江是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改变这个重大部署，必须作出解释。八月十九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说道：“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

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

从长汀北上以来，毛泽东、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不断改变进军方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因而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红军还得到较大的发展，由长汀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为日后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基础。

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

八月七日，毛泽东在奉新得到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的上海报纸，得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乘虚攻克湖南省会长沙（中原大战爆发后，反蒋的李宗仁、张发奎部从广西大举北进湖南，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急忙调兵抗击，长沙防御力量薄弱）。几天后，又获悉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并在平江地区受到何键部的追击。红一军团立刻向湘赣边境西进，同红三军团靠拢。十八日，在万载得悉湘军追击部队右路的第三纵队四个团已突进到两省交界处的浏阳文家市一带，和其他两路距离较远，态势较为孤立。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当夜发出奔袭文家市的命令。

二十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向文家市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立足未稳的湘军三个团、一个营及一个机枪连，击毙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支援红三军团有重要意义。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一部无线电台。湘军溃退时，丢下一部电



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电台给砸烂了。当时红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还没有建立无线电通讯，毛泽东很惋惜，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于二十三日北上浏阳永和市，同由平江地区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三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工作，由毛泽东任主席。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什么？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进行讨论。据滕代远后来回忆：

“这时，中央又命令一方面军再去打长沙，三军团也有不少人主张打长沙，当时我们认为，第一次三军团二万多人也打了长沙，现在四万人还不能去打吗？”当时红军士气旺盛，但还不具备进攻大城市的条件。第一次进攻长沙，因对方守备力量薄弱而攻入了，但敌军一集中兵力反攻，就被包围在城内，突围时遭受很大损失。这时，长沙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比红军多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强固的防御工事。红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所以，毛泽东、朱德对中央这个指示提出疑问，认为就红军的装备条件来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员主张打长沙，最后，毛泽东、朱德仍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由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

依据总前委的决定，毛泽东、朱德于八月二十四日下达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二十九日进抵长沙近郊。总前委从侦察中获悉，长

沙守军有六个师又一个旅，共三十一个团，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一方面军的十三个师实际上相当于十三个团，双方强弱悬殊，决定采用“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作战方法。然而，长沙守军坚持凭工事固守，不肯出击，红一方面军抓不到歼敌的战机，部队内部要求攻城的呼声甚高。于是，红一方面军总部在九月一日晚，发出在第二天向长沙发动总攻的命令。这次战斗异常激烈。尽管指战员英勇奋战，甚至采用“火牛阵”的方法，想用牛群来冲破敌军的电网，仍没有奏效。何键看到红军进攻受阻，在三日晨派两个多旅出击，被红一军团击溃。这以后，守军不再出击。十日，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二次对长沙的总攻击，连续几次强攻，激战到十一日拂晓，仍没有能突破守军的阵地。

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十六天，两次总攻都没有奏效，诱歼敌军的计划也没能实现，又得到李宗仁、张发奎的部队已到达湘潭的消息。九月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湖南省委代表参加的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大家认为，李、张部队到湘潭不是打何键而是为了进攻红军，红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从而下决心从长沙撤围。撤围后退到哪里？会上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不应该放弃对长沙的进攻计划，可由株洲萍乡铁路撤退，以消灭后面的敌人；二是撤退到岳州；三是撤退到江西袁州；四是撤围长沙，改打南昌。最后由毛泽东作总结，会议决定先退株洲、萍乡，休整待机。

对这次攻打长沙的教训，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三十一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五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

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他在报告中强调：“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可以看出，经过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实际教训，毛泽东已更深切地感到，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强行进攻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抵株洲时，部队缴获了国民党政府在内政部印发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八月初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第一军团的任务是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第三军团在江西工作一个时期后，再去湖南或湖北。”看到中央这个指示后，红一方面军一部分干部主张立即进攻南昌、九江；一些干部又主张在湘鄂赣坚持斗争，再攻长沙。毛泽东深知，无论进攻南昌、九江，还是再攻长沙都难以奏效。九月十三日，他在株洲召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先在萍乡、醴陵、攸县筹措给养，然后由红一军团夺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会后，红军沿萍株铁路从湖南折回江西。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当时“革命急性病”在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特别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许多人急于想取得攻下中心城市的重大胜利。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通常称为袁州会议）。会上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等坚持株洲会议的原有决定：先打吉安；部分干部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的甚至向毛泽东提出

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

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从湖南赶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传达说：长江局已查明李、张部队并没有到达湘潭，要红一方面军回去再打长沙。并且带来中共中央的一封指示信，里面说：“我们预料你们（注：指一、三军团）既然取得联络，必然有过会议，讨论再度占领长沙问题。如果你们是决定以三（注：原来的红六军已改称红三军）、四、五、八军的主力集中进攻长沙，而以少部队留守赣省，牵制南昌、九江之敌，并通知二、六军逼进武长线，以切断敌联络线为任务，这一战略无疑是正确的，望你们坚决照此战略执行。”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曾和周以栗一起搞过农民运动，就同他谈了一个通宵，终于用事实说服了他。周以栗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且转过来在会上帮助说服部分干部：暂时不打南昌而先打吉安。会议终于决定：“一军团以很短时间攻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补充新兵，筹措给养等。三军团则占领清江县城及其附近，封锁赣江，筹款，发动群众，整理补充等。”这样，就最终放弃了再攻长沙的打算，也没有采取立刻进攻南昌、九江的冒险计划。

十月二日，毛泽东和朱德向红一军团下达命令，“决于四日拂晓总攻吉安城”。部队行进到吉安境内，遇到从中央开会回来的李文林，说中央还是要红一军团去打南昌。毛泽东很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开去了！李文林说，那也只好这样了。

当时，吉安周围都在红军控制下，已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同外交通。十月四日晨，在赣西十多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总攻击。当晚，守军邓英率部乘夜潜逃。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接着，中共红

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城内举行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吉安解放的胜利，成立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同时，组成李文林负责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但在吉安也得到错误的情报，认为“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这导致了不久后发生的肃反中的严重错误。

红一方面军占领吉安后扩军八千人，还建立起工兵队，又连续攻克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进行了土地革命，使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得到了扩大。

这时，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大批地向江西南昌集中，准备对红军发动“围剿”，而红一方面军内部却又争论起攻下吉安后打不打南昌的问题来。不少干部仍坚持按照中央原有决定去攻打南昌、九江。毛泽东从攻打长沙失利的教训中已经认识到，这样做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但又不便同中央决定和红一方面军内许多干部的意见公开对抗，只能以“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为理由，决定将部队先向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等待战机。

根据这个决定，红一军团的三个军分别从十四日拂晓开始撤出吉安，移师向北。

毛泽东随同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十月十七日抵达峡江县城，召开总前委会议。这时，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已将结束。在讨论时局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严重的局势即将到来。他说：“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

对如何巩固已经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会议也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指出：“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

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 ”

会后，朱德、毛泽东命令：“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命令中对南昌、九江是“待机略取”，而“第一步”只是攻取高安。十月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清江县的太平圩，并已获悉国民党军队正在大批开入江西。第二天，毛泽东在太平圩召开总前委会议，“决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决战的条件，暂以七天为期。” 二十九日又命令：“本方面军拟仍在原地区延长工作三天”。这样，部队实际上不再向北推进。

鉴于局势日趋严重，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后撤三十里，移至新余县罗坊，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决策会议。

当时得到消息：国民党军队先头部队已到清江，同红军只有一江之隔。会上，毛泽东根据当前敌情的变化，明确地提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 (21)

开始讨论时，少数人不赞成这个主张，李文林、袁国平提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22)多数人如朱德、周以栗、罗荣桓、曾山、陈正人等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对打不打南昌、九江这个问题基本上统一了认识。第二天，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提出目前的战略是“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23)

滕代远后来回忆说：“经过充分讨论和毛主席以及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说服，我们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确意见。当然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的，而是毛主席费了很大的功夫，尽了最大的耐心，开了许多次会，我们的思想才通了。另一方面，当时我们也感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24)

但在联席会议上，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仍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所以在决议上并没有把它写上。十月三十日，从侦察得知，国民党多路军队约十万人已经出动，向红军和根据地推进，局势十分严峻。毛泽东立即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大家认为，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状况出发，要战胜敌人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腹地才有可能，于是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25)，并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之间转移到回旋和发展余地都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广阔区域活动，待机破敌。

红一方面军是由一军团和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三军团的第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湖南的平江、浏阳人，第八



军大多是湖北的阳新、大冶人，有些人从狭隘的地方观念出发，反对东渡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彭德怀出席了罗坊会议，坚决支持总前委的决定，认为：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他在三军团的会上说：“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26）他所表示的这种态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没有意见了。三军团便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总部和一军团也在峡江附近渡过赣江。

这样，整个方面军在统一指挥下开始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从离开长汀西进到罗坊会议这四个月间，毛泽东和他率领下的红军走过一条充满惊涛骇浪的历程。那时，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一些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毛泽东虽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移师向南昌、长沙推进，并且对长沙发动了历时十六天围攻，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较大伤亡；但总的说来，他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认真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尽力避免盲目硬拼，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当进攻长沙失败后，他又在存在严重争议的处境下，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纠正部队内部相当普遍的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和急躁的情绪，把红军的行动引入正确轨道。朱德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这样而真照李立三的错误指导做下去，“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27）到一九三三年十月间，红一方面军总人数已达四万人，并且集中了兵力，统一了指挥，革命根据地也有明显扩大，从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当时那种复杂的环境中 ,能做到这样实在是很难了。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  
1930 年 6 月 9 日。

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信 , 1930 年 6 月 15 日。

《郭化若回忆录》 ,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版 , 第 28 页。

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报告 ,  
1930 年 9、10 月间。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 4 月版 , 第 316、317 页。

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 , 可以确认它是从中央带来的。

《郭化若回忆录》 ,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版 , 第 30、31 页。

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 ,  
1930 年 8 月 19 日。

滕代远 : 《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 , 《江西党史资料》第 6 辑 , 第 252 页。

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 1930 年 8 月 31 日。

关向应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 , 1930 年 10 月 14 日。

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 , 1930 年 9 月 17 日。

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 , 1930 年 9 月 17 日。

滕代远 : 《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 , 《江西党史资料》第 6 辑 , 第 254 页。

中共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1930年8月29日。

毛泽东给南方局即转中央信，1930年10月14日。

毛泽东给湘东特委的信，1930年10月19日。

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19日。

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4日。

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9日。

(21)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2)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264页。

(24)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1967年），《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2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54页。

(2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2页。

(27)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0页。

## 十二、打破三次“围剿”

工农武装割据所以能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不断发生的分裂和战争，严重地削弱了他们的统治力量。一九三一年初，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控制华北和西北的阎锡山、冯玉祥以及盘踞广西的李宗仁、张发奎等部的紧张关系已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经过近四个月的酝酿，终于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一百万人。南方各省原来用以“进剿”红军的军队纷纷调离原地。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是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其中的谭师以及张师一个旅就先后调往广东、河南作战，到中原大战结束后才返回江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严重分裂和战争，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猛发展的有利时机。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包括对长沙等中心城市的攻打，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到十月间，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结束。他刚腾出手来，立刻掉头调集兵力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中间几乎没有留下间隔。

这种“围剿”和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过去一省的“进剿”和几省的“会剿”还只是局部性的行动；这时的大规模“围剿”已成为南京政府统一指挥下的全局性行动。“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和以后发展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赣西南地区。

刚刚在中原大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的蒋介石正处在兴高采烈、不可一世的时候。他调集了十万大军投入第一次“围剿”，以为可以很快把红军荡平。十月二十八日，鲁涤平被任命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十一月二日，鲁涤平将江西境内的七个师又一个旅编成三路纵队，限五天内集

中,推进到袁水流域,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在这里同红一方面军决战。

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这时已在三十四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拥有九座县城,根据地内人口达二百多万,并已开展分田运动。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积极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许多县、区、乡、村分别建立起赤卫军、赤卫纵队、赤卫大队和赤卫队。这就为红军提供了得到民众全力支持的广阔战场和充分的回旋余地,是以往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还不曾有过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当时所在的袁水流域处于根据地的前沿地区。

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的方针,就是当优势强敌扑来时,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避开不利于红军的决战,以保存实力,然后依靠根据地内的民众支持和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集中兵力,待机破敌。这是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的正确作战方针。但要使这个正确方针为大家所接受却并不容易。一部分干部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的影响,不肯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只讲进攻,把退却看作“保守路线”。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这是罗坊会议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的原因所在。

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治委员的刘亚楼回忆说:

“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毛泽东同志用许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地解释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

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这就保证我们掌握了反‘围剿’战争的胜算。”

“诱敌深入”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朱德指挥已转移到赣江以东的红一方面军主力渐次向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冈一带山区退却。十二月一日，到达宁都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同月十二日，由于肃反中的错误而发生富田事变，红二十军部分领导人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将该军开往赣江以西。十五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又转移到平田、安福、砍柴岗地区隐蔽集中。

鲁涤平指挥的三路纵队到达袁水流域后，才知道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经转移，扑了个空，立刻把张辉瓒、谭道源两个纵队调到赣江以东进攻，仍不知道红军主力所在而接连扑空。十二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任命鲁涤平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各路兵力继续向根据地中部地区推进。但国民党军队一进入根据地内，就陷入困境，在这一带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山区中，既找不到向导，又找不到粮食，不得不等待后方补给接上后再前进，处处耳目闭塞，对红军的行动一无所知。

红军却以逸待劳，消息灵便，对国民党军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黄陂后，在十二月上旬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案。大家认为，“进剿”敌军虽有十万，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是鲁涤平的嫡系，也是这次“围剿”的主力军，如果消灭这两个师，这次“围剿”便可基本打破。张、谭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而红一方面军有四万余人，如果一次打对方一个师可占绝对优势，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

为了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充满信心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总前委和方面军总部将毛泽东在黄陂会上的发言《八个大胜利的条件》作为反“围剿”的宣传材料印发。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在小布召开盛大的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会上，他以这副对联为题，具体生动地解释了“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他还分析了敌必败、我必胜的六个条件：一、苏区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二、红军可以主动选择最有利的作战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三、红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四、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五、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六、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这些分析，大大增强了苏区军民反“围剿”的决心和取胜的信心。

毛泽东十分重视“慎重初战”的问题，一定要在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才打。打击的目标，最初选的是离红军隐蔽处最近的谭道源师。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接连两次冒着严寒在谭师将要开到的小布地区设伏，准备出其不意地将该师歼灭于运动之中，但因谭道源不敢孤军深入而没有打成。红军立刻撤出阵地，继续忍耐待机。夜里，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商议作战行动时说：“机会总是要来的，我们还得耐心地等一等。”

就在二十八日那天，鲁涤平命令所属各师向红军发动总攻击。一向骄横的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得知红军内部发生“富田事变”，以为正是大举进攻的好时机，立即出动，把第五十四旅留守东固后方，亲率师部

和第五十二旅、第五十三旅，在第二十八师一个旅的配合下，向龙冈推进。

龙冈接近红军主力集中的地方，群山环抱，中间是狭长的盆地，当地群众又能帮助封锁消息，是红军设伏的好场所。张师出动的当晚，毛泽东、朱德向全军下达命令：“张辉瓒部经善和、藤田到达潭头，现向上固、龙冈推进中。”“方面军决定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第二天晚八时，毛泽东、朱德乘张师刚刚进占龙冈、孤军深入、立足未稳的机会，下达攻击命令。

十二月三十日凌晨，细雨浓雾。毛泽东、朱德步上龙冈、君埠之间的黄竹岭临时指挥所。毛泽东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我们乘晨雾全歼顽敌啊！”

张辉瓒率部由龙冈向五门岭推进，刚进入狭窄山路时，突然遭到预先在这里设伏的红军居高临下的猛烈袭击，退路又被切断。战斗从上午十时开始，激战到下午六时。由于红军集中了兵力，四面包围，以主力从敌军侧后攻击，全歼了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一万人，活捉张辉瓒。

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毛泽东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它的前半阕是：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红一方面军乘胜挥师向东，抄近路，翻过一座高山，直取谭道源部第五十师。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晨，红军进抵东韶附近，向第五十师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共歼该师三千多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仓皇退走。

在五天内，红一方面军连续打了龙冈、东韶两个大胜仗，共歼“围剿”军一个半师一万五千多人，缴枪一万二千余支，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龙冈战斗结束后，鲁涤平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战况，其中有“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之语。蒋介石回电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毛泽东、朱德在返回小布途中，接见了这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原来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台人员王诤、刘寅等人，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建立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治委员，为开展无线电侦察，准确掌握敌军动向提供了条件，对以后多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的胜利，是中国红军建立三年以来对国民党军队取得的最巨大的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二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

毛泽东清醒地估计到，蒋介石遭到这次打击后决不会就此罢手，一定会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因此，立刻抓紧战备，特别是发动根据地广大军民进行迎击新的“围剿”的准备。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势作战，先后占领广昌、石城、瑞金等县城；在几县交界处摧毁了不少地主豪绅武装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健全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党团组织；恢复并发展了地方武装；并在根据地各县境内大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集给养和经费。红一方面军还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开展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这些部署，为打破新的“围剿”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二月初，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围剿”部队。四月初，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共二十万人，投入的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同时，鉴于第一次惨败的教训，在作战方式上也有很大变化，“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作战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八百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步步推进。“他们在这一大包围的布置之下，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廿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坚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

依据“围剿”军的前进态势，三月下旬，毛泽东、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脱离同敌军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的命令，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从根据地北部边缘后撤到广昌、宁都、瑞金一带。毛泽东随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县的青塘。

这时，苏区的领导机构已有了变化。一月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项英当时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

三月十八日，项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有人认为敌军有二十万人，红军只有三万多人，双方力量悬殊，主张红一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另寻出路；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凭借根据地内的有利条件，一定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这次讨论没有取得结果，未能就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作出决定。

四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十七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在青塘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所作的决议中基本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认为，前委“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等。

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最紧迫的问题还是要确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会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许多人仍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抓住中央三月二日指示信中“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

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便提议扩大会议范围，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接受了。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走出会场时担心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

扩大会议的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包括各军的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还要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会上，许多红军高级干部发言，坚决主张在根据地内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周以栗依据创建苏区的实际经验，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提出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赣西南和闽西特委负责人也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根据地。这样，毛泽东等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就是反攻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有些人主张先打在兴国的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十九路军便于红军的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不久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他还指出，从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打起，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

江，战局结束后没有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关于先打弱敌还是先打强敌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后闲谈时曾说：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先打弱敌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的吗？”“但他在争论中不用这些，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说服了大家。”这个正确决策，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朱德立刻在四月十九日签发命令：“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部队在龙冈一带集中完毕后，又向西推进二十公里，在群众条件和地形都十分良好的东固地区逼敌而居，沉着地埋伏了二十五天，隐蔽待机。

毛泽东在龙冈时，同中央代表团的王稼祥进行深谈，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斗争历史和当时争论的问题，并向他提供了便于了解这些历史状况的许多文件。王稼祥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并在不少问题上给予支持。四月三十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讨论反“围剿”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钦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对策略的问题又提出来讨论，由泽东同志先报告。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

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磨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完全可以以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

这一策略决定后，根据地军民一齐动员。红军中各军都召开誓师大会，并利用五一节的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按照毛泽东几次讲话的精神，向全体军民印发了《第二次大战的八大胜利的条件》的文件。

三万多红军在二十多天内隐蔽在东固这个山区，毕竟会带来一些困难。一些指战员求战心切。有些人还认为：要进攻从富田出动的王金钰部必须先穿过蔡廷锴、郭华宗两师之间二十五公里的空隙，说这是钻“牛角尖”，过于冒险。毛泽东又耐心地做了工作，说明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后将它歼灭于运动中的作战方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在隐蔽待机过程中，传来过几次不确实的情况，很影响人心。毛泽东始终岿然不动，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坚持预定计划，不受干扰。

等了二十多天，王金钰部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终于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地区进犯。五月十三日晚，毛泽东、朱德果断地下达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为了准备应付可能意料不到的情况，命令中还提出，要作出敌军十四日向我军进攻或者不向我军进攻的两种作战计划。

命令发出后，毛泽东在第二天同彭德怀到白云山考察地形，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傍晚，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截获公秉藩师部电台用明码同该师驻吉安留守电台通报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里去？”富田台答：“东固。”这就证实了白天获得的情报。毛泽东、朱德决定：全军主力立刻从郭华宗师和蔡廷锴师之间的空隙中隐蔽西进，钻过这个“牛角尖”，突然以两翼包抄的方式攻击王金钰部的后背。

各路红军奉命于清晨出发，快速行进。毛泽东又赶到准备正面进击公秉藩师的红三军军部，同军长黄公略一起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在东固通向中洞的大路南侧，还有一条小路。毛泽东立刻改令红三军沿这条小路秘密前进。这一西进路线的改变，使红三军缩短行程，争取了时间，对消灭公秉藩师起了重要作用。

五月十六日拂晓前，毛泽东带着电台和警卫排登上白云山。接着，朱德带着总部少数人，在同行进中的公秉藩师先头部队发生遭遇性的接触后，也登上白云山。他们一起在白云山指挥所指挥全线战斗。

这时，由小道悄悄前进的中路的红三军主力已进到中洞南侧，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待公秉藩师尾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使毫无应战准备的公秉藩师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仿佛遇到飞将军从天而降。激战到下午五时许，将该师大部歼灭。公秉藩被俘后，装作一般俘虏而获释。右路的红四军在追击中歼灭王金钰部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红三军团当夜进占富田。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战斗首战告捷，给以后的连续作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五月十九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猛烈地向东横扫，截住正在撤退中的国民党军队，在吉水县白沙歼灭郭华宗

第四十三师一个旅和第四十七师第一旅残部。在藤田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闻讯星夜撤往永丰。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二个胜仗。

白沙战斗后，红军继续向东横扫，扩大战果。这时，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正奉命取道中村向藤田前进，准备增援郝梦龄师，它的先头部队一个旅于五月二十一日抵达中村。第二天上午，红军向中村发起攻击，歼灭该旅大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三个胜仗。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宁都县南团。苏区中央局因不便长期随军行动，留在永丰县龙冈。为了统一领导红一方面军作战和战区的地方工作，重新组成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彭德怀、林彪、黄公略、谭震林、周以栗为委员。

中村战斗结束后，已进入苏区的国民党军朱绍良第六路军的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三个师慌忙经广昌向南丰撤退。毛泽东、朱德于二十四日晚十一时下达“方面军决取捷道先敌占领南丰城”的命令。二十五日晚，毛泽东在宁都和广昌交界处的洛口圩严坊村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一次会议，决定方面军主力在第二天开到广昌县城西北的古竹集中，准备全力攻击朱绍良部的毛、许、胡三个师。

二十六日，毛泽东随总部进驻古竹，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二次会议。据当地农民报告，朱绍良部三师已全部集中广昌。会议认为：“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之下，如果我们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决定改变原有的全力攻取南丰的部署，而先集中主力进攻广昌。五月二十七日，经过一天激烈战斗，夺取广昌县城，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师一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后死去。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四个胜仗。

在广昌，毛泽东主持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三次会议。鉴于国民党军朱绍良部的三个师向南丰退却，桥梁又遭破



坏，已追赶不上，同时从整个战略形势考虑，会议决定再次调整作战部署，不攻南丰城，改为向东打国民党军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夺取福建的建宁县城。

建宁，地处闽赣边界，山峦起伏，地势险要。但刘和鼎没有料到红军主力会那样快地运动到这里。五月三十一日，红军出其不意地突袭建宁县城，歼灭刘和鼎师三个团，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缴到的西药就可供全方面军半年之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五个胜仗，也是这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次战斗。

从五月十六日起的半个月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打到闽西北山区，横扫七百余里，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和大量的军用物资，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在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又兴奋地填词《渔家傲》：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再次发生重大分裂：在蒋介石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后，反蒋各派于五月二十八日在广州另行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积极部署向湖南进攻。红军进驻建宁县城的第三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临时总前委第六次会议。当时的估计：“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之可能。”（21）会后，红军主力分散在闽北一带攻占宁化、将乐、归化、顺昌、永安等县，并在当地筹集给养和款项，准备对付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



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比红军的预计来得早得多，规模也比第二次“围剿”大得多。

六月六日，蒋介石发表《为“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声称要“戒除内乱”，“剿灭赤匪”，并宣布他即日将亲赴江西指挥作战。二十二日下午，他乘军舰从南京到达南昌。二十四日，任命何应钦为“围剿”军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直接指挥的左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其中大多是从中原战场调来的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从左翼南城方面向根据地腹地实施“进剿”，寻求同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陈铭枢指挥的右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从右翼吉安方面深入根据地“进剿”。此外，还有预备军、守备军、防堵军、航空处等。集中的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三十万人。

七月一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下总攻击令。他们的战略意图是：“分路围剿，务期先将匪军主力击破，捣其匪巢，然后逐渐清剿，再图根本肃清。”(22)作战方法，因为他自恃这次进攻的兵力雄厚，也改变第二次“围剿”时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在根据地东西两侧实行严密封锁，而以重兵由北向南猛烈推进，企图在赣南歼灭红一方面军主力，再乘势直捣广东，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势力。

从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到第三次“围剿”开始，中间只相隔一个月，比以前短促得多。总前委虽然预计到国民党军将发动第三次“围剿”，但没有料到它在第二次“围剿”刚遭受失败后会来得这么快。当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时，红军的准备还很不充分：指战员在苦战之后尚未休整，人员也没有得到补充，仍是三万多人；部队远离原有根据地，正分散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一时没有集中起来。

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毛泽东、朱德十分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收缩集中。他们最初曾设想在闽赣边界布置战场，消灭进犯军一路，再及其他；但很快就发现这次“围剿”规模之大和来势之猛，立刻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下决心集中主力，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在具有良好群众条件的根据地内部，“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打破这次大规模“围剿”。

七月十日前后，毛泽东、朱德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闽赣边收拢后，急行军回师赣南。由于国民党军队前进的速度很快，左翼军的陈诚部主力在十三日占领建宁以西的广昌，“我主力向赣南红区前部或腹部退却集中都已来不及，毛泽东同志毅然决定红军向赣南后部集中”。(23)这就需要实行千里大迂回，绕过“进剿”军进攻的锋芒，沿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南下，到根据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敌军背后。当时正值七月酷暑，红军在崇山峻岭中千里跋涉，十分艰苦，但情绪十分饱满。毛泽东和部队一起步行前进。七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抵达于都县北部的银坑，同由广西突围后转战到江西的红七军以及原在赣南的红三军等会合。接着，又继续向西北隐蔽转移，于二十八日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完成绕道千里、回师赣南的战略任务，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军队进入根据地后，东奔西走，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却到处扑空。七月底，蒋介石、何应钦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已集中在它侧背的兴国地区后，立刻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

这时，双方主力云集兴国附近，形势十分严峻。红军应当从什么地方突破敌军的围攻？毛泽东、朱德召开军事会议进行研究。会议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

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24）

为什么选择北出富田作为反攻的突破口？因为当时得到的情报：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向兴国急进，其右侧的富田一带只有三个团防守。但当红军主力开始北上时，忽然发现陈诚、罗卓英两师已先于红军赶到富田，这是国民党“进剿”军中最精锐的部队，红军准备夺取富田的计划已难以实现。毛泽东、朱德断然改变计划，率部忍耐折回，重新返回高兴圩，另寻战机。

八月上旬，国民党各路军队纷纷向高兴圩地区逼近，重兵密集，把红一方面军主力压缩在以高兴圩为中心的方圆数十里狭小范围内。红一方面军已处在北、东、南三面受敌和西临赣江的危险境地。能不能突破敌军的严密包围圈，关系到红一方面军主力的生死存亡，成为放在毛泽东、朱德面前的严重课题。

毛泽东、朱德对面前的敌情作了冷静的分析，认为陈诚、蔡廷锴、赵观涛和蒋鼎文等部战斗力强，不易突破，而东面由龙冈向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由第二次“围剿”时的王金钰部改编而成）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弱。他们决定将原定迂回敌军侧后的计划改为实行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方向突进。这是一个险着：南北都有强大的敌军，中间只有二十公里的空隙可以穿过。为了造成对方错觉，红军以少量部队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红一方面军主力却在八月五日晚出其不意地连续急行军一夜又半天，翻越崇山峻岭悄悄东进，穿过国民党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之间二十公里的空隙，于六日中午到达莲塘，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

国民党军对于红军主力的东进毫无察觉。红军一到莲塘，就发现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一个旅正毫无戒备地开向莲塘，决定集中兵力迅速歼灭该敌。七日拂晓，朱德、毛泽东指挥方面军主力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全歼该旅和上官云相听到枪声后派来侦察的一个多营，击毙旅长谭子钧，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莲塘战斗后，朱德、毛泽东挥师乘胜北进，包围驻在良村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当天下午一时，攻占良村，歼灭该师大部，击毙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守军残部逃向龙冈。

这两次战斗胜利后，毛泽东“估计敌在我莲塘、良村战后，必将调兵东向，找我主力决战。善战者自然应该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敌军大部调往东边，以便我向西打敌人的后方薄弱之处。于是，我们就选择了更靠东边的敌军毛炳文部为歼灭对象。”（25）红一方面军主力以三天行程奔袭毛炳文师所在的宁都黄陂。八月十一日，冒大雨进攻，一举突入黄陂，歼灭毛炳文师两个团；乘胜追击，又歼其一部。第二天，方面军总政治部发的《黄陂战斗捷报》中说：“三次战争，我红军于八月七日在良村、莲塘消灭敌人之第三路进击军两师，取得第一步胜利后，接着于八月十一日在黄陂击溃敌之毛炳文师全部，缴得步枪三千五百余支，手花机枪、水旱机关百余挺，无线电机一架，其他军用品无数，俘虏官兵六千余人。黄陂战争，我军开始猛攻，只一个钟头即将敌师全部打败”。（26）

从八月七日至十一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莲塘、良村、黄陂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歼敌八个团一个营共一万余人，缴枪逾万，从原来的被动局面中夺回了主动权。

红一方面军主力突然进攻黄陂时，毛炳文和他的参谋人员慌忙撤走，连机密文件也来不及带走或烧毁。方面军参谋处从毛炳文师部缴获战斗前两小时才收到的一份紧急电报，是第六师师长赵观涛和第十师师长卫立煌发出的，内称这两个师正向黄陂开来，已进到离黄陂十公里的砍柴岗，中间只有一座大山之隔。毛泽东、朱德研究后，断定国民党已将主力掉头东来，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黄陂地区。他们立刻下达紧急命令：红军停止追击，迅速打扫战场，当夜撤出黄陂，向君埠以东君岭脑地区隐蔽集中待机。红军主力撤出黄陂的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四个师赶到黄陂。由于红军已经转移，他们又扑了空。接着，国民党其他军队也对黄陂、君埠地区形成东、南、北三面密集的包围圈。

这样，红军又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合围的十分危险的境地。正如中共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所说：第三次反“围剿”以来，红一方面军指战员“两个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27)八月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在君埠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应该避免同超过红军数倍的敌军决战，而要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用一部分兵力继续向东牵开敌军，掩护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回到兴国隐蔽待机。

会后，毛泽东、朱德针对蒋介石、何应钦“深恐我军东出抚州（即临川）”的考虑，命令红十二军装作红军主力，大张旗鼓地向乐安佯动，使国民党军队产生错觉，以为红军主力要北攻临川，吸引他们向东北方向调动。毛泽东、朱德却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迎着正向东大举开来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寻找空隙，悄悄地向西疾进。疾进时，

严格规定不准点灯，不准抽烟，不准发出大的声音，从蒋光鼐的第一军团和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两部之间只有十公里的狭窄缝隙中穿越过去。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再次突破重围，安全转移到兴国东北部的白石、枫边地区，在深山密林里休整。红一方面军主力采取这样大的行动，从这样小的夹缝中穿插过来，丝毫没有被敌军察觉，充分体现了指挥员的高超指挥艺术和部队的良好素质，也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支援和对敌军封锁的高度政治觉悟。

这时，国民党军队仍以为红一方面军主力还在东线，全力猛追。当方面军主力已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背后的白石、枫边地区得到休整的时候，红十二军继续牵着“进剿”军的鼻子往东北走，攀山越岭，忽东忽西，疲惫敌军。正如当时缴获国民党军官的家信中所说：“这一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病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28）到八月底，蒋介石、何应钦才猛然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早已西去，急忙命令“进剿”军主力又掉头向西，再到兴国北部地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已在白石、枫边地区从容休整了半个月。九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三县之间的均村、茶园冈山区隐蔽集结。

国民党“进剿”军主力一再扑空，使他们精疲力竭，士气低落，已无力再在根据地同红军作战。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宁粤两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两广方面的联军趁蒋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苏区之际大举北进，进入湖南。鉴于上述种种情况，蒋介石决定“一面牵制江西境内”红军，“一面移师赣粤边区阻止叛军扩张”（29）。九月四日，

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决定，命令左、右翼两集团军实行退却。

国民党军队的撤退，正是红军反击的大好机会。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九月七日，红军一部在泰和县老营盘歼灭北撤的国民党军队第九师一个旅。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兴国县高兴圩向蔡廷锴指挥的两个师发起攻击。但这一仗打得很艰苦，经过两天激战，双方死伤都近三千人，打成一个对峙。打成对峙的原因是：蔡部战斗力强又占据有利地形，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这是一个教训。十五日凌晨，方面军主力转移到东固以南的方石岭一带，抢先控制有利地形，截住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一部，激战到九时，全歼该部，师长韩德勤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潜逃。其他各路进军纷纷撤出根据地。至此，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被打破。

第三次反“围剿”，是在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突然发动进攻而红军正分散在远离原根据地的闽西而又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始的。国民党参加“围剿”的军队，人数比红一方面军多九倍，而且包括了陈诚等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红一方面军打破第一次“围剿”只用了一个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用了半个月，而打破第三次“围剿”用了三个月。情况最严重时，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但红一方面军坚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在地方武装和根据地民众的配合下，灵活机动地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先后进行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六次战斗，除高兴圩打成平手外，都取得很大胜利，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七个团，共三万余人，其中俘敌一万八千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蒋介石提出的“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誓言，又一次破了产。

打破敌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后，红一方面军都乘胜解放一些新的地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第三次



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到瑞金叶坪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并在十月十一日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十月十四日，他们下达训令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劣绅的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30)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红军先后解放会昌、寻乌、广昌、上杭等县城，并在长汀、于都、武平等县普遍开展了工作；相继共拔掉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炮楼，巩固了后方。

这样，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中央苏区）。它的范围扩展到二十八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十五座县城，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动员了一万二千名群众参加红军，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一方面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争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红军在这三次反“围剿”中的丰富经



验，作出重要的理论概括。他写道：“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31）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各方面的具体路线都已大体形成，从而把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具体化。从红军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土地改革的政策，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都已提出明确而系统的、切合中国实际的主张。这是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的复杂环境中，严格遵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成果。终于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刘亚楼：《伟大的第一步》，《星火燎原》（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 5 月版，第 3 页。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版，第 48 页。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0 月版，第 38、41 页。

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 年 12 月 28 日。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0 月版，第 38、41 页。

谢慕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文史资料选辑》第 45 辑，中华书局 1964 年 4 月版，第 45 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版，第 143 页。

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 年 9 月 3 日。

《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 4 月版，第 143 页。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5 月版，第 300 页。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版，第 63 页。

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 年 9 月 3 日。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版，第 64 页。

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 年 4 月 19 日。

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 年 9 月 3 日。

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 年 5 月 13 日。

《曹丹辉日记》，《江西党史资料》第 18 辑，第 182 页。

《总前委第一次会议纪要》，1931 年 5 月 25 日。

《总前委第二次会议纪要》，1931 年 5 月 26 日。

《总前委第三次会议纪要》，1931 年 5 月 28 日。

(21)《总前委第六次会议纪要》，1931 年 6 月 2 日。

(22)《关于第三次赣南“围剿”之经过情形》，《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 2 辑，第 33 册。

(23)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3 月版，第 61 页。

(24)《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219 页。

(25)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3 月版，第 65 页。

(26)周以栗：《黄陂战斗捷报》，1931 年 8 月 12 日。

(27) 苏区中央局关于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经过给中央的电报，1931年10月18—24日。

(28) 《白军官长的九封信》，《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第237、238页。

(29)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著：《剿匪战史》（1），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第159页。

(30) 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10月14日。

(3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04页。

### 十三、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上）

打破国民党军队三次大规模“围剿”后，“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已取得重大发展。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联结成一片，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也都有相当规模。客观形势需要建立起一个对各根据地实行统一领导的机构。

中共中央早就急于成立全国性的政权，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五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没有出席而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会上成立苏维埃大会准备委员会。当时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李立三认为，中央政府应当设立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随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纠正，这件事暂时被延搁下来。

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中又把“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区政府对抗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与实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作为“苏区最迫切的任务”。筹备工作改由中共苏区中央局负责进行。六月一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在八月一日召开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但不久因为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大会又在六月下旬决定改到十一月七日举行。

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刚刚失败，日本突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在四个多月内占领我国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这个严重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在九月二十五日联名发表文告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坚决主张抗日。

可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而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看作主要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也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而把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他们一味强调所谓“进攻路线”，在王明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把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以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

这样，就使革命根据地内的状况大大复杂化了，也使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也就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中共中央八月三十日来信所说中央苏区的严重错误在于

“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五个决议案。虽在原则上肯定红军取得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但重点是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来信对中央苏区的批评，并从各方面加以展开。

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说道：“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认为：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在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

在根据地问题上，他们把“傍着发展”的正确方针当作右倾保守来反对，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同湘赣等苏区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这样来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

在军事方面，他们指责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写道：“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这种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提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当由各军政治部管理。”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

几个决议案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实际上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左”倾教条主义支配下的中共中央对它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也正在步步加强。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

尽管如此，中共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得很不够。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临时中央在给中央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批评中央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中没有能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说：“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

赣南会议前，苏区中央局曾致电中共中央，“望派一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临时中央经过讨论后致电苏区中央局：“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经过苏区中央局同临时中央商议，将原来规定的“江西苏维埃主席”改成项英。毛泽东是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他的前进道路，显然将十分艰难曲折。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红军部队，以及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共六百一十人。会议开幕那天上午，举行了阅兵典礼。下午，项英致开幕词。晚上，毛泽东和代表们一起参加提灯庆祝晚会。

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报告回顾并总结了中央苏区过去的工作，认为：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的所在地，它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指出：在中央苏区，建立了强有力的工农红军，他们依靠苏区广大群众的力量，连续击破了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围剿”，战胜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开辟了红军战争史上的新纪元。在中央苏区，已经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同时，也说到中央苏区存在着错误和缺点，有待纠正。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有利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在这种新形势下，必须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巩固和扩大红军，必须使苏维埃政权真正变成工农群众的政权，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加强反帝运动及职工运动的工作，必须纠正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等等。

大会主席团于十一日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等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讨论，依据临时中央有关宪法大纲的来电原则，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并经大会通过。会上还通过了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张国焘等六十三人组



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在二十日闭幕，由毛泽东致闭幕词。

这次大会制定的《宪法大纲》，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些规定，虽然受到中共中央“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笼统地把一切剥削者都排除在政权之外，但这个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工农大众当家做主的中央政府，并具体地规定了劳动人民在各方面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和《经济政策》等，以法律的形式把土地革命中实行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政策固定下来，并规定工农大众享有的劳动和取得物质待遇等种种权利，但其中也有一些“左”的政策规定。如《土地法》中宣布“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还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影响了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

根据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处理日常政务，并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代表大会闭幕后，十一月二十五日，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任命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十五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

委)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但张国焘一直没有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职。会议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时,各个革命根据地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和各路红军的统一指挥,在政治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代表大会通过的一系列法规和决议案,在初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临时中央政府和各根据地的立法和施政方针确定了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然而,临时中央的主要着眼点却在于过分夸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力量,片面强调苏维埃同国民党政权的对立,急于取得在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由他们起草而经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包含的一些过“左”的政策,对根据地的发展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发生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和中共秘密特支领导下发动的宁都起义。像这样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地投入红军,过去还不曾有过,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希贤(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党的主张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影响。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西北军的主力之一孙连仲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在第二次“围剿”时被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进

攻。在作战过程中，许多官兵受到红军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国东北，又引起他们强烈的民族义愤；蒋介石对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处歧视和压制，更激起他们的愤慨。宁都起义后不久，季振同曾对萧劲光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

十二月上旬，毛泽东已得知第二十六路军即将起义的消息，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针对有人提出的争取一个旅起义的主张，要求尽量做好工作，争取组织“全部暴动”。十一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会见第二十六路军内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袁血卒）。袁血卒回忆道：

“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和刘伯坚走在后边，我轻声问：‘毛主席是什么主席？’他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我接着又问。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地答：‘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

“毛主席的住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第一句问话是：‘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是。1927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

“随后，毛主席问起地下党的情况。”“刘伯坚同志插话说：‘我在西北国民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毛主席称赞说：‘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

“毛主席……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

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听主席这样一问，我一时回答不上，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有把握！’‘有好大的把握吗？’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我把七十四旅的情况向主席做了扼要汇报。”

“毛主席点点头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二十六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

十二月十四日，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人在宁都宣布起义，带着两万多件武器，开入中央苏区。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

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分，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在红五军团，同其他红军一样，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毛泽东找即将就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他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他又对即将就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经他批准，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些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

国留过学的干部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到红五军团工作，并任命刘伯坚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红五军团中原有的进步军官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批准董振堂入党。当董振堂得知被批准入党时，将三千多元私人积蓄全部交给党。军政委何长工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坚持全交，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军官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三人入党。卢寿椿随后担任了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师长，苏进担任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师长。

毛泽东十分重视采取一般士兵容易接受的形式对红五军团官兵进行教育。他派文艺演出队到红五军团中去演出，并对演出队的负责人李伯钊、钱壮飞、胡底说：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是要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当红军，要想尽各种办法向他们宣传过去是为谁牺牲，为谁送命。李伯钊等按照这个主题，编了一个《为谁牺牲》的戏，反映当时国民党军队士兵的悲惨遭遇，在红五军团各军演出后收到了很好效果。

关于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的建设，周恩来一九四三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宁暴时毛泽东领导争取五军团干部。”从红五军团后来参加历次战役时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充分证明对这支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四万多人发展到六万多人。

宁都起义发生的第二天，原在上海而没有到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秘密交通护送下进入闽西苏区。同月底，到达瑞金。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举行，着重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周恩来在到瑞金时曾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一月九日，临时中央又作出决议认定：“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十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五个师，在三个城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这样，会议就转到讨论如何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仍不同意打赣州，在发言中提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三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三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但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毛泽东又一次成为少数。他再建议可否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项英说：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我问过彭德怀可不可以打下赣州？彭德怀回答：“赣州守军马（崑）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

增援，是可以打下的。” 会议按照多数人意见，决定打赣州。这是苏区中央局执行中央“进攻路线”的第一个军事行动。

一月十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中革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赴前线督战。有人在途中还谈道：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帐。

一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谈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却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的来势很猛，毛泽东沉默，一言不发，使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会议在中途更换主持人。(21)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会后不久，他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他的请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一月下旬，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但两件大事仍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一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继续扩大对中国国土的践踏，一件是几万红军攻打赣州的安危。

上东华山后没有几天，毛泽东就从报上看到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他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写道：“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指出：“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22)这个宣言仍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所以拖到四月十五日才得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

上东华山后，他更关心的是红军攻打赣州的作战情况。三月上旬的一天早晨，细雨蒙蒙，项英骑马从瑞金赶到东华山，告诉毛泽东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红军已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并把前线发来的急电交给他。中革军委的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立刻带着警卫班下山，冒着风雨赶回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原来被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晚，他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的意见，已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支援下，使红三军团脱出险境。

中央红军这次攻打赣州历时三十三天，城未攻下，伤亡达三千多人。毛泽东到前线指挥部后，经过调查，提议苏区中央局在前线召开会议，讨论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三月中旬，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赣县江口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他这种主张，是要转入外线的进攻作战，以“出击求巩固”。但另一些人仍认为，红军攻打赣州是依据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虽从赣州撤围，并不是不再打赣州了；红军还是要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要夺取中心城市的，主张红军开到湖南去。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也没有把部队开到湖南去，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



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分率中路军北上。朱德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曾赋诗《经闽西感怀》，对毛泽东这次意见遭受否决表示惋惜：“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朱德在注释中说明：“这首诗第一句以下各句，都是毛主席当时的指示精神”，“但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

当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薄弱环节，除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闽西的红十二军刚占领了上杭、武平两县，守城的地方部队被击溃后退往广东。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发生的变化，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他在率领红一军团北上宁都集中的途中，向军团领导人林彪和聂荣臻阐述中路军向闽西发展的主张，并得到他们的赞同。林、聂在三月二十一日向中革军委报告：“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日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毛主席意见。”（24）红一军团随即进抵闽西长汀待命。

三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分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会后，毛泽东赶到长汀。他向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时，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如向南发展，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

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央局决定由我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25)

在长汀进一步了解福建境内情况后，毛泽东在三十日又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电文说：

“恩来同志：（一）电悉。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二）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三）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五天；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四）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一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七师望催兼程来汀，若七师不取齐，一军团下漳州更单薄。（五）我明日去旧县晤谭（震林）、张（鼎丞）。泽东 西三十日”（26）

对攻打漳州，有些人很有顾虑：惧怕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整个根据地被占。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刻从瑞金赶到长汀，在四月一日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政治意义。他还说明：“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27），会议又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随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为了组织好这次战役，毛泽东在会后带警卫排星夜从汀江坐船赶往上杭。警卫员吴吉清回忆道：

“这时候，我们的心情都一样，望着这滚滚的江面和乌云密布的夜空，有谁不为主席的安全着急呢？”“只听他很风趣地一字一板地对老船工说：‘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了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您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罗！’”“夜空里，突然间飞来两响刺耳的枪声。”“紧接着，西岸大山的悬崖之上，也打过两声冷枪，好像在回答对方的问讯。看着这个情景，我们都知道进入了被红军打散的敌军残部的封锁线了，便立刻掏出驳壳枪来，把身子贴伏在船沿上，做着应付一切意外的战斗准备。并且在船上仅有的这一小块地方，给主席和随行的陆定一同志做好了掩护。可是，主席非常镇静，他让我们把枪收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低声说：‘敌人打冷枪是搜索情况，我们只装作没听见。这样就是胜利。不要忘记，我们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留着这伙残敌，让我们的赤卫队去收拾好了！’”“就这样，我们说说笑笑地到了上杭。”（28）

毛泽东一到上杭，经过调查，又致电周恩来：“敌一部既入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于十四到龙岩。”“中央局、军委宜移长汀。”（29）

四月十日拂晓，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消灭守军张贞部近两个团，在下午攻占龙岩城。第二天，他致电周恩来，报告在龙岩取胜的原因，说明将在这里休整两天，待主力会合后，“即直下漳州”。并指出：“目前粤敌是对江西取攻势，对福建取守势。但我军入漳，必能诱动该敌。”（30）

根据中革军委的紧急命令，红五军团昼夜兼程，在十四日如期到达龙岩，同红一军团会合。毛泽东立刻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从龙岩到漳州的供应线，第三军随红一军团南下进攻漳州。

毛泽东为什么断定可以“直下漳州”？漳州虽是闽南重镇，地处九龙江的入海口，交通便利，贸易发达，但地势平坦，没有城墙，易攻难守。张贞部第四十九师两个旅和一些地方部队约一万人，孤立无援，主要依托漳州西北的天宝山一带外围丘陵地区进行防御。

红军经过实地调查，在四月十九日拂晓，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守军主要阵地，向纵深方向扩展。张贞见屏障尽失，大势已去，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而逃。二十日，战斗胜利结束，红军占领漳州城。

漳州战役中，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副旅长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七十四人，缴获各种枪二千一百余支、各种炮六门、子弹十三万发、炮弹四千九百发、无线电台一部，还缴得飞机两架，其中一架能飞，红军曾用它飞到厦门上空散发传单。这一次胜利影响很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南靖一线，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31）

入城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东路军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入城后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战利品；搜查反革命分子；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政策，分发谷物给群众，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向地主豪绅筹款；严格执行入城纪律，维持革命秩序。二十二日下午，他又向东路军总部、红三军、红四军的连以上干部作报告。他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32）

红军是在农村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进了漳州这样的城市后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尽管毛泽东已估计到有人会把农村斗争的一套搬到城市中来，进城时就要求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注意群众纪律，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出在打土豪上。毛泽东一发现，立刻抓住实例，坚决加以纠正。当时担任团长的杨成武回忆道：

“我们打土豪，出了纰漏。从山区来，语言不通，特别是头一次打下了漳州这样的城市，谁是土豪？开始，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类似这些问题，其他部队几乎都有发生。毛主席发现后，在他的住地，原漳州市立第三中学即现在龙溪地委机关内那座小楼门前的草坪上，召集了一个连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毛主席在会上讲了很多话，其中最主要的是说打土豪，你们打错了很多，有的不是土豪，属于华侨。（那时规定一条，不没收商店、不没收华侨资本家的商店，但可以要他们捐款。）毛主席说，你们为什么搞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第一个原因，没有认真地很好地调查研究。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听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还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本地话。毛主席说：越是不懂话，就越要调查研究。”“我们团抓的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只有五六个是土豪，其他都不是，就给他们赔礼道歉，请吃饭，然后都放了。我们在进漳州的路上，看到一些香蕉、甘蔗，以为是资本家的，给吃了，也都统统赔了钱。这样，党的政策就贯彻得很好了，留下的影响很好，群众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这是一件比较大的事。”（33）

毛泽东在漳州规定的城市政策 ,比一年多前打开吉安时规定的政策更加完善了 :强调商店照常营业 ;对一般工商业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聂荣臻回忆说 :“ 当时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有一座商店 ,派了他的款 ,他开始不交。我们只是派人进入他的商店 ,取走相当于所派款项的罐头、胶鞋等给部队吃用 ,仍令其继续营业。后来全国解放见到陈嘉庚先生 ,他说起这件事 ,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认为红军当年在漳州是讲 ‘ 信用 ’ 的。 ” (34)

毛泽东在漳州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就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 ,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著作。当时陪同他去找书的漳州中心县委书记曾志回忆说 :

“ 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 ,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 ,这个好 ,那个好 ,找了好多书 ,恐怕有好几担书 ,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两种策略》、《 “ 左 ” 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 ” (35)

这些书运到中央苏区后 ,毛泽东不但自己读 ,有几本书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看。彭德怀回忆道 :一九三三年秋天 ,“ 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种策略》 ,上面用铅笔写着 (大意) :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 ,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 ,他又寄给一本《 “ 左 ” 派幼稚病》 (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 ,他又在书上面写着 :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 ,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你看了《 “ 左 ” 派幼稚病》才会知道 ‘ 左 ’ 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 (36)

东路军在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 ,发动群众 ,筹集了款项一百多万元 ,动员了近千群众参加红军 ,还调拨几百支枪给闽南游击队 ,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

同样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的，打漳州是正确的？为什么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却主张打漳州？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城市的具体条件不同。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道：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37）

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龙岩、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在四月十一日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他刚讲到中央区“狭隘经验论障碍新路线的执行”，一个中央常委就插话说：“中央区的领导，我以为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布尔什维克的认识的。中央区是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虽然没有文件上表示出来），这是与国际指出目前是民主的革命工农专政、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义是原则上的不同。这在土地问题上、党的问题上、职工决议上、反帝问题上都表现出来。因此，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另一个常委又说：“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38）他们的意思是说：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



义”的路线高度。会后，临时中央连续在四月十四日和五月二十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

项英带着临时中央的批评意见，从上海回到中央苏区。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收到临时中央四月十四日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电中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一面准备接受中央批评，一面将临时中央四月指示信的精神电告正在前线的毛泽东。

临时中央在这封指示信中，重申“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并说“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信中说：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的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信中提出：“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最后强调地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39）

毛泽东接到来电后，断然认为：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党的任务的规定和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是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他在五月三日复电苏区中央局：

“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第一，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

“第二，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



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40)

这份复电里，毛泽东提出了在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这是在新条件下作出的一个重要概括，是对江口会议上提出以“出击求巩固”思想的发展。

苏区中央局没有能像毛泽东那样坚决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五月十一日，中央局在长汀作出决议说：“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中央局承认“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41)

这时，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开始了。他们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企图得手后再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六月初，在中央苏区的周围，国民党集中了四十个师以上的兵力，粤军已向北进攻赣南。毛泽东率东路军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

毛泽东回到长汀，看见苏区中央局五月十一日的决议，十分不满，而这个决议是在他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他在九年后曾写道：“六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42)

东路军回师后，红军编制作了调整，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这三个军团，由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没有恢复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仍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在赣南前线，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解决入赣敌军”的意图，组织了南雄、水口战役。七月上旬在赣南、粤北的南雄、水口等地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入侵赣南的粤军退回南雄。聂荣臻后来说：“粤敌经过这次教训，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我赣南根据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时间，这对于我们尔后的北线作战是很有利的。”（43）但这次战役由于兵力不够集中，没有能大量地歼灭敌人，红军自身的伤亡也相当大，只打成一个击溃战。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赶到前线。后方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鉴于中央局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44）但中央局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再次写信向中央局进一步陈述：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信中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45）

八月上旬，毛泽东在兴国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的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或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临川），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

军反“围剿”斗争。这次中央局会议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会后，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任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中革军委根据兴国会议精神，在八月八日下达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领红一方面军佯作向西行动以迷惑对方，主力却秘密北上，经过一星期的急行军，到达乐安附近，对方还没有察觉。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签发训令，突然向乐安县城发起攻击。十七日，攻克乐安。二十日攻克宜黄。二十三日又乘胜占领南丰。

乐安、宜黄战役是成功的。这一仗，行动隐蔽，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俘虏五千多人，缴获长短枪四千余支以及一批军用物资，创造了在一周内连克三座县城的成绩，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乐宜战役取得胜利后，下一步如何行动？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在后方的成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毛、朱、王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计划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集结的地区推进——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准备打开赣东局面。当红一方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国民党军队已在这里集中三个师准备固守，并有援军赶来，当地地形也不利于红军作战。周、毛、朱、王立刻当机立断地改变攻打南城的计划，将红军主力退却到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随后又撤至宁都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寻求战机。

可是,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不同意前方的布置,批评他们在撤围南城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撤退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决定”,“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46)他们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以减轻“围剿”军对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在前方的周、毛、朱、王在九月二十三日复电苏区中央局,明确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相隔一天,苏区中央局再电周、毛、朱、王,说:“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可以演成严重错误”。(47)

同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作战计划,并强调指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48)

毛泽东、朱德根据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在二十六日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49)这是一个符合前线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

苏区中央局对红一方面军这个训令十分生气,又收到临时中央七月二十一日长信和九月下旬要求在敌军合围

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50）

十月三日至八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没有留下记录，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51）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坚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52）把他五月三日复电中对临时中央的反批评斥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会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承认前方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有等待倾向，但指出后方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

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因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53)

会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正当宁都会议期间，临时中央常委会在十月六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批评道：“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还强调：“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54)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

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这个指示电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回后方。留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十月二十六日，临时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第二年六月上旬，在宁都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时，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但博古作的结论中重申那次是正确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55)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到宁都会议，说撤掉军职“是

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这完全是一种“高慢的宗派主义”。(56)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毛泽东在十月中旬抵达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院长傅连璋安排下住进老古井医院休养所——一栋两层的花园小楼房里。他一到医院，就去探视在这里分娩的妻子贺子珍。在休养所里，还住着正在养病的周以栗、陈正人，他们也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打击。三个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聚谈。毛泽东毫不隐讳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当时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划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57)

他还同在福音医院治伤而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长谈了一次，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罗明回忆道：

“他概括地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上杭、永、岩（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58)

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省委立刻决定派罗明

为特派员到杭、永、岩一带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他到那里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等。这在后来被认为是所谓“罗明路线”的“铁证”。当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时，途经上杭，罗明去迎接他。博古就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回答：“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博古问罗明对当前斗争有什么意见，罗明谈到要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他还没有讲完，博古便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59)博古到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毛泽东。博古又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这些，预示着毛泽东的处境将更加困难。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64页。

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1931年9月25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06页。

任弼时在延安整风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43年11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20—221页。

中共苏区中央局1931年10月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2、773页。

萧劲光：《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6月28日。

袁血卒：《“宁都兵暴”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3—196页。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97页。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02页。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6月28日。

《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

(2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73页。

(22)《郭化若军事论文选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72—73页；访问郭化若记录，1982年3月12日。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636、637页。

(24)《红一军团关于完全同意毛主席的行动方针的报告》，1932年3月21日。

(25)《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0—141页。

(26)毛泽东对一、五军团行动的意见致周恩来电，1932年3月30日。

(27)《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0页。

(28)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100、103、104、108页。

(29)毛泽东关于一、五军团行动与中央局、军委迁移长汀等问题给周恩来电，1932年4月2日。

(30)毛泽东关于龙岩战斗胜利原因和岩永今后工作问题致周恩来电，1932年4月11日。

(31)毛泽东对今后行动方针和新区、白区工作的意见致周恩来电，1932年4月22日。

(32)《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6页。

(33)《杨成武谈红军东征攻打漳州》，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5期。

(34)《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7页。

(35)访问曾志记录，1987年11月。

(3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83页。

(37)《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0页。

(38)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32年4月11日。

(3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93—201页。

(40)毛泽东关于对政治估量、军事战略和东西路军任务的意见致电苏区中央局，1932年5月3日。

(4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09—219页。

(42)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1941年上半年。

(43)《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5页。

(44)《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79页。

(45)周恩来：关于池江、水口两次战役初步总结及组织问题给苏区中央局的信，1932年7月29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议由毛泽东任总政委的电报》，1932年7月25日。

(46)任弼时、顾作霖对方面军行动的意见致前方电，1932年9月7日。

(47)苏区中央局复前方电，1932年9月25日。

(48)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中央局电，1932年9月25日。

(49)红一方面军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1932年9月26日。

(50)《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

(51)苏区中央局致前方电，1932年9月29日。

(52)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18期，第52页。

(53)《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

(54)中央常委会记录，1932年10月6日。

(55)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1月。

(56)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9月15、16日。

(57)《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71页。

(58)《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20页。

(59)《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21页。

## 十四、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下）

进入一九三三年，当湘鄂西和鄂豫皖两个苏区的红军主力相继退出原有根据地后，蒋介石便集中五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同时进一步加紧经济封锁。他们把这两手同时并用：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中央苏区军民面临着打破敌人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两大任务。打破军事“围剿”，由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指挥。打破经济封锁这副艰难的担子便主要地落到毛泽东的肩上。

这时，中央苏区内部的状况已发生一个重要变动。一月下旬，在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博古等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已难以立足，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二月中旬，被擢在长汀休养了四个月的毛泽东，接到召他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命令。他带着贺子珍，孩子及警卫员一同回到瑞金，住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村。但把他调回来工作其实是有条件的。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临时中央或苏区中央局在上年十一月留下的一份残缺的电报，里面写道：“我们可以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可见，他是在得不到信任的困难条件下重新出来工作的。

毛泽东一出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首先抓的是要使人民委员会的机构正常运转起来，解决各部的散乱问题，以实现打破国民党当局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任务。二月二十六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举行第三十五次常会，决定：

“一、议决对国民党军阀向苏区与红军的大举进攻大烧大抢及经济封锁（尤其是断绝食盐）的残暴政策，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工农群众，坚决反对，一致的来粉碎敌人的进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只有这样才能将敌人烧杀抢劫及经济封锁的野蛮残暴政策归于消灭。

二、议决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向富农募捐，以充实粉碎敌人四次进攻的战费。

.....

七、为加强中央各部的工作，议决责成各部迅速召集各部会议，以检阅过去工作，讨论今后行政实施方针，并健全各部组织。”

会后，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为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告群众书，号召苏区民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用一切力量帮助前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同时加紧春耕，设法输出本地土产、输入油盐洋布，并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有组织地进行买卖，来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在临时中央政府各部工作开始正常运转起来后，毛泽东立刻抓紧督促检查，健全各种工作制度，要求各部制定工作计划，每月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如：责成教育部即日颁发各级教育部的组织纲要，健全教育行政系统；责成土地部立即检查各地的春耕运动情形；责成国民经济部即日起草组织纲要及目前工作方针等。这样，政府各部日益发挥起各自的职能作用。

这段时间内，周恩来、朱德在前线，顶住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再命令他们强攻南丰的压力，率领红一方面军在黄陂和草台冈先后打了两次成功的大兵团伏击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近三个师，二万八千人，其中包括陈诚

的精锐部队 ,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 围剿 ” 的巨大胜利。

局势本来正在向有利方面迅速转变。但是 ,进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却置这些于不顾 ,反而在“ 进攻路线 ” 的旗号下 ,声势浩大地批判起所谓“ 罗明路线 ” 来。他们抓住罗明一月下旬向省委所写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 ,在二月十五日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 ,闽粤赣特委改为临时省委 ,不久由罗明任书记。第二年二三月间 ,福建党代会上成立福建省委 ,罗明任省委代理书记。此处所说闽粤赣省委实际上是福建省委。 )指责省委内“ 小部分同志中 ,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 ” ,决定“ 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 ,并撤销他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 。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 ,随后也被撤职。

接着 ,临时中央又开展反对江西的“ 罗明路线 ” ,主要是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他们中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 ,在“ 赣南会议 ” 上就曾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 ,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以后 ,他们又依据实际情况 ,在军事上主张“ 诱敌深入 ” 来消灭敌人 ,不赞成把敌军挡在根据地大门外硬拼 ;在工作上主张对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应当有所区别 ;在土地分配上仍然坚持“ 抽多补少 ,抽肥补瘦 ” 的原则等。从而被认定是“ 江西罗明路线 ” 的代表人物 ,被指责为“ 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 ” ,“ 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 ” 。接着 ,又把萧劲光当作红军中的“ 罗明路线 ” 代表来批判 ,开除党籍和军籍 ,还判了刑。十几年后 ,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说道 :

“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讲到这个问题：

“对干部问题，我只讲到一个问题，如罗明路线，究竟是怎样了，到现在还没有明显指出。他只是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路线问题。再还有些做了一件好事，还要说他是做了一件坏事。如罗明路线在江西，更是说得过火，如对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等同志的问题，对萧劲光问题，还有很多，后来发现七个书记撤职。这些都说明过去对干部问题是有错误的。那时，有些人无形中说什么毛派，也是不对的。”

反对罗明路线的矛头实际上指向毛泽东，这是许多人都看得清楚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公开地点名批判毛泽东？临时中央不是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毛泽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过一个电报干预这件事：“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这才使他有可能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但他境况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以很大的精力来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

这在当时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那时候，中央苏区大体上有三百万人口，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十万多，不发展生产怎么行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极其重视。原来担任《红色中华》主编的王观澜回忆道：“生产如何发展？与战争如何结合？战争第



一，生产、生活如何办？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些问题不解决，革命战争能不能维持，就成为大问题。”

为了消灭中央苏区，国民党政府在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经济封锁，企图使中央苏区军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造成经济枯竭，无法生存下去。一九三二年起这种经济封锁更加紧了。“企图建立纵深二百六十里的封锁网，在苏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每人每天只买盐三四钱，每月不得超过一斤，把群众的粮食搜掠到反动的堡垒里去。”严密的经济封锁给中央苏区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大：“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出来的稻谷、花生、大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而苏区的食盐、洋布、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当时流行一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由于工业品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和红军的给养。”

一九三一年底，临时中央一些“左”的经济政策推行到中央苏区来，更是雪上加霜。到一九三三年春夏，中央根据地经济严重恶化：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

这便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严峻局面。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毛泽东先从健全领导机构着手。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常会决定：“为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以适应革命的发展，议决呈请中执委批准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并委任邓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命令指出：“过去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予以迅速的转变。”四月，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成立，下设设计局、调查统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国营企业局和对外贸易处。七月二十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中央政府通告，强调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

展,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的政策,去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抵制奸商的残酷剥削,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这一重大任务,是迫切摆在整个苏维埃与广大工农群众的面前。”

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召开两次大会:一次是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瑞金举行;一次是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在博生县(原宁都县)举行。这种经济建设大会,以前在苏区是没有开过的。

毛泽东在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就是这个报告中的重要部分。报告从根据地实际情况出发,指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也是为着改善群众的生活。他尖锐地批评了战争忙“没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要等战争胜利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错误认识。要求各级政府抓紧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领导方式上要群众化,反对官僚主义;在工作方法上要和群众商量办事,反对命令主义。他强调指出:

“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这两次经济建设大会召开后,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具体指导下,中央苏区出现了蓬蓬勃勃的群众性经济建设热潮,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发展起来。

毛泽东把大力发展农业作为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任务来抓。王观澜回忆道：“毛泽东同志抓政府工作时，抓得很紧。农业生产当时主要是劳力问题，雇零工平时一天要三至四毛，到割禾时，一天两三元也雇不到。红军家属虽有耕田队帮忙，但也时常发生不能及时解决耕种的问题。地方工作越先进，参军的人越多，壮劳力也就越少，生产就越困难。所以，毛泽东同志重点抓了创办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常亲自讲演，予以提倡、推广。换工本来在民间早有习惯，犁牛合作社是以查出多余的牛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有一个章程，对使用管理和喂养耕牛都有具体规定。但农忙时，劳力还感不足，以后就发动妇女参加劳动，抓典型，奖励推广。江西妇女原没有下田的习惯，通过动员，妇女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成了一支生力军。就这样，解决了农业生产中劳力不足的问题。一九三三年，全苏区农业生产平均增产一成半，红军给养有了保证，一九三四年那一年，农业生产也是大丰收。”

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也是放在中央苏区经济工作面前的一项严重任务。由于这种严密的封锁，造成中央苏区内盐、布、西药奇缺，而粮食、钨砂、烟、纸、樟脑却出口困难，直接影响了群众和红军的生活，影响了革命战争。有人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很重视这项工作，号召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发展对外贸易，把粮食、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输出到白区去，卖得适当的价钱，从白区购买必需品，如食盐、布匹进来，分配给人民，打破敌人的封锁。当时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同志，副委员长陈云同志、朱琪同志都亲自抓这项工作。”他们采取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

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沟通了中央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活跃和发展了苏区经济。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农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

此外，财政、金融、手工业、兵工厂、邮电、交通、医药、卫生等事业都有一定的发展。

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中（《毛泽东选集》中的《我们的经济政策》是报告的重要部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结论的一部分），总结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经验，明确指出：

“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

“现在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 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 ,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 ,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 ,粮食和钨砂的输出 ,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 ”

“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 ” ,“ 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 ,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 “ 同志们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是群众 ,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 ,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 ,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

这些方针政策 ,不仅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而且在实际上逐步形成一种根本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

对政权建设 ,毛泽东也投入了巨大精力。

第一次全苏大会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已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 “ 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 ”。

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 ,规定 “ 第二次全苏大会以前应改选各级地方苏维埃 ”。七月二十一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作出《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 ,强调 :苏维埃政府 “ 须尽量接近群众 ,为群众谋一切利益。因此 ,不论乡、区、县、省 ,区域都不应过大 ”。行政区域划分完毕后 ,立刻开始进行选举。

八月九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选举运动的训令。指出 :这次选举是从乡、市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实行改选。要充分发动群众 ,预先公布候选人名单 ,“ 当实行选举时 ,须按名逐一提出 ,逐一讨论 ,逐一表决 ,使选民尽量发表意见 ” ,还要收集选民关于自己实际生活和对政府政策法令意见的提案 ,在此基础上开好区、县、省三级苏维埃代表大会。

为了发动选举运动，九月六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会议，作了《今年的选举》的报告。

这样，中央根据地的选举运动便热烈地开展起来，在九、十月间达到高潮，十一月上旬基本完成。中央苏区内，共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

一切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主要是在乡这一级。那末，它们应该怎样进行工作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选举工作刚一结束，毛泽东就在十一月中、下旬，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这两个点进行实地调查，总结典型经验，来推动全局工作。他召开有各方面人物参加的调查会，走访贫苦农民家庭和红军家属，同农民一起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了解乡苏工作和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随后，写出了《兴县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两篇调查报告，把它们作为“乡苏工作的模范”材料印发给第二次全苏大会。

在长冈乡调查报告中，他写道：“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了”，“问题是怎样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他所总结的长冈乡的经验就是一个“活的榜样”。

在才溪乡，毛泽东全面总结了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他特别重视最基层的村政权的建设，指出：“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

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这样，就使苏维埃的基层政权能够形成一个周密的、同民众有密切联系的网络，最大限度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更有效地推进各项工作。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作了详细的总结。他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假如苏维埃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讨论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苏维埃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地围绕在苏维埃的周围，热烈地拥护苏维埃。”从发展革命战争的需要来看，也决不能忽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毛泽东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

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在领导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同时，还展开了查田运动。这是根据临时中央的要求开展起来的。

当时，在中央苏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情况：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围剿”和反“围剿”的拉锯式作战中，中央苏区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发展并不平衡。毛泽东说过：“依着土地革命发展的经验，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是有它的大致的阶段的，就是：一，没收分配土地的阶段；二，检查土地的阶段；三，土地建设的阶段。”在土地的没收分配工作告一段落后，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并且发动群众来做，是正常的。另一方面，中共临时中央那时已提



出“左”的土地政策，在中央苏区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又试图通过查田运动来全面推行这种“左”的土地政策。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毛泽东还在长汀时，由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发出第二号训令，就号召苏区会昌、石城等八县“重新分田”和“查田”，“限二月内全县田园，必须彻底分好，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

这就使查田运动大大复杂化了。

毛泽东回到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后，对查田运动采取经过调查、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的做法。三月，他派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王观澜带工作队到瑞金叶坪乡做试点工作。王观澜回忆说：“我在瑞金叶坪乡搞了查田运动试点，是毛泽东同志指示下搞的。”“毛泽东同志亲自来到叶坪乡视察，征求我的意见后，把叶坪乡查田运动的经验推广到三个区（云石山、壬田区、武阳区），后来又推广到全县。”

六月一日，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要求在中央苏区内普遍地深入地开展查田运动。“责成各级政府主席，用最大注意去领导整个查田运动。”“查田运动中，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着贫农，坚固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攻。”训令强调了发动群众大多数的要求，要求在通过地主富农成分和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时，都要经过尽可能多数群众的同意与参加。训令中也有不正确的内容，主要是：“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sup>(21)</sup>这实际上就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第二天，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特地指出：“党和苏维埃政权过去



对于土地问题解决的不正确路线（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等），在许多区域中土地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这就给查田运动预先定下了调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处境自然是艰难的。

为了具体指导查田运动的进行，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叶坪主持召开瑞金、会昌、于都、长汀等八县的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一日，又在叶坪召开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接着，江西、粤赣、福建等省也分别召开所属各县的查田运动大会，深入动员，并作出行动部署。

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的报告，具体阐述了这次运动的策略和方法。

对划分阶级，他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强调了两个区分：一个是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另一个是也要区分富农和地主。他说：“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他更着重地指出：“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的〔是〕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他，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提出“富裕中农”这个问题，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创见，说明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阶级状况的认识更加细致和切实了。以后，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不断发展，对正确处理中国土地革命这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起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查阶级的工作方法上，他很有针对性地讲到四个问题：

“一、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二、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在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挨家挨户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三、查阶级之前，一定要经过宣传的阶段，即讲阶级的阶段。不经过公开的普遍的讲阶级就动手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四、查阶级要发动工会、贫农团的会员及其他群众多数人去查，要群众查了随时报告贫农团与查田委员会。不应该只是少数人去查，少数人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对通过阶级的问题，他也采取很慎重的态度。指出：“通过阶级就是决定阶级成分，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故要十分谨慎。一定要是查清楚了才能提出去通过。”“如有疑问的，移到下次讨论，此次不要通过。”“如果过去有通过错了的，如把中农当富农，富农当地主，地主当富农，应该推翻原案。要在群众大会上说明过去错误了，现在改正的理由，取得群众的满意。”“如果将错就错，不肯改正，那是完全不对的。”(22)

七八月间，查田运动已在中央苏区内全面展开，土地分配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在运动发展中也出现一些偏向，主要是侵犯中农利益和把富农当地主对待。不少地方把富农的家产全部没收了。有的地方把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人或者只请过一两年长工的富裕中农也放在富农一类。瑞金城区的查田，一开始就按家按亩去查，查得中农恐慌起来，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政府请求把自己的成分改为贫农，说：“中农危险得很，挨上去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咧，隔富农就远了一点。”

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这些偏向，毛泽东在八月间发表了《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他肯定了查田运动取得的

成绩，同时指出：“侵犯中农的倾向是最严重的危险”，是“‘左’的机会主义倾向”。他也谈道：不少地方把富农当地主来对待，“这一错误的来源，是由于抹煞富农的劳动力”。“对富农的不正确观念，也无疑要影响到中农上去。”(23)

在查田运动中发生的许多问题，有些是以往的文件中缺乏具体规定或规定得不明晰，有些是工作人员对已有规定的解释不正确或在执行上发生错误。王观澜回忆道：

“起初只从表面生活来看，从政治势力来看。随着斗争的深入，才开始从剥削关系、剥削数量来分析。”(24)为解决这个问题，十月间，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六月下旬所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通过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同时予以公布。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明晰地提出了如何分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的原则，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个文件，不仅对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工作起了指导作用，在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又经中共中央重新印发，成为当时土地改革工作的指导文件。

《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是十月十日由临时中央政府通过的，对当时土地斗争中遇到的二十个实际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和解释。例如，自己劳动还是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是区别富农和地主的主要标准。《决定》中写道：“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叫做有劳动。全家有一人每年从事主要劳动的时间不满三分之一，或每年虽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劳动但非主要的劳动，均叫做有附带劳动。”又如，关于富裕中农的问题，《决定》写道：“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其剥削收入的分量，以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为限度。在某些情形下，剥削收入虽超过全家一年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

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以富裕中农论。在苏维埃政权下，富裕中农的利益，应与一般中农得到同等保护。”(25)

这两个文件，具有原则上的明晰性和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这正是毛泽东在工作作风上的重要特征。对它的意义，王观澜评论道：“这样打击面就可缩小，拥护的人就多了，可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地主、富农则下降到百分之五左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6)

毛泽东、项英等签署发出的临时中央政府公布《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的命令中写道：“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有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27)这以后，实际工作发生了很大转变。胜利县原来划定的地主、富农有两千一百十六家，十月间根据两个文件进行复查后，有一千三百多家改为中农和贫农。会昌县乌径区，由富农改划为中农的有三十五家，改划为贫农的四家，由地主改划为富农的有十八家。于都县段屋区由地主、富农改划为中农和贫农的有四十家。(28)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他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对根据地实行更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和逐步推进的新战术。他调集一百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先以五十万兵力，分北路、南路、西路从三面围攻中央苏区。九月下旬，它的主力北路军开始发动进攻，二十八日进占黎川。

这时，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已发展到八万多人，同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对比是一比六。尽管形势严峻，然而比起第三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和第四次反“围剿”时的一

比十几年来，还是要好一些。如果红军能够采取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策略，仍有可能打破这次“围剿”。

但中共临时中央却准备以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来打破这次“围剿”。五月十二日，临时中央决定增补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规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主席职务，实际上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控制军事指挥权。六月十三日，临时中央提出将中央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博古并不懂得军事，完全依靠于九月底到达中央苏区的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负责指挥作战。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要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黎川失守后又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所谓“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

毛泽东这时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他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阶段时起，就不同意“两个拳头打人”和以后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认为应该主动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但博古、李德等却急于恢复黎川，强令东方军反击。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占着绝对优势，并且包括了蒋介石许多装备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队，同他们硬拼显然是十分不利的。红军主力在硝石、资溪桥和浒湾连续多次强攻失利，陷于被动地位。

博古、李德在失利面前，不但没有从战略决策上进行检查，反而归罪于战场上的指挥员，说要找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他们追查萧劲光在黎川失守中的责任，说他是退却逃跑，主张处以极刑。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

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29)可见,这件事的矛头其实也是对着毛泽东由于毛泽东、王稼祥等坚决反对,萧劲光没有被处极刑,但仍被判处五年监禁徒刑,并开除党籍和军籍。萧劲光被关押后,毛泽东要贺子珍前往探视,并转告萧劲光说:黎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问题,“你应该撤退,做的对”。(30)萧劲光被关了一个月后,调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

这时,出现过一个对红军打破“围剿”很有利的机会:曾在上海奋起“一·二八”抗日作战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十一月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打倒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等口号。(31)在这以前他们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得不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转入福建,讨伐十九路军。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和李德继续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些中间派力量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又害怕红军主力向苏浙皖赣地区突进会造成中央苏区的丢失,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红军也因错失时机而无法打破“围剿”。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号召全党“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把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指责为“富农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向博古表示：以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似无此必要”。博古等坚持原议。

一月二十二日起，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选出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提议的改由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三月十五日，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训令，提出“在继续开展查田运动中，必须坚决反对拿‘算阶级’来代替查阶级，拿百分数的计算代替阶级斗争”。提出：“必须坚决打击以纠正过去‘左’的倾向为借口，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这些，显然都是针对毛泽东的主张来说的。训令还规定：“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32)这就使查田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又进一步发展起来，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中央苏区内的社会混乱。

与此同时，博古等继续批“邓、毛、谢、古”，追查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33)这就使许多人有了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这时，他的亲属都因受株连而遭到打击。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一直挨批，被撤职，要追查他的“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贺子珍的哥哥



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到红军大学学习。贺子珍的妹妹、毛泽覃的爱人贺怡，被撤掉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到中央党校接受批判。贺怡想不通，有时到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泪下。静静地听着的毛泽东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34）

毛泽东后来对外国朋友说起过他这段异常艰难的处境：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35）

在这种逆境中，毛泽东抓紧时间，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他在一九五七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过：

“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36）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特别是广昌保卫战的严重失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已被攻破，整个局势越来越危急。博古、李德等到广昌前线去后，周恩来留在后方的瑞金，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四月下旬，经过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携带几个随员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这是他被冷遇三个月后才又得到的一次工作机会。他先到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会昌县文武坝，会见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毛泽东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当晚，他又和何长工一起到战地前沿去视察。

当得知防守南大门的红二十二师同优势敌军作战后被迫退出筠门岭、正在开干部会检查战斗失败的教训时，毛泽东立刻打电话给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说：“你们打得很好，你们是新部队，敌人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他指出：“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大量消灭敌人？你们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的打法，要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毛泽东最后指出：对“反水”的群众决不要打枪，但要放“纸枪”（即传单、标语），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工作，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37)红二十二师在连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作出具体布置。这以后，粤军一直停

留在筠门岭，没有再前进一步。在南线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

五月间，毛泽东又出席粤赣省委召集的各级干部会议。他说：目前斗争形势很紧张，苏区越来越小，要求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查田运动，扩大白军工作，消除赤白对立；恢复钨砂的生产与输出，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组织余粮大半出口，向白区购买布匹、食盐；整顿地方武装组织，清洗混入队伍的不纯分子，准备保卫胜利果实；做好扩红工作，完成扩红任务等。

在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指导刘晓、何长工等制定了南线的作战计划和工作部署。针对陈济棠的粤军同蒋介石存在矛盾的情况，他说：总的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他还说：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38）

接着，毛泽东到会昌站塘的李官山视察红二十二师，进行了十多天的调查，还用三个晚上时间同师领导干部一起总结战斗的经验教训。

经过在前线和站塘等地的调查，回到文武坝后，他向刘晓和何长工指出：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不能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派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粤军反蒋抗日。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的

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

毛泽东虽然身处南线的会昌，他最关心的仍是中央苏区的全局。那时，中革军委准备将红七军团南调，加强南线的防御。毛泽东同粤赣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研究后，在六月二十二日致电周恩来报告南线的实际状况：“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因此判断是渐，不是突然”，建议红七军团可不南调，军团长“寻淮洲以在瑞金待机为宜”。(39)周恩来接受了这个建议。

毛泽东在会昌工作了两个多月，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央苏区南线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同北线接连遭受严重挫败的形势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天，毛泽东带着几个战士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远望南方，写下了《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十月初，何长工和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同陈济棠部进行了三天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项协议，为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顺利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二道封锁线开辟了道路。

在这以前的五六月份，博古等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报告了国内情况。高自立在报告中转达了博古的口信：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毛、周想到苏联养病”。王明插话说，毛泽东“能抓得大事”；“这大的人物来，谁保险？”吴亮平回忆道：“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

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40)

六月下旬，毛泽东在会昌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实际上，中央书记处五月间已向共产国际请示，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也已复电同意，可是在这次会上对此并没有传达。毛泽东发言时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至于转移的方向，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这个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六千多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这两支部队在七月间出发，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41)但由于转到外线去的兵力单薄，没有能起到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调出的作用。

国民党军队不断地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他们的飞机不时地来瑞金沙洲坝轰炸，局势越来越紧。七月间，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迁到瑞金以西的背梅坑，毛泽东也搬往高围乡云石山一个大庙里居住。依据共产国际关于主力转移时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的指示，中革军委布置他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经过将近一个月，他写成了约三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共分三章。第一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以及游击队如何发展成为红军。第二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则、袭击驻止和行动的敌人、破坏敌人的后方、对付敌人的“围剿”和追击、关于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第三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游击队部队内的政治工作、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他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有好几次主席让我把他写好的东西，连夜送下山去给周恩来副

主席他们看。写的什么当时我们不知道。后来主席请人把写的东西抄清，用蜡纸刻出来，通过我们中央政府的发行科，发到了各个县和区。我们警卫班的同志因为参加印刷，每个人都留了几本学习。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写的是有关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书里头好多事是主席领着我们粉碎前几次蒋介石‘围剿’时我们亲身经过的，也有好多事是主席在武阳镇、会昌、于都等地开调查会、走访群众时我们听说过的。”(42)到红军大转移时，这本书才下发到各部队。

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的弟弟、国家人民银行行长毛泽民，来找他商量搬“秘密金库”的问题。这个金库是一九三二年四月毛泽东率领东路军在漳州缴获大批金条、银元等后建立起来的。毛泽东问道：“你们准备搬到哪里去？”毛泽民回答：“想搬到兴国一带去。”毛泽东说：“敌人已经到了藤田、东固、黄沙岭一带，你搬到兴国去怎么行？”停顿一会后又说：“我看还是立即分散，让部队自己管起来更好。你们研究研究看行不行？”(43)后来在转移时，毛泽民把金库中的大部分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一部分专门组织连队押运，保障中央各机关的使用，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前线的战局越来越不利，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也更加困难。打破敌军“围剿”已不可能，只剩下长征这一条路了。毛泽东心情焦急，向中央书记处要求到赣南省去视察，得到了同意。九月中旬，他带着秘书、医生和警卫班抵达赣南省委、省苏、省军区所在地于都。

此时，中共中央已着手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博古、李德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

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44）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他立刻召开各种会议作调查，还找那些从敌占区或刚被敌军占领地区过来的商人和其他人员详细了解敌人的动向。九月二十日，毛泽东急电报告周恩来：“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电报最后说：“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45）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时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

连续的紧张工作和难以驱散的忧虑，使毛泽东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高烧发到四十度，嘴唇干裂，两眼深凹，脸颊烧得通红。卫生员给他奎宁片、打奎宁针，高烧依然不退。警卫员吴吉清跑到省政府打电话向瑞金报告。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得知后，连夜骑马赶到于都，确诊他患的是恶性疟疾。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毛泽东的病情才慢慢好转。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直到第八天拂晓，我们刚刚想睡一会的时候，听见有人慢步走到床前来，温和地说：‘这几天，你们都辛苦了！’我们睁开眼睛，一看是主席，就着急地说：‘您病还没有好，怎么就起来啦！’主席笑着说：‘我好了！’”毛泽东刚能起床，就开始工作。傅连璋等一再劝告他再休息几天，他回答说：“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十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毛泽东骑马赶回瑞金，先到中革军委向周恩来等报告了于都的敌情、地形、河水干枯等情况。

然后，在云石山古庙里，召开一个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又称青山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吴黎平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46）当时，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瞿秋白希望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但博古等不让他走。瞿秋白请求毛泽东给中央说说。毛泽东说，我已经同他们讲过，但“不顶事”。

毛泽东回到家里，抚摸着天真活泼的小孩毛毛，心里很难受。过了一会，毛泽东告诉贺子珍：“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望着贺子珍，他又说：“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

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去随军行动的消息后，立刻到中革军委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第二、应带一部分女同志走。他得知中革军委已派部队到于都河搭浮桥，准备大部队从那里过河，又策马赶到于都。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中革军委的电话，说中央决定带走三十名女同志，其中包括贺子珍，把她们编在卫生部休养连，但不能带孩子。毛泽东立即派警卫员回瑞金通知贺子珍：小毛只能托付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毛泽覃、贺怡照顾了。在战争环境中，这个孩子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后来再没有找到。

十月十日晚，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长征。

毛泽东在于都作好安排后，于十五日在县城谢家祠参加由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



他在会上说：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并且对将要留在中央苏区的地方干部说：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员离开于都城，踏上征程。刘英过了于都河后看到毛泽东，就问：“你九月份到于都是有‘特别任务’的吧？”她后来回忆道：“毛主席这才告诉我，他来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现在我们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47）

从一九三一年赣南会议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

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

“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



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48）无论在前期的作战指挥上（包括漳州战役和宜乐战役），中期对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的领导，还是后期在会昌和于都的短期工作中，他都竭尽全力地做出重要的成绩。他还利用这段时间，读了许多书，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这段不平常的艰难经历留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二三十年后，他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49）

《红色中华》，1933年3月3日。

《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1933年2月15日。

《工农红军学校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

1933年5月4日。秦邦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1936年9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电，1933年3月。

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2页。

亮平：《经济建设的初步总结》，1933年9月30日。

姚名琨：《对外贸易局江口分局》，《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80页。

《红色中华》，1933年3月6日。

《中央政府通告第二号》，1933年7月20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页。

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1页。

王贤选、何三苟：《中央苏区反经济封锁的片断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89页。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24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0、131、133、139页。

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选举运动周报》第1期，1933年8月25日。

毛泽东：《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红色中华》第86期，1933年6月17日。

《红色中华》第52期，1933年2月13日。

王观澜：关于查田运动的一些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版，第 355 页。

(2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1933 年 6 月 1 日。

(22)毛泽东：《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写于 1933 年 6 月 14 日，载《斗争》第 32 期，1933 年 10 月 28 日。

(23)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斗争》第 24 期，1933 年 8 月 29 日。

(24)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版，第 351 页。

(2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版，第 549、551、552、561 页。

(26)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版，第 351 页。

(2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 49 号，1933 年 10 月 10 日。

(28)《红色中华》第 175 期，1934 年 4 月 14 日。

(29)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 12 月版，第 45 页。

(30)《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 5 月版，第 142 页。

(31)《人民代表大会口号》，《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3 月版，第 81 页。

(32)《土地革命文献选编》（1927—1937 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745、746 页。

(3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 4 月版，第 336 页。

(34)《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版，第 175 页。

(35)毛泽东接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5 年 8 月 5 日。

(36)《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7 月版，第 401、402 页。

(37)方强：《毛泽东同志来到南方战线》，《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版，第 222、223 页。

(38)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6 月版，第 129、130 页。

(39)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1934 年 6 月 22 日。

(40)吴亮平：《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7 月版，第 55 页。

(41)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1943 年 11 月 15 日。

(42)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06、107、108 页。

(43)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06、107、108 页。

(44)《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中共党史资料》第 1 辑，第 176 页。

(45)毛泽东复周恩来电，1934 年 9 月 20 日。

(46)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学习与研究》1985 年第 1 期。

(47)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瞭望》周刊，1986 年第 40 期。

(4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 4 月版，第 338 页。

(49)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8 月版，第 816、817 页。

## 十五、长 征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严格保密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布置了几道封锁线，却不知道红军往哪个方向突围，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的第一道封锁线上部署的兵力并不强。十月二十一日夜间，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二十五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就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开始议论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取胜的问题。到信丰县古陂杨坊宿营，贺子珍从休养连前来看望他，讲起瑞金县男女老少相送时紧紧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泽东听了说：我们欠根据地人民实在太多了。

十一月上旬，中央红军顺利地 在湘南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这时，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因患疟疾发高烧。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他，安慰他说：“同志们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十一月中旬，他们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

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

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二十七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控制了渡口。但因队伍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过缓，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受刚刚赶来的优势敌军的夹击。毛泽东在激战中随军委纵队从花村渡过湘江。

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失败，但红军自身却付出沉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为三万多人。这时，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他先拿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岸边进行阻击，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围出来。李德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粗暴地训斥道：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警卫班战士一个也不肯动手，在场的博古默不作声。毛泽东便直接出来干预，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他同周子昆谈了话，鼓励他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攻击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过湘江遭到惨重损失后，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回忆道：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经不能按原计划行动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这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这时，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红军的指挥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肩上。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德后来曾写道：“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

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



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当天下午七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

红军主力西进，在十二月十五日攻占贵州黎平，但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十八日，毛泽东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博古尽管自己意见被会议所否定，还是服从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 ”

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后来以廉臣的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 红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红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红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 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 “ 正询问间，红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一九三五年元旦，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 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 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 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 围剿 ’，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并规定：“ 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同时，

在黎平会议后，已重新任命被李德、博古派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承为总参谋长。

但争论仍没有结束。正如周恩来所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王稼祥回忆道：“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此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至六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在一月七日解放了这个黔北重镇。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于九日下午进入遵义城。

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

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伍修权回忆说：

“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博古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支持博古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聂荣臻没有答应。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二十人。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

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会后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

“扩大会中周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曾多次讲到凯丰当时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他说：

“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了。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会议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会议还作出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走自己的路”,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练,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遵义会议后的新的中央,改变“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同时,对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人进行平反。江华回忆说,“毛主席有发言权了,我们这些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人,也逐渐得了‘赦免’。”罗明回忆道: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知刘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我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21)

被诬陷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的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对被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判刑五年的萧劲光,遵义会议刚开完,周恩来就向他宣布:“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22)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调集四十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三万五千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一月十九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二十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

红军分三路在二十七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

这场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以红三、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它在二十八日凌晨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它的增援部队又即将开到，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红军立刻由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下，干部团猛打猛冲，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毛泽东在山头上看到这种情景，称赞道：“陈赓行，可以当军长。”接着，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参战，把阵地巩固了下来。这就是土城战斗。

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这次战斗打得并不好。博古那时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一月二十九日，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这时，川军潘文华部三十六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止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立刻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

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于二月八日进驻扎西镇，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三条教训：“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23）他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他的理由是：应该利用敌人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为此必须整编部队，实行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

当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时，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再渡赤水河。中央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红军在二月二十日前后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桐梓和娄山关以南的黔军，乘胜夺取遵义。这次战役，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登上娄山关，极目四望，吟成《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接着，当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时，中央红军又由遵义向西开进。三月十日，毛泽东在苟坝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现金沙县）的建议。周恩来回忆说：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24）

会后，中革军委给各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电报，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从这件事中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他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25）

这时，由于红军的行动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迂回曲折，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使蒋介石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只得分散兵力，四面防堵。为了进一步迷惑对方，调动国民党军队西移，红军在三月十六日下午至十七日中午分别从茅台附近三个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西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主力却在附近山沟丛林里隐蔽集结。

蒋介石得到飞机侦察的情报，果然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集各军迅速奔集川南古蔺地区。二十日，蒋介石还得意地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在达到调动国民党各路军队大举西向的目的后，红军决定立刻掉头再次东渡赤水河，返回贵州。二十日下午，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示：“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26）

这时，贵州境内的国民党兵力已十分空虚。红军主力在三月二十一日晚至二十二日晨神速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充分显示出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它是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们随即挥师南下，大踏步越过遵义仁怀大道。三十一日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回忆道：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一过公路，甩开了敌人，部队就像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就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别动支队九

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五个团的围追，入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泽，渡金沙江；另两路是红军主力，攻克霑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颤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27)

进入云南后，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抓紧“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抢渡天险金沙江，把一直紧紧尾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远远抛在后面。

在奔袭云南途中，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袭击。她因掩护伤员而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昏迷过去。经检查，发现挂花十七处。她苏醒后对赶来的毛泽民夫妇说：“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28)毛泽东赶到，她又说：“润之，把我留下，你们前进吧！”毛泽东对她说：“子珍，你不要那样想。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29)

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平原后，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由于没有地图，对云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靠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很不准确。全军都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位置在哪里，仅靠询问向导探索前进。用这种侦察方法，至多只能查明两三天的行程，往往要走不少弯路。”四月二十八日，先遣分队在通往昆明的公路上，截获一辆汽车，车上有龙云送给薛岳的云南省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毛泽东知道后十分高兴。他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就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从一定意义上说，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谓巧获呀！”(30)

当晚,毛泽东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立刻开会,研究抢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他说: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获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该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国民党军距我们还有三四天行程,迅速争取渡金沙江的先机。

中革军委一面派先锋团直逼昆明,迫使云南当局调兵固守昆明,削弱金沙江的防务,一面率主力迅速北上到金沙江南岸,准备过江。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两岸崇山峻岭,水流湍急,吼声如雷,素称天险。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在洪门渡、龙街渡、皎平渡三个渡口抢渡金沙江。毛泽东等随中央纵队从皎平渡渡江。从五月三日至九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国民党追兵在薛岳率领下赶到金沙江边时,已在红军过江后的第七天,船只已经烧毁,只能隔江兴叹。这样,红军就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紧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渡过金沙江后,红军得到几天的休整时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四川会理城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那时,林彪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31)毛泽东批评了林彪,“你是娃娃,你懂得什么?”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称赞他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军继续北上，先要通过彝族聚居地区，才能到达大渡河畔。毛泽东嘱咐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刘伯承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对其他部族做了工作，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

蒋介石立刻又命令在大渡河以北地区加紧布防，致电各路将领：“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32)安顺场在大渡河南岸，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四五十里是高山。部队在这样的深沟中没有回旋余地，兵力也无法展开，极易被敌人伏击消灭。刘伯承率先遣队到达后，找到两只小船，由十七名勇士坐着过河，占领了渡口。先遣队各部陆续过江。但此处架桥不易，全军难以在短时间内从这里过江。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抵达安顺场，听取刘伯承、聂荣臻详细汇报过河和架桥的情况后，立刻决定红军沿大渡河两岸赶向安顺场以北一百七十公里的泸定桥，限两天赶到。红军克服重重困难，按时赶到，战胜守军，占领了泸定桥和泸定县城。红军主力在六月二日全部渡过大渡河。毛泽东对指战员们说：我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

过了泸定桥，红军继续北上。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指示》，指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突破芦山、宝兴之线守敌，奇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

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关键 ,是要翻越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夹金山。山上终年积雪 ,气候变化无常 ,空气稀薄 ,人迹罕至。六月十七日早晨 ,毛泽东喝完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 ,身穿夹衣夹裤 ,手持木棍 ,沿着前面部队走出的又陡又滑的雪路 ,向山顶攀登。他把马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使用 ,并且说 :“ 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 ,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 !” 走到半山 ,气候骤变 ,冰雹劈头打来。他拉着战士的手前进 ,同时嘱咐大家 :“ 低着头走 ,不要往上看 ,也不要往山下看 ,千万不要撒开手 !” 一会儿 ,冰雹停止 ,但越近山顶空气就越稀薄 ,一些体力弱的战士一坐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毛泽东对坐在雪地里休息的戴天福说 :你坐在这里非常危险的 ,来 ,我背着你走。警卫员吴吉清抢先把戴天福背起 ,在毛泽东帮扶下走向山顶。越过山顶后 ,下山就比较容易了。当天下午 ,他们就到达懋功县达维镇 ,受到三月中旬退出川陕根据地来到川西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十八日 ,他们进入懋功县城 ,会见在这里迎候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 ,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 ,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十多万人 ,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两军会合后红军的行动方向应当指向哪里 ?是就地发展 ,还是继续北上 ?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不料 ,恰恰在这个大问题上立刻发生严重的、难以调和的分歧。

还在两军会合的前夕 ,中共中央收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来电请速决“ 今后两军行动大计 ”。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六月十六日致电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明确地指出 :“ 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 ,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 ,

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张国焘、陈昌浩复电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个战略，提出红军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

到达懋功县城的当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就战略进攻方向问题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提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望即下决心为要”。张国焘于二十日又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向西发展，并说“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无良策”。中央复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这样重大的问题，在往来电报中自然是难以解决的，因此，中共中央在电报中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二十五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懋功县城以北的两河口，欢迎从茂县前来的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并举行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大会。朱德致欢迎词，说明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重大意义和北上的方针。张国焘在讲话中却公然提出同中央相悖的西进方针。(33)毛泽东和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已经多年不见了，但一见面谈话却并不投机。

第二天，在两河口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从地域是否便于机动、群众条件和经济条件三个方面，阐明红军应该去“川陕甘”，“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提出以运动战迅速北上攻打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在发言中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又同时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



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34)

会议经过三天讨论，通过北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二十八日，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35)

六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除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外，主要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的情况报告。毛泽东发言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36)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

张国焘回去后，自恃他所领导的军队人数多，又策动一些人给中央写信伸手要权。他还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故意拖延执行中革军委在两河口会议后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

中央红军为了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继续北进，在七月初翻过第二座大雪山，抵达卓克基，十日到达芦花（今黑水县）。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他立



刻率部北上，并要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迅速到芦花集中指挥。

张国焘到芦花后，中共中央在十八日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主张增补一批人“可到军委”。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会议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同意将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中革军委当天发出通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二十一日，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

张国焘一朝权在手，便以集中统一指挥为名收缴各军团的密电本。彭德怀回忆说：

“我完成任务后，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37）

由于张国焘一再拖延，战机已被贻误，使胡宗南部得以集中兵力扼守松潘，红军已难经松潘沿大道进入甘南。中共中央只得撤销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这给红军北上带来极大的困难。八月三日，红军总部制订《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即原第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即原第五、九军团）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八月四至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再次强调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决议指出，在红军中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

会后，周恩来发高烧病倒了，经确诊是患阿米巴肝脓肿。毛泽东常去看望。他肩头的担子更重了。

张国焘参加沙窝会议时，表面上再次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实际上没有放弃因畏惧国民党军队而主张退却的打算。他回去不久，又提出经阿坝向青海、宁夏、新疆退却，同中央规定的北进夏河流域相左。

鉴于张国焘坚持向青、宁、新退却的主张，中共中央在八月十五日致电张国焘：“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38）

接着，毛泽东召集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开会，研究右路军经草地北上的具体路线，决定由叶剑英率两个团为右路军先遣队。他召见红一军二师四团团团长杨成武，布置先头团过草地的任务。杨成武回忆道：

“毛主席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说：‘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北

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他又强调说：‘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毛主席恳切地、着重地嘱咐我这两句话，然后问我是否已找到向导。”“毛主席一边与我握手，一边叮咛道：‘到徐总指挥那里去一下，去接受具体指示。’”（39）

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作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当时，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在东侧，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在西侧。毛泽东从军事、经济、民族、地形等条件，论证了红军主力不应向西而应向东。并且指出：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40）徐向前、陈昌浩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说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左路军一定要与我们靠拢。毛泽东做会议总结说，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坚持向东打。（41）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补充决议。这次会议调整了夏洮战役具体部署，以右路军为北进主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毛泽东起草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

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针对张国焘坚持西进青海、宁夏和新疆的主张，补充决定说：“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了毛儿盖会议的精神，指出：“目前应举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42）

八月下旬，毛泽东随右路军离开毛儿盖，向荒无人烟的大草地进军。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

“一当走进草地，情况就完全变了。天空像用锅底黑刷过的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边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如果一不留心，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如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远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儿，幸好被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才摆脱了危险。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

“几天来，他不仅把担架和马让给伤病员乘坐，而且每天在行军八九十里途中，还要坚持工作。一路上，他不是和指挥员、战士们谈心，了解部队的思想情况，就是向伤病员询问病情，鼓舞医务工作的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医疗护理工作。并且一旦了解到伤病员因缺粮而造成的危难，主席就立刻指示副官处，利用中途休息的时间，杀

掉几匹马，把马肉分送给各连队的伤病员。而他自己，每天和战士们一样吃着青稞野菜汤，不要一点马肉。”（43）

经过七天六夜的艰苦跋涉，毛泽东同指战员一道走出荒无人烟的草地，到了班佑。右路军一部成功地进行了包座战斗，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五千余人，为进入甘南打开了通道。这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

九月一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同右路军靠拢。在等候期间，右路军进行了休整。毛泽东在巴西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要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

九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下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他的分裂活动更加变本加厉：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九月九日，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这样，局势便发展到千钧一发的危急地步。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那个电报，立刻秘密地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迅速抄下电文（一九三七年三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同张闻天、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再想继续说服并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

当晚，毛泽东在阿西同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和病中的周恩来等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立即北上，并且通知已经北上俄界的林彪、

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化，要他们在原地待命。同时，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严肃地指出：“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44)

在出发北上前，发布毛泽东写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北上红军凌晨二时出发，毛泽东率部在前，彭德怀率部在后掩护中央机关北上。天明时，毛泽东看到叶剑英率军委纵队一部分赶了上来，十分高兴地说：“哎呀！剑英同志你来了，好！好！”后来，他引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话，来赞扬叶剑英的这次历史功绩。当时在场的伍修权回忆道：

“正谈话时，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骑马赶来了。他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主席劝阻他，他就同毛主席吵架。”“毛主席还是规劝、开导他，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但是李特就是不听，强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跟他走。”“当时有的同志对李特的行为很气。毛主席还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45)

这次北上，连李德都表示同意。他对宋任穷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46)

九月十二日，北上红军到达俄界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和结论。他说：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47）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方针是错误的。中央同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俄界会议决定，把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成立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这时，红军面对的是已被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控制的天险——腊子口。这个山口只有三十米宽，过后就是甘南的开阔地带。如果国民党的胡宗南等增援部队赶到，把山口严密封锁起来，要进入甘南就十分困难了。在这个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先头部队红四团勇敢机智地一举歼灭鲁大昌部两个营，在九月十七日夺取腊子口，为主力红军进入甘南打开了通道。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主力红军翻越岷山，在九月二十日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这就是毛泽东诗中所写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他出席在哈达铺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中说：我们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既要了解高级干部，又要了解中下级干部。部队在这里整编为三个纵队，共八千多人。

在哈达铺,毛泽东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当天,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到陕北去。聂荣臻回忆他是这样说的:

“ ‘ 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呢! ’ ” (48)

毛泽东随第一纵队向北行进,二十七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49)

毛泽东在率陕甘支队北上过程中,始终悬念着被张国焘拉回去的七八万红军。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等,指出张国焘多次违抗中央命令,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同时提出:“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卅军之继续北进。”最后强调,“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但是,张国焘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竟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公然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

这时,蒋介石得知红军已突破腊子口,害怕红军进占天水,威胁西安,急忙调胡宗南等部集中天水一线,防止红军东进。



红军陕甘支队却继续北上，跨过西（安）兰（州）公路，攀登海拔三千米高的六盘山，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道封锁线，陕北苏区已经在望。毛泽东登上六盘山顶峰时，心潮澎湃，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词：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陕甘支队一越过六盘山，就遇到一个新的对手：国民党的骑兵。在青石嘴，侦察到有两连敌军骑兵正在下鞍休息，毛泽东立刻到前沿阵地指挥。聂荣臻回忆道：

“随后，毛泽东同志也上了我们站的这个山头。他叫把各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召集来，决定要消灭这股敌人。他亲自命令一大队和五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四大队从正面突击。三个火队像猛虎扑食似地扑下山去，把敌人解决了，缴获了一百多匹马。大家对打骑兵有信心了。我们用缴获的马匹装备了纵队的侦察连，我们也开始有自己的骑兵部队了。”（50）

这时，东北军和马鸿宾的三个骑兵团又尾追而来。毛泽东认为，让敌军骑兵一直跟着红军进陕北苏区于我们不利。他提出要“砍尾巴”。彭德怀指挥第一、二纵队，坚决果断地击溃了国民党骑兵两千多人，使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不敢再来侵扰。毛泽东兴奋地赠诗一首：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十月十九日毛泽东随部队进驻吴起镇（今吴旗县城）。红军一进吴起镇，看到一间窑洞门口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觉得真是到了家了，长征以来一直感到苦恼的伤兵安置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指出：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二

千里，“到达这地区的任务已完成了，敌人对于我们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51)

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华北，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帝高潮，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敌人“围剿”陕北苏区的有利条件。当然，粉碎敌人“围剿”还需要有好的领导。在结论中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资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要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和游击工作的配合。要尊重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要依靠他们。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这次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关于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写道：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山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中央红军长征的传奇性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上海的鲁迅向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52)共产国际也高度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英雄斗争的模范”。

十一月五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到达象鼻子湾。他向随行部队讲话，对长征作了总结。他说：

“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

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53）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0 月版，第 177 页。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版，第 193 页。

《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年 11 月版，第 4 页。

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1943 年 12 月 16 日。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 113 页。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 12 月版，第 124 页。

《军委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1934 年 12 月 12 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版，第 441、442 页。

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1943 年 12 月 2 日。

《陈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5 月版，第 55、56 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版，第 445、446 页。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 年 6 月 10 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 月版，第 66 页。

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8期。

耿飚：《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人民日报》1994年12月18日。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14页。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67页。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42页。

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由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的谈话，1962年1月12日。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42页。

《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14页。

(21)《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70页。

(22)《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61页。

(23)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181页。

(24)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69页。

(25)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1月22日。

(26)中共中央、总政治部给各军团电，1935年3月20日。

(27)刘伯承：《回顾长征》，《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年 11 月版，第 7、8 页。

(28)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0 月版，第 217、218、219 页。

(29)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0 月版，第 217、218、219 页。

(30)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 7 月版，第 183、186 页。

(3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版，第 198 页。

(32)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 1983 年版，第 346 页。

(33)莫休：《大雨滂沱中》，《党史资料》1954 年第 1 期。

(34)毛泽东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 年 6 月 26 日。

(3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版，第 516 页。

(3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 年 6 月 29 日。

(37)《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版，第 201 页。

(3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版，第 541 页。

(39)《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 6 月版，第 216—219 页。

(4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 年 8 月 20 日。

(4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8月20日。

(4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48页。

(43)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68、276页。

(4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52页。

(45)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46)《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89页。

(47)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9月12日。

(48)《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82页。

(49)毛泽东十月二十二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

(50)《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83、284页。

(5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10月22日。

(52)《鲁迅致红军贺信 获重要发现》，《新华文摘》1992年第3期，第132页。

(53)《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86、287页。

## 十六、奠基西北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甘，重新有了可以立足的根据地，这是巨大的胜利。国民党军队对中央红军的追击堵截不能不告一段落。但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清醒地看到，要实现中共中央把大本营在西北奠基的任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十分艰巨的。

陕甘这块革命根据地，是三十年代初由刘志丹、谢子长分别在陕北、陕甘边领导武装起义后创立的两块根据地合并而成的。它包括延长、延川、保安等六座县城，游击区扩展到陕北和陇东的十七个县。根据地内进行了土地革命，大部分土地已经分配。谢子长牺牲后，这里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由刘志丹统一指挥。中央红军到达这里前一个多月，原在鄂豫皖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五军，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到达陕北延川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三个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共有兵力四千八百人，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先后歼灭前来进攻的东北军一个师又四个营，迎接了中央红军的到来。

但是，陕甘根据地当时外部环境和内部状况都面对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从外部环境看，随着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国民党当局立刻调集重兵到陕甘苏区周围，包括张学良部东北军、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还有中央军的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等部，直接用于“围剿”的兵力达十余万人。蒋介石亲自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而以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国民党方面的兵力比中央红军主力和陕甘红军要多好几倍，并且正在气势汹汹地继续向根据地推进。

从陕甘根据地内部来说，中央红军到达前出现了“左”倾错误，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九月下旬开始了错误的肃反，原陕甘根据地的不少军政干部被捕被杀，甚至连刘志丹也被关了起来。很多干部、群众非常不满，使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中。

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恰当的解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甘根据地是无法站住脚跟的，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十一月三日，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的汇报。毛泽东在这以前已经听到当地的干部和群众说：陕北的肃反有问题。他就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且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当省委汇报到肃反问题，他立刻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那时，中共中央正忙于战役准备，先派刚担任国家保卫局局长的王首道等组成工作组，前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调查并纠正肃反中的错误。毛泽东还叮嘱王首道等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着重讨论当前的军事行动。毛泽东提出：应该在本月内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不能用整个冬天，否则会给敌人构筑堡垒的时间。军队的编制恢复红一方面军，下辖第一军团（由陕甘支队改成）和第十五军团。会议决定：军事工



作由毛泽东负责；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会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彭德怀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全军共五个师又四个团，一万多人。

根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领导人暂分两路：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先到陕甘根据地的后方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开赴前线，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这时，蒋介石已经知道中央红军和陕甘红军会师的消息，重新调整了部署，调集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组织新的进攻：在西边，以第五十七军四个师由陇东沿葫芦河向陕西郿县东进；在东边，由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沿洛川、郿县大道北上，企图围歼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

局势看起来十分危急，毛泽东却指挥若定。他和周恩来、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先在郿县的直罗镇打一次歼灭战，消灭沿葫芦河东进的敌军一至两个师，再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敌以打破这次“围剿”。十一月十八日，在直罗镇以东的东村，毛泽东主持召开西北军事委员会会议，作关于战略计划的报告。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红军，扩大苏区，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建议将红军主力集中南线。会议通过毛泽东这个报告，要求两个军团分别付诸实施。

第二天，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指出东北军第一九师明日有到直罗镇的可能，我军应准备后日作战。在发起进攻前，他又要求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周围，察看地形，研究具体作战部署。

直罗镇是一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穿镇而过，北边是一条小河。干部们看过后兴奋地说：“这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敌人进到直罗镇，真如同钻进了口袋。”

二十日下午，东北军第一九师在飞机掩护下孤军深入，沿葫芦河进入直罗镇。当晚，毛泽东下达命令，按原定部署，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在拂晓前包围直罗镇。毛泽东的指挥所设在距直罗镇不远的一个山坡上。战斗打响前，他在下达作战命令时斩钉截铁地说：“这个仗，一定要打好！”“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

二十一日拂晓，红军突然从南北山上向直罗镇猛扑下去。第一九师仓促应战，激战至下午二时，大部被歼。红军在打援中又歼灭援军第一六师的一个团。到二十四日，第一九师残部在突围中被红军全歼。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原因是：“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足。四、群众与我们一致。”报告还提出，在新形势下，对待俘虏军官采取一律不杀和优待释放做法，既搞下层统一战线也搞上层统一战线。这是针对过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主张只搞下层统一战线、不搞上层统一战线来说的。

会后，毛泽东会见徐海东。先同他谈了当前敌人动向和我们将采取的对策，然后询问部队伤亡和伤员安置的情况，要他好好组织部队休息，让战士们都洗洗脚。当听他

讲到在鄂豫皖根据地搞的肃反中还有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没有作结论时说：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过来，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作反革命？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嫌疑犯的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干部要分配工作，还要徐海东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徐海东回忆道：

“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三百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三百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

毛泽东在前线紧张地指挥作战的同时，十分关心刚到后方瓦窑堡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当张闻天来电向他征询改变对富农政策的意见时，他复电表示基本同意，同时也提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

毛泽东更关注的是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他和周恩来、彭德怀从前线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察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并且肯定地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纠正错误，但处理要慎重，要有利于领导层的团结。中共中央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负责审查这个“案件”。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等从前线回到后方的瓦窑堡。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五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释放。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

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的纠正，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原来面对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使中共中央能够在这里站定了脚跟，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来考虑和处理许多带全局性的问题。

一九三五年，中国整个时局发生巨大的变动。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加快了他们企图独占中国、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步伐，并且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使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遽上升了。这一年，国民政府先后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达成“何梅协定”等，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量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但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因此罢手，反而更加得寸进尺，发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由它直接控制。这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开始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中共中央为了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在十一月十三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毛泽东在二十五日发表对《红色中华》报记者的谈话，重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中国领土的解放和完整。

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已有同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毛泽东冷静地看到：集结在陕甘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其中，第十七路军二十个团是杨虎城指挥的，他有抗日的要求和一定的进步思想，过去同共产党和一些党员有过友好关系；东北军六十个团虽

是“围剿”军的主力，他们在东北沦陷后背井离乡，流亡关内，不愿意再打内战，而是强烈地要求抗日收复故土；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同日本侵略者有着家仇国恨，势不两立。这些，都是可以联合抗日反蒋的有利因素。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就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先放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上，从优待释放被俘官兵着手，并写信给他们的师长、军长以至张学良，逐步开展对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

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从苏联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人民阵线的决议精神（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愿同一切抗日反蒋者订立停战协定，进而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国内的政治形势发展得很快。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推动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反日运动。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们还下乡进行救亡宣传，博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有必要对整个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以及李维汉、郭洪涛等十余人。张闻天主持会议，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

七大会议的指示精神。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

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一开始分析了当前形势的特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和红军的胜利。提出一九三六年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白军工作。”他归纳了十四条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包括：反对单纯防御，实行积极防御；在内线作战中，一般的是后发制人；波浪形的发展，反对冒险主义；又要打又要走，没有固定战线；争取技术的提高；反对不让敌人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统一指挥下，依照情况分工指挥；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等。他提出：准备六个月后，打到山西方面去。要在战略上扩大战果。号召全党学习军事，一切服从战争。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同意这个报告，并且作了补充。张浩说：“泽东同志将九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

会议当天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是：战略防御时，要执行积极防御，执行后发制人；战略进攻时，既要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努力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又要反对冒险主义，要适可而止，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运动战是基本原则，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主攻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先渡过黄河东征山西，再视情况北进。

会议进入讨论政治问题时，毛泽东作了主题发言。讨论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产生了争论。毛泽东发言中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博古发言仍引经据典地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第二天再次发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变”失策，就在于套用“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这一理论。我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他还愤激地说：“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往床上一躺不说了，毛泽东在讨论过程中明确地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

十二月二十五日，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确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地指出：“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

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中央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



想，不失时机地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来贯彻共产国际决议，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继续抓紧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把主要力量放在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山西上。

为什么中央红军主力刚到陕北才两三个月就要出师东征呢？这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内部是有争论的：一个是巩固和发展的关系，还有一个是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会议决定：红军东征时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彭德怀、张浩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陕北由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主持后方工作。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命令，要求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各路红军立刻奉命秘密行动起来。

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经过延川到达延长县县城。一月底，他在这里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并作了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发展和巩固的关系，以解除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担心红军主力东征会影响陕甘根据地巩固的顾虑，也批评了



李德所说东征是“想挑起日苏战争”的错误观点。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加快了东征的战备步伐。

这时，恰好下了一场大雪，毛泽东心情极好，作了一首词——《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渡河作战的准备工作中，毛泽东觉得原定出发的力量还不够，军力还须更加集中。二月十七日，他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留在后方的周恩来，提出：“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要求红二十八军主力东移到吴堡附近，第一步乘国民党晋绥军第七十二师撤退时，肃清这一带的残敌；第二步相机渡河。他们还建议周恩来暂移清涧县委驻地，指挥部队，争取群众，以保持东西两岸前后方的运输和渡河点。

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关于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东渡黄河。随即同彭德怀发布了红一方面军东征作战命令。

从二月十八日晚八时开始，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分别从陕西省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占领了山西境内三交、留誉、义牒等乡镇。到二十三日，已控制宽五十公里、纵深三十五公里的地区，并包围了石楼县城。到二十五日，已消灭、击溃晋绥军五个团，缴获枪支八百多，俘虏一千二百余人。

毛泽东在二十三日到达距石楼县城二十公里的张家塔，致电十五军团：“石楼为东征战略要地，须尽一切方法夺取之。”第二天，他和彭德怀会合，下达方面军训令：我方面军已胜利渡过黄河，完成东征战略的第一步任务；方面军有坚决粉碎敌人援兵之任务，尽快争取居民群众与红军一致，集中兵力消灭敌军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第二步任务。同时，他和张闻天、彭德怀急电周恩来：“请到前线催促红二十八军主力东调，如能及早赶到，定能夺取被晋绥军占领的吴堡、佳县、神府许多地方，而且直接援助了主力”。刘志丹、宋任穷奉命率领红二十八军向东，趁晋绥军四个步兵旅回援山西的机会，恢复了一度被他们占领的大片区域，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

阎锡山对红军神速地突破黄河天险，十分惊慌，立即调集十四个旅的兵力，编成四个纵队，从北、东、南三个方面，准备向红一方面军发起反击。

毛泽东一过河，就部署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三月八日，他在交口县大麦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在吕梁山地区集中兵力重创晋绥军。十日至十三日，方面军主力在吕梁山区先后击退晋绥军四个纵队的第一次反击。其中，在孝义兑九峪地区，击溃阎锡山部的第二、第三纵队十四个团。这就为红军向前挺进打开了通道。

为了扩大红军东征的政治影响，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有关政策，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布告》，号召一切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并指出，红军东征的目的是为了抗日，红军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

东渡后初战告捷，怎样进一步发展胜利，扩大战果，创立河东根据地？毛泽东在大麦郊召开红一方面军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对下一阶段的行动作了部署。会议决定，以红一军团并指挥第八十一师为一路，后来称为右路军，担任主攻，向霍县出击，再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南下作战，伺机向晋东南发展；以红十五军团两个主力师为一路，后来称为左路军，向灵石佯攻，掩护主攻部队的南下行动；以方面军直属队和黄河游击师等部统归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后来称为中路军，巩固现有占领区，保护黄河渡口和后方联络线。各路部队从三月中旬开始南下和北上。

这时，红一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已经作了部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已初见成效，陕北根据地形势已经好转，而且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文件已经到达，有必要对前一段工作进行总结，明确下一阶段的任务。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商定，在前方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从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在孝义县大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举行，通常称为晋西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时强调：瓦窑堡会议决议是合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会后的中央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事实上已经打开了新局面。他说：中国共产党要站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他提出：“一，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我们的任务，要利用每一分钟来争取最大多数。

会议的第二阶段，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由毛泽东作报告。他说：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必要与重要的步骤。”我们的方

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在战略上要大胆，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要谨慎，有利地形上以多胜少，以求减少错误。山西是主要的，也可以临时到河北、绥远去。现在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一般地削弱敌人；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以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他在这个报告中，还逐条批驳了李德对战略《意见书》的错误，指出它的主要问题是，“革命战争中的单纯防御路线”。他说：现在应该进攻，敌人“围剿”来时要防御，“围剿”打破后就要进攻，“李德则取消进攻”。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由毛泽东起草。

这次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会后，张闻天等随即回后方瓦窑堡。

正当红一、红十五军团分别南下和北上时，蒋介石为了阻拦红军的东进，调遣十个师的兵力开入山西，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同它配合，企图封锁黄河，消灭红军，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阎锡山也改变了原来拒绝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的态度。这就使双方在山西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大的改变。

鉴于这种严重状况，毛泽东、彭德怀命令南下、北上的两个军团在抗击敌军进攻中向晋西地区收缩集中，并命令中路军控制有关的黄河渡口。同时，向中共中央提出：“东面情况已根本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策。从五月二日开始，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军，分别在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五日全部返回陕北休整。在东征作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这次东征历时七十五天，虽然因军事形势变化而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消灭国民党军七个团，俘敌（包括阎部团

长郭登瀛)四千余人,缴枪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门;取得渡河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迫使原来侵入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红军扩大了新兵八千多人,筹款三十多万元,发展并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在山西二十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以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红军回师陕北后,由毛泽东、朱德再次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但蒋介石却拒不接受,继续加紧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他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在陕甘苏区的东面和北面,有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两个师、阎锡山晋绥军的一个师又一个旅准备渡河入陕,协同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滋两个师,采取堡垒政策,向根据地腹部步步进逼。在苏区西部,蒋介石将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一部部署在陕甘宁边界地区。在苏区南部,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向北进攻。但张、杨已同中共建立初步的合作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

为了对付这种严峻的局势,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前方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采纳了这个建议,同在后方的政治局委员一起来到延长县交口太相寺,在五月八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对当前的形势,毛泽东不是只从边区的局部着眼,而是从全国的大局出发,作出这样的分析: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雨般地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要斗争。“群众运动发展到不怕统治阶级压迫的状态!九一八所激起的运动不如此次之深厚广大。”中间分子的态度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天觉醒了。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不同方面的对群

众的争取十分紧张。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作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红军东征抗日，蒋阎阻止，红军自动停战，要求议和。不和，那末你是卖国贼，我们就要打卖国贼。在山西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的方向。”

对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说：是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择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了比较：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守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守，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筑堡垒，不能出东方；“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则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乘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

他在报告中还着重地提出红军政治学校的问题，说：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并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

会后，毛泽东连续出席五月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八日的七次政治局常委会议，逐项落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任务。

在这些任务中，最紧迫的是西征甘肃的军事行动。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下达西征战役命令，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万三千多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向陕、甘、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其余部队留在南线、东线牵制国民党的军队，以掩护红军主力西征和保卫陕甘根据地。

彭德怀西方野战军从五月十九日起出发西征。因为这一地区是回民聚居的地区，毛泽东在二十五日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21)西方野战军接连取胜，相继占领了陕甘宁三省边界的大片地区。在作战中，红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着重打击马鸿逵、马鸿宾部和地方民团；原则上避免同东北军作战，同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但对接受蒋介石命令向红军进犯的何柱国骑兵师准备适当还击。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对西征以来的整个指挥，我都是同意的。”“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22)西方野战军在作战中俘获了何柱国骑兵师部分官兵，在经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教育后，全部释放，马匹和武器也一并归还。这样又促进了红军和东北军合作关系的发展。



西方野战军的作战到八月一日结束，进行休整。这次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共消灭敌人、俘敌旅长以下二千余人枪，战马五百余匹；开辟了横宽二百多公里的新区，使陕甘根据地发展成陕甘宁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批资财。这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打好了基础。

正当西征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位外国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七月初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他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以后，见到了毛泽东。斯诺不久后这样记下他最初见到毛泽东时的印象：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

“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地主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包括两套布制服。”



“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23)

毛泽东曾经多次同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

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

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和战略方针，毛泽东说：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方针。

毛泽东着重谈判：面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正在相应地作出重大变动。他说：

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富农的土地是不没收的，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现在一些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

针对有些人恶意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莫斯科在华代理人的攻击，毛泽东义正词严地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

当斯诺在苏区进行了两个多月考察后，九月下旬，毛泽东又同他谈了联合战线问题。在解释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为什么要改变时，毛泽东说：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这一联合，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一）抵抗外敌侵略；（二）给予民众以民权利；（三）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应斯诺的再三请求，毛泽东还向他详细谈了自己从童年到长征的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

斯诺在十月底秘密回到北平,把他在苏区采访获得的丰富材料写成书寄到英国,在伦敦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且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而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产生了相当轰动效果。以后,也被译成中文,用《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在中国国内产生广泛的影响,使众多的人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相。

红一方面军的西征胜利,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在陕北站住脚跟并胜利展开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直十分关心被张国焘强令南下的那部分红军的命运,争取他们早日重新北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向他们通报直罗镇大捷的情况,并告诉他们:“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三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24)一九三六年元旦,毛泽东在复电朱德时又通报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25)

但张国焘却一意孤行,在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理番县卓木碉另立党的第二“中央”,狂妄地宣称:“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鉴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

“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26)同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还商请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做张国焘的工作。张浩在二十四日致电张国焘等，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他建议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于张焘和中央之间的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27)张浩的电报在南下的红军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徐向前回忆道：

“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28)

张国焘越来越孤立，被迫在一月二十七日致电张浩、张闻天，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又提出“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这时，南下红军在不利环境下遭到国民党军重兵进攻，伤亡极大，由原来的八万人锐减为四万多人，给养困难，前途渺茫。红二、六军团又即将在任弼时、贺龙等率领下前来会合。这些，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在六月六日宣布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徐向前回忆道：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29)

七月一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六十八位在陕甘的党政军负责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及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指战员，庆祝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电文说：“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30)接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两军会合后，任弼时从张国焘处要来电报密码本，直接同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沟通了联系。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从七月初开始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北上同中共中央会合。

中共中央、毛泽东得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非常兴奋。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的进攻，迎接你们北上。“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31)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他们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第二天，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关切地询问：“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八月中旬可出甘南否？”

又说：“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的大变化，兄等行军情形盼时告。”在接到朱、任、张来电通报北上情况和决心后，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在八月三日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32）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八月底从豫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南下迎接二、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十月初进抵静宁、会宁地区。

蒋介石发现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立刻在九月初调集胡宗南、王均、毛炳文三个军，企图抢占西安兰州大道上的静宁、会宁、定西段，来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通路。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火速北上，向这一地区推进。这是一刻千金的速度竞赛。针对敌情的变化，中央军委在九月十五至十七日接连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兰大道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否则一、四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隔断。十六日到十八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县附近举行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根据朱德、陈昌浩等多数人的意见，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肯定了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方针。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立即致电前线指挥部徐向前、周纯全，下达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部署红四方面军各部向西兰大道静、会段前进。

可是，一向反复无常的张国焘会后立刻变卦，一赶到漳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又违背中央指示和西北局决议，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转头西渡黄河。朱德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向中共中央和军委报告，表示坚决维护原定的静会战役计划；致电张国焘，批评他擅自改变西北局的决定；同时，下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暂停行动，并通知西北局各成员速到漳县重开会议，再次讨论行动方针问

题。徐向前到临洮调查后，也查明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九月二十七日致电朱张，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33)同日，他们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34)

这样，张国焘才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四方面军各部从九月三十日起，分五个纵队相继从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地区前进。可是，时间已延误十天左右，使远道赶来的国民党军队胡宗南等部得以逼近这一地区，使红军三大主力会合时西北地区的局势变得十分严峻，增加了许多原来没有预计到的困难。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已命令红一方面军向南急进。十月二日，西方野战军的红十五军团骑兵团在绕过海原县城后，连续奔袭二十多小时，行程三百多华里，抢在胡宗南等部到达前，夺占会宁县城，为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创造了条件。

十月七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在会宁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会合。九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二十二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实现全部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结束了创造人间奇迹的长征，也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胜利。在抗日战争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历史时刻，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对开展新局

面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致电热烈祝贺三大主力的会师，指出：这一会合，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也致电毛泽东，兴奋地说：

“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一师的战士们携手见面了。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和蔼亲诚的态度，使我们景仰钦佩。”(35)

蒋介石对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十分震惊，命令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军共十几个师的兵力向北大举进攻，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正从会宁地区北移时，将红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把这个计划称为“通渭会战”。张学良把蒋介石的“通渭会战”部署通报给了毛泽东、周恩来。

中共中央和军委根据敌我态势，在同朱德、张国焘及红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协商后，在十月十一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一个月的休整时间，部署迟滞南敌和进攻宁夏的准备工作，其中要求红四方面军以一个军迅速选择渡河地点，加速造船，准备过河进入宁夏。

毛泽东在十月十三日致电红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请按十月份作战纲领准备作出宁夏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供给中央军委。”(36)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在十月二十三日抵达打拉池，同先期到达的彭德怀会合，共同商讨由彭德怀拟制的宁夏战役计划，表示“完全同意”。这个计划规定由红一、四方面军分两路西渡黄河夺取宁夏：一方面军主力先“略取灵武、金积沿黄河南岸地区，尔后渡河”；四方面军以三十军、四军渡河，控制



黄河左岸，攻击中卫，“吸引马鸿逵主力向中卫增援”，以配合一方面军的行动。

为什么红军在这时准备发动宁夏战役？这同毛泽东五月八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设想有关，也同当时陕北的粮食和武器给养十分困难、很希望得到共产国际援助有关。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曾写到：“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但如能给马鸿逵主力以打击，一个时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能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远方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关于西渡问题，当日内征求远方意见。兹先征求你的意见。”(37)以后，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在两条道路中更多地倾向于先取宁夏。九月十四日，他们给朱、张、任的电报中说：“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38)十九日，毛、周、彭致电朱、张，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话，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39)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致朱、张电中又嘱咐：按照军委《十月份作战纲领》已到黄河渡口的“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为宜”。“二十号开始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40)

在收到朱、张、彭十月二十三日所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后，毛泽东当夜十二时复电同意这个战役计划，同时因

国民党的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三个军和关麟征部一个师已迅速北上，在电报中又强调指出：“胡、毛、王、关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41)二十四日夜半，红三十军开始渡河，第二天全部渡完，控制了河西一片土地。这时，胡宗南等部在飞机掩护下向红军阵地猛扑，已先后占领会宁、通渭、静宁等地，向朱、张、彭所在的打拉池进逼。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急电朱、张、彭等：“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42)二十六日，已随红三十军到达黄河渡口的红九军，经中央军委同意后过河。四方面军指挥部一起过了河。二十七日，朱、张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转达中央军委指示，并说：“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43)三十日，国民党军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看守渡口的红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就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也撤到河西，看守船只，休整待命。这样，河东和河西两岸的红军被国民党军队割断。

十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参谋长，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抵御南敌北进。根据这个要求，彭德怀在十月三十日下达经中央军委批准的海（原）打（拉池）战役的部署，规定红一方面军六个师、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准备从东西两面歼灭胡宗南先头部队一至两个师；其余部队钳制毛炳文、王均二部。同一天，张国焘却命令四方面军两个军后撤，使海打战役的部署未能实现。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对阻滞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北上、重新恢复河东河西红军部队的联系，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中央军委随后致电朱

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地战胜敌人。”（44）彭德怀指挥红一、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由同心城李旺堡一线东移，待机歼敌。

由于国民党胡宗南等部进展很快，到达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路，隔断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已无法执行，被迫中止。孤悬河西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二万一千八百人，虽然控制了一条山地区，奋战十多日，但这一带的地形和生存条件十分不利，难以长期停留。十一月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张并毛、周请示行动方针，说明：“此方人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以作战。”“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尔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45）九日，河西部队经中央军委同意后改向人口较稠密的凉州地区前进。十一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西路军开始独立作战。

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后，中央军委对河东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求得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国民党军一至两个师，停止他们的进攻。这时，骄横不可一世的胡宗声孤军深入，独自分三路向豫旺县进攻。十九日，彭德怀到山城堡前线主持召开前敌总指挥部会议，拟定山城堡作战部署，命令各部迅即进到指定位置构筑工事，待机歼敌。二十日凌晨五时，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说：胡宗南的丁德隆第七十八师，“有经山城堡、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46）这时，周恩来代表

中共中央到前线慰问部队，应彭德怀的要求，留下共同指挥作战。红军各部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

十一月二十日，丁德隆的第七十八师进占山城堡等地。二十一日，彭德怀、周恩来指挥设伏的红军，突然向从山城堡东出的丁德隆师发起攻击，将他们大部压迫在山谷中，经过一天激战，全歼该师一个旅又两个整团，取得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进攻盐池的国民党军一部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这次战斗，迫使胡宗南部全线后退，基本上停止他们对陕甘苏区的进攻。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对击破蒋介石的进攻，稳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局面，发展革命力量，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奠基西北的一份厚礼。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3 月版，第 166 页。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3 月版，第 167 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 年 11 月 3 日。

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一级以上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记录，1935 年 11 月 30 日。

徐海东：《生平自述》，三联书店 1982 年 12 月版，第 47、48 页。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5 年 12 月 1 日。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3 月版，第 170、171 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 年 12 月 23 日。

张浩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 年 12 月 23 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89—597页。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74、375页。

郭洪涛：《迎接毛泽东到陕北》，《说不尽的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71页。

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记录，1935年12月17—2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月17日。

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给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2月17日。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1936年3月10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3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5日。

毛泽东、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6年4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5月8日。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96页。

(22)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7月14日。

(2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61、65、66、69页。

(24)彭德怀、毛泽东致朱、张、刘、徐、陈电，1935年12月2日。

(25)毛泽东致朱德电，1936年1月1日。

(2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页。

(27)林育英给张国焘、朱德的电报，1936年1月24日。

(28)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56、476页。

(29)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56、476页。

(30)《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页。

(31)毛泽东、周恩来等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同志电，1936年7月22日。

(32)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复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8月3日。

(33)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张国焘等的电报，1936年9月27日。

(34)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张国焘等的电报，1936年9月27日。

(35)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给毛泽东的电报，1936年10月10日。

(36)毛泽东给彭德怀电报，1936年10月13日。

(37)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6月29日。

(38)毛泽东、张浩、洛甫、周恩来、博古致朱、张、任电，1936年9月14日。

(39)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张电，1936年9月19日。

(40)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张电，1936年10月19日。

(41)毛泽东致彭德怀并朱、张等电，1936年10月24日。

(42)毛、周致朱、张、彭，并致贺、任、徐、陈电，1936年10月25日。

(43)朱、张致徐、陈并报毛、周电，1936年10月27日。

(44)中央军委给朱、张、彭、贺、任电报，1936年11月15日。

(45)徐向前、陈昌浩致朱、张并毛、周电，1936年11月2日。

(46)毛泽东给彭德怀电报，1936年11月20日。

## 十七、西安事变前后

山城堡战斗结束后不到一个月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直接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西安事变的发生 ,是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激化的产物 ,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特别是加强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工作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内 ,这项工作是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的。

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时 ,由于蒋介石还没有明确的抗日表示并且正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军事“追剿” ,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是“抗日反蒋” ,而把工作重点放在有可能联合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方面。经过几个月的工作 ,包括释放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回洛川等 ,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初步达成“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的秘密协议 ,开始形成互不侵犯、互通商、互派代表的新格局。

这时 ,南京政府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同中共接触 ,他们的代表来到陕北。毛泽东、张闻天等向他们提出了五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 ,全国武装不分红白 ,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 ,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 ,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一九三六年三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专门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毛泽东作报告。他指出：在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形势下 ,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已发生分化。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 ,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 ,对民族革命派



采取各个争取 ;争取民族改良主义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他特别指出：“东北军之特点：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绪高，愿与我们合作。”对张学良要实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出全权代表同张学良直接谈。不管任何派别，都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而在基本原则不能让步。报告提出，军事谈判集中于军委，政党谈判集中于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赴延安同张学良会谈。

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也在逐渐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给博古转周继吾的信，1936年3月4日。发生变化。四月九日晚，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现在保存下来的电稿后面有一个注：“此电刚发，接到洛甫来电，所说立场同意”。就在同一个夜晚，周恩来在延安同张学良会谈。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当张学良提出“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时，周恩来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表示愿意听一听张学良的意见。张学良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蒋的错处在于他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周恩来听完后，对他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并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作最后答复。张学良高兴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

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可见双方在新形势下对这个问题已有了大体相同的认识。

红军东征胜利回师，五月五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 通电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的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且将旧称“蒋贼”改为“蒋氏”，这一字之改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军事报告讨论的结论时，再次强调：“东北军工作要加紧做”，“东北军工作首先是政治上团结。”

不久，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将粤、桂军改称“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被称为两广事变。毛泽东在六月八日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有个别分子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 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时局发展到新的阶段”：日军入侵华北，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华北，中国内部整个起了很大变化。“我们说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

红军东征回师后，毛泽东找东征中俘获的阎锡山部团长郭登瀛谈话，要他带信给阎锡山，表示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接着，又派彭雪枫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山西太原同阎锡山联络。

他还分别写信给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等，争取和他们实行合作抗日。

毛泽东倾注了更大精力的是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根据这个原则，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军、师、团三级的工作，派较得力的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合作抗日的道理。他特别指出，“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

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称赞周恩来领导的这项工作“可为很好的模范”。并且提出：过去我们的工作方针，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抗日联合战线。“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以前的三个，但次序要变更，第一是联合战线的扩大，应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现在大家应该出马，不应该关起门来。不仅要注意上层，还应该抓紧中层的工作。红军的行动也应该配合这一工作。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这个提议。

对张学良的复杂处境，毛泽东十分关心。他在八月九日写信给张学良提醒他：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

在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建立联系后，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的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同一天，又写信给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希望他继续推动杨虎城下决心联共抗日：“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杨虎城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十分感动，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

中共中央也和国民党直接对话，努力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这封信七月十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宣布后，产生了积极的反响。蒋介石的报告中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比他在国民党五大上所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显然又进了一步。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同日本驻华大使谈判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在九一八事变以来还不曾有过。

日本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许多人员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情绪。他们原来一直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够适可而止，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期待国际社会能对日本实施制裁，使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但这些希望都落了空。华北事变的发展，特别是

日本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的出台，把南京政府逼到几乎无路可退的地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开始考虑大幅度调整它的对日政策。

国内的局势发展得很快，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七月底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对东北军和整个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和结论。报告中说：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方针，在战略上没有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是变了；战术既大变，将来有可能影响他们战略的动摇。报告说：我们三月提出谈判的五条原则后，他们在五月答复时提出四项办法〔注：（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抗战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些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从这可以看出蒋介石有动摇的可能。他们五届二中全会来信对谈判又提出新的四条〔注：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称这四条是：“（一）尊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这新四条同五月的四项办法有些变化，现在是着重统一，对红军开赴绥远抗日没有提。“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方针。”从蒋介石的态度来看：“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使群众对他改变态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为要达到真正的抗日，必须要经过这样中间的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毛

泽东还在结论中提出：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后抗日，我们是要他先给抗日的民主，要看他做到怎样程度，才同他讲统一。“我们又要抗日，又要统一。”“‘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现在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也指出：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这次会议标志着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结束，决定了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会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之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等。

会议决定发表的“公开宣言”，就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它叙述了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严肃地批评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和它造成祖国大片河山沦丧的严重后果，同时也肯定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有了若干进步”，但仍不能满足全国人民强烈抗日的要求。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国民党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它在最后明确提出“国共的重新合作”的建议：“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至于我们方面是早

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

会议决定在党内所发的“秘密文件”，就是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指示提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1)

九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又作了三次长篇发言，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他说：对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领导，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有力量领导和没有力量领导的问题。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同。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我们在大革命时联合了它。当前经济危机加深，日本压迫，“使民族资产阶级又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我们重新提出和资产阶级联合，有苏区、红军的存在，应当由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抗日的胜利。事实证明，也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过，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的，现在正在争。“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22)他还说：加紧对南京政府以外的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会议为适应新的形势，决定改“人民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并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会后，毛泽东草拟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在九月二十日前后脱稿。协定草案共八条，其中规定：为



实行对日武装抗战，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建立民主共和国，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国民党方面承认：停止进攻红军与进犯苏区，划定红军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允许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政治犯。共产党方面承认：红军不向国民党区域攻击，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言论与行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的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指挥与统一编制。这个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自从中央政治局确定了以南京政府作为主要的谈判对手以来，毛泽东在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外，还直接致信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和王均、朱绍良、毛炳文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他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领袖，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敬佩。他还努力同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分别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与支持。

在这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部的工作。九月，他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协议。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在西安，公开身份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十月初，毛泽东等又派叶剑英到西安张学良部作为中共中央的常驻代表，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到一九三六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当然，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走的不是一条笔直的路，中间又有不少波折。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了。在他看来，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由他们收编。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来强行解决，他仍认为是“上策”，还要再试一试。

当“两广事变”被南京政府以政治收买和军事讨伐的办法解决后，蒋介石认为又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对付红军和共产党了。他一面邀请周恩来在广州或香港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胡宗南部就是在这时又调到西北向红军进攻的，想给红军以大的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讲条件。

处在从内战到抗日的转变关头，毛泽东善于运用灵活的策略，对蒋介石采取的多种手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他致电驻在张学良处的刘鼎，告诉他：“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在政治上，当蒋介石邀周恩来前去会谈时，毛泽东指出：“先停战，后谈判。”蒋介石大举进攻西北的情况，使周恩来无法前去，但中共中央仍派潘汉年到上海去同南京方面谈判。从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十九日，他同南京政府代表陈立夫进行了三次会谈。陈立夫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态度十分强硬，提出在陕北的政权必须取消，红军只留三千，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等。这样，谈判只能搁浅。到十二月初，当陈立夫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败后，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

这时，毛泽东认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十一月十三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然而

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23)十二月一日，他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十八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24)

可是，蒋介石却视毛泽东等的忠告为软弱可欺，认为，红军的处境已难以为继，又变本加厉地调集三十万军队准备“围剿”红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带着这批人和其他军政要员飞抵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蒋介石住在临潼华清池附近的临时行辕里，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张学良、杨虎城无法接受这两个方案，痛哭流涕地向蒋介石“苦谏”，反又遭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这就把张、杨逼到了绝境，加上西安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推动，终于驱使张、杨下定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吾等为

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25)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电报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周恩来在同一天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26)

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很突然，情况还不很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观察，会上对许多重大问题只是交换意见，需要在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毛泽东先发了言，最后又作了结论。他在发言中提出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他断言：“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他的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他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他当时的设想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他着重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27)与会者

还有九个人发了言，其中讲得最激烈的是张国焘。他说：“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28)

张闻天不同意这个意见，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29)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针对张国焘“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毛泽东强调：“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30)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再次电告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31)周恩来等先到延安，十七日乘坐张学良专机抵达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事变。

周恩来在十七日到达西安，立刻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他已同张学良商定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防。电报中还报告说：蒋鼎文已释放，持蒋介石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明日来西安。“我们商定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32)第二天，周恩来又两次来电报告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

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33)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况和建议。

在收到周恩来来电的同时，毛泽东又获悉：日本外相十七日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他和张闻天、博古等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十八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表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要求国民党：“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权，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并表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34)

十二月十九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这时，西安事变发生后各方面的情况已比较清楚，中共中央已有可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我们必须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是完全不对的。”他接着说：在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由于南京政府不立刻对日抗战、尤其是由于蒋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它“能更促进抗日(力量)与亲日(力

量)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这是光明的一面”。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以打击”。他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当时,苏联《真理报》两次发表评论,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造成的。毛泽东不同意苏联的这种说法,指出:“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他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表示:“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35)

会议讨论时,政治局内部的意见很一致。博古表示:“我完全赞成毛主席这个解释。”我们应着重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不是蒋个人的问题,“不采取与南京的对立”。(36)张闻天说:“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37)

毛泽东作结论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38)

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表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于政治局内部意见已很一致,这个通电并没有等候共产国际的来电,就在十二月十九日当天发表了。

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毛泽东在十九日这一天就起草并发出十四份电报。其中,发给在西安的周恩来的电报有十一份,通报了中央的决定并提出具体的工作部署。发给在前线指挥军事的彭德怀、任弼时

的电报有两份，命令他们率领野战军急行军直达长武待命，并派八十一师和二十八军开赴延安接受任务，给张杨以实际的援助。还致电在南京的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共产国际的来电，是在第二天（二十日）收到的。它的内容和中共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基本一致。毛泽东立刻在当晚八时把它转发给周恩来。共产国际来电的全文如下：

“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39）

潘汉年那时正住在南京宋子文公馆里。这是因为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急于了解中共的态度，经过宋庆龄的介绍，潘汉年从上海到南京住进了宋公馆。他收到十二月十八日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立刻把它交给宋子文转送国民党中央。他还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特殊身分，从旁支持宋美龄等力排众议，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当他接到毛泽东十九日的密电后，又把刚刚译出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立刻交给宋子文，并说：宋委员最了解张学良将军，他一定会热情欢迎您去西安的。宋子文认为潘汉年这个话反映了中共的意向，就在经过同亲日派的辩论后获准“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二十日上午，宋子文由顾问端纳陪同飞抵西安。张学良在见到宋子文时，坦率地告诉他：只要蒋答应张、杨通电中的八项主张，东北军、



十七路军和红军将一致同意释放蒋介石。随后陪同他一起去见蒋介石。周恩来也明确转告宋子文：中共并未参与此事，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他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第二天，宋子文飞回南京。

毛泽东在二十一日又致电潘汉年，提出同南京政府谈判的五项条件，要他立刻向陈立夫等提出，并且表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40）

潘汉年立刻向陈立夫等提出，并且从旁促进宋美龄去西安。二十二日，宋美龄接到张学良欢迎她前往西安的电报后，立刻在端纳、宋子文等陪同下飞赴西安。

周恩来在西安极为复杂的环境中，机智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双方谈判创造了良好条件。谈判从二十三日上午开始，南京方面出席的有宋子文，后来又加上宋美龄，西安方面出席的有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一开始，张、杨重申他们在通电中提出的八项主张，周恩来也说明中共的六项主张。经过两天谈判，宋美龄和宋子文对谈判的一些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承诺。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当面向他作了表示。那就是周恩来当时向中共中央所报告的：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41）

张学良以为蒋介石已经承诺了和谈条件，又怕时间久了在内部会横生枝节，经宋子文请求，就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同意蒋介石离开西安。他事前没有告诉别人，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下午三点多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乘车直奔机场。蒋介石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



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42)看重义气而经验不足的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反而遭到蒋介石的扣留和囚禁，长达半个多世纪。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这是客观上包含了这一意义。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他进一步分析西安事变能够造成这个转变实现的原因：“西安事变这样的收获不是偶然的，因为国民党已开始动摇，酝酿了很久。”“他们内部矛盾发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变便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酝酿成熟、时局转变的焦点。西安事变是划时代转变新阶段的开始。”

他也清醒地看到，西安事变虽然取得了这样重大的收获，并不是什么问题都已解决了，中间还会发生障碍，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他说：“国共合作虽然说了很久，尚未实现。联俄问题，亦在动摇中。”“西安事变仍是在发展中，我们应该教育落后(分子)，更多的争取中间分子。”但他对前途是乐观的，在作结论时说：“关于内战是否结束？我们应该说基本上是结束了。至于前途，不是内战或是抗日的问题，而是抗日迅速与迟缓问题。”(43)当事态正处在发展变动中的时候，毛泽东就作出这样明确的判断是很及时的，也是富有预见性的。

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的。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说来，它来得很仓促，不可能在事前作准备，中间又经过不少曲折。党必须根据急速变化着的政治局

势，迅速作出判断和处置，这实在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尽管在有些问题上对情况的了解和认识不能不有个过程，但从大的方面说，党对事变独立作出的各项决策是及时而恰当的，从而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标，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熟。

蒋介石在西安时虽然对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作出了重大承诺，但他回到南京后，态度又有变化，时局的发展出现过一些曲折。这也是毛泽东已经预见到的。

一九三七年元旦，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张学良、进攻西安的危险。并作如下处置：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秘密通令东北军、西北军紧急动员，防御亲日派进攻，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加紧晋、绥、川、桂、直、鲁的活动，反对内战。同一天，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共产党“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44)

第二天，毛泽东针对南京政府扣留张学良后又向西安进兵、西安内部群情激愤的事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进一步提出：“自从释蒋后，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目前我们的方针，仍是要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所不同的，对军事上应有准备，对西安更要积极地帮助与团结。”“现在不仅是西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45)同一天，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任弼时及各军团首长：为策应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积极作好准备，反对敌人的分化孤立政策，巩固西北抗日联合的胜利，推动时局的发展。

西安事变后几天，原来在延安的东北军就撤向西安一带集中。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由红军接管延安。中共中央机关随即从保安迁往延安。毛泽东也在一月十三日一起来到延安。他们在路上走了四天时间。快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延安，在陕北来说是个大地方，现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我们一定要很好地联系群众，要注意群众纪律，要对群众多做宣传工作。从这时起，他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了整整十年。

一月二十四日，他在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报告了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谈到国民党中央军继续由潼关西进时，他说：“对西安事件的分析，第一个阶段是进兵，第二个阶段是趋向和平。所以能趋向和平，就是因红军靠近张杨。现在已一般的趋向和平了。”(46)在讨论中，他再次发言说，对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应该有表示，应该有新的问题。比如：说明我们要建立的不是西班牙那样的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说明西安事变中我们的立场是和平解决，放了蒋介石以后我们军队开去还是为着和平；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国成立，我们就愿意成为统一的区域，苏区是特别的，但也归他管辖。

经过毛泽东、张闻天等的酝酿和起草，二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电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明确表示，如果国民党三中全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为了达到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作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

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47）

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新形势下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这样做，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说：“此电发表，各方面看法是不同的：托派必说我们投降，左派怕我们上当。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48）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在第二天发出后，得到全国民众的热烈支持，并且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在二月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多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仍使用反共的语言，但所提的谈判条件同中国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在实际上是相近的。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后，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停止了反对国民党的活动，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准备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准备在苏区用民选政府代替苏维埃制度等。南京方面，也作出积极的反应：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取消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而且拨发红军作为国民革命军部队应得的饷金的五分之三，即三十万元。

为了使国民党的政策进一步转变，从二月份起，周恩来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三地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设不设总

指挥部，苏区地位、行政长官人选，两党合作的形式及纲领，共产党公开活动的时间等问题上。当周恩来在杭州直接同蒋介石谈判后返回延安途中，毛泽东曾电告彭雪枫：“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致承认。”（49）由于蒋介石还缺乏足够的诚意，谈判中对许多重大问题一时还没有取得结果。

为了推动“联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毛泽东多次写信或致电给蒋介石、阎锡山、杨虎城、孙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刘湘、何香凝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五月，他亲自布置并接待了十年来第一个担负和平使命前来苏区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表示要实现国共合作，打日本，救中国。

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三月初，他在延安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史沫特莱。毛泽东对她说：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只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保持善意中立。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战线，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汉奸在外，这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广泛得多。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到这种转变开始的证据。

关于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老早就不仅是信仰共产主义，而且同时也信仰过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对外抗战求得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与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50)

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记录稿又带一份给埃德加·斯诺，附信说，这表示“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请他广为“宣播”；也把这个记录稿寄一份给上海《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请他在可能时把它发表。

一个月后，毛泽东又在延安同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他说：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纲领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务。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须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民主制度是对日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各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而斗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实际  
上接受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标志着“联蒋抗日”进入  
了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及时提出新阶段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  
日 ,在中央政治局听取博古关于西安事变经过的报告后 ,  
毛泽东说 :“我们过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 ,现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对全国工作的布置更为需要。”他说 :  
我们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是大的让步 ,是带原则性的让  
步 ,为着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为着抗日。对于土地问题 ,  
在大阶段来说是不放松的 ,但在目前阶段是应停止没收土  
地的。苏维埃制度过去十年的斗争是对的 ,现在改变也是  
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有解释清  
楚的责任”。(51)

这时 ,一个惨痛的损失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  
他们自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渡过黄河以西 ,到一九三七年  
三月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 ,歼敌二万多  
人 ,表现了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西安事变和  
平解决后 ,中共中央同南京政府交涉 ,要他们下令正在河  
西走廊不断攻击西路军的马步芳部停战让防 ,又派人去青  
海同马步芳谈判 ,要他们停止攻击。由于他们毫无诚意 ,  
谈判没有取得结果。三月五日 ,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  
西军出发西进。不久 ,因西路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失败 ,  
援西军停止西进。

三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毛泽东在发言中讲了三个  
问题 :

第一 ,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他说 :有  
许多原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 ,  
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对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 ,一  
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 ,但对蒋介石的变化



没估计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我们的政策的变化，国民党的政策的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民主义在理论上也要改一改。（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通过的决议看，是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这一转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

第二，关于过渡阶段问题。他说：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

第三，关于领导权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使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52）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讨论了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问是全部错误的。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



的。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他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历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从头干起。(53)三十一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为了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苏区、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中的党的正式代表二百十八人，列席的有六十四人。这是一次人数众多、代表性广泛、意义重大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并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和结论中，着重论述了三个问题。

首先，他从分析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关系的变化状况出发，由此确定党的任务和方针。他说：“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他敏锐地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他又冷静地估计到：国内矛盾虽已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依然存在，需要适当地调整，这就是还要提出民主政治、改良生活等方针的由来。从一九三五年一二九

运动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 ,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 ;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第二阶段 ,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这些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在结论中 ,他批评了那种由于片面地或表面地看问题而形成的否认国民党已开始转变的“左”倾观点 ,指出这种观点看不见旧阶段的结束和新阶段的开始 ,因而不提出新任务 ,不敢前进一步。

其次 ,他提出并阐明目前阶段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他说 :和平已实现 ,但并不巩固 ,也不等于抗战已经实现。为了巩固和平 ,实现抗战 ,必须具备一个必要的条件 ,即争取民主。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 ,而是前进一步 ,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 ,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 ,才能实现抗战。他批评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 ,仅仅应该强调抗战”的看法 ,指出 :“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 ,没有民主自由 ,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 ,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 ,没有民主自由 ,便无从进行动员。”“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 ,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所以 ,必须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 :第一 ,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 ,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 ;第二 ,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

再次 ,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 ,阐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他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 :“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 ,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 ?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 ,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 ,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怎样通过它的政

党实现政治领导呢？毛泽东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最后，他号召全党不断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尽速造就德才兼备干部，增强党内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和中共中央接着召开的白区代表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7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7日。

毛泽东、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6年4月9日。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34、35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1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5月28日。

毛泽东：《关于西南事变的谈话》，1936年6月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6月12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版，第 30—31 页。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1936 年 7 月 1 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 年 7 月 27 日。

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信，1936 年 8 月 9 日。

毛泽东写给杨虎城的信，1936 年 8 月 13 日。

毛泽东写给杜斌丞的信，1936 年 8 月 13 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版，第 44、46 页。

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 71 辑，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的记录，1936 年 8 月 10 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 年 8 月 10 日。

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1936 年 8 月 12 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版，第 77、87、89 页。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版，第 77、87、89 页。

(2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 年 9 月 15 日。

(2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 年 11 月 13 日。

(24)毛泽东、朱德等给蒋介石的信，1936 年 12 月 1 日。

(25)张学良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12月12日。

(26)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2日。

(2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28)张国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29)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3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31)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电报，1936年12月13日。

(32)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7日。

(33)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8日。

(34)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

(3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6)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7)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9)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36年12月20日。

(40)毛泽东给潘汉年的电报，1936年12月21日。

(4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版，第 73 页。

(4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版，第 73 页。

(4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报告和结论的记录，1936 年 12 月 27 日。

(44)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电报，1937 年 1 月 1 日。

(4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 年 1 月 2 日。

(46)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 年 1 月 24 日。

(4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版，第 157、158 页。

(4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 年 2 月 9 日。

(49)毛泽东致彭雪枫电，1937 年 4 月 1 日。

(50)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1937 年 3 月 1 日。

(5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 年 2 月 11 日。

(5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 年 3 月 23 日。

(5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 年 3 月 30 日。

## 十八、总结历史经验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

毛泽东在对待理论工作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在他看来，有了正确的理论，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停留在初级的感性阶段，而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内部规律性，用来自觉地指导行动；而这种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只能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段富有传奇性的艰险而曲折的道路。它在实践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惨痛的失败，积累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经验，也有过“左”的和右的沉重教训，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四年统治，更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但它是在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了变动，其他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谈到博古时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可见，他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正在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的审视。

这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也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订出正确

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订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

陕北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能传送到这里,也都便于毛泽东有可能从理论上全面地回顾和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把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给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所作的报告。

在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产生重大变化。“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长时间内无视这种重大变化。毛泽东在报告里,一开始便从千头万绪的现实生活中,十分鲜明地指明了当前主要矛盾之所在。他说:“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全国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接着指出:“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和



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具有两面性：既不喜欢帝国主义，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但在今天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他们是有变化的可能性的。即使是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也是要发生破裂的。

基于对现实状况的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为了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在党内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样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他说：

“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在这篇讲话中，他着重谈了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统一战线和关门主义这两种不同的

正相反的策略，作了强烈的对比：“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究竟哪一种策略的道理是对的？他依然用事实来作回答：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报告，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了完整的分析和论述，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为全党进入抗日战争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他的论述，处处以正在发生巨大变动的客观事实为出发点，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具体特点为出发点，反对那种不顾事实的、凝固而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说明他的思想正在进一步走向成熟。

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后，毛泽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党的军事路线上来。他说：“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这就必须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从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在经过长时间准备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他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略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也是党内军事问题上一场大争论的结果。这场大争论，在长征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激烈地进行着。瓦窑堡会议后，李德又不同意会议通过的东进的军事战略方针。他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意见，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状况，主张“巩固与发展苏区创造新根据地”，武断地认为“我们转入进攻是过早的”，“政治准备不充足”，结果就会“退却和逃跑”，以反对会议决定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并且说“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的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生怕把苏联牵进到军事冲突中去。这种离开“发展”来谈“巩固”的主张，其实又是在重复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那种单纯防御战略。从当时陕北的实际情况来看，更是不适宜的。毛泽东立刻指出，它是在革命进攻下的保守的单纯防御战略。这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开会时，讨论了李德的《意见书》，许多人在发言中批评李德的错误主张，并且作出决议：“战略决定由毛主席写。”这件事，也促使他下决心系统地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斗争上的经验教训，来写这本书。

毛泽东对这件工作做了十分认真的准备。他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到一批军事方面的书籍。他反复地精读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认真研究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籍等，还研

读了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他后来多次讲到：在遵义会议时，有人说我打仗是照《孙子兵法》打的，其实我当时并没有看过这本书，倒是到了陕北后才读了这本书。他还组织一些富有实际经验的干部一起，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来研究和讨论这些军事理论问题。

通过学习、讨论和研究，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由来。

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指出：战争是有规律的。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因此，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

他十分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

他又十分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

“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自然，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

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如果丢了这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二、敌人的强大；第三、红军的弱小；第四、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正是从这些特点，产生了我们的战略战术。

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十年内战中以“围剿”和反“围剿”为主要形式的战争的历史经验，并且就九个问题作了说明：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

在“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中，他写道：“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

在“战略退却”中，他写道：“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谁人不知，两

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在“集中兵力问题”中，他写道：“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他还着重地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在“运动战”中，他写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在“歼灭战”中，他写道：“‘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击溃战，对于

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怎样才能学会正确地指导战争？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主观和客观的一致。在指导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极其重要的：“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下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下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他所说的“用心思去想”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和客观的实在情况相符合。他写道：“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毛泽东详细地描述了一个军事家正确地指导战争时的整个认识过程：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



——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毛泽东在这里叙述的认识过程，实际上已超越军事科学的范围，而具有一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它同以后《实践论》中的论述，只有一步之隔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它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为深厚根基，以实践为主要源泉，充满着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特色。中国革命战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进行的。陈毅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曾作过这样的评论：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他说：“拿起落后的武器，和具有新式武器的敌人作战。我们是弱者，就不能斗力，斗力打不赢人家，我们就讲究斗智。因此我们战略思想最发达，我们的脑袋最发达，靠脑袋吃饭。”“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战略战术特别发展。这种军事思想为什么又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起来呢？就是他能根据这些特点，总结经验，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天才。”



政治路线也好，军事路线也好，都离不开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

毛泽东到陕北后，就努力阅读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哲学书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去访问他后，记述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调原驻延安的东北军增援东线，延安由红军接管。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到延安后，他又挤出不少时间，不分昼夜，发奋攻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读过并作过批注的哲学书籍就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他在前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约一万二千字，在后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有二千六百多字。批注的内容大约有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郭化若回忆道：“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國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

义。他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毛泽东应红军大学（后来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总政治部把他讲课的记录稿整理出来，经他同意，打印了若干份。以后，毛泽东把其中的两节，经过整理，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的一次更深刻、更系统的哲学总结，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也是对曾经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思想的有力批判。

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实践论》就是以认识与实践的正确关系为核心，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出发，强调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社会实践是推动人们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的动力，也是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因此，“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那末，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毛泽东说：人的认识过程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这是认识的感性阶段。“社会实践的继续，

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是认识的理性阶段。前者只解决现象问题,后者才解决本质问题。“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

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违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条主义者否认认识开始于实践,否认感性认识的必要性。他们总是从书本出发,忽视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生吞活剥地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中的个别词句去指导革命。经验主义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片面的感性认识,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而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们在认识论的全体上都是错误的。

《实践论》提出: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并不意味着认识过程的完结,它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是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又是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的一个飞跃。理论之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并不能由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要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结果,在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纠正其不完全性和错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如果人们从社会实践中得到感性认识,再由感性认识推移到理性认识,造成某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用来指导实践,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但是,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性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在《实践论》结束时这样写道: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写道:“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他的另一篇重要哲学著作《矛盾论》就是着重阐明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矛盾论》一开始就论述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人们不仅以其对物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不同回答被划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阵营,而且还以其对世界发展的不同回答被划分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大阵营。形而上学宇宙观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上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其原因不在事物

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由于外力的推动。和形而上学相反，唯物辩证法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他得出结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矛盾论》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是从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开始的。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二是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文章着重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必须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从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来看，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艰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分析事物，不了解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因此，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中，不分析和研究中国国情，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生搬硬套于中国革命。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

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结果,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分析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他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它对事物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当然,这种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过程阶段的推移,主要矛盾可能降为次要的,次要矛盾也有可能上升为主要的。

“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他又指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其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在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地位也不是固定的。由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双方斗争力量的增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可以互相转化。如果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着变化。

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说明在领导革命时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实际情况变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就会随之变化,共产党人的政策和策略也必须随之改变。

《矛盾论》还进而论述了关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对立面的同一性有两重意义:“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

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他又指出：所谓矛盾的斗争性，就是说处于统一体中的矛盾双方自始至终进行着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并且促进这一事物向他一事物转化。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互相转化。

《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两篇论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为日后系统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两篇论文又从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指出党内发生“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原由，为延安整风，特别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作了重要准备。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6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143、151、152、153、154、155、18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143、151、152、153、154、155、186页。

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3月26日。

陈毅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5月1日。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311、312页。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67、68页。

郭化若：《学习与回顾》，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版，第 201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 3 月版，第 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284、285、290、29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282—297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 3 月版，第 6 页。



## 十九、全民族抗战的爆发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在北平的南大门卢沟桥附近，日本侵略军突然向驻守在这里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奋起还击。卢沟桥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枪声，标志着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开始。

第二天，消息传到延安。

那时候，整个局势会怎样发展，还不十分明朗。这以前，日本在华北已曾多次制造过地方性的武装挑衅事件。卢沟桥所发生的，究竟是一次地方事件，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军事进攻的开始？许多人一时还不能看得那么清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立刻作出判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必须立刻旗帜鲜明地喊出这个口号。

七月八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这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的基本政治口号。这个口号，成了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及时地提出这种具体目标，是谈不上政治领导的。

国民党政府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鉴于自身的统治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也在进行抵抗侵略的准备。但他们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他们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了，在国共合作的谈判中不断横生枝节，使谈判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当时在延安担任军委参谋长的

萧劲光回忆道：“国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党与国民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问题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我们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针毡，焦虑万分。”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的态度，进行总揽全局的考虑和部署。七月十四日，他在内部发出指示，提出当前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包括两个方面：“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

毛泽东深知，要促成蒋介石下定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单靠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国造成一种声势。毛泽东指定南汉宸，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名义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他自己在七月十四日至二十日间四次写信或致电给阎锡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张云逸奔走两广当局之间，“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他还和张闻天一起致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他们要求各事，我们都同意，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

在推动蒋介石下定抗日决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自身积极地进行抗日参战的一切准备，并表明愿同南京一道去做。七月十三日，在延安召开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到会动员，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十四日，毛泽东等致电叶剑英，要他

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十八日，延安召开市民大会，毛泽东到会讲演。据当时报纸记载：“演词激昂，听众均磨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

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共产党的积极主张，一扫国内的沉闷政治空气。要求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到处沸腾起来了。“各地的大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各地党部，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及各地方的军政长官，也表示了他们的积极，提出了抗战的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到处要求行动的统一，并且到处组织了这类统一救亡的组织，这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

七月十七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大的进步。

蒋介石谈话发表后，毛泽东很快就表示欢迎，他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特别是没有宣布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没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对中国共产党仍不允许公开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局势越复杂，对毛泽东说来，仿佛倒越能显示出他善于在千头万绪中迅速抓住要领的本事。蒋介石庐山讲话后不到一个星期，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

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又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三）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四）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六）国防教育；（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另一套是同它相反的办法。毛泽东指出：实行前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后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他表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文章又指出，为了这样做，“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他强调：“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这几句话正是对国民党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正如英国记者贝特兰所说：“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诚恳的。显然他注重的并不是指摘‘缺点’，而是坚持他认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张是很充足的。”

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国性抗战的同时，红军参战的实际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已向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时要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聂荣臻回忆道：“到七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

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

随着华北局势日趋严重，蒋介石仍不肯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但几番催促红军迅速出动。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八月十五日改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但红军“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

由于红军即将开赴前线，一个新的课题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红军在抗日前线应该怎样作战？这时周恩来、博古已赴云阳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他们，对会议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突出的地位。这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电报说：“（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同一天，毛泽东和张闻天又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针对蒋介石已经表露出来的准备将红军分割使用、同日军硬拼消耗、逐步给以削弱以至消灭的企图，提醒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这些意见，对红军改编后保持独立性和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有重要意义。

七月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平津的失守是‘九一八’后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失，这使中国失去华北与中国西北部的最重要的屏障”。接着，日军沿平汉、平

绥、津浦三条铁路作扇形推进，向华北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在日军的进逼下，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往。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又电请朱、周、叶到南京后代表中共提出对整个国防问题的建议，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这个方针是中肯的，是切中当时国民党军队战略上的弊端的。意见中还说：“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意见最后强调：“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五日，毛泽东收到红军总部从云阳发来的《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主张：我们对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的补充与使用兵力的自由；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便于作战的察、绥、晋三角地区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方。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回电中强调：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应该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而不是三角地区，作为协助友军作战的地区；“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同时，要求本着“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显然，毛泽东对红军作战方针及兵力使用等问题采取慎重的态度。

他所以一再强调这些问题 ,除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长期性和红军自身的特点外 ,还由于看到蒋介石对待国共关系问题上已表现出许多不正常的现象 :一面要红军全部出动 ,一方面却在陕甘一带部署了十个师兵力。不久前在南方游击队改编时又出现闽粤边部队被国民党军队诱骗缴枪的事件 ,毛泽东认为这是 “ 极严重教训 ,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 ” (21)。他还认为 :“ 平津失陷后蒋之困难更加 ,但抗战决心与合作诚意增加至何种程度待尔后证明 ,此时宜缓不宜急 ,缓则有效 ,急则无功。 ” (22)

由于红军出兵在即 ,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又未必完全一致 ,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 ,统一思想。他提出 :“ 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 ,同时讨论作战问题 ,地点在洛川。 ” (23)

当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一时来不及集中 ,因此 ,八月九日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先开了一次会。

这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 ,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 ,由张闻天作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 ,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 ,他十分明确地断言 :“ 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 ,新的阶段在七月七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 ,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 ” 对国民党的状况 ,他采取有分析的态度 ,说道 :“ 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 ,离彻底转变还远 ”。“ 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 ,应战主义是危险的。但这还要很多的工作才能转变 ,应战主义实际是节节退却 ”。谈到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时 ,毛泽东说 :“ 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 ,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 ,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 ,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 ,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 ,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 ,防人之心不可无 ,应有戒心 ,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 ! ” 在反倾向问题上 ,毛泽东同



意张闻天报告中所指出的：“一是急躁病，二是适应国民党的适合主义”。提出要“保持组织的独立性、批评的自由”。(24)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八月五日和张闻天一起发出的电报中说的是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而在仅仅四天后的这次会议上他却谈到“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可见，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是他在红军出动前夜这个关键时刻反复思考的关键问题。

这次会上，毛泽东还对七月二十三日文章中的抗日八项办法提出补充，初步形成“十大纲领”。四天后，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时，将这个文件交给她。海伦后来回忆：“毛泽东拍案而起，他满面通红，两眼闪光地说：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这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着后一句话。”(25)

这次会议为十多天后召开的洛川会议做了准备。

红军各部已陆续准备就绪，随时准备开赴前线。但是，在南京的谈判却并不顺利，国民党方面在各种问题上诸多留难。直到八月十三日淞沪抗战爆发，谈判才出现转机。

日本军队的大举进攻上海，使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使蒋介石感到不得不进行全国性的抵抗，否则自身的统治也难以保持，于是，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周恩来后来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指蒋介石）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26)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同国民党经过反复谈



判，终于达成协议：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这时，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已陆续赶回陕北。中共中央认为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由于会议要讨论军事问题，吸收了前方主要将领参加，实际上成为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会址设在洛川城郊冯家村的一所小学里，这是一个比较偏僻而安全的地方，又正处在延安同前方将领所在的云阳的中间。毛泽东住在村中一座破庙里。萧劲光回忆说：“党中央就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27）

洛川会议是在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的。会议的议程是：（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作了多次发言。

他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现在已经开始政府的抗战，而且得到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这就成为现在的弱点与今后的任务——使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28）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提出了五条：“（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并且说明：前四条是要实现的，后一条是要争取的。他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作战

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29)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前期，经历过两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这个转变曾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次是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毛泽东一年多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后一次战略转变时说：这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是在敌人、友军、战场都有变化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30)这一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关系非常之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红军还没有开赴前线的时候，在仔细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后，便明确地及时地提出要实行这个战略转变，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关于国共关系，他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31)。

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本营。这支部队称为留守兵团，以后在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议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讨论。来自不同岗位的与会者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对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会上有些不同意见，但由于红军急于出发，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出席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

“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32)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会议决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加为十一人，书记是毛泽东，副书记是朱德、周恩来。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认为这次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在发言中作了说明：“两个政策，两个前途——单纯政府的抗战政策与我们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政策。争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前途，避免大分裂、大叛变。”“目前极需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与国民党单纯抗战的区别。”(33)这些，同他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中的看法是相连贯的。以后一个月中的种种事实，使他对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意见也更完备了。

洛川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在八月二十七日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所讨论的，是毛泽东正在思考中的更

深层次的问题。讨论的题目中，第一个就是：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先作了说明。他说：“两个阶级的企图，各在自己阶级立场上出发。”“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他把这一次国共合作同第一次作了比较，认为那时孙中山、廖仲恺所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要勇敢些，现在的国民党当局更胆小些，更小气些，而且是自觉地来限制我们。他们正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有计划地吸引共产党，从各方面影响你，以几千条线索来套我们。我们有些人容易上当，要有自觉，要使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随着我党走。国民党内也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34)他在座谈会结束时着重强调，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投降主义倾向，要注意对党内加强教育。

为什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当时已经出现的大量事实在他头脑中引起的反应。两个月后，毛泽东回顾这一时期的情况：

“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一’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以章乃器为代表），等等情况。”

“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35）

由于存在着这两方面的严重的情况，他认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民族的和阶级的投降主义。否则，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就可能被国民党吸引过去，被溶化或消灭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前途也会被葬送掉。

由于大敌当前，放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前的最紧迫的现实课题，还是红军迅速完成改编，开赴抗日战争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八月二十二日，洛川会议的前一天，蒋介石正式发表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命令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

为了在组织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九人组成。

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毛泽东代理主任。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由洛川回到延安。

这时，红军主力师已改编完毕，从九月二日起，陆续从山西开赴华北前线。

同日本军队作战，对八路军来说，是一次新的严峻考验。红军虽然已有十年内战的经验，但从来没有同具有现代军事装备的帝国主义国家军队交过手。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虽已在洛川会议上确定下来，但还需要在实战中充实、检验和完善。八路军出动到华北作战的情况如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因此，洛川会议结束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几乎以全部精力指导八路军在华北的作战。

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是毛泽东在八月中旬已经确定下来的。为什么先开入山西？毛泽东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山西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临下地俯瞰河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牵制华北日军的行进。凭借山西宽阔、险峻而复杂的地形，不仅有利于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而且有利于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消灭敌人。正如任弼时所说：“山西方面地形交通限制了敌人的长处，恰又补足我们的短处，便于我们的防守，持久斗争与打击敌人。”（36）第二，山西是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的统治地区。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之间既有联系，又有错综复杂的矛盾。日本侵略军攻陷平津后向山西大举进攻，严重威胁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军队开入山西，又使他深恐自己的地盘将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他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想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做他的暂时同盟者。早在一九三六年底，中共党员薄一波等经北方局同意同阎锡山建立了联系。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又答应毛泽东向他提出的建立公开的八路军驻晋

办事处的要求，并且同意八路军经山西开赴前线。第三，当时国民党企图将八路军“分割”使用，规定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到代县附近下车，开往蔚县一带集中。另外一个师沿陇海铁路转平汉铁路到河北徐水下车，开往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敏锐地察觉：这样做，是“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37），“包含着极大阴谋，决不能认为有利，坚决不能同意”。（38）因此，他提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39）把八路军三个师都放在山西，以便于统一领导，相互策应，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测。

为了落实八路军进入山西作战的事宜，九月初，毛泽东派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到太原同阎锡山当面商谈，可见他对这次行动的极度重视。

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八路军开入山西后的作战区域问题。这就像下棋一样，开始时的布局是否恰当，对以后局势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八月初曾考虑八路军出师后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但当八路军开赴山西时，华北局势已发生变化。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强大的钳形攻势：在北路，沿平绥铁路西进，在攻占张家口后折而南下，已于九月十三日占领晋北重镇大同；在东路，沿正太铁路向西推进；准备两路会合，夺取太原。如果仍按原有设想行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可能使八路军的全部主力陷于日军的钳形包围圈内，这当然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看清山西战局可能发生的这种重大变化，及时改变原定部署，要求将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部署在晋东北、晋西北、晋南，再图发展。他在九月十六日致电正率领八路军总部准备东渡黄河的朱德、任弼时提出：“拟



以百十五师位于晋东北 ,以五台为活动重心 ,暂时在灵丘、涑源 ,不利时逐渐南移 ,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以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 ,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 (40)这几个地区 ,后来成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坚持抗战的主要支撑点。

第二天 ,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 ,对改变部署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 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 ,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 ,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 ,亦在其大迂回中 ( 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 ) ,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 (41)两天后他又提醒 :“ 敌于太原 ,志在必得 ,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 ” (42)

在八路军出师后不到半个月 ,毛泽东根据局势的发展 ,及时调整了八路军作战区域的部署 ,这对八路军实行战略展开 ,合理布局 ,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

八路军开赴前线后 ,毛泽东关心的另一个焦点是 :部队在实战中能不能坚定不移地执行洛川会议确定的“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 方针。

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 ,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 ,一时不容易改变过来 ,还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 ,不少人十分兴奋 ,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 ,急于想打一些大仗。聂荣臻回忆道 :“ 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 ,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 ,他( 引者注 :指毛泽东 )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 ,一些同志蛮干。 ” (43)毛泽东还担心 :“ 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 ,被暂时情况所诱惑 ,如果这种观点不变 ,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 ,



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 (44)

对关键性问题，毛泽东历来是紧抓不放的。在九月中下旬，他接连五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45)

九月二十五日，他又致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明确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应环绕于游击战争。他指出：“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46)

为了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如果游击战争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同当地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相脱离，不能取得他们的全力支持；那末，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且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久，毛泽东在总结华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关系时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

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47）

毛泽东的反复阐明和耐心说服，使许多干部加深了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到很重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明确了。同时也觉得，他的这些电报，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48）

毛泽东在战略方针的重大决策一旦作出后，确实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因某些一时或局部的因素而轻易改变这种决心。同时，他又密切注意研究变化着的情况，不断总结经验，使作出的决策得到丰富和完善，使它更符合实际情况。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利用有利的时间和地形条件，集中兵力发动平型关战斗，取得了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战斗前，毛泽东已同意前方提出的想以一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意见（49）。战斗胜利的喜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八路军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50）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51）以后，他在《论持久战》中，总结十个月来华北抗战的经验，把八路军作战的战略原则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

战。”(52)这个提法，同洛川会议的规定是前后一贯的，而在具体表述上又更加完备了。

十月初，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日军占领保定，河北正面战场的抗战基本结束。在侧翼遭受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放弃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退守太原的北方门户忻口。

为了协助友军作战，毛泽东仔细研究华北战局后，在十月六日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要他们转告山西军事当局：敌人占领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因此龙泉关、娘子关两点应集结重兵坚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在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和出击中，出击是主要的。并提出：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主力将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忻口地区日军的侧后纵深地区；一二九师主力或全部将使用于正太铁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作战。(53)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各主力师在忻口战役期间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行动。第一二九师一度收复雁门关，伏击日军辎重部队，截断了从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交通。第一一五师主力夺回平型关，并收复涞源、定县等七座县城，切断了日军从张家口经平型关到忻口的交通线。忻口前线日军只能主要靠空运来维持给养。第一二九师陈锡联团又在十月十九日乘黑夜突然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焚毁日机二十余架。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的行动，依赖后方供给的程度很大。八路军各部队的行动，使日军的后方补给线陷于半停顿状态，对正面防守忻口的友军是有力的配合和援助。

在忻口战役期间，右翼晋军有十个团拨归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毛泽东就如何对待这部分友军，在十月四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叮嘱道：“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

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 (54) 毛泽东要求他们对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彻底执行这一方针。在东线，当娘子关告急时，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也救出了被日军包围的友军曾万钟部一千多人。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将南下的日军主力挡住了二十一天。这次战役，也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密切配合作战最为成功的一次。由于国共双方在这次战役中诚意合作，取得了较好的战果。

十月中旬，日军主力占领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进，包抄忻口的后方。二十八日，娘子关失守。三十一日，阎锡山下令放弃忻口。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场的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正确的领导，在于能有预见。毛泽东自己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生动地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55) 抗战爆发以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毛泽东显示了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解放》第1卷第10期，解放周刊出版社1937年版。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 5 月版，第 200 页。

毛泽东致张云逸的电报，1937 年 7 月 14 日。

毛泽东致张云逸的电报，1937 年 7 月 15 日。

洛甫、毛泽东致叶剑英的电报，1937 年 7 月 9 日。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致叶剑英电，1937 年 7 月 14 日。

《新中华报》，1937 年 7 月 19 日。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8 月版，第 152 页。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 1 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编印，第 106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34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346、348 页。

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 1986 年 7 月版，第 111 页。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 8 月版，第 338 页。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 年 7 月 28 日。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 年 8 月 1 日。

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 年 8 月 1 日。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8 月版，第 150 页。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37 年 8 月 1 日。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电，1937年8月4日。

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博古、林彪、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5日。

(21)毛泽东致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4日。

(22)毛泽东、洛甫致周恩来、博古并告叶剑英电，1937年8月1日。

(23)洛甫、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8日。

(2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9日。

(25)《一个美国女记者在中国的冒险（续）》，《瞻望》，1985年第48期。

(2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95—196页。

(27)《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2页。

(28)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

(29)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

(3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51页。

(31)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8月22日。

(32)《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4页。

(33)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

(3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7日。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92页。

(36)《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37页。

(37)洛甫、毛泽东致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18日。

(38)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937年8月18日。

(39)毛泽东致张冲转朱德、周恩来电，1937年8月17日。

(40)毛泽东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9月16日。

(41)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电，1937年9月17日。

(42)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9日。

(43)《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59页。

(44)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45)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46)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1937年9月25日。

(4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18页。

(48)《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60页。

(49)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50)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9月29日。

(5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8—379、500页。

(5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8—379、500页。

(53)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电，1937年10月6日。

(54)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0月4日。

(55)《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00、201页。



## 二十、指导敌后抗战和《论持久战》

太原失守后，华北战局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处于主导地位。

毛泽东敏锐地看清战局的这种变化，立刻对八路军下一步战略行动相应地作出新的部署。

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以明确的语言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

这时，山西的国民党军队正在全线溃退，许多地方的旧政权陷于瘫痪或自行消失，备受日本侵略蹂躏的沦陷区人民迫切要求能有人领导他们奋起抵抗，保卫家园。在这样一片混乱的日子中，毛泽东接连发出指示，为八路军在山西的行动规定了新的方针：“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这个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八路军在新的形势下，应该消除依赖国民党军队的思想，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敌后广大乡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徐向前回忆道：“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了，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

对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艰巨性，毛泽东有着充分的估计。他清醒地看到，日本侵略军决不会允许八路军在其后方搞得它日夜不得安宁，它“不久即将移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这种进攻将是极端残酷的，因此必须抢在日军行动前做好充分准备。

在这些准备中，最重要的是，要把八路军各部在山西敌后展开的基本格局，在原有基础上稍加调整，进一步作好通盘的部署。他电令第一一五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聂荣臻率领留在晋东北，继续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该师主力则从晋东北开赴晋西南地区，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师以管涔山脉为中心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沿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这个部署很有战略眼光。这四个区域的地理条件十分优越。第一个区域——晋东北，地处恒山、五台山、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可以直接威胁日军占领的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四条铁路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第二个区域——晋西北，位于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以西、长城以南、汾（阳）离（石）公路以北、黄河以东，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和它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相联系的枢纽。第三个区域——晋东南，东起平汉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北起正太铁路、南至黄河，直接威胁着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所依赖的主要交通线，对坚持华北抗战有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也是日后向冀鲁豫平原发展的前进基地。第四个区域——晋西南，也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这四个区域相互呼应，对日军已占领的华北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形成包围或侧面威胁之势。

毛泽东的这个布局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四个区域不是侷处一隅，而是几乎遍及日本侵略军控制下的山西全省。这就很有象征意义。一九三八年二月，毛泽东会见美

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达时说：“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

毛泽东对前方作战的指导，主要是提出大的方针，对具体作战部署不直接干预。他给八路军总部和各师负责人的电报说：“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这种做法，在抗战初期情况变动快速而通讯又不便的条件，尤其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毛泽东这个战略部署，八路军各部争取时间，迅速分别开赴指定地区。临行前，毛泽东又叮嘱各路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不久，他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

正当八路军各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实行战略展开时，日本侵略军果然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对立足未稳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军事行动了。

在攻入太原前，日军已感觉到它的后方由于八路军的袭击活动而带来的种种困难，但为了实现攻占太原的军事计划，一时还分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对付后方。因此，一到占领太原以后，立即就抽出大量兵力来对后方进行“清

剿”，为他们的继续南进扫除后顾之忧。这使八路军深入敌后的行动从一开始就面对严峻的考验。

十一月下旬，日军首先出动二万兵力配合骑兵、大炮和坦克、飞机分八路向刚刚创建的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攻。这是检验八路军能不能在敌后站住脚跟的第一场严重较量。它的成败，对八路军在敌后其他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毛泽东对它给予极大的重视。聂荣臻回忆道：“我们留在晋察冀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关心着我们，注视着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党在敌后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常常通宵达旦地研究情况，细心地思考着反围攻的对策。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这场反围攻战斗打响前，他致电朱德、任弼时，针对八路军占领区域的民众和新组织的游击队缺乏斗争经验，提出要进行三方面的准备工作：一、加强新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党的工作；二、加强新部队必要的军事和游击战争的训练；三、加强动员地方民众的工作。战斗打响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在关键时刻及时指明：对进攻晋察冀边区的敌军，“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进一步仍在我包围中”；“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的歼灭和有力打击”。同时，他要求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分别在同蒲路、正太路积极活动，给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有力的配合；要八路军总部将日军的行动通知阎锡山和蒋介石，争取友军的援助；还通过进步报纸舆论扩大宣传，使全国军民相信，八路军在敌人后方建立的根据地完全能够迟滞日军的前进。

由于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整套方针和办法得到贯彻执行，晋察冀的反围攻斗争取得胜利。聂荣臻回忆道：“这次反敌围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

打死打伤日伪军共一千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军用品。敌人除占领了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几座县城外，别无所获，不得不于十二月下旬全线撤退。”

日本侵略军自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围攻晋察冀根据地失利后，他们又先后发动对晋西北地区和晋东南地区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毛泽东继续指导这些地区的反围攻斗争。

他以晋察冀反围攻胜利的经验为依据，但又不是简单地照搬晋察冀地区的做法，而是按照这些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别提出不同的斗争方针。在晋西北地区，毛泽东根据日军五路围攻八路军的力量都不强的特点，要八路军同晋军协力，实行“各个击破”。在晋东南地区则要求八路军以次要兵力钳制日军数路，集中主要兵力对付日军一路。由于采取这些正确的方针，八路军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也先后取得反围攻的胜利。

太原失守后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在毛泽东及时而正确的指导下，八路军各部在敌后反围攻斗争中，不仅消灭了大量日军，而且在战斗中积极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建立起抗日根据地，逐步实现了在山西战略展开的预定目标，相继站住了脚跟，为开创整个华北敌后抗战新局面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在南方，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又集中兵力约二十八万人，实行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加紧对上海、南京地区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国民党当局在这个地区，指挥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前线官兵表现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作战精神，在敌军的猛烈炮火下作出了巨大牺牲。日军原以为这次战役很快就可结束，梦想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没有料到在上海地区战争就持续了三个月。但是，以这种硬打硬拼式的单纯防御，来对付优势装备的敌军，在战略上是不利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军攻陷上海。一

个月后，十二月十三日，又占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使整个中国战场上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接着，日军把作战中心北移到津浦铁路一线，企图攻下徐州，打通南北交通线，同华北方面南下的日军会合。他们的打算是：在华北和华中这两支大军会合后，便可以在两个战略方向上作出选择，或者进攻西北，或者南下武汉夺取华中。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整个战局的发展，既对八路军的抗日行动及时作出部署，又对正面战场的作战经常提出积极的建议。当他对日军的战略意图作出准确判断后，一方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一个全国战略部署的完整方案，作为建议；另一方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研究新形势下八路军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

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的建议中，毛泽东总结正面战场上军事失利的教训，主张应采取“攻势防御”的方针，把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结合起来。他指出：“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建议中，毛泽东还对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提出具体意见。但是，蒋介石同以往多次的情况一样，没有采纳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建议。

对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认为，在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可能失守的情况下，为了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军，应该在敌后更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更多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他曾设想，以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六处为主要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区、冀南区、热冀边区、大青山脉区辅助之。“三个

主力师位置大体上应预拟一个位于鄂豫皖区，一个位于鄂豫陕区，一个位于陕甘区，即两个在内线一个在外线。”

以后，由于战局的变化，他的具体设想有了改变。但他的基本思路不仅继续得到坚持，并且变得更明晰了。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他关于迅速展开兵力、建立多处能独立作战的根据地的基本设想。他说：日军的战略企图如果实现，“将造成中国割断为许多块”，根据苏区时期的经验，要形成许多独立的作战区域来坚持长期的抗战。他特别举出已在一月份建立的晋察冀根据地作为例证，说明：“聂荣臻是典型的区域”。

对八路军的具体行动，毛泽东认为应该依战争形势的发展分两步走：目前阶段，“在不被敌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抗日运动，如此方能钳制与阻碍敌向潼关、西安与陕北之进攻。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更不应不顾蒋令不顾友军渡过河来。为了保障将来转移便利，必须巩固吕梁山脉之转移枢纽，并布置太岳山王屋山（朱瑞处）工作。”毛泽东考虑问题，总是把立足点放在对局势发展作出最严重的估计上面，这样才能做到有备而无患。因此，他提出，在将来阶段，“即敌大举进攻潼关、西安、武胜关、武汉及陕北时，在取得蒋、阎、卫同意后，八路军主力及其他国军主力，应渡过河西、河南，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而留适当兵力位于山西各区，继续坚持游击战。”毛泽东指出：以上“是政治局战略决定之基本精神”。

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再次研究八路军在华北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根据坚持长期作战的要求，又提出在各区域建立新的游击兵团的主张。他说：“八路军主力移动后的部署，现在就要准备，应在各区域建立



游击兵团。” 为了加强党对华北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建议原在北方局的刘少奇留在中央以指导华北工作。二十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致电八路军各部，提出组织游击兵团的具体任务。电报指出：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的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具体部署是：在晋西北，除宋时轮支队外，再组织四个支队；在晋西南组织三个支队；在晋东南组织七个支队；在平汉路以东组织若干支队。各支队至少有一千人左右，以八路军有战斗经验的主力一二个连作基础，由地方游击队及新兵编成。这种以八路军主力连队为骨干、吸收大批新战士以组成若干新支队的做法，是适应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后有可能在敌后迅速打开新局面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新的主张。它使八路军的队伍能迅速壮大，而又能保持相当的战斗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九三八年春，日军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夹击徐州，尽力打通津浦铁路。为了执行这一计划，华北日军主力被抽调南下，造成河北、出东等平原地区兵力空虚，为已经在山区站稳了脚跟的八路军向华北敌后更广阔的地域发展带来了机会。徐州地区正面战场在李宗仁指挥下进行的英勇抗击，对华北敌后战场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毛泽东十分善于抓住机遇。他立刻调整部署，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

从山地来到平原，各方面的条件都发生重大变化，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许多人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对能不能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还抱有怀疑。徐向前回忆道：“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 (21)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春作出这个新的重大决策前早有考虑。他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时,就说明这个方针包含着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并在发展山地游击战的同时,密切注意八路军在前线探索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实践经验。

促使毛泽东较早考虑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意识到日军的深入进攻将带来游击战争的广泛发展,特别是备受日本侵略军屠杀和蹂躏的沦陷区(包括平原地区)同胞迫切期待着能领导他们保卫家园的抗日军队的到来,八路军走出山区伸向平原是必然趋势;二是他看到山区地形条件虽对发展游击战争有利,但资源、人力毕竟有限,平原地形条件虽不如山区,但地域广阔、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只要依靠当地民众的支持是完全可以得到发展的,这对扩大抗日力量有极大好处。

但这种设想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决不能在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情况下轻率地在战略行动上作出重大决策。这种实践经验,是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之交在冀中、冀东、山东等地区陆续取得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晋察冀边区反围攻斗争正在进行时,毛泽东从聂荣臻来电中得知冀中平原日军兵力空虚(22)。他立刻同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由第一二九师和聂荣臻部各派一个支队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游击。由于当时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电报中十分慎重地说明这只是试探性的游击作战,任务是:一、侦察情况;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三、破坏伪组织;四、收集武器,扩大自身。电报要求“两支队出去须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23)。这个指示很快传达下去。为了统一部队的认识,聂荣臻等组织受命部队集中讨论这次行动的意义。那时,共产党员吕正操已在十月间率领驻在冀中的原东北

军五十三军一个团，提出“北上抗日，到敌后打游击”的口号，脱离原建制，改编为人民自卫军。他们经过整训后，同冀中地区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相结合，开辟了平原地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他们在冀中站住了脚跟，而且建立了区党委、军区和行政主任公署。冀中地区的实践为其他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经验。

冀东平原也是毛泽东较早注意到的。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建议“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24）。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冀东工作，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冀东工作的重要性，建议派杨成武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25）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强调：“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之能力，出发前需作充分准备。”（26）

这年四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中央听取黎玉关于山东工作的报告。黎玉报告后，毛泽东立刻作出“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的结论。中共中央要求山东省委进一步公开地大胆地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并决定由罗炳辉去负军事总责。（27）

正是有了在冀中等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初步尝试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华北日军主力南下进攻徐州、华北兵力空虚的形势下，有可能果断地作出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刘少奇向八路军总部发出具有战略意义的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

斗争。”指示根据已有的经验和当前实际情况，具体地规定：

“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地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设法多少恢复当地的抗日秩序，这些政府由上级或司令部委任，或由民众团体推选，都跟随一个游击队行动，发布简单的布告与法令，组织民众抗日斗争，镇压汉奸，保护民众利益，帮助部队筹措给养等。”（28）

第二天，在山西前方的八路军总部根据这个指示精神，立刻电令第一二九师主力和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部迅速从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不久，又令宋时轮、邓华两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热南、察东北创造抗日根据地。这样，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平原上逐步发展起来。

考虑到日军占领徐州后将会进一步夺取武汉的形势，毛泽东还对组建不久、开始活跃在长江南北的新四军的工作作出部署。

新四军是由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为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叶挺到延安。十一月，项英也到了延安。毛泽东同他们具体商讨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十二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不久，又移驻皖南岩寺。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指出新四军应“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

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29)

同八路军相比，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大多是平原，丘陵地带和河湖港汊，部队又是由原来分散在十多处的人数不多的游击队经过集中和改编而成的，进入这些地区的时间比较晚，敌后的政治情况又很复杂，发展起来困难更多。因此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畏难情绪。毛泽东深知这一点，当华北的平原游击战争取得成功经验后，立刻把它推广到新四军中。五月四日，毛泽东致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的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

毛泽东对新四军的具体行动方向提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30)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新四军各支队经过整训陆续开赴华中敌后。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已在四月下旬向苏南敌后挺进。六、七月间，陈毅、张鼎丞随即率领有着较强战斗力的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先后进入苏南。六月十七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取得第一次伏击战的胜利，给了饱受日军蹂躏的江南沦陷区人民很大的兴奋。到年年底，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已初步建立起来。新四军威名远扬，在大江南北燃起了敌后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对战局下一步究竟会怎样发展，党内出现不同的认识。有的人一度估计日军在打通津浦铁路后将把主力转向华北，肃清后方，游击战争将面对空前严重的困难，不宜广泛发展。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如果领导人对局势作出不正确的判断，就会丧失时机，对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战争的发展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毛泽东审时度势，冷静地指出：日军主力转向华北“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31）。目前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他由此得出结论：“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为了钳制日军向大西北的进攻，他提出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绥远大青山脉，并同意朱德、彭德怀提出的派李井泉率骑兵或步兵开创大青山根据地的意见。同时，为准备应付今后华北局势可能到来的变化，毛泽东要求冀中、冀热察等抗日根据地要注意巩固现有武装，做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准备。

六月中旬，武汉会战开始。针对国民党当局采取的单纯防御的作战部署和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损失过大的教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各负责人，向他们提醒：“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电报中指出：如果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中再损失过大，将会增加各将领对蒋介石的不满，投降派会起而乘之。电报抱着善意地写道：“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请加注意为盼。”（32）

当日军向武汉大举进攻时，骄横不可一世，而后方空虚又疏于戒备。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这年十一月下旬，八路军各部主力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大规模进军：第

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第一二 师主力进入冀中，第一一五师师部率第三四三旅进入冀鲁豫地区和山东，开辟新的根据地。这也是对正面战场上友军作战的配合和支援。到这年年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获得蓬勃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在同日军一千六百多次交战中共歼敌五万四千多人。八路军发展到十五万六千多人，新四军发展到二万五千人，一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起来了。

到徐州失守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整整十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已相继沦陷，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天天在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对这些问题，许多人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仍在到处流传。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营垒内就一直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战开始后，又出现“再战必亡”的论调。身任国民党副总裁的亲日派汪精卫是他们中突出的代表。这种悲观情绪也影响到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毛泽东家乡的一个青年学生从湖南乡下写信给他，诉说心中的苦闷：“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作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

速胜论的观点也有相当市场。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来迅速取胜。淞沪会战时有人提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一战取胜后，《大公报》又鼓吹徐州战役是“准决战”。这种盲目乐观的轻敌思想也出现在共产党内，一些人把抗

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两百万正规军上，急于打大仗，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33）。

毛泽东“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34）。一九三六年七月，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已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抗战初期，当中国军队连连失利时，他始终认为：“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35）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从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他又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论著，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毛泽东总结道：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他得出结论：“中



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36）

毛泽东指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毛泽东强调“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

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毛泽东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它作了更全面、详尽的论述。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的发表，使他博得愈来愈多人的钦佩与尊重。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



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37)

《论持久战》这部著作，处处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唯物主义，在观察事物的方法论意义上有着普遍的价值。它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和近一年来的战争进程，始终着眼于战争的全局，对敌我双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能科学地预见未来的前途。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程思远回忆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38)

《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这是由周恩来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的。爱泼斯坦等参加了翻译工作 (39)。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在海外，这本小册子同样得到高度评价。

抗战开始后还不到一年，毛泽东就能写出这样能正确地指导战争实践的著作，一方面得益于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战争的规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从不放松读书和理论研究，注意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从实际经验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毛泽东

不久后说过：“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40)

一九三七年，面对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毛泽东曾写信告诉他的表兄文运昌：“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41)。每天，他总得先读一大堆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工作作出部署。然后，在昏暗的油灯下开始读书或写作。毛泽东习惯在夜间工作，他常对来访者说：“我白天睡觉，晚上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时候。”(42)

在这段时期内，毛泽东着重研究军事问题。同时，也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他深知，许多错误的观点，无论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

艾思奇的哲学著作当时是毛泽东喜欢读的书。一九三七年九月，毛泽东读了他的《哲学与生活》一书，写下约三千字的辑录。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起，毛泽东用两个月时间读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43)，这部书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作了大量批注，其中有对原文内容的复述或提要，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见解。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一书重点探讨了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毛泽东“感到颇为新鲜”。收到书后，他“只用了三天就把它读完了”(44)

在军事著作方面，对中国古代战争素有研究的毛泽东这时又认真地研读了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他在延安组织了《战争论》研究小组，参加这个小组学习的莫文骅后来回忆道：

“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

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五倍到十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45）

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读报，把它作为了解国内外形势的重要途径。当年帮助他工作过的史敬棠回忆说：“送到毛泽东处的报纸、杂志，毛泽东阅后将重要内容加圈，示意大家要用战略眼光结合国内外形势来看报纸。选择内容应当有助于分析社会各阶级的动态和观察社会经济、政治向何处发展的材料。这使我得到很重要的启示，终身受益不浅。”（46）

通过刻苦学习和深入研究，毛泽东的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得以升华为理论概括，回答了当时许多人无法回答的问题。这是他付出了超乎常人的艰辛劳动所换来的。

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张浩电，1937年11月8日。

毛泽东致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1937年11月13日。

徐向前：《历史的回顺》（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589页。

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转胡服、杨尚昆、彭真电，1937年11月9日。

毛泽东：《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1938年2月。

毛泽东致朱、彭、陈、罗、贺、萧、关、刘、徐、邓、聂电，1938年3月8日。

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红旗》，1981年第13期。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27页。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436页。

毛泽东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1月27日。

毛泽东、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2月5日。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79页。

毛泽东致第120师电，1938年3月6日。

毛泽东、任弼时致八路军总部及各师、北方局、长江局的电报，1938年2月23日。

毛泽东致八路军第115师、129师、120师和长江局的电报，1938年2月21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电，1938年3月9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记录，1938年3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38年3月23日。

毛泽东、刘少奇致朱德、彭德怀、朱瑞、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贺龙等并各省委、程子华、杨尚昆电，1938年3月24日。

(2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606页。

(22)《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94页。

(23)毛泽东、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2月16日。

(24)《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98页。

(2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记录，1938年2月8日。

(26)毛泽东致八路军总部、长江局并告北方局的电报，1938年2月9日。

(27)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38年4月5日。

(28)《对平原游击战指示》，《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07页。

(29)毛泽东致项英、陈毅的电报，1938年2月15日。

(30)《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争的指示》，《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08页。

(31)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首长的电报，1938年6月27日。

(32)毛泽东、洛甫、陈云、康生、王稼祥、刘少奇致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38年8月6日。

(3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40页。

(3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记录，1938年5月10日。

(35)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手稿，1937年10月。

(3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42、443、447页。

(37)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8月4日。

(38)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第 131 页。

(39)访问爱泼斯坦记录，1985 年 5 月 7 日。

(40)毛泽东在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39 年 1 月 28 日。

(4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版，第 115 页。

(42)米契尔·布赖克福特：《卡尔逊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版，第 219 页。

(43)毛泽东读书日记，1938 年。

(44)毛泽东读书日记，1938 年。

(45)莫文骅：《终生难忘的怀念》，《中共党史资料》第 41 期，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 4 月版，第 17 页。

(46)访问史敬棠谈话记录，1991 年 2 月 2 日。

## 二十一、从十二月会议到六中全会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怎样对待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异常复杂的问题。

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它有几百万军队和得到国际承认的外交地位。没有它的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就难以形成。抗战开始后，它从对日妥协退让转为武装抵抗，从长期的“剿共”转为同共产党合作，对民众运动也有一定程度的开放。这些都是重大的转变。抗战初期，他在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会战中也有相当积极的表现。看不到这些，在抗战中不重视国共的合作，造成双方关系的破裂，那就会犯“左”的错误。

可是，事情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即使在双方关系较好的抗战初期，他仍然十分害怕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千方百计加以限制，总想找机会加以“溶化”和消灭。对民众运动的兴起也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不愿和不敢放手发动民众，只想用政府和正规军的力量去抵抗日军的进攻，这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局势迅速恶化的原因之一。国共两党关于“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的争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要是看不到事情的这一方面，忘却以往的历史教训，以为国民党已经转变得一切都好了，过分看重以至依赖国民党，束缚自己的手脚，丧失独立自主和必要的戒备，那就会上大当，就会犯右的错误。

对应该怎样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毛泽东在抗战中期所写的《农村调查》的跋中作了很好的概括：“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

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这里，不容易的是怎样根据变动着的情况，灵活地处理联合和斗争的关系，怎样恰当地掌握好两者关系中的“度”。没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是很难把它处理好的。

一九三七年二十二日，也就是日本向上海发动进攻后四十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周恩来在七月庐山谈判时向蒋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一件大事，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对《宣言》的发表和蒋介石的谈话，毛泽东立刻毫不含糊地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我们宣言及蒋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蒋介石谈话中表现出的“自大主义”，表示“未免遗憾”。他指出，现在成立的统一战线，还不是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表现在蒋介石方面的是：在抗日问题上的始终不肯接受中共反复提出的发动民众的全民抗战的政治主张；在两党关系上，既想借重共产党的力量，又不肯平等相待，对确定两党合作形式与制定共同纲领采取消极态度。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不改变，统一战线可能流于形式，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中国争取抗战胜利的责任。



《宣言》发表一周后，毛泽东为《解放》周刊撰写《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在文中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他说：从西安事变以来，“起了变化的东西是有的，并且是很大的，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广大的民众还没有被发动，国民党的统制政策依然没有改变，从而暴露出严重的危机。“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他还提出：“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会见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他在答问中，充分肯定中国抗战的成绩是有的，而且是伟大的；同时也指出几个月抗战中暴露的弱点：“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

他还针对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散布“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的民族悲观主义论调，提出“克服投降主义”问题。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在对待国共关系的问题上，一种错误观点正在滋长发展。这种“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他们只看到国共两党一致的地方，而看不到两党在“全面抗战”（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和“片面抗战”（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抗战）等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毛泽东指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他说：“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

毛泽东十分警惕这种危险的倾向，并在实际工作中同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明确的斗争和必要的预防。在中央常委会讨论中共是否参加政府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只是聘请个人参加而不宣布执行抗日纲领，我们不参加”。根据毛泽东等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只有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时候”，中共才能参加。毛泽东还对陇东等地出现的对国民党无原则退让，对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委员章乃器在上海提出的“少号召，多建议”的主张，提出批评，纠正各根据地和救亡工作中出现的迁就倾向。对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多次指示，要求不能参加任何倒阁的阴谋活动，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我们的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还是能够干下去这样一个基点上。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陷落的当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看法。

他在报告一开始就提出“目前形势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接着说：“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但是，“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毛泽东强调指出：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

他在这个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他先提出了“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的任务。他是这样分析的：“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

毛泽东在报告中，把洛川会议等酝酿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根本性问题，以更加明确具体的语言提了出来：“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他明确地得出结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接着，他又提出：“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他说：“这个倾向在现时是发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那就是指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

亲日派集团。毛泽东提醒大家：“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

向党的活动分子所作的这个报告在党内引起很大的震动，并收到了成效。这个报告后十多天，王明从苏联回国了。

王明自一九三一年赴莫斯科后一直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在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一次，他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关注。当时，苏联正面对着纳粹德国来自西面的严重威胁，十分担心日本从东面向它发起进攻，使它陷于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十分希望中国的抗日战争尽可能多地拖住日本的军事力量，减轻它在东面的危机。中国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曾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会议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国共统一战线，应该积极给予帮助和支持。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过于隔膜，过高地估计了执政的国民党的力量，主要期望由它所领导的政府和军队来抗击日本侵略军，因此，生怕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紧张起来，会使国民党退出抗日战争。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却成了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关心的焦点所在。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经着重提出：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努力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做到共同

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他还指出，为帮助中共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必须有“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样，共产国际就选中了王明。

王明回国前，斯大林会见他，谈话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全力以赴地坚定国民党蒋介石长期抗战的决心。

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康生到达延安。同机回来的还有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冒着纷飞的大雪，到延安机场迎接。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的第一次会面。

王明回国后只隔了十来天，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被称为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议的第一天就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它有一个书面的报告大纲，在会上另有一个口头报告。

在口头报告中，他谈了“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即是如何巩固国共合作问题”，接着便危言耸听地说：“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

他进一步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这些指责，显然是针对毛泽东而发的。

他又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这些指责，自然也是针对毛泽东的。

他在报告中还提出许许多多其他批评，例如：“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要改造旧军队，这是不策略的口号”；“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意义的”，等等。这些还都是对毛泽东的指责。

王明强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要使人家一到特区，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

由于王明说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那时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望，对与会者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民党的军队在上海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抵抗。会议期间，正好是日本侵略军包围和攻陷南京的时候，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危急阶段。许多人对洛川会议以来的统一战线工作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他在会议第三天的发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说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他说：统一战线工作“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对不同意王明的一些意见，毛泽东

作了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他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党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他说：“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要在政治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共产党在八路军出动后，政治影响更扩大。在全国群众中组织力量虽不够，但不能看数量少，在群众中力量是大起来的。”他又说：“章乃器说少号召多建议，我们是要批评的。这是只适宜国民党现时状况。我们要在政治上有号召。”这些，其实都是对王明指责的回答。

在会议的第四天，毛泽东又专门就战略问题发了言。他说：“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在持久战中领土与军队什么最重要？军队较重要。军队失败，领土不能保。应向国民党提出保存军队是基本的，过去红军便是采用这个原则。”“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军一部。”“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

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谈到过十二月会议的情况。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引者注：就是指王明）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他在延安整风时的政治局会议上还讲过：“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



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21)

尽管王明的错误主张影响了不少与会者，对工作带来一些干扰，但从全局来看，它在党内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因为经过十多年成功和失败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成熟起来。王明提出的那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错误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因为行不通而遭到抵制。参加十二月会议的彭德怀回忆道：“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切事情都得听从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谓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存在；同时也区别不开谁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谁是消极抗日的右派，谁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这些原则问题，在王明路线中是混淆不清的。”“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 (22) 所以，有些人虽在会上作了口头的“自我批评”，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真正去贯彻王明那一套。

十二月会议在组织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安排：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中央局赴武汉领导南方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赴武汉同国民党谈判；由刘少奇、杨尚昆负责北方局，朱德、彭德怀负责北方军政委员会，加强对华北游击战争的领导。

会议还决定，中央负责处理各类来往电报的分工如下：党的工作由张闻天处理；军事问题由毛泽东处理；统



一战线工作由王明处理，王明外出回到延安前这项工作由张闻天负责。为准备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书记为王明。秘书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五人组成。(23)

十二月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多次致电各抗日根据地的首长，要求各地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各友军和地方士绅搞好关系，“减少磨擦，团结对敌”(24)。他强调：“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与方针。”(25)同时，他也继续注意纠正右的偏向，亲自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布告，揭露国民党顽固分子破坏陕甘宁边区人民利益、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纠正了一部分干部对这种破坏活动的退让迁就，使各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

王明在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前往武汉，是因为蒋介石想了解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态度而特地邀请他去的。那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的大部分在南京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已先后迁到武汉。中共中央原来要王明见过蒋介石后很快就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可是，王明离开莫斯科时就已把国民党看得比共产党更重要，把武汉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因此，到武汉后就留了下来，把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由他担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他继续以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在《群众》周刊第四期上发表由他起草而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同期并发表了他的文章《挽救时局的关键》。他还到武汉大学等处作讲演，继续鼓吹他的错误主张。

这时，国民党中右翼势力的反共活动日见抬头。一九三八年一月，国民党复兴社头目康泽、刘健群在两党关系委员会上公然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攻

击八路军在华北是“游而不击”。国民党军方机关报《扫荡报》和《血路》、《民意》、《抗战和文化》等刊物，掀起所谓“一党运动”。二月十日，《新华日报》发表王明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对国民党这些言论提出批评。这种批评是必要的，但王明并不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义发表公开谈话，也反映了王明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心理已到了何等地步。在这以前不久，国民党还指使几十名暴徒捣毁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的营业部和印刷厂。这些事件，对中国共产党内正确认识国民党的本质是一次现实的教育。

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的这些倒行逆施，周恩来在二月十日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对主义、信仰不欲限制各方”，“对各党派并无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对《扫荡报》言论，认为不能代表党（引者注：指国民党）及他个人”；“对政治部副部长仍要周做”。(26)以后，国民政府聘请毛泽东、博古、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七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击，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中共厉害，他的人愚蠢”(27)。

鉴于时局中出现的新情况，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中共中央接受长江局的建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以后被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由于国民党进行的“一个党的运动”，他承认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但又认为“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须在党

内外进行教育。”还进一步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28)。

毛泽东在第二天发言，一开始便说：“我只讲军事问题，先说战争的长期性。”他指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我认为过去中国抗战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只是死守一处，结果还会失守。”“正规军分为作战兵团与守备兵团。过去共产党组织赤卫队及游击队有丰富经验，要告诉全国来学习。”“战争的具体形势，内线外线的作战是互相交错的，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他说：“我同意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为争取国民党继续抗战，合作形式将来可采用民族联盟或共产党员重新加入国民党，但是要保证共产党的独立性。关于召开七大，毛泽东认为“须看战争的形势来决定”。他在发言中还提出要“大大发展党员，中央应有新的决议”。“只有大党才能提拔大批干部”。(29)

张闻天在会上说：“历史决定了国共需要合作，两党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今天要利用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但又怕共产党与民众的力量。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式更复杂了。我们要看到与国民党有些磨擦是不奇怪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引导国民党进步。与国民党吵一下是难免的，但注意不要分裂了。我们无论何时不要忘记要与国民党合作，但必须时时有戒心。”“我们一方面要保证与国民党的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共产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30)

毛泽东在会上还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但一心只看重国民党力量的王明执意要重返武汉。三月一日，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决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即回来（如估计武汉、西安交通有断绝之时则提前）。”但王明连这个决议也不理睬，去武汉后一直到六中全会召开时才回延安。在武汉，他又自行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发表。

为什么在坚持抗日、坚持统一战线的共同主张下，毛泽东、王明之间会产生这么尖锐的分歧？王明为什么一直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坚持他那些错误主张？毛泽东后来说过：“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引者注：指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31）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评论。王明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不要得罪国民党，求得他们不脱离抗日阵营，以免苏联遭受两面作战的危险；至于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却不是或很少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其实，放弃斗争，一味退让，不仅不利于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不可能使国共合作真正保持下去。

这时，又发生张国焘叛逃事件。四月四日，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到陕西中部县参加祭黄帝陵的机会，私自逃离，在国民党方面庇护下经西安到达武汉。十二日，毛泽东等致电张国焘：“希早日归来，不胜祈盼”。（32）张国焘不听劝导，在四月十七日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十八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毛泽东要求全党把这件事作为教训：“每个共产党员应该不像他那样，半途放下旗子，要坚定政治方向，牺牲一切而奋斗到底，反对开小差。”（33）

三月会议结束后，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苏联。由于共产国际长期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任弼时这次担当的任务是十分重要的。他不仅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

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详细的口头报告。他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他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报告。这些生动具体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七、八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会前，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报告抗战的形势和抗战的总结。(34)

会议第一天，先由王稼祥作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王稼祥传达道：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他说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35)

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这些指示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36)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

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37）

在二十四日的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共讲了五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意义；二、国际指示；三、抗战经验总结问题；四、抗日战争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五、今后任务。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指示对中共政治路线的估计是“恰当的和必要的”，“这种成绩是中央诸同志和全党努力获得的”。他认为，共产国际指示的要点，“最主要的是党内团结”。他指出，“特别是有国际的指示，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有保证的”。他在讲话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指出武汉失守的危险是存在着的，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军事意义上讲是战略相持阶段。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力量，准备反攻。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他说：

“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斗争是需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38）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再次强调，今后中央领导同志之间要真正的互相尊重，互相信任。鉴于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以来一系列严重违背组织原则的做法，毛泽东建议在六中全会上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

正如毛泽东所肯定的，这次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它从政治上、组织上为六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准备。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的。这是一九二八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宣布会议议事日程。这时，传来武汉情况紧急的消息，大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一封信，鼓励他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十月四日，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由周恩来带到武汉送给蒋介石。

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共包括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明确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它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另一方面更加进步。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他说：“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毛泽东的话使许多与会者感到豁然开朗。一位参加会议的干部在会上说：“最初有人看到《论持久战》，还不了解我们如何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此次毛的报告具体指出了过渡阶段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39）

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自己的历史重任，毛泽东号召大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民族的历史和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他说：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



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0）

这段论述是毛泽东从亲身经历中国革命失败的痛苦教训中，从同党内各种错误倾向进行的斗争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他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论断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不仅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对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有深远的意义。

会议进行过程中，广州、武汉在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七日相继沦陷。

十一月五日、六日两天，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

他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他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说：“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



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进一步强调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41)

他在结论中还说:“团结的要点是政治上的一致。此会上一切主要问题无不是一致的,这就保证了全党的团结。”由于这些主要问题上的是非已经分清,毛泽东对十二月会议以来同王明在政治上的分歧着重用正面说理的方式来进行总结。

对王明本人,毛泽东采取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42)后来,毛泽东对这样对待王明问题做过解释:“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43)

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毛泽东提出“应予平反”,没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他说:对萧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等的处罚“皆不妥当”;对周以栗、余泽鸿在政治上组织上的

打击是不对的，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44）

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全会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

毛泽东从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这次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彭德怀在会上的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45）

在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这个会议，取得这样的成果，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46）。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与持久抗战的需要，抗日前线和迅速扩大的各抗日根据地迫切要求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各项工作。但现有的干部队伍，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这就把迅速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的任务，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又一个异常突出的大问题。

毛泽东比较早就意识到这项工作的紧迫性。抗战爆发前夕，他曾向全党呼吁：“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47）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花了很大力气，亲自来抓这项工作。他一方面要求各地迅速恢复被打散的组织，寻找旧的关系；另一方面，更重要是，在延安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来培养各方面的干部。

那时候，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呼唤下，大批爱国人士，特别是知识青年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难，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入延安。为什么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延安会对要求抗日的人们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力呢？有一位青年这样说：卢沟桥事变时“我在上海，立刻我就去南京投效工作。但是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是这样走掉了。”“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觉得顶好只有向八路军学习。延安的领袖们有伟大的政治经验，而且特别精于游击战术和民众运动。我们到西北来学习这些东西。”（48）

一走进延安，许多人立刻看到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新天地，看到一种真挚而平等的新的人际关系，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摄影家吴印咸回忆道：

“深厚坚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49）

毛泽东非常珍视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人，把他们看作革命队伍中的新鲜血液，提倡开办各类学校，把他们培养成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他常常说：“出人是要紧的事，

出了人便可以派出去”。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措施。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领导开办的学校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专门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是延安最有影响的学校。它的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改名，简称“抗大”。抗大的学员，一部分是从部队中抽调的红军军政干部；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校工作，如刘伯承、林彪、罗瑞卿、徐向前、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莫文骅、李志民、胡耀邦等。同时，又从大后方请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学者到抗大任教。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认为“这是共产党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紧抓好。

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都被列为抗大的必读教材。

毛泽东和党中央一些负责人，经常为抗大讲课。毛泽东后来回忆：“那时我可讲得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他讲课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历史等，其中主要是谈战略问题。毛泽东强调要“提高战略空气”。他说：“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他要求学员们在政治上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军事上要努力学习军事理论，这些都是战略问题。

有一个学生在毕业后给毛泽东写信说：“过去未到这里以前，在外边（指非特区）看过很多的书报杂志，五花八门，懂得了不少，可是抓不住中心，摸不着方向。但是到了这里以后，就学到了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知道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泽东看后非常满意，认为他所学到的是“重要的中心的一点”（50）。

每当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或结业式时，毛泽东把它看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通常都要到会讲话，鼓励学员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走出校门要向社会学习，指出“那是无字之书”。毛泽东常常告诫他们，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路，走“之”字路，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毛泽东的讲话有很强的感染力。刘白羽回忆道：“当讲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时候，毛主席安详而沉静地朝前望着，举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方推去，这是推动历史前进啊！这时你的心情特别庄严，什么艰难险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话下，就是付出生命，也会马上站起毅然决然走上前去。”（51）

毛泽东很重视在政治上关心知识青年，勉励他们进步，并注意在他们之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毛泽东对各队党组织的负责人说：这批革命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延安不容易啊！从西安到延安走了八百里，这就是一个考验，政治上不坚定是走不到的。要好好教育、培养这些人，尽快发展他们入党。在抗大学习与工作过的李志民后来说：“现在我们再回顾四十多年前这段历史，就更感到当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待知识分子大胆信任、大胆使用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当年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把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青年，或是在政治历史上沾点‘灰尘’的青年统统拒之门外，我们就组织不起来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巩固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52）

但是，对于抗大中的党员干部，毛泽东则要求十分严格。他们中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的，不管过去有多少斗争历史，一定严惩不贷。一九三七年九月，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而枪杀了陕公女学生刘茜。案发后，毛泽东在抗大校长罗瑞卿写的报告上很快作出批示，并于十月十日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认为应该对黄克功处以极刑。他在信中说：“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53）

抗战八年中，抗大先后办了八期，总校和分校共培养出二十多万干部，大多在各条战线上成为骨干力量，对争取抗战胜利，对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形势的发展，来到延安的青年越来越多。一所抗大已不能满足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新的学校——陕北公学。

这所学校由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张云逸、成仿吾等人筹办，艾思奇、何干之、何思敬等著名学者任教。李维汉回忆说：“陕公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创立的。特别是毛泽东，他在繁重的工作中，还常对学校的任务、办学方针等关键问题，给予及时的指导。”（54）

陕北公学是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毛泽东对陕公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陕公是全中国的缩影，“陕公是代表着统一战线，陕公是一幅进步的缩图”（55）。陕公前后办了近四年，培训出一万多名干部。

鲁迅艺术学院也是毛泽东倾注了不少心血的一所学校，是由毛泽东等发起创办的。这是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学校，由沙可夫、李伯钊等负责。

毛泽东非常钦佩鲁迅，说自己“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一九三六年，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去工作。行前，毛泽东和他长谈了一次，嘱咐他一定要好好团结鲁迅先生，因为他是一面大旗，能够唤起民族的抗战热情。毛泽东经常用鲁迅的精神来教育青年和文艺工作者。他说：鲁迅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伟大的“鲁迅精神”（56）。他还说：“今天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57）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鲁艺培养出一大批文艺干部，创作出一大批宣传抗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对发动和组织群众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还经常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以及由他提议创办的中国女子大学等学校讲课。

到六中全会召开时，这些院校已培养了几十万干部，其中共产党员达到二十五万人。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培养干部的问题提到更高的地位来看。他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58）他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花了这样大力气，自己动手，来抓这件事，是十分有远见的，效果也是极为明显的。

大批知识青年来到延安，也给这里带来了新的蓬勃朝气。每天傍晚，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都会有年轻人的



欢笑声和歌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一曲抗大校歌凝聚着千万颗青年人的心声。毛泽东常常出现在他们中间，无拘无束，谈笑风生。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一九三八年秋，贺子珍离开延安一年后，毛泽东同从上海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江青结婚。这次婚姻上的错误选择，给毛泽东后来的生活，特别是他的晚年带来极大的不幸。

抗日战争前，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和“围剿”，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被迫处于同外界隔绝的状况下。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主张令人们感到耳目一新，引起国内外广泛的注意。许多人来到延安访问。梁漱溟回忆他当时去延安访问的动机：“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百闻不如一见。”（59）抱着这样的目的与心情，一些关心中国命运和抗战前途的中外人士络绎来到延安。毛泽东认为这是了解社会情况、大众情绪和宣传党的主张的极好机会，在繁忙中抽出许多时间接见来访人士。

梁漱溟是中国乡村建设派的领导人，一九三八年一月到延安后，就抗战前途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同毛泽东交谈了八次，每次时间都在两小时以上，最长时通宵达旦。半个世纪后，梁漱溟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同毛泽东交谈的情景：“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却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对阶级斗争等问题，双方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梁漱溟说：“他



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60）

毛泽东会见平民教育会派来延安参观的诸述周时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还是站在老百姓的头上压迫他们，只要和他们接近，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自然相信你，随你要他们的钱，要他们的命都可以办得到。只要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何愁没有人上前线，何愁没有人抗战？（61）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七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从前线返回内地途经延安时，受到毛泽东和延安军民的热情欢迎。毛泽东就合作抗战等问题同他广泛交谈。这次延安之行对卫立煌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陪他同行的秘书赵荣声回忆道：“自此以后，卫立煌对于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多些了，不只是看看标题，而且翻阅一部分文章。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叫我陪他细读七月七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名著《论持久战》。这本书不但对于卫立煌的‘速胜论’、‘唯武器论’等顽症有很好的疗效”，而且使“卫立煌对于八路军打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有所理解、有所同情了”。（62）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五月十一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就这些问题作了回答。第二天还为他题写赠言：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面，才能达到目的。”（63）

来延安访问的人中有一些外国朋友，毛泽东非常重视同他们的交往。

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是位著名的外科医生。一九三八年三月底，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白求恩率领加美医疗队到达延安。毛泽东在会见时热烈支持他建立战地医疗队的提议。后来，白求恩赴晋察冀边区工作，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诊手术时受感染而逝世。毛泽东十分悲痛，写下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高度赞扬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

有些美国军人对延安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埃文斯·卡尔逊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去延安前说：“如果能亲眼看看，我就能证实真实的情况。”(64)一九三八年五月，卡尔逊到延安，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还会见了大批中外记者，其中包括英国记者贝特兰、美国记者王公达、中国记者舒湮、邓静溪等。毛泽东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战的形势、前途，以及八路军、游击战争在持久战中的重要作用。一位记者这样评论毛泽东：“他的外表很像朴实的农夫，但他的举止却似文雅的书生”，同毛泽东谈话“听起来似乎觉得‘平淡无奇’，过后想起来却又‘隽永有味’”。(65)事后，这些记者将延安之行中看到的情况介绍出去，毛泽东被国内外愈来愈多的人所了解了。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37年9月25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页。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37年9月25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1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9月25日。

《中共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六大以来》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861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1937年10月22日。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等的电报，1937年10月19日。

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告朱德的电报，1937年11月15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87—396页。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11月14日。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10日。

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12月9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10日、12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10日、12日。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 4 月版，第 231 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43 年 11 月 19 日。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 年 11 月 13 日。

(22)《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版，第 224、225、226 页。

(23)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7 年 12 月 12 日、13 日。

(24)毛泽东致邓小平、程子华、彭雪枫等的电报，1937 年 12 月 17 日。

(25)毛泽东、萧劲光、谭政致边区各军政首长的电报，1937 年 12 月 24 日。

(26)陈、周、博、叶、董致毛、洛及书记处并朱、彭、任电，1938 年 2 月 10 日。

(27)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 年 2 月 28 日。

(28)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 年 2 月 28 日。

(29)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 年 2 月 28 日。

(30)洛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 年 2 月 28 日。

(3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版，第 263 页。

(32)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致张国焘的电报，1938 年 4 月 12 日。

(33)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二期学生毕业典礼前一天的讲话记录，1938 年 5 月 7 日。

(3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记录,1938年8月3日。

(35)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8年9月14日。

(3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16页。

(37)《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24日。

(39)张文彬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0月24日。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7—554页。

(42)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38年11月5日。

(4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63页。

(44)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1月6日。

(45)彭德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0月24日。

(46)《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4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77页。

(48)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93、94页。

(49)吴印咸：《延安影艺生活录》，《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5 月版，第 267、268 页。

(50)毛泽东对抗大三大队临别演词记录，1938 年 3 月 20 日。

(51)刘白羽：《延河水流不尽》，《毛主席的旗帜飘万代》，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77 年 10 月出版。

(52)李志民：《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之三)》，《中共党史资料》11 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第 227 页。

(5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版，第 110 页。

(5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 4 月版，第 398 页。

(55)毛泽东对陕公第 6、7、8、9、10 队毕业同学的讲话记录，1938 年 3 月 3 日。

(56)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记录，1937 年 10 月 19 日。

(57)《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版，第 122 页。

(58)《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526 页。

(59)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4 月版，第 61、64 页。

(60)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4 月版，第 61、64 页。

(61)诸述周：《毛泽东先生会见记》，1938 年 6 月 14 日。

(62)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 1 月版，第 93 页。

(63)毛泽东为施方白题写的赠言手迹，1938年5月12日。

(64)米契尔·布赖克福特：《卡尔逊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12月版，第216页。

(65)邓静溪：《毛泽东先生会见记》，1938年3月24日。

## 二十二、反磨擦斗争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日本在武汉和广州战役中几乎倾注了全力。进攻武汉动用的兵力达十四个师团，进攻广州也用了三个师团，共占当时日本陆军总兵力的半数。这是自卢沟桥事变一年多来日方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对两地的进攻几乎集中在同一个时间内举行，反映出他们力图“速战速决”，以摆脱长期作战带来的严重困境，但结果并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对华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几乎已达到极限，已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的进攻势头，不得不陷入他们极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状态，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以期“以战养战”，并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

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这时已迁到重庆。随着局势的变化，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不同集团分别出现新的重要政治动向。

一向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突然从重庆跑到越南河内，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的声明，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彻底暴露了卖国乞降的面目。全国范围内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投降活动的热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也把他永远开除出党。

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没有和汪精卫一起投降，继续留在抗日战争的阵营内。这是值得赞扬的。但在他看来，日本军事进攻的威胁已较原来大大减轻，而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回顾这一年时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几天后，他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的日记中把话讲得更明白：“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无系统”等四端，“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也”。从蒋介石日记里透露出的这些内心变化中可以看出：他已把关心的重点从对日作战转向防共反共方面，虽然他这时还没有公开说出来。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的磨擦活动也明显增多起来。周恩来在给延安的电报中说：“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磨擦且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毛泽东在会上说：“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都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更要限制我们。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他提出：“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推动国民党向好的方面发展。

但是，事情并没有如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那样来发展。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虽然在开会词中谈到现在是第二期抗战开始的时候，谈到要抗战到底，不能半途而废，但他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更严重的是，会上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四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会议公开发表的《宣言》中说：“本会议郑重声明，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

坚，致生顿挫。”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写道：“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这些话，矛头显然都是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五中全会，成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

尽管如此，这时蒋介石仍主张继续对日抗战，严厉谴责汪精卫的投降活动，他的防共反共的全盘打算主要是在内部酝酿和布置，没有完全公开出来。因此，这时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这个问题需要谨慎而恰当，留有余地，并且继续观察。

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国民党五中全会后的形势及党的方针。毛泽东已经敏锐地警觉到国民党内妥协磨擦的危险倾向在发展，特别是蒋介石本人的态度在发生变化。他在会上批评国民党五中全会的错误是“依靠外力，只打到卢沟桥”。“国民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在五中全会是再一次表现。”关于国共关系，他认为，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与磨擦倾向也是错综复杂的，主张执行联共同时又防共的中间政策的占多数，我们应该增加左翼力量，争取中间派。蒋介石将处于中间派地位。“过去，我们只与汪精卫斗争，没有与蒋介石直接斗争。抗战中如何打法，我党一贯与蒋介石斗争。在前年的斗争方式是尖锐的，去年较和缓，但斗争是没有停止的。今后我党方针还是不要太尖锐，要坚韧。”“我们要阻止妥协磨擦危险倾向的发展，主要方针是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争取中央军，发展八路军游击队。”他说：只要有力量造成抗战的局面，就能逼迫蒋介石不得不继续抗战。

此前，他在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演，提醒大家在反对民族投降活动的同时要注意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他说：最近为止，我们得了许多材料，很多

材料、很多小册子发给国民党党员，要防止共产党，而且要采取攻势。什么叫防止？就是不让共产党发展。什么叫攻势呢？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溶共”的政策，就是说要取消共产党、溶化共产党、取消共产主义，他说：“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古时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我们对无理之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他在讲演的最后说：对国民党的磨擦，“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说人家不捣乱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要抓得紧，一定要有力。”“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寇”。

对蒋介石正在日益加强的防共反共活动，毛泽东主张进行必要而适度的反击。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召开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南方局：因国民党五中全会对民主民生问题一无表示，对我党态度仍不甚好，而且指令各地对我党我军我边区采取进攻方针，并增加磨擦对抗，对前次参政会决议也未见实行，因此，我参政员对本次会议宜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蒋及国民党反省。随后，毛泽东和王明又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并转蒋介石：“因事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特电请假。”

这时，共产党内有人存在一些糊涂观念，认为既然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中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末，国民党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毛泽东为此作了说明。他在抗战以来早已一再说过，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国民党部分地实现了民族主义，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没有实行。这些，已经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当局对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不同态度说清楚了。针对党内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他又提出，蒋介石用三民主义来同我们斗争，“我们抓住三民主义，用三民主义压倒他们”。他多次到中央党校等部门讲演，说明国共两党对待三民主义是有区别的。他说：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实行的是三民主义，将来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把三民主义（现在的）变为社会主义（将来的），这一条我们不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我们跟友党讲亲爱，讲团结，这是对的，而同时要大大发展我们的党，不要因讲亲爱、团结而放弃了自己的任务。”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三民主义是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正如西安到延安，洛川是必经之路一样，现在我们实行三民主义，哪个说我们将来不实行社会主义？”

三月十二日，蒋介石借孙中山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布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规定它的共同目标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其实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变相提法，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要“利用他们的东西来反对他们，压倒他们”。

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作《关于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他说：“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地方。一方面号召全国人民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对付

共产党的。”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它得到一个正确的方针，使它有利于‘打日本，救中国’”。

五月一日，延安各界在延安南门外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演。说：“大家宣誓：反对汉奸，拥护抗战，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干什么呢？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我们中国在危难之中挽救过来，改造过来，变成一个新中国。”“我们要打到什么程度呢？要打到鸭绿江边！要收复一切失地！不达目的，决不停止。”“今天，延安各界，党政军民，各机关，各学校，在这里开会，举行宣誓，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一定要打倒我们的敌人，一定要建设我们的新中国！”他强调指出：“汪精卫要把力量集中到他的汉奸阵线上去，集中到降日阵线上去，行不行呢？万万不行的！有些捣乱分子、磨擦专家，不是把力量集中而是把力量分散，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所以一切意志要完全集中在最后胜利一点，一切力量是要完全集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处，决不能够违反。有违反的就要反对，就要打倒”。毛泽东接过蒋介石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口号，来揭露和批评他，这在斗争策略上是无懈可击的、十分高明的。

随着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颁布，国内政治形势一天天恶化。在河北、山东、陕甘宁边区等地，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不断制造同八路军的军事磨擦，事件层出不穷，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事态越来越严重。一味退让，只能使对方更加得寸进尺，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因此，毛泽东在这年年初已经提出反磨擦的问题。他说：大革命的“亡党之痛”提醒我们，“要国民党进步，没斗争是不行的”。他还在内部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但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仍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

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尽量通过谈判来妥善处理与顽固派的磨擦问题，以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

那时，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的重点地区。他们派了十九个步兵军和两个骑兵军，还有三个保安旅和十七个保安队，共约四十万人对边区进行包围与封锁。他们还向边区许多县派去国民党的县长、县党部和保安队。毛泽东在一封电文中曾描述道：“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这一切，迫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真对付。当年担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的萧劲光在回忆录中说：“陕甘宁边区的整个反磨擦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对斗争情况了如指掌，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善于从斗争实践中，及时发现和提出问题，及时归纳、总结经验，并及时提醒我们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许多重要的策略思想和斗争原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虽然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到后来才陆续向全党提出来的，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开始就从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言传身教中贯彻了这些思想和原则的基本精神的。”那时，以萧劲光的名义发给蒋介石、胡宗南以至国民党的师长、专员的电文声明、布告等，基本上都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不少还是他亲自起草的。萧劲光回忆毛泽东在修改时字斟句酌、煞费苦心的状况时说：

“毛泽东同志在修改电文时，多次加了这样一些话：‘边区二十三县范围为蒋委员长所指定’，我军‘对原定

二十三县并未越出雷池一步’。这样写理由很充分。边区二十三县是你老蒋亲口承认，又经过国民党的正式会议讨论才决定下来的。现在你又派兵来侵占，出尔反尔，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在修改我给蒋介石等人的一份通电中，毛泽东同志反复推敲，最后改写成这样一段话：‘目前日寇以一师团之众大举西犯，柳林、军渡相继失守，我河防部队正尽一切力量，予以痛击，连日战斗甚为激烈。大敌当前，覆舟堪惧，后方纷争，实属不宜再有。苟一方拼死杀敌于前，他方复乘机争夺于后，则不啻以刃资敌，前途危险，何堪设想！’这段话里的潜台词，是在警告顽固派不要继续与日伪勾结。

“在修改我致程潜、朱绍良的一份电文时，毛泽东同志加了‘据闻一切行动均系根据新颁处理共党问题方案，下级不过照此方案执行而已’一句，点明下面的人制造磨擦，上面是有‘根’的。”

萧劲光在叙述这些情况后写了自己的体会：“认真琢磨他修改的词句，对于怎样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我心中就更有数了。”

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克制态度为软弱可欺。反共磨擦事件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国民党在河北的“磨擦专家”、河北民军总指挥（以后又任命他为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张荫梧公开叫嚷：“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我们无论怎样做，进攻是没有问题的。”他乘八路军反击日军“扫荡”的机会，从背后偷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酷杀害八路军官兵四百多人。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又包围湖南平江嘉义镇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通讯处负责人、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毛泽东得到报告后



义愤填膺地说：“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

面对步步进逼的这种横逆，中国共产党人已无法继续退让，否则，敌后抗战的成果会重新丧失，抗战大局会遭到严重破坏。

六月十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对投降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国民党存在投降与继续抗战的两种可能性，中国共产党要从坏的可能性作准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精神上没有准备。“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但他还是强调：“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

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博古改定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宣言》中明确地提出了三条中心口号：“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上作报告，提出“保卫边区”的任务。他说：“现在有些顽固分子，他们讲磨擦。他们说要把我们的边区磨掉。我们呢？我们说要把边区保卫起来。过去是创造边区，现在是要保卫边区。”“因为顽固分子他死顽固，他磨擦来，你一定要磨擦去。你如果不磨去，他会愈磨愈凶起来。你磨了去，好比在他的头上打了一下，使他的头不敢再钻进来。他就想一想，还是不磨吧，讲亲爱。这个时候我们也同他讲亲爱，请他喝茶，大家讲和平。所以磨擦是对付顽固分子，结果还是讲亲爱。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不要先打人，人家打来了，我也打过去。磨擦的最后目的是讲和，



磨擦是讲和的最好办法。但是不是要磨擦下去，像从前十年内战一样呢？那我们也不赞成那样搞的。”

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必须制裁反动派》）他说：在平江这个抗日的后方，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被反动派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

从七月三日至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多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内外形势、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在会上说：“在国民党开始进步时（由内战转到抗战时），全国团结统一空气高涨，妨碍统战开展的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在国民党退步时（二月起）妨碍统战开展的危险，便是怕磨擦破坏统一战线。”“到磨擦到尖锐时的危险，可能最容易忘记同一性，易于忘记三民主义与统战策略。将来可能只顾磨擦忘记了统一性。目前党内要进行阶级教育。”（21）

聂荣臻后来回忆：“当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反磨擦斗争，就在全边区展开了。”（22）

八路军被迫进行还击的第一个目标，从粉碎张荫梧的进攻开始。

八月上半月，乘八路军在艰苦环境中同围攻根据地的日军进行生死搏斗时，张荫梧又两次从背后袭击八路军，

杀害八路军工作人员。八路军在反击中缴获张荫梧部下勾结日军共同向八路军进攻的密信。这种状况已使人忍无可忍。八月十五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刘伯承等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提出对河北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指出：对张荫梧这样的顽固分子要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这个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刘伯承接电后，在八月二十四日一举将张荫梧部大部歼灭，二十七日又全歼他的残部，共歼四千五百人，张荫梧只身逃跑。不久，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将张荫梧撤职查办。这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正当中国国内磨擦迭起的时候，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纳粹德国在先后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后，又向波兰大举进攻。九月三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变动对中国的抗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九月七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所写的社论《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社论中说：帝国主义战争扩大这一新的国际形势可能对中国抗战产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晌。“然而，最主要的，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够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坚持内部团结，尤其是国共合作的方针，坚持力争全国进步的方针，那末，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以缩短时间，减少牺牲，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更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同样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克服一时困难，进而取得抗战的胜利。”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会见随同北路慰劳团来延安的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和《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当记者问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时，他回答：“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当然，“说敌人大规模战略进攻和我们的战略退却在一定条件下基本上已经停止，并不是说一切进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却的可

能都没有了”。当记者问到所谓“限制异党”也就是各地磨擦的问题时，毛泽东激动起来了。他说：“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由于记者问到共产党对待所谓磨擦的态度，毛泽东回答：“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在这一年的早些时间，毛泽东已经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原则，但那是在内部讲的，这一次是通过答三位记者问的形式第一次向全国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态度，同时说明这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谈话最后，毛泽东把中共中央在七七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用更简洁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三大政治口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期的基本口号，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帮助许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国内政治局势中正在步步上升的严重危机和分清是非的标准。

几天后，毛泽东再次见到来延安访问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斯诺一开始就讲到，他在重庆访问国民党一个将军，那个将军说：现在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党——国民党，一个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边区政府”都是完全非法的，终究必被取消。他

在西安又访问另一个将军,也是这样说:中国除国民党外,再没有其他合法的党了,共产党在与蒋委员长表示一致之后已不复存在,因此,现在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的。毛泽东回答说:“中国早已有实际上的统一战线,在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已也有了名义上的统一战线。”“别的政治集团怎么讲,我不知道,说到共产党,那末,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过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

当谈到抗日和民主的关系时,毛泽东说:从抗战以来,国民党政策上的变化是不打内战而打日本了,但在民主民生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这种独裁引起了全国的不满,非得变更一下不可。”“现在全国人民都很着急,中国不改革政治,不实现民主,不但不能打胜日本,而且一定要亡国的。”(23)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还会见了率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到延安访问的南北总团团长、国民党元老张继,北路团长贺衷寒、副团长王右瑜,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著名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以及来自各国的友人。向他们广泛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心和诚意。这对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合作有重要作用。

到这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局势越来越坏,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向中国共产党进攻。十一月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之跋扈嚣张,全无国家民族观念,只知乘机扩张势力,今后必益加甚。叛乱之期,当不在远。”实际上是,蒋介石使用军事手段向共产党进攻的日期“当不在远”了。这个月的十二日至二十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

实际上确定了要以军事反共来代替政治溶共的方针,并制定《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日益恶化的形势使毛泽东十分焦虑。

他清醒地看到:一场共产党人原来不希望看到的相当规模的武装冲突也许已难以避免。十一月十四日,他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谈到:“我们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假使把你的头割掉了,还讲什么团结啦?”“所以我们讲团结,在必要斗争的时候我们还要斗争,有了斗争也就会有团结。”(24)十一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及华北地区斗争情况的汇报。汇报中谈到在当时国内外形势影响下,大资产阶级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但在重庆的中产阶级,包括一些国民党元老却反对内战,“他们表现很活跃,敢于讲话”(25)。在华北坚持抗战的国民党将领也发出“再打内战就完了”(26)的呼声。这些,对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如何处理反磨擦问题也有启发。

为了准备对付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进攻,毛泽东越来越注意到必须争取中间势力(27)。这在他的统一战线思想中,是一个新的主要内容。

他还特别强调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十二月一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呼吁:“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28)

在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〇年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山西、河北等地的军事进攻中,阎锡山于十二月在晋

西发动的进攻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的事件最为严重。

山西新军的正式名称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由薄一波以牺盟会负责人的名义向阎锡山建议，取得阎的同意后成立的。开始时先建立一个团，由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一支革命军队。新军成立后，很快发展到五十个团，协同八路军在敌后作战，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使阎锡山感到十分恐慌，决定用他长期控制下的山西旧军来消灭这支力量。晋西事件发生前，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这时，和平妥协的危险已成为严重的危险。阎锡山在会上公开叫嚷：“天快下雨了，赶快准备雨伞。”山西党组织派人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毛泽东果断地指出：“阎锡山准备‘雨伞’，你们也赶快准备嘛。”(29)

由于晋西是联结华北和西北的枢纽，是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往来的必经通道，“晋西斗争我们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30)，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地区的反磨擦斗争。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阎锡山还没有公开反共，晋西的磨擦斗争是以新旧军冲突的形式出现的。毛泽东紧紧抓住这个特点来制定斗争方针。他认为，晋西事件反映了山西旧派准备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它的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要“认清此种冲突可能扩大”，“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31)他要求八路军必须支持和帮助新军，但暂时不要提反对叛军的口号。对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投降日本的阎锡山，毛泽东主张仍要积极争取他继续抗日，“在拥阎之下反阎”(32)。他强调“晋西斗争之胜利，依靠于正确政治方针，正确战略战术，强兵良将，缺一不可”。(33)薄一波

回忆道：“那几年，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明确的指示，结合山西的具体情况，部署和开展工作的”（34）。

十二月底，晋西的斗争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在阎锡山看来，在晋东南和晋东北地区，抗战派的力量比他们大，而在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他们的力量比抗战派大，有可能把抗战派压服。因此，他们先以全力进攻晋西南，准备得手后再转而进攻晋西北。蒋介石又调中央军从晋东南方向积极配合，随时准备乘隙而入。这样，晋西成为八路军、中央军和阎军三大力量斗争的局面。毛泽东判断：“如此战新军失败，蒋必增强阎锡山，倚之为反共降日的华北支柱，那时就麻烦了；如此战新军胜利，可能使阎锡山转舵。”（35）他指出：“在拥阎讨逆口号之下，完全独立自主自筹给养，遇敌进攻则消灭之，这是整个山西的总方针。”（36）这时，晋西南新军采取坚决反击的方针，将前来进攻的旧军两个旅击溃。山西工作重点已转向保卫晋西北的斗争上。中共中央军委把李井泉从大青山根据地调来，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领导。接着，要求已东进冀中的第一二 师准备调一个团到晋西北。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贺龙、关向应：“你们的主要根据地是晋西北、绥德及吕梁山，望担起全部责任，师部宜即过来。”（37）第二天，他们致电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 师，明确指出：“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电报要求第一二 师新三五八旅及晋西北新军即集中于适当地区，加强战备。同时要求：“贺、关立即出发到晋西北指挥战争，愈快愈好。”（38）

一九四一年一月初，晋西南旧军封锁了吕梁山和中条山。晋西北的八路军新三五八旅和决死队在临县地区向晋西北旧军赵承绶反击，迫使他们在十三日夜退往晋西南地区。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山西问



题，须候贺龙到晋西北后完全解决旧军残部，并建立政权，并准备派人去和平解决。”“现在阎有旧军三万余人在吕梁山脉，粮食困难。将来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旧军依靠中央军进攻我军；另一种可能就是和平解决，减少磨擦。我们的方针，不惜与中央军打，只有反磨擦才能取得存在与发展，要求最后划江而治。”(39)二月，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师主力从冀中返回晋西北，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不久，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和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先后成立。军政委员会由贺龙任书记。行政公署由毛泽东推举著名爱国将领、晋西北新军总指挥续范亭为主任。

这时，晋东南八路军和新军反击阎军孙楚部；八路军在太行反击朱怀冰部，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内顽固派发动的这场反共高潮已无法支持下去，接近偃旗息鼓。二月二十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作了这样一个概括：“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40)

在激烈的反磨擦斗争中，党内外一些人有些担心，生怕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因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指示指出：

“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



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41）

为了支持和配合全国范围的反投降、反磨擦斗争，延安民众召开讨汪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演讲，号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他说：“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针对蒋介石只讲抗日、不讲团结和进步的错误方针，他指出：“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他批驳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统一论，是统一于分裂，统一于倒退，所以是假统一；强调我们的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讨汪通电，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的十点要求。

反磨擦斗争，对中国共产党说来，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卫行动，因此，在可能条件下就力求适可而止。一九四一年三月，在日本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蒋介石和日伪的矛盾更加激化。毛泽东及时提出对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军事上的休战，政治上开展和平攻势，并加强争取中间力量的工作。

在山西，据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报告：阎内部对新军和战主张尚不一致，而阎本人则觉解决新军已非己力所能为，对勾结中央亦尚有顾虑。（42）

中共中央加紧了对阎锡山的工作。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以后对外立词，请注

意和缓些。”“你们准备派两个团向南行动，现不适宜，谅已停止。如未停止，请即设法停止退回来。”(43)第二天，毛泽东写了给阎锡山的信，表示希望和平解决晋西事件。并决定派萧劲光和王若飞为代表赴秋林镇会晤阎锡山。二月二十五日，萧劲光、王若飞带着毛泽东写给阎锡山的这封亲笔信到达秋林镇同阎谈判，受到极大欢迎。

“阎公开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之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并且表示：“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44)经过谈判，双方实际上达成划区作战协议：在晋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的活动区域。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在国民党顽固派后来发动的反共高潮中，阎基本上采取中立态度，同中共保持了合作的局面。

与此同时，在河北等地，八路军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后达成协议：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

八路军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也推动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在重庆，正在进行的两党谈判中，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再三向中共谈判代表申明：“决不会投降，请你们相信我们”。同时不再提八路军扩军人事归国民党中央管理。对于这次反磨擦斗争取得的胜利，毛泽东充分肯定它的重大意义。他在中央会议上说：在国共关系中，“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45)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是第一位的；国内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但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实行反共和反民主的政策，国内的阶级矛盾有时还相当尖锐。如何处理好国共之间的关系？这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

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观察形势，分析形势，都离不开这个问题。

经过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实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策略思想获得重大发展。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策略原则，并从理论上作出高度的概括，突出的是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和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他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在讲话中，毛泽东着重分析和阐述了争取中间势力的极大重要性。他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他还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便不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后来，他在致萧向荣的信中写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46）

针对反共顽固派一方面主张团结抗日；一方面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特点，毛泽东提出要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既争取他们留在革命队伍中，又要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他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

他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要注意三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毛泽东将这三个原则归结起来，就叫做“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重要策略原则，对全党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确实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在回忆录中写道：“回顾反磨擦斗争这段历史，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持，是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既联合又斗争，斗争要有理、有利、有

节的政策策略而取得的。当时，大敌当前，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的条件和基础。只讲团结，不作必要的斗争，统一战线也不能够维持。”“正是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和中间势力的拥护与同情，积蓄和发展了抗日力量。”（47）

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1月2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1月5日。

《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47页。

《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54页。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记录，1939年2月5日。

中央书记处致南方局的电报，1939年2月6日。

毛泽东、王明致国民参政会转蒋介石的电报，1939年2月1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8日。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记录，1939年2月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4月26日。

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9年4月29日。

《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8日。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35、236页。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35、236页。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 5 月版，第 254、255 页。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8 月版，第 147 页。

毛泽东在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9 年 7 月 12 日。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577、578 页。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 年 8 月 24 日。

(22)《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 8 月版，第 452 页。

(23)毛泽东和斯诺谈话记录，1939 年 9 月 24 日。

(24)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记录稿，1939 年 11 月 14 日。

(25)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9 年 11 月。

(2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版，第 232 页。

(27)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9 年 11 月。

(28)《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620 页。

(29)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 11 月版，第 7、8 页。

(30)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1939 年 12 月 26 日。

(31)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左权、彭德怀的电报，1939 年 12 月 6 日。

(3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 年 12 月 23 日。

(33)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左的电报，1939年12月28日。

(34)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7、8页。

(35)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电，1939年12月23日。

(35)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彭、罗、赵、陈、林电，1939年12月28日。

(36)毛泽东、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电，1939年12月30日。

(37)毛泽东、王稼祥致八路军总部和120师电，1939年12月31日。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月18日。

(39)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0年2月20日。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2、713、716、717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2、713、716、717页。

(42)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电，1940年1月31日。

(43)毛泽东、王稼祥致贺、关并告朱、彭电，1940年2月22日。

(44)中央及军委致朱、彭、杨等并转告新军各领袖电，1940年3月5日。

(45)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3月23日。

(4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61—162页。

(47)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8 月版，第 168 页。



## 二十三、新民主主义的理论

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之交，毛泽东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 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次飞跃，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它不仅回答了当前时局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而且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写出这些文章，决不是偶然的。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遭受严密封锁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变成全国性的大党，公开走上全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受到人们越来越密切的关注。他们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和中国未来前途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也必须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来，把人们吸引到自己高举的大旗下来。

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当政治中心还在武汉时期就起劲地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主张。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这种宣传更变本加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勱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在主张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同时，还要同毛泽东讨论“共产党之理论”，咄咄逼人地写道：“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此，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号称国民党“理论家”的叶青（任卓

宣)更公开主张：“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他还说：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不止今天，就是将来也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蒋介石自己也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发表一篇《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长文，鼓吹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这就把“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十分尖锐地提到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的面前，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对这个问题系统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中国共产党早就说过：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所解释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限度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真诚地愿为它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在当时来说，强调这一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又说明：两者之间仍然是有区别的。既然有区别，而一些人又正在叫嚷只要有一个三民主义就够了，要共产党把自己的旗帜收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就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自己的旗帜更加鲜明地打出来，同形形色色冒牌的或歪曲了的“三民主义”宣传分清界线，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理论和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中华民族要建立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前途。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共十多年成功和失败的丰富经验，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了的政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经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能够系统地回答前面所说的那些问题，将党关于现阶段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纲领这面大旗更加鲜明地打出来。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

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 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他说，只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在抗日时期，“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这个全新的理论能够在这时由毛泽东系统地提出来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早就感到，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进入抗战时期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形势和肩负的任务比过去更艰巨，更复杂。这使毛泽东更深刻地感觉到理论的重要性。因此，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就向全党发出学习理论的号召。他指出：

“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进一步的探索。美国作家斯特朗在访问记中写道：

“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毛泽东是她曾经采访的对象之一。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已经四十六岁，长期的战争磨难和陕北的艰苦生活损害了他的健

康。但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一面紧张地处理着战争年代的繁杂工作，一面坚持进行理论研究，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工作疲劳时，他就用力握几下用来当作“镇尺”的铁条，舒展一下关节，算作休息。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经过长时期的思考和探索才提出来的。这个理论以中国的实际国情为出发点。而要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国情，并且依据它提出正确而完整的革命理论，是极不容易的。它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所进行的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使他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深刻的了解，与此同时，他撰写了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重要文章，包括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在内，都是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准备。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一个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新阶段，他阐述党的理论、路线、战略、方针和政策的著述，更加丰富了。

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发表的《五四运动》一文中已经说到：“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他在五月四日所作的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把正在进行着的中国革命称作“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他说：“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它在打倒帝国

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后，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但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

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中已经明确地讲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从五四运动起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需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它要建立的是既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又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将来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显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这时已在酝酿、思考和形成中，只是还没有把“新民主主义”这个明晰的概念提出来，也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的论证和说明罢了。

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个科学概念，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这是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二章“中国革命”是他自己写的，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别人起草后经他修改定稿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早发表在延安出版的刊物《共产党人》上。建国后，这篇著作经他审定收入《毛泽东选集》。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明确地规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为什么中国现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由中国的实际国情所决定的。

毛泽东写道：“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正因为如此，《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著作，首先从

分析中国社会着手，以此为基础，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他指出：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决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其中又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这两项革命任务是互相关联的。

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谁能完成呢？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状况等方面的特点逐一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无产阶级有着许多突出的优点，所以能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但如果单凭它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因此能成为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没有完全断绝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联系，因此，又没有彻底

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当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成为反革命助手的危险。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还指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抗日战争中,对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应加以区别。前者是投降派,应该打倒;后者是顽固派,具有两面性,对他们应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此外,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关于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之间的这些区别,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初在《共产党人》上发表时还没有讲到。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第一次讲到这个问题。同年四月以后,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这部分作了相应的修改,(见该年十一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辑出版的《党建论文集》所收的这篇文章)。

由于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也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就决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



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 ,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就是 “ 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 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 ,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 ,否则是不可能的。 ” 这就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

毛泽东还指出 :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带来两方面的结果 :一方面 ,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 ,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 ;另一方面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 :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 ;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 ;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加上有利的国际环境 ,就能使中国革命的前途走向社会主义 ,而不是资本主义。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著作的发表 ,大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它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作出了如此系统而清晰的说明 ,使原来令人感到眼花缭乱的纷繁的社会现象顿时显得那样井井有条而易于理解 ,使人们在复杂多变的局势面前感到心明眼亮 ,能够始终清醒地把握住基本的方向 ,保持一致的步伐。它在当时和以后很长时间内产生的巨大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 新民主主义 ” 这面大旗高高地举起来了。那么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它们的特点是什么 ,还有其他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发挥和说明。

一九四 一年一月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讲 ,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这个长篇讲话 ,



从下午一直讲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拥挤在会场里的五六百听众，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一个月后，这篇演讲首先在《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稍后几天在《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自己说，他这篇讲话的“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这个范围。

毛泽东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十分明确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纲领。

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毛泽东主要概括了两点。第一，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伟大的一部分。第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关于后一个问题，过去中国共产党内存在过许多混乱的思想，主要是：有些人常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相混淆，急于在民主革命阶段采取一些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托陈取消派又认为中国现阶段既然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在将来再去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虽曾提出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但究竟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仍没有说清楚。直到这时，毛泽东从理论上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才是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

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这两个阶段又必须相互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我们要建立的“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文章为这个新国家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宏伟蓝图。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他说：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国体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还有一个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可以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总之：“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提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农村，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实行“耕者有其田”，容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后，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说：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但是，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再一次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这样，毛泽东就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具体内容，把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为人们勾画出了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轮廓。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驳斥了顽固派散布的一种论调：你们共产党既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推到后一个阶段去了，你们既然又宣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末，就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好了。毛泽东写道：“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国的民主革命，

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他还具体分析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哪些相同的部分,也有些不同的部分。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篇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的文章,也是一篇有着很强论战性的文章。对这篇文章,毛泽东酝酿的时间很长,写作过程中反复修改,并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二十多年后,他还曾讲到:“《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理论的反动文人叶青也不得不表示,自从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文章在党内外更引起重大的反响,使许多人对当前奋斗的目标和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了清楚明白的了解,使越来越多的人奔集到新民主主义的大旗下来。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无产阶级是否掌握了领导权。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早就提出来了。但是,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实现领导权?这个问题,毛泽东也经历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而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作出了全面的论述。他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关于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毛泽东写道:“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

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十八年来的斗争历程作出的重要总结。

毛泽东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章，令人难以置信地，都是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中写出来。他住在延安杨家岭的两间窑洞里，里间是寝室，有一张木床、一个小木方凳、一个木箱；外间是办公室，有一个旧书架、一张作为办公桌椅的旧方桌，还有一些小方凳。他习惯于通夜工作，到天快亮时才睡，上午十时又起来继续工作了。当时担任他的保卫参谋的蒋泽民回忆道：

“毛泽东写文章是非常辛苦的。延安地区没有电，夜晚毛泽东写文章时点两根蜡烛照明，烛光昏暗而又跳动，很影响视力，容易使眼睛疲劳。毛泽东写累了，就揉揉酸胀的双眼，再继续写，一夜之后，他的脸上沾了一层烟尘。”“毛泽东写文章用的是毛笔。写前打好腹稿，然后挥笔而就，疾书成文。他写东西时，桌子上一般不放书籍和报纸，不参照别人的东西。”“他埋头书写很长一段时间后，往往要停下笔休息几分钟，或者点燃一支烟吸，或者站起来，到门外的空场上走一走。如果他表情是平静的，面带微笑，和我们或公务员唠几句嗑，那么，他已经完成一部分文稿了。”“毛泽东写好文章，有的进行反复修改后，让我们送给中央首长传阅，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都要送给朱德看，政治方面的文章送给王稼祥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他再一次修改。”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作出这样巨大的理论创造？一方面因为他始终立足于无限丰富的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他认识上的每一步深化，都来源于对客观实际生活中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细心观察和深入思考，来源于反复地同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交换意见，集思广益，从来不作那种脱离实际的个人冥思苦想；另一方面在于他勤奋地刻苦地钻研

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的办法是：“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他曾对曾志说：“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

毛泽东一向认为，指明革命的方向和前途是十分重要的，但单有这些还不够，还需要确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和策略。他说：只有“把理论与实际政策说清楚”，问题的解决才算完整。当然，那时更多地吸引着毛泽东注意力的，还是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实际政策问题，而不是未来新中国方方面面的具体政策，但这两者之间又有着许多一脉相通的地方。

到一九四一年底，已是皖南事变的前夜，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一点也没有放松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统一战线策略上的新经验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

十二月四日、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他提出应当组织一个委员会，对党的各项政策问题进行总结，有的还要制订出条例来。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全面总结这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关于时局与政策的党内指示（指示中的政策部分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论政策》）。指示明确地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

会变更的；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当再简单地引用。”指示批评了土地革命时期出现过的一些“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指示着重阐明和规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在军事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在国内关系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等。

指示从具体的阶级分析出发，特别强调需要作出种种区别，如要把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要对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国际上，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要加以区别。如此等等。并且明确地指出：“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

关于各项具体政策，指示也根据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分别就政权组织、劳动、土地、税收、锄奸、人民权利、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规定了明确的具体政策。

指示最后要求：“以上所述各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规定的许多具体政策，全党必须坚决地实行。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



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 ,才能坚持抗日 ,发展统一战线 ,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 ,争取时局好转。 ”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确定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日见成熟。经过十八年的风风雨雨毛泽东终于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在早年就曾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面旗子应该色彩鲜明、简单明了、又有着十分丰富而确定的内涵，才易于为更多的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中国人从五四运动前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起，经过二十年的艰苦探索和曲折经历，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独立自主地立起了“新民主主义”这面旗帜，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有所指望”，“知所趋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对抗日战争中后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以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张君勱：《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生》第 10 期，1938 年 12 月 16 日。

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1939 年 9 月 30 日。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8 月版，第 825、82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353 页。

温济泽：《听毛泽东讲新民主主义论》，《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年 4 月版，第 473 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版，第 160 页。



毛泽东会见外宾时的一次谈话，记录稿，1956 年 3 月 14 日。

叶青：《毛泽东思想批判》，帕米尔书店 1974 年 9 月第 3 版，第 5 页。

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八一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版，第 27、28、29 页。

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第 400、401 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 年 12 月 4 日、13 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 年 12 月 4 日、13 日。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版，第 554 页。

## 二十四、皖南事变前后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毛泽东从对国内外局势的分析出发，一再向党内发出警告：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来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应付最危险最黑暗局面的到来。这种危险果然很快就出现了，那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一年前那次反共高潮不同，这时斗争的焦点已从华北转移到华中。

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华中地区，处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连结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的枢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当日本侵略军占领华中地区以后，在敌后同样有着一大片可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广阔空间，这里的人民同样热切地期望有人能领导并组织他们起来打击侵略者。

毛泽东在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展开大体完成后，很快就把眼光投射到这块重要地区上来。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他说：“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他强调：“现在就应该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会后，周恩来在一九三九年春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帮助他们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正确方针。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华中敌后，负责指导华中工作。

新四军向华中发展，面对着和八路军向华北敌后发展时不同的许多新的困难。首先，新四军是抗战开始后由原先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指挥系统以前并不统一，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也比八路军差，需要经过整编训练，再开赴前方作战。其次，华中大部分是平原、湖沼、水网，地势不利于游击战争的初期发展。再次，新四军组建比较晚。军部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成立。一九三八年二月，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的岩寺集中，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集中。当他们进行整编训练后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时，华中敌后的政治形势已比八路军初入华北时要复杂得多，新四军不仅要同日军作战，而且要时刻防备国民党顽固派从背后来的袭击。刘少奇曾叙述过这种情况：“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

当时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他过分夸大了面对的这些困难，举棋不定，贻误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最好时机。

一九四一年初，新四军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驻在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挥

部 ;张云逸率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江北指挥部。

这时 ,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应该放在哪里 ?对这个问题 ,有着两种不同意见。刘少奇到中原后向中共中央建议 :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 ,而在江南的新四军渡江北上 ,大力发展苏北。项英则认为 :华中的南部各省在政治上和群众基础上都对我有利 ,北部的发展也必须有南部配合 ,况且驻皖南的部队要北渡不但是困难的 ,而且是危险的。因此 ,他主张 :努力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

面对这样两种意见 ,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在一月十八日举行中央书记处会议 ,经过研究 ,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十九日 ,王稼祥起草了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电 ,指出 :“ 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 ,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 ,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 ,又商得向南巩固 ,向东作战 ,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 ,在华中可以发展( 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 ,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 ) ,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 ,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 ,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 ” “ 由江南抽兵到皖南 ,请考虑 ,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 ,江南发展较易 ,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 十天后 ,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项英、叶挺 ,强调 “ 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 ,虽已失去良机 ,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 ” ,并要求他们 “ 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 ,为紧急时用 ”。 根据这个要求 ,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刻抓紧时机向皖东敌后发展 ,到三月间就从原来的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左右 ,为向苏北发展开辟了道路。

新四军刚取得一点发展 ,蒋介石立刻命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桂系将领李

品仙，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军进攻。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华中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信号。

面对这种严峻局势，毛泽东立即发出“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的警告，并且及时作出如下部署：“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他提醒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四月一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抽调四万至五万人的兵力，在三个月内外到达华中，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

遵照毛泽东的部署，江北的新四军以劝告和争取的态度暂时制止了桂军的东进，同时在军事上击退了苏北方面韩德勤的进攻。

四月初，蒋介石要求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顾祝同也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已经清醒地看到：“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这样的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但从大局出发，他仍同意周恩来去重庆通过谈判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他又起草给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等的电报说：蒋介石“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的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

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

这时，蒋介石已打算将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江北移到江南。他们分析江南新四军的情况后认为：“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因此，顾祝同在谈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以便切断新四军和八路军会合的可能，并使他们集中到苏南狭小地区后再加消灭。

对国民党的这种企图，毛泽东已有察觉，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有力地打击韩德勤部的进攻后，顾祝同一定会对皖南、江南的新四军采取加紧压迫的手段。他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因为停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北面是受到日本军舰严密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有国民党的重兵，随时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他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等问题。稍后又电告项英：“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

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险境之中，这已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但对如何走出险境，项英同陈毅、粟裕之间又出现不同意见。项英认为：“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主张“江北之叶（飞）、张（道庸）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陈毅、粟裕则认为“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支持陈、粟的意见。四月二十六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并告

刘少奇、张云逸：“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并再次重申一条重要的原则：“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

局势已日见恶化，而项英的犹豫不决只会使正在恶化的处境更加恶化。五月四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

这个指示到达后，陈毅立刻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打破了国民党打算消灭在苏南地区的新四军的图谋。但项英仍固执己见，没有东出苏南同陈毅部会合，丧失了转移

的时机 ,对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也仍然不作准备 ,这就使皖南新四军军部陷入愈来愈危险的境地。

这时 ,国际形势又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 ,德国对法国发动全面进攻。五天后 ,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战。在德国军队闪电式的进攻下 ,同月二十二日 ,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投降。英军从欧洲大陆退守本土。国际形势的大变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抗战。日本企图在英、法无暇东顾之机加紧进攻中国和侵略南洋。七月二十三日 ,日本大本营发出 :“ 迅速处理支那事变 ” 的命令。

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天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 ,透辟地分析了法国投降、英国从欧洲大陆撤退后的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他指出 :英、法失败将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 ,促进德、意、日扩大战争胜利的贪欲 ;另一方面 ,又驱使美、英和法国的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对中国说来 ,“ 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 ,已经不存在了 ,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 ”。“ 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 ,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 ,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 ”。对国内的阶级关系 ,他一直主张作好两手的准备 :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 ,又要力争时局的好转。这时 ,他对国内时局的好转抱着比前一时期乐观的态度 ,认为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是 :“ 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 ,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 ” ,“ 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 ”。他还指出能够推动时局好转的两个因素是 :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 剿共 ” 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 ;国民党党内与党外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势力 ,还保存着更多的积极性 ,这也是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 剿共 ” 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分析 ,同他在三月间提出的“ 发展进步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 ,孤立顽



固势力”的思想是前后一贯的,并且把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放在更明显的地位。

根据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并为《新中华报》撰写了纪念抗战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在这篇文章中,他深情地写道:“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

在形势转变关头,使高级干部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七月六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向延安高级干部作《目前形势的特点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他说:“中国处在新时期中,空前困难时期与空前投降危机是快要到来了。”“今后的一年将是异常困难的一年。”但“全国统一投降、统一反共是可能避免的”,“我们的方针即是避免此种可能,逐渐争取好转”。他提出:在反共高潮稍见减退的情况下,对国民党应强调团结;要继续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但应“限制在战区、敌后及边区二十三县”;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中的“左”倾错误,但右倾也要反对。毛泽东在分析中间势力还保存抗战积极性时,提醒大家:“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

他在十三日为这次会议的讨论作总结时,又专门谈了团结和斗争的问题:“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以团结为主还是反共

为主而定。”“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又斗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

毛泽东自己也积极从事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六月间，他几次会见到延安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等，向他们详细介绍国内抗战情况和两党磨擦问题。当年随陈嘉庚一起到延安的庄明理回忆：“陈先生在延安会见了毛主席，心里十分畅快”。“延安之行以及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见给陈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从此把战胜日寇，祖国抗战必胜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然而，形势的发展表明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估计还是乐观了一些。蒋介石把国际形势中几大力量相互对峙的局面看作他“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大好机会。七月一日至八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十六日，他们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指导；划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冀察两省、鲁西北及晋西北一部，并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这就使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返回延安。

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四日、七日、八日，中共中央开了五天会，听取并讨论周恩来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和南方局工作的报告。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充分肯定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注意了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他强调今后要更加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他说：“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过去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

强这方面。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21)中共中央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放在全局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以前很长时间内还没有过。为了推动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回到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各根据地在加紧对日本侵略军作战的同时也要做好反磨擦的准备。

从八月二十日起，八路军在华北的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这次战役，八路军共出动一百五十个团，二十多万人，到十二月上旬基本结束，史称“百团大战”。八路军前后作战一万八千次，毙伤日军二万余人、伪军五千多人，俘虏日军二百多人、伪军一万八千多人，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多人。

正当八路军在华北同日军浴血苦战时，蒋介石却加紧在华中部署对新四军的进攻。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的力量比较弱，争夺华中可“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九月三日起，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部两路大举南下，向已由苏南渡江北上的新四军陈毅、粟裕部进攻。新四军多次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并一再退却。韩德勤自恃兵力远远大于新四军，一再进逼。二十七日，陈毅明确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省韩进攻，只有自卫。中共中央这时调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黄桥决战前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22)十月四日，韩德勤以多于新四军守军一倍的兵力向黄桥发动总攻。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经过四天激战，歼灭韩部主力一万一千人。接着，新四军请曾任江苏省长的苏北著名爱国人士韩国钧到韩德勤处斡旋，却遭到拒绝。韩国钧回来气愤地说：“和平无望！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准备自卫吧！”(23)国民党顽固派这次进攻黄桥的惨败完全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刘

少奇后来在总结时说：“很明白，如果顽固派在我们的任何一次和平提议之后，停止进攻，那他们也不会弄到那种地步的。”（24）

黄桥战役后，新四军在苏北敌后站稳了脚跟。十月十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的先头部队同新四军北上的先头部队会师，打通了华北和华中联系的通道。黄克诚在《自述》中写道：“黄桥决战的胜利和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师，为确立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并对以后抗战形势的发展有重大影响。”（25）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由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刘少奇在苏北与陈毅会合后布置一切，毛泽东十分重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由于江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心地区，因此，毛泽东在十月十四日发来的电报中就特别强调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題。他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題之一。”（26）

十月十九日，国民党方面由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收到电报的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从已有的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这封被称作“皓电”的电报，是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反共高潮的开端。

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对形势作出这样的判断：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27）毛泽东指出：“如何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地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28）

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呢？这同剧烈变动着的国际形势有关。九月间，德、意、日在柏林签定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英、美也签定协定，两大集团的斗争更加激烈，都想拉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苏联也正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得意忘形。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29)他判断，无论哪一种局面出现，国共之间的严重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新四军在苏北的胜利，也促使蒋介石更急切地要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采取报复行动。

当时，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准备投降的危险是估计得比较严重的。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形势。会议认为，时局有由小风波转到大风波的可能，党的工作布置应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毛泽东在致一些主要地区负责人的电报中强调：“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总之，我们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要有办法。”(30)

对举国瞩目的“皓电”，中共中央没有匆忙地作出答复，而是反复磋商，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毛泽东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特别慎重，因为：一方面，他认为时局还在变化中，蒋介石现在仍是动摇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31)；另一方面，他考虑到“皓电是哀的美敦书”，（引者注：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对这个问题如果操切从事，可能导致同国民党决裂，“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32)

由于考虑到可能出现最危险最黑暗的局面，毛泽东曾设想两种方案：一种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也就是只在反共军队进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时再反击，

八路军、新四军不打入它的后方；另一种是政治和军事上同时进攻。毛泽东认为这两种方案各有利弊，采用前一种方案，政治上占上风，但军事上将被国民党构筑的纵深封锁线围困，将来出不去而受日、蒋两军严重夹击，危险也是很大的。采用后一种方案，军事上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但是，人民不了解，政治上不利。究竟采取哪一种方案？毛泽东并没有立刻下最后的决心。十一月一日，他电告周恩来：“究采何方案，我们尚在考虑，亦请你们提出意见。”(33)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又电告周恩来：“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34)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周恩来十一月一日来电，来电提出“还是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何、白”(35)的建议，并反映中间势力迫切“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36)的情况。书记处会议决定采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的态度，宣言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毛泽东在同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

“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但各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再说话不迟。现距何白皓电限期尚有二十天，拟日内拟好复电，待十号左右拍发，不必复得太早。”(37)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38)同时，毛泽东仍作着两手的准备。同一天，他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

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 (39)

十一月九日，毛泽东起草的以朱、彭、叶、项名义复何、白电（通常称为“佳电”）经过反复斟酌后定稿。电文态度严正而坚决，措词委婉而恳切。首先叙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四年以来在抗战中取得的战绩，以表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心”。然后就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团结抗战之大计这六个方面，对皓电的无理指责作出明确答复。

防地问题是皓电的中心内容，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限期北移。佳电对华中敌后各部请求免调的理由，列举了四点。一、“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二、华中敌后各部在现在防地坚持抗战，符合蒋介石庐山谈话和告沦陷区同志书的精神。三、华中敌后各部调离后，其家属及留守人员的安全毫无保障，甚惧平江惨案、确山惨案之重演。四、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该地军民以树叶为粮，道殣相望，实难容纳其他之部队。因此，“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接着表示，在不得已情况下，准备对江南和江北的部队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

毛泽东在当天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佳电“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



然后，佳电又写了一段剴切陈词、柔中寓刚的肺腑之言：

“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毛泽东说：佳电的这一段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

在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部分，电文首先指出：“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必能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接着，电文笔锋一转，写道：

“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动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急，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佳电严正要求国民党“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40)

“佳电”发出后，在社会各界，特别是中间势力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得到广泛的同情。毛泽东不久后总结道：“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41)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各方面的工作作出周密的部署。他要求苏北的新四军“积极整军，沉机观察”；(42)皖南



的新四军“认真准备北移”，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他还致电周恩来，要他在重庆加强同苏、英、美等方面的外交人员联络，并“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43)

尽管如此，蒋介石要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各种部署日益加紧。十二月八日，何应钦、白崇禧再次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往黄河以北。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暗中做好围歼新四军的准备，还故意把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泄露给日本人，以便共同夹击。这个时期内，由于“日汪条约”的签订，毛泽东一度对形势看得比较乐观，认为“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44)，并估计“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45)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抛弃过对蒋介石的警惕，在实际工作中仍要求党内“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46)

十二月底，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日见嚣张，已集中了十二个师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47)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指示，除了命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兵力加强华中外，还要求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和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指示提出，军事指挥，叶挺未到江北前，统一于陈毅、刘少奇指挥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指挥下。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48)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一再致电项英，催促北移，并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49）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移做着最后的努力。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一面请周恩来继续向蒋介石交涉，要他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and 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

但是，这时的形势已难以逆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已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爆发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遵令北移。由于项英的犹豫不决，行期一再延误，国民党已在新四军行进的必经地区埋下重兵。六日，仓促行动的部队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受到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严密包围和猛烈袭击。双方兵力悬殊，国民党军队又已作了充分准备，新四军陷入苦战中。

因为通讯被阻断，事情发生后三四天，毛泽东才得到确实消息。他先收到的是刘少奇在一月九日发来的两封电报，一封电报说“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50）；另一封电报报告：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51）十日，毛泽东才收到叶、饶紧急求救电和在突围不成后又回到部队的项英自请处分的电报。他立即决定，由叶挺、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克服困难，继续执行北移任务。并要刘少奇、陈毅“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52）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指示电：“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新四军军部的命运紧紧牵动着毛泽东的心。他反复考虑着如何把他们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一月十四日，他在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指出：这“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进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53）。出于这种焦急不安的心情，中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54）中央指出，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部，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由于力量过于悬殊，皖南新四军在奋战七天七夜后，终于因弹尽粮绝而失败。奉命同国民党军队谈判的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遇难。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检讨新四军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指出：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是指挥上的错误。他提出：

袁、项的错误须立即宣布，如何处置交七大解决。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我们前次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一样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他又说：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55)

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将反共高潮推到顶点。国共关系已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这时，毛泽东反而更加冷静。他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56)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付时局的办法。毛泽东指出，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由国民党当局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实行撤退。

当天，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延安发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七个师和七个独立旅，共九万多人，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

同时，也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分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他说：“目前全国人民

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

那么，事情是不是已经到了非决裂不可的地步呢？毛泽东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最后，毛泽东指出：“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他说：“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57)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合情合理，引起重大反响，不仅“全党一致拥护，情绪异常兴奋”(58)，而且深受党外人士的好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联名致信蒋介石，谴责政府当局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会引起破裂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陈嘉庚、张一麐等仗义执言；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也对蒋介石表示不满，冯玉祥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59)这件事，在国际上也引起广泛重视。斯特朗、斯诺等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向世界披

露皖南事变的真相。英、美、苏等国都不支持蒋介石的作法，对他形成很大压力。

蒋介石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狽境地，这是他根本没有料想到的。更加出乎他意外的是，连日本军队也没有因为他发动反共内战而停止进攻。一月下旬，日军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队十五万人包围在平汉铁路以东，两军发生激战。毛泽东评论说：这对蒋介石“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60)毛泽东判断：“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61)

毛泽东的判断完全符合实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政治攻势下，蒋介石几次派张冲、张治中找周恩来商量妥协办法，并且批准叶剑英回到延安。二月二日，叶剑英到达延安，带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件和他为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而写下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毛泽东看后感到“欣慰之至”，“为之神王”。他在杨家岭住所同叶剑英畅谈了五个小时。

这时，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已转到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是否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问题上。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名单是在皖南事变前夕公布的。中共方面的参政员仍是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各民主党派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来缓解一下国共矛盾，纷纷表示这次会议中共方面的代表必不可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这给蒋介石造成很大压力，为了摆脱困境，必须争取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出席会议。

中共代表是否出席这次参政会呢？毛泽东同周恩来电报往来，反复协商，认为不能无条件出席。毛泽东指出：

蒋介石“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62)蒋介石既要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又不肯答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二条。为了打破僵局，经毛泽东修改审定，又提出中共中央的临时解决办法“新十二条”。它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国民党方面立即停止在全国的反共军事进攻；释放叶挺和皖南所有被捕干部，交还所有人、枪；成立各党派联合会；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承认敌后抗日政权等。这个“新十二条”，在国民参政会开幕第二天的三月二日清晨用公函形式送去。但蒋介石仍不肯接受。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的意见，指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毛泽东分析：中共参政员不出席会议，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因为：第一、皖南事变蒋错了，举国皆知；中共以不出席抗议并没有错；第二、中共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蒋不答应，其曲在彼；第三、若蒋由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第四、国际形势对蒋不利；第五、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如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63)

经过这场斗争，蒋介石在参政会的讲话中虽然继续攻击中共，但不得不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64)毛泽东评论蒋介石的这个讲话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65)它实际上标志着蒋介石发动的这



次规模更大的反共高潮又被击退了。这以后，国共关系又逐渐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到成效。”（66）

为了总结打退这次斗争的丰富经验，以便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国情，更自觉地在中国的复杂环境中进行有效的斗争，五月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这份党内指示，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是《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他写道：

“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



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67)

这一次反共高潮，从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为开端，到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它的退兵时的一战。

它和上次反共高潮不同，是由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直接出面的，前后历时五个月。这次浪潮的规模要大得多，它所造成的伤痕要深得多，中间险情迭起，并且面对着许多难以预测的未知数。内战代替抗战，似已接近成为事实。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能不能驾驭如此复杂的局势，能不能灵活而果断地处理一个又一个异常棘手的难题，能不能争取

到广大中间势力的理解和同情，这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来说，对毛泽东来说，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这半年，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非常紧张的一段时间。他思考问题很细，很具体，处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紧。他所起草的关于这个问题文电有三百多件，一般每天都要发出两三件。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四日这一天就发出了十一件，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文电最多的一天。

毛泽东在打退这次反共高潮中制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正如胡乔木所说：“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团结了，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的意义。”（68）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1月6日。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276页。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09、310页。

毛泽东、王稼祥致项英、叶挺的电报，1940年1月29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3月29日。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0年4月2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彭德怀等的电报，1940年4月4日。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10页。

毛泽东致项英电，1940年4月3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4月15日。

项英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4月16日。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10页。

中央书记处致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4月26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3、755、756页。

《大陆命令第四百三十九号》，《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05页。

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6月26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9、761页。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0年7月6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0年7月13日。

庄明理：《南侨报国觅知音》，《情谊与事业——在周恩来心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71页。

(21)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0年8月8日。

(2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0月3日。

(2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1页。

(2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1页。

(25)《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0页。

(26)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0月14日。

(27)毛对东致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28)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9日。

(29)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9日。

(30)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31)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32)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3)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4)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5)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6)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7)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8)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11月3日。

(39)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3日。

(40)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1940年11月9日。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3页。

(42)毛泽东、朱德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的电报，1940年11月19日。

(43)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11月24日。

(44)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12月19日。

(45)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12月23日。

(46)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12月23日。

(47)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12月30日。

(48)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电，1940年12月31日。

(4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0页。

(50)刘少奇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报，1940年1月9日。

(51)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1年1月9日。

(52)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的电报，1941年1月11日。

(53)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41年1月14日。

(54)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周恩来、叶剑英等的电报，1940年1月14日。

(5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月15日。

(56)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的电报，1941年1月20日。

(5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75—776页。

(58)毛泽东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情报》上加写的批语，1941年2月7日。

(59)毛泽东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情报》上加写的批语，1941年2月7日。

(60)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7日。

(61)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7日。

(6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14日。

(63)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3月2日。

(64)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第六次会议上的演讲，1941年3月6日。

(65)毛泽东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3月12日。

(6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78—779页。

(6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1—784页。

(68)胡乔木谈话记录，1990年9月6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8、29页。

## 二十五、建设边区，战胜困难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是国际形势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是在靠近下半年或在下半年发生的。从此，中国不再是单独对日作战，而是和其他同盟国一起对日作战了。国际关系中的诸种因素，也对中国内部产生更大的影响。

苏德战争在六月二十二日爆发。这场战争的突然爆发是出人意料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迅速作出了反应。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决定，提出要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七月上旬，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强调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同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立即对日宣战。美国同德、意之间也相互宣战。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已进行了四年多以后，这时才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这样，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国内的国共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缓和。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面对的局势依然十分严峻。从一九四一年开始，在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已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到一九四一年进入极端困难时期。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比起其他根据地来，这里所处的是比较和平的环境，推行各种政策可以比较从容。因此，毛泽东用了很多的精力来研究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他这样做所考虑的，

远不只是陕甘宁边区这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根据地内应该实行怎样的政策。他说：“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边区人民的任务是“提高自己，帮助别人”。

毛泽东对边区的工作一向十分看重。他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团结人民、坚持抗战的根本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离开当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坚持抗战也好，建设根据地也好，都是谈不上的。

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个抗战建国纲领，标榜“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并且提出“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但国民党自己从来没有认真这样做过，甚至背道而驰。只有毛泽东领导陕甘宁边区却认认真真地做起来，并且超过了那个纲领的要求。林伯渠回忆道：“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一经传达到我们这里时，我们马上就召集各种会议，最后召集了群众大会，进行了一个热烈的讨论。不仅通过了决议拥护这个纲领，而且事实上，这个纲领，在我们边区的条件之下，是已经实现了的。”

一九三九年初，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它是人民普选产生的。参议会经过民主选举，选出高岗为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会议还制定出“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边区的建设方向是要成为“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他还提出一九三九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推进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这是毛泽东对边区建设的初步



设想。毛泽东指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辟了根据地民主政治的新局面，朱德评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它实际上成为后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一九四一年，随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在有了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后，毛泽东就把陕甘宁边区做为一个“试验区”。他在这年三月初的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明确地提出：“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以很大的力量，指导边区政府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原则，根据边区的环境和条件，加以具体化。边区中央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政府党团书记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粗枝大叶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就要把它细针密缕起来。”“这不是一件易事，要求中央更加注意边区，要求在边区工作的同志更加努力”。为此，毛泽东对边区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考虑边区的各项施政方针。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个纲领的大部分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的。它共有二十一条，明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团结、抗战、进步的总方针，而且对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知识分子等方面规定出具体政策，为边区人民勾画出一个美好的建设蓝图。

这个《纲领》中，值得重视的是在政权建设方面规定贯彻“三三制”原则。它写道：“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

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三三制”的原则，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就已经提出，中共中央专门发了党内指示，但是这样地以“法”的形式将它确定下来，还是第一次。关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在同时期的另一篇文章中更明确地写道：

“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

对各项政策的规定，毛泽东都考虑得很仔细，很慎重。他对《纲领》进行修改时，关于改进司法制度、厉行廉洁政治、减租减息和部分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推行消灭文盲政策等条款，都是他重新起草的。关于厉行廉洁政治这一条，也是引人注目的。它强调“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提出“实行俸以养廉原则”。

五月八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评论道：“这个纲领所确定的团结抗战的总方针以及各方面的正确政策，都是我党对边区人民及全国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团体以及友党友军坚决实行的郑重诺言。这样的施政纲领，正是全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所深切盼望的，这是真正保护一切抗日人民利益的纲领，是保护和调节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党派利益的纲领。近年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颁布过不少正确的、内容丰富的施政纲领，但均不如此次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向选民所提出的施政纲领完善。”

“三三制”原则提出后，许多干部思想不通，担心“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担心会失去“流血牺牲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政权”。毛泽东认为有必要

做一些说服工作。十一月六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通过施政纲领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有针对性地阐述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原则和意义。他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

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政策？毛泽东继续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为改变第一届边区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负责人全部是中共党员的状况，毛泽东提议：“这次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两个副主席中要有一个是由非党的进步人士充当。”根据这个原则，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高岗为参议会议长，绥德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十八人中，中共党员人数有七人，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徐特立马上申请退出，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非党人士递补。

毛泽东的真诚态度，深深感动了许多中间人士。会议的第二天，李鼎铭对人讲：“昨天毛先生讲的几句话，真教我五体投地。他说我们的施政纲领与三三制，下面工作的人，还做得不够，他们仍旧掌一种闭门主义，不肯信任别人，把持包办，一意孤行。我想毛先生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竟然把下面情形说得这样清楚，说得这样透彻，真是绝顶聪明。”他后来还对人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一位七十九岁的老人李丹生议员在大会闭幕时代表全体议员发言，称赞中共“诚所感人”，并希望“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

“三三制”的实行，使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毛泽东自豪地说：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这也是新中国面向世界的形象。一位外国朋友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到新中国。”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对其他抗日根据地也产生了巨大的示范作用。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回到延安的彭德怀这样评价：“这个边区给全国，给敌后做了很多事情，把革命的三民主义，也是新民主主义在陕甘宁边区认真实现了，对全国来说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因为这是国民党人几十年讲要实现的三民主义，而实际上没有做。对敌后所有解放区亦有很大的帮助，这里的许多经验介绍给敌后解放区，使他们的民主建设得到更快的、更顺利的进行，对坚持战争准备反攻有好处。”

在指导边区工作中,毛泽东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干部之间的团结。陕甘宁边区是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红军到来后,边区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迅速地扩大发展起来。但大批外来干部的涌入也带来一些矛盾,有一些外来干部看不起本地干部,甚至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引起本地干部的不满。这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本地干部同当地的民众有着长期的血肉联系,如果不能团结好本地干部,也就不可能在当地人民中深深地扎下根来。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予以纠正,做了大量的耐心的协调工作,他把重点放在教育外来干部上,要他们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主力部队要帮助发展地方武装,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原有的边区党委改成中共边区中央局。规定除军事活动须经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外,边区党政各部门工作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都统一于边区中央局领导下。中央局书记是高岗,副书记是谢觉哉,常委有萧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中央还决定由这年春天从苏联回国的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负责指导边区工作。毛泽东虽然很忙,但对边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管得还是很多。不久,中共边区中央局又同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改为中共西北中央局。边区党政军领导的统一与团结的加强是陕甘宁边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正当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在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时,边区遇到的困难也愈来愈明显,主要反映在财政经济问题上。毛泽东这样写道:“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

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对这种局面的出现，毛泽东早有思想准备。抗战刚转入相持阶段时，他就意识到：“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21)困难一露头，毛泽东就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召开的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讲话中说：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22)接着，又提出通过生产运动来解决和改善边区军队和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23)不过那时边区财政收入还有海外华侨、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款，以及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的节余部分，取之于民的赋税负担是很少的。

到一九四一年秋，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与此同时，边区内遭受了严重的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的侵袭，灾情几乎波及每一个县。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只有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土地也比较贫瘠，要保证供给军队和机关学校人员的衣食需要是有困难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响亮地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萧劲光回忆：“一天，毛泽东同志把林伯渠、高岗和我找去，对我们说：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

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他的这段话，既风趣，又易懂，像一盏明灯，一下子把我的心照亮了。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大家都会赞成第三种办法。毛泽东同志听了，笑笑，接着说：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24）

一九四一年是克服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关键的一年。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用了许多时间来研究和确定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方针和具体办法。毛泽东认为：就现实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并把解决财政经济问题看作是“学习治国”。

为了统一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林伯渠为主席（25）。中共中央除每星期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外，增加了书记处工作会议，由在杨家岭的政治局成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七人组成。在这一段时期内，政治局或书记处的会议几乎每次都要谈到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还请周恩来、董必武将重庆的经济书籍“尽力搜集寄来”（26）。

最初，党内对如何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任弼时、朱德以及边区中央局的一些负责人主张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具体办法主要是：整理税收和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的资金主要依靠军队组织人民运盐和增发边币。林伯渠、谢觉哉担心这些作法会加重人民负担，因此主张把解决困难的基点放在节约和拖欠党政军的经费上，不赞成增发边币。盐的产运销在政府管理下实行自由贸易。



毛泽东赞成积极发展的方针。他提出要实行新的政策，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他提出一个怎样对待边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政策问题，说：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不要妨碍私利，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发展资本主义不要害怕，过去党内反对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今后改用反对贪污腐化。(27)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下大力气对财政经济工作进行了研究。他在致谢觉哉的信中写道：“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今年之仅仅注意公业投资未能顾及私业投资，是由于等着公营事业救急的特殊情况，由此产生的害则是与民争利（垄断）及解决不了大问题。明年决不能继续这个方针，仅有盐业投资是明年应该继续的，而其他公营的农、工、商业则只当作必要的一部分继续下去。”要把盐作为例外，因为边区北部盛产食盐，盐的收入是边区政府对除公粮外的最大收入，盐的外销占边区对外出口的百分之九十。“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问题。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28)

为什么要实行这些政策？毛泽东这样回答：“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边区有了今年经验，明年许多事都好办了。”(29)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委托毛泽东找林伯渠、谢觉哉、任弼时、朱德等谈话，沟通意见，解决分歧。(30)毛泽东采取“先做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31)的办法，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

林伯渠、谢觉哉都是党内德高望重的长者，深受毛泽东的敬重。为了说服这两位老同志，毛泽东多次登门拜访，常常谈至深夜。凡是这两位老同志提出的问题，毛泽东都要请边区中央局去核实情况，做出答复。林伯渠、谢觉哉也非常信任毛泽东。谢觉哉说：“毛泽东同志从不轻臧否人”，所以愿意同他谈心里话，单在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间，谢觉哉写给毛泽东的信就达数万言(32)。对林伯渠、谢觉哉的每一封来信，毛泽东都“过细地读了”，并且及时写了回信。他在一封信中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还说：“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求达‘和为贵’之目的”。(33)毛泽东曾恳切地向林伯渠表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他，说：“我虽不能为你分忧，但人事调整方面可多少帮你的忙”(34)。

无论在谈话或书信中，毛泽东对解决边区财政经济的几个具体问题都坦率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并十分注意听取林、谢二位老同志的意见。他在给谢觉哉的一封信中，恳切地说：自己提出的论点，“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

关于党内对财政经济问题上产生争论的原因，毛泽东认为主要是由于缺少经验，对没有做过的事，谁也难以说有十足的把握，因此应该加强调查研究，多掌握第一手材料。他说：“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谈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作。”（35）他要求负责起草财经纲领的陈正人多听取边区政府银行行长朱理治、财政厅厅长南汉宸、建设厅厅长高自立、八路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及粮食局、贸易局的意见，因“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实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更准确”。（36）毛泽东还为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写了按语。高克林采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等人后所写的这个调查报告，记述了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过，讲到不少过去不曾遇见过的新情况和新经验。毛泽东号召大家向高克林学习，“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

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所提方针：“根据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特点，边区应从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以解决人民生活与政府财政两方面问题。规定：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公营为辅，平衡出入口，增加盐的运销，以官督民运为主，自由运盐为辅。”在六次会议上，毛泽东还强调，在革命与战争的环境下，部分的强制性负担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37）。

毛泽东这些细心观察并研究了实际工作中积累的新经验后提出的意见，终于基本上统一了几个月来党内对如何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的不同认识。

粮食问题，这时是边区经济工作中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初，边区各部门的用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征粮，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和富农，中农负担很轻，贫农

全无负担；另一个是靠边区政府拨款采购。一九四一年，外援断绝后，边区政府已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粮，只能全部依靠征粮。一九四一年所征收的公粮，供应到一九四一年三月时，在部分地区已出现断粮现象。不久，各地粮食供应普遍发生恐慌。政府先后买粮一次，借粮两次，才勉强支撑下来。为了保证一九四二年的供给和归还一九四一年的借粮，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经过再三研究，决定一九四一年征粮二十万担。这当然是不得已的，但比一九四一年征收的公粮九万担增加了一倍多，是抗战以来边区征粮数字最高的一次。群众深感负担过重，普遍出现不满情绪。

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电击死(38)。事后，一个农民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这个农民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它反映我们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39)

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毛泽东抓了两件事。一是号召积极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二是实行精兵简政。

党、政、军、民、学参加的大生产运动是从军队开始的。当时，朱德首先提出“屯田军垦”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一九三九年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

党中央和保卫边区任务的第一二 师三五九旅 ,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 ,开荒生产 ,很快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经过几年艰苦奋斗 ,南泥湾的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成为 “ 到处是庄稼 ,遍地是牛羊 ” 的 “ 陕北江南 ”。一九四三年九月 ,毛泽东到南泥湾视察时 ,看到他们取得的成就 ,非常兴奋 ,他说 : “ 困难 ,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 ,大家动手征服它 ,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 ,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 ,假定将来有了外援 ,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 (40)

在军队的带动下 ,机关和学校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和中央以及地方各部门负责人都带头开荒生产 ,交公粮。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 ,开垦了一块长方形的地 ,种上蔬菜 ,一有空就去浇水、拔草。通过大生产运动 ,边区实现了 “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 的目标。单单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年中 ,军队和机关学校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 ,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毛泽东说 : “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 ,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 它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 ,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 ,培养了一批干部 ,这是不能拿数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

在这个时期中 ,毛泽东还要求边区政府全力支持农民发展生产。他认为农民富裕起来了 ,才能有力地支持抗战。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一 ,制定优待移民、难民的政策 ,鼓励他们开荒生产 ;第二 ,开展减租减息 ,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第三 ,倡导劳动竞赛 ,表彰劳动模范。这些措施推动了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涌现出大批劳动英雄。农民获得实际好处后 ,更加把自己的命运同共产党、八路军紧紧地联在一起。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毛泽东号召开展变工互助，把农业劳动力组织起来。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41）

边区只有很少的一点工业。毛泽东认为，它的数目虽小，意义却非常远大，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他在给博古的一封信中写道：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而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是机器而不是手工，“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任务。”（42）

精兵简政这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是党外人士、不久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提出来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李鼎铭等提出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还提出了五项具体实施办法。这个议案提出后，曾产生争议。有些人担心这会使边区在遭到敌军进攻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挡。毛泽东看到李鼎铭等的提案后非常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43）毛泽东后来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

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三次精简，取得很大成效。

中共中央下决心实行精兵简政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当时是这样说的：“敌后的严重的必然趋势就是缩小。敌后变化是突然的，在事变后再干就被动，故要主动和定出办法”，(44)“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45)依据这种分析，毛泽东强调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为了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精神，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46)在这期间，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他派原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到边区政府工作，希望他到任后，团结内部，在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起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47)毛泽东还为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制定出具体的原则和办法。他强调：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对边

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毛泽东常爱说的一句成语。到一九四二年底，陕甘宁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在经济上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在这几年的精心探索中，毛泽东对经济工作也积累起比较丰富的经验。十二月，他为西北局高干会提供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请李富春、南汉宸等协助收集整理了有关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方面的大量材料，并告诉他们：每个材料“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48）

在报告中，毛泽东着重批评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指出：“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关于人民负担问题，他批评了那种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写道：“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同时，他还批评了另一种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他说：“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



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他总结起来说：“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49)

毛泽东特别强调认真做好经济工作在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针对某些人轻视经济工作的态度，毛泽东还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而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50)

这篇报告同毛泽东后来起草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章是中共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的基本纲领。

兼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贺龙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毛泽东“真正实际解决了边区当前最重大的问题(假若没有饭吃，一切工作都无从说起)，他比我们负责领导财经工作的任何同志，更懂得边区情况(因为他有正确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边区的具体运用，是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不是能读《资本论》



不懂边币的经济学），他不是夸夸其谈的提出一般的方针与任务，而是对于每个问题都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的确定今后能做应做的事，并详细指出如何实现的办法（开荒、移民、水利、纺织合作社、运盐、调剂劳动力均有极生动模范的例子），他解决了摸索几年的众说纷纭的许多财经问题上的原则问题，实际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边区经济与财政的大道，提高了全体人民的信心。他真正能使我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去争取抗战胜利。他不仅解决了边区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并且给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全国都提供了解决问题辉煌的模范的例子。”（51）

贺龙的这段讲话，恰当地说出了毛泽东领导边区建设、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重大历史贡献，也描述出了他在工作中那种严格尊重客观实际、耐心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在实践中细心观察、对复杂情况从多方面进行分析、经过慎重研究后果断地作出判断、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优良工作作风。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7月6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的发言记录，1939年1月。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代会上的讲话，1939年11月14日。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第485、486页。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工作报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113页。

《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10页。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785 页。

《解放日报》，1941 年 5 月 8 日。

刘景范：《回顾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版，第 143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808、809 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1 年 11 月 10 日。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1985 年 1 月编印，第 242、379 页。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 4 月版，第 523 页。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1985 年 1 月编印，第 242、37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718 页。

《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4 月版，第 564 页。

彭德怀：《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的讲话》，《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1985 年 1 月编印，第 438 页。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 4 月版，第 14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892 页。

(21)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撰写的发刊词，1939年1月2日。

(22)毛泽东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1938年12月8日。

(23)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39年2月2日。

(24)《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98、299页。

(25)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6月8日；8月27日。

(26)毛泽东致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1941年3月。

(2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3月5日。

(2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6、177，186、187页。

(29)《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6、177，186、187页。

(30)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8月6日。

(31)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6日。

(32)《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36页。

(33)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5日。

(3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0页。

(35)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22日。

(3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84页。

(37)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8月13日。

(38)《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14页。

(39)《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43、144页。

(40)王恩茂：《南河湾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209页。

(4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31页。

(4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38、239页。

(4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502页。

(4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7月29日。

(4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82页。

(4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7月29日。

(4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99页。

(4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09页。

(4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1—894页。

(5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565、566页。

(51)贺龙：《整财问题报告大纲》，《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07—308页。

## 二十六、整风运动（上）

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

为什么在抗日战争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以这样大的力量和这样长的时间来进行这场整风运动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有着深远的考虑的。

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以来的二十多年历史中，经历过巨大的胜利和严重的失败，出现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中给党带来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这时已发展成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毛泽东认为，这些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

全党范围的整风是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的，而它的最初酝酿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就开始了。为什么要经过这样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呢？因为整风的重要目的是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东西。这种思想问题的解决，决不能靠强制的手段，

必须使人真正从思想上想通 ,并且从实际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 ,才能切实奏效。何况王明有着共产国际作为后台 ,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 ,要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 ,毛泽东后来解释说 :“ 非经过各种步骤 ,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 ”

在六中全会上 ,毛泽东曾明确提出 :“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 ,即是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 他还指出 :“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 ,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 他所说的“ 一些严重的错误 ” ,其实就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

六中全会后 ,王明口头上也说 :“ 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 ” ,实际上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一九四一年三月 ,王明把他在 一九三一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 左 ” 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 ,在延安印了第三版 ,并且在三版序言中写道 :“ 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 ,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 ,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 ,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 ,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 ,因此 ,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 ,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 ,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 ” 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 ,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本来 ,六中全会前 ,中共中央已曾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中国党的历史问题 ,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王稼祥在六中全会上传达国际的意见时说 :国际认为 ,中共七大要着重于实际问题 ,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 ,不应花很久时间在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

总结十年经验，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以后，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的高级干部难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开，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也一直拖了下来。

王明的小册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后，毛泽东就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他对编辑这部历史文献集十分认真，花了不少工夫。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他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过的材料，使他对问题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

毛泽东指出：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所以苏维埃后期的损失，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他说：而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关于抗日战争以来的错误倾向，毛泽东认为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国共合作建立后有一个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他总结说：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同意以后专门研究，但研究的大纲要谈一下。他指出：过去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便产生了对革命的急躁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党，党员比较幼稚，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不足。他强调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总

结过去的经验教训 ,对于犯了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  
一种教育。

会上 ,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相继发言 ,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样 ,毛泽东在一九四 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 ,说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时 ,没有用路线错误的提法。

不久 ,皖南事变发生。毛泽东痛心指出 :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 ,“ 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 ” ,“ 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 ,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 ”。 为了引起全党重视 ,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

为了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 ,经过慎重考虑 ,毛泽东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 :一九四一年三月 ,毛泽东决定出版主要由他在一九三 一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和跋。他申明 :“ 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 ,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 ,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 ”他指出 :“ 现在我们很多同志 ,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 ,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 ,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 ,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 ,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 ,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 ”他又指出 :“ 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 ,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 ,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 ,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 ,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 ,这句后 ,虽然曾经被人讥为 ‘ 狭隘经验



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发言权的”。这些话的针对性是再明显也没有了。

第二件更重要的事是：五月十九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研究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没有兴趣，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他们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毛泽东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最大敌人，是工人阶级的最大敌人，是人民的最大敌人，是民族的最大敌人，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在报告中突出地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说明只有这种态度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要求不单懂得外国还要懂得中国，不单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求有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他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的阐述：

“‘实’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

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然而，毛泽东这篇观点鲜明措词尖锐的重要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上报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这是党在准备整风时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前，中共中央作了充分准备，成立了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还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也由毛泽东任组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还把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要大家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

这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对《六大以来》的阅读和研究，对开好九月会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胡乔木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

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编辑《六大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把采取这些措施后引起的变化说得很明白：“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

九月会议时断时续开了一个多月，集中讨论了五次。会议重点是检讨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一开始就说：党内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这就是主观主义。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他又说：六中全会打击了主观主义，但仍没有引起一般的注意。主观主义已不占统治的地位，但还相当存在着。毛泽东分析主观主义的来源主要是党内“左”的传统，苏联的德波林等的影响，以及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他提出：克服主观主义要从政治局同志做起，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

会上，有二十八人次发了言，谈了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有着极大的意义。许多人以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帐，现在必须偿还。”他还说：“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

博古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他表示：现在我有勇气公开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王稼祥总结了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说：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

这次九月会议，特别是毛泽东在第一天所作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为以后全面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确定了基调，并且在党的领导层内取得了大体一致的认识。

只有王明在会上丝毫不作自我批评。他发了两次言，虽然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承认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却完全推卸责任，说自己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作法是不同意的，强调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最主要的负责者。

鉴于这种状况，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多次找王明交谈，希望他能够转变态度认识错误。在十月七日的谈话中，王明不但避而不谈自己的问题，反而攻击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是太“左”了。他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好的。认为目前应当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建议中共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同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表示决心同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第二天，王明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更系统地阐述他的观点。王明的观点受到会上许多人的批评。毛泽东严肃地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他许久，最近我和他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因为王明在争论中提出了对目前时局的严重的原则性问题，毛泽东提议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集中讨论抗战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他希望王明把他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加以说明。但王明却突然称病不肯出席政治局会议，使会议未能举行。以后，他就长期称病，拒绝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宣布，因为王明生病，政治局会议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依照十月八日书记处工作会议提出的

“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作为定论。

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泽东起草了一份书面结论草案，题目是《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草案概括地说明：“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草案分析：这条路线在思想方面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在政治方面，对形势的估计，对策略任务的提出与实施，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在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转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同时也包含着拼命主义），最后在长征中转到了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组织方面犯了宗派主义错误。草案还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际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这个结论草案的许多重要内容后来被吸收到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为了进一步弄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研究党的历史的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

大概就在起草这份结论草案以前，毛泽东还写了题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逐篇地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指出它们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特征。毛泽东当时只把这篇

文章给刘少奇、任弼时看过，一直没有发表。关于没有发表的原因，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曾这样写道：“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一九六四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了，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因此，当时这篇文章不但在社会上，并且在党内也没有直接发生影响。但通过写作这篇长文，使毛泽东对那个时期中央的路线错误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同一九四一年底政治局讨论党的历史的那次会议相比，一九四一年的九月会议大大跨进了一步，因为它使党的领导层对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大体上取得了共识。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

九月会议后，毛泽东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他认为“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成立了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毛泽东规定中央学习组的任务是：“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他还提出，“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要注意“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对如何研究党的历史，第二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作了讲话。他说：“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他提倡在研究中要用“古今中外法”，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他还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是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21)

在毛泽东精心部署下，从一九四一年冬季开始，全国各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普遍开展起来，为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准备了条件。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高级干部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达到了基本一致的认识。这样，在全党普遍整风的条件就成熟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要点》在叙述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党内的种种表现后写道：“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有多大效力的”。(22)

整风学习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普遍进行，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和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



的报告后开始的。在报告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

他明确地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他说：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这两种主观主义，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认为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他要求正确处理党内的各种相互关系，以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同时也要消灭党外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他着重地说：“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关于党八股，毛泽东认为它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如果不把党八股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他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关于整风的意义，毛泽东强调：“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

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关于整风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提出八个大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整风的宗旨。具体讲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23）。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八个字成为党内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的正确方针。它的方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他强调要好好地说明理，说这个工作“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明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

党内的普遍整风从延安开始，有一万多名干部参加。

当时，毛泽东的两篇报告发表后，在延安“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开始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来审视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人，主要是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和新党员还没有能够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深刻意图和真正意义。“不少人受到自己经验的局限，误以为整风就是整领导。整什么领导呢？就是整那些直接面对他们的领导。那些高层领导中有什么东西要整，他们当时是看不清楚的。”（24）这样，就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转移到一大堆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上去。这种倾向不扭转，就会改变整风运动的方向。那个时候，许多单位办起墙报。在墙报上一些人以讥讽谩骂的方式批评延安存在的某些具体现象，吸引了许多读者。一天晚上，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墙报，认为这样

发展下去，整风学习是不能达到预定目的的。他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25)

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谈到：整顿三风“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26)。他说：这样大批的新党员没有这次思想的改造，将来党是搞不好的。毛泽东提出，全党干部和党员普遍整风的内容，一是学习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一是结合学习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他的推动下，普遍整风在延安很快开展起来。

在整风过程中，延安文艺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很突出。这些文艺界人士大多是在抗战爆发后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他们满怀救国热情，但对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却很不足。正如周扬所回忆的那样：“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怎么成呢？你以为这个问题简单吗？可不简单啊。结合，你怎么结合的了啊，这些人都三四十岁了，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还蛮大的。”(27)在文艺界内部，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的现象，包括还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因此，在普遍整风的初期，毛泽东特别重视解决文艺界的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接触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他花很多时间同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交换意见，并请他们帮助收集文艺界提出的各种意见。毛泽东深入细致的作风和真诚坦率的态度，得到了许多文艺界人士的尊重与信赖。当时，性情孤傲的萧军因为工作中的矛盾想离开延安。临行

前，他到毛泽东那里辞行，毛泽东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要离开？萧军回忆说：“我看他那么诚恳，那么热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无保留地同他谈了。他听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认延安是有某些缺点的，另方面也希望我及时反映，帮助改正。”(28)毛泽东还写信给萧军，坦率地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又关切地提醒他：“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29)女作家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后，毛泽东诚恳地对她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深受启发，她后来说：“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30)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弄清了情况，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来解决存在的种种问题。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共一百多人。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五月二日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被称为座谈会的“引言”。他开宗明义地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他强调：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我们首先要依靠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说：为了实现文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

作斗争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那就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他说:文艺工作者应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这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以自己作例子,详细讲述了像他这样一个学生出身的人参加革命后在思想感情上逐步发生变化的经验。然后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他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艺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毛泽东最后表示,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毛泽东这个“引言”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并且觉得十分亲切和容易接受。何其芳后来说:“我那时当然不能说已经理解《引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深刻意义。但听了以后,也感到那是一些很新鲜、很重要、平时自己没有想到,一听就终身难忘的问题。”(31)

座谈会在二十多天里开了三次大会,讨论得十分热烈。在充满民主的气氛中,有几十位党内的文艺工作者讲了话。每次开会,毛泽东都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一面仔细听大家发言,一面认真做笔记。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山说:“大家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管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讲完之后,也没有向任何人追究

责任，真正做到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来讨论解决，不带一点强迫的性质，发扬了艺术民主，使大家非常心情舒畅。”（32）

在二十三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做结论。面对着文艺界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种种问题，他不是就事论事地纠缠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而是高屋建瓴地从问题的根本下手。他一开始就说：“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这就从千头万绪中一下子抓住了要领。萧军评论道：“毛泽东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33）

毛泽东在讲话中尖锐地指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

在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上，毛泽东着重谈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他认为：我们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

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这就需要解决向工农兵学习的问题，和新的时代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深刻地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于文艺批评，毛泽东说：我们要求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对讨论中暴露出的许多思想问题，就其中比较重要的进行了分析。他最后说，延安文艺界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相信经过整风，大家“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34)

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文艺工作者真正能转变立场，毛泽东强调对党内干部要进行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他说：“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他还说：要使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对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要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35)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许多人感到思想上豁然开朗，在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天地。会后，延安广大



文艺工作者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比如，戏剧方面有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中央党校京剧队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剧院的《三打祝家庄》；小说、诗歌方面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等。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就能涌现出这样一大批优秀作品，是很不容易的。

看到文艺界的进步，毛泽东十分高兴。对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演出的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一组短剧《晋察冀的乡村》等，和丁玲、欧阳山写的介绍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模范人物的《田保霖》、《活在新社会里》两文，毛泽东都专门写信给予肯定和鼓励。他在看了平剧《逼上梁山》的当晚，写了一封信给该剧的编导杨绍萱和齐燕铭。信中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36）

在延安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带动下，革命根据地及中国的文艺运动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也很关注中央研究院反对王实味的斗争。



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后，他在《解放日报》和《矢与的》墙报上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对他不满的现象提出批评。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缺点是可以而且应当批评的。但是，王实味从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使用了夸大事实、冷嘲热讽的语言，还说艺术家的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当时，“《矢与的》墙报本来贴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门口的一间大平房里，外单位有不少人跑来看。后来贴在布上，挂到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看的人更多，像赶庙会一样。”(37)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去看过墙报，认为王实味是“不讲成绩，抹煞成绩，只暴露黑暗”(38)。他说：“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有许多缺点应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39)

随后，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多次大会，开展对王实味的批判。开始时，还是把王实味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但在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插手下，很快就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以后更把他说成“托派”，成为敌我矛盾，还牵连到别人，定为“反党五人集团”。这样，对王实味的斗争出现严重的偏差，并且对不久后开始的审干运动和抢救运动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一九四三年四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在关押期间，用“逼供信”的办法继续审讯。以后，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错误结论。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中央机关撤离，在从延安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经康生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批准，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这是一起冤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对王实味的被处决提出了批评。(40)

尽管普遍整风中也出现一些问题，但总的说来，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党内思想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讲到：“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41）

为了把整风学习进一步引向深入，中共中央成立总学委，以毛泽东负总责，具体工作由康生管。六月八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此后，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从延安推向各地，在全党范围内陆续普遍开展起来。

在全党普遍的整风学习运动中，毛泽东在给聂荣臻的电报中强调指出：“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而“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42）

八月三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在延安的四十三名高级干部（八月八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增为四十八人）编成九个小组，由中央同志直接领导，联系本部门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编在第一组。毛泽东还提出：“要从讨论那些细小微末的具体问题，转入到集中火力检讨党内存在着的根本思想倾向，主要是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问题。”（43）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各地也先后召开高级干部座谈会，联系本地区的实际进行学习和检查。

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用两天时间，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的讲话对边区党清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纠正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倾向，增强党的团结有重要意义。在闭幕会上，毛泽东总结道：“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的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44）

接着，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但张闻天已主动地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后，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开，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一九三九年七、八月的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主要是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他这样说：“我自己及中央秘书处在一九四〇年五月间也搬了过来，实际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出来了。”（45）中共中央的工作其实已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

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作为主席而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是“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而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有的研究者以为，这个《决定》给予了毛泽东在整个党的工作中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最后决定权”，这是由于过分粗心或以讹传讹而产生的误解。

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为了统一各地区的领导工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分工：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大后方工作统归陈云负责；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负责。中央党校校长由毛泽东兼任。四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决定，为指导工作便利，驻重庆办事处工作由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工作由任弼时管理。

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进一步得到巩固。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2年。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页。

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40年3月第3版，第3页。

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14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月15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91页。

胡乔木谈话记录，1991年3月20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8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1年9月10日。

张闻天：《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补课》，《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314页。

《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王稼祥：《政治局要以思想领导为中心》，《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26页。

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记录，1941年10月13日。

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历史问题的结论草案，1941年10月。

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批语，1965年5月。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3年1月25日。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400—408页。

(2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400—408页。

(2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90—391页。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30—845页。

(24)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2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83页。

(26)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发言记录，1942年5月28日。

(27)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6页。

(28)萧军：《难忘的延安》，《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3页。

(29)毛泽东致萧军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4页。

(30)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2页。

(31)何其芳：《记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77页。

(32)欧阳山：《我的文学生活》，《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8页。

(33)萧军：《难忘的延安岁月》，《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4页。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59—877页。

(3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30、432页。

(3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22页。

(37)温济泽：《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760页。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10月19日。

(39)毛泽东在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1942年3月31日。

(40)中组部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1980年7月9日。

(41)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2年6月13日。

(42)毛泽东致聂荣臻的电报，1942年7月4日。

(43)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8月3日。

(44)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月。

(45)张闻天：《反省笔记》，1943年12月16日。

## 二十七、整风运动（下）

各地整风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共中央认为在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同时，普遍整风要继续开展下去。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明确规定继续开展普遍的整风运动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二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为了实现前一项任务，毛泽东强调：“自由主义是目前党内斗争中的主要不良倾向，在整风中必须克服此种倾向，才能达到彻底整风之目的”。因为：“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有自由主义偏向的人则不愿拿起这个武器，尤其是许多中级与高级干部害怕自我批评，这种现象必须在此次整风中着重地纠正过来。”为了搞好整风运动，毛泽东提出注意领导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一九四二年的整风，凡是取得成绩的，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

后一项任务，也就是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在王实味问题等发生后提出来的。毛泽东认为：“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总学委负责领导这项工作，日常事务由康生主持。为了加强对审干工作的领导，中央还成立了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副主任。



在当时十分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在各种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对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进行渗透和破坏的情况下,对干部队伍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是完全必要的,通过这项工作可以清除特务,纯洁革命队伍。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向有关负责工作人员强调:“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七月二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求把他阐述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的一段话刊载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毛泽东写的这段话是:“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过分严重地估计了敌情,由于抗日根据地处于同外界隔绝的状况,对干部的历史状况的调查研究十分困难,在这方面所花的力气不多,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一个时期搞得“特务如麻”。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危言耸听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后,更出现相当普遍地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使整风运动中的审干工作变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单在延安地区十几天内就骇人听闻地揪出所谓特务分子一千四百多人,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使审干工作大大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完后说: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作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作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作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

化的错误。他后来总结审干工作的教训时指出，发生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两条：一条是缺乏调查研究；一条是没有区别对待。

在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以后一个月，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以中央文件正式公布毛泽东提出的“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审干工作九条方针。这九条方针的正式下达起了重要的作用。参加过延安整风的邓力群回忆说：“我们这些负责审查干部工作的，搞了逼供信，被审查的不愿也不能交待政治问题，双方的关系很紧张。正是这个时候，中央下达了毛主席的《九条方针》，它解放了被审查者，也唤醒了审查者，使我们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认识了主观主义的极大危险性。”十月，毛泽东在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的批语中，又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

这年年底，延安审查干部的工作转入甄别阶段。一九四四年一月，毛泽东在书记处会议上总结时，指出一种已经出现的严重倾向：过去延安重视知识分子，不重视工农分子；“抢救运动”以来，又走到完全不相信知识分子。现在应估计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他要求对搞错的同志“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在反特务斗争中要注意保护知识分子”。

为了防止延安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在其他地区再发生，毛泽东还要求各地做到：灵活地运用坦白运动，不要机械地搬用延安各机关的经验；要正确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不要把一切从敌占区及国统区来的学生、知识分子、军人、文化人、技术工作人员等都看成是特务分子，不可将一切敌后或大后方的党组织或“左”倾革命团体，都看成是红

旗政策的特务组织；要教育干部注重调查研究，不要轻信口供，要在干部和群众中深刻地广泛地进行反对逼供信的教育，要懂得逼供信的绝大害处；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原则。这些意见对各地审干运动健康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

对延安审干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不断总结教训。他多次向受到错误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一九四四年五月，他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说：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说到这里，他向大家行礼赔不是。同年十月，他再次在中央党校讲话，说：去年“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我们马上就使它停止了。“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一九四五年二月，他又一次在中央党校讲话，说：在审干中，“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我是党校的校长，党校也搞错了，如果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因为搞错了。”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化解了许多人心中的怨愤，重新实现了同志之间不存芥蒂的团结。

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但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却出现了由于主观主义而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这是不应该发生的错误。但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现并纠正了这个错误，它在延安整风中只是一个支流。

当整风运动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向前发展的时候，传来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这件事也有利于正确解决中共党内高层领导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自从在党的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后，作为它的一个支部，不仅思想上受到共产国际很大影响，组织上也得受到它的一定约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做过许

多有益的工作，也做过不少错误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各种政治上以至组织上的重大问题时，常常不能不考虑到共产国际的态度这个因素，尽管在后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预已经越来越少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关于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二十二日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一事。当翻译师哲将国际来电送给他时，毛泽东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来电。会议决定：先由毛泽东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赞成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待共产国际公开宣布主席团的这一提议后，中共中央再作正式决定。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收到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当天晚上，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特别是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上，有巨大功劳。接着指出，但是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需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了。他强调：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共产国际的解散，更便利了中国党能够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去处理中国革命问题。

共产国际的解散,也打破了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了两年的相对平静状态。国民党顽固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趁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他们一面以共产国际解散为借口,制造舆论,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另一面调集二十多个师的兵力,准备向边区发动突然袭击,形势十分严峻。

毛泽东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得到准确的情报后,立即做出紧急部署:“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他从晋西北调兵力保卫边区;在延安召开三万余人的群众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积极做好武装自卫反击的准备,由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同时,他又指示重庆、西安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把蒋介石、胡宗南准备进攻边区的消息向外界广为传布,并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呼吁爱国的国民党人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正确的斗争方针并作出周密的部署,揭穿了国民党的密谋,取得国内各界的同情,英美等国也对蒋施加了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这场来势汹汹的反共浪潮还没有完全掀起就被打退了。事后,毛泽东致电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负责人周子健,表扬他们提供的准确情报“帮助中央甚大”。

接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乘势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巨大的宣传攻势,批判蒋介石在这年三月出版的著作《中国之命运》,反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的势力,以消除中国的内战危机。为了反驳蒋介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宣传,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的材料,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不得不表示,中共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应

用政治方法解决”。毛泽东给这个时期的斗争以高度评价，他说：“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党内系统地进行了关于国民党统治的本质及如何对待国民党的政策教育，用抗战以来直到眼前的种种具体事实来加以说明。一些原来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党员，通过这场斗争和党内的政策教育，提高了觉悟。在这些事实面前，经过对照比较，人们对王明所鼓吹并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就看得更清楚了。

在这个时期中，王稼祥、刘少奇先后提出“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重要论断，并被党内广大干部所接受。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系统地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整风运动按照原定计划转入最后一个阶段——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结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事实指出：国民党的政策是两面政策，抗日和反共，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王明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路线是错误的。针对王明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以来一直坚持错误，到处宣传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所以毛泽东提议，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

一九四三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六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的继续和发展。

从九月七日至九日会议连续开了三天，王明称病没有参加。这三天中，博古、林伯渠、叶剑英、朱德等发了言。他们对抗战以来王明的路线错误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博古又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武汉时期有两条路线，一

一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这条路线，只看见国民党抗战的一面，忘记了它反动的一面，只看见并夸大它变化的方面，忘记了它不变的方面；对八路军，不敢大胆深入敌后，不敢大胆扩充，华中、华南失去许多机会；对根据地，不建立政权，一切要合国民党的法；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对抗战，强调运动战，忽视游击战，对持久战基本观点是不同意的。(21) 针对王明把错误的责任都推给博古，毛泽东在会上插话说：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路线理论的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与发挥者。(22)

在九月十三日的会议上，康生提出：要用历史的方法来检讨王明的投降主义错误，这就是不能孤立地看他抗战时期的问题，而要联系十年内战时期王明主义的来源。他说：过去我们说，“左”的路线应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决议起，现在看来要重新考虑，因为王明是在四中全会之前就有一个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起的比立三“左”的机会主义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一九四一年，他不经中央同意，又将这本书印发到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康生要求在武汉工作过的同志应当对这些情况多多揭发。康生提出的王明的小册子这个问题，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说：“九月的会是有收获的，以前许多同志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注意，如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现在康生、少奇、恩来等议论，四中全会是错误的，此事大家可以研究。”(23)

在九月十三日的会上，毛泽东也发了言，他指出：从四中全会后，党内有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一个是经验主义的宗派。“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一个



形态，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二个形态。反掉这两个具体东西，党才能够真正的统一。”他说：“教条主义宗派，其思想是主观主义，政治上是投降主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他着重强调：“两种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主要的”，“所以破坏整个宗派主义，首先应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24)他的这个发言，对党的历史上许多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在党内的两种具体形态是正确的，但其中有一些过激的话，他自己不久作了纠正。如两个宗派的问题，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提议：“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这时，彭德怀等前方负责人不久可以回到延安。九月三十日和十月六日，中央书记处先后举行两次会议决定，中央的会议暂停，等他们到来再开为好，先进行高级干部的学习。总学委仍以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康生为副主席，胡乔木为秘书。

十月六日，毛泽东在这次延续一个月的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次会上作了关于学习党的路线的发言。他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取得的成绩，并且说：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这些宗派并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教条宗派是经验宗派的灵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要发展自觉性，也要适当地将军，内力外力合作，才会有成效。对时局问题，他说：今年国民党搞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我们的方针是后发制人，不为戎首”。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骂了我们八个字：“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又拉了一下：“政治解决”。



我们“从今天起，对国民党的揭露在《解放日报》一律停止，但阶级教育、反特务斗争继续进行”。(25)

毛泽东讲话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相继发言。刘少奇着重谈党内斗争传统问题。他强调，首先要有自我批评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应该有这种精神准备，随时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与批评；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的展开，党内历史有许多不清楚的，要组织几个报告，要留下些文件给后代。(26)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和毛泽东患难与共的朱德说，毛泽东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办事的本事。(27)周恩来系统回顾了党的历史，分析了党成立以来几次出现路线错误的国际原因和社会根源。他说，在这几次错误中，王明的教条更完备，还有“国际”的帽子，又有米夫做后台，这样才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28)

作小结时，毛泽东又谈了两点意见：第一，团结问题。他说：我们是要团结的，但办法是要大家觉悟起来，犯路线错误的、犯个别错误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的是非，才能真正团结。真正要团结就要展开批评，掩盖分歧的人就是不要团结。第二，党内斗争的方法。他说：这次要避免党的历史上的错误斗争方法。“过去党内斗争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现在的斗争还是继续整风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29)

批判王明的范围逐渐扩大。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指出：我们党已经有二十二年三次革命的经验，不能再容许王明路线占领导地位了。他把抗战初期王明错误的特点概括为四条：一、以速胜论反对

持久战；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

这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从杨家岭迁往枣园，毛泽东的住所也迁到枣园。

枣园，位于延安城的西北面，原是陕北地方实力派高双成的庄园。毛泽东的住处在一座小院中，院内种了许多花草、树木，夏秋时节，花繁叶茂，香气袭人。院子东南角有个八角形的小凉亭。毛泽东工作之余，常到这里读书，看报。每逢过年过节，毛泽东常去看望枣园的乡亲们，并且为老人们祝寿。他称自己是“枣园的居民”。

从十一月十三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集中批判王明在十年内战期间和抗战初期的错误。十三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系统地回顾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斗争的历史，着重批判了王明、博古等：“他们顶着国际和马列招牌，欺骗全党，全党要从这个骗局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很好的步骤和方法是很危险的。”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他又讲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王明回国，进攻中央路线，“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他强调：一定要学会使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具体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他说：“教条宗派分化出来的人是应当欢迎的。遵义会议不是稼祥、洛甫分化出来是开不成的。他们二人不管过去怎样，但是做了对党有利的事。”他又说：“所

有经验宗派的人，与教条宗派是有区别的，大多数是被欺骗的，不觉悟的。他们常常被教条宗派利用‘共产国际’、‘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诱所蒙蔽，所迷惑。”他在结束发言时说：“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30)

许多中央领导人在会上也回顾了党内斗争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并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但王明始终没有到会，会后，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向他传达会议精神，并希望他认真考虑，作出检查。十二月一日，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代笔为王明写了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表示一九四一年九月底十月初时同毛泽东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抗战路线问题的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31) 这些，其实都是假话。

十二月下旬，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向一些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发出的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要求他们很慎重地组织这一研究，每一中央分局在所属地区组织一百到二百人左右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两条路线的有关文件。毛泽东强调：“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经过九月以来的紧张学习和对错误路线的深入批判，高级干部中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已能看清。但是，又出现一些新的偏向。有些过去受过错误打击的干部对那些犯了“左”倾错误的干部也进行过火斗争，使有些人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揪上台去交待问题，有的甚至被轰出会场，一度造成十分紧张的气氛。对党史中的一些重要

问题还存在严重争议，主要是：王明、博古等属于党内问题还是党外问题？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怎样处理思想要弄清和结论要宽大的关系？对六大如何估价？党内的宗派是否还存在？对这些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历史经验告诉他，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还会重复过去犯过的错误，党内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就上述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取得了一致意见。三月五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谈了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明确地指出：一、党内党外问题。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怀疑王明、博古同志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错误问题。二、合法与非法问题。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查到临时中央有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国际批准，所以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四中全会是合法的，但政治路线的内容是不好的。三、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问题。自整风以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治病救人”。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责任。因此，组织结论可作宽大些。现在要宣传解释这个方针，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对抗战时期的问题也许不在七大上作结论，七大只做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四、不要反对一切。对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否定一切。当时我和博古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就是一种偏向。五、对六大的估计。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党内宗派问题。经过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党内没有宗派了，现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山头主义。(32)

毛泽东这些意见得到政治局会议的赞同和批准。四月十二日和五月二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和中央党校作学习和时局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经政治局通过的这些意见。他在四月十二日的报告中说：

“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全党的团结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当年参加会议的邓力群回忆：“一批人解脱了，许多人心服了，大家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33）

在这个时期中，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总结了明朝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篇文章，认为它的内容对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把它当作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他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谈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

误。”(34)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35)。

在全党团结、统一的气氛下，中共中央认为起草历史决议问题的时机成熟了。五月十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召开党的七大的问题。会议决定组织几个准备报告的委员会：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包括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几天后又增加了博古），由任弼时负责召集；军事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召集；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会议还决定，七大召开前在五月二十日左右开始召开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七大的准备问题。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是从五月二十一日开始的，本来只准备开两个月，由于时局的发展变化，会议延长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才结束，断断续续开了十一个月。

五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他指出全会的任务是：一、准备七大；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指出：这两个时期我们的方针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关于发展自己，事实说明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中国的抗战决不能有今天。关于团结友军，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则要同它斗争。在反磨擦中，我们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

磨擦斗争归于缓和，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目标上去。今年军事仍以精练为主，明年准备发展，并占领一批小城市，在获得美国配合时，准备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在全会期间，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由七中全会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并形成决议。会议通过七大的议程、各报告负责人和四个报告（政治报告除外）准备委员会名单。

起草“历史决议”是七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为准备七大所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最早的“决议”草案稿是任弼时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写成的，题目是《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它是以一九四一年秋天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基础的，主体部分的内容基本相同，同时又反映了一九四三年九月会议以来的新认识，如对四中全会的评价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作用等。稿子写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由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作了比较大的修改。任弼时又在胡乔木的修改稿上作过三次修改，其中把王明路线的错误概括成七点提纲式的意见，题目也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接着，又由胡乔木写了一个稿子。中央指定张闻天对历史决议稿做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

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这个决议的起草。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张闻天修改后的稿子上开始进行修改。他前后作了七次修改。毛泽东后来曾特别讲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



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 (36)

在第一次修改中，毛泽东将题目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且增写了新的内容，如“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 (37)，就是这次写上的。在第二次修改中，毛泽东强调了六大的正确方面；批评四中全会在过分地打击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后，还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并对受打击的被诬为“右派”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作了肯定的评价；还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中央的新的领导，这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38)在这份稿子上，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弼时同志：请邀周、朱、洛、刘（如在此时）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40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定议，再交七中全会通过。” (39)以后，毛泽东在三月二十六日的稿上作了些文字增删，在四月七日和八日又先后修改三次。这以后再修改了一次。在四月七日的修改稿上，毛泽东在起始部分加写了一大段话：

“中国共产党自从它在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一九二一年至现在（一九四五年）的二十五年奋斗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全党同志和广大中国人民在一起向着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取得伟大的成绩与丰富的经验。同时，在这三个时期中，全党同志与党内一切机会主义思想



与行为不断地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一天天更加巩固起来。到了今天，有了一百二十万党员，我党领导了近一万万人民，九十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了一条同国内一切错误路线相对立的正确路线。由于执行了这条正确路线，并批判了一切错误路线，党才在三个时期取得了伟大成绩，造成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党，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领导者。”（40）

这一大段话，经毛泽东再作修改后，成为后来通过的历史决议的第一部分。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进行了多次讨论，提出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其中，很多意见被吸收到决议中去。

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来是七大的重要议事日程。三月二十五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决定将这个决议改在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重大改动呢？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作了说明：总结经验可以说是算帐。不采用大会这个形式来算帐，才能使大会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他说：历史上的错误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那时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如果使用大会这个武器，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目标，结果仍不能超过现在的草案。毛泽东要求参加七中全会的同志说服七大的代表们，把过去党的历史问题委托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来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他还讲到：草案中没有说“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问题，没有说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也没有说四中、五中全会的非法问题，也没有说教条宗派、经验宗派问题。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

不对，却会造成错误。对《决议》草案中没有就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作结论，毛泽东也作了说明：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历史问题，没有成熟的问题都不必急于作结论。(41)毛泽东准备的政治报告和刘少奇准备的修改党章报告也在这天的会议上通过。

四月二十日，任弼时主持召开扩大的七中全会。这是历时将近一年的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朱德准备的军事工作报告和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由于会前毛泽东、任弼时等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所以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博古等在发言中真诚地表示拥护这个决议，并向那些曾经受过错路线迫害的同志道歉。任弼时在发言中坦率地谈到他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特别提到：“皖南事变后毛对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风中的思想领导，使我产生了佩服和信赖”(42)。王明请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和七中全会的声明书中，对历史决议和它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所犯严重错误的分析和估计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43)

毛泽东心情舒畅地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与全国人民有关系的，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负责任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于今后的斗争有益。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

《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

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会踰矩的。(44)

这次会议一致决定：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个别意见委托给七大以后的中央去采纳修改。这个决议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获得一致通过。

《决议》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结论。经历了几年的整风，使党内的思想取得了一致，使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它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第三号（关于克服自由主义），1943年4月13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00、901—902页。

毛泽东和绥德专署专员袁任远谈话记录，1943年7月。

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8月2日。

王保成：《跟随领袖二十年》，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9页。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329页。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4年1月10日、1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邓小平、饶漱石、林枫、程子华的电报，1944年1月24日。

毛泽东、康生致邓小平、滕代远的电报，1944年2月26日。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记录，1945年2月15日。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28页。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5月26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7月7日。

毛泽东致周子健的电报，1943年7月13日。

蒋介石对《关于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决议案》的指示，《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841页。

毛泽东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关于《质问国民党》一文发表后的反映材料上的批注，1943年8月22日。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50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00页。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8月30日。

(21) 博古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9月7日。

(22)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43年9月7日。

(23)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24)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9月13日。

(25)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26)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27)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28)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29)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3年10月6日。

(30)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1月13日。

(31)王明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1943年12月1日。

(32)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3月5日。

(33)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47、948页。

(35)《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41页。

(36)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5年4月21日。

(37)毛泽东对历史决议(草案)的第一次修改稿，1945年3月手稿。

(38)毛泽东对历史决议(草案)的第二次修改稿，1945年3月24日手稿。

(39)毛泽东对历史决议(草案)的第二次修改稿,1945年3月24日手稿。

(40)毛泽东对历史决议(草案)的第四次修改稿,1945年4月7日手稿。

(41)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3月31日。

(42)任弼时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4月20日。

(43)王明向毛泽东及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提交的《声明书》,1945年4月20日。

(44)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4月20日。

## 二十八、联合政府的主张

到了一九四四年，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逐渐从最困难的处境中走出来。这年春天，根据地有了明显的扩大，居住的人口增长到八千万人，军队发展到四十七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七万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谁也无法忽视的力量。

当时放在中国人民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很好地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这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毛泽东为它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还在一九四三年秋天，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刚刚被打退，维护国内和平、促进国共团结的任务就被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那时，蒋介石又作了这样的表示：要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并许诺在抗战结束一年内实行宪政。对蒋介石的允诺，毛泽东清楚地看出他其实是“欺骗”。但只要还有一点可能，毛泽东仍要抓住这种机会来推动国共关系向好的方面转变。十月五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提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也有利于促使国共两党谈判的恢复。尽管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北非战场上都取得重大胜利，但中国战场上毕竟仍集结着数量庞大的日本陆军。美国政府为了避免一旦在中国大陆作战时会造成美国士兵的大量伤亡，希望中国所有军队都能用于对日联合作战，而不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时出现内战。苏联和英国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这种国际压力也迫使蒋介石对国内问题进一步采取缓和态度。

一九四四年初，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向毛泽东转达蒋介石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信息。听到这个消息后，毛泽东的判断是：“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争取和广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

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郭仲容，告诉他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三月十二日以后。对即将进行的这次谈判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四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发言说：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所谓十项罪状。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毛泽东接着说：这次总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毛泽东还提出：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

四月二十九日，肩负重任的林伯渠同王若飞、伍云甫一起离开延安，五月二日到达西安。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了初步会谈。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同张治中、王世杰同机到达重庆。同以往的情况一样，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毫无准备，拿不出任何方案来。他们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拿出具体意见来。五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明日由电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将这个意见书交给王世杰和张治中，以此作为谈判的具体内容。



这份意见书是毛泽东起草的。意见书首先说明：“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

关于全国政治的有三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的有十七条，主要内容是：允许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公平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等等。

对这些合情合理的要求，国民党谈判代表拒绝接受，并且不肯把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书转交给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对意见书作了修改，将原来的二十条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提出。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中央所作的上述修改，并说：“如彼方再不接受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屈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但是，对经过修改后的意见书，国民党方面仍不肯接受。

六月五日，王世杰、张治中突然拿出一份《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其中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军十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陕甘宁边区划定为“陕北行政区，其

行政机关称为陕北行政公署”。而对敌后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及人民的权利等只字不提。王世杰、张治中还声称：只能按照这个提示案来谈。这个蛮横无理的《提示案》，不但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意见书相距甚远，而且同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状况相去太远。

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于是又陷入僵局。

这时，中国正面战场的局势出现新的严重危机。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和本土开始遭受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所谓“一号作战”计划。计划的重点是：“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地”，以实现贯通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运输线；同时，要摧毁设立在广西和湖南的盟军空军基地。四月中旬，日军沿平汉路向河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接着，又从湖北沿粤汉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广西，前锋直达贵州独山。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战场上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大溃退。短短八个月内，相继丢失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六千多万中国同胞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在战时，人们最关心的焦点莫过于军事。如果其他问题还可以勉强忍受的话，那末在这方面出现不应有的严重挫折就使人普遍感到难以忍受了。谁都看得出来，这场大溃退其实是国民党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严重问题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腾，舆论空前激昂，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冲破皖南事变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比较沉寂的状态，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蓬勃兴起。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信任，要求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驻华官员和舆论的强烈关注与不满。

过去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严密封锁，大后方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这一年初，在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往延安等地采访。六月九日，也就是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第三天，参观团一行二十一人到达延安，成员中有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路透社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汉神父，苏联塔斯社记者普多岑科，此外，还有国民党统治区各大报的一些记者以及国民党官员。

中外记者来到延安，毛泽东很兴奋，觉得总算是打开了局面。他立刻经过延安交际处安排了同记者会见的时间。

六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记者参观团。记者团的成员大多是第一次来到延安，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在同毛泽东的谈话时提出的问题特别多。毛泽东一一耐心地了解答。关于国共谈判，毛泽东说：现在还在谈判之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关于开辟第二战场，毛泽东说：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他又指出：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关于中共的主张，毛泽东指出，中共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他说，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也快要到来了，但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须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胜利。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当时在交际处工作的金城回忆：“中外记

者都想不到毛泽东能这样快地接见他们,并且详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回到交际处,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

毛泽东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泼斯坦在当时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毛在延安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十多个抗日根据地频繁的战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组织工作。在和国民党多方面的关系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他既要躲开对手的攻击以避免发生内战,又要推动对手更有力地去打击日军。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从事于理论写作和解党内争论的问题。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庆的蒋介石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由于交通的阻断和困难,内部通讯联络不可能对很远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以具体的指示,这就要求每个人了解并遵循总体的方针路线,把一致性和主动性灵活地结合起来,由他们自己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

朱德、叶剑英等也分别会见了中外记者,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和它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一份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团的讲演《中共

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通过中外记者的报道，广泛传布到大后方和许多国家，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内外舆论开始重新评价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延安交际处还组织中外记者们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这些原来对解放区情况毫无了解的记者们，看到了和重庆完全不同的情况，留下深刻的印象。七月十二日，参观团除五位外国记者留下继续参观访问外，其余离开延安回重庆。毛泽东在七月十四日和十八日又先后会见了斯坦因和武道，同他们就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斯坦因的会见长达十二个小时。记者们回到重庆或回国后，写了许多反映中国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籍和文章。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受到广泛的注意。记者团中过去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敌视态度的夏南汉神父

“亦认为边区是好的”。七月一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驻华官员约翰·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多次建议美国政府派人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考察。这些提议最初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随着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同中共军队合作的问题。一九四四年二、三月间，罗斯福通知蒋介石，为了搜集日本在华北、东北的情报和研究将来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各种可能，准备向延安派出一个军事考察团。蒋介石一直以种种附加条件来进行阻挠和拖延。到六

月间，豫湘桂大溃退已经开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又到中国来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这个要求，蒋介石才勉强同意。

对美军观察组要来延安的事情，毛泽东非常重视。他认为，争取同美国政府合作，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很大的意义。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第二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问题。会议决定：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不久，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不应把他们（指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引者注）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七月二十二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美国军用飞机到达延安，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迎接。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来，要详细了解日军的战斗序列、日本空军的战斗序列、伪军的战斗序列，但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战斗力，还有共产党在日军内部和日本占领区中的情报工作能力。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会见观察组。使毛泽东最有兴趣的是同出生和长期工作在中国、并且对中共抱着友好态度的谢伟思交谈。在八月二十三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谢伟思说：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

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在另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向谢伟思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毛泽东说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刻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最危险的时机。这些谈话给谢伟思留下很深的印象。

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期间听过毛泽东的讲演。包瑞德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总是神态自如。当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们的观点时，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没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为我在场，他可能有意回避责骂委员长和国民党。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演讲家通过手势吸引他的听众，那么就正是毛泽东。”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近两年时间，听取了中共领导人和军队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并且多次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生活清苦，工作热心，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观察组写回国内的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从九月起，国共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大溃退，他们在政治上的独裁专制、腐败无能，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物价飞涨就激起全国上下更强烈的愤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已成为大后方人们普遍的愿望。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响亮的新的政治口号，那就是成立“联合政府”。



当时，正处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召开的前夕。中共中央认为，目前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董必武八月十七日向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毛泽东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请周考虑拟复。”随即又在周恩来八月十八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的电报上批注：“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九月一日，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提议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他说：“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中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电报强调：“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

九月五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这次会议是在战局严重恶化、国人群情激昂的时刻召开的，会上发言之热烈，批评之直率，是以往历次参政会上不曾见到过的。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议程：国共关系问题。以前，国民党当局一直只许国共谈判在内部进行，不肯公开宣布。这次在国内外普遍要求了解国共谈判真相的巨大压力下，把它列入参政会议程，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十五日，林伯渠、张治中在大会上分别作了国共谈判经过的报告，会场座无虚席。林伯渠在报告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召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21)这个口号一提出来，立刻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巨大反响，各界纷



纷集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国共谈判的中心也应该转到这个问题上来。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的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

“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22）

十月十三日，林伯渠将这封信送给王世杰、张治中。始终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积极反响。伴随这场斗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民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

西，不是一大一小。”“现在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23)

在国际上，美国政府对美国国内政局特别关心。当时，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用跳岛战术进行的反攻已取得巨大成功，准备攻占菲律宾，向日本本土逼近。随着战争接近胜利，美国政府已越来越多地在考虑战后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中国和整个亚太地区。他们希望，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作出一些改革，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能有效地适应美国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府。同时，当时担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同蒋介石之间日益发展的矛盾也需要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九月六日，罗斯福派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赫尔利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到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24)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已放在支持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上。

十月间，赫尔利在重庆同中共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多次交谈，向他们表示自己受罗斯福总统派遣到中国来，是为了帮助中国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尽管在事实上，他并不是这样做的。赫尔利还表示：在必要时愿意访问延安。

对赫尔利要来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十一月六日，在赫尔利到达延安的前一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研究这件事。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如下分析：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蒋想给些小东西而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看得相当乐

观。他说：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25)会议决定，对谈判应采取积极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批评。

第二天，一架从重庆来的飞机在延安机场着陆。身着军装，胸前佩带着各色勋章的赫尔利出现在舷梯上。周恩来立刻把毛泽东请过来。和赫尔利同机到达的还有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

八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举行第一次会谈。美方参加会谈的还有包瑞德及译员和秘书。这一次主要是听赫尔利谈。他首先说明：我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我这次来，还得到蒋委员长的同意和批准。赫尔利说：“我的任务是企图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来与美国合作，击败日本。”他还谈到来延安之前曾与蒋介石交谈，蒋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达成谅解，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并愿意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还考虑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会议，共产党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26)

接着，赫尔利宣读了一份他所起草的《为着协定的基础》，内容是：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

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27)

赫尔利读完后，一直耐心地听着的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赫少将刚才所说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没有完全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回答说：这些观点是他本人的意见，中国政府方面是同意的。包瑞德告诉赫尔利，毛泽东想知道这些意见是他的意见还是蒋介石的意见。赫尔利说：原来是我的意见，后来蒋介石做了若干修改。(28)对这个细节，包瑞德回忆道：“毛泽东查询这些条款体现了谁的思想，我当时觉得他有些唐突。然而后来，当我阅读这些条款时便觉得，毛泽东提的问题是公正的，因为某些语言听上去的确不像委员长自己惯常的表述方式。” (29)

当天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谈，主要是毛泽东发言。欢迎赫尔利到延安来。

他说：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安已有一些时候的包少校知道得很清楚，还有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

他指出：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他告诉赫尔利，蒋介石却总是想拖，拖到抗战结束一年以内，才来办这件事。如果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国民党政府有崩溃之危险。

毛泽东强调：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

关于改组军队问题，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最后，毛泽东表示，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30)

在会上，毛泽东就赫尔利的五点建议提出具体的修改和增补意见。这些意见关系到许多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只要把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和赫尔利提出的五点建议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又合情合理，分寸适当，易于为对方接受。赫尔利对毛泽东的修改意见很满意，他说：“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31)

九日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第三次会谈。中共方面提出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赫尔利看后表示这个方案是对的，他将尽一切力量促使蒋介石接受。会议着重商讨了国共之间进行协商的具体步骤。毛泽东提出：赫尔利将军回去后，可以把我们所同意的要点征求蒋介石先生的同意。如他同意，那就非常好。赫尔利说，如果毛主席愿意见蒋先生，我们将以美国国格担保毛泽东及其随员的安全。毛泽东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如果事前取得一致，我见蒋先生的时候，就可以没有多大争论。就是说，在双方见面以前，实际问题早已解决，这样的步骤比较恰当。

赫尔利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在协定草案上签字，毛泽东说可以。赫尔利说，那我也要在上面签字，题目可以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基本协定”。毛泽东说，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蒋先生愿意签字否？包瑞

德在一旁补充说：这五项要点，蒋如拒绝签字，责任就在蒋身上。(32)

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向全会报告同赫尔利会谈情况。毛泽东说：经过三次会谈修改后的五项协定，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的进步。(33)全会一致同意批准这个协定，并且授权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这个协议上签字。

这个经过讨论修改的协定草案全文是：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34)

十一月十日上午，毛泽东同赫尔利进行最后一次会谈。毛泽东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同志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35)赫尔利也说：“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能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36)随后，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签字，赫尔利是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和见证人的身份签字的，文本上留下了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处。赫尔利建议毛泽东给罗斯福写一封信，当天毛泽东将写好的信请赫尔利转交罗斯福。信中说：“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37)当天下午，赫尔利离开延安飞往重庆，周恩来、包瑞德同行。

事情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蒋介石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协定草案。接着，他却提出一个“反建议”，内容是：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38)这时，赫尔利虽然口头上继续表示原来的“协定”草案的内容是公平合理的，实际上却完全转到蒋介石一边。十一月十七日，赫尔利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大使。包瑞德回忆：“在我看来，从这天以后，他同共产党人谈判时就日益倾向于袒护国民政府了。”(39)

蒋介石的这个“反建议”，完全是站在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立场上的。它由赫尔利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转交周恩来。周恩来看完后，立刻一针见血地问赫尔利：“蒋介石对联合政府态度如何？”赫尔利说：“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同日，周恩来将同赫尔利会见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来电上批了：“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



制我军”。由于赫尔利背弃了他在延安签过字的协定，谈判难以继续进行下去。十二月七日，周恩来、董必武回到延安。包瑞德同机回来。

当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听取周恩来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会议认为，国民党所提的三条反建议明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因此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第二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包瑞德，拒绝蒋介石的“反建议”，并且严肃批评赫尔利背信弃义的行为。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踏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踏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毛泽东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说：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40)

十二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在重庆的王若飞：“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41)并要王若飞将这些意思转包瑞德或戴维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一时已无法再同国民党讨论如何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复信赫尔利，对他七日来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的提议，加以婉拒，指出“恐此项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请他向国民党政府转达中共下述提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这种预备会议应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



有平等地位和往返自由。”并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这一提议，周恩来可以再到重庆磋商。

显然，中国共产党仍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赫尔利二十日来电（来电说他相信国民党政府准备作出重要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来重庆谈判），告诉他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二十四日，周恩来飞抵重庆。行前，毛泽东叮嘱他继续谈判的方针是：一、争取建立联合政府，和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三方面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等。

在重庆的谈判中，赫尔利和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在政务委员会以外的两个补充办法：（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军派一名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共产党派一人为副总司令。周恩来立即加以拒绝。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因为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中宣称一旦军事形势稳定、最后胜利更有把握时，就要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42）在二月五日的电报中，毛泽东又再次强调：“如无真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43）

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根本拒绝接受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44)这时，正站在蒋介石身边的赫尔利是怎么想的呢？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来会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地位的原则和方法。”(45)

这样，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最后一次谈判，自然只能不欢而散。二月十六日，周恩来返回延安。

赫尔利的扶蒋反共政策，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三月一日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公然宣称：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他宣布将在十一月十二日单方面召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毛泽东迅即作了严厉的抨击。三月十三日和四月一日，他两次会见谢伟思，尖锐地指出：蒋介石现在正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内战和国民党终将自杀的道路。他请谢伟思转告美国政府：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46)

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仅完全违背中国人民的意愿，而且不肯回头。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美国不同中共合作，攻击中共和它领导的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声称美国的军事援助只能给国民党政府。

美国政府奉行的错误政策带来了什么后果呢？正如毛泽东所评论的：“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47)

但是，“联合政府”的主张一经提出，它已深入人心，谁也无法把它重新抹掉。越来越多的人再也不相信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政府还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光明的前途。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处在同国民党对等的地位，并且被人们看作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这不仅影响抗战最后阶段的国内政治形势，而且延伸到战后，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日后国民党政府失败的重要种子。

毛泽东致董必武的电报，1943年9月26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26页。

毛泽东致董必武的电报，1944年2月4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4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4月15日。

毛泽东致林伯渠的电报，1944年5月16日。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河南会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第20页。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08页。

伊·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7、28页。

毛泽东在《中情通报》上加写的三段批语，1944年8月15日。

《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毛泽东致林伯渠、董必武的电报，1944年6月28日。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

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249—260页。

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249—260页。

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60页。

毛泽东在董必武向周恩来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44年8月。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1日。

周恩来致林伯渠、王若飞的电报，1944年9月4日。

(21)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589页。

(22)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的致王世杰、张治中的信，1944年9月27日手稿。

(23)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22日。

(24)赫尔利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44年12月24日，《党史通讯》，1984年7月。

(25)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11月6日。

(26)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8日。

(27)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28)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29)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76页。

(30)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31)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32)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会谈记录，1944年11月9日。

(33)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11月9日。

(34)毛泽东同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10日。

(35)毛泽东同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10日。

(36)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2页。

(37)毛泽东致罗斯福的信，1944年11月10日。

(38)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提交的三条反建议文件，1944年11月21日。

(39)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8页。

(40)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96页。

(41)毛泽东、周恩来致王若飞的电报，1944年12月12日。

(4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5年1月28日。

(43)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5年2月5日。

(44)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5年2月18日。

(45) 赫尔利致国务卿的报告 ,1945 年 2 月 18 日 ,《党史通讯》 , 1984 年第 8 期。

(46) 埃谢里克编著 :《在中国失掉的机会》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 4 月版 , 第 329、 339 页。

(47) 《毛泽东选集》 , 第 3 卷 , 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6 月版 , 第 1111 页。

## 二十九、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尽管时局仍旧笼罩着一片乌云，但谁都看得出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毛泽东一直坚信：“决定中国事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他在指导同国民党谈判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具体指导各敌后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准备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这种准备是从一九四四年春天开始的。

这一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准备担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重大责任，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必要准备：一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二是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毛泽东说：“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向哪里发展？毛泽东早就确定了一项十分明确的原则：只能向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敌后地区发展，也就是从侵略者手中光复失去的国土，而不能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去发展。一九四四年，日军实行“一号作战”的计划，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河南、湖南、广西等大片国土沦丧，当地民众迫切期待有人领导他们起来反抗侵略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机立断，确定开辟河南、发展苏浙皖、进军湘鄂西。用毛泽东的话来概括，就是“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那里。”

人们可以从比较中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一边是正面战场出现震动中外的豫湘桂大溃退，一边是敌后战场进入大规模的反攻作战，一个是后退，一个是前进，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四月二十二日，日军沿平汉铁路向河南中西

部发动进攻的第五天,毛泽东立刻命令八路军袭击它的后背,“乘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展豫西工作基地。”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太岳军区派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新四军第五师组织七个连沿平汉铁路北上河南;新四军第四师派部西进皖苏地区。各部队相互配合,经过短短半年多的时间,迅速打开局面,收复了原被日军侵占的大片土地,将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结在一起。

对苏浙皖地区的发展,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为了配合将来美军的登陆作战,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一带的大城市。八月三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向华中局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使上海、杭州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十二月,在粟裕指挥下,新四军南下部队分两路渡江,开始了发展东南的任务。为了加强这个地区的工作,毛泽东、刘少奇要求新四军军部考虑建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的军事活动。一九四五年一月,苏浙军区成立。

派八路军一部南下进军湘粤赣,是毛泽东这时的一项大胆战略决策。这是日军沿粤汉铁路南下时夺占的土地。毛泽东的考虑是:太平洋战争后期,如果日军向山东等沿海地区退却集结,这支部队便可以转入反攻,收复更多失地。战后,万一蒋介石发动内战,它也能牵制南方一翼,掩护各解放区自卫作战。这个行动的特点是远离根据地,完全独立地作战,因此,中共中央对这一行动格外慎重,经过了多次讨论,反复研究。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最后商定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主力南下,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



等八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南征部队命名为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

毛泽东十分关心这支部队的南下行动。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向准备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说：国民党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老百姓都仰望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要百分之百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就现在的环境看，还需要大大的发展，广东、湖南、河南都可以大发展。”他在这次讲话中以柳树和松树来生动地譬喻共产党员的机动性和原则性，他说：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但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

毛泽东约见王震时还对他说：“战争越扩大，革命越发展，战争越持久，革命越深入。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的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

十一月一日，即将出发的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大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开始讲话。他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王首道回忆说：

“毛主席的讲话，为我们南征从指导方针、政策、策略和工作方法等方面指明了方向，武装了思想。”

后来，由于战争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的投降比人们的预料到来得更快，南下支队进军湘粤赣的计划没有全部实现。但是，他们在近一年的时间中，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省，到处撒下革命的火种，对发展这些地方的革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做好城市工作，是中共六大决议中就提出来的了。但是，十年内战中，没有条件去实现它。一九四四年春天，毛泽东重新提出这项任务，并且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那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有很大的发展，日本侵略者所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都处在这些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而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却远在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黄河以北几乎没有国民党精锐部队的踪迹。因此，预计当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完全有可能首先进入这些大城市。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结果，也是一种历史的机遇。毛泽东认为，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再不提出这个任务，“我们在抗战中将犯大错误”。

六月五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这份指示明确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来执行，“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会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以彭真为主任。会议还建议中共七大的议程中增加城市工作这一项。九月一日，中共六届七中全

会主席团会议又决定：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市工作部，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为部长、刘晓为副部长，来进行这方面工作的准备。

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在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都需要积极地做好准备。

为什么需要做好经济工作？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毛泽东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经济工作。他又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还是处在个体经济和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这就要采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样一种办法”。

在农村，怎样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个很大的问题。农民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仍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必须“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减租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毛泽东要求基层干部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农村群众开展生产运动。他说，这样做，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

民众要进行生产，部队能不能从事生产呢？有人认为部队从事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从事生产就不能工作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以大量事实说明：不但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的民众可以生产，军队也可以生产。他提倡

各地学习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经验,为大反攻积极准备物质基础。毛泽东在社论中强调:“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

对文化工作,毛泽东提出的口号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时,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名文盲,迷信思想仍严重地影响着广大群众。毛泽东认为:“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他号召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他要求广大干部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到一九四四年底,国际形势变化得很快。毛泽东估计: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提出解放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努力。毛泽东鼓舞人心地指出:“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

一九四五年一开春,国内形势就出现可喜的发展势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

略包围之中。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万人，十九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经接近一亿。

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也令人振奋。在欧洲战场上，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也乘胜不断向日本本土进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

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

就在这个历史时刻，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同一个时刻，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重庆拉开帷幕。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之命运。

为了开好七大，中国共产党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四月二十一日，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明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二十四年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最后，他向全党发出号召：“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姐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

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

这座风格别具的礼堂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为迎接七大而自己动手修建的。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两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这十二个醒目的大字同会场后面的题词“同心同德”，烘托出会议的主题。大厅两侧的墙边插放着二十四面红旗，象征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的奋斗历程。插放红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当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带着一百二十万党员的重托走入会场后，庄严肃穆的礼堂充满了团结喜悦的气氛。雄壮的国际歌声响起，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始。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言简意赅，吸引住了全场的代表。他说：

“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引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引者注）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21）

面对这样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和方针是什么呢？毛泽东坚定不移地回答：“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

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第二天，毛泽东向中共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这份报告是在广泛听取代表意见的基础上，三月三十一日在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讨论通过的。

报告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这是党制定纲领和各项政策的出发点。报告指出：“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毛泽东曾说，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地讲出国际国内“人心向我”的结论，但是写出了“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八年抗战中国共两党由于执行两条不同指导路线而取得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指出这两条道路的争论“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毛泽东说，八年的抗战考验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次大会应该对此作出结论，作为今后奋斗的指针。

报告的中心是阐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就纲领来说，同几年前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相比较，两者相同的地方是：都把党的纲领区分为最高纲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和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当然，《论联合政府》在这时再次谈这个问题也有它的特殊针对性。共产国际解散后，有些人叫嚷要“解散”中国共产党，也有人提出要中国共产党改换名称。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这种特殊性作了如下的说明：“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



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22)不同的特点是，《论联合政府》中把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加以区别，又着重地阐述党的具体纲领，而《新民主主义论》中主要是讲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没有去谈具体纲领。这反映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

对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论联合政府》比《新民主主义论》有重要发展的是：强调了要允许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得到比较大的发展。而《新民主主义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重点是放在“节制资本”方面，也就是说：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家所有，但并不没收非独占性的规模不过大的“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作了这样的说明：《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23)

为什么共产党人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倡导它的发展呢？《论联合政府》中回答道：“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24)他在《论联合政府》的“工业问题”一节中，本来还有一段专门论述吸收外资的话：“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



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在一九五三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把这段话删去了。这可能同当时的客观形势和毛泽东主观认识的变化都有关系。

所谓具体纲领，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过程的一定时期内所适用的纲领。《论联合政府》中共提出了四十条，主要内容是：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人民的统一；建立人民的军队；实行农村改革（抗日战争期间实行减租减息）；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在这些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联合政府”。报告强调：“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这也就是“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的意思。报告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两个步骤：第一，“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报告说明，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

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5)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那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的提出,对自觉地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一天,毛泽东向大会做了口头报告。他从书面政治报告的内容中提出三个问题,更充分地展开论说。这三个问题是:路线问题;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党内的几个问题。

关于路线问题,毛泽东指出:七大决定的政治路线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毛泽东强调: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一切革命。“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26)

关于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毛泽东再次阐述了他在书面报告中所说的要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他说:关于资本主义,“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他进一

步批判了民粹主义的思想，说：“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27)他指出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是太急了。他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毛泽东一开始就谈党性和个性的问题，批评一些人认为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的错误观点，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二者的关系：在共产党内，党性是普遍性，个性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对干部问题，他指出：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他还提倡党内要讲真话，做到“不偷、不装、不吹”，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如此。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

毛泽东报告的最后说了一段充满革命激情的鼓舞人心的话：“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二十四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28)

随后，朱德和刘少奇分别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刘少奇作的修改党章报告中说，“党章的总纲上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七大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是七大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

二十四年来，中国共产党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在革命斗争中、工作中吃过不少苦头，走过不少弯路。事实证明：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才能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是接受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的探索后形成的。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那末毛泽东所作出的贡献无疑是最重要的，所以，用毛泽东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思想的代表是很恰当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总纲中写入这一点，还因为有这样的客观需要。胡乔木中肯地评论道：“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为什么四十年代中国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29）

大会期间，代表们在讨论中对几个报告发表了很多意见。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一共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世界将走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向。但是，应该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看形势，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现在还不存在。关于国内形势，毛泽东说：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我看光明多得很，但我们更要准备困难。毛泽东列举了今后可能出现的十多种困难，如外国大骂；国内大骂；被占去

几大块根据地 ;被消灭若干万军队 ;爆发内战 ;外国干涉 ;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 ;天灾流行 ,赤地千里 ;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 ,等等。还有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 ,但是一定要想到 ,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 ,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 ,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他满怀信心地说 :  
终久我们是要胜利的 ,马克思主义者要坚信这一条。

关于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 ,毛泽东强调领导者要有预见 ,要看得更远 ,“ 就是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 ,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 ,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 ,就能看见 ,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他特别举出这次大会提出的要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等问题 ,就是属于预见。这些问题今天还没有 ,甚至大家还感觉不到 ,但是如果看不到 ,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 ,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 ,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我们要提倡想问题 ,就是要开动脑筋 ,还要善于分析问题。“ 我们党内过去有一个习惯 ,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子 ,无论做文章、讲话 ,都用这个框子去套。这个框子就是所谓党八股。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 ,这是列宁讲的 ,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 ” “ 一个问题来了 ,一个人分析不了 ,就大家来交换意见 ,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 ,就去问问同志们 ,问老百姓。 ” 要准备转变 ,由农村转变到城市 ,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 ,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 ,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 ,我们要作准备。还有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即“ 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 ,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 ”。“ 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 ,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 ,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 ”

毛泽东富于感染力的讲话，常常被一阵阵掌声打断。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大会最后通过决议：“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30）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是公开发表的。它被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大后方也引起轰动。这本小册子在重庆发行了三万册，“有人接到后一夜未睡觉，一直看完”。正在参加国民党六大的有些代表看了后也称赞：“共产党说的头头是道，有办法。”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这项工作能否做得好，关系着这次大会能否真正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此，当代表们还在讨论大会的几个报告时，七中全会主席团已对选举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

当时议论得最多的是选举的标准，也就是按照什么原则来进行选举。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二、这届中央委员会要选拔许多新同志，还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即各个山头；三、候选人是不是必须要有完全的知识才能当选。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五月二十四日向大会做了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

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七大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选举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总原则下，对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对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就要选。他尖锐地指出：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因此，“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

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这一条，的确要练习，不练习就做不到，练习就可以做到”。选举中要注意照顾各个方面，也就是照顾各个“山头”呢？他说：七大主席团认为还是要照顾才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这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一定要认识山头，要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点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至于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要通晓各方面知识，毛泽东说：“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不一定要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如果经过同志们考虑，采取了主席团这样一个组织路线的话，我们相信这个中央将是缺点比较更少的中央。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就可以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

经过反复的酝酿和预选，六月九日进行了正式中央委员的选举，十日大会公布选举结果，共选出正式中央委员四十四人。但是，王稼祥没有当选。这使毛泽东很不安。六月十日，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他在大会上专门谈了王稼祥问题。他说：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同时也说明：“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选举结果，王稼祥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在团结、胜利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毛泽东情绪饱满地站在主席台上，他这时候的心情，也许只有那些同他一起经历了二十多年千辛万苦的探索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种局面来之



不易，是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换得的。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后，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闭幕词，他高度评价七大的历史作用，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号召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六月十九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起来了，这是历史作出的选择。

和中共七大几乎在同一个时候举行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一条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相反的道路。在五月十七日公开通过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中，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第二天，蒋介石在内部所作的第二次政治总报告中更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为了欺骗舆论，会上提出要在七月七日召开国民参政会，为在这一年举行国民党早在抗战前选出、由它一手操纵的所谓“国民大会”作准备。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七大主席团会议，讨论是否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问题。他说：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跟着也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不参加好处很多，因为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美蒋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根据会议决定，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关于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



的新闻稿,说明不参加的理由是:第一,从去年九月以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在全国解放之后实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人民的选举,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政府,这些合理的要求在谈判中一再遭到国民党的拒绝;第二,此次召开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政府事前并未与中共或其他党派商议,完全是一手包办,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第三,国民党六大不顾全国一致的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决定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而这次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现国民党六大的反动决议。中共方面为保卫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利益起见,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31)

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阐释道:我们决定不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就是把一个问题摆到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可做。毛泽东还提出,在蒋介石不肯改弦更张的情况下,要加紧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会,向联合政府发展。(32)

国共之间的紧张局面,引起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六月二日,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从重庆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大意是讲:团结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希望继续商谈。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褚辅成等,表示愿意商谈,并欢迎他们到延安来。

七月一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从重庆飞抵延安(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的隆重欢迎。在短短三天内,毛泽东同他们多次倾心交谈。

毛泽东同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就国共关系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褚辅成等认为国共两党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毛泽东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会谈气氛融洽，“彼此都十分坦诚，十分恳切”。最后，双方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还建议国民党当局：“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33)六参政员同中共方面取得的两点共识和中共对国民党当局的建议，构成了《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在同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他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溥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刀，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34)

七月五日，六位参政员飞返重庆。黄炎培在他所写的《延安归来》一文中反映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心情：“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35)

这时，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比毛泽东原来预想的要快得多，他在五月三十一日向中共七大作结论时还说：“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还准备日本军队可能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还准备可能要集中二十到三十个旅去打大城市。但是，局势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化。七月二十六日，中、英、美三国政府以宣言的形式公布《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八月六日、九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长崎两地投下原子

弹。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提前出兵中国东北。这一连串紧接而来的事件，大大加速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到来。

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毛泽东首先说：中共中央准备发表一个关于苏联对日宣战问题的声明。他接着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配合作战是同苏联红军配合，具体的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对日军我们应广泛发展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这不会犯冒险主义，要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可能攻开的就攻。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阻止的，中间是蒋的，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他还指出：美国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将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36)

同一天，中共中央主席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声明说：由于苏联对日宣布对日作战，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全国人民应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会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军进行广泛的进攻，扩大解放区，并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迅速占领可能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一万万民众迅速投入对日本侵略军的全面反攻，光复了大片国土。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付出

三千五百万人伤亡和无数财产损失的巨大牺牲换来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日本投降了！”胜利的消息传来，延安城内外一片欢腾。毛泽东和边区人民一起，沉浸在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喜悦中。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篇章。它是中国人民在近代第一次完全战胜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这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正是这场战争，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人民。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这场充满了惊涛骇浪的战争，同样也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指针的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成熟的。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在近代中国，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人民最坚决而又成功地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把祖国从危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谁就能取得人民最真诚的信任和拥护。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广大民众充分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凝聚成一股任何外国侵略者都无法战胜的巨大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历史洪流中纯熟地驾驭局势，始终清醒地指明夺取胜利的正确方针和办法。

抗日战争不仅锻炼了中国人民，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从八年抗战的无数事实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奔集到它的旗帜下来。到抗战胜利到来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已远非抗战开始时的状况所可比拟。

的了。这种影响往下延伸，为日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对即将开赴前线的干部的讲话记录，1944年10月25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46、947页。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11月23日。

毛泽东致滕代远、邓小平转杨得志、苏振华、黄敬等的电报，1944年4月22日。

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致华中局的电报，1944年8月3日。

王震：《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9日。

毛泽东对即将赴前线的干部讲话记录，1944年10月25日。

王震：《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9日。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229页。

《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日。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6月5日。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记录，1944年6月5日。

毛泽东会见出席边区职工代表会的代表们的讲话记录，1944年5月22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16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16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页。

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上的讲话记录，1944年12月15日。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7、10、16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5页。

(22)《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00页。

(2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00页。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60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86、1079页。

(26)《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20、121、126页。

(27)《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20、121、126页。

(28)《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58页。

(29)胡乔木谈话记录，1990年2月19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0、11页。

(30)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52页。

(31)《新华日报》，1945年6月23日。

(32)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6月19日。

(33)《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1945年7月3日。

(34)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150页。

(35)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150页。

(36)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9日。



## 三十、重庆谈判

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并作着准备的。但它来得那样快，却不是毛泽东完全想到了的。整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无数新问题一下子涌来，需要迅速地作出决断。其中最重要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后怎样妥善处理迅速上升的国内矛盾。

毛泽东以惊人的精力，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将领。他每天工作都在十多个小时。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物。毛泽东饿了，就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充饥。小礼堂周围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来自各地的干部坐在那里等候他的指示。

当时的局势是十分复杂的。抗日战争刚一结束，人们还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时候，中国上空却已笼罩着一片阴云：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动手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把刀锋指向中国共产党。

在八月十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出的当晚，朱德总司令已在延安总部向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发布向日伪军加紧进攻的命令，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敌军送出通牒，限他们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果日伪军队拒绝投降缴械，应该立即予以消灭，接收他们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十一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六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包括要求冀热辽解放区等部队向东北进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明确地指出：

“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存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那时候，华北和华中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都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包围中，在东北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一小部分抗日武装在活动；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退缩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这是国民党当局长期奉行消极避战以保存实力政策的结果。蒋介石明白，他的军队难以很快开到日本占领的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受降。当延安总部发布向敌占区大举进军的命令后，他在十一日发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命令：一个要求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推进，勿稍松懈”；另一个发给第十八集团军的，却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他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就是要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手脚捆起来，让国民党独吞抗日胜利的果实，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回到抗战胜利前的老样子去。人们从这里已经可以感觉到一股令人焦虑的内战的浓烈气息了。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一天，他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

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他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同时，他也指出：“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中国共产党力争的就是实现这种可能性。

事情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那样：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在国内，全国人民刚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普遍反对在战后再发生内战，要求实现国内和平，以便在和平环境中重建家园。在国际上，美英苏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而对蒋介石说来，更大的困难在于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对于这一点，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回忆录中明白地作了说明：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任何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

于是，蒋介石在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

拒绝到重庆来，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最后仍可以消灭已变成赤手空拳的共产党。另一个是，可以用谈判来取得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

在接到蒋介石的第一、第二次电报后，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天就要出发到前线去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萧劲光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始就指出：“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他分析道：进入这种情况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蒋介石的地位，既有有利方面，也有不利方面。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抗日功劳无法磨灭，也无法封锁；国民党内部有矛盾，又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要求。毛泽东着重提出一个问题：“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他说：我们现在的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够取得的，因为英美苏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他同时也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原因，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等待机会消灭我们。

所以斗争是长期的，迂回曲折的。从中国的局面来看，成立的联合政府“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根据这个方针，毛泽东建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他判断：在谈判中，关于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总之他是不会满足我们的。毛泽东说：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是决定停一下的，因为日本突然投降，蒋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他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参加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毛泽东“对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志说，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他风趣地说，目前的情况是有三种果子，我们可能得一批小的，失一批大的，另外，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

会上，周恩来、陈云、朱德、张闻天、彭真、彭德怀等先后发了言。毛泽东最后说：大家的意见很好。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内战。所以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他又说：“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

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

就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一天，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到了。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回到延安。毛泽东等七个政治局委员连夜同王若飞磋商。二十六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对他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明确地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他说：“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出去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势？毛泽东说：“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他设想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板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未宥”电（即《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已收入《毛泽东选集》），并在当天向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发出。电报中指出：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

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毛泽东起草的这个党内通知，把中共中央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态度说得很清楚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三十七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有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飞机在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大公报》记者子冈作了这样的报道：

“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接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



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九个人。

“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

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这天晚上，他们出席蒋介石在山洞住处举行的欢迎宴会，并且留住在山洞林园。第二天，同蒋介石进行第一次商谈，并确定双方的谈判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和王若飞，政府方面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三十日晨，毛泽东、周恩来从山洞林园进城，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赫尔利等，然后住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九月一日，毛泽东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有宋庆龄、孙科、冯玉祥、陈诚、陈立夫、沈钧儒、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三百多人参加的鸡尾酒会。

毛泽东来到重庆，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四人的来信说：“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毛泽东在重庆的四十三天，除刚到和临行时有三天住在林园外，其他时间都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二楼，同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一起。红岩村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因此，张治中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

“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摸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订出有关的政策。他们研究得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研究完谈判之事后，周恩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起草电报或文稿，安排毛泽东第二天的活动，处理一些要事。毛泽东则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下步的工作。”“待忙完这些事后，毛泽东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不仅要看《新华日报》，还要看国民党办的各家报纸。一般的报道，他通览一遍放下。重要的文章和报道，他要认真反复地看，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映，掌握时局的发展。”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

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

九月二日，毛泽东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也在座。毛泽东对这次谈判提出了八点原则性意见：

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

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第二天，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十一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谈判结束后向政治局汇报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

九月二日晚、四日、十二日、十七日和十月九日、十日，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或在赫尔利参加下，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

当时担任毛泽东副官的蒋泽民回忆道：“毛泽东到重庆后，每次参加谈判，我和陈龙都跟随前往，毛泽东他们在里屋商谈，我们在外屋等候。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都是温和的。”“在外屋等候的我们，有时也能隐隐约约听见里面的争吵声。我观察，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立刻安静下来。”

在近一个月的商谈中，国共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却搁了浅。九月二十一日晚，赫尔利向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赫尔利这些话，是最后通牒式的施加压力。毛泽东从容不迫地用八个字来回答：“问题复杂，还要讨论。”他说：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

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继续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十月八日，双方代表最后就《会谈纪要》达成协议。十月十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里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通常称作《双十协定》）。签字仪式后，政府代表邵力子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接着，毛泽东从楼上走下来，同在场者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夜，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到山洞林园同蒋介石长谈了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他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商谈，使《纪要》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以前得到解决。

这次国共谈判就告一段落。

毛泽东在重庆这四十三天中，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会见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会见了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会见了中外记者，还会见过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名士兵，并且同他们一起合影。

八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拜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毛泽东和张澜在这次来重庆以前，从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神交已久。毛泽东向张澜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八月二十五日《宣言》中提出的六项紧急要求。张澜连着说了几声“很公道”，并且说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实施。张澜担心地对毛泽东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毛泽东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

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张澜说：“蒋介石要是真的心回意转，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呀！”

毛泽东和柳亚子，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老朋友。九月六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到柳亚子寓所去拜访他。毛泽东把手书的旧作《沁园春·咏雪》赠给柳亚子。柳亚子也即席赋诗作答：“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十月四日，毛泽东接到柳亚子一封信后，复信说：“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

对国民党内的各派人物，毛泽东也广泛接触。他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就是对一向反共的陈立夫、戴季陶等，他也前去看望。九月二十日，他在秘书王炳南陪同下去看陈立夫。见面后，他用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初期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在谈笑自若中批评国民党后来实行的剿共政策。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陈立夫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另一次，他由王炳南陪同去看戴季陶，出来时正好在小路上同蒋介石相遇。蒋问他去哪里，他说去见了戴季陶。蒋先是一怔，然后说：“好，见见好，见见好。”有的人指

责：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回答：“‘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

在重庆，毛泽东的活动十分繁忙。举《新华日报》一天的报道为例：“外交部王世杰部长昨日晨十时往访毛泽东同志，畅谈很久。下午三时以后，毛泽东同志往访于院长、戴院长、白崇禧将军、吴稚晖先生等。下午五时，晤韩国临时政府张先生，六时又接见文化界郭沫若先生，七时半赴苏联大使馆宴请并观电影。”这里，还没有把他晚上同周恩来、王若飞研究工作等活动包括在内。

毛泽东在重庆还探访了一些故旧。王炳南回忆道：“毛主席很念旧，不忘老朋友们。到重庆后，开了一个他过去相熟的新民学会会员的名单，要我去了解他们的近况。后来打听到其中一位，当时赋闲在家，穷愁潦倒，住在一面山坡上。毛主席便亲自去看他，还叫我们事先不要惊动主人。当我们随同主席走进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告诉主人，毛主席来看望他时，主人颤巍巍地站起，久久凝望着毛主席，脸上滚下簌簌的热泪，半晌说不出话。屋子矮小阴暗，不便招待客人，毛主席便同他拉过几把旧竹椅，坐到屋外的空地上，款款叙旧。”

毛泽东在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一是交流政治见解，并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二是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情况；三是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大后方以及国外人们的情况和想法。他在回到延安后所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谈到这方面的感受：“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在全中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上午九时许，毛泽东在张治中和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桂园前往机场。临行前，他同桂园的工作人员和担任守卫的国民党宪兵都热情地一一握手告别，向他们表示谢意。到机场后，他又同前来送行的蒋介石的代表陈诚以及其他友好人士握手道别，然后偕同张治中、王若飞登上一架草绿色的双引擎 C47 型运输机。经过近四个小时的飞行，在下午一时三十分回到延安。

毛泽东一到延安，当天就召开政治局会议。他报告这次谈判的经过说：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公报不可。《会谈纪要》是蒋介石提议，由周恩来起草的，也采纳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略有修改。国民大会和解放区问题还没有解决。赫尔利回美国前，要我们交出解放区，说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我说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毛泽东还谈了对《纪要》的看法，说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是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没有解决的问题，还要继续谈。(21)

第二天，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对重庆谈判作了这样的评价：“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这一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这次谈判的重要成就。”同时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冲突仍不可避免”，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军队整编问题也没有最后解决。国民党军队现正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因此，“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以松懈。”(22)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一次报告。这个报告后来以《关于重庆谈判》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他说：“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他同时也指出：“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但不管怎样，“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他十分明确地告诉大家：“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目前，蒋介石正在部署进攻解放区，“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2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25、1127、1130页。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70、71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3日。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325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3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6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53—1154页。

子冈：《毛泽东先生到重庆》，《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49、50页。

《重庆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9页。

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8月29日。

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八一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01、202页。

王若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0月11日。

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八一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0、191页。

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441页。

《柳亚子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911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61页。

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新华日报》1945年9月4日。

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0月11日。



(2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9 月版，第 324、325 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1156、1159、1161 页。

## 三十一、和战之间的抉择

全国人民对和平建国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是，蒋介石只是把和谈看作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暂时手段，所以，《双十协定》签订后，内战的烽火不但没有停息，反而越燃越大。

毛泽东在力争实现和平的同时，早就看到内战的威胁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他在八月十三日向延安干部会议所作的讲演中就清醒地指出：“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就在九月十七日以命令形式向内部重新颁发他在十年内战时期手订的《剿匪手本》，指令各部队要在“剿灭共匪”的作战中“切实遵行”。阎锡山部集中了十三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配合下，侵入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部队的自卫反击下，被歼三万五千余人。

十月十三日，《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和公布后的第一天，蒋介石又向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了一份杀气腾腾的密令：

“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紧接着，在十一月九日和十一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分别召开军事会议和复员整军会议。各地重要将领到重庆参加这两个会议。会议经过几天的讨论研究，决定了进攻解放区的作战计划。

会议决定要在六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进行清剿，以期“根绝匪患”。这个计划分三步行动：第一步控制苏北、皖北和山东，打通津浦路、平汉路；第二步集中重兵于平、津，“扫荡”华北；第三步打通平绥路，占领察、绥。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作战行动上的重要特点，是流动性大，运动战、游击战交替使用，并依靠群众的支持。这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将领们十分头痛。因此，他们这次会议决定把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活动的地区划分为“第一收复区”和“第二收复区”。前者主要指中共军队根据双十协定正在撤离的广东以及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湘粤边地区。会议决定要对这些地区加紧进行“围剿”和“清剿”，以期彻底肃清“匪患”。后者主要指长江以北，包括华北、西北等广大地区。会议决定在这些地区依据铁道干线的走向划分为六个“剿匪区”，各设一个指挥机构（就是后来建立的郑州、徐州、西安、太原四个绥靖公署和北平、西北两个行营）。

在这两次会上，蒋介石作了多次长篇讲话。对于“第一收复区”，他声称：“现在第一收复区里面土匪的主力，虽已渡江北窜，但一定还有不少的余孽，潜伏地方，我们高级将领必须除恶务尽，不使遗留一个种子。否则，如果我们疏忽大意，大部分的军队都已北上，而已经收复的地区又让土匪蔓延，则一旦土匪的主力南窜，里应外合，所有的收复区又将变为匪区了。”对于“第二收复区”，他认为基本方针、进攻步骤虽已确定了，但具体的兵力分配，“还要针对土匪的行动计划，作最后的决定。”

这时，国内局势确实相当复杂：一方面，国共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还签订了协议；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在杀气腾腾地部署和进行更大规模的内战。对于这样充满矛盾的现象应该怎样认识呢？

毛泽东的看法是：第一，蒋介石要消灭我们，这个主意老早定了。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做到这一点，也要使形势对我们更不利，对他更有利些。这是目前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第二，由于他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存在和他要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还不足，因此目前的大规模军事斗争可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时间内，还不是全面的内战，“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第三，“和平、民主、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和平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

为了应付这种复杂的局势，从重庆返回延安的毛泽东，不顾旅途疲劳，立刻连续召开会议，统一领导层的认识，并在十月二十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的着重点仍在击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它指出：

“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在这一期间内，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广大群众，发动要求民主、惩办汉奸、挽救经济恐慌、救济失业人民与援助还乡人民等项运动，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在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除移动大量军队与干部去东北及热河等

地，并在那里组织人民、扩大军队、阻止与粉碎顽军侵入外，在一切解放区，是组织强大的野战军，有计划地歼灭向我进攻的顽军，歼灭得愈多愈干净愈彻底愈好。这是自卫的战争，我们具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区的一切工作，都应为此中心任务而服务。”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全中国人民有利。”目前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在华北和东北，“只要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

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的蒋介石，从八月中旬到十月下旬的两个多月中，已调集一百一十三个师约八十万人的兵力到内战前线，此外又收编了伪军三十万人，共一百一十万人，沿平绥、同蒲、正太、平汉、津浦五条铁路线东进或北上。企图以此达到两个战略目的：一，打通铁路线，大举进兵平、津，再向东北推进；二，把华东、华北各解放区分割开来，尔后各个击破，或逼迫中国共产党在不利形势下订立城下之盟。

为了争取在有利条件下实现国内和平，毛泽东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回到作战指挥上来。他在给各大战略区的许多指示中，一再强调对付国民党军进攻一定要遵守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是自卫的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第二是胜利的原则，即“不要浪打，打则必胜”。

一九四五年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达到高潮。在这段时间中，毛泽东精心指挥晋冀鲁豫部队进行了平汉路战役（又称邯郸战役）。

蒋介石北上平、津的基本部署是兵分三路：左路以第一战区胡宗南部九个军东出潼关，并以其中的三个军北渡黄河进入晋南，然后经同蒲铁路到太原和第二战区阎锡山部会合，再经正太铁路东进石家庄，转而北上平、津。中路以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三个军八个师进占郑州，然后北渡黄河，沿平汉铁路北进，攻占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同胡宗南部会师石家庄，再继续北进，同由美国帮助空运到北平的第九十二军和九十四军会合，完全控制平汉铁路。右路以第十战区李品仙部三个军七个师由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指挥，先到徐州地区，然后沿津浦铁路北上，占领济南，伺机进击平、津。在这三路国民党军队中，中路的孙连仲部三个军八万多人已在九月中旬占领了新乡等八城，作北上石家庄的准备。左路胡宗南部两个军约五万人，也由太原附近沿正太铁路向石家庄东进。

面对着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地向解放区推进，如何阻碍和迟滞国民党军队沿铁路线北上，便成为解放区军民的严重战略任务。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北进的国民党军队在兵力上多于解放军，装备更优于解放军，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但官兵中很多人不愿意打内战，士气不高，部队新到，对地理、民情不熟悉，系统不一，补给困难，又有轻视人民解放军的心理，却是他们的短处。

根据这些情况，毛泽东决心以刚刚胜利结束上党战役不久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迅速东移平汉线，迎击孙连仲部由新乡北上的三个军。从十月十二日起，毛泽东连续签发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一系列作战指示，提出打胜这一仗的重要指导原则：

一，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大，因此必须精心筹划，精心组织，准备以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北上的八万敌军中的一半左右。

二，鉴于安阳以南临近敌之出发地域，不易求得歼敌机会，且易打成阵地持久消耗战，因此必须审慎忍耐，采取以逸待劳方针，诱敌深入到安阳、沙河间地区寻求机会各个歼灭之。

三，在安阳、淇县间应当先以小部兵力采取宽正面的运动防御，轮番抗击，达到迟滞、消耗、疲惫敌人并摸清敌情之目的；但在敌深入安阳再行北进时，则应避开正面抗击，让敌放胆前进。

四，具体打法上，应待敌进至于我有利之地区时，一面在正面坚决阻击扼制，迫敌展开，我主力再从敌暴露的侧翼或后方进行坚决的、猛烈的突击，加以围歼。

在新乡地区进行了二十多天准备的国民党军孙连仲部第三十、第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在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及参谋长宋肯堂的指挥下，从十月十四日开始北进。他们经过汤阴、安阳，先头部队在二十二日北渡漳河，同晋冀鲁豫军区的阻击部队接战。二十四日，这三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分两路猛烈北攻，遇到解放军节节抗击。此时，星夜兼程东进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已在预定地区完成集结，二十四日晚开始按预定部署出击。经过合围、逐步削弱敌人、总攻、诱敌残部突围加以围歼等几个作战阶段，于十一月二日胜利结束平汉路战役，歼灭第四十、第三十军两个军的主力两万多人。在战役过程中，刘伯承、邓小平派参谋长李达在夜间到高树勋司令部，劝他率部起义。十月二十八日，高树勋毅然率新八军等部一万人起义，对这次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平汉路战役，是继上党战役后由晋冀鲁豫部队进行的又一个规模较大和比较彻底的歼灭战，对当时国内形势的

演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九五九年，国民党在台湾的“国防部”编了一部《戡乱战史》，对这个战役作了如下评述：“是役（按：指平汉路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之为漳河战斗）之后，我军对平汉路既未打通，匪更奄有晋冀、冀鲁边之有利态势，对华中形成极大威胁；对华北更肆意窜扰，南北隔离，使我对接收华北工作发生极大的困难，尔后惟依空运部队接收平津，究以兵力有限，形成孤立，使政略、战略陷于被动，影响尔后之作战实至深钜。”

对平汉路大捷，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致电正在重庆进行谈判的周恩来等，告诉他们：“高树勋率两个师起义，影响极大。”“此战胜利后，将给‘剿匪’军以大震动，我们拟公开发表”。“现今刘邓清查缴获文件，为数必多，拟公开发表，击破国民党之诬蔑宣传。”十一月五日，他为新华社撰写了《豫北冀南战场胜利捷报》的新闻报道。同一天，他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用平汉路战役的实例，驳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所谓“政府在此次战争中全居守势”的谈话，指出：“由彰德北进一路，攻至邯郸地区之八个师，两个师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六个师（其中有三个美械师）在我解放区军民举行自卫的反击之后，始被迫放下武器。这一路国民党军的许多军官，其中有副长官、军长、副军长多人，现在都在解放区，他们都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奉命进攻的全部真情。这难道也是取守势吗？”

对于高树勋的率部起义，毛泽东更是备加赞扬。十二月十五日，他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这份党内指示中，决定把“开展高树勋运动”，作为解放区十大工作任务的第二项，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



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在平汉路战役前后，毛泽东还组织指挥了平绥路作战、津浦路作战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五年最后三个月内在军事上取得的一连串胜利，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某些调整，广大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实现国内和平，终于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中共代表团提出的无条件停战的建议，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同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中国的土地上（除东北外）出现了暂时和平的局面。

过分紧张的工作，终于使毛泽东在十一月中旬病倒了。

他得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神经疲劳”。当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的师哲回忆：“十一月，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我每天都要看他几次。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经过书记处几位领导人研究并一再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暂时集中一段时间治病养病，历来党内的重要文电，一般都由毛泽东自己起草。但在十一月十四日他起草了给东北局及晋绥、晋察冀军区等九份电报后，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出席欢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宴会，长达近四个月的时间内，他起草的电报只有九份，其中有三份电报是比较长的，就是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科《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及十一月十五日致东北局关于作战部署的电报，其余六份都只有数十字至百余字。

毛泽东养病期间，仍然密切关注着全党的大事。他养病的地方，最初是在柳树店附近的联防司令部干部疗养所。由于这里离中央和总部比较远，不能及时了解有关情况，后来又搬到王家坪的桃林。为毛泽东治病的，除原有的医务人员外，还有两位苏联医生：阿洛夫和米尔尼科夫。他们是斯大林应中共中央的要求选派来的，还带来一些新的医疗器械和新研制的特效药。阿洛夫过去曾长期在延安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看病，一九四五年十月才离开延安回苏联，十二月间又返回延安，他对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比较熟悉。由于他们的精心治疗，又由于在一段时间内减少了繁重的工作，一九四六年开春毛泽东的病已逐步好转了，工作也逐渐恢复。

毛泽东病情好转得比较快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阔别二十年的长子毛岸英又回到他的身边。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返回湖南长沙故里。一九三一年杨开慧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毛岸英等三兄弟由中共湖南党组织秘密送到上海。一九三一年，毛岸龙患病死了。一九三六年，毛岸英、毛岸青又被送到苏联学习。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已在莫斯科大学毕业的毛岸英，随阿洛夫医生等到达延安。毛泽东十分高兴，抱病到机场去迎接，父子的久别重逢，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安慰和温馨，也使他的病体能较快好转。

毛岸英在苏联生活了近十年，对中国的情况所知极少，甚至连中国话也几乎忘却了。毛泽东为了让毛岸英多了解些中国的社会情况，尤其是中国的农村情况，当他自己病情稍有好转后，就在一九四六年二月间春耕快要到来的时候，把毛岸英送到陕北农村，接受劳动锻炼，学习农业生产知识，熟悉农村情况。毛岸英走的时候，毛泽东嘱咐他：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学到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

去学另一半知识。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它就叫“劳动大学”。毛泽东还告诉毛岸英：你要老老实实地锻炼，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生活上不要有任何特殊，要多做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实际的调查，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情况，学习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在病休期间，毛泽东十分关心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他一再叮嘱阿洛夫等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作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当他了解到任弼时血压过高、血管硬化的情况后，十分担忧，几次催促他赶紧治疗。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毛泽东依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停战通告：

“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中国解放区各部队首长，各级政府同志们：

“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纵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需严格遵行，不得有误。”

“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在国共双方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并各自发布《停战通告》的同时，由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会议经过二十天的激烈争论。先后通过了有关军事问题、宪草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问题以及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重要协议，在一月三十一日闭幕。二月二十五日，由张治中、

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达成了《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国共停战了，政协各项决议通过了，人们无不额手相庆，期望着中国从此可以走上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康庄大道。

同全国人民一样，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中国从此能实现和平，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新国家。从这个良好的愿望出发，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也就是政协闭幕后的第一天，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这份指示，虽也提醒“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长期的”，要求全党“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但它着重强调的是“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示中说：“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认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狭隘的关门主义”，因而要求全党必须很好地克服那种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实现，以及不相信蒋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现民主改革，并能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

正在病中的毛泽东，修改、审定了这份指示，还尽可能地参与了许多重要决策。

二月四日，中共在重庆的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共方面参加宪草审议委员会和参加政府人员的名单，请求中央批复。二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了参加宪草审议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行政院的人员名单（因谈判正在进行中，这个名单暂时没有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毛泽东根据会议的决定，复电在重庆的代表团，告诉他们：（一）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博

古及何思敬五人为宪草审议委员。(二)国府委员仍照周恩来一月二十七日返延时议定的八人,即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为适宜,以便将来全党指导中心移至外边。第一次会议少奇可不出席。如范明枢不就,可提彭真。(三)同意以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个部长及不管部部长。可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殷切地期望着这次和平谈判能够取得成功,并为和平实现后参加政府作着认真的准备。

二月九日,毛泽东接见美联社记者时,对国共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发表了十分乐观的谈话。毛泽东说:政协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今后当然还有困难,但相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各党当前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活动,将无保留,出而参加。

三月六日,即《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字后的第十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精兵简政”的党内指示,对山东、华中和晋冀鲁豫三个军队员额最多、民众负担最重的地区,提出了分两期裁减兵员的计划,要这三个地区第一期精减三分之一的兵员,三个月内外完成,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对于晋绥、晋察冀两个战略区的兵员裁减问题,也作了进一步的布置。

但从二月份开始,国内政局却向着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国民党当局指使暴徒制造了一系列反对政协决议、反对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严重事件。

二月十日,也就是政协决议通过后的第十天,重庆发生了校场口事件,国民党特务以暴力捣毁各民众团体在校

场口广场举行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与会的各界著名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被打伤。庆祝政协成功的大会，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如此明目张胆的破坏。这件事向人们发出一个严重的信号：国民党根本没有诚意来实行政协决议。当然，对中国共产党说来，事态会如何发展，还需要继续观察。

二月二十日，北平国民党特务又以河北难民还乡请愿为名，纠集暴徒千余人，大闹军调部中共方面的办公室，侮辱殴打工作人员。

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在重庆制造反苏反共游行，并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多人。

三月一日至十七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为会议定下了基调，这就是抛开国家的民主化来谈“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对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妥筹补救”。会议根据这个调子，通过了一系列推翻政协决议案的决议。国民党以中央全会的方式公然破坏政协决议，这就进一步证实：前此发生的一系列暴行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国民党最高当局决策的先行步骤。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对此表示严正的态度。《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政协所决定的为全国人民所一致拥护的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原则，而继续坚持‘五五宪草’中的独裁原则。”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三月十八日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也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

三月二十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召开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鉴于近期内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四月一日，蒋介石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讲，公然宣称：“政

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可言”。前一点，是由蒋介石亲自出面，公然推翻政协决议。后一点，是表明他们要向东北的解放区大举进攻了。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七个军约二十五万人进入东北，其中包括曾在缅甸作战的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开始对中共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武装力量发动全面进攻；在关内，也频繁地蚕食、侵占解放区的城镇乡村。

一切事实表现，蒋介石决不甘心放弃他的独裁统治，决不会轻易改变他的反苏反共立场。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在一系列事实面前，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他在发言中对国际、国内的时局作了四点分析。在谈到蒋介石时，毛泽东说：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如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的这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为平静一点就忘了。二月一日到九日就忘了，校场口事件以后就不忘记了。”马歇尔能放长线，蒋介石也较何应钦不同。假如有一个放长线的，放半年我们就会忘了，那就危险得很。刘少奇在作总结时肯定毛泽东的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打起来，有了准备；不打，更好。”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在三月十五日和十八日先后发出了两份关于目前时局和对策的党内指示。前一个指示指出，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罪将展开。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CC系和何应钦等军人派，正企图破坏停战整军，借口东北问题，实行各地军事接收，想在马歇尔离华期间造成新的内战局面。“而这种阴谋，是蒋介石知道的，因此十分值得警惕”。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反动派的阴谋挑衅，“除开审慎



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除东北、热河外，各地第一期复员整军，不论时局变化如何，都应力争完成，以利于作长期打算。“减租、生产两件大事，一切地方须抓紧推动”，“务必在今年内获得空前巨大成绩，造成解放区不可动摇的群众基础与物质基础，不怕任何反动派的破坏。”后一个指示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和强调政协决议每一条每一句均须实现，反对修改。“在坚持实现政协决议、宪草原则，反对修改的斗争中，我们不要害怕破裂。事实上我们愈坚持不许修改，国方就愈不敢破坏。我们在精神上必须准备不怕分裂，不怕打内战，然后才能压倒反对派的破坏，并可能免于分裂。”指示再一次强调：“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

三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国民党修改政协决议和宪法草案原则致周恩来的电报上，加写了一段话：“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第二天他又致电周恩来，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很坏，我们应展开批评攻势，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

基于这些认识，从三月中旬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逐步加强对蒋介石集团的批评和揭露，加强各项应变准备。

怎样看待这一段历史呢？这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刘少奇说过一段话：在一、二月份，是糊



涂了一下。现在证明和平是不可能的了。但和虽不可能，谈判仍是必要的，因为人民要和平。毛泽东也说：在七大时，我们估计在日本投降后如果不克服蒋介石和中国的斯科比事件，中国的内战就不可避免。今年一、二月间似乎变了。后来还是证明七大估计是正确的。谈判是有成绩的，教育了人民，党内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毛泽东还举例说：“复员就吃了亏，部队不充实，减少了民兵。”

总的说来，中国共产党也好，毛泽东也好，虽曾一度对时局和平发展的估计偏于乐观，但并没有完全陷入对和平的幻想中，更没有因此而放弃人民手里的武装力量。到今年三月以后，随着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的行动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中共中央很快就总结了经验教训，而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的重点转到准备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上来，对复杂的事物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是不奇怪的。

随着蒋介石全面内战步伐的加紧，一九四六年三月以后，国内的军事形势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关外，就是指东北地区。这个地区东、北、西三面同朝鲜、苏联、蒙古接壤；南面，陆上同华北地区衔接，海上隔渤海同山东半岛相望，人口三千余万，资源丰富，重工业比较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撤入关内，东北人民从此陷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统治之下。东北军一批爱国将领，在民众支持下，自发地组织东北义勇军奋起抗击。中共满洲省委一面派人到各地义勇军中参加抗日，一面组织东北人民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三六年，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成东北抗日联军。后来，在日军重兵“讨伐”，“清剿”下，抗日联军一部分部队撤退到中苏边境地区活动，小部分仍在日本占领区内进行隐蔽斗争。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抗日联军配

合苏联红军作战，八路军在冀热辽边和山东的武装也迅速深入辽南。

毛泽东一向十分重视东北。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期间，他曾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中共中央并没有更多地派遣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就近组织部队挺进辽宁，配合苏联红军作战。中共中央还决定以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率千余干部先行进入东北，抓紧时机开展工作；命令原属东北军的山东军区万毅支队等向热河急进，待查明情况后准备进入东北。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二十六日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都谈了东北问题。他说：限于中苏条约，苏联不能直接援助我们。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军队去不去，还不一定。要看情况。

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根据获知的东北政治、军事情况，经同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后，制定了以发展东北和热察两省为中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立即决定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昼夜兼程急进，进入东北。

蒋介石同样十分重视东北。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取得了接收东北的法定身分。八月三十一日，他明令将东北三省划分为九省三市，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准备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接收政权。他在驻华美军帮助下，经海上运送军队登陆秦皇岛，向东北挺进，并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他还收编了伪满军及日军共二十余万人及大批土匪武装，要他们“保持武器”，“为自身安全而奋斗”。蒋介石对他的部下说：“东北不

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而是中国革命的归宿地。经过本党这三十年不断的奋斗，我们中国的革命已经快得到归宿了。希望各位在这最后成功的时候，格外奋起，格外努力，完此一策，以竟全功。”

一九四五年冬，苏方多次表示要将中长路及其沿线各大中城市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并要求中共领导下的部队迅速撤离这些地区后，刘少奇一再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告诉东北局：独占东北已无可能，东北局除部署一定力量力求插足长春路沿线及各大城市外，应以大部分力量分散到东满、西满、南满、北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以争取我在东北的一定地位。

十二月二十八日，病休中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而在靠近国民党占领区的游击区内，“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指示》强调：适应东北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作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全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必须“将正规军的相当一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这个极富远见的指示，明确了东北工作的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上中旬，美国以三十一艘运输舰把国民党两个军分别从九龙和越南海防运送到秦皇岛登陆，并连续攻占了已被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山海关和

绥中、锦州等北宁路上的要点。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后，蒋介石一面要求苏军暂缓自东北撤军，一面要求美方加大海运能力，加速运兵东北。到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包括热河方向在内，已有七个军约二十五万人的正规军进入东北，占领了沈阳以及鞍山、营口等城市，企图利用关内停战的机会，在关外大举进攻，力争消灭中共领导的部队，或把他们压缩到僻远山区，处于不利地位，再通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

陆续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没有赶到前，已在东北各地取得很大发展，并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同东北抗日联军合编，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一月十三日国共停战后，中共中央原来估计，东北地区在经过谈判后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争取在谈判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准备集中兵力“在我完全防御有利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因而要“不怕以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乘苏军已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军队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在三月中旬攻占四平，四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歼灭被国民党加委的伪满军和土匪武装三万余人。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已全部处于东北民主联军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托内线迎击大举北上的国民党军队的有利战略态势。

三月中旬，在中共谈判代表团的力争下，东北停战问题列入军事三人小组谈判的议事日程。三月二十七日，又达成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蒋介石不想在东北实行停战，坚持必须占领哈尔滨、长春、四平并控制中长铁

路后，才能谈停战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一面指令杜聿明指挥新一军和七十一军从沈阳地区北进，限令在四月二日前占领四平，再向长、哈、齐推进，一面请求美国再协助运送五万兵力进入东北。

刚刚恢复工作的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企图早已料到。他认为：苏军将于四月完成撤军。蒋介石必将部署部队自沈阳北进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不给向北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有力打击，东北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停战的，东北解放区后方也难以巩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经取得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领导人的共识后，定下了“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以争取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决心。

三月下旬，国民党新一军、七十一军自沈阳地区北进，在遭到东北民主联军顽强抗击，并在四平西南被歼一个师的大部后，于四月中旬逼近四平市区。这时，返国述职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已经返华，并提出东北停战方案。为了争取在有利态势下实行停战，毛泽东在四月二十六日致电林彪、彭真：“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21）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又多次致电林彪，指出：在停战前国民党军队可能继续发动几次猛烈的进攻；我军必须“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加强四平守备力量，并依据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态势，将主要力量部署在东起火石岭、西至八面城的百里战线上，同国民党军队对峙。五月十四日，国民党的增援部队新六军等也到达四平前线，并在第二天开始集中十个师兵力，采取正面进攻和两翼迂回相结合的战法，对四平发起总攻。参加这次总攻的，都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东北民主联军防守四平的部队虽经顽强抗击，仍不能挡住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势。

四平守军鏖战一个多月，伤亡已达八千多人，疲惫困乏，难以再战，加上防线左翼被突破，退路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于五月十八日致电中央，陈述理由，并于当日午夜组织部队撤出四平，分别向南满、东满、西满转移。十九日，毛泽东复电：

“一，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英勇顽强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二，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的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三，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则愈前进愈分散粮源愈困难，其力量必减弱下来。”（22）

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后，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北推进，先后占领公主岭、长春、德惠，直抵松花江南岸。但其势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再向北渡江进占哈尔滨。在这种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国共双方经过紧张谈判，于六月七日分别发表在东北休战十五天以便继续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东北出现了暂时休战的局面。

四平保卫战是在国共双方有可能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战役历时一个多月，东北民主联军共毙伤俘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给了他们沉重打击，使东北出现了从六月到十月的四个月的实际停战的局面。这就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使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在原来立足未稳的情况下，通过深入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在北满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国民党军队始终未能北渡松花江进攻北满解放区，使东北民主联军保持住了一块完整的战略基地。这一局面的形成，原因很多，但四平之战中守军以高度顽强英勇的精神使进攻的国民党军遭受重大损失，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从

这个角度看，四平保卫战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是有所得的。当然，四平保卫战是属于城市防御战性质，这并不是中共领导的军队的长处所在，而且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达到成建制地消灭敌人的目的。在四平保卫战中，东北民主联军伤亡达八千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关内调赴东北的骨干，使参战部队不得不撤向远离敌人的地区，以较长的时间进行整补。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是有所失的。所以中央军委和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的领导人都认为这是“一时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作战，不能成为“一般的作战方针”。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51年编印，第174页。

《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22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370、371、372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67、1174—117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67、1174—1175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13页。

《解放日报》1946年1月11日。

中共中央发渝台电，1946年2月6日。

《解放日报》，1946年3月19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3月15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46 年 3 月 15 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版，第 92、93、94、97、98 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版，第 92、93、94、97、98 页。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 年 11 月 21 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 年 11 月 21 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 年 8 月 23 日。

《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 152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1179、1182 页。

(21)中共中央致林，并告彭电，1946 年 4 月 26 日。

(22)中共中央致林，并告彭电，1946 年 5 月 19 日。



## 三十二、全面内战爆发以后

一九四六年六月，蓄谋已久的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终于发动了全面内战。

蒋介石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动这场内战，主要是由于他自恃拥有远较共产党方面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其中包括美国给予的大量援助，以为可以凭着这些力量很快地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

蒋介石当时的兵力，包括陆军的正规军、非正规军，海军、空军、特种部队以及后方机关、军事院校，总数达四百三十万人；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只有六十一万人的正规军（野战军）、六十六万人的地方部队（军区、军分区、县属武装）和后方机关人员，总数一百二十七万人。双方兵力的对比是三点三七比一。

蒋介石的军队，由于接收了侵华日军一百万人的武器装备，再加上美国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后给予的大量援助，装备先进、武器精良。他的正规军，约有四分之一是用美械装备起来的，一半以上是日械装备，四分之一是混合装备。他们不但拥有大量的炮兵，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坦克、作战飞机和海军舰艇。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却只装备有抗日战争时期缴自日军的各种步兵火器（主要是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以及极少数数量的山炮、野炮，没有坦克，没有飞机，更没有作战舰艇。

蒋介石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控制着全国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和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口，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军火工业也有相当规模。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却只有全国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和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除哈尔滨外没有一个大城市，经济上主要依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只靠肩挑、背

扛、大车拉、小车推，军工生产基础极为薄弱，只能制造远不能满足作战需要的机步枪弹、手榴弹、炸药以及极少数量的迫击炮。当时人们往往把这些自制的弹药加上一个“土”字，来说明它的技术性能之落后。

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大力援助，也是蒋介石敢于发动这场大规模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仅国共停战的一九四六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价值十三点五亿美元的各种物资。美国总统杜鲁门承认，美国在抗战胜利后给予蒋介石政府的物资援助，是抗战胜利前美国援华物资的两倍。美国前后为国民党军队训练了各种技术军官十五万人，重新装备了四十五个陆军师（旅），为空军配备了各类飞机九百三十六架，其中大部分是在抗战胜利后移交给国民党军队的。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又向国民党军移交了舰艇一百三十一艘。从日本投降后到一九四六年六月，由美国海、空军帮助输送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达五十四万人。大规模内战爆发前夕，美国国务院除向国会提出《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请求通过外，又着手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准备把储存在西太平洋的价值二十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五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国民党政府。

蒋介石对发动这场大规模内战充满自信。在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次会议上，他告诉他的部下：“我们军队的长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特种兵以及空军、海军，而共产党没有这些兵种。”他还提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声称“因为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而是他们匪军则绝对没有的”，因此“我们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战争是敌对双方实力的竞赛。面对国共双方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不能战胜蒋介石军队的大

规模进攻？这是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首先需要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作出回答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已成为解放区军民心目中感到忧虑的中心问题。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信中，明确地指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

面对这个重大问题，毛泽东是怎样考虑的？他充分看到蒋介石在军事、经济力量方面所占有的优势，尤其是美国大力支持这个优势，这是一个方面；但他坚持对事物采取分析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清晰地看到蒋介石存在的种种弱点和自己的种种优势，尤其是革命力量在八年抗战中取得的巨大发展，已远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可比。

正是根据对双方力量对比的这种清醒的认识，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第二个月，也就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他对前面所说的这个重大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怎样去“战胜蒋介石”呢？毛泽东提出几条基本的指导方针：

在军事方面，他强调两个要点：一是“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为了打好运动战，他指出：“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

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二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当着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他指出这种方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这是“我军必须特别强调的”。

在政治方面，他要求“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并为此规定了党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和在国民党军队中必须团结、争取、孤立的阶级、阶层和人员。

在经济方面，他要求“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约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要“努力生产”，要“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要“艰苦奋斗，军民兼顾”。

单单这些还不够。为了使人们认清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树立起必胜的信念，需要提出一个简单明了、使人一听就明白并能记住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毛泽东向正在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斯特朗是一位美国籍的进步女记者。一九四六年年初她从旧金山来到上海转往北平，接着乘军调部的飞机到达延安采访。她在延安住了几个星期，同各界人民和中共许多领导人广泛接触，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已有相当的了解。

八月六日下午三时，延安雨后初晴。在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斯特朗见到了毛泽东。陪同她去的，一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一个是长期在延安工作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担任临时的翻译工作。听到斯特朗来了，毛泽东走出窑洞门口，来到院里欢迎。为了表示对客人的礼貌，他那天特意穿了件稍好的蓝布衣服。他们一起坐在窑洞前苹果树下的一张石桌周围，娓娓而谈。

毛泽东是不放松任何一个机会来作调查工作的。他先向斯特朗询问了许多美国国内的情况。斯特朗惊奇地发现：“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得比我还详细”。接着，毛泽东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问题。他谈话的中心点，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列举俄国沙皇和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反动力量从表面上看是强大的，可怕的，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从本质上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当斯特朗问到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看法时，毛泽东爽朗地回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原子弹当然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最后又谈到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他十分坚定地告诉斯特朗：“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吃饭后，他们又接着谈下去，直到午夜。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的论断，一提出来，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一九六一年，斯特朗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这篇文章中，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起这次谈话。文章说：“毛主席是十四年前在延安时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现在这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这次谈话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谈话开始后不久，斯特朗发现附近二十多米的草丛中有响动，吃惊地问：“那儿有谁？！”“是另外一家老百姓家的孩子”，毛泽东笑着回答：“他大概是对我的外国客人产生了好奇心。”这件小事给斯特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四年后她回忆说：我很少见过这样能和周围环境打成一片的人。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也就是蒋介石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前夕，毛泽东对国内形势作了如下分析：“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根据这个判断，毛泽东得出结论：“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

全面内战成为事实后，七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又进一步指出：“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在东北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在又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将来亦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可见，即使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初期，直到这时，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仍在力争实现国内和平的局面，进行自卫战争的目的仍是为了恢复国内和平。

怎样去争取自卫战争的“大胜”呢？鉴于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决心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南线和北线分别组织几次强大的攻势，歼灭大量敌人，扩大解放区，以此逼迫蒋介石知难而退，恢复国内和平。根据这个决心，他在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和各战略区领导人多次磋商后，通盘筹划，拟定出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经过实践中的探索，后来都作了比较大的调整）。

在南线：

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下的中原军区李先念、郑位三部以“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为基本行动目的，立即组织突围。由于中原军区东部的鄂东、皖西是国民党预有准备的筑垒地带，北部则东西向的河流较多，在国民党军队堵截下不易渡越，向西虽也有国民党军堵截，但地域广阔，便于机动，便于就粮，而且鄂西北、豫陕边地形复杂，高山峻岭，便于分散坚持，如果情况十分紧张，还可分向陕南、湘鄂川边突进和向陕甘宁解放区、太岳解放区转移。根据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批准了中原军区的建议，决定他们除以一部分部队就地坚持，一部分部队以苏皖边解放区为目的地向东突进外，主力三万多人分两路西进，越过平汉路，直趋鄂西北及豫陕鄂边地区。

在毛泽东考虑中的南线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在全面破裂后准备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五万人、山东野战军主力五万余人、华中野战军主力四万人，分别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和蚌埠、浦口段及其东侧地区，在野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上述作战胜利后（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可考虑以晋冀鲁豫和山东两军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挺进。这是一个大

踏步挺进的计划。毛泽东指出：“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计划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如能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

在北线：

提出了一个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准备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和晋绥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而将冀东、热河作为钳制方向。毛泽东向华北部队提出：“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这个计划的实施次序，后来在设想中又演变为：第一步夺取大同，控制同蒲北段；第二步夺取平汉北段，相机占领石家庄、保定；第三步转用主力于正太路，相机占领太原。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所有对平汉、同蒲、正太三路之进攻，均是攻城战，望立即训练攻城技术，多备黄色炸药。”

除了作出上述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外，毛泽东还要求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本着“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奋斗去取得和平的总方针”，抓住停战时机，通过加紧进行军事、政治、群众工作多方面之准备，以“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而在目前则应采取“敌不攻我，我亦不攻敌，保持平静”的方针，以争取时间。他十分强调东北应准备持久战争，提倡自力更生，告诉即将去苏联治病的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苏方“作任何要求”。



在从事军事部署的同时,毛泽东仍力图以战争胜利来谋取恢复国内和平。他从“大概半年之后又可能和”的估计出发,要求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按照“继续争取长期全面和平的方向去进行工作”,并指出:“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

大规模内战的战火,首先在中原地区燃烧起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行营所属的八个整编师另两个旅共三十万人,在武汉、西安两地空军直接支援下,向中原军区部队集结的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方圆不足百里的地域发动进攻。中原军区主力按预定部署分两路向西突围,于二十九日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线合围圈,越过平汉铁路,摆脱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克服重重困难,于七月底八月初分别进到陕南和鄂西北地区,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其中,由王震率领的第三五九旅,在八月底回到陕甘宁边区。

中原军区主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对各解放区起了重要的屏障作用,为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争取了时间。因此,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胜利突围和王震部回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十分欣慰,多次致电李先念、郑位三加以慰勉,指出这是战略上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九月三十日,毛泽东还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欢迎会,欢迎归来的三五九旅指战员。

“慎重初战”,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作战原则,在重要战略转折关头更是如此。在组织中原部队突围的同时,他密切注视着南线敌情的变化,不断同南线各区领导人磋商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计划,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调整。

在这个计划拟定后的短短几天中,他接到周恩来从南京发来的国民党军队即将向各解放区、特别是苏中和苏北

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重要情报，又先后接到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六月二十七日的电报，以及华中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会商后于二十九日联名发出的电报。这两份电报列举苏中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后，建议在津浦路作战的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主力仍留置苏中迎击来犯的敌军，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争取先在内线打一、两个胜仗，而以一部加入津浦路作战；待津浦路作战进入晋冀鲁豫、山东两军渡淮作战的第二阶段时，华中野战军主力再加入这个作战序列。六月二十八日，陈毅、舒同也致电中央和刘邓，分析了南下淮北、淮南作战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建议淮北、淮南两地的野战军仍应各自独立作战，山东、太行、华中各军仍沉着应变，作充分准备，以便大举。

毛泽东审慎地分析了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全面进攻的形势，认为这些建议“似有理由”。他当机立断地先后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致南线各战区领导人，对南线作战部署作了调整，指出：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我军要“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宁周午文称：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毛泽东还告诉他们：“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

显然，“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对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然后渡淮而南的外线出击计划是一个重要修改。从毛泽东的几个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作出这样修正有两个好处：一是“在政治上更为有利”；二是便于“看出敌人弱点”。这两点，正是战争指导者在战

争初期必须充分把握的重要原则。根据毛泽东确定的“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方针，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分别在苏中战场、淮北战场和豫皖苏、鲁西南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较著名的战役有：华中野战军遂行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一个半月中间歼灭国民党军六个旅；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定陶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及另两个整编师各一部。随着内线作战的不断取得胜利，毛泽东一再推迟原定的外线出击的时间，要求南线各军在内线更多地歼灭敌人，为尔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在北线，毛泽东拟定的半年内外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经过一段曲折的实践过程后，也由他作了重要修改。

早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旬，为了报复山西阎锡山部对太岳解放区的进攻，并为此后迎击傅作义部可能向绥东地区的进攻，晋绥军区并指挥晋察冀军区一部分部队，已在同蒲路北段发起晋北战役，连克崞县、五台、原平、定襄等城，孤立了大同。随后，根据毛泽东拟定的“三路四城”计划，晋察冀军区主力自平汉路西调，会同晋绥军区部队准备夺取大同。

毛泽东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决策，但对这样一座经过日军长期设防的工业城市能否攻克仍抱着审慎的态度。当得知晋察冀军区部队迟迟未能攻克大同外围的应县后，他立刻致电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和副政委刘澜涛，询问他们：“应县久攻未下，你们对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当估计到。”

为了答复毛泽东的询问，大同前线在第二天召开有各纵队领导人参加的阳高会议进行研究。八月三日，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了会议的结论：“一致认为攻占大同对今后

各方执行任务均为有利。”“大同（敌）总兵力不强，但工事坚固是它的特点，故须在技术上充分准备方可奏效。”“对大同拟强攻及坑道进行，我们与晋绥已有一些准备，并继续加强中。”这样，首先夺取大同的决心就确定了下来。

八月十四日，大同攻城战正式发起，但部队伤亡很大，进展缓慢，到九月四日才肃清城周各据点和城关。从九月三日起，傅作义部以主力东犯集宁，增援大同。攻城指挥部调转主力还击傅部，又因各种原因，不但未能达到歼敌目的，而且集宁失守，大同亦难再攻。攻城部队只能在九月十六日从大同撤围，转入休整。

大同、集宁之战，是北线人民解放军的“初战”。此战先后歼敌八千多人，并使部队经受了锻炼，但没有能实现预定的夺取大同的目标，对以后晋察冀战场的形势发展影响很大。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于这个战役的失利原因作过这样的评述：“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装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在当时装备很差的条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后打强的。”

大同撤围后，解放军控制的华北重镇张家口已处于国民党军队从集宁和北平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中。九月十六日和十七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根据实际情况，先后两次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对张家口只作“掩护战斗，不作坚守”，而以军区主力集中于张家口、南口之间寻歼可能由北平西犯之敌的建议。毛泽东总结了大同失利的教训，在十八日复电批准聂、萧的建议，并指出：“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每次歼敌一

一个团二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十个至十五个团即有可能歼敌一个旅(两个团)。”这样,毛泽东就已在实际上改变了“四路三城”的计划,而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了。

人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常常需要有一个过程。南北两线初期作战的实践,为毛泽东提供了许多新经验,使他对指导作战的认识有了发展和变化,主要是:在敌强我弱的基本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只有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实行内线作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兵力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缩小双方力量对比的差距,才能最终改变战略上敌攻我防、敌主动、我被动的不利态势。

一九四六年七月到十月,是全面内战爆发后的最初的四个月。它在解放战争历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在全面内战开始时所作“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这种预测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用什么方法去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战争的发展过程和结局会是什么样子?这一连串问题,经过头四个月战争实践的反复探索,已经从事实中得到初步的回答。

在四个月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三十二个旅,其中包括一部分美械装备的部队,连同被歼灭的非正规军,总数达三十万人。其中,起义、被俘的和毙伤的约各占一半。四个月中,人民解放军损失兵员十二万人,其中负伤的占九万多人。国民党军队的损失是解放军的二点四倍。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大多转为人民解放军战士,成了人民解放军兵员的重要来源之一;人民解放军方面虽也有被俘的,但为数甚少,仅占兵员损失的百分之三左右,即三千多人,而国民党军队没有也不敢将他们补入部队。二是解放军损失的兵员中,约百分之八十属于负伤,负伤人员中又有大约百分之八十治愈后仍然回到部队,而国民党军方面很少有

伤愈归队的。所以 ,双方头四个月实际损失兵员数的对比 ,远远不是三十万对十二万。

在四个月战争中 ,国民党军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一百五十三座 ,其中包括张家口、菏泽、淮阴、安东 (今丹东 )这些当时解放区的中心城市。解放军方面只收复或攻占了四十八座县城 ,得失相较 ,解放军丢失了一百零五座县级以上城市 ,包括大片土地。

四个月战争 ,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兵力不足同他的企图过大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共有正规军八十六个整编师 (包括未经整编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 ,战争第一个月即一九四六年七月 ,动用了六十八个师、一百九十三个旅 ,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二十六个师七十二个旅。到战争第四个月即一九四六年十月 ,蒋介石动用的兵力增加到七十三个师二百零九个旅 ,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四十三个师一百一十七个旅。这就是说 :一 ,蒋介石作为战略预备队而留置在后方的兵力 ,已由战争初的五十五个旅减少为三十九个旅。二 ,在投入内战前线的二百零九个旅中 ,不得不以百分之四十四的兵力 ,即八十二个旅 ,用于“清剿”他们日益扩大的占领区 ,相应地减弱了用于第一线进攻的机动兵力。

这就是经过四个月战争后军事形势的基本状况。

怎样看待这一形势 ?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蒋介石认为自己进行的是“现代作战”。他的根本观点是 :“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 ,无交通就无政治动脉” ,所以 ,“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 ,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控制都市”。从这个观点出发 ,他要求部队“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 ,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而成为“流寇” ,然后加以“清剿”。现在 ,在占领解放区一百零五座城市后 ,他以为自己已取得重大

胜利，他的战略目的已接近实现。因此，在十月十日便下达恢复征兵制的命令。十月十一日，也就是占领张家口的当天，就宣布在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出任“总统”。不久，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下达了进攻延安的命令。这样，蒋介石就完全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但是，一贯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而特别重视打歼灭战的毛泽东，却从这些数字中得出了同蒋介石恰好相反的结论。

还在十月一日，毛泽东全面总结了三个月战争实践的经验，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指出：

“七月二十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

“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向解放区进攻的全部正规蒋军，除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不计外，共计一百九十几个旅。此数以外，至多再从南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后即难再调。而此一百九十几个旅中，过去三个月内，已被我歼灭二十五个旅。”

“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一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



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欲达此目的，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外，继续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的伟大成绩，再歼敌二十五个旅。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

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又第一次提出了在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变化后，人民解放军将转入战略进攻，而实现这种战略转折的关键在于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和谈的大门已被蒋介石完全关死，中国人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经过战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才能在中国获得真正的和平。这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他从抗战胜利后一年多来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它对中国共产党下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去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根据这个判断，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国民大会”召开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要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立即返回延安，南京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数人同国民党继续保持某种接触。

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向全党指出：

“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



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指示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来代替前一阶段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这不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变换；毛泽东是把它同蒋介石“自走绝路”连系在一起的。在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以后，毛泽东又观察了四个多月。随着蒋介石不顾一切地攻占张家口和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国内和平已经不再可能，客观形势迫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以战争为手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结束了同国民党历时一年多的谈判，率中共代表团多位成员回到延安。谁都看得出来，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已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关头。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毛泽东接着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他是不允许共产党在保持一块地方的条件下签订城下之盟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战争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毛泽东指出：过去几个月内消灭了国民党军三十八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可能的，也是能够改变战局的。毛泽东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画了一张大致的蓝图，说：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

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大约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达成这一目标。毛泽东还指出：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些，我们不但要准备三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到十五年。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对于现在是不是要马上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毛泽东主张可以按这个目标去做，但不必急于提出这个口号。

一个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推动下，在全民、全党、全军的奋力拼搏下，很快就要到来了。

《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58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7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86、1187页。

中共中央致刘邓薄，贺李，聂刘，并告陈舒电，1946年6月19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86页。

中共中央致刘邓薄、陈舒电，1946年6月22日。

中共中央致聂萧刘罗，并告子华电，1946年6月28日。

中共中央致林彪电，1946年7月11日。

中共中央致罗荣桓电，1946年7月30日。

中央军委致刘邓，陈，华中局电，1946年7月4日。

中央军委致陈张黎，刘邓薄，张邓粟谭电，1946年7月13日。

中央军委致聂刘，并告贺李电，1946年8月1日。

《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版，第 628 页。

中央军委致聂萧刘罗电，1946 年 9 月 18 日。

《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 159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1205、120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1219—1220 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 年 11 月 21 日。

### 三十三、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在决心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指挥作战上来。怎样作战才能取得胜利？他从战争初期的实践中获得的最重要的认识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时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因此，他要求各级指挥员不论在战役上或战术上，都必须切实运用这一作战方法，而且“必须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强调指出：只有这样彻底大胆地集中兵力，“方能有效地歼敌”。

各战场的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继续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机动灵活地实行内线作战，不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取得重要胜利。其中集中兵力比较多，战役规模比较大，因而歼敌数量也比较多的是华东战场。

华东地区，包括山东和苏皖两大解放区。四个月来，国民党军队由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以损失八万人为代价，攻占了苏中、淮南、淮北地区和鲁南解放区的部分地区，打通了胶济铁路，对苏北和鲁南形成一个长达一百五十公里的弧形半包围态势，并对联结苏鲁的枢纽——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构成直接威胁。

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淮北和苏中战场上歼灭敌军一部分有生力量的同时，逐步收缩后撤，于九月十九日放弃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两军会师于淮阴以北，进行休整补充，准备再战。

这两个野战军的会师，集中了将近十万人的兵力，力量相当雄厚，为下一步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准备了必要条件。但此时，在东台到峰县的弧形战线上，国民党的徐州

绥靖主任薛岳配置着四个作战集团二十五六个旅约二十余万兵力，不断发动攻势，不但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场上都掌握了相当大的主动权。要大量歼敌，困难极大，形势是严峻的。

毛泽东认为，改变战局的关键，仍在争取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时主要要靠华东、晋冀鲁豫两大主力的协同作战。因此，他要求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并指出只要达成这个任务，“就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根据这个设想，毛泽东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频繁磋商，强调：

一，山野、华野应集中作战，开展战局，“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

二，会师后的第一仗必须打胜，因此要慎重选定歼击目标，掌握战机，精心组织。

三，为保证行动的一致，山野、华野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建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毛泽东还告诉陈毅、粟裕、谭震林以及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领导人的“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因此“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战机”。

四，部队集结休整的地点应选择在距敌较远的地区，以便诱敌深入，造成可乘之机，然后集中全力加以歼灭。

五，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主要以拖住国民党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以缓解华东作战的困难。

这些意见，尤其是集中两个野战军在一个方向作战、实行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主张，体现了毛泽东在战争逐步向解放区中心推移时怎样打大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对华东

解放军以后的作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军队采取了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行动谨慎，力戒冒进，在十、十一两个月中，只对苏北、鲁南地区进行了若干次有依托的、规模不大的短距离进攻。所以，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基本上仍处于分别迎击敌军的状态，各自进行了几次以歼敌一旅左右为目标的战役，共歼敌约三万人，并没有能立刻实现预期的大规模歼敌的目标。

十一月中旬，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大会”开幕。为了给这个会议壮声势，蒋介石决定从郑州绥靖公署的序列中抽调精锐主力整编第十一师改归徐州绥靖公署指挥，命令薛岳立即组织一次对苏北地区的大规模攻势，并限定在攻势发起后半个月内“结束苏北战事”。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徐州绥靖公署拟定了一个以二十五个半旅约二十万人分四路会攻苏北的作战计划：以五个旅由东台向北进攻盐城、阜宁；以五个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由淮阴北攻涟水；以六个半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由宿迁分向沭阳、新安镇进攻；以九个旅，其中包括机械化装备的第一快速纵队进犯临沂。四路中，又以从宿迁和淮阴出犯的两路为主力，企图迫使华东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在苏北的狭小地区同它决战，或北移山东。进攻行动统一在十二月十三日开始。

这时，放在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哪一路国民党军队作为首先集中打击的对象。十二月六日，陈毅得到整编第十一师正向宿迁开进，准备会同在宿迁的整编第六十九师进攻沭阳，以及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将同时配合行动的情报后，立刻向中央军委提出了集中主力首先歼击宿迁出犯之敌的初步构想。十二日，粟裕自盐城前线北进，同陈毅见面。在陈毅主持下，召开包括华中军区领导人在内的作战会议，最后确定歼击宿迁

出犯之敌的决心和部署，一面组织部队开进，一面上报军委。十五日，毛泽东迅速批复了陈、粟的部署，并要求他们：“情况望随时电告。”

十二月十三日，从宿迁出发的国民党军队六个半旅分两路向北、向东，以新安镇、沐阳为目标发起进攻。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立刻按照陈、粟的部署，在第二天晚上隐蔽地向战区开进。十五日晚由山野参谋长陈士榘指挥的右路军突然向处在对方左路的整编第六十九师三个半旅实行穿插合围；而以一部分主力楔入整编六十九师和十一师之间的结合部，把它们分割开来。经过两天激战，在十九日上午全歼整编六十九师，该师中将师长戴之奇自杀。整编十一师星夜撤回宿迁。这一仗通常称为宿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二万多人，是山野、华野会合后共同进行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歼灭战。它对以后这两支野战军汇集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来实现毛泽东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意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战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毛泽东先后发出两份电报，在表示祝贺的同时，又向他们提出下一步的任务，那就是集中主力进行鲁南战役。电报说：“此战胜利，整个苏鲁战局好转。涟水暂失，将来可以收复，也一定要收复。但第二步作战似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峰、枣、台，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收复苏中、苏北一切失地。”在刚打完一场大仗后，立刻提出这样的任务，实行起来自然很不容易，因此，毛泽东告诉陈粟：如指战员感觉久战疲劳及伤亡过大，则应鼓励士气，并将部队就火线上编并，以利续战。

宿北战役后，宿迁和峰枣的国民党军队已转入防御，但由淮阴、淮安、东台出犯的整编七十四师等部在占领盐城、涟水后，正继续向北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华东人民解放军下一步的作战方向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南下迎歼

正在北进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二是渡过运河，西出淮北，以调动运河以东的敌军回援运河以西，求歼援敌；三是回师歼击鲁南之敌。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毛泽东告诉华中、山东领导人：只要有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十二月二十四日，陈毅、粟裕最后下定了以迅速的动作回师，求歼鲁南敌军，解除后顾之忧，再行南下的决心，并上报军委。这正是毛泽东的意图所在。二十五日，毛泽东批准陈、粟这个决心，告诉他们：“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要求他们集中主力并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第一仗以先打鲁南敌军主力整编第二十六师为宜，以争取全局好转。

根据这一决心，陈毅、粟裕等置淮阴、涟水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北进于不顾，集中主力星夜隐蔽北上，会同原在鲁南的部队，在一月二日发起鲁南战役。历经十八个昼夜的激战，这个战役在一月二十日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一快速纵队以及整编第五十一师，计两个师部、五个旅共五万多人，俘虏中将师长马励武、周毓英以下三万六千多人，缴获一百零五毫米榴弹炮四十八门，山炮、野炮四十一门，坦克二十四辆，汽车四百七十四辆，使华东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得到很大改善，完满地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任务，取得在鲁南打“更大的歼灭战”的胜利。

鲁南战役结束后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二月一日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

这个指示明白地宣布：“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



胜利而斗争。”他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目前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同时，蒋介石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指示中说：“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问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

政治局进行讨论时，毛泽东说：发这个指示很需要。这种文件，去年还不能发。总的形势，是说革命高潮要来了。这种革命高潮在半个世纪中只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抗日战争。“革命动力是两个战线，解放区与蒋管区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胜利愈大，高潮来得愈快。”他又说：“我们的文件没有塞死和平的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推翻蒋介石的口号。”会议快结束时，他再一次发言，提出要“使一切没有土地的人有土地”。他说：土地政策是不是可以早几年解决？可以的。“现在解决也可以，如果太迟，要犯很大错误。”他谈到：革命胜利的时间，还要准备相当长，五年到十五年，五年已过了一年半。这个指示在干部中应该普遍散发，但不公开发表。

这是中共中央根据一年多来的形势发展，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快要到来了。

鲁南战役后，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关于集中统一以打更大规模歼灭战的要求进行合编，组成华东野战军，下辖十一个步兵纵队，并用从国民党军手里缴来的大量火炮、坦克、汽车和俘获的技术兵组建了一个特种兵纵队，全军共二十七万人；并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精心筹划，继续实行内线作战。华东野战军主力出敌不意地隐蔽北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突然发动了莱芜战役，一举歼灭正从莱芜大举南下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第七十三两个军六个师及第十二军一个师共七

个师（旅）五万六千多人，活捉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和中将军长韩浚，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准备在山东战场上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计划。接着，华东野战军主力又掉头向南。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到十六日，在鲁中的孟良崮山区一举全歼骄横不可一世、被誉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战场上取得的改变战局的巨大胜利，表明解放军的战斗能力已得到明显提高，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混乱。

在精心组织指挥华东人民解放军不断歼敌的同时，毛泽东还筹划了在其他战场上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的战役。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人民解放军即将结束战略防御而转入战略进攻之际，毛泽东在为新华社起草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社论中写道：

“蒋介石的军队，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打了败仗。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共计十一个月中，仅就其正规军来说，即已被歼灭约九十个旅。不但去年占长春、占承德、占张家口、占菏泽、占淮阴、占安东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没有了，就是今年占临沂、占延安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也没有了。蒋介石、陈诚曾经错误地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法，以为退却就是胆怯，放弃若干城市就是失败，要想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但在十个月之后，蒋介石全部进犯军已经深入绝境，被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所重重包围，想要逃脱，已很困难。”

这时，为了摆脱战线日益延长而兵力日益不足这种被动的困境，蒋介石已缩小进攻的正面，在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战场上改取守势，而抽调兵力加强到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上去，力图先控制这两个地区，再集中兵力解决华北和东北。当山东战场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的同时，

蒋介石发了狠心，严厉要求部属一定要对“匪军老巢”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

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被誉为“革命圣地”。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吸引着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而成为蒋介石集团的眼中钉。

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旬，蒋介石将握有重兵、长期坐镇西北、围困着陕甘宁边区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召到南京，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基本设想。二十八日，他又飞到西安，召集西安军政负责人开会，研究确定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三月十一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旅以上军官参加的作战会议，传达西安会议的决定，确定在洛川组织前进指挥所，统一指挥西安绥靖公署（由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改称）所属各部的进攻行动。

国民党军队用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共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人。基本部署是：以胡宗南直辖的十五个旅由宜川、洛川向北推进，担任主要突击；并以五个旅维持后方兼充战略预备队；以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等部自甘肃、宁夏向东南，以邓宝珊部自榆林向南，担任辅助突击。企图一举攻占延安，摧毁中共中央，或逼迫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再在华北同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

当时，在陕北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只有正规军一个纵队（辖两个旅），还有两个旅，加上三个兼警备区（军分区）的地方旅，全部兵力约三万人，同进攻的国民党军相比，兵力上装备上都居绝对劣势。形势十分严峻。

在得到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后，毛泽东召开了几次中央会议，对局势作了分析：蒋介石这次进攻，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显示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都已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中。为了抽调兵力组织这次进攻，胡宗南在右翼的山西地区只留置四个旅，协同阎锡山进行防御，在后方的陇海铁路以及从西安

到兰州的公路上兵力也很空虚，完全是“孤注一掷”，“带着慌乱精神”。毛泽东正确地作出判断：蒋介石组织这次进攻的军事企图是“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定下了“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决心，并据此确定：急调晋绥军区第二纵队王震部（两个旅约万人）自吕梁地区西渡黄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军序列；西北人民解放军必须从长期战争着眼，依靠自身的力量部署一切；在当前，应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同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的困境，然后乘机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歼击，以达到钳制并逐步削弱胡部，从战略上配合其他解放区作战，最终夺取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目的；驻延安的党政机关及群众立即紧急疏散。

三月十日，在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已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毛泽东派彭德怀到南线视察部队的战备情况，并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三月十二日，朱德、刘少奇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自枣园北上子长县的王家坪，毛泽东、周恩来搬到延安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办公，并在这里听取了彭德怀关于南线情况的汇报，当场研究决定由彭德怀和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到前线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由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

为什么毛泽东要主动放弃延安？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道：

“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三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

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 Q 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对当地的老乡，毛泽东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道：

“譬如有一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这个仗怎么打？他把刚调到延安的新四旅政委黄振堂、副旅长程悦长、团长袁学凯等找到王家坪住处谈话时，对他们说：“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敌人，因此，

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好比你面前有三个敌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一个强的，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我们这次打仗，采用蘑菇战术。你们的任务，是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使他们疲劳饿饭，再寻机会歼灭它。一个月歼灭它几个团，过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毛泽东还谈到自己准备留在陕北。他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担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

三月十一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刚撤离后七小时，国民党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十七日清晨，西安绥靖公署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指挥两个整编军十五个旅十四万人开始向北进攻。国民党飞机四十五架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进行大轰炸，投下五十九吨炸弹，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有一颗重磅炸弹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前面爆炸了，气浪冲进居室，冲倒了桌上的热水瓶，毛泽东仍然若无其事地在批阅文件，不说什么时候离开延安。

十八日，延安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基本上疏散完毕，延安城里也已可听到清晰的枪炮声。毛泽东和周恩来仍在王家坪窑洞里同刚自晋绥赶到延安的王震谈撤离延安后的作战方针问题。枪炮声越来越近了，别人劝毛泽东早些走，

他说：“走这么早干什么？我还想在这里看看敌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和王震一直谈到黄昏，要彭德怀告诉阻击部队立即撤出阵地，并和周恩来、彭德怀察看了王家坪的几孔窑洞，叮嘱道：“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才同彭德怀分手，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十年的延安。

他们的车队经飞机场、桥儿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西南的刘家渠。接着的几天中，又经过子长县的徐家沟、高家岭、任家山，在二十五日到达子长县的王家坪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在这里，毛泽东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山西文水县年仅十五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敌人面前英勇就义的事迹，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二十七日，他就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的问题同刘少奇等交换意见后，在当天致电晋绥的贺龙、李井泉，告诉他们：“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二十八日，周恩来去晋西北布置后方工作，毛泽东、刘少奇等率一部分机关人员转移到清涧以北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于二十九、三十日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随后，四月十一日，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八百人组成四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由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郑位，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



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直属司令部”以“九支队”为代号。

胡宗南的部队在三月十九日占领延安后,蒋介石兴高采烈地庆祝了一番,还授予胡宗南“二等大绶云麾勋章”,要他立刻指挥军队对陕北进行“清剿”。

胡宗南命令部队在延安地区略事整顿补充后,以主力向安塞方向挺进,寻找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而以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率部向青化砭方向担任右翼侧掩护。他们根本不知道撤出延安的人民解放军主力此时正在何方。彭德怀、习仲勋得到这一情报后,决心集中主力在青化砭伏击担任右翼掩护的李纪云部。二十二日,这个计划得到毛泽东批准。二十五日,李部进入解放军设下的口袋。伏击部队立即迅速出击,经过一小时四十分钟的战斗,全部歼灭了这股敌军,共毙俘二千九百多人,旅长、副旅长、参谋长、团长都当了俘虏,伏击部队只伤亡二百六十五人。这是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二十六日,毛泽东高兴地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重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青化砭战斗后,胡宗南才发现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山区,立刻部署部队转向延川、清涧挺进,准备“先切断黄河各渡口,尔后向左旋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毛泽东分析了胡军这一行动,认为现在的关键是“不怕胡军北进,只怕胡军不北进”,因此一面告诉彭德怀、习仲勋应避免同胡军作战,除以一部分部队同它周旋外,主力应隐蔽集结在机动位置待机;一面致电陈赓、谢富治,要他们推迟几天再发起晋南攻势,以便让胡军放胆北进。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只要胡军北进,钻入延安、子长、清涧、延川之间的山沟里,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发挥自己荫蔽精干、灵活机动的特长,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和



群众条件，饥疲饿困敌人，然后寻机各个歼灭敌人。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意图，彭德怀在青化砭战斗后，用小部队不即不离地吸引胡军在千山万壑间游转了十二天，行程四百余里，使胡军疲困，一无所获。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作了这样的描绘：胡军“以十个旅组成横直四五十里左右之方阵，不敢走大路，专走小路，攻安塞，攻两延，攻瓦窑堡，到处扑空，现已显现疲困，逃亡颇多。我军仍在待机击敌。”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向彭德怀、习仲勋等发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指出：“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军自歼敌第三十一旅后，虽未大量歼敌，但在二十天中已经达到使敌相当疲劳和相当缺粮之目的，给今后使敌十分疲劳、断绝粮食和最后被歼造成有利条件。”“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这以前几天，总部电台截获一个重要情报：驻清涧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八师二十四旅的一个团将赴瓦窑堡接防。据此判断：原驻瓦窑堡的整编第一三五旅将沿公路南下。毛泽东立刻致电彭、习，要他们“乘该旅移动途中伏击之”。彭、习迅速作了部署。十四日八时，整编一三五旅果然离瓦窑堡南下，十时左右进到羊马河以北，早已在此设伏的解放军立刻迅猛出击，激战八小时，全部歼灭该旅，毙俘少将旅长麦宗禹以下四千七百余，取得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二个胜仗。

羊马河获胜后，毛泽东致电彭、习和其他战略区，指出：“接彭习寒亥电，继寅有在青化砭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后，卯寒又在瓦窑堡附近将敌一三五旅（属一五师建制）全部歼灭。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

歼灭第一三五旅后，西北人民解放军迅速撤离羊马河战场，进入山区，隐蔽休整。胡宗南军主力又经过几日“游行”，数度扑空，携带的给养耗尽，疲惫饥困，不得不回到蟠龙基地进行休整补充。此后不久，国民党军的飞机侦察，发现有解放军部队东渡黄河进入晋绥地区（其实只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一部分工作人员东渡）。根据这个错误判断，蒋介石要求胡宗南以主力沿咸榆公路向绥德挺进，并命令榆林邓宝珊部南下配合，企图封闭黄河渡口，乘机消灭渡河中的解放军。四月二十六日，胡军主力九个旅从蟠龙、永坪分两路向绥德北进，邓宝珊部由榆林向米脂、佳林出动策应。

密切注视着战场情况变化的彭德怀，认为良好的战机出现了，立刻在四月二十七日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并提出：“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引者注：指瓦窑堡）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毛泽东在二十八日六时收到这份电报，立刻复电批准，并且告诉他：“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

蟠龙是胡军的重要补给基地，工事坚固。守军整编第一师第一六七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连同地方部队，守备兵力达七千人。这一仗关系西北全局，很可能是个硬仗，和前两次的伏击不同。因此

毛泽东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三十日，他又致电彭、习：要他们“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

蟠龙之战能否成功的关键在能否于胡宗南援军赶到前取得从事攻坚作战所必需的时间，而这一点又决定于援敌的距离，胡部主力距离蟠龙越远，所需时间就越有保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善于用兵的彭德怀立刻作出周密部署。他以第二纵队的三五九旅为主，又从其他各旅中每旅抽调一个排，伪装成野战军主力，沿咸榆公路同胡军保持接触，缓缓后撤，并在沿途遗弃一部分军需物资，造成狼狽溃退的假象，使追击的胡军敢于放胆北进（到蟠龙战斗打响后，这支伪装主力的部队又可以转过来担任对胡军主力的阻击任务）。野战军主力则隐蔽集结在蟠龙周围，进行攻坚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发动攻击。

五月二日，正当胡部主力占领绥德，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之际，蟠龙战斗突然打响了。激战到四日二十四时胜利结束，全歼守军六千七百余人，活捉旅长李昆岗，缴获大批粮食、弹药和其他物资。当放弃绥德仓皇回援的胡部主力在八日赶回蟠龙时，解放军主力早已不知去向。

在主动放弃延安后的一个半月里，西北人民解放军以不足三万人的兵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蘑菇战术”，同比自己多达十倍的国民党军队从容周旋，三战三捷，消灭胡军一万四千多人，拖住胡宗南军这支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并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对于这段历史，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白皮书》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述：国民党军“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台湾一九五九年编写的《戡乱战史》也说：在西北战场上，“战斗进行中，我军因情报搜集无法深入匪区……影响于指挥及部署之行动不小。”而共军则“始

终凭借其严密的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隙流窜……不行主力决战。尤以陕北原已人烟寥落，匪复利用其地方组织，将仅有之人与物资等可资利用之力量全部撤离，使我军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之困难。”“我军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这些事隔几年、十几年后所作的评述，倒是多少说出了一些真情。

中央军委致陈粟，并告张邓，张黎电，1946年12月18日。

中央军委致陈谭电，1946年12月25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11、1212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2月1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6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37、338页。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1页。

中共中央致贺李，并告彭习电，1947年3月27日。

毛泽东致陈谢并告刘刘，滕薄王电，1947年4月7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2、1223页。

中共中央致彭习，并告朱刘，贺李，聂萧罗，林王，叶杨，刘邓，陈谢，滕薄王，陈饶粟谭，林高电，1947年4月15日。

彭习致毛泽东电，1947年4月27日。

毛泽东致彭习电，1947 年 4 月 28 日。

## 三十四、转入战略进攻

在毛泽东的精心筹划下，从一九四七年七月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在独特的形势中以独特的方式展开的。

这里说的“独特形势”，是指：经过一年作战，国共两军兵力对比的悬殊情况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强弱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军虽然已在几个战场上转入守势，但在陕北和山东这两个主要战场上仍然保持着比较强劲的攻势。在这种状况下，捉住战机，就果断地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巨大成功。这自然是独特的。

这里说的“独特方式”，是指：担任战略进攻任务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采取了不要后方，不是正面稳步推进，而是千里跃进的方式；外线作战和内线作战同时并存，密切配合，在战略上双方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也是独特的。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经历过长时期的审慎思考。全面战争爆发后，他曾三次比较明确地表述了准备在适当时机将解放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以实行战略进攻的基本设想。

第一次：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of 中共中央会议上，他指出：歼灭战已经经历了事实的证明，过去几个月已歼灭国民党军三十八个旅。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战胜的。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就可以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再向长江以南。毛泽东的这个分析，不但提出了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而且提出了进攻的主要方向，就是鄂、豫、皖和甘肃。

第二次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毛泽东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高岗的一份很长的指定“科长译”、“阅后付火”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对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蓝图作了更全面的描绘。

电报首先分析了过去一年作战的主要结果及当前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状况，指出：第一年我共歼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歼伪军、保安部队等杂部二十四万人，共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人。目前，敌军主力仍在南线，连被歼重建者在内，共一百五十四个旅；其中，山东八十八个旅，晋冀鲁豫二十六个旅，西北四十个旅。北线敌力较弱，包括歼灭重建者在内，共六十个旅；其中东北二十四四个旅，晋察冀、晋绥四十个旅。后方守备兵力三十个旅。全国敌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现有兵员一百五十万人。此外尚有数量巨大的特种部队、伪军、保安部队以及后方机关人员。一年作战，敌军士气已衰，厌战情绪高涨，民心尤为厌战，蒋政权在人民中已陷孤立。我方山东有二十七个头等旅；晋冀鲁豫（不包括陈赓部）有十三个头等旅，十四个二等旅；西北有陕北六个旅（其中四个旅是晋绥西调的），陈赓四个旅，晋绥三个旅；晋察冀有九个头等旅，四个二等旅；东北（包括察北、冀东）有头等、二等旅三十二个。我全军共计一百一十二个旅，九十万人。此外，地方部队六十万人，军事机关四十万人。

接着，电报提出了全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基本方向和部署，指出：“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一百个正规旅及大量杂部，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为此决定：“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陕、甘、宁大部。北线我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其中极重要的是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联系。”

第三次：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刚两个月，许多人对整个局势的发展还没有看得那么清楚。毛泽东向各区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全面地阐述了解放军实施战略进攻的构思，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毛泽东特别强调“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

在“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意图下，毛泽东精心筹划了南北两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计划。

在南线，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在华东人民解放军举行的鲁南战役即将胜利结束而由中原突围进到陕南、豫西和鄂西北的李先念部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告诉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要他们在三、四两个月内，在陇海路南北广大地区灵活作战，将这个地区“创造为机动战场，以便吸引邱军及其他薛、顾主力来此而歼灭之，大约在五月间主力即可向中原出动”，以支援李先念部。他还告诉华东的陈毅、陈士榘、粟裕、谭震林，要他们在鲁南战役结束后准备在陇海、台枣两线“打几个大歼灭战，开辟向南进攻的道路”。一月二十四日他又致电华东领导人并告刘邓：“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五月开始（包括



休息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向,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弹药、新兵、干部、经费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具体规定南线的两大主力——华东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外线出击的时间和方向。

由于战场实际情况的迅速变化,毛泽东在以后对这个计划又作过三次调整。

第一次局部调整,是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和五月四日。修正的原因是:在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华东野战军举行的莱芜战役已胜利结束,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七个旅,主力正集结在胶济铁路一带进行休整;同时,李先念部大部分已脱离险境,安全渡过黄河,进入太岳解放区,另一部正在渡河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改变了要华东野战军提早转入外线援助李先念部的计划,指示华野“大约本年内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但规定晋冀鲁豫野战军五月挺进中原的任务仍没有变化。一九四七年三、四两月,南线的战场形势又发生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国民党军队把进攻重点改置于南线两翼的陕北和山东。进攻陕北的胡宗南军很快就陷入困境。二,处于南线中部的晋冀鲁豫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分别转入局部反攻,在豫北和晋南收复了大部失地。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对南线战略进攻的部署作了进一步的调整:

“现在可以确定下列诸点:(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二)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三)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已东(六月一日)以前完毕。已东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

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军受刘邓指挥。（四）陈谢主力（四个旅）在现地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部，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

随后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又电告陈粟谭等：山东方面，应“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

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独力先出中原，华东野战军在完成内线作战任务后再越陇海铁路东段进入苏皖边区作战，两军夹津浦路密合作战，以及陈赓部西进陕北，直接配合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的部署。

第三次修改是在一九四七年的七、八月间。这时面对的情况是：一，晋冀鲁豫野战军依照毛泽东“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的决心，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后于六月底自豫北南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转战一月，歼灭国民党九个半旅，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国民党军正调集重兵准备在鲁西南狭小区域内同晋冀鲁豫野战军“决战”。二，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上集结重兵、集团滚进的部署，同时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地区的作战，华东野战军按照毛泽东的决定，以五个纵队兵力分两路出鲁西、鲁南，以四个纵队留置鲁中正面。但七月份攻滕县、攻邹县、攻济宁、攻汶上、攻南麻、攻临朐，都打成消耗仗，没有达成预期的歼敌目的，战场形势十分严峻。三，陕北地区的军需尤其是粮秣供应十分困难。

针对形势的上述变化，毛泽东及时组织南线主力转入进攻的决心并没有改变，但在具体部署上又一次作了大的调整。

第一，将陈谢集团的进军方向从西进陕北改为渡河南下，挺进豫西：“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陇海路潼关、洛阳、郑州段，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

第二，刘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略事休整后，下决心不要后方，大踏步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第三，华东野战军出鲁南、鲁西的五个纵队在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指挥下，就势进入鲁西南；另由陈毅、粟裕指挥一个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主力由鲁北南渡黄河，会同陈唐五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外线（西线）兵团，首先在鲁西南掩护刘邓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边区，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的广大地域内往来击敌，逐步将鲁西南、豫皖苏两区创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之后方。华东野战军的另外三个纵队及由胶东地方武装刚组成的一个纵队组成东线（内线）兵团，在谭震林、许世友指挥下担任保卫胶东解放区、钳制山东战场国民党军之任务。

第四，西北野战军仍然独立在陕北战场坚持内线作战，钳制并逐步削弱胡宗南集团，并为自己今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这样，在南线最终形成了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中央突破，挺进中原，彭习、许谭两军分别在陕北、山东两翼钳制胡宗南集团和进攻胶东的范汉杰集团的战略布局。

我们再把眼光转到北线的东北战场和晋察冀战场，毛泽东也多次作了规划。

毛泽东一直认为，华北、东北是一个整体，两区军队的基本任务，就是夺取长春、北宁两铁路线和长春、沈阳、北平、天津四城。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东北民主联军正在发动夏季攻势，之际，毛泽东指出：“夺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构想，他要求华北部队：在为配合东北夏季攻势而发起的青（县）沧（县）战役结束后，主力应出击平津间和平保（定）间，“往来机动，寻歼敌之正规部队”。在东北夏季攻势胜利结束后，毛泽东又告诉东北部队准备在八、九月间发动新攻势，以四个月到六个月时间占领中长、北宁两路之大部，相机夺取长春、四平、辽阳、锦州等城，并准备在一九四八年春配合晋察冀、晋绥两区进攻平绥路。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了解决北线之敌的任务，“应以东北我军为主力，五台（引者注：即晋察冀）、晋绥为辅”去完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从一九四七年七月开始的。它以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为主要战略重心，分别在南线和北线逐步展开。

在南线，一九四七年六月底，刘邓大军十二万人出敌意外地南渡黄河，转战鲁西南，歼敌九个半旅。紧接着，突然在八月中旬向南越过陇海铁路，穿过遍地泥淖的黄泛区，在国民党重兵堵截追击下，抢渡沙河、汝河、淮河，在八月下旬进入长江北边的大别山区，实施战略展开，创建鄂豫皖边根据地。

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旬，陈谢大军（四纵、九纵及三十八军）从晋南南渡黄河，切断陇海铁路，进军陕南、豫西，实施战略展开，创建豫陕鄂边根据地。

一九四七年九月上中旬，陈粟大军（华野外线兵团）在鲁西南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接着在九月下旬分路越陇海铁路南下，在豫皖苏边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根据地。

三路大军在广阔的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后，一面大力扫荡土杂武装，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建立政权，一面适时集中兵力打中等规模之仗，历经高山铺战役、大别山反“清剿”、陇海路平汉路破击战、洛阳战役、宛西战役等，到一九四八年五月，胜利地完成了创建、巩固拥有三千万人口的新的中原解放区的战略任务。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评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对中原三军的作战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

担任右翼钳制国民党胡宗南军任务的彭习西北野战军，一九四七年八月在沙家店战役中歼灭胡宗南集团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六千多人。这是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沙家店战役进行时，毛泽东就在离战场只有二十里的梁家岔。炮声一打响，他就兴奋地说：“好！我看这回胡宗南怎么交代！”战斗一结束，他来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高兴地说：“胡宗南是个没有本事的人，阴险恶毒，志大才疏。他那么多军队，打我们没一点办法！我们打了这么多次，就没有吃过败仗。他的本事，就是按我们想的行动。”“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哪样想，

他就那样办，当然要吃亏了。”他又说：“沙家店一战，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完全打掉了！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要找机会再打几个这样漂亮的胜仗，到那时候，陕北的敌人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担任左翼钳制山东国民党军的许谭军（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历经胶东保卫战、胶济路西中段战役，不但完成了钳制范汉杰兵团的任务，而且在战略反攻和进攻中攻占周村、潍县，迫使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缩据在济南、兖州、青岛、临沂等几个孤立据点之内。

在北线，从一九四七年九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军队二十多万，收复县以上城市三十三座，把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狭小地区内，为下一步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同一期间，晋察冀野战军首先在平汉线发动攻势，举行了清风店、石家庄两次战役，攻克河北重镇石家庄，完全控制了平汉铁路保定以南段，使晋冀鲁豫、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接着又转移攻势，出击绥东、察南的国民党军队，截断了平绥铁路；留置内线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分及广大地方武装，先后攻占运城、临汾，使山西阎锡山部缩据在晋中、太原及其附近地区，完全处于守势。

毛泽东关于战略进攻的一系列构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十个月中全部变成了现实。一九四七年年底，毛泽东高兴地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取得的这些重大胜利，都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那种极端艰苦而险恶的环境中指

挥的。那时，周恩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许多重大战略决策由他们两人商议后就付诸实施了。后来，周恩来曾说过：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随着战略进攻号角的吹响，直接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已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形势的发展，促使毛泽东除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外，必须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建设新中国有关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

还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任弼时，有中央部门和西北地区领导人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贺龙、习仲勋、贾拓夫、张宗逊、马明方、王震、张经武，还有从晋南前线赶来的陈赓。会议在院子里临时搭的凉棚下举行。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能有这样多负责人集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次会议通常被称为“小河会议”。

小河村座落在靖边县城东南约三十多公里的地方，依山傍水，绿树掩映，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山村。但它的周围却是动荡不定的战争环境。只是在一个多月前，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几经辗转，曾在六月九日从王家湾冒着大雨迁移到这个村子。两天后，国民党军队又从王家湾向这个村子扑来，离村只有十来里，毛泽东不得不率中央机关离开小河村向西北方向的小山村天赐湾转移。这次转移十分艰险。部队还没有出村，一阵霹雳电闪，大雨又下起来。小河水暴涨，把原有的小桥也冲走了，只能临时赶搭浮桥。这时天已完全黑下来，敌人就在邻近，队伍不能有一点亮光和声音，只能在大雨中摸黑从羊肠小道爬上山顶。第二天清晨到达在山梁上的天赐湾。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毛泽东、周恩来等挤在一间小窑洞里住，很多随从人员只能在外露宿。一星期之后，六



月十七日，他们在形势稍见缓和后又回到小河村。这以后没有几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进入第二个年头。全国性的战略大进攻就要开始了。小河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小河会议上，由毛泽东第一个讲话。

他先告诉大家，原来计划把陈赓的第四纵队调到陕北来，同西北部队集中作战。前天中央几个同志同彭总、陈赓在一起又作了一次研究，考虑到西北的粮食困难，又考虑到陈赓率部南进豫西、陕南更有利于从外线钳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军出中原，因此，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作战。这样一来，陕北战场只能依靠彭总独力作战，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主要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了。现在决定晋绥、陕甘宁两区合并，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资格统一指挥，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

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他考虑了很久的问题。他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作战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在政治上蒋介石也已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我们说五年，用不着公开宣布，还是要作长期准备，准备用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

他把加强统一战线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提出来。毛泽东认为，党内有些同志存在着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不如抗日战争时期那样广泛了。针对这种错误看法，毛泽东说：日本投降后，我们同蒋介石进行了和平谈判，这是必要的。虽然没有达到政治解决问题的目的，但确实教育争取了群众，扩大了统一战线。现在统一战线的成分有了变化。减少了一部分，增加了一部分。减少的是解放区的地主，因



为现在我们要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南方的地主却因为征兵征粮首先同蒋介石闹翻，同我们还没有决裂。增加的是中间派，这些人在抗战时期更加相信蒋介石，现在和我们共同抵抗蒋介石，这是十年内战时期所没有的。坚持土地改革不至于吓跑民族资本家；但如果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最后也会丧失民族资本家。土地改革应采取平分方针，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在城市中，我们是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又着重谈了土地制度改革问题。他充分肯定了“五四指示”的正确方面，但也指出了它的某些方面的不彻底性。毛泽东说：我们的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要求更进一步。平分是原则，但按情况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但对共产党员不应例外。中农土地应该不动；在群众大潮流中，如果中农同意，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是许可的，但不能正式写在文件上。军队打出去时，在新区与其没收土地，不如按阶级路线摊派缴税，暂时利用旧机构有时也是需要的，如果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势必成为强迫群众去做。

他还说：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一句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去解释。“敌人的把握放在我们不能长期坚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这次会议，除了决定成立中共西北野战军前敌委员会等问题外，主要是就急需解决的一些重要政策问题交换意见。会议开得很活泼，虽然没有作正式决议，但为以后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作了重要准备。

毛泽东在小河村一共住了四十五天。当时，胡宗南的军队虽已疲惫不堪，并已受到三次沉重的打击，但他的主力仍保存着。由于西北解放军正从陇东向陕北的榆林附近

集结，七月底八月初，胡宗南所属整编第一军刘戡部奉命向北推进，一部已逼近小河村所在的靖边县一带。毛泽东就率领中央机关在八月一日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靠近。经过近二十天的行军；在八月十九日到达佳县城西北的梁家岔。

就在这里，他们迎来了沙家店大捷。二十三日上午，西北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从梁家岔赶到会场，表示祝贺。毛泽东在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陕北战争已过坳了。他说：侧水侧敌，本来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老总却敢于在黄河西侧侧敌而进，指挥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当天下午，毛泽东等又转移到佳县朱官寨宿营。

毛泽东等在朱官寨住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们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和当地农民一起，只是吃米糠、秕谷和瓜果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片片熬成的“钱钱饭”。九月二十一日，移驻佳县神泉堡。十一月十三日，又由神泉堡转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离开陕北。

在朱官寨、神泉堡、杨家沟的七个月，由于陕北和全国的战局都已大为好转，毛泽东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考虑在局势发生根本转折后面对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重大的决策。

七个月内，毛泽东工作得最紧张的是十月上旬。那时他正住在神泉堡。在这短短的十天中，他修改并审定了《土地法大纲》，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公布这个大纲的决议，明确提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他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政治纲领。他审定了准备以人民解放军名义公布的政治口号，并补写了十四条，更加突出了“打倒蒋介石”和人人“有地种”、“有粮吃”、“有衣穿”、“有屋住”、“有工作”、“有书读”等反映人民要求的内容。他还同时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要求全军指挥员、战斗员对这六十七条口号“逐条讲解牢记，认真实行”，并在所到之处“普遍地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务使他们完全了解，万众一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他还重新修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起草《训令》，要求全军“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在这些文件里，最重要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目标。所有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是为着实现这个目标。在全面内战开始了将近一年半后，提出这个目标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了。大约三个月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旬，南京政府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所谓《戡平共匪总动员令》。三个月后，毛泽东正是选定十月十日这个被南京政府定为“国庆”的日子，由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郑重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立刻在举国上下以至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完成这些文件的起草审定后，毛泽东稍稍轻松一些。他把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主要委托给周恩来，又要任弼时多收集、了解、研究各解放区执行《土地法大纲》的情况和土地改革中的具体政策问题，他自己从十月十七

日到十月三十日的两周内，先后对佳县城、谭家坪、南河塘村、白云山等地进行调查研究。

他接见了出席佳县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的人员，并同县委负责人深入进行交谈，了解土地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他参观了峪口纸厂，调查了这个厂的生产情况和工人生活情况。重阳这一天，他还到白云山看了庙会，向寺院人员了解生活情况，勉励他们好好保护历史文物和古迹，还高兴地看了群众剧团演出的山西梆子戏《反徐州》。

经过他自己的调查研究，回来后又听了任弼时有关各区土改情况的汇报，他敏锐地发现在顺利发展的形势下，党内的“左”的倾向正在抬头。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认为如果不坚决克服正在抬头的这种“左”的倾向，共产党就会在一部分群众中失去同情，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也就不能顺利地实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目标。

毛泽东请任弼时从档案中找出一九三三年由毛泽东起草的两个重要文件《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发给全党，以指导土改运动向正确的轨道前进。任弼时为颁发这两个文件替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毛泽东审阅时加上一段重要的话：

一九三三年在中央苏区，“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带（戴）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切须纠正，而这两个文件则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目前当各解放区开展与深入土地斗争之时，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要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

群众斗争之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

冬天快要到了。考虑到陕北还没有完全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仍不过黄河，留在陕北。

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们迁到米脂县的杨家沟。这里的居住环境比以往转战陕北时有明显的改善。在陕北，米脂县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杨家沟是在县城东四十里外的一个较大的山村。全村二百七十多户人家中有七十二户地主。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容易保密，窑房又多，便于长时间居住和召开较大的会议。毛泽东住的是三间相通的窑洞，和周恩来在同一个院子里。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比较多，除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王明、谢觉哉、李维汉、赵林、李涛等。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举行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是在十二月召开的，人们习惯地把它称为“十二月会议”。

这个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做得比较充分。周恩来、任弼时广泛收集了情况，准备了资料，分别对军事形势、土改情况作了深入的研究。毛泽东用很大精力起草作为会议主题报告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会议开始前，从十二月七日至二十四日，先用十八天时间开预备会议，与会者分成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对有关问题交换意见。正式会议开始前，毛泽东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发给大家讨论。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达到一个转折点的历史时刻，是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响亮地宣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庄严目标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它所回答的问题是：怎样打倒蒋介石，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

为了把解放战争胜利地进行到底，实现打倒蒋介石的目的，报告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报告写道：

“我们的军事原则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

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是打歼灭战，“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十大军事原则中的每一条，都贯穿着打歼灭战的思想。十大军事原则既是人民解放军在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经验中产生的，也是新的战争形势下的产物。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面对着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将夺取城市与歼敌有生力量相结合，如何使运动战、阵地战相结合，如何使作战和休整相结合，如何使后方补充和取之于敌、取之于当地相结合等。十大军事原则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取得的新经验，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作出明确而完整的论述。它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更加系统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

由于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在望，新中国的诞生已为期不远，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全国人民面前鲜明地宣布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纲领。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

“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这里包含的最重要的新内容，就是宣布要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这里所说的垄断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只提到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



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而没有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问题。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第一 ,这种垄断资本是在近二十年时间内加速发展起来的 ,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最高峰。它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 ,而人们对它又有个认识过程。毛泽东在下一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讲到过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 ,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区别 ,当时还没有在我们脑子里明朗。这个问题到十二月会议时已经明朗了。第二 ,在抗日战争期间 ,国共两党是合作的。就是到解放战争初期 ,尽管全面内战已经爆发 ,但在明确提出“ 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 的口号前 ,也不宜把没收官僚资本列入革命纲领。到十二月会议时 ,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成熟了。

没收官僚资本 ,是一项牵动全局、影响深远的大政策。这个官僚资本已集中价值达一百亿至二百亿美元的巨大财产 ,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把它收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 ,便使国家经济在新中国经济构成中成为领导的成分 ,能够有力地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方向发展。

对保护民族工商业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里也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写道 :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 ,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 ,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 ,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 “ 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 ,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 ,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 ,在一个长时期内 ,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 ;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 ,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 ;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 ,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

报告把这些归结起来 ,写道 : “ 总起来说 ,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 : ( 1 ) 国营经济 ,这是领导的成分 ; ( 2 ) 由



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文件，反复思考，修改了好几遍。“当把原稿交秘书抄写时，还书面提出五条要求：不要写错字；不要写草字；不要写怪字；不要写别字；不要写简字。”

十二月会议的正式会议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举行的，会期四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十二月会议在二十五日开幕。毛泽东在第一天上午讲话。他先从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对当前形势的特点作出明确的判断。他说：“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孤立起来，群众站在我们方面。”他分析道：这个问题在长时期内没有解决，内战时期我们比较孤立，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军事方面，蒋介石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他说：过去我们把它称为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讲进攻。“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形到了今年已经很严重。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根本上是我们有土地改革，蒋介石没有，而且我们主力又打出去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也已走上轨道。他归结起来说：战争期间，高潮主要表现在为战争的胜利。革命已经进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但战争仍是长期的。

接着，他着重谈了统一战线问题。他说：统一战线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时期，我们本

来不孤立，但因为政策右了，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脱离了群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政策上的“左”，结果孤立了自己，当然我们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抗战时期，我们对蒋介石实行又团结又斗争，坚决同他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但又停止了没收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和三三制等政策，因此孤立了蒋介石。所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既要反右，又要反“左”，才能划清界限，避免自己的孤立和失败。毛泽东还详细地列举了在对美蒋、对待中间派、对待土改和整党工作等方面怎样做到既反“左”又反右。

最后，他又谈了国际形势中的若干问题。一九四六年四月，毛泽东曾就这个问题起草过一份文件，当时只在中央很少人中传阅。这次会上，把这个文件印发给与会人员。毛泽东还作了说明。他说：关于苏联和英美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提法。一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一种是在若干问题、包括某些重大问题上，早一点妥协或者迟一点妥协。我看应该是第二种提法，而不是第一种提法。妥协也不是在一切国际问题上妥协，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妥协会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国内问题的处理。“各国人民的方针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十二月二十八日会议闭幕。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他说：这次会议是很令人高兴的一个会，是在时局开展中召开的。我们同蒋介石之间的力量对比问题在今年发“二一指示”时还没有解决，到现在这个问题才解决，不但领导者，群众也看出来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打倒封建制度，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三个敌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反右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几个会议上已经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了“左”的偏向。好比一河水，

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都是好的 ,但在对待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上发生了偏向 ,这两个浪头就不是好的。“ 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 ,共产党要反对这个潮流。” 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 ,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毛泽东还说 :我在日本投降以后长时期内没有写过文章 ,因为兢兢业业 ,对形势只能作估计而不能作结论。现在国内国际的形势都很明朗了 ,我们的战争胜利了 ,蒋介石孤立了 ,土改整党都上了轨道。因此我们这次会比今年七月小河村开的会有很大不同。

毛泽东在结论中着重地强调 :“ 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篇文章 (引者注 :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这篇文章可以估计为在打倒蒋介石时期起纲领性作用的。” (21)

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强有力的领导人 ,最可贵的就是能在关键性的时刻 ,及时抓住并解决关键性的问题 ,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领导人。当历史悄悄地发展到一个转折关头时 ,一般人即便模糊地有一些感觉 ,往往仍局限于自己原有的看法 ,很难立刻敏锐地察觉这个转折时刻已经来临 ,更难立刻认识到伴随这种新局面而来的一系列新的情况和问题 ;而毛泽东却能比一般人更早地、毫不含糊地看清楚这一切 ,并且在深思熟虑后立刻提纲挈领地提出在这种新局面下应该采取的方针和政策。经过他对情况的周密分析和明确论断 ,使人顿时有豁然开朗之感。这确是他的过人之处。

十二月会议后 ,战争形势继续以最快的速度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全国各个战场上 ,除中原战场处于胶着状态外 ,其他战场的国民党军都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从一九四七年冬季开始 ,人民解放军又先后开展以诉苦( 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 )和三查( 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 )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这是解放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集中、成效最高的整军

运动 ,对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素质和战斗力起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为了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 ,更好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十二月会议后 ,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党的重要政策的研究上。这些政策包括 :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新区工作等方面。他向县区乡村干部及农民进行调查研究 ,仔细审阅下面送来的报告。他经常同周恩来、任弼时及其他领导人一起就政策问题交换意见 ,并提出若干问题和意见请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大军区、各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意见 ,还十分注意阅读新华社汇集的国内外新闻报道、评论以及《晋绥日报》登载的消息文章。在此基础上 ,他为中共中央起草有关政策和策略方面的指示 ,为新华社撰写评论和文章 ,在许多场合作讲演 ,还组织其他人撰写文章、社论、报道 ,经他审改后发表。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这半年时间内 ,这种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讲演有近百篇 ,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十五篇。

为什么毛泽东在这时要集中精力来研究政策问题 ?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是革命能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关键 ,也因为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不少工作中出现“左”的错误倾向 ,使他更感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明确地告诉全党 :“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 ,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他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得更透彻 :这次战争 ,胜利把握很大。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 ,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确实孤立 ,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 ,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

分子，对俘虏处理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22)

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毛泽东说出了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23)

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但自己要懂得和执行党的政策，而且“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24)他指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但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

为什么各地在规定和执行政策上往往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呢？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个电报中详细地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四类原因：第一，“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第二，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自我批评道：“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作系统的说明，不能

专责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此种责任。”第三，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第四，“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25)

鉴于正确地规定和执行政策的极端重要性，鉴于以往有些地方擅自决定政策和上下连系不够的教训，十二月会议结束后第十天，毛泽东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指示中强调：“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加强此种联系，极为必要。”(26)三月间，他接到邓小平关于大别山地区几个月工作所受的“左倾冒险的、急性病的害处”的报告后，认为这个报告是“非常好的”，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告诉他们：“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足、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当忙的事务工作而忽视了策略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要求各地在每两个月向中央所作的综合报告中，不但要报告各地规定的策略与政策，而且要说明这些“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27)

在研究政策和策略问题时，毛泽东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依托广大农村逐步展开的。能否给广大农民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是能否取得广大农民支持的关键，也是能否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共中央颁布《土地法大纲》后，土地改革运动

已经在各解放区全面展开，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在农村中实现根本的社会大变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壮举。但《土地法大纲》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左”的倾向。例如《大纲》过分强调“平分土地”的原则，没有说明必须按照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实行分配土地，出现了不分新解放区、老解放区、中心地区、游击地区一律强行平分土地的情况。又如由于《大纲》对有些政策的规定还不具体，不明确，因此在运动中出现了损害新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用过激方法斗争地主和搜罗地主“地财”等情况。

毛泽东在政策确定后，总是密切注视着它的实施情况，以便随时发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当他发现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后，立刻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纠正这些偏差的政策指示。他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写道：“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28)经过两个多月的冷静观察和总结，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作出了更完整的表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29)

根据这个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重新厘定一些具体政策：

他明确规定在老解放区，日本投降后解放的半老区以及转入战略进攻后新解放地区三种不同的地区内实行土地改革的不同步骤和具体政策，特别强调在新解放区“不



要性急”，要分步骤，要区别巩固区和游击区，要“严禁乱杀”，甚至可以“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他要求各地准确地掌握划分阶级的标准，严格地把地主和富农、地主中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恶霸地主与一般地主、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封建剥削收入和经营工商业收入、旧式富农和新式富农等严格区别开来，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他指出要把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消灭地主阶级和消灭地主个人严格区别开来，前者是革命的对象，是要坚决消灭的，而作为地主个人，应该给予出路，做好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工作，引导他们参加国民经济生活行列，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毛泽东还要求全党注意：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发展生产，增强支援战争的力量，因此，在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中要注意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反对破坏，反对浪费；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地区，要着重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生产斗争，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毛泽东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统一战线中的各项政策。要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关键在于以什么态度对待资产阶级。针对当时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一些“左”的偏向，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党内指示，告诉全党：“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这个指



示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指示还具体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右翼、中间力量和左翼的不同政治态度,指出应当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孤立其中的少数人。“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30)

毛泽东对事情总是想得很深很远,在走这一步的时候,往往已经考虑到第二步、第三步的需要。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特别是石家庄这样重要城市的解放,为了筹划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把注意城市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他为中央起草给各地的指示,写道:“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这是经验主义、地方主义还在我们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结果。”他着重指出:“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电告我们。”(31)

此外,对工商业政策、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毛泽东也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了一系列指示,明确而具体地规定在这些工作中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哪些是从长远看应该做但在目前尚不宜做的,哪些是适合在农村做但不适合在城市做的。这样,使干部和党员不仅有明确的方向,并且了解工作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便于遵循,有利于防止各种偏向的发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战线迅速向长江北岸推移，战局发展很快。二、三月间，西北战场的局面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以七万人的兵力，采取攻城打援手段，在宜川、瓦子街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部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五个旅，共约三万人。这是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陕北形势已完全改观。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各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作战，也为了书记处的几位书记能更及时地共同研究和决定新时期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后决定在三月二十一日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

临行的前一天，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四千字的长电，向党内通报了战争形势、全党执行政策的情况和纠偏的情况，并且告诉他们：年内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目前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下工作。中央也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

第二天，他就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动身离开他生活和战斗了十三年的陕北，踏上东移的旅途。

毛泽东致林罗高电，1947年7月10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30、1231页。

中央军委致刘邓，并告陈粟电，1947年1月18日。

中央军委致陈陈粟谭电，1947年1月18日。

中共中央致陈饶及华东局，并告刘邓电，1947年1月24日。

中共中央致刘邓，陈谢；陈粟，并告彭习电，1947年5月4日。

中央军委致陈粟谭集张饶邓黎，并告刘邓电，1947年5月22日。

中央军委致刘邓，徐滕薄王，郑李，谢韩电，1947年7月19日。

中央军委致刘邓，陈粟谭，华东局电，1947年7月23日。

毛泽东致林高并告朱刘电，1947年5月20日。

中央军委致朱刘聂，并转杨罗耿电，1947年6月19日。

毛泽东致林罗高电，1947年7月10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93页。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67、169、170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43、1244页。

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7月21日。

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7月23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43—1260页。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06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7年12月25日。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7年12月28日。

(22)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8年1月15日。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98页。

(2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86页。

(25)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8年3月6日。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5页。

(27)毛泽东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电，1948年3月14日。

(2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8、1317页。

(2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8、1317页。

(3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87、1288、1289页。

(31)中共中央致中央局、分局、前委，并告中央工委电，1948年2月25日。

## 三十五、东移西柏坡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从撤离延安到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陕北，共三百七十一天，行程一千多公里，居住过十二个县境内的三十八个村庄，并从这里领导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这是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他们在三月二十一日离开杨家沟，经过两天行军，于二十三日中午到达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渡口。当地政府早已在这里准备好了十几条渡船。毛泽东登上第一条船。木船缓缓地离开岸边。毛泽东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经过半小时左右的紧张搏斗，渡船绕过许多顺流而下的冰块，冲出激流，渡过了滔滔黄河。船一靠东岸，他们便踏上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境内。毛泽东上了岸，回头再看着黄河，深情地说：“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显然，他的心已在越来越多地思考着新中国的未来了。在他们东渡黄河后不到一个月，四月二十一日，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

踏上黄河东岸后，毛泽东等就来到临县三交镇的双塔村，同驻在这里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会合。这时，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已先赶赴在河北的中央工委，留在这里主持工作的是后委副书记杨尚昆。毛泽东对杨尚昆说了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

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毛泽东等在双塔村住了两个晚上，决定中央和军委的大部机关人员由杨尚昆率领前往西柏坡，毛泽东等带领少数电台、机要、警卫人员乘吉普车东行。

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等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会面，听取他们的汇报。四月一日和二日，毛泽东分别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着重地强调全党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善于从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个全局的高度去把握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发生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他针对当时农村中正在流行的那种错误思想，明确地指出：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最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他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他再一次强调地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对党和群众的

关系，他反对笼统地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认为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予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予以改正。”

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他讲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办好党报的问题，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主张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

在蔡家崖停留八天后，他们又上路了。毛泽东白天坐车，夜间工作，找地方干部谈话，参加各类人员的座谈会，访问群众，还在油灯下批阅各地发来的电报。四月十日，他为中央起草的电报中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一。总之，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他们经过岢岚、神池、雁门关、代县，在大风雪中翻越五台山，在四月十三日到达阜平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大院。毛泽东住在聂荣臻原来住的两间房子里。

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初早曾提出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和斯大林研究一些问题。这年七月一日，斯大林致电在陕北担任医生兼联络员的奥尔洛夫：“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在到达城南庄的前一天，也就是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阜平县西下村宿营时，毛泽东向周、任又提出这个问题，周、任都表示同意，决定到城南庄后，周、任先去西柏坡同刘、朱会合，毛泽东则暂留城南庄作去苏联的准备。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示：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斯大林先在二十九日复电同意，到五月十日又致电毛泽东：考虑到中国战局的发展和他途中的安全，再次建议他推迟来苏。这样，毛泽东在城南庄共住了三十五天。

在这段时间内，从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都出席了。这是自撤离延安后五位书记第一次在一起参加的正式中央会议。时间相隔只有一年多一点，国内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根据形势变化的要求，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怎样促使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和怎样迎接这一胜利的到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三点战略性的意见：第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没有这一条，不能胜利。第二，胜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负担很重。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土改、整党、人民代表会议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生产的发展，要使人民的负担适当减轻。第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利。他的这几点意见，后来被归纳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十六个字，成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行动方针。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华北、中原分别成立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机构；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著名人士来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就这个问题立刻同有关人士交换意见。会议还研究并确定了粟裕率领的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先在中原地区打几个大仗的部署（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谈到）。

城南庄会议结束后没有几天，五月十八日，国民党飞机突然来轰炸城南庄，击中了毛泽东的住房，但毛泽东却没有受伤。对这段惊险的经历，聂荣臻回忆道：

“那天早晨，收听完广播，我正在吃早饭，听到有机群的轰鸣声。”“我急忙走到院里，敌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了。我循着声音望去，有一架敌机已经飞来了，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声音很沉重，不多时，又飞来了两架敌机，这时已经看清是 B25 轰炸机。于是我快步向毛泽东同志的房间走去。”

“由于毛泽东同志通宵都在工作，我走到他屋内的時候，他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我想，不能再延迟了，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担架以后，我向赵尔陆同志递了个眼色，便把毛泽东同志扶上了担架。我们两人抬起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我和毛泽东同志刚走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我们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

这次敌机一共投了五枚炸弹，其中一枚正落在毛泽东所住的小院子里爆炸了。毛泽东住的那两间小房子，门窗

的玻璃都被震碎，一些鸡蛋也被弹片砸烂了。看到这些，聂荣臻真觉得“后怕”：“如果不是当机立断，事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显然，国民党方面已经获得毛泽东住处的情报。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转移到离城南庄二十多里的一个很隐蔽的小村子：花山村。他在花山村住了九天。五月二十七日，到达中共中央机关所在的西柏坡。

到达西柏坡后，毛泽东逐步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指挥作战上来。

在这以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冬到一九四八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面进行新式整军运动，一面展开攻势作战。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冬季攻势，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中旬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五万多人，把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锦州、沈阳、长春这三个互不相连、仅占东北总面积百分之三的狭小地区内。毛泽东对这次攻势作了很高的评价。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名义指出：“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国。”西北野战军在取得被毛泽东称为“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形势”的宜川大捷后，又攻占宝鸡，光复延安。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中原地区的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所部，华北的徐向前兵团和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兵团，也在一九四八年的三、四月间分别进行了周村战役、潍县战役、洛阳战役、临汾战役、察南绥东战役等，各自歼灭了为数不少的国民党军队。

毛泽东到达西柏坡前后相继开始的一九四八年夏季攻势作战，就是在上述胜利的基础上，在全国五个作战方向上先后展开的。这就是：中原战场上的豫东战役和襄阳、樊城战役，华东战场上的津浦路中段战役，华北战场上的晋中战役和冀热察边战役。

其中,豫东战役对推进南线战局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个战役的形成,在决策上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过程。

早在毛泽东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时候,他就同时考虑到以当时已进入鲁南作战的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两个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叶飞、陶勇,因此也叫叶纵、陶纵)渡过长江、直出闽浙赣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便把战线进一步推向国民党军战略后方的构想。他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的一份电报中说到,在刘邓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谢南渡黄河挺进豫陕边的同时,由陈毅、粟裕、谭震林率华东野战军主力留置山东(包括鲁西南)“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另以第一、第四两个纵队经过整补和政治动员后,第一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二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三步跃进至“闽浙赣目的地”。为了加强这支部队出击后的领导,毛泽东还提出以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组成东南分局的建议,要华东局考虑。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是毛泽东独具匠心布下的棋局。它从根本上扭转战局,使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为进攻。但是,全局中最关键的一着棋——向大别山地区挺进的刘邓大军,虽有陈谢集团进入豫西从右侧辅弼,力量仍嫌不足,在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还有被迫撤回的可能。经过再三考虑,毛泽东在八月七日和八日两次致电陈毅、粟裕并告刘邓,修改了原来考虑的华野主力全部在山东内线作战而以第一、第四纵队分步骤挺进闽浙赣边的构想,决定由陈毅、粟裕立即赴鲁西南,统一指挥包括第一、第四纵队在内的华野六个纵队,组成华野西线(也叫外线)兵团,进行直接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作战任务。毛泽东估计,在刘邓大军向南跃进时,国民党军必然会以重兵追堵。在这种情况下,陈粟西线兵团立即尾随敌军南下,就可以从“反对方向钳制敌

人”，有效地掩护刘邓大军的挺进并在大别山地区立足生根。

毛泽东对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所下的决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他执著地认为，只有适时地和有步骤地把战线向蒋介石统治区推移，使人民解放军所需的大部人力、物力取之于对方，才能使新解放区逐步扩展，使老解放区得到进一步巩固，经过跃进和巩固的几次反复，最终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他在根据战局的发展适当调整陈粟大军的作战部署后，还多次致电刘邓、陈粟，要他们继续准备以一部分主力在第二年的适当时机渡江南进，吸引部分国民党军从中原地区转援江南，以利于中原解放区的巩固。

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大约一个星期，从中原前线赶赴陕北中央的陈毅，同毛泽东在杨家沟见面了。这是他们随着抗战胜利而在延安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在同陈毅谈到一九四七年七月以后的全军作战行动时，强调它的性质已不再属于“自卫防御”，而是一种“革命的进攻”，是把战争的主要战场推向蒋管区、以求解放全中国的作战行动，所以叫“战略进攻”。毛泽东说：蒋介石已处于防御地位。黄鹤一去不复返，他要回到战争初期那种形势是不可能的了，今后是我们如何转入江南、四川、两广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起，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议。从十九日下午开始，会议连续三天听取了陈毅关于日本投降以来华东地区和华东野战军的各方面情况、中原战场当前形势的汇报。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对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和沿江重镇南京、武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蒋介石无论如何都想把他们从自己的卧榻之旁赶走。一九四七年十二

月初，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在九江设立国防部前进指挥所，调集三十三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地区的刘邓军展开大规模“围剿”。大别山地区的反“围剿”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虽然取得重大胜利，但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共两军在整个中原地区，基本上处于胶着相持的状态。

怎样打破这种僵持局面？毛泽东和周恩来、陈毅最初商定的南线三军在三个月内的作战方针，是以刘邓军主力位于大别山内线，“分遣坚持，多休息，多打小仗”，待正由晋冀鲁豫南下的三万新兵到达以充实部队后，再打中等规模之仗；以粟裕所部并指挥陈谢军在二、三、四三个月内，在中原地区寻求打几个中等规模的歼灭战，以配合刘邓军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他们还设想以山东兵团的许世友、谭震林率两个纵队南下苏北、苏中，会合原在这两个地区活动的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形成一个重要战场，威胁京沪”，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抽调一部力量向东。“三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把这个战略构想传达给刘邓、粟裕和陈谢等。二十七日，又以毛泽东、陈毅两人的名义，就山东兵团的使用问题提出两个方案，要求华东局研究提出意见。

打破大别山乃至整个中原的僵持局面，是关系全局的一篇大文章。对这样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发出电报后，仍在反复思索，并同周恩来、陈毅继续商议。毛泽东所担心的是，这样的布局能不能有把握打破中原的僵持局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更积极、更大胆、更能震动敌人的方案呢？毛泽东又想到了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这一着棋。本来，他是准备在一九四八年秋季中原战局基本上得到改善后再走这一步棋的，现在考虑要提前实行。周恩来、陈毅也同意这个设想。

设想虽然提出了，但对采取这样重大的行动，毛泽东下决心是十分慎重的。一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前一个电报发出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向粟裕发出第二份电报。这是一份限少数领导人“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的绝密电报。电报中说：关于由你率叶、王、陶三纵渡江南进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研究有三个方案，即：一，休整半月后立即渡江；二，二、三、四三个月在中原地区歼灭一部分敌军，然后休整一个月再渡江；三，按原议先在中原作战，于一九四八年秋季再行渡江。在电报中，毛泽东分析了三个方案各自的利弊后指出：“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毛泽东希望粟裕“熟筹见复”。

毛泽东还同陈毅研究了准备成立东南分局，由粟裕任书记，叶飞、金明任副书记；准备组成东南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邓子恢任副政委。

给粟裕电报发出后第三天，一月三十一日，粟裕发来他同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研究后的回电，就一、四、六纵队的渡江时间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三个纵队先北开陇海铁路附近休整一个半月，三月下旬即可出动；二是三个纵队仍先参加中原作战，三月中旬开始休整，五月中旬出动南下。“以上两案，以第一案为最好。”回电中，粟裕还就渡江路线、渡江后留在中原各部队的作战方针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复电粟裕，表示完全同意他提出的第一方案，在三月下旬出动。“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

一个重大的行动计划决定下来了。

但是，一九四八年春季，中原战局出现了重要变化。

第一，由于刘邓军实行了集结和分遣相结合的灵活战略，加上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和陈谢部的积极作战，不但基本上粉碎了白崇禧对大别山区的围攻，而且开辟了桐柏、江汉和沙河淮河之间的三个新解放区，拦腰切断了中原地区两条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攻克中原重镇洛阳，中原战局已逐步走向稳定。

第二，中原三军成功地保持了从豫北经过鲁西南、豫皖苏区通往大别山区和由晋南进入豫西、陕南这两条重要通道，使晋冀鲁豫解放区一部分军需物资和三万新兵得以补充在千里跃进大别山过程中损耗较大的刘邓军，使他们的战斗力逐步恢复，也保障了中原各军在此后的作战中能得到后方的支援。

第三，中原新解放区经过半年经营，特别是纠正了执行党的土地政策、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中某些“左”的偏向后，各项工作逐步走上轨道，拥有三千万人口的中原新区开始得到巩固。

第四，解放军一部分主力进入中原并吸引国民党军部分主力回援后，坚持在内线的解放军乘机相继发动攻势，取得重大战果，尤其是西北野战军在宜川战役中一举歼灭胡宗南集团两个整编师近三万人，迫使胡宗南从中原战区抽调一个兵团回援西安；同时，由于苏北兵团的积极作战，也吸引了部分国民党军队从大别山东麓调往苏中地区，从而相应地减弱了他们在中原战区的兵力。

总之，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逐步具备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中原战局的这些变化，引起执行跃进闽浙赣边计划的主要负责人粟裕的反复思考。

四十一岁的粟裕，在当时各战略区领导人中，是一位身经百战、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年轻将领。他根据中央军



委批准的方案，率一、四、六纵队从平汉铁路东侧的临颖地区北上，到达濮阳地区，准备经过一段时间整训后执行渡江南下的任务。同时，派出先遣小分队到预定渡江的地段先期侦察，并密切注视着不断变化中的中原战局。以往的作战经历使他熟知苏浙皖赣地区的地形条件，这种河流水网、稻田密布的水网地区对装备较重的第一、四、六纵队的机动作战很不利。同时，也考虑到大兵团远离后方作战，不仅在群众和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而且在补给和伤病员安插上也有许多困难。他回忆起一九三四年红军抗日先遣队在皖浙赣边地区的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他还具体地分析了中原战区国民党军各部队的具体情况，认为他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主力第五军、第十八军和桂系主力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师，这样，中原战局会在比较长的时间内继续呈现僵持局面，而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数学的竞赛。粟裕算了一笔细帐，认为解放军三个纵队进入江南后，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条件下作战，减员必大又无法得到补充；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三至五个整编师，这对打开中原战局将更为有利。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比较和思考，粟裕逐渐形成一个主力暂不渡江南进而留在中原作战的构想。尽管构想有充足的根据，但他深知对一个已经确定并正在付诸实施的战略决策，是不宜轻易提出不同建议的，尤其是在当时正十分强调组织纪律性的情况下。因此在濮阳休整期间，他先向刚从中央回来的陈毅作了汇报。征得陈毅同意后，他又在四月十六日致电刘邓，报告了自己的构想。两天后，四月十八日，他才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粟裕的这份电报长达三千字。在电报中，粟裕首先充分肯定去年七、八两月先后转入外线以来取得的极大胜利，接着，详细地分析了华野三个纵队执行渡江方案后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当前中原战局发生的有利变化，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不南下，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求得在最近有效地打几个大歼灭仗。他认为，组成“三线武装（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远征游击队）依战局之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粟裕是谨慎的，深知自己这个建议的分量。因此，在电报结束时写道：“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刚到城南庄只有一个星期的毛泽东，看到了粟裕的电报，也看到了刘邓在同一天发来的电报。刘邓的电报表示，在粟部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和渡江有较大困难的情况下，自以“迟出几个月为好”。这样，粟部可以“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看到这两份电报后，毛泽东立刻决定要陈毅、粟裕尽快来中央，向中央具体汇报他们的意见，以便中央对行动方针作出最后决策，并把这个问题列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程。要求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先作研究。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起，毛泽东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中，听取了粟裕的汇报。与会同志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根据城南庄决策，陈毅赴中原局工作，由粟裕任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和代政治委员。五月五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

“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

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印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徐汴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

这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所作的关键性的变动。它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进程，包括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第一线高级指挥员的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敢于实事求是地大胆地对中央重大战略行动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是难能可贵的。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能实事求是地重视并采纳部属的不同意见，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调整重大战略部署，也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对需要高度集中的军事指挥来说，这可以说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典范。

城南庄决策，为中原会战擂响了战鼓！

五月三十日，粟裕率领一、四、六纵及两广纵队（相当于一个师）、特种兵纵队南渡黄河，同中原野战军（由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第十一纵队会合。六月三日，第三、第八纵队在陈士榘、唐亮指挥下从漯河地区东越黄泛区，前来会合。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华东野战军发起开封战役，一举攻克中原名城、河南省会开封，歼灭守军约四万人。接着，又在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六日乘胜发起睢杞战役，在中原野战军主力策应下，歼灭国民党军队的区寿年兵团主力和黄百韬兵团一部五万四千多人，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开封、睢杞这两个战役，通常合称豫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九万多人，是继东北冬季攻势以后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一次战役。

豫东战役的重要意义 ,不但在于歼灭了中原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有生力量 ,打破了中原战场上的僵持局面 ,而且证明人民解放军依托老解放区和中原新解放区的支援 ,已经有可能在这个地区大规模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彻底解决中原问题。七月十一日 ,毛泽东要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贺电 ,指出 :这个战役的胜利 “ 正给蒋介石 ‘ 肃清中原 ’ 的呓语以迎头痛击 ,同时 ,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 ”。七月十三日 ,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 ,明确地告诉中原局和粟陈唐 : “ 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 ,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 ,开辟南进道路 ,然后南进。 ” 并且斩钉截铁地写道 : “ 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 ”

在豫东战役前后 ,其他几个重要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通盘筹划下展开的强大攻势作战 ,也相继取得重大胜利。

在华东战场 ,为了配合豫东作战 ,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山东兵团在济南和徐州之间进行了历时五十天的津浦铁路中段战役 ,全歼整编第十二军等部六万多人 ,完全孤立了由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据守的山东省会济南。韦国清、陈丕显、吉洛 ( 姬鹏飞 ) 指挥苏北兵团在苏北北部发动攻势 ,歼灭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 ,完全打通了苏北同山东的联系。

在晋中战场 ,徐向前指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发起了历时四十天的晋中战役 ,歼灭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所部约十万人 ,完全孤立了山西省会太原城。

在中原战场 ,中原野战军在七月二日至十六日发起襄樊战役 ,攻克襄阳、樊城 ,歼灭国民党军二万人 ,活捉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

在华北北部战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指挥下，先后在保定以北和冀东地区发动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四千人，使河北省会保定陷于孤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夏季作战的巨大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国的战局。这五个作战方向上取得的重大胜利，被合称为“五路大捷”。新华社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发表的《祝五路大捷》的社论指出：“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的时候，敌人在黄河以北，除了平绥、平锦两条铁路及在这两条路上的城镇外，只有沈阳、长春、承德、保定、太原、安阳、新乡、焦作等稀稀落落的几个据点了。”在黄河以南，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超过了战前规模，其余各解放区都在发展或恢复之中。中原战场上的形势，早已不利于蒋介石。“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中夺取了敌人成千门的大炮之后，就建立了具有强大威力的人民的炮兵，从此，人民解放军不独在运动的野战中是无敌的，就是在阵地战中也是无敌的了。一年来我们攻克了石家庄、运城、临汾、宝鸡、潍县、兖州、洛阳、开封、襄阳、辽阳、鞍山、四平街等坚固的设防地带与设防城市，这就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术，特别是攻坚战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此，已经没有什么国民党的设防城市打不开的了。”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29页。

杨尚昆：《对毛泽东的几点回忆》，《中共党史风云录》，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2页。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标准本，解放社1949年6月版，第82、84、88、89、91页。

中共中央致华东局、转许谭谢、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1948年4月10日。

《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

中共中央会议记录，1948年5月3日。

《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版，第 677、678、679 页。

毛泽东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华东局电，1947 年 7 月 23 日。

中央军委致粟裕电，1948 年 1 月 27 日。

中央军委致粟裕，并告刘邓、饶漱石、邓子恢电，1948 年 2 月 1 日。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版，第 537—541 页。

中央军委致刘邓并华东局电，1948 年 5 月 5 日。

中共中央致中原局，并告粟陈唐电，1948 年 7 月 13 日。

《祝五路大捷》，《时事学习材料》，苏南新华书店 1949 年 6 月版，第 217、218 页。

## 三十六、决战前夕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旅程。如果说一年前还处在“爬山坡”的时刻，那么，从一九四八年九月起，有如自然界进入金秋一样，也到了收获的季节。

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间，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大目光盱衡全局，敏锐地察觉到历史已将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精心筹划新的方略。

在军事上，他思考着要打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仗，开始筹划行将到来的大决战，根据这个目标作出全盘的部署。

作为这场决战的序幕，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准备发动济南战役。在五路大捷后，济南事实上已成为国民党军队坐困的孤城，蒋介石的重要军事基地徐州也变成直接暴露在最前线的城市。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得知解放军已攻克兖州的消息，当天就向他们提出新的作战任务：许谭兵团在津浦路中段战役结束后，“如能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七纵、九纵、十三纵、渤纵、鲁纵）可于十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十六日，又要求许谭兵团：“主力应不惜疲劳，抢占济南飞机场，并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以期提早夺取济南。”同一天，还要求粟陈（士渠）部准备阻止国民党军邱清泉兵团北援济南。为了保证华东野战军“攻济打援”的胜利，毛泽东并要求中原野战军“作有力配合”。接着，又要求粟兵团以歼灭国民党第五、第十八军等部，开辟渡江南进的道路为目标。毛泽东想起，蒋介石在这年四月九日，也就是充当南京政府的“总统”前几天，还在说“一定可以在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内肃清中原人民解放军”，便在新华社社论中加写道：“三个月已经过去”，“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要满六个月，我

们倒要看一看究竟谁肃清谁。”这不仅是对蒋介石的辛辣嘲讽,而且也透露出毛泽东准备在中原战场打一场大规模歼灭战所下的决心。

对华北战场,毛泽东在七月十六日指示徐向前:指挥华北第一兵团攻取太原。

对东北战场,毛泽东批准东北野战军主力由长春地区南下,到北宁线作战。他在七月二十二日和三十日指示林罗刘:“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以封闭蒋军于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并且指示华北的杨成武、杨得志两兵团准备发起察绥战役,以配合东北野战军的南下北宁线作战。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全盘部署后,八月十五日致电告诉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西北局:“九月起全国各区均将有大战,希望你们能配合。”

要从全局着眼,相互配合地为进行战略决战作好准备,必须加强集中统一的指挥。因此,毛泽东便进一步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坚持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制度。也在八月十五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长达二千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在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他说:今年五月、七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等。

“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毛泽东责问道：“我们五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毛泽东说：“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你们如果不同意上述批评，可以提出你们的反驳。”

当林彪就此问题向中央作了检讨，并送来综合报告后，毛泽东在二十日复电林彪：

“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

为什么毛泽东把这件事看得如此之重，紧紧抓住不放？他在二十二日以中央的名义致电东北局时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他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大决战前夜的现阶段有着极端的重要性：“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



在大决战的准备工作中，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兵员补充和火力加强（特别是炮兵火力的加强）。毛泽东在经过审慎考虑后，分别作出了重要决策。

对前一个问题，毛泽东提出：“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引起全党注意。”他说：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乡村人口已大为减少。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的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像这样大量地吸收俘虏兵，让他们在经过诉苦运动后立刻参加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来，在过去还很少有过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出地强调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对后一个问题，为了解炮兵的作战和建设情况，八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召见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华北军区炮兵旅旅长高存信，听取他们的汇报。毛泽东听后举起拳头说：解放战争好像爬这座山，现在已经过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今后打大仗炮兵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把炮兵搞好。后来，在战略决战中，特别是攻坚战中，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火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毛泽东想得更远。他已经在着手筹划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事宜。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提出一个重要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立

刻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五月五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其他民主人士，通电拥护召开新政协。

毛泽东收到以上各电后，在八月一日复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等说：对诸先生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并且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并就召开这次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询他们的意见。

这时，蒋介石由于军事失败，人心动摇，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发展，阻止国民党内分崩离析的趋势，正在焦虑地寻求“局势好转”的计策。国民党内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主张停战谈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向蒋介石建议：在目前极端危急的局势下，要“产生一个联合宣言”，“与共产党成立协议，以谋求和平”，“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战争”。蒋介石表示“他要將此事再仔细考虑”。

毛泽东看透了他们在此时突然提出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他改定的一份党内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反动派所谓和平运动，只是战争失败时求得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打倒，反动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人民民主政府必须在全国建立，美国侵略势力必须退出中国，中国对外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

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否则所谓和平必定是假的，只是过渡到更残酷的内战的一种手段。”

“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必须向解放区军民人等指出，战争不是无止境的。依据过去两年的作战成绩，加上今后的更大努力，执行正确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项政策，大约再打三年左右，就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中国的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自己及全国人民就可以永远过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了。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这大约三年左右的痛苦，接受反动派的欺骗，停战议和，让其休养生息，然后被迫再打，我们就将受程度更大、时间更长的痛苦。”

这种“和平运动”确实只是一种烟幕。与此同时，蒋介石于八月三日至七日，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全面检讨两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制订了他们的应变方针。

政治方针：“动员全民积极实施总体战，发挥政治、经济、军事及一切力量之总和，全力进剿并使党政军民经济一元化，以期步调一致”。在“实施要领”中规定：“实施全面动员，确定戡乱第一”；“加强金融管制，实行银行国营、金白银国有，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币制”。

军事方针：“军事上于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为此，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划为一个战区，东北、华北划为一个战区，“各置统帅一人节制之”。在西北“应迅速成立西北剿匪总部，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剿匪军事”。将整编师、旅番号恢复为军、师。加强各战略城市的守备，“责成有关总部、绥署构成坚固工事”，长期坚守。同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机动兵团，加强应援力量。

这次军事检讨会议 ,虽然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 ,但它的主要内容仍被一些外国通讯社记者获悉 ,公开加以披露和评论。这样 ,所谓“ 和平运动 ”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人也看得很清楚了。

决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为了对军事上、政治上面对的种种重大问题在党内领导层中统一认识 ,特别是为了筹划新中国的建设 ,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到会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七人 ,还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毅、贺龙、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曾山、邓颖超、滕代远、饶漱石、廖承志、陈伯达、刘澜涛十五人和李维汉、杨尚昆等中央、中央军委重要工作人员十人。这是中共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这次会议 ,是在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战略决战即将开始的时刻召开的。经过两年的作战 ,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 ,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七万人发展到二百八十八万人 ,同国民党军总兵力的对比已从开始时的一比三点三七 ,变为一比一点三 ;由于战斗中积累的新经验和新式整军运动 ,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涨 ,军政素质大为提高 ,武器装备得到极大改善 ,不但能打运动战 ,而且能打阵地战了。解放区面积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 ,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解放区的城市有五百八十六座 ,占全国城市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 ;人口达一点六八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 ;有一亿人口居住的地区已完成了土地改革 ,广大翻身农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高涨 ;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巩固。许多海外华侨积极声援人民解放战争。同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从原来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为三百

六十五万人，而且内部派系矛盾加剧，士气低落，战斗力大为削弱；卫立煌、傅作义、刘峙、白崇禧、胡宗南五大战略集团，已处在孤立被动的困境；人民对国民党的信任已丧失殆尽；经济状况更急剧地走向全面崩溃。蒋介石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形的表现，的确是严重而危险的”，已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将要出现一个决定性的重大变动。

九月政治局会议一开始，先由毛泽东作报告。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

打倒国民党后，未来新中国的政权性质是什么？他在报告中第一次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来代替过去所提的工农民主专政。他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想到了这个问题，这次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

关于新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他批评了“新资本主义”的提法，“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不起决定作用。所以，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他还说：“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的、只要农业来

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

会议就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刘少奇发言说：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以前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上来计划了。邓小平插话说：真正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还没有过。刘少奇接着说：现在我们要准备大的会战，消灭它两三个兵团，这一关也没有过。这两关过了，那就解决了。锦州、济南的会战，如果他们的援兵来，那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朱德插话说：将来在徐州会战的可能是最大的。刘少奇接着又说：这种思想要在主要将领中大大宣传，解释清楚，这就是围城打援。

周恩来就军事工作作了一个系统的发言。他说：争取五年胜利是根据过去两年经验所作的谨慎的估计。如果蒋介石垮台早些，胜利来得更快。如果美国出兵，困难要大些。我们今天，自然还是争取五年胜利。

他提出第三年军事计划的要点：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之于敌，“并且要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今后仍应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可能增多，使攻坚和野战互相结合。军队组织也要逐渐走向更加正规化、集中化。并且指出：第三年的作战，“重心在中原”，“北线重心在北宁路”。他还谈到第三年军队建设的方针：充实野战军，努力建立特种部队，加强地方武装，精简后方机关。统一全军编制的问题，也应该在这次会上确定下来。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两年来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这次会上什么都讲了，连前途问题都讲了。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现在战争已经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些，可以带确定成分地来讲了。同时，要充分估计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这次会

议也作了估计。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两个阶段的过渡问题，少奇同志讲得很好。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至于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

十月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将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和决定向全党通报。通知中强调：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并且指出：为了“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和“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应该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

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为最后打倒蒋介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作了重要准备。

当时，国民党全部军事力量三百六十五万人中的百分之七十集中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的第一线，其中正规军二百四十九个旅，用于北线的有九十九个旅，南线的有一百五十个旅。它的主要战略集团已处在十分孤立被动的地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正是根据这种情况，决定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的第三年中仍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要求全军歼敌正规军一百五十个旅左右，并夺取北平、天津、沈阳以外的一切城市。

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利得多：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已可集中、机动地使用；部队的素质有了极大提高，炮兵和工兵得到加强；原来被分



割的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处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人民支援战争的潜力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却被包围在几个孤立的据点中，战斗力大为削弱，部分高级将领正在寻求出路，酝酿反战起义。

但是，困难还是很大的：有居民三十至七十万人的太原、济南、长春等城市，国民党守军各在十万人以上，那里的城防工事经过多年加修已达到堡垒化的程度，被他们自诩为“固若金汤”；国民党军队鉴于连遭惨败的教训，已改取重兵固守、诸兵团驰援的会战方式；人民解放军还没有海空军的配合和支援，也缺乏现代化的后勤运输保障；除东北战场外，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都没有取得优势。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反复地进行权衡。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毛泽东常常用来指导红军作战的一句名言。他恪守这个原则。对如何攻克国民党军重兵据守的大城市，如何对付国民党军几个兵团增援这两个人民解放军面对的新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他对徐向前部采取以坑道爆破为主的方法来攻克坚固设防的临汾的经验，极为称道。对进攻重要城市时敌军可能大举增援的问题，他也早已向林彪等指出：“你们应以敌人必然增援为自己作战计划的基础”，在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法上都要保障能阻止或歼灭援敌的胜利。“在作战实施中，依据城敌与援敌两方面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变化，你们可以酌量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在某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打援方面（这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攻城方面。”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作战方法，对不久发动的济南战役和以后的战略大决战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济南是山东的省会，位于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的交会处。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正规军三个整编师的九个旅和非正规军五个保安旅等十万余人，依托济



南内城、外城和商埠构成基本防御阵地，并以东山和飞机场等坚固工事作为屏障。蒋介石为了确保济南，还拟定了一个从徐州派出邱清泉、黄百韬、李弥三个兵团北上增援的“会战计划”。

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认为，攻打济南将“是一次严重作战”。他在八月十二日致电粟裕等，从对豫东战役的分析中作出判断：解放军如果真打济南，徐州的三个兵团一定会北上增援；但在刚发生“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受重创”的情况下，很可能采取“谨慎集结、缓缓推进”的方法。他预计这次战役的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也就是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就是既攻克济南，又歼灭援敌的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他向华东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既达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根据这个决策，华东野战军的具体部署是：以山东兵团加一个纵队担负攻城；以六至七个纵队在兖州、钜野间“夹运（河）而阵，并构筑几道防御工事，以便随时转移兵力于运东或运西，阻击与歼灭敌援。”二十八日，毛泽东又决定中原野战军当济南徐州吃紧、位于信阳和郑州的张轸孙元良两兵团被迫移动时，在运动中发起攻击，歼其一部，以配合济南战役的进行。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给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的电报中，就攻济打援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了明确的说明：“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他又说明这

种部署在遇到情况变化时可以予以改变，如：援敌已被阻住而攻城需要增加兵力时，可从打援方面抽调兵力参加攻城；在攻城不能短期解决战斗，而援敌又已大举进犯，非歼灭援敌不能继续攻城的情况下，则应从攻城兵团中抽调一部至半数兵力加入打援。他还指出：攻城部署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于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同时指出：“整个战役应争取一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发点。”并规定：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这样，毛泽东就从战略运筹到战役部署的方方面面，完成了对济南战役的基本决策。

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和军委的指示，经过周密侦察和准备，于九月十六日发起济南战役，只经过八天的战斗，就全歼国民党守军十万余人（其中，争取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二万余人在战场上起义），攻克了济南城。从徐州北上的邱清泉兵团一部，因为害怕被歼，停留在城武、定陶地区不敢前进。另外两个兵团还没有在徐州集结完毕，济南已告解放。蒋介石的增援计划便胎死腹中。

济南的攻克，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和国际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杜聿明评论道：济南守军的被歼，“可以说蒋军的‘重点防御’计划已被击破”。美联社在九月二十六日评论道：“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日本的《朝日新闻》在同一天评论道：“中国的内战进入了一个极重要的新阶段。”

济南战役的胜利给了解放区军民巨大的鼓舞，各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纷纷致电祝贺称：济南的解放“创造

了我人民解放军攻坚解放大城市的新纪录”，“使我华北华东各解放区更加全面的联成一片”，表示要加紧作战，“争取新的胜利”。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济南战役胜利的意义给予极高的评价，指出：“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最严重的打击之一。”“华东和中原的全部解放，已经更加迫近。”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就是“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也不除外了。

他们还从济南战役的胜利中总结出解决国民党重兵集团的两条经验：一是“攻济打援”的战法；二是争取国民党军队举行战场起义。正如朱德所说：“吴化文的起义，我们不能过低估计，对我们打下济南起了相当作用。今后的作战，就是需要有这样的起义。”

济南战役，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把秋季攻势引向战略决战的起点。周恩来后来说道：“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许谭，华东局电，1948年7月14日。

中央军委致许谭，并告粟陈唐张电，1948年7月16日。

《祝五路大捷》，《时事学习材料》，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6月版，第218页。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电，1948年7月22日。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7月30日。

中央军委致彭张赵，并告西北局电，1948年8月15日。

中共中央致林彪、东北局电，1948年8月15日。

毛泽东致林彪电，1948年8月20日。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8年8月22日。

中共中央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唐，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西北局，彭张赵，徐周，许谭，杨罗电，1948年7月17日。

毛泽东致李济深等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电，1948年8月1日。

中共中央关于揭破敌人的和平阴谋的指示，1948年7月1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8年9月8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8年9月。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5月7日。

中央军委致粟陈唐张，并告许王谭，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8月12日。

中央军委致许世友，并告粟谭陈，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9月11日。

## 三十七、大决战的日日夜夜（上）

人们期待已久的战略大决战终于来到了。

这次大决战，是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一环紧扣一环地组成的。三大战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旅），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多人。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历史上，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丽篇章。

这场气势磅礴的大决战，生动地体现出毛泽东作为卓越的军事家那种高瞻远瞩、全局在胸的战略眼光和多谋善断的惊人胆略。当决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还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更比人民解放军好。南京政府仍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毛泽东不仅看透这个表面上的庞然大物其实已异常虚弱，无法摆脱战备上全面被动的地位；并且敏锐地察觉他们正打算实行战略撤退而一时还举棋不定，难下决心。正是在这种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依据对客观形势的冷静分析，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抓住时机，发动了这场人民解放战争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战略大决战。

这场大决战，是从辽沈战役开始的。

为什么毛泽东要选择东北战场作为这场大决战的起点？叶剑英作过详细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择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

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东北敌人的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在敌军方面：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联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那时候，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还有四个兵团，十四个军，四十四师，加上地方武装共五十五万人，但已经被分割和压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块互不联系的据点和地区内。东北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中歼灭了国民党军队近三十万人，自身也迅速壮大，野战部队已发展到五十三个师，加上地方部队已超过一百万人，经过近半年的大练兵，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有很大的提高。人民解放军已占有显著优势。

对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块孤立的据点，先从哪里打起？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毛泽东还在陕北时就曾致电东北野战军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设想。

电报说：“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原故。”他问道：“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滦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并着重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但当时毛泽东还是在征求意见，并没有下最后的决断。林彪对主力从北满远道南下攻打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并在周围有若干据点的锦州却顾虑重重，担心如果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从华北和海上增援，将会陷解放军于被动地位，再三提议先打长春，并在四月十八日报告军委，强调进攻长春的有利条件，“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先打长春，而又指出：“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五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以两个纵队试攻，发现攻占长春并不像预期那样容易，改用严密围困的办法。

七月二十日，林罗刘将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后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到八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的意见上报军委。二十二日又致电军委：“如华北敌人确实空虚，则我军南下与晋察冀〔部队〕配合作战，则有全部歼灭敌人，夺取天津、北平的重大可能；同时，亦必然引起长春、沈阳敌人撤退，达到解放东北的可能。”同时，提出一个要求：“如能将傅作义调动一两个军向西去，我

们就可能全部歼灭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唐山、大同之敌的把握。”

毛泽东在接到这个电报后，就在二十二日深夜复电林罗刘：“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上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并指示他们要加紧进行政治动员和粮食准备，否则八月间还不能打响；关于具体作战计划，望他们详加考虑，拟出全盘方案电告。

为了将傅作义主力向西引开，以配合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作战，毛泽东八月三日在西柏坡召见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华北第二兵团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一起向他们交待“东北打，华北牵”的任务。毛泽东先让聂、杨看了由他起草的七月二十二日、七月三十日给林罗刘的两份电报，在聂、杨表示完全同意后，毛泽东宣布组成华北第三兵团，由杨成武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二十天内完成一切准备，进军绥远，开辟新的战场，把傅作义部主力拖到平绥线，配合东北作战。并问杨成武有什么困难？杨成武回答说：“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毛泽东笑了笑，说：“不对，出兵绥远，困难是很多的！”他一一作了分析：绥远是傅作义的老窝，他搞坚壁清野，你们去了会吃不上饭；要华北供给支援你们，也是很困难的，还有战斗可能很不顺手。毛泽东要他们把困难想透，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做好充分的准备。杨成武听后，很受感动：“毛主席日理万机，全国各个战场都需要他呕心沥血，真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既向部下交待任务，又为部下把执行任务的困难想透。他是那样了解情况，全国的各个战场上就如同同一盘棋，全在他的指掌之中。”



八月八日和十一日，林、罗、刘又两次致电中央军委，先是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后来又提出：“南下则因大批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毛泽东接电后，在九日电告林罗刘：杨成武部已确定在二十一日出动，并指出：“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在十二日又电告他们：“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杨部孤军早出，如被傅作义赶走，对于战局有何利益？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的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人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毛泽东在这个电报的最后，严厉地指出：“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八月十三日，林罗刘致电军委和毛泽东，承认对北宁线的敌情是轻信了一些不确实的消息，作了错误的判断。关于南下问题，“目前仍尽力争取早日出动”。九月三日，林彪、罗荣桓致电军委报告了南下作战的具体部署：我军拟以靠近北宁线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对长春

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

九月五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同意这个部署。指出：北宁线上各处敌军互相孤立，均好歼击，你们可以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在此线上作战补给较便利，这又是中间突破的方法，使两翼敌人（卫立煌、傅作义）互相孤立，因此你们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电报中还谈了对敌情的估计：“你们主要要对付的敌人，目前仍然是卫立煌，因此你们现以七个纵队又六个独立师位于新民及沈长线是正确的。”长春和沈阳的敌军“恐怕要在你们打锦州时，才不得不出动”。

接着，毛泽东便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要求东北野战军“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九月七日，也就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考虑到在东北工作的领导人不能抽身前来参加会议，就以军委的名义致电林罗，告诉他们中央关于全国战略任务的计划，要他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如果在你们实行锦、榆、唐战役期间，沈、长之敌倾巢来援，你们便可以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这个电报，以《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为题，被收入《毛泽东选集》。

九月十日，林彪、罗荣桓态度明朗地报告军委：完全同意军委所指示的前途与任务，认为可能和应当争取东北与华北战局的根本变化。并称：已在北宁线附近的部队于

十二日在锦州、义县间打响，北线主力于十三日起从四平街、长春附近南下。

这时，在东北国民党军队五十五万人中，由卫立煌直接指挥的两个兵团共三十万人驻守在沈阳地区；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领的一个兵团及保安部队共十万人驻守在长春；由另一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一个兵团及保安部队共十五万人，防守义县到山海关一线，主要兵力在锦州、锦西。在坚守长、沈，还是将长、沈主力撤至锦州的问题上，蒋介石同卫立煌等东北高级将领之间的争论正日趋激烈。

东北野战军在九月十二日发起强大攻势。二十六日，林罗报告军委：准备在二十七日攻义县，得手后接着打锦西、兴城，再打山海关，如果敌军已逃，就回头打锦州。二十七日，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致电林罗，批准他们的计划，同时指出：歼灭义县等五处之敌后，如果先打出海关然后再回头打锦州，则劳师费时，给沈阳之敌以增援时间。不如先打锦州，然后攻山海关、滦县、唐山，如有可能直迫天津城下。同一天，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战争第三年全军歼敌任务的电报中，又把原来由东北野战军和华北两个兵团共同担负歼敌三十五个旅的任务，改为分配东北野战军歼敌三十六个旅，华北两个兵团另行担负歼敌十二个旅。这是对预定作战任务的重大改变。

林彪等在九月二十八日定下“先攻锦州，再打锦西”的决心后，第二天将具体部署报告军委；并称：“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已有密息证明）。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毛泽东接电后，十分高兴，在三十日复电称：“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

这样，随着东北战场局势的实际演进，经过毛泽东、中央军委同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反复磋商，终于将初定的北宁线秋季攻势，发展成一举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的辽沈决战。

东北的国民党军队，长时间内一直没有察觉东北野战军主力会南下奔袭北宁线，关闭它通往关内的大门。守在锦州的范汉杰，在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东北野战军包围义县的危急情况下，才连电蒋介石乞援。蒋介石命令卫立煌从沈阳出兵援锦，卫立煌拒不接受。蒋介石在九月二十六日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飞赴沈阳监督卫立煌执行援锦命令，卫立煌仍坚持拒绝执行。蒋介石得到顾祝同的报告后，在三十日飞北平，调集第六十二、九十二军等部共五个师，并决定放弃烟台抽出第三十九军，经海运到葫芦岛登陆，由侯镜如指挥组成援锦东进兵团。十月二日，蒋介石又飞赴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并命令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

“这次沈阳军队直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完全交给你负责，如有贻误，也唯你一人是问。”廖耀湘表示：“沈阳主力先集中于新民、彰武地区，完成一切准备，俟锦、葫两地军队会师之后，再东西对进，以夹击共产党军队，才是万全之策。”得到蒋介石的默许。

当日晨五时，毛泽东签发由周恩来起草的东北野战军的指示：因傅作义部九个步骑师向绥东寻杨成武部作战，杨罗耿兵团不能不到平张段，予以配合。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

林彪在获悉葫芦岛已开到国民党援军四个师、华北的杨罗耿兵团又因傅作义部向绥东进攻而不能开到山海关至天津段作战这两个消息后，深恐打锦州时陷入沈阳、葫芦岛两大援敌的夹击中，攻锦决心再次动摇。十月二日深夜，由林罗刘致电军委，提出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锦

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但认为，攻锦州需要相当时间，而葫芦岛方向的援敌可集中五、六个师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挡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第二个方案，回师打长春。估计经过几个月的围困，“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到半月到二十天时间”。并称：“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提的虽然是两个方案，它的基本倾向十分清楚：就是放弃北宁路作战，仍然回师打长春。电报发出后，“罗荣桓政委再三考虑，认为不妥”，“于是他说服了林彪撤回这个电报，可电报已经发出，罗荣桓政委便亲自起草撤销这个电报和再增加北宁路作战兵力的电报报军委。”这就是十月三日上午九时的电报，里面说：“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军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并重新调整了部署。

中央军委在十月三日清晨四时先收到林罗刘前一个电报，毛泽东、周恩来看后都感到十分不安。毛泽东立刻复电，斩钉截铁地指出：“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并称：五月和七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同时询问道：你们指挥所现到何处？望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

这封电报发出后，毛泽东仍不放心。两小时后，他又再次致电林罗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电报中继续分析了先打长春再回头打锦州的诸多不利后，指出：“只要打下

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望你们深刻地计算到这一点，并望见复。”

电报发出后一个多小时，军委收到林罗刘第二个电报，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在四日清晨六时电复林罗刘说：“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电报接着说：从你们部队开始行动起到今天差不多已有一个月之久，你们才把攻击重点问题弄清楚。从这件事，你们应取得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你们的指挥所应先于部队移动到达所欲攻击的方向去，由于你们没有这样做，致使你们的眼光长期受到限制；第二个教训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而不要平分兵力。并且表示：“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同时指示：蒋介石已到沈阳，不过是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他讲些什么，你们完全不要理他，坚决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部署做去。”

按照上述部署，十月五日，林罗刘率领指挥所到达锦州西北二十公里的牯牛屯。接着，林彪带了担任主攻的纵队领导人详细勘察锦州周围地形后，确定了攻锦步骤。十月九日至十三日，扫清外围据点。十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罗刘电，指出：从你们开始攻击锦州之日起，一个时期内是你们战局紧张期间，望你们每两日或每三日以敌情和我情电告我们一次。毛泽东这时已在考虑战局下一步如何发展的问题。电报中说：“这一时期的战局，很可能如你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为极有利的形势，即不但能歼灭锦州守敌，而且能歼灭葫、锦援敌之一部，而且能歼灭长春逃敌之一部或大部。如果沈阳援敌进至大凌河以北地区，恰当你们业已攻克锦州，使你们有可能转移兵力将该敌加以包围的话，那就也可能歼灭沈阳援敌。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

十月十四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只经过三十一小时的战斗，就攻克了锦州。在锦州东西两侧进行阻援的部队，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分别从沈阳和葫芦岛增援的企图，保障了攻锦的胜利。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作战的成功，致电林罗刘说：锦州作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21)锦州的解放，对于辽沈战役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就像关上了东北的大门，把国民党方面在东北战场和华北战场这两大战略集团分割开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被俘后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22)

在锦州攻克后，困守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举行起义，新七军投诚，郑洞国率领残部放下武器。十月二十一日，长春和平解放。从沈阳西出后徘徊于新民、彰武地区的廖耀湘兵团十万之众，在蒋介石“规复锦州”的严令下，在十月二十日向黑山、大虎山攻击前进。毛泽东批准林彪、罗荣桓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予以歼灭。十月二十五日，当廖耀湘兵团转向营口撤退时，东北野战军从四面八方将它分割包围，经过两天激战，将廖耀湘兵团全部歼灭。紧接着，大军又乘胜挥师东进，到十一月二日，解放了沈阳和营口。九日，收复锦西和葫芦岛。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辽沈决战历时五十二天，东北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歼灭了东北人，其中包括由美国装备并训练、曾在印缅战场作战的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取得震惊中外的巨大胜利。

辽沈决战的结果，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是致命的一击，引起了全国战局的急转直下。蒋介石在北平和南京两次吐血。他后来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东北一经沦



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形势也就不可收拾了。”路透社记者评论道：“国民党在满洲的军事挫败，目前已使蒋介石政府比过去二十年存在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崩溃的边缘。”

辽沈决战的胜利，对解放战争来说，大大加速了胜利的进程。人民解放军不仅有了巩固的有较强工业基础的战备后方，拥有一支强大的战备机动部队——七十多万人的东北野战军，而且取得了在战略协同下进行大会战的丰富经验，这对于整个战略决战的进一步展开和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全东北解放的贺电中写道：

“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积极援助下，从一九四五年冬季以来就曾经用极大力量来抢占东北，先后投入兵力及收编伪军胡匪共达一百一十万人。依靠我东北前后方全体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并得到我关内各解放区的胜利配合，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一百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土地和三千七百万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23)

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星火燎原》选编之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6、7页。

毛泽东致林罗刘，并朱刘电，1948年2月7日。

毛泽东致林罗高陈李刘谭电，1948年4月22日。

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7月20日。

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7月22日。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电,1948年7月22日。

杨成武：《战华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31、132页。

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8月11日。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杨罗耿电，1948年8月9日。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8月12日。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9月5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35、1336页。

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9月29日。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9月30日。

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0月2日。

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辽沈决战》上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16页。

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0月3日。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0月3日17时。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电，1948年10月4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37页。

(21)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0月9日。

(22)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辽沈决战》上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27页。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445页。

## 三十八、大决战的日日夜夜（下）

辽沈战役一结束，南线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便开始了。

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战役。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下的四个兵团和三个绥靖区部队，加上以后从华中增援的黄维兵团等部，总兵力达八十多万人。其中，邱清泉兵团的第五军和黄维兵团的第十八军是南京政府仅存的两支最精锐的主力部队。叶剑英曾这样分析：“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拦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人民解放军参加这次战役的，有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还有华东、中原军区的地方部队，总共约六十多万人，数量少于敌军，装备和交通运输条件更远不如对方。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东北战场上不同。

当时，蒋介石的打算是：在徐州地区布下重兵，既可寻求同解放军主力决战，又可以退而作为长江一线的屏障，保住它的根本重地——南京和上海；当战局对它不利时，还可以将主力撤至江南，巩固长江防线，阻止解放军过江。因此，如果不能抓住战机，在徐州地区消灭它的主力，让刘峙集团缩回江南，就会给以后的渡江作战和解放江南广大地区带来许多困难，甚至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作出歼灭刘峙集团于徐州地区这个决断，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魄力。

确定淮海战役的规模和部署，有一个发展过程。最早提出发起淮海战役这个建议的，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九月二十四日清晨，当人民解放军已突入济南内城进行巷战时，他致电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提出为了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并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如果“全军即进入休整，如此对部队有好处，但易失去适宜作战——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于敌人之精神压力”。第二天中午，刘伯承、陈毅、李达致电中央军委：“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当晚十九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并且明确地指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这里说的“黄兵团”，是指位于徐州东侧、由黄百韬率领的第七兵团。当时所说的“淮海战役”，准备夺取两淮（淮阴、淮安）、海州，打通山东和苏北的联系，威胁长江北岸，为下一步在徐州、浦口线上的作战创造有利条件，还不是作为南线战略决战的淮海战役。

电报发出后，毛泽东继续观察和思考着。他很快觉察到，这次战役的规模和影响将比原来预想的大得多。九月二十八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黄兵团调回新安镇地区业已证实。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新安镇地区距离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甚快。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十月十一日，他又再次电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兵团，完成中央突破”；并且

更着重地提出：“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及阻击及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成歼灭黄兵团三个师之目的。这一部署，大体如同九月间攻济打援的部署，否则不能达成歼灭黄兵团三个师之目的。”像这样“用一半以上兵力”来打援的巨大决心和部署，完全出乎国民党当局的意料之外。它对以后保障淮海战役的初战大捷有着巨大的意义。

由于预见到淮海战役的规模将越打越大，毛泽东立刻考虑到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这两支大军并肩作战的问题，在十月十一日那个电报中提出：正在徐州以西的豫东地区的“孙元良三个师现将东进，望刘陈邓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同一天，他又致电叮嘱中原野战军：“否则，孙兵团加至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野的新作战。”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中原野战军在二十二日以突然动作攻克郑州，消灭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回忆道：“从打郑州开始，淮海战役即成为华野、中野两支大军共同执行的任务了。正如邓小平政委引用毛泽东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

就在中原野战军攻克郑州的同一天，毛泽东又对他们的下一步行动提出新的要求：“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县，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可以清楚地看到，把淮海战役的战略目标扩大为力争包围并歼灭徐州“剿总”刘峙全军的巨大决心，到这时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东北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有利形势面前，淮海战役应该怎样打？毛泽东觉得原定的在新安镇地区歼灭

黄百韬兵团后华野主力转向淮安、淮阴地区的部署已不能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十一月七日，即淮海战役发起后的第二天，他致电华东并告中原野战军的领导人，提出：第一仗估计需要十天左右时间，力争歼灭黄百韬等部廿一二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进。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这样，他对淮海战役规模的构思又推进了一步。十一月九日，他在接到粟裕、张震关于“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歼灭之”的建议后，立即在九日起草了一份“佳亥”电，明确提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至此，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即毛泽东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致中原、华东领导人电报中提到的“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便最终确立了。

毛泽东历来主张：要多谋善断。在淮海战役正式发动前的一个多月中，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指挥员反复磋商，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从多种方案中进行比较选择，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及时地调整部署，作出战略决策。因此，当战役一开始，便能成竹在胸地将既定的作战方案一步步地付诸实施，并能从容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当时担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的张震后来评论道：“毛主席高瞻远瞩，制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又博采众长，使这个方针得到补充和进一步完善。战役第一阶段的进攻方向选定在徐州以东，歼灭对象是黄百韬兵团。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协同华野作战。在总的战略意图下，最高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员之间经过酝酿磋商，使战役的具体部署更加缜密。”这是淮海战役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南线战略决战能够如此有条不紊地胜利进行的重要原因。

基本作战方案已经确定，毛泽东仍然十分谨慎，没有因此而完全放下心来。十月二十七日，他致电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再次叮嘱：“你们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第二天，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向中央军委并刘、陈、邓报告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计划。三十日，毛泽东复电：“计划与部署甚好，请即照此施行。”并且提议：“各处一起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互相不能照顾。”陈、邓方面“亦请同时动作”。次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这个要求立刻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十一月三日，毛泽东致电陈、邓：“关于钳制邱孙兵团的‘具体攻击任务，由你们按当面情况临机决定’。”

一场大战很快就要开始了。

十一月四日，华东野战军下达淮海战役攻击命令。六日傍晚，华野向徐州东侧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出击，淮海战役开始。第二天，毛泽东致电粟裕等，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攻击部署，并说：“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华东野战军发动攻击后，黄百韬率领所辖五个军慌忙西撤，企图退往徐州。八日下午，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都是地下党员）率第五十九军全部、七十七军大部二万三千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使徐州的东北大门敞开，解放军得以迅猛地直插徐州以东，并造成国民党军上下混乱。刘峙不得不把原在徐州以东掩护黄兵团的李弥兵团撤回，并急调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共同守卫徐州。

十一月十一日，解放军切断黄百韬撤往徐州的退路，将黄百韬兵团合围于以碾庄圩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同一天，蒋介石一面命令黄百韬固守待援，一面派杜聿明到徐州指挥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东援。邱、李两兵团在飞机、坦克、榴弹炮掩护下，向解放军阵地发动猛攻，但没有估计到华东野战军“用一半以上兵力”来打援，攻势得不到进展。二十二日，黄百韬兵团在解放军总攻下，全部被歼。

当华东野战军主力正在围歼黄百韬兵团时，中原野战军主力根据中央军委十一月九日和十日的电令在十六日攻占宿县。宿县是徐州至蚌埠间铁路线上的重镇，是徐州“剿总”的重要补给基地。攻克宿县，就一举切断徐蚌线，完成了对徐州的包围。这是一个大举动，不仅有力地保障了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并且为下一步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立刻敏锐地看出：战场上的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他在十一月十四日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指出：“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两天后，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成立中共淮海前线总前委的电报，明确地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全歼黄百韬兵团，标志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结束。下一步的主攻方向指向哪里？还在十一月七日，毛泽东曾预计第二仗是打从河南赶来淮北的黄维兵团。但一切



作战都将依战场实际情况而定。到十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期间，战场的情况是：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由徐州东援的邱、李两兵团被阻于林佟山、东贺村一线，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位于蚌埠地区，黄维兵团正由阜阳沙河以西东进。据此，毛泽东同刘、陈、邓和粟裕经过磋商预定：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就势转兵歼灭邱、李兵团，将它打得不能动弹；或以华野一部南下协同中野打黄维兵团。十一月十九日，黄百韬兵团仍未歼灭，而黄维兵团已进抵蒙城东西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十九日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我们决心先打黄维”。当天，毛泽东复电，同意中原野战军以主力歼击黄维；华东野战军除继续围歼黄百韬兵团并阻击邱、李、孙外，抽出必要兵力对付李延年兵团，以求歼灭至少阻止李延年兵团，保障中原野战军侧翼不受威胁。二十三日，刘、陈、邓又向中央军委报告：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迟迟不进，黄维兵团远道疲劳，孤军冒进，态势突出，“歼击黄维时机甚好”，决心在浍河以北布置袋形阵地诱敌深入，聚歼黄维兵团。第二天，毛泽东复电：“（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这样，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歼击黄维兵团的作战方针便确定下来了。

先打黄维兵团的决心确定下来后，毛泽东稍稍松了一口气。二十四日他给清华大学教授吴晗写了一封信说：“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吴晗对毛泽东在指挥战略决战的紧张时刻，还读



完了他所写《朱元璋传》的修改稿，并且提出使他在理论上得到启发的意见，十分感动。

黄维所率领的第十二兵团，辖有四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大部分为美械装备，是蒋介石的精锐兵团。其中的第十八军是陈诚的嫡系部队，有很强的战斗力。淮海战役开始时，他们被中原野战军一部牵制在豫西山区奔波不息，人马疲惫。以后，因为淮海战场局势危急，未及休整，匆忙东调。他们带着大量重武器，闯入河流纵横的淮北，遭到解放军小部队和地方武装的不断袭击，行动迟缓，先头部队到十一月下旬才进至蒙城地区，企图同由徐州南下的邱、孙两兵团和从蚌埠北上的李、刘两兵团，重占宿县，恢复徐州和蚌埠之间的交通，但彼此还隔有相当的距离。

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从十一月二十三日（全歼黄百韬兵团之日）开始。二十五日，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合围于双堆集地区。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总前委：“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极好极慰。但请你们用极大注意力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两天后，又向他们提出下一步的任务：“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是解决徐蚌两处之敌，夺取徐、蚌。”（21）中原野战军在得到华东野战军一部的加强后，经过激战，至十二月十五日全歼黄维兵团，胜利地结束了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

正当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时，十一月三十日，杜聿明鉴于徐州已陷于孤立无援状态，经同蒋介石磋商后，慌忙放弃徐州，率领前进指挥部和邱、李、孙兵团共三十万人向西南的永城方向撤退。毛泽东在二十八日已要求总前委注意：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十二月二日，又致电华东野战军：“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击，不要单靠尾追。”（22）四日，华东野战军将撤退中已混乱不堪的杜聿明集团合围于徐州西南六十

五公里的陈官庄地区。孙元良兵团在单独突围时被歼。解放军采取南面阻击、东西北三面攻击的方针，逐步缩小包围圈。

十二月十六日，黄维兵团被歼的第二天，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这时平津战役已经开始，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在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南下，毛泽东指示在南线留下杜聿明集团，暂时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由于歼灭杜聿明已不成问题，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就地休整，并加强政治攻势。毛泽东为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向被围困的国民党军队阵地反复广播，它劈头就指出：“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广播稿最后要求他们：

“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23）

从十二月十六日以后的二十天中，天气骤变，雨雪交加，国民党军队粮弹两缺，饥寒交迫，士兵饿死冻死的越来越多。蒋介石派飞机空投的少量粮弹，根本无济于事。人民解放军就地休整。后方的几百万民工为了支援前线，源源不断地送来粮食弹药等，使解放军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这是取得胜利的保障。陈毅多次说过：“华东战场上的国民党反动派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把他推倒的。”（24）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陷入绝境的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开始瓦解。十日，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历时六十六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五十五万五千多人。国民党军队在南线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已得到解放。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和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武汉已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下。整个南线战局已经根本改观。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唯一的人民解放军在总兵力上少于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下进行的。毛泽东称赞前线指挥员们：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回忆道：“淮海战役既是与敌人斗力，又是与敌人斗智。”“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是克敌制胜的根本依据。前线指挥员的胆略、智慧和威望，也是不可缺少的。他们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积极贯彻和补充作战方针，并根据情况变化，采取机断处置，适时调整部署，这个环节如稍有失误，也不可能取得战役的全胜，甚至弹打鸟飞，功亏一篑。毛主席十分重视了解下情和发扬集体智慧，善于集中下级的正确意见，充分发挥前线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并给他们以临机处置的权力，使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得到更好的贯彻，这更证明了毛主席的伟大英明。”（25）

当济南战役、辽沈战役相继胜利结束，淮海战役中黄百韬兵团已被全歼、黄维兵团正被围歼时，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屡遭打击后，又失去南北两面的依托，军心动摇，已陷入十分孤立和混乱的境地。

那时，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除一个军位于归绥、一个师位于大同外，其余主力四个兵团、十二个军连同其他部队五十多万人，沿着北宁铁路和平绥铁路，分驻在东起滦县、西迄张家口的五百多公里狭长地带，摆

成一字长蛇阵。这些部队中,百分之四十属于傅作义系统,百分之六十属于蒋介石系统,彼此间存在矛盾。在面临东北和华北人民解放军的联合打击面前,他们在总兵力上已居于劣势,处境极为不利。在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相继发动后,这是国民党方面唯一可能机动的兵力。

对如何解决华北问题,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早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在给林彪、罗荣桓的一份电报中就作出大致的规划。这份电报明确地指出:为了将来解放北宁、长春两路和平、津、沈、长四城,东北和华北必须密切配合,有计划地、逐步地建立北满、南满、冀热辽强大根据地。一九四八年八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召见聂荣臻、杨成武时,又对他们说:“现在中央的战略决策是,先解放东北,然后再回过头来解放华北。因此,你们目前的战略任务就是配合东北作战,抓住华北的敌人,不让他们增援东北。”(26)十月三十一日,当东北野战军即将攻占沈阳、营口时,毛泽东部署东北主力先抽两个纵队即行南下,其他部队准备在下一步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等地,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天在北平开会。同一天,新华社发表他所写的评论《国民党军队北线总崩溃在即》。

蒋介石和傅作义在这种局势下虽已惶惶不可终日,但仍以为:在辽沈战役这样的大仗刚结束后,东北野战军一定需要有一段时间休整,不可能立即入关,华北的生存还不会马上受到威胁。由于徐蚌会战已有一触即发之势,急需投入更多兵力,长江防线也须加强兵力,蒋介石着设想要傅作义率部南撤,并委傅为“东南军政长官”。但他的主意并没有打定,仍在犹豫之中,考虑到根据地原在绥远的傅作义可能不愿南下,所以又想仍以傅部守平津,阻挡和牵制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的南下,以利争取时间加强江防。傅作义的考虑是:绥远是他的“老家”,但他统

率下的蒋系部队带不去；而且绥远经济落后，不利于扩充实力和长期坚守；暂守平津，有利于扩充实力；如果南下，不但自己的嫡系部队很难带往江南，而且在南下后可能被蒋介石吞并。他有意把蒋系部队摆在北宁线，把傅系部队摆在平绥线，一旦东北解放军入关，蒋系部队首当其冲，而傅系部队在不利情况下可以西撤绥远。这样，蒋、傅各有各的打算，不易取得一致，一时仍采取暂守平津、控制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局变化的决策。

十一月九日，毛泽东签发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一份电报中指出：在人民解放军胜利影响下，傅作义部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并提出扣留傅部在平、张、津、保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27)十五日，东北野战军总部致电军委，建议华北人民解放军除一部监视太原外，“集中力量迅速包围保定或张家口”，切断它同北平的联系，以拖住敌人。“等到东北部队南下后，再同时合力发动攻势，歼灭全部敌人。”(28)毛泽东在第二天复电说：“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曾经考虑过，认为如以杨罗耿位于绥东与杨成武集结一起，可以阻止傅作义部向绥远撤退，但不能阻止傅部及中央军向海上撤退，包围张家口世不能达此目的。”接着，他提出一个独到的设想：“你们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海上逃跑。”但他仍以商量的口气写道：“请你们考虑你们究以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并以结果电告为盼。”(29)

战场的局势发展得很快。就在中央军委发出上述这份电报的十一月十六日，华东野战军对黄百韬兵团发起了总攻，中原野战军也攻克宿县，对徐州地区形成合围。十七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由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

林、罗、刘的电报，指出在南线战局急剧变化的情况下，蒋介石必将考虑长江防线问题，目前他“所能调动的兵力，只有华北、西北两集团，首先必是华北”，因为西北胡宗南集团还负有掩护四川和西南的任务。毛泽东在这里添写道：虽然蒋介石不调动平津一带兵力这一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我们的计划应当放在他可能调动一点上。”电报接着说：“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二十四个师及傅系步骑十六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于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但欲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依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法完成的。”因此，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二十五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另一个是“仍按原计划休整到十二月半然后南进”。对实行后一种方案的后果，毛泽东加写道：“即是说蒋傅要撤就让其撤走，你们则准备于到平津后，无仗可打时，即沿平汉路南下。”(30)十分明显，虽说有两个方案，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倾向于实行第一个方案的。

林罗刘在接到毛泽东十六日的电报后，复电称：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因为在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需要以大力解决；此外部队冬大衣、棉帽、棉鞋均尚未发下。因此，关内部队最好能在东北主力尚未动时，即能包围一股较大敌人，以拖住敌人为好。

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向林罗刘通报：“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接着，便断然作出东北主力迅速入关的决断：“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

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 ” “ 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 ” (31)二十日，他再次致电林罗刘等： “ 先以四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执行隔断平津的任务。 ” 为了使东北主力入关的行动不过早惊动对方，他特别强调： “ 部队行动须十分隐蔽，蒋傅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尚未料到你们主力会马上入关，因此除部队行动十分荫蔽外，请东北局及林罗谭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 ” (32)他还决定以聂荣臻的名义，通过符定一等，要傅作义派可靠代表到石家主，作起义谈判的初步接洽。

傅作义这时虽已通过关系开始接洽起义，但意在 “ 保存实力 ”，并没有拿定主意，还有西逃和南下的可能，而以西逃的可能性较大。聂荣臻回忆道： “ 这时候，东北我军主力尚未入关，如何在他们入关之前，将敌人抑留在华北，不使其南窜或西逃绥远，这是当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考虑的中心问题。经过一再分析，决定从二十兵团包围张家口、宣化入手。 ” (33)毛泽东估计，一旦以迅速动作抓住并包围张家口、宣化后，傅作义将调集他的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等部由北平地区西援。如能在平张线上歼其一部，使傅部不能西逃或南下，便是极大的战略上的胜利。

平津战役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作战先从西线打起。当夜，华北第三兵团对柴沟堡等地发起攻击。傅作义果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立刻命令第三十五军主力和第一百零四军一个师分别乘火车和汽车驰援张家口，并且调原在涿县的第十六军移至昌平、南口，以便在形势不利时保住西撤的通路。这样，傅系主力被牵制在平绥铁路一线，又掩护了东北野战军的入关行动，避免国民党在北平地区的兵力调向东去。十二月五日，原来秘密集结在北平以北



平谷地区待命的东北先遣兵团两个纵队采取突然行动，迅速攻占密云，傅作义判断他们将直下北平，急忙调整部署：命令第三十五军和一百零四军一个师火速撤回北平，并从天津、塘沽等调集第九十二、六十二军和第九十四军主力增防北平。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华北第三兵团迅速包围了张家口，华北第二兵团将从张家口匆忙东撤的傅作义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包围于新保安。接着，东北先遣兵团占领了怀来、康庄、南口。东北野战军指挥所属各纵队，以神速隐蔽的行动，分别由喜峰口，冷口向关内急进，到达冀东集结。这样，解放军便将傅作义集团主力分别包围或吸引在北平和张家口地区，使天津、塘沽、唐山各只有一个军（塘沽还有一个独立师），造成东北野战军主力可以切断平津、津塘之间联系的有利形势。毛泽东欣慰地说：此种形势“对于大局极为有利”。（34）

战局瞬息多变，战机稍纵即逝。毛泽东对正在展开中的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形势进行通盘分析后，作出决策。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等电。这个电报，后来以《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

电报一开始就分析当前的局势：“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和整个北平、天津、塘沽、唐山诸敌，除某几个部队例如三十五军、六十二军、九十四军中的若干个别的师，在依靠工事保守时尚有较强的战斗力外，攻击精神都是很差的，都已成惊弓之鸟，尤其你们入关后是如此。切不可过分估计敌人的战斗力。”并且明确地指出：“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

根据这个判断，电报作出具体部署：“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



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

电报说：敌人现时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

在完成上列部署后，电报规定：“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35）

对这样的作战部署，叶剑英后来评论道：“‘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36）

局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十二月中旬，傅作义将华北“剿总”司令部由北平西郊迁到城内，放弃唐山、芦台，加强塘沽的防守。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派前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从南京飞抵北平，劝傅作义率部南撤。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加强对张家口和新保安的包围，作好攻击的准备；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七纵队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完成了隔断平、津、塘之间的联系。到这时，傅作义集团这只“惊弓之鸟”，已被分割包围而变成笼中之鸟，欲逃无路了。

在完成对平津的包围后，十二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人民解放军先后攻占新保安、解放张家口，将傅系主力基本消灭，使他们无法西逃。毛泽东在布置严密防止平、津国民党军南逃的同时，一再查询攻克塘沽的可能性。他从一些情报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中获悉，大沽口没有码头，轮船不能靠岸，塘沽以西的新河是盐滩不毛之地，而塘沽附近集结有一批国民党的军舰，是天津出海的唯一口岸。因此，要求东北野战军迅速切断天津和塘沽之间的联系。二十一日，又指示：“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港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37)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后来说：“我军本拟首先攻歼塘沽之敌，但因塘沽背面靠海，地势开阔，河流、盐田很多，冬不结冰，既不能从侧后切断敌人退路，又不便从正面展开兵力，而守敌侯镜如的指挥所设在军舰上，随时准备逃跑。”(38)这些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实际情况是不能不加考虑的。二十五日，林彪将第七纵队关于塘沽地形情况的报告转报军委，提出：从地形来看很不好打。二十六日，林彪又向军委报告：平津敌军突围迹象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碍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的攻击时间拟予推迟。第二天，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示林彪：“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并请考虑将迫近两沽之我军向后撤退。敌人见我不去攻击，就不一定会逃跑，若干天后海边封冻，再考虑是否攻击。该敌只有五个师，即使从海上跑掉也不要紧。”同时，又强调：“平津两敌则应严防突围逃跑。”(39)“如果平津两敌确有突围征候，即应断然放弃对两沽之攻击计划，将对两沽兵力移至平津之间。”二十九日，毛泽东更明确地复示林彪：“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40)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在天津国民党守军奉命拒绝和平解决

后，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到十五日攻克天津，歼灭守军十三万人。十七日，塘沽守军乘船南撤，人民解放军于当日解放塘沽。这样，傅作义集团的北平守军已完全没有退路，促成了他们接受和平解决。

毛泽东为了用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对傅作义进行了耐心的工作，既考虑到他的安全（北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属于傅系的只有四个师，其余都是蒋系的部队），又晓以大义，指明正确的出路。

傅作义是华北“剿总”的总司令，但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是不是接受北平的和平解放，对他说来，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方面他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有较深的矛盾，在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时，有把他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反共，跟我们打过仗，他自己有两个军的嫡系部队，整个华北由他统帅的国民党军队有六十万人，不到不得已时，他不可能轻易接受和谈。”（41）事实正是这样，在傅作义还有力可恃、有路可走时，对和谈、起义长时间处于利害权衡和犹豫动摇之中。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对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决定性作用。战场上的胜败，左右着傅作义对和谈的态度。新保安一战中歼灭了他的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张家口的解放又断绝了他的西退之路，傅作义才真正接受和谈。到天津解放、解放军对北平已兵临城下时，他才最后下定决心率部接受和平改编。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要他们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市委直接告诉傅作义：“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

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42)九日，他又表明：“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作义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43)

这以后，经过多次谈判，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和民主人士的积极劝说和促进，特别是在毛泽东发表“八项和平条件”后，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的方式，并在内部做了不少工作，将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二十多万人从一月二十二日起开出城外，进行改编。人民解放军在一月三十一日进驻城内。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谈判的成功，北平的和平解放，使这个文化古都得到了完整的保存，促使国民党军队日益瓦解，大大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傅作义内疚地说：主席，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毛泽东说：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劳很大！当谈到绥远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的是要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等就好过了。”(44)傅作义、邓宝珊听后都受到很大鼓励。

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余人，除归绥、太原、新乡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

外，解放了华北全境。北平国民党军队接受和平改编后，绥远国民党军五万多人，留待以后起义，再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在三月上半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天津、北平、绥远作为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他说：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45）

用这样三种方式来解决国民党的一百多万残余军队，是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歼后的新条件下，毛泽东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互相结合的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它预示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星火燎原》选编之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8 月版，第 8 页。

粟裕致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 年 9 月 24 日。

刘陈李致中央军委并粟电，1948 年 9 月 25 日。

中央军委致饶粟，并告许谭王刘陈李电，1948 年 9 月 25 日。

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刘陈，华东局电，1948 年 9 月 28 日。

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 年 10 月 11 日。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李电，1948 年 10 月 11 日。

李达：《回顾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李达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版，第 283 页。

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陈邓，中原局电，1948 年 10 月 22 日。

张震：《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的作战行动》，《淮海战役·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版，第 24 页。

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陈邓电，1948 年 10 月 27 日。

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刘陈邓电，1948 年 10 月 30 日。

粟裕致中央军委并报陈邓 ,华东局 ,中原局电 ,1948 年 10 月 31 日。

中央军委致陈邓 ,并告刘粟电 ,1948 年 11 月 3 日。

中央军委致粟陈张钟刘 ,并告陈邓 ,华东局及王谭电 ,1948 年 11 月 7 日。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第 1361 页。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 ,并粟陈张 ,告谭王韦吉 ,华东局 ,中原局 ,豫皖苏分局 ,苏北工委 ,华北局电 ,1948 年 11 月 16 日。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 ,并告粟陈张电 ,1948 年 11 月 24 日。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版 ,第 310 页。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 ,并告粟陈张谭王电 ,1948 年 11 月 26 日。

(21)中央军委致刘陈邓 ,并告粟陈张谭王韦吉电 ,1948 年 11 月 28 日。

(22)中央军委致粟陈张谭王 ,并告刘陈邓电 ,1948 年 12 月 2 日。

(23)《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第 1369、1370 页。

(24)陈士榘 :《天翻地覆三年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年 11 月版 ,第 49 页。

(25)张震 :《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的作战行动》,《淮海战役·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版 ,第 33、34 页。

(26)《聂荣臻回忆录》(下) ,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版 ,第 686 页。

(27)中央军委致杨罗耿，杨李李，聂薄滕，徐周，并告林罗刘，程黄电，1948年11月9日。

(28)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1月15日。

(29)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1月16日。

(30)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东北局、华北局电，1948年11月17日。

(31)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1月18日。

(32)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程黄，杨罗耿，东北局电，1948年11月20日。

(33)《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94页。

(34)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程黄，杨罗耿，杨李，并告聂薄滕电，1948年12月10日。

(3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63—1366页。

(36)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星火燎原》选编之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1页。

(37)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2月21日。

(38)刘亚楼：《平津战役的胜利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伟大的战略决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1年6月版，第195页。

(39)中央军委致林彪电，1948年12月26日。

(40)中央军委致林刘电，1948年12月29日。

(41)崔月犁：《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崇高的使命》上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155页。

(42)中央军委致林彪电，1949年1月1日。

(43)中央军委致林聂电，1949年1月9日。

(44)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291页。



(45)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1424—1425 页。

## 三十九、将革命进行到底

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所组成的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国民党政府正像一艘破船那样将从历史上沉没。

面对这种急转直下的不利局势，两年多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把和平之门关死的国民党政府，忽然通过种种渠道，放出要进行“和平谈判”的空气来。

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又拒绝了他所提出的增加美援和公开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声明的要求，因此，不得不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表示要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同中共的“和谈”。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要求同中共和谈的《新年文告》，提出要以保存所谓“宪法”、“法统”及“国军”等作为谈判的前提。这就很清楚：他的目的不过是想保存国民党政府的地位，争取喘息时间，以便重新集结力量，卷土重来。

一向同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趁机以和谈为名，要逼蒋下野以取而代之。他们这样做，是有一定的国际背景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建议：劝告“不孚众望”的“蒋委员长退休”，而让“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李宗仁”，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李宗仁曾向司徒雷登表示：如果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而新的领导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

区”。十二月下旬，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的和谈部署”，加紧施加压力，逼蒋下台。

这场越来越热闹的“和平”活动，使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要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在国际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似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该适可而止。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刻，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辨别力和政治坚定性，及时地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他在党内能得到人们如此普遍的高度信任，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他用两天时间为新华社写成了一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毫不含糊地指出：

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

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他用了一个著名的譬喻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至八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没有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的林伯渠、罗荣桓、陈毅、刘伯承、高岗等这次也来了。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讲了话，他先对形势进行分析，指出：军事方面的形势，比九月会议时不同了。那时说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但慢一点对外公布。九、十、十一、十二，几个月情况变了。阶级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看得很清楚：解放了的城市中，人不走，学生教师不走，资本家不走，职员不走，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来。整个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战线都在崩溃和混乱

中。“今年和明年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今天以前还不能下这个决心。美国是不是不出兵？不要去肯定它。准备它和我们打，以免在事情发生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我们愈坚决，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愈少。最近三个月，美国的政策是摇摆不定。几年来证明一点：美国人并不可怕。我们不乱搞，对侨民不损害他。党内有进步，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学会了政策和策略，一九四九年还要普遍地进行政策教育。接着，他提出了十六项任务，包括要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原则是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可能有右翼分子”。一月八日，他在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他说：打完一仗之后，要立即提出新任务，这样他就不骄傲了，否则就会停止前进。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表明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声明说：

“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长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院；（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

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三十一日午后，毛泽东在他的门口迎接了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和两个随行人员。一见面，米高扬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分同苏共代表面谈，意义自然十分重大。

二月一日到三日，毛泽东同米高扬正式会谈，周恩来、任弼时也参加了。毛泽东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关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新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人民民主专政更合适，更为合情合理。它是由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名义上不这样叫。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民主党派，与我们已合作多年了，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就是说，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是核心，同时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一战线工作。

关于胜利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说，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为此，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中国五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

是可以学会的。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中国经济建设工作的发展可能会快些。

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说，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得很快，解放区的青年们踊跃参军外，我军还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虏人员，缴获的武器、物资也不少。现在战争的人力、物力补充主要来源靠前线。解放军本身也需要逐步现代化。将来中国无需维持过于庞大的兵力，而应实行寓兵于民的方针。

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关于解放战争的发展，毛泽东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在我们的解放战争进程中，还没有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阻拦。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这个形势，在往昔的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关于民族问题，毛泽东说，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几十个民族，汉族人数最多，其他如蒙、回、藏、维吾尔等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中国人并非只指汉族，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人。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民族间出现某些磨擦或纠纷，甚至是矛盾或冲突是难免的。但是今天可以比较容易解决。目前主要的是防止和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和破坏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祸根子。我军向前发展，很快就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了。因此，关于民族问题将会在最近制定出一套相应的方针、政策。

此外，毛泽东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状况，谈到对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以及党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执行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等。二月四日和五日，任弼时和周恩来还分别同米高扬谈了一些问题。

二月六日中午，毛泽东到米高扬的住处，为他送行。第二天，米高扬便乘机回国了。米高扬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送走了米高扬后，毛泽东继续为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紧张的准备。当时，北平刚刚解放，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决定全会仍在西柏坡村举行。



七届二中全会从三月五日开到十三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有十一人，因为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二十人。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

毛泽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是要解决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国民党剩下的一百多万作战部队。他指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以便开展新解放的广大地区的工作。

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他说，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对中国的经济状况，毛泽东分析道：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在现代性的工业经济中，最大的和最重

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占第二位的是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决不可限制得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实行“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我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全国胜利以后，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只要它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它们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毛泽东响亮地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报告的最后部分，毛泽东在热情洋溢地指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巨大意义后，提醒全党要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的滋长，要警惕别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说了一句名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时，又强调地指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所以要普遍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并批评王明所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他说：马恩列斯是先生，我们是学生。现在编了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如果在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他在结论中还谈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问题。

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对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从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两个半月，四分五裂的国民党政府对“全面和平”喊得越来越热闹了。

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兵临长江、南京城内已微闻炮声的情势下，众叛亲离的蒋介石被迫“引退”，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离开南京，由李宗仁出来代行“总统”职务。但蒋介石实际上仍掌握着对国民党政府残存的大权，并在筹谋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李宗仁在蒋介石

“引退”的第二天，发表声明，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看起来，李宗仁政府似乎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开始和谈。其实，他只是想通过和谈，同中共实行“划疆而治”以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

毛泽东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他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还是复电李宗仁表示愿意同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托人转告李宗仁、白崇禧：“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们配合解决蒋系，才能站在人民方面。”

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在石家庄西柏坡接见了以“上海和平代表团”名义赶来的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人，就国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经过两天会谈，双方确认：“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共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致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

就在这一天，李宗仁正在广州劝说迁往那里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立法院迁回南京，遭到“行政院长”孙科的坚拒。一听到新华社广播愿同他进行和谈的消息后，立刻在二月二十五日从广州飞回南京，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了他们的“对共和谈三项原则”：

（一）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共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条件；

（二）有鉴于铁幕内各国之惨痛遭遇，政府断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方提议划疆而治；

（三）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这个“三原则”实质上仍是蒋介石的那一套。李宗仁自己心里也很明白。他后来说：“当然我也完全知道，除非我们能守住长江，使共方在谈判之外，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根据此三项原则来和我们谈判的。至于长江是否能守住，那当然又是另一问题。”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开完七届二中全会，在三月二十三日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他们共坐了十一辆小汽车和十辆大卡车，毛泽东坐的是第二辆中吉普。车队下了山区，就进入华北大平原。行车途中，毛泽东很高兴，在车上不断同警卫人员说笑。他说：“今天又是三月份，为什么老在三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警卫排长阎长林说：“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号撤离延安啊。”“去年三月份呢？”“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三月二十三号，与去年三月二十二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向北平前进了。三年三次大行动都是在三月份。明年三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他又问：“进北平是要进的，但是没有想到有这么快。你们想到了吗？”阎长林说：“我们也没有想到撤离延安两年就进北平了。”毛泽东沉默了一会，说道：“咱们没有想

到，蒋介石更没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

那天本来是准备赶到保定的，因为路不好走，天黑以前就在唐县附近的淑闾村住下了。毛泽东住在村民李大明家里。他的卫士回忆：“这一夜毛主席没有休息，前半夜同村干部座谈；后半夜坐在小凳子上，趴在用木板支的床上写材料。”第二天上午车队继续出发，中午到保定休息吃午饭，傍晚抵达涿县，住在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军部大院里。三月二十五日清晨，他们从涿县改乘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随后坐车到颐和园休息。下午，毛泽东积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到西苑机场，同各界代表一千多人，还有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傅作义等见面，并且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当夜，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在香山住下，毛泽东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他在这里住了半年，到九月二十一日才移居北平城内中南海的菊香书屋。

毛泽东到北平后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三月二十六日，即他们到达北平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开始时间为四月一日；谈判地点为北平；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以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三十一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在香山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毛泽东充满自豪地对他们说：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四月一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首席代表是张治中。从二日到十二日，先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磋商，酝酿协定的方案。

四月八日，为了推动谈判顺利进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张治中。他看了李宗仁的信后对张治中说：德邻先生虽同意按八项条件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看来对战犯的问题还是不放心，你也感到有困难吧？好，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又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再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果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就更好。对于今后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毛泽东同张治中长谈了四个小时，还邀请他一起吃午饭。张治中得知毛泽东、周恩来上一天一夜未睡，就告辞而归。

第二天，毛泽东又同南京代表团的邵力子、章士钊交谈。第三天，同黄绍竑、刘斐谈。毛泽东在询问了黄、刘到北平的生活情况之后，对刘斐说：“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刘斐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泽东很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刘斐说：“蒋介石打不下去，让李宗仁出来求和。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接着又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并扳着指头对刘斐、黄绍竑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



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他踱了几步后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毛泽东留下黄、刘二人一起吃饭。当谈到各人的爱好时，刘斐趁机将他心里还有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地问毛泽东：“您会打麻将吗？”毛泽东回答说：“晓得些，晓得些。”刘斐接着问：“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刘斐回忆说：“毛主席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我也会心地笑了起来。”

为了促成和谈成功，毛泽东还作了许多相应的部署。从四月二日至十一日，分别致电总前委邓小平、陈毅，第二野战军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粟裕、张震，告诉他们：一、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我军勿攻安庆，驻安庆桂军可以撤退等语。我们认为可不攻安庆，让安庆守军向武汉撤退；二、依据谈判情况，决定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到二十二日渡江；三、目前数日内（十一日至十六日）请令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尤其是芜湖、镇江对岸）。

四月十三日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讨论由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协议方案。张治中回忆道：“当时（南京政府）代表团同人有这样的共同认识：对国民党方面，认为失败是肯定的，我们既然注定失败，何必还一定拖累国家和人民。”他们在会后提出一个修正案，包括修改意见四十多条。中共方面经过研究，接受了所提



修改意见中的过半数，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十四日，毛泽东致电前线指挥员告诉他们：“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惟南京李、何、白、顾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此种干涉现已加紧）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要他们做好多种准备。十五日晚，谈判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张治中回忆道：这次会议以后，“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因此，在代表团内部“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并决定派人带文件回南京去，劝国民党政府接受。十六日，毛泽东又致电前线指挥员：“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胥（四月二十日）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他历来主张遇事要作好应付各种可能的准备，叮嘱前线指挥员：“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

四月二十日，南京政府复电，断然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第二天，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根据毛泽东和朱德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乘风破浪，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那天下午，“毛主席起床后，手里拿着《人民日报》号外，从屋里来到了院落的凉亭里。他坐在藤椅上，看起报纸来。因为报纸上登的是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所以他看报纸时心情是很高兴的。看完报纸，也没有在院子里散步，也没有和任何人交谈，他就回到办公室里去了。在办公室里，又把报纸看了一遍，边看边在报纸上画了一些杠杠和圈圈。”看完报纸，他就给刘伯承、邓小平写了贺电，又写了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两句诗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当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二百零四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城市的百分之六十三，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三。上海、青岛等地还驻有美、英等国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胡宗南部正由西北向西南撤退。由于人心已去，士气涣散，已难以组织坚强有力的抵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中，不少人不愿再打内战，正在酝酿起义。大进军的形势十分有利。

为了实现解放全中国的任务，毛泽东经过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和前线指挥员磋商决定，以第一野战军（包括解放太原后的第十八、第十九两兵团）向西北进军；第二、第三野战军担负渡江解放京、沪、杭、苏南、皖南、赣东、浙、闽全省；第四野战军先以一个兵团牵制武汉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三野战军的渡江，尔后在六、七两月执行江汉战役，并完成渡江准备工作，八月渡江。

随着进军形势的胜利发展，特别是上海即将解放，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进军部署作了新的调整。他在电报中指出：“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建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根据正在变化的形势，他在这个电报中分别规定了各野战军下一步的进军目标：第三野战军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第二野战军应准备在两个月以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第四野战军现有两个军渡江，还有六个军约在六月上、中旬渡江，“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并提出：在占领广西之后，四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第一野战军“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七月间，他又决定云南归第二野战军经营。

对解放台湾的问题，毛泽东也在考虑中。七月十日，他写信给周恩来，根据朱德的建议，提出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这样，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就制定出了一个“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战略规划。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毛泽东又提出一系列具体的作战指导方针。

第一，“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这是因为，国民党的残余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主要集中在江南和西北、西南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现在人民解放军在兵力上已占绝对优势，只有把进攻的矛头集中指向各大中城市，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消灭敌人，加速胜利的到来。

第二，“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在渡江后的大进军中，国民党军队几乎是一触即退，尽力避免作战，准备在西南重新站住脚跟，进行顽抗，并在不利时将大批军队撤往国外。如果他们这个意图得逞，将给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带来不少麻烦。针对这个情况，毛泽东作出大胆而果断的决定：“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21)并具体指出：“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什么地方，“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22)对原在西北，这时正退据陕南汉中的胡宗南部，毛泽东提出：“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及使胡宗南部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以便稳住胡宗南。(23)他又指示：“胡宗南部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24)这种大刀阔斧的远后方、远距离的战略大迂回、大包围，和在陕南拖住胡宗南部以利全歼的方针，具有远见卓识和宏大气魄，是毛泽东歼灭战思想在战略进攻阶段的重要发展。

第三，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敌人”。在西北，实行“钳马打胡”和“钳胡打马”。国民党在西北的军事力量，有胡宗南集团和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胡宗南集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二马是地方军阀，两者之

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五月二十日，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接着又控制了渭河南北地区。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25)六月中旬，第一野战军在运动作战中击破了胡宗南和两马所部共二十万人的联合进攻，解放军第十八、十九兵团先头部队也相继开到西安、咸阳等地。胡宗南部退至扶风、宝鸡、凤县地区，二马退至邠州、长武地区，都想借助对方力量，互为犄角，阻止解放军进军甘、宁、青或南下汉中。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要求他们以部分兵力钳制两马，集中主力采取迅速行动以包围并歼灭胡宗南部四、五个军。(26)第二天，他又复电彭德怀指出：如二马只作小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宗南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为费力；如两马作大的撤退，距胡部较远，就实行钳马打胡。(27)根据这个方针，第一野战军七月中旬在扶风、眉县地区，歼灭胡宗南部四个军四万余人，取得西进中的关键性胜利。

这以后，已遭受严重打击的胡宗南部退守佛坪、凤县及陇南地区，二马退至平凉地区，胡、马两部已经远离。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批准彭德怀实行“钳胡打马”的计划。八月二十六日，解放兰州，歼灭马步芳部主力二万七千多人。九月二十三日，解放银川，马鸿逵部全部覆灭。

第四，在采行战斗方式的同时，“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毛泽东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已要求人民解放军：“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

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28）

为推动和争取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接受和平解决，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渡江战役发起前，他就数次致电前线指挥员，要他们派人同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及苏南、皖南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将领联系，推动他们起义。八月六日，他致电彭德怀说：“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29）

毛泽东还亲自致电、致函给国民党地方高级党政军负责人，勉励他们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如程潜是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过去有过同共产党合作的关系，同蒋介石等有矛盾。一九四五年秋，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时，曾对程潜说过寄予厚望的话。一九四八年七月，程潜受到蒋介石、白崇禧等的排挤，由武汉行辕主任改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他已在考虑同共产党合作，实行“应变”。一九四九年三月，程潜的故旧章士钊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在南京见到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殷切期望，说明不咎既往，还将给予礼遇，使程潜坚定了起义的决心。程潜回湖南后，在六月间将他表示起义决心的“备忘录”通过关系送给毛泽东。七月四日，毛泽东亲笔复电程潜。电文是：

“颂云先生勋鉴：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

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30)

程潜在七月十一日收到这个复电，反复看了几遍，高兴地说：“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盖，顾虑很多，现在有了这封信，真是湖南人的喜讯，喜讯啊！”并表示决心“早日实现湖南和平起义”。

当时，准备追随程潜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因一九四七年六月坚守四平曾受到蒋介石的嘉奖，担心共产党不会宽容他，心里有所顾虑。毛泽东估计到这一情况，对章士钊谈过：“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嘛！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 (31) 陈明仁看了章士钊给程潜的亲笔信，里面讲到毛泽东这一段话，顾虑尽除，加快了准备起义的步伐。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等在人民解放军策应下，在长沙宣布起义。这件事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震动很大，对加速中国南部的解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毛泽东还通过已站到人民方面来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对国民党剩余军队作争取工作。兰州解放的十三天后，也就是九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张治中，对他说：西北野战军已经由兰州及青海分两路进军新疆。希望张治中去电新疆军政当局，敦促他们起义。张治中表示：我早有此意，只是自五月以后，我同陶峙岳、包尔汉没有联系了。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在伊宁建立了电台，你如有电报，可发至伊宁再转迪化（注：即今乌鲁木齐）。

九月十日，张治中发电给陶、包称：“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



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32）这个电报，在九月十五日由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员邓力群从伊宁秘密飞往迪化时，转交给陶峙岳、包尔汉。九月十七日，陶、包联名复电张治中称：“新疆前途，承详切指示，至深感激。”并表示：“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九月二十五、二十六日，陶峙岳、包尔汉宣布起义，实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底，在中国大陆上，除西南和两广等一部分地区外，都已获得解放。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75、1377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9年1月6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9年1月8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89页。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96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75—384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4—1439页。

毛泽东在中共第七届二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49年3月13日。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版，第 222、224、225 页。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版，第 222、224、225 页。

《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第 248 页。

余湛邦：《张治中机要秘书回忆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版，第 97 页。

《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5 年 2 月版，第 824 页。

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并告二野、三野电，1949 年 4 月 14 日。

《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5 年 2 月版，第 843 页。

中央军委致总前委，粟张，刘张李电，1949 年 4 月 16 日。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1451 页。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版，第 281 页。

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刘张李，粟张，并告林罗，彭贺电，1949 年 5 月 23 日。

毛泽东致周恩来信，1949 年 7 月 10 日。

(21)中央军委致邓张李，并告林邓谭电，1949 年 9 月 12 日。

(22)中央军委致林邓萧，并告刘张李电，1949 年 7 月 16 日。

(23)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9 年 6 月 27 日。

(24)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刘张李，粟张，并告林罗，彭贺电，1949 年 5 月 23 日。

(25)中央军委致彭张赵电，1949年5月26日。

(26)中央军委致彭张赵电，1949年6月26日。

(27)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9年6月27日。

(2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51页。

(29)毛泽东致彭德怀并贺习电，1949年8月6日。

(30)程潜：《回忆湖南和平起义》，《潇湘黎明》，湖南省文史研究馆1994年8月版，第8页。

(31)陈明仁：《湖南义举》，《潇湘黎明》，湖南省文史研究馆1994年8月版，第177、178页。

(32)《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581页。

## 四十、筹建新中国

建立一个新中国 ,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长时间内 ,由于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 ,这种目标还只是个美好的远景。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 ,随着建立新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要求 ,这个问题便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毛泽东在领导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时 ,早已看清时局发生的深刻变化 ,着手筹划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

一九四七年十月 ,当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 ,毛泽东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 :“ 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 ,组成民族统一战线 ,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 ,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发出“ 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 ,讨论“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 的号召。 五月一日 ,毛泽东致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 在香港主持盟务 ) 沈钧儒 ,提议由中共中央、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发表联合声明倡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 ,“ 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 ” 。

中共中央的号召 ,得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

从一九四八年八月起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 ,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

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在北平解放前夕，毛泽东和周恩来又致函在上海的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北平解放后，已到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汇合到北平。

这时，各种全国性的人民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一九四八年八月，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接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一九四九年三月至七月间，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相继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组织的筹备会也分别成立。这些全国性群众团体的成立，把社会各界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是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组织准备之一。

这样，不仅工农基本群众，就是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都已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后，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一九四九年春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由香山乘车来到北平城内，拜访北平师范大学代校长汤璟真、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他们有的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或同学，有的是北平九三学社的成员。毛泽东和他们畅叙旧情后，黎锦熙对毛泽东说：新政协会议就要召开，新中国将要诞生，北平九三学社的人数不多，这个团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宣布解散。毛泽东听后，诚恳地对他们说：九三学社不要

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要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这将是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说：关于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并将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各项职务，“所有这些，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他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

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毛泽东曾在六月十五日暂时从香山双清别墅移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以后，他进城时都住在这里。

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二十三个单位的代表共一百三十四人。毛泽东在会议的开幕式上讲话。他说：

“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

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这次会议一致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

会议结束后十多天，为了进一步阐明将要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对外政策及国家的前途等基本问题，毛泽东在六月三十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是他用两天时间写成的。他在文章中说：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

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编好后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也同白皮书一起发表。毛泽东对这件事十分重视，认为是用来教育中国人民的一次极好机会。他写道：“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

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

在八月十二日新华社评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写信给新华社社长胡乔木说：“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应将各国评论中摘要评介。”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发表的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毛泽东看到后，又函告胡乔木：“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广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他还接连给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中说：“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在第二封信中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毛泽东自己从八月十四日到九月十六日，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评论中指出：

自从一八四〇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



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巢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

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对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经验的总结，把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奋起的历程说清楚了。

新政协筹备会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六个小组，分别完成以下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起草宣言；（五）拟定中央人民政府大纲；（六）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

毛泽东就新政协所要讨论的各项问题，继续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交谈。先后会见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

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道：“毛泽东对这些民主人士很尊敬，十分亲切有礼，一听说哪位老先生到了，马上出门到汽车跟前迎接，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一些民主人士见到毛泽东总要先竖起大拇指，连声夸耀‘毛主席伟大’。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十分不安。一次，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李老先生一见面就夸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扶他进门坐下后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

“有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先生，事前他吩咐我：‘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敬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我在他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他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我说：‘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毛泽东不同意：‘不要借，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毛泽东就是穿着补丁衣服会见张澜，会见过许多民主人士。”

对新中国的政体问题，毛泽东一直在思考中。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他认为，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他特别重视这种制度应有利于加强人民政权同群众的联系，发扬人民民主。一九四九年一月，他就批示：“各地新区外均应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首先是区、村人民代表会议，方能防止命令主义与官僚主义。”八月初，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的电报，称：“你们已召开上海各界代表会议，甚好。此种会议有很大用，可以依靠它去联系群众，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华东所属各城市均应举行，并应看重此种会议。”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参加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并说：“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讲话时，毛泽东从衣袋里取出一封市民的来信，说：这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物价高涨；二是捐税多，失业多；三是共产党员吃苦耐劳，工作勤奋，军纪严明，这是好的地方。”要代表会议处理。会议当即决定延长时间，对前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十九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的电报说：“太原解放至今，不到三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成绩很好。各地除石家庄、上海、北平已报告开会外，尚未据报开会，这是很不好的。”并且规定：“三万以上人口城市均须开各界代表会。”“你们应重视此事，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为要。”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出席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就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作了发言。他说：历来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问题，只有我们能解释。“对于必须集中的尽量集中，必须抓紧的要抓紧，例如对司徒雷登的外交问题。有人说我们只管政策不管事务。事务是管不胜管，政策问题是关乎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的。”“我们是抓紧大的人事、大的政策。我们要有些集中有些不集中，才能搞好，所以有些地方要给地方以监督之权。鉴于蒋介石的集权，我们是又集中又不集中，需要集中的集中。”对于有着数亿人口的大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导原则。

八月二十八日，新政协特邀代表宋庆龄在邓颖超陪同下，从上海抵达北平。九月七日，特邀代表、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程潜由湖南到达北平。毛泽东都到车站迎接。

宋庆龄到北京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早已在前门车站站台上迎候她。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热烈欢迎她前来共商国家大事。”（21）

程潜到北京时，正为毛泽东摄影的徐肖冰回忆道：

“当程潜走下火车后，毛主席快步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就在握手的刹那间，程潜的泪水流了下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还是毛主席先开了口，风趣地说：多年未见，您历尽艰辛，还很康健，洪福不小啊！这次接你这位老上

司来，请你参加政协，共商国家大事。”接着，毛泽东把程潜扶进车里，两人同乘一辆车，来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晚宴时，毛泽东对程潜说：“二十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着思念的乡亲。蒋介石把我逼成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啊！经过八年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过不成太平日子。阴险的美帝国主义存心让蒋介石来吃掉我们。我们是被迫打了四年内战，打出一个新中国。这是人心所向啊。”（2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是由周恩来负责起草的。九月三日至十一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起讨论修改这个草案。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纲领》草案作过多次修改。其中，他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府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准备，九月十七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和委员一百二十六人到会。会议原则通过常委会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同意将起草大会宣言和拟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两项工作移交给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向大会主席团提出报告的提议；通过常委会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会议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样，召开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准备已经完成。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毛泽东等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大会在欢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场外鸣放五十

四响礼炮声中隆重开幕，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五分钟之久。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庄严时刻！

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说：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这些话，说出了中国人民此时此刻的共同心声。他所说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使许多人热泪盈眶。代表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八十八人在会上发了言。特邀代表宋庆龄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23)

九月二十七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九月二十九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包括序言和总纲、政协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七章。这是一部中国人民的临时宪法。

九月三十日，政协全体会议，选出毛泽东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周恩来等五十六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二天就要诞生了。这是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流血奋斗所换来的。当夜幕将要降临时，毛泽东和政协全体代表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在这个庄严肃穆的场合，毛泽东满怀激情地朗声宣读了由他撰写的碑文：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一夜，毛泽东彻夜未眠。第二天黎明，他将迎来中国历史上一个新世纪的开始。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37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146页。

毛泽东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1948年5月1日。

毛泽东、周恩来给宋庆龄的信，1949年1月19日。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69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63、1466、146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75、1477、1478、1479、1480、1481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99页。

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1949年8月13日。

孙起孟：《关于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筹备和参加人民政协的二三事》，《迎来曙光的盛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89、90页。

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1949年8月24日。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333、33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84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13、1514、1515、1516页。

李银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3、344页。

毛泽东在晋绥分局关于党代会以后综合报告上写的批注，1949年1月10日。

中共中央致华东局电，1949年8月7日。

《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

中共中央致中央局、分局电，1949年8月19日。

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上的发言记录，1949年8月27日。

(21)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3页。

(22)徐肖冰、庄唯：《历史的瞬间》，《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66、267页。

(23)《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314、316页。

## 后记

编写毛泽东同志的传记，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经过四年多的工作，建国前部分（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四九年）已经完稿。考虑到建国后部分的完稿还需要一段时间，现在先将建国前部分出版。

本书的主要依据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同志建国前的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和他所参加会议的大量记录；同时，参考了同毛泽东同志有过直接接触的同志的访问记录、回忆录和当时的报刊资料。力求根据丰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写出比较翔实的信史。

毛泽东传记的编写工作，在逢先知主持下进行。建国前部分由金冲及任主编，各章执笔人如下：

一～一六：陈晋

七～十八：黄允升

十九～二十九：廖心文

三十～三十五：姚杰（军事科学院）

三十六～四十：毕建忠（军事科学院）

金冲及统一地对全书作了较多的改写和补充，并负责定稿。

李琦审阅了全部书稿。冯蕙对抗日战争部分作了认真的修改。黄允升选定书中的照片和插图。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厅的秘书处和档案处，中央文献出版社，为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做了许多工作。

书中不当的地方，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以便在再版时改正。

一九九六年六月

中国现代、当代名人传记选

# 开国领袖 毛泽东

王朝柱 著

## 第一部分

### 1. 这里始变成了新中国的政治重心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的雄鸡刚刚引颈高唱，漆黑的夜天还没有破晓，各界人民就相继起床，一个个身着节日的盛装，有的小声哼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的小声而又庄严地唱着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庆祝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然而，中南海的黎明却是那样的宁静：一个个四合院仍在熟睡，似乎空中还能听到飘游的细细的鼾声；就说岸边、草丛中争鸣的虫声，也成了一首天然的送走夜时的晨曲；举目望去，一个个卫兵一动不动地站在规定的位置上，无声地注视着四周的动静，护卫着中南海的安宁。有顷，栖息在树上的鸟儿醒来了，它们在树枝上又唱又跳，打破了中南海那独有的祥和与平静。卫兵们听后习惯地皱起了眉头，小声地轰着树上喳喳鸣叫的鸟儿；这鸟儿也似乎习惯了，不仅不展翅飞去，反而像是存心和卫兵们过不去似的，有意站在枝头，挑逗性地加大了鸣叫的声音，气得卫兵只好像往常那样怨声自语：“不懂人性的东西！首长屋里的灯光才熄灭一会儿……”接着，他又下意识地朝着丰泽园看了一眼。

丰泽园位于南海北岸的西侧，是一座很大的供皇室居住古老的建筑群。这座整体的建筑群落，由一些井然有序的较小的庭院组成。留意察看这建筑群体的风格，依然是那种传统的各有天地、别有风趣京城王府中常见的那种多进的四合院。它始建于何年何月？是明代还是清朝甚至是两代相袭而建？已经无从稽考。后人走到丰泽园大门前，最感兴趣的，一是那座楠木大门，再是门额的上方挂

着的那块大匾，上书“丰泽园”三个大字。有人说是出自乾隆之手，有人说是某御用文人代笔，但是笔者相信，横匾上方雕刻的那四四方方的御印恐怕是真的，因为谁敢在等级森严的皇室禁地伪造乾隆爷的御印呢？要知道御用文人最喜欢的是溜须拍马，最怕的是坐牢杀头。说来也很有趣，从乾隆到袁世凯，从北洋政府历任总统到中华民国末代“总统”李宗仁，丰泽园里主人换了又换，既没有给“丰泽园”增加什么光彩，也没有在我国近代史上留下什么可作纪念的痕迹。然而到了一九四九年九月，由于毛泽东入住丰泽园中的菊香书屋，这里始变成了新中国的政治重心。

随着历史的推演，很多人又把毛泽东的名字与“丰泽园”联系起来，并注入了某种迷信色彩。有人说，毛泽东的名字寓意着恩泽东方的意思，所以他自应成为东方的救星；也有人说，毛泽东只有进驻享有丰厚恩泽之地的丰泽园，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真正的领袖，等等。就说原毛泽东的保健大夫王鹤滨吧，就公开著书把毛泽东和丰泽园联系起来。他认为，毛泽东，字润之，泽和润又是同义字，再加之自古就有“泽润生民”之说，这不仅含蓄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治国之道，同时也与他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有着内在的因袭联系。但是，历史的真实是：周恩来进驻中南海之后，丰泽园是他的临时下榻之处。就在毛泽东决定搬进中南海之前，细心而周到的周恩来查看了有关的住地，认为丰泽园中菊香书屋的条件比较好，主动请毛泽东入住丰泽园，而自己搬到西花厅去居住和办公。因此，这一搬和一进，体现了周恩来的为人以及对毛泽东的尊重。

## 2. 毛泽东是很不情愿地搬进中南海的

时人与后人都知道毛泽东住在丰泽园中的菊香书屋。但是，去过丰泽园的人都知道：菊香书屋是一个统称，并

不是毛泽东真正下榻办公的地方。走进悬挂“菊香书屋”的房子，是一座南北向的、长方形的四合院，有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都是五间。北房一明两暗，门上挂有一块“紫云轩”匾额，对着屋门的堂屋就是过厅，东边两间是打通的，这里才是毛泽东真正的住所。西侧的两间有山墙相隔，靠近堂屋的是江青的卧室，不过她很少在此下榻。西侧里间与西厢房相通，是毛泽东的藏书之所，他在这里汲取了知识的力量。

毛泽东是很不情愿地搬进中南海的。那时，他的理由很简单：他不当李自成，不住皇帝住过的地方。然而，当他一旦搬进丰泽园中的菊香书屋之后，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当年，他在延安或西柏坡的时候，住在一个小小的院子里，无论是窑洞还是房间都不大，和其他领导人接触十分方便，甚至在院里喊一声就行了。如今住的是深宅大院，各种规矩多得不得了，他想见谁以及谁想见他，都需要经过几道关卡。因此，毛泽东的活动范围除去参加大型会议或外出视察以外，基本上就是在菊香书屋的周围；他所接触的人也就是朝夕相见的卫士、警卫和秘书。诚如他的卫士所回忆的那样，毛泽东想出中南海，必须报告汪东兴、叶子龙等，公安部要派人保卫。如果离京必须报告杨尚昆、罗瑞卿以及铁道部长，他们要跟随。毛泽东的行动，要由这些不同层次的人掌握，有时还要听这些人安排和指挥。可以想象，这对生长在农村且又常年转战在大江南北的毛泽东而言是痛苦的！最起码他也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当人民的领袖也是没有多少自由的。事实上毛泽东搬进中南海没有住上几天，他就憋得实在受不了啦！

一天，他突然来到卫士李家骥的身边，说道：“小李，我俩去郊区。”

“不敢，有危险。我担不了这个责任。”小李答说。

“不用怕，我突然出去，他们不知道。我不相信坏人耳朵就那么灵，现在我们马上走。”

毛泽东想借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兵法“冲出”这座戒备森严的中南海，到郊区看看与他同命运、共呼吸的农民。作为卫士，小李既不敢违反中南海里的规矩，又不敢和全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对抗，怎么办？只好为难地解释道：“主席，我和你不一样，我必须执行给我规定的纪律，不然，我的领导要批评、处分我的。”

对此，毛泽东能说些什么呢？唯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沉吟片时，说道：“这个规定没有错，但把我和群众分隔开不行啊！我见不到群众就憋得发慌。我是共产党的主席，人民的领袖，见不到他们还算什么主席，还算什么领袖。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各级领导是鱼，人民群众是水，鱼离不开水，离开水鱼就渴死。”

毛泽东或许想得太多了，抑或是他那天生的个性受到了前所未有过的压抑，又感慨地说：“我见到群众，和他们唠嗑，不仅是工作而且是一种享受啊！不知你们是不是理解我的心情。唉，我这个主席不如你们好，我没有自由啊！”

这就是毛泽东入住中南海后的真实写照。实事求是地说，他这种在革命中与人民群众结下的鱼水之情，直到他驾鹤西去都常驻在他的心中！

### 3. 对这身黄色的呢子礼服还是满意的

话再说回来，毛泽东在二十多年的战争生涯中，养成了与战争有关的生活规律：一般人是夜间睡觉，白天工作；毛泽东却习惯于夜间工作，白天睡觉。他的卫士回忆道：别人的中午是他的早晨，别人的下午是他的中午，别人的晚上是他的下午，如此循环，总是跟别人差出半天。按照这种生活规律分析，毛泽东于九月三十日夜以及十月一日

凌晨是没有休息的。但是，毛泽东这次彻夜未眠恐怕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在十月一日举行开国大典！

毛泽东是一代诗人，不知为什么在这样有意义的夜里没有写出一首千古绝唱。对此，笔者只有一个结论：毛泽东在这个通宵未眠的夜里，他依然没有化作一位浮想联翩的浪漫诗人。相反，他还是作为一代政治大家在思索过去甚至更多地在筹谋新中国的未来！历史没有留下他在这个不眠之夜的笔迹，也没有任何贴身的卫士记录下他处理过哪些国家大事？但是，笔者可以大胆地设想：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度过的最为激动的一个通宵！

晨曦迎来了十月一日的黎明，桔色的朝曦渐渐地涂抹着菊香书屋的木窗。毛泽东虽然像往日那样又倒在了床上，但是他还是没有一点困意，从他那亢奋的表情可知，他绝不是受着那特殊的生活规律的驱使，而是为了完成就要举行的开国大典的重任所为之。因此，他的卫士曾说过：“主席躺下了，但不一定很快就睡着，再等等看。”

太阳已经转过正南方，时针也指向下午一时，仅仅躺了几小时但不一定入睡的毛泽东终于起床了！他今天的精神分外的好，很是高兴地说道：“给我拿礼服来！”接着，他在卫士的帮助下穿上了黄色的呢子礼服。从他的表情分析，他对这身黄色的呢子礼服还是满意的。

说到这身黄呢子礼服，它的料子是美国产的将校呢，是请京城有名的服装专家王子清亲手裁做的。卫士们看到毛泽东穿上这套礼服，更加威风凛凛，气宇轩昂。然而当再仔细一看，礼服里面穿的仍然是那件补了多次的衬衣。对此，他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个人，衣着随便，十分简朴。有时为了礼节也不得不简单修饰，但那只是外表，内里绝不改变。”毛泽东吃饭是很快的，一直保持着军人的作风，端起饭碗，呼呼拉拉，不



到十分钟，碗筷一放，兴冲冲地又朝办公室走去。就要到两点了，毛泽东起身赶到勤政殿，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

这是开国大典前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以及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全体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并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政府机构，执行各项政府工作。会议总共进行四十多分钟，整个气氛严肃而又兴奋。交谈中，毛泽东风趣且又十分感慨地讲：“我们打了几十年的疲劳战，打出来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是建国的第一天，又是一个疲劳战了。我没睡几个小时到天安门上还要站几个小时。看来咱们的命运就是打疲劳战吧！”

#### 4. 情不自禁地挥动着他那巨大的右手

与会的代表相互谈了几分钟，周恩来看了看手表，时针和分针指向两时五十分，他站起身来，大声说道：“时间到了，请大家起身参加大典！”

毛泽东和与会的代表相继走出勤政殿，在门口登上各自的轿车，结队驶向天安门。

那时，北京刚刚解放不久，不仅蒋介石的飞机有随时飞临古都上空的可能，而且大量潜伏的特务时常出没于群众之中。为了确保开国大典的安全，毛泽东与周恩来等有关的负责同志经过缜密的研究，认为敌人在舟山群岛以南的飞机，不会在下午起飞北来，因为他们在完成轰炸北京

的任务之后难以飞回基地，遂决定开国大典定在下午三时。同时，为了确保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保证参加庆典的首都三十万群众不出任何问题，周恩来和罗瑞卿、李克农等开过多次会议，并采取了各种安全措施，做到了万无一失。就说毛泽东从中南海到天安门路线，周恩来在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之前都亲自做了安全检查。对此，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在私下称赞：“周副主席是大公安部长！”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心目中，天安门广场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在这里不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而且也洒下了被北洋政府、日本军国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的革命群众的热血。那时，他们，尤其是周恩来仅仅是作为天津的学生领袖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中华民族的新生呐喊；然而今天，他们却作为创建新中国的领袖登上了天安门，那种特有的自豪感是时人乃至后人难以理解的！

今天的天安门城楼修缮一新，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国的主人的到来。当毛泽东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后，映入他眼帘的是悬挂在城楼两边的那八盏大红的宫灯，显得既威严又壮观；当他再翘首眺望，看见城楼重檐中间挂着一幅醒目的横幅，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遂又自信地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下午三时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从天安门城楼休息厅走出，相继站在城楼前沿各自的位置上。毛泽东放眼望去，广场中的三十万欢庆开国大典的群众人头攒动，红旗林立，一种说不出的情潮打心底油然而生。啊！这就是新中国的象征，这就是站起来的中华民族的代表。恰在这时，早已准备好的播音员通过扩音器激动地向人们报告：“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已经登上了天安门！”

猝然间，偌大的天安门广场掌声雷动，欢声如潮，“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声震太空。站在天安门城楼正中央的毛泽东望着这欢腾的人群，听着这发自肺腑的欢呼，他情不自禁地挥动着他那巨大的右手，由衷地喊着“人民万岁！”……

欢腾的天安门广场终于平静下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现在开始以后，紧接着又大声说道：

“升旗！奏国歌！”

根据大会的议程，毛泽东伸出右手，郑重地按下了升旗的电钮。与此同时，指挥家罗浪挥动了手中的指挥棒，庞大的军乐队奏响了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一百零八门礼炮分为两组，每组五十四门，一共放了象征中国共产党胜利走过二十八年的二十八响礼炮。在这期间，从毛泽东到每一位参加国庆大典的群众的目光，都一齐投向那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

## 5. 长久地回荡在神州大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由上海曾联松设计并经第一届政协大会通过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出自何人之手。据史记载，是美术供应社女工赵文瑞在两天内赶缝出来的。那天，正好赶在九月三十日下午政协第一次会议开会的时候，在怀仁堂的会场上展现了这面五星红旗，博得了与会者一致的掌声。是日夜，又把这面五星红旗送到天安门广场，挂在旗杆上。由赵文瑞亲自缝制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隆隆的礼炮声和军乐高奏的代国歌声中，第一次冉冉升起在这二十二米高的银灰色的旗杆上。

升旗仪式结束之后，林伯渠走到麦克风前大声宣布：

“第二项议程，由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是一份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再者，由于毛泽东在十月一日宣读的公告文本与第二天刊在《人民日报》上的有所不同。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读的文本，没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名单。当时，站在天安门上的张治中先生当即向毛泽东建议：在正式发表这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时候，希望加上全体委员的名单，对内或对外都会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当时，毛泽东接受了张治中委员的建议，请人用铅笔抄写了一份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单，贴在印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后边，亲自批了四个字：照此发表。署名毛泽东。接着，他又请人找来了时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李普，把贴有名单的公告交到李普的手里，十分郑重地说：“你要小心这张纸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

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上述那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这份公告发表之后，正如张治中先生所预测的那样，在国内和国外尤其是尚未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地区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加速了国民党军队的弃暗投明。自然，也就等于推进了全国的解放！

事后追论：毛泽东是何等的民主啊！他能获得党内党外人士一致的拥护，并被党内、党外一致推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这种从谏如流的民主作风的必然！

毛泽东在宣读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之后，又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成立了！”这句话长久地回荡在神州大地，永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之后，林伯渠激动地宣布：“阅兵开始！”接着，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站在麦克风前边下达阅兵令，旋即又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将军的陪同下，乘敞篷车开始检阅陆海空三军。昔日屠杀革命群众的天安门广场，由东而西相继走过了接受检阅的人民解放军不同兵种的方队。

## 6. 在天安门城楼站了整整三个小时

毛泽东不仅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而且与人民的军队结下了深厚的情感。他清楚在开国大典阅兵的特殊意义，事前对阅兵工作作出指示：“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搞好，不许搞坏。”军乐队奏响了《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受阅的部队一字排开，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在口令的指挥下，接受检阅的部队面向主席台，向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行注目礼。这时的毛泽东会想起什么呢？他人无从知晓，只见他缓缓地举起了右手，向着三军指战员挥手致意。有顷，天空传来了隆隆的飞机马达声，毛泽东禁不住地扬起头，看着那结队飞过的战鹰，他那严肃的表情似乎是在说：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空军！我们一定会实现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

阅兵结束之后，林伯渠大声宣布：“群众游行开始！”对此，跟随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的卫士李家骥作了如下回忆：

游行队伍群情激奋，热情洋溢。当人流来到天安门城楼时，人们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向天安门城楼翘望，想看清楚一点，想多看几眼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虽然播音

员齐越、丁一岚劝说、指挥游行群众按规定通过天安门，但无济于事。人群是在后浪推前浪的作用下流动的。

这时的毛主席笑容满面，神采奕奕，和游行群众目光相对，表情、动作配合协调，就像两个人对面交流一样。毛主席时而挥手时而鼓掌。当工人群众队伍过来时，毛主席面对工人的热烈欢呼，通过扩音器高呼“工人同志们万岁！”当农民群众队伍过来时，他又高呼“农民同志们万岁！”而每当广场上的群众听到毛泽东的声音时，更加热烈地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就是这样不知有多少个来回，台上的毛主席和广场上的广大群众思想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站了整整三个小时，他再次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同是这些可爱的人民，昔日他们可以为自由、为民主在天安门前呐喊；而今天，他们又是如此忘情地为自己的领袖欢呼！啊，这不正好应了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老话了嘛！

是日初夜，毛泽东不顾下午的劳累，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烟火。当广场上狂欢的群众发现毛泽东以后，城楼和广场再次展现出下午游行时的激动场面。当他的女儿高兴地对他说：“爸爸，人民群众喊你万岁，你喊人民万岁，真有意思！”他非常激动地说：“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啊！……”

或许是十月一日太令毛泽东兴奋了，他彻夜未眠，忽而隔窗望着夜空沉思，忽而重读他读过多遍的《史记》。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呢？笔者认为他和卫士李家骥如下的对话，正好道出了他彻夜思索的核心：

“家骥，你看今天开国大典搞得怎样？”

“太好了，太令人兴奋了。”

“是啊！”毛主席颇有感慨，又像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地接着说，“我们用了二十八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说头上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的问题任务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更大的力气，你说对不对？”……

是啊！毛泽东是在为解决脚下的问题而睡不着觉……

## 7. 万事开头难

毛泽东自十月一日起，由原来意义上的人民领袖变成了新中国的主席。用老百姓的话说：毛主席是咱人民真正的当家人。

毛泽东是来自人民中的领袖，他自然会经常想到“当家方知柴米贵”这句谚语。如前文所述，当他从欢庆开国大典的高潮中平静下来以后，想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们用了二十八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同时，他还明确地指出“解决脚下的问题任务很重”。换言之，他这个新中国的当家人，必须解决这个任务很重的“脚下的问题”。为此，他通宵没有合眼。

毛泽东作为一代鉴古知今的大政治家，非常熟悉“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这句古训。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自己再三声言不当李自成的所在。为此，他还向全党发出号召：“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也许是毛泽东深知“坐天下”有多么难了，就在十月一日的深夜里，他再次读起了太史公的《史记》，想从古往今来的帝王的成败得失中能感悟出些什么！

万事开头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步将从何处迈出呢？毛泽东认为是建立政权，组建新中国的政府机关。虽说毛泽东在亲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中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级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但是，有关政务院主要成员的组成以及施政大计，依然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五大书记共同商定的。因此，毛泽东于十月一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十多天中，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选贤任能、把政务院组成一个为各方接受的班子方面。

十月初的一天，他正在对着政务院委员会的名单出神，秘书小声报告说：“主席，周总理到了。”

毛泽东听后一怔，下意识地自语了一句“周总理……”他抬头一看，只见周恩来拿着一叠文件走进屋来，忙笑着说：“对，对！是周总理到了，请坐，周总理。”

周恩来一听毛泽东的话音，再一看毛泽东的表情，边落座边笑着说：“主席，你叫我总理，不顺口；我听着，也不顺耳，还是叫我恩来吧！”

“那可不行！”毛泽东断然地答道，“我们搞了二十八年革命，不就是希望有自己的政权吗？不顺口，也得叫；不顺耳，也得听。一句话，从现在起，你就是全国人民的周总理了！”

对此，周恩来还能说些什么呢？他只好谦虚地表态：“主席，我希望努力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尽量当好这个总理。”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换了一种口气，“日前，一位朋友对我说，我们选的总理姓周，他一定是人民信任的、周到的总理。”毛泽东看了看周恩来那有些不太自然的表情，遂又深沉地说道，“我们家乡有一句老话，当家人一睁眼，就要考虑油盐酱醋茶五件事；我们这些新中国的当家人，一睁眼就得考虑内政、外交这两件大事。现在呢，我们必须先帮着我们的周总理选主持内政、外交的阁员。”



## 第二部分

### 8. 首先要确定组阁的原则

恰在这时，刘少奇也走进屋来。毛泽东待刘落座之后说道：“今天，请你二位来，是想和你们交换一下政府各级机构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负责人人选问题，以便提出供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名单。”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远在西柏坡的时候就着手考虑了。中国共产党入主北平之后，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它先由一块一块地方取得革命的成功，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发展到全国范围的成功。这和以往其他国家革命的情况不同。由于各项工作有原已建立的地方性政府在那里负责管理，所以在政务院筹组过程中，整个工作并没有停顿。他不仅与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在思考新中国成立后方方面面入阁参政的人选，而且还对未来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的设置作了研究，并请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作了如下概略的介绍：政务院下面设四个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五个部门，财经委员会下辖十六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六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一共是三十个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次之是文化教育。可以想象，毛泽东在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商谈上述政务院机构设置的时候，一定会谈议到有关各大部门的负责人选。当时，他们可以议而不宣；时下，他们必须议定请人入阁。

因此，周恩来作为新任命的政务院总理说道：“政务院组阁是一件关系重大的议题，我认为在讨论具体名单之

前，首先要确定组阁的原则。”对此，刘少奇是完全赞成的。他认为所谓确定组阁原则，就是要体现国旗的精神。换句话说，新的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取得的。所以，他明确地说道：在这个大原则下，就一定能组出一个既有工作效率，又能为全国大多数人民拥护的内阁。

毛泽东是全国各族人民认同的当家人，他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想到：蒋介石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统治中在组阁方面有哪些失误。为此，他非常郑重地说：还有一个原则是要讲清楚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要真正做到放权。换句话说，要给其他参加政府工作的民主党派人士以实权。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实权是属于蒋氏王朝的，其他的人是当牌位给人看的。

在确定了组织政务院的原则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又不能不想到如此庞大的内阁办事人员从哪里来？最后，他们一致商定：首先将华北人民政府撤销，把这个班底拿过来作为政务院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但是，一经作出决定，并由周恩来实施的时候，就又发现了具体问题：那就是华北人民政府原有的机构不能拿来使用。对此，《周恩来传》作了如下的评析：华北人民政府原有机能的职能只是管辖华北五省二市，现在要管理全国，负责制定并推行全国性的各项方针政策，这自然有很大的不同；政务院有些重要部门在华北人民政府中是没有的，需要组建，如外交部；还有些部门过去是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管理的，如公安部、铁道部，改隶政务院后，也要经过必要的调整……

### 9. 一定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确定了组阁原则之后，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遂集中精力投入到具体的组阁方面

来。如果不把政务院的机构建立起来，各项工作尤其是那些急迫解决的内政、外交大事就无从谈起。为此，他作为政务院总理必须亲自挑选各级领导成员的人选，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另外，周恩来清楚毛泽东提出的组阁原则，中国共产党要做到真正放权的目的是：一方面，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如何管理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许多方面还缺乏经验，而党外人士中不乏在这些方面有经验的人才；另一方面，因为这样的政府成员结构，有利于团结并带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但是，一些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贤达，尤其是那些从国民党阵营中过来的高级将领、所谓的党国元老受着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影响，不愿加入内阁，还需要周恩来亲自出面甚至请有关人士做工作。如：六十一岁的蒋光鼐曾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当政协委员有地方支薪水就行了。所以，开始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希望他出任重要职务，他没有同意。后来，总理找李济深帮助做工作，他才接受了这一重任。自然，周恩来在完成组阁任务的全过程中，要时常与毛泽东商议。历经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周恩来终于草拟出了一份内阁名单，并送请毛泽东审阅：“主席，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那就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毛泽东认真地审阅了周恩来提出的第一届政务院阁员名单，他沉吟片时，深沉地说道：“从这个名单看，我认为总理提出的第一届内阁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还应有这样的准备：尽管我们从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很可能还有人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在我们内阁中供职。”

对此，周恩来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讲了组阁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后，又诚恳地说道：“那我们就做工作嘛！还是主席常说的那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再不行，就请主席出面嘛。”

“用不着，用不着。”毛泽东说罢虽是坚决地摆了摆手，可又以商量的口气问道，“你和傅作义将军谈了吗？”

“谈了，而且我是登门请他出任水利部长的。”“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大的没有。可是他说：我去西柏坡的时候，主席就请我当水利部长，可我就怕当不好啊！”“我看这是推诿之词。”毛泽东凝思片刻，“你可以对他说：一，做到有职有权；二，我们可以给他配助手；三，他也可以推荐贤人。”“我就是按照主席说的精神办的。第一，我告诉他，调李葆华同志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他十分欢迎；第二，他推荐了原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技术专家张含英、原北平市长刘瑶章，我愉快地接受了。他决定走马上任。”“好！一定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说罢满意地点了点头，“农业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长梁希等人的态度呢？”

“他们不仅愉快地接受了委任，而且还表示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周恩来说罢看了看毛泽东微微点头的表情，又说，“不过，有一些不了解历史的同志，对任命李书城等人当部长表示不理解。”

“要做工作！”毛泽东当即说道，“李书城是我力主推荐的。他是老同盟会员，又是辛亥革命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我清楚记得：中共一大也是在他们家召开的。入阁当部长是应该的。”

## 10. 把信扔在了桌子上

周恩来与毛泽东逐一商议了内阁名单之后看了看手表，说道：“主席，我应该去请黄炎培先生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了，你有什么指示吗？”

“黄任老是一位有气节的大知识分子，对革命又作了贡献，我是赞成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

但是，他有出世的思想，曾数度拒绝当官，恐怕是要多做些工作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不仅与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商谈组阁名单，而且也同样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找人谈话，请人入阁。另外，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还选贤任命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和正副参谋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和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和委员等名单。可以想见，为此他又付出了何等多的心血！另外，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成了国家的领导，这些人民领袖家乡的亲属公然要官、要钱的事也时有发生。为此，毛泽东很是生气！他要求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必须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坏传统。他对待此事的办法是：要官，一个也不给；家中有困难的，从自己的薪水拿出一部分，以解燃眉之急。就在建国不久的一天，他听说长子毛岸英也收到了湖南老家的来信，遂让秘书把毛岸英找来，当面问道：“你收到湖南家乡谁的来信了？”“是表舅向三立的。”

“信上写了些什么内容？”“他在信上说，我们家的另一位亲戚，希望在长沙能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

毛泽东一听震怒不已，他当即近似自语地说道：“什么？他希望通过你这个所谓的太子，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对！”“什么？你还理直气壮地答说对？”

毛岸英是一位很有原则的青年，从不向毛泽东所表示出的父道尊严，尤其是在他看来是错的时候低头。他一听父亲说话的口气以及质问的内容就有点不服，遂肃然立正，一本正经地说：“请问主席同志，你说我应该怎样回答呢？”

“你……”毛泽东正想大发雷霆，循声一看毛岸英的样子，遂又改变了口气，“你是如何回答这位表舅的？”

毛泽英听后没有说什么，从口袋中取出两封信，双手呈送到毛泽东的手里，凛然地说道：“您看吧，一封是表舅向三立写给我的，另一封是我写给他的回信。”

毛泽东拆阅了向三立写给毛岸英的信，看罢犹如火上浇油，把信掷在了桌子上。接着，他又取出毛岸英写的回信仔细审阅。毛岸英这封回信写得实在是好，现在摘录如下：

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则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 11. “像是我的儿子”

读罢毛岸英写的回信之后，毛泽东陷入了长久的凝思之中。站在一边的毛岸英看着父亲那深邃不语的表情，也许许久许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顷刻之间，整个菊香书屋显得是那样的凝重，似乎连空气的分量也增加了。最后，毛岸英终于猜出了父亲的心事，他为了能让父亲尽快地从这人间凡事中解脱出来，小声地叫了一句：“爸爸！”或许是毛泽东由此想得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他竟然没有听见儿子的呼唤，继续沿着他的思路在沉沉地思索着、思索着……

“爸爸！”毛岸英提高声调又叫了一声。毛泽东终于从沉远的凝思中回到了现实，有些愕然地问道：“你叫我有什么事吗？”“我想知道爸爸看了我写的回信的感

想？”“好！”毛泽东说罢笑了，十分满意地说，“像是我的儿子！”

恰在这时，周恩来走进了菊香书屋，有点茫然地问道：“岸英就是主席的儿子嘛，何来像是主席的儿子？”毛泽东突然大声笑了起来，顺着周恩来的话语说道：“总理说得对，岸英就是我的儿子！”

毛岸英离去之后，周恩来高兴地向毛泽东报告：黄炎培答应出山入阁了。

毛泽东听后也很有感慨地说：“我看啊，黄任老答应出山入阁，多半是你两顾茅庐的精神感动了他。”

周恩来在追述了他请黄炎培出山的经过之后，又取出一封信，边交给毛泽东边说道：“主席，黄任老出山入阁是认真的。你看，他还为此写了《为参加行政工作一封公开信》呢！”

毛泽东当即拆阅黄炎培写的这封公开信：“三十五年来给我官不做的我，现在怎么又做起来了呢？这点愿向诸位说明一下：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情，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自己编了剧本，自己不应该拒绝唱。”

毛泽东看罢的确被黄炎培的精神感动了，他抬起头，掷地有声地说道：“黄任老说得好啊！自己编了剧本，自己不应该拒绝唱！”

接着，毛泽东又与周恩来议起了内阁成员问题。对于政务院设置四位副总理，有两位共产党人，董必武和陈云；有两位民主人士，郭沫若和黄炎培，毛泽东是比较满意的。他接着又问道：“各部部长和政务院委员的名单都确定了吗？”

周恩来答：“确定了。”接着，又取出名单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阅罢名单暗自算了一下：二十一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十一人；政务院下属三十四个机构的一百零九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四十九个，其中十五个正职。最后，他笑着说道：“你这个总理真不愧是‘周到’的总理啊！我相信，这个名单不仅会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也会在国内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

接着，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拟设四位副主席，他们分别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再加上主席毛泽东一共五位。毛泽东听后沉吟片刻，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我有两个意见：一，由你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二，不要搞清一色，可以再增加一位国民党元老任副主席。”

“我赞成，那只有请你的老乡长程潜出山了。”周恩来说罢看了看微然点头的毛泽东，“这次，只有主席亲自出马相请了。”“好！由我来请这位镇守长沙的老黄忠。”

## 12. 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费尽了心血

毛泽东在建国前后曾与他的老乡长程潜谈过几次话，史无准确的记载。但是，我们从毛泽东十月五日发给林彪、华中局的电报中可知：他们之间曾就湖南军政大事进行过认真的磋商。

在毛泽东与程潜、陈明仁等人谈话的时候，“李明灏代其提出人枪太少，问是否可以给他补人补枪，并要求我们速派干部助其整训，要求在打白崇禧及他处时，让其参加作战立功”。对此，毛泽东对程潜、陈明仁等人说，“军委决定给以第二十一兵团，第五十二军、第五十三军及第二一四师至二一九师的番号”，并得到他们的认同。另外，陈明仁觉得，“应先对干部说清楚，对多余干部应有安置，即用调训方法使其学习，以安其心。然后宣布缩编为两军六师”。毛泽东当即表示：陈明仁上述意见是合理的。同



时，决定十月十天左右，请陈明仁、李明灏由北京动身返湘，“再定宣布及实行的步骤”。为了使“该兵团从陈明仁起，全体官兵，安心供职，增强彻底改造的决心，表示我们对程、陈及该兵团看成和自己人一样”，毛泽东明令林彪：“应在该兵团编整及纪律做得有些成绩的时候，给他们补充一批人枪，其来源可从对白崇禧作战的缴获中取得。这样一做，可以增强我们对该部的领导权及发言权。再则在湖南全省平定及土改实行以后，即在大约一年以后，如该兵团表现好……可以考虑编一个军加入该兵团，使陈明仁有三个军。这对于改造该兵团是有作用的。以上各点我已向程、陈、李透露了。”

依然是在这次谈话中，“程、陈、李提议现在就可以取消湖南军政委员会，程潜到北京任职，陈明仁专任军职不挂省主席名义”。毛泽东权衡利弊后表示：“军政委员会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取消太快，程、陈部下可能发生误会，对全国影响也不好。省政府改组亦宜在全省平定，陈明仁率部向前线推进之时，方有理由实施。目前几个月内，陈的主席职衔仍应兼着，惟陈的实际工作，可以着重于治军。”对此，程潜和陈明仁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无湘不成军。这句话说明湖南人早有从军为伍的社风。因此，在湖南解放的前后，仅程潜、陈明仁所部就有失业军官达十五万人之众。为此，程、陈二人向毛泽东反映这些失业军官“纷纷找他们安插，是一个大问题，他们不胜其烦”。毛泽东当时答说：“此是一社会问题，国家有责任有步骤地给以谋生出路。”据童小鹏回忆，毛泽东为了使他的老乡长程潜不太为难，还说了如下这段话：

“颂公在军政界搞得久，旧部多，需要安插又可以安插的，尽可能地予以安插，可能还有人向他要钱，或者他自己想送点钱给老朋友或者老部下，都要替他设想到，

免得他为难。现在决定由政府按月给他们特别费大米五万斤，任其开支，不受限制。”

由此可见，毛泽东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费尽了心血！

### 13. 而是前来探视乡亲与好友

对于毛泽东的良苦用心，程潜也是铭记在心的。请看他与族弟程星龄的一番谈话：

程星龄感慨地说道：“主席十分念旧。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他还把我这个师弟请进中南海，对我说，你的族兄颂公字颂云，你的别甫却是‘不云’，我叫‘润之’。你不云，天上没有云就不能下雨。不下雨，我怎能‘润之’呀！就滋润不了土地嘛。”

程潜听后喟叹不已：“一番妙语，道出了许多妙论，真是非同常人所能比啊！”

“当时，我也说了类似的话，可主席他听后却严肃地批评了我。”

“为什么？”程潜一怔，问道。

“当时，主席严肃地对我说，你也不要恭维我了，恭维我奉承我的多了，我就可能晕头转向，搞不好不是降甘霖而是下冰雹，那就坏了！”

程潜久居官场，从汪精卫到蒋介石，他见多了；同时，程潜还研究过中国历史上的军政要人，对历代帝王的所作所为知之甚多。因此，他听了毛泽东批评程星龄的话后，发出感叹：“从历史上看，尚未得天下的帝王，都能做到求贤若渴；然而，一旦登上九五之尊，谁还能像润之这样既对昔日的上司重情重义，又能对像你这样的乡弟做到礼贤下士呢！”

“很难有第二人了！”程星龄说罢叹了口气，“就说关于哥哥的工作安排吧，他认为您是老前辈，林彪是年轻

人，想请您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还要与我这个当弟弟的谈，然后再与您婉商。”

恰在这时，毛泽东亲自打来了电话，提出约见程星龄。程潜高兴地说：“星龄，你好幸运啊，润之又要召见你了！”

程星龄再次驱车来到中南海里的丰泽园。他下车之后在秘书的引导下来到菊香书屋，他望着门额上挂的那块写有“菊香书屋”四个大字的横匾出神，似乎引起了无限联想。这时，毛泽东迎出门来，笑着问：“师弟，对这菊香书屋有何置评啊？”

程星龄或许已经进入了另一种感觉，不是奉命前来面见一国主席，而是前来探视乡亲与好友。所以，他听了毛泽东的问话之后，坦诚地说道：“我上次走进菊香书屋就有一种感觉，连幅字画，连盆鲜花都没有，就有些与这菊香书屋名不符实了！”

毛泽东听后笑了，指着菊香书屋的院落介绍道：“我刚搬到这里时，盆花多得很，简直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小花园，我也喜欢得不得了。”

“那些花呢？”程星龄愕然相问。“搬走了。”毛泽东淡然地答说。“为什么？”“你说这样行吗？我们共产党打天下，是为劳苦大众翻身，不是图自己享受，与李自成、与国民党不同也就在于此。”程星龄有所感悟地点了点头。

## 第三部分

### 14. 要给全国人民带个好头

“过去，这里摆花，我管不着；今天，我住在这里，就不准摆这样多的鲜花。今后，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不仅有各地的官员，还有工人、农民的代表，他们一看我这里摆这么多漂亮的鲜花，一定会上行下效的，养成这种无事种花的风气可就不好了。”毛泽东说罢看了看频频点头的程星龄，又接着说道：“我是一国主席，要给全国人民带个好头，不然，我们的新中国还会应了那句老话：上梁不正下梁歪！”

毛泽东这番话对程星龄震动极大，他似乎从这极普通的话语中感到了毛泽东那高深的精神威力。因此，他由此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得天下是应该的。接着，程星龄随毛泽东走进那简朴的办公室，在转达了他的族兄程潜的问候之后，又说：“主席，您对颂公如此殷切的关怀和优渥的待遇，不仅使颂公感激不尽，也使我终生难忘。”

“星龄啊，”毛泽东摆了摆手，“我还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谈谈对你的工作安排哩，怎么就‘终生难忘’？”

“主席，我的工作安排用不着征求意见，什么都可以。”程星龄说罢变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似乎嘴也笨了许多，“不过，我有一个愿望，不知当说不当说。”

“不管是什么愿望，都当说！”

“我想参加中国共产党，不知够不够格？”

程星龄这个愿望实在有点出毛泽东所料，他沉吟片刻说：“据我所知，你早年参加国民党左派，在我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的领导下，从事反对军阀张作霖的斗争；后来，

你又一直支持我党，连你的族兄颂公也曾怀疑你是共产党，应当说早已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不过，从全局考虑，你提出加入我党的要求，我认为暂缓为好。你最好是参加‘民革’。”

“为什么？”程星龄愕然相问。

“道理是简单的，”毛泽东掰着手指头说道，“一，‘民革’大都是早年参加的国民党的左派，是革命的组织；二，你参加‘民革’，可能比参加共产党，能像过去那样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听主席的。”程星龄明白了毛泽东的用心，但仍十分动情地说道，“不过，我再次向主席说明，我参加共产党的决心是早已下定了的，望主席在适当的时候不要忘了啊！”

“小同学！我会记住的。一句话，我们的合作是真诚的，决不像蒋介石昔日对待颂公，今天对待李宗仁那样口是心非。”毛泽东说罢有意停了一会儿，方把请程潜出任军委副主席的事讲了出来，最后他郑重地说道：“我请你先给颂公通个风，有个思想准备，然后我再与他谈。”

程潜是一个靠军队起家的湘籍政坛耆宿，他深知有枪便是草头王的道理。几十年来，他所经历的荣辱沉浮，无一不是与他手中的军力强弱有关系。因此，他为了在蒋家王朝之中拥有一席之地，始终都紧紧抓住那点属于他的军队。换言之，他视军权高于一切。也许是这种有军就有权的观念深深根植于他的心底的原因，他一见前来拜访的毛泽东就有些惶恐不安地说：“润之，我是国民党元老，怎么可以出任你们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呢？”

### 15. “怎么样？老乡长给我个面子吧？”

毛泽东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之后，就明确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

之下，回到自己的家乡领导了秋收起义，并以此为基础，不仅创建了第一个红色政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且还组建了工农革命军（后改为红军）。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能成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与他领导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他很理解程潜说的上述那番话。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一位大政治战略家，他还十分清楚军队仅仅是维护政权的工具，若想新中国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唯有“得人心者得天下”。他听了老乡长程潜的话后，有意避开军权之议，十分策略地笑着说：“颂公，你和我之间怎么也分起你们我们的来了？”

“润之，军权从不旁落，自古亦然啊！”

毛泽东听后笑着摇了摇头，在讲了一番对军队的看法之后，又感叹道：我毛泽东从不争个人军权。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和发展，陈明仁将军可以当人民解放军的兵团司令，颂公当然也可以当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了！

大凡从旧社会过来的军政要人，绝大多数都存有所谓的名位思想。把话说白了，都具有论功行赏、论资排辈等观念。程潜明白他不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相反还曾做过有悖于革命潮流的错事，当他获悉其他四位军委副主席的名字之后，就更有点诚惶诚恐了！他急忙摇着头说：“润之，这就更使不得啊！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忝列朱总司令、周总理这些开国元勋之后呢！”“这就更说明我毛泽东对不住颂公了！在中南，让颂公位在林彪之下；到了中央，又在我毛泽东的领导之下，为此，被你们称之为周到的总理说，若想颂公出山，只有主席出马相请了。”毛泽东说罢看着依然蹙眉摇头的程潜，十分真诚地说，“怎么样，老乡长给我个面子吧？”

程潜的确是被毛泽东的真诚打动了，他望着等待回答的毛泽东的表情，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那我也就算完成任务了！”

毛泽东说罢笑了，笑得是那样的自然、可亲；程潜也笑了，笑得却是有些尴尬、勉强。他们二人又闲谈了一会儿，程潜以请示的口吻问：“润之，湖南刚刚解放，需要解决的问题成堆，你看我何时回湘理政呢？”

“我看不要这样急，等恩来组完阁以后吧！”

程潜赞同地点了点头。

“颂公回到长沙以后，请代我去看看仇鳌先生，告诉他，我很忙，抽不出身来南下拜访他，欢迎他来北京聚谈。”

“请放心！我一定把仇亦山先生请到北京来。”程潜说罢迟疑片时，又有点为难地问道，“润之，我可以向你讨教有关解放湖南全境的事吗？”“你已经答应出任军务副主席了，不问，我也要请教你。”毛泽东说罢扔掉手中的烟蒂，“来，我向你先请教有关歼灭白崇禧军事集团的事情。”

接着，毛泽东与程潜谈起了我第四野战军在湘南发起的“衡宝战役”……

## 16. 布下了三步大棋

建国伊始，毛泽东一是日理万机，再是如履薄冰，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都不敢走错一步棋，给国内外敌人以攻击新中国的口实。

虽说在衡宝战役、漳厦战役结束之后，毛泽东认为没有多少大仗可打了。但是，退守广西的白崇禧集团尚未消灭，蒋介石还把西南诸省当作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复兴之地，因此毛泽东还从战略的高度为我军向中南、向西南、向西北等地进军，并最后把国民党的残部消灭在大陆而制订作战方案。为此，他借前来参加开国大典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贺龙等高级将领即将返回前线的时机，在中

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军事会议。首先，由朱德总司令发言：广州解放之后，国民党把所谓政府迁到了山城重庆，这标志着蒋介石从幕后完全走到了台前。同时，我们也就开始了以四川为重心的解放大西南诸省的战役。今天的军事会议，就是主席给大家交待具体的作战任务。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消灭广西的白崇禧，主要是采取军事的手段；解放西南诸省如四川、西康、西藏、云南、贵州等省，需要采用以军事手段为主，策动敌人举行和平起义为辅或两者相结合的形式。在这之前，毛泽东曾为消灭白崇禧集团给四野林彪等发过数电，迨至广州解放的前夕，又发去了《关于占领广州和围歼白崇禧部》的电文。他在详细陈述解放广州及消灭在粤之敌的部署之后，又对消灭白崇禧集团的主力作出指示。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为消灭盘踞在西南诸省国民党残部以及诸地方实力派的兵力，他布下了三步大棋：一、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两个兵团，由现在的驻地常德、湘潭一线迅速穿过湘西，出奇兵，由川东南进入四川；二、为歼灭由陕、甘南部退入川西北的胡宗南所部，由贺龙率部入川；三、二野陈赓率领的四兵团在协同邓华兵团占领广州后，旋即挥兵入桂，协助四野主力歼灭白崇禧集团，然后经桂西进入滇南。完成上述部署之后，龟缩在川、康、滇、黔的国民党残部完全被我军合围，形成瓮中捉鳖之势，即使敌军不缴械投降，也会被我军歼灭在西南边陲的高寒山地。为此，毛泽东根据上述战略部署，又向有关的野战军下达了具体的作战任务。也就是在这次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对贺龙说道：“中央军委已经作出决定：由你率一个兵团由川北入川，你看带哪个兵团入川好呢？”



贺龙心里清楚毛泽东如此相问的缘由：就其常规，他应当率领跟随自己转战多年的部队，这无论是对他这个指挥者来讲，还是对被指挥的兵团首长而言，都因相互熟悉而有利于作战。但是，贺龙清楚，以他当年带领的红二方面军发展而来的八路军一二师进而组建为第一野战军的老部队，已经在彭德怀的统领下向西北进军，正与敌军战斗在丝绸古道上。他若调回其中的一个兵团随他入川，势必影响大西北的解放。他稍许沉思后，毫不犹豫地說道：“我熟悉的部队，正随彭老总进军新疆，不可以调回。如中央同意，就把周士弟同志的第十八兵团拨给我吧！”

### 17. 把他们消灭在川滇一带

这件事不仅看出贺龙的高风亮节，也的确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好评。为此，毛泽东当即答说：“可以！请你立即赶往西安接交任务，率十八兵团入川，要求于明年一月份解放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并布置明年的春耕，不误农时。”

贺龙十分高兴地接受了战斗任务。接着，毛泽东又说道：“这样一来，我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中央决定：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同志为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为此，小平同志和伯承同志必须立即赶赴湘西前线，率部入川。”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刘伯承代为答说。

“另外，为切断西南各省的残敌退往越南、缅甸，中央军委准备命令陈赓兵团归建二野，经由广西插入云南。”

“务请主席电告林彪同志。”邓小平很是周到地说。

毛泽东微微地点点头，走到挂在墙上的军事地图前，沿着川、滇西部划了一道直线，说道：“中央希望明年的一月，战局会发展成这个样子：敌人尤其是胡宗南残部被我解放军压到这一线，让敌人沿着我们当年长征的路向南败退。然后，我们再集中优势兵力把他们消灭在川滇一带！”

与会者听后非常兴奋。朱总司令接着补充说：“同志们可能都明白了主席的战略用意，那就是刘邓所部及陈赓的四兵团，等于为最后消灭国民党残留在大陆的军队，搞了一个更大的战略迂回。”

不久，毛泽东收到林彪等人的电文：根据退入广西的白崇禧所部有可能向西逃入云南的情势，他们提出“先以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的战略构想。实事求是地说，林彪提出的这一“大迂回”战略构想，仅仅是聚歼白崇禧残部的作战方略，而毛泽东提出的上述“大迂回”的战略构想，是在大西南全歼国民党残部的战略决策，因此，是有着根本差异的。但是，林彪等人的这一“大迂回”战略构想，也的确促使毛泽东完善了他的“大迂回”战略的意图，并于十月十九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了《关于西南地区的作战方针》。

毛泽东认为“西南重心是四川，我二野主力必须于十二月占领叙府泸州重庆一带，贺（龙）率领十八兵团则于明年一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布置明年春耕，方有利于生产建设。因此不论白崇禧是否退云南，我三五两兵团只准备以一个军（即十八军）进占贵阳，并经营贵州；其余五个军，两个兵团部及二野直属队，均由湘西分直取叙泸渝（留一部于遵义一带），务于十二月达到该地区，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统筹西南全局。否则一百五十万人的财经问题将陷入极大困难。这里所说的一百五十万人，是指我军六十万人（其中二野全军五十万人，贺部十

万人)，张群所属国民党川滇黔康四省军政人员据说有九十万人，主要是在四川。”

## 18. 令他震愕不已

根据林彪等人提出的大迂回方案，“估计白崇禧部可能有一半或更多被我歼灭于广西境内，退到云南去的或者不多”。对此，毛泽东作了如下评估：“现在假定白匪主力退至云南，加上贵州之敌亦退至云南，加上云南卢汉等部，共敌军有十五万人左右，我仍应只以陈赓兵团十万人，加上地方游击部队（据说有二万余人）去对付，方有主动。因为路远缺粮，往返不易，如去两个兵团（二十万人），有陷入困境之虞。估计陈赓以十万人入云南，采取各个歼敌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过时间略为延长些罢了。”

从上述可知，毛泽东对军事解决西南诸省问题已了然于胸。为此，他命令“刘邓于明日或后日由京经汉赴湘，指挥二野向四川进军。三五两兵团，请令其补齐棉衣，进至湘黔边境待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密令我第二条战线的同志，在残留西南诸省国民党军政两界进行策反，从而大大推进了西南诸省的解放。

毛泽东在部署完聚歼白崇禧军事集团以及向大西南进军之后，在他看来，不会再有需要他亲自部署和指挥的大战役了。我各野战军首长能够独立地完成中央交给的作战任务。因此，他把主要精力相对地集中到内政外交方面来了。但是，出他所料的是，十月二十九日收到了粟裕等同志发来的有关金门战役全军覆没的报告，令他震愕不已！

据军史记述：我军在完成漳厦战役之后，使金门守敌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为加强该岛防御，敌军将潮安、汕

头地区的第十二兵团所属两个师先后增到大金门，该兵团后续部队也有继续向金门增援的迹象。”

我第十兵团在解放厦门后，兵团领导主要用于城市接管，仅“以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各一部共七个团的兵力，在第二十八军首长指挥下，担任攻取大金门岛的任务；以第三十一军一部夺取小金门岛”。要夺取大小金门岛，不仅需要运送兵力的渡船，而且还须有掩护我军渡海作战的制空权，也就是必须要有空军相配合。那时，我军既没有渡海作战的军舰，也没有与蒋介石所部进行空战的飞机，仅仅“搜集到一次可运送三个团的船只。为求在敌第十二兵团尚未全部到达之际攻占大、小金门岛，第十兵团首长决定把所有船只集中使用，准备一夜间连续运送两次，集中五个团的兵力首先夺取大金门岛，尔后再攻小金门岛。二十四日夜，我军发起金门战役”。

是日夜，我“第二十八军二个团又一个营，第二十九军一个团，分别由莲河、大嶝岛、后村等地起航，途中遭敌炮火拦击，受到部分伤亡，船队已不能保持完整的航渡队形。二十五日二时许，各船陆续在龙口、古宁头附近靠岸登岛。各部在‘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战术要求下，分头向敌勇猛攻击，大胆穿插”。一场惨烈的攻岛战役在大金门岛上展开了！

### 19. 务必力戒轻敌急躁

就在这时，敌“第十二兵团之第十八军已到达该岛加入了战斗，协同原有守军，在坦克配合下对我登陆部队实施连续反击，我军被迫退至古宁头地区继续坚持战斗。由于我军登陆时已是退潮时间，所乘船只全部搁浅，进而被敌飞机及地面火炮全部炸毁，致使后续部队无船可渡，登陆部队处于敌众我寡、孤立无援之境地。二十五日，后续部队虽四出搜罗船只，但仅够装载四个连的兵力，于当晚

起航登岛，与坚持古宁头部队会合。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登岛的全体指战员仍临危不惧，顽强战斗，连续向敌猛烈的反击。但因兵力薄，后援不继，终难挽回败局。激战至二十七日，两批登岛部队共三个多团九千零八十六人（内有船工、民夫等三百五十人）一部英勇牺牲，一部被俘”，无一生还。这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的一次重大损失！粟裕作为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感到十分震惊！自解放战争打响以来，他在中央军委、毛泽东的领导下，协助陈毅同志指挥过无数个大的战役，均取得了胜利。但是，他没有想到在华东全境业已解放仅仅剩下攻占沿海岛屿的情况下，竟然遭受了如此巨大的失败！为此，他于十月二十八日致电第十兵团司令叶飞及福建省委，指出十月“二十七日八时电悉。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当时，我们曾电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并请福建省委，用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至失散人员，仍望设法继续收容”。

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他在接到上述电文之后的第一感觉是，我全军将士在取得辉煌的解放战争胜利的时候，一种骄傲、轻敌的苗头在萌芽、滋长。为此，他决定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批转《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并要求各部“特为转达，请即转告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另外，他还以中央军委的名义重笔写下了如下这段批语：

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军委十月二十九日

## 20. 对解放舟山群岛作战方案进行审核

毛泽东在向全军发出上述指示不久，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于十一月三日发起定海（即舟山群岛）战役。由于对敌据岛顽抗及援军迅速登岛估计不足，致使我军在攻击定海登步岛的作战中遭到敌守军、援军和海空军的联合反击，被迫撤出战斗。自然，也受到了很大的伤亡。毛泽东接到报告之后，仔细分析了敌我态势以及失利的原因，继而又对第三野战军有关解放舟山群岛作战方案进行审核，发出了《须重视对定海作战的各项问题》的电令。他明确指出：

舟山群岛共有敌军五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岛作战的失利，你们须严重注意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提议你们派一要员直赴定海附近巡视检查一次。如何盼复。

毛泽东在发出上述电令之后，他的战略思路进行了转移，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在攻击海岛的战役中迭次失败？自然，他很快就得出了结论：我人民解放军主要是陆军，于渡海作战没有经验；另外，敌人不仅有着较为强大的海军，而且还有美国武装起来的空军。在敌人掌握着制空权及制海权的前提下，如何解放沿海岛屿以及攻占海南岛、台湾都成了我军战史

上的新课题。换言之，必须审慎研究我军尚不熟悉的渡海作战的战略和战术问题。据史记载，我军在攻占华东地区主要城市之后，毛泽东曾于七月与朱德总司令研讨过解放台湾的问题。那时他们认为：只要苏联援助我们几十架飞机，掌握了制空权，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发起解放台湾的战役。但是，我军经过金门岛战役与定海战役的失利，审慎地推迟了解放台湾的时间。半年之后，国际形势发生骤变，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入侵我台湾海峡，使得我不得不改变解放台湾的计划。

也正因为有了金门战役、定海战役的失利，毛泽东对解放海南岛也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他曾于金门战役失利后不久的十月三十一日，明确指示林彪等四野首长：

“我们已占领广州及广东的大部，广州、香港、澳门之间的海上残敌尚未肃清，陈赓兵团即将入桂作战，内外敌人可能窥伺广州，白崇禧匪部如被程子华、陈赓切断逃往云南、安南（越南）的道路，有东窜入粤可能。因此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两个军）必须全力镇守广州（主力）、韶关（一部）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华南分局决定邓华兵团迅速离开广州南进的计划是不妥当的。”

## 第四部分

### 21. 对人民解放军的兵力进行了部署

毛泽东在这以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虽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政、外交尤其是访问苏联等大事上，但是他时时都在思索渡海作战以及解放海南岛这一问题。

在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指挥下，我四大野战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将盘踞在大陆上的国民党残敌大部就要全部消灭。为了确保新中国的安全，或者说随时准备对付外来入侵之敌以及消灭残留大陆的兵匪，毛泽东在出访苏联的前夕，对我人民解放军的兵力进行了部署。略谓：

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二野入云、贵、川、康后，三野只能防守华东，置重点于沪、杭、宁区域，以有力一部准备取台湾，没有余力兼顾华北。现在华北只有杨成武三个军及其他六个二等师位于京、津、山海关一线，一旦有事，颇感兵力不足。除令一野以杨得志兵团（三个军十万人）位于宝鸡、天水、平凉区域，有事可随时调动外，四野在广西问题解决后，拟以五个军位于两广，担任广州为中心之两广国防；以三个军位于河南，准备随时增援华北；其余各军，位于湘、鄂、赣三省并以主力位于铁道线上，可以向南北机动。在目前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四野除完成各省剿匪任务外，如能做到，甲、解决广西问题，乙、修通粤汉、湘桂两路（这是极重要的），丙、利用铁路运输完成上述国防部署，就是完美无缺的。

关于向西北进军尤其是新疆和平起义以后有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也花费了很大的心血，请看他为妥善处理新疆问题所走的几步棋：



首先，是对待新疆民族军的问题。

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人民，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举行武装起义，并形成三区自治的区域。同时，以三区武装起义部队为核心，发展成一万四千余人的民族军，为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进驻新疆了，如何正确对待民族军就成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为此，毛泽东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致电彭德怀等一野的首长：“民族军应改名为人民解放军，他们已有此意，并要求我们派政治工作人员去。此事及应编师的数目及具体番号，待你至迪化与民族军负责人商量后再定。”这样，就把民族军的历史功绩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中了。另外，为了体现民族平等的原则，毛泽东明确指示：“民族军必须有人为新省军区副司令”；在成立以王震为书记的新疆分局的时候，毛泽东又指示：原新疆“自治区只有民主同盟，尚无党的组织（应该建立党的组织），是否可以同盟负责同志数人临时参加分局会议，待考虑后再告”。

## 22. 亲自发展赛福鼎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次，是在新疆少数民族同志中发展党的组织。

毛泽东早在一野向西北进军的初期就指出：在西北少数民族中没有党的骨干分子。时下，新疆成立分局党组了，依然找不到一位少数民族党员参加。为此，毛泽东在北京亲自发展赛福鼎加入中国共产党。

赛福鼎，时任新疆保卫和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代主席。在阿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乘坐飞机遇难之后，赛福鼎作为新疆三区的代表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他在留居北京期间，受到了党中央毛

泽东等领导同志的接见，亲身感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为此，他于十月十五日向中央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毛泽东获悉此事之后，决定利用设家宴的办法，与赛福鼎边谈新疆的工作边谈入党的问题。自然，每当说到新疆问题，毛泽东就会条件反射似地想到两件事，一是惨死在新疆军阀盛世才屠刀下的弟弟毛泽民以及陈潭秋等同志，一是乘坐飞机遇难的阿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如果他们还在，新疆成立党的组织还能没有党的骨干吗？

因此，他在等赛福鼎到来之前，提笔展纸为阿哈买提江等五位遇难的同志写下了如下这幅碑文：

为民族解放及人民民主事业服务而牺牲的阿哈买提江·卡斯米同志、伊斯哈克伯·木奴诺夫同志、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同志、达力立汗·苏古尔巴也夫同志、罗志同志们的精神永垂不朽！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当赛福鼎走进菊香书屋之后，毛泽东把亲笔写的这幅碑文交到赛福鼎的手里，很是客气地说道：“赛福鼎同志，你看看，我为阿哈买提江等五人不幸遇难写的碑文行吗？不行的话，我再重写。”

赛福鼎双手接过这幅碑文，很快看完，操着不太熟练的汉语说道：“用我们维族的话说：亚克西！阿哈买提江等五位烈士能得到主席这样高的赞誉，也可安息了。”“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新疆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切。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也没有看到新疆的新生。”

接着，赛福鼎向毛泽东介绍了有关新疆三区革命的历史以及诸少数民族的风俗之后，郑重地取出一页文稿，双手恭敬地捧到毛泽东的面前，说道：“主席，不久以前，我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今天，听说主席请我

来做客，我又重新抄写了一遍，当面交给主席，看看我赛福鼎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

毛泽东双手接过这份入党申请书，很快审阅完毕。旋即又把这份入党申请书放在桌上，说道：“赛福鼎同志，我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 23. 连吃饭这样的事情都想得如此周到

“主席！”“赛福鼎同志！”

毛泽东伸出双手，用力地握住赛福鼎的双手，许久许久没有放开……毛泽东望着赛福鼎那激动的表情，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请赛福鼎落座，两人就新疆诸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突然，秘书走进屋来，把一叠文件交给毛泽东。赛福鼎急忙站起身来，说道：“主席，您的工作太忙，我告辞了。”“不！讲好了的，吃完了饭再走。”“不麻烦主席了，我是伊斯兰教……”“这我知道。一早，我就让秘书去北京饭店，请了一位有名的回民厨师，由他选的上好的牛、羊肉，不吃岂不可惜了。”“主席，我吃，我一定吃！”

毛泽东连吃饭这样的事情都想得如此周到，实在是太出赛福鼎所料了！据赛福鼎回忆，他在主席家不仅吃了一顿可口的饭菜，而且还亲耳聆听了毛泽东讲的很多深入浅出的革命道理，对他的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赛福鼎离去之前，毛泽东又在赛福鼎入党申请书上作了如下批语，并交由赛福鼎代转：

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手续。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再次，毛泽东为了新疆工作开展顺利，他又请来原国民党主政西北的最高行政长官张治中，请张从旁助一臂之力。张治中听后讲：“主席太客气了！半年前，我就对主

席讲过这样的话：国民党执政二十余年，没能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愧对国家人民。现在你们执政了，我愿意从旁尽一份力量。”“我也再次说明：文白先生不能以旁观者对待新中国，因为你为她的诞生出了力。”毛泽东很是真诚地说道。“可是，我总觉得自己是属于那个政权的。既然失败了，我这个人也自应成为过去了。”“不对，还记得吧，我曾对你说过这样一句话：你的一纸声明，就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开始。”“主席，情感深处的事是讲不清的啊！”“这我当然能理解。一句话：你在历史上是共产党的朋友，是我毛泽东的朋友。国共和谈之后，你又为新中国的成立，为促进新疆的和平解放立了功。”毛泽东看了看张治中微然摇首的表情，又以商量的口气说道，“文白先生，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

## 24. 果断地研究解决上海的经济问题

张治中听后就一怔，不知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意思，就说道：“主席，现在是您的领导，谈不上什么国共合作。需要我做什么，您吩咐就是了。”

“对朋友怎么能吩咐呢？我希望文白先生去新疆一趟，帮助彭德怀同志做好那边的工作。”

“说句老实话，我在西北工作有年，离开以后，常常想念那里的人民，您认为我有去西北一趟的必要，我愿意当彭老总的顾问。”

“不，不！”毛泽东连连摆手，“过去，你是西北最高行政长官，此行是请你做彭德怀的副手，真是委屈你了！”

“我愿意接受，听命令，听吩咐。”

毛泽东在做了上述工作之后 ,又以中央的名义给彭德怀等同志下达了《关于新疆问题》的电报 ,对解决新疆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 :

我们认为.....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 ,为新疆的主要民族 ,过去反动派压迫新疆人民主要地就是压迫维吾尔族。现在人民解放军入疆 ,维吾尔族及各族人民表示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 ( 以及其他各族 ) 建立兄弟般的关系 ,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因此 ,一万四千人的民族军 ,应使之和人民解放军一道 ,分布全疆各地 ,作为人民解放军联系维吾尔族、吉尔吉斯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桥梁 ,进行民族工作 ,建立人民政权 ,建立地方武装和建立党的组织。此事如何具体进行 ,请与赛福鼎进行初步商谈。尔后 ,由分局逐步解决。

毛泽东在解决了重建新疆的问题以后 ,上海的金融风暴已经越演越烈 ,大有动摇新中国的政权之势。为此 ,他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 ,果断地研究解决上海的经济问题.....

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 ,就一再向全党同志发出号召 :学会管理经济和城市的工作。因为他清醒地知道 :能否统一全国财经管理 ,努力制止持续多年的通货膨胀 ,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项与夺取政权同等重要的新课题。自然 ,也是对共产党人执政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

上海刚刚解放 ,不法资本家与国内外敌人勾结 ,公然制造所谓“ 银元风潮 ” ,妄图从经济上摧毁以陈毅为市长的上海新政权。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 ,未经十天的较量 ,共产党人就打败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 ,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 ,国内外的敌人不仅不承认失败 ,反而认为共产党是采用军事手段解决经济问题 ,并得出结论 :说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不懂经济规律。为此 ,他们公然叫嚣 :

“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就说一些共产党人的朋友，也不无担心地说：“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在他们看来，要不了多少时间，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这些在农村土生土长的“土八路”，一定要失败在不懂经济上！对此，毛泽东说道：“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

## 25. 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要求

毛泽东是一位了不起的战略家。他不仅向全党发出号召学会管理城市工作，同时还一再提出把几百万解放军变成工作队。与此同时，他还及时地建立了管理全国经济的统帅部中央财经委员会，选调熟悉城市工作又懂经济的陈云出任中财委主任，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陈云走马上任之后，一是健全中财委各级组织，真正成为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司令部；再是南下上海进行调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财经会议。

陈云此次调研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天上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地上，国民党退出上海以前，在上海潜伏了大量的特务，他们躲在暗处，不断地打黑枪，随时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天公似乎也不作美，陈云到达上海不久，七月二十四日，上海即遭受了三十年未遇的台风袭击，由于国民党长期缺乏防汛措施，海堤江堤受损严重，以致江水倒灌，市区受淹，南京路闹市可以行船，市政府大厦内水深过膝。”由于陈云调查的对象多为资本家，他们瞧不起共产党，认为是土包子，根本不懂经济，所以他们不仅不坦诚相待，反而处处为难。然而，陈云这个老上海知难而进，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在上海召开的财经会议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接着，他成功地召开了财经会议，并作出了一系列的

解决全国经济问题的具体措施。九月二日，陈云由沪返京，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毛泽东历来重视上海的工作，他视上海为全国经济形势的晴雨表。他在听了陈云的有关汇报之后，为了稳定上海的政治、经济形势，于翌日九月三日，给饶漱石发去电报，就上海的工作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要求：

陈云同志已回，九月二日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报告。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的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易迁移，不轻易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必须精密筹划，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则不要迁移。对难民的迁移，亦需如此。着重节约那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开支，但不要减少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着重反对浪费，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封锁在目前时期对于我们极为有利，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看，都是有利的。已裁的二万七千人，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满，应加以处理。其办法是立即加以调查，分别自己有办法生活和自己无法生活的两类。对于后一类人，应予收回，给以饭吃。现在无事做，也应给以饭吃，维持他们，使他们活下去，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就全局来说，全国养九百万至一千万人是完全有办法的。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如像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你找三个旧职员谈话那样，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

## 26. 一场反封锁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但是，刚刚解放不久的上海，在经济运行中的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例如，自上海败退的蒋介石集团于六

月二十三日实行海上封锁，他们利用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岛控制东海门户，切断各国开往上海的商船。这样一来，“进口的柴油、汽油立即断绝了主要来源，印度和美国的原棉、南洋的橡胶及许多已买到手的工业原料，搁在各国港口运不进来”。结果，如上海市长陈毅所说的那样：“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物价要高涨，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困难。”一时间，工商界许多人惊慌了，有人准备跑香港、台湾。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趁机提出要求：他们可以用商船帮着我们把原料运到上海，但必须由他们的军舰护航到吴淞口。对此，陈毅坚定地答说：“这是利用我们的困难，想打开我们的缺口。他们过去攻打广州虎门，炮轰四川万县、南京下关，中国老百姓死了成千上万，他们又想到我们海域来干什么？中国海域让外国军舰自由出入，还不是出让主权？这扇门绝不能开，不能接受这种变相的侵略！”

从此，一场反封锁斗争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毛泽东批准了以陈毅为首的上海市委制定的“反封锁六大方针、五大任务”，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措施，使上海工业终于从萧条困难中挣扎出来，并走上了复苏的道路。

但是，经济的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毛泽东作出多少指示，也不论资本家在“银元风潮”中吃过多大的亏，不法资本家依然会受利益的驱动，在动荡不定的上海金融界再次掀起新的金融风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国内外敌人不甘心他们在军事上的失败，企图在经济战线上夺回他们失去的一切。就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全国的经济形势逆转，“自十月十五日，沪津先导，华中、西北跟进，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不出一个月，物价平均指数：京津涨一点八倍，上海涨一



点五倍，华中、西北大致相同。”为此，毛泽东找来了陈云，商讨有关解决的办法。

陈云很早就向中央提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为大米、纱布和煤炭。因为这三样东西是城市的命根子，是不能一时或缺的。正因如此，这也是投机分子和游资冲击的主要对象。自然，“两白一黑”中的关键又是“两白”，即大米和纱布，因为一个是吃的，一个是穿的。陈云说：粮食和纱布“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直言之，“市场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为此，我中财委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对解决粮食和纱布问题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国内外的敌人以及不法资本家利用我们发行纸币过多，全国政局尚不稳定等因素，再一次向新诞生的政权发出了挑战。对此，陈云向毛泽东报告：“这次物价上涨，一方面是由于钞票发行过多，但更主要的是投机资本在兴风作浪。实际上是不法资本家继银元风潮之后，跟我们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的又一次较量。”

## 27. 让他们知道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的厉害

毛泽东是大政治家，他看问题的视点自然是政治。他听了陈云的汇报之后，严肃地说：“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次物价飞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尤其是官僚资产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再次向我们发动的一场进攻。”

对此，陈云点了点头。

“主要战场在什么地方？”

“在上海。”

“有没有辅助战场呢？”

“有，是北方的天津。”

“南沪北津，遥相呼应。”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他们手中握有什么样的牌呢？”

陈云报告道：在较量的主战场上上海主要物资是纱布。由于投机分子集中攻击纱布，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涨了三倍八倍，棉布上涨了三倍五倍。由于棉纱和棉布价格的上涨，也导致了其他日用商品价格的上扬；在天津和北京等大中城市，由于夏天多雨，洪水成灾，使得夏粮减产，因此一些不法资本家借机囤积粮食，哄抬粮价，市民抢购粮食成风。最后，陈云总结道：“简而言之，一句话，上海是纱布，北方是粮食。”

“南纱北粮，有意思……”毛泽东沉吟良久，又问道，“他们的手段呢？”

“是共同的：囤积居奇。”

“他们先囤积，后居奇，等待行情一涨再涨。对吧？”毛泽东问道。

“对！主席，按照时下的行情发展，到十一月初，棉纱恐怕就得上扬四倍，棉布至少也得上扬三倍多。”

“好厉害呀！”毛泽东说罢站起身来，旋即在室内缓缓踱步、凝思。接着，他又向陈云详细询问了我们手中握有的纱布实力，一套制胜不法资本家、投机家的方案渐渐地形成了。最后，他就像指挥军事战役那样，果断地说道：“陈云同志，请立即电告陈毅同志：要不露声色地顶住。在此期间，中财委尽快拿出打垮投机家的方案和措施，提交中央讨论，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集中打击上海、天津两地的投机家，让他们知道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的厉害！”

陈云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他为了抑制京津地区因缺粮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急电东北局，要求紧急调拨一批粮食入关，支持华北尤其是北京、天津的粮食市场。“为求万无一失，陈云又命令曹菊如赶往东北，并要

他坐镇沈阳，保证东北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由北京市在天坛打席围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围，要让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有粮食，在粮食方面无隙可乘。”这招棋很灵，北京、天津的粮贩子看到东北的粮食源源而来，未敢轻举妄动。因此，北粮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毛泽东表扬道：

“只要我们做到手中有粮，老百姓就自然而然地心中不慌。这招棋从军事上讲叫示强于敌。”

但是，毛泽东在解决上海所谓纱布之战的时候就采取了相反的策略，那就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 第五部分

### 28. “快拿出你亲自制定的决战方案吧”

为了迅速平抑全国的物价,打击上海形形色色的投机家,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连续向全国发出了十二道指令。为了让投机分子把囤积的棉纱,怎么吃进去的再怎么吐出来,他要求:(甲)目前抢购风盛时,我们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他起草完这份电报,当晚即上报中央。

周恩来阅罢立即在这份电报上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出送阅。”

世人皆知,毛泽东多在夜间办公。他收到这份电报后,当即提笔指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少奇)、朱(德)。”

为求在上海经济战线上发动的这场战役大获全胜,毛泽东又亲自召开会议,听取有关报告,作出具体部署。首先,陈云报告说:“根据中央、主席的指示精神,我以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名义于十一月十三日向全国发出指示电。同时,为保证江南纱布的供应,特委派钱之光同志先到上海,然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的纱布量。一句话,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这东风就是中央下命令了!”毛泽东说罢仍不放心地问道,“恩来同志,到目前为止,我们手中的确有了充足的反击投机家们的子弹了?”

“是的,”周恩来深沉地点了点头,“在政务院的统一领导下,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紧张准备,大量物资集结完

毕，我们手中掌握了充足的纱布。一句话，与上海投机家们决战的时机完全成熟了！”

“好！”毛泽东习惯地掷出右手，“陈云同志，快拿出你亲自制定的决战方案吧！”

陈云亲自制定的方案共分三个步骤：一、抛出我们库存的冷货和呆货，供上海的投机家们抢购；二、随行就市，按照时下市面上的价格抛售纱布，再次供投机家们抢购；三、当投机家们吃得快要撑死的时候，我们再全面压价抛售。接着，周恩来又补充说道：“这样一来，吃到投机家肚里的纱布吐吧，赔老本；不吐，就胀死。一句话，最后只有跳楼一条路。”

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当他获悉这些投机家们的融资手段一是借高利贷，再是向人民银行借贷后，他又严肃地指出：要通知我们的人民银行，要严格借贷手续。到时，这些投机家不还钱，就以实物抵押。最后，他终于下达了命令：“既然是战场较量，就要严格封锁一切消息，让这些投机家们在商场中变成瞎子、聋子，要做到像蒋介石那样听从我们的指挥。为此，请总理电告上海的陈毅同志：欲要大获全胜，就要注意保密。陈云同志，你是这场战役的总指挥，请下达决战的命令吧！”

陈毅市长接到中央的命令以后，按照中央的部署与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采取统一步骤，在同一天所有国营花纱布公司一起抛售纱布。

## 29. 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

开市之后，上海等地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势力不知是计，一看市面上有纱布售出，拿出全部资本争相购进，有的甚至不惜借高利贷。“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上海人称为‘日拆’，这在上海、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罕见的。”这是因为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和投

机家们根据经验，纱布价格一天之内涨好几次，当天出售，不但可以应付日拆，而且还可以获高利。另外，正像俗话所说的那样：“资本家生得怪，越贵他越买，越贱他越卖。”结果，上海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争相借贷、争相抢购纱布的风潮，搞得市民人心惶惶。

陈毅市长及其他的战友们不露声色，他命令上海所有国营花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市面上绝无告罄的态势出现。随着库存滞销的冷货、呆货等抛售完毕之后，这些国营花纱布公司又根据市委的指示一边抛售上等的纱布，一边逐日降低牌价。投机讲究的是买涨不买落，投机者一看国营公司货源充足，价格一路走低，知道大事不好，急忙开始抛售自己原有的以及最近吃进的纱布。结果，他们抛售得越多，市民们越不买，因而市场行情跌得也就越快。据史记载：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降了一半。接着，陈毅市长根据中财委的指示，又采取了如下几条措施：

首先，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借贷，让这些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家无法周转可供投机用的资本，唯有降价、亏老本抛售手中囤积居奇的纱布；

其次，严格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必须照发工人的工资。结果，这些不法资本家不仅无工可开，而且也无工资可发，被逼得只有夜对苍天叫苦不迭；

第三，国家税务部门加紧征税，严格规定税金不能迟交，迟交一天，就罚税金额的百分之三。

这样一来，参与投机的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家们，“两面挨光”，再也受不住了，不得不要求市政府出面，由国营花纱布公司买回他们吃进的棉纱、棉布。国营公司乘机以极低的价格又买进大量的纱布。这些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家历经这一买一卖，仅仅几天，就赔得“血本无归，应付

不了‘日拆’，跳楼自杀，有的卷起铺盖逃往香港”。由此，上海及全国的物价迅速稳定下来。

当时，对于我党在上海打击投机势力的做法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如上海有个大资本家曾这样对陈云说：这些招是不是太狠了？陈云当即说：“不狠，不这样，就天下大乱。”

过去，那些曾经说共产党经济打零分的资本家，而今却发出了如下的感叹：“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毛泽东在接到上海打击投机势力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后，对陈云领导经济战线上的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

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另一场禁毒、禁娼、取缔黑社会的战斗，也在上海初战告捷。

### 30. 研究清除三大毒瘤的运动

毛泽东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对旧社会黑暗到什么程度是非常清楚的。另外，他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深知造成中国如此黑暗、腐败的罪魁祸首是历代帝王和一切统治阶级。随着时代的推移，勾栏妓院、行帮迷信应运而生。等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妓院又与烟馆、黑社会同流合污，把旧中国彻底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而在深渊底层的就是中国的妇女。

因此，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后，他就严肃地向全国人民指出：妓院、烟馆、黑社会是附在中华民族肌肤上的三个大毒瘤，不下定决心清除它们，红色的中国就会一步一步地变黑。

时人皆知：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是藏污纳垢之地。据史记载：赌场、按摩院之多位居全国之冠。说到大小妓院更

是无计其数。据说有个干部做过调查研究，从四马路（今福州路）走到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共遇到妓女有七百六十四个！说到上海的流氓，多与青帮、洪帮有关系，就说在解放之后，聚赌抽头、拐卖人口、贩卖毒品、偷盗绑票等等依然是司空见惯，昔日的“码头霸”、“扒窃霸”、“菜场霸”、“人力车霸”、“粪霸”……依旧招摇过市。这些流氓集团依附于青帮、洪帮，实际上是上海底层的控制者。

为此，毛泽东要求陈毅市长坚决打击各种黑社会势力，采取有效的措施取缔妓院、赌场和烟馆。

毛泽东早在西柏坡的时候，就曾通过与青帮有着关系的章士钊先生向杜月笙传过话；同时，毛泽东还通过潘汉年与时在香港的杜月笙谈妥，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的时候只要他命令弟子不动，我们不杀其上层。

上海解放后，陈毅又亲自派干部找到留居上海的黄金荣。“要他按政府法令办事，并管束门徒，不得再为非作歹。八十岁的黄金荣唯唯从命，并将手下所有大小头目的花名册呈交给军管会。后来，一批罪恶深重、民愤极大而又继续作恶的流氓恶霸如‘江北大亨’、‘码头春宝’等被先后正法，刑场周围几千群众放鞭炮庆贺。不出两年，盘踞上海半个世纪以上的黑社会势力，便基本肃清。”

就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大搞清除依附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三大毒瘤妓院、烟馆、黑社会的同时，毛泽东请来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长罗瑞卿，一道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清除这三大毒瘤的运动。那天下午，毛泽东独自在中南海岸边踽踽踱步，不时眺望故宫的深墙和角楼，似陷入十分深沉的凝思。有顷，彭真和罗瑞卿来到跟前，询问毛泽东在想些什么，毛泽东很是意外地问道：“请问二位，你们知不知道皇帝有多少个老婆？”



彭真和罗瑞卿被问得瞠目结舌，不知该如何回答。少顷，罗瑞卿看了看表情严肃的毛泽东，知趣地摇了摇头。

“彭真同志，你是北京市委书记，应该知道吧？”毛泽东问道。

彭真被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想了想，很不自然地答说：“主席，我当市委书记的时候，清朝皇帝已经退位整整三十八年了！”

### 31. 终于明白了毛泽东召见他们的原因

“这不是理由嘛！”毛泽东沉吟片刻，“你是当今北京的父母官，也应该知道皇帝年间的事嘛！你们二位听没听说过，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

彭真与罗瑞卿相继点了点头。

“罗部长，算算看，加起来一共有多少？”

“八十一。”罗瑞卿似有所悟，“也就是说，皇帝有八十一个老婆。”

“这是法定的，所谓后宫三千，都是供皇帝玩弄的女性！除此之外，大小宦官，还为他们在宫外设宅，幽会各种情人。上行下效，就有了金屋藏娇、勾栏妓院，把整个封建社会搞得乌烟瘴气，龌龊不堪！因此，我对着紫禁城终于悟出了这样的道理：形似威严的皇宫，原来却是妓院的衍生之地。”毛泽东越说越气，他停了一下，又严肃地说道：“今天请你们二位来，一是要你们在首都查禁妓院、烟馆，坚决地取缔黑社会；再是研究一下，我们共产党人如何清除依附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三大毒瘤！”

彭真和罗瑞卿终于明白了毛泽东召见他们的原因。因此，他们当即表示：一定要从政治的高度认识这三件大事的意义，同时还要采取果断的措施，落实毛泽东交给的查封妓院，严禁烟馆，取缔黑社会这三大任务。

毛泽东转而又问道：“彭真同志，你知道如今的北京有多少妓院吗？”

彭真听后微微地摇了摇头。

“公安部长同志，你知道时下的北京有多少妓女吗？”

罗瑞卿也摇了摇头。

接着，毛泽东把陈毅在上海查封妓院、上街“钓”暗娼等方面的经验讲了一遍，又指示道：“我请你们二位来的目的有二：一是立即搞出一个查禁妓院、清除暗娼的行动方案；二是搞出一套改造妓女的经验来，然后再向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推广。”

彭真和罗瑞卿亲自坐镇，民政局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通过一个星期的调查研究，在十二个小时之内就查封了二百二十四家妓院，收容妓女一千二百八十八人。为了扩大战果，他们不仅正在向纵深发展，而且还把这些妓女集中起来学习，要她们学会自食其力，重新做人。毛泽东听后并未现出喜悦之情，相反，他却皱起了眉头。思索有时，又要通了彭真的电话：“你把那一千多名妓女集中起来学习，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认为同时你们还要请高明的大夫，为她们进行全面的检查。”

“主席，这个工作我们正在进行，从检查的结果看，有百分之五十的妓女有性病。”

“一定要把她们的性病根治好！”

“可我们没有那样多的进口特效药青霉素。”

“动用外汇去买，也要把她们的性病治好！”

随着查封妓院、严禁烟馆、取缔黑社会运动在全国展开，毛泽东认为要在新中国根除妓院，必须尽快制订一部保护妇女权益的婚姻法；若想在中国根除黑社会，也必须制订一部在全国行之有效的法律。为此，他正式向政务院

政法委员会提出：一定要在近期制订出上述两部法律，在全国颁布执行！

也就是在这前后，毛泽东就要动身去苏联访问了。因此，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出访苏联的工作方面来了……

### 32. 挥笔写下了这则新闻稿

毛泽东自一九四八年三月胜利完成转战陕北，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东渡黄河以后，就曾计划出访苏联。但是，因国内政治、军事迅速发展，终未成行。

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尤其是随着我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取得胜利之后，创建新中国的大任迫在眉睫。在毛泽东看来，“建国以后如果外国三天不承认，就有问题了”。恰在这时，美国政府不改侵略本性，依然支持业已倒台的蒋介石，使中美建交在当时已不可能。由哪个大国率先承认新的中国呢？从全球外交全局来看，苏联一直对中国共产党有友好的一面，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又基本一致，因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公开打出“一边倒”的口号。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派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出访苏联，得到斯大林的允诺：新中国一成立，苏联便率先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的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同一天，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向各国政府发出公函，强调指出：“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望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基于国际大势的需要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十月二日 ,斯大林指示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发来如下这则电报 :

周恩来先生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已收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本年十月一日之公告 ,其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在研究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之后 ,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 ,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 ,故特通知阁下 :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并互派大使。

当时 ,周恩来虽然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但由于外交部尚未正式成立 ,所以周恩来把上述电文转送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实事求是地说 ,毛泽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就收到苏联建交的电报 ,是十分高兴的 !他看罢电文之后 ,当即挥毫写下了这则《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 :

在本月一日下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 ,以公函向各国政府发出毛泽东主席的公告后 ,苏联政府业已收到此项公告 ,并于二日二十一时四十五分以葛罗米柯署名的照会电达周恩来部长 ,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中两国的外交关系 ,并互派大使。

## 第六部分

### 33. 值得纪念的日子

毛泽东深知舆论的重要性，在准备讨论政务院组阁的会前，他把上述新闻稿交给周恩来，并风趣地说道：“这是我起草的《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呈请周总理审阅。”

周恩来听后笑了，接过毛泽东起草的这则新闻稿以及附录的葛罗米柯的来电认真拜读，他阅后微微地点了点头，说道：“很好！立即交乔木同志，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向中外广为播发。”

“完全正确！”毛泽东猝然间来了情绪，“我们就是要利用和苏联建交的时机，在国际上展开一个强大的外交攻势，争取有更多的国家和我们建交。”“据我估计，随着苏联和我国建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

“接着，我们要通过这连续的建交宣传，再争取更多的国家，尤其是和我国为邻的亚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我想，会按照主席的估计发展的。既然和苏联宣布建交，那我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

“王稼祥，是在西柏坡的时候选定的。”毛泽东说罢又问道，“周总理，你这位外交部长什么时候组建外交部啊？”

“快了，”周恩来边说边把一叠文件送呈毛泽东审阅，“这是有关组建外交部的宗旨以及人选。”

毛泽东看罢满意地点了点头。有顷，他又深沉地说道：“近一百年以来，由于当道者昏庸无能，无一不是跪着办

外交，搞得丧权辱国。因此，一定要告诫我们在外交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从现在起，要挺起胸膛来为国争光！”

正如毛泽东所估计的那样，继苏联与我国建交之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家在十月底以前相继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发表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电告周恩来外长。由于照顾到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中国同南斯拉夫建交暂被搁置。

就这样，我们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不仅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诸国的外交地位，而且也增加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十月十六日在我国外交史上是值得纪念的日子，苏联派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大使罗申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递交国书。由于这是第一位大使递交国书，毛泽东十分重视这次接受国书的礼仪。是日，毛泽东身着中山装，在外交部长周恩来、内定的我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等同志的陪同下，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接交国书的仪式。当时，毛泽东双手接过苏联大使罗申递交的国书之后，当即发表了自己亲笔起草的《接受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 34. 乘坐专列出访苏联

毛泽东在郑重地发表完答词之后，遂与苏联驻华首任大使罗申进行交谈。首先，他指着身边的周恩来介绍道：“贵大使，这位就是我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

罗申曾任苏联驻南京国民政府的大使，是一位能操汉语的中国通，自然知道周恩来在当今中国的地位以及办外

交的能力。因此，他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手，说道：“久闻总理阁下大名，今日相见，实在幸会。”

周恩来十分了解罗申的底细，不失身份地说道：“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亲如兄弟，不必这样客气。请坐下谈吧！”

毛泽东伸手示意请罗申落座，接着自己才坐在主人的座位上。罗申等周恩来、王稼祥等落座之后，热情地说道：“主席阁下，总理阁下，我们的斯大林同志让我转告贵国，他对中国取得的胜利由衷地高兴。”

毛泽东是一位纵横大家，他自然知道苏联对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用；自然，他也清楚中国共产党需要斯大林的支持，因此，他很策略地说道：“这胜利不仅有苏联无私的援助，也与斯大林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为此，请贵大使向贵国人民、向斯大林同志转告我最真诚的感谢。”

寒暄过后，周恩来为了使毛泽东尽快访苏，与斯大林进行会晤，他有意地问道：“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正逢斯大林同志七十大寿，不知贵国计划如何为斯大林同志祝寿？”

“据我所知，除举行国庆活动外，还要邀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出席。”

周恩来以大外交家的敏感，抓住了这一重要的话题，他有意地说道：“我们的毛泽东主席早在延安的时候，就为庆祝斯大林同志六十大寿写过文章。这次如能躬逢其盛，代表中国人民向斯大林同志祝贺七十大寿，那将是很意义的。”

罗申作为外交家，当然也明白毛泽东为斯大林祝寿的政治影响，所以他当即高兴地说：“这也是我们苏联人民的光荣！”

“好，”毛泽东也不失时机地说道，“请贵大使先向贵国政府报告一下，我一旦收到邀请信，将立即动身赴苏联，为斯大林同志祝寿。”

呈交国书的仪式结束之后，毛泽东握住罗申的手说道：“我们将为贵大使在华工作提供一切方便。”

“谢谢主席阁下！我一定把您的盛情转告斯大林同志。”罗申说罢与周恩来、王稼祥等一一握手，乘车离去。

毛泽东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晚九时，乘坐专列出访苏联。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上午，中国代表团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克里姆林宫，苏联代表团在斯大林的带领下早已迎候在那里。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正中间，周恩来和维辛斯基端坐在签字桌本国国旗一旁，分别全权代表两国政府，郑重地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 35. 从刀光剑影的战场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毛泽东一行于二月十七日夜启程回国。由李富春、王稼祥等组成新的代表团，留在苏联继续进行谈判并签订一些单项贸易协定。毛泽东一行在归国途中访问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次克、赤塔等城市，与工人、科学家等进行了座谈，了解了许多有关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情况。二十六日，进入国境；二十八日，在长春参观后到达沈阳；稍作休息，遂于三月四日一行返抵北京，受到刘少奇、朱德等人的迎接。

如从十二月六日毛泽东离开北京算起，差两天就三个月了！可以想见，有多少内政外交大事需要他亲自处理啊！



虽说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工作千头万绪,然而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中央政治局、向中央人民政府报告出访苏联的情况。

毛泽东在讲到中苏缔约的历史意义的时候,他指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是巩固革命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毛泽东出访苏联近三个月中,依然是在他的直接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消灭了残存大陆的国民党的军队,结束了大规模的战争。换言之,未来的军事战场仅仅剩下了进军西藏、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等局部的几个地方。因此,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必须进行战略性的转移:那就是从刀光剑影的战场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说到经济建设已经成为新中国的主战场,在毛泽东看来又包含着如下的内容: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大中城市的经济管理,以及利用苏联贷款和专家,创建国有大型企业等等。为此,毛泽东回国之后,召开有关会议,听取有关同志的意见,在党内形成了共识:昔日,进行革命战争,主战场在农村;今天,进行经济建设,主战场是城市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所谓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战线转移,就是要把握好城市的金融和市场。仅就在上海这半年多以来的较量看,说明要完全、彻底地战胜上海的不法商人,还需要像打淮海战役那样,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分几个阶段进行。或许解放初期在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实在是太复杂了,毛泽东多次提醒战斗在各条战线的同志:经济战线上的斗争,

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更何况躲在台湾的蒋介石贼心不死，靠着高喊反攻大陆过日子呢！

正当毛泽东运筹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战线转移的时候，出乎他所料的是，他收到了一份华北军区的送呈件，略谓：时下军队出现了一些十分严重的倾向，急需纠正：“（一）集中力量搞生产，放松了剿匪任务；（二）工具未准备好，劳动量过度；（三）管理松懈，引起个别人员逃亡；（四）生产动员时片面强调分红，对增加国家财富和减轻人民负担的精神强调不够。”毛泽东看罢感到问题很严重，当即批转全军，要求各部“参考并纠正自己部队中的偏向，是为至要”。

### 36. 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

接着，令毛泽东更为震惊的是，他亲自审阅下发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规定：一切部队机关不得经营商业，但是，自从他访问苏联归来之后，“迭据各地报告，某些机关、部队、学校，仍有借口生产，从事商业经营者；亦有不经当地国营贸易机关，而直接在市场抢购大宗物资者；更有不顾政府法令，进行投机活动者”。这件事情不得不使毛泽东暗自思忖：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仅成立不到半年，他出访苏联才只有三个月，资产阶级以及封建势力开始侵入了新中国的肌体。这样下去，不要太长的时间，仅军队经商就不但会使人民的军队变质，更为严重的是还会亡党亡国！为此，他召集会议研究对策，遂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名义下发《关于严禁机关部队从事商业经营的指示》。略谓：

（一）国营贸易机关是负责调节供求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任何机关、部队、学校不得从事商业经营。过去机关、部队、学校所设商店，应移交给国营贸易机关，收回资金，

或自行结束。机关、部队、学校的消费合作社，只能在该机关、部队、学校内部经营消费业务，并须遵守合作法规。

.....

（五）对于违反以上各条规定之任何单位，当地政府均有权视其情节轻重，分别予以征购、没收等应得之处分。其关系重大者，可冻结其物资或现金，报请上级处理。.....

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家，他清楚全国向经济战线转移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初期，国内外的敌人千方百计制造事端，采用杀人放火、投毒爆炸等手段，搞得各条战线都时无宁日！为此，他下大力气抓了社会治安这件大事。

也是在毛泽东回国不久，他收到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有关报告：据公安战线上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反动派在从全国溃退前夕，曾有计划地在大陆潜伏政治土匪二百余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六十万。另外，他们还在许多地方预留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忠义军”、“光复军”等反动军事组织，其人数也不下数十万之多。国民党反动派逃到台湾之后，又不断派遣间谍、特务潜入大陆。这些反动势力无孔不入，对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和捣乱，其活动十分猖獗。

毛泽东在战略上向来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因此他看了这份敌情报告之后，曾在一次治安会议上不无藐视地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看起来，蒋家王朝的大厦被我们推倒了，这清理垃圾的工作还蛮困难哟！”

“是啊，我们还是保持冷静的头脑为好。”朱德赞同地说，“据我收到的各地的情报来看，江南数省尤其是主席的家乡无湘不成军的湖南，还有我的家乡天下已平蜀难平的四川，仅散兵游勇、反动的会道门、土匪恶霸，就不下百万人枪！”

“老总，你看，”毛泽东取来一份材料，“这是小平同志发来的电报，是恩来刚刚转给我的。老总家乡的袍哥、土匪还是很有些势力和地盘的。当然，我的家乡湖南尤其是湘西，多少年来都是土匪的天下。”

### 37. 对待人民和朋友却永远是敬重的

就在朱德接读邓小平发来的电报的时候，周恩来严肃地说道：“更为可气的是，蒋介石贼心不死，经常派遣小股部队，打着反攻大陆的旗号，袭扰东南沿海数省，搞得渔民出不了海，百姓也不安心春耕生产。”

恰在这时，哮喘病犯得十分厉害的李克农走了进来。毛泽东一看上气不接下气的李克农，怜爱中带着责备地说：“病得这样厉害，就应该住院治疗嘛！我和恩来不是对你作了专门指示嘛，你怎么还带病坚持工作呢！”

“主席，我能休息吗？”李克农边说边取出两份电文，“这是我们刚刚截获的敌人密谋刺杀陈毅同志、叶剑英同志的情报。”

毛泽东接过这两份电报迅速阅毕，又分转给周恩来、朱德，待周、朱二位看罢电报之后，他十分严肃地说道：“恩来，老总，我们必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一个文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集中镇压反革命，这对巩固新生的政权是必不可少的措施！”为此，中共中央于三月十八日也就是毛泽东出访苏联回北京的两个星期之后，第一次下达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与此同时，毛泽东一方面电告陈毅、叶剑英二同志，请他们务必注意安全；另一方面要求罗瑞卿、李克农亲自坐镇领导，一定要逮捕由台湾潜入上海和广州的刺客。

毛泽东对待人民的敌人是毫不手软的，可是他对待人民和朋友却永远是敬重的。也就是在他出访苏联回到北京不久，秘书告诉他：早已到京的仇鳌先生打来电话，向他

表示问候。他听后很是感叹地说：“没想到解放了还这样的忙，连见老乡长的时间都安排不出来！”

一天，他通知秘书：“找一天晚上，帮我准备一桌地道的湖南风味的饭菜，我要请仇鳌先生。同时，还要借此请几位老乡长来中南海聚谈一次。”

毛泽东曾于八月底电邀仇鳌与程潜等一道北上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共商国是。这时，仇鳌已经隐居故乡汨罗山村，他给毛泽东回电辞谢：“亦山半肺残躯，老迈无为，愿居林泉，以度余年。”由此可知，他是学着古代圣贤的样子，功成身退，淡泊自守。

程潜回乡之时，毛泽东又致信仇鳌：“纵先生无意职位，亦请先生来京欢叙。”仇鳌见毛泽东的来信情辞恳切，当即决定从故乡林泉中走出。他稍作准备，登车北来。不巧的是，这时的毛泽东正为出访苏联忙得抽不出身来，只好请秘书田家英代表自己，与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一起，去车站欢迎仇鳌先生的到来。

今天，前来中南海赴毛泽东宴会的是三位湘籍老人，他们是符定一、章士钊和仇鳌。按年龄算来，符定一是长者，因此，毛泽东亲自上前搀扶，而章士钊与仇鳌只好交由秘书代劳了。为此，他真诚地说道：“行严老，亦山老，只好委屈你们二位了，按照家乡的规矩，我只能搀扶最为年长的符老了！”

### 38. 想听听你们对国家的意见

仇鳌一见毛泽东那亲切的样子，再一听毛泽东这尊老的话语，真是感动极了！他忍不住地说道：“多年不见，当了主席的润之还是老样子啊！”

“亦山老，这就叫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我毛泽东这辈子是改不了啦。”

毛泽东搀扶着符定一走进餐厅，指着主宾的座位，说道：“符老，您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我的很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今天，请您坐上座。”

“这怎么可以呢！”符定一诚惶诚恐地摆着手，“你是一国主席，自应由你坐上座啊！”

“哪有学生坐上座的道理！”毛泽东边说边把符定一扶到上座坐下。接着，他又客气地说：“行严老，亦山老，你们二位当陪客，我坐末席，给你们三位斟酒。”

符定一看着毛泽东为他们三位斟酒，一种说不出的情潮在心底滚动。他沉吟片时，说道：“今天，我们三个老湖南来赴会，吃是次要的，主要是想听听润之谈谈国家大事。”

“我赞成符老的意见。”仇鳌急忙附议，“润之啊，你主讲，我们三个老人听。”

“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章士钊也说道。

“这下可难住我了！说老实话，今天一是见见我的三位老乡长，再就是想听听你们对国家的意见。”毛泽东说。

毛泽东与三位老人争执了一会儿，章士钊打圆场道：“我提议：并行不悖，先由润之讲。”

章士钊的提议得到了符定一和仇鳌的赞同。毛泽东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很是感慨地说：“我离开湖南二十多年了，做了一些什么事呢？”他指着自己的头，“把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搬掉了，建立了一个新中国。今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他指着自己的脚，“就是要解决我们脚下的问题。”

毛泽东这些话在不同的场合讲过不少次了，但对于这三位老人来说却是第一次听说，感到是那样的新鲜。另外，由于毛泽东讲话十分幽默，把三位老人全都逗笑了。接着，毛泽东又讲道：“什么是我们脚下的问题呢？那就是要实

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十个字：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中山先生他解决了吗？”

“没有。”章士钊说道。

“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弟子蒋介石呢？”毛泽东问道。

“他是孙先生的叛徒，怎能践行孙先生的主张呢！”仇鳌说。

“你们现在推行的土地改革，不就是在践行孙先生的耕者有其田吗？”符定一说道。

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

## 第七部分

### 39. 安排功成身退的仇鳌的工作

“据我在西柏坡看到的，把耕者有其田变成现实，还是比较容易的。”符定一边说边看着认真听他讲话的毛泽东，“因为，把地主的土地一分，就解决了。可是，要实现居者有其屋，这可就难了！”

“是很难啊！”毛泽东有些沉重地说道，“这就需要大家，当然也包括你们三位，多给政府出主意。唯有群策群力，才可以把我们这个贫穷、落后的祖国建设好。”

毛泽东转了一个大圈，又绕到听取三位老人意见上来了。他们三位老人各自谈了大半个世纪来的见闻和所经历的沧桑之变，都一致认为言者易、行则难。最后，毛泽东把话锋一转，十分沉重地说道：“莫说让五亿人民有吃有喝难了，就说中央准备成立一个文史馆，我想请符老出任馆长，行严老当副馆长，都不知道二位老乡愿不愿从命？”

“我看润之的提议是知人善任。符老、行严，你们二位就接任吧！”仇鳌赞成地说。

符定一是赞成中国共产党得天下的，但是，他因年事已高，从来没有想过做共产党的官。他想了想，说道：“好在文史馆长不是什么官，只要是老而贫的文人就可以充任。行严，可以接任吧？”

章士钊自青年时代起就从政，官至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可以说对官场是深了解的。他赞成符定的观点，淡然地答应同意。但是，出他们三人所料的是，毛泽东却说：“仅文、老、贫还不行，必须要有才、德、望才能胜任。”



三位老人深知毛泽东这句看来简单的话的分量，因为就从所谓“文、老、贫、才、德、望”这六个字中廓清了人民的领袖和昔日帝王的区别，遂均表示同意。

毛泽东宴请三位老人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安排功成身退的仇鳌的工作。为此，他以商量的口气问道：“亦山老，您想留居北京，还是想回湖南呢？”

“我是有病之人，想回湖南安度晚年。”仇鳌答道。

“如果亦山老回湖南，我想请您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可以吗？”毛泽东问道。

“不！不行……”

“先不要说不行嘛，”毛泽东望着摇头的仇鳌，“您去挂个名嘛！你只去开开会就行了，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起身就走嘛！”

仇鳌明白了毛泽东的好意，故欣然接受了。至此，毛泽东的任务完成了，他指着桌上的酒菜，说道：“看，光顾了说，都忘了吃了。来！一起下箸。”

.....

#### 40. 海南岛全境解放

毛泽东作为一代军事大家，深知军事民主是取胜于敌的法宝。因此，他在组织实施任何一次大的战役的时候，都先要最广泛地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然后才掷下手中制胜于敌的棋子。

远在莫斯科的时候，毛泽东就曾为解放海南岛制定有关的作战方案并与四野所属参战部队电文往返，几经修订，目的就是减少伤亡，尽快歼灭逃到海南岛的桂系残部，早一天解放我国第二大岛屿海南岛。

毛泽东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下达攻占海南岛的作战方案之后，我华南分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兼政委叶剑

英主持召开了渡海作战会议。与会的兵团、军两级首长认为：结合海南岛的敌情和地形等情况，“如一次以一个军登陆，则船只问题极难解决，同时又无法对付敌之海空军扰乱”。因此提出“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换言之，首先以小部队分批偷渡，加强岛上力量，为大规模强渡作有力策应；而后以主力在琼崖纵队及先期登陆部队接应下强行登陆。

毛泽东仔细地研究了这一战役指导方针，当即作了如下批示：“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提早解放海南岛。”

毛泽东访苏归来之后，他又亲自过问我渡海兵团实施的四次偷渡作战的成败。当他获悉这四次偷渡大获成功并使岛上的我军增加了约一个师的兵力，为主力部队登陆作战创造了条件之后，遂批准了渡海作战兵团的战役部署：以第四十军六个团、第四十三军两个团组成西、东两路军，分别在鲤鱼港东西一线待命起渡；以第四十三军一部为第二梯队跟进；以琼崖纵队第一总队、第四十军偷渡登岛部队，进到临高以北接应西路军登陆；以琼崖纵队第三总队、第四十三军偷渡登岛部队，进到海口地区接应东路军登陆。

四月十六日十九时，我渡海兵团以东西两路大军从雷州半岛南端并肩南渡。途中，担任掩护任务的火力船与敌军舰炮战通宵，掩护主力航渡，并获得成功。二十三日，我军解放海口；三十日，我军解放榆林；五月一日，海南岛全境解放。我军以四千五百余人的伤亡歼敌三万三千余人的辉煌胜利，写入我军渡海作战的军史之中。

与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的同时，我第三野战军业已做好了解放舟山群岛的准备工作。蒋介石鉴于海南岛守军被歼，为了集中一切兵力，确保台湾基地，命令国防部调集载重十五万多吨的舰艇四十四艘，从五月十三日开始，指

挥舟山群岛守军秘密撤退。为此，我军没费多大气力，于五月十九日全部占领舟山群岛。

上述两个战役，不仅应验了毛泽东提出的“即可提早解放海南岛”的预测，更重要的是说明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积纳了我军将士的聪明和才智。

#### 41. 一有空就十分认真地看群众来信

或许毛泽东太热爱人民了，他搬进中南海以后，最感痛苦的是距离他热爱的人民远了！过去，无论是在井冈山还是延安和西柏坡，他天天生活在人民之中，感到是那样的充实。时下，中南海的红墙把他和人民分隔开了，他再也不能去百姓家串门、聊天了！怎么办呢？他唯有经常地拆阅群众的来信，从信中了解人民的心声。

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寄自全国的群众来信几乎堆满了他的写字台。他自从回到菊香书屋，一有空就十分认真地看这些群众来信，简直达到了乐此不疲的境界。他看啊看，看得是那样的有兴趣。与此同时，老解放区的人民为思念自己的领袖，把家乡的土特产寄到中南海，希望毛泽东能够再尝一尝这不同风味的东西；而新解放的人民，为了感谢人民领袖给他们带来的幸福生活，也把自己最好的礼品寄到中南海，表一表自己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这天，他正在用心地翻阅群众的来信，警卫人员双手抱着一些东西走进菊香书屋，往桌子上一放，高兴地说：“主席，你看这是什么？”

毛泽东微微地抬起头一看，是两只江苏的板鸭，两只金华的火腿，还有一包新鲜的海米。他不高兴地问：“这是谁送来的？”

“全国各地人民寄来的！火腿，是浙江翻身后的老百姓为感谢共产党，专门寄来的；板鸭，是江苏的贫下中农

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把亲手制的板鸭送给主席的；这海米嘛，是沿海的渔民精心挑选的。”

“你这是听谁说的？”

“这些信中写得清清楚楚，主席看过就知道了。”

“信，我收下。这些礼品，交给办公厅主任尚昆同志处理。”

“不行啊！”

“我说行就行，立即退给尚昆处理。”

事有凑巧，就在这当口，田家英提着一个不大的袋子走进来，他把袋子往桌上一放，高兴地说道：

“主席，这是杨主任让我交给你的。”

毛泽东一看桌上又多了一袋东西，猝然之间，他把眉头皱了起来，生气地说道：“今天这是怎么啦？你们这个杨主任是不是有意让我违反党的纪律啊！”

“主席，您先别生气，”田家英怔了片时，忙解释，“杨主任不是这个意思，您先看看嘛！”

“不看！全都给我退给你们的杨主任。”

“主席，使不得啊！”田家英动感情地说，“您不看，我怎么向这位吃了大半辈子苦的妇女交待啊！”

毛泽东一听感到这其中有什么文章，他怔了一下，问道：“家英，这是怎么一回事？”

田家英从袋子中取出一条毛围巾、一双毛手套，还有一封信，双手放在毛泽东的面前，声调低沉地说：“主席，您看了她写给您的信就明白了。”

## 42. 捧起兔毛的围巾和手套，两眼湿润了

毛泽东拆开这封来信，取出信纸，认真地读了起来。信中写道：

我出身于河北省蓟县一个贫农家庭，家中无地，种地主的地，一年到头除去交租所剩无几，父亲得了肺病，还

得下地、做小贩，不够吃，我每天都得去挖野菜。一过春节，父亲只有躲债。一家十一口人，有病无钱治，先后死了九口，只剩下我和母亲……

以后，我来到北京，给人养兔子、纺线，过着受剥削的生活。解放前日本的侵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杀人放火，粮食一天三涨，生活没有保证，日子实在难熬啊！北京解放了，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一九四九年春天进了北京。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心里高兴极了，那一天我代表街道居民参加游行，第一次幸福地看到了毛主席，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天气渐渐冷了，我想着毛主席就动手剪下自己养的兔子毛和以前收着的一些，纺成线，织成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我要把自己的这一劳动成果作为礼物献给毛主席……

随着这封信的内容，毛泽东的脑海中渐渐地浮现出一位勤劳的中年妇女形象；不知何时，这个勤劳的中年妇女形象，又化作了千百万个不同年龄的妇女形象，占据着他的脑海屏幕，幻化出各种各样的悲惨的画面……有顷，他又捧起那条兔毛的围巾和那双手套，看着看着，两眼渐渐地湿润了……

田家英十分了解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尤其是受苦最为深重的中国妇女间的深厚感情，当他看见毛泽东双手捧着来信和礼品久久不说一句话的时候，他知道毛泽东的心被打动了！为了不使毛泽东过分沉浸于这种情感之中，他有意小声地问道：“主席，这条围巾和这双手套……”

“我收下了。”毛泽东低沉地问道，“这封信和这两件礼品是谁转来的？”

“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同志。”田家英答说。

“请把这刚刚送来的金华火腿、江苏板鸭、山东海米转给王冶秋同志，请他或局长郑振铎同志转给这位女工。”

“是！”

田家英说罢走到桌前，小心地把火腿、板鸭和海米收起。他正要转身离去，突然听见毛泽东说道：“等一下，我要给这位女工写封感谢信。”

毛泽东说罢提笔展纸，给这位女工写了封感谢信：

丁张秀清女士：

去冬承惠珍品，极为感谢。兹有薄物数件奉上，尚祈晒纳为幸。

毛泽东

一九五 年五月十九日

据丁张秀清回忆，五月二十一日，郑振铎在北海团城上接见了她，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你送给主席的礼物，毛主席收到了，主席很高兴，并让我问你身体好。”

接着，郑振铎指着桌上的两只火腿、两只板鸭和一大包海米，还有毛泽东写的那封信，又说道：“这是毛主席送给你的，还有这封亲笔信。”

## 第八部分

### 43. 严肃地说道：“原件退回！”

丁张秀清看着毛泽东送给她的礼品和亲笔写给她的信，心里感到无限的温暖和幸福，高兴地流下了热泪。她十分激动地说：“请您转达我的祝福，我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我一定转达。”郑振铎说罢又以商量的口吻说，“主席的信给我们收藏吧！”

“不给，我舍不得！”丁张秀清指着桌上的礼品，“你们分享毛主席送的东西吧！”

自然，郑振铎不会要礼品，但是，他作为文物局长只好把这封信拿去拍照，然后把原件又退给了这位女工。

抑或是毛泽东太热爱他的人民了，也许是跟着他打天下的各级干部太敬仰自己的领袖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各种颂扬毛泽东的诗、画和文章越来越多，令毛泽东非常不安，总想找个机会表达一下自己这不安的心情。也就是在毛泽东筹划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前夕，田家英双手捧着一份公文走进菊香书屋，往写字台上一放，有些为难地说道：“主席，沈阳市政府报来了一份文件。”

毛泽东听后果一怔，放下手中的笔，沉吟有顷，问道：“噢，沈阳市政府有什么大事啊，为什么一定要报给我呢？”

“是这样的，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市中心修建一座纪念塔。”

“像这样的事，他们自己就可决定嘛！大不了，再报给东北局书记高岗同志就解决了嘛。”

“主席，您还不知道，他们要在这座纪念塔上，铸上一座主席您的铜像。”

“什么？”毛泽东听后大惊，“他们要在纪念塔上铸上我的铜像？”

“对！他们在报告上提出：请摄影家代摄主席的八寸站像四幅，寄给他们。”

“一幅也不给！”

毛泽东说罢感到问题严重了，他打开这份公文报告，一边看一边用毛笔批示。历史留下了如下这段重要的批示：

在“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写：“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像”旁批写：“只有讽刺意义”；在报告的上端大笔一挥，写下：“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毛泽东看罢这份沈阳市的报告并批示完毕以后，用力把这份报告一推，严肃地说道：“原件退回！”

“是！”田家英双手拿起了这份报告。

“告诉有关部门，这是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今后，谁再做这类事情，要通报批评！”

当时，除去西藏、台湾外，中国大陆基本上解放了，在毛泽东看来，有两大课题摆在新中国的面前，必须逐步解决：一是广大的新解放区的土改；再是几百万作战部队官兵的复员。为此，毛泽东亲自电告各大区的负责同志来北京，出席中央讨论军事、土改等问题的会议。

#### 44. 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说到部队官兵复员，毛泽东认为“应积极地提出复员是为了返回家乡发展生产和建设民兵，回乡后应服从区政府领导，在人民中起模范作用，而不可乱来”。但是，数以百万计的官兵要在不长的时间内复员，在完成土改后的地区还要使他们重新分得土地，这是何等难的一件大事



啊！为此，毛泽东认真审核了各大野战军复员的数量和方案，又亲自召开了一次又一次复员会议，总算比较完满地做到了留的安心，走的高兴，回到家乡后都有土地种、有饭吃，且又确保了我军战斗力没有下降，为即将爆发的朝鲜战争积蓄了足够的战备力量！

说到广大新区的土改，一是分两步走：春耕期间先减租，今冬和明春再土改；二是起草土地法草案，整训参加土改的干部。可以想见，要在一二年内在全国完成“耕者有其田”的任务是何等的不易啊！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他将移动一步大棋，那就是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确定整体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统一全党、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共同意志，他准备在近期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以，他又把全副精力用到起草有关文件上来了。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真总结了党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确定要做好土改、在稳定物价的基础上调整工商业、肃清反革命、整党等八项工作，争取在三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为此，毛泽东在开幕式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发言；同时，还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长篇报告。毛泽东在解释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战略思想之后，又说明了为什么不要四面出击的原因：“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为此，他向全党发出号召：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的人。”

“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 45. 现在是过土改一关

六月九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毛泽东又投入到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准备工作中去了。因为他清楚，“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然而，要在全中国实现上述三个条件，又必须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他要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发言的中心。为此，七届三中全会一结束，他就亲笔起草《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的发言稿。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中心是讨论落实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议题，而重点又是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

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毛泽东在闭幕式上发表了《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的发言。他向与会的党内外同志指出：“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

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同时，他还向准备过三关的同志们发出号召：

“在国外，我们必须坚固地团结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丝毫的游移和动摇。在国内，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以及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不仅指明了新中国前进的方向，而且也为即将爆发的朝鲜战争打下了思想基础。正因如此，我国才能做到一边抗美援朝，一边进行国内的经济建设，并在三年内完成了经济恢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六月二十三日闭幕，毛泽东又于二十四日会见了一些进京参加会议的战友和朋友，这时，他认为自己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是日深夜，他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道：“我希望今晚能快些入睡，明天上午也不要喊我起床。”

六月下旬，北京已经很热了，再加上这几天气压过低，闷得人们呼吸都不那么畅快，真希望这沉沉的夜幕上来一道闪电，撕开这铅似的浓云；紧接着再响起一声炸雷，把低垂的阴云炸出一场瓢泼大雨，让天、地、人都感到爽快一些！

但是，夜幕还是那样阴沉沉的，气压低得越来越让人喘不过气来了。毛泽东已经感到十分劳累了，可是他却被这闷热的天气搞得没有一点睡意，只是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下意识地摇着那把葵扇，希冀能给他带来些凉风。

## 46. 朝鲜战争爆发了

六月二十五日清晨,毛泽东的卧室依然像过去那样窗幔紧闭,四周没有一点动静,只有警卫人员在院中轻轻地打扫卫生。突然,远方传来沉雷声,警卫人员急忙抽身关好毛泽东卧室的门,转身看了看满天低垂的浓云,自言自语地说道:“老天爷是不是成心不让主席多睡一会儿啊!”警卫人员又继续打扫院落的卫生。

有顷,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快步走来,表情严峻地问道:“主席还在睡觉吧?”

“还在睡。杨主任,有事就等到中午吧!”

“不行啊!”

“行!杨主任,您是知道的,主席这些天来又是开会报告,又是和参加会议的代表谈话,忙得没有睡一个好觉。昨天晚上他又睡得很迟……”

“不要说了,这些我都知道。”

“可总理对我们吩咐了,这两天谁也不要打扰主席休息。”“但我有重要的大事急需向主席报告啊!”“谁在外边?”毛泽东在屋内说。

杨尚昆推开屋门走了进去,只见毛泽东穿着睡衣已经走到客厅。

“主席……”“有什么大事?”毛泽东说。“主席,朝鲜战争爆发了!”“什么?”毛泽东下意识地问道。

“朝鲜战争爆发了!”“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们的同志从法新社收听到的。”

毛泽东表情变得是那樣的肃穆,两道眉宇紧锁在一起,他凝思良久,方微微地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朝鲜战争果真爆发了啊!……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但是,国民党反动残余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仍在采取武装暴乱和

潜伏暗害等方式进行活动。他们组织特务土匪，勾结地主恶霸，或煽动一部分落后分子，不断地从事反对人民政府及各种反革命活动，以破坏社会治安，危害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来，各类恶性案件直线上升，且发展到暗杀各地乃至中央党政军的负责人。毛泽东看了公安部关于敌人匪特大搞暗杀阴谋的报告，感到异常吃惊，为此，他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

兹将中央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六月十一日关于匪特暗害阴谋及我保卫工作报告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加以充分注意，指导所属加强保卫工作，彻底粉碎国民党匪特的暗害的阴谋，有效地保卫一切党的领导同志、工作干部及党外民主人士，是为至要。

毛泽东作出上述批示之后，又请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听取有关国民党匪特大搞暗害阴谋活动的情况汇报，并研究、作出针锋相对的措施。首先，毛泽东开门见山地对罗瑞卿说道：“今天，我和总理请你来，是想听听近期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全国范围内的治安情况。”

#### 47. 掀起了一场有声有势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罗瑞卿取出有关材料进行汇报：自“（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残留在大陆的政治土匪、国民党特务以及各种反动会道门势力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机会到了，于是便纷纷从阴暗的角落里跑出来，进行各种反动活动。他们炸毁桥梁，破坏工厂矿山，烧毁仓库器材，抢劫粮食财物，残害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甚至组织武装骚扰和暴乱事件。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始，河北交河县发生反动地主反攻夺地事件九十三起；福建省发生十九起反革命武装暴乱；

广西各地干部被杀三千多人”，等等。最后，罗瑞卿说道：“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们还把暗害的矛头对准了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听后震怒不已，他极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说道：“恩来，我们手软是不行的。从目前形势发展来看，你我从苏联回国之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个镇压反革命的文件是很不够的！”

“是的，”周恩来严肃地指出，“看起来，我们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才能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才能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才能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与社会变革。”

经过缜密研究，最后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会议，明令颁发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文件。接着，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于七月二十三日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首先，文件重申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七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接着，明确作出如下对反革命分子处理的决定：

一、对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扰乱之匪众，必须坚决镇压剿灭，并将其主谋者、指挥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处以死刑。

二、对以反革命为目的而杀害公职人员和人民、破坏工矿仓库交通及其他公共财物、抢劫国家和人民的物资、偷窃国家机密及煽动落后分子反对人民政府的一切活动、

组织或谍报、暗杀机关，应彻底破获并逮捕其组织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处以死刑或长期徒刑。

三、对怙恶不悛的匪特分子和惯匪，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

四、凡勾结、窝藏上述三项重要反革命分子而情节重大者，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

随着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结合国内、国际尤其是朝鲜战争发展的大势，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有声有势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 48. 重重地划了两道横杠

俗话说天灾人祸经常是结伴而来的。正当朝鲜战争猝然爆发、国内敌人借机闹事的时候，淮河接连两次大决口，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极大的损失。为此，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商议，决定派政务委员曾山赶赴受灾地区视察。据曾山的报告说：他看到“津浦铁路两旁一片汪洋，一眼几十里都是如此，沿路数百里的河堤全部失去作用，村庄被淹没，怀远县县城的城墙也看不到了。许多灾民挤在一块高地上求生，干部情绪低落。这次被淹没的耕地达三千一百万亩，冲塌房屋几十万间，灾民九百九十五万人，其中断炊的已达一百九万人”。毛泽东看了曾山在政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后，他的脑海中全都是滔滔洪水和流离失所的灾民，内心有着一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不久，毛泽东又收到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致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并转中央的电报，详细地报告了有关淮河决口造成的损失：“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二十个县淮南沿岸七个县均受淹，城市因受淹而迁徙者约二十三万人。被淹田亩三千一百余万亩，占皖北全区二分之一强。全无收者二千二百余万亩，房屋被冲倒或淹塌而已报告者八十余万间，死

四百九十九人……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堕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

毛泽东看到“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的地方，不忍再看下去了！这时，他的眼前景物似乎化作了水急浪高的滔滔洪水，渐渐地漫过房屋，只有大树的树冠还露在洪水的上面。他似乎看见了一个中年妇女抱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坐在树杈上哀号求生……毛泽东终于又从幻化的思维中回到了现实来，他那滚动欲出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滴在了这份电报上。接着，毛泽东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的下边，重重划了两道横杠。

毛泽东毕竟是一代大政治家，很快进入了理性的思索。他按着自己独有的思维方式，从历史到现实、从历代帝王得天下到失天下的层面进行了审视和思考。

首先，毛泽东认为洪水成灾与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蒋介石执政的二十多年中，由于水利长期失修，加上连年战乱的破坏，尤其是像黄河花园口人为决堤，给人民造成的损失是十分惊人的！仅一九四九年不完全的统计，全国被淹耕地达一亿二千一百五十六万亩，减产粮食二百二十亿斤，重灾区灾民达一千万人。其中，华东地区被淹耕地五千余万亩，占全部耕地的五分之一，减产粮食七十余亿斤，灾民一千六百万人。可以说，蒋介石兵败东南数省，与洪水成灾、失去民心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毛泽东从大禹治水兴天下，到蒋介石因失修水利等原因而败退台湾，对“水兴国家兴，水害国家败”的话有了更深的理解！



## 第九部分

### 49. 调动一切有利因素为治淮河服务

其次，毛泽东认为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政权，并应付国际和国内的突发事变，必须考虑从根本上解决洪水年年造成的局面，唯有如此，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一心一意地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否则，其他一切革新都会因为洪水成灾而付之东流。

为此，毛泽东在曾希圣发来的电报上作了批示：

周（恩来）：

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毛泽东 八月五日

周恩来在收到毛泽东上述批示之后，两次主持政务会议，讨论治淮问题。在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报告了有关情况之后，周恩来提出了治理淮河的五项原则：“统筹兼顾，标本兼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分期完成，加紧进行；集中领导，分工负责；以工代赈，重点治淮。”同时，他还明确指出：“总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为主。从水量的处理来说，主要还是泄水。”“这次治水计划，上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并且还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总之，要统筹兼顾。”接着，又经毛泽东批准，发布了《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決定》。一场根治淮河的群众运动已在酝酿之中！

毛泽东深知根治淮河是一项大工程，而且还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如何才能做到在治淮过程中少走弯路

呢？他决定亲自动手，大搞调查研究。与此同时，他还要调动一切有利因素为治淮河服务。在这期间，毛泽东与邵力子先生畅谈治淮大事是很有代表性的。

这天，毛泽东驻步丰泽园的门前，恭候邵力子的到来。有顷，水利部部长傅作义陪着邵力子驱车来到门前，毛泽东走上前去，亲自扶邵力子走出轿车，热情地打招呼：“欢迎，欢迎，先生和将军都很准时呵！”

“主席是珍惜时间的人嘛。”邵力子答。

“军人第一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二是以时间的准确为生命。”傅作义也作了适合将军身份的回答。

“好！那就让我们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进屋畅谈治淮吧！”

邵力子或许是读书人出身的缘故，他走进菊香书屋下意识地向桌上一看，只见上面摆着文房四宝以及刚刚写好的条幅，感到有些好奇地问道：“主席正在写字？”

毛泽东边答说“是啊”，边请邵力子与傅作义落座，待到秘书给这两位客人献上茶水之后，毛泽东突然地说道：“我久知邵老是前清的举人，早年又与当代草圣于右任老等人在一起靠卖文为生，所以，我做了个字谜，想请你这位清朝的举人给解一下。”

邵力子听后愕然，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所以。他禁不住自问：“毛泽东为何做字谜请我解呢？这又与治淮有什么联系呢？……”他看了看同样感到好奇的傅作义，只见傅微笑着冲着他摇了摇头。从傅作义的表情分析，似乎是蛮有兴趣地看着将要发生的一切。

## 50. “我这可是个续字谜啊”

就在邵力子与傅作义用眼传神的过程中，毛泽东走到写字台前，双手拿起墨迹未干的那张宣纸，很是恭敬地放

在邵力子面前的茶几上，带有自我调侃的口吻说：“我这是应了那句老话，孔夫子面前卖弄字画，请看！”

邵力子微微欠身，俯首一看，只见宣纸上赫然写着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治淮。邵力子看罢一怔，他清楚毛泽东出的这幅字谜，是属于续字谜，也就是说在“治淮”二字的后边必须续出两字，合作一词，表达一种完整的意思。就在这刹那之间，邵力子却犯了难，因为毛泽东写的“治淮”二字不仅是意义深远，更重要的还代表了一个明确的概念，想要续上二字绝非易事，故情不由己地蹙了蹙眉头。

毛泽东放好这幅治淮字谜之后，旋即回身，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习惯地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有些自我欣赏地缓缓吐向空中。接着，他才漫不经心地看了邵力子一眼，似有意提醒道：“邵老啊，我这可是个续字谜啊！”

毛泽东或许是认为自己的目的达到了，抑或是他不想把这位前清的举人考得太狼狈，他先是哈哈大笑，后又伸出右手指着书桌，说道：“邵老，这续字就是这两个字嘛！”

邵力子经毛泽东手指书桌一点化，顿然大悟，不由自语：“方案！”

坐在一旁看热闹的傅作义目睹了这一切，当邵力子脱口而出“方案”二字以后，他于这瞬间又把毛泽东的原字谜“治淮”二字与之合起来，原来这四个字是“治淮方案”。到这时他才恍然明白了毛泽东出此续字谜的真谛。同时，他看到年长的邵力子其悟性或曰聪明还是比自己胜出一筹的。好在他此时的身份是将军，而不是举人或秀才，所以，他随着邵力子的哈哈大笑也不由笑出声来。

这就是毛泽东与人交往或曰与友人谈工作的一种方式，双方倾谈治淮这样一件大事，竟然是从如此写意的方面开始，真是令人慨叹不已啊！待到邵力子、傅作义恢复

常态之后，毛泽东方言归正传：“邵老续得好！今天我请二位来，就是为了讨论治理淮河的方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傅作义或许是在阎锡山、蒋介石手下当差当得时间太长了，他听了毛泽东的话后，认为自己是水利部部长，自应第一个介绍情况。所以，他一板一眼地说罢水利部制定治淮方案的过程后，又郑重地说道：“我们水利部正在总理的领导下，进一步研究、完善治理淮河的方案。”

“我已经看了总理有关治理淮河的报告，”邵力子接着傅作义的话题说道，“我是过来人，所以我赞成总理说的淮河年年闹灾，是当年蒋介石为阻止日军南下，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造成的。这是因为黄河的泥沙破坏了淮河原有的蓄泄洪水的能力。”

## 51. 首先就要大兴水利

“邵老一言中的！”毛泽东有意把话题一转，很是诚恳地说道，“当年，邵老做西京王的时候，我长征一到达陕北，就听当地的老百姓美传您是当代的大禹。”

说到邵力子做西京王，那是日本在我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宣布第二次下野，把邵力子外放陕西，坐镇西安，代蒋控制多事的西北地区。也就是邵在西安执政的五年之中，他曾带领陕西人民治理过黄河，而且很见成效，被当地老百姓传为当代治水的大禹。也正是因为邵力子有这样一段特殊的从政经历，毛泽东才听取他对治淮的意见。自然，邵力子也想到了这一点。但是，当他听毛泽东如此赞誉他治理黄河的功绩的时候，他又谦虚地连连说道：“百姓过誉了。过誉了！”

“我看是有他们的道理的。”接着，毛泽东又坦然说道，“我当时听后也感到新奇。事后才听人告诉我，当年邵老重视黄河水利，亲自主持修了泾惠和洛惠两大渠，建

了龙门闸和风陵渡工程。我想这就是老百姓至今还流传邵老治水故事的原因吧！”

“主席过奖了！”邵力子非常客气地说，“那时，我任国民政府陕西省主席，治理黄河是我的责任。再说，我做的那点区区小事，怎能与今天共产党和主席想根治淮河的工程相提并论呢，何足挂齿矣！”

“邵老那时的作为，现在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啊！”毛泽东在历数了邵力子在治理黄河上的成绩之后，又说道：“今天，我请邵老来的目的有二：一是想听听您的意见，再是邵老您能离京去实地考察，那是最好不过的。话再说回来，这也就是我写的那个续字谜的谜底。”

邵力子从政数十载，自孙中山到蒋介石等政坛要人都时相过从，有的还私交甚笃。但是，他却未遇见过像毛泽东这样善做工作的领袖人物。因此，他心悦诚服地说道：“请主席放心，我打算立即成行。”

“不，不。”毛泽东急忙摆手制止，“现在淮河正在抗洪、救灾，不是邵老这样年纪的人去的时候。”

“那我何时成行呢？”邵力子问道。

“再定。”毛泽东凝思片刻，“到时，我一定为邵老写一幅字：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以壮行色！”

“请放心，我一定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至此，毛泽东请教邵力子的工作就算做完了。他看了看作陪的傅作义的表情，又十分客气地说道：“傅将军，你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部部长，请将军集思广益，再拟定一个全面的兴修水利方案。”

“我尽快落实主席这一重要指示。”

“我哪有那么多的重要指示哟，”毛泽东微微地摇了摇头，“这些天来，由于淮河水祸如此严重，使我想了很多问题，看起来，要想改变我国的贫穷面貌，首先就要大

兴水利。我们这些人如果能把几千年来得水患化害为利，那可是造福于民、功德无量啊！”

## 52. 还随时介绍有关各地土改方面的材料请他们看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改变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两千多年以来少数地主垄断大部分土地的现实，自井冈山时代起，就亲自动手搞调查，草拟出了有关的法规。后来，尽管中国革命有沉浮，时代大势有变迁，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要让中国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有地种，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这件事。即使毛泽东在出访苏联期间，还在考虑新解放区的土改，尤其是对江南富农的处理问题。为此，他不仅审定了有关土改的各种大法，而且还写下了许多很有指导性的意见和批示。他考虑到新老解放区的不同情况，要求“所有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的新解放区，由于准备工作及群众的觉悟还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决定在一九五〇年秋收以前，一律不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并对上述地区依照具体情况分为三类：第一类，江苏、湖北、广东、陕西等九省地区，在一九五〇年秋收以后，有条件的可开始实行土地改革；第二类，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绥远六省，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后，可实行土改；第三类，新疆和全国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的地区，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前都不实行土改，何时土改另行决定。同时，还明确规定：“所有新解放区，在实行分配土地以前，应一律实行减租。”

由于江南的地主不仅与大中城市的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与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也有着各种血缘或朋友的关系，所以，自实行减租以来，各民主党

派的负责人或多或少地收到了来自家乡的上告信，非难实行减租以来出现的所谓过火行为。像黄炎培、张澜、程潜、陈叔通等知名人士，都采取不同的方式向毛泽东作了反映。其中，陈叔通还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大意是：现南方都正在实行减租减息，平均每亩地租减为一半，地主农业税则按其地契上之田亩数缴纳。此外，尚须按农业税之递增加缴累进税，地主就缴之农业税多不经地主之手，而由其佃户在其应缴之地租中代为缴付，不敷之数，则由地主负担……陈（即陈叔通）最近收到家中电报云，今年秋季尚须缴的农业税二百担米……当地催迫甚急，已将其家中看门的抓去看押，限本月二十日缴清。二百担米……约折合人民币四千万元（旧币）。陈表示，此税必须缴纳……乃拟将家藏之陶器（器上有图案有字，甚宝贵，价格很高）数件，呈送中央或地方政府，陈不要政府之收购费，但拟请中央（或地方）电告华东局转知当地政府，允其家中的每年两季应缴之农业税直到土改时止，都予豁免。……

毛泽东看到了陈叔通等人的发言记录，也收到了黄炎培等人转来的反映土改情况的信。为此，他多次给这些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老朋友写信，还随时介绍有关各地土改方面的材料请他们看，希望能帮着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志士仁人转变立场，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的土改运动中去。由于黄炎培位居政务院副总理，又自称是他毛泽东的诤友，所以，他还多次听取黄炎培的汇报，并朋友式地商讨有关情况。

### 53. “我有几句话送给黄任老下去调查做参考”

一次，黄炎培说到激动处，当面向毛泽东请缨，想亲自回到生养他的江南水乡做调查研究。毛泽东听后十分感慨地说道：

“黄任老，你的精神我是敬佩的！共产党多有几个像你这样的诤友，我们就会少犯错误，事情就会办得好一些。”

“听主席的话音，是同意我下江南做调查了？”

“同意了！不过，我有几句话送给黄任老下去调查做参考。”

“请主席直言相告。”

“一、黄任老官至副总理，没有乾隆皇帝的官大，所以此次下江南，用不着微服私访；二、你毕竟是七十有四的高龄了，也用不着像年轻人那样安营扎寨做调查，能骑马观花走一趟就不容易了；三、如身体条件许可，除了走亲访友，不妨多走几家翻了身的农民。”

“请主席放心，这次下江南考察，一不住亲朋好友家，二绝不住在地主的家庭。主席还有什么嘱托吗？”

“我希望黄任老以副总理的身份关注江南的文物古迹，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教育农民，提高认识。”

“时下，我国还没有制订有关的文物大法，不知主席个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

“有！”毛泽东沉吟片刻，郑重地说，“举个例子说罢，过去，尽管蒋某人的手下挖了我的祖坟，今天，我要把蒋介石的祖坟当作文物保护起来。”

毛泽东十分重视黄炎培下江南调查土改之事，为此，他亲笔给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以及陈丕显写信：

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十二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一月四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黄炎培以七十高龄下江南巡视，仍随队员住进农舍，同农民兄弟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里的条件



较差，考察团的成员挤在一间小土房子里。房中只有一张木床，大家就把黄炎培的行李搬到床上，希望他睡在床上。可是，黄炎培硬是不肯，愿意和大家挤在地铺上，还美其名曰：有福一起享，有苦一起吃。垒砖、搭铺，忙前跑后，他还幽默地对大家说：“我一向高喊劳工神圣，双手万能，不会搭铺还怎么算万能？别忘了，我除了任之，还叫韧之呢！任之嘛，听之任之以外，就是担当大任；韧之呢，就是坚韧不屈，不畏苦，不畏劳，我可不能徒有虚名噢！”

黄炎培经过自己亲身的考察，得出了与家乡地主全然不同的结论。他回到北京以后，写出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呈送毛泽东。

#### 54. 使之认识到土改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他在这份报告中首先肯定：“我们访察到的苏南土改，认为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每个人都在想搞好，大体上已经搞好起来了”。土改之所以办得好，在于“土改之前，生产救灾”，取得人民信任。至于有人提出的“和平土改”，“不能说是绝对做不到”，“但是这样基础太脆弱，靠不住”，“必须发动群众，必须唤起农民自觉，建立群众力量”，故“‘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应认定这是一句名言”。

毛泽东看了黄炎培写的报告满意地笑了。

毛泽东在亲自做黄炎培工作的同时，还多次与张澜、程潜等老朋友谈心，送转有关土改的材料给他们，使之认识到了土改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说：“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阻碍了人民的中国走上工业现代化的道路，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每一个参加单位，都以最大的决心，来完成土地改革这一历史任务。”

民盟中央主席张澜说：“这种叫喊（指加重人民负担），其实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挑拨离间的阴谋。这种叫喊大部分来自地主阶级。对这种叫喊，应该加以警惕，并且不要轻信。”

程潜说：土改中所传的偏差和错误，“有的是事实，而大部则是匪特的造谣和顽固地主的叫嚣，决不可一概而论。据我的考察，广大的新老干部，在生活上及其服务情绪上，都是能够忍苦耐劳的……假使没有这些干部的艰苦奋斗，我们几个月来的成绩，是不会有这样伟大的”。

毛泽东领导的这场伟大的土改运动，不仅从真正意义上摧毁了封建社会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使“土地还家”，解决了耕者有其田这个了不起的革命任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思想水平。另外，我们通过上述这些经历过清朝、北洋政府、中华民国所谓的“三朝元老”们的思想变化，还看到了毛泽东那高超的统战艺术。使人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慨叹：“这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楷模！”

毛泽东最熟悉中国的历史。他从历代的兴亡中真正认识了“载舟覆舟”这四个字的意义。

毛泽东来自人民，也得益于人民，因此，他才向全体党员、向全军指战员立下为人民服务的训教。

或许是因为这种原因，他在进驻北平之前一再说明：我们不做李自成。就是随党中央迁往北平之后，他也不愿意搬进中南海居住。另外，抑或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进驻北平的第二天就和诤友黄炎培谈兴亡之道，寻找共产党人跳出黄炎培说的那个“怪圈”的措施。为此，他曾采用整风的办法谨防全党、全军“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也可能“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待到毛泽东从指挥朝鲜战争中解脱出来以后，他竟然发现各地党政机关，暴露出不少贪污问题和其他违法乱纪现象。

## 第十部分

### 55. 做好保护陈嘉庚的安全工作

如下这组数字不仅出乎毛泽东所料 ,而且也令他大吃一惊 :

一九五一年上半年 ,华北地区各省市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了区级以上党员干部违纪案件三千九百四十七件 ,其中贪污案共五百三十一件 ;北京市在建国后的两年多中 ,共发现贪污分子六百五十人 ,贪污总额达人民币十五亿元 (旧币)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份以前 ,华东各地法院所处理的贪污案件有八千多件 ,其中 ,因个人贪污造成国家财产损失高达一千四百四十二亿元 (旧币) ;华北军区及军区直属各单位所受理的案件中 ,属于贪污腐化堕落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四 ,其中六个贪污案件使国家损失达八十多亿元 (旧币) ,相当于一万五千个农民一年的生活费用。

毛泽东看着这一组组数字 ,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  
“ 共产党人才掌权两年多啊 ,怎么就会有这样多的党员干部堕落成贪污分子呢 ? ”

也是在这前后 ,全国各界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其中 ,毛泽东的老朋友华侨巨商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募捐很有成效 ,据外电报道 :陈先生不仅募到了修复厦门大学的资金 ,而且还向爱国华侨募到了买飞机的钱。正当毛泽东准备派人慰问刚刚回到厦门集美的陈嘉庚先生时 ,周恩来十分严肃地报告 :“ 主席 ,我们从截获到的台湾的消息中获知 ,他们对陈嘉庚先生号召华侨捐献飞机恨之入骨 ,已经派出杀手潜入大陆 ,你看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 ”

“你立即电告陈先生，请他马上来北京。”毛泽东有些愤怒地说道。

“我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他固执地说：‘我让全世界的华侨看看，蒋某人是如何杀死我陈嘉庚的！’”

毛泽东听后十分焦急，最后与周恩来议定：借陈毅出巡东南沿海地区的机会，做好保护陈嘉庚的安全工作。

陈嘉庚在南洋创业几十年，总计做了两件大事情，其一是赚钱兴教，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其二是以身作则，支援孙中山先生闹革命。这其中也包括支援蒋介石抗日等义举。这天，陈毅奉命来看望陈嘉庚先生，没有想到陈嘉庚的办公室是那样的简朴：一张木床，挂有一张发黄的且有补丁的蚊帐；一张木桌，上面放着一个倒扣的破瓷碗，上面立着半根蜡烛；两张破沙发不成对，一个是新修过的，一个是旧的；一个破旧的木茶几摆在中央，上面放有一个盛糖的瓷盘，看得出，这个瓷盘中刚刚放上一斤包有糖纸的糖块。这天，陈嘉庚领着陈毅走进这间陈旧的房子，指着那张新修过的沙发，客气地说：“请陈市长坐。”

陈毅久闻陈嘉庚的大名，且知他是华侨中数得着的有钱人，在他看来，陈嘉庚再节约、简朴，也不至于用这样的旧房作办公室兼卧室。因此，他没有落座，用心地打量着室中的各种陈设，感慨万端地说：“嘉老，您兴建广厦千万间，万千学士俱欢颜，而自己是‘庐独破’哟！”

“我住得不是很好嘛！”陈嘉庚再次伸出手，说道，“陈市长，快请坐。”

### 56. 却用一斤糖果招待了陈毅市长

陈毅喟叹不已地摇摇头，遂落座。接着，他信手从茶几上的瓷盘里拿起一块糖，一边剥糖纸，一边感慨地说道：“嘉老，不知为什么，我走进您的办公室，便又想起了当年的延安。”

“陈市长过誉了！这里比延安好多了。那时，我记得毛主席用的桌子比这破旧多了。我这些东西虽说破旧了些，但都能用。”

“嘉老，我这次来拜访您，除去表示我个人对您的敬意之外，我还受了毛主席的重托，他让我来看您。”

“这多不好意思，主席日理万机，还想着我。”

“嘉老，主席让我转告您，我们的确截获了蒋介石派人暗杀您的情报，主席听后急得不得了。”

陈嘉庚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特别重一个“义”字。所以，他一听说毛泽东派陈毅来看他，内心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难以理解地说道：“我想不通啊！我和蒋介石认识好多年了，可以说是熟人，他为什么要暗杀我呢？”

“道理是简单的，您动员全世界华侨捐献飞机，您又拿钱帮着国家渡过难关。”

“捐献飞机，打入侵的美国佬，有什么错呢？”

“美国佬是蒋某人的后台老板啊！”“没想到他会走到这一步。”

“嘉老，不用怕！主席让我派了人保护您。”

“毛主席连这样的小事都想到了，他怎么能不得天下呢！”

就在陈毅离去之后，陈嘉庚召来了工友，指着瓷盘中的糖果，严肃地问道：“你买了多少糖果？”

“一斤。”

“买那么多干什么？首长最多尝一二颗，买它二两糖果就蛮够了。”

“我……以为接待这样大的首长，您会说我只买少了呢！”

“咳！”陈嘉庚摇了摇头，“你们都要记住：事业上该花的钱成千上万都要花，生活上该省的钱一分一文也要省。”

陈嘉庚用一斤糖块招待陈毅的事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对此，毛泽东感叹地对身边人员说：“当今华人世界中谁最富？陈嘉庚先生！可是这位最富有的华侨巨商，却用一斤糖果招待了我们的陈毅市长！这还不令我们共产党人深省吗？”

“主席，这可有点像当年的延安精神。”

毛泽东对延安有着特殊的感情，一碰到困难，他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延安精神。然而，当他想到某些从延安走过来的人成了贪污分子以后，对自己倡导的延安精神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他微微地摇了摇头，说道：“我们在延安的时候，是一无所有，想腐化吗？没有条件；而陈嘉庚先生呢，他是当代华侨巨富，自己拿钱办得起一所大学，可他对待自己呢？……”

毛泽东由于过分激动讲不下去了，他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并未完全理解毛泽东此时此景的心情，按照他自己的思路说道：“当年，我们在延安的时候，我听一位同志说过这样一段话：没有钱的人说不爱花钱，不一定是真的；没有当官的人说瞧不起官，也不一定是心里话。”

“但是，陈嘉庚先生却告诉了我们共产党人这样一句话：有钱的人把钱用到事业上，是高尚的！”

## 57. 阅毕这份报告后吃惊不小

东北局率先开展了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此过程中，发现各级党政军机关内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如沈阳市在运动初期，仅工商局各公司就揭发出三千六百二十三人有贪污行为，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贪污款额达人民币五亿元（旧币）。浪费

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因管理不善，也造成巨大的损失，等等。毛泽东阅罢这些材料，感到震惊之余，认为我们党的某些干部已经中了敌人的糖衣炮弹，在金钱面前打了败仗，被资产阶级从思想上缴了械。另外，他也从这些案件中得出了结论：官僚主义是干部贪污、浪费的滋生源。因此，在反贪污、反浪费的同时，必须大张旗鼓地反对官僚主义。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以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作为全国人民当时的中心任务。同时，“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从此，全国各地逐步开展了揭发各级机关内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运动。

正当毛泽东暗自寻思党内究竟有多大的贪污犯的时候，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呈送毛泽东一份材料，是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报告：

“最近，我们发现了河北省天津地委和专署有严重的贪污浪费和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行为。据初步检查材料证实，现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先后运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二十五亿元（旧币，下同），宝坻县救济粮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一亿四千万元；从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合计四十五亿元；冒充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四十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搞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为贪图暴利，曾利用蜕化干部从东北盗运木材达两千立方米；勾结私商张文义等以四十九亿元巨款从汉口贩卖大批马口铁，私商从中贪污中饱，破坏国家政策。张子善、刘青山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只有帐可查者，二人私用四五亿元，并向上下级及其亲属送礼（有的达一二千万元之巨）达一亿三千万元。张子善为消灭证据，曾亲手焚毁约计一亿五千万元的单据和其他单据一百七十

八张。由于我们最近派人到天津检查和逮捕了与张、刘等勾结的私商，张子善已十分惶恐不安。根据其所犯错误和罪状，经华北局讨论，总理批准，决定立即将张子善逮捕法办，刘青山归国后亦予逮捕。”

毛泽东阅罢华北局的这份报告后吃惊不小，他那愤怒的双眼死死盯住桌上的报批文件，许久许久没有离开，也没有说一句话。

毛泽东气得已经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了，饭也不曾吃一口。这下子可急坏了秘书和警卫人员。开始，他们谁也不敢靠近毛泽东。随即，大家又心痛起毛泽东的身体来了。最后，一位很受毛泽东喜欢的警卫员走到近前，近似哀求地说道：“主席，您不能这样为了国家大事，就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 58.再次审阅了张子善、刘青山贪污案件的报告

毛泽东无限悲哀地摇了摇头，近似自言自语地说道：“可这些腐化、堕落分子呢，他们就是光为了自己享受，完全忘了爱惜自己打下来的天下了！”

或许是毛泽东觉得菊香书屋憋闷得慌，虽然已经是后半夜了，他还是让工作人员陪着他到中南海的大院中走一走，借此也换一换空气。突然，他停下了脚步，问陪着他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你有没有贪污？”

“没有，再说我天天在主席身边，您还不清楚吗？”

“我是说你将来像张子善、刘青山那样有了权，会不会贪污呢？”

“请主席放心，我永远不会贪污。”

“这就好，这就好。”毛泽东想了一会儿，又说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永远不能搞贪污，要经得起考验。”

“主席，我记住了。”



毛泽东慢慢地走着走着，他突然又停下了脚步，很是严肃地问身边的警卫人员：“你不贪污，你有浪费没有？”

“没有。”

“不贪污，也不能浪费。勤俭节约是共产党人的美德，做不到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毛泽东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南海岸边，他驻步在不太高的围墙后面，望着黑乎乎的紫禁城，又陷入了对历史的沉思。或许他想从历史中找到答案，抑或是想对着高高的紫禁城问个为什么。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他有些伤情地问道：“你们是如何看待张子善和刘青山的呢？”

“从历史上看，像李自成属下的一些人物，他们一进北京不就腐化了吗？我看像张子善、刘青山这些人，就是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说的，他们是在糖弹面前打败仗的典型！”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会这样快地当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从历史上看，我国有哪几个朝代灭亡得最快？”“秦朝和隋朝。”

“原因呢？”

“秦朝亡于暴政，隋朝败于腐化。”

“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呢？”

“暴政加腐化。”

毛泽东不再说什么，又陷入了对历史的沉思。最后，他近似自言自语地说道：“看起来，我们共产党人如果不痛下决心，是很难跳出黄炎培先生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啊！”

“主席，这恐怕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大课题。”

“是的。但是，我是相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句话的，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地做几件实事。”毛泽东的心中似乎不那么憋闷了，他走向菊香书屋的写字台前，再

次审阅了一遍有关张子善、刘青山贪污案件的报告，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自治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处理。

### 59. 毛泽东听后越发地皱起了眉头

毛泽东写完这段批示之后，又把华北局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报的另一份材料看了一遍，仅仅是一些犯罪事实，并无具体的处理意见，他当即又拿起笔给薄一波、刘澜涛起草了电文，大意谓：

你们十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华北方面发现的贪污事件的报告收到了。在这个报告中没有说到对于那些重大贪污犯，党和政府是如何处理的，请你们将处理的情况补告我们，即对太原市区委书记赵城、区长任华，唐山市粮食公司负责人（报告中无姓名），河北徐水县银行经理赵增非，山西交城县县长张进才，辽东工业厅驻津办事处主任刘治宇，山西交通局保管科副科长赵以儒，华北军区后勤部汽车学校政治委员李晋吾，河北省供销社西北小组负责人（报告中无姓名）等重大贪污犯判处了何种罪刑，向我们作一补充的报告。

薄一波认真地看了毛泽东的批示以及给他和刘澜涛的电文，知道毛泽东生了很大的气。为此，他借谈财政方面的工作来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报告了有关张子善、刘青山另一方面的情况：“刘青山、张子善都是很老的同志，他们都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的严峻考验。其中，刘青

山参加并领导了一九三二年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后被捕入狱，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张子善也在一九三四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参加绝食斗争，表现了共产党的英雄气概！”

周恩来知道薄一波与刘青山、张子善都是隶属当年北方局的老同志，对刘、张犯错误有着与一般人所不同的情感，痛恨中含有某些惋惜的成分。为此，周恩来严肃地说道：“可再看看他们的犯罪事实呢，那也是触目惊心的啊！”

薄一波完全明白了周恩来的话意，没有再说什么。周恩来拿着华北局上报中央的报告，却有些愤怒地说：“更不能容忍的是，全国人民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禁毒、反对嫖娼的运动，我们的这些所谓功臣们，却吸毒成瘾，滥搞男女关系！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啊！”

“总理，我们如何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呢？”

“召开天津地委会议，征询大家的意见，供中央、主席下决心作参考。”周恩来说罢又解释道，“这样做的结果，目的是教育更多的同志，从刘青山、张子善的身上吸取教训。”

不久，薄一波把天津地委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的意见送交总理，并请总理代呈毛泽东主席：“华北局调查结果是：天津地委在家的八个委员一致同意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党员干部是五百五十二名，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是五百三十五人，判处死缓的八人，判处无期徒刑的三人，判处有期徒刑的六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是五百三十六人，判处死缓的七人，判处无期徒刑的三人，判处有期徒刑的六人。”

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许久无语，只是蹙着眉头微微地点了点头。周恩来低沉地问道：“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听后越发地皱起了眉头，许久才说了两个字：“死刑！”

“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

“不准！”

### 60. 才能挽救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毛泽东虽然对刘青山、张子善下了处以死刑的决心，但是他的内心却是痛苦的。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有好几天睡不好觉，经常听唱片《斩马谡》的唱段，偶尔还要跟着唱片小声地哼几声。或许这几天，从中央到华北局来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的人多了些，所以，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了命令：“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大贪污犯讲情的人，我一律不见！”

距离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由于人们知道毛泽东传下了话，谁也不敢再来菊香书屋讲情。这天，警卫人员向毛泽东报告：“主席，薄一波同志说有要事见主席，您看是见啊还是不见呢？”

“我听总理说过，他是赞成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以儆效尤的，可以见！”

薄一波走进菊香书屋，只见毛泽东依然专注地小声哼唱《斩马谡》的唱段。他小声地问道：“主席，您在听唱片啊？”

“噢，是一波同志到了，”毛泽东边说边走向留声机，“快请坐，等我关上唱机。”

“不要关嘛，我们一道把它听完。”薄一波边说边坐下。

“不听了。”毛泽东伸手把唱机关掉。

“主席，经常听听，这样也可以放松一下。”

“我再放松啊，就不是挥泪斩马谡了！”毛泽东说罢叹了一口气，点燃一支烟，颇有情绪地吸了一大口，又缓

缓地吐了出来，“再这样下去，你们只好跟着我拼死吃河豚了！”

“我懂了，主席为了不使我们将来吃河豚，所以今天就下定决心斩马谡。”

毛泽东看着一边点首一边自语的薄一波，不解地问道：“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言谈话语，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我怕主席生气。”

“你又不是贪污犯，我生你什么气？”

“我要是代别人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呢？”

“有意思，替人讲情还有代的。”

“主席是知道的，我是不会为他们讲情的。”

“是谁让你来我这里讲情的？”

“黄敬同志。”

毛泽东听后猝然变色，蹙眉不语。

“黄敬同志说：刘青山、张子善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改了。”

“那你为什么又代黄敬来讲情呢？”

“他坚持要我向主席反映他的意见。”

毛泽东听后站起身来，沉吟顷许，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你转告黄敬同志：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

## 61. “我要到郊区看看农民去”

就在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的前后，毛泽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报告，党内、军内、政府内的各级干部，不少变成了大中小不等的贪污犯，至于说到因官僚主义造成的浪费现象，那就更是惊人的了！当他听说专政机关公安部也有一个处长被定为大老虎，他当即要通了罗瑞卿的电话，生气地问道：“我听说你的衙门口里也养出了大老虎，是这样的吗？”

“报告主席，是有一个行政处长用盖办公大楼的钱供自己挥霍，过资产阶级生活。”

“如不抓紧教育，我们的专政机关尤其是公、检、法部门，就会变成最大的欺压老百姓的地方！不要几年，我们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毛泽东或许是太气愤、太激动了，他说完“啪”的一声挂上了电话。接着，他又在室内快速踱步不止，似在想消气的办法。他突然驻步，以命令的口气说道：“要车，我要到郊区看看农民去！”

菊香书屋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毛泽东要离开中南海，必须报告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警卫局还要派专人负责安全。如果要离开北京，那还得报告罗瑞卿等人。因此，他们听后谁也不敢说话，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毛泽东大声命令：“这是我的决定，不许通知其他人！”

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真的和少数身边的警卫人员离开了中南海，坐着车来到刚刚入春的郊区。当他们发现在农田干活的一位农民，恰好是他们去年到此视察认识的吴大伯后，毛泽东立即命令停车，向吴大伯走来。

这时的吴大伯正在地里挖野菜，一见是毛泽东向他走来，急忙提着半篮子野菜迎过来，高兴地说道：“这不是主席嘛，您怎么有空到乡下来转转？”

“吴大哥，”毛泽东满脸堆笑地说，“我在那座深宅大院里憋闷得慌，出来和你们聊聊天。”“和我们这些乡下人有什么可聊的呢？主席一定是出来散心的吧！”

“说出来散心也行啊，”毛泽东从吴大伯的篮子里抓了一把野菜，放在鼻前闻了闻，“你们村里搞‘三反运动’了吧？”

“就是打老虎吧？”“对！你们乡里有老虎吗？”“叫我说啊，占小便宜的人有，变成虎仔的没有。”

“这说明我们的基层干部还不错。吴大哥，你对打老虎有什么意见吗？”“要说有还真有！打个比方吧，景阳冈出了吃人的老虎，应当由武松出来打。可是，打虎也得挑个季节，现在是春耕大忙的时候，村里的人都忙着开会打虎，这农时可就给误了。”

“你说得好！立即告诉你们村的干部，停止打老虎，赶快忙春耕。”“谁听我这个老头子的话啊！”

“你就说是我毛泽东讲的。”

毛泽东再次看看手里的野菜：“你把这些苦菜全卖给我吧！”“主席爱吃，我都送给您了！”……

毛泽东很是开心地过了一天，但是，当他一走回菊香书屋，就又忙着去处理有关城市的“五反”运动了……

中国现代当代名人传记选

# 毛泽东私人医生 回 忆 录

毛泽东的生理与心理，和他的绝对权力形成互动的  
影响，并由此波及他的国家和世界。本书以全球第一手  
资料，披露毛的政治与权谋，性与死亡。

原著：李志绥 英译：戴鸿超教授

助编：石文安 (Anne F. Thurston)

前言：黎安友教授 (Prof. Andrew J. Nathan)

中译：李志绥 中文版助编：廖书珊

## 作者简介

李志绥医生，1919 年生於北京。他的家庭属於世代相袭的医生世家。李医生的大曾祖父是满清同光年间的御医。1945 年李医生获得医学博士。1950 年以後成为中共核心内医疗机构的主持人，并自 1954 年起被任命为毛泽东的私人医生，直至 1976 年毛去世为止。1980 年後李医生被任命为中华医学会、中国老年学会副会长，并主编《中华医学杂志》及《美国医学杂志》中文版。1988 年移居美国，与他的两个儿子及儿媳住在一起。



# 献词

本书不是毛泽东的传略。这只不过是著者作为毛泽东的医生二十二年间的个人经历。谨以此献给亡故的爱妻——吴慎娴。在这些年中，她与我共历患难，鼓励并支持我，使我得以度过那些恐惧忧抑的日子，并最後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 前言

黎安友教授(哥伦比亚大学)

像毛泽东这样长期统治众多子民，并带给他的国家巨大浩劫的领袖，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驾御的欲望和害怕背叛的恐惧，驱使毛持续陷其宫廷和子民於动荡之中。他的理想和权谋，驱使中国迈向大跃进及其可怕後果，即夺去千万生灵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

在这本由曾任毛二十二年专任医生的作者所著的回忆录中，毛也是第一个如此被近身观察的专制暴君。索多留(Seutonius)所著的《十二凯撒生活录》，历历描绘了提比略、卡利古拉及尼禄的绝对权力令人惊悚的表现：声色犬马、贪婪、虐待狂、乱伦、酷刑和杀人如麻。但作者本人并不认识这些君主。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在《秘史》一书中，无情地撻伐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和其後提奥多拉，却缺乏对主人翁的真正了解。施佩尔(Albert Speer)熟识希特勒，但他俩的共同兴趣局限在公务和战争。史达林的女儿很少和她父亲见面。拿破仑和希特勒的私人医生的日记仅为临床资料。

莫兰(Moran)的《邱吉尔传》和荷顿(Herndon)的《林肯》这类关于伟大民主领袖的私人回忆录，在历史方面的着墨，并不多於暴君的传记，这是因为民主领袖较无将其个性强加於历史事件上的伸展空间。而中国传统中，每个朝代的“起居注”也只记载了每位帝王在仪式、异兆、结盟、封地采邑上所扮演的角色，甚少揭露黄袍下的个人。即使是在《三国演义》此类中国历史人物的虚构小说中，处理的也是人物类型而非个性。

相对之下，李志绥医生的这本回忆录显得格外独特：既提供第一手观察记录，又呈现知人论事的洞见。

现今在中国境内流通的官方回忆录和毛的肖像，皆一成不变地呈现出一位英明爱民的帝王。真相却迥然大异。毛在初次会晤的场合中，散发着魅力、同情心，又不摆架子，使他的访客轻松而畅所欲言。但他擅长操纵自身的情绪起伏，巧妙运用愤怒和轻蔑来控制随身人员，达到骇人的效果。他依仗着身边臣子不愿犯上的儒家谦卑，来羞辱其属下和敌手。他作势自我批评，旁人便群起大加奉承。他在周遭创造了一种卑恭屈膝的文化。

毛效仿唐太宗，挖掘人们的弱点，使他们誓死效忠。李志绥医生出身於富裕家庭，在上海的美国人学校接受医学教育，早期曾和国民党略有牵连。这些潜在的危险因素使他完全受控於毛。毛深知其警卫行径腐败，但他需要这些人替他出面办事。

毛爱说，水至清而无鱼。他能毫无惧色地在浊流中浮游，或在黑夜中行过泥地。

无论出身，毛的追随者永远如履薄冰。毛的老同志被流放内地，有些因而死去，虽然毛未必直接一手促成这些悲剧。我们在书中一景看见毛隐身坐在幕後，他两位最亲密的战友正在群众大会上接受攻讦。毛控制高级领导的医疗保健，拒绝准许一些人接受癌症治疗，因为他认为手术会耗尽他们余生的工作精力。他对爱人、子女及老友的痛苦，无动於衷。他也无视於为其政治和经济计划所陪上的抽象人命数字。他了解痛苦只为了控制其臣子。在政治和私人生活中，他对臣子呼之即去，招之即来——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李医生常瞧见毛手上捧着中国史书。毛爱读传统故事中的权术倾轧和欺骗伎俩，他更是熟谙伺机而动，声东击

西，迂回攻退之法。他善用“引蛇出洞”法，鼓励旁人表明立场再突而擒之。即使是他最亲密的盟友也分不清他是站在同一立场，还是正伺机反噬。毛带着如此温煦的微笑，判其侍从流放，而那位受害者竟一路鞠躬谢恩离去。

帝王权势让帝王享有最大的奢侈——生活简单。毛大部分的时间要不在床上，要不在私人游泳池旁休憩。他吃油腻食物，以茶漱口，和女子寻欢作乐。毛一九五八年出巡河南时，随车带着一卡车的西瓜。毛喜欢穿布制的鞋；如果迫於外交礼数得穿皮鞋，他命人先把鞋子穿合脚。他不洗澡，偏爱用热毛巾擦身，使得李医生难以遏止滴虫病在毛的女友间蔓延。他睡特制的木床，由专列一路运载到各招待所，甚至空运至莫斯科。

他统治时间和岁月。内宫随着毛的节奏运转，日出而息，日落而出。国家领导同志随其行踪落脚，四处开会。他希冀以道家御女房术来战胜死亡。除了五一劳动节、国庆节、和偶尔接见外宾之外，他不遵循任何日程表——只有在这类重要场合，毛穿戴整齐，并用镇定剂控制焦虑。

女人象上菜般轮番贡入。在以毛之名推行禁欲主义的同时，毛的性生活成为内宫的中心事务。人民大会堂特别辟出一个厅，让毛在高级领导会议中寻欢休憩。捍卫全国道德操守的党军政治处，号召大批无产阶级背景，可靠而又美丽的年轻女孩；表面上是为了在舞厅中和领袖翩翩起舞，其实是献做他的床伴。有些女孩倍感荣耀，引介其亲姊妹共沾雨露。

每位省党委书记都为毛兴建一座招待所。他行踪不定部份是出於安全上的顾虑，部份是被迫害妄想狂的驱使。他曾跟李医生说：“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不好”。他专列行驶之处，交通管制，车站封闭。公安打扮成小贩，好给毛一切如常的感受。大跃进时期，农民被动员到火车沿线耕

作挤插的稻田，演出大丰收的荒谬剧，但事实上那场秋收是个灾难。毛最喜爱的住所是珠江上的小岛招待所，在广州喧扰的市嚣中，他能独享一片天地。北京劳改农场中特别栽种的食品空运至此，并有试尝员先试吃。警卫用冰桶为他的房间降温。

绝对权力影响毛的心理、生理健康，以及人际关系，并透过这些波及他的国家和世界。他蛰居床头数月，郁郁寡欢。一旦政治斗争有利於他，立即转为精力充沛，无法成眠，以至於李医生不得不加大安眠药药量。政治压力不是使他阳萎，便是使他纵情声色犬马。在千万人饿死的大跃进期间，毛虽暂时放弃吃肉，却需要更多女人的慰藉。一位年轻女孩曾对李医生说：“主席真伟大，样样都伟大，真使人陶醉。”

专制政治与专制者的个性息息相关。毛建立了一个特异的政权——他努力整合政治社会整体制度，以求从一个贫穷、落后和百般凋零的国家中，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

面对西方的敌意，毛转而与莫斯科结盟。但他对西方的欣赏是他选择受美国训练的李医生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俩无数次彻夜长谈的话题。毛告诉李医生，美国对中国的企图一向具有正面意义。毛则对苏联友邦，深怀轻蔑心理。毛立志要以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超越原始苏联模式，并将中国提升到先进西方国家水准。这项成就将使他跨入马列主义创始先驱的殿堂。大跃进即是毛试图创造出比北方邻国更优秀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努力，而文化大革命则是在面临此次失败之下，顽固的试验。

在一个拥有众多贫穷人口，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毛运用群众力量来追求经济增长，尝试以意识形态的狂热取代物质生活。他将人民生活冻结在最基本的需求，以此建

立一个庞大、虚耗财源的工业结构。因此，毛无视於那些与理想相左的现实。

尽管他是农民子弟，他仍相信大跃进初期所见的那一片片匪夷所思的稻田。就如李医生所言，毛为何要怀疑共产主义天堂是否真正来临——因为他自己就身处其中？毛认为他从中国史书中可学到的领导权术远多於现代工程教本。等到後院炼钢运动为害匪浅之後，毛才费神了解钢铁的制造过程。饿殍遍野之际，他幻想人民的稻谷多得吃不完。

毛思想推崇自我否定，以政治操守界定人性价值，并羞辱阶级敌人。一个由工作组，阶级标签、户口管理和群众运动组合而成的体制，将每位公民囚禁在组织的樊笼中。没有任何极权制度能将人类彼此相残的政治恐怖发挥到此极致。这个官僚体制渗透入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人民私生活，甚至许多人的思想层面。此机制更领导人民颂扬这个对他们予取予求的政权。在党机器无法充分迎合毛之幻想的步伐和努力时，他不惜动摇其根本，大举清算批斗。等群众陷入派系暴力，才又将之重建统合。

最高领导阶层中，由三十到四十人共同拟定重大决策。他们的个人权力极不稳定，完全仰赖与毛的关系。李医生栩栩描绘了那些服务领导同志的中央办公厅体系、政治及机要秘书、警卫、厨房、停车间和门诊部的众生百态。领导人可经北京的地下工程秘密穿梭於中南海和市内其他建筑物之间。毛的贴身家臣曾在其居所装设窃听设备，无非是想保有更完全的决策记录，东窗事发後，他们因监视毛而被撤职。

权力结构在服务和保护领导的同时，也孤立他们，毛尤为甚。毛的战友逐渐将中南海内游泳池、舞会和北戴河海滨退让於毛。毛不顾警卫反对，执意在三江游泳的壮举，

象征他与官僚体制的孤独奋斗，对革命走向末路的恐惧，以及对战友背叛其狂热信念的疑惧。

一九五六年八大会议中，毛的同袍籍苏联反斯大林运动之势，将毛泽东思想排除於党章之外，促使党内反对个人崇拜，并批评毛大力催生共产主义的努力。毛向李医生谎称这些政策未曾经其首肯。国外势力亦威胁毛的统治。新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希求於西方和解。李医生描写了毛、赫两人在游泳池旁不欢的会晤。这次秘密会晤揭示中苏公开决裂与中国长期孤立的开端。

毛掌握三种权力工具：意识形态、军队、及其在党派系网络中的枢纽地位。毛主席走遍全国的巡回运动吹起大跃进的号角，一时上至经济计划领导，下至基层干部，纷纷群起响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其他领导人试图钳制毛的脚步，毛即恫吓要上山另组红军。其他领导人只好俯首听命。

大饥荒开始後，毛退居权力二线。其他领导恢复经济的同时，他斥责彼等为“行尸走肉”，并私下抱怨他们不再征询他的意见。但他按兵不动，直到京剧论战时才一一将以诱陷，同时用农村腐败问题，使敌手晕头转向。他待一切布置妥当，便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九年，於百万人牺牲之後，毛在九大会议中赢得全面胜利。彼时他的政敌不是已被凌虐至死，便是放逐内地，全国在他无所不在的肖像前歌功颂德，挥舞着小红书。他身侧站着另有所图的林彪——旧统治团体中唯一的幸免者。毛发展的理想失败了。但在这个他所毁灭的国家中，他握有绝对权力。两年後林彪政变使毛深受打击，李医生相信它加速了毛的死亡。毛用余生精力推动开往西方的大门，为往後邓小平的改革铺路。

病态心理在宫廷政治中蓬勃迷漫。毛的控制越彻底，他越恐惧他人的钳制。手下争相邀宠反而使毛更觉疑云重重。毛认为招待所被下了毒，他因听到野兽在屋顶的游走声响而惊吓万分。毛透过党组织来操纵其他领导，监视他的同袍。他的政敌全被他的手下包围，难怪他永远无法确定，对方是否也透过女人来侦伺他。

毛夫人江青也深为精神衰弱所苦，她怕声音、光、冷、热，并且总是无法自制地与人争吵。生活无聊，依赖，和被迫无所事事，在在使她极度沮丧。因此毛在拈花惹草之际，总试图避其耳目。但当毛需要她做为政治上的代理人时，他便领她进入内宫政圈。江青跟同样病奄奄的林彪一样，握权後立即生气百倍，并与毛最宠爱的女友友善，期能更接近权力的源头。

李医生呈现了下列场景：林彪在其夫人怀中，为肾结石的病痛呜咽不已；华国锋在大厅中静坐数小时未能见毛，只因毛当时的看门人张玉凤正在午睡；周恩来跪在毛脚跟旁指示吉普车游行的路线；病重的毛将全国大权交给周恩来，只为及早康复和活得比周长久，以及江青对此的愤怒等。

在所有毛的追随者中，只有周恩来与内宫诡秘繁琐的脉络保持某种程度的距离。

反讽的是，李医生和他的同事由此认为周为不守信义的危险人物。周按领导阶级向上汇报之举，令其他家臣疑心大起，视其为软弱无能。

最後，全中国最受爱戴的人众叛亲离。在毛长期病情恶化期间，家臣念兹在兹的主要念头是避免因他的去世而惹祸上身。只有他的女友张玉凤仍待他如常人，争吵不休，旁人指责她会气死毛时，她也悍然无惧。毛越形衰弱後，



她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只因为只有她才能解读毛含糊不清的语言。

李医生那张坦荡而带着微笑的圆脸，在毛众多家臣的团体照中，特别突出。他率直的表情、柔和的笑容，和整洁的打扮，在在都掩不住他所受的西方训练。李医生的外国气质和西方仪态。似乎既说明了他的才干，又说明了他的弱点，因此使他显得特别不可多得。李医生的不安全，恰可保证毛的安全，两者息息相关。於是他在毛的保护羽翼之下生存，埋首於医药事物——即维持那位一举一动便足以陪上百万人性命的人的健康。

对邪恶能有某种程度视而不见的人，才能成为暴君生命的守护天使。李医生身为历史旁观者的局限是其工作的要求之一。但有时政治不免压顶而来。毛时常坚持讨论时事，或派遣李医生离开内宫，四出观察，提出报告。陷於内宫中，李医生不得不区分敌友。除了毛主席外，他的保护者是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李汪的联盟使此书有若干偏颇，但同时也提供了了解宫廷政治的许多洞见。

自李医生离开中国後，他便几乎完全被官方历史抹消。中国出版界发行的大量描述毛个人生活的书籍中，只有一、二本提及他。很明显地，中央曾下达指令——李仿佛未曾存在过。但他的身影牢牢嵌在无法修改的纪录影片和照片中，而某些可靠来源也确定他的身份。比照官方和半官方的著作，可证实他书中的许多细节，但不同於此书的是，它们都大笔略掉会使这仍仰仗毛的光明形象来行使统治的政权感到难堪的那些层面。没有任何一本官方传记呈现了一幅比李医生此书更真实的毛画像。此书是有关毛——或许也是有关历史上任何一位专制者——的著作中，最深刻入微的一本。

毛去世五年後，也就是一九八一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毛盖棺论定，发表一篇官方的《關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中结论毛是伟大的革命家，功大於过，瑕不掩瑜。此书给我们另一种教训。它描述过度膨胀的权力，如何驱策其拥有者进入一种黑暗的深渊：在深渊中，伟大的梦想只能导致滔天罪行。

## 自序

一九六零年中国青年杂志社通过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向我征求稿件。

田在中南海南楼的宿舍，和我贴邻。他平时知道我喜欢作点杂记，其中个别篇章，他还看过，这是他劝我选一、二篇刊登出去。

自从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空下来我将平日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一者为了消磨时间，二者有时拿出来翻翻，作为流逝的年华的纪念，完全没有想发表的意思。因此，我拒绝了《中国青年》杂志的征稿要求。

开始只是记录一些趣闻趣事。时间一久，成为习惯，於是写成无所不容的日记了。到一九六六年时，已经积累了四十几本。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红卫兵兴起了抄家风。这时我已迁到弓弦胡同中央保健局宿舍。前後院住了三位卫生部副部长。我自己住在中南海内，很少回家。可是一回来，嫫就同我说，几乎天天晚上，来人抄这三位副部长的家。时常敲错门，敲打我家。嫫很害怕，万一抄错了，进来将这四十几本杂记抄走，岂不是有了十恶不赦的罪状了，应该赶紧烧掉。

我抱着这四十几本杂记发愁，不敢在家里烧，怕邻居怀疑而揭发，又没有地方可藏。於是我将这些杂记带到中南海内一组，即毛泽东的住地。靠南墙的小院内，有一个焚化炉，是为了毛泽东和江青不需保存的文件、信件，加以销毁之用。我就用这个炉子焚烧。烧到还剩下十多本的时候，汪东兴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他问我，现在正是抄家的时候，江青的厨师告发我，在一组烧毁文件。我告诉

汪，我烧的不是文件，是我的笔记。汪说，笔记有什么要紧，何必烧。我说，这些笔记都同毛有关系，留下怕惹祸。汪说，你一烧更惹祸，这个厨子如果告诉了江青，就完了。

我回到一组，看到剩下的十几本日记，心想这些留下来是祸害，反正已经烧了，再烧一次吧。

第二天汪东兴又将我叫去。这回他急了，对我嚷：“你不要烧，你还烧。主席的厨子来告你的状了。这事要闹出去，就成了大问题。你再不听话，我把你关起来”。

我向汪说，已经烧完了，再也没有可以烧的了。

这就是我积累了十几年下来的日记的下场。

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片纸支字都没有保存下来。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捕以后，娴常常惋惜地说：“太可惜了，那四十几本日记。如果能保存起来，也没有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为此她常常催促我，写出这一段的经历。

一九七七年夏，叶剑英到二零五医院检查身体。检查间隙，叶同我谈到往事。他说：“你给毛主席工作了二十二年，时间可不短了。你应该将你知道的事，写了出来，这也是历史啊”。他并且说，他要向一些报刊代为宣传。

此后多种报刊杂志都找到我，要我投稿。他们愿意优先刊登。但是我不愿投稿。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凡是讲真心话的文章，作者不是被封为右派，即冠以反动文人的称号，没有一个可以幸免。我又不想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章。

但是我不愿意让我的这些年的经历，烟没无存，于是我重新拾起旧忆，撰写回忆录。从一九七七年开始执笔，断断续续，又写了二十多本。我并没有想整理发表，因为

根本没有公开发表的可能性，何况我不想因之取祸。这只不过作为我和娴逝去年华的雪泥鸿爪，留作纪念吧。

一九八八年二月，娴发现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五月住院，到七月下旬，病势日趋严重。两个孩子、两个儿媳，都十分焦急。他们一再催促我携娴来美国求医。

八月中旬我与娴带着孙女到了美国。娴继续求治。我每天要照管娴的饮食和治疗，虽然娴多次提到，将旧作整理出来，但是我哪里有这种心境和时间呢？

十二月中旬，娴因感冒，病势急转直下，送入医院，住院治疗。经过多方抢救，终于因为肾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她陷入昏迷前，还一再叮嘱我，要将一九四九年以来，这三十九年中的遭遇写出来。她说：“一定写出来，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我们的后代。可惜我不能再帮助你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我点检行篋，取出了旧记和带来的全部资料，开始了写作生活。这一方面是对娴的永久的纪念。另一方面，身在美国，就可以将这些年的所见所闻，秉笔直书，无需避讳，加以发表。

如果读过这本书以后，读者能够更加珍惜自己的理想和所向往的幸福的生活，那将是我与娴多年来的最大愿望。

\*\*\*

经过了二十二年的血腥战争，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终于取代国民党，统治了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年夏天，我正在澳大利亚。由我大哥的从中介绍，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来信，希望我回去工作。于是我返回香港，同我的妻子娴一道回到北平。

傅安排我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香山门诊部，後迁入中南海，成立中南海门诊部。

我工作勤奋，受到中共中央一些高级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的赞誉，被选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甲等工作模范，吸收入党，并被任命为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後为中南海保健办公室主任、中央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副秘书长及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二零五医院院长。

一九五四年，经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推荐，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意，由周恩来批准，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後并兼任毛的医疗组组长。从此，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我作为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无论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随在他身边，为时二十二年。

我初次到毛处工作，即惊异於他的生活习惯与众不同：饮食睡眠都没有一定的时间，正是“起居无时，饮食无常”。对他说来，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分，画夜之分，毫无意义。他的一切公私活动，甚至接见外国元首，都以他的意愿为主，都不事先通知，而采取突然行动。即使在身边工作的人员，也摸不清他下一个行动是什么。

加上共产党内部控制严密，强化保密制度，毛本人亲自规定：“不要说这里的情况”，所以他的真实状况，从政治活动到私人生活，都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更形增加了他的神化感和权威感。

一九五九年以前，我崇拜他，仰望他如泰山北斗。但是我虽在他身边，在他的周围似乎有一道神秘而不可逾越的障隔，使我不能真正进入他的生活。

一九五九年以後，我逐渐穿过这层密障，进入了他的生活实际。原来他正如演员一样，除去前台的经过种种化装的他以外，还有一个後台的真实的他在。

五十年代初期，人们只看到他与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号召“一边倒”，但不知早在三十年代，他就被苏联共产党和史达林目为“异端分子”，是“白心的红皮萝卜”。一九四九年冬他去苏联，受到极大的冷淡待遇，住了两个月，在他最後愤然要回国时，史达林才见了面，签了这个条约。他认为苏联是中国的最大威胁，最终目的是吞并中国。只是到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的破裂才公开化。

自从斯诺等人访问陕北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奇迹以来，他对美国，特别美国人，有很大好感。当他号召“学习苏联”，大家学俄语的时候，他不学俄文，而学英文。他自嘲说：“我是言行不符”。他身边所用的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都是受英美教育出来的人。他决不将由苏联培养出来的人放在身边。至於韩战及越战是由许多因素，也包括美国一些不了解毛的内心世界和对当时中国共产党有歧见的人士造成的历史大不幸。从六十年代末期，毛即致力於恢复中美友好关系，而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是他去世前实现的。

毛对蒋介石，虽然终生为敌，但并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蒋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俯首贴耳听命於美国。他说：“蒋介石和我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在这点上我们志同道合。”

共产党核心领导中的斗争，既复杂又曲折。自一九五七年的所谓“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演变到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表面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实际上却存在一个根本因素。一九五六年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有“反史达林”，“反对个人崇拜”的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一连串反应。毛从种种迹象

感到，他作为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受到动摇，因而作出一系列相应的反应。正如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所说：“毛认为，全党没有谁都可以，可是不能没有他。”

毛的私生活骇人听闻。外表上，他凝重端庄，而又和蔼可亲，俨然是一位忠厚长者。但是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到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娱乐，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乐趣。汪东兴说：“他是不是觉得要死了，所以要大捞一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大的劲？”江青说过：“在政治上，无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他(毛泽东)的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我不是给毛写传记，只不过作为毛的保健医生，在二十二年的风风雨雨中，将我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笔之於书，用以纪念与我患难与共的爱妻娴，没有她生前对我的支持和一再鼓励，我不会写成这本书。

时间间隔太久，又没有读些参考文献，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盼读者方家斧正。



## 致谢

著者在此特向廖书珊小姐致谢，她在本书的中译过程中，无论协译、剪裁、补译、贯串、拼贴、校对，都付出极大的精力和时间。感谢夏元瑜教授赠一中南海示意图，使本书生色不少。

本书中每章後的注释为英文版助编石文安女士所注；中共中央组织结构图、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结构图、人物简介及年表，亦均为英文版编者绘制，在此一并致谢。

## 序幕毛泽东之死

“主席，你叫我？”

毛泽东尽力抬起眼睛，嘴唇嗫嚅地动着。呼吸机的面罩放在他的口鼻旁。毛在吃力地喘息着。我俯下头，但除了“啊，啊……”外，听不清他说些什么。毛的头脑仍然很清醒，但声调中已失去希望。

我是毛泽东的专职医生，也是他的医疗组组长。自从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大厅内的心电监护器显示心肌梗死之后，两个多月以来，我们二十四小时照顾他。

护士人手原本不足，从医院又调来一批，每班三个人，另有两名医生做心电图监护。我昼夜二十四小时待命，一个晚上只断断续续睡上三、四个小时左右。我的床榻就在毛的病房一个桌子下面。

毛泽东已成不死之躯体。对成千上亿的中国人来说，毛不是凡人，甚至不是帝王，他是个神祇。将近二十年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与日常生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已俨然成为事实。全国各地的街道、工厂、学校、医院、餐厅、戏院和家庭中，充斥着毛的肖像--还有这句口号。甚至那些怀疑毛不朽的人，也相信毛会活得较一般人长久。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当时即将被选为毛的接班人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声称，毛一定可以活到一百或一百五十岁。谁敢暗示毛是凡人，就得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险。

中国人民此时仍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毛病倒了。他们只能从毛与国外显贵会晤的几张应景照片中，略窥毛衰老的情况。毛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与寮国

领袖凯山的合照。虽然那张照片显示他们的领袖已垂垂老矣，新闻媒体仍坚称毛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早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仍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但在那天晚上，我们这些随时在毛身边的人心里都很清楚，毛的死期近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名副主席华国锋和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名委员张春桥和汪东兴，这四个人自从六月二十六日毛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以后，也一直分成二组；轮流昼夜值班。

负责拯救主席生命的华国锋对毛忠心耿耿；他诚挚地关心毛的健康和舒适，试着了解医生的解释，并相信医疗组已竭尽所能。我们建议从毛的鼻孔插胃管入胃饲食时，只有华国锋愿意先亲身试试这种新医疗方法。我喜欢华国锋。他的正直和诚恳，在腐败的党领导阶层中十分罕见。

我是在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期，陪毛去巡行湖南的韶山老家时，认识华国锋的。

华国锋当时是韶山所属的湘潭地区党委书记，毛非常欣赏他。两年后，在大跃进使全国经济衰退之际，许多地方领导仍在谎报粮食产量节节高升，只有华国锋有勇气直言。他说：“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折腾，人瘦了，地瘦了，牛也瘦了。在三瘦之下，再讲什么高产粮食，是不可能的。”毛对我说：“他的话，我看是大实话。”

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这是毛死前权力斗争的一大胜利。在此之前，毛已指派华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接替才去世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了四月上旬，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哀悼周恩来，并抗议造反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这个游行被打成“反革命暴动”。毛为了安抚造反派，

以煽动不安罪名整肃邓小平。毛为了搞调和，不选造反派，而选华做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因此成为毛确认的接班人，得以主持中央政府和掌理日常党务，造反派转而指控华右倾。

华决定他无法再等下去。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他告诉毛主席造反派的攻击危及他的地位时，我也在中南海。会后华与我透露他们的谈话内容，并把毛写的字条给我看。毛蜷曲的字体写着：“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着急”。那时毛已口齿不清，他发现用笔比较容易沟通。华国锋将纸条拿给政治局看，毛的纸条是他接班合法化的唯一文件。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午夜零点，毛泽东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为了急救，刚刚给毛从静脉的输液管道内注入了升脉散，血压由已降到了 86/66 毫米汞柱升至 104/72 毫米汞注，心跳也稍微增强了一些。华国锋殷切的眼睛望着我，他低声急促地问我：“李院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都凑了过来。

我沉默地凝望着华国锋。室内除了呼吸机的嘶嘶声以外，空气好象凝结了。我小声说：“我们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大家又沉默下来。

华低下头沉思了一下，然后对汪东兴说：“立刻通知江青同志和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也要通知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要他们即刻来北京。”汪起身出去时，内室中的一位值班护士跑过来，匆匆对我说：“李院长，张玉凤说毛主席在叫您。”我绕过屏风，走到毛的床边。

张玉凤是毛十四年最亲近的的随员。张玉凤曾为毛出巡全国时私人专列上的服务员，现在则是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与毛初次相遇於毛在长沙举办的晚会上。那是一九六二年冬，她那时年方十八，天真无邪，有着大大圆圆的

眼睛和白皙的皮肤，她主动请主席跳舞。就在那次晚会上，毛与张连续跳了几场舞，等到舞会结束，我亲眼看见了毛携了张玉凤的手回到他的住室。

毛与张的关系十分亲密，毛也有其他几位女友。现在仍有两位原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孟锦云和李玲诗在做毛的护士，替他擦身和喂食。但张玉凤待在毛身边最久。

虽然在岁月催折下，她也开始饮酒，但她一直深受毛的信任。一九七四年，毛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因肺癌住院，张便接管毛每日批阅公文的收发。在毛视力衰退以后，她便负责将那些公文读给毛泽东听。张於同年年底由汪东兴正式任命为毛的机要秘书。

我是毛的私人医生，给毛检查身体时，还可以见到毛，谈几句。别的任何人，要见到毛，首先要经过张玉凤的同意。一九七六年六月中旬，华国锋到游泳池来，要向毛报告工作。叫张玉凤三次，张睡觉不起，另外两个值班的是孟锦云和李玲诗，不敢向毛说华要谈工作。她们说，不经过张，直接同毛讲了，就不得了。华等了两个多小时，张仍然不起床，华只好走了。孟锦云告诉我，一九七六年初“批邓整风”后，邓的女儿给毛写了一封信，说批邓以后，撤走了工作人员，邓有病，她要求自己留下，照顾父母。这封信是否交给了毛，很值得怀疑。因为结果邓的女儿仍没能够去照顾她父亲。

张玉凤能爬到这个位子，完全是因为只有她听得懂毛的话。连我都要透过她翻译。

张玉凤对我说：“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

毛用力点点头，同时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桡动脉的搏动很弱，几乎触摸不到。两侧面颊深陷，早已失去了他以往丰满的面容。两眼暗淡无神，面色灰青。心电图示波器显示的心电波，波幅低而不规律。

我们六周前将毛从中南海游泳池搬到代号为“二零二”这座大厦内的一个房间。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附近发生了强烈地震。北京东北一百里外的唐山市全被摧毁。二十五万余人当场死亡。北京市虽没什么伤亡，但房屋倒塌多处。数以百万的市民唯恐再发生一次强烈余震，在街上搭的防震棚住了好几个礼拜。自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便住进了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他的病床就在室内游泳池内一个房间里。地震时游泳池也受到强烈震撼。我们决定将他迁往更安全的地方。

二零二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一九七四年游泳池以南的旧平房被拆掉，盖了一座抗地震的大厦，旁边又修了随从人员的住房。大厦有走廊连接游泳池。这座大厦就称为“二零二”。唐山大地震当天傍晚下了大雨，又有一次地震。在二零二这栋屋内，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其实那时即使山崩地裂我都不会有什么感觉。我全心全意在救助毛泽东奄奄一息的生命。

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和汪东兴此时静静地走到毛床前。我听见另一批人从屏风后面悄悄进房的声音。房里都是人，大家正准备换班。

我站在那，握着毛的手，感觉他微弱的脉搏时，江青从她居住的春藕斋赶到。她一进门就大声嚷道：“你们谁来报告情况？”

如果将毛十四岁时，他父母替他安排，他却拒绝圆房的那桩婚姻也算在内，江青是毛的第四任妻子。毛於一九三八年不顾共产党政治局的激烈反对，与江青在延安结婚。传说江青在延安时期对人温和有礼。但在一九四九年后，这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妻子，却因无法掌握实权而对人生厌烦，并变得不可理喻，难以伺候。直到文化大革命

后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才得以运用她的权势刺激消除旧隙。毛和江青长年来各过各的生活，但毛并不想和她离婚。毛恢复自由之身后大可以和别人结婚，但他不愿意这样做。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搬去钓鱼台国宾馆。直到毛六月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江青才搬回中南海的春藕斋旁新建的一所华丽的大房子。

华国锋摇摇手说：“江青同志，主席正在同李院长讲话。”

虽然我心里清楚毛毫无希望，我仍试图安慰他。这几年来他的健康情形每下愈况。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后不久，当时身为党副主席、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毛钦定接班人，全中国公认为毛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背叛毛，并策划暗杀他。林彪在他的计划暴露之后，与他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一起搭机准备潜逃到苏联。飞机因燃料用尽，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林彪事件后，毛更形沮丧，无精打采，且持续失眠，最后他终于病倒了。

在美国总统尼克森一九七二年二月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几个礼拜前，毛仍抗拒着医生所给他的任何医疗措施。直到尼克森预定抵达的三个礼拜前，毛醒悟到如果他的健康状况再不改善，他便无法亲临这场历史性的外交会晤。他叫我给他治疗。

当时他的病况过于严重，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经过不断的治疗，肺部感染得到控制，心脏功能明显好转，水肿在消退，但是直到会见尼克森的时候，露在衣服外面的颈部和双手水肿还没全消，两足更是明显，原来的布鞋穿不下去，特地做了一双大鞋，他此时行走仍很困难。我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门口迎见尼克森总统的座车，领他到毛的书房后，就在接待室外的走廊上将急救设备准备好，以防万一。也因此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现年八十三岁的毛百病缠身，他长年吸烟的习惯毁了他的肺，并有慢性气管炎、肺炎和气肿发作。他的左肺中有三个大的空泡，所以只能向左侧倾卧，这样右肺才能充分膨胀吸入足够的空气。他常常只能借助氧气机器呼吸。在几次急救中，我们使用季辛吉在一九七一年秘密访问中国时送的美国制呼吸器。

一九七四年的诊断确定，毛的病非西方所猜测的帕金森氏综合症（另称震颤性麻痹），而是一种罕见而又无药可救的运动神经元病（另称内侧纵索硬化症）也就是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因为，喉、舌瘫痪，会引起肺部的反复感染，不能吞咽，不能正常饮食，势必更形衰弱。必须经鼻道装胃管饲食。受影响的肌肉组织失去功用，呼吸困难。现今仍未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毛的病情如专家所料的恶化。但真正使毛致命的，是他的心脏——那老迈而被慢性肺炎折磨的心脏。毛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和张玉凤一次剧烈争吵中，爆发第一次心肌梗死，六月二十六日则是第二次。第三次发生于九月二日。医生们全都知道死神就要降临，但没有人敢明言。

毛主席仍在和死神挣扎。

我弯了腰对他说：“主席放心，我们有办法。”这时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两眼顿时露出了刹那的喜悦光彩。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两眼合下来，右手无力地从我的手中脱落，心电图示波器上呈现的是一条毫无起伏的平平的横线。我看看腕上的手表，正是九月九日零时十分。



毛的逝世并未使我感到难过。二十二年来我每天都随时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个会议。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里我不只是毛的医生，我还是他闲聊的对手，我几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细枝末节。除了汪东兴之外，我可能是随时在他身边最久的人。

我刚开始崇拜毛，望他如泰山北斗。他是中国的救星，国家的弥赛亚。但在一九七六年此时，这崇拜早成往日云烟。好多年前，我那个全民平等，剥削终止的新中国梦想就已破灭。我那时仍是共产党员，但我对它毫无信心。“一个时代结束了，”当我盯着心电图那条平直的线时，闪过这个念头。“毛的朝代过去了。”

这念头瞬间即逝，紧接着我心中充满恐惧。我会有什么下场？做为毛的专任医生，这问题长年在我心中盘旋。

我抬起头，茫然环顾四周。从每一个人的神色举止和语言里，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对于这位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的死亡，有着多么不同而复杂的心情。江青转过身，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们这是怎么治的？你们要负责任。”

江青的指控早在我意料之中。江青在最天真的举动中都能嗅出阴谋。二十年前我们就处得不好。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她指控我是特务集团中的一员。

华国锋慢慢走到江的身旁：“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值班，医疗组的同志们都尽到职责了。王洪文涨红了脸急忙说：“我们四个人一直在这里值班。”

王洪文才四十二岁，是政治局里最年轻的委员。他从原本是上海一家纺织工厂安全干部，窜升到最高政治权力阶层的速度之快，使得外界给他取了个“火箭式干部”的绰号。没有人知道毛为何喜欢这年轻人，并如此迅速的提拔他。王长得高大英俊，可他是个金箍马桶，只有中学程度，不学无术，只会卖弄小聪明。他对中国的领导阶层没

有任何贡献。那年五月，毛的健康重大恶化时，王还建议我给毛服用珍珠粉，但我拒绝了。为此汪东兴还批评我不尊重党的领导人。毛也从未服用过珍珠粉。

毛垂危病榻时，王原本该负起看守的责任。但他却常跑去国家高层领导专用的西苑军用机场猎兔子。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观看香港进口的电影，我想王原先就不是有品德的人，权力只是使他越加腐化。

王洪文又说：“医疗组的每项工作都报告了我们，我们都清楚，也……”没等王说完，江青抢着说：“为什么不早通知我？”

但我们早跟江青报告过好几次毛的病情。江青指控我们医生从来将病情说得严重，是谎报军情。她怒斥我们是资产阶级老爷，还说医生的话最多只能听三分之一。

八月二十八日，在听过我们对毛病情恶化的正式报告后，她气冲冲赶往大寨“巡查”。九月五日，华国锋打电话将江青从大寨催回北京。当晚江来了一下，说太疲劳了，就回了她自己的住处，并没有询问毛的情况。

九月七日，毛已进入垂危状态，江青下午来到二零二，与每一个医生和护士握手，连声说：“你们应当高兴”。她似乎以为毛死后她会当然接管权力，我们也会期盼她的领导。

医疗组的人都感觉很奇怪，为什么江青这样对待毛呢？我将这些告诉了汪东兴。汪说：“这不奇怪。江青认为阻碍她取得最高权力的人，就是主席。”

这时张春桥背着双手，踱着八字步，两眼看着地上。

一旁的毛远新则脸色铁青，走来走去，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毛远新是毛泽东二弟泽民的儿子。毛泽民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新疆省省长判处死刑。原本亲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盛世才，曾热烈欢迎毛泽民前往他的辖区。但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他便转而投靠蒋介石和国民党。毛泽民的夫人也一起被捕，在牢里产下毛远新。他母亲再婚后，毛泽东便负起养育侄子的责任。毛在一九四九年把毛远新接入中南海，但很少和他见面。

我是看着远新长大的。远新小时和江青处得不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才二十多岁。他写信给毛为自己与江青不睦的事道歉。现年只有三十多岁的毛远新是沈阳军区政委。一九七五年尾，毛因病重而不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毛远新便代表他出席，成了毛的联络员。江青信任毛远新。

其他人们和医生护士都低眉垂目，象是等待判决，汪东兴在向张耀词说些什么。

张耀词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与江青素有嫌隙。汪当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并身兼数个要职。他不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还是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以及中央警卫团党委书记。想发动政治局政变一定得有他的鼎力相助。

突然江青的脸色变得缓和起来。也许她以为阻碍她取得最高权力的障碍已经消失，她马上就可以统治中国。她转身向我们说：“你们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然后回头叫她的护士说：“给我准备好的那套黑色衣服和黑头纱呢？你们烫好，我要换上。”

华国锋向汪东兴说：“你立刻开政治局会。”

大家从室内走到外面的大走廊，这是张玉凤突然放声嚎哭，嘴里叨叨着：“主席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哪？”江青走过来，用左手抱住张的肩膀，笑着对张说：“小张，

不要哭，不要紧，有我哪，以后我用你。”张立即停止了嚎哭，满脸笑容对江说：“江青同志，谢谢您。”

我听到江青悄悄对张玉凤说：“从现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谁也不许进去。你把留下来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点好，交给我。”一边说一边向会议室走去，张跟在江的后面说：“好的，江青同志。”

此时张耀词气急败坏从室内走出来，向我说：“李院长，你问问值班的人和别的人，有没有看见床旁桌子上的那块手表？”

我说：“什么表？”

“就是郭老在重庆谈判时，送给主席的那块手表。”毛没有戴手表的习惯--他起居无常--那只瑞士亚美加表是多才多艺的文人兼学者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送给毛的。郭后来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直到一九七八年去世。他终生是毛的好友，因此那只表极具历史价值。“我说：“刚才大家都忙着抢救，谁也没有注意那只表，你问问张玉凤。”张说：“我看见毛远新走来走去，东摸西摸，一定是他拿了。”我说：“我没有看见，医疗组的人没有谁有胆量拿。”张又急忙回内室。

汪东兴从会议室那边走过来，叫我到旁边的房间内说：“刚才同华总理商量过了，你赶快去想办法，要将主席的遗体保存半个月，准备吊唁和瞻仰遗容。一定要保住，天气太热，不要坏了。”我说：“保存半个月容易做到。”汪说：“你赶快去办，我还在开会，你回来后立刻告诉我。”

我又走到大走廊，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值班的警卫队员都在这里，一中队的教导员坐在地毯上，他对我说：“李院长，你可要准备好，政治局开会，好事摊不到你的头上，出了事都是你的责任，你跑不了。”我想，我跑到哪里去呢？无处可跑。

我早料到了我会被控谋杀毛泽东。

我家五代都做医生。

我的大曾祖李德立，是满清同治年间太医院左堂官，四曾祖李德昌是右堂官。我家相传下来的一段史实，同治皇帝患梅毒，但慈禧太后只准医生按水痘治，大曾祖曾冒险向慈禧说，不能这样治皇上的病，不是水痘。慈禧大怒，将头上的钗子掷下，大曾祖立即摘帽磕头到地。慈禧没有杀他，但摘去顶戴，带罪当差。所以大曾祖死时遗嘱，“不要戴帽入殓，把帽子放在旁边。”并告诫子孙，不要做御医，怕没有好下场。我家仍旧是以医药传家，但代代都遵守着我大曾祖所说不要做御医的遗言，往后没有人再做御医。

我被任为毛的医生后，曾要求上级再考虑。但我无法回绝。我尝试离职好几次，毛都将我召了回去。

只有我的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知道我工作的性质。真正了解我工作的人总觉得我不会有好下场。他们常警告我，做为毛的专任医生，可能会有悲惨结局。

一九六三年有一次我的堂兄对我说：“你在工作上承担的责任太大，毛主席的健康可是全党全国人民都极其关心的大事，万一有哪位中央委员对你的工作不满意，指责你，可就不好办了。”

一九七四年春天，我母亲的干女儿由云南昆明到北京来休假，看到我说：“你的家我可不敢去，更不敢住。在昆明谭甫仁被暗杀后，凡是去过他家的人都被隔离审查，幸亏我没有去。你这里如果发生点事，那可不得了啦！”谭甫仁当时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军区保卫处处长刺杀。

自从一九七二年一月毛发生肺心病心力衰竭后，身体越来越坏，特别是神经系统症状出现以后，我经常想到会

不会发生一次象苏联在史达林死后那样的“医生谋杀事件”？在毛去世前五天，我抽空用了一刻钟的时间，坐车回家一趟。慎娴上班，孩子们上学，只有老保姆在家。我将棉衣棉裤棉大衣打了一个小包带走。我打算，如果发生“医生谋杀事件”，我坐牢，天冷时还有棉衣穿。离开家以前，我到每个房里看了看，心想，再见吧，或许是永别了。正因为心理上早就有了准备，所以现在反而十分镇静。毛生前常爱讲的一句口头禅是“死猪不怕烫”，这时的我在精神上已经是“死猪”了。后来，慎娴告诉我，老保姆同她说，李院长这么急急忙忙地回来又走了，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在北京，干部家的保姆政治嗅觉都很敏感。

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约她到她家立刻面谈。她问我有什么事，这么急。我讲见面后再谈。

刘湘屏是故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未亡人。他们两人都效忠江青的造反派。我想刘湘屏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坐上卫生部部长的位子，是江青保的，因为刘没有相当的资格。

刘在客厅中等我，还没有睡醒的样子。她一见到我就问什么事这么紧张。我说：“毛主席在零点十分去世了……”话还没有说完，刘放声大哭，我赶紧说：“现在要抓紧办事，不能耽误时间。中央指示要将毛主席遗体保存半个月。这事很急，中央在等回话。”她擦着眼睛说：“怎么办呢？”我说：“这事要找中国医学科学院，他们的基础医学研究所的解剖学系和组织学系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刘说：“那就将黄树则和杨纯叫来商量。”那时黄树则为卫生部副部长，杨纯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我说：“他们不知道具体办法，叫他们来了，再找人商量，就耽误时间了。可以叫他们在医学科学院杨的办公室会合，同时通知基础医学研究所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研

究人员共同商量。”刘立即打电话分头通知。我乘车赶到医学科学院。

我到杨纯的办公室时，黄、杨二人已在那里，此外还有另外两个人。杨介绍，一位是张柄常，解剖学副研究员，一位叫徐静，是组织学助理研究员。张神情沉郁，目光呆滞，侧身对窗坐着。

后来我们比较熟悉以后，我问张那天凌晨他的表情为什么那样不自然，那么紧张。张说：“文化大革命以后，三天两头有人自杀被杀。常常半夜三更叫我们解剖化验，检定死亡原因。如果我们检定的死因不符合造反派红卫兵的意思，我们就要被斗，打一顿倒没有什么，弄不好还要戴上反革命或者同情反革命的帽子。前些天半夜被叫去，是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死亡，我们被叫去解剖，检查死因。我被关在公安部里两个多月才放出来。”

我简要说明毛已去世，中央要求保存遗体半个月，以便吊唁及瞻仰。我讲完后，我看到张柄常的神色立即放松了，脸上也不象刚才那样发青，身子也转过来，面向大家了。

张、徐二人认为保存时间短，只要在股动脉内灌注福尔马林防腐，用两公升就可以保存半个月没有问题。黄、杨二人都无异议。於是由张、徐二人立即拿了灌注用具及药品，同我一起到中南海游泳池。这时已经是九月九日凌晨四时半，但中国人民要到好几个小时后才知毛逝世的消息。

我跨进大门，走到会议室外。政治局还在里面开会。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队长对我说：“李院长你可回来了，汪(东兴)主任出来找你好几次了，叶帅也找你。政治局已经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下午四点开始向全国广播。”

我问他：“广播文上对毛主席的病和去世是怎么提法的？”他说：“这里有一张打印的告人民书，你看。”

我急忙拿过来看第一段。等看到“.....在患病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以后，没有再往下看，心想这该是正式的结论了。我紧张焦躁的心情缓和下来。

我推开会议室的门，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都在，外地的也来了几位。汪东兴看到我立即迎上来说：“我们到外面谈。”我们走到隔壁房间，他说：“你看到告人民书没有？”我说：“我刚才拿到一张，只看了第一段。”汪笑了说：“大概你最关心的是这一段。”

跟着他又说：“刚才中央已经做了决定，主席的遗体要永久保存，你要找人商量怎么办。”我吃了一惊，我说：“你原来说只保存半个月，怎么又成了永久保存？而且毛主席是第一个在一九五六年号召火葬的文告上签名的。”汪说：“我同华总理都赞成。”我叹了一口气说：“这是完全办不到的事情，就是钢铁木材也要生锈朽烂，何况人体？怎么能够不腐坏？”我还记得在一九五七年和毛一起前去莫斯科瞻仰列宁和史达林遗体的事。遗体看起来很干瘪。我得知列宁的鼻子和耳朵都腐坏了，只好用蜡代替。史达林的胡须也脱落了。苏联防腐的技术还比中国先进。我不晓得我们如何永久保存毛的遗体。

汪眨着眼说：“你可要考虑大家的感情。”我说：“是有感情问题，可是科学发展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件事。”汪说：“所以才交给你找人商量研究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任何用具与设备，你们提出来，中央给办。”正说的时候，叶剑英走进来，问我的意见。



年事已高的叶剑英元帅当时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他是最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也是人民解放军的创始者之一。叶是对我最关心的政治局委员。

我又讲了一遍不可能永久保存。叶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不这样决定。李院长，你找有关人商量研究。你也找找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师研究一下，做一个蜡像，要做得完全和真的一样，等以后必要的时候可以代用。”我於是放了心。

汪说：“要保密。”

时至走笔今日，我仍不知有多少政治局常委参与决策此事。江青可能根本毫不知情。

我走到毛的住室兼病室，他的遗体就放在这里。室内医疗用具很多，於是将他搬到旁边一间大房间内。这房是空的，很便於工作，因此成为临时太平间。但是室温是摄氏二十四度，我通知服务员将室温调低到十度。服务员说：“这可不行，首长们都在，特别江青同志对温度要求的严。要先告诉他们，同意了再降。”

於是我又回到会议室，说明要降温的理由。他们都讲应该降，会已开完，可以散了。我走回那间临时的太平间，张、徐二人已将两公升福尔马林从股动脉注入体内。我向他们两人说明中央决定改为永久保存。他们都怔住了，说：“这不能办到。而且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我说：“没有法子也得干。可以到医学科学院图书馆查查有没有这方面的书。”

徐静去了图书馆。过了一个多小时，她打电话来说，只查到较长期保存的一些办法，主要是在死亡后四到八小时内灌注福尔马林，用量按体格不同大约十二公升到十六公升，灌到肢体末端摸上去有饱满的感觉就可以了。她又说，实在没有把握，最好请示中央政治局。

我打电话给汪东兴，汪说：“一些具体方法，你们自己研究决定，你再请示一下华总理吧。”毛病重期间，华住在游泳池旁的值班室，这时他还没有走。我向他说明查书的情况。华想了想说：“现在又不能马上开会，就是开会也没有用，大家都不懂。你们就这样做吧，没有别的方法。”

我回到临时太平间，这时又来了基础医学研究所解剖学系的一位姓陈的实习研究员和北京医院病理科的老马，他们共同灌注，注入很慢，直到上午十时多，一共用了二十二公升的福尔马林，用量多是为了保证不腐烂。

结果毛泽东的外形大变，脸肿得象个大球，脖子跟头一样粗，表皮光亮，防腐液从毛孔中渗出，象是出汗，两个耳朵也翘起来，模样古怪，完全不象他本人的样子了。

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走进来看到，都表示十分不满，张玉凤甚至指责说：“你们将主席搞成这个样子，中央能同意吗？”徐静还沉着，张炳常一下子脸色苍白，似乎就要虚脱。我急忙说：“老张不要急，我们再想想法子。”当时我也觉得外形改变太大，可是已灌注进的液体又拿不出来。我又说：“身体四肢肿胀没有关系，可以用衣服遮住，主要是脸和脖子要想办法。”张说：“用按摩方法可以将面部颈部的液体揉到深部和胸内去。”

他们开始用毛巾垫上棉花揉挤。当小陈揉挤面部时，用力稍大些，将右颊表皮擦掉一小块，小陈吓得浑身发抖。老马说：“不要急，可以化妆。”他用棉花棒沾上凡士林和黄色颜料涂上去，果然看不出来了。

他们四个人继续揉挤，直到下午三时，面部肿胀消去不少，两耳外翘也不明显了，但颈部仍然很粗。那些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又来看，他们认为虽然还肿，但可以将

就了。於是將准备好的中山服穿上去，但胸腹肿胀，系不上钮扣，只好将上衣及裤腰的背后中线剪开，才勉强穿好。

这时从外地赶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陆续来向遗体告别行礼。正在穿衣时，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了。许世友是中国最有名的司令之一，年轻时便加入共产党，也是幸存的长征英雄之一。许出身贫农，幼年时因家贫到河南少林寺做过和尚，未受过教育，红军教会他识字。他是个粗犷豪放的人，从未喜欢过江青，但对毛始终忠心不二。

许世友先向毛深深鞠躬三次，毛的衣服还没有穿好，他俯身看了看胸腹皮肤，突然问我：“主席去世前还有多少伽玛？”我听不懂，无法回答。他又说：“人都有二十四伽玛，主席有多少？”我又回答不出。许说：“你这么高明的医生也不懂这个。”到今天，我还是不懂“伽玛”是什么。我懂佛教的朋友跟我说，佛教徒相信人都有二十四个伽玛。他说着，绕遗体走了两圈，自言自语的说：“碰鬼，身上怎么有蓝斑？”又深深三鞠躬，敬了军礼，出去了。

老马又重新化妆，穿好衣服后，在毛遗体盖上鲜红色底，锤子和镰刀相交的共产党党旗。九月十日午夜，也就是毛死后大约二十四小时，我们将毛的遗体便运上救护车。我跟毛的遗体坐在车内。救护车驶出中南海大门，往南路经黑暗又荒凉的北京街道，直到人民大会堂。毛的遗体将供民众瞻仰一个礼拜。

毛病重后的权力紧张斗争现在全集中在“文件争夺战”上。江青和毛远新乘这几天游泳池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每天向张玉凤要毛留下来的文件。江取走两份文件，其中有毛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至九月十二日巡视大江南北时，路经武汉，与济南军区司令杨德志、政委王六生的谈话。杨、王将谈话记录整理送毛审阅，毛一直放在他这

里没有发表，其中特别讲到林彪一伙的问题，以及毛对中央其他人特别是江青四人帮的意见。

从九月十一日到十七日的吊唁瞻仰期间，汪东兴住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因此不知道此事。等到张耀词向汪报告时，汪大发雷霆，赶回中南海游泳池，找张玉凤说：“你只有看管这些文件的责任，无权将文件交给别人。这些文件是党中央的，别人不许拿。”张玉凤哭哭啼啼说：“江青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又是主席夫人，毛远新是主席的联络员，又是主席的侄子，我管不了。”

汪说：“那好，我派人来清点收集文件，你将江青取走的要回来。”张玉凤向江青要文件，江没有给张，张报告了汪，汪告诉了华国锋，华打电话给江，江只好将文件交回，同时大发牢骚说：“主席尸骨未寒，就赶我了。”文件取回后，其中两处有了涂改。

在此同时，我成立了遗体保护组，从全国大的医学院校的解剖、病理和生物化学系等专业调来研究人员二十人参加工作。

我们研究了中国古代保存遗体的办法，但马上发觉行不通。考古学者发掘到的一些古代尸体，虽然历经数百年仍保存良好，却都深埋在地里，从来没有暴露在氧气中。科学家认为浸泡这些尸体的防腐液是汞。这些尸体一经空气接触就开始腐烂了。

另外两个研究员前往英国的蜡像博物馆研究如何复制蜡像。他们这小组决定，至少在蜡像制造技术上，中国早已大大超越了英国。工艺美术学院所制作的毛泽东蜡像栩栩如生，英国蜡像馆里的陈列像看起来就假多了。

我们研读了大量科学刊物，最后决定，唯一保存毛泽东遗体的方法就是改善原已采用的福耳马林灌注法。毛的脑部保持原封不动--我们不想剖开他的头颅--但我们必

须取出内\筒{脏}，也就是心\筒{脏}、肺、胃、肾、肠、肝、胰、膀胱、胆囊和脾\筒{脏}。我们可以把这些内\筒{脏}分罐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中。身体内空腔里则塞满浸泡过福尔马林液的棉花。遗体保护组并可透过插在毛颈部的管子定期灌注福尔马林液。玻璃棺材内则灌满氦气。遗体保护组的工作在吊唁瞻仰期间后随即秘密展开。我们的工作地点便在“五一九工程”内。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中国、苏联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后，毛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在北京秘密建设了地下通道，代号便为“五一九工程”。隧道宽度可以并行并开四辆汽车，沟通人民大会堂、天安门、中南海、林彪死前住地毛家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零五医院大楼地下，直通北京西郊的西山，以备战时中央做为临时指挥部及转移之用，三零五医院大楼下面的隧道中设有小型医院，设备很全，正好用来作为保护遗体之用。

吊唁一周后，九月十七日午夜，将毛的遗体由人民大会堂运到地下医院，华国锋、汪东兴、卫生部正副部长和遗体保护组的数位负责人，在警戒森严的摩托车队护卫之下，分车前往。我伴随毛的遗体经过北京黑黝黝的街道，知道有两个哨兵守卫的毛家湾五一九工程入口。哨兵挥手示意通过，小型汽车便往下开入蜿蜒曲折的地下隧道，直驶向十五分钟车程外的三零五大楼地下的医院。到医院后，便将毛的遗体移入手术室，开始了遗体防腐工作。

数天后，我第一次看见运来的蜡像。它后来被锁在手术室附近的房间里。工艺美术学院教师们技术令人叹为观止。那蜡像诡异的就像毛本人。

只有少数几人知道，泡在福尔马林中的毛遗体和毛蜡像一起在地下医院里收藏了一年。这期间我每个礼拜都去察看两个毛泽东。连看守医院的哨兵都不知道他们在保护

什么。一九七七年位於天安门的纪念堂完工，且准备公开展示毛的遗体时，两个毛泽东--以及那几罐浸泡内脏的福尔马林--一起被转运到纪念堂下的大陵寝裏。

此后，曾参与毛遗体保护工作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组织学助理研究员徐静，便被指派去继续保管毛的遗体，并被任命为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

自此以来，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中国老百姓和外国访客，前来纪念堂瞻仰这具遗体--曾任中国共产党主席四十年左右的人。至於蜡像，则作为日后一旦遗体腐败毁坏的代替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毛死后一周多，那天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会。我们从下午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东侧礼台。天气很热，在太阳下站立，真是挥汗如雨。自从共产党解放中国之后，毛的肖像便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两侧则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革命口号。

下午三点整，全中国停摆，全中国各地的工厂和火车鸣汽笛三分钟以示哀悼。全国人民继之默哀三分钟。然后全国各地的工作单位自行哀悼。大会上由王洪文宣布全国致悼，华国锋致悼词。

我看着下面的人海，不断冒汗。几个月来的长期疲乏突然淹没了我。华国锋开始致颂文时，我晃了晃，用尽全力才没昏倒。自从毛在五月中旬发生第一次心肌梗塞以后，已经有四个月过的是衣不解带的日夜值班生活。每天睡眠不足四小时。我原本一百七十五磅的体重也骤减至一百二十磅。值班时整天昏昏沉沉。我只知道等一切都结束时，我就可以好好睡一觉。也许我还可以回到我家人身边。

下午五时半我才回到中南海。回来以后，就睡下了。刚刚入睡，汪东兴又来了电话，通知我，九月二十二日上

午十时在人民大会堂东厅，由医疗组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报告毛的患病经过、治疗情况和死亡原因。医疗组的医生全体参加，由我报告。汪说：“这次会很重要，你要准备好。”

我很清楚这次会议是万分重要的。毛刚去世后发表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是只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参加通过的，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当时还没有赶到。二十二日的会议则是全体委员都参加，如果他们通过了我的报告，就说明官方正式同意毛的死亡属于正常的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而医疗组也尽到责任，所以这次会议关系着医疗人员的今后命运。

我当即召集了医疗组的医生们，说明了汪的通知。大家初步讨论后，决定由我执笔写出再讨论。我动手写报告，十八日一夜未睡，十九日中午写完。那份报告有五十余页。我详细交代从一九七二年一月心力衰竭抢救过来，逐渐出现神经系统症状，直至发生三次心肌梗塞而病故的过程，包括检查与治疗 and 死亡原因。后经大家讨论，反复修改了几次，到最后定稿时，已是二十日上午。

二十日下午我带着这份报告去见汪东兴。汪说他不看了，要我找华国锋看。我即去见了华。

华看了后说写得很详细，但医学名词太多，政治局的同志们不懂，还是要明确说明是什么原因才死亡的，要改改。我拿回来同大家说明华的意见，大家认为，医学名词要保留不动，因为这些名词都有严格的科学涵义，不能口语化。在报告时，可以解释说明这些名词，至于死亡原因，因为身体内的主要内脏都处于衰竭状态，不能说是由于单一原因死亡，不过可以强调直接死亡原因是中心性呼吸衰竭。

我将报告又做了些修改，二十一日我再次见华，说明了大家的意见。华同意了这份报告稿，又嘱咐说：“在会议上可能有的政治局同志提出问题，要尽可能详细回答，要让人听得懂。”

二十二日上午九时半，张耀词同我们到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政治局委员们已经坐在沙发上围成一个大圆圈。沙发后面放了一圈扶手椅。我正好坐在华国锋与叶剑英的背后。

当时任北京军区司令的陈锡联正站着大声说：“我干不了，没有办法干下去了，我请求解除我的职务。”华说：“锡联同志不要着急，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以后再商量，现在先听毛主席的医疗组报告。毛主席病重以后，这些同志连续昼夜值班抢救，已经四个月了。现在让医疗组组长李志绥院长报告病亡经过。”

这时叶剑英回头对我说：“你语调声音要大一点，好几位耳朵不大好。”我开始读我的报告，当中有几位委员插话问医学术语及名词，我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说明解释。在讲到六月下旬病危时，坐在斜对面的许世友突然站起来，走到我面前说：“主席身体上为什么有青黑斑？这是什么原因？”

我说：“主席病危末期，呼吸困难，全身严重缺氧，所以才有这些现象。”许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死人见的多了，没有见过这个样子的。九月九日下午我去见主席遗体，看到这些青黑斑，我就问你主席生前有多少伽玛，现在又有多少。人都有二十四个伽玛，主席有多少，你完全回答不出。”他接着又讲：“主席是被毒药毒死的，毒死的才有青黑斑，要审医生护士，是谁下的毒。”

我说：“用药都是医生写医嘱，两个值班护士核对，再由值班医生复查后才用，而且每种都由医疗组讨论后才



用，药品都是为中央首长专用的保健药房准备的，各种药都经过药物鉴定，取来时都加过密封。”许说：“难道不会上下勾结，串通一气，用毒药暗害？这非彻底查清楚不可。”

一下子全场都静下来。许站在我面前，两手插腰。他的话是对我说，可是头转过去看定了张春桥。张春桥左手托着下颚，两眼看着地上。江青穿一套黑色套服，坐在沙发上两眼直看着许。华国锋紧张地挺起了身子。汪东兴一直在翻看文件，似乎周围没有发生什么事。王洪文左顾右盼，满脸通红。

叶剑英和当时任沈阳军区司令的李德生回过头来低声问我：“主席身上的青黑斑是怎么回事？”我说：“主席左肺有三个肺大泡，两肺都有肺炎，缺氧十分严重，他是凌晨零时十分去世的，许世友同志看遗体是下午四时，当中已相隔了十六个小时，是出现尸斑。人死后一般四小时后就开始出现。”

这时江青站起来说：“许世友同志，主席的医疗组辛苦了几个月了，你让他们把报告说完。”王洪文也站起来说：“主席病危起，国锋、春桥、东兴和我就一直轮流值班……”许将上衣的两个袖子捋到肘上，走到江青面前，右掌猛地一拍茶桌，将茶杯都震翻到地毯上。许大声吼道：“政治局会议不许政治局委员发言提问题，你们搞的什么鬼？”华国锋立即说：“世友同志有话慢慢讲。”然后转过头来对我说：“李院长，你们先回去，汇报等以后再说。”这个会后来如何结束我不知道。医疗组在回去中南海的路上都垂头丧气，闷声不响。

回中南海后，张耀词警告我说：“汪主任打招呼，叫我告诉你，要同大家讲一下，不要议论政治局的事，免得

惹麻烦，等候政治局决定。”吃午饭的时候，我将汪的话告诉大家后，大家都愁眉苦脸，就更加吃不下饭了。

对我来说，这决非意外，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说我们下毒的是许世友，而为我们辩护的倒是江青。自毛病危以来，指责我及医疗组最多的是江青。不过这也很清楚，既然王洪文和张春桥参加了值班，不要说下毒，就是医疗上稍有失误，他们也难於推脱责任。江与王和张是一伙的，目前政权大局未定，江青势必要坚持医疗上没有问题。这以后，上面没有再让我出席政治局会议。

我昼夜不安的过了一个星期，到十月一日国庆节前，汪东兴让大家分别回到原来工作的医院。於是医疗组的人都奔走相告，但并未结束，自然也不可能结束。大局在动荡不安，毛泽东去世以后，共产党内的权力角逐正加紧进行。

毛死前两个月，也就是七月时，汪东兴曾跟我透露要逮捕江青的计划。虽然汪对江表面上漠不关心，而华国锋也一直是客客气气的，但我知道他两人随时会逮捕江青四人帮。江青即使一副毛的权力即将在握的笃定神态，她心中一定是忐忑不安。

只要政局未定，医疗组的命运也就难测，毛的死因随时可能成为互相指控的把柄。

对我而言，即使权力斗争暂时落幕，江青四人帮被捕，但谁说得准另一场政治斗争又会在何时登场？在中南海旁观二十七年后，我早就了悟了人生变换莫测的道理。

我做了毛泽东二十二年的专任医生，历经他的病危和死亡，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安全。

李志绥著《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 第一篇

1949—1957

我二十九岁那年正在澳大利亚雪梨做船医。那时我从报纸上得知，共产党未费一枪一弹便和平解放我的故乡，北京。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当时仍叫“北平”的市民夹道欢迎他们的“解放”。现在共党领导阶层准备将北平当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而北平也将恢复其原本的名称--北京。国共内战仍未落幕，但大家都确定共产党会得到最终的胜利。

北京是我的老家，我十三岁以前都住在我祖父所兴建的那所传统四合院里。我老家富裕，属上层阶级。高墙和瓦顶平方错落隔成三个大院，院中种满花草，总共有三十多个房间。它坐落在紫禁城的南方--也就是琉璃厂一带。琉璃厂曾在明朝专门为皇城制造金色的琉璃瓦。

我曾祖父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他的画像挂在家中单独一间房内，每年李氏子弟都会定期聚在此，向他祭拜。他在前厅开的中医诊所仍然保留了下来。我曾祖父富而有礼好施，对穷人十分仁慈。他在我家旁边另外开了一个药铺“沛芝堂”，提供免费的医疗诊断和药品。我先祖在琉璃厂一带和北京许多地方以慷慨而闻名，我自小便相信穷人有他们的苦衷，应该善待他们。

但我的富裕出身仍将我与穷人隔开了来。北京穷人很多，我母亲不准我出大门和“野孩子”一起玩耍。自小起，家里便期待我成为医生，将医业家传发扬光大。我也以先祖为傲，并立志向上学医。

我叔父毕业于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也是个乐善好施的良医。河南在流行斑疹伤寒时，他自愿前去行医，结果染病，不到三十岁便英年早逝，他遗孀和两个儿子一直和我

们住在一起。跟我们同住的还有我同父异母的大哥。我父亲在第一任太太去世后，便和我母亲成婚。

我父亲是唯一未承继家传衣钵的人。一九二零年他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留下我母亲和我前往法国留学，一去七年有余。周恩来是他团里的同学，两人成了莫逆之交。周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我父亲却加入了国民党，成为蒋介石手下的高级官员。

我父亲回国时，带回来一位法国太太跟我们一起住。这事使全家族蒙羞。我母亲是个传统中国女人，单纯而不识字，裹过小脚，天性善良慷慨。她最大的心愿便是相夫教子。那时中国男人可以合法拥有数个太太；这是富豪子弟之间的风尚。但李氏家族从来没有这种先例。

虽然如此，我父亲的法国太太温和守礼，教育程度很高，在北京大学里教法文。

她对我特别好，常拿糖果逗我吃。但我可以从我母亲时常爆发的愤怒和家法杖责中感到她对我父亲的不满。这也是等我长大成人后才逐渐懂的。

我童年时便憎恶我父亲。我们很少见上一面，他带给我的大都是负面的影响。族训教导我要牺牲奉献和服务人群，但我父亲渴望权势。我先祖注重道德修养，我父亲却不走正途，他和他法国姨太太回国后不久，便去南京投靠蒋介石政权。几年后法国姨太太去世了，我父亲也未曾再娶，转眼成了纨绔子弟。我对他追逐声色犬马的行径感到羞耻，决心成为悬壶济世的良医。我父亲与国民党的关系使我厌恶国民党，并在早年就接受了共产党。也许我对父亲的憎恶，也是我后来对毛泽东纵欲生活失望的原因之一。

我像我那一代大部分的中国青年一样，怀着满腔爱国热血，以中国四千年来的文字、诗词、艺术等丰富的历史

遗产为荣。我对近百年来中国的衰弱感到不安。小学时代，我读到一八三九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以及法国、日本和俄国相继入侵之下，清朝的凋零和中国的分裂残败，外国租借地在许多城市中散布，自外于中国法律。我从小便知道上海同盟路往河滨公园的入口上有一块臭名远播的标示--“华人与狗不许入内”--这使我非常愤怒。我跟许多人都把中国的衰弱归罪于外国势力--也就是所谓的“帝国主义”。

一九三一年，我十一岁时，日本侵占东北，并建立伪满州国傀儡政府。我母亲和我逃离北京，南往苏州。随后我在美国卫理公会设立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就读。我在那里接受的是全盘美式的英语教育。学校宗教气氛浓厚。一九三五年，时仅十五岁的我受洗为基督徒。

我那时也初步接触共产主义。我同父异母的大哥一九三五年在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读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对他这种富裕背景的人来说，这很不寻常，但他全是凭一股救国情操和对贫民苦痛的关怀。我父亲要送他到法国去深造，他不肯去。

我大哥每周末都来苏州探访我们。他教导我资本主义的邪恶和其对劳工阶级的压迫，并介绍共产党平等民享的信念。他指斥国民党的腐败和不愿与日本满洲政权斗争的懦弱。他让我相信共产党全力在对抗日寇。

我崇拜我大哥，向往他口中的乌托邦世界--一个强大富庶、民有民治民享的中国。我念了他给我的几本共产党书籍。大哥说只有共产主义能救中国--而朱德和毛泽东则是民族的救星。我自此视朱毛为中国的弥赛亚。后来我得知我最崇拜的作家鲁迅也支持共产党时，更加深了我的信念。

大约在此时，就是一九三六年，我母亲的干女儿跟我介绍她一位中学同学，她叫吴慎娴。我们几乎是一见钟情。慎娴也是出身富裕的基督徒。整整十年后我们才结婚。那期间，即使战争迫使我们两家越来越往内地避乱，我们都会尽量想法子待在同一个地方。

日本人往南深入后，我和我母亲逃往武汉。一九三七年我们抵达四川首府重庆。

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将国民党首都迁往重庆。一九三五年秋天，红军在蒋介石军团的重重围剿下弃守江西山区，完成长征，并在陕西延安建立新基地。我大哥和一位堂兄也去了。

一九三九年，我在四川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就读，此校于一世纪前由加拿大教会所创办。日本占领北京后，许多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教师和学生逃往成都。一九四一年华西协和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完成战时并校。两所大学都属于洛克菲勒基金会。校中大部分的教授为美国人，我用的是英文课本，接受的是现代西方训练。我毕业时有两张文凭--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和纽约州立大学毕业证书。

慎娴原本在重庆复旦大学念社会学，后转往成都一所美国基督教学校就读，即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正好完成外科实习，在南京中央医院工作。院里设备十分现代化，医生们都极为尽职。我的志愿是成为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和慎娴结婚，娴那时任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图书馆员。

国共内战随即爆发。通货膨胀闹得人心惶惶。慎娴的薪资比一般人高，一月相当于一百五十美元，且以英镑给付。相较之下我的相当于二十五美元的月薪便微不足道了，而且我拿的是中国纸币。我每一领薪就马上拿去黑市换成美金或银币。百姓推着一车车的钱上街。米价狂飙，

太平时代无论如何也不会偷钱的人，被迫纷纷闯入米店抢米。

在这片混乱中，我同学黄梦花正在香港做医生，他建议我去生活较安定的香港找他。香港的医生收入颇丰，娴鼓励我去。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我离开南京前往香港。

但我未在香港久留，我转到澳洲东方公司，在雪梨行医，时而在往返澳洲和纽西兰的船上做船医。我收入稳定，娴也搬到香港，租了房子，跟英国人共事。

因为澳洲当时施行“白澳政策”，我不要娴前来澳洲和我同住。身为中国人，我可以在澳洲短期居留，行医挣钱，但我永远无法成为澳洲公民。我的骄傲和自尊使我憎恶这个种族政策。我住在雪梨的一个小公寓里。我认识的澳洲人都觉得中国没有前景。我变得更形沮丧，我留在那只是为了挣钱。但我也也不想住在英国的殖民地--香港。我的骄傲不容许我成为外国国王统治下，没有选举权的子民。

因此在共产党解放北京时，我十分振奋。我确定共产党的胜利将意味着外国租借地和帝国侵略的结束，中国终于能再在世界上扬眉吐气。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刚收到了母亲从北平来的信，其中有我大哥的一封信。他抗日战争时去了延安，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共产党接收北平后，他随着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进了北平。他很高兴回了老家，并希望我回去。

信中写道，现在很缺少合格的医生，回来后肯定有符合我的工作，而且全家也团聚了。看完信后，我心情很矛盾！目前我的工资相当高，我们的生活很舒适，娴计划来澳洲和我团聚。我可以将母亲接出来，或者每月寄钱回去都没有问题。



但我也清楚，在澳洲我无法完成做神经外科医生的志愿。中国人在澳洲没有发展机会，而且就算我钱挣的再多，澳洲仍是个异邦，离开中国，我只是象没有根的浮萍一般飘零。我的爱国赤诚，使我日夜深受煎熬。

复活节这天是个晴朗的好天气，昨天与杨先生约好一同去参加复活节游行，然后到他家过节。杨先生是土生土长华侨，但仍旧保留着中国人的习惯。夫妻二人带着一儿二女在伊莉莎白街底开个杂货店。

我精神恍惚走到杨家，杨看出我心事重重。我将大哥来信的事告诉了他，我没有提“白澳”的事，只是说我下不了决心。他收起了笑容说：“这可是件大事，要好好想想。”我说：“你的看法呢？”他耸耸肩说：“我同你不一样，我全家都在这里。那边给我的待遇再高，我也不会去。澳洲虽然实行白澳政策，可是全国人口太少，谋生容易。你应该问问你大哥，是什么事，有多少工资，可以两边比比看。”

他的话更激发了我的爱国情操，我并不在乎挣多少钱。如果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真能由此富强起来，个人的生活暂时下降，也是值得。我离开杨家当天就给慎娴写了封信，让她写信去问我的工作如何安排。

五月上旬又收到慎娴来信，其中附有大哥的信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的一封短信。傅连璋在中国医学界是知名人物，他大概是长征中唯一一位受过西方训练的基督教医生。他在一九三四年长征前，治好了毛主席的疟疾。他在延安的共产党战时司令部任共产党领导阶级的医生。傅的信写得很诚恳，欢迎我回去，工作安排没有问题，并且希望我转告别的医生，愿意回去的，一律欢迎。但他只字未提薪水的数目和我工作的性质。

我看到信真是受宠若惊了，一位部长肯写信给我，说明共产党爱惜人才，延揽人才建设国家的决心。我抱着感恩知遇的心情，决心回去。

在我动身的前夕，杨请我到 he 家里，同时还约了两位在中国城开业的华侨医生。

他们祝我一路平安，并且要我以后给他们写信，又说：“如果工作不合适，还可以再回来。”

谁知这一别就是三十六年。一九八五年我应澳洲医学会邀请到澳洲访问时，曾顺道去伊莉莎白街街底找杨先生一家。但杂货店不见了，我也没找到我的朋友。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旬我回到香港英皇道家里与慎娴团聚。这里很热闹，上海战事已结束，天津与香港之间已经有船通航，香港拥来了大批由内地逃来的人，可是又有不少人离开香港返回内地。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我先去看了黄梦花，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十分惋惜，说：“我们在一起在这里干多好啊。”我向他提了傅连璋的信后，他沉默了好久，然后说：“也好，你先回去看看，如果好的话，你写信来，我也回去。”后来我没有写信叫他回来。

走前我们又去看慎娴复旦大学的一位老师张令铎先生，他正准备去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时共产党召集了无党无派的各路精英，成立了这个会议。我们当时很天真，以为这能给杰出的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演员和非共产党的“民主派人士”政治实权和发言机会。新共产党政府会运用我们的精力、教育和才能来改造中国。

张令铎十分高兴地说：“中国现在有了希望，应该回去参加建设。”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办第一次大会，会中表决通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中央政府领导成

员名单，毛泽东将成为新共和国的主席，副主席为刘少奇和宋庆龄等人。但政治协商会议最后演变成一个笑话--共产党接管了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所有政务。政治协商会议只是个花瓶而已--摆着好看，但没啥用处，凡是斗胆不识相的向共产党进言的委员皆被打成右派，送去改造。张老师便是这些天真的人之一。

张于一九五七年被批斗成右派，下放劳动改造。一九七九年给他平反了冤案，可是这时他已是龙钟老人，两眼失明，自己都不能照顾自己的生活了。

一开始，在政治迫害还未展开前，我一直觉得共产党统治中国是再恰当不过的事。我崇拜共产党，将它认为新中国的希望所在。我在澳洲像个瞎子，前途茫茫。回祖国以后，我将对新中国贡献我的才能。因此每次当我隐约见到共产党黑暗面的时候，我总认为那些是无伤大雅的个别现象，而将他们抛诸脑后。

在香港跟我们合住的黄先生将我介绍给一位姓严的先生，在见面前黄对我讲：“严先生负责挑选优秀知识分子去北平。经过他介绍，回到北平可以到医学院教书，工资也会高。你最好送他点礼品。他没有手表，你买块瑞士表送他就可以。而且凡是由他介绍的，全部路费都由他们承担，到北平后还招待食宿。这样算下来，你可以省不少钱。”

黄这番话自然是我打算的好意，想让我用点小礼换来不少好处。但我痛恨贿赂，中国几千年的官场不就是贪污腐化吗？我天真的以为，共产党绝不会像国民党那样贪污腐败。我对黄说：“我认为共产党是廉洁奉公的。我靠本事吃饭，不做这样的事。”

以后我再没有同这位严先生来往。他后来在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而且是某一民主党派的负责人

之一。数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部的人，先派到香港，后又派到民主党派工作。

后来直到一九五六年，我做了毛的医生，在一次闲谈中，我告诉毛我这段经历，和我对此人此事的看法。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毛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真是书呆子，应该懂得人情世故，水至清则无鱼，这有甚奇怪的。我戴的这手表就是重庆谈判时，郭沫若送我的。”

一九四九年的香港极为动荡不安。我年轻天真，满怀理想，我将回到故土，并在北京首屈一指的医院中任职。我将承袭我家医业传统，并遵照医学学位里的誓言，不论贫富一律尽力救治。我会成为伟大的神经外科专家。医学将是我对建立富强新中国的贡献，在那个新中国里，人人平等，贪官污吏绝迹。

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我与慎嫻由香港乘船经天津回到北平。我一九三二年离开北平，十七年后回来了，亲戚们见到我都说：“你可是落叶归根了。”我真的是归根了吗？

### 注释：

一九零四年美国六所教会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之赞助始于一九一四年。上海复旦大学于日本侵华期间迁往重庆。

据薄一波指出，一九四九年时，中国只有六千名“高级”知识分子。

我看到的北京是灰茫茫一片阴沉败落的景象，完全失去了我儿时记忆中的光彩。

历经八年抗战和四年国共内战后，北京残败不堪，城墙倾塌多处。北京市民似乎也染上北京的阴沉，人们凡是共产党干部都是一身快洗成白色的土黄或灰色的干部服，一律穿土布鞋，老百姓则是蓝布大褂，发型全是一个样式——男人全是极短的平头，女人则是削直的短发。象我这样西服革履，真是绝无仅有，我的长头发也很显眼。慎娴烫过的头发，西服套服，半高跟皮鞋，在短发列宁服的女干部和布旗袍的女市民间，更是惹人注目。

我急忙向我大哥要了两套他的旧军服，慎娴赶做了两套布列宁服，都买了布鞋，剪短了头发。分别了十三年的老母亲头发全白了，人瘦得大约不足八十磅，见到我就说：“你不走了吧？”我说：“回来了，自然不走了。”

但北京的气氛却与它残旧的外观大不相同，整个城市似乎欢欣鼓舞，北京解放了，全体市民诚心欢迎共产党新政权的到来，只有几个觉得我们回国是傻瓜的亲友不做此想。

星期日大哥大嫂回到琉璃厂家里来，互相谈了这些年的情况，然后大哥说：“你的工作傅连璋副部长已经有了安排。”于是星期一上午我到了弓弦胡同二号。这是很大的宅子，有六个大的庭院，满清时是个王府，抗日战争胜利后成了杜聿明的私宅，后来便成了卫生部用地。傅连璋在最后一个院子的北房内见我。他是一位削瘦修长的老人，前额宽大，两眼有神，半躺在一个睡椅上。他当年是五十五岁，因此在二十九岁的我眼中，自然把他看成一个老人。

他问我的学历和经历，然后说：“我有肺结核多年了，不能多谈。你的工作已经派好了，明天上午你去椅子胡同军直卫生处报到就成。”

在新人民政府成立之前，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执行管辖，卫生处直属其下。

第二天我到了军直卫生处后，接见我的任玉洪说：“非常欢迎，你大哥是我的老上级了，现在缺少医生。”他又说：“傅部长交代了，同我们一样，都是供给制，没有工资，因为你是高级医生，所以有中灶待遇，衣服鞋子都会发给你，零用钱也比一般工作人员高些，每月有五十斤小米折钱零用。”

当时的供给制待遇分为四种，大灶是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中灶是中级干部，小灶是高级干部，特灶是中央首长的伙食标准。不久以后我才明白，我所以得到所谓供给制，正是将我看做自愿参加“革命”的人。

我听了以后，心里很紧张。我经济负担很重，除了慎嫔外，我得奉养母亲、一个婢、一个舅母和表妹，以及我的岳父母。

我心里算了一下，我们从香港带回些美元和黄金，没有工资可以支持一年。一年以后怎么办呢？我正在沉吟的时候，任给我介绍旁边的一位说：“这是雷同志。”他对雷说：“老雷，你给开个介绍信。”雷介绍我到香山劳动大学香山门诊部。

任接着说：“李大夫你回去准备一下，下星期一这里有卡车去香山，老雷陪你一同去。”我觉得很奇怪，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似乎一切都安排妥当，没有商量余地，再来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劳动大学这词儿。这样我到底是不是到学校工作？不知道有没有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如果只是门诊部，那么范围就太小了。

至于慎娴的工作就难了。她不是医生，卫生部无法安排工作，只好暂时先到通县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的幼儿园工作。我心里很不高兴，我们在香港时，并没有说她的工作不好安排，否则我们会另外考虑回国的事，因为经过南京的英国文化委员会介绍，香港的英国文化委员会邀她去工作。我又想到，在香港时真应该送严先生一块表，这样就会对她的工作有适当的安排了。

我大哥安慰我说：“你刚来，不懂。在我们这里，只能工作挑人，不能人挑工作，这叫服从组织分配。工资的问题，目前先这样，好在你还有点钱，以后会解决。”他也没再多说什么。

劳动大学门诊部在香山脚下。香山位于北京西北数里外，曾是清朝帝王御猎场所，山坡上有数座乾隆时期兴建的游宫。香山也以两座古佛寺而远近闻名--卧佛寺和碧云寺。每到秋天，白枝松树和长满红叶的黄栌树将整个山坡编织成绚烂的锦云。

劳动大学占了香山大部分，人口众多，热闹纷嚷。

行政处处长伍云甫和副处长罗道让两人都说欢迎我来门诊部工作，并说星期六晚开一个欢迎会，将我介绍给行政处的全体人员。他们让行政科席科长给我办报到手续，发了服装和被褥，又给我一枚圆形珐琅证章，当中是个五角星，中央有“七一”两个字，背后刻有号码。席说：“这个不要丢掉，这是出入证章。”又向我补充说：“不要对与这事无关的人讲山上的事。”我听了真有如坠五里雾中。

宿舍位于林木密布的半山腰。但我房间离香山上举目可见的游宫很远，房子是个简陋的小农舍，对我这个出身富裕的城市人来说，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种房舍。泥土铺地，房顶漏水，头上只有一个电灯泡做照明，房里唯一的



家具是一张床--架在两条木凳上的一块木板--没有床垫或是床单。没有水，外面有个茅坑做厕所。因为我住处于简陋，慎娴不能来与我同住，我每周周末回北京老家时才得以和慎娴团聚--还有洗澡。

我们照中国农村习惯一天只用两餐--早上十点还有下午四点。农民很少吃肉，因为我身分是医生，不但可以自己住一个房间，而且几乎每天都有肉吃。餐厅和宿舍一样简陋，但食物味道不错，厨房也干净。

门诊部更是令我大吃一惊。泥土地板的农舍，设备十分简陋，除去几支体温表和两个旧的血压计以外，就没有别的检查器具了。唯一的医疗药品便是阿斯匹灵、喉痛糖浆和消炎药。看来今后给人看病只能靠听诊器和自己的经验，对于稍微复杂的一些病，怎么办呢？

门诊部有两个主任，都是三十岁左右。其他医务人员有二十几人，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男女，来自农村，受过短期的医务训练。他们对我的到来表示非常高兴。

他们只会像包扎小伤口这种急救，知道阿斯匹灵可治感冒，但对诊疗则一窍不通。

有的人说：“早就听说你要来了。我们真希望有你这样一位医生，可以给我们上课，讲讲医学知识，我们学的太少了。”我吓呆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好呢？

那星期日我回到家里，正好我中学时一位好朋友陈来看我。我们已经有十一年没有见面。陈是老共产党员，在青年团中央工作。他问我这些年的经历，又问我现在的情况。我向他讲：“我现在到了劳动大学门诊部工作。这个大学很大，而且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象这样的学校很少见。”

他听过以后，神情突然严肃起来。他说：“我这次来看你，事先请求过领导。领导要我告诉你一些需要注意的

事，免得你刚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了解情况，糊里糊涂发生错误。”我听了倒真糊涂了。我说：“我是医生，给人看病，仔细尽责，有什么错误可以发生？”陈说：“你不要急，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我说，“我告诉你了，在劳动大学。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每天看看门诊，没有什么大病，实在荒废时间。”

他哈哈大笑说：“你看那里象个大学吗？香山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各个领导机关的所在地，你这个门诊部就是为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服务的。北京解放不久，为了安全和保密，中央机关暂时在这里，难道没有人告诉你，要保密吗？”他又庄重起来说：“时间长了你自然会知道许多情况，不要小看这个门诊部，设备不好，病人不多，但是这地方重要，接触的人也重要，这就是我们的领导同意我与你谈谈心的原因。”

当时我不敢问他，他口中所指的领导同志是谁。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香山这一地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及所属中央机构的所在地。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书记中，周恩来与任弼时经常住在城里，朱德住在香山附近的玉泉山，这里也是过去清皇室的园林区。毛泽东及刘少奇住在香山。周围的卧佛寺、碧云寺及西山一带有名的寺院称为“八大处”，都住满了党中央机关和部队。

香山门诊部的上级领导机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厅主任是杨尚昆。除中央直属机关管理处，主管所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后勤供应以外，其余各处主要是为五大书记的办公、会议、警卫和料理生活而服务，但中心是围绕毛而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是党政机构里最神秘的部门，连其成员都不清楚它的组织机构和功能，只有高级干部或资深人员才对其略知一二。

一九五零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分成八大部门。行政处处长伍云甫、副处长罗道让主要负责党领导阶层的食衣住行各方面后勤供应。警卫处处长汪东兴(他那时也在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手下做局长)负责党最高领导阶层的安全和保健工作。汪在保护所有最高领导同志之外，还身兼毛泽东的卫士长。汪在保健工作方面时常与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互相牵制冲突。

机要秘书室主任为叶子龙。他负责安排所有的高层党干部会议、会议记录，以及政府党务公文的收发。此外，他还兼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兼管毛的家务、及负责处理毛的礼品，并给其他四大书记选派机要秘书。

政治秘书处则负责实际的公文书写工作及向最高干部通知要务。一九四九年处长为陈伯达，他也兼任毛的政治秘书。毛也有其他的政治秘书--毛的妻子江青、胡乔木和田家英。其他书记也有专属的政治秘书。

中央机要处(处长李质忠)和机要交通处(处长王凯)是办公厅下最机密的二个部门。中央机要处负责中共中央的机要联络，需要大批收发密电、译电的人员，译电没有译电本，全凭在河北张家口的机要学校受训死背，密码又常常更换，所以译电员或机要员都必须年轻，年纪稍大，特别在结婚有了小孩子后，记忆力下降，就不适合这个工作了。

机要交通处则负责全国党军领导的机密文件往返。

档案处处长曾三负责保存共产党的党史资料。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管理处处长邓典桃则负责党各部门的后勤供应。

在罗道让和傅连璋的联合管辖下，香山门诊部负责中央办公厅内所有干部的保健工作。因此我的病人就包括了这些高低阶层干部和其家属。

我自然也认识了其他中共中央机关的大小干部，但平时交往上没有与上述这些人那么密切。我对这些人都抱着崇敬的心情。我认为他们为了中国的富强康乐，为了建立新中国，从青少年时代就弃家参加了共产党，历经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是真正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此外，我对于一般的男女干部与工作人员也抱着极大的敬佩态度，因为这些人也都是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在默默无闻中奋力工作着。

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与事。中国有了希望，希望就在这些人身上。

在我成为中国革命核心的新成员后，我得以在建国仪式中，坐在前排，亲身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成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这天清晨五时，大家起床。这是个晴天，凌晨很冷，都穿上了棉大衣，吃过早饭以后，由香山乘卡车出发，不到七时到了天安门广场。

我们抵达时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群。汹涌的人潮举着各式各样的彩旗。在冷冽的秋风中，飘扬的彩旗一扫北京的阴沉。人群欢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唱着革命歌曲，场面既宏大，又很激励人心。

十时正，毛泽东等领导人都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全场欢声雷动。自我大哥第一次告诉我毛泽东是中国的救星起，他便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虽然我在香山工作，却从来没有见过毛。他当年只不过五十六岁，高大壮硕的身体，脸色红润，前额宽大，头发漆黑浓密，声音洪亮，手势有力。毛穿了一身黄呢中山服（后来这样式被称为“毛服”），戴一顶黄呢工人帽，站在一群代表联合阵线的非共产党政治人物之间。高雅的宋庆龄也在场。

虽是众目所瞩的人，毛的态度却从容而又庄严，没有一丝做作或倨傲。我也看过意气风发时的蒋介石好几次，但他仪态总是非常高傲，要所有的人俯首称臣，从未让人感到易于亲近。

毛却很有群众魅力。虽然毛湖南口音很重，但语音清晰，语调很富感染力。“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大声宣布。随即广场上人群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我的两眼充满了眼泪，无限的民族自豪感涌上心头。中国、中国人受外人欺凌侵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在我的心目中，毛主席是一位传奇式的“革命领导人”，是一位历史创造者。我离他很近，但是又觉得很远，因为我只不过是个普通医生，当时我可万万想不到以后成了他二十二年的保健医生和医疗组组长。他临终时，我也在他的病榻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前往莫斯科访问数月，与苏联的史达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一九五零年二月回国后，毛自香山迁入北京中南海（即为旧紫禁城的游园地）。中共中央办公厅随之迁入。其他中共中央机关也相继搬进城内。这时行政处的主要人员迁入中南海，称为中南海行政处，香山还留下小部分人，称为香山行政处，看守香山这一地区，以备毛等人或许有时小住。门诊部也因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进入中南海，在警卫处下成立保健科，专门负责毛等五位书记的保健医疗；香山还留下门诊部的大部分人，称为香山门诊部。我留在香山。

如果没有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或许我就不会离开香山，那么以后的三十八年势必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一九五零年夏秋的雨季，蚊子很多。中南海行政处下属，专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服务的服务科，有一名服务员住在中南海瀛台，染上流行性大脑炎。中南海门诊部的主任误诊为感冒，没有进行相应的急救治疗而死亡。周恩来，杨尚昆震惊万分，因为瀛台距离毛的住处丰泽园、颐年堂及菊香书屋很近，他们深恐毛受到蚊子叮咬而染上流行性大脑炎。

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中南海门诊部，撤销了门诊部主任的工作，立即将香山门诊部迁进中南海，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于是我随同门诊部进了中南海，开始了我生活上又一大转折。

门诊部设在南海流水音及沿东大墙一带的院落。这地方原本是乾隆皇帝晚年游乐与休息的地方，乾隆御笔的木制对联、匾额仍然挂着，但年久失修，油漆彩绘已经剥落。一九五三年大修整以前，没有自来水，都用南海边上的机井。门诊部就用这片房屋的一部分做为宿舍，一部分设立门诊室、手术室及病房。虽然仍是因陋就简，但比在香山时要完备些。

一九五五年以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城内的房子还没有修好，暂时设在中海居仁堂及附近。军委的彭德怀、中宣部的陆定一、张际春、何凯丰，以及陈伯达、胡乔木和任弼时的未亡人陈琼英，都住在居仁堂以东的永福堂等以福为名的八个四合院中。

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中，只有我受过正规训练，所以就让我负责。我分配到一间小宿舍。后来我搬到比较大的南船坞宿舍去，慎嫔和我那还在襁褓中的儿子李重便来跟我同住。

中南海警卫森严。从一处到另一处都有哨兵沿路站哨和检查通行证。我在毛住处附近的中南海门诊部工作，佩戴着乙种通行证，只能在门诊部和我住的宿舍一带活动。慎娴虽然也分到乙种通行证，但行动自由小得多。后来我调到毛处工作，才换成甲种通行证。

在中南海门诊室内，我照顾起许多领导干部的健康。那时大小干部在城内没有宿舍，同他们的家属都在中南海内。因为花了八年时间抗战和四年国共内战，他们大都是结婚不久，刚刚有了小孩，对孩子很宝贵，有一点小病都希望去看，而且要求我看。这样就造成我日夜忙碌，很少休息了。

我申请入党，但我的政治历史很有问题。换言之，我的“成分”不好。我的父亲在国民党时，做过官，是所谓的官僚。我的岳父是地主，那时全国土地改革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我岳父被打成“人民公敌”，剥夺了公民权和所有生活保障，他现在完全靠我赞助。

此外，慎娴于一九四四年在云南省昆明巫家坝美国空军供应处，一九四七年又在南京英国文化委员会工作过，有人一直怀疑她是美、英特务。

我年轻时的活动也令党怀疑。一九四九年回北京后，每个人都要写一篇自传，我将年轻时的经历交代清楚了。一九三六年我在江苏省苏州（亦即吴县）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是高中一年级。当时国民政府规定，高中一年级学生都要集中军事训练三个月。从五月到七月，我和全班同学集中到江苏省镇江三十六标接受军事训练。

在集中军训结束前，我和一些同学集体加入中华复兴社。回到学校后，没有人找过我谈到中华复兴社，也没有什么行动。然后我从医学院毕业后，在国民党里当过短期军医的那小段经历也被共产党怀疑。

但问题是，中华复兴社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也是蓝衣社军统的前身，是国民党内的特务组织。他们根本不相信，我参加以后，会没有任何行动或活动。

汪东兴决定派人对我的背景做更进一步调查。他们一直怀疑我曾中华复兴社的活跃分子，搞不好还是个国民党特务。我入党的事，就此拖延了下来。

但我极想对正在热烈进行的革命付出一片心力。我申请加入土改队，自愿下乡，把大地主的旧土地和财产重新分配给穷苦农民。虽然我岳父母丧失了他们所有的财产，我仍然支持这个改革。我相信只有土改才能终止乡村的剥削，改善贫穷苦况。

多年以后，也参加过土改的朋友才敢跟我说当年的运动常常十分残暴不公。但我的申请未被批准。党告诉我，中南海需要我的医疗服务。

一九五零年夏天朝鲜战争爆发，我也申请自愿从军。对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我未参军，因此我想趁这个机会报效国家。当时美国的军备远远比中国先进，我心里以为中国必会战败。我很关心战情发展，听到中国连连传捷报时，心情非常激动。这是百多年来中外战争中，中国第一次扬眉吐气。我得知美国竟在韩国使用细菌战时非常震惊。即使在朝鲜战争状况未明的阶段，我仍以身为中国人为荣。但上级仍拒绝我的申请，要我留在中南海。

我变得郁郁寡欢，我既不能为革命效力，又没有机会成为神经外科专家。我觉得和那些身为革命分子的病人之间有一道鸿沟。入党的事一直没有结果，使我沮丧不已。

一九五二年春天，我首度与毛的家人有了接触。

那时毛三十岁左右的二儿子毛岸青精神分裂症发作。毛有两个儿子，毛岸青和毛岸英--都是他第一个自由意志下的婚姻配偶杨开慧所生。杨在一九三零年因拒绝背叛毛



而被国民党处死。那时毛在数百里之外的江西井冈山已经和贺子珍结婚。杨死后，两个孩子前往上海，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流浪生活。一些认识毛岸青的人，都觉得上海租界巡捕曾残酷殴打毛岸青，此事是他精神分裂症的导因。数年后共产党在延安建立基地时，才又找回他俩，毛随即将两兄弟送往苏联读书。

朝鲜战争爆发后，二十九岁的大儿子毛岸英赴前线作战，不幸在美国炮弹轰炸中丧生。这期间，毛岸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翻译处做翻译。

一九五一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中，中央宣传部内揭发出，毛岸青的稿费被另一个人冒领了，他一怒之下打了这个人一记耳光。毛泽东知道之后，狠狠批评了毛岸青，毛岸青的精神分裂症发作。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精神分裂症的一些现象，有时发呆，长期失眠，不过没有引起家里人的注意。

毛岸青发病以后，便住进中南海门诊部的病房。

春末夏初的一天傍晚，我在办公室内整理病历，值班护士匆匆跑来，气喘吁吁叫我说：“江青来看毛岸青了，要你去汇报病情，快点。”

我走进病房旁的一间休息室，江青坐在一个靠背椅上，旁边站着漂漂亮亮的她的一个护士。

以前我都是在路上离得很远看到江青。我这是第一次面对面的见到江青。我心想，可真是个电影明星出身，穿戴自然与众不同，只是没有想到，会与大家有这么大的差别。那时共产党刚进北京城不过三年，无论是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穿着灰色或蓝色土布“毛服”，正是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时候，衣服褪色、油垢、补绽，几乎每个人的身上都可见到。

江青穿一身银灰色纯羊毛派力斯的连衣裙，敞领上装内是米黄色绸衬衣，穿著长统肉丝袜，下面是半高跟黑色皮鞋，头发又黑又多，烫过，精心向后梳，挽起一个发髻，眼睛圆圆的，眸子既黑又亮，皮肤细腻，乳黄。她瘦削，大约有五尺三、四寸，可是上半身却显得比下半身长。她那年三十八岁，我则是三十二。

我在她的对面坐下。她说：“你就是李大夫。”一口纯北京话，没有等我回答，接着说：“岸青的情况怎么样了？”

有人说江青年轻时很漂亮，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她顾盼间让人感到高傲、冷漠。

我便将毛岸青的病情向她说清楚，并且说明在门诊部没有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设备，只能提供短期的治疗，转到精神病院，或者疗养院去治疗较为妥当。

她沉思一会，然后对我说：“我将你的建议，报告给毛主席，再决定吧。”然后她伸出手来，同我握了握手。她的手指细长柔软，指甲修剪得很尖俏。她说：“谢谢大夫，谢谢大家。”然后向院子走去。这时我才看到，有三名警卫人员站在院子里。

总的说来，江青使人感到精明苛刻。谈话时，不停地打量着谈话的对手，似乎想在对方的言谈举止中，发现什么。在她的目光中，看不到温暖与信任。相反地，在那两道炯炯的目光里，流露着侦伺对方的神色。

不久，毛岸青被其他医生正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住进大连一家疗养院，由北京医院一位护士全天候照顾。岸青与那位护士谈了恋爱。但家里早就替他安排好了婚事——毛岸英遗孀刘思齐的妹妹张绍华。心碎的护士只好被迫返回北京。

一九五三年秋天，在这件事发生后年余，当时任毛泽东秘书和宣传部秘书长的胡乔木请我到家里，给他检查身体。当时他患有过敏性鼻炎和十二指肠溃疡，经常发作。

胡乔木住在中海居仁堂以西迤北，以永福堂打头的以福字命名八个堂的最北一个四合院内。他的妻子叫谷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我到胡乔木的卧室，胡脱去上身衣服，我给他检查。

正查的时候，谷羽跑进来。神色张皇地对胡乔木说：“江青来了，快穿衣服。”

胡乔木立刻爬起来，一面穿上衣，一面同我说：“李大夫，对不起，今天不能检查身体了。”

我匆忙往外面走，江青已经大步走进来，正碰在一起。她握我的手说：“这不是李大夫吗？”胡乔木迅速答道：“我请李大夫检查身体。”江说：“还没有检查完吧，我可以等一下。”胡说：“不，已经检查完了。”我同他们告别，走了出去。

这是第二次与江青见面。这次仅是匆匆一瞥，她给我的印象与第一次相同，只不过让我感到更冷淡更倨傲。

我在门诊部工作是极其勤恳的，每天除上下午门诊以外，夜间还要出诊。另外，我给人们看病时，无论是首长或是普通工人，我都一样的细心认真治疗，从来不会因为他们的地位不同而有不同的态度，所以我受到了中南海内上上下下人们的交口称赞。很多人对我十分信任，甚至愿意将个人及家庭的烦恼同我谈谈。一九五二年秋天，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选择模范工作者，我被一致推荐为甲等工作模范。

五零年后调查人员找到了我在集中军训时的中队长徐斌，他正在贵州省息烽县的监狱中劳动改造。徐完全不记得有我这样一个人。他们又找到了一些我在东吴中学时

的同学，这些人都证明我没有过政治性活动。总之，他们调查了所有可能找的人，都没有得到我有过政治性活动的证据，甚至有的人还说我并没有参加这类政治团体。这次调查一共用了两年多时间，结论是“查无实据”。

我的“阶级背景”和这些政治性活动在往后中国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横扫过时，又会回来困扰我。但我仍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其实只有《共产党宣言》、毛的两篇文章、年轻时我大哥给我念的几本书和一些共产党口号而已。

在中南海工作这几年下来，我对我本身情况的估计，越来越清楚。我五二年虽然终于参加了共产党，但在工农干部的眼光里，我永远是一个本身历史很复杂的知识分子，不是他们的“自己人”，我充其量只是个被“团结、利用、改造”的对象。

因为我是医生，他们只不过要利用我的医疗技术专长而已。

汪东兴是中央警卫局局长，负责最高领导同志的安全工作，还兼任毛泽东的卫士长。我是在中南海门诊部认识他的，我们后来成了朋友。他是老共产党员，参加过长征、在乡村长大。他在十岁时，因在城里的街上随地小解而差点被警察拘捕。汪的父亲付了一元大洋使他免去牢狱之灾。汪痛恨当时国民党的腐败，便加入了共产党。他在延安认识了毛，并开始为毛工作。一九四九年后，他跃升到这个政治职位。但他一直很尊敬知识分子，对我这个接受西方训练的医生也特别客气。

一九五四年刚过了十月一日国庆节，二日下午，我正在门诊部值班，汪东兴给我打来电话，约我晚饭后，到他

那里去，说：“有事情要谈谈。”我讲我在值班，有什么事。他说：“你来了，再仔细谈。”

我觉得很突兀，因为汪平时说话，一向直爽痛快，从来没有将话留下，不立即说明。

那时都很简陋，汪的宿舍就是一间大房子，是办公室、会客室、饭厅兼卧室。他的小孩和保姆另外住在院子对面的平方里。他刚吃完饭，要我坐下，泡了一杯茶。

他说：“这是今年的龙井茶，你尝尝。”我喝了几口茶，就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去办。他的神色突然严肃起来。他讲：“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放在门诊部，保留这么久，没有调出去？”我说：“我不清楚。”

他说：“我观察了这么几年，你很受群众的欢迎。你最大的特色是对待人不分高低上下，一律耐心周到，不势利眼。所以，不只是一般同志，就是高级首长都知道你。你的高明的医术，平易近人的人品，热情细心的服务精神，给大家的印象比较突出。在闲谈时，毛主席他们都听说了你。给毛主席找个保健医生，能胜任下来的不容易找到。我已经请示过周恩来总理，他批准了，昨天我当面报告了毛主席，他同意。不过要先见见面，谈谈，如果谈得来，再定。你要准备准备。”

我听了后，大吃一惊。我再也想不到，会指派我做这么一份工作。

我在门诊部时，毛的住处是绝对不允许进入的。虽然身在中南海内，这块地方真可谓近在咫尺，但是在我的眼内，真象是海外仙山一样，既神秘，又庄严。我常常抱着崇敬的心情，在南船坞楼上我的住室窗口，望着这块地方。这里是全国的“心脏”，从这里传出来的每一次跳动，都牵连着大陆中国内的每一个人的命运。

许多思绪此时一一闪过我脑海。我的妻子慎嫔在美军供应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工作过，没有办法找到她不是特务的有力证明，因此她没有资格加入共产党。而我也没法改变我的出身背景。何况，毛已经有了保健医生。然后我又想起我大曾祖临终时交代子孙不要作御医的遗言。

我将这些想法，都告诉了汪。他听后哈哈大笑说：“你怎么想的这么多？你的历史问题和家庭的一些问题，在你入党前已经审查过了，都做了结论，不是新情况，新问题。要你去工作，不是我一个人说了就定下来，是经过党委讨论。而且你的这些问题，报告了罗部长和杨主任，也报告了周总理，都认为不成问题，才报告毛主席定下来。你还有什么犹疑呢？至于你大曾祖的事，那时封建皇帝时代，怎么能同现在相提并论呢？”他说完又大笑起来。

我又问他，傅连璋知不知道这次的分派。傅此时已是新设立的卫生部副部长，兼任保健局局长，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他自认是毛的密友和追随者，非常关心毛的健康，自然会想参与我分派的事。

他说：“傅部长虽然是你的上司，但是这样的工作，是中央直接定下来，不需要他参与。”但实际上汪估计不足，傅对于我这次任命没有通过他，十分不高兴。

我当时又问汪：“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商量商量呢？”我深知给毛工作，是个众目交集，引人注目的所在，尤其负责他的健康保健，责任太大。一旦发生点差误，即使算不上什么的差误，也会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而形成“阶级报复”的骇人罪行。

汪说：“不行了。这已经是组织上定下来的事，没有考虑商量的余地。”我看这事已成了定局，没有回旋余地。我又说：“我在工作上自然会十分谨慎小心，但是医疗上

不可能十全十美。万一有点误差，那时就复杂了，而且会连累到你。”

他说：“不要想的太多。你做自然要谨慎小心，要请示报告，但也要放胆去干，不能没有主见，也不能事事都请示报告，要勇于负责。我看你能干好，我不会看错人。”然后他又说：“你准备好，先与主席慢慢熟起来，能不能做下去，适合不适合，还要由主席自己决定。你等着吧，会找一个很自然的机会让你见主席。到时候我会通知你。就这样吧。”

在这次谈话以后，汪将毛以前的一些病历记载拿给我，要我了解毛的病史，并嘱咐我多做些准备，还同我说：“主席就要离开北京，到南方休息，这次你先不要去，照旧在门诊部工作，还是要找自然机会见他。”

我回到宿舍，同娴说了领导上的这一决定，和我跟汪谈话的经过。她也认为，既然中央定下来，不可能改变了。她说，这工作责任太重，不能出任何一点毛病。从这天起，娴无日无夜不为我的工作与安全担心。

曾任共产党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同志于一九五〇年猝然与世长辞后，其未亡人陈琼英变得极为消沉。陈常来门诊部看病，主要是头痛、失鸣和耳鸣。我给她镇定剂及苏联的一种溴化钾和咖啡因混合药剂服用，但她的纯粹是心理上的，门诊部也无可奈何。我只能尽量安慰她，人死不能复生。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对人十分善良热诚，认识我时间长了，待我如同子弟。

后来我奉汪东兴之命陪同陈琼英同志到上海和杭州休息两个星期，以防她忧郁症病情恶化。当她知道我被派去做毛的保健医生时，她同我讲：“这个工作可不好做，千万谨慎小心。毛老头脾气大得很，而且翻脸不认人，没有人在他那里干得长的。江青这个人，是出名的骚贱货，

待人刻薄，你千万别上当。在那个地方工作，一旦搞不好，出来，没有地方敢要你，弄不好还要坐牢。”

在五十年代初，毛的威望正如日在中天，谁也不敢背后议论他。这些肺腑之言，简直是“反党言论”。这些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在此后的行动中，无时或忘。

一九五零年后的两年内，连续推行了“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前一个运动主要打击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人员和黑社会分子，后一个运动则主要针对共产党内掌握一定权力的党员干部，其中固然有少数确有腐化行为，但大多数是挟夙怨借机打倒对方。

中南海内也展开了保健医生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一九五五年“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在警卫局长汪东兴的指挥棒下，将一些保健医生打成“反党分子”。原来是几年来这些保健医生不满意脱离医生临床工作，单纯只给一个人做些照料生活的所谓保健，凑在一起时，不免讲些不满意的话，甚至发牢骚。警卫局便藉此机会整整医生们。

这种“批判斗争会”几乎每天下午、晚上开，每次要开四或五个小时，弄得人疲劳不堪，而同时罪名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

江青的保健医生徐涛（他也曾短期任过毛的专职医生）在批斗会中是众矢之的。开批判斗争徐的会上，江青特地叫卫士参加，“揭发”徐对江青是如何“粗暴”，如何“虐待”江。并举出例证，如，江青叫徐拉上窗帘，因为日光刺目，徐没有立即拉上，于是成了有意损伤江的眼睛；江要求室内温度固定在摄氏二十六度，江感到冷，批评徐降低了室温，徐拿了室内温度计给江青看，恰好是二十六度，于是成了有意在精神上折磨江。像这样的“罪名”不一而足。



足，要徐承认“有意反对江青，反对共产党”。最后徐被定为“反党小集团”的主要成员。奇怪的是，其他的“集团”内的保健医生，都被调离中南海，可是这位“反党分子”的徐医生，并没有被调出中南海，反而继续给江青做保健医生。

我很同情我那些医生同事。我知道他们没有做错事，他们绝对不是反党分子，但我只能保持沉默，如果我很公开替他们辩论，我也会被归为反党分子。

走笔至今我仍感到良心不安。一九五二年的“三反运动”中，我大哥、堂哥都受到波及。他们是我的亲人，我清楚他们是无辜的，但我不敢站出来为他们辩护。

在我正式为毛工作之前，我就已经违背良心了，无法言行合一。在政治风暴中我总是三缄其口，但此次批斗大会上，我被迫加入攻击的行列，来保全我自己和家人。我无法指控那些医生反党，我只说他们不该发牢骚，他们没有好好做好工作，所以应该反省学习。

我那时不知道，一九五四年就展开的保健医生批斗会里，医生们其实只是汪东兴和傅连璋争权夺利的棋子。

这两个人的职务无可避免的会发生冲突。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璋负责指派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凡是傅派到“中央首长”处的医生，都要定时向傅汇报，回报的内容不只是身体健康情况，也包括所了解的言论和行动。傅还透过这些医生递送他写给某“首长”的信，表示他的关心。傅采取这些手段，来摸清“中央领导人”的政治动向，特别是党内斗争的动向。在“中央领导人”中，自然毛泽东是傅视为最重要、最需要摸清的人物。

而身为警卫局长的汪东兴恰恰也是尽一切可能，使“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摸清中央的意图动向，进一步垄断这些情况。汪能指挥的主要是

警卫人员和卫士，因为这些人都是汪亲自选派的，但是汪也要利用医生和护士收集情报。于是傅连璋认为汪东兴干涉他的业务职责，汪又认为医生听傅连璋的指挥。

在汪任派我为毛的保健医生后，汪傅之间的勃溪剧烈。傅想以我的家庭背景问题说动毛不任用我，汪则转而利用反革命批斗大会——攻击傅委任的医生。最后是汪胜利了，医生们只是牺牲品，汪东兴和傅连璋之间形成决裂局面。

发生这次所谓“反党小集团”事件时，我受到很大的震动。我完全明白了，在工作中，只能绝对服从，不能丝毫违背“上级”的意旨，如不谨慎而触犯“上级”的个人意志、威望、都会被无情的“整”，也就是被镇压。采取的方式，是“群众的”制裁办法。群众呢，他们是被指定参加这行动，甚至他们在会上的发言，都是早经排好的。

这次可真是一次非常生动的教育，让我明白，每一个人都是在一个布置好了的环节内言谈行动。一个人不能有什么个人意志，只能是一部庞大复杂的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不管这零件安装的部位合适不合适，也不管这零件在整个机器运转时，能不能起作用，只要甘心在这部位上听命运转下去就可以。

这点对于自由知识分子的心灵，所造成的痛苦是难以比拟的，在“为人民服务”、“一切服从党的需要”的钢铁纪律下，保全自己的唯一途径，是俯首贴耳，唯命是从。在一片颂扬声中，所有的生机都被斫丧了。违背良心的言论，违背良心的行动，成了准则。而更糟的是，唯有这种办法，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进而一步步爬上去。

四十年后的今日，我在美国安全的环境下，追忆这些往事，我知道我当年还是会这样做，我没有余地，我那时得保护我的家人，无路可走。如果今天我回了中国，政府

要我支持一九八九年血腥的天安门事件，我也必须同意。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只有一直违背自己的良心，才能在中国生存下去。

而四十年前的我，在与汪东兴会谈数月后，仍满心欢喜的期待毛的召见。但毛迟迟未召我去。

## 注释：

共产党第五大领导人任弼时因脑溢血突然暴毙是另一个原因。也正是在这时，每位领导人都派任一位专职保健医生。

中国当局一向坚称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战，美国官方则一直否认。

另有报导指出，毛与杨开慧共育有三子，其中一个(译注：毛岸龙)在杨开慧被处死后，下落不明。

于李医生前任毛专任医生的王鹤滨指出，毛曾将岸青的一些信转给他，岸青信中说他的心灵被一个小人占据了，那个小人常刺激他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岸青写说，他控制不了那小人，也无法逃避他，他为此感到很局促不安，但没有那小人时，毛岸青又觉得寂寞。年光事件后陈学诗为毛岸青做诊疗。中国解放后，精神医学几乎全然瓦解。文化革命后，也在狱中关了七年。李医生不知道岸青或其他高级领导接受哪种药物治疗。但他确定医界从未使用导电筋挛疗法(ECT)。王鹤滨说，此事后，毛岸青被送往苏联接受数年治疗。

一九五四年前毛的医生包括傅连璋、陈兵辉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有王鹤滨、周泽昭和徐涛。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多钟，我正在看门诊，护士长匆匆走来叫我。

她面色神秘而紧张，悄悄小声对我说：“一组来了电话，要你立刻到游泳池去。”一组是毛及其人员的代号，二组为刘少奇，三组周恩来，四组朱德，五组原本是任弼时，在他死后，则为陈云。

室外露天游泳池是原来就有的，为了让毛在冬天也能游泳，就在室外游泳池的南边新建了室内游泳池。室外游泳池在夏季开放，中南海内的工作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都可以来游泳。室内游泳池夏季不开放，在其余的季节里毛去的时间多，别的首长也来，但逐渐来的越来越少，于是成为毛的专用场所了。为了让毛能好好休息，以后又向南加修了大会客堂与书房，这就是以后接见尼克森总统、田中首相等人的所在。同时又修了卧室。文化大革命后的一九六六年底，毛迁居到这里，直到一九七六年去世为止。

毛终于召见我了。

我将病人处理完毕，交代了工作，骑车出了流水音。正是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之前，天气仍旧有些凉。我到了中南海怀仁堂北面的游泳池，已经微微出了一些汗。

在游泳池的门口，毛的卫士长李银桥正在等我。他看见我立刻迎上来说：“你怎么这样久才来？毛主席一直在等你哪。”我说：“我将门诊的病人处理完，时间长了些。”当时我没有带医疗用具，我问他：“主席是看病，还是检查身体？”李说：“都不是，主席只是说要见你，谈一谈。”我又问他，要谈些什么，李回答说不知道。

李将我引进室内游泳池，毛泽东正躺在游泳池南端的一个木床上看书。

虽然毛躺着，身上盖着毛巾被，可是看得出来，他的身材魁梧，面色红润。上身穿白衬衣，肘以下露在外面，比较起来，手臂显得很长，头发浓黑，前额宽阔，皮肤柔细，两只脚放在毛巾被外面，穿着深咖啡色线袜，小腿很细，脚看上去就大了。

李银桥向毛说：“主席，李大夫来了。”毛放下书，叫李搬了一张椅子，放在床边，要我坐下。

他说：“张之洞说 he 自己是起居无时，饮食无常。我同他一样，刚一起床，就到这里来了。现在几点钟？”我看了表，告诉他：“现在四点半。”毛说：“这是我的早晨。你什么时候起床？”

我不知道毛的生活习惯，他突然一问，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因为这时是下午四时半，我不清楚他是问早上的起床时间，还是午睡后的起床时间。于是我说：“我是早上六点多钟起床，午饭后稍微休息一会儿。”

毛笑起来，说：“你是医生，很讲卫生，起居有时。”毛的眼神充满智慧，他的眼神，而非言词，使人感到和蔼可亲。我打心底佩服他，我觉得我是跟一位伟人坐在一起。

他拿起一支香烟，我注意一看，是英国三个五牌子。他将烟掰了一半，装在烟嘴上，点燃以后，吸了几口。他说：“这种烟嘴是宋庆龄介绍给我用的，里面可以装滤烟器，据说可以将尼古丁滤掉。我吸烟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尼古丁起了什么作用。你吸烟吗？”我说：“我也吸烟，不过不多。”毛又笑了说：“你是我遇到过的第一个吸烟的医生。”然后，他深深吸了几口气，眨着眼睛，带着一丝顽皮的笑容说：“吸烟也是做深呼吸运动，你说对不对？”我笑了笑，没有回音。

他看到我的两鬓有不少白发，说：“你才三十出头，怎么白发比我的多？”我说明人体各部位的遗传特征不相同，人体各系统衰老的表现不一致，然后我说：“从头发上看，我比主席要老。”他哈哈大笑说：“你给我戴高帽子了。”

然后他问我的学历与经历，我大略说了一遍。他很注意地听我说完，然后他说：“你中学时就开始受美国人的教育，解放战争(国共内战)时，美国人帮蒋介石，现在又在朝鲜打我们，可是我还是要用你这种英美派。我要学外语。有人说学俄文吧，我不学。我要学外语，就学英文。以后你同我在一起，你教我学。”我表示同意。

过了一会，他又说：“你加入复兴社时，只有十六、七岁吧，那还是孩子嘛，懂什么？你已经向领导上讲清楚了，这没有什么问题了。唐太宗手下有一个大将，叫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归顺的时候，唐太宗手下的人都说他不可靠，可是唐太宗让尉迟敬德和他睡在一个帐篷里，后来尉迟敬德建立了不少功劳。当然我并不是说，我是唐太宗，你是尉迟敬德。这只说明，互相之间要以诚相待，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短时间还不行，要长时间的考验才算数。”

“许世友早先在张国涛手下，长征到陕北后，张国涛跑了。一九四二年整风开始，大家都说许不可靠，把他斗得要死要活。许急了，要拉队伍自己去打游击。康生要将他抓起来枪毙。我说不忙，我找他谈谈。他们都不赞成，怕许害我。我说不会。许到我这里，见到我，张开大嘴就哭。我说不要哭，我只问你两句话，你相信张国涛，还是相信我？你愿意走，还是愿意留下？许说，我当然相信你，我愿意留下。我说，那好，你照旧去带兵，没有事了。许世友到现在不是干得很好吗。”

毛又说：“你那时只是个孩子嘛，懂什么？”

多年的忧虑和阴霾消失无踪，我一下子感到安全无比，毛一语解决了我家背景和政治历史的问题。许多人用我的过去来攻击我，阻止我入党，使我活得战战兢兢。毛此番话的逻辑是那么简单，但它使我放下沉重的心理负担。毛是最高领袖，没有人敢向他挑战，我很感激毛救了我。

这时卫士长来给他开饭。他坐在床沿，要我同他一起吃饭。一盘清蒸武昌鱼，是两大条；一盘回锅肉，里面放了不少红辣椒；一盘炒油菜，油很多，青菜都是整根排在盘中。这时是五十年代初期，大家的生活还很清苦，平时在食堂粗食淡饭惯了，一旦吃这样的菜反而油腻得吃不下去了。毛注意到我吃的不多，笑着说：“你吃得不踊跃啊。武昌鱼的味道不错嘛，回锅肉也很好。”我嗫嚅的说：“我不饿。”他说：“这是我的早饭，也是午饭，我一天吃两次饭，大概同你的吃饭时间合不上。”

吃完饭后，他要我再谈一会。他问我读没读过哲学，我说：“学医的时候，医学的书还读不完，没有学哲学。毕业以后，忙于看病人，也顾不上读。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只是学过主席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我是真的喜欢那两篇文章，毛写得不错，简洁而切中要点。《实践论》主张真正的知识是从实践中，而非读死书而来，对我这想做外科医生的人来说可真是一针见血。《矛盾论》使我了解解决任何问题的方式在于找出主要的矛盾所在--即寻求解决根本问题之道，而不是专注在外表征兆上的小节。

他笑了说：“抗日战争发生后，部队到前线，抗日军政大学要我讲讲哲学，我也打算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写



了这两篇。《矛盾论》我写了两个星期，只用了两个小时就讲完了。这两篇中，《实践论》比《矛盾论》重要。”

后来我也常常回想，我第一次与毛见面及谈话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第一次与他见面，就给他留下了好的印象，能够一见投机呢？我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

在毛身边待了一段日子，我才知道他有多么重视这两篇文章。他自觉它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突破，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理论分析。《实践论》和《矛盾论》分别在一九五零年和一九五一年正式发表以后，苏联方面一直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传说史达林指派苏联有名的马列哲学家尤金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是为了就近研究毛的思想，并向当局报告。毛曾经几次与尤金谈这个问题，而且还亲自到尤金在北京的官邸与尤金讨论两次，但是双方都是各持己见，没有结果。

毛后来同我讲：“难道哲学在马克思和列宁以后，就到了止境了？难道中国的经验不应该从哲学上加以总结吗？”

但那个第一天下午，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毛也并未提及。

毛又说：“哲学要读一点，不读恐怕医生也当不好。我这里有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你拿回去读。有人告诉我，在美国不论文科、理科、工科等各科的最高学位是 PHD，也就是哲学博士，可见他们也是将哲学看成统率各学科的科学。另外也要读历史，不知道历史、就不清楚现在是怎么来的。还应该学点文学，医生是同人打交道的，只懂医学，语言无味，缺乏共同的语言。”然后他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日子长得很，有的谈。”他伸出手来，与我握了握，我走出室外。

我出来以后，已经是傍晚七点钟了。

我发现毛既凝重又诙谐，很健谈，很善于让人讲出自己的思想，眼睛里不时闪出智慧的火花，似乎有时有玩世不恭的影子。在接近他的时候，自然的感到亲切而和蔼，开始时的紧张心情，坐下一谈，自然就放松了。

那么我见过毛了，以后要经常见到他，负起他的医疗保健的重担了。

我立刻到了汪东兴的宿舍。汪笑嘻嘻的说：“今天你谈的时间可不短，都谈了什么？”我将大体情况告诉了他。他说：“我说你干得下来，怎么样？这个开头开得不错，你安心好好干。”

这时他的电话响了，原来是李银桥打电话来，告诉他，我走了以后，毛很高兴，要我做他的保健医生。李银桥估计，我适合在毛处工作。

汪放下电话后说：“我会将情况报告罗瑞卿部长，你好好休息，注意保密，主席那里的情况一律不许对没有工作关系的人讲。”

我回到南船坞宿舍，娴正等着我吃饭。我将下午的事全告诉了她。她很高兴，说：“看上去，你给毛主席的初步印象不错，否则不会谈这么多这么久，还请你吃了饭。”毛好象喜欢我，我自然高兴。但我仍免不了忧心忡忡。我说：“这也难说，还要看以后顺利不顺利。”娴说：“这种性质的工作，只能小心谨慎。既然开始了，就不能不干好。”

第二天的上午，傅连璋打电话找我，他说他知道我见过毛主席了，要我到他那儿去谈谈。我心想，他的消息真灵啊，怎么昨天才见过毛，他就知道了呢。我将工作交代给值班医生，骑自行车到弓弦胡同。

我走到后院傅的住室，他从躺椅上站起来，打过招呼，他又坐到躺椅上。他说：“你昨天见过主席了，情况怎么

样，你讲讲。”我将昨天见毛的情况和毛说的话都告诉了他，他很注意的听，看上去他也很兴奋。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给我泡了一杯茶，围着桌子踱了两圈，我听他喃喃自语道：“看起来是投机了，”然后坐到躺椅上，抬起头望着我笑道：“你的机缘不错，初次见面就谈这么多，难得。”

“一九三一年我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当院长，毛主席正打摆子，还立即要出发打仗，他派人把我接到他那里，要我立刻把摆子治好。我说可以，当时是用奎宁治好的。一九三三年主席又要去打仗，叫我去吩咐说：‘我去打仗了，把贺子珍同志交给你，你照顾她。’那时贺子珍正怀孕。我说：‘主席放心，我来照顾。’我一直照管贺子珍同志，直到她顺利生产，是我接的生。”傅并未说明贺子珍生了几个小孩，我一直没搞清楚，但我听说她在一九三四年秋天长征之前，就已经生了两个儿子，共产党自南方退守时，将他们寄养在乡下农家，后来一直没有找回他们。傅说到这里时，十分激动，两颊现出潮红，前额也渗出汗珠。他喝了几口白开水，停了一下说：“我不喝茶，我不吃任何刺激性食品。”

傅转变话题，又说：“后来王明路线时将我当 AB 团（即反布尔什维克团，标志是国民党派到共产党内的组织）打，是主席救了我。我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身体不好。主席对我很好很信任，长征的时候给我一匹马骑，还让我每天吃一只鸡一直到现在。那时鸡是罕见的奢侈品，每天吃一只鸡更是无法想象。他让我喝茶，而且说：“我讲点以前的事给你听，是想使你多了解主席的情况。”我对以往，特别是长征之前，在江西的红军期间，更不清楚，所以听起来很有兴趣。我说：“我很想知道一些主席以前的情况，你讲了，对我以后给主席工作有很大帮助。”

傅笑起来，又讲道：“主席有很严重的失眠。我在福建长汀和江西瑞金时，派人化装成商人，到上海买了凡罗那，又买了葡萄糖粉，建议他睡前用热水化一小杯葡萄糖粉，服一、二片安眠药片。这办法很有效，主席非常高兴。你看，我对主席是忠心耿耿。我与主席同岁，但是身体没有他好。”

他注视着我，严肃的说：“派你到主席那儿工作，是党对你的高度信任。这工作非常光荣，可是也很艰巨。”

说到这里，服务员摆上饭菜。傅对我说：“昨天主席要你同他吃饭，今天我用便餐招待你。”很清淡的四样小菜和一碗清蒸鸡。他解释道：“我每天吃一只鸡的习惯，至今还是这样。”

他又叫人给我一小杯葡萄酒，他也倒了小半杯。他举起酒杯来说：“我平时不喝酒，今天同你喝一点。”在吃饭当中又说：“你在主席处做医疗保健工作，要十分谨慎小心。遇到困难，不管什么时候要告诉我，我会帮助你。”我不晓得傅连璋能帮我什么忙，但他显然想对毛及其活动有全盘的了解。

他吃完鸡，就不再吃了，然后对我说：“我每天要吃五顿饭，每次吃不多，你不要拘束。主席要你同他一起念英文，要你教他，这是很自然的同他接近的好办法。看来他很愿意同你谈谈，你可不要有架子，除去医务上的事，别的事能为他做的，都要做。”

我听了后，心里很不舒服。如果这样做，医务反而成了我的次要职务。我冲口说道：“我可以照你讲的做。但是这样做，我不但没有临床机会，反而距离医务也会越来越远。”

傅正色说：“不能只看到这点。主席的知识深广如大海，可以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你既然负责他的医疗保

健，就不能局限于医学，知识面应该更广泛，才能有更多的话同他谈谈，这样才可以更加了解他。”

毛也要我多读读书，我想傅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毛仍年轻健康，刚开始头几年我可能不用治疗什么疾病。但如果我不多接近毛，就不可能知道他的脾气、性格和生活习惯，也就不知道造成他目前心理和肉体特点的原因，那么怎能采取一些改进他的健康的办法呢？要接近他，我必须先取得毛的信任，首先我得多读读书，与毛有共同的语言才成。

我起身向傅告辞，感谢他给我的指教。他站起来同我握手说：“以后每个星期到我这里来一次，有事无事都来一次。”

我骑着车子，从沙滩转入景山前街，正在午后，天气晴朗，有些燥热。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各个机关的大门都在悬灯结彩，一队队的学生做着游行演习。节日前的景象和气氛使我不由得振奋起来，心中充满了自豪感。

自从一九四九年回来以后，这几年中心境一直烦躁不安，自尊心也一再受到挫伤。我的哥哥和我少年时的好友都已经是“老革命”了，他们都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去了延安；这时他们无论留在北京，或在外地，都是一个部门的领导干部。虽然有些人在三反运动中被批判，但他们仍留在工作岗位上，受人尊敬。

而和我一样没有“参加革命”的医学院同学们呢？他们这时都在各大医院中的各个专科中工作，已经成了各科的专家。

可是我却丢掉了外科专业，作着各科都干的类似开业医生的工作，我似乎看不到一点回旋的余地。更糟的是，周恩来决定将中南海门诊部与国务院门诊部合并，由国务院秘书厅总务处领导，并且决定要精简机构，裁减人员。

虽然我被任命为门诊部主任，但是在人事大变动，人心浮动的情况下，很难稳定住局面。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调我任毛的保健医生，使我立即脱开人事纠纷的困境。

自从一九四九年进入北京以后，毛即深居简出，住处警卫森严，对一般人来说，他是个遥远，神秘，又无法企及的人物。最高层的领导人，除去开会，也很难得与毛个别见面谈谈。我作为医生，是所谓“身边工作人员”，可以随时见到他。特别在他让我教他英文以后，见面与闲谈的机会更多了。

我的整个世界豁然开朗，天地都为我欢唱，我不再只是个无名小卒。一九四九年我刚回国去见傅连璋时，他是坐着见我的。今天他站着，几乎是奉承般地迎接我。

我后来也发现很多高级领导人突然变得很愿意接近我，对我很客气。我已经不是个普通医生了。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我是毛的专任保健医生。

## 注释：

毛从年轻时代起便断断续续学过英文。

尤金(Yudin)为《简明哲学辞典》的作者之一，并被公认为史达林思想的权威学者。苏联一九五三年开始出版针对毛之《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批评，同年尤金出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毛非常欢迎尤金，但有些中国人后来认为，尤金被派任是为了就近了解毛的哲学，以便提出批评。

有些资料来源指出贺子珍总共育有六个子女，其中一个产于“长征”途中。六个子女中只有一个男孩。李敏是唯一的存活者。两个小孩被寄养在农家，一直没有找回来。其余均夭折。

在我与毛第一次见面后没几天，五一节前夕，已经是夜里一点多了，一名卫士值班室的卫士打电话来，要我立刻到毛那里去，毛在等着我。

我匆匆走到一组面对中海的后门。我想毛大概生病了，要不然怎么会这么晚找我去？

我从来没有去过毛的内住地。我第一次踏进这块“圣地”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激动和喜悦。我想，我终于“长征”到“革命的核心”中来了。作为一个医生，能有这种幸运的并不多吧。

大家总是形容毛过着禁欲而简单的生活，他设下节俭的好榜样。他死后，中南海住地开放，展览他生前破旧的衣服、袍子和拖鞋，显示他为了接近群众而舍弃奢华的生活。毛是农民出身，惯于单纯。他只是在绝对必要时才穿戴整齐；平时睡醒以后，总是科头跣足，赤身穿一件睡袍半躺在床上。他穿衣服时，只穿破旧的衣服和布鞋，在公开正式的场合才穿上毛服和皮鞋，新的布鞋一定要别人先穿一段时间，完全踩合脚后，才肯换上。至于衣着整齐坐在那儿看书或办公，是为照像，摆个样子。事实上，他几乎总是在卧室或室内游泳池处理公事。

但是他仍过着帝王般的生活。毛的中南海内住地在中海与南海之间，前门面对南海。中南海一定是全世界门禁最森严的地方。晋见毛的外国贵宾感觉不到武装警卫的存在，但事实上警卫以毛为中心，成环状向外扩散，遍布中南海内。毛的贴身侍卫（又称内卫）也兼任随从，武装精良，守卫紧密森严。汪东兴督导下的中央警卫团武装安全警卫，即外卫，则防守内住地。他们在周围的隐蔽哨站内等距放哨。



中央警卫团并驻守中南海的四周，毛出巡时全采这种保护网层措施。

毛行踪不定，只有最高领导阶级同志才会知道他的行止。他在中南海外主持庆典仪式时，车子都停到别的地方以防车牌号码被人记下来。车牌号码经常更换。这种安全措施抄袭自共党革命后的苏联，但这也是封建时代保护帝王的严密方法。

毛的内住地原是乾隆时期兴建的图书馆和休息室。宫房几十年来没有好好整修，已开始腐坏，建筑物仍未恢复它们当年的雄观，修复工作仍在进行，房内到处是乾隆的御书匾额。

旧式传统大门上，绘有五彩图案。大门上一横匾，即“丰泽园”。宫房顶铺着灰色瓦。大门内东西耳房，是警卫值班室。二门内是一大院，正房上一横匾，即“颐年堂”，一九五九年人民大会堂未建成之前，毛在这里召开会议，接见外国贵宾和朋友，也在这里举行他个人的宴会。颐年堂后面是“含和堂”，其中是毛的藏书室。

毛住的“菊香书屋”在第二个大院内，与第一大院有游廊相连。菊香书屋四合院中，长着郁郁葱葱的古松柏，当中放着一些藤椅藤桌。五十年代初期，在热天的时候，毛曾在这院内召集过会议，但以后再也没有在这里开会了。

菊香书屋有一大房和几小房。北房三大间：西间是江青的卧室，有暗廊与毛的藏书室相通，中间是毛的餐室，东间是毛的卧室。南房则是江青的活动室。

机要秘书室主任叶子龙住在北房后的西间，江青的卧室隔壁。叶住所西侧，与“含和堂”相接处有一大厨房。叶负责毛的食品。毛的食品检查制度很复杂--也是引用苏联模式，但大都沿袭封建帝制的方法。一九五零年毛自莫

斯科返国后，警卫局请来两位苏联的食品专家，目的是让他们指导，如何使食品安全可靠，不至于被人下毒。在这两位专家的指教下，先设立了一个大的巨山农场，生产各种蔬菜、肉类、家禽及蛋、奶，专门供给中南海内的“首长”用。又在警卫局下成立了供应站，农场来的食品，集中到站内。站内设立生物化验室，负责化验食品的新鲜及养分；毒物化验室，负责检验食品中有无毒物。另又建立食品试尝制度，在“首长”入口以前的各种食物，都要由试尝员先吃一定的数量，以免“首长”中毒。这种检验方法在警卫局内成为一套制度以后，全国各大省群相效仿，确实劳民伤财。

东房是毛的办公室，有走廊与他的卧室相连。但我从来没有见到他去过这间房子，所以是长年关闭的。

南房向南又形成一四合院，这是江青的姊姊李云露及毛的女儿李敏、李讷等三个人的住处。李云露比江青年长甚多，缠过小脚。江青母亲死后，她便姊代母职，扶养江青成人。中共领导迁居中南海后，江青把李云露和她儿子接来同住，以帮忙照顾李讷和李敏。毛和江青不太关心他们的子女。李讷、李敏都住在学校里，周末及节假日回家。一年只有几次和毛或江青一起进餐。平常彼此也很少见面。

第四个四合院称为“西八所”。这里原有从北向南八排房子，当中六排完全拆了，余下南边一排，靠西是乒乓球室，靠东的一排是医生办公室和休息室、秘书办公室及毛远新的住室；北边一排是毛与江青的衣物室，和外国友人送的礼品储藏室。

中国著名画家齐白石和徐悲鸿等人送给毛的作品，也放在这里。

后来我在这间礼品储藏室看见卡斯楚送的大箱大箱古巴雪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送的陈年白兰地，还有伊朗国王赠的金银烟盒。这里也是由叶子龙负责。

西八所当中造了喷水池，种了雪松和丛竹，和一个大葡萄架。每到夏天的时候，这里总比别处低四到五度。这个院子靠东边，在南花墙上开一小门，斜对瀛台，这就是南小门。在南小门里，原有一片菜地，种些西红柿、黄瓜之类，后来在这空地下，挖了一个防空洞。

东墙有一小门，通过去就是“勤政殿”了。一九五九年人民大会堂造成以前，在这里接外国大使的国书，会见外国政府首脑。毛的卫士和江青的护士们的宿舍，就在这周边的房间内。

在西八所大院子北墙内，靠西一排房子，是毛的卫士和江青的护士值班室。他们是日夜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一般生活用品、食品及药品都放在这里。卫士有“值班日志”，详细记录了毛的一切活动。所以这里成了“毛的身边工作人员”了解毛的情况，和平时聚会的地方。

北墙上开了一个后门，面对中海。毛平时外出，都走这个门。一般客人和见毛的党政领导人，也都走这个后门。

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凌晨一点多钟，我匆匆赶往后门，心想毛一定生病了。门卫看到是我，立刻按电铃，卫士开了大门，我同他一起走进卫士值班室。我问他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叫我。他说：“主席已经吃过两次安眠药，睡不著，叫你来谈谈。”我穿过相接的明廊，入北屋进到毛的卧室。

毛的卧室很大，几乎有舞厅般大小。家具是现代而实用的西式家具。卧室南北墙上四个大玻璃窗都用一层黑布，一层紫红色线绒窗幕遮住，因此在卧室内完全分不出白天或夜晚。

这时，毛正睡在床上，上半身靠在床头的枕头上。他那张大木床，有一个半普通双人床那样大，床内侧占床三分之二都堆满了书。他睡的地方，只占床外侧三分之一。外侧床头床尾的两只床脚，用木头垫高，这样外侧比内侧高出有三寸。据卫士长李银桥告诉我，这个办法是防止毛翻身时，掉到床下。但是过了几年以后，我更加深入了解了毛的内幕，才知道这样的安排与他的性生活习惯有密切的关系。

床头外侧放一张方木桌，上面堆著文件，就是毛的办公桌，也是他的饭桌。他与江青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和规律完全不同，碰在一起共同吃饭的时候也不多。

毛见我进来说：“我还没有吃晚饭，找你来谈谈。”他光着身子，穿了一件白绒睡袍，前襟敞开，右手拿着一本线装书，两颊微红，眼光闪烁。

我搬了一张椅子，坐在床旁。这时卫士端给我一杯茶。

他放下了书，问我有什么新闻没有。这一下把我问糊涂了，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哪方面的新闻，而且除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以外，我也没有别的新闻。他见我沉吟不回答，跟着就讲：“你这两天见过什么人？有什么议论？”

毛每天的开场白就是“有什么新闻没有？”他对每个人都问这个问题，这是他收集情报和监视控制一组人员的方法。他要我们报告所有谈话及活动的内容，并聆听我们对彼此的批评。他喜欢让一组里面的人斗来斗去，并要求我们“知无不言”。

于是我将见到傅连璋的情况，告诉了他。

他注意地听著，然后抬起身说：“在江西反 AB 团、打 AB 团的时候，傅连璋一家五口人，女儿女婿都被当成 AB 团打死了。他不是共产党员，长征时间他愿不愿意跟着走，他愿意，给了他一匹马，他不会骑，连人带马掉到河

里，几乎淹死。他还是跟着到了陕北。他是大好人，可是他教你的一些话，不可全听。譬如说，我有了病，你给我治病的时候，是什么病，怎么治法，你要事先同我商量好，我同意了，就是治坏了，也不怪你。你若是不同我商量，你治好了，你也没有功劳，是你的错误。”

前面他讲傅连璋的话，很容易理解，可是后面讲到治病的方法，使我莫名其妙了。我预感到今后的医疗工作将会十分困难。毛要求给他进行医疗以前，都要说明生理和病理的演变过程，每一步治疗要达到什么目的，起什么作用，得到什么结果，全都要深入浅出地讲明白，还要使他接受，这很不容易，但是我必须做到。事实上，此后多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很多困难，但也都尽可能做到了。

这时卫士给上饭菜，将桌上的文件叠好，堆放在一边，铺上了一块桌布。菜摆上来，是一盘大块的红烧猪肉，肥多瘦少，一盘清蒸鱼，一盘炒苋菜和一盘青椒豆豉炒苦瓜。他吃肥肉吃得很香，我心里不以为然。这时他已经是六十二岁了，傅连璋交给我的毛的健康检查资料，体重是八十七公斤，再吃肥肉，对健康有很大坏处。

我想，以后要同他说清楚，肥肉，特别大量肥肉，对健康不利。我这一打算并没有实现。原来这一嗜好，是他少年时期在老家韶山农村养成的，直到他去世前保持不变。

他要我吃炒苦瓜，并问我味道如何。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而且也没有见过。我说：“又辣又苦。”他哈哈大笑道：“一个人是应该吃点辛和苦，特别像你这样，念书，然后做医生，大概是没有吃过什么苦。”

我当时没有弄清楚，他说这话，是开玩笑，还是当真，或者是用开玩笑的方式，讲出他对我的真实的看法。我只是就势说：“我以前没有吃过苦瓜，今天吃起来还是很有

味道。”他又笑了说：“那好，以后你就要有准备，要多吃点苦。”

这样我明白了，他认为我过去是一个不知辛苦的人。

毛觉得每个人都该“吃苦”，包括他的女儿李讷、李敏，还有解放后养尊处优的领导干部。大部分的领导干部都是农工出身，数十年来为革命胜利而艰苦奋斗，他们已经吃过苦了。但毛觉得他们在当权之后就逐渐沉迷于城市的奢华生活，意志薄弱。毛认为，如果这些领导干部不再吃吃苦，就会忘记真正的中国。往后那些年中，他让他身边的人——我和领导干部们——吃足了苦。

随后他说：“我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第三是打麻将牌。”他又问我会不会打麻将牌，我讲不会。由于家庭教育，从少年时代我就将打麻将牌和吸鸦片看成是中国社会的两个毒瘤，对之是十分厌恶。

他说：“不要看轻了麻将，牌是一百八十四张，要按自己手上的牌，桌上打出来的牌，别家打出来的牌路，来判断自己和每家的输赢趋势。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

麻将的确是种战略游戏，毛是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家和麻将高手。但我想他优异的战略战术来自于《孙子兵法》、中国历史和《三国演义》。毛打麻将牌可不只是为了磨炼战技。原来打麻将固然是一种消遣，对毛来说，却也是一个调情的机会。牌桌上，手在和牌、摸牌、打牌，牌桌下却是用脚勾脚，用脚踢脚，也在忙得一塌糊涂。

毛接着又说：“《红楼梦》这部书是封建社会的兴亡史，是中国两千年来历史的缩影。我从来不看小说，可是我看《红楼梦》。”

《红楼梦》这本小说我以前翻过，但是实在引不起兴趣，觉得书中的情节景象，距离我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太远，所以往往只看一两页，就扔到一边去了。

《红楼梦》这部书的主题之一便是贾家的兴亡盛衰，还有当时社会的堕落。毛认为它是一本探讨中国封建制度之腐败和衰亡的奇书，但数百年来，中国人都把它当做贾宝玉个人的爱情悲剧故事。贾宝玉早年追求美丽的女性和感官逸乐，其实是他对社会家庭的反抗。他最后失败了，只好遁世去做和尚。后来我才知道，毛一贯以贾宝玉自居，以能左拥右抱为一大乐趣，“丰泽园”几乎成了当年的贾府。也正因为此后他的“后宫佳丽”越来越多，“争风吃醋”更使他飘然，更加以贾宝玉自居。毛这位反抗英雄跟我说：“我不是圣人，我也不想做和尚。”

毛那晚又说，中国的庞大人口应该归功于中医的发达。他说：“至于中医，你想想看，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经过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战争屠杀，到现在人口怕有了五亿多人了吧？有这么多的人，是西医的功劳吗？西医到中国，不过上百年。数千年来，老百姓就是靠中医。为什么现在还有人把中医一笔抹杀呢？中国的书，只有佛经和中药书我没有读过。你读过医书吗？”

这可把我问倒了。虽然我的祖上都是中医，可是我没有想到中医对中国人会起这么大的作用。何况，在医生还没有出现的远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又怎样解释呢？

我说我试著读过张仲景的《伤寒论》，可是弄不清楚金木水火土的道理，读不懂，昏昏然不知道书上说的什么。

他大笑说：“阴阳五行是不好懂，可能是代表人体内的生理和病理状态。我主张中西医结合，首先要让一些有根柢的西医学中医，老的中医也应该学学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和病理学之类，要能用现代科学阐明中医的理论，

也应该将一些古典的中医书翻译成现代语言，或者加注解说明，经过一段时间，总可以形成中西医结合起来的新医学，对世界会有贡献的。”停了一下，他又说：“我提倡中医，可是我自己不信中医，不吃中药，你看怪不怪。”

是很怪。

他讲过以上的高论之后，又说：“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你同我一起到天安门上面去看看，这也是一次很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他紧跟着又问我，孩子有多大了。我告诉他，已经是五岁。他说：“你把孩子也带上去，让他看看。”我说：“这可是不能办。上天安门的都是首长，我因为工作关系，可以上去，但是孩子可不能去。首长们的孩子都没有上去过，他怎么能去？何况他很调皮，又不懂事，惹出事来，找来麻烦，那么我可真成了众矢之的了。”他听后，笑著说：“那好，就这样办。你回去睡觉，我也要睡觉了。”

我回到南船坞宿舍，已经是凌晨三点半钟，早就过了我每晚十点入睡的时间，娴还在等我。我将当晚的情况告诉了她。我说：“看来，他的身体很好，并不需要什么经常性的治疗。我这个角色与其说是医生，不如说是清客。”

娴说：“不能急，开头只能照这样接近他。何况，看起来他对你的印象还不差。千万不要急。”

那晚是往后多次与毛彻夜长谈的开端。毛很孤独，很少见江青，也没有什么朋友。所谓“延安精神”不过是个神话罢了。刘少奇和周恩来有时会来，但毛与他们之间的交谈只限于公文上的批阅往来，和不定期在“颐年堂”或毛所巡行的城市里，举行的会议讨论。毛和其他领导同志之间很少相互来往。他最亲近的人是那些年轻、知识水平很低的卫士。谈话范围自然有限。毛爱跟卫士们讨论他们



的女友，面授机宜，还代为写情书。但毛无法跟卫士讨论他最有兴致的两个话题--中国历史和哲学。

因此我成了毛的清客。我读些毛推荐的史书和哲学书，和毛讨论上数小时成了每周的常规。由于失眠症，他睡眠极不规律。一天分二十四小时，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他想睡时就睡，睡不著就找人谈话，或开会，或看书。时间对于他没有任何限制，也不起什么作用。

嫻劝我不要急是对的，但事实证明要适应毛并不只是一天两天的事。毛是个独裁者，我们这些在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必须事事以他为中心。在毛的官闱中如果胆敢有自己的主张，无宁是自寻死路。

## 注释：

早在一九三零年代中期，共产党于延安建立基地后，毛总是分住最好的居所。据说他在延安的窑洞是最舒适的。

另有资料来源显示，傅连璋的女儿、女婿在一九三四年长征初期遭到杀害。傅的女婿陈兵辉医生据说一九三二年曾替毛治病。傅与其家人经济充裕，生活舒适，是他们被控为 AB 团的原因之一。毛与张闻天救了傅，但他的亲人仍遭杀害。

第二天是五一劳动节，早上九点过后没多久，我带上必要的急救用具，走到卫士值班室。汪东兴与值班秘书都在。九点半毛从北屋出来，穿着一身浅灰色维呢的薄呢中山装，也就是毛服，脚上穿一双大元头的黄色皮鞋。他高兴兴的同大家打招呼。

这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赶到卫士值班室，看到毛在北屋外面，快步走过来，满面春风的向毛敬礼，大家祝贺节日好。毛说：“时间差不多了吧？”罗说：“可以走了。”于是穿过西厢房，走到颐年堂，大家在丰泽园大门口纷纷上了红旗车。

自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的所谓国庆大典起，每年的十一国庆和五一劳动节的群众游行，我都参加了。每次参加这种盛会，总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天安门广场上汹涌的人流，狂热的眼睛，使我感到作为中国人的无限豪情。

今年不同了，我不再是群众游行的参加者，我要登上天安门成为一个“观礼者”了。

罗叫我坐到他的车上。这车打头开路，从丰泽园沿南海北岸，出中南海东门驶入午门，停在天安门北侧西箭道下。罗赶忙下了车子，跑到毛的车旁，开了车门，搀扶毛下车。毛瞪了罗一眼，用右肘甩开罗的手，申斥罗道：“不懂事，你去照顾宋庆龄副主席嘛。”罗急忙跑到宋的车前，宋早已下了车。

那时的宋庆龄一定已有六十岁，但看上去不过五十岁上下，真是雍容大方。她向大家祝贺节日好，而且走过来，同我们握手致意，使人感到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另外那些所谓的“民主派人士”--李济琛、陈叔通和沈钧儒--就不同了。几个人都是老态龙钟，步履蹒跚。毛走上前，请宋先走，并招呼李、陈、沈等人一同走上箭道。临上天安门陡峭的石阶前，毛还搀了宋一把。

他们刚在天安门上露头，观礼的人们都鼓掌欢呼。

我是第一次登上天安门，感到又激动又好奇。我走到城楼两侧向下面望，人流在移动。我走进天安门城楼内，里面悬灯结彩，对着大门，用屏风隔出一大方地，摆着一排沙发，排成半园形，这是为给毛在会间休息，和会见参加五一节的外国客人。其余地方都摆着长的条案，罩上白桌布，两边摆着扶手软椅，桌上是一碟碟的点和水果，以及茶水饮料。

往年参加这种聚会，总是很不解，大会从上午十点开始，一直要到下午三时或四时结束，在天安门上的“首长们”，怎么能站立这么久呢？现在明白了，原来有这样一个休息和饮食的地方，这是在下面游行的群众所意想不到的吧。

毛缓步同熟识的人们握手，然后走向主席台，广场上的欢呼声，像大海的波涛，起伏不停，毛挥手向人群致意。这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开始。二十一响的礼炮响起，乐队奏着《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国际歌》和《解放军进行曲》。

先由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坐敞篷吉普车检阅部队，然后群众游行开始。

由身著军服的海陆空三军带队，开着坦克车和大炮驶过长安街。

毛及其他政府首长站立阅兵，乐队奏着军歌。

数以千计全身白装，颈间系着红领巾的学生，高举国旗和各色厂旗的干部、工人团体一波又一波的穿过，并在游行行进间向毛及其他领导欢呼。群众游行持续了数个小时之久。毛很高兴，没怎么去休息室休息。最后一波已是午后多时，上千个著白衣系红领巾的儿童经过天安门城楼下，高举花环向毛致敬、喊着共产党、中国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今天游行的群众都是经过筛选，政治成分可靠。这些群众真的热爱毛主席。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我只站在毛咫尺之遥，随同他检阅游行。我耳中回响着雄壮的军歌声，目睹五彩缤纷的群众队伍和中国精良的战备能力，心中涌满了澎湃的爱国情怀。

从天安门回到中南海，已经是下午四时半了。在卫士值班室前，罗瑞卿向毛说：“主席，晚上七点钟上天安门，各家分头去，就不集合了。”毛点头示意，走向菊香书屋。

罗走入值班室，向我们这些随从人员说：“你们都辛苦了，六点半回到这里，不要误了时间。”

我匆匆赶回南船坞，娴和孩子在房间里正在玩跳棋，看见我回来，都说怎么这样晚，公园去不成了。我告诉他们晚上还要上天安门，没有办法，什么地方都去不成了。娴说：“那怎么办？妈妈在等着呢。”我说：“这有什么办法，你们先回去，我如果回来的早，就去接你们。要是到九点钟我不来，你们就不要等我了。”

送走了她们，我到中南海东八所食堂去吃饭。我找到值班厨师，他给我煮了一碗挂面，什么味道也没有。

我回到一组卫士值班室，秘书和警卫们已经聚在这儿，都在抱怨没有吃上饭。汪说：“不要紧，等下到天安门上你们去吃点心。你们不要挤在一起，分开了吃。要不

然别人见了，会说，一组的人怎么这样闹特殊待遇，别的工作人员不准吃，为什么让他们同首长的待遇一样。”

七点时，罗瑞卿嘟囔说，怎么主席还不出来。汪急忙顺走廊到菊香书屋。过一会，汪走回来说：“王胡子给主席理发呢，上午没有来得及理发。”快七点半时，罗瑞卿大声说：“汪东兴，你还不快去请主席走。”我好奇的跟着汪去菊香书屋一探究竟。

原来毛就在中间那间饭厅内，坐在一张高背藤椅上，在颈部系上白布盖布，右手拿著一本线装书在看。

毛完全按著自己的舒服与否，随意转动著头颈。这个发可不好理。椅背太高，手不容易伸到脑后。理发的老王已经六十岁出头了。他随着毛的头的转动，而上下左右地剪着头发。没多久，老王已经满头大汗。

王胡子名王惠，从一九三零年代晚期就一直给毛理发。毛有一次同我讲到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开始整风运动，在随后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王胡子被打成反革命。抢救运动的目的是揪出反革命，被怀疑的人必须坦白交代。王胡子当时坦白说，他是暗藏下来的特务，要在理发时，用刀子杀死毛。

毛告诉我：“我就不相信，他给我理发和刮胡子这么久，一个小口子都没有割开过，怎么可能是要杀我的特务？如果要杀的话，早就可以下手了，还等到现在？我让他们叫王胡子来，我谈谈。王胡子来了，见到我就下跪，大哭说，坦白交代，要杀主席。我说为什么不动手呢？他说等国民党来了再动手，我说到那时还用得著你动手？我让他讲老实话，他说不这么讲，日夜不让睡觉，实在受不了，只能按他们讲的坦白交代，这才让他睡一觉。这样，我才下命令停止抢救运动，凡是以前坦白的全不算，有什么说什么，没有就不要说。”

王胡子从此对毛绝无二心。在毛的宫闱中，许多与毛最亲近的忠心分子都曾受过毛的救命之恩。

理发完毕以后，大家动身，我与罗、王同车。车上，罗责备汪说：“这么大的主席，你们就这样给理发。家里搞出一间房，修个理发室，到北京饭店拉一把理发椅子来。”汪说：“这些都好办。请示过主席，他不同意，只准这样子理发。”

罗又说：“王胡子这么大岁数了，手直抖，要把主席剪破刮破了皮，怎么得了？”

汪说：“给主席做事的人，就是不好找。王胡子从延安干到现在了，主席不同意换人。换个生人在他眼前拿剪刀刀子晃，他不放心。”

罗嘿然不语。我心里暗自奇怪，毛生活上的细节，罗为什么不知道呢？我又想到以后我工作，势必要用一些医疗用具，像注射针之类，毛会不会不放心呢？看来首先还是取得他的信任以后才好进行工作。

毛到了天安门上，立刻放起第一批烟火，衬著夜色下广场附近的万家灯火，景色十分壮观迷人。在空中绽放的缤纷焰火，将广场上无数身着彩衣的民族舞蹈表演者点缀得非常美丽烟火放得正热闹时，周恩来走过来，请毛到大厅内和来观礼的外宾一起拍照。这次接见中，包括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胡那年六十岁，瘦瘦的，留一口灰白色长胡子，穿一双草鞋，看上去很精神，中国话讲得非常好。给胡作警卫工作的张告诉我，胡十分喜欢中国，衣食住行，样样都是中国的好，全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特别喜欢住在广西和云南。我这是第一次见到胡，非常欣赏他。

最后一批烟火放完已经快十点钟了。大会里没有人告诉我这些点心总共花了多少钱。但我后来得知，光是这一晚的烟火费恐怕就不下五十万人民币。那时工人一月薪资

只不过是三十人民币上下。此后，我越来越觉得这般庆典过于铺张浪费，特别是在困难时期，大家普遍饿肚子的时候。多年后，这些庆典对我便变得毫无意义。

毛后来也对这些节庆意兴阑珊。不过每年过五一及十一这两个节日，他都很紧张。一是头天总想早睡，偏偏睡不着，大会的时间不能更改，往往不睡，或睡的很少上天安门。虽然如此，群众的崇拜倾倒总能令他精神大振，得以撑完全场。问题是他典礼后又常常感冒。感冒有时演变成支气管炎，好几个礼拜都不舒服。年事更高后，支气管炎更易导致肺炎。此外，他也讨厌打扮整齐和这些繁文缛节。

他之辞去国家主席，所谓退居二线，实际上，是将这些他称之为“表面文章”的礼数，推给别人去周旋。六十年代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决定，为了节省人力物力，此后逢五逢十才在天安门庆祝国庆。这说得似乎很中听，但骨子里是怕麻烦，怕感冒。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劲头反而来了，为了打倒政敌，巩固手中的权力，一跃而起，到天安门八次接见并鼓励红卫兵“造反”。这些花费比平常的国庆和劳动节庆典要大得多。毛在权力斗争中，从无顾及花费的问题。林彪一九七一年九月叛逃苏联途中坠机身亡之后，毛便再也不曾出席任何庆典。天安门的庆典就此取消。

但在一九五五年劳动节之时，毛仍极为振奋。

放完最后一批烟火，我以为这下可以回家了，不料毛还举行了一场舞会。这真使我大吃一惊。解放后，跳舞场就因其颓废和具资本主义特色而被全面禁止。但在中南海的深宫朱墙内，毛内住地西北的春藕斋，每周末有一次舞会；一九六零年以后改为星期三、星期六晚各一次。那晚放完烟火后，就有一个舞会，而且我还必须出席。



我和毛一起走进春藕斋，警卫团政治处文工团的女团员们，一下子都围上来，争著要同毛跳舞。原来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组成临时乐团伴奏，后来改由专业文工团乐队伴奏，奏起舞曲--大都是民歌小调--年轻女孩轮流上来和毛跳舞。毛的舞步迟缓而笨拙。毛跳完舞后，喜欢和女舞伴聊聊天，但马上就又换上下一个女孩。前阵子江青去杭州了，所以她没有来，朱德和刘少奇倒都来了。只有毛、朱、刘这三位领导坐在桌旁，其他百余名左右的办公厅干部和文工团的女孩子都坐在靠墙边排排放的椅子上。我那时年轻，任毛的保健医生，又是舞厅里少数的男伴之一，所以年轻女孩子也请我跳舞。

有时舞曲音乐会嘎然停止，换上北京戏曲的小调。北京戏曲是种民间通俗文化，内容多半是缠绵悱恻的庸俗爱情故事，有时甚至十分色情。西方人听不懂它高亢吵嚷的曲调，其格调和西方舞曲完全相反。

文工团的乐队奏起了“苏三起解”中的小过门，舞场内立时沸腾起来。毛和著小调，跳起他独一无二的西洋舞步。在舞会的乐曲上，毛与江青的爱好完全不同。毛喜欢民间小调，江喜欢西方乐曲。所以在跳舞上，二人也合不来。

我看看，春藕斋里正是急管繁弦，舞步杂踏，没有我的事了。我正打算回去，李银桥拉住我，他说：“你可千万别走，主席他跳舞，总是注意身边工作的人在不在。如果不在，他会说是我不合作，把你排挤走，会认为我们之间在闹意见。”我说：“这怎么可能？没事怎么会闹意见？”他说：“你可不了解。时间久了，你就知道。”

事情正如李银桥所说，毛很注意在他娱乐活动的时候，他身边工作的几个人是不是都参加了。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在杭州，浙江省委给他在杭州饭店举办舞会。我当

晚很累，没有去。过了一会，一个卫士敲了门，说：“主席问你为什么没有来？是不是值班卫士故意不通知？快走吧。”

另一次在一九五八年，到湖南长沙，我因雨大，没有去看花鼓戏的演出。但过了半个多小时，湖南省公安厅李厅长赶来，又接我去了。从这两次以后，凡是毛参加的活动，我定到不误。

数年后我才了解举办这些舞会的“内幕”，所谓警卫团政治处文工团是由汪东兴负责组织，其真正目的在于提供毛娱乐，并非官方所说，是为了服务警卫团。文工团挑选年轻、“可靠的”女团员做为毛的舞伴。

一九五七年，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在政治局给毛提意见，问毛为什么要在警卫团成立文工团。彭是政治局委员中最直言敢谏，勇于向毛挑战的领导干部。彭斥责毛弄个“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并直斥罗瑞卿、汪东兴不干好事。因此，警卫团文工团被撤销，但毛并不缺女伴。其他文工团的女孩子--北京军区、空军、铁道兵、第二炮兵文工团等--都来陪毛。

但一九五五年的五一劳动节，在第一次舞会上，我对这些臭事一无所知，我只想尽早赶回南船坞和家人过节。曲终人散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汪东兴招呼我去吃消夜，我没有去，急着赶回家，我知道娴还在等着我。

在家中，我们一起吃著蛋炒饭。我未能和家人一起过节，娴感到非常失望。我母亲做了不少菜，等我到十点钟才开饭。我儿子李重累得在母亲那睡著了，那晚就睡在老家。

我第一次跟毛见面至此还不到一个礼拜，但我的生活已经起了剧烈的变化，起居无时，饮食无常。娴说：“你要跟毛主席一样了。”从那时开始，二十余年来，全家的

生活都被搞乱了。我非常爱娴，但我很少能待在家里。过去我们总期盼着国庆日、劳动节和春节的来临，我们通常去我母亲那一起过节。在我为毛服务的那二十二年间，我只放过一个礼拜的假，一家人也从来没机会再聚在一起度假。

毛常要我凌晨时分去陪他，因此我回家时，每每已近破晓时刻。娴往往坐在灯下忧心忡忡地等著我。我每次同毛出巡外地，常常一去几个月，甚至一年，这期间她一贯寝食难安。我二儿子于一九五六年出生时，我正在外地。

不单是我不常在家的问题，即使我人在北京，娴也不能参与一组的生活。娴一直未被批准入党。好在我是毛的保健医生，这职位使她安然度过一次又一次使生灵涂炭的政治浩劫。

以后，娴在各方面支持我，使我能无后顾之忧。我的家完全是她一个人在管理、在支持。她尽心尽力照顾孩子们和我年迈的母亲。娴刚回中国时，是个精力充沛、活泼外向，对人生充满热情的年轻女人。我眼睁睁看娴经过岁月摧折的转变，内心之痛苦，笔墨无法描述。新中国拒她于门外，她为我忧心忡忡，在在都迫使她变得内向而沉默。她常对我说：“我们过的仍是流浪生活，有家等于没有家。”她的蓬勃朝气似乎正在一点一滴的流逝。

## 注释：

王胡子的屈迫成招并不是停止延安整风运动的唯一原因，许多人均被诬陷。

毛自一九三零年初期便曾在延安举办过舞会。叶子龙那时负责从其机要秘书室中挑选女孩子和组织临时乐团人员。

毛自己在一九五三年也觉得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时期成立文工团至为不妥，但也未能将其解散。

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差不多是我与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六个礼拜后，汪东兴突然要我火速赶往北戴河。北戴河原是渤海湾内的一个小渔村。一九五零年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直管理局在海滨给每位“中央领导人”预备了房子，就是将接收下来的别墅重新翻修，作为避暑之所。毛和他的随从几天前就去了北戴河。这次由原来的周泽昭医生陪毛同行。当时我还兼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仍未曾随毛主席出巡。我想这么紧急的召我去，一定是很严重的事。

好在每天有一列由北京直开北戴河运送公文往返和政府官员的专车，我当天就到了。

我到了北戴河后才知道，当天凌晨时，一次寒潮引来狂风暴雨，涌起的海浪有一层楼高。毛一夜失眠，没有睡觉，要下海去游泳，风浪太大，卫士阻挡不住，打电话给汪东兴。汪匆忙赶到海滩，毛已要下海。汪劝阻毛不要下海，毛没有理汪，走入浪中游向深处。卫士、警卫员和中队队员纷纷向毛周围游去。

汪看风浪太大恐怕出危险，焦急之下打电话给周恩来和罗瑞卿。周、罗二人赶到海滩，毛已游到远处。周感觉责任过大，又无可奈何，于是报告了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周希望刘出面阻止毛冒险，但被刘拒绝了。刘少奇也许只是识时务，不愿犯上大不韪的罪名来阻挠毛的一意孤行。

就在毛下海游泳的时候，江青也赶到海滩。她叫当时在场的周泽昭医生下海照顾毛。无奈周医生已经五十多岁，年事已高，不会游泳，不敢下海。江斥责他说：“主席游到风浪里去了。万一出事，你站在这边有什么用处。”于是周医生坐上一条小船追上去，可是风浪太大，颠簸之

下，在船上根本坐不稳，他又晕船。等到毛回到海滩，周医生由警卫人员抬扶到岸上，只能躺在沙滩上呕吐。这更使江青大不满意。原来这就是要我立即赶到的原因。

毛游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回到海滩，对汪东兴极不满意说：“你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游泳。你自己横加阻挠还不算，还想用中央压我。”

汪东兴和罗瑞卿负责毛的安全工作，是毛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但他们面临了棘手的难题。如果毛出了事，不管他们有多忠心，也不管这是不是毛本人的意思，下场不但是被撤职，还会送命。

但毛却认为汪、罗两人想限制他的行动自由。毛进一步觉得政治局委员想控制他。毛总是我行我素，谁想阻挠、拂逆他，谁就挨一顿臭骂。这次的北戴河事件在毛与汪、罗两人关系上投下一道阴影。他的愤怒隐藏了许多年才终于爆发。

北戴河事件也是我生活的转折点。夏季将尽，周医生被悄悄撤了职。周离开中南海，前往北京医院任院长，我成了毛的专任保健医生。我的工作一来是替毛治病，二来是维持毛的健康。如果他生了不该生的病，或是有任何病痛，我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我的工作与身家性命紧密相连，我必须小心毛身体上的任何细微变化。因此我得先行接近他，才能深入的了解他。自毛从北戴河回中南海开始，我每天都去见他。此后，我也随同他出巡北京或外地，我不断翻阅毛的病历时发现，近两年毛每次检查血液中的白血球，总数都高，其中的中性白血球计数也高。但是一九五零年以前的检查，白血球总数和中性白血球计数都很正常。这表明在毛的体内某处，有慢性炎症存在，但是没有检查，我确定不下来。

我不知该如何说服毛接受检查，他觉得自己很健康。一九五一年有几位苏联医生来帮他作身体检查，查了大半天，搞得毛大发脾气。自此后他就很讨厌医生。

一次他同我读英文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间他谈到战争，由此我谈到人体的抵抗力，谈到白血球是人类抵抗细菌的“战斗部队”。我告诉他，这两年他检查出来，白血球比过去高，表示身体某处有慢性炎症。他说：“为什么？”我说：“如果没有慢性的细菌增殖，身体不会有增加抵抗的表现。但是白血球并不太高，又没有别的不舒服症状，可见这炎症不严重，可能是在什么地方有窝藏细菌。”

他问我有没有办法弄清楚。我告诉他先将容易藏细菌的副鼻窦、牙齿、喉咙和前列腺几个部位查一查就可以。他问我要多长时间。估计半个小时就完了。他要我立刻检查。

我先查了鼻腔和上颌窦及额窦，没有发现不正常。又查口腔，牙齿上积垢太多，成了一层绿色膜。毛保留着农村习惯，从来不刷牙，睡醒后，最多只不过用茶水漱口，叫他看牙医更是比登天还难。我想起，十月一日在天安门上，彭德怀走来同我说：“主席的牙齿像是涂了一层绿漆，你们要劝他刷牙。”毛有几个牙齿，用手指稍压牙龈，就有少量脓液排出。我怀疑毛为了讨厌看医生，天大的病痛也强忍下来，不肯吭声。可见毛是极能耐苦的人。

我跟毛解释牙齿是主要问题。他说：“这怎么办呢？你给想想办法。”我建议他请个牙科医生看看，因为一般医生在学医的时候，虽然也学牙科，但只是稍微涉猎，尤其在毕业以后，更是从来不接触牙科，所以很生疏。他笑了说：“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么说起来，你倒不是强不知以为知。”他同意了我的建议。

随后我检查前列腺。他有包茎，包皮很不容易翻上去。自他迁入中南海以后，就再也没有洗过澡。他觉得洗澡浪费时间。他的卫士每晚在他批公文、看书或闲谈时，用一条湿毛巾替他擦身。毛右侧的睾丸没有降到阴囊，也不在腹股沟，所以是隐睾。这不会影响到性能力，但能导致睾丸癌。我得注意这个不正常现象。毛的前列腺不大，柔软。我做了前列腺按摩，用试管装了精液，拿回到办公室。

隔了两天，毛起床后，要去请牙科医生来。我请了北京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的张光炎医生。张是华西协合大学牙医学院的毕业生，比我高两班，在学校时就很熟识。

临时诊所就放在菊香书屋内中间那饭厅里，理发用的高靠背藤椅正好用做诊疗椅。我接来张医生。张十分紧张，问我检查时有什么判断，又问我毛的习惯与性格。

我老实告诉张，毛的性格，我还不完全了解，因为我也初来不久，我只知道，他喜欢简洁，不喜欢迟缓罗嗦，张担心做不好。我说不会，他决心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会配合好。我叫张放心。

我带著张医生走进北屋中间的那间饭厅。毛坐在藤椅上，正拿著一本线装书在看。毛在会见客人时，总是拿著一本书在看，以缓解心情紧张。另一方面，毛很清楚他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明白一般人都像对待神祇一样的对待他，拿著书也可帮助他先想好谈话的内容。他以说笑话、谈琐事做开端，使他的客人一下子就从精神紧张中松弛下来。特别是对初次见面的人来说，他表现得既机智，又幽默，且富于谈话的技巧。毛用亲切而不著边际的口吻，使见他的人自然而然地讲出真心话。



毛放下了书，笑著说：“一卷在手，看得昏天黑地，你们已经来了。”同时站起来与张医生握手，示意让我们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

卫士给我们端来茶。给毛拿一个热手巾，毛擦了脸，又擦手，并且著意地擦一个个的手指。

然后毛问起张的名字，说：“你叫光炎，那么是光大炎汉的意思了。这个名字在清朝末年，反清运动时，是很吃的开罗。”又问张是哪里人，张回答是河北省人，不过在四川住了好多年。

毛说：“啊，河北，这河指的是什么河呢？”张说：“黄河。”毛说：“黄河原来靠北，自东汉以来，越来越向南移。河北离黄河越来越远了。”

毛点燃了一支香烟，又问张说：“四川是哪四条川呢？”张脱口说：“岷江、沱江、嘉陵江和金沙江。”毛笑了笑说：“不是金沙江，是乌江吧。乌江比金沙江大得多啊。”张也笑了说：“我想到主席的诗‘金沙水拍云崖暖’，所以认为是金沙江。”毛大笑说：“那是写诗啊。”

当谈到张和我都是华西协合大学毕业，而张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时候，毛欢快地说：“抗日战争时，在延安，美国派来一个军事代表团，和我们相处得很好。由美国来的医生，像马海德(GeorgeHatem)，一直同我们在一起不走。在消灭花柳病上，他出了很大力。他是你们的同行。”

马海德(一九一零～八八)于一九三六年和斯诺一同前往共产党北方基地陕西保安，后来终生留在中国行医，入了中国籍。

“美国也给我们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那时美帝仍是中国的头号敌人，这言论简直是反革命。“你们是英美派的，我就用你们这些英美派。”他又对著张说：“我

在学英文，李大夫就在教我读英文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是 Socialism 吧？”张说：“是。”

这时我看张已经完全放松，神态自如了。我说：“主席，现在检查吧？”毛说：“那好。”

张给毛清除掉许多食物残渣和齿垢。张慎重地向毛说：“主席以后要天天刷牙，齿垢太多了。”毛不以为然说：“我一向用茶漱口，不刷牙。老虎并不刷牙，为什么虎牙那么锋利呢？”这一下子将张和我都问住了，实在出乎意料，不知怎样回答。

毛眨眨眼说：“你们医生也有些生理现象说不清楚吧？”张说：“很多。”

张又提出要拔除左边上面第四个牙齿。张说：“这个牙齿的周围已经有脓，牙齿很松了，如果不拔，会牵连前后的牙齿。”毛说：“真有这么严重吗？”张正色说：“我可不敢乱说，这是真的。”毛点点头说：“那就照你的办。可是我很怕痛，你要多用点麻药才行。”

张悄悄地问我：“主席对普鲁卡因过敏吗？”我说：“在他的病例记载上，肌肉内注射过很多青霉素，都加普鲁卡因止痛，没有一次过敏反应。”张又悄悄同我商量说：“这个牙只要稍一夹就可以下来，还要用麻药吗？”我说：“还是用一点，这样他可以放心。”张说的对，真是轻轻一夹，就顺利地拔下来。毛十分高兴说：“英美派胜利了。”

过了两天，我又给毛取了耳垂血检查，白血球总数和中性白血球计数都恢复到正常。我将检查结果告诉他时，他高兴地说：“你解开了存在几年的一个谜。你胜利了，英美派万岁。”又让我准备好牙刷牙膏，决定刷牙。但是他坚持不到几天，就又放弃了。

往后几年毛仍有牙痛，也仍然讨厌看医生。他的牙齿全部变黑，一颗颗掉了下来。到一九七零年初，他后上方

的牙齿全掉光了。好在毛说话或微笑时，嘴唇总能盖住剩下的牙齿，因此很少人注意到齿疏色黑的现象。前列腺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毛的前列腺正常，但报告显示他没有生育能力。毛与他前后三位妻子生了好几个小孩。毛跟江青生的小女儿，李讷，那时不过是十五岁。看样子毛的生育能力是在中年后停止的，我一直无法找出病因。

我告诉他，前列腺没有问题，不过没有生育能力了。他说：“那么我成了太监了？”我说：“不是。”我这才发现毛完全没有基本的生殖常识。他也是现在才知道他的右侧辜是隐辜。我又解释说：“生育能力全看精虫是不是正常，性欲和性能力与精虫没有关系。”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毛担心的不是他的不孕症，而是性无能。他一直相信性生活活跃期是在十二岁到六十岁之间。他讲他年轻时，在韶山曾和一个十二岁女孩子有性关系。他一直对此事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一九五五年这时毛六十二岁，深恐从此丧失性能力。也是在此时毛开始有阳痿现象。毛坚信性能力和健康有直接关联。在我刚去他那里工作时，他正由别的医生建议肌肉注射鹿茸精，我不同意这种治疗，但骤然无法使他中止。随着他自己的年龄越老，他将上面说的年限不断扩大，最后成了“男女年龄在十一岁到八十岁之间”。这无非是以他自己的性经验做出的结论。

我只好等所谓一个疗程完结后，同他说明这类称之为“补肾壮阳”的药，对身体有害无利。他说：“你们医生有的说这样，有的说那样；这个赞成，那个反对。看来医生的话，只能听七分。”但他也并未再坚持注射。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他相信一些长寿的药，也想寻求这类药。例如，那时宣传很多的罗马尼亚医生勒普辛斯卡娅的长寿法，用肌肉注射奴佛卡因，即她称为 H3 的。

他很相信，要来了一些相关资料，详细看过，按法注射了将近三个月，他自觉没有什么效果而停止。

以后他还是要我找既安全又有效的壮阳药。我同泌尿科和精神科医生商量后决定用暗示治疗，胶囊内装上葡萄糖，取了一个名字，给他服用。

后来我发现毛在权力斗争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下，阳痿现象最为严重。一九六零年初期，他势如中天，阳痿突然完全治愈。毛和江青那时早已不同床，但毛跟那些年轻女孩完全没有问题--同床的女人数目增加而平均年龄骤减。

即使毛不断求长生不死药，他仍相信他自己年轻时写的一首诗。诗中自豪“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在一九六零年中期跟外宾说他准备去见上帝--或是马克思--完全只是一种伎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的健康状况达到最高峰。

毛在被攻击时常久卧不起，但他也把生病当成一种政治策略。毛的健康状况常是中国政治局势的反映。

一九六三年，中苏关系陷入低潮，毛在苏联驻中国大使前表演了一出精湛的垂死大戏。他想藉此观察苏联对毛之死会有反应。先前他在我及数位卫士的众目睽睽之下，在身上盖了一块毛巾被，假装痛苦万分，表情呆滞，语不成调。“我演得好不好？”他问我们。然后毛把苏联驻中国大使叫到床前，演将了起来。

相同地，在一九六五年，毛故意跟旧识斯诺说他快死了。毛这一方面是在刺探美国对此事的反应，另一方面想藉此使美国改变其中国政策。同年，他也告诉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同一句话，考验欧洲的反应。

毛常指控他人挑拨离间和阴谋诡计。但说起搞阴谋，谁都搞不过毛。

## 注释：

毛未曾修饰过的照片可清晰看见他微笑时露出的黝黑牙齿。

一九九二年九月伯克莱《健康杂志》(WellnessLetter)指出，近几年新推出“一种有名的罗马尼亚防止老化的药方”，它能“使你一夜之间变得更年轻。”这灵丹妙药为普鲁卡因(商品名称为奴佛卡因，Novocain)。报告中声称一位安娜·阿斯兰医生在一九四零年代于布加勒斯特曾用此药进行试验。没有任何研究显示此药品是否真有所宣称的效果。

在本书此处和其他处，读者将会发现中国医学界对此未达成学术共识。这在美国也是个新主张。

我刚给毛做专任保健医生时，毛的医疗问题都不严重——感冒、偶发性肺炎、皮肤搔痒、鸡眼或胃口不好。毛的便秘倒是非常严重，因此他的卫士两、三天就给他灌肠一次。大家每天都在讨论他的便秘。哪天突然正常如厕，便成了件大喜事。

毛的精力充沛，异于常人。他计算时间的方法，与大家完全不同。上午下午，夜间白天，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他的身体拒绝依照二十四小时的变换来运转，他大部分的活动都在夜间进行。

大体上，每次入睡的时间，总比头次入睡时晚三、四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又常常睡四、五个小时，或五、六个小时，就醒了。醒著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时连续二十四小时，甚至三十六个小时不睡，随即连睡上十或十二个小时，环境嘈杂也不受影响。也许毛的生理时钟一向就不规律，傅连璋在一九三零年代初期曾想治好他的失眠症，但长达二十年的行军和革命生涯，使毛的睡眠完全纷乱不堪。毛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讲到失眠。这位英国元帅说，在第二次大战时，战况如何激烈，他也定时入眠。毛说，你真是好福气。

每当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时，象他一次同我说的，引了《西厢记》张生的一句话，真是“捣枕捶床”，无法成眠。于是无论昼夜，他总是做些体力活动，如游泳、跳舞、以求体力疲劳。在我做他的保健医生前，他已服用了二十年的安眠药。傅连璋在一九三零年代给他开的是佛罗拉(Veronal)。一九四九年以后，改用温热葡萄糖水送服药效极强的阿米妥钠(sodiumamytal)零点一克的胶囊一粒。毛按这个方法，往往睡不著，于是加服一粒或两粒，

甚至三粒，也就是最多时，用到了零点四克了。而正是这个时候，大家最为紧张不放心的了，因为他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走路摇摇晃晃，可是又最不愿意别人搀扶。

我到职前，傅看到药量太大，惟恐中毒或成瘾，所以暗中将胶囊减量，只装零点零五克或零点七五克，告诉毛仍是每个零点一克，但毛服用剂量还是越来越大。

我知道毛服用的是安米妥钠后，感觉十分不妥，我从来不给病人服用这种药效强烈的安眠药，也怕毛会上瘾。我劝他不要吃药，毛回我一句：“那我不用睡觉了。”他不肯听，还是继续服用。

他有一次开玩笑问我：“你说一年多少天？”我很奇怪他怎么提这样的问题。我说：“自然是三百六十五天。”他说：“对我来说，一年恐怕只有二百多天，因为睡的少。”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以后说：“不，要用醒的时间长度算。主席的一年要有四百多天，很象‘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了。”毛哈哈大笑说：“照你这样算，失眠倒成了长寿的办法了。”这自然是说笑话，我确很清楚他的意思，对失眠真要想想对策。

我同傅连璋谈过一次，要改变以上方法。安米妥钠是一种起作用慢，但作用时间长的安眠药，用来引导入睡比较差。我建议改用起作用快，而作用持续时间短的速可眠钠(SodiumSeconal)。晚饭前二十分钟服用零点一克的速可眠钠两粒，来迅速引导入睡。饭后可以再服一粒安米妥钠，以延长睡眠，而且要将胶囊内药量不同，告诉他本人。给毛服药的是他身边那些没有医学常识，农民出生的年轻卫士，而毛的保健是我的责任，我必须确定卫士们不会给毛服用过量才行。

傅同意这方法，我然后将这方法同毛谈了，而且说：“用这种方法，睡眠会好得多。”毛似信不信地说：“说嘴郎中没好药，试试看吧。”

事实上用这个方法以后，确实使入睡好些了，睡的时间长些了。后来有的胶囊只装葡萄糖，与不同剂量的安眠药配合服用，起了很好的效果。他有几次笑笑的说：“你这个偷工减料的药葫芦里，卖的药倒还管事。”

但有时毛的失眠严重到我的方法也不起作用。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

神经衰弱(Neurasthenia)这病名在美国已不再被提起，在中国却非常普遍，毛和江青皆深为所苦。一般来说，神经衰弱是由心理抑郁所导致，但中国人一般认为自己有心理压力等于丧失颜面，因此症状多转为生理疾病。神经衰弱最普遍的症状是失眠，其他症状则包括头痛、酸痛、头晕、恐惧感、高血压、沮丧、阳痿、皮肤疾病、肠功能失调、食欲减退和脾气暴躁。

后来，我逐渐把神经衰弱视为在共产党内无路可走的政治体系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疾病。我第一次处理的病例是在一九五二年。那时我大哥在“三反”运动中遭到批斗，发展出严重的神经衰弱，主要症状为高血压。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展开后，许多无辜的人被误打成右派，神经衰弱的病例大为激增。在国民党政府主政时，我未见过比例如此高的情况：那时不管政治局势变得多糟，总有法子可以逃离那个政权，但在共产党统治下，却是无处可逃。严重的精神病，比如精神分裂症和忧郁症，都可以在共产党体制中得到通容；但轻微的心理困扰被硬批成“思想问题”。中国人觉得看心理医生是很丢脸的事。在毛在



世期间，国内也根本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治疗，而且医生只提供药物，不可能深入探讨疾病的根源。

我从来不以“神经衰弱”一词，来界定毛的焦虑抑郁。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毛会觉得我是在轻视他，我也会被撤职。他也从来不用这个词。毛久卧不起，忧郁终日时，他只简单说他心情不好，要我对症下药。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皮肤瘙痒和阳痿，严重时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否则会跌倒，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有一次他接见非洲的代表团，许多团员围著他，兴高采烈，用手指著主席做了很多姿势，我察觉毛开始摇晃，连忙跑去扶他。因此，在他外出、走路、接见客人时，一定有人在旁扶持。当然，在他情绪高涨，精神振奋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而经过多次检查，毛无论心、脑、内耳都没有实质的病变。

毛的神经衰弱与一般人原因不同。毛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五十年代中叶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的问题不断增加。每在这种情况下，毛就会长期失眠，在毛苦想应对战略和得到最后胜利的数周、数月中，睡眠变得非常混乱。我在初任他保健医生时，不清楚他正困在对农村合作社化的反弹险境中，而我帮他治疗的失眠症，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毛的目标是在迅速而全面化的完成中国的改革，他对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实施的农村土地改革并不满意，土改后私有财产制仍到处可见。毛要的是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农村合作社化。中国太贫穷，农村机械化则过于耗日费时。

一九五三年农村合作社化运动开始在农村展开，由于步调过快，又倾向于建立难以管理的大型合作社，要求农

民缴交农具和牲畜，使农民和许多领导干部反对声浪日高。中国某些地方在建立合作社后不久，便立即撤销。撤销工作由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下令执行。毛认为邓和一些党内官员主持下的农村工作部阻碍农村走向社会主义化的道路，从而取消了农村工作部。邓受到批评，从此一蹶不振。

另一方面，至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戴河，为了农村合作化问题，毛与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更形紧张。在狂风巨浪中游泳，只不过是表现出他决心无视于任何艰险，而勇往直前。

一九五五年秋到五六年冬，毛主持了一连串宣扬社会主义改革的会议。一九五五年的秋天，为了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批评共产党内有些领导人“右倾”，并号召加快农村社会主义化的改革脚步。在这期间，他常常严重失眠。

十月中旬的一天，已经有三天没有睡好，这天又是连续三十几个小时不能入睡，服过几次安眠药都不起作用。他到了游泳池游泳。待我接到电话通知，赶到游泳池时，他已经游完。这时天气还暖，正是中午，他躺在躺椅上晒太阳。

我看他面色红润，精神很兴奋，可是神态却显得疲惫了。他要我坐下，问我游不游泳。我告诉他，今天还没有吃饭，不游了。毛笑了说：“我不吃饭，没有睡觉，还游了一个小时。吃过三次安眠药也不顶事，你是不是拿的偷工减料的安眠药？”我笑起来说：“主席，今天可都是真的。”他说：“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睡觉。”

我告诉他，可以服一次水合氯醛(chloralhydrate)试试看。傅连璋告诉过我毛一贯不吃水药，所以我说明，这可是水药，而且味道很不好吃，苦、涩，还有点辣。

他说：“我爱吃辣。这不相干，拿来试试。”

我坐车赶到弓弦胡同。那时傅连璋仍负责管理毛及其他领导人的药品，保健局药方经由香港公司由美国、英国和日本批药进来。为了安全起见，毛的药品都是用毛在一九四六年，在国民党围剿弃守延安时的假名--李德胜--来配药。

药剂师将瓶塞加上火漆密封印章，交给我。这时傅连璋知道了，跑过来，急切地说：“主席从来没有吃过水药，你怎么这样大胆，把这么难吃的水药给他吃？他发起脾气，怎么办？”我说：“傅部长，这些我事先都同他讲了。他让拿去给他试试。他在等着，我得赶快。有什么情况，我以后再向你报告。”我匆匆往外走，隐隐地听到傅在叨叨：“怎么这样莽撞，事先也不同我商量好了再办。”傅认为他是我的领导，应有权参与毛所有的保健问题。他以他与毛之间长久的关系自豪，自以为很了解毛主席，而毛也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但现在常跟毛接触的人不是傅连璋。毛正开始对我信任有加。

赶到游泳池，饭刚做好。我讲：最好先吃药再吃饭。毛同意，说：“那好，听你的。”我给他倒了十五毫升在小杯子里，他一口气喝下去，然后说：“味道很不错。我不喝酒，这倒像酒。”接着他又说：“这个灵不灵，还难说。”

这时饭菜摆上来，看来药的作用已经开始发挥了，他正处在安眠药作用开始的欣快期，饭吃得很好。等到吃完饭时，他已经昏昏欲睡，来不及回菊香书屋了，就到室内游泳池的床上睡了。这一觉，从下午近二时起，直到半夜十二时多才醒，足足睡了十个多小时。

醒后，他十分高兴，半夜把我叫回去，跟我说我这炮可打响了。

我走进他的睡房，他正在闭目养神，他睁开眼睛，拿半截香烟装在烟嘴上点燃，说：“你给我吃的是什么药？怎么会这样好？”我扼要说明了这药的性质和作用，并且说：“这是安眠药中最早出现的，十九世纪已经由医生普遍应用在临床，所以对这个药的作用和副作用，了解得最清楚。这个药对人体安全。”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给我吃？”我说：“主席不爱吃水药，这药味道又不好，所以不到不得已时，没有拿出来。”

事实上安米妥纳的效果和水合氯醛差不多，但是他已经几天失眠，当天又是疲乏不堪，再加上服药前，用语言和行动，使他在精神上接受了有力的暗示治疗，因此才会如此见效。

我想毛清楚他的精神衰弱根源在生、心理两方面。他也相信精神慰藉的力量。小时有次他病重，他母亲带他到佛庙里去拜拜烧香，毛服下香灰后，就不药而愈。“我反对摧毁佛寺，”毛在全中国“破四旧”捣毁庙宇时跟我说：“乡里农民，小病挺挺就过去了。大病也不一定找医生，拜个菩萨，求点香灰回来吃。你不要小看香灰，给人的精神上的支持可大啊。”

他笑着说：“你倒是留了一手啊。你这个郎中还有点好药。你回去睡觉，我要开始办公了。”

从此以后，水合氯醛成了他必不可少的安眠药，与速可眠钠同时用。到六十年代以后，毛上了瘾，不只吃饭前服安眠药，就是会客、开会、晚会跳舞，甚至性生活前都要服一次。

## 注释：

1.毛其他随身人员也描述毛的便秘。据说在井冈山，贺子珍用手指替毛抠便，后来她学会了灌肠。国共内战期间，毛拒绝使用盥洗室，都由他的警卫陪他到野外，在地上挖个坑如厕。据说在长征期间，毛顺利如厕可以激励红军士气。

2.在本书中，因为李医生未受过精神医学训练，李的用词“抑郁”是一般大众的用法，而非严格的医学名词(depression--忧郁症)。自毛去世后，中国人对心理疾病的观念已有改变，许多城市那都设有心理咨询诊所。

我一向不过问政治，对毛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之间剑拔弩张之势也一无所知。一九五六年初，我开始察觉到毛主席正在策划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到今天，我才懂文化大革命那场持续十年的政治大风暴，其实早在一九五六年便已播下了种子，赫鲁晓夫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联共产党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中发表的那篇反史达林秘密报告是其导火线。

毛并未参加大会，由朱德率领中共党代表团前去苏联。朱面容慈善，那时已是七十岁，头发很黑而多。朱没有政治野心，解放后几乎是半退休，只担任几个荣誉职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和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官方性的巡查和在中南海的花房里种花——他养了上千盆兰花。人代会委员长是个闲差，但大家仍称他“朱总司令”。中国人民十分尊崇他在共产党所内做的贡献。

赫鲁晓夫突如其来的举动使朱德措手不及。朱德向中央打电报请示时，表示要支持反史达林。毛十分震怒。毛说：“朱总司令这个人十分糊涂。可见朱德和赫鲁晓夫都靠不住。”

毛对国家领袖的角色持着神秘主义的信念。毛从不曾怀疑他自身的领导能力。只有他的领导能改造中国。全天下都认为毛是中国的史达林。和一般中国人一样，毛视自己为民族救星。赫鲁晓夫的那篇反史达林秘密报告，直接对毛的统治构成威胁，质疑毛的领导，毛被迫起而迎头痛击。如果毛同意赫鲁晓夫反史达林的攻击，等于为往后会有反毛运动铺路。毛决不容许此事。史达林于一九五三年去世后，赫鲁晓夫随即领导苏联，毛毫无异议。但发生

反史达林事件后，毛转而对赫鲁晓夫深怀敌意。毛认为赫鲁晓夫违反了一条基本的革命道德--那就是忠心不二。赫鲁晓夫能有今天的地位，完全归功于史达林的提拔；赫鲁晓夫此举无异是过河拆桥。

此外，毛觉得赫鲁晓夫这样做是为虎作伥---授美国帝国主义以柄。毛说：“他们不要这把刀子，我们要拿起这把刀子，我们要充分使用这个武器。你们苏联反史达林，我们不反，我们不但反，我们还要拥护。”

我一直非常敬仰史达林。但是毛反对“反史达林运动”并不是出于对史的尊敬。

事实上，毛鄙视史。我听到毛形容他和这位前苏联领袖的关系不好时，非常惊愕。

毫无疑问地，毛在一九五六年初跟我说的一番话是气话。毛时常扭曲历史以迎合其政治目的。

毛对史的强烈个人憎恶要追溯到一九二零年代建立江西苏维埃政权的时期。

一九二四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不久，第三共产国际命令共产党与国民党携手成立统一战线。中国当时四分五裂，第三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完成统一，建立中央政府。但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反悔，大举歼灭城市里的左翼分子，毛逃回湖南，亲眼目睹农民的暴动。毛于是认为，中国农民一定会起来领导二十世纪的革命。毛便大胆采取了一个合於中国历史情境，却为非正统马列主义的战术。毛发动共产党领导农民秋收起义。随即毛在江西井冈山建立基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毛在此号召农民的支持，实行土改，继续和蒋介石的军队做游击战，以耗损国民党的力量，进而领导农民攻占城市。苏维埃政权在毛领导下日渐壮大。

一九三零年，史达林指派当时才二十五岁，在苏联读了好几年书的王明为第三共产国际代表前来中国。据毛所言，王明虽未实际领导中国共产党，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按照王明的指示，执意将当时的革命路线由乡村推往城市。毛认为当时势力仍薄弱的红军一定会节节溃败，元气大伤，因此大力反对，而被打成保守右倾，并前后不下二十次被撤、降职，以及开除出党，并被封为狭隘经验主义。毛说：“长久以来，史达林骂我是红皮白萝卜，意思是外面红，里面白，我也没有骂他。”

江西苏维埃政权岌岌可危，蒋介石发动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时，红军决定突围而出，开始了历史性的长征。在长征途中，毛夺回指挥权。

毛认为红军早期的失败全该归罪于史达林和第三国际的横加干扰。他说：“中国共产党自江西红军时代，深受第三共产国际瞎指挥的苦头，将大好形势搞得一塌糊涂，白区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我们没有怪史达林和苏联共产党，只怪我们自己的同志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毛还骂王明是左倾的“投机分子”。

毛又说：“日本投降以后，史达林怕美国，要我们像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希腊共产党一样交出枪去，我们不同意。日本投降后，（我们）同国民党打起来了，苏联没有给我们一枪一弹的援助。淮海战役以后，又要我们与国民党划江而治，不要打过长江去。等到国民党在南京站不住脚，搬到广州去，英国和美国都不肯把大使馆搬到广州，可是苏联大使馆跟着去了，表示他们支持国民党，跟我们没有牵连。一九四九年冬天，我到莫斯科去谈判，史达林对我可是不相信了，一住两个月，史达林根本不谈。我发了脾气，不谈就不谈，我回去，这才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朝鲜战争，美国打到鸭绿江了，我们说应该出兵。史达林说不能出，出了兵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说，你不打，美国把朝鲜打掉了，中国、苏联岂不是唇亡齿寒？你不打，我们打。你苏联有武器，你怕英美说你援助我们，那么我们买你的武器，打起来与你没有关系。”“高岗在东北，史达林封他东北王，实际上是插手中国党，搞分裂。”

这是毛首次明确谈到他对史达林的看法，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原来存在这么久、这么深的分歧。

但毛从未公开他的看法，他本身的革命领导地位和史达林过于息息相关。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使中国国内领导人立场一下子泾渭分明。朱德表示要支持反史达林，大大触犯了毛。我从不认为朱德会对毛构成威胁。毛和朱德在江西时期曾分裂过，因此朱德对“反史达林”的最初赞成反应，使毛与朱德隔阂加深，进而说这是“个人品质问题”。一九五六年的五一节，朱德身体不舒服，但他即使不能上天安门，也得上。每年五一劳动节，领导人都照合照，如果不在里面，就很耐人寻味了。朱德告诉陈琼英说：“如果我不上，别人会以为我犯了大错误，上不了天安门。”那年五一节中国领导合照的相片中，朱德脸色苍白，愁眉不展。朱德仍想确保他在毛主席身边的政治地位。

毛永远不会原谅赫鲁晓夫反史达林。一九五六年中，我也发觉毛对共产党领导同志非常不满。毛首先对他们苏联模式依样画葫芦的死方法发难。

到一九五六年，中国已深受苏联模式影响，此时已建立了一个深入乡镇，由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庞大国家官僚体系。农业合作化推展完成，城市中主要的工厂和商店收归

国营。规模较小的手工业工厂和商店不是合作社化，就是交由地方政府经营。

就经济和官僚制度而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似乎已趋完善。

但毛所极力追求的国民精神改造——也就是中国的浴火新生——仍遥遥无期。在庞大繁杂的官僚体制建立后，昔日的革命斗士成为养尊处优的官僚，汲汲于追求显赫地位，而将毛的革命理想抛诸脑后。毛深感不耐，他要快速地推动改革，继续革命奋斗。但党官僚、领导干部纷纷发出警讯，坚持遵循苏联的渐进改革模式。毛则认为他们对苏联的模仿缺乏创意，在不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之下，将苏联的组织体系全套抄袭过来。毛为此对当年并肩作战的领导同志十分震怒。

毛的革命需要大胆、气魄和斗争等特质，这些也是毛的性格。因此他认为其他领导人只会墨守成规。他们当中一些人同意赫鲁晓夫反史达林，无异是向毛的最高领导层下了挑战。毛戒心大起。毛不要他的任何下属在他死后，摇身变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写黑报告告发他。在他有生之年，他会拔掉所有能破坏他统治的毒草。

他对共产党党内的不满逐日加深，多年后，终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

**注释：**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所使用的军火，其中有将近百分之九十购自苏联。

朱德在井冈山期间曾与毛意见相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即针对朱德及陈毅而发。

毛对自己的形容至为贴切。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日，毛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引用了一句歇后语：“我是和尚打伞”，以说明他自己是“无发(法)无天”。那天的翻译对此一歇后语不熟悉，因此将这句歇后语翻译成“一个孤寂的和尚，打着破伞，在雨中踽踽行走。”因此，斯诺和许多继他之后的无数学者以为毛有一种悲剧性的孤寂情结。这真是个大大的误解。毛其实是在大言不惭的告诉斯诺，他就是神祇，他就是法律--“无发(法)无天”。

毛见外国人时，给毛当翻译很不容易。他在会谈时，常引用诗、文及俚语。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谈，引用了清康熙时文华殿大学士张英的典故：张英的家人与邻居争地界，发生纠纷，给他写信，他赋诗代信回覆：“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立即让地三尺，对方为此也让三尺，成了一条六尺巷道。毛引用了这诗的最后二句，用以表明他对中苏之间边界纠纷的态度。当时我看翻译十分为难，我不懂俄文，不知怎么译，但从尤京一脸茫然的表情看，他恐怕没有听懂毛的意思。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毛会见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谈到和平共处，引用了宋末赵孟俯的夫人管道生给赵的一首诗：“你侬我侬，忒煞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他藉此说明中印二国的亲密关系。翻译很为难，说了很久，我不知道对方是否明白毛的意思。

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庆祝苏共国庆四十周年时，毛在大会上讲到团结的重要性时，引用了俚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十个帮”。为解释这句话，翻译弄得一头大汗。

一九七一年毛初次会见季幸格，毛引用《红楼梦》中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美国的处境。可是这句话怎么也译不清楚。

毛常告诉我，“我念的是绿林大学”。毛是个彻头彻尾的叛逆分子，他反抗所有的权威，力求驾御一切--从最高政治决策到他日常生活中最微小的细枝末节，中南海内凡事都须经由他的首肯，甚至江青的衣着打扮。中国的重大决策必须通过他的批准。

毛没有朋友，自外于一般的来往接触。他和江青很少聚在一起，亲生子女更少。

就我所知，毛对第一次见面的人虽很亲切，其实是铁石心肠，感受不到一丝爱或友情的温暖。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的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跌到地板上。这是舞池，没有任何保护设施。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惊叫起来。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团演员，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时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场一片闹烘烘时，毛与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团员仍在说说笑笑，喝着茶，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事后毛未过问幼童的情况。

我始终无法了解毛的冷漠，也许他曾目睹过多死亡，因此对人类的苦痛变得无动于衷。毛的第一位妻子杨开慧及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都被国民党处死，大儿子毛岸英死于朝鲜战争中，他有数名子女在长征时夭折或是失散，永无下落。但我从未见他为失去这些亲人表露过任何情感。事实上，由于他一再逃过这些劫难，似乎只让他更

相信自己会长命百岁 ,对那些死去的亲人 ,他只淡淡的说 :  
“ 为了革命理想 ,总有人得牺牲。 ”

毛虽然行止孤独 ,消息却很灵通。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床上 ,一连好几天只罩件睡袍度日 ,但他勤于阅读 ,并总要他身边的人 ,用口头或书面向他报告中国境内和世界大事 ,因此他对上自中国偏远地区到全球各地 ,下至他宫闱中的倾轧夺权 ,都了若指掌。

毛痛恨繁文缛节。一九四九年 ,当时政务院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建议 ,按照国际礼节 ,应该穿黑色衣服 ,穿皮底黑色皮鞋接见外国大使。毛听到后 ,大发脾气说 :“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 ,搞他们那套做什么。 ” 他穿灰色中山装 ,胶底黄色皮鞋接国书。从此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 ,也一律穿灰色套服了 ,于是驰名于世的“ 毛服 ” 也就随之出现。余因此被调职 ,文化大革命时余自杀。

毛拒绝服从任何时间表。他神出鬼没 ,行踪飘忽不定。每回他出去散步 ,回程一定走另外一条路。他从不重蹈过去的足迹 ,永远另辟蹊径。无论是在私生活或是在国家大事上 ,毛总勇于追寻前所未有的途径。

毛对历史有癖 ,看得最多 ,常反覆翻阅的是历史书籍。他看过很多遍二十四史 ,因此他惯于用过去来注释现在。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论 ,与我过去的想象完全相反。毛的政治观点中 ,没有道德的顾虑。我在知道毛不但认同中国的帝王 ,而且崇拜令人发指的暴君后 ,非常震惊。毛不惜用最残忍暴虐的方法来达到目标。

毛认为在中国历史上 ,纣王开辟了东南大片土地 ,使中国的疆土东抵大海 ,而且对中国的民族统一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比干这些人反对纣王的开拓疆土政策 ,当然要杀掉。纣王搞了些女人是事实 ,但是哪个皇帝不搞 ?

毛说：秦始皇是中国的广阔版图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基人。至于焚书坑儒，焚的是宣传分裂的书，坑的是主张分裂的儒，而且杀的儒生不过四百六十个，实在算不上什么。有些人在这上面大作文章，真是“抓住一点，尽量扩大，不计其余”，完全颠倒黑白。

毛对武则天推崇备至（后来文革中江青以武则天自居）。有一次他同我谈到武则天。我说：“武则天疑心过大，告密过滥，杀人过多”。他说：“武则天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进行改革。唐室的宗室豪门大族想设法推翻她，是事实，不是她疑心大。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这些人的阴谋呢？将想杀死她的人杀掉，有什么不应该？”

隋炀帝则是沟通中国南方和北方，使南北方密切结合起来的伟大人物。中国的大河都是由西向东入海。隋炀帝开了由北向南的大运河，象一条大腰带，将中国拦腰捆住。毛说这段历史是唐人给完全歪曲了。

西方领袖中，毛对拿破仑极为推崇。他认为拿破仑打破了古典战争的常规，使战争的战略和战术起了革命性的改变。譬如，他进攻时，用密集大炮轰击取胜。毛推崇拿破仑的另一重大事件是，拿破仑进攻埃及时，曾带领大批学者、科学家到埃及，并因此建立了埃及学，研究古埃及文化源流。在这个事件的启发下，毛也决定组队到黄河的发源地青海省，去探寻中国文明的源头。

一九六四年汪东兴组织了一批学者，包括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地质学者、水文学家和工程学家。汪为此从内蒙古及宁夏调来马匹，成立了一骑兵团，还另外调来大批行军器材和装备。毛和我每天一起练习骑马。毛最后决定八月十日起程。八月五日夜晚传来美国军队直接参加越南战争的急电，这样毛才取消黄河行的决定。

毛的历史观与常人不同，它反映毛本身的性格。毛爱惜古喻今，并自认对中国历史有极大贡献。我认为中国历代宫闱夺权诈术对毛思想上的影响远大于马列主义。

毛是个革命家属不争事实，他的目标是将中国改造成富强大国，但他却从过去的专制历史中寻求统治方法和权力倾轧的对策。

中国历史对毛所追求的新中国作用不大。毛认为中国文化已停滞不前，他要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有必要学习外国，改进外国思想，并使其适应中国国情。他常说：“中国的东西也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些，非驴非马，成了骡子也不坏。”

毛认为社会主义能激发中国人民的蓬勃创造力，并重造过去的盛世辉煌。苏联是最早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他不得不向苏联寻求灵感。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坚持中国要“一边靠”。毛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的是求中国富足强大，文化复兴。换句话说，要创造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他常说未经消化吸收的全盘西化不好，他也从未提倡将苏联那一套原封不动的搬来中国。他认为苏联在建设中成功的或失败的经验都可作为借鉴。

从毛第一次召见我开始，他便将对美国和西方科技的赞赏表露无疑。他深知要重振华夏声威，光学习苏联是不够的。因此他对“一边靠”的口号很有保留。

毛对自身的历史定位十分肯定，他从未质疑过他的角色。他是最伟大的领袖，万王之王--他统一中国，并将改造中国，使它恢复过去的辉煌。毛从未跟我用过“现代化”这个词。毛不是现代人，他念兹在兹的是使中国恢复昔日的繁盛风华。毛是革命家，也是和传统决裂的人，他要改造中国，重振大汉天威。毛将缔造自己的万里长城。他的



不朽与中国的伟大交织在一起。整个中国都是他指下的试验场，毛就是中国。任何与毛思想相左或胆敢向他挑战的人，都被毛视为异端。毛毫不留情的铲除敌人，百姓的生命不值一提。

最初我很是困惑不解，我很难接受毛竟会如此轻贱人民的性命，以达到他的目标。一九五四年十月下旬，印度总理访问中国。毛与尼赫鲁会谈时，毛明确表示，原子弹无非是“纸老虎”，为战胜帝国主义，值得牺牲几千万中国人民的性命。毛这样告诉尼赫鲁：“我不相信原子弹有那么不得了，中国这么多人，炸不完。而且原子弹你能放，我也能放。炸死一千万、两千万算不得什么。”这些话当时使尼赫鲁大为吃惊。

后来毛在一九五七年于莫斯科的演讲中又说过，中国就算死了一半人口（三亿人）也算不上什么，我们可以再制造更多人。直到“大跃进”，上千万中国人民死于饥荒，我才开始醒悟到毛和他所推崇备至的暴君之间的相似之处。毛知道有上千万人饿死。他无动于衷。

我经过一再思索后，终于搞懂了毛的历史观点。此外，他这番话也是在明白告诉我，今后我对他只能绝对服从，不可稍加异议，忠贞不二是唯一的路。

外面的人看毛的宫闱世界，总有如雾里看花，觉得毛如此伟大，为他工作如此光荣，想离开一组简直是不可思议，只有那些对毛不够忠心的人才会被驱逐在朱墙之外。全中国也没有地方敢收容不明不白离开一组的人。

一组里的人有些是真的忠心耿耿。一来因为毛对他们有救命之恩，让他们有安全感（就象我的政治历史被毛一笔勾消一般）；二来他们崇毛如泰山北斗，视他为中国的救星。但却有另外一群人只是拍马屁，向毛争宠。毛的心

里也很清楚，只因为他有用得着这些人的地方，所以留着他们，一旦利用价值没了，毛便一脚把他们踢开。

一次我同汪东兴谈话，我向汪提出了这个疑问。汪说：“为人民服务，总要有具体的人啊。为毛服务，还不就是为人民服务。你在这里工作，是党分派你来的，还不就是为党工作吗？”

“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是毛喊出来的。中南海南墙入口的新华门后，这几个斗大的金字嵌在一片墙上，它也挡住了中国老百姓一窥今日紫禁城中高级领导生活和工作真相的视线。在中南海的政治学习中，总是强调要“为人民服务”，是为党工作，不是为个人。这口号使我激动不已，因此决心加入共产党。

后来我发现在毛这里工作，却成了向毛争宠。而毛呢？从来不用亲自穿鞋脱袜，梳洗理发。我对这“为毛服务”的一组现象非常不解。

我那时年轻天真，便听信了汪东兴这番教诲。

毛一旦怀疑一组人员和其他领导人--不管是周恩来、林彪或是刘少奇--关系过于密切，便立即将他们撤换。毛警告我：“祸从口出。”此后二十年中，历尽各次政治运动，不论是“大鸣大放”，还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字报”、“小字报”，我都守口如瓶，只埋首于毛的医疗保健；甚至在我深深了解他的残酷暴虐之后，我也一迳保持沉默。我清楚，在中国只有毛有独立意志。

但我此时仍崇敬毛，他是中国的救星，民族灯塔，最高领袖。我将中国视为一个大家族，我们需要一个族长，毛主席就是大家的领导。我为毛主席服务就是为中国人民服务。

## 注释：

爱德加·斯诺对此事的描述见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71 ,p.175)。

赫鲁晓夫记述毛在断言中国能制造更多的人口时语言的残酷，他及其他苏联领导为毛轻视生灵的态度大表恐怖。见 *Khrush chev Remembers* , Tran. &ed. Strobe Talbott (Boston :LittleBrown ,1974 ,p.255)。

我随同毛开始出巡之后，才见识到“为毛服务”的铺张浪费的一面。毛的安全和保健工作极尽周全。毛的舒适和享受是第一要务。我早知道毛的安全工作一向非常周延，但在中南海内我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等出巡时，这种过度奢侈的现象才变得份外明显。

毛不断的出巡各地，很少待在北京。他是个南方子弟，因此觉得与北京格格不入。广州、杭州、上海和武汉是他最喜爱的城市。毛每次外出都是好几个月，五一节、国庆日或接见外宾时才回北京义务露个面。毛行踪飘忽不定，有时他早上才决定去杭州，我们下午就匆匆上路了。由于警卫局怕会走漏风声，通常随行人人员前一夜才通知要外出，却也不知道目的地。

毛通常乘专列出巡。毛的专列共计十一节。专列平常停放在离北京火车站相当远的车库里，以利毛秘密行动。毛的专列有二节主车，一节毛用，一节给江青备用。

江青只有一次与毛同乘这一专列。第三节是毛的餐车。毛的卧车非常豪华，里面装了一张大木床，大部分的地方都堆著书，前面四节满是上下铺的卫士、警卫、摄影员、机要员、厨师等随身人员的卧车。再接工作人员餐车一节，医疗急救车一节。

在毛那节车前另有一节备用主车。

专列没有冷气，夏天酷热难耐。一九六零年初期，铁道部从东德定制一列新专列，十分奢华，有隐藏式灯光、设备齐全、自然也有冷气设备。汪东兴、机要秘书林克和我同住一节，三人共用一起居室。每个车厢内有沙发、桌子、床和热水浴室。

专列沿途的安全措施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毛乘专列到外地一次，铁路的全线行车时间表都要改过，至少一个星期才能恢复正点运行。沿路火车站上匆忙的乘客和叫卖吃食的小贩全换上了安全警卫。专列驶进空荡荡的火车站，一路只见站台上的哨兵，感觉非常古怪。我和其他随行人员跟汪东兴说起这事后，汪便安排了一些打扮成小贩的警卫站在站台上，来增加真实感。

凡毛专列沿途经过的各省领导必须在其所属的省内，负责毛主席的安全。在毛停留期间，每省铁路局都会派出一位司机和火车机车。沿线并有各省公安厅派警卫，每隔五十米放哨。我有一次和辽宁省公安厅一位处长聊起，他告诉我，一九五零年一月毛从莫斯科返国时，在北京到满洲里的铁路沿线上，两边每隔五十米派部队和民兵，轮流昼夜看守。他在一个铁路涵洞下蹲了两个星期，也不知道是谁经过，正是冬天冻得够呛。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火车上载的是毛主席。

毛乘火车也不受时间限制。除加水以外，不靠车站。他不睡的时候，不管多长时间，列车行驶不停。他要睡觉，无论什么时间都得停下来，一般都停在铁路支线的工厂或飞机场。这是工厂就要停工，机场要停止飞机起飞及降落。

有时毛会乘坐飞机。一九五六年夏天我第一次随毛坐机出巡。十月下旬毛去广州，他决定乘坐飞机去。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乘坐飞机。毛第一次乘飞机是一九四五年由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同，由延安飞抵重庆，进行“国共和谈”。

飞机的选用与试飞，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空军司令刘亚楼负责，他们经过多次讨论，商定乘坐苏联生产的“利-二”型客机。出发那早，刘亚楼陪同毛及其随行人员前往北京西苑机场。在这段时间，全国所有航线停飞，空军

派出战斗机巡逻。随行人员分乘四架飞机，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及其他秘书、警卫员等随行人员乘坐一架伊尔十四。毛的司机、厨师、摄影师、两位食品化验人员及另一批安全警卫分乘两架飞机。其他大约二百名随行人员，则乘毛的专列先行出发。专列载有毛那辆苏联制、防弹的吉斯牌(Jis)车，毛下机后，预订乘车直奔广州小岛招待所。专列则停在白云机场，随时供毛外出使用。

毛的利-二坐机是小飞机，只有单螺旋桨。客舱内原有二十四个座位，前一半的座位拆掉，安装了一个单人床，一只小桌，两只坐椅，后半部只留下了四个坐椅。这架飞机除毛以外，还有卫士长李银桥、一名卫士、秘书林克和我乘坐。

刘亚楼将一位麻脸瘦高个子的军人介绍给毛说：“这是胡平，他开主席坐的这架飞机。”毛说：“这可要辛苦你了。”胡很善于言词，说：“能给主席开飞机，那太幸运了。”胡平在文化大革命后升为空军参谋长。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坠机身亡后，胡平被判刑。

将近中午抵达汉口机场。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武汉市委书记刘克农，在原是蒋介石别墅的东湖客舍设宴宽待。东湖客舍环境优美，隔湖对面的是武汉大学。以前，外国人，特别是白俄，在汉口开了一些酒吧、饭店，雇用的厨师、服务员都经过专门训练。现在这批人中的一部分被调到招待所，做服务工作。

这次外出，使我对毛被奉承的情形大开眼界。王任重说：“史达林处理党内斗争问题，比主席差多了。他杀了那么多人，我们党对王明他们还是讲团结。”毛说：“是啊，应该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不同性质。对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从来不主张乱捕乱杀。”王说：“这是主席领导才做得到。”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任重，我感到他极会阿谀奉承。我从旁观察，毛对王相当亲切。无怪王的官运亨通，不过四、五年，升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虽然如此，毛也没有逃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文化大革命初期，王被调到北京成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但很快被江青在群众会上，指斥为“背着文革小组活动”，而遭批斗。

将近下午六时，到达广州白云机场，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广东省省长陈郁等人在机场等候。从机场乘车去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一路上突出的印象是街道脏乱，街上的人们大多穿着木底拖鞋，嘀嘀答答，十分吵人。

毛的广州之行是个机密。一组人员被拆散，分居数处，并不准随意外出、打电话、会客或收信。我们寄到家里的信件全由专邮送投。毛要走前几天，汪东兴才准我们随同广东省公安厅的公安人员外出观光。

毛的舒适仅次于安全措施。

和平解放北京后不久，没收了许多旧别墅，也相继造了些新的，供党领导专用。

中央办公厅在玉泉山上替五大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造了五个别墅。后来罗瑞卿和汪东兴(两人都是旱鸭子)又为毛加盖了游泳池。为了安全起见，游泳池只有两个澡盆宽，水只及膝。

毛为这小游泳池大为光火，此时彭德怀又在政治局会议中直言，指斥动用公款以为毛私用。毛于是用他自己的稿费付出建游泳池的费用。他此后没有去玉泉山住过。

一九五零年中央办公厅又在北戴河海滨一带没收了许多旧别墅，分配给各领导，并特别为毛修建了“八号楼”。自此后，各省领导也争相在其省内为毛修建别墅，但他们以为毛喜欢最现代化的设备，别墅内装设了西式弹簧床和坐式抽水马桶。毛出巡时总带了一张大木板床和蹲式马桶。

随行。一九四九年到苏联莫斯科时，这个木床也运去了。一九五七年再去苏联的时候，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只有坐式马桶，他没有办法，最后取来一个便盆临时凑合救急。

陶铸在广州为毛和江青修建的小岛招待所最合毛的意，因此毛爱常去广州住。小岛招待所在珠江两支流交汇处，整个小岛布置得象个大花园，种着广玉兰、白玉兰、梔子树、洋桃树、木瓜树、芭蕉和香蕉。

这里面原有一座孙中山先生的别墅，小巧的两层楼老式楼房，称为二号楼。省委书记陶铸觉得这楼太小，在旁边造了一号楼，两头各有一间卧室，毛住西首一间，江青住东首一间，中隔一极大大厅，可以开会，也可放映电影。靠西又修造了三号楼，是毛与江的起居室。

四号、五号和六号楼，是为刘少奇、周恩来及朱德来时用的。这次由罗瑞卿、杨尚昆和我们分住。我与林克住四号楼。

岛内布满武装明哨和暗哨，中央警卫团就来了一个中队。陶铸、罗瑞卿和其他公安人员深恐不到九十里外的香港内的国民党特务会想法子暗杀毛，因此这条珠江分支封了航，除去巡逻炮艇外，断绝航行。搞得岛上安静得出奇，只听到热带鱼的啾啾叫声。

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人员，加上毛在北京的随行人员，总人数将近二百人。他们大都住在位于与内陆衔接的对岸桥头公安大厅内。八到十个人挤一间房间。

毛的专用厨房设备良好，卫生安全，管理容易。北京巨山农场每天运菜过来，共毛的厨师使用。毛有时会试试广东的水果、青菜和鱼，但他还是爱吃油腻辛辣的湖南菜。

但公安厅大楼的饭厅问题很大。饭厅和厨房的服务员及厨师的工作量突然增加很多，地方原本又小，没有食品



冷藏设备。菜蔬肉类堆放在一间小储存室内，堆满以后，放不下了，又堆在厨房外院子中。虽然已经入冬，可是广州天气还很暖，老鼠又多，疾病容易滋生，也有可能食物中毒。汪东兴便召集了北京来的一些人员，协助厨师们做好厨房的清洁卫生，建立食品包管与化验制度，我则负责小岛内部的医疗卫生工作组。

汪东兴和罗瑞卿为了毛的安全工作，可谓大事周章，虽然理由正当，毛仍然十分不满。后来毛批评汪东兴，在警卫工作上“前呼后拥，如临大敌，只相信自己，什么事都要自己带的人去干，不相信当地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更不相信群众。”毛从来感受不到身边警卫人员的紧张心情。毛清楚群众崇拜他，谁会想谋害他呢？

这年冬季因为毛在广州，其他的“中央首长”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人也都来到广州，以便开会。领导们分别住进四、五、六号楼，我则迁桥对岸的广东公安厅大楼住。其余政府首长分别住在小岛旁的广州军区招待所，和城里的广东省委招待所内。

陶铸为了表示对来广州的“客人们”的热情欢迎，在省委招待所举办宴会。陶来请毛，毛不愿出席这种应酬。陶一再请尝尝广东菜，毛仍不答应，最后同意让汪东兴、叶子龙和我参加，毛对我说：“你去，有什么特别的菜讲给我听。”

开饭前一个半小时，中央警卫局办公室主任田畴跑来找我。他十分焦急。他说食品化验在菜中化验出氰化物，全部饭菜封存，厨房工作人员也全部不准离开，汪东兴要我马上赶去省委招待所。

我赶去时，七张大桌上都已经铺好了白桌布。我走进厨房旁边一间食品化验室，各种菜、饭、酒、饮料的样品都放在那里，由北京带来的两位食品化验员，正忙得满头

大汗。看见我进来后，他们似乎舒了一口气，说：“您来了，可好了。您看怎么办。”

广东省公安厅苏副厅长对我说：“这事情真奇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反复审查过，都没有政治问题。可也难说，离香港这么近，容易有坏人钻空子下毒。”

经化验后只有青笋中含有氰化物，其他的菜都没有问题。青笋是在招待所院子内的竹丛中自己挖出来的。于是又挖出一些青笋，化验表明确含有微量氰化物。我又赶到中山医学院，查阅书籍，青笋正常含有微量氰化物，是在正常食品允许含量以内。

我将情况向陶说明，陶立刻绽放满脸笑容，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等会我敬你一杯酒。”

苏副厅长拉我到一间客房，暗暗跟我说：“你可帮了大忙，刚才陶书记大发脾气，说是要处分我们。好在问题搞清楚了，饭也可以准时开了。要不然这黑锅我们可背不起。”

饭中，陶铸走到我前面，举杯对我说：“李大夫，我谢谢你，干杯。”我站起来，谢了他。陶转身对汪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啊。”汪乐吱吱的，嘴都合不上。

晚上回到小岛，我去看毛，毛正在看《明史》。我进去后，他放下书，问我有什么新闻。我把这件事告诉他。他说：“我历来反对向外国乱搬乱学，搞个吃饭也要化验。在北京搞了还不算，又把这一套搬到外地搞，搞得人家人仰马翻。结果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告诉汪东兴，要改。”

我从毛那里出来后，到了汪的书房，告诉他毛的意见。汪很不高兴。我说：“你怎么这样不了解主席。我不讲，自然有别人会去讲。到那时，主席会说我有事不向他讲，对他不老实。而且别人讲，很可能跟事实有出入，给主席

一个不真实的情况。他先有了一个歪曲的印象，就根本无法在改变。倒不如直接向他说明，听听他的意见。”汪觉得有道理。经过毛的批评，汪改变了毛的食品供应制度，取消了食品化验及试尝办法，巨山农场交给北京市，供应站仍保留，负责到各地采购食品(但这改变只是表面的，毛的食品仍大部分由巨山直接供应)。

以后我又将这些改变告诉了毛。毛笑起来说：“我说学苏联，难道拉屎撒尿也要学苏联？我就不学，我倒要学学美国。”

注释：

江青也曾参与兴建这座小游泳池的决议。

江青这时也在广州，我们常常接触见面。

到广州后的第三天，卫士长李银桥来告诉我：“你最好去见江青，把主席这些天的情况，总的向她汇报一次。”我说：“到广州的当天，大家不是一同见过她了？”

他说：“不行。你要专门去见她一次，否则她会说你架子太大。”

我听了李的话，那早九点，我随护士到二号楼江青的书房，江青正低头翻看一本“参考资料”，她穿着潜蓝色连衣裙，半高跟白色凉鞋，头发仍向后挽成一个髻。

江青跟毛久了，也学毛看书这一手。但不同的是，她完全是在客人面前装幌子，甚至通报客人已到了的时候，她才拿起书来。

她示意要我坐下。我首先问候她好，这可是李银桥及护士分别一再叮嘱我，不可忘记的礼貌。

“主席的身体很好，”我做着说明，“没有定时的作息，已经成了习惯，而且是多年的习惯，不可能再改变了。勉强改会造成主席精神上增加负担。”

江青这是插话说：“你的意思是照这样下去，用不着劝主席定时起居了？”我说：“是这样，勉强改或加重失眠症状。”江轻蔑地说：“这就是医生的见解吗？”我说：“这是我的看法。”江青的眉毛向上一挑，两眼睁得圆圆的说：“你的见解同主席讲过了吗？”我沉静的说：“我讲过了。”

江青似乎是意想不到，用手指敲著旁边的茶几，正色说：“主席的意见呢？”我说：“主席讲同意我的看法，还说，已经老了，有些习惯不能再改了。”江青低下头，然

后抬头用手一捋头发，微笑说：“我也是这种看法。以前别的首长劝主席改，我是不赞成改的。”

江青又问道：“那么安眠药呢？”我说：“主席长期有失眠。现在看来，使他入睡，恢复疲劳，安眠药有作用。”江青说：“你的意思又是不要改了。”我说：“是的，只要不再加大药量，可以不改。”江青严肃地说：“没有一个医生主张吃安眠药。你自己吃吗？”我说：“我不吃。”江青说：“你不吃，你知不知道安眠药有害？”我说：“最好是什么药都不要吃。可是主席这么多年的习惯……”我话没有说完，江青的脸色变得阴沉下来，又问我：“你也向主席说了可以吃安眠药？”我说：“是的，讲了，主席也同意。我累计了主席的睡眠时间，每天入睡总比前一天入睡时晚二到四小时。推迟晚些，睡眠长些；推迟得早，睡眠就短。平均下来每天可以睡到六小时。有时二十四小时，甚至三十六小时没有睡，可是每次有这种情况，接下去就可以睡十到十二小时。平均起来，还是每天睡五、六个小时。所以看起来不规律，但是仔细算，主席的睡眠有自己的规律。”

江青抱怨我道：“这些你为什么早不同我说？”我说：“以前没有机会多谈。这些都是主席随便同我闲谈时，讲到的。”江青欠了欠身说：“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你有什么见解，先同我谈，再告诉主席。”江青说这话是想控制我，进一步间接控制毛。我是不会上她的圈套的。

我辞了出来。这时正好下着阵雨。我没有带雨伞，只好在中央大厅徘徊。

江青以为我已经走了，走出书房，在大厅看到我仍在那里。我立即解释说：“外面下阵雨……”江接着道：“大夫，你太拘谨，再进来坐一下。”我跟在她后面，走进书房。

江青开始问我在什么学校读书，在什么医院工作。她同我讲她在三十年代时，在上海的一次看病经历。

她说：“有一天我发高烧，一个医生问也没有问我的情况，潦潦草草看一下，开了药方就要走。我当时气坏了，问他为什么这么草率对待病人。他还是不理。我骂他真是外国资本家的走狗，真让人痛心。我药也没有拿，就回去了。”停了一下又对我说：“你们这些外国派头的医生，丝毫不关心病人的疾苦。”

我说：“不都是这样，从医学史上讲，一些伟大的医学家，都是为了解除病人痛苦，而不惜自己做出牺牲。这种事例多的很。”江青冷笑道：“这是庸俗的人道主义。”我说：“这些人的事例很感动人。”江止住我的讲话。她说：“你是大夫，我不喜欢别人同我辩论，我是一个病人。”

这时阵雨已过。我再次告辞，回去。

后来江青的护士告诉我，我走后江青一直在跟她嘀咕说：“这位李大夫傲慢，竟敢当面顶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不过看上去，这个人很有主见，而且不轻易放弃他的见解。这个人要好好整整。”

当天晚上我去见毛时，顺便将上午同江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毛。当讲到人道主义的话时，毛笑起来。他说：“我们并不笼统反对人道主义。我们反对利用人道主义模糊敌我界限。你的讲法，恐怕江青对你有意见了。以后要当她的面，多说她的好话，给她戴上高帽子，她就会高兴。”

夜里吃消夜以前，见到汪东兴，我将白天和晚上的这段周折告诉他。汪眨眨眼说：“你太直了，也不会看脸色。对江青可要尊重，要不然……”我没有说下去。

我心里想，汪可能对自己有亲身体会，不便于向我讲清楚吧。我十分愕然于毛的这种方法。这同过去我听到的

“教导”，要做正派的人，不能做阿谀奉承的小人，完全两样。

我既不肯给江青戴高帽子，又无法同情她，只好想法子了解她。江青生活条件极为优渥，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但江青整天无所事事，生活毫无意义。毛处理公物忙碌，对江漠不关心，两人也早已不住在一起。毛大江二十岁，两人的生活习性和爱好真有若天壤之别。江青做事按部就班，井然有序；毛则反抗一切的常规礼范。毛非常嗜于阅读，江青没有耐心看完一本书。毛以他的健康和体力自豪；江青整日生病，愁眉不展。他们连口味都南辕北辙。毛爱吃辛辣的湖南菜；江青喜欢清淡的鱼和青菜，或是自以为懂得吃些她在苏联吃过的“西洋菜”——烤肉和鱼子酱。

毛也曾试着让江青做些工作。一九四九年以后，毛让江青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她的作风霸道，以毛的代言人自居，上上下下都和不来，只要离开宣传部。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任副主任。在这里她仍然颐指气使，气势凌人，不受欢迎，又被调离政治秘书室。第三次是专任毛的秘书，替毛从“参考资料”中，挑选一些所谓重要消息，送毛参阅。

可是这项工作，真正承担下来的是毛的秘书林克。因为江青根本不耐烦去读“参考消息”。真的要她读，她又分不出那些消息是重要的，因此对毛来说可谓毫无用处。

江青是中国人所谓的“小聪明”——小事精明，但知识水平不高，缺乏分析能力。

她对中国历史所知甚少，对于外国历史就更模模糊糊。她知道一些重要国家和世界领袖，但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知。比如她不知道西班牙在哪，其政治历史和现今领袖是谁。她读书常抓不到重点。她有次跟我说：“英国没有我们中国这么封建。他们就有过好几个女王。”



她对有些汉字不认识，又不肯说不认识，却问别人：“这个字用北京话怎么发音？”

她虽然知识水平不高，倒很喜欢讥笑他人的缺点。毛有次笑我说我的历史知识都是从京戏中学的。我深觉侮辱，因此有系统的去读了《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但江青日后仍常拿这事来奚落我。毛常送些书、文件和新闻给江青读，意思是要她多懂历史和时事，但江青常将它们搁置一旁。

她天天看香港进口电影，有时上午、下午到晚上都看。她长期“生病”，看电影是她治疗神经衰弱的办法。

一九五三年由中央卫生部与中央警卫局共同派了一位徐涛大夫，做她的专职医生。徐涛原本是毛的保健医生，但毛的身体好，平常没有什么医务上的事要办。因此毛将徐派到给了一天到晚生病的江青。

江青让徐涛有如生活在人间地狱中。一九五四年，中南海内展开反革命运动。在江青的指挥下，徐遭到批斗。后来江青也未曾善罢干休。今年到了广州，徐医生又被一个卫士指控对江青的护士有不正当的行为。

江青一名护士有轻度贫血，到广州后，经常头晕，她要求徐医生给她检查。徐医生在他们住的客房休息室里给她检查。要检查自然要脱去必须脱掉的衣服。一个农村出身，文化低下的卫士刚巧走进撞见。他对医学检查毫无概念，马上联想到不正常的关系上去。这便传出了徐医生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风言风语。

汪东兴不得不为此开了会，展开调查。汪本人和徐很熟，并不相信那些传闻，何况他清楚那年轻卫士本身目光狭窄，毫无见识。我参加了这次会，听到警卫们的指控，十分吃惊。这些指控极为荒唐。徐涛为人耿直，有些固执，但是道德上十分严谨。再说，徐医生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

已被戴上反党小集团成员的帽子，不能再落井下石。我表明了这种看法，说明不能对医生的职业上的操作，做些莫须有的指责。

最后毛替徐涛出面。徐涛没事，那位卫士被撤职。

但江青这边可就没完没了。江青爱看片子，又怕片子没意思，引不起兴趣，就让徐医生先试看，好的再推荐给她看。有的片子徐认为不错，她看了认为不好，看完大闹，说徐利用片子使她精神上受折磨。徐说那让别人试看。她又说，看电影是治疗她精神衰弱的办法，医生不能不负责任。

江青的精神衰弱完全来自精神空虚，还又怕被毛抛弃的深沉恐惧。江的病状很特别，怕声音，怕光线，怕风。这些都无药可治。看电影是她逃避现实，寻找心理慰藉的主要方式。

问题是很少有江青喜欢的片子，她的影评更是刻薄不堪，常常好片子一到她嘴中就变成不值一看的大烂片。她常看《乱世佳人》，却说它颂扬美国南方奴隶制度，并且斥责我们这些爱看的人是“反革命”。一九五零年中期，没有人把她的高见当一回事。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她说的话可就左右了许多人的前途和生死。

就算江青觉得徐医生挑的片子不错，她还时有得闹。放映的时候，片子光线要合适，亮了伤眼，暗了看不清，两者都可以说成是要折磨她害她。电影室内温度要恒定，不能高，不能低，不可有风，必须空气好。这些实在不能同时做到。只好用两间房，一间映片子，映完一本，到另一间休息，映电影这间立即通风换空气调温度，再过来看。

有次广州寒流来袭，负责给锅炉房加煤的服务员得跪在地上，爬过江青的客厅窗户，免得打扰她的清静。有一次为了探戈是四步舞还是五步舞的问题，江青同卫士争了

起来，最后，她叫卫士到院子里罚站两个小时。回北京时，她要飞机停在济南把她不喜欢的医生和卫士赶下机。她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身边总有五、六个人忙上忙下，弄得人仰马翻。替毛主席夫人服务是天大的光荣，但这工作的精神压力实在太太。

后来我才了解她的病源在于毛不断的拈花惹草。我负责管理他的护士，护士们多半是年轻漂亮，容易吸引毛的女孩。她同我多次讲过：“大夫，你可不要太天真。主席在感情上可不专一。你用的这些护士要注意，要教育他们。”还有一次，那是在北京的时候，一天傍晚，她一个人在一组后门的中南海木椅上坐着流泪。我正经过那里，吃了一惊。江见到是我，叫我过去，拭干眼泪说：“大夫，不要同别人讲。主席这个人，在政治斗争上，谁也搞不过他，连史达林也没有办法对付他。在男女关系的个人私生活上，也是谁也搞不过他。”

因为毛的外遇多，江又不能不想到，她的位置有可能被别的女人取代。刚开始时毛为顾及江青的颜面还偷偷摸摸的。但日子一久，便再也没那么小心谨慎。江青就撞见毛和她自己的护士许多次。她作为一个女人，自尊心受极大打击，又无可奈何。她又不敢公然表示她的怒意，怕毛会不要她。

有一次毛同我谈到江的病时，说：“江青就是怕我不要她了。我同她讲不会的，可她就是放心不下。你看怪不怪。”毛并不了解他的风流行为伤了江青的自尊心，及带给江极度的不安全感。

孤单、寂寞、抑郁的江青只好把气全出在服侍她的人身上。江青对毛唯命是从，我始终都不清楚她是否是心甘情愿。江青的言论行动，甚至她的穿戴，都得经过毛的首肯。极度的不安全感使得她待人刻薄、小器。她明明知道，

叶子龙、李银桥和卫士们都是毛同女友联系的助手，却也无可奈何。尽管卫士们有汪东兴庇护，她不敢怎样。因此对待医生，她自可以肆意撒气了。

江青老是说别人精神虐待、折磨她；其实，她才是那个让别人痛苦的人。她的随从人员通常都做不久，受不了她，要求调走。徐涛到一九五六年秋天，也提出脱离临床看病太久，要求到医院学习提高。于是徐便调到北京协和医院去了。那时，我十分羡慕他的解脱。

毛的内宫中，如果说江青是最依附毛生存的人物，叶子龙则是对毛最有用处的人。叶子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室主任，兼毛的机要秘书并管毛的家务。后来我从汪东兴那得知(叶也亲口告诉我)，叶也给毛找女朋友。叶替毛从各种来源提供女孩--机要秘书室、机要室。他都挑选一些单纯、容易指挥控制、政治上可靠的年轻女孩。

叶住在中南海，毛的菊香书屋的后面。叶安排年轻女孩进入中南海，先躲在他房屋内，等江青睡熟时，再把她们从饭厅后面送进毛的卧室。凌晨时分再送女孩出中南海。

叶也负责毛寄放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的稿费。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也就是在《毛语录》卖出上万册之前)，《毛泽东选集》已使毛赚进三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在一九五零年代，毛是全中国的首富之一。毛也很慷慨，资助了一些因共产党当权而被没收财产或无以为继的老师 and 友人。他也用钱资遣那些跟他在一起的女孩。叶子龙就是负责管理这些“帐目”--资遣费由几百块到几千块人民币不等。

我觉得叶子龙这人不易相处。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文化程度低，既不读书，也不看报。叶子龙也是少年时参加了共产党，经过长征到陕北。三十年代后期起，他就替毛工作。四九年到北京城前，他从未去过城市，没用过电，没看过霓虹灯。进了北京城以后，对着这个“花花世界”，他很快就被“同化”了。我想他原本就是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人，他过去只是没有机会腐化而已。

一九五一年我还在中南海门诊部工作。一天叶来找我，要我给他五瓶油剂青霉素。他说他湖南老家的一位农

民亲戚，得了梅毒，需要这种药。当时这种药中国不能生产，完全从美国进口，数量有限，门诊部只有两瓶。我没有给他，他拂然而去。

他走后，门诊部的护士长同我讲：“你怎么不给他？他可是毛主席身边的大红人，中南海一霸。别人想给他，还碰不上这机会。你怎么得罪他？”我当时并不以为然。心想，我与叶河水不犯井水，他干他的，我干我的，有什么了不得哪。这可真应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想到后来我被调到一组，又应验了“不是冤家不聚头”。

一九五零年初期，叶子龙的待遇同大家一样也是供给制，没有钱。但许多人都愿意巴结毛的机要秘书。共产党当时大力提倡简单节约的精神，叶却举凡食、衣、住、行都尽量追求洋化。北京高干俱乐部成立后，叶和那些负责人混得很熟，常常可以免费享用最好的餐宴。

高干俱乐部和北京饭店是叶最爱出没的两个场所。这两处的警卫从来不检查叶的通行证。任谁一眼望去都看得出叶是个高干人物。当时北京城的市民都穿着褪色缝补的棉衣，叶一身合身剪裁的毛料毛服十分突出显眼。叶也负责毛做衣服的事，裁缝总会提供叶一些难得的衣料。

叶并主管毛的礼品储藏室。毛通常将礼品慷慨分赠一组的人。但汪东兴告诉我叶的手脚并不干净，他的劳力士手表和莱卡相机都是拿来的，叶还是北京城内第一个拥有日本制电晶体收音机的人。他后来对外国电器名牌十分熟悉，但却无法在地图上指出其输出国的位置。

叶的另一个“渠道”是北京市公安局下设的“团和农场”，这里生产各种食品。

解放后，各地都设有劳改农场，是关犯人，包括政治犯在内的劳动改造农场。生活条件极差。早期的政治犯都是国民党军队或低层地方官员。高级官员不是逃走，就是

象我父亲一样，为共产党吸收。我父亲是共党欢迎的“投诚者”之一。共军打到南京时，周恩来派了一个人去说服我父亲留下来。后来我父亲经由周的帮助，搬回北京，生活优渥，还有自己的房子。

我进一组后和叶相处得不好。他觉得我是旧社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是汪推荐到一组工作的，于是傅连璋和叶联合想将我排出一组，主要由叶向毛说我政治上不可靠，我有架子，同工农出身的干部合不来，看不起这些人等等。直到毛要江青告诉叶，这些知道了，不要再提了，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卫士们也看不惯医生。卫士值班室和医务人员相邻。两者地位孰高孰低立即可见。医生中，徐涛又特别沉默寡言。当时他被打成反党分子，又冠上不正当行为，自然更是噤若寒蝉，唯恐祸从口出。

医疗人员一向较为沉默。相较之下，卫士们却高谈阔论，口若悬河，讲个不停。

尤其每当叶子龙、李银桥来到值班室以后，这里成了茶馆，交流小道消息，散发牢骚怪话，可以说是无所不谈。

值班室里常谈的话题是性。毛并不具备正确、充分的生理知识，但我发现毛很喜欢谈论性。毛对满洲王高岗的性生活非常好奇。高岗、史达林称其为“满洲王”。

在一九五四年因被控“反党联盟”而自杀。汪东兴告诉我，高和饶漱石集合了一些人反对刘少奇，因此被批整。

毛说到高、饶的错误问题时，常一带而过，但是每次讲到高的私生活丑史，无论在口气上，或是表情上，都是显出极为惊羨而至为向往的神情。毛非常羡慕高用举办舞会的办法，借机勾引女人，和一百多个女人发生了关系。毛讲：“这种事是生活上的小事。大节不亏，这种小节算

不得什么。高岗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或把自己的错误说清楚，这点事无所谓，我还要用他。”

江青也常绕着性大发厥词。在我到一组后不久，曾几次亲耳听见她宣布她昨晚和毛做了爱，我简直是目瞪口呆，大为惊骇。她并称赞毛的不凡之处。

既然毛和江青都如此口无遮拦，在这种风气下，护士们爱谈论性事就很自然了。

江青是卫士们另外一个爱谈论的话题。每当江青不在场时，卫士们总把江青奚落得体无完肤。卫士里有个年轻小伙子，他最爱模仿江青。那年轻卫士很聪明，长得眉清目秀。江青的衣服都放在值班室，由警卫清洗和熨烫——江青的丝质内衣也由卫士负责熨烫。他有时戴上江的大草帽，披上江的大衣，撇开八字脚学江的样子扭来扭去，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一次他正在表演的时候，毛出来看到，也笑了笑，倒也没有别的表示。

我自从一九四九年回国以后，没有遇到这种环境。我在卫士们之间总是沉默寡言，我对于他们的言行，实在看不下去。这点被这帮人感觉到了。叶子龙便三番五次跑去向毛告状。

一组内倾轧斗争互相坑害，毛也从中搅和，这样子就不会有人团结起来反抗他。

江青老和叶子龙、李银桥拌嘴不休。江知道叶给毛办“事”，便和叶疏远。江青更是厌恶李银桥。有一次李银桥在值班室发表议论，说江青怕人家给她提意见，跑到杭州“躲风”去了。

汪东兴和叶子龙一向水火不容。而叶子龙和李银桥一来为利益相争，二来为竟向毛争宠，也剑拔弩张。毛则在一旁煽风点火，等事情闹大了才出面搞平衡。一组的日子便是在这样风风雨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日子中过去。



毛在广州同我谈时说：“医生总有那么一副医生架子，让人讨厌。”我说：“医生对一般人有架子是可能的，但对你不会。”他说：“那才不见得哪。你有没有架子呢？”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李银桥告了我一状。

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是受西方医学教育出身，自然有“医生架子”。再加上卫士们的“渲染”，我就架子十足了。毛的革命价值是推崇工农出身的干部，对医生不屑一顾。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内心很不平。我从小受的教育告诉我，医生这个职业是治病救人，是高尚的工作。叶子龙因此看我不顺眼，想将我排挤出一组，指使李银桥去毛那边告了我许多状。

毛听了李多次，总设法调和我们之间的勃溪。有几次毛同我谈话时，我讲到叶、李二人不得人心。毛说：“这两个人对我有用处，你们要搞好关系。”这话，我当时也不懂真正的涵义。我深知其中的底细，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我那时仍很尊敬毛，但江青的不可理喻和一组这帮人的徇私苟且，使我想离开这个环境。毛的“争宠论”和“戴高帽论”又使我难以苟同。我此时已是一组中的一员。一组应该是个相当光荣的特权团体。但一组的人多半看不起我。叶子龙、李银桥、机要秘书和卫士们就象古代宫廷中，随侍在帝王身侧的人，借着毛的“意旨”作威作福，旁人只有俯首听命。我身为毛的保健医生，却得任凭叶、李这种人的压制。

我自尊心极强，不愿忍受这种耻辱。我衡量当下处境，毛身体很好，不须要一位专职的保健医生。再待在这，我永远无法成为杰出的医生。我仍强烈渴望成为一流的神经外科医生。

因此我下决心离开一组。

我将我的这种看法向汪东兴讲了。汪似乎非常意外，摇摇头说：“大夫，你怎么打退堂鼓啊。你来了一年多了，为主席工作有成绩，你解决了他老人家白血球高的问题。调整了安眠药。主席休息得好多了。你应该从大处着想，服从党的需要。你再想一想，医生多得很，做医生做到主席的医生可就不是简单容易的事了。你要是这么糊里糊涂，不明不白地突然离开了，人家不了解你离开的原因，你也不敢说出这些原因，哪个机关敢要你去工作呢？”

汪的这一席话，确实打动了。我也看过，凡是从这里调出去的人，即使是“家世清白，工农出身，苦大仇深，一心为党”的人，也到处不受欢迎，其中包括一位毛的前任保健医生。每个人都觉得他们是政治上出了问题才离开一组的。不然谁会离开中南海这个特权集团呢？我离开后，我本身的家庭历史更会启人疑窦。这可真是骑虎难下，只能象毛说的：“硬起头皮顶住。”

但我踌躇再三。虽然明白前途未卜，仍觉得应该离开，而且越快越好。于是，我向江青说：“我考虑过我自己的情况，我是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和个人政治条件都不适合做主席的医生。最好让阶级出身好的，本人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来代替我。”

江问我：“这些情况你同主席讲过没有？”我说：“我自己和家庭的详细情况，我第一天见主席时，就向他说过了。调换工作的要求还没有讲。”江沉吟一刻说：“这件事你不要同主席讲了，我们考虑一下。”

第二天江青叫我去，一见面她要我坐下。她立刻说：“你提的事，我们考虑过了。你自己和你家庭过去的一些政治问题，都是社会现象，都是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必然会发生的事，这些不能由你来承担责任。何况汪东兴副部长、罗瑞卿部长和杨尚昆主任都了解，做了审查，有了

正式结论。周总理也知道。你还是安心工作吧，以后对任何人，都不要再提这些问题了。”

汪知道这次谈话的结果以后，十分高兴。他说：“到底摸清主席的底了。他对你可是不错啊。我说我看人是差不了。你好好干，没错。”

因此我又工作下来，虽然心情并不舒畅。

我感觉到，自此以后，江青对我变得客气起来了。每次去看她，她一定叫护士或卫士给我泡一杯茶，也开始谈论医以外的话题了。她的闲谈的方式和方法，很可能是向毛学来的。谈到一个题目，她总是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探索对方的真实想法，和她所想知道的对方的情况。同时又给对方造成一种不拘形式的和无所孤寂的心情。无可讳言，在这方面她学毛学得相当成功，只是没有毛那么老练。

江青的许多高见只不过是一字不差的重重复毛的话。我常常反驳她，但总是适可而止。文化大革命以后，江青将我以前对诗词或小说的看法批为鸳鸯蝴蝶派，属于应被打倒之列。

一九五六年夏天，我们还在广州。一天上午，江青的护士来叫我，笑嘻嘻地对我说：“江青同志叫你去。有好事啊。”

我走进三号楼大厅，江青正在大厅内看照片。我同她打招呼。江放下照片，笑起来。她说：“大夫，听说你一天到晚出汗啊。”

我很窘。去年从北京随毛出来，正是秋末冬初，我只带了冬天穿的衣服。没有想到在广州住这么久。天气暖，我还着纯毛咔叽衣裤。上衣脱掉，只穿衬衣。室内又没有冷气。因此每天从早到晚出汗不止。我讷讷地说：“没有想到主席在这里住这么久，我没有带夏季衣服。”

江随手指指身边几段衣料说：“你穿得太厚，这几段料子你挑一段，拿出去做。”我囁嚅地说：“我穿着衬衣可以将就过去。”护士在旁暗暗地扯我的背后衬衫，我明白这意思。我又说：“谢谢你的好意。”江说：“你用不着客气，去做了吧。”她又叫来小岛招待所负责生活服务的老张，让他陪我去做。

我觉得这事出乎意料。平时听叶子龙和李银桥讲，江青十分小气。现在突然对我这么大方，而且又没有考虑到别的工作人员会怎么想，这必然会使我成为众矢之的。

我去找汪东兴，他说：“这几段料子是在广州举行的日本展览会上拿来的。给你一段，你不接受，她会认为你看不起她。你接受了，别人是会嫉妒，你就孤立了，我去替你推辞吧。”

他到江青那里去了一会，回来找到我，对我说：“你收下吧，江青同志很高兴，她说看同志热汗直流，为什么没有同志间的互相关心的感情呢？这可不是收买李大夫啊。”汪随后说：“以后有人说闲话，我来替你说明。”

果然不出所料，几天以后，李银桥和其他卫士们议论起来说：“江青一向是一毛不拔，送给大夫一套料子，可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叶子龙和李银桥便口口相传，说江青对我“好”，这不寻常。我一知道毛也听到这话，当天晚上，就去看毛，告诉他这段料子的事。毛说：“江青送给你衣料，事前我知道。”

毛知道江青不敢乱搞。江青知道这会成为毛不要她的最佳借口。她偶尔会讨好毛身边的人，顶多也只是和男人说说笑而已。

毛最后说：“你是‘君子求其放心’吧”这事便落了幕。

## 注释：

毛的裁缝是受过法国训练的服装设计师王子卿。他的雷蒙服装店位于北京最繁华的购物街，王府井大街。

毛一九四九年八月至一九五三年十月的保健医生是王鹤滨。王在延安受过医学训练。王离开这个工作后，前往苏联深造，然后回国在北京医院做了一段时间。毛去世时，王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

四月过后，广州已经很热了。毛搬到三号楼大厅内。为了降低室内温度，厅内放了五个大桶，每天运来人造冰放在桶内。我的睡房用一支电风扇，吹的风都是热的。

蚊子又多，不放帐子，咬得凶。放下帐子，就更加闷了。

为了蚊子太多，毛曾经发脾气，责怪卫士们不打蚊子。李银桥又将责任推到医生护士身上。蚊子会传染疟疾，所以是医生们的责任。

问题是小岛地处珠江三角洲，河汊水塘多，无法彻底灭蚊。广州招待所屋子很高。窗子多，窗帘是三层绒的，里面藏蚊子。入夜后，就出来肆虐。拍打蚊子根本徒劳无功。最后省公安厅派人去香港买了不少 DDT，这样才暂时解决了蚊子问题。

天气越来越热，大家都受不了了。他们叫我去劝毛早点回北京。毛说：“我不怕热，还有些事没有办完。再等等。”

我当时听了，猜想一场政治风暴可能正酝酿着要席卷中国。毛离开北京期间，许多中央领导发表了“反冒进”的言论，《人民日报》社论更主张工农生产应稳定渐进。中国人民当时和我一样，不清楚这些高级领导抨击“冒进”其实就是在批评毛。坚持农村迅速合作化的主张是毛提出来的。

过了两天，罗瑞卿、汪东兴叫我去，问我珠江水干净不干净。我一下子摸不清头脑，不知道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我没有回答。汪解释说：“主席叫罗部长和我去谈过了，他要在珠江、湘江、长江游水。陶铸同志说珠江水脏，王

任重同志说长江太大，有风浪旋涡，不可游。我们都不主张游，可是挡不住。你看珠江水脏不脏？”我说：“这里是珠江三角洲，在广州工业区下游。不可能干净，脏到什么程度就不知道了。”他们问我有什么办法检验，并要我  
将检验报告尽快做好。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卫士突然来叫我，说：“主席发大脾气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为游水的事。罗部长、汪副部长都在三号楼主席那里。”

我走到三号楼卫士值班室。罗、王二人刚由大厅走出来。两人满头大汗、满脸通红。汪尴尬地笑着对我说：“不要化验珠江水了，主席马上要在珠江里游水了。”

这时毛走出三号楼，上身披一件白色绸睡袍，穿一条白绸短裤，赤脚穿一双旧皮拖鞋，甩开两臂大步走上码头旁的游艇。陶铸、王任重、杨尚昆都随后上了船。我也立即跑过去。

罗和汪，陶和王，都身负保护毛的安全责任。出于保护毛的安全，他们不赞成，毛在江中游水。但毛仍一意孤行，非游不可。

游艇向上游驶去，不久便停驶。附在艇旁的四支舢板都分别解缆，排列在游艇两旁。毛走下游艇舷上挂着的悬梯。罗、陶、王、杨一一下水。一中队的队员下水后，将毛围成一圈。因事出突然，只有毛穿着游泳裤，我们全只穿内裤下水。

这里的江面大约一百多米宽。水流缓慢，水可真脏，水色污浊，偶尔有粪便从身旁流过。毛躺在水中，大肚子成了一个气箱，全身松弛，两腿微曲，仿佛睡在沙发上。他随水流漂浮，只有时用手臂打水，或摆动两腿。

毛见我游得很用力，他叫我游到他旁边说：“身体要放松，手脚不要经常划动，只在变换位置时，划动一两下，

这样既省力又持久。你试试看。”我试了试，不得要领。毛又说：“你大概怕沉下去，不怕就不会沉。越怕越紧张就要沉。”杨尚昆和王任重都前后游着，他们很快学会了这种游法。我是练了多次才能在水上飘浮，不过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这次在珠江口漂浮了将近两小时，将近二十几华里。回到游艇，冲洗了身体。江青在艇上等着，大家在一起吃饭。

饭中，毛十分高兴，好象打赢了一场仗。他转头对罗瑞卿说：“你们说，李大夫讲这水太脏。”我说：“是的，我旁边就漂着大粪。”毛笑得合不拢嘴说：“照你们医生的标准，人都活不下去了。生物除了太阳是热力总供应者以外，离不开空气、水、土。这三样就那么纯，那么干净，我不相信，没有纯空气、纯水、纯土，里面总有杂质，就是你说的脏。鱼要是养在蒸馏水里，能活多久？”我默然无以应。这明明是无理搅三分，但是要用几句话说明干净与脏的概念，是很难办到的。

晚上在三号楼，我去看他。他讲：“我要在珠江、湘江、长江三江游水。罗瑞卿、汪东兴说，三条江都不能游。今天游了珠江。罗和汪就说，长江浪大，旋涡大，掉进去，捞不上来。陶铸说，不要在珠江游。我说能不能在湘江游。他不吭气。王任重说，不要在长江游，我说能不能在珠江湘江游，他却说可以。”

众人会有这些分歧是管辖范围内的责任问题。罗和汪总理毛的安全工作，不希望他在任何一条江中游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自然不要毛在珠江游水。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则对毛的长江游水提心吊胆。

毛气呼呼的又说：“我说不要你们这样的保卫。你们没有底，我有底。我派韩庆余和孙勇到长江去试游，回来



向我报告。”韩庆余是一中队队长，孙勇是警卫科科长，两人的泳技都不错。游长江真的是非常冒险。长江水流湍急，旋涡大，连船都很难行走。从来没有人试游长江，毛是第一个要游水横渡长江的人。

大约过了十来天，韩庆余和孙勇从武汉回来了。韩、孙二人都说，长江可不比珠江，要卷进去，真捞不出来。而且还有日本血吸虫病。罗向王说：“你向主席报告吧。”王摇着手说：“还是让他们两人讲比较好，我说不能游，主席还会不相信。”罗对着韩、孙二人说：“你们可要讲真正情况，不能顺着说。”二人唯唯说是。

我们一起去见毛。

韩很紧张，是山东人，说话不清楚。毛打断韩的话，说：“你不要讲了，我问你回答。”这下韩更紧张了。毛问：“江宽不宽，大不大？”韩点头说：“宽大。”毛问：“旋涡多不多？”韩说：“多。”毛问：“掉进去，捞得出来吗？”韩连连摇头说：“这可捞不出来。”毛问：“不能游吧？”韩点头说：“可不能游。”毛拍着茶几说：“我看你就没有下去，你还做我的一中队队长呢，你给我滚蛋。”我看韩的脸都吓白了，他站着未动。毛又吼道：“你给我滚蛋。”韩倒着退了出去。这时室内空气似乎凝结住了。

毛回头转向孙勇说：“你说说情况。”我看孙好象胸有成竹，不慌不忙说：“主席，可以游。”孙刚说完这三个字，毛就微微一笑。孙勇接着又要说，刚一张嘴，毛就说：“有那句话就够了，不要多说了。你好好做准备。”

孙退出来到值班室。汪责问孙：“你怎么这样回答，事先不是说好了要如实讲吗？”孙胀红了脸说：“汪部长，你看见老韩了吧，我要照他那样说，我也要滚蛋了，这有什么办法。”韩嘟囔着说：“这不是把我卖了？”汪安慰

他说：“怕什么，你是共产党员，党了解你。”但韩庆余自从这次游水事件后，调离一中队。

一九五六年，由广州乘专列到长沙。毛准备游他故乡的湘江。这时长沙的气温已到摄氏四十几度。住下后的第二天游了湘江。

湘江正在涨水。江面足有二、三百米宽，水流急湍。从岸上走到江边，有一段砂砾地。地一天下水前，在江边行走，跟在毛身后不远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祥，突然被水蛇咬了一口。大家骚动了起来，有人叫道：“快送他去医院。”

毛毫无反应。但罗、汪和整个警卫人员都紧张起来，一齐围到毛的身旁。罗问我带没有带防治蛇咬药，我说带了。罗并不是为李祥问这句话，而我也不能替李厅长急救，因为我只负责毛的保健。

罗又说：“为什么警戒布置，事先不将岸边都仔细看看。”我说：“我听湖南省公安厅李厅长说，原来布置在岳麓山对面下江，谁知主席临时要停车，走下来了。”汪接着说：“主席不肯听别人的安排，他要干的事谁也别想拦住，以后定这么一条，凡是游水，沿江上下十里都要彻底调查。”

下水以后，水势很急，毛仍然用他的姿势漂着，慢慢游向江心。湘江当中有一小岛，就是橘子洲。毛游到橘子洲上了岸，巡逻艇随即靠岸。随从递给他袍子、拖鞋和香烟。我们赤足上岸，只穿着游泳裤。

小岛上破破烂烂几座小茅房，根本没有橘子树。毛走到一间破屋前，正有一位穿着补钉衣服的老太婆，坐在屋前缝补衣服。毛坐下来，吸着烟，谈了起来。毛问：“日子过得怎样？”那老太婆不知道眼前这位就是毛主席，自

顾自补着衣服。毛又问了一次。她勉强说：“马马虎虎。”她根本未抬眼瞧毛一眼。

有不少小孩和大人围了上来。毛谈起他年轻时常游来橘子洲的往事。那时岛上就已是一片荒芜。

我们后来一九五九年六月又回来时，橘子洲变得毫无人烟。原来毛突然在橘子洲上岸，把当地的公安厅搞得胆战心惊。在毛走后，公安厅和军区派出一队士兵，去岛上清除“坏分子”，迁走所有的居民。公安厅在岛上种满了茂密的橘子树，秋天橘花盛开，整个岛成了花团锦簇的大花园。我问李祥那个老太婆到哪里去了。李推说他不知道。我想李一定知道，只是不想说实话而已。

第三天游湘江，又发生了一件没有想到的事。大家正顺流下浮时，韩庆余忽然大叫：“不要到这边来。”原来湘江没有涨水前，江边挖了一些储粪池，江水一涨，淹没了粪池，老韩不知道，游进一个粪池中间，弄了一身大粪，大家放声大笑。

晚上我向毛说：“这样游水很安全，可是大粪池到底有些……”我话没有说完，毛大笑说：“湘江太窄，游长江去。”

过没几个小时，我们便坐上了往武汉的专列。

王任重为了游水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仍住在东湖招待所。王抽了一条渡江的“东方红号”轮船专用来搭乘人员。甲板宽阔，船舱里有床，可以睡卧休息。一个小盥洗室可以洗澡。毛、其他领导、毛的卫士及当地警卫一起在一座工厂内登上轮船。厂内原有的工人全被驱离，里面满满都是警卫。轮船拖带了八条木船，另有四艘小汽艇往来巡逻。

船到江心，也就是武汉长江大桥正在修建的地方，毛从舷梯走下水去。大家纷纷下水。一中队队员有四十多名，在毛周围游成一个圆圈。

我走下舷梯，两手刚松开梯栏，水流立刻将我下冲，瞬息下漂有四五十米，根本不需要划游，只要保持身体平衡，自然就迅猛顺流而下，既没有波浪，也没有旋涡。在水中感觉水很宁静，炽烈的太阳正在头顶。身上似乎融合在水里，感到无限轻松。

我在游水的人群中，听到轮船上许多人大声喊叫。我抬起头，看到许多小木船纷纷划近距轮船大约一百米处，一些水手从船上跳下水去。当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游在毛的旁边，毛问我船上有什么事，我又问身边的人，大家都莫名奇妙。

等到游完回到轮船，才知道是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大家下水时，他踌躇不决，等大家游远，他才决心下水。他入水后，水急下冲，他慌了，喝了几口水，等到木船上的人们将他拉到船上，他已经是筋疲力竭了。

这次游水向下漂流一个小时后，罗瑞卿、汪东兴在轮船上叫我，招呼我说：“你同主席讲一下，已经游了一个小时了。”我游到毛身旁告诉了他，毛说：“长江并不可怕吧！”我说：“这样游法，是不可怕。”毛说：“看起来，再困难再危险的事，只要做好准备，就不可怕。不准备好，容易做的事，也会出问题。”

我想他不只在指游水一事，也在影射政治。两小时过去了，罗、汪又叫我向毛打招呼，并且又说：“王任重书记说再下去就是血吸虫疫水区。”毛闪闪眼说：“什么疫水区，还不是想让我上去。”我说：“两个小时也差不多了。有的人来以前没有吃饭，游这么久，饿得也够受了。”毛说：“那好，上去吃饭。”

轮船缓慢驶入人丛，毛由舷梯向上攀去。我问了当地的水手游了多远，他说足有四、五十里，还说：“像这样在水上漂着游法，还是第一次，越游越冷。”杨尚昆游近舷梯，对我说：“这不是游水，是在水上飘流，倒是不用费力气。”

毛上船后领导们都松了口气。汪东兴先前特别紧张。他后来同我说：“这次游江是没有出什么事，如果像陈再道那样，喝几口水，我岂不是成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人了？”

孙勇也同我讲：“我说可以游长江，真是捏一把汗。如果主席游水有个三长两短，我这命不还是要送进去。”

在轮船上，毛十分高兴，菜摆上来了，毛说大家一起吃。王任重给毛斟一杯酒说：“主席喝一杯驱驱寒气。”毛哈哈大笑说：“这么热的天，有什么寒气。酒可以喝一点。大家都喝一点吧。”说完，他喝了一口酒，又说：“陈再道同志，你倒是应该驱驱寒气。人应该顺潮流而动，你怎么逆潮流而动呢？”陈咧嘴，吃吃半天，说不出话来。

王任重得意地说：“主席啊！我们跟你这么多年，就是不知道主席游水游得这么好。像主席这样有魄力，我想到主席年轻时说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真是这样，今天一游，其乐无穷。同主席在一起，真是受到教益，主席今后多批评教育我们。”

罗瑞卿说：“我们跟主席这么久，在主席教育下，仍旧是教而不化。我可不像主席说的，有些人是花岗石脑筋，一定改。”

汪东兴说：“主席，我们该检讨，只想到安全，不想到游长江给全国的影响多大，全国会从这事上，想前人不该想的事，做前人不该做的事。”

毛真是高兴极了，说：“你们不要给我戴高帽子。事情就怕认真对待。你们要记住，任何你们不熟悉的事，不

要一上来就反对，反对不成又犹疑，就是不认真准备。王任重同志由不赞成，转变到积极准备行动，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江青是最后说话的。江青开始也一再反对江中游水。后来看毛为了游水发脾气，江青才冷冷地说：“游水有什么可怕，这些人吓得似乎天塌地陷。在广州你们不赞成游水的时候，我就同你们不一样，我是游水上的促进派。”

以后毛常讲：“只有江青完全赞成我。”

我侧眼旁观这些共党领导同志。我想起有一天毛同我谈论时说：“他们是向我争宠。他们对我是好的。我有用他们的地方。”我很难想象在这么伟大人物的身旁，竟都是些阿谀奉承的人。毛究竟要他们有什么用处？

这些人不只是在奉承毛的游水功夫，也在阿谀毛的政治能力。毛为中国画下的未来蓝图，规模宏大，大胆冒险；毛坚持中国必须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国家，此立场与其他中央领导的小心谨慎成为对立的状态。毛说“不熟悉的事，不要一上来就反对”，便是在批评北京的那些保守派。毛认为在农村合作社化和城市经济重建两事上所遭遇的难题，完全来自于“不认真准备”，而不是毛所倡导的改革政策本身的错误。在三江游水，再困难、再危险、只要做好准备就不可怕；同理，中国若勇于大胆改变其经济和社会总结构，便能重振雄风，荣登国际舞台。如果中央领导们不支持毛这个远大的计划，陶铸和王任重这些地方首长会愿意跟随毛的脚步。毛常说，在北京住久了，头脑空虚，像工厂没有了原材料；到外地走一走，原材料就来了。

毛一九五六年夏季的巡行，打了一场大胜仗。

毛用他游水的方式统治中国--毛坚持实行一些前所未有的，猛进危险的政策来改造中国，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此时在一九五六年六月，毛的大跃进和

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腹案还未完全成形。但在武汉，毛第一次游长江后，我开始模糊地察觉到毛心中乌托邦天堂的冰山一角。

我在武汉时，随毛会见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林提出在长江的三峡下流修建系列水坝，以引流分洪，避免水灾。毛说，要在三峡修成大坝岂不一劳永逸。林即表示，这才是彻底解决长江水灾的办法。于是三峡大坝的修建就这样定下来。林是老干部，不是科学家或工程师。我个人觉得，三峡的改建须经过精确的计算，这庞大的筑坝工程的结果也难以掌握和预料。但毛很热衷这个规划。毛对我说：“将来三峡就没有了，成了一个大水库。”

在当晚毛写了一首词，即《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墙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以后毛对我说：“这词中的两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有人说我引的孔老夫子的话，表示忆古抚今，流露出的心情与苏东坡的‘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差的多，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想想孔夫子在这两句话下面，还有一句，‘不舍昼夜’？大江奔流，不能不给人一种奋发进取的精神，怎么会给人无可奈何的消极情绪呢？《禹贡》上说，大禹疏通九江。大禹有无其人，还有争论，大禹不可能开通三峡。但自古传下来的大禹的故事很多，这些确是积极进取，很鼓舞人心的。”他又讲：‘高峡出平湖’一句是林一山他们的话，还是恩来同我谈起这一设想。我是没有把握，这才请他们来谈谈，他们计划在巫峡筑坝，引水到华北、西北广大缺水地区。也有人提出

来，这一来，四川境内长江水位提高太大，重庆朝天门码头只剩下两级石阶，重庆以下的农田全部要淹没，我是很想追溯黄河、长江而上，探河源之源。常说‘不到黄河不死心’，我是到了黄河心不死。“北京中央领导的”风吹浪打“挡不住毛的英发气势。就像秦始皇修理万里长城，毛要为自己留下一个不朽的巨大纪念碑--那就是长江三峡大坝。不久后，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投入了三峡大坝的规划。他们知道毛对大坝的梦想，异口同声地向毛保证此工程行得通。我想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不会如此草率便赞成这个规划。果然，后来国务院和人民代表大会属下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诚实地表达了他们的保留看法。但这项规划仍在毛死后十五年，一九九二年四月通过。第二天和第三天毛都到江中游水。毛在长江下了三次水后，突然决定要回北京。那时正是七月。我对毛的政治战争毫无留意，也从不主动探问。毛的医疗保健才是我的责任。我是从毛和他的政治秘书田家英(田是我的朋友)口中、党文件中，一点点拼凑出当时正横扫全国的巨大变动。我深知等我们回北京后，我便难再置身度外。



## 注释：

在毛的鞭策下，一九五七年中国将粮、钢年产量指标拔高：粮产量预计将从三亿吨增到五亿吨，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到三千万吨。与一九八四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秋收(粮产量只有四亿吨)相较，毛的计划显然是“冒进”。钢产量则直到一九八三年才达到三千万吨。

这首诗实际上是毛对中央其他领导提出“反冒进”批评的回音。

回北京后，毛更加信任我，考虑要我当他的秘书。有一天毛与我谈话时说：“我没有病，你的事不多。我看你还不错，你做我的秘书，再干点医以外的事。”我会做类似林克的工作，毛要我除了读读“参考消息”外，还要做政治研究，写报告给他。

我心里非常不愿意。当秘书可就会卷进政治的是非漩涡里去了。我不想卷入其中。汪东兴劝我接受。但我考虑，当医生已经处在“受嫉”的地位，再兼上秘书，就要成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了。做医疗工作已经是十分艰难，怎么自投罗网，兼上秘书呢？

我跟毛说：“政治上我不行，不如林克。我还是干医生，这方面我在行。”

一九五六年去北戴河前，毛叫我把两个儿子带去。

我说：“小的太小，大的太顽皮。而且北戴河都是首长，我带孩子可不好。”毛咧嘴一笑说：“你这个人啊，就是这么谨小慎微，怪不得江青说你为人太拘谨。别人能带孩子去，李敏、李讷和远新都能去，你为什么不能带孩子去？”

我在卫士值班室见到叶子龙和李银桥，告诉他们毛的话。两个人都显得那么别扭，叶说了一句：“你就带嘛。”我觉得不妙，赶紧到汪东兴宿舍，将这事的原委告诉他。

汪沉思了一会：“这事还得照主席的话办。不过，你带孩子影响太大，工作人员不许带孩子。你到保健局，他们派医务人员到北戴河值班。你告诉他们，主席让你带孩子去，我的意见让他们带去。这样，警卫局的人没有话可说，也免得我为难，不至于抱怨我。”

我那时的领导上是汪东兴的警卫局和中央保健局。由于大部份的领导人夏天都去北戴河避暑，保健局也派人随行在那设立一个门诊部。保健局里答应替我把我六岁的大孩子李重带到海滨。小儿子在北京由娴和我母亲带着。

走前，江青要汪东兴转告我，想请我给李敏（毛与贺子珍生的女儿，当年十九岁）补习数学。李敏小的时候在苏联的中国幼儿院长大，没有受到完善的教育，人却是很朴实忠厚，十分有礼貌。一九五六年她在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读书，数学、物理和化学，特别是数学跟不上。汪东兴帮我答应了下来。

我也没有异议，但江青还有别的要求。江青知道慎娴的英文好，想请她教李讷学英语。汪也答应了。

我一听不由得吃惊。教李敏数学不难相处。但李讷对人欠缺礼貌，慎娴恐怕没有能力教她。

汪东兴一再怂恿我答应。他说：“我已经答应江青同志了，你可不能不同意。”

那时娴已经由她老师安排在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工作，常得陪同外宾到外地参观。

我坚决地说：“吴慎娴工作太忙。她不是党员，出入主席的家，很不合适。加上她家庭出身是地主，兄弟姊妹在台湾，这些都是大问题。”汪又说：“罗部长可是也同意了。而且经过保卫处审查，你说的这些都不成问题。”

我仍然不同意，我说：“我一个人在这里工作，已经够困难了，不能再把吴慎娴也派来工作，这样更不好相处。”汪很不高兴了，说：“你不相信组织领导吗？罗部长和我都同意，你就是不同意。你这不是使我们为难？”我说：“我不是使你们为难。这事干不得。江青是翻脸不认人的人，李讷性情别扭了一点，再加上叶子龙、李银桥这些人，平常没有事还要惹是生非。吴慎娴是个很纯朴的

人，她应付不了一组这么复杂的认识关系，来了会引起大麻烦。”

汪这时已经很不耐烦了，他说：“算了，我找吴慎娴谈，你不要管了。你叫她到我这里来。”我看到事情已经要弄僵了，说：“我叫她来。”我赶紧回去，将大体情况告诉了娴。说：“你现在到汪部长那里去谈话，你不能答应教李讷英语，你强调工作太忙，每天下班回来太晚，决不要松口。”娴匆匆去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娴回来了。看她脸色和缓，我放了一大半心，问她谈得怎么样。

她说：“谈得很好，我将目前的工作情况告诉汪部长，特别时常有接待外宾的任务，还要陪同到外地参观，时间上保证不了给李讷上课。”我完全放心了，说：“你倒是会讲话，汪部长怎么说？”娴说：“他仔细听我讲完，他说这倒是不好办，以后再商量吧。”我就回来了。

第二天江青又找我谈，她说：“你爱人这么忙啊。”我说：“是忙，特别是来访问的外宾多，常常回来很晚。”江点点头说：“教英语的事以后再商量。那么，你可以教李敏了？”我说：“可以，每天两小时。”

一九五六年七月下旬，我与毛坐专列前往北戴河，毛和江住在八号楼。李敏、李讷和毛新远住在张家大楼，据说这原属于张学良家的别墅。我和林克，住在八号楼后面的十号楼。

北戴河景观迷人。我和慎娴在一九五四年夏天曾经到这里休假一星期。没想到那是我们往后二十余年中唯一的假期。我们很喜欢这个地方。北戴河原是渤海湾的一个小渔村，满清末年英国人经营唐山开滦煤矿，发现了这个小渔村，便修了避暑游场，盖了些别墅，此后中国的豪门大吏也修了一些。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些都收归国有，成为

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暑期活动地。在海滨迤东一带开设了商店和饭馆，成了一个很繁华的市镇。北京到沈阳的铁路，经过这里。英国人盖的红砖别墅四周长满了常绿植物。红房绿荫与蓝天白云相映生辉。海面无边无际，海天迷茫，蓝中微微闪出银灰色亮光。渔夫告诉我，那亮光表示有带鱼群出没。

前次慎娴与我来北戴河时，我们总在凌晨二、三点落潮时分，到沙滩上捡海鲜和海螺壳。四点时，渔夫聚集叫卖，我们顺便买当日的食物回去。此地的蟹蚌非常美味，但慎娴与我偏爱比目鱼。

一九五六年离开酷暑中的北京，觉得北戴河真是清爽宜人。海风拂面，微咸而湿润。别墅前的砂砾海滩向东西各延伸七里，偶尔有一两叶白帆浮沉在波光涛影中。

住处周围都是树林和灌木丛。门前两旁有四棵李子树，到八月都结了实。每个李子有鸡蛋大，皮紫红色，肉瓤深黄，味香甜，随手摘食，满嘴清冽。这是在北京无论如何买不到的水果。每当雨后的清晨，我们到松林中采松蘑，这种松蘑大而香，似乎充满了松林中的清凉松香气。两三个小时往往可以摘到一两斤，拿回来，交给厨房，加上虾米，可以煮成鲜美的清汤。毛对汤素无兴趣，但江青却极爱好。

日子过得既有生气，而又闲散。平时晚上有电影，映些国内外新发行的影片。每星期三、六晚上在浴场大厅有舞会，厅外的大阳台也成了舞池，这是为毛准备的，刘少奇、朱德有时也来。我每天上午两个小时给李敏补习数学。下午随毛和三、四十个办公厅人员和一中队队员到海滨休息游浴，警卫在离岸约两千米的海面上，放置一张有一间屋子大小的平台，四周用铁锚定住。毛首先游到这里，休息一度再游回去。

七月底八月初，常有暴风雨，乌云低低压在海面上，即使在这样的天气，毛也去游过两次。汪东兴与罗瑞卿劝阻无效。我也游过。风浪太大，在水中奋力漂浮。有时候觉着游出去很远了，可游来游去实际没有超过沙滩地，不过是随浪沉浮。一个大浪将人似乎推向云端。浪退下去，人又似乎沉入海堤。狂风夹着海水，在耳中咆哮，呼吸间两肺翕张，好象无限地膨胀起来。

象这样地游过以后，毛往往问我：“你觉不觉得在大风浪中搏斗的乐趣？”我说：“以前没有体验过。”毛说：“平常说乘风破浪，不就是这样吗？”

海里多鲨，一中队在平台外围了安全网防止鲨鱼游入。有时警卫们捕获鲨鱼，他们想这可以使毛打消游太远的念头。汪东兴清楚，越是劝毛别往远处游，毛越会去冒险，于是将鲨鱼在浴场外展示，这比劝阻有效多了。毛常在浴场休息室看文件，与领导同志谈话，傍晚回八号楼。

这个暑期，李重真是高兴。一夏天晒得又红又壮。他同一中队的队员们已经混熟，常同他们一起去游水，晚上去看电影。李敏很喜欢他，常带他去玩。他很懂事，晚上我回来的很晚，他在睡前总是将我的床整理好，将换下的衣服也洗干净晾起来。

其他领导也在北戴河，但常见的只有刘少奇和朱德。其他的领导人感到毛这里太拘束，他们大多去东山国务院管辖的浴场舞场游水或跳舞。他们很少来找毛，我也从未去拜访他们。毛要求一组的人只效忠于他，如果我们和别的领导人走得太近，毛会怀疑我们要“通风报信”。

朱德偶尔到毛的休息室和毛谈谈。朱不会游水，常带一个救生圈在水中漂游。朱喜欢下象棋，没有对手时，我的孩子李重常和他对局。朱对我非常客气。朱每次见到我，总要问毛休息得好不好。

刘少奇也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了。可是精神矍铄。他身材细长，背微驼。一般在下午三、四点以后游水。刘那时是毛的钦定接班人，主管国内事务，为人拘谨庄严而小心谨慎。毛和刘公事往来密切，但在北京时也很少见面，只有公文的批阅往返。

党中央缮好文件，先呈送刘少奇批阅，刘看好后就送往机要室，最后才送到毛那。

毛加注他的看法，公文在辗转送到刘那去执行。

刘的最后一任妻子王光美常常陪他。王那时大约三十几岁，头发黑而浓，脸微长，门齿微露。毛在的时候，王总是很热情地走来看望，也常陪毛游到海内平台。

每当这个时候，我注意到，江青坐在阳台上，一脸的不耐烦和不高兴。江不会游水。最多只在沙滩旁近海处“泡一泡”。她每次下水都穿上橡皮软鞋，因为她右足有六个足趾，不愿意别人看到。

刘的前后好几位妻子给他生了不少孩子。刘的第二任妻子王前生的女儿刘涛那年夏天也在北戴河。刘涛很纯真活跃，那时大约已是十六、七岁的姑娘了。她常同毛一起游向远处，晚舞会也常请毛跳舞。毛对刘涛一直很中规中矩。但江青对刘涛的开放活泼作风，又嫉又恨。

江青常常发怒，我吃足了伺候她的苦头。没想到十年后，她压抑的嫉妒和不安全感全爆发出来，一心一意将刘家人逼于绝境。

毛和刘对刘所扮演的角色看法很不相同。毛觉得他是至高无上的领导，刘少奇不过是在他的御杖下工作的人。刘则自觉和毛平起平坐，为治理国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一九五六年是毛刘关系的转折点。我和毛的关系受到重大打击之后，我才间接察觉到这一微妙的情势。

注释：

有些资料来源显示王光美是刘的第五任妻子。  
我们只能确定她是第三位。



我以为那年夏季的最大风暴是北戴河的夏季暴风雨。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毛突然对我大发脾气，起因是傅连璋。

一九五六年七月回到北京以后，傅连璋要我将这一段的情况向他汇报。我去了以后，他交给我一封信，是他写给毛的。主要内容是向毛介绍一种新的安眠药，是西德生产的，叫“烦恼躲”(Phnodorm)。他希望毛检查一次身体。

我觉得很难办。因为自从改变安眠药的服法后，睡眠还比较好，平均每天可以睡六到八个小时。这时又提出用新的安眠药，很不是时机，毛会认为多事。再来傅该了解毛的个性，毛一向不喜欢医生检查身体。傅以前还跟我说过一九五一年毛对苏联医疗小组大发雷霆的事，并一再嘱咐我要当心。

我向傅说是不是慢些时候再提出来。等到睡眠不好时，劝他用新药，可能容易接受。傅同意了这个意见。傅又说，信里有向毛建议检查一次身体的事。傅说：“我从红军时期就跟随主席，这么多年了，他相信我，你就说是我的建议。这次完全找中国的专家。”我刚要再开口说话，傅截住，沉了脸说：“你胆子要大些，不要推三阻四的，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将信搁了两天，傅又打电话来，催我快去讲。我只好回答我会立刻去报告。

当天下午，毛到室外游泳池，游完泳，晒太阳。我凑过去，毛看到我，说：“你怎么没有游水啊？医生要讲卫生啊。”我换了衣服，穿上游泳裤，在水中游起来。毛说：“不要练游得快，要练游的时间长。”我说：“到现在还没有学会主席的游水方法，以后一定多练。”毛笑起来，叫我到他身旁，又做给我看他的游水方法。然后说：“我看你

的身体很不错。”我说：“这是在武汉游长江，每次主席都游两小时，表明主席的心脏、血液循环都超过一般的人。”毛又笑了说：“你又给我戴高帽子了。”我说：“我讲的是实话，好多年轻人都受不了，有一个水手，上了木船就虚脱了。”毛说：“我怎么不知道？”我说：“因为人多，王任重同志顾虑讲出来引起紧张。”毛开朗地笑着说：“有什么好紧张的，各人体质不同啊。”我接着说：“最好乘现在很健康的时候检查一次身体，留下一个客观记录，等以后有病时，可以对照出来。”

毛看看我，摇着头说：“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们医生的想法。我常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你们的药就那么灵？夸口郎中无好药。就说癌吧，得了癌有什么办法？开刀割了就好了？我不相信。”我说：“早期癌，没有扩散以前，手术很有效，不检查，不可能在早期发现。”毛说：“不见得，你举出一个人来，我听听。”

那个时候，“高级领导人”年级都不很大，还没有一个例子可以举出来。我只能说几个乳腺癌的例子。毛笑了说：“乳头在外头，容易查、容易治。只能说，有的部位的癌可以早期查出，早期治。不能千篇一律。”停了一下，毛说：“你的意思是让我检查？”我说：“傅连璋部长有封信给你，你看看。”毛拆开信，大发脾气说：“傅连璋这个人，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来找事。我现在不得空，过几天到北戴河再说吧。”我跟着问：“医生们可以一同去吧？”毛说：“可以，可以让他们检查，我也可以找他们谈谈。”

我那时对毛还不完全了解，我满以为这样就定下来了。于是给傅打了电话。傅在电话上高兴地说：“我同你讲过了吧，只要说是我提的建议，主席肯定会同意的。”

毛和江青在北戴河都排了身体检查。北京协和医院的张孝骞和邓家栋医生负责检查毛，林巧稚和于葛峰医生则检查江。江青很快便做好妇科检查，但张、邓两人却等了十几天，毛还是没有动静。傅打电话跟我发牢骚，说医生们在北京很忙，等着要回去。傅要我问什么时候可以检查。

我认为这事好办，毛在北京已经同意了，现在不过定一下时间，不困难。

第二天同毛一起读英文时，我直接问毛：“张孝骞大夫来了十几天了，什么时候检查身体呢？”毛放下书说：“让他们住下来，休息吧。”我说：“怎么向他们回话呢？”毛诧异地说：“回什么话？”我说：“不是检查身体吗？”毛这是突然变了脸色说：“谁人说过要检查身体？”我说：“离开北京前，主席不是同意了到北戴河检查身体吗？”

毛抬起身来，大声说道：“在北京讲的话就不能改变吗？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我也可以改嘛。这一定是汪东兴这个王八蛋搞的，我不检查，你告诉他，叫他滚蛋。”

我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毛发这么大的火。我也不知道，叫“他”滚蛋的他，指的是谁。我晕头胀脑地说：“这是傅连璋部长要我报告你的，汪东兴同志并不知道。”毛说：“叫傅连璋也滚蛋。”我说：“傅没有来北戴河。”

这突如其来的发作，使我象当头打了一闷棍。检查身体本来是件好事，无论谁作主提出来，可丝毫没有恶意。如果不同意，也可以拒绝，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呢？

我走到卫士值班室，摸不清毛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李银桥和卫士都偷听到了。李说：“主席不是对你发脾气。这两天中央开会，谈什么事不清楚，不过听说，主席在会上批评了警卫工作，特别提到这次外出游长江一些事，还有火车的安排，警卫太多，好多事情哪。”

我心里想，毛并不说明道理，突然大发雷霆，使人手足无措，而且也无法知道他到底想什么。

李又说：“明天主席自己不同你说，江青也会同你解释，让你不要紧张，不要想的太多。”

但我忐忑不安。我见过毛对别人大发雷霆，但这是第一次毛用这么严厉的语气跟我说话。我能替这么一个不可理喻、喜怒无常的人工作吗？这工作太危险、太难捉摸了。我想还是离开一组，去医院工作好。

我回到屋里，又一想，了悟到我这次讲话太冒失了。我不知道毛近日想什么，说了些什么，要做些什么，就贸然提出他并不怎么想做的事。何况在北京时，我是拐弯抹角慢慢才引到检查身体，采取了很缓和的方式使他同意的。细想起来他在北京时讲过的话，他同意是勉强的，或许是“给我面子”应敷衍我。我的头脑太简单了。

第二天傍晚，毛叫我到他那里去。一见面毛就笑着说：“曹营的事难办吧？”我也笑了道：“那么我就是蒋干了。”毛叫我坐下说：“我发脾气是我的一种武器。我不想做的事，勉强我做，我一发脾气，就做不成了。脾气发过去，就没有事了。你不要记在心上。我是主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以后我有不对的地方，你可以当面同我讲，可是不要背着我讲，我一向反对背后讲人。”

我说：“主席，我讲话太冒失了。”

毛说：“我这次到北戴河来，中央有些事要解决，下半年要开第八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我没有时间，不检查身体了。你告诉医生们，说我忙，以后再检查。你要好好招待他们。他们要是愿意，在这里多住几天再回去。张孝骞大夫是湖南人，我还想同他谈谈。”

这次我听懂了，身体不会检查了。我也明白毛不是在生我的气。

事过境迁，日子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我们每天都读英文。毛晚上睡不着，便找我去闲谈。这一阵子他谈的多半是他对苏联的不满以及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迫切需要。毛谈到中国文化的僵滞，认为西方思想或可促使中国蓬勃再生。他想引进西方文化，但又不想附属其下。他的目标是创造出“非中非西”的新文化。

我则指出中西文化差异甚巨，毛说我“抱残守缺、没有进取精神”。这也是他对中央领导的指控。

也就是在一九五六年夏季这个期间，毛第一次告诉我他要辞掉国家主席，退居二线。我那时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当时我对毛不够了解，不晓得毛向来不做戏言。毛用这些闲谈来帮助他思考，而我总在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之后才了悟闲谈其中的深意。他要辞去国家主席之事，当时经由几位领导人讨论，仍未公诸于世。三年后，一九五九年毛才正式辞去国家主席。毛“退居二线”所持的理由是他的健康，以及他不想为琐碎小事分心，只专心重要大事。其实真正的原因不仅如此。

毛的健康确实是原因之一。每年过五一及十一这两个节日，心情都很紧张。想睡偏偏睡不着，往往彻夜未睡便上天安门。二来庆典后，毛受风寒，很容易感冒，一拖久就变成支气管炎。所以上天安门成为毛的精神负担。

毛厌恶繁文缛节是另一个原因。在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平日科头跣足的毛，必须按时穿戴整齐出席外交活动以及送往迎来，在在使他厌烦。

但我后来才了解到毛的所谓“退居二线”，是种政治手腕，以此来考验其他领导人的忠诚度——特别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当时毛已对他俩起了戒心。赫鲁晓夫的反史达林秘密报告，中国领导人最初对赫的支持声态，而后叫响“集体领导”的口号，批评毛的“反冒进”言论等等，都使毛

愤懑不安。他并非真的想放松他手中的权力——实际上他是将这些他称之为“表面文章”的，推给别人去周旋，这样他可以全心全意投入改造中国的大业。

毛并没有等太久就知道这个政治考验的结果。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确定了他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怀疑。

注释：

薄一波曾说，他在一九五四年夏天就听毛谈过退居二线之事。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揭幕。其他领导都在开会前纷纷返回北京。但毛仍滞留在北戴河。这时北戴河已开始有寒意。我们每天下午仍下海游泳。最后毛也觉得太冷，我们便在开会前赶回北京。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召开。解放后，这是第一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八大”。“八大”会中将选出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并为新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定下指导纲领。毛原本希望“八大”将其激烈改革政策形成决议，并确立其为中国独一无二的领导人。他便将细节交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处理。刘邓两人误以为毛真的要交出权力。刘少奇负责讲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最重要的政治报告。这报告的起草讨论须经毛先行过目和修改。后来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告诉我多次--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交毛过目。那时即将担任新职(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要毛休息，不参加会议。

毛说：“我提出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是我仍然是党的主席啊。召开八大为什么事先不同我打招呼，八大的政治报告起草讨论，我没有参加，事先稿子也不给我看，说是来不及了。我又没有离开中国，有什么道理说来不及，不让我看一看呢？”

我不确知毛究竟批阅过刘的政治局报告没有，但他显然不喜欢其中强调经济建设并避开阶级斗争的论调。我想毛跟我发的牢骚，是他在气头上的话。八大路线(即坚持集体领导、发展经济、反对个人崇拜、主张实事求是等)从未得到毛的支持。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都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的出击。直到一九六



九年第九次全国大会时(那时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并已死亡，邓小平被撤职)毛的思想成为全国指导纲领，毛的报复才算落幕。

我想邓和刘对治理中国的观点基本上与毛的迥然大异。他俩将党视为决策机构，赫鲁晓夫的反史达林报告更使他们坚定集体决策的信念。毛的观点则是帝王式的。

毛认为他的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并憎恶任何反对声浪。

毛在“八大”中做了开幕讲话。我随同毛出席了开幕和闭幕会议，并在后台听了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我一听到刘、邓两人的报告，就知道毛一定会大为震怒。我也非常惊骇。毛的确有理由觉得中央在压制他。刘的政治报告和邓修改的党章的报告中，赞扬集体领导路线，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进一步向党代表保证，中国绝对不会出现个人崇拜。邓修改的新党章中，不但删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这句话，并为毛设立了荣誉主席的职位--这些都显示毛的党主席职位并非终身职，党领导要他交出权力。

跟随赫鲁晓夫起舞，颂扬“集体领导制”的基调，特别令毛不安。如果中国共产党员真的实施集体领导制，那表示领导人之间地位平等，所有重大决策将经集体裁决。毛的重要性便会锐减。但毛要做天下第一人，他想搞个人崇拜。

毛说他想要退居二线时，他仍想由他决定所有重大事件。但问题就在刘、邓两人觉得重要的，毛觉得不重要，没送来的文件，毛又觉得很要紧。这也就是毛后来所说的“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报”。

我在“八大”会议中首次发现，毛和他的制定接班人刘少奇之间，存在着如此重大的歧异。“八大”是毛与刘、

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毛觉得中央领导人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

但是毛平息怒气的策略，是先针对敌手的下属迂回攻击，而不是直接铲除真正的目标。因此这次毛龙颜大怒，遭到池鱼之殃的反而是罗瑞卿和汪东兴。毛的愤怒也使我的生活起了快速而戏剧性的改变。

一九五六年，八大闭幕，国庆日后不久，毛便爆发了。有晚中南海大部分的工作人员纷纷去怀仁堂看京剧表演。毛没有去，我正在卫士值班室看值班记录。李银桥突然跑进来，打电话到怀仁堂，叫还在看京剧的罗瑞卿、汪东兴立刻来。

过几分钟罗、汪赶来了。他们问什么事，李银桥只说：“主席请你们去。”他们匆匆走进毛的卧室。去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才下来。毛大骂罗、汪时，李银桥和卫士在卧室门口，他们听得很清楚。

罗、汪进到毛的卧室后，毛就破口大骂，说他们不接受批评，依仗中央压他，毛骂道：“宰相出朝，地动山摇。警卫学苏联，搞什么公安军和警卫干部队。到处兴师动众，完全脱离群众。”

毛不能明说他真正生气的原因--罗、汪两人过于服从党组织，凡是都要向刘少奇报告。他们也并不是为了讨好刘少奇而胆敢跟毛对立。他们总认为从安全出发，做好保卫是天职。毛又时常一意孤行，在戒惧恐惧之下，他们转而向刘少奇寻求支持，以防万一出事，可有人分担责任。

八大后，罗、汪仍照旧前去向党中央报告毛的起居一切，这使毛大为恼火。他们不知，如此警卫森严，甚至使毛觉得一举一动都在警卫人员的监视之下。毛自然不愿受到这种约束，尤其这影响了毛“私生活”的“保密”。

毛此时仍对彭德怀批评他“后宫三千”之语耿耿于怀，罗派的警卫越多，毛私生活的秘辛就越有可能流传到中央去。

毛对罗、汪两人大吼说：“我就不信，‘死了张屠户，就吃混毛猪’，你们滚蛋。”毛说，要罗下放到湖南省，任省长。要汪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然后下放江西。

两人从毛卧室出来，颜色苍白。罗说话时口舌抖动，向汪说：“这是这么一回事，到公安部，今夜立刻开会。”罗性格刚烈，要向党中央说明情况。汪说：“罗部长先别急，明天再开吧。我先了解一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汪劝罗，如果这样做，等于同毛摊牌，毫无转圜余地，会彻底垮台。

罗于是改向毛写了检讨报告。然后召开公安部组会，在会上做了自我检查。毛的气出来了，慢慢平静下来，罗仍任公安部长，没有下放，汪也写了检讨报告，但没有复职，到党校去学习了。

我是汪推荐来的，遇到了困难，都找汪商量。现在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今后的工作和人事关系，更不好办了。我冷眼旁观，汪走后，无论叶子龙或李银桥都似乎去了一块“心病”，对我自然更加肆无忌惮。我前思后想，我在一组工作，脱离了医院临床，一天到晚处于勾心斗角的“内战”中，对我来说，牺牲太大，何况我在这场“战争”中，肯定是“战败”者。我便开始寻找机会脱离一组。

江青这次真的生病了。

暑期在北戴河，由林巧稚、俞葛峰做了子宫颈细胞涂片。由她们分别带到北京和天津做细胞染色检查，她们都认为有癌变。江青回到北京以后，她们再次取了子宫颈细胞标本。由广东中山医学院病理科梁伯强教授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科胡正详教授，共同看片，最后诊断仍是癌变。但癌细胞没有蔓延，是原位癌，可以治疗。

另由俞葛峰大夫带一份片子到苏联去会诊，意见也一致。傅连璋写报告给毛。

毛在颐年堂内同医生们讨论。林巧稚大夫说，按照目前情况，用钴六十放射治疗，效果最好。当时中国医学院还没有钴六十的设备，苏联医生又一再主张钴六十效果最好。林这样建议一来可保护自己和其他医生同僚，二来万一诊断错误，也没有人需要负起责任。

毛说：“方法的选择，由你们决定。生了病只能听医生的，没有别的法子啊。”

当时定下来，由俞葛峰大夫陪同，去苏联进行钴六十放射治疗。毛会后请大家在颐年堂吃了一次饭。

医生跟江青说明病情后，江差点崩溃。经由医生们一再保证原位癌可以完全治愈，她才平静了下来。几天后，江便乘飞机往苏联。

十一月上，我等待的机会来了。

我有两个选择--一是我听到卫生部要派医生到英国进修热带病，另一个是当时苏联派来中国的医生中，有一位出名的精神病科专家 Rushinski。卫生部决定成立一个

高级精神病医生进修班，抽调全国各主要医学院的精神病科讲师以上的医师来进修。

一天读过英文，我向毛说了我的要求。毛说：“你的意思是想去？”我说：“要是主席同意，我希望去。”

毛详细询问了这两个班的性质和专业。然后说：“什么热带病，跟我毫无关系。要去的话，到北京医代办的精神病进修班去，进修以后，可能对我有好处。”

我说：“主席同意了，我同卫生部去讲。”毛又问：“你去了，我这里的工作，由谁代替啊？”我说：“可以由一位卜大夫代替。”卜志强小我五岁，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毛说：“我不认识他。那么，你就远走高飞了？”我说以后还可以回来。我正要出去的时候，毛叫住了我说：“告诉傅连璋，我这里暂时不要人也可以，等以后再说。”

但傅借此机会指定卜大夫为毛的保健医生。卜立即迁进中南海，我于十一月中到进修班上课。

自由真可贵！

我在进修班，班上布置的课程很紧凑。参加进修的一共十几个人，都是几个主要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研室主任。大家相处得很融洽，也很愉快。每天复习完专业课程，夜里常常到两三点钟才能休息。

北京医院副院长计苏华医生跟我保证，等上完进修班后，他可以介绍我到新成立的神经外科工作。

慎娴为了我脱离一组，十分高兴。她说：“我们又可以开始家庭生活了，太好了。”

慎娴的父母原本住在南京，到十一月中旬我们将他们接来北京，同我母亲、慎娴，和孩子住在一起。一九五六年南京的公安厅和民政厅知道我是毛的医生，恢复了两老的公民权。公安厅又看到他们年纪大了，将他们的地主帽

子摘掉了，定为城市贫民。他们极为高兴，心情很愉快，特别在看到我们的两个孩子后，他们从内心中露出喜悦。

我仍保有南船坞宿舍，但家人很少去住。中央警卫局代局长罗道让原则上放我去北京医院进修，但不同意我脱离一组，不让我搬出中南海。毛以前换了三个医生。

罗怕一旦放我走，毛主席需要我时，找不回来，可就成了大问题。他并且向中央保健局指出，决不可以调我到别处工作。

参加进修班的医生们都埋头于专业，对外界政治活动并不关心。我也不例外。毛在此时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号召民主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向党提意见。进修班里也开了好几次这种批评会。我汲汲专业，没有去开会。外界的劳劳碌碌，几乎形同隔世。

一九五七年春，我仍在进修班研习专业。

五一劳动节过去以后，五月四日我们正在讨论病例。李银桥来医院找我，他说：“主席请你去。他感冒了，不舒服。”我说：“卜志强大夫不是在吗？可以让他去看。我这里太忙。”

李说：“不行。你走了以后，卜大夫去过两次，主席对卜大夫不习惯。主席也请卜大夫去舞会玩过几次，但卜大夫太紧张，见到主席就会发抖。主席不喜欢他。主席现在没有医生。主席刚从广州回来。江青已经在苏联治完了病，住在广州。他们两人商量定了，还是要你回来。主席叫你，你怎么能不去。”

我说：“我去没有问题，可是我要请假才好离开，也应该向这里说明一下，否则会说我太随便了，要来就来，要走就走，这给人的印象太坏。”

李说：“这件事上面都知道了。汪东兴副部长到党校去了。王敬先副局长管警卫，我同他说了，他叫我自己来北京医院找人。车子都等在门口了。快走吧。”

我说：“这不行，我还得报告保健局和卫生部。”李说：“来不及了。主席睡醒后就叫我请你去。耽搁太久，让他等着可不好。你先去看他，完了以后，你再去告诉保健局和卫生部。”于是我带着检查身体的用具，同李到了一组。

我进到毛的卧室，毛正睡在床上。我看他精神似乎很疲乏，脸色也黄一些。他叫我坐在床边。护士给我泡了一碗茶。我向他问好。

毛说：“不好了，感冒了。感冒有两个多月了，还有些咳嗽。二月二十七号演讲以后一直没有胃口，不想吃饭。”我要求检查一下身体，他同意了。我给他做过身体检查以后，没有发现有什么症状。我向他建议服用一些化痰药，同时用一些帮助消化的药。毛说：“这些药都可以吃。你配好以后，交给卫士，告诉他们这些药的作用和服法。你就不必每次由你来给我吃药了。”

我一面答应着，一面收拾检查用具。毛又说：“你再坐一会。”我又坐下来。

毛接着说：“那时那句话，曹营的事难办啊。”我笑起来，他又说：“你想远走高飞了。可是我这里没有人。这样吧，我们订一个君子协定，还是由你照管我。平时我的事不多。有事时我找你。以前国民党有一位卫生部部长姓周，大约叫周颐春吧，记不清名字了，在德国专门研究兔子的卵巢，得了博士。你看，研究兔子卵巢可以得博士。你在我这里，空下来的时候，也可以研究一些什么。搞些小动物来，弄一间实验室，买些设备，不要公家出钱，我来出钱。”

但我觉得在中南海弄个小动物实验室这事绝对不可以。中南海里不准饲养动物--连猫狗都不准。卫生部和警卫局怕动物会将传染病传染给毛和其他领导。后来江青竟破例养了一只猴子，真是人人奔走相告，惊天动地。我觉得行不通。

我说：“不如有空时我多看看书。”毛沉吟了一下说：“这样也可以，不过没有实际操作，就不全面。先这样吧。你将我的事抓起来，有空的时候你自己安排。”

说好听点是君子协定，压根儿是毛主席的“意旨”。没有人敢反抗毛。他的话就是法律，如果我拒绝，往后就会再也找不着工作。慎嫔也会被解职，无法生计。如果我不服从，会被逮捕，甚至批斗。

歇了一下，毛又说：“以前同你说过，你可以做我的一个秘书，你又不肯，中国现代历史上有不少出名人物开头是学医的，象孙中山、鲁迅和郭沫若。学医行医自然是好，不过不要局限在医学这一门上。要多注意社会科学。我要你做秘书，你不干。就做医生，也可以。不过我这里医的事情不多，不能一天到晚给我查身体。我们之间还要多一点共同语言，知识面要广。你以后要看‘参考消息’”这样我们可以和平共处。”毛随后又讲：“我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党内发了一个通知，让大家讨论。叶子龙、李银桥他们都不赞成。这些人都不听我的话，我不干主席对我身体有好处。这些人想不通，大概是不做主席，他们就没有油水可捞了。给国家主席当工作人员，脸上更光彩些吧。”

我感觉到毛这一次的病不单纯只是感冒。我离开的这六个月，政治局势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在医院里我可以对外面的政治起伏视若无睹，现在我又回到了毛的官闱世界中。卫士代我去医院收拾了我的东西。毛召见我的那



晚，我就搬回了中南海船坞。我又重返一组，以后便再也没能离开。

林克告诉我，我去进修期间所发生的事。

毛仍为“八大”所做成的各项决议--提倡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反冒进”、毛思想不再是中国的指导纲领等--大为震怒。就在我开始去进修班进修，也就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旬，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时，毛在会上宣布，一九五七年开展整风运动，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林克说，一九五六年冬天起，毛在家精神抑郁，整天躺在床上，除大小便外，不起床，甚至吃饭都在床上。毛虽形体衰弱，精神忧抑，他也是在利用这个时机思考下一步的政治行动。

毛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发表的一篇演说便是他策略的一部分。毛以国家主席的身分，召开了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政治局委员、军事委员会高级干部、高级政府官员，以及“民主党派人士”的几位领导都参加了。毛在此会上严厉批评了党官僚体系，又提出“大鸣大放”号召“民主党派人士”随意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毛认为社会主义改革已经成功。虽然还是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但数量太少，构不成威胁。人民内部的矛盾已不再是尖锐敌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鉴于“匈牙利事件”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内部矛盾问题要用整风的方法，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共产党曾有过内部整风运动。毛曾在一九四二年于延安展开整风运动(目的在审查干部、清除王明势力)。但这次的整风和延安整风不同之处在，这一次的整风运动不再只是党内部的事情。这时毛对党内高级干部歧见已深，认

为共产党整风，自己整，整不好。因此号召民主党派人士来批评共产党。这是毛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策略。

中国共产党向来是个体系严密，力量强大的排他性组织，非共产党人士一向不允许向其建言。敢这样做的人都被打成“反革命”。全中国的善良百姓都深深明白这个道理。

再来，身为知识分子的毛，对知识分子却存有很大的疑虑。毛在公开言语上，虽然提倡“联合、利用”知识分子，骨子里实在并不信任他们。解放后，中共立即展开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文坛上举行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指导他们与党站在同一线上。不愿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便会遭到严厉的攻讦。

作家胡风在文艺界的整风中便成为被批斗的对象。胡风(一九三零年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解放后，曾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委)一向耿直敢言，曾公开批评毛的独裁，并对文化部提过不少建言。但他最大胆的言论是在与好友的谈话和私人通信中发言。胡的一些朋友将信交到了党里。一九五五年，胡风因做为“胡风反党集团”的首领而锒铛入狱。自此后，知识分子记取胡风的教训，连在好友间多不说真心话。

因此毛这次鼓励学术辩论，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个赌博游戏。毛认为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数量稀少，而象胡风这样的异议分子早就噤若寒蝉，其他的知识分子无非是跟着毛的指挥棒，向毛自己认为最需要改造的党内人士(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和政策进攻。毛自信在这场赌局中，他稳操胜券。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扩大的最高国务院会议中说，国家建设中，出现了马鞍形下降，是共产党领导的错误，也就是毛自己的错误。张治中在会中第一个为毛辩护。张

治中原是国民党将领，一九四五年国共和谈时的主要谈判代表。一九四九年，张在周恩来劝说下投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的高级座上客。张说：“我常将主席与蒋介石比较，蒋介石是‘天下有罪，朕躬无罪’，毛主席是‘天下无罪，罪在朕躬’。这就是区别。共产党有了错，自己承认，毛主席又承担了错误的责任，这最使人佩服的了。”

虽然毛大力号召给党提意见，知识分子仍一再沉默。

于是毛从床上爬起，又站到讲台上。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到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仍是由高级共产党领导和民主党派人士参加。毛又重复了二月讲话的重点，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民主党派人士打破沉默，直言敢谏。全国报纸转载了毛的讲话，地方工作单位的领导也大力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刚开始的批评非常温和而且微不足道。四月底，在一次天安门群众运动中，第三度号召群众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民主党派人士终于展开了热烈的鸣放运动。

也就是在此时，于五月上旬，我回到了毛的身侧。

一天一天的过去，人们给党提的意见越行尖锐，指出的“错误”越来越多。最后甚至涉及到了国家该由什么人领导的问题。毛没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见越来越敏感，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例如：“共产党念的这本经，因为大和尚念，小和尚才念”，“国家的领导要由各党轮流担任”，“民主党派要有自己的军队”等等，形成了一个时期毛所说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势。

林克的想法，毛这次是受到重大打击。他万万没有料到批评的箭头会转而指向他本人。毛的本意不是要共产党政权受到质疑。解放以来，毛对周围的人的阿谀奉承已习

以为常，认为他真正的敌人早就被歼灭或囚禁起来，因此他从未察觉知识分子的不满竟如此之深。

到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大鸣大放达到高潮，这是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们都是高级民主人士)的鸣放会上，一位姓卢的参事发言中反驳攻击共产党的言论。卢的发言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刊出。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是邓拓，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胡乔木(我的朋友之一)主管《人民日报》。

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忧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

五月十五日，我回一组后没几天，毛写了一信，并在党内高级干部间秘密传阅。整风运动的本质必须立刻改变。毛准备给那些发表猖狂言论的右派分子大大反击。数天后，地方领导和各级编辑都知悉了毛的反击计划，各报继续刊登了批评党的“反动言论”和攻击“右派”的支持共产党文章。

毛这阵子告诉我，他的意思是要“引蛇出洞”，也就是“让毒草滋长出来，然后一一锄之，做为肥料”。知识分子仍在大鸣大放，但党内领导人皆知，反击运动即将展开。

毛对我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毛认为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的“反史达林报告”和秋天的“匈牙利事件”形成全球性的反共风潮。中国许多共产党干部和人民都受到影响。毛认为他们是思想糊涂。

毛将胡乔木叫来，臭骂一顿，并说：“没有能力办报，就应该辞职，给能办报的人让路嘛。”让胡住到人民日报去，从报纸上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并要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替换了原社长邓拓。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写的这篇社论显示鸣放运动的政策就要有大幅度的转变。文中说：“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毛号召群众起来反击右派。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毛在二月二十七日扩大的最高国务院会议中所发表的讲话，正式刊登在《人民日报》。许多民主人士看了正式出版的毛著都大吃一惊，说内容上同一九五六年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完全不同了。

毛在原本的开明讲话中提倡大鸣大放，知无不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在六月十九日这篇修正的文章中，却提到了原本没有的“毒草”和“引蛇出洞”。

毛还在文中立下了几点批评限制——一、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种团结。

知识分子这下觉得上了毛泽东的“当”。毛也知道弥漫在知识分子间的情绪，毛在一文正式出版后说：“有人说，你这是搞阴谋，让我们大鸣大放，现在又来整我们。我说，我是搞阳谋，我叫你帮助党整风，叫你鸣放，谁叫你反党，向党进攻夺取政权。我叫你不要这么闹，闹了不

好，这是事先打招呼，是阴谋还是阳谋？我们做事都是有言在先，出了安民告示的，你们不听，硬照你们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办，怎么说我搞阴谋。”听了这一番话后，我终于了解毛是心口不一。原先毛想利用知识分子将他的党内敌手整一整的策略适德其反。

六月底，通知我准备行装，随同毛外出视察，王敬先告诉我说，这次外出时间多久，他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他不清楚。此时大鸣大放已经结束，反右派运动正要展开。

专列的驶停，仍以毛的作息时间为转移。我在火车上发现，随行的人大大减少。

我问王敬先为什么只出来这么几个人。他说去年毛连续批评警卫工作神秘化，脱离群众，警卫调派方法改了，以后多依靠各省市的警卫力量。这次南行，一中队只出来十几个人，警卫处只派了一个人，其余就是秘书、卫士和我了。

这时已经开始反右派运动。一路上谈话，讲的都是反右派问题，毛不像在北京时的消沉，显得精神高昂，语言有力。毛在那期间跟我谈的许多话，直至今日，犹仍在我耳边回响。

毛说：“我一向的办法是后发制人。可以用三句话说明，一是老子不为天下先，老子指的是李耳，他的办法就是不首先发难。第二是退避三舍，这是晋文公重耳的办法，我们原来共事，对我有过帮助，现在打起来了，你打，我先不还手，不但不还手，还要退兵三十里，让你以为得计，让你暴露一下，让大家看清你的面貌。三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孔老夫子的话，既然你打来了，我让了你，你还打，那么我也就动手了，你怎么打过来，我就如法炮制，照样打回去。”原来大家还不知道什么是右派，右派是什么样子，说不清楚。现在大家明白了。什么右派啊，就是反革命派。我说不要叫反革命，不好听，戴上反革命帽子也不好看，就叫右派吧。

“这次一整，可能整出几十万个右派吧。我们还是老办法，一个不杀，一开杀戒，类似的就都要杀掉，就没有界限了，这一条还是延安整风时，定下来的。王实味向党进攻，写一篇文章叫后来一查，他是托派分子特务，就是



这样，我也说不要杀。胡宗南进攻延安，我们从延安撤退，是保安机关将王实味杀了，报告我说，怕他跑，所以杀了。我还批评他们不对。”第二条是大部分不捉，这也是延安时定下来的。除非不捉不足以平民愤，不能捉起来。他们是劳动力，捉起来养着，浪费劳动力。他干不了领导，干不了这项工作了有可以劳动，还有生产价值。这条办法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这样办的。所谓“没官”就是给公家劳动。

“第三条是就地改造，这条在延安时没有明确说明，可却也这样做的，现在明确提出，这么多右派怎么集中得了，在你这单位出的右派，就在你这单位里改造。大家都清楚他的言行，可以听其言，观其行，在大家的监督下，把他改革好。而且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他接受改造，很好。不接受改造，也只有带着花岗岩脑子到死，他不接受改造，有什么办法。我看这样的是极少数。”我常说，人是可以改造的。你看，牛并不是天生下来给人耕田用的和给人挤奶用的，马也不是天生下来给人骑的。还不是野牛野马，经过人的一手改造，牛可以耕田挤奶，马可以骑了。人难道不能改造。我也常说，反革命也好，特务也好，总有那么一点特别本事，如果一点本事也没有，他怎么能当反革命、特务、右派？为什么不改革他一下，把他这点本事利用起来。“王实味是抗日战争前，在上海的作家。抗日战争后去延安。他看到每个星期六晚上有舞会，有时还给”首长“演京剧，很不满意，特别是前方将士流血，后方歌舞升平，于是写了加以评论。其中有”舞回金莲步，歌啭玉堂春“讥讽这种状况，因此而被捕。王本身不是托派反革命特务，现在已经完全平反。和毛谈这席话许多年后，我读了，我这才知道王的批评全是事实。王批评的也正是我栖身中南海内旁观多年的腐败现象。我恍然大悟党早在延安时期开始便步步走向堕落。我们先去山东

济南，然后到上海。上海市长柯庆施负责接待我们。毛对我讲：“在中国共产党内，亲眼看见过列宁的就是柯老一个人，那时他在苏联东方大学读书。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看见了列宁。柯老说，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时激动人心的场面。可见，领袖在人的心目中，所能唤起的力量。”

到上海后，住在沪西一座大理石楼，据说这原是一个叫哈同的犹太人的房子，一般叫做大理石楼或铜顶楼。草地很大，有不少树木，但毛不喜欢这里，想搬回专列上住，由上海市长柯庆施一再挽留才住下。

毛此次的上海之行是公开的。他要全国人民知道他仍是最高领导，他策划的反右派运动已正式展开。上海的反右派运动正在高潮。柯庆施安排毛看了工厂的大字报，会见了上海市的党政军干部，讲了话。又在锦江饭店会见了一些文艺界的“左派”人士，包括小说家巴金、演员赵丹和他妻子黄宗英，还有女演员秦怡。

毛发动进攻时，迅如闪电，不及掩耳。我们旋即离开上海，到以西湖闻名的杭州。我们住在刘庄。刘庄，原主人是安徽籍大茶商。一九六零年，浙江省为了使毛住得更舒服，将原住厅堂拆掉，改建成豪华的现代住所，修好暖气设备。真是金碧辉煌，豪华壮丽。刘庄在西湖湖汉中，是典型的江南园林，既优美又安静，比起北京的颐和园，更胜一筹。庄中建筑散落在池塘水流间，有典雅拱桥相连。每次阵雨过后，小塘中可以捉到很多鲢鱼，拿到厨房，厨师作成西湖醋鱼，味道鲜美。

苏联共产党内发生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事件后，这时苏共派米高扬秘密来中国向中共通报情况。米高扬一行人到了杭州，想跟毛讨论中国核武发展计划。毛要我去见见米高扬。

米高扬个子不高，体形适中，背微驼，看上去大约已经有六十岁左右了。他主要的症状是大关节疼痛，主要在背、腰和大腿关节。在苏联治疗很久，不见效。他听说中国的针灸治疗很有效，特意问我能不能给他施治。我说可以用针灸方法治疗试试。因为他还要到北京，我给他介绍一位很好的针灸大夫孙振寰，可以用针灸同时服用中药治治看。

然后他请我喝伏特加，我推辞了，因为我不喝酒。我要了一杯茶。米高扬同我谈起原子弹的可怕。他说，在苏联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多次，有一位负责这项工作的部长，得了辐射病死亡。

我对米高扬说：“我是医生，对原子弹毫无研究。不过从医生道德来说，原子弹和任何其他杀人武器一样，都应该加以反对。”

回到刘庄，我将米高扬的病和他的这段谈话，告诉了毛。毛说：“米高扬同我说，有他们的原子弹就够了，他们的原子弹伞可以庇护我们。苏联其实是想控制我们，不要我们生产原子弹。苏联生怕我们不服他的控制，怕我们得罪美国。我们是从来不受谁的控制，也不怕得罪哪个。我们是搞定原子弹了。我常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谁也不要想限制、控制、吓唬我们，你控制，我就反控制。谁也不要想做我们的太上皇。”

对毛来说，原子弹炸死一千万、两千万人都算不得什么。所以杀掉几十万个右派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毛也许未亲自下令处死那些右派（就象王实味一样），但他也不曾出面制止这些暴行。

毛在杭州做了另一次的讲话，几天后，我们便由杭州乘专列到了南京。我们住在中山陵附近，原属于国民党宋子文的一座别墅。这时已是六月，天气很热。室温一般在

摄氏四十度。毛不怕热，他的卫士每天在他卧室里放上大冰桶。毛又对反右派运动说了不少意见，我总是边听边冒着大汗。

外面的政治风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参考资料”上满是声讨、批判右派的报导和评论，毛读了很多。毛这阵子睡得更少，所以闲谈的时间也多，但他精神益发振奋。

我不在时，林克跟毛接触最多。他跟我谈起他对毛的政治评估。林的看法，在当今这个局势下，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这次是由邓小平负责反右派运动。邓曾在八大会议召开期间，叫毛休息，毛十分震怒。但毛所指斥的“小脚女人”领导中，并不包括邓。我许久之后才知道邓在推行反右派运动时，风声鹤唳，人人胆颤心惊。

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到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一九五七年，而不是一九六六年发生。我们今天只记得反右派运动时对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径。其实毛开始时是想借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毛未料到民主党派人士竟群起质疑“社会主义路线”和“共产政权”的合法性。毛万万没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见越来越尖锐，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的统治。毛被迫暂时回头和党内反对他的同志联合起来。党内领导人人人自危，大家一致枪口向外，出现了大团结的局面。

毛对党内高级干部有意见。一九五六年底开始的半年内，毛号召给党提意见，到一九五七年一、二月以后，毛又提出大鸣大放，也就是随意给党的各级领导提意见。原来毛认为共产党整风，自己整，整不好。各领导人在害怕毛的愤怒和右派人士的批评之下，转而支持后来的“大跃

进”。毛仍在考验这些党领导。毛此时正设法夺回政权，重整旗鼓，准备稍后再做出击。

在这期间，毛想在南京召开全国各省市书记会议，但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觉得南京太热，建议在青岛召开。

毛本来想乘专列去青岛，但是太热了，大家都劝他乘飞机。毛同意了。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带两架伊尔十四来到南京。大家分乘这两架飞机到济南。第二天毛在省委礼堂会见省委和济南军区的干部。毛讲话内容仍是反击右派，与一路所讲的相同。

青岛的七月确是清爽宜人。从南京大火炉到了这里，真是别有洞天了。青岛地处崂山余脉。全市街道，高高下下。市内整洁，房屋都是德国式的。郊外到海滨，错落错落的一座座别墅，红瓦红砖墙，点缀在密密丛丛的绿色树林中。毛住在原德国总督府改建成的迎宾馆。这是一座地堡样的德国式建筑，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俯瞰着青岛市。

青岛有一个很好的水族馆，毛去参观过。毛乘车到山东大学内转了一趟。这个大学就是江青吹嘘她在三十年代时，旁听过梁实秋讲课的所在。又参观了青岛四方火车机车制造厂。这在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制造火车头的工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大工厂。毛在青岛的警卫仍如往昔森严，每次秘密出外参观，由于警卫众多，往往引起居民的好奇。青岛的许多街道则禁行车辆和行人。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于青岛召开全国各省市书记会议，议程前后数日，会中的讨论集中在反击右派和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两大方面。《人民日报》刊出毛的一文--毛主张将中国建设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毛的理论其实矛盾百出--从领导一元化谈到民主政治、教条主义到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统一到个人意志。毛的理想是要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在四十到五十年内，超过英美先进国

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理念正在毛心中滋长。

我在毛奢华的宫闱天地中，未曾感受到外面反右运动的风声鹤唳。那些激烈的批判、斗争离我十分遥远。我完全与世隔绝。毛的几次闲谈似乎也没有带给我任何真实感。我只能模糊感受到毛话中的深意。

我在青岛正为政治以外的事搞得焦头烂额。

李志绥著《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 第二篇

1957—1965

我的问题是江青。江青四月就从苏联返国，也跟我们去青岛。苏联的放射治疗非常成功，但她变得更难以伺候，抑郁消沉。

毛与江青分住在迎宾馆楼下南和北的两端房内。我们住在二楼。只住了两晚，江青说楼上的人冲马桶的声音吵得她不得安宁，休息不好，要我们立刻搬走，并且说：“到青岛来休息，是叫你们休息，还是让我休息？”

林巧稚和俞葛峰两位妇产科医生仍随行。但自一九五六年徐涛医生到医院学习后，江青便没有专任内科医生。江青提出要我兼管她的工作。

我说：“你同主席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兼管你的工作，你们不在一起时，我很难兼管。”江说：“好在我也没有多少事，我和主席不在一起时，必要的时候，可以让护士给你打电话，安排我的治疗用药。”我只好答应下来。

没过多久就遇上难题。就在我们被赶出迎宾馆几天后，也就是七月中旬，那晚下着大雨，晚上十一点多钟，江青的护士打电话告诉我，江青觉得鼻子有点不通气。

我问脉搏和体温，说都正常，也没有发现什么症状，只是江青觉得鼻子有点不通气。江青让护士告诉我，看怎么办。我向护士说：“雨太大了，去不了，先给她服一点抗过敏药，到明天再看。”

那时雨势很大，可以说是豪雨。我既未带雨衣，也无雨伞。如果走去，全身要淋透，也就没有办法给她检查了。何况只是鼻子有点不通，没有必要检查。

过了大约半小时，护士又打电话来说：“江青同志说了，医生不看病人，就给药吃，是不负责任。”我听了以



后，觉得江青这话有些过份了。鼻子不大通，服一点抗过敏药，就成了不负责任，岂不是笑话？何况在大雨滂沱的夜晚，又没有什么大病，要摆出随传随到的架子，对医生太不尊重了。因此我在电话上说：“江青如果不愿意服抗过敏药，可以不服，明天再看吧。”

第二天，林巧稚和俞葛峰大夫已经给她做完妇科检查，要回北京去。江青请她们在海滨吃饭。李银桥告诉我：“本来要你做陪，因为那天夜里叫你，你没有去，她说你架子大，把你取消了。”

将我取消，我倒是如释重负。反正同她一起吃饭，实在谈不上乐趣，只是活受罪而已。她吃饭时，规矩十分繁琐。饭前要吃促进消化的药，饭中要吃补血剂、镇定剂，饭后要吃一大堆维他命。吃相饕餮，又不断品评，使人感觉虽不能说芒刺在背，也可以说食欲全消。

毛又感冒了。七月的青岛天气有时阴湿，毛每天仍去山东公安厅专设的私人浴场游水。毛自七月中旬以后，咳嗽加多，胃口不好，自觉身上没有力气。我让他服了些感冒化痰药，并不见效，几天后便停服了。

一天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来，对我说：“济南有一位中医刘惠民大夫，医道很好，可以请他来看看。”我告诉他，这要征得毛的同意，便去找毛。毛说：“这次感冒总是不好，你不主张再多吃药。还有什么办法？”

我对中药病理并不了解，但我父亲在一九五六年重病一场，张孝骞大夫等人都束手无策。我请了中医章次公大夫，是他给治好的。我跟毛提起此事，劝毛试试看。

毛点头答应说：“那么由你主持，请他来给我看看。”

这位刘大夫六十多岁人，高而瘦，面容清癯。看上去十分朴实。毛见到他，请他坐下。然后问他姓名，说：“你是施惠于民了。请你来给我看看。”

刘问脉后，看看舌苔，说：“这是风寒内聚，不得外泄，只要表一表，驱出风寒，就可以好。”这时毛有些不耐烦，说：“你讲这些，我也不懂。你同李大夫研究吧。”刘向毛鞠了一大躬，退了出去。

舒与刘一起到我的住处。刘又解释，这是风寒内阻，需要发散出来，服用两剂药就可以好。最好是睡前用半碗米汤随药服下，然后盖上毛巾被，有微汗才见效。我听了，很为难。这是毛喜凉，往往不盖任何东西就睡了。

我又到毛的住室，他正等我回话。我将刘大夫说的简单讲了一遍，然后说：“治病是个麻烦事，主席试一次，一次不好，再也不干了，如何？”毛显得有些为难：“这种天气，盖上毛巾被睡，不吃药，也要出汗，何必要他看呢。”我说：“盖被捂出来汗，同吃药发出的汗，可不一样。试试就知道了。”毛说：“照你的办，试一次。不行，就算了。”

舒同的夫人水静给煎的中药。我亲自检查过药单，确定没有问题。但傅连璋的药品化验处无法化验这些中药，我只好联络中央保健局讨论化验药草的法子。

毛每到外地，即从该地拨出一条专用长途电话，直通北京的北京电话局三十九局，这三十九局是设在中南海内，专供保密通话。有黑、红两种电话。黑色电话可以通其他的分局。红色电话就是机密电话，与北京室内其他线路不通。

我就是用这电话打电话给保健局的。保健局的意见，舒同是中央委员，山东省委书记，他主持之下，应该没有问题。我说，这些药怎么做药物安全检查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中药不比西药，很难弄清里面的成分。最后商量好，按药方做成四份，一份舒同吃，一份我吃，一份送

回北京交保健局，一份给毛吃。我与舒同做了一次当成试验品的荷兰猪。

毛盖着被出了一夜的汗，感觉同以前差不多。第二天毛又同意服了一次。刘大夫又诊过脉，认为风寒已驱尽，应该感觉好了。毛说同以前差不多。于是又连服了三天。刘又诊视一次。刘说感冒风寒已经没有了，不舒服是劳累引起的。刘建议改服一些西洋参和中药合成的药丸。这些药我一一查过本草纲目，都是起补的作用，没有害处。毛于是同意服用。

但毛还是觉得身体衰弱。刘大夫也束手无策。我想也许去暖和点的地方，毛病情会好转。舒同说：青岛最好的季节是八月，七月太冷。最好在青岛留下，过了八月再走。但天气未如他所言好转。

七月底一天晚上，毛叫我去，问我的意见，是留下，还是走。我说：“我也没有胃口了，这样的气候，再住下去，恐怕不会舒服。”毛说：“那么就打道回府吧。”

八月初离开青岛回北京。毛的感冒马上转好。

回北京的第三天，毛同我谈到反右派运动的情况，问到我医学界的反右。我毫无所知，回答不出。毛诧异地说：“你可真是‘山中不见人’了，你到协和医院去看看那里的大字报。那里有你的老师和同学，同他们谈谈，回来告诉我。”

北京协和医院是全国最完善的医院之一，医生素质优秀，设备齐全。旧医院原本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一九四九年后依苏联模式，完全改组。一些优秀的医生被分配到其他医院，由党委接管医院事务。现任党委书记是张志强。党方面认为战时曾接受红军医务兵训练的张志强具备医生资格，但医院里受过西方训练的大夫无法接受。但张是个老革命，在那时政治成分大过一切。

我到协和医院找了几位老同学谈，大家主要的意见是，卫生部将北京协和医院的各种人员拆散，分别调到别处，别的医院，而且将综合医院，改成专科医院，他们认为这对培养全面的人才不利。有几个人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提出了以上的看法。我回去以后，转告给毛。

毛正色道：“你这个人真是‘浅尝辄止’，了解得不深不透。你再去了解，回来告诉我。”

我参加了一次全院批判大会。会上发言人的箭头集中在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和医院院长李克鸿两人身上。发言的人，大都是年轻的实验室技师和护士，他们受的教育不多，不懂医院管理。年轻的医生们则对医院事务较有了解，又尊敬这两位长辈，故多未发言。

发言的人都斥责李宗恩、李克洪一贯不服从党的领导，向党争三权，即人事调动权、财务支配权和行政管理权，总的一句话，向党夺权。会场上大众的情绪很热烈。

我很同情两位李医生，他们公开批评党领导之举实属不智。我觉得再怎样不该批评党中央。我那时才在毛身侧工作三年，仍非常崇拜他。毛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觉得毛永远是对的，从未想过该跟他有不同的想法。

会后，我去找张孝骞大夫。张孝骞大夫也是湖南人，解放前在他母校湘雅医学院做院长，后转为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他是中国境内数一数二的优秀专家。这年春天张也给党提了意见。张说，他做内科主任，可是对内科的医生的去留没有发言权，是个傀儡主任。反右派运动展开以来，张日日心惊肉跳。

张孝骞一见到我，立刻抓住我的两手说，他犯了大错误。他说：“我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张又讲，大家认为他是想向党争人事调动权。他说：“我可是没有要人事权的意思。我只是说，科主任应该对科内的医生的业务能力评定，有发言权。”

最后张又说：“你要把我的这些话反映上去。”

我回去后，将以上的情况告诉毛，特别将张最后的话向毛讲了。

毛笑着说：“你这次才算了解清楚了。这三权是党领导的具体表现，将这三权交出去，党还领导什么？”毛歇了一下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死了这么多的人，共产党才从国民党手里夺来这三权，他们要争这三权，谈何容易。”

他接着又讲：“张孝骞同这些右派不一样，他是个书呆子，让人利用了。我以后还要找他谈谈。”因此张逃过此劫。

但李宗恩和李克鸿大夫下场凄惨。反右运动，二人都被定为“右派”，免职“下放”改造。李克鸿到云南一所

小学里当图书馆员，李宗恩被流放到贵州，两人都死在外地。

反右越深入，可以明显看出来，毛的思考越加深入，换句话说，他张开的网，越加大了。但我仍不明其所以。我不知道劳改的确实人数，也不明瞭所谓“改造”的真正目的。从毛的谈话中，我觉得毛对敌人宽大，给他们改造的机会。毛说不该杀王实味时，我也相信了。我支持毛和反右运动。毛是对的，共产党好。他们解救了中国。

直到三年后，也就是一九六零年，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告诉我“反右运动”中，有五十万人被大成右派分子。每个单位奉命都得揪出百分之五的右派分子，造成冤狱遍布，诬陷泛滥。

也是那时我才真正了解被打成右派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许多人被撤职，送去劳改营“改造”摧残至死。毛总是毫不留情地打击他的政治上的敌人或对手，谁敢于冒犯他的，无不家破人亡。他说他不杀人，可是“改造”带给人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无非使人更加痛苦地走向死亡而已。

我后来参加十三陵大坝的修建工程时，才略微醒悟到劳改营里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光景。在劳改营中，一个只能驮二十斤石头的人被迫驮四十斤，他自然承受不住，瘫下来了。因为他是右派分子，不驮也得驮。在他饱经摧残，无助而痛苦时，大家就逼他认错，他只好出卖朋友，连带供出别的人。许多人不堪摧残而惨死在劳改营中。死亡似乎比毛所谓的“改造”还仁慈些。

我早该知道这些情形，我有的是机会了解。毛给了我不少暗示。

毛有天跟我说：“我也常说，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加上这次的右派，这共有三千万人。这三千万人

集中在一起,就是一个不小的国家,集合在一起就会闹事。现在我们不将他们集中起来,把他们分散在各单位,这么一来他们就是少数,我们这六亿人口里面有三千万,二百人里面有一个,还怕什么?我们党内有人就是想不通。我对党内好多人讲了,你们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他们说,哎呀呀,不得了啦,顶不住了。可是大多数还是顶住了。少数不但不顶,还闹退党,还同右派一起向党进攻。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人是谁了,就可以好好整他们。”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三千万“人民公敌”。这数字似乎不可思议。但当时我觉得毛肯定有他的道理,这数字的来源一定可靠。后来我甚至相信这数字应该更高些。

毛也曾给我别的暗示--中国百姓的生命对毛来说一文不值。

毛常说:“我们有这么多人,死个一、两千万算得了什么?”

走笔今日,我很感激我当时的天真无知。当年我还不如现在这般了解毛,不知道外面整人之风横行,知识分子身受可怕折磨,以及许多人正一步步地步入死亡。我曾想离开毛的行宫,但每次毛都把我召回去。我在一组中,如同困兽,无法挣脱。

我原本应该明白更多的真相,但我却视而不见。如果当年的我知道外界的真实情况呢?了解“反右”的巨大规模呢?我一定会无法接受,也无能为力。我会无法离开一组,也无法在其间装傻过日子。中国人常爱说“难得糊涂”--我想这就是我那几年的情境。抚今追昔,我领悟到那几年我是在糊糊涂涂之中度过。我不得不如此。只有那样我才能生存下去。

苏联预定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盛大庆祝苏联革命节四十周年。赫鲁晓夫特别邀请全球共党领袖赴苏，共襄盛举。毛主席那年六十三岁，只在一九四九年冬天为和史达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出过一次国。毛要再去一趟莫斯科。如今全国反右运动正进行地如火如荼，他精神特好。全国团结，人心振奋。城市和乡村都在迅速推展社会主义化革命。毛这次威风凛凛地率着代表团浩浩荡荡地前往莫斯科。如今的毛正和赫鲁晓夫旗鼓相当。

我们预定在十一月二日去苏联。

我负责医务人员的安排。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是代表团的专任医生，我以毛的保健医生身分前行。江青向我提出，这次去苏联，可以带上刘惠民大夫。一方面是感谢他在青岛治好了主席，另一方面是向莫斯科作态，表示热心提倡中医。

刘大夫知道后，半喜半忧。刘大夫向我说，他年纪大了，很怕冷。我告诉他，这些天使馆来的气温报告，最低时不过摄氏零上四度，而且屋内有暖气，但刘大夫不放心。他说：“万一主席没病，我倒先病了，那不糟糕了。”刘大夫怕代表团统一分配的羊毛大衣不够暖，叶子龙只好到皮货商店买了一件皮大衣和一顶皮帽子。这样，刘大夫才算放了心。

然后便是毛的中药问题。苏联没有中药，所以刘想带齐所有的药材。中药不比西药，都是些草根树皮，体积大。带少了，要用的时候不够用。带多了，太占地方，而且不好带，何况中药的味道太大，随身携带太熏人。

最后商定一个办法。对外贸易部一个押送礼品的人，要先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刘随身只带够用五至七天的常用



治感冒药。其余足足三大皮箱的药材和用特定的木盒子装好熬中药用的砂锅，交给外交部，由他们的礼品信使，先行带到莫斯科中国驻苏大使馆。

此外为防毛有紧急状况，也须要一位护士随行。我建议要中南海保健办公室的护士长吴旭君去。我是保健办公室主任，对吴的工作能力很清楚。但是叶子龙不同意，叶的意思是带江青的一个护士去，因为他同江青去过苏联，可以不做出国衣服，节省点费用。但这位护士在医院的训练不够。江青破天荒地赞同我的看法，认为找一名有临床经验的护士去远比省钱重要。我便通知吴旭君做准备。

苏联方面也为毛派了一位医生来。据他告诉我，他得到的指示是，负责陪同毛前往莫斯科以及毛的旅途健康。我们事先见了面，我、吴旭君和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主任赖祖烈在“全聚德”请他吃烤鸭。他对烤鸭赞不绝口。他特别欣赏的是茅台酒，一大瓶酒，他一个人几乎喝完，我看他已有醉意，急忙送他回苏联大使馆，又另外送了他一瓶。

苏联派来两架图--一零四到北京来迎接。我与毛、宋庆龄和那位苏联医生同乘一架飞机。黄树则随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乘另一架。

旅途中，机上的空中小姐不断来给我们送来鱼子酱、鲑鱼片和三明治，也拿来一杯杯的伏特加酒。飞机中途在托木斯克和鄂木斯克各停留一小时加油。两地都准备了大型宴会，全是冷菜。毛对我说：“这苏联菜，实在没有吃头，尝不出什么味道。”

那位苏联医生一边吃喝着，一边同我讲吸烟的坏处，喝酒的好处，不过没有多久，他就安然入睡了。

在莫斯科机场赫鲁晓夫和一帮官员前来迎接。留着一部山羊胡子，面容严肃的布尔加宁及米高扬也来了。米高

扬热情地与我打招呼，还说了一些话。当时翻译正在毛旁边，给毛翻译，我不懂俄语，我想米是说针灸的事吧。在郝旁边有一位文化部长福尔采娃，是苏联官员中唯一的女性，大约也就是五十岁左右，举止有些轻率。

赫鲁晓夫陪同毛到了克里姆林宫住下。我从旁观察，赫鲁小夫对毛是很亲切和尊重的，赫鲁晓夫向毛说，希望能多住些日子，这天是十一月二日，过了十月革命节，可以住到郊外别墅。并邀请毛在会后到黑海的索契住一段时间。

但毛则显得比平时多一分矜持。毛一开始就对赫有些冷淡，他仍然为那份批评史达林的秘密报告余怒未消。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的路上，我和毛都注意到，街上的人大多一副有气无力，死气沉沉的样子。这与中国解放后的振奋活跃，简直有天壤之别。毛说：“赫鲁晓夫反史，不得人心，哪里还会卖劲。”

苏联方面十分殷勤款待毛及其随从人员。毛住的是叶卡特琳娜女皇的寝宫，宫内穿廊叠叠交错，宛如迷阵，宽敞的房间里摆着典致的古物。地上铺了长毛地毯，挑高的天花板垂吊着灿烂的吊灯。墙上有些肖像。毛住的卧室，是最豪华宽敞的一间。这次毛的大木床没有运来。克里姆林宫内只有坐式马桶，毛用不惯，最后是取来一个便盆临时凑合。

我和叶子龙、王敬先、林克、李银桥、卫士、给毛做饭的两位厨师和几位翻译员在宫内。中国代表团其他领导同志也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其他随从人员则分别住在莫斯科旅馆和中国大使馆。我们很少见面。林克和我同住一间。每人的房间内都摆上苹果、橙子、巧克力糖、桔子水、矿泉水和纸烟。酒非常多，食物丰盛。

毛一直很兴高采烈。毛似乎未特别注意寝宫的奢华，但他发现现今他和代表团所受的贵宾招待与一九四九年遭到的冷遇，有若天壤之别。他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看起来，不论中外，不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什么人都是势利眼。这里还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哪。”

这句话给我极深的印象，他说这话时，微笑而又带讥讽的神情，时隔这么久，依然如在眼前。我当时弄不清，他是开玩笑，还是说明事实。我没有答话。

毛去列宁墓内列宁及史达林献了花圈。我看列宁和史达林都瘦小而干瘪，这倒真使人看了很不舒服。我听说他们的耳鼻都已开始腐烂，只好用蜡代替。当时我做梦也想不到，二十年后，我会是毛泽东遗体保护组的副组长。

毛对苏联文化毫无兴趣。他单独进餐，从未和代表团人员一起用餐。这次到莫斯科带来两位厨师，其中一位厨师精于西菜。到莫斯科后，苏联方面又配了两位厨师给毛做饭。因此，每餐饭都是中国和苏联的各占一半。但毛大多只捡湖南菜吃。我可以体会毛偏爱中国菜的心情。苏联菜无论冷热都让我难以下咽。

一天他吃饭的时候，我去看他。毛邀我一起吃饭。虽然我才刚吃了一顿苏联饭，但毛的饭菜中有他厨师的杰作，所以我胃口大开，吃得津津有味。毛看出我吃得很高兴，他微笑着说：“我看，你不象吃过饭的样子。”

毛对苏联文化的见解令人难堪。赫鲁晓夫请毛观看芭蕾舞剧“天鹅湖”。赫鲁晓夫邀我们共坐在他的包厢中观赏。我们到时，已经是第二幕，毛看没多久就看不下去。毛没有看过芭蕾舞，也没有人事先跟他说明。毛对赫鲁晓夫说：“看来我这辈子不能干这个了(指芭蕾舞)，你还行吧？”赫鲁晓夫说：“我可不行了。”

第二幕刚结束，毛就说：“可以了，该回去了。”回来以后，毛对我说：“这么个跳法，用脚尖走路，看得叫人不舒服。不能改个法子跳吗？”我怀疑毛是故意不去欣赏苏联文化。他这是为了嘲笑赫鲁晓夫和苏联。

我们去莫斯科大学拜访中国的留学生时，毛才对苏联露出一丝赞美之情。当时中国的留学生每人都穿着一件褴褛破旧的棉袄，而苏联学生穿的是呢子衣服。学生餐厅里的伙食远远强过国内的干饭青菜。莫斯科大学宿舍的居住条件也比中国好。同样大的房间，苏联只住两个人，中国却挤八个。毛说：“这我们比不上。”

毛通常白天开会，晚上单独留在卧室内。我和其他人员便有许多时间自由行动。

我与林克没有事，我们去看了庆祝晚会的演出。这是一个音乐歌舞演出会。每个节目都不长，很吸引人。晚上我们在宫内的小型电影放映厅，观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片子。我们点名要看“翠堤春晓”。

后来外交部的韩叙说，到苏联这里，专看美国片子，太不好意思。于是映了刚发行不久的“静静的顿河”，但我是一句话一个字都不懂，实在看不下去。

苏联人员和我们代表团处得很好。我们这次带了一大堆礼物给招待的高级苏联官员，准备的有象牙雕船、景泰蓝花瓶和金镶的苏联国徽；另外准备了中国香烟、茅台酒，绣花拖鞋和丝睡衣给一般警卫人员和女服务员。

楼道口站岗的警卫官们同我们混熟了，开始是我们进出时，顺手送他们一些，他们拿到总是偷偷摸摸地藏起来。后来，他们值班时，轻轻敲楼道口的门，我们就知道是要烟和酒了，我们就递出一些去。

有位女服务员以为中国的生活水平比苏联好，医生的工资很高。林克注意到她整理我的床铺特别仔细用心。后

来她从翻译阎明复那打听，问我愿不愿意同她交朋友，她愿意随我回中国去。阎明复替我回绝了。大家听了这事，哄堂大笑。

我们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又发生了一叫使大家十分不愉快的事。我们随从人员公用一间大盥洗间，每天上午由苏联女服务员整理及打扫。按苏联习惯，盥洗间放一大瓶香水。中国人没有用香水的习惯。可是这瓶香水早上摆在那里，到中午就不翼而飞。如此，一连三天。

叶子龙怀疑是哪位顺手牵羊拿走，装在箱子里了。于是他突然检查每个人的箱子。我十分反感。检查了一遍，谁的箱子里也没有香水。而香水摆在盥洗间里，仍然每天放，每天不知下落。大家一肚子不高兴之余，突然恍然大悟，香水之不见，是这几位苏联小姐的杰作，前手放、后手拿，方便的很。

我将这段插曲告诉了毛。毛说：“叶子龙简直是多事。人家拿了，就不要查。万一查出来，怎么得了。人家背着你拿，就是怕你知道嘛。”

赖祖烈同我商量，去看那位到北京接我们的医生，于是由大使馆的姓金的翻译陪我们到这位医生家去。他住的是公寓房子。一共两间房，房间很小。我们带着绣花拖鞋、丝睡衣和两瓶茅台酒送给他。

那位医生看见礼物时不知所措。他连着转几个圈子，突然拿出三百卢布送给我们，作为还礼。并且说送给一人一百卢布，很不好意思。我正在推辞，赖祖烈却一把接过去收下了。我当时大惑不解赖为什么收下。赖回来的路上同我说，这算是公家收入。但赖操守很差，我想他把那笔钱自己拿了。

十一月七日毛参加了红场的阅兵式及群众游行。毛同苏联党政领导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并立在列宁墓上。我站

在墓下左侧 ,在我旁边是爱沙尼亚的党书记。他会讲英语 ,而且相当流利。他告诉我 ,他年轻时在英国住了很久。他说 : “ 以前我们常用中国代表谜或神秘 , 似乎很远很远。以后有机会真想去看看这个谜一样的国家。 ”

中国五一劳动节和国庆节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原本就抄袭自苏联模式 ,很累人 ,我对如此铺张浪费也十分不满。红场的尖塔宫殿及鹅石大道虽然举世闻名 ,但不够宽阔壮丽。两年后 ,为纪念解放十周年而拓建天安门广场。我怀疑中国此举是要和苏联较量 ,盖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广场。

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发表了莫斯科宣言后 ,苏共中央举行了一次宴会。这次毛喝了点酒。宴会后 ,毛的兴致很高。他对这次的莫斯科宣言十分满意。他说 : “ 一八四八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 ,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将近一百年后 ,这次的《莫斯科宣言》总结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 ,指出了今后的方向和策略。 ” 我们中国党在会议上提出了 ,十五年之内 ,在钢铁生产上 ,苏联要超过美国 ,我们要超过英国。到那时候 ,物质生产的力量对比 ,我们就有了质和量的根本改变 ,革命的形势就会彻底改观 。我们这个国家就是钢太少了。就是要搞实力地位才行 ,要不然你说话 ,谁人来理你 ,人家看不起你 ,你讲半天有什么用。

“ 冷战政策也好 ,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也好 ,我都双手赞成。国际上搞得紧张点 ,国内各种力量就会团结得好一点。外部有压力 ,内部才会奋发团结。你那面磨刀霍霍 ,我这面也不会把枕头垫得高高的睡大觉。 ”

后来我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 ,得知毛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于莫斯科发表那篇狂妄自大的演讲 ,使赫十分震惊。毛的那篇演讲根本是 “ 井蛙观天 ” ;毛对资本主义世

界没有概念，才会毫无根据的说出“十五年内超过英国”的这种狂言。而在核子时代中，表态支持战争边缘政策和国际紧张局势，更是愚蠢至极。但问题毛那篇演讲就象平常和我深夜闲谈一般，不只是说说而已。他又在思考新的策略。那时毛的心田早已播下了“大跃进”的种子。

## 注释：

李医生与毛的俄语翻译李越然同一间房的报导有误。

毛夸口中国会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可能是被赫鲁晓夫说苏联可在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激。但李医生没有听到赫鲁晓夫的那篇演说(译注：赫鲁晓夫在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节周年大会上的演说)。“大跃进”这个术语第一次被公开引用，是在周恩来一九五七年夏天的一篇演说中。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毛自莫斯科返国前，《人民日报》号召掀起“大跃进”运动。

关于赫鲁晓夫对毛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的忆述，可见前引书 KhrushchevRemembers ,pp.250-257。



莫斯科之行使毛精神振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离开莫斯科后，毛已准备发动“大跃进”，增加粮产量。但他当时最大的阻力是中国共产党。他目前的首要之务在于寻求支持。

回到北京后，稍事休息，毛就乘飞机到了杭州。江青已经先行抵达。

在杭州住了两个星期，又乘飞机去广西南宁开南宁会议。中途在长沙黑石铺机场降落加油。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到机场来迎接，请毛进城休息一下再走，毛没有同意，就在机舱内同周谈话。毛说：“湖南的农业就是上不去，为什么湖南只种一季稻？”

周回答：“湖南的气候只适宜种一季稻。”毛说：“你这湖南同浙江在同一纬度上，自然条件也与浙江相似，为什么浙江能种两季稻，你湖南就只种一季稻。”我看周的脸胀得紫红，说不出话来。

毛又讲：“我看，就是不吸取人家的好经验。”周囁嚅说道：“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毛抢白地说：“什么研究，我看研究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毛说着，随着伸手拿起《明史》，对周说：“你们回去吧。”也没有等周告辞，毛就翻说看起来了。弄得周尴尬不堪，同我们打着招呼，又说：“主席，我们回去就改种两季试试。”毛也没有理他。

周下了飞机后，毛气虎虎地将《明史》一扔，说：“他试试看，完全不学学别省的好经验。没有用处。”

南宁会议是毛鞭策共产党的再一次努力。

这时已是十二月底，南宁仍然是郁郁葱葱，满眼苍翠。城市不大，但十分整洁安静。街道和商店建筑是典型广东式的。沿街房屋都是两层或三层楼，而第一层都内缩一截，使二层的临街部分形成沿街一条行人走廊。这种建筑方式，对于多雨的华南地区城市的行人，有很大的便利。这里极其幽静，树木很多，特别是橘子树和梔子树丛。橘子数上满是白色的橘花，甜香沁人。也有不少的柚子树，气候温和，一般在摄氏二十四度左右。

广西自治区党委交际处宾馆设在一座小山上。毛住在一座小巧的平房里。江青住在邻近的另一座平房。沿着房前的花径，转过山坡，是新建的两层楼招待所，我们住在这楼里，小山脚下是南宁宾馆。

到南宁后第三天，江青叫我去，大发脾气说护士折磨她，有意打乱她的生活习惯，将她整得精神紧张的很。要我立即给护士开会，整顿工作。

原来南宁招待所的房屋没有暖气设备，只能用电炉取暖。这种炉子一开，温度升高很快，江青说温度高了。关了以后，室温立即下降，她又说凉了。区委书记和公安厅长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派人到香港，买来电暖气。这种设备，外形每具同普通的暖气片相同，有十到十二片相连，灌入冷水，插上电源，水温可达到一恒定温度，这样才解决了室温的问题。

江青是淋浴的，但招待所没有淋浴设备，只好用脸盆将热水冷水混好冲洗，一盆用完，再拿一盆冲，这个空隙，江说护士有意使她受凉。自治区委书记知道洗澡出了问题，立刻又派人到香港，买来淋浴设备。但是江住在这里，不肯先到别处住一两晚，无法安装，闹得大家十分紧张。

我先问过护士后，随即跟江青解释情况，除非她暂时搬到山下宾馆住一两天，趁此加紧安装淋浴设备，另外没

有别的办法。江更加不悦。她说，护士不积极想办法，不尽职，反过来以让她搬家胁迫她。

在这种无理取闹中，已经不能同她讲道理了。晚上江睡觉后，我同毛讲了护士们的困难情况，毛听后说：“江青这个人也是个纸老虎。有的事就是不能听她的。要顶一顶，护士们不要怕，替我感谢她们，谢谢她们照管江青。”

第二天下午，卫士来告诉我。江青到毛处，说护士不好好给她洗澡，故意让她受罪。毛说：“百日床前无孝子嘛。这些人还不是抱着雇佣观点来工作的。”卫士说：“大夫，可要注意了。”

这下我明白了，毛对我讲江青不对。对江青又讲护士不对。我还得准备好对付江青。

过了两天，江青找我谈话，对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有时我在将就你？”我说：“我不知道。”江说：“你这个人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你能够想办法，遇事果断。主席说你这个人还是多谋善断。可是你骄傲，有架子，只要你认定的事，什么人说你，你也不回头，要说服你，难得很。我对你投鼠忌器，你知道吗？”

我说：“我不懂你的意思。”江皱着眉头说：“我有时受不了你的这个脾气，只是主席在用你。你给主席工作，主席对你也适应了，也不容易。我对你从主席的这个大局出发。你和我都是为主席工作，都是他的幕僚，你我是同僚。我已经给你提了意见，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呢？”

我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我的工作能力和我的个人条件，都不适合在这里工作。我还是希望有适合的人，可以接替我。”我建议由王鹤滨替代我的工作，因为这时王已经从苏联学习回来了。江青显得不耐烦说：“你的工作适合不适合，由主席决定。”

卫士全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他同我讲：“大夫，江青对你真算是客气的了。我听主席讲，这么忙，还闹个不停。真不懂事。”我问他：“主席这几句话是说谁呢？”

卫士说：“这是江青从主席房里出来以后，主席讲的。我看可能是说江青。”

但江青还是闹得翻天覆地。为了洗澡，闹得护士们哭啼啼地跑来跟我诉苦。我看，摆在面前的事情，不是医生能解决的。

我去找王敬先，王说，这种事他管不了，他只管警卫工作。我又去找叶子龙，叶说，没有办法，淋浴设备买来了，江青不肯搬到别的房间住一两天，装不上去。我又去见了江青，说明不安装淋浴设备，无法解决洗澡的水温保持恒定。这次江同意了，暂时到山下宾馆住一天，总算装好淋浴设备。

洗澡问题告一段落。接着江又说，住房周围不安静，影响她的休息。于是，除我们几个人不动以外，其余所有的人，包括区委秘书长和区公安厅长一律搬到山下，而且山的四周断绝通行。

刚过了一九五八年新年，毛决定在一月十一日召开中央各部门和省委书记会，也就是南宁会议。中央部分领导人，和部分省市领导人都参加了。会中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会上，毛批评了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当时负责计划、建设和财经工作的人都作了严厉的批评，其中包括周恩来和陈云。

一月十一日开会。十五日陈伯达找到他南宁宾馆的房间去。他告诉我，他感冒了，头痛，让我给他感冒药。其实陈伯达想回北京，但因陈在会中也遭到毛严厉批评，不敢走，怕一走毛会指控他“躲风”。他又问我，他的房间的楼上，住的是哪一位？一夜到天亮，在上面走来走

去，不停的来回走，在下面整夜吵得睡不着。陈要我到上面去打招呼，不要吵得下面不能睡觉。我口头上答应他了，但是来的都是“首长”，我怎么能够去打招呼呢？

我离开宾馆以前，到了二楼，才知道住在陈伯达上面的是薄一波。薄当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会上受毛的严厉批评，心理压力想必极大。

江青的前夫，黄敬，当时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在会中遭到毛的激烈指责后，精神崩溃。

南宁会议是在二十二日结束。当天上午，上海市长柯庆施找我，说黄敬这些天来，精神不正常。要我给黄查一查，是不是病了。

我到了黄的房间，他睡在床上，但是并没有入睡。他语无伦次，精神恍惚。不断地说：“饶命啊！饶命啊。”我立刻将这种情况告诉了杨尚昆。杨说，会议结束了，明天可以到广州，再住院治疗。

后来在广州，柯庆施告诉我，黄敬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兼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等坐一架飞机去广州。途中黄突然跪在李富春面前，磕头说：“饶了我吧。”大家知道黄是疯了。到广州后，送入广州军区总医院。黄敬住院期间试图从医院窗口跳楼逃跑，跌断了腿。我自此后没有他的消息。许多年后才知道他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就去世了。

在毛的斥责下，与会人员俯首贴耳，唯唯诺诺，但毛的情绪十分高昂。会议结束后，自治区党委请大家吃一顿“龙虎斗”。毛破例跟大家一起用餐。所谓龙就是蛇了，但不是一般的菜蛇，而是一种叫做三花蛇的毒蛇，虎就是猫了，但不是一般的猫，而是一种野生的猫科的果子狸。这种狸，素食，在山林间以各种果子为食物。

非常肥腻，我和很多首长都觉得难以下咽，但毛却吃了不少。

第二天毛要在南宁市郊外的邕江游水。当时水温太低，只有摄氏十八度，不适合游水。毛不同意。他认为，只要在精神上有了准备，水温再低，也不会感冒。我只好和他一起下水。毛在邕江中游了大约一个小时。游后第二天毛果然感觉不舒服了。虽然没发烧，但是咳嗽增加，痰也多了起来。开始时他想顶一顶不吃药，后来咳嗽加重，他还是同意服药治疗，逐渐恢复。

南宁会议后几个月，又一连串开了数次会议。毛在每个会中都疾言厉色地指责各省市书记和负责党计划的主持人，脚步太慢，拖延中国的进步。每次会议一结束，各省传来的农业、工业指标便节节拔高。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正式提出了“大跃进”。

## 注释：

据说当时任副总理和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对江青也有类似的抱怨。陈说为了怕吵到江青，他得脱掉鞋子，赤脚走来走去。

陈伯达曾表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获得解决，目前最主要的矛盾存在于中国经济文化发展和人民需求之间，因此遭到毛的批评。

薄一波一九五六年反对毛的“冒进”，并拒绝响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九五七年九月毛开始批评，薄是被批评的人士之一。毛指控薄右倾。

一九五八年初，我感觉到毛的性格起了变化。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成形。我们由南宁飞往广州，再回北京，只待了几个礼拜。五八年一月，毛展开整风运动。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是关起门来整，自己人整自己人。三月初，往成都，召开成都会议。

四川省委给毛安排的住处，在成都城西二十华里的金牛坝。金牛坝招待所占地面积很大。坝后有一个花圃。院中错错落落的竹林旁有苍松翠柏，小径旁又挺立着棕榈和柚子树。花圃中，茶花开得火红。石径上布满了苍绿的青苔，雨后远处山石树苍苍茫茫，融合成一片迷离闪烁的青光。毛在散步时说，看来中国画的金碧山水派，和大泼墨的山水画派，都有自然界的依据。

他说：“烟水苍茫的烟，指的是微雨似烟，并不是饮烟。烟雨莽苍苍的烟，指的是树林在雨中远望的景色，也不是饮烟。有人说，我写的词中山花烂漫，不知是什么花，我指的就是茶花和杜鹃花，这两种花在四川和云贵高原多的很。”

我很高兴能重返旧地。我自一九四四年夏天，从成都华西协和大医学院，转到重庆歌乐山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离开成都，到这时候已经十四年了。因此我趁这机会去拜访位于华西坝的母校。

华西协和大学校内原本是郁郁葱葱，其风景之美和占地之广，居全国之冠。校园在我的大学时代繁盛有若天堂。但它现在已面目全非。



在原来的体育场开了一条由北向南的大马路。整个校园被一分为二，拆了许多原有建筑，包括一座座小楼的教授宿舍，明德楼 (Vandman) 及加拿大学校 (Canadian School)。大钟楼、医科楼及新医学楼虽然没有大的变化，但已失去昔日的绚丽。校园疏于照顾，杂草丛生。校门外的小天兰街也失去了昔日的幽静风采。

学校现已改名为四川医学院。文、理学院则合并到四川大学。我任毛保健医生一事很少人知道，所以未去惊动太多老同学。我只去拜访了孙玉华，他当时是医学院院长。说去旧日情景，不胜唏嘘。

回到金牛坝，毛问我都看了些什么。我告诉他，我到念书时的学校，华西坝去看了，已经有十四年了。毛说：“有首诗写‘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日摇落，凄凄江潭。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人到了久别重游的地方，是会有这种感慨的。”

毛又问遇到什么人。我说有几个老同学，我没有去看他们，不方便。毛说：“旧地重游，也应该旧雨重逢。什么方便不方便。”这我没有听他的。因为中央在这里开成都会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几次请毛看川剧，毛以进城里往来费时费事推辞。李井泉提出，就在前院的礼堂内演出，毛终于同意了。

第一晚演出剧目是“抢新郎”，是出喜剧。剧情突梯滑稽，演员才华精湛，很快就将我完全吸引住了。我看毛，他也是全神贯注，有一次竟将香烟点燃的一端放到嘴里。以后每晚都有川剧演出。从此以后，各地为毛兴建豪华住地，都附有小型演出礼堂，以利毛观赏川剧。

毛对金牛坝的室内游泳池抱有一种非理性的恐惧，也是在那时我才感觉到毛的变化。这游泳池是李井泉完全模仿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兴建而成，结构上完全一样。

毛到成都后，从来不在这里游泳。他不断要我们去游，而且要我们告诉他，在这里游，比北京的游泳池，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毛老觉得池子里被下了毒。我们试游过的人全安然无恙。我对毛的恐惧很感纳闷。多年以后，毛的猜忌心越来越严重，我才了悟其实就是他往后发展成为迫害妄想症的前兆。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召开成都会议。成都会议事实上是南宁会议的继续。毛大肆批评主持经济发展的党领导。毛一方面鞭策他们提出十五年超过英国和倍增钢、农产量指标的具体方案，另一方面指责他们是小脚女人，步伐放不开。此时虽经过五七年夏季的反右整风，毛对党仍未恢复信心。

毛在成都讲话中说：“要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风格，应该讲真心话，振作起精神来。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才好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是这些干部老爷们，却并不想势如破竹，反而精神不振。这是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就象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下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能迷信。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还不是马克思创造出来的。不能照书本，生搬硬抄。在这点上，史达林好些，苏联《共产党简明历史教程》一书的结束语说，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不合理的，可以改变。

“中国儒家，对孔老夫子就是迷信，不敢叫他孔丘。唐朝的李贺就不象这样，他叫汉武帝，直叫其名，曰刘彻，

刘郎。称魏人为魏娘。”如迷信前人，我们的脑子就被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学马克思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气概，那很危险。史达林也有点势如破竹的精神，可是有些破烂事，搅得不清楚。

“害怕教授，进城以来，对于教授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对他们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象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却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思想，‘谢主龙恩’的残余思想。”

毛认为，有些人，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阻碍了“革命”的前进；知识分子一般说来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进行革命，就要寄希望于年轻人，要年轻人带动“革命”。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事物，他就抓住不放，向老古董开战，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孔子从二十岁才开始，创学派，收门徒。耶稣有什么学问？他创立的基督教，还不是流传至今。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孙中山年轻时有大学问，不过是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主义时，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是后来学的。他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已经创立了新的学派。他在二十九岁开始著书立说，他批判的人，都是当时一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如李嘉图、亚当史密斯、黑格尔等。在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了学问多的人。”

毛并不是在说反话。中国儒家不敢叫孔夫子孔丘；全中国也没有人敢直呼“毛泽东”，一律称呼“毛主席”。他说的话后来变成了教条。毛常扭曲历史为其本身的思想做辩解。孙中山一九二一发动革命时是个医生和富有的知识分子。

数年后，于一九六六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全国年轻人起来批判他们的教师和共产党--我常想起他这些谈话。文化大革命在毛的脑中已酝酿多年。

但在成都，毛仍需要党来执行他的意旨。他批评“反冒进”，直斥这帮人是非马克思主义，犯了离右派不远的政治方向的错误。毛坚持经济建设该大大加快脚步。

任何反对的人，都被打成右派。毛鞭策经济计划委员会向前猛进，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条的总路线。

我也察觉到毛对社会主义的了解正在逐渐改变。虽然中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阶级仍旧存在。毛提出有两个劳动阶级，即工人和农民，他们是“好”的。当时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毛说：“知识分子动摇性很大，哪边风大，随哪边跑。有些人读了不少书，可是对于实际问题一窍不通。”这是他第一次开始谈到阶级斗争。

毛觉得成都会议开得很成功。粮产量指标节节上升。会中通过了三十七个决议。

每项决议都取代了先前八大制定的现实的经济路线。

共产党内起了根本变化。中国急速驶入“大跃进”的深渊中。毛的权势如日中天，党内异议分子噤若寒蝉。凡对不合现实主义的高指标抱着怀疑态度的人都得顶着被打成右派的危险。“反冒进”言论在毛的淫威下沉默了。奉承阿谀的人开始扯着瞒天大谎，同意他们明知无法达到的高目标，争先恐后地把指标越提越高，形成一连串空想的“大跃进”计划。

恐惧开始弥漫。

越不可思议的假话假象，毛越喜欢。

注释：

毛于一九五五年末，五六年初之际，开始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口号。

一九五八年初我和毛仍在成都时，在毛的指示下，共产党内重新开始了由于反右运动而中断的整风。三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整风中，要将林克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林克这时仍在毛处工作，给毛看“参考资料”，也同毛一起读英文。林决定回北京参加秘书室的整风。后来这便发展为“黑旗事件”，是我在中南海所见，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有人家破身亡，有人撤职处分。这个教训使我没齿难忘。

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整风中，有八个人，其中有林克，向政治秘书室的副任何载提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是讲何载邀功诿过，对上面拍马屁，对下面专横压制。何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党委员会书记杨尚昆报告，说这八个人对党不满，有向党进攻的言论。于是组织秘书室的人向这八个人召开批判斗争。何载一些人，还指责政治秘书室副主任田家英是林克这八个人的后台老板，到一九五八年三月，批判斗争已升级到要将这八个人定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集团。

三月底，成都会议结束，林克赶回北京后，我才开始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与毛随后离开成都，往重庆，乘船沿长江经三峡大坝预定地，东下武汉，毛在那讨论了三峡大坝的规划。最后到广州已近四月下旬。叶子龙和田家英此时也到了广州。

田家英告诉我：“杨尚昆已经做出决议，要将林克这八个人停职反省，再进一步批判揭发他们的反对共产党的问题。”

田接着说：“何载他们说我是林克这几个人的后台，我不但不能替林克他们辩护，而且整倒这八个人以后，下

一步很可能牵连到我。所以这事情很复杂，也很难挽回了。我也不便于向主席申明，否则更会指责我，超越中央办公厅，到主席那里去告状。”

我听到以后，感觉很难理解。这八个人中，别人的情况我不清楚，可是林克与我相处已经四年，这四年中可以说是朝夕相聚，林说话直爽，不大通人情，容易得罪人。此外，我从来没有发现他有反对共产党的言论，何况林在毛处做秘书，怎么会变成了反对共产党的人呢？

在广州，一组的人又议论起政治秘书室内八个人的反党问题。我说：“我很难想象林克会反党，他只不过是知识分子，有时说话太直，使得有的人觉着林克太不尊重别人。有些积怨是很可能的。”

叶子龙说：“你又不在北京，你怎么知道他不反党。”我说：“一个人有反共产党的思想，平时不会不流露出来。平时对党老老实实的人，怎么会在整风时突然反起党来……”

说到这里的时候，话还没有说完，王敬先向我使了一个眼色，走出去了。我随后也跟了出去。

到了隔房里，王敬先对我说：“大夫，你可不要太率直了，中直党委已经做出决定，你再讲多少，你能扭得过来吗？人微言轻，起不了好作用，你再讲下去，别人还会说你，包庇林克，不相信中直党委的决定，甚至会说你，对抗中直党委。事情就糟了，弄不好，把你也牵进去。”

王说的也有道理，叶子龙早就向毛报告过林克停职之事。我想了一想，实际上正是如此。在下面讨论丝毫无济于事，也确实会被误解。王说这些话，确实是为我想，也是他在共产党内多年的经验之谈。可是就这样将这八个人一棍子打死，还有什么道义可言？



我因此认为如果毛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他会支持林克。先前叶向毛报告，林克等八个人反党，毛只是听，没有说什么。叶分析起来，毛是同意了中直党委的决定。我心里倒以为不然。按照我对毛的了解，他对某一件事不讲话，就表示他并不同意。但我最好等毛自动问起我时，再表示意见。

那天下午起床后，到小岛后门外，停靠在码头上的游艇内甲板休息，卫士来叫我，毛要读英文。我匆匆走上游艇，同毛读起来。

我们刚刚读了几段以后，叶子龙来了。毛停下来问叶有什么事。叶说：“昨天已经向主席报告了林克这八个人的问题，还有些事要报告。”毛让叶讲下去。我立刻就起来，要避开，以免叶认为我在场，不便于他讲话。

但是毛看见我要走，对我说：“嗯，你不要动，讲反党又不是秘密。我们还要读英文。”于是我又坐下来。可是毛并没有让叶坐。

叶站着，对毛说：“昨天已经向主席报告了，林克这八个人借整党时机反党。昨天又同中直党委通了电话。”

毛说：“那么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为什么不来向我报告，却让你来呢？”

叶说：“中直党委副书记曾三同志知道我还要到广州，就让我向主席报告。所以昨天报告了，我打电话告诉了他，他让我再报告主席一下。”

毛沉默不语。叶就退出去了。

我看得出毛心中不快，但我不敢轻举妄动。我的直属领导是卫生部保健局。林克的事发生在办公厅政治秘书室。依党组织我无权干涉。否则我会被冠上与林克勾结的罪名。毛这里，卫士们来来往往，一下子进来送茶，一下子送热毛巾给毛擦脸。

就算不进来，也会在门外听见我们说什么。如果我先向毛提起林克的事，卫士们一定会将我的话传给叶子龙。一组内反林克的人就会对我群起而攻之。我最好是等毛开口问我。

我拿起刘少奇在八大二次全会的政治报告英译本，又读下去。

毛坐正了身体，说：“慢，先慢一点。”

毛又沉思了一下，对我说：“你知道政治秘书室发生的事吗？”我说：“我不清楚，我不在他们的单位内，彼此都不了解情况。他们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我没有想到。因为林克在成都走时，他说几天后，就会回来。可是一走就没有了消息，叶子龙主任来了以后，才知道已经出了大问题。”

毛说：“这八个你都认识不认识？”

我说：“八个人都认识，只有林克很熟。”

我说：“林克这个人怎么样？”

我的机会来了，当下必须步步为营，卫士们都竖着耳朵在听，我得好坏都说才行。

我说：“这三四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闲谈也多，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党思想，只不过有些骄傲。”

毛说：“谁没有骄傲，现在不是谈骄傲的时候。我是问你，林克是不是反党。”

我说：“他没有过反党言论。他可能对某个人，某个领导人不满，可是我没有听到他对党、对主席不满，反而是忠诚的。”

毛说：“是啊，去年反右派运动时，他和那七个人都是积极分子嘛，怎么能突然今年一整风，就反党呢。”

我说：“我弄不清楚内幕情况。田家英同志也从北京来了，住在这里。他是政治秘书室的，对这件事他很清楚。”

毛叫我找田家英去跟他谈。

我将与毛的谈话告诉了田家英和王敬先，他俩都大吃一惊。王觉得我太大胆。田还是忧心忡忡。杨尚昆是田的领导，他不想超越杨向毛反映情况，或是反对中直党委的决定。毛那晚找了田去谈，田将总体情况反映了出来。

第二天凌晨四点钟，我正睡得很熟的时候，卫士跑来将我叫醒。说：“大夫，快起来，主席要读英文。”我昏头胀脑起来以后，用冷水冲了头；又擦了脸，匆忙走到毛的卧室里。

毛见到我进来，叫我坐在他的床边椅子上。卫士泡来一杯浓茶，放在我旁边的桌子上。

毛对我说：“李大夫，你不讲卫生，睡懒觉，睡够了没有？本来两点钟就想叫你，我压了一下，让你多睡一会。”

我们读了几行英文以后，停了下来。毛说：“我找田家英谈过了。情况嘛，大体上是清楚了。这八个人就是不满意政秘室领导人的右倾。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官官相护，反而打击他们。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我看，这八个人说政秘室右倾一点不错。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也是右倾得很了，他们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打击人的办法，不是右倾是什么？”

“这八个人在去年反右的时候，是积极分子。现在反过来，说八个人是反党分子。我说，说这样话的人，本身就是站在右派立场，为右派说话。而且动用了党组织的招牌，以势凌人，大张伐，大加镇压，这八个人还有活路吗？”

毛停了一会，又说：“唐顺宗的时候，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个人变法图强，侵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

益，被旧势力打了下去，八个人同时贬官，就是所谓的八司马。那时候，旧派势力的人就说，柳宗元他们是年少狂，目无纲纪。用现在的话说，年少狂就是年轻骄傲，目无纲纪，就是反党了。我让田家英回北京去，我们也就回去。”

我们也随即动身回北京。到北京正是五一节前三天。五一前夕，毛找林克谈话，了解政秘室整风运动的情况，谈了大约有三个小时。

毛回北京后，中南海形势为之大变。之前杨尚昆原本预备要开大会斗争林克八个人，刚好此时田家英回到北京，说毛要亲自处理此事。田强调毛主席不赞成办公厅的决定。何载他们，甚至杨尚昆听了，坐卧不宁，想方设法要对付过去。

过了五一，第二天毛睡醒后，躺在床上。召集田家英、林克、何载和中直党委的刘华峰、李东野、萧兰谈话。毛叫我坐在一旁，听情况。

毛坐在床上，身上只披一件睡袍。毛讲话时的语气是很温和的。毛首先指出，政秘室的运动开展得不正常。在反右派运动中的左派，不可能在整风运动中成了反党分子。毛提出，要实事求是，总结上一段整风的经验，不要混淆了阶级阵线。

如果毛讲话以后，就按照他指出的途径谈下去的话，也可能引出一个较为和缓的解决结果来吧，然而可惜的是这时萧兰发言了。

萧说：“这八个人的言论，矛头指向了中央办公厅，指向了中央办公厅的领导人。何况中直党委已经作出决定，指出这八个人进行反党活动，决定他们停职反省。”萧的发言，语气既激烈，而态度又昂扬。

我虽不赞同萧的看法，我内心倒是佩服萧兰的勇气。她在显然不利的环境下，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敢于拽虎

须，置自己得失于度外。问题是萧过于天真，她只知道听从党组织，却不了解毛发起“整风”的动机。毛不满意那些党领导的保守路线，林克等八人的批评正大合毛意。再者，萧不该以为中直党委的决定不能更改。在共产党上面还有个毛主席。她这番话等于向毛挑战。

毛立即挺起上身，两手拉起毛巾被向身后一塞，环顾坐在四周的人一眼。毛每次采取这种姿势时，就是做了决定，要狠干一场的了。

毛说：“那么，你们双方是各执一词的了。也好，我说了不管用，可以把这个问题全部交给群众。召开政秘室群众大会。在大会上，进行充分的辩论，将问题彻底搞清楚。你们都回去，明天起开大会，让中南海各机关派人参加大会。”

事情真的闹大了，真的是无可挽回了。

我只参加了政秘室辩论大会的第一天的全体大会。会上杨尚昆首先发言。因为何载先前已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说他只是奉命执行杨的决策。杨的讲话很聪明，暗示他对何所发动的政秘整风运动没有很好地过问。杨检查他自己说：“我要求大家在发言中在辩论中，应该揭发这次打击左派同志的所有有关人员。对我有任何意见，也要揭发。”

萧兰仍大力批判林克等八人。萧兰在一次发言中，称林克八个人打的不是红旗，是黑旗。这就是所谓中央办公厅的“黑旗事件”名称的由来。

会议开了一个月。后来的辩论大会，我都没有参加。结果林克八人获得平反。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恍悟毛在这次黑旗事件所使用的战略。毛的目标不但有杨尚昆，还有杨尚昆的领导邓小平。这次事件结果是撤销中直党委，杨尚昆算是保住了中央办公厅主任，但是中直党委书记的

职务掉了。但到文化大革命时，杨又因“黑旗事件”而被批斗。

杨尚昆手下的中级干部在这次大会后受到处分。中直党委副书记李东野、刘华峰二人被下放。一九八零年，毛病逝四年后，邓小平与杨尚昆复职，李刘两人才得平反。政秘室副主任何载被开除出党下放，一九八零年平反。中直党委办公室主任萧兰被开除出党下放，死于劳改。

讽刺的是，事情闹大后，田帮杨开脱，证明杨的确不清楚何载的行动。何载被下放后，杨将田提升为办公厅副主任。

注释：

李东野平反后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刘华锋成为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何载成为中央组织部干部司司长，后来成为其秘书长。

一九五八年夏季，全中国陷入全民办水利的狂热中，大量人力投入建水库的集体劳动。毛领着中国往前走。水库的意义不只是政治上的。水库一方面可改善中国的灌溉系统和提高农产量；另一方面，毛也想借此倡导及宣扬体力劳动。毛一生厌恶知识分子的傲慢，极力崇扬农工苦干精神。

从五月中旬，北京西北郊地处明十三陵前的水库正在修建。北京市各机关，国务院本身及下属各个部委，中共中央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及部队都开展义务劳动，参加修建。各国大使馆也纷纷参加。

中国的领导人轮流在镁光灯中，铲土照相，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五月二十三日以毛为首，中央各首长，分乘六辆大旅行车，到十三陵参加劳动。

毛坐在第一辆车中。他一进车以后，就走向车后排，坐到倒数第二排，我坐到最后一排。

毛说：“平时我们这些老爷，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今天也要来动动手了。都说劳动好，真到劳动的时候，可就不一样了。有的人是真的劳动，有的人是不得来劳动，还有的人是想挂这块劳动金字招牌。不过这样也好，不管抱着什么目的来，劳动总比不动手要好。”

到十三陵水库工地上，人潮汹涌，万头攒动。毛的座车一到，人群便欢声雷动，频呼“欢迎毛主席”的口号。北京军区司令员兼十三陵水库总指挥杨成武带了一连军队开出一条路，将毛簇拥到工地指挥部。



这指挥部是临时搭成的工棚，杨成武向毛介绍水库建设工程计划和进度。

远处可见大坝修建的情况。在大坝下面周围是黑压压的人海。铲土的人挖掘一条叫沙河的河床河滩的沙石，装入箩筐，用扁担挑筐到小铁路上的翻斗车，将沙石倒入车内。小火车在运送着沙石。翻斗车翻倒沙石到传送带上，向坝上运去沙石。

这种劳动单调，挖、掘、铲、挑，这样的重复姿势劳动，很容易疲劳。不用多久，臂、肩和腰就酸痛无力了。

杨成武和我随毛走到坝底。毛卷起袖子开始铲土。我们也随着一起铲运沙石，挑筐运土。毛当天穿一件白布衬衣，下面穿一条浅灰色派力斯裤，一双黑色布鞋。这天天气温暖，在闪烁的阳光下，毛的黑红色的脸上，罩上了一层灰土。汗水淌下，似乎形成蜘蛛般的小河。

过了半个多小时，已近正午，杨成武要求毛休息一下。毛说：“很久没有劳动了，稍微动一下，出这么多汗。”

毛走进工地指挥室，坐下以后，对我说：“你们留在这里吧，劳动一个月再回去。也应该体验艰苦劳动的生活。北京市有这么多的人在这里劳动，不应该脱离他们。”

此时整风仍在继续，对象不只是那些走错误路线的人，也包括我这种“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毛觉得一组的人太过养尊处优，一年到头，吃好的，住好的，到处受着好招待。所以王决意让我们去受受罪，体验一下农工生活。毛相信劳动的好处，每个人--尤其是资产阶级出身的我--应该去吃点苦。

我说：“那好。可是要回去一趟，拿点日用品和换洗衣服来。”

毛想了一想说：“也好，大家都回去，商量好再来。”

第二天，全国报纸头版上都刊出毛拿着铲子，四周围着官员百姓的照片。这照片显示毛虽高官显赫，仍有接近群众参加劳动的热诚。在我为毛工作二十二年间，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劳动，而且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如此简单的象征性动作，竟鼓舞了全国人民从事艰苦劳动的狂热。

当天傍晚，毛和江青坐在游泳池旁休息。毛刚游完泳，江在啜着茶，毛见我来了说：“大夫你来了，正好。我们商量一下。建设十三陵水库是件大事，几十万人都去参加义务劳动，外国人也都去了。我们只去这么半天，怎么说得过去。你和秘书、警卫，组成一个班，到那里去十天二十天。无非是挖土铲土、走路、晒太阳、淋雨，总之，是要疲劳不堪，真的要到了呜呼哀哉的程度，就随时给我报个信，我接你回来。明天就去。我这里只留一个秘书和一个卫士就行。他们忙不过来，我就自己动手。我不能去，你们应该去，也是代替我去。”说着，毛转过头来对江青说：“你身体不好，不能去，你不能拖别人的后腿，叫你的那几个人去。”

江青说：“我只留下两个护士照顾我，其他的人我都不用。”

第二天由叶子龙、王敬先带队，我们到十三陵水库工地。这一期的人员由中央和北京市的干部组成，一共义务劳动二十天。我们晚到五天，和临时加入机要室的几个人组成一个班。

指挥部总指挥杨成武为了照顾我们，让我们住到房山县中学的教室里，搭地铺。

那间教室，不过十二平方米大小，我们在里面打地铺一共九个人，大家比肩而卧，转身都会影响别人。加上天气又热，又吵，入睡十分困难。

杨成武又是为了照顾我们，将我们的劳动重点排在半夜零时上工，上午八时下工，打夜班。这时正是五月下旬，天气热得很，白天的太阳晒得暑气蒸腾，如果白天劳动，真是要吃大苦了。

上午八时收工，由工地走回，路上一小时。早饭是咸菜、窝头和大米粥。然后大家坐在地铺上“学习”，什么“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之类。午饭是两菜一汤，天气太热，饭菜粗糙，吃不了多少，饭后开始睡眠。晚上九点左右起来。

我们每晚十一时开始列队出发，不行一小时到工地。我用铲子铲起沙石，装入箩筐，装满两个筐后，用扁担挑筐压在右肩上，挑到小铁路上的翻斗车去。我那时三十九岁，身强体健，年轻时我还是体操和篮球选手。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单调的重体力劳动，象这样用原始工具，全靠体力消耗的劳动，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夜里相当凉爽，可是劳动一、二个小时以后，全身汗透，肩背酸痛。

有的人，特别是那些由农村出身的所谓工农干部，一条扁担，可以挑六筐，甚至八筐沙石。别人挑起沙石筐，走动起来，扁担在肩上一起一落，既好看，又轻松，好象是在舞蹈。翻倒筐内沙石时，两臂前后一甩，似乎丝毫不用力气。可是我想照样舞时，全身都不得劲，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而我挑起两筐沙石，压在肩上，直不起腰来。每走动一步，扁担似乎咬着肩上的皮肉。

有一晚，队长分配我挑沙石到小铁路边，将筐内沙石倒入翻斗车内。因为十分疲劳了，两手抬起筐，往车上甩倒时，整个身体随着跌倒在车内。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说：“大夫，这可不比听诊器和手术刀。甩筐可是有巧劲。”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如别人。但是转过来安慰自己，要是让这些人拿手术刀做个手术，大概

比我这时的样子更要狼狈吧。我一边挑一边想，劳动改造的味道，可太不好受了。又想到，那些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长年的这样“改造”，能活下来的有多少人呢？

也有人说，这样的劳动，在工地上不少人受伤了。大夫还是去看看病，更有价值些。我没有同意。我十分清楚，毛叫我来，是用“劳动”来“改造”我。我如果去看病，治好再多的人，也躲不过“逃避劳动改造”的谴责。

好在我一起劳动的人，都是一般的干部，没有笑话我。不断指导我，如何用劲，如何可以省劲。

有一夜下了大雨，没有防雨衣物，全身淋透了。雨后又起了大风，有没有多带一两件衣服，冷得打战。这时王敬先走过来，让我回去休息，我环顾四周，大家都还在不停地挖着条着。我又干下去。好在是重度劳动，不久不但不冷，反而大汗淋漓。

劳动到十五天，我已经是筋疲力尽。睡眠不足，体力消耗太大，每天往返走路都感到两腿酸痛，迈不开步。

这一期劳动结束。我们晚来五天，大家提出一个问题，要不要延长五天，凑足二十天，也就是参加到下一批来劳动的人一起，再劳动五天。很明显，大家都不愿再“劳动”下去了，可是谁也不肯开口说回去，要说的话，岂不成了“落后分子”了。所以建议半天都说，再干五天。

这时杨成武来了，说是看望这一期劳动的人。杨到了我们的地铺房内，同我们亲热地握手打招呼。听到我们正议论要补足二十天劳动后，杨说：“你们来劳动就是主席对首都的最大关怀，最大的支持了。不在乎十五天或二十天。主席那里事情多，你们为他老人家做事做一个小时，比在这里干五天还多得多了。我是工地总指挥，指挥你们回去。”杨一边说，一边笑。大家在嘻嘻哈哈一片笑声中，都松了口气，可以回中南海了，可不是自己要回去的。

跟着做劳动十五天的总结，要评选出劳动表现好，需要表扬的人。机要室一位姓刘的科长提出应该表扬我。他说：“大夫要求自己严格，是位高级知识分子，可是没有架子。同大家在一起劳动，从来不肯落后，在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中间，能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大家都同意刘的话。

我心里明白，在这样的“劳动”中，得到表扬，对我丝毫没有用处，我再干得好，再能挖、铲、挑得好，对我的医术能起什么作用呢？何况我从心里厌烦这种“劳动方式”，甚至一直是抱着反感。得到表扬，岂不是大笑话？

我心里也明白，大家都是毛命令来劳动的，都在毛身边工作，如果我受到表扬，岂不是将这些“工农干部”比下去了。我就会成了众矢之的。所以绝对不能接受表扬。

因此我一再申明，“我是个应该改造的知识分子，我是为了经过艰苦劳动加强改造自己，不能表扬，否则就失去改造的意义了。”

叶子龙自然不喜欢我受表扬。他说：“大夫都一再表示不能表扬他，应该尊重他的意见。”于是停止了表扬我。

接着又议论，到底表扬哪一个人，议来议去，似乎每个人都是拼了命地劳动了，要表扬就得全表扬。最后还是杨成武解了围，杨说：“主席身边的人就是不一样，个个都是给大家做出了榜样，个个都是劳动的模范，所以这一组是模范组，全组受表扬。”于是皆大欢喜，圆满结束了这场劳动。

回到城里，大家分手。我先到清华园浴池去洗澡，因为那里有擦背的服务项目，而且十五天下来，脚掌上起了鸡眼，需要剜掉。

回到琉璃厂的家里，母亲和娴都说：“你可一下子瘦了这么多，给你做好了羊肉馅饼，你吃吧。”

娴对我说：“我也去了一天呢。是早上去，晚上回来的。天气太热了，晒得托了一层皮。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我可不能休息，我知道毛正等待我的“改造”结果。我不回去向他报告“劳动心得”，他会认为我表现“消极”。吃过饭，我回到中南海。

毛这时正和江青在游泳池边休息，一见到我就笑起来了。他说：“看你这副尊容，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了。听说你自己也甩到翻斗车里。亏得你爬出来的快，不然把你也运到大坝上去。”

原来一组的人早把这事报告了毛。

江青看到我时说：“味道如何？在翻斗车里还舒服吗？”回中南海时，我先和江青的护士谈过。护士笑着说：“江青同志说了好几次，这些人跟着主席，一年到头，吃好的，住好的，到处受着好招待，这下子让他们去受受罪。”

毛又讲：“呜呼哀哉了吧？”

我说：“筋疲力尽，味道不好受。”

毛说：“知识分子只会动嘴动笔，真要五体勤快起来可不容易。知识分子劳动化，不是一句空话。劳动的一大好处是，你必须接触群众，必须认识群众的集体力量。每隔一段时间，你要参加一次这种劳动。这对你有好处。”

此后一段时期，我跌倒翻斗车里的丑事成了中南海的笑柄。

注释：

在刊登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上的原始照片中，北京市长彭真站在毛身边。文革期间彭真被打倒，照片便经喷雾处理，将彭真抹消。

江青从苏联接受医疗返国后，神经衰弱更形严重。她认为她有重病，子宫颈原位癌复发、咽部淋巴结发炎、胃不好、消化能力差、头上似乎压了一个铁盔。她自称是淋巴体质。她说耳鸣，好象有个虫子向耳里钻。怕风、怕光、怕声音，而且有一种恐惧感。她长期有失眠症，安眠药换来换去，然后又说药物过敏。她对安眠药上瘾。她生病也上了瘾。

但她的钴六十放射治疗十分成功，原位癌完全治愈。

当时我负责她和毛的保健，不得不给她检查。

江青经过钴六十放射治疗以后，我在血常规检查中发现，全血细胞都偏低，特别是白细胞和血小板比正常数字降低很多。那表示江青处于放射治疗后的恢复期，不必大惊小怪。但江青几近歇斯底里。我从十三陵水库劳动回来后，就由我负责具体组织安排，保健局找了各科专家检查会诊。这时已是暑期，江到北戴河后才检查身体。

这次的检查科目多。江要我布置各科分开检查。江又提出，为了避免神经紧张，连续查两天后，要间隔三、四天，休息好了再查。这样断断续续地做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一共用了两个礼拜。江对检查的医生们呼来喝去，非常不尊重。又随意改变检查时间，视医生们如同家仆。

检查完毕以后，医生们聚在一起，讨论检查结果。大家感觉十分棘手。除去已经治愈的子宫颈癌尚且需要定期检查以外，就是要适当治疗放射后的血球降低。其他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疾病。（此后多年，直到她被逮捕时为止，二十多年间，她的健康情况一直很好。）大家都明白，江的生活条件十分优越，每天没有事情可做，接触的人太少，真可谓离群索居，势必形成性格上的孤僻怪诞，和极端的



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她自己感觉的症状又多又严重，但身体却是基本处于健康无病的状态。她说的一些症状，其实就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都是内科医生，无法治疗她的心理疾病。

我们写了一份意见书，分别交给毛和江青。意见书上说：“经过各科仔细周到的检查以后，江青同志目前处于放射治疗后的恢复期。除去一般的增强体质，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的药物治疗以外，要尽可能参加一定的社会生活。暂时不能担任工作。但要多参加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我们措词十分委婉，其实江青的病因之一便在于无所事事。

江看过后大为不满。她认为她根本上不是放射治疗的恢复期，她有重病，医生不是忽视，就是向她隐瞒真相。她指责一顿以后，要医生们重新讨论，认真报告实际情况。

医生们无可奈何，聚在一起又反复讨论。大家并不是讨论有什么病，而是琢磨用什么样的言词可以使她接受。最后向江青提出，大家提的放射治疗的恢复期，是表明在逐渐恢复中，在恢复过程内，原有的神经衰弱和植物神经功能失调，都表现出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就是她自己感觉到的各种不舒服。

江青对于这个解释仍不满意，一定要说出有重病在身，仍在坚持奋斗。可是医生们再也不愿意让步了。在与江交谈时，她甚至瞪目厉声质问医生们说：“你们能保证我没有，也不会有什么病吗？”

江跟着又说：“你们说参加一些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太空洞，没有具体内容。你们应该提出具体项目，排出每周的活动日程。”

这又使大家大费脑筋。于是建议，听音乐唱片，练习听力；每周参加两次晚舞会，锻炼体力；看看电影，使眼

睛对光线逐渐适应；多在室外照相，使身体对自然风和阳光适应力增加。又提出可以打太极拳。

毛对我说，他年轻时练过拳，也了解道家佛家禅定及修炼，对于江青打太极拳有意见，认为练拳不适合江。后来他同意先让她试试看再说。于是保健局通过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请来一位姓顾的拳师。这是毛与江暂时住到西郊新北京，叫做新六所的住处。这里面有六座住宅，是为毛和其他几位党的副主席造的。我每天上午乘车接顾拳师，到新六所教江青打拳。

江打拳很认真，但是柔弱无力，只能算是比画而已，顾拳师既谨慎，又含蓄，话不多，可是需要说明的地方，都简要精确地加以说明。

顾非常会看眼色。他发现，只要重复两三次指出江的姿势或出手不对的时候，江神色就不对了，因此也不要求太多。

七月初我随毛和江青到了北戴河。顾拳师也跟着去了。

江青在北戴河，神经衰弱越来越加重。

护士天天哭丧着脸。江青怕光，窗子上必须放下窗纱，可是江又要经常开窗通空气，必须拉开窗纱。这一开一关，护士被骂来骂去。江怕声音，拉开或拉关窗帘，都不许有一点声响。护士在房内走路时，衣衫的悉嗦声都要受到她的申斥。江说，棕色、粉红等等，刺她的眼睛。于是墙壁，甚至家具，都涂成淡绿色。

护士又向我哭哭啼啼地说，实在干不下去了。这期间换了五、六批护士，都是高高兴兴来，垂头丧气走。江的口头禅是：“中国有六亿人口，人多得很。谁不干，谁走。愿意干的多得很。”

当时我和保健局局长史书翰，副局黄树则，一筹莫展。我们商量还是找杨尚昆，请他想想办法。杨说：“江青根本看不起我。你们的这些困难，说给我听，我有什么办法。”

我们回来，真是如坐愁城。又商量还是找周恩来，请他想办法。史书翰曾为林彪的事找过周恩来。当时林彪已是半退休，有精神衰弱，不肯听医生的话。周去找林谈，说毛主席和党都希望林彪听医生的劝。林就听了周的话。我们想请周对江青劝说一下。

结果我们打错如意算盘。

黄打电话给周，秘书说周太忙，由周的妻子邓颖超同我们谈一次。我很少跟邓颖超接触，但我十分尊敬她。我们都叫她“邓大姐”能见到她本人是件光荣的事。我做了发言的准备，想好好地将江青不好伺候的情况向邓说明一下。

我和黄树则去见了邓，将工作的困难向邓说了。并且说，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还提出，只采取医疗护理的办法，解决不了江青的“病”，必须有人劝她，要自己克制一些，要认识她的一些症状，不是真的病，是脱离工作，脱离社会生活的结果。

邓听我讲完以后说：“我们的主席，在革命中度过一生。他老人家全家有八位，都为革命牺牲了，真是为了革命，做出了无比的贡献。我们对主席的感情不能是空的。主席现在只有了一位夫人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有病，我们只有照顾好才对得起主席。再有天大的困难，也要照顾好。”

“主席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为革命牺牲了。第二位夫人贺子珍有了精神病。现在你们又说，江青同志精神也不正常，这使我们伤心极了。你不应该这么说。这对主席

太不公平了。党给你们的责任，就是照顾好江青同志，治疗好，护理好。你们没有权力提出那些问题。”

当时我与黄树则哑口无言，只能唯唯诺诺，碰了一头灰回去。我想邓这一手可真厉害。她这么一讲，表明了周与她二人，对毛是无限热爱和忠心赤诚的。

我这才了解周恩来其实只是毛的“奴隶”，对毛绝对服从。邓颖超是老干部，经历记多，深谙世故，是泥鳅样人物，让人无论如何也抓不住任何把柄，说她与周有不利于毛和江的言论。我认为她这番话是事先与周商量好才说出来的。她知道我说的是实情，但她得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训诫我们一顿。

而我们在她口中，变成不负责任、不尽职的人，而且不识大局，对毛感情不深。

将来传出去，传到毛的耳朵里，使毛更能信任周和她。可这就把我们给卖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倒使我们自己成了“被告”。

我走回来，默无一言。我原本极为尊敬“邓大姐”的，现在知道她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是个标准的邀宠固位的人物。我深深感到厌恶。

我只好亲自向毛报告江青的事。这是正值赫鲁晓夫秘密访问中国。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日抵达，毛从北戴河坐专列回北京见他。我在车上跟毛说了江青的病情。

毛诧异说：“你们不是已经有了一个报告了吗？又有什么新问题？”

我说：“不是新问题，是检查结果和医生们的意见，没有全部写进报告中去，所以再向主席报告。”

毛放下了烟，说：“你讲清楚吧。”

我说：“医生们共同的意见是，江青同志没有什么病，主要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这时我将大家签名写的一张简单诊断书，交给了毛。

毛看了这张纸条，问我，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说明什么问题。

我说：“医生们的意见是，江青同志对人对事，往往以主观臆想代替客观实际，而又出尔反尔。医生们主张，尽早劝江青同志要多接触一些社会生活，多接触一些人，这样对她可能会好些。”

毛听了以后，默然不语。

我又说：“别人向我谈到林彪同志的病，他的病医生很难治。可是只要周总理去看他，向他说明是主席建议的一些话，他都听得进去。可是江青同志对谁的话都不听，这太难办了。甚至主席的话，她也不听。”

毛垂下眼睛，吸了几口烟。

然后毛慢慢说：“江青还是听党的话的。”毛说“党”时，指的是他自己。

“这点要看清楚，你们的意思是，江青有思想问题的了。她这个人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可是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惶惶不可终日，是怕我不要她了。我同她说，不会的。护士们照顾她，替我谢谢她们。江青的话不能全听。她待人苛刻，告诉护士们，必要时可以顶她一下嘛。”

我说：“不要说顶了，全心全力伺候她，她还不满意，还骂人。要顶就更坏了。稍不顺心，她说护士服务态度不好，有雇佣观念。再顶顶，岂不成了反革命。”

毛笑起来，说：“我一直同江青讲，百日床前无孝子，自己生病就是要诸事将就一些。”

我说：“护士们哪里指望她将就，只希望不要责骂，不要太苛求了。”

毛沉顿了一下说：“那好，替我谢谢护士他们。我看江青的病现在是过了坳了，也替我谢谢这些医生们。”“过了坳”这句话我不太懂，后来才明白，毛是说江的病已经度过谷底，在逐渐好起来。

我又告诉毛，医生不希望将这些看法告诉她本人，也希望毛不要讲出医生的真心话。

毛点点头说：“江青会听党的话。我可以不告诉你你讲的这些。以后有什么难办的事，可以直接向她提，也可以告诉我。不过不要背后议论。不能既不告诉她，又不告诉我。向别人去将，这样就不好了。”

我说：“我没有背后议论过，更没有向别人讲。正是工作上有了困难，才向你说。”我不能跟毛坦白和邓颖超谈过，毛会觉得我是在背后议论江青。我已学到了教训，不能再找别人谈，犯另一个错误。

在北京我将毛的这些话，告诉了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和史书翰及黄树则。他们都替我担心。他们说，一旦毛将我的话告诉了江青，不但我的日子不好过，而且会牵连到保健局、卫生部和这些专家们。他们劝我，不能再讲了，适可而止就行了。

当时的结果是，护士们的工作仍然困难，但无论如何江青待它们比前一段要好些了。那个夏天在北戴河还是遣走了几位护士。

我也开始怀疑江青不满意的不单是护士们没有好好伺候，她担心的是毛对年轻女人的偏爱。这一段时间由北京医院找来不少护士，供江青挑选。江青说，见生人太紧张，最好在晚舞会上的轻松环境中，将护士带给她看。

这些年轻、天真的护士自然也要介绍给毛。她们都将毛看成是一位伟大的领袖，自然对毛表现十分热爱和亲近。一次一位护士给江青送药服用时，这位护士先向毛打了招呼，握了毛的手，问毛好以后，才将药送给江，江很不高兴。我向江解释，我认为这事很自然，年轻人对领袖当然会流露出仰慕和热爱的心情。

江青睁大眼睛说：“大夫，你可太不了解主席了。他这个人在爱情上可不专一。他是一个精神与肉体可以分离的人。有些女的也愿意往上搭。你明白吗？你对这些护士要进行道德教育，要他们注意礼貌。注意与首长接近时，应该有男女有别的概念。你可不能放任不管哪。”

我那时不了解江青的这番话。我对毛的性放纵仍不甚知情，而且毛跟我明说过，江青主要是怕毛抛弃她。我不知道在某些方面，江青看得要比我透彻。

毛的性欲极强，而且性和爱可以是全然无关的两回事。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赫鲁晓夫秘密访问北京。毛却刻意羞辱了这位曾在苏联盛大款待他的贵宾。

毛是穿着游泳裤，在中南海游泳池见的赫鲁晓夫。他让赫下池泡水。赫接受时，我们都大吃一惊。赫换上在游泳池旁换衣间内存放的游泳裤，跳进水里。赫不会游泳，套了一个救生圈。我、几个卫士和翻译，都在游泳池旁。

表面上，毛和赫仍客气的。但他俩的谈话并不顺利。赫的回忆录中，对毛为这种无礼的接待方法，表示了极端的厌恶（1）。赫原本预定停留一个礼拜，但来三天后就回苏联了。他和毛唯一的一次谈话就是在游泳池里的那次。毛此举，就像古代帝王般将赫鲁晓夫视做前来称臣纳贡的蛮吏。在我们回北戴河的专列上，毛对我说，那叫使赫“如坐针毡”。

在北京到北戴河的回程火车上，他对我说：“苏联就是想控制中国，想捆住我们的手脚，真是痴人说梦。要和我们建立联合舰队及长波电台，这简直是妄想。赫鲁晓夫为了同美国拉关系，把我们当成他的筹码，让我们答应不用武力进攻台湾。还说我们搞公社，太快了。我说，搞长波电台，可以，你把材料及技术交给我们，搞联合舰队，可以，你把船交来，我们有司令员，有舰长。你让我们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难道我们自己家里的事，你也要管吗？至于公社，我们试一试，也不可以吗？我最后同他说，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就照我说的办法搞。台湾问题，最近就可以有眉目。公社我们试定了。他碰了一鼻子灰，走了。”

这时全世界都不知道中苏关系出现裂痕。

在北戴河期间，毛仍气愤异常，他又跟我说过：“赫鲁晓夫自不量力。你不是要同美国拉关系吗？好，我们放



炮庆祝。这些炮弹留久了，就没有用处了，不放炮庆祝一下，做什么用？美国最好插手进来，在福建什么地方放一颗原子弹，炸死一两千万人。看你赫鲁晓夫怎么说。”

接下来他又讲：“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糊涂，不明白这个道理，还准备渡过台湾。我是不赞成打过去，放在那里，是一个压力，内部就会团结。这个压力一没有了，内部就会闹起来。”

毛的谈话使我大惑不解。我对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一无所知，对台湾更是所知甚少。我甚至期望在毛提出台湾问题之后，海峡可以和谈。我没听说要建立“人民公社”的事。中国才刚过渡到高级农村生产合作社。几周后，我才明了毛谈到台湾问题的用意。没几天后，我便去参观了刚成立不久的“人民公社”。

在八月初某天凌晨三点多钟，我正在睡得很熟，毛的卫士把我叫醒。毛睡不着，叫我一同读英文，这时读的是恩格斯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英译本。

读三个多小时以后，毛已经是疲倦了。毛从未认真学习英文是为了放松和找机会闲谈。他说：“我们吃饭吧，我晚饭还没有吃哪。”

他问我看没有看最近的一期《内部参考》——这是由新华社内部参考编辑部，将国内不公布的新闻编辑成不定期的册子，供高级干部参阅。《内部参考》常提出一些政治上很敏感的消息，以供中央领导参考。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期，《内部参考》也对党提出严厉批评。有时一般报纸不准刊出的社会性案件，全登在《内部参考》上。

但一九五七年夏季“反右运动”开始以来，《内部参考》上的基调已大为调整。

一些忠实报导中国社会黑暗面的记者被打成右派、撤职，有些人甚至下放边远地区。

一九五八年初，在整风和毛“鼓足干劲”口号的强大压力下，《内部参考》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赞扬起农村的快速进步。

我说没有看到。

他顺手将一本《内部参考》拿给我，说：“你等下带去看一看。其中有一篇报导，河南省查牙山成立了人民公社。这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人民公社这名字好，把合作社组织起来，成立人民公社。这可以成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桥梁。可是不知道这公社内部是怎么组织法，怎么样进行工作，怎么进行核算，核算放在哪一级呢？又怎么样进行分配，怎么样体现劳武结合。”

一九五八年春夏之际，由于全民办水利运动造成农村强劳动力短缺，因此有些省份开始将农村合作并成更大的组织。起初这些新组织没有一定的名称。毛仍未亲自巡查这种农村组织，政治局也未行核准，但毛赞成大型农村组织的设立，并觉得“人民公社”这名字响亮。

毛接着说：“我想让你去看看，到那里去住上一个月。把情况了解清楚，回来向我讲一讲。你现在手头上还有什么事吗？”

原本长夏无事，我找了一本英文《老年与老年学》看，开始摘译其中一些章节。

每完成一章，送给毛看。开始他读得很有兴味，可是看过“细胞的衰老变化”一节后，他认为写的不好。我仍继续翻译工作，一来闲着也是闲着，二来这工作不会使我和医学界过于脱节。

我说：“我现在摘译的那本老年学还没有弄完。不过先放下，等以后再说。”

毛说：“那本书没有多大的意思，以后弄也可以。人民公社是件大事，关于到我们国家的体制。这会是一件震

动世界的大事了。常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人间哪得几回闻’，可以改成‘自古盘古开天地，人间不得一回闻’。你去看看，你一个人去不行，组织几个人一起去。叫叶子龙、黄树则也去。这时他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了。几年以来，他已经习惯在饭前服安眠药，这样可以使入睡快些。这次也一样，吃这安眠药后，休息了一会儿，开始吃饭了。饭中，他已经有些蒙胧，说话口齿讷讷不清。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要我去，还是随便说说，所以我立即问他：“我现在就去同他们商量一下，准备两三天就走。”

毛说：“有什么好商量的，拍屁股就走嘛。你同他们说，今天做准备，明天就走。”说着说，他已经沉沉入睡了。

这时已经早上八点多钟了，这事如不立刻安排好，毛醒后无法向他回话。我先去找了叶子龙，告诉他毛的意见。

叶听了后，满脸不高兴说：“主席真是没有事找事。我们去看了顶个屁用。”

我一听，叶不想去。我说：“主席说的可是很认真，不能不去。”

叶皱着眉说：“你先告诉黄树则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个办法，怎么去。明天走是不行的，最少也要过几天再走。”

我急了，又说：“这可不行，他让我们走，而且说到那里住一个月，要改变可不好了。”

叶无可奈何说：“他也不想想，人家手上有些事，不交代清楚，怎么能走。”

我想多说无益，于是向他说：“今天他起床以后，你最好风见他，同他当面再谈定。”

然后我去找了黄树则，将毛的意见又同黄说了一遍。

黄欣然道：“主席要我们去，我们就去。我给崔义田副部长打个电话，让史书翰局长接上我的工作。”

弄完已经近午饭的时候了，我赶回来，匆匆去见江青。

我走进江青的卧室。她半身躺在床上，倚着靠垫。面前是一个小食架，正吃着烤面包、黄油和杏仁酪。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我将主席要我们去查牙山，看看人民公社的事情，告诉她。又说：“主席是吃过安眠药以后，吃饭中间说的，当时他已经是睡意甚浓的了。我没有同他多谈。我不知道他是随便说说，还是决定下来叫我们去。”

她说：“这可不是随便说的。等主席起床以后，我去同他谈谈。”

我回到十号楼里，洗漱了一遍。这时田家英来了，他问我：“何事匆匆？”我将毛的话说了一遍。田是毛的政治秘书之一，在各省都有熟识的省委书记提供他“人民公社”的内幕消息。他很怀疑“人民公社”的用处。

田说：“一九五六年搞高级社时，农民就已经怨声载道，说搞初级社的好处还没有发挥出来，现在又急着搞高级社。今年又说要过渡到人民公社。这可真是急功近利。南宁会议及成都会议以后，各省都在抢风头，都在想方设法闹新花招，一劲猛干。今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后，更加热闹了，都想当促进派，怕当观潮派，更怕当秋后算帐派。你去了后，可以亲身体验一下。”

我吃过午饭后，整理了衣物，已经疲乏不堪。我预备睡一下以后，再商量明天出发到查牙山。想不到躺下去就昏昏沉沉，一睡就睡到了下午七点多钟。还是值班卫士来将我叫醒。他说：“主席六点钟就叫你，我说大夫正在睡觉。主席说再让他睡一个小时。”

我连忙起来，赶到毛的卧室。

毛说：“叶子龙、江青都同我谈过。我现在想我自己去看看。不看看怎么行。新生事物嘛。我们过两天就走。你再去准备一下要带的东西。我们这次要多走一些地方。你一个人如果来不及，可以带个助手。”

我问毛，要不要黄树则一去。毛沉吟一下，说：“你去够了。黄树则不要去了。你去告诉他，他解放了。”

当时毛仍在服用壮阳用的人参药，需要一位会传统煎药方法的护士。我便建议随同毛去莫斯科的吴旭君也一起走。

我正要走，毛又叫住我，说：“这次外出，你不要去讲，免得张扬。”（2）他还同我说：“搞医务工作的，只知道看病治病，这可不行。不能脱离社会，特别当社会在大变革时，应该去观察这种变革带给人们的影响。你们学医的，大约很重视个体的人，不大重视群体的人。”

过了一刻他又说：“这就是哲学上的个性与共性的问题。这次我们一起去看看吧。看看到底是什么个样子。看看我们这个个体，怎么样生活在这个共同体里面。”

两天后我们便乘毛的专列由北戴河出发。这就是往后再一再宣传，一再吹嘘的“毛主席走遍全国”的开始。

专列往南疾驶。我感觉到这次出巡与往不同。“大跃进”已如火如荼地展开。

## 注释：

(1) 赫鲁晓夫对一九五八年这次来访的描述可见前引书 KhrushchevRemembers , pp. 258-261。

(2) 无疑地，毛指的是 JackBelden 于一九四九年初版的 ChinaShakestheWorld (一九七〇年再版，London : MinthlyReviewPress )。

(3) 毛虽嘱咐李医生这次是秘密出巡，但因为无数的记者和官员尾随，此次出行迅速被炒成媒体大事。

一九五八年的夏天，真是风调雨顺，几乎每天夜里一阵大雨，次日白天却是万里无云的晴天。今年秋收可望是中国历史上最丰饶的一次秋收。全中国都笼罩在一片欢腾、极其乐观的高昂情绪中。

首站是河北省。农村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联合起来，形成以村或乡为政治与经济合一的整体，有的称自己是共产主义社，有的称为黎明社，又有叫曙光农业生产社，还有的叫红旗集体农庄，名称上真是五花八门。

第二站转往河南。由河南省书记吴芝圃陪同。吴个头不高、微胖，人很坦诚。

我们一行人开了十辆车（包括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武装警卫、河南书记室的工作干部、新华社特派记者团，以及河南党报记者），浩浩荡荡驶过黄沙泥土路。八月天气灼热，虽然戴上大草帽，仍然晒得挥汗成雨。一路上每停一个地方，都准备了加香水的凉水毛巾，给我们擦汗。河南省委、省公安厅带了两卡车的冰西瓜随行。毛吃得不多。我们一路上又晒又热，口渴难熬，免不得大吃一顿了。

毛兴高采烈，与农民处得非常自在。去兰考县途中，毛下车看棉田，不想踩了一脚大粪。卫士要给他换鞋，他不换。要用纸擦干净，他又不让擦，说：“大粪是肥料，是好东西，擦它做什么！”这鞋一直穿到夜里，卫士等他休息以后，才给洗刷干净。

农田里农作物长得极好，到处都是在劳动的农民。黄河以北的农村妇女，一般不在农田劳动，但是现在农田里遍地都是穿红着绿的妇女和女孩子们和男人一起劳动着。

沿途下车看了各地的人民公社，到兰考去看了黄河故道。在这里，毛打算游黄河。他派警卫局警卫科孙勇，先去探路下水。孙回来后向毛报告，河水太浅，都是黄泥汤，最深的地方不过只有半人多高，膝盖以下陷在黄泥里，游不成。毛这才打消了游黄河的念头。

八月六日到了河南省新乡县。仍由河南省书记吴芝圃陪同，乘车到了七里屯。

棉花田里棉花挂起“七里屯人民公社”的大字。毛笑着说：“这个名字好。巴黎公社是法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是我们农民建立政经合一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好。”

三天后，毛在山东又重复了“人民公社好”这几个字，站在毛身边的新华社记者记录下来，这五个字马上便出现在全国报纸的头版上。于是“人民公社好”成了“圣旨纶音”。从此以后，人民公社的名就定了下来，而且不脛而走。全国农村都正式以人民公社的名字，人民公社便成了高级生产合作社以后，农村基层政权和经济组织形式。

从一个人民公社走到另一个人民公社，景象都是一片欢欣鼓舞。历史正在被创造者。中国农村起了史无前例的大变化。中国终于找到从贫穷迈向富裕的道路。中国农民就要站起来了。我当年也支持人民公社的成立。我深信毛主席不会错，“人民公社好”。

回北戴河后，毛十分兴奋。毛相信中国粮食生产问题已得到解决，人民现在有吃不完的粮食。

正在北戴河会议中间，八月二十三日，开始了“金门炮战”。从一开始，毛就将“炮打金门”当作成一个筹码，以便于左右“中苏”、“中美”、“苏美”之间的关系。

毛以为蒋介石会要求美国在福建投下原子弹。如果美国真投了原子弹，毛也不会在乎。他炮打金门只为观察美



国的反应。这是一场赌博，一场游戏。所以“金门炮战”就象开玩笑一样，突然开始，连续四十四天以后，在十月六日又突然宣布停火一周。十二日再宣布停火二周，但没有到一个星期，因杜勒斯访台，恢复炮击。

十月二十五日以后改成“单日炮击，双日停火”，最后完全停止。

毛不但并不想进攻台湾，即使金门和马祖也并不意味着武力占取。他对我说：“金门和马祖是我们和台湾联合起来的两个点，没有这两个点，台湾可就同我们没有联系了。一个人不都是有双只手吗？金门、马祖就是我们的两只手，用来拉住台湾，不让它跑掉。这两个小岛，又是个指挥棒，你看怪不怪，可以用它指挥赫鲁晓夫和艾森豪明白他们无法束缚中国，国共和谈遥遥无期。这场可怕的游戏幸好未曾引发全球原子弹大战，或是赔上数亿中国百姓的无辜生灵。

毛的攻势仍未结束。一九五八年秋天，毛坐飞机、专列、游艇等来回巡查各地农村的大变革。每到一处，群众的欢迎程度就更加热烈。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上午，毛乘飞机去武汉。前国民党将军、高级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安徽省第一书记曾希圣在武汉和毛会合。毛邀张治中一同巡查，张极其高兴。张治中很会说话，谈到当时的“大好”形势，张捧毛说：“这可真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哪。”

曾希圣也善于投毛所好。原籍安徽的张治中，便和曾一起鼓动毛到安徽去看看。于是由武汉乘船至合肥。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往后轰动一时的“后院炼刚”——原来是在省委机关院子里，搭起砖头和泥叠起四五米高的“土高炉”“土法炼钢”。土高炉里的炉火通红。炼钢的原料是些铁锅、铁铲之类的家庭用的铁器，甚至还有门上的铁荷叶、铁门把。

毛问炼出钢没有。曾希圣拿了一块钢锭给毛看，说这不是炼钢来了。这简直是使人不容怀疑的了。

毛号召全国用多快好省的炼钢方法在十五年后超过英国的钢年产量。何必化费巨资兴建钢铁厂呢？于是“土法炼钢”的空想诞生了。

这个景象很使我迷惘。炼钢的原料原本就是家用品，炼出钢锭后，再做成家用品。炼钢做钢，炼刀做刀，岂不荒谬？全安徽省的土高炉里所看到的，都是一坏坏粗糙不堪的钢锭。

在离开前，曾希圣向毛提出请毛乘坐敞篷车，让群众夹道欢送。理由是让更多的安徽人亲眼见到毛。一九

四九年夏天，北京市民夹道欢迎毛进城解放后，毛乘过敞篷车。一九五六年九月印尼总统苏卡诺来访时，毛又乘过敞篷车一次。但往后就少再公开露面。毛每次至各省出巡视工时，工人都经过政治过滤和控制。毛一向只接见党高级领导人及“民主人士”。就连他每年两次在天安门上露面，广场上的群众也经过挑选。毛不原在群众前公开露面，不只是为了安全上的顾虑，也怕被别人说在搞个人崇拜。

毛相信领导本身的形象，就是鼓舞广大群众的革命意志的无限力量。而毛也需要一种“群众自觉”的行动方式，公开为他歌功颂德。极会察言观色的张治中替毛解决了这道难题。张说：“我这次有幸跟随您出来，一路上觉得您有着一种戒心。”毛问张什么戒心。

张说：“您好像随时随地怕造成个人崇拜，在这上面有戒心。”毛注意听着。

张说：“您是中国的列宁，不是中国的史达林。您和列宁一样，领导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胜利。可是列宁在革命胜利后八年就去世了。您身体这么健康，全国人民都认为您可以继续领导三、四十年，直到进入共产主义大道。这是中国人民最大的幸运，这又和列宁不同。”

“您不是中国的史达林，史达林继列宁之后，开始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到极点，越到晚年越厉害，以致犯了严重错误。而您一直坚持民主领导的作风，强调‘群众路线’，没有丝毫独断专行，怎么会有个人崇拜呢？”

“今天中国建设成就这么伟大，人民生活改善这么快，人民自然流露真诚热烈的爱心情，这是人民热爱自己的伟大领袖，快不是个人崇拜。”

张这番说词大获毛心，毛同意公开让合肥市民夹道欢迎。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合肥总共有三十几万市民夹道欢送毛主席，个个竞相亲眼争睹这位伟大人物。毛由招待所到火车站乘敞篷车所到之处。我怀疑这些“自觉”的群众也是经过筛选的。他们穿着彩衣，颈上挂着花圈。敞篷车所到之处，一片花海，载歌载舞，群众欢叫着“毛主席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大跃进万岁”的口号。曾希圣事前做了万全的准备，安徽省公安厅负责挑选群众。这些群众是真心爱戴毛主席，一见到毛，欣喜若狂。

毛开始思考供给制的可行性。毛说：“粮食太多了，吃不完怎么办？实行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

从红军时代到一九五四年，中共内部实行供给制。一九五四年以后，改成干部资金制。毛决定重新实施干部供给制，叫中央办公厅先实行，而由一组的工作人员开始。

这时上海市市委的《理论月刊》发表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一篇歌颂供给制的文章。毛对这篇投合心意的文章，大加赞赏。要张春桥立即赶来，与我们同车去北京。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春桥，后来他的权势在文革时迅速提升，文革后被打成“四人帮”。张这人对人冷漠，不易接近。我从第一次见张就不喜欢他。他大力提倡重新实施干部供给制会使我的生计陷入窘境。我有很大的疑虑。我与娴从澳大利亚转香港到北京后，在两年的供给制中，早将从国外带回来的储蓄用光了。这时再改回供给制，我们便没有钱可以垫成家用。

我们必须赡养我的母亲、婶母、舅母、表妹、我们的两个孩子和娴的父母。我改成供给制后，只靠娴一个人的薪金，怎么养得活她们呢？她们都是老的老了，小的还小，没有自己谋生的能力，这怎么办呢？

一组里也没有人愿意实施供给制。同行的叶子龙忐忑不安，叶的薪金极高，自然不愿改制。叶子龙说：“大夫，你有困难可以告诉毛主席。”

我想，叶的心里明明也不同意，他无非想让我说出不同意的话。如果毛决定不改了，他可以依然拿薪金。如果毛决定要改，我在众人心目中自然就是落后分子了。

我明白，毛意图用供给制代替薪金制，是认真想这么办，并不是随便说说就了。毛之让大家讨论，是想先听听我们这些人的意见，认为这些人会讲真心话，这样可以有助於他做出决定。

我走进毛的车厢内，毛正躺在床上看书。他看见我进来，说：“大夫，有什么新闻？”

我说：“我们讨论了改供给制问题。”

毛说：“怎么样，有什么高见？”

我说：“改成供给制，我有点困难不好办。”我接着说明了我家里的情况，并且说，如果改了的话，这些人不好办。

毛说：“如果城市里，按街道都成立了公社，大家在公社中参加一定的劳动，不就解决了吗？孩子放在托儿所，公家给钱。”

我说：“还有难处。我舅母年纪轻一些，她可以这么办。可是我母亲和婶母年纪都老了，有病，身体很不好，没有劳动力，公社怎么会让她们白吃饭？孩子都要国家养，公家出的钱，恐怕比发工资还要多。”

毛点头道：“这倒是要算一笔细帐。要算一算公社集体劳动，能挣多少钱，能不能养活公社里的这么多的人。老人和小孩太多，恐怕就困难了。我已经向中央打了招呼。

也让一些秀才，就是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讨论这些问题。如果目前实行不成，那麽等以後再说。”

我走出来，一名卫士正在门外听着。他看到我，伸出了右手大拇指，悄悄说：“大夫，还行啊，有希望不改了。”

这事显示毛此时仍很理智，“大跃进”的欢腾景象使他振奋激动，但他对土高炉炼钢仍是有怀疑的。他曾一再估量，能不能在十五年以内，钢产量超过英国。他纳闷说：“如果小高炉可产钢的话，为什麽还要那麽大的高炉呢？难道外国人都是笨蛋？”

田家英对这一点保有谨慎的理智。

田说：“张春桥的这篇文章，造成的影响坏透了。这完全是一篇哗众取宠的文章。当权的党不能随心所欲，乱提口号，不看我们国家生产落后，不看有几亿人要吃饭要穿衣。好像餐风饮露，赤身裸体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真是信口开河。我们党一贯实事求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说假话，瞎吹牛，还不以为耻的事。这完全违背了党的好传统。现在有的省已经吹到粮食亩产上万斤，简直是沽名钓誉，无耻之尤。不过也难说，‘楚王好细腰，宫人皆饿死。’上有好焉者，下必甚焉。”

田家英这一席话，显然指出毛的好大喜功，只能听阿谀奉承的话。在这种压力下，一级压一级，不久又出了亩产两万、叁万斤的报告。

大众心理行为学专家曾对中国一九五八年夏末的狂热做出解释。他们认为，中国陷入一场由毛所领导的群众歇斯底里热潮，到最后毛也成了这神话的牺牲者。到一九五八年八月中，毛自己也把那些口号当成真理，一心盲进。回到中南海以后，机要室西楼的后面，警卫局在万圣殿，都建起了小高炉。入夜后，片片火光，照得中海红光闪闪。

少数清醒的人只能闷声不响。每个人都争相跳上这班开往乌托邦的列车，全力向黑暗疾驶而去。原本“反冒进”的人也跟着毛指挥棒起舞。没有人知道他们心里真正在想什麼。每个人都困在这场集体歇斯底里症的乌托邦。

过了十月一日以後，又乘火车南下。沿铁路两旁的景象，与一个月以前又不相同了。沿线两边的农田里，挤满了忙着农活的男男女女。仔细看的时候，男女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或是须发斑白的老年人。女人则是穿戴得花花绿绿，像是过节过年一样。原来农村中壮年男子都派去炼钢铁，或上山搬运砂石，以堆砌土高炉，或去兴水坝、水库去了。

田野的景观也大变。过去毛睡眠时，停车的地方，都在飞机场，或叉路僻静处。现在不行了，这些地方，都有不少人，运料运炭，熙熙攘攘，在大炼钢铁。

入夜，处处小高炉燃起红红的火花，照亮了半边天。

在沿途又看了不少人民公社，这时的粮食产量，据各公社负责人的汇报，已经高得使人咋舌。到人民公社的食堂去看，都挂上彩旗，设立报喜台，公社内的生产队，生产小队，有了新的更高的产量时，敲锣打鼓来报喜。

此时毛原先的怀疑和理智已经全部消失无踪。他欢欣鼓舞，真的相信那些不可置信的高粮食产量。他的兴奋也感染了我。我虽然很纳闷中国的农村怎能在一夕之间有这麼大的转变？但事实摆在眼前，不由得我不信。只有在某些时刻，我脑海中会闪过一丝理性的怀疑。

晚间我同王敬先及林克坐在餐车上，一面看着远远近近燃至天际的熊熊火光，一面在闲聊。我说，我很奇怪，为什麼会一下子有这麼多人，这麼多的土高炉，农田产量这麼高。

林克说：“我听田家英讲在铁路沿线这么搞，是做给主席看的。省委让铁路沿线各县将周围几十里的人，聚在铁路两边，连夜赶造土高炉。让妇女穿红着绿下到田里。在湖北省王任重让主席看的那亩稻田，是将别处十几亩的稻子连根挤插在这一亩里。所以王任重说，可以站上去几十个人，都倒不了。一根挤一根，挤得紧紧的怎么倒得了。王还吹农民会想办法，为了让稻子通风，在田埂上装了电扇，吹风。整个中国成了一个大舞台，主席还真相信这一套。一亩水田，何能产出五万甚至十万、廿万斤稻谷？土高炉无非将家家户户有用的铁器，炼成一堆堆废铁而已。曾希圣在安徽给我们看的那块铁锭是炼铁厂里拿来的。”

我狐疑地说：“报纸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林说：“自从反右运动，人民日报受了主席的批评，改组以后，他们哪里还敢登真能反映情况的消息？上面怎么讲，他们怎么登。”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名为党中央报纸的人民日报，刊登的消息，并不是真实的情况。

王敬先站起来说：“不要聊了，快去睡觉去吧。”然后他悄悄对我说“说话留神哪，让人抓住辫子就不好了。”

我当时并不相信林克。我也被大跃进的美好幻象所迷惑。我仍然相信党、毛主席和人民日报。但这些谈话令我很不平静。如果林克说的是真话，为什么没有人跟毛主席反映呢？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于敬先、林克，甚至周恩来呢？如果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些事实，为什么没有人敢于明言？难道毛心里就没有底吗？

但我从和毛的话中，我觉得，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之际，毛泽东最担心的并不是农钢产量的浮夸高指标问题，而是某些领导人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建立后，粮产量激增，有些人以为这下共产主义的理想



社会指日可待。毛对中国农民显示的冲天干劲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认为这现象是好的，但不能急於进入共产主义。

毛对我说：“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是不能否定的。当然，现在的人民公社是新产生出来的，需要充实和整顿，让它健全起来。有的领导人心是好的，太急了，想立刻进入共产主义。这些问题应该解决。可是现在有人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抱着怀疑态度，甚至个别人还暗中反对，我看这些人真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在南郑州召开中央扩大会议，也就是所谓第一次郑州会议。郑州会议期间，仍然充满了乐观欢乐的情绪。会上毛强调，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不能急於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并指出，农民太辛苦了，各级干部要注意群众的生活。

几个月前，毛才大力鞭策各级干部起来行动，现在他又指示他们放慢脚步。此时毛虽然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想暗暗改正错误，他对粮产量的浮夸高指标和後院炼钢未置一词。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於郑州期间，毛私生活周围的帘幕慢慢在我眼前卷起。大跃进时期，毛的私生活变得肆无忌惮。我在旁逐渐看得明白。毛一向住在火车上，开会时下车去，会後在宾馆吃饭，休息一下，参加舞会。专列上有年轻护士成了毛的女朋友，公然和毛在舞会中出双入对，晚上也在毛的车厢内。

这时在朝鲜的最後一批志愿军回国。二十军的文工团来到郑州。她们每晚参加舞会伴舞。这些姑娘来自朝鲜前线，一旦见到毛，真是如醉如痴，将毛围在中间，都争着要毛同她们跳舞。文工团员中，有一位与毛跳得非常合拍。毛同她跳时，步步前进後退、前倾後仰、左旋右转，跳得

大家目瞪口呆。毛是笑逐颜开，越跳越带劲，常常从晚上九点钟，跳到凌晨二时。

郑州会议後，乘专列到武汉，二十军文工团和那位护士也都去了。毛情绪高昂。王任重仍在火车沿途布置了挤插的稻米、熊熊的土高炉和戴绿的妇女。每个人都像快乐地唱着歌似的。

江南水田多。有些田内，水深及腰，妇女们都在田内屈身劳动。水稻深耕也是大跃进的新生事物之一。自大跃进後，因长期浸泡在深水田中，妇女普遍患了妇科感染病。

毛接着在武汉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毛仍住东湖客舍的甲所。湖北首屈一指的杨厨师每顿饭都表演一道名菜。我们的房间内都摆上水果、烟和茶叶。每夜必备丰盛消夜。并且摆上茅台酒，尽醉方休。大家都开玩笑说，共产主义也不过如此吧。

在武满期间，毛说大家离家时日不少了，每人放假一星期回北京城去看看家里。那是前後服侍毛廿二年间，我唯一的假期。因此有段会议期间我不在武汉。

武汉会议会期为十一月廿八日到十二月十日，这时大跃进引起的混乱後果已逐渐明显。毛因而在会中批评各级干部的急於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中国仍未准备好过度到共产主义，资金制维持不变。人民的冲天干劲是好事，但该实事求是。毛明确指出，经济指标过高，并压低来年指标。毛正式辞退国家主席，退居二线。六中全会决议同意毛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届国家主席的建议。

但毛辞去国家主席後仍是最高领袖。武汉会中的批评使毛成为及时制止错误的先知先觉者。虽然如此，武汉仍洋溢着一片过於乐观、干劲十足的气氛。毛对人民公社的热忱仍然未有稍减。

毛批评苏联说：“苏联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是：农业机械化以后，再搞集体化，成立集体农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先公社化以后，再机械化呢？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好，一大二公，一大是不搞小田块，打破埂垄，连成大片农田。二公是农田是公社大家的，产出的粮食，给公家纳公粮以外，其余可以由公社留下公积部分，然后公平分配。这不是非常好的事吗？这就解决了有的富起来，有的穷下去的问题。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要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当时在干部中议论最多的，是左好哪，还是右好？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还是左一点的好。因为左的好处在于可以不断受到毛的表扬。如果因为左而把事办坏，也不过是好心办了坏事，不会丢官，受处分。右的结果可就大不相同了，一落到右字上，轻的罢官，重的家破人亡。

我在武汉会议结束前由北京赶回武汉。武汉会议结束的那一天，湖北省省委为了表示庆贺，在东湖客舍宴请毛、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以及各中央局的书记。大家兴致极高，真是高谈阔论，议古说今。

王任重第一个拍马屁。王任重说：“这份《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可以说是当今的共产宣言。只有在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才能在东方出现这一轮红日。”

周恩来接着说：“伯达同志讲，马克思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可以提高到‘一天等于廿年’的速度。我们今天不是已经达到了吗？”

柯庆施说：“所以不能够这样说，超不过马克思。我们现在无论是理论上，或是实践上，不是早已超过了马克思？”

大家哄然说：“苏联搞了这麼几十年，还没有找到向更高层社会发展的门径，我们短短十年不到，就由主席指

明前进的道路。”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在席间，但他们在批评苏联一事中，未发表意见。毛平时不喝酒，有客人时，也只是稍喝一点。这天他的兴致高，喝了两杯，满脸通红，然後说：“总理的酒量好，请总理喝。”

我第一个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乾杯。”周大声说：“是应该庆祝一下。”大家依序到他面前敬酒。周的酒量极大，脸也从不发红。当天晚上，周喝得大醉，半夜鼻子出血。

第二天清早，罗瑞卿将我叫去。他一见到我，就说：“你们这是怎麼搞的，怎麼能向总理这样子敬酒。就是大家高兴，也应该有节制。你是医生，也不注意。以後不许這麼干。”我心里暗自嘀咕我没有做错，我只是听从毛的指挥。

一九五八年的秋收，创下中国史上最高纪录。随即在十二月中全国严重缺粮。

就在中国领导们纷纷向毛主席的伟大领导致敬这当口，酝酿了数月之久的灾难终於露出狰狞的面孔。

在王任重的隆重款待下，身在武汉的我们对粮食吃紧程度毫无所觉。在武汉会议当中放假的那几天里，我诧异地发现中南海里没有肉和油，米和蔬菜也很少见，情况很不对劲。

灾难正在蔓延。大部分的稻谷搁置田间无人收割。农村中年轻力壮的男人被调去土法炼钢及兴修水力。老人、女人和小孩无法负担收割这项体力繁重的工作。这年确是大丰收，可是未收割的谷子慢慢在田里腐烂。

我那时不知道，中国正蹒跚行在崩溃边缘。党领导和各省第一书记只想得到毛的表扬，亿万农民的福祉被置之脑後。上级领导相信了各省所报的浮夸生产指标。但一亩地怎麼可能生产一、两万吨的稻米呢？等到纳税交粮的时

候，按上报的产量交粮，产量本来没有这么多，为了上交粮凑足上报数，只好减少农民自留口粮，甚至颗粒不留，农民大量饿死。吹得越高的省，死人越多。

更讽刺的是，上交粮里有许多是进口米。当时中国对苏联外债高筑，许多米都运去苏联还债了。

人民公社为了减少损失和保留口粮，编出天灾连连做藉口，原本的高粮产数被压低。这些人民公社得以按下了一些上交粮，否则国家也会发给它们一些赈济粮。

後炼钢也吹得越来越神。农民的做钣锅、农具都交出去炼钢了。到後来，真是夜不闭户，因为门上的铁锁、铁荷叶全都拆走。没有了锅，铲，饭也无法煮。

炼钢的煤不够，农民的木桌、木椅、木床都交出来。炼出来的钢全都是一些没有用的铁锭。毛说中国还未准备好进入共产主义。但一些荒谬的共产天堂已经实现了。私有制完全废除，农民所有的财产完全喂进了土高炉饥饿的火口中。

毛仍处於兴奋状态中。我想，即使到此时，他仍对即将来临的大灾难一无所知。我有不详的预感。但我不敢直言。毛听进那些漫天大谎使我忧心忡忡。没有人告诉真话。田家英是毛的内宫中对大跃进的内幕知道得最详尽的秀才。我想应该由他来向毛戳破这些假象。

但田家英此时在四川调查研究。胡乔木在安徽，陈伯达在福建。毛信任他们。

他会相信他们回来时所做的真实报告。

一些隐隐约约影射毛的批评慢慢浮出表面。

毛仍对湖南省第一省委书记周小舟未能种两季稻而余怒未消。周却是第一个挺身批评毛的地方首长。我们在十二月中旬离开武汉，只在长沙稍做停留。周趁此时请毛观赏了湘剧《生死牌》。周告诉毛，国防部长彭德怀十一月在长沙看了这出海瑞的戏，非常喜欢。周请毛看这个戏，我想是别有用意。周将自己比做一心为民的忠臣海瑞，毛则是那个深居宫内的嘉靖皇帝。

就算毛看出了戏中对他暗涉的批评，他当时也毫无表示。毛表示极喜欢生死牌，并欣赏海瑞这个角色。那晚在长沙，他叫林克给他找来有关海瑞事迹的部分明史。几个月后，毛提倡党领导们学习海瑞精神。

到了广州，江青已在。毛仍神采飞扬的谈着粮食生产高指标。毛因此想读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着的政治经济学。他想将苏联的经济组织和中国实行的新经济结构加以比较，便将陈伯达、田家英、邓力群召来广州，同他一起读这本书。

田家英将四川的调查情况一五一十的如实上报。我没有和田谈过，只听说四川人民在闹饥荒。这一向，毛晚间也时常找我闲谈。但是也看得出，他总有些不放心。

大跃进正闹得欢腾。他也怀疑粮食生产的产量，有没有那么高。他常说：“我就不相信，粮食亩产能到万斤。”对于土高炉炼钢，他更是疑虑重重。他说：“这种高炉炼出来的钢，能用吗？”

由此可见，这时的毛，开始怀疑大跃进的真实性和他自以为站在人民群众的一边，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

求。毛也经常说：“对人民的热情行动，不能泼冷水。对他们只能引导，不能强迫。”

十二月廿六日，毛六十五岁生日，陶铸请毛与大家一起吃一次饭。毛同我们说：“年纪轻的时候，愿意过生日。过一次生日，表示大一岁，又成熟些了。到年纪大了，不愿意过生日。过一次生日，表示少了一年，更接近死了。”於是说：“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我们乘车到城里省委迎宾馆。筵席很丰盛，又精致。大家都是酒足饭饱了。回来以后，我因为头晕，立刻睡了。

到半夜李银桥突然将我叫醒，说：“主席立刻要回北京。”

原来当夜江青半夜睡醒，叫护士拿水和安眠药来。江叫了半天，又到值班室去找，仍未见到护士。江青疑心大起，闯进毛的卧室，当场抓到，因此大吵了起来。

李银桥还跟我说了下面这件事。这事也引起江青很大的不快。追查很久，也是造成这次在广州与毛吵架的原因之一。

毛与他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在湖南长沙结婚后，曾用过一位保母。后来杨被捕处死。毛上了井冈山，保母回到乡下，结婚后生一女。

一九五七年保母女儿初中毕业后，想进入中南音专专科学校。毛寄给她叁百元。让她自己投考。这事让湖南省省委知道了，安排那位年轻女孩进了中南音乐专科学校。

一九五八年初那位年轻女孩又写信给毛。毛要她在寒假时来北京。二月她到北京。二月叁日及十一日两次，毛将她接到中南海住所相见。同年十二月九日，毛又在武昌洪山宾馆，见了那位女孩。这次给江青发现了。江既怀疑毛与保母关系，又怀疑毛与保母女儿之间的关系。当晚争吵时，江青也把这件事拿出来闹。那晚我起来后，立即整

顿物品，因为事先毫无准备，一时手忙脚乱。直到天蒙蒙发亮，才将所有的药品用具，装箱完毕，这时通知立刻上火车。

毛立刻离开武汉回到北京。江青未同行。

江青很快便为那晚的争吵后悔。毛回到北京后不久，她写来了一封道歉信，上面引述一句西游记里的话。追寻真理的三藏在盛怒中将悟空休回水帘洞，悟空备感凄惨，对三藏说：“身在水帘洞，心逐取经僧。”毛为江青引用了这话大为高兴。毛是现代三藏，身负实现共产主义真理的艰难任务。与追求共产主义的崎岖道路相较，毛与护士和女友之间的区区小事，实在不足挂齿。



一九九五年初北京人心惶惶。街道上宣传，要成立人民公社，大家都吃食堂，要大家把锅交出去炼钢。这可闹得大家都慌了神，怕把自己的东西交给人民公社，於是将家具、衣物都拿出去卖，免得白白充公。一时间，街上成了旧货市场。

自大跃进开始，我老家的经济情况便每下愈况。我很少在家，也帮不上忙。一九五八年就在东奔西跑中过去了。回北京时，我非常高兴。

母亲最不放心的是，街道上正在办人民公社。母亲有高血压病，又照看两个孙子，她很累，得不到休息。经常头晕，吃不下饭。她问我她入社以後，谁管孩子的生活呢？毛说可以把孩子们送去国家经营的托儿所。

罗道让提出，在中南海内，再给我两间房，将母亲和孩子搬进来，这样便於照看。我很犹豫，我不希望我的家人卷入宫闱倾轧中。何况北京老家仍是我的避风港，真要都搬进来，就完全没有周转的余地了，我也不可能一辈子在中南海工作，一旦离开，就连退路都没有了。一再踌躇之後，我们想，我们不可能久住中南海内，因此决定仍照原样不动。

毛听到了北京的情况，立刻决定只在农村开展人民公社运动，城市里面不搞。

但我家的房子还是被充了公。我们的老屋有叁个院子，有叁十多间房间。母亲带着孩子住在中院北房五间，前院及後院的房子已被强令低价出租。一九五八、五九年冬交之际，居民委员会和房屋管理局及公安局派出所，都来向母亲讲，除庄母亲所住的中院北房五间以外，全部公

私合营，也就是将产权交给公家，每月由公家给极少数补偿费。公家将房出租，嫻讲，母亲很不愿意这么办。

很急，让我想想办法。

我同嫻讲，这个事情毫无办法，现在不搞供给制，已算万幸，否则连她们的生活问题，也解决不了。留下五间房，就凑合着住吧，如果一间不留，我们也没有法子。何况警卫局早已经提出，在中南海再给我两间房，将母亲孩子搬进来住。如果去讲，又会提出这个办法，说来说去只能接受居民委员会的安排。

我回到家里，安慰了母亲。告诉她，有五间房住，已经很不错了。不是有的人一间住房都没有吗？母亲希望我多回家看看，我说我还不行，嫻可以多回来看看。

一九五八到五九年，全国严重缺粮，我母亲的处境更为困难。那时嫻和我都在中南海公共食堂吃饭。没有肉，配粮减少，但还可勉强凑合。中南海会是全中国最后一块被饥荒波及的土地。

我母亲那时已年近七十，如想买到米和油，就得经跑粮、跑油店，要去排队。

我母亲带着小孩，很累，身体越来越差，血压经常很高。我们只好跟邻居商量，请他们帮我母亲排队买粮。

田家英说我对全国情况不清楚，现在全国都发生粮食紧张。这还只是开始，也不知何时才能解除危机。我原来以为在这种日渐吃紧的情况下，毛会在北京住一阵子。没料到我又想错了。

在一月下旬一天，我早起后，骑车到北京医院，参加一项会诊。病人是胡乔木，他有十二指肠溃疡，因大出血做了胃大部十二指肠切除术，定期复查。

我走到病房，主治医生开始报告情况。这时医务办公室的一位主任，跑来找我，说一组来电话要我立刻回去。

我匆忙离开病房，骑车刚到医院大门，正好与李银桥迎头碰上。他坐一辆车停在医院门口。他说：“主席立刻动身到东北去。找你有一个多小时了。只等你一个人了。赶快回去。”说完他先坐车走了。

我骑车赶回中南海，已是一身大汗。这时毛已乘车到机场去了。所有的备用药箱和医疗用具箱，都由护士长收拾好，先运走了。只有一位卫士等我。他看见我後，立刻拉我上车。他说：“我们快走吧，主席走了怕有十分钟了。”我说：“我只穿一身夹衣，到东北怎麼成？我回去换厚衣服。”卫士说：“怕来不及了，主席走时说，叫你快去。”

我同卫士乘车赶到西郊机场。这时毛乘坐的一架飞机已经起飞有十几分钟了。

第二架机在停机坪上，早已发动。我上了飞机，舱内只有我同卫士两人。

数小时後，我在辽宁沈阳下机。在冬季东北的酷寒中，我只穿了夹衣，连毛衣都没有带。当夜住沈阳交际处，据说这里在伪满时，是满洲银行。毛住在二楼西半边，我们住东半边。室内暖气的温度很高。但我一出交际处大门，就冻得手足发麻。毛看到我的畏缩冷栗的样子，不禁笑着说：“你是不是在大跃进中，把衣服都卖掉了，还是入了公社？”好在毛只在东北待了五天。

毛这次出巡煤、钢铁产量最大的东北，是为了了解钢铁的制造方法，以及看看土法炼钢究竟可不可行。毛原本希望用分散全国钢铁产量的策略来激发农民的创造干劲和削减中层经济官僚日益膨胀的权势。毛仍未解决如果土法炼钢可行，为何先进国家要盖大钢铁厂的疑问。

再来高炉的燃料问题也盘旋在他脑中。在中国乡村，农民早为炼钢把树林砍伐殆尽，现在连门和家具都劈下当柴火。东北有现代化的大炼钢厂，煤的产量和质量都很好。因此毛想同时看看炼钢厂和煤矿的情况。我们参观了鞍山钢铁厂和抚顺露天煤矿。

毛的东北之行使他看清了真相。只有用优质煤做燃料的大炼钢厂才能生产出高品质的钢铁。但毛并未下令停止后院炼钢。炼钢中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以及土高炉炼出的成堆无用的钢，都不是他关心的重点。毛仍不想压制广大人民的狂热。

我们自东北回北京做短暂停留，随即转往天津、济南，南下南京、上海、再抵杭州。这次外出，毛带了罗瑞卿与杨尚昆随行。目的也是要他们受教育。两人真是喜出过望。自从一九五六年在游泳问题及警卫工作上对罗严厉批评，甚至要将罗调离公安部以后，罗学乖了。再也不多管中南海警卫局的事，更不敢对毛的警卫工作多加过问。这两年多以来，罗默默勤练游泳，心情沉重，唯恐毛再算老帐。

对杨尚昆，则因政秘室的所谓黑旗事件以后，撤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即中直党委。杨被免去中直常务书记，无异於给予了党内处分，此後杨给人的印象是，说说笑笑，对于大事一贯不发表个人见解。这些年来，杨虽身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可从来没有机会单独见到毛，谈谈话。这次毛带他一起出巡，自然是否极泰来，受宠若惊了。

一路行来，沿途参观学校、工厂、公社。每到一处，当地党、政、军的领导人也对毛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此时全国经济紧张，但毛的个人崇拜之风反而日渐高张。老百姓认为粮食紧张是地方首长未尽到责任，不是毛政策上的错误。

只要毛主席来视察，马上就会情况大好。天子被奸臣蒙蔽的观念，早已在中国传统中，形成根深柢固、牢不可破的定理。

一路南行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而抵杭州，处处都是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之声，不绝於耳。

此外，毛带罗和杨出来，也是要他俩看看毛受到群众狂热欢迎的程度。

一次在行车中，杨尚昆、罗瑞卿及我们，在一起闲谈。杨又提起毛在各地参观和谈话中，即席讲了不少有关工业和农业生产，特别是人民公社的问题。例如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及不能无代价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等等这么多的讲话，都同政府的现行政策有关系。书记处不知道这些话，无法按毛的意思形成文字指示下达。

这时，毛路经各省市的党委，纷纷根据毛的谈话要点，拟出一些改进建议，向中央请示。刘少奇、邓小平不知道毛讲了些什么，没有办法作出决定。杨因此想找个法子，将谈话记录下来。这样中央可以根据毛的谈话，按照毛的意图下达指示。

叶子龙跟我说，杨让他去向毛请示，以后外出能不能带个速记员，毛不同意说：“这是推卸责任，拿我作挡箭牌。”毛通常用讲话方式表达他的意思，他清楚他的话所具备的力量。毛说“人民公社好”。全中国农村便纷纷建立人民公社。但他并不想将他的话拟成政策，如此一来，他得担负的责任太大。

这下就得背着毛安装窃听装置了。困难的是，既然得背着毛安装，一般的收音喇叭太大，装上去，毛会发现。於是决定由公安部的专门管理各种先进侦察技术设备的十二局负责技术设备在专列上安装窃听装备。整个安装实在巧妙，小喇叭放在灯罩、花盆等的里面，一点都不会暴

露出来。还在毛专列的餐车、会客室及卧车内装收音小喇叭。连接的录音机也很轻巧，放在隔壁车厢内，丝毫不露马脚。又从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调一个姓刘的人，守门负责秘密录音。自此以后，毛每次外出，都有刘作为工作人员之一随行。刘奉命不得在毛的面前露面，免得被毛看到来了一个生人，查问出来，露了馅。这就要求刘做一个“黑人”，随时躲开毛的眼睛。后来叶子龙告诉我，毛常去的一些招待所住地也给装上了窃听装置。

叶子龙向我们一组的人交代，这是中央的决定，谁也不许向毛透露。叶同我们说：“这可是中央决定，谁要是向主席讲了有刘这人和录音这事，中央查问起来，谁讲的谁承担责任，不要怪我没有打招呼。”我们只有如金人叁缄其口。

谁也不愿意引火烧身，将自己牵连进去。何况这是党的命令，我们只得服从。

我们哪知后来竟牵连出那么大一场灾难呢？文化大革命中，安装窃听器成了一件滔天罪行，也成了江青多次公开声明公安部门专政，专到我们头上来了的罪行之一。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到四月五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仍是整顿人民公社，决定各级无偿调拨的劳动力、粮食等等，都要算清帐目，给予赔偿。通过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其中经济指标大幅压低。一九五八年的浮夸指标，在一九五九年降订得较为切合实际。毛最大的恐惧不是粮食短缺、高指标，或是土法炼钢浪费人力物力。毛深恐大跃进所激发的群众创造力会因此消沉下来。即使毛知道中国正面临大饥荒，他也从未透露一二。我完全被蒙在鼓里，虽然先前有田家英的警告，我仍以为粮食吃紧只是暂时现象，是低层干部报告错误所造成的结果。我在毛的内宫中浑然不觉百姓疾苦。

上海会议期间，毛的专列停在龙华，毛住在车上没有住进招待所。原因是，一方面在上海市内，柯庆施给准备的住处“哈同花园”，毛不喜欢，另外一方面，根本的原因在於，毛与专车上的铁道部专列局的随车护士仍打得火热，所以开会下车，晚舞会後回到火车上。晚会设在茂名路锦江饭店对面的锦江俱乐部。毛那时对自己的私生活已无所顾忌，这位护士公开和他在锦江俱乐部出双入对。柯庆施替毛引见了许多上海有名的女演员和歌唱家。但这些女人年龄太大，见识广阔。毛喜欢的是年轻单纯、容易控制的年轻女孩。後来柯庆施从叶子龙那了解毛这项癖好，便每晚都安排了文工团女孩子的表演。

在锦江饭店内，南楼和北楼之间的新建小礼堂放映电影，和演地方戏曲。一九五八年毛外出巡视，路经长沙时，便看过有关海瑞的湘剧。这次柯庆施则将湖南湘剧团调至上海再次演出。

当天夜里，毛对我说：“海瑞被人称为南包公，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海瑞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他还把这句话，写到给嘉靖皇帝的上疏里。嘉靖看了十分生气，将海瑞关进班房。想杀海瑞，可是把海瑞的奏文看了一遍，放下。又看一遍，放下。连看叁遍，然後说‘海瑞还是赤心为国的’。没有杀海瑞。有一天，管班房的牢头给海瑞端来酒和菜，海瑞吃了，以为大约是要杀头了。一问牢头，牢头说，恭喜你啦，嘉靖皇帝死了。海瑞大哭一顿，将吃下的东西，全吐出来了。可见海瑞对嘉靖是忠心耿耿。”

毛在会议中，提倡要有海瑞精神。特别叫中央办公厅将海瑞传印出，发给参加会议的人，并且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的这种精神，毛还说，要找几个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此後由人民日报开始，许多报刊杂志都不断登载了有关海瑞的文章，又在上海和北京出现了宣传海瑞的戏剧。海瑞一下子变成全国的英雄。

如前所言，在一九五九年，因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系列过左的措施，伴随而来的困难已经出现。同时我也察觉到，广泛存在着说假话、说大话、搞浮夸的现象。毛同我谈到海瑞时说过：“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海瑞这个人物，竟然成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斗彭德怀的引燃点。我往後常就这两件事思考海瑞对毛的意义。毛是个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

毛身为皇帝，认为自己绝对不会错。至於政策和决策上的错误，是下面的人说假话，上面的人被蒙骗欺瞒的结果。

我看毛之推崇海瑞精神，自有毛自己的策略。毛说海瑞这个人，‘刚直不阿，直言敢谏’。海瑞甚至为了国家大



义，身首异处也在所不惜，可见护主之心甚切。海瑞近乎‘死谏’的行为，益发和嘉靖身边的奸臣形成对比。

毛一再号召讲真话。即使在今日，我对共产党的梦想早已全然幻灭之时，我仍认为如果毛在大跃进初期便完全了解真相，他可能会及时阻止那场大灾难。

但问题在於毛认为现代海瑞应该讲真话。批评式的谏言或是意欲夺权、心怀不轨的那些高级领导所说的话，无法让毛接纳。只有一心为民、毫无野心的人才会计真话。但这种人很少能在政坛上爬至高位。

毛熟读中国历史，深晓宫廷政争中的夺权倾轧。毛认为他的朝廷自然也不例外。他本人更是玩弄权术的高手。所以即使有的人向毛禀奏了客观的事实也是忠言逆耳，因为他不相信在朝为官的人能扮演刚直不阿、无私无欲的海瑞。因此毛这次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和先前一九五七年他用所谓引蛇出洞法，鼓励知识分子批评党、替共产党整风一样，都是他惯用的策略。只有英明的毛皇帝能决定谁是真正的海瑞，谁只是藉机夺权的造反分子。

但毛的逻辑也有不通之处。毛崇拜一般中国人民厌恶的秦始皇、殷纣王和隋炀帝。大部分读海瑞传的人视嘉靖皇帝是密处深宫，二叁十年不见朝臣的昏庸皇帝。许多毛的亲密战友自认为比得上海瑞对嘉靖的忠心。可是毛认为那些身居高位的中央和地方领导是嘉靖，下面的人应该向这些人提意见。他自己是与下面深深相连的英明领袖。

我在这里所需指出的是，毛所说，上面压下面，下面不得不说假话，毛口中所谓的上面，是其他领导干部。但其实真正的最大的上面，是毛自己。从一九五六年以後，由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毛的一系列过左、过急的批评和讲话，都不难看到这点。毛所提倡的海瑞精神也好，直言敢谏也好，是用来对付中央和地方

其他人，并非提倡别人用来对付自己。彭德怀和周小舟这种现代海瑞便是误读了海瑞故事。现代的海瑞们下场凄惨，毛对他们毫不留情。

四月十八日到廿八日召开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前毛赶回北京。会上由朱德建议选举了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一九五九年後刘少奇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在毛退居二线刘出任国家主席前，大家都叫他少奇同志。现在他突然被称为刘主席。主席这职位本身就代表极大权力。刘对此头衔也十分在意，逐渐扩展势力控制中央日常事务，有时没有先请示毛便执行工作。因此可以说，毛要确立自己为中国唯一的主席的斗争就在此时展开，直到刘被批斗，取消“国家主席”才告结束。

我们在北京只待了一个月，五月下旬又乘专列南下。

沿途景观大变，不再有火焰冲天的後院土高炉，也没有穿红着绿的农村妇女。

农田一片荒芜。眼下不见任何农作物和农民的迹象。王任重所辖的武汉非常吃紧。我们仍住在东湖客舍。消夜食品用的油炸花生米和酱牛肉不见了，早餐时的生煎包子也没有了。招待所里，不但没有香烟卖，而且也没有火柴。偶尔有鱼可吃，蔬菜罕见。可见库底都被挖空了。

才几个月前，王任重还炫耀湖北农田亩产量为一万、二万斤的稻谷，现在却闹了饥荒。王任重说是天灾导致饥荒。但湖北天气一九五八年至五九年真可说是风调雨顺，真正原因是年轻力壮的男人都派去炼钢和修水利，田里的稻子没有人收割，放着烂掉。而收割的一小部分稻谷全缴给了北京。

到了长沙，住到省委的蓉园招待所。我们的住房内仍然摆上了中华牌香烟和碧螺春茶叶。不过烟和茶都有些霉味。看来库存很久了。现在都挖了出来。这时湖南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是比湖北好，我们一如以往，仍旧可以吃上湖南腊肉，安东鸡。

周小舟可注意到了湖南和湖北的差异。一九五七年毛曾严厉批评这位湖南第一书记不学别人种二季稻。这次王任重也随同毛至长沙。有天罗瑞卿、王任重、周小舟一起闲谈时，我也在场。周小舟说：“去年湖北不是一直受表扬吗？说他们的工作做得好，说湖南就是不行，没有热火朝天的干劲。现在看吧，湖北到底怎么样？恐怕有霉味的烟、茶都没有。他们去年就把库底挖空了。我们湖南再差，还存了点库底。”

周小舟说这些话时，很气愤。我和罗瑞卿闷不作声。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也在场，讪讪地走开了。两省的街道也有明显不同。湖南仍有小食在卖。

毛决定回他的出生地韶山。他从一九二七年，也就是卅二年前，就没有再踏进韶山一步。

毛的韶山之行是他追寻真理的途径。他当时已不相信领导干部。纯朴的韶山不会搭起戏台来等他。毛对韶山太熟悉了，熟悉到他一眼可望穿任何欺骗的伎俩。韶山纯真的老乡会和毛讲真话。毛属于韶山。他信任他的乡人。

六月廿五日由长沙乘汽车出发，不过两个多小时到了湘潭。这一路都是砂土小石子铺的路。第一辆车子还吃不到土，第二辆车以后，就都在在灰砂滚滚中穿行。天气又热，车子中没有冷气装置，只能打开窗子，吹得全身都是灰土，到了湘潭几乎都成了泥人了。

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来迎接，这是毛和我第一次见到十六年后会成为毛的接班人的华。毛擦了擦脸，稍微休息一下，就对华说：“你乾你的事，不要陪我。韶山是我的老家，你是父母官，陪了去反而受约束。”

由湘潭到韶山，只不过四十几分钟。毛住到一个原属于基督教会，在一个小山丘上的房子内，我们住到山下的一所学校内。天气热而潮，蚊子很多，夜里睡觉时，只好罩上蚊帐，很难入睡。

第二天凌晨大约五点多钟，李银桥打来电话，叫我们立即到山丘上毛的住处，原来毛一夜未眠，这时正等我们，要出去散步。

我们赶到后，毛立即走出这个小的招待所，向后山踱过去。罗瑞卿、王任重、周小舟和一群警卫也不知道他要到什麼地方去，只好随后跟行。毛走到一处矮矮的松树环绕的土垄前，站定了，深深地鞠了叁个躬。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就是毛的父母的埋葬处了。警卫局派来随同外出的警卫科长沈同，十分灵活，他迅疾采来一把松柏枝，交给了毛。毛将这把松柏枝放在土垄上，又深深地鞠了叁个躬。我们立在毛的身后，也跟着叁鞠躬。

毛转过身来说：“这里原来有一个小石碑，大约年深日泯，泯没了。”罗瑞卿：“应该好好整修一下。”毛摇头说：“不必了，知道这块地方就可以了。”

从这里下山，顺路前行，走到“毛氏宗祠”前不远的地方，毛前瞻后顾，似乎在找什麼，可是没有找到。我正走在他的身旁。我问他在找什麼。他说：“这里原来有一个土地庙，我小的时候生病了，我母亲带我到这里跪拜，求过签，讨过香灰吃。”公社主任跟上来说道：“这个土地庙去年成立人民公社时给拆了。砖拿去砌了土高炉炼钢，木头当煤用，炼钢时烧掉了。”

毛摇摇头说：“可惜了。这个庙应该留下来。农民没有钱，生了病看不起医生，到庙里求求菩萨，讨点香灰吃，在精神上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人的精神没有寄托是不行的。”

毛转过头来，对我说：“你不要小看这香灰。我常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香灰能鼓舞精神，使人有战胜疾病的勇气。”他看到我在笑，正色说：“你不相信吧。你们当医生的，应该懂得精神作用的道理。”

我的微笑并非表示不赞成。身为医生，我相信精神状态对身体健康有巨大的影响。

下午毛去看了他的老屋。当时对毛的个人崇拜还没有到后来那种发疯的程度，因此这几间房子基本上仍保持典型泥墙草顶，农民房屋的原貌。院内廊下，排放着很完整的各种农耕用具。大门上悬挂一长方木匾，上书“毛泽东主席故居”。是一个小院落，共有八间房的住所。依这规模看来，毛的父亲是个富农。

毛的父亲曾耕种过的农田，农忙时，还要雇人来帮助干农活才够，已成为人民公社的一部分。门外树荫下是一方池塘，毛指着这池塘对我们说：“这就是我洗澡和饮牛的地方。毛回忆他的童年往事，他说：“我父亲可厉害啦，动不动就打人。有一次要打我，我跑出来，他追我，我围着池塘跑。他骂我不孝，我说”父于慈，子不孝“。我母

亲非常慈祥，很愿意帮邻舍。她常常同我弟弟一起搞“统一战线”对付我父亲。我父亲早死了，要是活到现在，至少要被搞成富农，受镇压。”

在韶山的时间安排很紧凑。毛看望了两处他的本族远房的居房。两处都只有儿童和妇女，男人们都炼钢铁、修水利去了。这两家一如一九五八年所见到的农户相同。做饭的锅没有了。甚至连灶也拆掉，据说灶土是极好的肥田土。

毛下午在韶山新建的青年水库游泳，问当地的居民这水库起不起作用。一位老人说，这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大搞水利建设时，公社党委书记下命令，叫大家挖出来的。结果匆忙建成，漏水，而且下大雨时，又存不住水，下面要受淹公社临时派人将男人们叫回来。晚间，毛在招待所的阳台上，摆了五桌饭，请他本族的人和一些老党员。饭中，交谈时，一些老人说，吃食堂大锅饭，吃不饱。因为饭一拿出来，年轻人一拥而上，等到年纪大的人挤上去，饭已被被装没有了。毛又问年轻人，食堂这办法怎么样。这些年轻人也说不好，因为饭少人多，虽然能挤上一碗半碗，但吃不饱。尤其大家抢着装饭，好多饭都落到地上，踩来踩去，都糟蹋了。

毛转过话题问大炼钢铁的土高炉怎么样。公社书记叫大上山找铁矿，大家找不到。又叫大家找煤矿，只找到几个煤质量很差的鸡窝矿，弄不到多少煤。公社书记说，周围都在炼，我们不能不炼，让大家将烧水做饭的铁锅、铁铲都献出来炼，门板也卸了，当煤烧。炼出来的都是些铁疙瘩，仍在那里。我们要烧开水，都没有锅用。公社的锅，煮饭都来不及，更不用说煮水了。

毛听着，默然不语。全场一片死寂。看样子大跃在湖南施行的效果并不佳。毛沉思了一会说：“食堂里吃不饱

饭，可以散了嘛。这个办法也太费粮食。修水利，不要处处搞水库，搞不好，成了害。炼钢炼不成，就不要要炼了。”

在全国，韶山人民公社可能是第一个解散了食堂，停止了挖水库和炼钢铁的所在。

此时我和毛才开始明了全国经济情况的衰退。毛的重返韶山之行将他自梦中唤醒。清醒地面对灾难降临的现实。回武汉时，毛已不像前一段那样意气风发，兴高采烈。但毛仍坚信大跃进的基本总路线是正确的，只需要做适当调整即可。毛不愿使群众的冲天干劲受到打击。他决定在武汉开一次会，提醒领导干部面对事实，而又不能使全国人民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照他的说法，“主要是宣传上的问题。要泼泼冷水，降降温。”

我们在六月廿八日抵达武汉。王任重建议，七月武汉太热，没有冷气设备，恐怕受不了。王又说，最好到青岛，海边凉快些。但是毛对青岛的印象不好，因为一九五七年夏天，他在青岛连续感冒有一个多月。

最后柯庆施建议，不如到武汉的下游庐山去开会。因为这时已经有些中央和省市的领导人到了武汉。就近去庐山，省时，省事。毛同意了。

党将举行庐山会议。



毛老家韶山的情况比中国其余各地要好得多。饥荒已笼罩中国。已不是个别地方有人饿死。安徽、河南，连偏远人稀的甘肃都有。一九五八年毛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开会，仍在大力推行十五年超过英国的空想之际，四川也是饿殍遍野。

我身处倍受保护的一组之中，从未亲见目睹饥荒的真实惨况。在随毛以及数位首长乘船而下的航途中，我听到了饥荒蔓延的惨事。是时去河南和四川调查六个月的田家英已经回来，也在船上。田家英、我、林克、周小舟和王敬先聚在甲板上，议论纷纷。

田家英描述了四川的饥荒情况，并说在北京，工业交通系统的意见最多，钢的生产指标太高，虽然年产量从两千万吨，逐渐下降一千叁百万吨，但是全民炼钢，六千多万人上山找矿这些一窝蜂的作法，并没有停止，尤其一九五九年仍在大跃进中，人力物力实在过於紧张。

田家英一语道破的又说：“我们党一向是提倡说真话，现在是假话满天飞，越说越离奇，可是越弄虚做假，越受表扬。说真话的，倒不断受批评。”毛是个杰出的哲学家，战士和政治家，但在经济上，毛完全一窍不通。这样就自然讲到毛的好大喜功，甚至脱离了毛自己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作风。

由此又讲到毛的私生活的放荡，一九五七年开始，继汪东兴之后管警卫工作的王敬先也凑上去讲了一些。

我听了真是无法置信。我知道大跃进后物资紧张，但不知饥荒正横扫全国，吃不饱的人数以千百万计。听到对毛的批评也大为惊骇。田家英行事向来谨慎，当时他说话的对象即使是跟我们，也已坦白到危险的地步。我更是对

王敬先说的那些放荡丑事毫不佑情。王的责任是保护毛主席，在朋友闲谈间，实在不该泄露毛的私生活细节。林克仍对毛在“黑旗事件”保他一事心存感激，因此没有吭声。我则一直保持沉默。

就在这些人闲扯的时候，柯庆施、王任重、以及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走了过来。柯笑着问，这么热闹，谈些什么。田家英说：“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李井泉立刻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饿死人？”王任重接着又说：“人们这么热火朝天地干，这倒是历代没有的。”柯庆施说：“现在有人就是看小不看大，抓住点缺点，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真是主席说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因此在到庐山之前，就在长江的航船上，已经可以看出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一方面，凡是大跃进以来积极按照毛的意思，往下压任务，往上报成绩的人，都不容许任何人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参面红旗有批评意见。属于这类人的，大抵都是省市第一书记，比如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之流，因为他们在大跃进中，跟毛跟得最紧，干得最欢。另外一种像是像罗瑞卿这种并不负责生产建设的中共官员，自大跃进以来罗一直跟毛巡视，对毛的意旨了解得清楚，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以后，受了不少毛的指评，甚至差一点下放，所以对参面红旗特别拥护。杨尚昆则刚在中央办公厅政秘室的黑旗事件犯了错误，自然不敢贸然说话了。另一方面，通常批评毛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以两位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工业交通系统的薄一波和主管经济发展李富春为代表。他们是中央负责工农业生产的领导人，经济生产计划指标太高，压在身上，自是苦不堪言。薄一波在大跃进初期，原本不赞成不符合现实的生产指标。但他后来一看苗头不对，只能顺着毛的意思讲。原来他让下面给他准备了一大堆意见，预备上庐山后发言。后来他召开了一次全国工交系统电话会

议，讲了一大通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之类的话，才上了山。薄其实对毛在经济上的冒进深感不安，早知后果不堪设想。但他不能向毛挑战，也不能说真话。薄和李从未公开批评大跃进。第二种是到了下面，认真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大跃进的灾害感受最深的人。这些人既不是主管经济的领导人，也不负责执行毛的伟大计划。他们是亲眼目睹农村混乱凋零的见证人。毛的政治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属于这第二种人。他们的责任是向毛报告真相。批评的人只敢在自己人里议论纷纷。我们在长江船上就是这个情况。但要和持有另一种意见、只会说大话的那批人说通，几乎是难如登天。看准了问题所在，挺身敢於披逆鳞的人，毕竟是寥若晨星。大部分的人不过是见风使舵罢了。知道实情的田家英和深知民害的周小舟也只敢在私下嘟嘟囔囔地批评毛及其大跃进，不敢直接向毛谏言。在船上时，只有田家英讲话直切。但是柯庆施、李井泉一开口，田也就不不再多说话了。七月一日凌晨船到九江。那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仍在接受改造中。汪东兴来接船。毛看到汪东兴就说：“省里如何？”汪说：“这两年我是按照主席的指示，多接触了群众，确实受教育。”毛讲：“人不能总是浮在上面，以后要立个规则，大家轮流要下去蹲点。”

上庐山的公路修得很好，途中下车休息两次，到山上只不过一个多小时。江西省组织了一个接待班子，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方志纯和副省长汪东兴负责。汪指派了一位姓胡的警卫处长，做毛的随身警卫。汪向胡交代了一些警卫工作方法和规定。胡找到王敬先，向王说明汪的布置和安排。

王敬先听了以后说：“汪东兴同志离开主席已经叁年多了，他那套是老黄历了。不能听他的。”胡此后真的不听汪的指挥，只按王敬先的布置去安排警卫工作，并且又

将王敬先的话传给了江西省公安厅和江西省委办公厅。这两地又把王的话告诉了汪东兴，由此汪东兴对王、胡二人非常不满。

毛的住处，据说原是蒋介石的别墅。是二层的小楼。我们住到邻近的另一小楼。山上确很凉快，在山下原来一身大汗，到山上甚至感到一丝凉意。空气很潮湿。在楼上打开两向相对的窗子，就可以看到片片白云，从这边窗口飘进来，在室内打个转，又从对面窗子飘出去。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的意见，於七月二日开始。毛的意思是，到了庐山，当神仙，不给出题目，大家漫谈，故称神仙会。毛列了十九个问题，让大家随便谈谈。毛参加了大会的开幕，讲了话。毛的讲话主要是，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人民群众的无穷尽的创造力不容忽视；过去一年中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大家可以议一议。

从毛的简短开幕词可以看出，毛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及总路线取得的成绩，对之不能有丝毫怀疑，也必须坚持不懈。对于缺点和问题，可以谈谈，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干，要向前看。

最后毛还说了几句笑话。他说：“有人说，你大跃进，亩产粮食多少多少，为什麼粮食又紧张起？为什麼女同志买不到发夹子？为什麼肥皂、火柴买不到？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着，鼓足劲去干，明天各种东西多了，就能够说清楚了。总的是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继毛的开幕词后，领导人分成小组讨论。为了便於人人发言，参加会的人按地区分组，一般分成：东北组，包括东北各省；华北组，包括华北各省，西北组、西南组、中南组、华东组均如是。

毛当天晚上告诉我，打算开个十天两个星期的会。因此我想毛当时的心情，很是轻松。毛去了含鄱口、仙人洞游玩，还讲了朱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的故事。

为会议准备的医疗室由江西医院院长王寿松主持。王是廿年代末、卅年代初的日本留学生。另有四名护士，是庐山疗养院的工作人员。王院长十分老实，这四名护士却十分灵活热情。每晚舞会她们都必到伴舞。除她们以外，又将江西歌舞团及农垦文工团调来伴舞。不过叁、四天光景，四名护士中一位护士，和文工团中一位演员，都同毛混得很熟了，也都分别在夜间被叫到毛的住室谈话。

会议十分顺利。毛玩得兴高采烈。他打电话到北戴河叫江青不用来了。毛准备会后去北戴河。

上山的第五天起，卫士长李银桥在工作人员开会安排工作时，提出林克和我这两位知识分子不好伺候。原因是我和林克住皂楼，没有装电话，毛有事叫我或林克时，卫士只好由毛住的楼跑到我们住处来通知我们，卫士嫌麻烦，提出我们最好就在毛住的楼下值班，等毛睡了以后再离开。

林克与我商量，这办法不妥。楼下房间少，我们难找到安静的房间，而且毛要会客，我们在楼下很不方便。而且我们如果到毛的楼下值班，又没有听到毛的吩咐，毛会发生误解，以为我们在探听他的隐私。因此我们断然拒绝，理由就是毛没有讲，我们只能听毛的吩咐。这就引起我、林克叁人与卫士组发生了争辩。

工作会议只好继续下去。结果越谈，扯得越远，这几年积累下来的隔阂意见都谈出来了。以至於天天要开会争论了。

一组内的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原本就存在着极大的歧见。工农干部以李银桥和卫士为代表，知识分子则为我和林克。

毛前一段对李锡吾厨师做的菜已经很少说不好吃，这几天来庐山后，却几乎每顿饭都发脾气，说做的不好。因此一组的工作会内容就更多了。李银桥是旧话重提，在会上一再说，饭菜不好吃，是大夫和护士的责任，没有改进伙房和厨师的工作质量。

我们正在争论不休的时候一天田家英来到我们住处闲谈。他了解到我们的近况以后说：“现在是大庐山会议，越开越紧。你们这小庐山会议也紧张起来。”

我原来认为，一路上虽然听了些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意见，但毛在会议开始时已经讲清了他的打算，不会有什麼周折了。我并没将会议放在心上。我听过田家英讲的情况以后，才回想起这一个多星期以来，毛每晚虽然仍然去舞会，但是平时却不大说话，看得出在不断地思索。胃口也不大好。

虽然会议没有说讨论什麼主题，随便讲讲，可是分组会中，不约而同在发牢骚，而且越讲越多，特别对压下面讲假话，有意见，人民公社饿死人也普遍出现了。每天各组有简报，由秘书处呈主席看，可是开会已经廿一天了，主席没有再讲话，也没有批示。

其实毛正在一旁默默观察领导人对大跃进的立场。批评毛的人估计错误。他们忘了毛在开幕词中的基调讲话：毛认为对大跃进的总路线不能有丝毫怀疑，缺点可以改正。他们将毛此时的沉默误视成默许。事实上毛的怒气正越来越高涨。毛常说他不搞阴谋，他搞阳谋。他认为他在基调讲话中就已经把讨论方向明明白白设定好了。这神仙会越开越不对劲了。毛的沉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七月十日又在山上的小礼堂内召开了全体会。毛讲了话。他强调了党内要团结，思想要一致。问题可以讨论清楚。总路线完全正确，一年来取得的成绩非常大，缺点是有，可是与成绩相比，“人不是有两只手吗？一共十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毛并指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要进入共产主义。毛说：“人民公社叫公社，按照现在公社的性质来说，可以是大合作社，或者仍然属于高级合作社范畴，这样就没有问题了。我们的问题是将人民公社看得太高，要降下来。”另外毛又强调，在进行一场全新的革命活动，要取得经验不付点学费是不成的。全国大炼钢，国家赔了廿多亿，可是全党全民学会了炼钢铁，这就是交学费练本领。

毛讲过话以后，也没等大家发言便离开会场。我随毛退场。但田家英后来告诉我，毛讲过话以后，大家就不再多说话了。毛这番话显然是个警告，要大家别再批评。

虽然如此，彭德怀仍争辩到底。七月十四日彭德怀交给毛一封长信，即所谓万言书。我起先虽不知信中内容，但知道毛心里不舒坦，那天毛彻夜未眠。

彭德怀的长信内容大致如下：第一部分是肯定一九五八大跃进年的成绩。他列举了工农业增长的统计数字，认为农村公社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经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间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的一次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得到锻炼和提高。是有失有得。

第二部分强调总结大跃进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浮夸风气普遍增长。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

错误，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最後信中提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於团结，不利於事业的。

彭的信相当切实中肯。可惜彭德怀过於天真了。彭是个军人，根本不懂得政治的肮脏。而且自井冈山时期起，到建国後这几十年间，毛与彭之间有不少次的意见冲突。毛一直认为彭有“反骨”。这封信正好激发了新仇旧恨。

七月十六日，毛穿着他件白绸长袍睡衣，光脚穿一双拖鞋，在住的楼内，召开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常委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穿戴整齐来参加这个会。彭真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虽不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也列席了会议。

邓小平此时仍在北京医院住院疗养，不能参加会议。在五一节後一天傍晚，邓在中南海北门的高干俱乐部打弹子，可能是地板太滑，跌倒，右股骨折。我送他到北京医院後，做了手术，打上钉子，上了石膏。

林彪当时尚未上山。他这阵子神经衰弱仍未痊愈，时常生病。我後来才知道林彪一年到头不洗澡；解大便不上厕所，在床上坐一个盆子，用棉被从头顶向下，将全身包盖起来。他怕风、怕水、怕冷，还怕庐山的白云。庐山气候的风吹雨打，对他会是种折磨。

毛重复讲到党外右派否定的一切。而在党内有些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

现在彭的这封信，集中代表了这方面的意见，印发下去，大家来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毛还讲，如果党搞分裂，那他就走。组织人民，另外立党。如果军队另搞一套，他可以另组红军。



於是会议转入讨论这封信。参加会议的人明白事态严重起来，发言都很谨慎。

只有少数人胆敢为彭仗义执言。七月十九日，总参谋长黄克诚和深知民苦的周小舟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信的内容总的讲是好的，表示同意，有些提法和用语可以斟酌。李锐也发表了意见，认为彭德怀提的问题尖锐，打破了沉重的压力局面。这叁个人发言都很简短。

到七月廿一日，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长篇发言，系统说明他对大跃进以来各种成绩和缺点的看法。张曾留学苏联，一九叁零年初期自苏返国後，曾是王明路线下所谓廿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但後来转而支持毛。他总是赞同毛的意见，为此曾受到别人的讥讽。他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他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後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张并且不点出名字说：“有的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说：“毛主席常讲，要敢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要怕杀头。这些话都很对，可是，谁不怕杀头，谁能不怕挨剐……这无异於指出，毛压制民主，那套话是说给别人听，毛不会照自己说的办。张闻天的发言还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的信中内容，不同意柯庆施等人对这封信的非难，又强调了：“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要领导上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於提意见，‘意见书’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

张闻天是在华东组中发的言，发言中不断受到柯庆施、曾希圣、舒同等人的打断和反驳。甚至指责、申斥。但要说张反毛是不对的，因为张事後说：“要做比干刚强

谏死，不做箕子佯狂自全。”这很明显表现出张的忠君爱国思想。

七月廿叁日召开全体会。会上毛作了发言，说：“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党外有右派，党内也有那么一批人。要劝劝党内这部份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的同志在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他们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不过还有卅公里，相当危险。”

毛又逐一批驳了彭信中指出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有失有得的论点。

毛讲话以后，气氛立刻十分紧张起来。对这封信，真是群起而攻之，集中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彭坐在会场的最後一排椅子上，沉默不语。在会议之前，彭德怀曾私下去和毛谈过一次话，并当面顶了起来。后来毛告诉我：“彭德怀见到我就说‘这封信是给你一个人的，你为什么印发给会议。’我说：‘你也没有告诉我，不要印发给全会啊。’两个人没有办法谈下去。”散会时，彭立刻走了出去，毛走出礼堂向山坡下行走，这时彭又向山坡上走过来。毛立住脚说：“彭老总，我们再谈谈。”

彭红着脸，右臂在头上一甩，大声说：“现在还有什么好谈的，不谈了。”

毛又说：“我们有不同的看法，还是可以交换意见嘛。”

彭匆匆走过，说：“现在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毛决定立即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全会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任何批整彭德怀的正式行动，都须经由它核准。

江青本来在北戴河等毛。她给毛打了长途电话以后，坐飞机赶到庐山。廿四日上午叶子龙、王敬先和我约了汪东兴乘车到了九江机场，将江接到山上。江神色冷峻，见

到我只问了一句：“主席身体好吗？”我将最近吃饭不大好的情况告诉了她。又说，经过汪东兴从南昌调来了厨师，做了清蒸圆鱼，这几天好多了。

江青这次前来庐山身负重大政治任务。过去江抵达一个地方，因神经衰弱，总是要睡个半天再起来。这次一反常态，庐山剑拔弩张的紧张情势，使她精神大振，百病全消。

江青到时，毛正酣睡未醒。江青先去看了林彪。林彪这时已到庐山，但怕冷没有住在山上，江与林谈了两个多小时才出来。

江立刻又乘车去看周恩来、邓颖超，然后又去看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及其夫人蔡畅。最后又到柯庆施住处去谈话。

江青从来没有正式插手过问政治。她和毛在延安结婚时，政治局曾决定，江青不能过问政治。江青的任何行动都需经毛的批准。这次毛竟然在庐山派出江青打头阵，表示毛的确陷入困境。江青到庐山的目的便是为毛披甲上阵。等到江回至住地已是傍晚了，毛已睡醒。

第二天上午江起床后，我去看她。江说：“我很不放心主席，急着赶来。现在看，主席的身体和精神都不错。你们可是要注意保护他。昨天晚上，李银桥告诉我，前幾天吃饭很不好。饮食营养可是医生的责任，不要漫不经心，应该抓紧伙房工作的改进。”

这很明显，江青一到，李银桥就抢先告了我一状。我是医生，不是营养师，找新厨师不在我的职责之内。我没有反驳，只是说：“昨天在九江已经告诉你了。现在吃饭还不错。”江点点头，又说：“大夫，你同李银桥他们不一样。你是个聪明人，又有知识，在政治上可要敏感，不能做糊涂人。在山上不要同外人来往，自己要注意。”

江是好意提醒我不要乱说话。她说的外人自然指的是与毛的意见相左的人，比如我的朋友田家英。

八月二日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毛讲了话。他说：“初上庐山，七月上半月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闲谈一顿，没有什麼着重点，没有紧张局势。後头才了解，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就是认为松松垮垮不过瘾，不得要领。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已经出现显着的迹象。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意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毛的这次讲话，实际上为全会定了调子，要全会批判彭的信，彭和其他几个人在会中的发言，并且要求他们几个人说清楚，他们在庐山会议前後暗地来往串通的情形。

彭一封切实中肯的信，透过毛的口，被夸大扭曲了。我逐渐了解毛一贯在讲述历史时的态度，他口中的历史总是偏离真相。

这就牵出我们从武汉东下，在船上的一些议论，特别是田家英所说的诸如饿死人，说假话等等言论，王敬先诬蔑毛的私生活问题等等。又因田家英到四川进行调查，李井泉攻田最猛。陈伯达到福建进行了调查，受到福建省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指责。胡乔木是在安徽调查过的。曾希圣批判胡乔木最凶。此外，柯庆施、王任重、陶铸、罗瑞卿都是发言最多，攻击最猛的人。罗在会上指着田家英说：“你小小年纪，懂得多少马列主义？也在胡说乱道。你有什麼资格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发言？”罗在一九五八年和毛一起走遍全国後，对毛更是忠心耿耿。

李锐在会上想再申明一下自己的看法，被周恩来制止。周说：“现在开的是中央委员会全会，你一不是中央委员，二不是候补中央委员，你没有资格在会上发言。”

连续几天的会，眼看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已经要被网罗到反党集团内了。

最後的法官是毛。八月十一日，毛又在会上讲话。他说：“彭德怀这几个人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党内的同盟者、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

毛接着又说：“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是党里的秀才，我们还要用他们。至于李锐，他不是秀才，不在此列之内。”毛的这几句话救了陈、胡、田。但是李锐却因之被打入反党集团。

一组的人员也受到波及。八月十二日罗瑞卿召集我们开会。会上狠狠的骂了我们一顿，说：“你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在主席身边工作，是党信任你们。你们不知自爱，听说你们之间很不团结，不是互助团结，而是互相推卸责任。再有，你王敬先，口无遮拦，胡言乱语，让反党分子利用。这些等回到北京再开会说清楚。”

此外，罗又定了一条规定：有关一组的事，有关毛的事，一律不许对外讲；不管对方有多高地位，不许同他们谈任何有关主席的情况，不许在一组之间议论。

我预感到当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还会有更的撤职和批斗。

八月十六日，毛又在一件发布中央全会内流传的文件上批示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就将彭等划到资产阶级范围内。

四天後中央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關於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庐山会议就此闭幕，随之就在全國开展起反右倾运动。有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了批判和处分。

八中全会的最後决议使我困惑而且忧心忡忡。彭德怀被扣上阶级异己、反党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帽子，这几乎将彭打成蒋帮分子。但我知道彭为人诚恳耿直，是党的赤诚分子。

我的政治处境非常安全。虽然田家英受到批判，船上那番议论时我也在场，但我始终保持沉默。我从未批评毛。因此深得毛的信任。我在政治上的谨慎和无知救了我一命。

庐山的气候潮而凉。上山以後，为了毛的饮食问题闹得心情很不愉快。我原来有十二指肠溃疡病，从八月初起，经常吐酸水、胃痛，而且大便变成黑色。我到医务室去查大便，是十二指肠溃疡出血了。我自己治疗，但吃了药仍毫无起色。庐山医务室王寿松院长要我到南昌去住院治疗。但这个时候庐山会议正开得紧张。我想不能离开，一是别人会误以为我出了什麼政治性问题，借口生病溜走了，二是在这紧张时刻，毛正在观察每一个人的态度和表现，他不会相信我有病，为看病下山，而会怀疑我怕别人揭发我对他有中不忠的问题，支持彭德怀，乘机走掉。所以我要食堂给我做了软饭和一些半流质饮食，开始治疗。但溃疡出血越形严重。黑色大便已经成了柏油样。等八中全会结束时，我已经瘦得不成人样，全身疲乏不堪。

八月廿日胡乔木来找我。他有点感冒，要我给他一些治感冒的药。他一看到我，立刻吃惊的说：“李大夫，你怎麼突然瘦了这麼多？脸色也难看得很？”

我将我八月初以来十二指肠溃疡病发作，告诉了他。他也有这个病，在五十年代中，因为大出血，到北京医院做了十二指肠和大部分胃切除手术。所以他对这个病很清楚。他问我为什么不快点去医院。我将我的顾虑告诉了他，并且说，如今还没有告诉毛。

胡立刻说：“这样可不行，不立刻好好治，会耽误的。我同主席去讲。”

过了半个多小时，胡来了。告诉我，毛已经同意我去治病，并且吩咐，要治就要好好治。回北京住院吧。胡还告诉我，他已经打电话给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要黄同北京联系好。叶子龙则替我安排好了每天从九江到北京对开的飞机。

我走到毛住的小楼，去和江青告别。我走进江的起居室，她正在看一些她自己的摄照片。

江注意端详了我一会，然後说：“大夫，你是瘦多了，脸上也难看。这一阵主席太忙，我也跟着紧张，没有注意到你有病。还是乔木同志注意到了。”

我说：“主席太忙。我不能再麻烦你们。你自己身体也不好。”

江稍微停顿一会，又说：“我刚才同主席商量的，很快就要下山了。我们还是一同走的好些。”江青此举其实是出於好意，表示毛仍信任我，他们愿意保护我。但我的病实在不能再拖。

我说：“我有病，同大家一起走，会给大家增加麻烦，不如立刻回北京好些。”

江说：“这也说的是。你走了，主席这里的事谁管呢？”

我说：“我将主席的事交给黄树则同志以後，明天就走。”

江说：“这么快？也好，早走可以早点治疗。”

我说：“那我就不去看主席了，是不是请你替我向主席告辞一下。”

江立刻说：“不，你还是去看主席一下，看看主席还有什么吩咐。”

我从江的房内出走上二楼到了毛的卧室。毛躺在床上，正在看明史。

我走到毛的床边，说：“主席。”

毛放下书，看到是我，说：“大夫，你来了。这一阵我太忙，找你们胡吹的少了。听乔木说你病了。”

我说：“十二指肠溃疡发作了，出血。”

毛问：“有多久了？”我又说了一遍发病的情况。

毛说：“还是回北京去治好一些，我也住不了几天了，你先走一步。要治就好好彻底治。”

毛又问我：“我这里谁来管呢？”我告诉他，可以由黄树则暂代。毛表示同意，然后说：“回到北京，好好治病，早点治好。记住，庐山的事不要去随便讲。一切要听组织上的安排。”

然后我去医务室找黄树则。我告诉他，毛已同意暂时由他代替我。黄表示很为难，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将这一时期毛的身体情况告诉了黄，又将有关毛的健康记录也交给了他。黄说，他打电话给史书翰和北京医院院计苏华。明天他们会去机场接我。

我回到住处后，打电话给罗瑞卿，向他报告了毛说的一些话。罗说：“我告诉汪东兴明天送你，你回北京后，要注意保密。生了病要好好治。在政治问题上可大意不得，千万谨慎小心。”在电话上，我向他告辞。



我又到杨尚昆的住地。杨见到我後说：“听说一组的小庐山会议也开得紧张，你累病了吧？”

杨又说：“一组啊，就是个大染缸，谁去了也都要染上点什麼。庐山的事你都知道了，到了北京，你去看看小平同志，他已经出院住在家里了。”我心想罗瑞卿吩咐得很清楚，我是任何人都不能去看，就连邓小平也不行。反右倾运动正要开始，不能自找麻烦，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被牵扯到。住进北京医院，哪里也不去，是最安全的了。

北京医院在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由德国人兴建。院内有全国最优秀的医生和设备。当时的北京医院不是平民医院，它是专供高级干部以及郭沫若这类民主人士医疗的特权医院。领导人常在北京医院疗他们的创伤，北京医院也成了躲避政治风暴的避风港。我正想藉此机会待在医院，并离开一组。我想找别的工作。

第二天一清早，江西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方志纯和汪东兴来了。给我一大筐水果放到车上。又交给我十斤有名的庐山特产云雾茶和十瓶四特酒。我说我的十二指肠溃疡病不能喝酒喝茶。方志纯说，可以带去送人，这都是江西特产。

车子一路婉转盘旋而下。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总算脱离开这一天到晚紧张得要死的地方了。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梦想随此会议破灭。毛在我心中的完美形象正在解体。我现在只想救我自己。心境放松後，胃痛减轻了不少。我在庐山时常辗转难眠，但飞机一起飞，我便安然坠入沉沉梦乡。等我睡醒时，飞机已降落到郊机场。我是这班飞机上唯一的乘客。

嫻来接我，史书翰和计苏华也来了。我在住院前先和嫻去看看母亲。

经济紧张後，老家的情况越来越拮据。近几个月母亲的身体很不好，得了高血压性心脏病。母亲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不单是因物资紧张，也是没有胃口。我这两年来东奔西跑，嫻也早出晚归。母亲带两个孩子太累，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让她轻松点。

回到家里，母亲对我的病很担心，看我瘦了这麼多，她哭了。我不想让她担心，加重她的病情，回家几分钟后就去北京医院住院。

经过各种检查，确诊是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内科主任吴洁是我的前辈；在成都华西坝我念医学院时，他已经在教课了。他主张不要做手术，我也不愿手术治疗。开始饮食及服药结合施治，住院起第叁天起，大便已经没有血了。

住在我隔壁的是位部长的夫人，非常健谈。她知道我在毛处工作，而且刚从庐山回来，就千方百计的套我的话。打听毛和江青的事，闹得我很烦，又无法应付。院长计苏华帮我换了病房。

我住院的第六天下午，嫻打电话到医院告诉我，母亲病重，让我立刻回去看看。我要了个车子赶回家中，母亲是心绞痛，已经垂危。我同嫻抬她到车上送入同仁医院救。

母亲的心肌梗死范围不大，急救比较及时而得当，很快脱离了病危状态。就在同仁医院病房住下。两个孩子暂时由我的舅母看管。好在同仁医院就在北京医院旁边，我常常去看她。嫻则每天傍晚先来看我，然後我们一同去同仁医院看母亲。

北京医院是我的庇护所。此时反右倾运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住院可以避过这个政治风头。在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布置下，长安大街上，每隔二、叁十米就横挂着红绸长幅，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我在卫生部工作的同父异母的大哥已被点名受批判，但是不知道详细情况。我大哥在五零年代初期的叁反运动中被降职处分，但仍任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长。我大哥是个忠贞的共产党员，但从未有一次运动他能幸免于难。娴要我向保健局或卫生部打听一下。我说不能打听，打听出来也没有办法，弄到谁的头上，也只能逆来顺受。别人帮不上忙。

我全心全意想离开一组的工作。我想离开的原因并不是和毛工作上出了问题，而是我和叶子龙与李银桥之间的勃溪已发展到难以忍受的地步。他两在一组待久了，与我格格不入。我看不惯他们的行为。但他们对我颐指气使，要我负责和保健毫不相干的厨师问题。此外，我还得一天到晚做江青和她护士之间的调停人。我已经四十岁了，还在做一般的保健工作。我仍想做外科工作。

计苏华说不要做外科了，目前医院的保健办公室没有人管，不如去保健办公室。我没有同意，因为在中南海时做保健，到医院仍然在保健的圈子里，岂不是换汤不换药。我趁住院恢复期间向上海和南京打听工作消息。

到九月下旬，毛回到北京，九月廿八日李根桥和毛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到医院来看我。他们问我什么时候出院，并且告诉我，今年是建国十周年，要举行大庆祝会。过去十个月来，数以百万计的群众赶工完成毛的十大工程，以迎接十周年国庆。天安门广场扩建到今日的规模，广场可容纳五十万群众。广场两侧分别是巍巍的人民大会堂和革

命历史博物馆。届时将有壮观的阅兵和烟火。李和罗都觉得错过了这场盛会很可惜。但我不想去观礼。

我没有同毛上天安门。建国十周年庆来了又去，我仍住在医院里。

到十一月中，母亲病情有了变化。一天早上起来後，她自己到卫生间去洗浴，可能水热了些，她昏倒在浴池内。经急救检查，是广泛的心肌梗死。这次可不同於上次了。她处於休克状态，一直没有好转，我赶到同仁医院病房的急救室，她的血压已经很低了。内科主任同我说，很难抢救过来了。数小时後，母亲於傍晚时分撒手人间。她最後一句话是，想看看两个孩子。

我们没有为她举行葬礼。保健局给联系好火葬场。第叁天火葬後，我将骨灰盒放在我的书柜上，不愿将它送往八宝山。也许上海或南京那边的医院会要我去，如果离开北京，可以带上一同走。

母亲去世，琉璃厂的老家怎么办呢？只留两个孩子在那里是不可能的。我去找罗道让。他仍在主管警卫局的行政事务工作。他不同意我住在老家。他说：“主席并没有说，你可以不必回来工作。你住到老家去，他再叫你回来工作，孩子谁管呢？”我说娴可以管。罗又说：“你好好想想看，如果主席要你回去，一年到头常出差，这个家不是散了。不如都搬进中南海来，南楼内再给你一间房子。”

我同娴商量半天，也只好这样办。大孩子已上学，可以骑车来往。中南海内有食堂，不必自己做饭。小孩子送入卫生部托儿所日夜全托。後来又转送北海幼儿园，这里离中南海近一些。

将这些安顿好了以後，娴劝我再住院治疗，我又住到北京医院。周末娴带着两个孩子来看我。她说：“你要准

备真有可能回一组。照你现在的体质，去了又会病，还是再治治好。”

琉璃厂的老家空出来，我们家里没有人去住。北京市房屋管理局趁机让我们交出房产所有权。十年前天真热情的回到祖国来服务，十年後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者，被共产了。我感觉十分惆怅和伤心。我失去了珍贵的祖产。日本侵略中国後，我和母亲逃往苏州，一去十七年，我童年时光是在老家度过的。回中国後，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根植在老家中。

娴和我总将老家看作我们的快乐小天地，在这小天地里可以无拘束地谈论说笑。现在我们再也没有办法保有自己的这块自由土地。我们永远失去老家了。

一组在十二月底召我回去工作。卫生部常务副部长徐运北来病房看我。他已经向吴洁了解了我身体情况。李银桥九月来看我时，便想叫我回一组，但吴洁推说我还需要治疗。现在副部长亲自出马，吴洁只得同意让我出院。

徐问我什么时候出院。我说打算多住些天。他说现在黄树则的母亲去世了，黄去天津葬母，一组没有人工作。我表示我不想去。

徐立刻说：“现在可正在反右，外面热火朝天，你住在医院里，又没有大不了的病，这不大好吧。”

我一听徐的口气不大对头，里面似乎有威胁的意思。我在医院的四个月内，外头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彭德怀元帅被撤职，他手下的总参谋长黄克诚也未能幸免。罗瑞卿升职，接替黄的职位。一九四九年便半退隐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取代彭成了国防部长。许多人不懂毛为何指派健康状况不佳的林彪就任此要职。

林彪甫就任国防部长，立即召开了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发了言，不但批了彭德怀，而且将朱德批了一顿说，朱是什么总司令，当总司令从来没有指挥过一次战役，没有打过一次胜仗，简直是个黑司令。林的发言稿是经过毛事先看过的。看来这些提法，毛是同意的。

看情形我如果再坚持住院不回一组，岂不很容易被扣上右倾的帽子。

我於是说：“等我办好出院手续再去。”

徐说：“我院手续办不办都可以，我告诉他们就可以了。”徐兼任卫生部党组书记，自然有权这样办。

毛此时在杭州。王敬先两天前便打电话给罗道让，要我随时动身前去杭州。十二月廿二日，我与李银桥搭机前往杭州。

起飞不久，遇到暴风雪，飞机颠簸得很厉害，只好在南降落。我们到机场休息室，江苏省公安厅洪厅长正在等我们。洪告诉我们，京沪杭上空有一个强暴风雪带，飞机通过有危险，他让我们到招待所住一夜再走。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一辆小轿车在暴风雪中上路，沿过去的京杭国道驰去，下午叁点钟到了杭州汪庄。这时毛仍未睡醒。晚上我才见到毛。

我说：“我已经恢复了。主席可能感冒了吧？”

毛说：“不晓得，只是不舒服。”

我说：“我给检查一次吧？”

毛同意了。我给量了体温。稍有微烧。听诊没有异常。心脏、血压和脉搏都正常。我同毛讲，是有些感冒和支气管炎。

毛说：“马上开会了，怎么办呢？”

我建议他服点抗生素和感冒药，防止继续发展。毛同意了。

次日晚上体温恢复正常，咳嗽也减轻多了。毛很高兴，说：“说嘴郎中还有点好药。”

我趁机说：“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同志建议，明天是主席生日，想大家会餐庆祝一下。”

毛说：“我历来不主张过生日，不过大家聚聚是可以的。我还没有全好，你们去会餐，我就不去了。”毛仍为大跃进所引起的饥荒心有愧疚。他不愿在一般平民挨饿受苦之际，大吃大喝。

其他干部可没有这种胸襟。我出来後，告诉了叶子龙。叶听了以後，笑逐颜开，抿抿嘴说：“行啊，我们干它一顿，这一次一定把王芳灌醉。大夫你干了件好事啊。”

廿六日毛醒了後，大家一一进去给他祝贺生日。毛已经完全复原，对这次治疗很满意，同意和大家照像。

宴会就在叁号楼餐厅内举行，一共摆了八桌。浙江省的主要领导人都来了。由江华、王芳作代表去看了毛。毛告诉他们，不能铺张，不要说做寿，只是大家聚聚。

江、王出来後，大家开始入席。这可真成了宴会，浙江省的名菜都摆出来了，其中最突出的是燕窝乳鸽和砂锅鱼翅，确是别有风味。席中叶子龙将王芳真的灌得大醉。王敬先悄悄同我说，现在全国这麼困难，饿死人，我们这样大吃大喝，太不像话。

我深有同感。在中南海深宫朱墙外，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正在挨饿。一九五九年的秋收比前一年还糟。到目前为止已有数以百万的人饿死。等这场饥荒结束时，死亡人数会上千万。在中国哀鸿遍野之际，我和林克、王敬先、叶子龙、李银桥、浙江省的这批领导人，大举庆祝毛未出席的六十六岁大寿，眼前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公安厅长醉得倒了。我心中感慨万千。

我跟王敬先说：“在这个环境里，不随波逐流，就会受嫉。除非下决心，挨整也离开这里，才能对的住良心。林克常说：‘鲁迅说过，不能赤膊上阵，否则乾挨枪。’看来，不同他们妥协，在这里无法立足。”唯一对得住良心的方法是离开一组，但我第二次的努力又告失败。一组这个环境可真是中国土地上的一个特区，任何纪律、法律、规定，都不能在这里起作用。这是块世外桃源，真是块天不管，地不辖的地方。只有毛能统治我们。还有噬啮着一小撮尚有良知的我们的罪恶感。



越来越多的百姓因严重的饥荒而饿死时，共产党变得更形腐败。刚过完一九六零年新年，毛离开杭州，到了上海。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定於一月七日召开。专列仍然停在龙华车站，毛依旧住在车上。参加会议的领导们则住在锦江饭店。正如田家英同我说的，已经是过左，现在反而要反右倾，势必越反越左，看来亏吃得还不够，学费还得多交。政治局通过一个又一个越来越左的决议。生产指标节节高拔，钢产量又规定是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的高指标。各县、公社开办企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会议期间一如以往，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为了将晚会搞得热热闹闹，调来了南京军区文工团、江苏省歌舞团伴舞。上海京剧院、上海舞剧院等演出节目。大肆采购也是活动之一。上海市委为了使会议更加生色，在锦江饭店沿街的一排房子中，陈列了各式各样的商品，以较便宜的价格出售给参加会议的人和他们的随员。这些脚踏车、皮鞋和上好毛料都是外面市场上没有的短缺货物，何况这时已进入困难时期，市场上早已是货架上空空荡荡的了。这阵子叶子龙和李银桥之间的斗争越演越烈。叶子龙逐渐占了下风，李则藉机夺权。李银桥向毛和江青告了叶子龙的许多臭事。毛没有讲什麼。可是江青却经常对别人骂叶子龙，说叶脑满肠肥，饱暖思淫。毛最後无法坐视不顾。以後，毛交女朋友所用的钱不再放在叶处，改交李银桥管理。这是叶子龙和李银桥交恶争权，李取得胜利。这一段时间，叶时常同我发牢骚，说：“给他办了这麼多年的臭事，弄得这麼一个下场，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

我说：“主席对你不错啊，他并没有叫你走。”

叶说：“屁，他用各种办法挤我，比明白说叫我走，还难受得多。”

多年来，我一直不愿去正视毛和这些女孩子交往背后的真相。每次毛有客人，我也避得远远的。我不想知道实情。叶跟我说了不少事，使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假装不知道毛拈花惹草的风流事。

一九五九年底，我回到一组工作，发现除了原来一位女机要员外，又有一名女机要员，随同外出。后者并不好看，不过皮肤白析，身材修长。这种外形是毛最喜爱的。她初次与毛见面时，告诉毛，她念小学和初中时，同学有些人骂共产党，共产共妻，骂毛是土匪头子，她开始与这些人争吵，后来动起手来，被那些人打得头破血流，但她仍大声说，共产党好，毛泽东好。这一番话，说到毛的心坎上去了。有一段时期，毛只要一睡醒，就要她陪，直至下次入睡。在上海会议期间，晚会跳舞，她总是坐在毛的身旁。有时跳到半夜一点钟，毛仍无倦意，舞兴还浓，每次都是她睡眼惺忪地拖毛回去。以后毛外出，都带着她。

她有一大特点，虽然是毛的女友，但是见到江青，一直很热情亲切，毫无怕被发现或内疚的表现。江青似乎也很喜欢她。毛常对别的女孩子们说，要学学这位的大方举止。

批斗彭德怀已使我对毛主席的信心动摇。现在知道他私生活的丑相后，我对这曾一度敬仰如泰山的人，只有深沉的憎恶。

李银桥逐渐取代了叶子龙的总管地位以后，与一位女工作人员要好起来。上海会议期间，两人打得火热。常常在毛没有起床时，一起离开火车，乘汽车到锦江饭店买东西。

有一次柯庆施到火车上接毛去城里开会，毛叫李，李不在。等毛下火车时，李刚赶回来。毛当时吼道：“李银桥，你一天到晚弄个女人捣鬼，你是干什么吃的。”

当时柯庆施大吃一惊，认为叶子龙、李银桥过于渎职，长此下去，为毛的安全担心。柯同北京市长彭真讲了，也告诉了周恩来和刘少奇，于是动议将汪东兴调回来。

上海会议结束后，大家动身去了广州，然后才回到北京。

叶子龙回到北京以后，对毛和江青十分不满意。如前所述，他认为毛用各种方法给他难堪。叶说：“毛不明讲让我走，可是办什么事不让我办，同一组的人讲我这不好那不好，使我没有办法待下去了。干了一辈子的丑事，到头来落得这么个下场。”叶开始活动去北京市工作。已经得到彭真同意。叶到处宣扬毛的桃色新闻，终于祸从口出。这事让刘少奇知道了。刘说：“这是污蔑我们党，把他拘捕，枪毙。”后来周恩来、彭真等一再关说，才没有执行。

毛自己的私生活如此，他的随从只是上行下效罢了。毛的卫士们个个长得年轻英俊，眉清目秀，舞会里也有很多认识漂亮女孩的机会。毛和其他领导人奉行的道德标准，和中下级干部奉行的有所不同。毛是无法无天，自然可以随心所欲，但党对一组人员仍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毛不得不采取行动，叫汪东兴回来解决问题。

汪东兴於一九六零年十月由江西调回中南海。四年的放逐生涯，使汪吸收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汪同我讲，以後对毛只能唯命是从，千万不能逆他的意，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否则把他惹毛了，谁也没有办法解救。

汪又讲：“过去可上了不少江青的当。好多事都是听她听坏了。以前一直认为她是主席的夫人，听她的没有错。哪里知道，主席讲了，你要是听江青的，你去给她办事，我这里不用你。一九五六年主席批评我时，是江青煽风点火，加油加醋。这次江青可别再想顺心了。我走的时候使坏。我没死。回来了，看你江青还能不能使坏。”

汪回一组後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巩固权力，清除敌人，换上忠於他的人。一组此时的腐败已明显到连毛都无法坐视不顾的地步。自一九五八年以後，毛外出到各地，各地对一组工作人员，尽力招待；大家便白吃白喝，随意要东西，不给钱。汪藉此展开内部整风，目标是清清他的对手：叶子龙和李银桥。

汪东兴告诉我一件事，很能说明叶子龙的为人。叁反运动开始後，一天罗瑞卿召集公安部的几位副部长开会。罗在会上要求凡是有各式各样贪污的人，要自动坦白，否则要加重处理。大家默不作声。罗大声吼道：“姓汪的，你为什麼不开腔？你没有问题？你躲得过去吗？”汪告诉我，当时在座的，除他姓汪以外，还有一个姓汪的副局长，两人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来。罗又大声指斥：“汪东兴，你还瞧别人。你不坦白，你过不了这一关。”汪当时糊涂了，不知道有什麽问题。罗又问：“你拿过主席的东西去卖没有？”汪简直是丈八罗汉，摸不清头脑。罗站起来，指着汪说：“给你点出来，你还不及早坦白，你看这

是什麼？”汪拿过来一看，是一张检举揭发信，揭发汪将一架送给毛的照像机，卖给了委托寄卖行。卖的人签名是汪东兴。汪没干这件事，因为送给毛的礼，不由汪负责保管，主管人是叶子龙。这事与汪亮不相干。

汪这次回来是看准了毛的意图。毛这时对叶子龙和李银桥已经很不满意了。但是这两个人都是一组的老工作人员，而且给毛办过不少事，毛不好开口让他们走，所以要用汪来搞叶、李。当然大家并不知道，一组整风的幕後操纵人是毛。

汪对这两个人也很不满意，因为以前这两个人在毛的面前讲了不少汪的坏话，害得汪被下放四年，所以汪正好利用这机会整整他们。这次他一回中南海，便展开整风行动。

我觉得汪的所做所为也是情有可原。此外全国性大饥荒终於侵入中南海的深宫朱墙了。每人的配粮一个月减至十五斤。肉蛋已经绝迹。没有食油。我们虽可以去市场买瓜类和蔬菜，可是瓜菜也很少买得到。所以实际上是在挨饿。有办法的中央机关和军事机构，都组织人到内蒙去打黄羊，大家都去打，打到的也就越来越少了。

中南海内普遍营养不良，很多人得了水肿和肝炎。嫺的两脚已经有了水肿，想办法买了点黄豆，她又舍不得吃，都炒熟後，给孩子做菜了。这时她倒愿意我随毛外出，这样我的那份定量生活供应品，就可以省出来，留给孩子们吃。

毛自然不受配粮的限制，大家也尽力使他不受影响，但他还是知道了困难时期物资紧张的艰苦。毛每天批阅的文件，件件都在跟他呐喊着真相。自从一九六零年以後，工农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的经济生活越来越困难。夏天开始，毛又恢复了一九五六年的老习惯，睡醒以後不起床，

精神常常处于低沉状态。但我觉得他心理上还是无法面对这个事实。

有一次我告诉毛，现在浮肿病和肝炎病人很多，而且越来越多。毛嗤之以鼻说：“这都是你们医生闲下来没有事情干找事干。你们找出来两种病吓唬人。你们如果不找出点毛病来，你们不是要失业没有事情干了？”

我又说明这两种病是真的，不是医生找出来的。是有人有了病去找医生，医生查出来的。

毛说：“查同找还不是一个样。现在全国缺粮。这里有一个报告。”他顺手拿给我一分内部参考，其中有一篇消息，说明浮肿病和肝炎的流行，需要饮食中增加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

年前杨尚昆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讲了一次话，要大家有长征时的精神，准备挨叁年饿。要求各个单位自己想办法，粮食不够，自己找空地种瓜种菜，用瓜菜代替粮食。

杨的这次讲话以后，大家在住房前后的空地都种上了青菜和瓜，甚至上班时间，大家放下手头的工作，去种这一小片土地。除去市场上买到的一些，加上自己收获皂一些，瓜菜倒有了供应，但是粮食太少。吃瓜吃菜没有油炒，多吃几次难以下咽，而且也吃不饱。

我觉得毛特意漠视横行中国的疾病，十分残酷无情。但我不可能打破他的幻象。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同毛谈起过浮肿病和肝炎。这两种病似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复存在了。

毛对那些不断指出局势黑暗面的领导十分不悦。他说：“他们越是说到黑暗面，前途就变得越加黯淡。”毛觉得那些领导是夸大国家的困难，存心给他心理压力。

毛倒是对饥荒做了一大让步。毛开始不吃肉了。他说：“大家都饿饭，我不能再吃肉了。”

刘少奇、周恩来知道毛不吃肉了，都向汪东兴表示担心。汪要我乘机会探望毛的口气，能不能劝毛吃肉。刚好有上午，东北送来老虎肉和鹿肉，我藉机劝毛吃一点。

毛笑一笑说：“你告诉汪东兴，将这些肉放在大食堂，给大家吃。”

我乘机说：“是不是留一点，交给厨房，做给你尝尝。”

毛摇摇头说：“不必了，我暂时不吃肉，过些天再说。”

毛的牺牲对大饥荒毫无助益。中南海的人员也许因为有老虎肉，有几次吃得好些了。但这无法使被破坏的农业立刻恢复。尽管如此，毛主席这个姿态仍赢得了大家的赞叹。

在饥荒中，汪东兴展开了一组整风。当时大吃大喝成风，到外地有好东西就无偿或以低价买来。沿海省份公安厅破获台湾特务向大陆走私的劳力士手表和莱卡相机，只几几块钱卖给一组人员，我们可以买到一般百姓买不到的罕见奢侈品：毛料服装、丝缎和皮鞋。困难时期一组仍如此嚣张，使大家侧目以视。

汪为了便於整顿，向毛报告不要叶子龙参加。汪同我讲：“叶子龙的官和我一样大，他在主席处工作的年头比我长。他参加整风，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在里头一捣乱，弄得我更难办。”如果汪同时批整叶和李，这两人可能会联合起来反击他。因此汪决定采用各个击破法，先将叶放在一边，集中对李开火。

毛的意见，叶子龙可以不参加，但是大家可以给叶提意见，然後转告给他。汪觉得也不要给叶子龙提意见了，提了也没有用。

这次整风从十月底开始，每天在毛入睡後开叁、四小时。连着开了两个月。卫士们值班侍候毛，就向毛说明会上谁发了言，说了些什麼，给李银桥提了些什麼意见，李

银桥怎麼检查自己的，如此等等。然後毛又给出主意，开会要说些什麼。

毛让卫士在会上揭发李银桥，在上海时，丢下毛处工作不干，到锦江饭店小卖部去抢购东西，买那麼多东西，那里来的钱？

鼓动一组人员点名批判李银桥并不难，他平日树敌甚多。但整风会提的意见也只点到为止，大家都不想让李下不了台。我也只大致批评了他工作上不负责任。

但整风会却整出了意想不到的後果。叶子龙没有参加会，可是通过会上一些发言，大家都知道了叶在北京有一个吃喝小集团，叶是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这两个月期间，叶坐卧不安，他时常从各方面打听会上的发言有没有涉及到他。

汪东兴的这一举动，立即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声誉，都说他敢在一组这太岁头上动土，这把火放得好。周恩来，刘少奇大为赞赏。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廿六日，毛六十七岁生日那天，这场整风落了幕。

毛生日前两天，汪东兴向他报告了整风情况，主要是这几个人跟着毛，在上面时间久了，不知道下面生活的困难，又不自觉自爱，搞得对外影响很不好。好像一组的人都这麼差劲。现在粮食很困难了，大吃大喝，白吃白喝，太特殊了。

毛生日时，我正巧赶去广州看江青的病。汪後来告诉我，十二月廿六日下午，汪东兴、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林克、机要秘书高智，还有护士长吴旭跟毛一起吃饭过生日。这时毛还是不吃肉，所以菜色都很简单。

汪说：“吃饭当中，主席说，给你们讲个故事，战国时候张仪和苏秦是同学好朋友。张仪在秦国当了丞相，就



是等於总理吧。可苏秦还是个穷光蛋，也找不着工作。苏秦想，既然张仪阔了，是个大官了，为什麼不去找张仪呢？苏秦到了秦国，大约就是现在的陕西咸阳。打听到了丞相府。找门官，就等於现在的传达室，一报。张丞相说先住下吧。一送，送到了招待所，这等於北京饭店。苏秦一住，住了两个多月，张仪也不见他。苏秦心里的火大了。好啊，张仪你不讲交情，不见就不见，不求你，老子回家。招待所长送苏秦回家，到家里一看，房也修了，家里也有饭吃了。招待所长同苏秦讲，张丞相的意思，怕你留在秦国没有出息，所以不见你。他劝你，到六国去游说，就是耍嘴皮子，让六国联合起来打秦国。这样张丞相在秦国稳当了，你苏先生在六国也稳当了。苏秦一听，真有点道理，就这样做了。”主席说，讲这个故事，不是说你们是苏秦，我是张仪，这是说明，再好的朋友，也不能靠着过下去。要自己努力，打开出路，互相配合，才能成功。

“现在国家有了困难，没有粮食，老百姓在饿饭，你们下去，搞些劳动，同时进行调查研究的，看看老百姓有些什麼问题，告诉我。”在座的也不全去，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林克、高智你们去，卫士小封也去。现在山东很困难，你们到山东去。要是你们饿得快呜呼哀哉了，告诉我，立刻叫你们回来。

“第二天主席写了个条子，叫他们不要去山东，改去河南信阳，参加劳动锻链，说信阳情况可能好一点，去了不会饿饭。”

毛实在也是个极善表演的演员，不但善於看什麼人说什麼话，而且嘻笑怒骂，流泪叹息，都是他用来收拾人心，达到他的一定的目标的手段。毛對於在他身边工作，或同他有特殊关系的人，在处理上很有策略手段。一般先让这个人去学校甚至到苏联学习，学习完结，即调到别处工作。

再有就是用到下边调查研究，劳动锻链，按毛的说法是冷一冷，再调到别处工作。在这个人去学习或下去劳动以前，毛必然要找来谈谈话，表示关心，甚至流泪，表示舍不得离开。

这样这位被处理的人，自然感恩戴德，虽走犹荣，还常常拿这点向人夸耀。叶他们要求过了春节再走。但毛叫他们月底就出发。

叶他们走前，汪东兴还在名单上加上了他另一位对手：罗道让。罗在一九五六年汪受批评下放江西时，便任警卫局局长。为了这些原因，汪回来以后，就想将罗除去，但是没有机会。

一天汪从政事堂办公室走向南楼，路上遇着罗道让，很明显，罗是要卖乖，随便向汪说：“一组的人下去不少，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么个机会锻链？”

罗这样一说，汪立即顺水推舟说：“那好，我报告主席，你同他们一起去。”

并立即去了一组，报告了毛，毛同意了。

叶子龙和李银桥下放后，汪征得毛的同意，一组的事情由汪负总的责任。卫士组仍由剩下的卫士轮流值班。汪将行政处长毛维忠及办公室主任田畴提为副局长，主管行政事务及中央领导的生活服务。办公室主任则由汪的心腹武建华担任。徐涛的妻子护士长吴旭君固定在一组工作，以便随时从吴了解到毛的日常动态和情况。

汪东兴在一组巩固他的权力，并利用整风机会撤走彭德怀的原有势力。汪东兴一向非常重视中央警卫团这一支武装部队。这支部队虽然编制是团的名称，可是兵力有两千多人，装备精良。而且负责警卫的地点都是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住地和经常活动的地点，如中南海、新北京、玉泉山、北戴河。而警卫团的战士和干部大都是彭任国防部长

时征集来的。汪於是大加调换，给毛担任武装警卫的一中队，基本全部调换了，汪的心腹警卫团团长江耀词升任为警卫局常务副局长。

汪虽权力日渐坐大，控制全局，也无法打赢这场反腐败的战争。一九六一年年初毛路过长沙，在黑石铺停了一天，毛叫刘少奇和周恩来来湖南，在火车上开会，没有人下车，第二天就走了。湖南省委招待处向省委报帐，吃了两千多只鸡。汪知道了，找新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问，毛、刘少奇和周恩来，加上随从人员和警卫，肚子再大，一天也吃不了两千多只鸡。张平化说去查一查。

后来张告诉汪，可能是廿几只，多写了。汪说，那天大家一口鸡都没有吃到，是谁吃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祥同汪打招呼，说毛在火车上开会，那一夜铁路沿线和飞机场，加上周围叁个县的民兵，统统值班巡逻站岗一共有上万五千多人，天气冷，不能不给他们吃点。汪说，吃就吃了，不能算在毛主席头上。

李祥说，不算在毛主席他们叁个人的头上，报不了帐。

所以汪说下面捣鬼捣得厉害，毛背黑锅。

汪东兴重新整顿完毕後，中南海、北京、甚至全中国境内的叁大关键组织：一组、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在汪的指挥下，又将一些警卫团的干部调入警卫局，以作局团合一的准备。又一步步酝酿将公安部八局合并入警卫局。汪的势力不断扩大，在宫廷斗争中成为举足轻重的要角。六年後，文化大革命开始，毛派遣八叁四一部队进驻军管主要的工厂和大学，这些都由汪办理。

汪回来以後的又一改革是：因为毛老了，需要增加活动身体。经过毛同意後，将每星期六晚的一次跳舞会，改为星期叁晚及星期六晚各一次。原来伴舞的是中央办公厅

里的一些机关干部，如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等。另有专业文工团员，主要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这时汪又找来铁道兵文工团和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一九五九年国庆日，人民大会堂启用。原来的北京厅改为一一八厅，厅堂宽敞，成为毛专用的房间。人民大会堂的女服务员也成了他的外宠。这时他结识女友的范围和人数大为增加，再也不需要中间人了。那年毛是六十七岁。

一九六零年五月，英国第二次大战时的元帅蒙马利来到北京。毛在那次会谈中，第一次公开讨论自己死亡的各种可能性。毛对蒙哥马利说：“人总是要死的。我想我会怎么死法呢？第一是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飞机掉下来摔死。第三是火车撞翻撞死。第四是游泳淹死。第五是害病被细菌杀死。”

汪东兴在北京巩固个人势力时，我正在广州陷入一场个人斗争中。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中旬，江青打电话给毛，说身体不好，要我去广州给她看病。江青在广州过冬，抱怨频频。她说她有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她的护士、随从、卫士都不肯尽心照顾她。她要我去给她看病。

江青找我次数过多，连毛都起了疑心。自一九五九年底我出院回一组工作以后，一直有人议论纷纷，说江青对我好，太不寻常。叶子龙和李银桥也在中间加油添醋。毛听到江青要我去广州时说：“让他们去好嘛。”便叫我去。

我实在不想去。我很了解江青。她根本没有什麼病，而脾气古怪，难伺候。她的身边工作人员都有满肚子委屈，我的调停很少能起作用。我每跟江青在一起时，总觉如坐针毡。我知道毛起了疑心，更不想给别人说三道四。

但我没有选择余地。毛叫我去，派了一架空军专机送我到广州。

我到了广州小岛招待所。这次同江青一同在广州的是警卫处的科长孙勇，卫士，和两位护士。我一到，他们就跟我一直诉苦。他们几个人都说，江青这个人没有办法伺候，没有她如意的时候。怕光、怕风、怕声音，都是假的。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常开舞会。江青一跳可以跳叁、四小时，广东省领导全部下去伴舞，上从广东省最高领导干部下到卫士、随从，个个都得陪她跳上一曲才行。

江青跳舞可以跳叁、四个小时，看电影可以连看两、叁个片子，这时候什麼都不怕了。

江后来见了我，说了一遍身体上的各种症状，然後就讲护士们如何如何不好，没有人管她们，指导她们。

我向江青说明，我是毛派来给她检查身体，完了以後就回去。江当时面色沉下来没有说话。

第二天江还没有起床，护士跑来找我，说：“大夫，你昨天同江青讲了些什麼？她一晚生气，拿我们出气，还说，这个大夫真莫名其妙，他到广州来，简直想潦草应付一下，搪塞了事，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

我於是不再向江谈给她检查身体，也不提回北京，天天就同江看看电影、散散步、照相、周末跳舞。江每天近十点、十一点才起床。下午二、叁点睡个午觉，然後接下来吃晚饭。我们没有一起吃饭，但我跟江青在小岛上都吃得很好，丝毫不觉外面的人正在挨饿。

十二月廿六日是毛的生日。陶铸及他的夫人曾植请江和大家吃饭。这样一连下去，过了新年。小岛风景优美，日子舒适，但我却百般无聊，忐忑不安。我看得出来养尊处优的江青非常不快乐。

江的病的根源，首先毛有不少相好的。江心里有气，又怕毛不要她了。又恨又怕，精神不会正常。

其次江极不满意她的级别定低了。在中共政权中，行政级别分成廿五级。一级到六级是高级首长，七级到十叁级是高级干部，十四级到十七级是中级干部，十八级以下是一般干部。江青的级别是九级。她非常不满意。她有天对我说：“叶子龙、江东兴两大老粗都是七级。杨尚昆太不公平。”

党没有给江青掌大权的地位，她心里不痛快，不服气，又没有办法。这两点加在一起，自然这里不如意，那里不舒服。谁有办法治她这种心病呢？也只能毛表示永远要她，劝劝她，才好一点。可是让她掌握大权，我看毛也不可能自己开口，就是毛想这样办也难，何况江青眼高手低，

什麼本事没有，还不愿在别人领导下工作，脾气又大又爱教训人，同谁也合作不好。

因此江青的神经衰弱其实是种政治病。她野心勃勃，却无法伸展。如果她痊愈了，她就得去工作，九级的干部没有真正的权力地位。但如果她是以毛主席夫人自居，别人尽管心里不尊敬、不喜欢或不愿意，也得对她卑恭屈膝，唯唯诺诺。

最後我終於了解江青不生病是不行的。只有生病，她才能予取予求，支配身边的人。她也需要毛以为她真的有病，否则她就得去工作。

到小岛快叁个礼拜以後，一九六一年一月十日，上午江青起床後叫我去。我走进叁号楼她的休息室。她正坐在躺椅上，喝着茶。我进去後，她叫我坐下。然後说：“大夫，我们谈谈。你已经来了叁个星期，无所事事，你有什麼打算？”

我说：“我在等着，什麼時候你觉着合适，我给你检查身体。”

江青说：“我今天要你来，是商量一下长远些的事情。主席身体很好，并不需要经常有医生在身边照顾。主席自己也说，并不必要有个医生。可是我的身体不好，徐涛走了以後，没有医生做系统观察和治疗，我需要医生，可是没有医生在这里。我同你商量，你以後跟着我，兼管主席。你觉得那个护士顺手，可以由你调来。”

我本来这几天就看出她有这个打算，所以听了她的话，并不意外。我说：“我调到一组来工作时，领导上交代，是给主席保健，负责主席的健康。领导上说的清楚，这是组织给我的任务。江青同志你的意见，同领导上谈的不一样。这样改变，领导上没有同我谈，主席也没有同我谈。我不知道何所适从。我觉得不妥当。”

江青说：“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主席，主席同意了。你没有别的意见，领导上容易办，我同他们说一下就可以了。”

我说：“这件事还得要思考。这样办我觉得不妥当。”

江大声说：“有什么不妥当？你是不是眼睛里只有主席，没有我？你看不起我这里吗？”

我怕的是蜚短流长。如果我真的做了江青的保健医生，一组里的谣言便成有根据的事实。我觉得事情紧张起来，我委婉的说：“根本没有看得起看不起的问题。当医生谁有病都得去看。我认为照你的办法，会有不好的反映意见，对你、对主席都不好。”

江听我讲完，忽地立起身来，圆睁两眼，急促的问我：“你说有不好的反映意见，是什么意见？”

我说：“不必说了，是一些流言蜚语，讲了没有好处。”

这时江青急了，厉声说：“大夫，我一向对你不错，为什么有话不明说？你讲，你讲出来。”

我说：“江青同志，你既然一定要问，我告诉你。自从一九五九年底我出院回来以后，一直有人议论说，你对我好，这不寻常。而且有人告诉我，这人还将这话告诉主席。主席说：让他们去好嘛。江青同志，所以我认为这么办不合适。”

江青听了以后，倒沉静下来。她问我：“是谁这样讲呢？”

我说：“算了，就不管他是谁了。”

江青说：“大夫，你太糊涂，我对你是特别照顾些，这是因为主席同一个医生能合得来很不容易，我是照顾这大局，才对你特别将就些。现在有人就是制造流言，不顾大局，到底是谁呢？”



我说：“是叶子龙这么讲，后来李银桥也讲。”

当天夜里，江青给毛打了一个电话，流了不少眼泪。几天后，也就是一月十二日，我就乘空军专派飞机回北京了。我跟江青告别时，江青警告我说：“这事不要再提了。”

回到北京，到处冷冷清清。看到家里人，似乎都瘦了一圈，面色又黄又灰。娴的两只脚肿得更厉害了。自我走后，他们每天的定量粮食都吃不饱，没有油，更没有肉和蛋，青菜也不容易买得到。能够得到一点黄豆，煮着吃，就是美食了。一九六一年春节，娴弄了点白菜，和一些大米，煮成稀饭，凑合过去。

我决定过几天再去见毛。毛准备在一月十四日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要求各级领导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解决大跃进以来的问题。直至今日，我仍然相信毛发动大跃进真心是想促进中国进步。问题在毛没受过现代教育，他以为土炼钢、高产粮、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些乌托邦的空想是中国迈向廿世纪现代化的道路。

毛的思想仍停在十九世纪，领导国家全靠毫无科学根据的主观想像。现在他想缓一缓。思考对应的方法。

九中全会对毛是个打击。参加的领导认为党首要的工作在恢复农业生产。在饿殍遍野中，毛的迅速工业化只是空想。民以食为天是不变的道理。

会议结束后，一月十八日夜我去看毛，告诉毛我在广州时的情况，与江的对话。

我对毛说：“我忍耐很久了。叶子龙、李银桥说我同江青关系不正常，他们有什么根据？我认为他们不是丑化我，而是丑化主席。他们的用意到底为了什么？”

我一边说，我看毛在眯着眼睛。我说完后，毛说：“前两天江青打电话来，告诉了我。这事我清楚了。你不用挂

在心上。常说：谁人背後不说人呢？叶子龙、李银桥要下去锻链了。过两天他们就走。”

我很纳闷，汪东兴为什麼不告诉我这件事呢？我出了毛的卧室，立刻去找汪，向他问个究竟。汪跟我解释了此事的由来始末，见前文。

我一月离开广州回北京後，江青一再提出身体不好，保健局几经商量後，派了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上海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和上海精神病防治院院长，精神科医生，神经科医生粟宗华到了广州，住在小岛河外的公安厅大楼中。他们到了一个多月，江青却迟迟不见他们，更不要说检查身体了。

等毛、汪东兴和我到广州时，已经是二月底。我们到了以後，这叁位立即找我说，保健局派给他们的这个任务，很是光荣，可是太艰巨了。见不到病人，没有办法出力。而且医院里忙得很，大家都急着回去。我将这些话转告江青，她沉下脸说：“这些医生架子太大。”

後來江青总算同意身体检查，但吩咐不能一天检查完，要分叁天。最好是查一次，休息一天，隔一天再查第二次。再隔一天，查第叁次。一共用一个星期。第一天计苏华查的外科，实际上没有什麼好查的，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完了。等第二天内科由薛邦祺检查，除去做心动电流图稍微费点时间以外，也没有用多少时间就结束了。只有第叁天粟宗华做神经精神科检查用了不少时间。但江青很狡猾，避重就轻，规避了许多让医生了解她心理状况的问题。

检查完毕，我去见了江，告诉她，叁位医生想当面向她说明检查结果和治疗方法。

江青示同意了，然後问我，叁位医生查出什麼病。我说叁位医生检查身体的结果，没有发现有什麼重要的不正常，身体情况在好转。

江冷笑一声说：“他们的话你已经替他们讲了，不必见了。他们检查身体的结果，你先不要同主席讲。让他们写一个报告给我。”

我告诉了他们江要一个书面报告，不谈了。他们说，不谈也好，反正只有这麼几句话，当面碰钉子更不好办。於是将以前检查身体报告取出来，将辞句修改了一些，强调江青仍在原位癌放射治疗後的恢复期，有神经衰弱现象，建议她仍持续原先的文娱活动，然後整个缮写出来，交给汪东兴看。

汪看过以後，不同意这写法，说：“你们还是老一套，什麼同意看电影、跳舞、听音乐、江青搞这些倒成了合法的了。你们不要出这些主意。”

我终於和医生们起了争执。原先保健局派这几位医生来照顾江青，好好治病时，我也在场。我气愤地告诉医生们不必再迎合江的反覆无常，只要坦白报告她的健康完全无恙。医生们不知道江青待人的无礼，改写了报告。

这份报告交给江後，当天退回来。江青说：“这叁个医生写的什麼东西。完全不负责任。他们是来干什麼来的？叫他们回去。”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出面请他们叁人吃了一顿饭，表示感谢他们到广州来。他们知道江青不满意他们的报告，但未料到江青长久压抑後的愤恨宣泄出来时，会有多可怕。

这叁位医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极大的打击。计苏华被殴打，关在医院中的小木屋内，最後以早老性痴呆去世。薛邦祺也同样受到批斗。文革结束後不久，便因心脏病发去世。

粟宗华受的迫害最严重。一直被关押被殴打。粟受迫害後，给我写叁次信，证明他在广州给江表看病时，认真负责，没有任何反党反江青的活动。我当时处境也很困难。我写证明寄给上海精神病防治院，没有结果。最後粟不堪虐待自杀死亡。

送走了叁位医生後，我成了江青所有不满的唯一发泄管道。护士们不断向我说，江青对这次检查身体非常不满意。她们说，江青认为这次检查身体，是医务界有意与她为难，其中特别是我，在对待她的态度上，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江并且举出一九五八年在武汉时，我考虑到她的身体衰弱，劝毛不要让江随同一起去参观大学这件事说：“李大夫全变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真正关心我的身体，为我着想。现在跟我在作对。大概那个时候叶子龙、李银桥加上一个傅连章整他，他拿我当後台支持他。现在叶子龙、李银桥走了，傅连章不工作休息了，汪东兴调回来，李大夫是不是拿汪东兴当後台来整我呢？还是他有别的看法哪？”

我对江青看法是有，只是我的看法同她说的看法，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我本来就不愿意在一组工作，根本谈不上找汪东兴做後台来巩固我的工作地位。我从来就不喜欢江青，江青的养尊处优，无病装病，对人呼来骂去，刻薄暴虐，在在都使我深为憎恶。

当时共产党的电影和歌剧白毛女中，描写恶霸地主婆虐待丫头和女佣人的这一类宣传事例，说地主和资本家如何如何剥削压迫人，那麼江青同这些人有什麼区别呢？

我自然也明白，江青如此目空一切，完全是仗着她是毛主席夫人的地位。我越来越憎恨我四周的伪善，伪道德。共产党一再咒骂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又一向自诩共

产主义道德品质，那麼这些共产党领导在人民普遍挨饿受冻之际，还穷极奢华，大吃大喝的行径是属於什麼样的生活方式呢？我梦寐以求的新社会、新世界完全幻灭了。

江青以为我对毛仍崇敬如泰山北斗的看法也不正确。我对毛的私生活日益清楚以後，对毛的品德十分厌恶。毛的行为又是属於什麼样的道德品质呢？他批斗彭德怀，一个对共产党赤胆忠心，全心奉献中国的伟大革命领袖。

而中国人民呢？共产党一天到晚宣传人民两个字，似乎一切为了人民，要求干部们做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等等。但实际生活中，权利者可以毫无顾忌、毫无限制的满足自己的私欲。受迫害、受压榨的人们，只能忍受一切苦难和耻辱，逆来顺受是唯一能生存下来的办法。所谓人民不过是广大求告无门的奴隶的代名词。这就是共产党的新社会、新世界。江青说的很对，我是不将她放在眼里。只是她不知道，我其实对毛和一组深恶痛绝。

这几年的生活，对我的精神是极大的打击。我所期望的新中国已经是红楼梦中的贾府。

在空前的大灾难当中，毛在声色的追逐上却变本加厉，而且已经越来越不加丝毫掩饰。

中南海春藕斋重新粉画装修，晚会的场所由暂时迁移到怀仁堂内北大厅又回到春藕斋，春藕斋舞厅旁新修了一间“休息室”，里面放了床，我那时仍是每场舞会必到，常在舞兴正酣的时候，大家都看见毛拉着一位女孩子去休息室，待在里面，少则半小时，长则一个多小时，这时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刚好改名成一一八会议室，这是一大间会议室，里面的装璜，家俱，吊灯远胜於克里姆林宫的规模，是我见过最豪华的房间，在人民大会堂内，毛又有一些女朋友。

许多女孩子以与毛有这种特殊关系为荣，这些女孩子大多是贫农出身，或是从小由政府养大，思想上非常崇拜毛，毛的临幸自然会让她们感觉到莫大的恩宠。

但是也有一些女孩子拒绝毛的要求，通常她们是年纪较大，教育水平较高的女青年，有些护士认为与病人发生亲密关系，有违职业道德。

毛的女友之一有一次同我谈起她的童年，她是黑龙江省人，幼年时父亲死去，母亲带着她讨饭过生活，东北解放後，母亲在工厂有了一分打杂工作，生活上算是有了保障，她九岁考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做了歌剧演员，虽只担任配角，但是她已经心满意足了。

毛另一个女友是铁道兵政治部文工团团员，她父母都是烈士，从小由政府养大，小学没有毕业，十二岁就考入铁道兵政治部文工团。

对这些女孩子来说，党的解救已经是大恩大德，现在有让毛宠幸的机会，更是感激莫名，对中国人来说，光是站在天安门广场，看一眼毛在城楼上的英姿，便是终生难忘的经验。一些跟毛握过手的人，好几个礼拜不洗手，亲友们携老扶幼地赶来和他握手，仿佛这样他们也沾到了一些神明的光采。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人将毛送的芒果供奉起来，用一小块芒果煎成一大锅水，大家喝一口，共享领袖的关怀。一般人民狂热如此，何况是有幸和毛发生特殊关系了。

那些年轻女孩子对毛的敬爱不是一般的男女之爱，而是对伟大领导，民族救星的热爱，大部分的女孩都知道这特殊关系只是暂时的，她们开始服侍毛时都极为年轻，而且未婚，等毛厌倦了，就会安排她们跟年龄差不多的人结婚。

在毛宠幸期间，他要他的女们对他忠贞，虽然有的也会自行结婚，却仍会被毛叫去陪伴。

毛从未真正了解这些年轻女孩对他的看法，毛分不清身为她们的伟大领导和一个男人之间的差别，有位女友有一次笑嘻嘻的对我说：“主席这个人真有意思，他分不清楚人家对领袖的热爱和男女的相爱，他认为这是一回事，你看滑稽不滑稽？”

这些年轻女孩在敬畏毛的政治权劫外，也倾倒於毛的性能力，毛在六十七岁时，阳痿问题完全消失，毛在那时成为道家的实践者--性的功能是延年益寿，而不单是享受。

道家学说是毛性放纵的藉口，我不可避免地知道了毛的许多臭事。他的女友平时则大肆宣扬这种特殊关系，而且说话露骨。毛常把素女经拿给他的一些女人看，这成了他的教科书。有的女孩很年轻，文化程度又低，这部书字

句艰涩，与现代语言有不少差别，她们常拿一些看不懂的字词来问我。这些都是很难解释清楚的，也无法说清。有一天一个女孩子毫无遮掩的告诉我：“主席可真是个伟大人物，他样样都伟大，真使人陶醉。”

年轻女人既多，有位年轻卫士便惹上麻烦，有天半夜，一位文工团团员来卫士值班室给毛取安眠药。这位卫士开玩笑的拍了女友的臀部一下，说她长得很白很嫩。她立刻变了脸，骂了一声：“流氓”。匆匆走了。她回到毛的卧室，向毛全部都说了，当夜毛将汪东兴叫来。

汪从毛卧室出来後，便冲进值班室，对卫士吼说：“你怎么午麽事都要插一手埃 这不是老虎嘴里拔牙？”

卫士问汪怎麽办。汪说：“听主席的。不过你也不要着急。没有午麽大不了的事。但停止了卫士的值班，叫卫士休息，听候处理，并且取走了卫士的手枪。毛原本想将卫士关起来，汪建议不如办得缓和一些，太急太严，怕出人命，并且提出，将卫士作为正常工作调动，调出北京。毛同意了汪的意见。过了两天，汪东兴找卫士正式谈话，将卫士调走。我们在上海逗留的时候，毛住在锦江饭店南楼第十二层楼。整个南楼 有一组人员居住。这次同行的有一位女机要员。我在一九六一年跟这位机要员很热火，二月时毛在她的民兵服相片背面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她当时就想拿出去发表，被毛阻止了。

一天凌晨四点，新调来的一个年轻卫士慌慌张张跑到我的住房将我叫醒，说，：不好了。我到主席房里去给他的茶杯倒开水，我也不知道有人睡在他的床上。我一进去，她光身掉下床来，吓得我立刻退出来。你看这怎麽办？”那位卫士才来一组不久，不清楚毛的生活规律。他说他不晓



得毛房里有女人，他也没看得很真切，只是从放在房门後床前的屏风縫隙里瞧见她。我起来说：“别急，主席看见你没有？”

她说：“我也不知道他看见没有。我刚一进去，她掉下来，我就跑了。”

我说：“也许主席没有看见。只要他没有看见，她怕难为情，也不一定告诉主席。就算告诉了，也没有关系。主席还不是明白，大家心里有数。”

我又劝他，以後不可大意。进房以前，一定要清楚里面有没有人。

卫士说：“我刚来，也没有谁向我说明，该什麼时候进去，该怎麼辦，全凭自己揣摩，自己摸索。我又不知道会有这种事。”一面说，一面哭。我又安慰他，问他告诉汪东兴没有。他说还没有。我告诉他，明天乘空告诉汪东兴，可是不要再同别人讲了，免得传来传去，就成了大问题。又告诉他，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以後可要小心了。毛的房里有女人，千万不可进去。以免误会。

卫士说他不能干下去了。我说干不干自己作不了主，汪东兴也得听毛的。那卫士有十九岁，很天真老实。最後他说：“万一有什麼事发生，你要证明我确实不了解情况。卫士从我八楼的房里出来後，回到十二楼值班室。不过十几分钟，毛房里大吵大嚷起来。卫士不敢去看，後來叫得太厉害了，他才走到房门口。她正在大哭，毛看见卫士，叫他进去，说她不尊重他，没有礼貌，立刻开会，批评她。原来她与毛都是湖南人，在中南海跳舞认识的。她有个朋友，想结婚，毛不让她结婚。今天早上，又讲到结婚的事，她便说毛将她当作泄欲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过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毛听了非常生气，将她踹到床下，就此争吵起来。他两人根本没注意到卫士

进去倒了开水。毛叫汪东兴去，要汪立刻开会批评她。但她如果说开批评会，就要公开她和毛的内情。而且还要公开指控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汪真是进退两难。汪便找我商量。汪说：“这怎么好。随便批评一下，传到毛那里去，毛说我敷衍了事，这就说明我们知道内幕，才马马虎虎过去。但是批重了，她沉不住气，说出真相，等于将毛的丑事抖露出来，毛会认为丑化他。”

于是汪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由我先找她谈一谈，说明按照没有听从和不尊重主席批评，别的事不要谈。她同意了。批评会还是开了。会上她觉得委屈，又哭了一顿，作了自我批评。这事算是就此了结。

但毛仍不让她结婚。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顾不上了，她结了婚。毛转而对一位文工团团员发生兴趣。这位是江青在外地时第一个整晚待在毛房内伺候他的女人。在一次晚会后，毛将她带回一组住所，这时江青已去杭州。这位文工团团员白天晚上都住在一组。端茶送饭，完全由她侍候。毛带着她到了上海以后，仍住在锦江饭店南楼。毛和她正是打得火热的時候，夜晚便要她睡在他的房里。

上海市公安局的人、上海市委招待处的人和锦江饭店的负责人都在这里，再加上饭店的服务人员，这么多人都知道毛留女人住在房里。这位文工团团员也很得意。她原本就想利用这次外出，将她与毛的特殊关系挑明。她同我说过：“过着这种不明不暗的生活，算怎么一回事哪？”

但汪东兴负责安全工作外，还兼顾毛的名誉。那么多人知道毛留女人在房内过夜，影响太坏。何况人多口杂，不好。汪认为还是劝毛让这位文工团团员住到别的房间里好些。但汪又不敢自己去跟毛说，便叫卫士给毛提意见。汪跟卫士交代，不能将以上的意见说明是出自汪的口里，

能说是他本人的建议。卫士向毛讲了以上的建议。毛很不高興，但是勉强同意了。让这位文工团团员住到八楼的一间房内。这便种下了将这位卫士调走的原因。

这位文工团员还给毛介绍别的女人。她名副其实的“内举不避亲”，将姐姐们都介绍给毛。毛曾让她将大嫂带来见过一次。这位女子年纪大了，长得也不好看。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毛在我们住的无锡太湖内的梅园请那位文工团团员、她二姊和二姊夫一起吃饭。梅园是一个小岛，有一座二层楼，还比较大。另外在旁边有一座平房。周围就是花圃，种有不少梅树，都是枯枝，尚且没有绽出花柔，外围则是茫茫无际的太湖，真是烟波浩渺，正在雪後，四望白皑皑，恍如幻境。毛在岛上散步一周，随口说：“湖海烟波客。”叫我对下句。急作之间我说：“春闺梦里人。”

毛哈哈大笑说：“根本对不上。大夫，你还得学学对对子。”

毛不在乎二姊是已婚女子，绿帽冠顶的这位二姊夫不但没有义愤填膺，反而深觉与有荣焉，窃望以此做升官之阶。晚饭後，毛叫他回家，让二姊住了叁晚。在这期间，毛将曾希圣和柯庆施叫来，讨论了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毛表示支持曾希圣的这一建议。但到一九六二年夏，又批评这是资本主义复辟。

汪东兴为此曾愤愤地说：“竟然还会有这样忘八式的男人。”汪东兴还讥笑说：“她的妈是死了，不死的话，也会来。这一家子真是一锅煮。”

自一九六零年以後，毛的性放纵越来越不顾一切。汪东兴一次同我说：“主席年纪老了，是不是觉得活不久了，要大捞一把。否则怎麼有这麼大兴趣，这麼大劲？”

大部份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劫，在在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濡目染之後，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着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後，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异趾高气昂。与毛的特殊关系是这些未受教育，前途晦黯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机会。被毛宠幸後，个个变得骄纵，仗劫凌人而难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毛踢开的女人，利用与毛有过这种关系往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

看了这麼多被毛腐化的女孩後，我才开始觉得，江青走过了相同的路。在延安初和毛结婚时的江青也许真的和今日十分不同。也许毛也使江堕落了。

那位文工团团员有阴道滴虫病。她说在文工团内，女团员穿的舞蹈服装，全部是混穿混用的，所以一名女团员有了滴虫病，很快就传给了所有的女团员。这种病在男子受染後，没有什麼病状，容易忽略过去，但是可以传给女人。女人在初染急性期，病状明显，但到了慢性期，病状就很少了。

毛很快受到传染，成为滴虫携带着。此後，凡是同他有这种特殊关系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受到传染。毛根本不相信他自己已经受染。一组知道内情的人，都自带盥洗用具，而且我的药箱内又得装入消毒用药，交给卫士，让他们自己动手。我交代他们，消毒这事不能让毛知道。

一九六一年二月，也就是春节後不久，我们乘毛的专列前往广州。

汪东兴一上路似乎就有不好的预感。毛此行带了更多的女人。汪东兴出发後便跟我说：‘两个女的赛过一面锣。’这次随行的，除车上的女列车员之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托儿所的幼儿教师，她教过我的大孩子李重。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位很善良而老实的年轻幼儿教师。原来她在中南海的舞会上，多次与毛交往，从而密切起来。她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离开北京最远的地方只到过香山。毛这次带她出来，是让她开开眼。一位高级军官妻子也同行。她看上去有四十几岁了吧，黑黑的，头发在脑後挽了一个髻，面容沉肃。那位妻子和毛在延安时就熟识了，一九四九年以後，被送去苏联学习，回来以後同军官结婚。江青知道这段往事，一直想整她和她丈夫。彭德怀做国防部长的时候，江没有办法。一九五九年後林彪上台当了国防部长，江借林彪的手，要整她丈夫。这次这位妻子是向毛求援来的。一路在火车上，毛曾叫军官妻子到他的车厢几次，每次出来，面色都很忧悒。到杭州的当天晚上，毛又叫她到他的住室去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清晨，一位女机要员来叫我，她说，军官妻子一夜没有回房间。我们去找她，发现她坐在湖边的石头上哭。毛当天便叫人给军官妻子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北京去了。这事我一直弄不清原委结局。离开杭州，去武汉，中经长沙，火车停在长沙郊外黑石铺机场。毛召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省委几个人到火车上谈话。毛与幼儿教师在他车厢内混很久後才姗姗出现。张平化和湖南省省委书记之一王延春在隔壁车厢里等了很久。王是河北人，保留着农村中蹲着谈话

的习惯，一直蹲在沙发上。会谈开始後，我、幼儿教师、两位机要员到火车下面散步。机要室录音员刘凑过来，同我们一起走。大家正在说说笑笑地走着。刘对着幼儿教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她愕然问刘：“你听见我什麼话？”

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里，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

她又问：“还听到什麼？”

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

这时不止是幼儿教师，两位机要员都呆住了。幼儿教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向火车上去。

张平化他们谈过话後，毛说休息一下就开车。幼儿教师马上去找毛。她向毛讲了火车上安装了录音设备。

隨後毛把汪叫去他车厢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汪向毛讲，他调回来，这是第一次外出，不晓得谁让录音的。汪出来以後，专列便向武汉全速驶去。

叶子龙和高智都下放劳动去了。机要秘书只有罗光禄一个人。汪将罗和录音员刘叫来。

汪说：“主席问我，是谁让录音的。我说不晓得。我这次调回来，第一次外出。原来带些什麼人，照样带这些人。录音员是以前都带出来的。主席让我审你们，录音到底是怎麼回事情？还说，要将录音员关起来。我说，不要关了，跑不脱。”

汪让罗光禄说说，录音是怎麼搞起来的。罗说，他也不清楚，为什麼装，什麼時候装起来，都不知道。这事要问叶子龙。

汪说，叶子龙已经下去劳动了，怎麼问得到。汪又问刘。刘说，领导指示他每次跟出来录音，他照领导的指示办，别的都不知道。

汪瞪了刘一眼说：“领导上叫你录，你就录。主席同身边人随便闲谈，你录下音来，也是领导上布置的？”刘不讲话了。

汪又说：“这简直是没有事找事。你们要录音，事先又不告诉主席，又乱录一阵。我怎麼同主席讲？”汪让罗和刘坐着等他，又到毛的车厢去了。

车到武汉是清晨四时多。大家下车到了梅园招待所。汪带着刘和招待所的一个电工，又赶到火车上去拆除录音设备。

我因为很疲乏，到招待所後，立刻进房睡下了。等我睡醒，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

我走到二号楼汪住室旁的会议室内。室内桌上摆着录音机，机音带，电线，各种小收音喇叭，一大堆放在那里。毛命令汪东兴、康一民（机要秘书室副主任）、罗光禄、录音员刘站在桌子背面，拍了几张照片，注明是对毛进行秘密侦察录音的人证物证，并将照片存档为证。

康一民是乘飞机从中南海赶来武汉的。康对汪很不满意。康说汪应该明白，没有中央几位领导人同意，无论杨尚昆或者叶子龙都没有这麼大胆。康认为汪没有在毛面前说点好话遮掩过去。

汪说，这个事，以前没有任何人打过招呼，这次是毛发觉的，怪不上别人。吵的结果，由汪去向毛报告，就是说是机要室会议科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後好写党史。

毛听了以後更加生气，说：“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准备，赫鱼晓夫式的黑报告？”以窃听他私人对话的方式撰写的党史，只有可能是黑报告。

毛私生活的放纵早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毛经常出巡全国各地，会晤地方首长干部的作法是种政治策略，以此来越过庞大的党的官僚体系，直接和地方领导接触。毛不愿意他在地方上的谈话被传回中央。他不愿意他随时讲的话，被当作中央制定政策的依据。当然毛更为愤怒的是，背着地录下他的讲话，可以作为以后反他的黑报告的依据。

毛又要汪将过去录下来的材料全部收缴焚毁。毛说：“不要留着将来做黑报告的材料。”

刘录音员坦白交代，杭州汪庄也装有录音设备。汪报告了毛，又派了一中队丁队长去拆除。

对有关人员的处分，康一民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机要秘书罗光录调至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由机要室调回徐业做毛的机要秘书。徐原先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公开谈论李银桥说江青去杭州躲风的事。刘下放陕西省劳动改造。

毛自然也清楚，康一民、罗光录、录音员刘只不过是奉命行事。对于火车专列、武汉梅园招待所及杭州的汪庄中的人，毛都没有过问。毛说：“这些人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知道。”

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史达林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反他的准备行动之一。很自然，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

使他更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十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后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



自此後，毛对我便没有再像以往那样信任。

毛处理完录音事件以后，我们便南下去广州。一路上气氛仍十分紧张。毛要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会议，中央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陈云都先後到了广州。小岛上武装警卫森严，如临大敌。此时全国饥荒四起，党内不协调，政局不稳定。当时城里无粮，农村也无粮，因此生怕工人闹事。

广州的安全问题棘手。广州距离香港近，敌特可能由香港潜入广州，来搞暗杀或窃密。一九六零年一月上海会议期间，中共中央调查部、总参谋部参部等机构及公安部同时截获台湾方面的情报，台湾知道了中共在上海开会，要派人破坏。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大发脾气，认为内部有人泄密。进行彻查。凡是在此期间寄过信的、打过长途电话、电报的，一律审查。后来查明，原来由北京及各地向上海飞去的飞机过於中，因此被台湾方面推测出来。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非常紧张。他召集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汪东兴和广东省公安厅的一些人布置小岛的安全警卫。在小岛的各个出入口和一些隐蔽处，都增派了武装哨和流动哨，非指定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小岛。我参加了这个会，小岛内的医疗卫生由我负总责。

上午开过会，下午广东省人民医院的赵院长来找我，赵提议，要在小岛内设立一个医务室，解决工作人员的就近医疗问题。正在商量时，护士小李打来电话，电话上她的声音很急，说：“大夫快来吧，江青同志发了大脾气，叫你快来。”江青的神经衰弱又成了一件大事。

我匆忙与赵告辞，赶到叁号楼，进了值班室，护士、卫士都在。他们都紧张得不得了，看见我进来都说：“这回可够呛，就像中了邪一样。护士挨了半天的骂了。”

我问护士是怎麼一回事，护士器器啼啼地说：“今天早上起来气就不顺，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怎麼做也不行。下午睡过午觉气更大了，说昨天晚上给她洗澡，故意用开水烫他的屁股，给她吃的安眠药有问题，是有意害她。”

我向护士说：“不要急，你到一组来工作，是保健局和警卫局通过江西省委调来的，又不是你自己想要来的。何况原来调你是为了给毛主席做护理工作，江青硬要你，这些事情总能讲清楚吧。”

我走进大厅，江青正在来回走着乱转，看见我进去，她将一块毛往桌上一甩，说：“大夫，你们到底用的什麼人，安的什麼心哪？”

我坐在她的对面，问她有什麼事。

江青用手拍桌子，说：“有什麼事，你不知道吗？”我只好向她说明，我刚刚在开会，不知道发生了什麼事。

江说：“昨天晚上洗澡，护士有意用开水烫我。给我的安眠药，胶囊红颜色发淡，这里面有鬼。”

我说：“给你洗澡，水的温度调得不大合是有可能的，不可能是开水。而且她们给你冲水前，自己先用手试，如果是开水，她们自己也受不了。何况卫生间的热水管也放不出开水来。”

江青说：“我只说了一句，你讲了这麼多句，难道我讲假话？安眠药的问题呢？”

我说：“我没说你讲假话。我只是说，水热了一点是可能的，但是不会是开水。安眠药是保健局、北京医院通过香港的华润公司，从美国进口的，每批货进口的时间不同。不是一个批号。可能颜色上有些不同，但是进来以後会经过药物鉴定和检定检查，不可能有假药或不纯的药。更不可能有毒药。你吃的药全部是经过这些检验手续，密封从北京带来的。药箱由护士们一同保管，取药时要两个

人同时去取。她们两个人，包括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关系都经过保健局、警卫局审查清楚，没有问题才调来工作。她们工作上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决不可能捣鬼。她们如果捣鬼，保健局和警卫局岂不是都有鬼了。”

江青说：“这话可是你讲的，我没有讲这些。我看你是包庇他们，她们做了坏事，你不但不管，还要替她们辩护。我不同你辩，把汪东兴同志请来一同讲。”

汪东兴一反以往与江对立的姿态，笑着说：“江青同志，有什么事情要办？”

江青说：“老汪，你是公安部副部长，又是警卫局局长，主席这里的事情都交给你管，我可要领教一下，你手下的干部，到底应该用什么态度服务对象。”

汪又笑了笑说：“江青同志，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商量着办，不要急。”

江青说：“老汪，我慢慢讲，你们的这位大夫都顶来顶去，我还能急吗？”

我刚一开口说：“事情是……”江青立刻插嘴说：“你不要再喋喋不休了。老汪，我刚才同大夫讲，护士小姐的工作太差，洗澡的水温度不好好调，安眠药换了批号，也不向我解释说明，这些难道不应该批评教育吗？我向大夫诉苦，你是大夫，起码也应该安慰病人啊。大夫倒好，一股劲教训我，完全不把我看成个病人，大呼小叫，这是什么态度？一点对待病人的同情心都没有，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疗工作者吗？”

江青停下来，我又开口说：“事情的过程……”江青立刻又插嘴讲下庄说：“医务人员的根本职责是关心爱护病人，怎么能同病人辩论？而且是盛气凌人，难道真想让病人精神上受折磨吗？”

我又开口说：“江青同志……”

没有等我说出一句话，江青又大声说：“你不要再辩了，停止向我争论。”

这时我已慰无可慰。我站起来，对江青说：“既然是谈话，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不能制止、压制我说话。不准许我讲话，我没有必要参加这次谈话。”我棋了心，不干了。

我走出室外，将房门重重一关，轰的响了声，我隐约听到江青讲：“你看，你看，当着你们部长的面，都敢这样态度。”

我走出来以后，在院子里走了几圈，冷静下来，心想，可不能吃眼前亏，要立刻同毛讲讲这个过程。在相互告状这事上，毛往往是先入为主，他认为谁先将事情经过告诉他，谁讲的就是真话，以后讲的人，多半与事实有出入。因此我不能等待江青先去讲。正当这时，卫士走来说：“汪部长和江青同志请你去。”我只好又走回叁号楼大厅。

刚推开室门，江青看到我就说：“我已经同你们部长说了，停止你的工作，关你的禁闭。”

我说：“好吧！：我立即退了出来。事不宜迟，停止了工作没有关系，如果关了禁闭就不好办了。我立刻走进一号楼，毛卧室旁的卫士值班室。卫士正在。我问卫士，毛醒了没有。卫士说刚醒，今天睡得不错。喝过了茶。我走进毛的卧室。毛确实是闭着眼躺在床上。我走近床边，叫了声：“主席。”

我睁开眼，看到是我，说：“李大夫，怎么样，有什么新闻没有？”

我说：“有，江青停止了我的工作，还要关我禁闭。”

毛半欠起身，头放在床栏上，拿起烟吸起来，说：“这麽厉害啊？什麼起头搞的？”

我告诉毛，我告诉毛，自从给检查身体以后，江对于医生们说她身体已经基本恢复了，十分不满意，拿护士撒气。我向毛说：“她吃的安眠药同你的完全一样，怎么会鬼？”

毛吸了两口烟，说：“我常说，江青这人有叁点，第一是个钢铁公司，一点弹性也没有。第二是个纸老虎，顶她一下，没有什么了不起。第叁她是刀子嘴菩萨心。嘴上厉害，心里还是好的。江青这个人就是不讲道理。你告诉了我，就可以了。不要向别人说。我会同江青讲。你先避开几天，不要出头露面，不给她点面子，也不好下台阶。你同护士们说说，不要怕。”

我走入卫士值班室，江青正从正门走到毛的卧室。

随后我休息了叁天，正巧陶铸请毛到佛山市去参观，因为佛山是广东省市容整顿最清洁的，烧瓷也很出名。毛告诉我，不要同他去了。以便向江青表示处罚过，就可以了结。

那天朱德要看电影，我随朱在礼堂看了日正当中。我很喜欢那部电影。贾利古柏是我最欣赏的演员。

第二天上午护士打电话来，说江青叫我去。我走到二号楼江的休息室。江青倒是改变了态度，叫我坐下，然后说：“我知道主席在他的医疗上相信你。你也不必这么骄傲。主席昨天晚上让我告诉你，好好安心工作，过去的就算了，要向前看。”然后又拿了一本内部参考说：“主席要你看看圈的这个消息。主席说，要注意国家大事。”

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国最重要的大事是全国性的饥荒，各地饿死数以百计的农民。中共中央工作广州会议的目标便在于调整农业政策。毛二月里大都在起草一份农业计划，赶着在工作会议上提出讨论。

毛要看的那份「内部参考」是有关安徽为克服饥荒，在农业组织上所做的应变改革。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大跃进的狂热支持者。到一九六一年春，安徽全省大约已有将近一千万农民挨饿，随后数月，上百万人饿死，几万人逃荒到外地谋生。曾对大跃进幻想全部破灭，力求恢复农业生产。

这时在安徽，按社员的劳动底分承包土地，按实际产量记上分，也就足将田地分给个人耕种，田间的农活由个人负责，打下粮食分配时，还是大家分。因比，曾认为这仍是公社化式的「社会主义」。这点在无锡时，已经得到毛的同意。

一九六〇年初上海会议时，毛讲话中提出，可以将农业高级合作社时候实行的田间管理农活，包产到户的办法，恢复起来。这新办法实行後效果不铅。安徽的农产量上升。毛的广州会议草案中，未曾提到责任田制或是当时中国其他地区实行的包产到户办法。在三月十五日，曾希圣向毛汇报了责任田的好处以後，毛表示，可以试验，并且说：「如果搞好了，可以增产十亿斤粮食，日子好过些。」曾立刻自广州打电话到安徽省委，推广责任田，还讲，已经通天了，放手干，不要怕。

事实上，会议上很多人对这个办法意见下一致，其中反对最激烈的是华东局第一书记何庆施（上海市长）。柯度施对曾希圣十分不满意，安徽省委授华东局管，曾直接

通知安徽省委，没有事先同何商量，何认为「曾目中无人，而且责任田是反公社化的手段，公社化才是社会主义方向」。

中央各领导的信念在广州会议上仍不明显，但个别的意识倾向则可一目了然。

一九六一年二月，我第一次听到邓小平发言表示支持曾希圣的责任田制，他说了一句「名言」：「管他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在青年团一次台上讲的。原是黄猫黑猫，不知怎麼改成白猫黑猫了。邓小平首要的目标是提高农产和结束饥荒。

刘少奇的发言虽没有邓有力生动，也逐渐表明他的态度。在广州会议上，他倾向於支持包产到户的刀法。

广州会议并未解决这些分歧。领导人决定亲自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以求第一手资料，才能决定。台中讨论通过毛的「农业合作社工作条例」草案，文中未提到曾的责任田制，但因是以草案方法通过，预留了往後可以加以修改的空间。会议决定五月再重新召开，届时再做调查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在议程结束後便马上下去。领导人们表面上的表现还是团结的。但在幕後，受内意识形态分裂日异加深。全心跟随毛主席脚步的人已经寥寥可数了。

我看完这篇消息，直觉感到曾希圣提倡的包产到户政策会惹祸上身。表面上看来，这政策应该施行，如果将田地分给农民自耕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中国便该实行分田制。农业是中国的命脉，现在饿殍遍野，人民得吃饱肚子才行。大部分的领导人选择社会上义道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社会主义能战胜贫穷，提高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促进中国富强康乐。这也是我支持社会主义的原因。我视社会主义为手段，而不是目的。现今面临严重农业危机，



许多领导人相信将耕地还给农民可以提高生产，而农产量的确提高时，更是大力支持。

问题是，曾希圣的责任田制倾向於私有制，因此不是社会主义。此时共产党内因对社会主义定义和中国福祉为何的看法上，意见分歧。对毛来说，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毛的最高理想是共产、公有、平等——也就是一种原始的共有制。毛也清楚农民要的是自己有田。但他说：「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要的是公有制。现在农田生产上有困难，我们可以让一步，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方向。」

毛坚持公社化，无视於责任田制在提高农业指标方面比公社有效。他说：「还要那句话，古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不死心。」

毛的话很明显，他之同意责任田，只不过是「暂时的退却」，并不是同意了此後就将田地包给农民个人或家庭长期自行耕作。

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百姓枯瘦如柴，面容槁枯，营养不良，水肿更形严重，到处冷冷清清。这个会决定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工作，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这年总计有一千万城市人口被迁至农村，以减轻城市负担，并增加农村劳动力。

领导下乡调查研究的结果并不乐观。农村情势非常黯淡。领导人依此更坚持他们的信念。陈芸坚持责任田制。他说：「农民已经有了怨言说：「蒋介石手里受难，吃饭：毛泽东手里享福，吃粥。」这说明农民很不满意。农民分到了田，自然有了乾饭吃。「会中又修改毛的「农业合作社工作条例」。当时许多地方已取消人民食堂，在会中正式宣布解散。一九六二年又下放一千多万二人到农村，工业、钢产指标大幅下降。但决定仍保留人民公社。一九六

一年夏季，毛又回到庐山。这次的庐山议程准备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等问题，中心是调整国民经济，建立新的平衡，才能巩固、充实和提高工业和农业。毛还说，这次一心开会，再不让任何人捣乱。八月庐山会议，毛仍有有力的支持者。毛的忠实拥护者有柯庆施。此外，这时开始，林彪已经在《解放军报》报头上，每天刊登毛主席语录。军区司令员在军中展开学习毛主席思想运动。林不断利用各种讲话的机会吹嘘「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林又号召全国人民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作毛主席的好战士。湖北省书记王任重也是支持毛的人之一。成为一个讽刺而不寻常的现象倒是一九五九年被打倒的彭德怀。这时彭到他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也是毛的家乡）调查后，认为搞责任田或包产到户是一股歪风。在他的报告中主张「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保证集体经济在全部收入中占绝对优势。周恩来和朱德是不敢明确提出自己的真正看法的人。她们唯毛的马首是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华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拿不定主意。他倾向于支持责任田，但主张只将全省农田百分之三十「借」给农民自耕。陶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你们要搞个贫穷痛苦的社会主义吗？」

刘少奇是同意包产到户的，说过：「工业上要退够（指政策上的降低生产指标和减少指标。一切有利于说动农民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不要说那一种办法是最好的、唯一的。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

至於邓小平，仍在重复「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名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批评曾希圣搞责任田说，这是方向性错误。邓小平则说：「华东局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毛自然不同意刘、邓的看法，这是很明显的。一九六〇年五月，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一次会议上外交部长陈毅巧妙地说，这位元帅很善辞令，他很想见见你们那位在西方很出名的残酷无情的暴君。毛听了哈哈大笑说，很想见见这位元帅。於是二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蒙是瘦小的老头，穿一件鲜红衬衫。毛与他握手时说，「你知不知道，你是和一位侵略者握手？联合国有一个决议，我们被扣上了侵略者的帽子。你同一个侵略者握手，你不在意吧？蒙神色活跃，说：「不错，我写的回忆录中，曾对阁下有这样的评论。我问过印度总理尼赫鲁，他说你最好自己去看看，毛像个和气的老人家。今天我看见了，联合国大约认错了人。」随后他们谈到战争和战争的冷酷无情。毛说：「在追求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如果不是不顾一切，残酷无情去获取的话，就不能达到目的。问题在於你确切要知道，你要什麼，你要做什麼，决定去做什麼，要无情地铲除妨碍实现你的计划的那些无能，又阻碍你前进的一切事物。」由此也可以看到毛对农业公社化的信念（1）。

这次的庐山会议倒是很平静地过去了。毛很少参加会议，神情也不开朗，找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谈过一次话。曾将这四、五个月在安徽实行责任田的情况，向毛作了汇报。

有一大晚上，毛叫我去读英文。在谈到国内的状况时，他说了一句使我非常吃惊的话。他说：「中国共产党里，好人早都死完了。现在剩下的都足些行尸走肉。」

五年後，到文化大革命时，毛的行动充分证明，当时他说这句话时，是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那时才知道哪些人是毛口中的「行尸走肉」。

注释：

(1) 毛於一九六一午又接見蒙哥馬利元帥。毛邀元帥和他在長江共游，但蒙因消化不良而未成行。

毛很少出席庐山会议的讨论会。就在共产党正在激烈辩论如何克服饥荒，而千百万的长民相继饿死之际，他从未公开承认大跃进的失败，也不肯正视总路线所引起的大灾难。在这期间，他谈话很少，相当沉幽。毛很少公开露面。但是很明显，他仍渴望崇拜。在大灾难中，这种倾向更为明显。林彪提倡学习毛思想和那些女孩子们的热情崇拜，正符合他的心意。

在庐山，毛与江青仍住在上次住过的小楼。晚上天天开舞会，由江西省歌舞团的乐队伴奏，歌舞团的女孩子们伴舞。因为江青每晚都参加，所以散场比较早，舞场中也比较沉闷。

毛曾经为丁玲、杨开慧和那位身着民兵服的女机要员写过诗词，江青很不平静。

毛为了安抚江青，给她写了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时为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江青有了这首诗极为得意，到处显示。并且自己作了一首诗，《五绝：自题小照》：江上一峰青，隐在云雾中。

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将自己的名字夹在绝句里。这绝句正也是抒发其政治野心不能得逞的抑幽之作。在文化大革命时，这句绝句被她拿来宣扬自己。

这里附带说一下，一九六一年，毛的一位女友送毛一封信，其中抄了陆游所作《卜算子：咏梅》，藉以表明毛已将她抛置了。毛看了以后，也作了一首《卜算子：咏梅》

给她：「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独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明明是安慰她的一首词，可是到一九六三年，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发表了这首词，报刊上纷纷认为这是申明：「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寒冰雪中，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斗争。」这是典型的将毛作的词「拔高」。

毛每天起床後，我们陪他到江西省委於一九五九年为毛在庐山造的新别墅旁的水库里游水。然後在别墅中「休息」，以避免江青和其他领导人的耳目。这时都是由庐山疗养院的一位护士（毛、护士两人初遇於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陪他。

毛为了不让江青撞见，有两次从山下乘车到九江，在长江游泳，然後到九江市委招待所和他的「女友」休息。但是天气实在太热不能久停，只好匆匆又回到山上。

一九六一年夏季，毛叫他的第二位妻子贺子珍前来庐山（1）。那年春夏之际，贺子珍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其中提到「你一定要注意你身边的王明一样的人害你」。贺在与毛分居後便发生了精神病，毛和贺从未正式离婚。贺是少数经历过长征的女英雄之一。但毛在一九三五年到延安後，很快便对贺失去了兴趣。一九三七年贺去苏联养病。二次大战期间，贺在苏联与她女儿李敏相依为命。毛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当时也在苏联。苏联精神科医生曾诊断贺子珍为精神分裂症。贺回中国后，精神状况也一直未见改善。毛安排她住在上海。多年来，贺一直未恢复正常。

毛给贺子珍回了一封信：「……我身边绝无王明之流的人，我已经把他们下放的下放，送去学习的学习。请你

放心。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兢兢业业，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毛安排贺和他见面。

毛将一条三五牌香烟，连同一千元人民币，让上海公安局局长交给贺子珍的弟弟，在上海警备区工作的贺敏学，转给贺子珍。

江西省公安厅派人将贺子珍接到庐山。毛与贺子珍就在半山新修的别墅中见了面。

贺子珍满头白发，步履蹒跚，面色苍黄。除去刚刚看到毛时，眼色现出一丝狂喜而惊慌的神情外，几乎没有任何表情。

毛见到贺子珍进来以后，立即迎上去，拉住贺的双手。然后拉着贺子珍坐到身旁的扶手椅上。这时贺子珍两眼开始红润，沁出了泪水。

毛拍着贺的肩膀，微笑着说：「你看到我给你写的信了？钱收到没有？」

贺说：「信看过了，钱也收到了。」

毛便细问贺在卜海的治疗情况，和日常的生活情况。贺说话轻声低缓，每个字和每个字似乎都不连贯。可是时间越长，贺的神情越加激动，脸也现出淡红色。

毛留贺吃饭，贺摇摇头。毛说：「我们见面，你的话不多。你回去后，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疗，我们还要见面。见面。」

江西省公安厅的牛厅长陪着贺子珍走了。毛在客厅里，吸着烟，沉思不语，脸上显出抑郁的神态。我看得出他很为贺难过。他最后开口，声音小得我几乎听不到。

他说：「老多了，病还是很重。」又回过头来问找：「是不是上次给江青检查身体的那位栗宗华院长给贺子珍看病？」

我说：「是的。」

毛问：「到底是什么病？」

我说：「是精神分裂症。」

毛说：「什么叫精神分裂症呢？」

我说：「就是人的思想和现实世界相相离。这个病的原因，还没有研究出来。在治疗上，一些药的效果也不大好。」

毛说：「这不是同毛岸青一样的吗？」

我说：「是一样的病。毛岸青在大连，由保健局派医生和护士在治。」

毛说：「我看这两个人是治不好的了。这也足无可奈何啊！」

我只能沉默地点点头。

一九六二年在上海，我又瞧见他脸上有相似的神情。他那时把五十多年前他年轻时，在韶山老家发生第一次关系的女人找来见他。当年的年轻女孩如今成了白发老妇。毛给了她二千元叫她回家。毛说：「怎麼变了这么多。」

就我所知，江青一直不知道这次见面的事。



注释：

（1）在此之前，一九五九年，毛在上海时曾见过贺子珍一次。

一九六二年是毛泽东政治上的转捩点。一月十一日到二月七日，毛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七千多人，所以又叫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和讲话。

这次的七千人大会讲话，刘少奇(当时刘少奇已出任国家主席，毛仍任中国共产党主席)事先曾呈请毛批阅。毛说他不看。毛说开这个会要民主，让各级干部按自己省区的经验发表见解，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毛叫刘先将讲话作为底稿，再根据与会人士的发言整理出一篇报告。

刘的讲话出乎毛的意料之外。刘拒绝接受毛的官方说法：天灾连连，导致叁年饥荒。刘在人民大会堂讲话中强调：“天灾是一片，人祸是一国，要记取这个教训。”

此外，刘讲到那些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并反对大跃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和地方干部有翻案平反的机会。只是彭德怀不能平反。

毛为此很不满意。毛在会议後跟我说：“开会不讲阶级，不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脱离这，讲什麼天灾人祸。我看这种讲法的本身，就是灾难。但许多与会干部都同意刘少奇的看法。中国现况如此惨淡，大家对主要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七千人大会开了一个多月。这次会议按照中共的说法，是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有历史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对於统一全党思想，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作用。但并没有指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造成全国人穷财尽、饿殍遍野的根本原因。可是会议中，

将倡导责任田和包产到户，使农民稍微喘口气的几位典型的省市负责人开刀示众了。毛只是在大会开幕，及刘、邓、周、林大会发言时，出席大会，其他如小组会等，他都没有参加。他每早起床后，就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会议室，在大床上由女友陪伴阅看小组发言简报。基层干部终于揭开大跃进的假象，面对经济困难的现实。基层干部在大跃进的高指标压力下，掀起一阵浮夸风，浮躁盲进，以免被戴上右派帽子。上面给压力，下面的基层干部不得不讲假话，结果下面人承担了错误的大半责任。七千人大会刚好给这些基层干部发牢骚的机会，将这叁、四年对党领导的怨气发出来。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表示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这句顺口溜有四句话如下：“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乾一稀（两顿乾饭，一顿稀饭），马列主义。”

并没有人将矛头直接对着毛。大家主要集中攻击大跃进的政策。但谁都知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总路线是毛提出的口号。批评政策无异是批评毛。

毛对发言简报大为不满。他有天跟我说：“该改成‘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乾一稀，完全放屁。’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

我的值班室就在毛一一八会议室的隔壁。七千人大会期间，实在是无聊极了。坐在那里没有事情干，只好找人天南地北的胡吹一顿，要不就到人民大会堂的各个厅去闲逛，不然只好看书，憋得十分难受。

七千人的大会，大家批评得很多，已经到了由他一手造成的大灾难，不得不承担责任的时候了。虽然没有人胆敢叫毛自我批评，但毛转而把此做为一种政治策略。

毛极厌恶承认错误，他认为自己永远正确。在一九六零年，毛与蒙哥马利的会见中，我第一次听到毛坦率地承

认自己犯了许多错误。毛说：“我们对战争有了不少的經驗。可是對於工業和農業的建設，沒有經驗，辦了許多錯事。犯了许多錯誤。”

但在面對黨高級幹部和中國人民時，毛心理上難以俯首承認中國的災難是他一手造成的。一九四九年解放以來，毛終於做了第一次自我批評。

“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一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第一個應當負責的是我。”毛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卅日作了以上的講話。話後隨即批評了包產到戶制度。

我認為毛從未相信他的總路線有錯誤。撫今追昔，我才清晰見到他當時極恐懼喪失對共產黨及中國的控制。即使退居二線，毛仍自視為中國的中心。毛讓劉少奇做國家主席是為了考驗劉的忠誠度。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毛判定劉有二心。毛一肩扛起所有的責任，不是真在承認錯誤，只是變相宣稱他的天子地位而已。

林彪是屈指可數的數位支持毛的人之一。林在二月七日的講話，可真是抓住了毛此時的心理狀態。林說：“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事情出了毛病，造成了困難，總是因為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主席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擾。”

林講話後，毛從主席台走回一一八會議室，一路走一路說：“林彪的話，講得多麼好哇。要是黨內的領導人，都有他的這個覺悟，事情就好得多了。”

我聽了毛對林的評論，覺得林彪可真是搔着了毛的癢處。與此同時，毛對劉少奇、鄧小平和周恩來的發言表示很不滿意。

除了林彪有心邀宠巩固地位以外，一九五九年我和毛曾第一次见过面，华国锋却是诚心诚意的反包产派。毛将华在小组会上发言简报，拿给我看了。华说：“经过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大干以后，人瘦了、牛瘦了、田也瘦了。不能再大干了。可是农村要度过困难，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包产到户，更不能搞单干，否则将是死路一条。”

毛同我讲：“华国锋是个老实人。他说出了当前的困难。也说了解决困难的办法。他比中央的一些人强多了。”周小舟等人被下放后，张平化接任湖南第一党委书记。华为湖南党委书记之一，处理日常工作。七千人大会决定恢复规模较小的人民公社和农业合作社，工业指标再度压低，整个经济重新组织，并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

二月和叁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以国务院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名义，在广州召开了科学工作会议。所有的副总理都出席了会议，全国一些知名的科学家都被邀到会。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后，全中国学术界笼罩着一片悲观沮丧。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撤职、降职或劳改。侥幸未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也是日夜心惊胆战，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些人被迫中断研究，或是不断参加政治学习，技术旷久日疏。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会议中讲：“别人不敢讲，我要讲。中国需要知识分子，需要科学家。这些年来，对待他们不公正，要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

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主要说明，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人民的知识分子。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

并且指出，破除迷信不是破除科学，而要同尊重科学相结合。

不少科学家发表讲话，感谢政府对他们的尊重，使他们以后有机会发挥他们的技术专长。特别是一些在这些年中，受到批判或戴上右派帽子的科学家，对于这次会议，给他们摘掉帽子，恢复名誉的作法，表示万分高兴，简直是感激涕零。

在五七年发起反右运动时，毛指出知识分子的无知，号召工农干部破除迷信，破除怕教授的心态。周自然知道此事，因此他的发言绝对是有经过毛的同意。周的这个报告，事先是送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并送请毛批准。

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可以使广大的知识分子受到鼓舞，解除那种战战兢兢、心情颓丧的精神压力。可是毛却不以为然。他看过这些简报以后说：“我倒要问问，是谁创造历史，是工人农民这些劳动人民，还是别一些什么人？”毛仍然相信是劳动人民，而非知识分子在创造历史。农民起义自古以来便是推动中国历史向的原动力。

在这期间，毛召集了陈伯达、康生等人，谈过一次话。这篇讲话太长，只摘录其中他对局势的看法和他采取的对策。这篇讲话没有发表过，但很重要。毛说：“知识分子天天坐在机关里，住的好，吃的好，穿的好，也不走路，所以伤风感冒。文科大学生，今冬明春分期分批下去，教授、助教、行政人员，一起下去。到农村五个月，到工厂五个月，去参加阶级斗争，才能学到阶级斗争，学到革命。”

“现在社会上很复杂，有人提出包产到户，这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搞了这么多年，才叁分天下有其二，有叁分之一掌握在敌人或敌人同情者手里。敌人可以收买人，更不要提那些娶地主女儿的人了。”

我那时摸不清毛的意思，但感觉到他对知识分子和高级领导人的深切的敌意。文化大革命以后，江青多次讲话中，将这次广州科学工作会议称为周恩来和陈毅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屈膝投降的黑会，是给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帽子，加上劳动人民桂冠的脱帽加冠。

刘少奇和毛也越见分道扬镳。刘要给一九五九年因彭德怀案而受牵连的人翻案复职。这行动在党内极受欢迎。在七千人大会上，当时我不知情，许多干部暗暗认为，肃清彭德怀一案有欠公允。有些人将彭比做现代海瑞。

刘也许私下赞同这些看法。七千人大会后，四月，中共中央书记根据中共常务副主席刘少奇的意见，由中央组织部发一分通知，对彭德怀案和大跃进时受错误处分的党员和干部甄别翻案。这份“全力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可替至少百分之七十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平反。但连刘也无法越权为彭德怀平反。当时毛正在返回北京的途中。

在火车上，毛同我谈到这个通知时说：“这个通知是他们同意发布以，才给我看。我看安子文（当时负责平反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个人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都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随后又说：“从一九六零年下半年，一九六一年，到今年上半年，都讲困难，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在压我？”

据田家英告诉我，安子文听到毛的批评后，说：“中央？谁是中央？北京有好几个领导人：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在主管中央日常工作。我向他们报告不就是向中央报告吗？”

另一个跟毛持不同理念的党领导人是陈云。陈与毛之间的关系长期紧张，毛认为陈是靠右边站的人，两人很少来往。在一九六一年，陈云就认为包产到户不能解决问题，而提出要争取时间，分田到户，七千人大会後，陈主管财经工作，陈将他的意见详细写在财经小组报告中，呈送毛阅批。

毛在上面批了：“将情况说成一片黑暗，没有光明。此人是店员出身，资产阶级本性不改，一贯的老右倾。”

陈云是党的副主席之一。毛以主席身分指控主管财经工作的副主席右倾，这种批示对党内影响太大。田家英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陈的政义危，下了一无前例的决定：田叫林克把这个批示压下，不要交到中央书记处去，免得以後被拿来用做批斗陈云的材料。林确实没有交出，将这个批件压在他的宿舍床上的褥子下面。

我不知道谁走露了风声，将毛批件的内容泄露给陈云，陈云立即前去苏州疗养。陈未被撤职，文革中也未遭严厉批斗。但在毛有生之年，陈未再在政坛上扮演要角。

直到一九八零年，邓小平复出後，陈才重返政治舞台。

一九六四年毛去外地，当时的收发文件的秘书只有林克和徐业夫。毛只带了林克出去，徐留在北京。徐以清点机密文件为名，检查了林克的宿舍。在褥子下面找到了这份文件。他将文件转给了书记处。事後徐对我说：“林克这个人不宜做机要工作，这麼重要的文件压在褥子下面。”徐也向汪东兴和毛讲了这件事。由此造成一九六四年底林克调出中南海，自此後徐成了毛唯一的机要秘书。田家英此次没有被牵连。但文化大革命甫爆发之际，田是毛的一组人员里第一个被批斗的人。



我目睹我朋友林克遭受的痛苦和听见那些残酷的攻击，我非常庆幸自己当年没有做毛的秘书。如果我做了，我也会被牵连。

我跟汪东兴说，我怀疑毛对其他党高层领导的希望幻灭。但汪嗤之以鼻，觉得我太敏感。汪说：“我们不是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向很团结。”但我对毛的话话听得很仔细。情势正空前紧张。

在当时哀鸿遍野、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毛认为这只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一些人对局势右倾、僵化的估计，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因此一九六二年夏委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和接下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前，我有一种预感，毛不知要拿谁开刀了。

八月六日召开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只有省委第一书记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参加。毛第一天便在大会上讲了“阶级、形势、矛盾。”毛在沉默期间，在准备这篇讲话，目的是大喝一声，使全党振奋起来。

毛认为即使中国实行了社会主义，仍存在着阶级。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消灭阶级，因此阶级斗争要继续下去。

在九月二十四日於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进一步修改了他的讲话，毛又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极其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严重的阶级斗争。毛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路的斗争。”这句话后来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纲领。他认为，中国正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因此必须不断进行阶级斗争。

毛后来又说：“党员的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共产党已经成了资产阶级的避难所。

毛在两次讲话中全面发动攻击。毛批评知识分子，并且大反周恩来和陈毅在科学工作会议上的基调。毛在北戴河会议上，将知识分子与地主、富农子弟摆在同等地位说：“还没有及时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阴魂不散，动摇不定。”

毛又申斥彭德怀搞翻安。彭在六月份时交了一份八万字申诉书，说明自己没有组织反党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彭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审查，处理我这类莫须有的罪名。毛指控彭不但里通苏联，还勾结了全世界包括美国的反动势力。於是全会发言跟着毛的指挥棒转，对彭进行缺席批判，说彭和国际反动势力一起搞反华反共大合唱。甄别平反工作随之停止。

然後毛将矛头指向西藏的班禅却吉坚赞。毛说班禅是无产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潜逃印度，中共中央镇压西藏暴动。一向对北京俯首称臣的班禅喇嘛给中共写了一份报告，说明西藏的民主改革中有过左的行动，需要纠正。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支持班禅喇嘛的看法。毛随即声讨李。毛认为李是投降主义，向西藏农奴主投降。李曾在五月向中央提出一个报告，主张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联盟是最重要的联盟。毛很不满意。李维汉被免除职务。班禅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监护九年零八个月。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主张，对苏联共产党、东欧国家共产党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缓和一些。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的援助要少加限度。这在北戴河会议上，被毛指斥为参和一少的修正主义。此後，王稼祥在中共中央联络部虽然保存部长名义，但实权操到副部长赵毅敏的手里了。王稼祥就此长期疗养休息。

至於主管农业工作的人如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被斥为十年一贯的老右倾。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廖鲁言，因为说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就没有搞好的。”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底对不对？如果对的话，为什麼

闹成这个样子？”因此被斥为“中国的修正主义典型言论”。

地方首长中，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会后被撤职。安徽施行的责任田制被令中止。也指其为资本主义复辟的表现。原已萧条的农业生产更为黯淡。

下一个被点名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葛曼。葛於自治区实行包产到户，颇有成就，农业生产有了起色。甘肃第一书记汪锋一九六一年春曾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发现农民集中居住的共产主义生活和公社食堂，真正造成了民不聊生。汪、葛两人因此决定实行包产制。毛认为葛和汪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但一九六二年时只有葛受到降职处分。文化大革命后，毛於一九六六年八月第一批点了叁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名字，其中之一就是汪锋。葛曼也为此被残酷斗争，而自杀死亡。

一九六二年秋季对毛和共产党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点。毛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仍未消除阶级，批判党内异议分子，使理性的声音噤若寒蝉。七千人大会刚形成的开放活跃气氛消失殆尽。重视国家福祉，支持分田到户的人不敢再批毛的逆鳞。毛於此时提出的阶级矛盾理论，在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化大革命中成为清算斗争的指导纲领。

不同意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滔天大罪。

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中，毛仍继续点名批判，负责人是康生。

康生是老党员。我第一次见到康生是在一九五八年。他这时才开始在政坛上大展身手。解放后他曾长期在北京医院疗养，直到大跃进初期才出院。康是大跃进的热烈支持者之一。我在北京医院负责治疗康的几位医生朋友后来告诉我，康生有精神分裂症，不知为何获准出院。我很少

跟康接触，见面时也是客客气气。康常来找毛，两人私下谈话比较多。康总是非常表情冷淡，不像其他一些偶尔来找毛汇报工作的领导那么神态轻松。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康生和江青接触频繁。他们常找我一起看江青爱看的美国电影，让我翻译其中的对话。江青很尊敬康生，事事都问他的意见，开口闭口叫他康老。我从未见过她对谁这么彬彬有礼。

我尽量避免和康生接触。我总觉得康生有一股难以名状的邪恶气质，让我感觉，在他眼中，人人都是可疑分子。我觉得康生代表共产党的黑暗面，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牵连。

康生是北戴河会议及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的活跃人物。毛在十中全会上攻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借历史小说刘志丹替高岗翻案。审查习仲勋反党的专案审查小组的组长就是康生。在他的审查下，受到到这次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一共有叁百多人，包括中委贾拓夫、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白坚。

我跟习仲勋很熟，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和习仲勋黑爪牙这些罪名完全是凭空捏造的。康生这次对党领导干部的审查，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基础工作。十中全会后多人被株连或丧命。习仲勋下放河南，后被关押，直到一九八零年才获平反。许多被扣上莫须有罪名的人受尽折磨的被迫致死。

一九六叁年五月二日到廿日，毛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共政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在毛的主持下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此即所谓的前十条。

毛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因此提出在农村中推行四清运动的社会主义教育，

进行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所四清工作队，就是抽调各机关的干部组成队伍，到农村的公社进行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四清是指对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进行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和清理工分(清帐、清库、清财、清工)，要查公社、大队和小队干部有没有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行为。

在一组内，我对中国农村的一切几乎毫无所知。我只知道大跃进造成饿殍遍野，农村恢复缓慢等等。我无法理解毛所推展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

杭州会议後，毛乘专列回北京，在车上我同汪东兴和林克谈起此事。我认为，现在农民的生活好不容易开始进入正轨，毛又迫不及待地要搞四清运动，折腾个没结没完，他就是不让人过稍为好一点的日子。他这个人不好。当然我说的不好主要指他在个人生活上的不检点。

回北京後，娴的工作机关西亚非洲研究所要派她参加北京郊区农村的四清工作队。

我虽然在北京，可是以我的工作性质，完全照管不了家里的事。大孩子刚进中学，还不能完全自立，二孩子还在托儿所，秋季开始入小学，必须大人照看。我感到十分困难了。

娴是地主的女儿，怎能给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娴不但不是共产党员，她的娘家还是阶级敌人，为什麼第一个派她去四清工作队呢？

我先到娴的研究所，找到所长。他说，正因为娴不是共产党员，所以特别让她去四清工作队。为的是让她看看农村如何改造地主和富农的子女。让她接受教育和锻链，目的是改造她。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困难，只能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如果大家都以困难为理由，那麼四清工作

就得取消。可是四清工作是中央决定的，是有关全国的大事，不能因为个人家庭的事，影响中央决定的大事。

九月下旬，嫫随四清工作队到北京东郊通县农村。

嫫走后我向汪东兴抱怨：“既然领导上不体谅下情，只知道让人无日无夜工作，不知道个人的困难实在没有办法解决，这哪里是爱护人的作法？”

汪便同保健局发出联合公函给所长，说我是毛主席的专任医生。嫫马上回了北京。

刘少奇感到前十条不够完备。一九六叁年九月，刘少奇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所谓后十条。九月六日至廿七日北京工作会议上通过的提案，毛对此很不满意，多次向我说：“后十条是他们搞的，我不知道。”

我想毛的怒火不是针对后十条的内容，而是刘竟然冒大不讳，自作主张地补充了毛的前十条。毛向来刚愎自用，他自认在前十条里，已经把农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完整提出，任何修都是多此一举。毛最气愤的是刘胆敢擅自修改前十条，宣告由中央制定。毛觉得只有他自己才是中央。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中央。

一九六四年，刘少奇派王光美去河北省抚远县桃园公社四清。毛最不满的是，王光美搞了个桃园经验。到处去吹，还召开了万人大会，全体高级干部出席，把她抬得比天还高。当时我暗暗感觉到毛真正的目标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但我觉得难以置信，也不愿相信。毛那时仍一迳在批判较低一层的干部，还未触动高级领导同志。

讽刺的是，毛虽然批评了刘少奇捧王光美，他却将江青的政治地位越提越高。

李志绥著《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 第三篇

1965—1976



当夜开车，第二天中午到了武汉。机要室派来送药和文件的飞机早已到了。张耀词、吴旭君、我、周福明、徐福明、徐业夫和四位“女将”一起，和毛住进了梅园招待所。

现在整个一组的内宫气氛和以往大大不同。以往汪东兴一向控制全局，对毛的动静了若指掌。张耀词的作风却是胆小怕事。现在政治局势紧张，张畏畏缩缩，以求自保。张不让我向他讲明毛的健康情况。毛医务上事，张说他是外行，管不了，也搞不懂，他只管警卫上的事。

这次一起出来的警卫局警卫处长曲琪玉，为了打探毛的一切，同这些“女将”很接近。我和吴旭君处于一种“被排斥”的状态。我觉得他的狂妄自大令人难以忍受。

毛开始采用了全新的安眠药服法。经过五天，安眠药量恢复到以往的用量，同时睡眠也调整过来。

吴旭君同我商量，病好了，再待下去，恐怕会有不愉快的事发生，不如见好就收，回铅山去继续搞四清。我们商量好了，先告诉张耀词。张面露难色，说：“你们回来以后，我总算知道了点情况，老曲他们对我封锁得厉害，什么都不告诉我。”

我又去见了毛。我说：“你的病全好了，安眠药恢复到过去的常用量。我同吴旭君参加四清工作队的事还没有完。我们还是到江西铅山去，搞完这项工作。你有事时，我们可以随时再来。”

毛沉吟了半晌，说：“四清虽然没有完，也差不多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四清了，要比四清大得多。你们留下有好处，我随时有事找你们办。”

我听完后瞠目结舌。四清是自土改以来最大的运动，动员了上千万城市人口下乡。看样子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难怪毛问也没问汪东兴四清做得怎样。我开始明白，正在发生一场我尚不了解的大事件，虽然不完全知道这事件的内幕，但毛说比四清大得多，那么其规模之大说可以想见了。

我很踌躇。留下来，跟这帮随来的人可能难以相处；但既然要有“大事发生”，毛的羽翼无疑是个避难所。

我想了又想，还是决定回乡下去。那里更安全。

我说：“可是我与吴旭君换洗衣服都没有带，每天穿这身棉衣服，很不方便。”

毛说：“你告诉张耀词，将你们的衣服由北京带来，这好办得很。等我叫你走的时候，你们再走。”

政治变动的脉搏清晰可感。毛退隐到他的房间里，整日与“女将”厮混。曲祺玉在毛四周筑起一道无法突破的隔离。我尽量不去值班室，免得和这些人多接触。

毛叫我，我才去看毛。我在政治边上，纳闷着会出什么大事。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毛在武汉梅园招待所听取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中的彭真、陆定一和康生汇报经过北京中共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中共中央在一九六四年设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另有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等成员。毛主持这个会议，并让我坐在后排旁听。

毛在会议上说：“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就同陈伯达、康生说过，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又问彭真：“吴晗这个人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康生抢着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

别人都不讲话。

毛接着说：“当然，不同的意见都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好坏自明。你们可以放。让各种意见都可以放出来。”

彭真说话了，他想为他拿来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提出辩护。这份提纲中强调，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彭真说：“学术问题还是照主席的指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已讨论同意这一提纲，现在就等毛批准。

陆定一说：“学术讨论和批判不能随意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否则就鸦雀无声了。”

此后没有人再讲话。

三人已划清阵线——康生认为吴晗事件属于阶级斗争，想发动批斗吴晗及其同伙的运动。彭真和陆定一则认为大家对此戏的各种意见，应该看作学术辩论。几分钟的寂静后，毛决定散会。

彭真说：“是不是写一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

毛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

我马上知道大难要临头了。毛设下圈套。他不看便表示他不赞成。但彭真不了解毛。彭真和陆定一正一步步涉入险境之中，这个“中央批语”一发全党，就完了。

二月十二日这份《二月提纲》上有彭真及陆定一写的《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语》，批发到全党。

当晚毛对我说：“看来还是我的那句话：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不倒。”毛准备给彭、陆两人迎头痛击。彭真这份《二月提纲》往后成为恶名昭彰的反社会主义宣言，并导致他的崩溃。

就在彭真他们走了以后，毛的睡眠又坏了，往往二十四个小时不入睡。饭也吃得很少，有时一天只吃一次饭。我很担心，对毛这样年纪的人，睡眠少会发生不利影响。这样又不得不重新安排安眠药的服用时间。于是，不到一个星期，毛便恢复到原来的睡眠和吃饭习惯。

我刚刚感到心情松弛下来，张玉凤跑来说：“主席讲，卧室的天花板上藏着一人，天天夜里上面有响动。是不是有坏人啊。”

我不禁心里暗笑，在这样警卫森严的布置下，怎么可能有坏人爬到天花板上。

我想可能是老鼠在上面作怪，我去找随同外出的警卫一中队队长。他说，最近在院子里站岗的警卫，常在地上看到像猫足迹，可是比一般的猫足掌大得多，可能是野猫。

于是警卫们在院子里架石磨，用细木棍支起来，下面用了一条鱼做饵。接连打死两只野猫，一只很大，像小花豹；另一只小一些，但也比家猫大。这很明显，这座招待所是专为毛修建的，周围是些草木树业和花卉。平时空在那里，没有人住，只不过有一些哨兵看守，时间久了，自然成为野生动物的栖息所。

一中队的队员将这两只野猫放在院子里的凳子，他们的意思是想让毛看看。毛起床以后，隔着玻璃看过了。毛说，这里不安全，立刻出发到杭州去。

数小时后，我们便在往杭州的路上。

毛到杭州以后，开始忙碌了。我感觉到气氛紧张起来。有事情正在匆忙进行，正在发生，可是我说不出是什么事。

叶群从苏州打电话来，叶说有重要的情况要向毛汇报。第二天叶乘飞机到了杭州。毛在大厅里同叶谈了三个多小时，叶又匆匆回苏州去了。

毛与叶的谈话，只有他们两个人，谁也不知道谈些什么（1）。但是夜里毛吃饭的时候，说了几句话，使我越加感到事态严重起来。

毛说：“邓小平管的书记处，不知道是管的谁人的书记处。书记里头坏了多少人啦。过去的不算，现在的彭真，他管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陆定一管的中宣部个阎王殿，左派的文章休想这关。罗瑞卿在军队里头搞折中主义。杨尚昆往来传递消息，收集情报。这就是邓小平的书记处。”从“录音事件”以后，毛一直怀疑杨是个特务。

一、二天后，江青来了杭州。这次我见到江青，她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看她精神旺盛，步履很快，已经完全没有“病态”了。江青见到我的时候，只是点点头，打个招呼，没有说话。江青的随从人员只有一个护士、一个服务员和上海市公安局派给她的一位警卫员。

护士对江青的健康情况透露了些。她说，这一段时间，江的身体很好，怕光、怕声音、怕风都基本上没有了，也没有了头痛、耳鸣的症状，所以没有带医生出来。

江青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便赶回上海。隔几天后，也就是二月下旬，江第二次来杭州，我才知道毛和江讨论了什么。

原来二月二日到二十日，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了一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青前来询问毛对这个会的《纪要》的意见。这份文件毛拿给我看过，中心内容是针对着陆定一主管的中宣部。《纪要》中提出“建国以来文艺界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我看了这个文件，倒没有奇怪，因为毛同我已经讲过对陆定一的中宣部的意见。

但是我没想到，林彪透过这种方式，利用江青出头，将毛的意见公开出来。这同时，林也将江青推上了政治舞台。我感到十分不安。握有大权的江青会是个极为危险的人物。

我从未见过林彪。解放后，林虽然身兼数个高级领导职位，但他已在半退休状态，有“病”，五一节和国庆日一律不上天安门。七千人大会中，我也只从后台听到他的演讲，远远看到了他一眼。但林是中国十大元帅之一，以善战闻名。我很敬仰这位军事天才。

一九六六年三月，江青二度拜访毛后患了感冒，要我去上海替她看看。毛让我先去上海，说：“我随后也要到上海去，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不好。”毛的被迫害妄想症使他无法久居一地，觉得杭州也是危机四伏。

江青只不过是轻度感冒，我看她并不在意，吃点感冒药就好了。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傍晚，林彪突然来了。说是知道江青生病，特意来看看。

我是第一次看到林彪。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身军服，紧得几乎是贴在他身上，他的李秘书跟他来到前厅，林脱下毛大衣。中等偏低的个子，瘦瘦的身材，青灰色的脸。林因为秃头十分明显，在屋子里也戴着军帽（2）。脚上套着皮靴。林几乎没注意到我，也未发一言。双眼十分黑湛有神，瞳孔和虹彩几乎是同一颜色。

林彪虽是说来看望江青生病，但他与江谈话近三个小时才走。李秘书告诉我，林以前有神经衰弱，怕光、怕风，从不出门。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活动多起来，身体比以前好多了。那些症状也都消失了。林彪和江青一样，完全变了一个人。我想林的病也是“政治病”。

但林也未变成百病不侵的钢铁之躯。那年八月中旬，文化大革命正狂热地展开时，林彪正是权倾一时。汪东兴正设法接近这位毛即将钦定的新接班人。林彪此时病了，汪要我同他一起去林的住地毛家湾看看。

我们走到林的住室。林躺在床上，头放在叶群的怀里，哼哼唉唉地哭着。叶群在抚慰他。那时我对林彪的观感完全改变——从一位骁勇善战，运筹帷幄的元帅，变成不适合治理国家的精神上十分脆弱的患者。

这时许殿乙和吴阶平医生也到了。叶群、汪和我三人退到客厅。经过检查，是输尿管结石。治疗以后，林逐渐安静下来。

在治疗时，叶群跟我说了林的一些情况。叶说，林原来吸鸦片，后来改成注射吗啡。一九四九年以后，到苏联去，才戒掉的。自此后便没有再复发，但林的举止仍然令人难以理解。林怕风、怕光，所以很少外出，更别说到开会。怕水怕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只要看见水或听到水声就会拉肚子。因此，根本不能喝水，只能用馒头泡湿了吃，代替喝水。大便不能上厕所，要用便盆放在床上，用棉被从头下盖全身，在被子内大便。

我心中很纳闷，这明明是一个精神上不健全的人，怎么能让他来管理国家呢？

回去中南海以后，我将林的病情告诉了毛。毛面无表情，什么都没有说。我也从未和别的领导或医生同事讨论过林的病情。泄露国家高级领导人的有关情况是种政治罪行。

三月江青的感冒完全恢复后，我留在上海。张春桥几乎每天来同江密谈。不久，姚文元、戚本禹（新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关锋（《红旗》编辑之一）也一同来了。



三月十五日毛来到了上海，十七日到二十日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会上，毛扩充江青的论点：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把持着，真正代表左派的意见和言论发表不出来。会上点名吴晗、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翦伯赞、北京副市长邓拓、缪沫沙都是身为共产党员，实为国民党。最后提出，文、史、哲学、法学和经济学要在学术和政治上，开展“文化大革命”。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文化大革命”这一个名字。我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我认为毛是要在文艺学术界搞一次运动，同医学界关系不大。因此，虽然感觉到形势严重，但是却似乎又与我很遥远。

三月底，毛连续召集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主要提出，彭真等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即所谓《二月提纲》），混淆阶级阵线；要撤销。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包庇坏人，要解散；“五人小组”也要解散；开展文化大革命。由此可见，毛一方面固然召开了中央常委会，可是他却通过康生、江青等人在与中央常委和书记唱对台戏。毛这招出人意外之外。毛从未对高级领导发动全面攻击。毛在四月初又回到杭州，并在十六日到二十六日之间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提出彭真的反党问题，重新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会中气氛紧张万分。我非常忐忑不安。一组的人已全被撤换，我既不认识也不信任新的工作人员。我很少见到毛，毛的新警卫处长曲祺玉仍封锁毛的一切消息。汪东兴仍未回到一组工作。没有汪的保护，我真如身处在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孤立无援。因此在杭州会议期间，我到西泠饭店去见汪一面，一方面打听现今政治局势，另一方面也催汪回一组。我到西泠饭店时，汪正和周恩来开会。周劈面就对我说：“这是什么时候，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说：“我想将主席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汇报一次。”

周哎了一声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能汇报主席的情况？”

汪说：“是我让他来讲一下主席的健康情况。”

周说：“快一点，不要时间太长。康老（康生）和陈夫子（陈伯达）都在，不能让他们等。”周一边说，一边走向会议室，又回过头来说：“李大夫谈完了立刻就回汪庄去。”

周这么紧张使我很惊讶。我问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汪说：“这一段时间，你听到了一些，也看到了一些。这是中央的事，不要多问。主席的情况怎样？”

我扼要说了这几个月中毛的情况，然后说：“耀词压不住阵脚，现在一组内部工作很乱。你什么时候回来？”

汪说：“主席没有叫我回，我不能回。开完会，我到汪庄来看看大家。”

我回到汪庄以后，想到周恩来的紧张神色，和他特别提出康生与陈伯达在等着开会，都说明我去西冷饭店可以贻人口实。我随即去见毛，说明我到了西冷饭店找了汪东兴，向汪说明毛的身体很好。

毛淡然一笑，问我：“他们在做什么？”

我说：“听说在开会，汪东兴同志是从会议室内见我的。后来周总理也出来了一会，叫我赶快回来，免得有人误会我夹着什么使命去的。”

毛说：“去一趟有什么要紧，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

我这次向毛及时说清楚，做的是十分必要。到一九六六年底，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发动，打到汪东兴的时候，康生转给毛一封所谓揭发信，是浙江省公安厅一个人

写的，揭发我在中央会议期间，曾去西冷饭店找过周恩来和汪东兴，是在“暗中勾结，通风报信”。

毛将康生转来的这封“揭发信”给我看了，然后说：“这件事你告诉过我了。这信放在汪东兴那里，你去交给他。”

我明白毛的意思是给汪打个招呼，毛在“保”我和汪。

四月二十四日，毛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由陈伯达起草，毛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毛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并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这通知后交五月四日到二十六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五月十六日扩大会议通过这份通知，称之为《五·一六通知》，即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纲领。毛并未参加扩大会议，那时我们在杭州。

毛给我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陶铸和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王任重、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毛告诉我，这个名单是林彪提出来的，原来没有陶铸和王任重，是毛加上去的。

我看到这个名单，内心紧张起来。江青有了实权了。自从一九六〇年以后，她对我积怨很深。以她的为人残酷来说，她不可能轻易饶过我。我今后会有什么遭遇呢？

毛藉着机开导我，要我对江青表示对她的“忠心”。毛远新对江青一向十分冷淡。每年暑假回到北京的时间，他从来没有主动去看江青，或和江青谈谈话。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立刻给毛写了一封道歉信来。毛远新向毛作深

切的自我检讨，说明经过这一时期文化革命的开展，他看清楚了，江青是毛的忠实的学生，表示对江青从心里敬佩。

毛看了很高兴，将信转给江青。

毛远新当时在黑龙江哈尔滨的军事工程学院读书。毛远新的这一手很灵，此后他成了江青指挥下的战将，短短几年中，便窜到沈阳军区政治委员。

反过来，我和江青之间旧隙难以摆平。毛远新是毛的侄子，江青将毛远新纳为麾下大将之后，声势也得以日渐壮大。但我对江青的看法丝毫未变，何况我也不屑于平添她的政治力量。我无法对她卑躬屈膝，曲意奉承。她早晚总会对我伸出魔爪。

我真有长日将尽的感觉，江青一定会想法子毁了我。

**注释：**

（1）叶群显然两度造访毛：第一次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李医生并不在场；本书此处所描述的是第二次，即一九六六年初。

（2）林彪的秃头也许是年轻时代曾患头癣（即俗称所谓秃疮）的结果。

一九六六年五月，毛觉得翻天覆地后，又开始隐居起来。

《五、一六通知》通过后，毛跟我说：“让他们去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是毛一贯采用的以退为进法，好整以暇地隔山观虎斗，静待他的敌人一个个现出原形。

我们便避开政治的纷纷扰扰，在杭州待了下来。

毛的以静制变使党领导群龙无首。文化大革命需要毛的领导。我想此时毛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仍让领导之间摸不着头绪。

六月初，刘少奇和邓小平到杭州来过一次，向毛汇报文化革命的情况。刘、邓走了以后，毛曾经说：“让他们去处理运动中的问题，我还在休息。”

我当时听了毛的这两句话，立刻感觉到，毛似乎置身事外，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那么北京乱起来，不正是必然出现的结果么。

在杭州住下来，仍旧是每星期两次舞会，有时候去爬爬丁家山。我看他沉思的时候多，说话少了，但是精神上却显得很好。

六月十五日由杭州动身，乘火车西行。十八日到湖南省湘潭县，改乘小车驶向韶山。

一九五九年六月，毛回到韶山时，到山下的水库游泳，曾说过：“等我老了退休，可以回到这里搭个茅棚子住。”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决定，自一九六〇年开始，在滴水洞修建了别墅。这就是毛的“茅棚”。

这里四面环山，长满了青翠的乔木和灌木。附近没有居民，是个远绝人世的山谷。毛说：“这里我小的时候来

放过牛也砍过柴。大石鼓上有一块大石，叫石头干娘，小的时候，每次路过都要拜一拜。另一座山上有个虎歇亭，我小时候常到这亭子里来躺着。”

住到滴水洞宾馆以后，消息更加闭塞。每隔两三天北京派来机要通讯员送文件一次。他们带来北京的报纸，我也从他们口中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他们说北京现在各学校都乱了，学生们闹得很厉害，没有人管得了。我想再问时，他们也不愿意多说。

但我听说了傅连璋的事。他在文革初就被斗。一九五八年傅已被强迫退休。由于前所施行的保健制度，他树敌不少，领导同志没有一个喜欢他。但主要对傅怀恨在心的是林彪。解放初期，傅劝林戒毒瘾不听，傅向中央写了报告。又一次，林患肾结石，傅组织会诊，叶群要求查小便，傅不同意，是一位医生私自去化验后才确诊的。因此林、叶对傅恨之入骨，想方设法要置傅于死地。自一九五八年后我就很少听说他的事。他挨斗后，给毛写了一封信来。

毛说：“傅连璋告诉我，有人斗他，自杀一次，救回来了。他让我救救他。其实傅连璋这个人是好人，已经退休不管事了，还有什么斗头，这个人要保一保。”

又说：“这次恐怕又要有人自杀。”

事实上毛的这个保一保，是白说了。到一九六六年底，总后勤部革命造反派的一些人，将傅抓到西山，此后音信皆无（1）。

我们到韶山十天后，六月下旬，湖南天气很热。滴水洞因在山谷中间，每天闷热潮湿，没有冷气设备，只靠几台电风扇，解决不了问题。毛于是决定迁移到武汉。

到武汉后，和外界的连接频繁多了。机要通讯员每天由北京来一次，带到大量文件、报纸、杂志和信件，我收到的斓的一封信，我们已经有一年没有见面了。毛在武汉

隔岸旁观文化大革命在北京的发展，十分高兴。他的敌人正逐渐落入他的圈套，他趁此养精蓄锐，准备击溃他们。从我与他的谈话和他给江青的信中，我都暗暗感觉到这点。

起初毛对文革并没有计划。但由这封给江青的信可以看出毛对当时局势的看法，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对今后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都做了分析，特别充分肯定了自己在这些方面所起的作用。而毛向江青，而不是别人，讲出了心里话，更加抬高了江青的政治地位，表明毛对江青的信赖。我认为这封信，极为重要，可以看成是毛在政治斗争中的宣言，也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发出的遗嘱之一。

毛在武汉的遁隐生活中写道 - -

江青：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了。你还是照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即上海）住一会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六月十五离开武林（即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即在滴水洞）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即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讲政变的问题。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不行了。在重大问题是，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信中的几句话：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的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对于朋友（指林彪）的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讲的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

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的本意，为了打鬼（指毛在党内的敌人），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减，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知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接近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

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而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

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楣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军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为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改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这信先交给周恩来及康生。江青获信后，欣喜若狂。虽然信中也有涉及对她的批评，她仍将信在少数核心领导人中印发流传，以求进一步巩固她目前的政治地位。

毛知道后，命江青收回，禁止流布。我在将信还给办公厅前就抄了一份下来，保存至今日。

以后二十五年中，我常常回想这封信的内容。今天，亲身经历过那些政治动荡，仍觉得此信足以证明毛在政治上有他自己的真知灼见。毛从未完全信任林彪。毛只是暂时利用林来借刀杀人。林没多久后，背叛了毛。毛死后，所谓的右派终于夺回权力。

每次政治运动时，我都尽量躲避，免得惹祸上身。这次我本来想，同毛在外地，可以不搅到运动里去了。现在看来，要躲是躲不过的。

七月初，毛已经离开北京有数月之久。北京一片混乱，他正准备要回去。他对我说：“北京现在热闹起来。我在这里再住下几天，你先回北京去看看，只要文件和材料不行，要亲眼看看，才能分清好人和坏人。你准备一下，明天回去。”毛要我对北京的文革活动进行调查，然后向他报告。他一月不让人回石溪时，口中所说的“事”，就是这件任务。

我说：“从送来的材料上看，政治局和书记处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了。现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弄不清楚。我回北京去以后，找什么人才好呢？”这时中共的领导们都在手忙脚乱。在这个政治的大漩涡中，到北京后找谁呢？

毛沉吟了一下，说：“陶铸调到北京。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你去找他，就说是我叫你去的。让他给你安排去看看群众的革命造反活动，和张贴的大字报。等我回来以后，你讲讲你的看法。”

我仍然不怎么放心。在毛的保护下，我可高枕无忧，一旦单独行动，去调查一个根本不了解的运动，心情真是如履薄冰。毛几周前和我说过：“我看，这次要死个千把的人。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

我不愿见到天下大乱，文革使我提心吊胆。第二天，我在离开北京一年多后，坐飞机回到了北京。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我正在北京。那天，毛在长江游水，轰动全球。我跟毛游过好几次水，因此几乎没有注意到这条新闻。我当时并不知道许多抱着怀疑态度的外国人，对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人能创下超越奥林匹克冠军记录的惊天动地之举，觉得不可思议。我并不以为然。长江武汉那段水流湍急，毛仰游在水面上，浮起的大肚子可一路顺流而下，一下就漂过好几十里。

对我来说，毛的长江游水意味着他自我放逐的结束。这也表示毛不满中央领导，正发出战斗的讯号。两天以后，也就是七月十八日，毛回到北京，整装亲临政治斗争的前线，又一次重大的灾难正式揭幕了。他开始亲自指挥文化大革命。

注释：

傅连璋死于一九六八年三月。

回到家里，娴十分高兴，两个孩子放了暑假都在家里。当晚全家吃了一顿团圆饭，但娴很担心。江青现在已经握了实权，我明白她为我和全家的安危发愁。但她似乎心里还有别的烦恼。

夜里娴轻轻说：“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田家英已经自杀死了。”

我吃了一惊。田家英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在很多事情上看法一致。自从公布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名单以后，我为我自己担心，有时也想到田今后的日子会不好受。

长期以来，田与陈伯达及江青积怨甚深，互相攻击，相持不下。田家英对大跃进很反感，自毛一九五九年批斗彭德怀后，田几乎已被排挤出中央政治核心。我知道他会被斗，但没有到他这么快就死了。十年文革中，田家英是我的熟人里，第一个走上死亡这条道路的。

我说：“我在外面怎么没有一点消息呢？谁都没有告诉我。”

娴告诉我五月十六日中央通过文化革命通知以后，汪东兴按照周恩来的布置找田家英谈过，并派戚本禹等人去田家英家清点接收田的文件——这是要批斗田的确定讯号。当晚田家英就上吊了（1）。

娴说：“这次叫你先回来，可能看看你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我劝你心肠放宽，遇到再在的困难，也不要采取田家英的办法。我们全家只有四个人，你要是自杀，我们就全完了。”

共产党员是不准自杀的。自杀是叛党行为，自杀者的家人往后也会被戴上叛党分子家属的帽子，抬不起头来。

如果我自杀，娴会被开除，送去劳改，儿子们也会被下放。娴又说：“你一倒，可就完了。”

我说：“我不会自杀，真到斗我的那一天，你立刻同我离婚，这样可以保住你和两个孩子。”

事实证明，我的这一想法，还是将共产党估计得太好了。随着文化革命的开展，被斗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家破人亡。用离婚的办法躲不过去。

娴说得对，毛叫我先回北京就是要看看我的态度。

第二天我立刻去找汪东兴。我将毛的话告诉了汪。汪说，陶铸要第二天才由广州到北京（2）。汪约我次日与他一起去接陶铸，又要我同他一起到中南海的西楼去看看给陶布置的住室。

到飞机场接陶后，在去中南海的车上，我将毛的话告诉陶。陶说话痛快：“明天我叫中央文革小组派个人，同你一起去大学里看看。”

我心里直发虚，谁知道中央文革是什么一种状态。我不能搅进去。

这时汪东兴说：“主席是叫他找你，没有让他找中央文革小组。还是不找的好。”

陶点点头说：“现在我主管中央宣传部，卫生部属中宣部管，你可以去找钱信忠，去看看医学院。我叫中宣部派一个人同你一起去好了。”

当时中国医科大学（前北京协和医学院）已经闹得无法控制。整个学校喧腾混乱。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我，和中宣部一位徐同志一到学校便引起骚动。学生已罢课，教学大楼内贴满大字报。其中的一张大字报指出钱信忠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其中提出，钱信忠原是国民党军队中一名军医，一九三四年在安徽大别山地区被共军俘虏，加入共产党。共党在过去很欢迎国民党的“投诚者”。

我看了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不禁吓了一跳，这种“揭露”，完全是人身攻击。

而这种攻击使对方无法解释，只能被打倒。由此我想到我自已。如果我陷入到里面，被“揭露”，被攻击，就不堪设想了。

走进礼堂，学生们已经坐满了。大家喊口号，情绪沸腾。我默默坐在后面座位，钱走上讲台。我看到中宣部那位姓徐的，已隐在学生之中，后来看不见了。学生们开始向台上的人叫骂，提出尖锐的问题。我听到学生们指控和卫生部只为“老爷”服务，忽视广大群众的保健。他们特别提到毛的《六二六指示》。那时我才惊悟到我写的那份报告，现今被拿来作攻击钱的利器。

在会场上我坐立不宁，感到很内疚。没有所谓《六二六指示》，钱信忠可能不会被斗得这么惨。那天全会场的人，只有身为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知道那所谓的《六二六指示》是我写的。只有他知道是陶铸，也就是毛派我陪他到学校。也只有钱知道我是毛的私人医生。我全身颤抖地离开会场，决定不再参加这类会了。万一我被斗，被揭发所有的过去（我及我父亲的国民党史，嫫是地主的女儿），我就完了。

我向汪东兴说明我的想法。汪说，先休息一下也好，等过几天再看看。

到十二月底，陶铸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攻击，已经摇摇欲坠。起因是一方面陶做事不原受江青的压制，另一方面陶支持许多被批斗的党委（包括钱信忠和王任重）。



陈伯达写了一封信给毛，附有中宣部那位徐同志的一封信揭发信。毛给我看了。信中大意说，我与陶铸有密切关系，陶派我去医科大学保卫部党委。我立即向毛说：“回京找陶铸是你让我干的。”

毛笑笑说：“论关系吗，你同我的关系倒有些密切。”毛叫我写个大字报揭发钱信忠，我没有照办，也没有告诉毛。反陶铸事件中，毛保了我。但许多跟我一样无辜的人，都遭到迫害。

七月十八日毛由武汉回到北京，七月二十二日毛叫我到亿他的菊香书屋。他对我说：“明天你同李讷一同到北京大学去看看大字报，和同学们谈谈，看看他们是不是反革命。”

毛在杭州和武汉养精蓄锐时，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在北京的各大学里派了工作组。但毛怀疑工作组不但不支持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将他们打成反革命。

我说：“李讷原来是历史系的。好多人认识她，我们去了，岂不让大家联想到你。”

毛说：“那有什么关系，联想一下也好。你们可要支持学生。”

第二天我们到了北京大学。李讷找到了她认识的同学和老师。大家围坐在学生宿舍里议论。议论中，我很少说话，都是李讷同他们交谈。校长陆平是他们的主要议论对象。

他们说，打倒校党委以后，由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取代了校党委的位置，继续镇压学生，将学生打成反革命。

听完学生的议论后，我们在北大里绕了一圈，大字报太多，也来不及看。有几处演讲台，围着许多人，有的在台上辩论。

我对这些毫无兴趣。我认为根本的问题，发生在高层领导内部。有任何分歧，应由他们自行解决，凭什么要将问题推到学生间呢？

但毛并不作此想。毛与领导内部意见分歧其来有自，早在一九五六年，毛就发现党内整风也起不了多大用处。他动员知识分子帮共产党整风，反而倒戈相向。他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知识分子竟敢质疑起社会主义，还将批评的矛头纷纷指向毛。这次文化大革命，他决定越过党官僚的重重关卡，直接鼓动这些崇拜他的年轻人起来造反。

我不禁想到，我离开武汉前，毛同我说的一些话。他说：“看来只有年轻人才有冲破旧势力的勇气。要靠这些娃娃们造反、来革命，否则打不倒这些牛鬼蛇神。”

回到中南海，将所见所闻告诉了毛。毛的神态似乎洞察一切，成竹在胸。他并没有仔细听情况。我总感觉，毛叫我去北京大学，并不是为了了解情况，向他汇报，而是通过此行，让我接受“群众教育”，测量我对文化革命抱什么态度。他最后问我一句话，说：“将学生打成反革命对不对？”

我说：“自然不对。哪里有那么多的学生反革命？”

毛说：“是啊，问题就在这里。”

我于是通过毛给我的第一个考验。

毛回北京后，越来越常在公开场合露面。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万人礼堂里坐着来自各学校的学生“积极分子”，包括前一段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会上首先公布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接着刘少奇和邓小平因在毛离京期间在各学校分派了工作组，而做了自我批评和检讨。

毛并未出席，他不愿学生认为他和刘、邓是站在同一条阵线上。领导和学生们都不知道毛去了大会堂。就在大会开始前，他隐身坐在幕后，我也随侍在一旁，毛不露声色地听着刘少奇的自我批评。

刘的自我批评和一九六二年毛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承担困难时期的责任的那个自我批评，十分类似。刘并没有承认犯了错误，更没有说是严重错误，只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对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毛听了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

我听到以后，心中一沉。现在完全明白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俩是党里的“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这时周恩来在台上宣读毛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务（3）。毛本来打算走回一一八厅，但是突然停住，说：“要支持革命群众嘛。”

待到周一讲完，几个随从人员把幕拉开，毛闪的现身，像变魔术一样，从幕后走到台前。全场学生欢声雷动中，毛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回一一八厅，周恩来像忠犬般尾随毛后。毛从头到尾没有正眼看刘或邓一眼。刘、邓呆立台上。毛的这一行动，最明确不过地在群众眼前，表现他与刘、邓的分歧。

三天后，八月一日，毛给清华大学附中一位学生写了一封信。附中几位学生在五月组成了一个造反组织，自称为“红卫兵”。毛对反动派表示热烈的支持，并倡导“造反有理”。毛的话在学生刊物上争相转载，立刻激励了中国各地的年轻子弟。

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中学大学成立起来。

为了支持校区的大字报运动，毛也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央立即发布。这张大

字报的内容主要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毛号召全中国年轻人扩大文化大革命。由此可见，学生的革命和造反，是由毛支持着。

毛八月十日在中南海西门的中央接待站会见群众。而后毛于一九六六年秋季，在天安门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每次都有我陪同。有两次毛是乘吉普车巡行检阅。林彪也在，看来神经衰弱全好了。北京的秋天太阳最烈，天安门城楼上风很大。但林彪变得不怕光，也不怕风，次次和毛一起向城下的红卫兵挥手致意。

我这时才完全明白，毛在一九五六年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就对刘少奇及邓小平深为不满，现在毛的敌意越来越明显，刘、邓两人即将垮台。但对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毛发动文革的动机仍是混沌不明。

毛私底下和我及其他少数人说刘是“反革命”。但是在语言上却另有一套。例如八月一日至十二日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又说：“要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这些话，好像不同派别的存在，是自然的，而且宽恕了刘少奇。有些人误信了他的这番语言，成了文化革命运动中的绊脚石，成了保刘少奇的“保后皇派”，因之也就被打倒，被斗。

“冰封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多年后，毛才一一击溃他所有的敌人——有些还是解放前结下的梁子。为了最终的胜利，毛不惜将全中国卷入一片混乱中。

## 注释：

中国资料来源显示，汪东兴在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派王力和戚本禹去清点接收田的文件，搜查直到夜间才结束。据报田在五月二十三日清晨自杀。

陶铸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其他资料来源则指出，陶于六月四日抵达北京，六月九日往杭州。本书此处所描述，陶返回北京的时间，大约是在他被中央任命后六个星期。

其他资料来源提供另外的发言人顺序。一种说法是李雪峰、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另一种说法是李雪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李医生记忆所及，认为第二种说法才确实。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红卫兵兴起了抄家风。我在弓弦胡同原保健局宿舍的家因此不得安宁。我住的宿舍院内有二三位卫生部副部长住在里面，医学院的学生和许多外地到北京的医疗卫生人员，三天两头到我们住的宿舍来抄家。有时敲错门，找到我们家。中央文革小组常派出人，化装成学生，参加抄家和捉人。我不是目标之一，但现在天下大乱，红卫兵起了串连狂飙，满天栽赃诬陷。娴劝我少回家，多待在中南海。只要我跟毛在一起，就很安全。不过我平时写的日记这时已经有了四十几本，都有关于我的工作和毛的情况。娴认为留在家里太危险，一旦被红卫兵抄去，就立刻可据为反革命的证据。我带到中南海内，全部烧了。

毛知道了我的处境，特别给我一个工作。毛让我和吴旭君筛读每天由全国各地如雪片般涌来的各种小报，挑选一些送给他看。此时全国文革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文件数量太多，毛的几位秘书也看不完。我很愿意做这件工作。这些文件刊载各式各样的消息，甚至有的连中共中央的机密文件及会议都登在上面。这些小报都是由各种革命造反红卫兵组织所编发。我可以从这许多小报得知各地方文化革命动态以及许多领导被批斗的大会记录。栖身中南海内，也正好暂时躲开这乱糟糟的外面世界。弓弦胡同那份宁静之美，已被打得粉碎，我觉得很难过。但同时我很庆幸有中南海的保护。

没多久，中南海也变得不安全了。每个人都遭到怀疑。

这时，周恩来也受到以江青为主的造反派的围剿。他们给他戴上反党的帽子。

事情原委是一九三〇年代上海《申报》，曾刊载一篇伍豪（周当时的化名）宣布正式脱离共产党的启事。

周有次来室内游泳池见毛，当时我也在场。周腋下夹了一份图书馆借来的《申报》，跟毛谈这件事。周说这篇文章是国民党造假诬陷，刊载时他人不在上海，已经到了江西苏维埃革命根据地。这是国民党捏造的，康生可以证明。毛从来未对我谈过对此事有看法，但我知道周直到死前，心头都有这个阴影。

田家英的事还没有完全结束。田在中南海的人缘很好，许多人都为他的自杀感到悲伤和震撼。田是反党分子，因此，所有和他有关的人都被怀疑有反党嫌疑。周恩来更是深恐中南海内藏了想谋害毛主席的反党分子。为了毛住在中南海内行动安全，周恩来让汪东兴将原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办公厅除警卫局以外各局的一些受怀疑的工作人员，集中起来，称为学习班，由宇光主管。在这个班上要坦白交代反毛、反共产党和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及行动，同时还要揭发别人的这类言行。

九月中旬，田的遗孀董边写信“揭发”我。田自杀身亡后，她必须和其划清界线，以示对共党的忠心。董为了自保而“揭发”我。董说我同田家英过往极密，平时无话不谈。但其中没有指出具体的事实。因田家英已自杀，是个“反党分子”，我同他“密切”，自然可疑了。

另外，田家英的秘书逢先知揭发我早在一九六三年，由武汉回北京的专列上，我、毛的秘书林克及汪东兴闲谈。那时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刚刚有些好转，毛又开始推动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时又人心惶惶。我说：“主席这个人就怕大家过好日子。现在刚有口饱饭吃了，又在折腾起来。”随后我又讲：“他这个人人为人不好。”后面这句话实际指的是毛在男女关系上的不正当作风。

回到北京以后，林克将我说的这些话，告诉田家英及逢先知。这时逢写成了揭发材料，证明我的反毛言论。这份材料如果落到中央文革小组手里，他们会将我作为反革命分子捉起来。

汪东兴告诉我这两件揭发信，他收藏起来。汪的“保”我，有他的道理。我到毛处工作，是他首先推荐的，我成了反革命，他的责任不轻。其次，我讲这些话，是当着他的面说的，汪自己也有不少反毛、反江青的话，我知道得十分清楚。我如被捕，坦白出去，正好让江青抓住。

汪多次同我谈过，叫我不怕江青和中央文革对我下毒手，他说：“怕什么？顶多你同我一起坐牢。坐牢有吃有住，又可以不工作。怕什么？”

何况，有这两份揭发材料握在他的手内，抓住我的辫子，永远不敢“背叛”他。

汪不能把那两封信烧了，因为他也怕别人说他烧一些不利于他的文件，对抗文化革命。汪把这两封揭发信锁在宿舍的保险柜里，并叫办公室的人与已调到新华社的林克谈话，叫林克不许乱讲。然后让宇光在学习班，将逢先知训了一顿，以后不许这样胡说八道，再胡说的话，加重他的罪行。一九六七年五七干校成立，汪将逢先知跟第一批人一起下放到江西。逢直到十多年后，一九七八年才被调回北京。

但是到十一月，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警卫局内有相当一批人组成了革命造反队，目标是打倒汪东兴。中南海内贴满了声讨汪东兴的大字报。闹得最凶的是警卫局下属警卫处及行政处的一些人。汪怕被抄家，他将这两份材料送到周恩来处保存。



周说：“你这不是交给我两把火吗？”但还是锁起来了。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周去世后，汪在清理周的文件中，又将这两份收回来，他告诉我，烧掉了。

毛关亲自出头保护了汪东兴。毛同我说：“警卫不能乱。警卫乱了套，哪里还有安全呢？”又由周恩来反覆向我们讲：“凡是在首长身边的人，不允许参加革命造反组织。”一次外出到人民大会堂，乘车回到游泳池，毛下车后，对司机说：“大字报说‘火烧汪东兴’、‘油炸汪东兴’，火烧、油炸都可以，可是不要烧糊了，炸焦了，糊了、焦了就不好了。吃烤鸭，谁也不会吃糊焦鸭子。你回去同你们交通料和别的地方的人都讲一讲。”

毛的这些话，是发出“保”汪的信号。警卫局不能乱，否则可能危及毛的安全。

在文革一片混乱中，毛自然是从他自己的安全观点来衡量大局。于是，支持汪、支持警卫局党委的人，组织起来，由中央警卫团协助，将警卫局内革命造反派镇压下去。就我所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原党委没有被打倒，原党委负责人没有被打倒，仅此一家而已。

待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其他中央领导人也被批斗后，中共政治局完全解体。

由中央文革小组召集碰头会，参加的人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外，还有周恩来、谢富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汪东兴、叶群，实际上起着政治局的作用。

毛的确需要汪东兴。毛在对敌人全力后扑时变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上次录音事件，毛怀疑菊香书屋也被安装了窃声装置，他便对自己的住房失去安全感。他决定搬走。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回到北京后不久，一组搬到了北京市外玉山一号楼。没住几天，毛说这里有毒，搬到了钓鱼台国宾馆。这里盖有数栋别墅，树林葱葱，有一个大池塘。文化革命小组的办公室设在钓鱼台内。汪青、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其他小组人员早已迁入。毛住到附近的十号楼，江青住在十一号楼（1）。

又没有住多久，毛仍觉不安全。于是搬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这里住得比较久，到接近年底的时候，搬到中南海室内游泳池。这是他最后的住地，在北京没有再换住处。

可能是文化大革命提倡的禁欲主义使然，毛回到北京后，有很短一段时间，没有跟女人厮混。但中南海仍为他每星期举办两次舞会。有次江青从上海回来，也参加了舞会。毛点播了京戏唱段“游龙戏凤”——在当时已被禁演。这里使我回想起毛对我讲过一段历史上他的看法。他说：“明朝正德皇帝到山西、雁北一带，并不是为了游乐，目的是巩固西北边疆，开拓边陲。在这一伟大目标下，兴之所至，偶而‘戏凤’，也在所难免。”他说的‘戏凤’，就指的是京戏中的这个“游龙戏凤”。

江青现在成了文艺界的仲裁者，整个人都改头换面。江青的服装大变。过去她一贯穿西装、半高跟皮鞋，现在成了近似所谓毛服的上衣及长裤，脚踏平底鞋。她看到我的时候，显得很严肃，好像她已掌握了一切，可以决定一

切。现在的江青不容许舞会这类活动。八月底时，她让毛不再组织舞会。

毛不久跟我说：“这下我做了和尚。”

自从停止舞会活动以后，毛没有了寻欢作乐的地方。短短数周后，他开始用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厅作为他消遣的所在。如前所述，他在人民大会堂内，有一帮“女朋友”，即各个厅，如福建厅、江西厅等的女服务员，她们轮流来陪他。因此，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毛依然故我，过着帝王般优哉游哉的生活。

毛许多女友在文革时遇上困难，多来寻求毛的保护。

张玉凤是第一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张带着准备送毛的茅台酒和巧克力到了中南海西门。张打电话找吴旭君。张此时仍是毛专列上的服务员，但毛已在北京住了下来，所以两人有数月未曾见面。张这时二十出头，已经结婚。

原来铁道部专运处里面，也在革命造反，专运处党支部形将瓦解，支部书记罗将被打倒，张玉凤自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是支持党支部，保支部书记罗的。

张本身也受到攻击。

吴旭君将事情原委转告毛后，毛同意让张到游泳池谈谈。她回处里报告与毛谈话经过时，没有人敢怀疑其真实性。说毛主席认为支部书记属于不该被打倒之列，罗便马上复职。张从此高枕无忧。

空军政治部广文工团的刘是第二个。也是由吴先去见她。刘和另外陪她来的两位女团员一见到吴就放声大哭。刘抽抽答答地说出她的事。

自从文化大革命运动深入到军事系统以后，各地的军事院校学生纷纷自行组织起来。文工团中也分了两派，一

派是造反的，另一派是“保皇派”的，刘她们少数人属于后者。造反派在文工团夺权后，就将三人赶出宿舍。吴和她们见面时，她们已经在街上转了三天。

毛见了刘及另外两个，说：“他们不要你们，我要你们。他们说你们是保皇派，你们保的是我嘛，我就是那个‘皇’。”

刘从和毛的“特殊关系”中得到不少好处。毛命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叶群替刘及另两个女孩平反。叶不但照办，还找来空军司令吴法宪，任命刘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在短时间内便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

自此后，刘和另外两个女孩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一住下来就有五天十天。

一次正在大被同眠的时候，江青突然从钓鱼台国宾馆住地来了。游泳池门口的警卫不敢阻拦，江进到游泳池以后，才由吴旭君跑到里面通知毛，这几个女孩子抱着衣服躲起来了。

毛为此大发脾气，毛要我告诉汪东兴：“中央别的人要见我，都是先打电话请示，我同意了才来。江青为什么要自己闯来呢。告诉汪东兴，没有我的同意，门口的警卫不许放她进来。”这一条成了规定，江青只好遵守。

刘后来与叶群过从甚密。一九六九年刘怀孕生产时，叶群亲自送刘住进空军总医院高级干部病房，每天送鸡送肉，让刘保养。刘产下男孩后，叶群十分高兴。叶说：“主席生了几个儿子，死的死，病的病。这下可好了，有这个男孩可以传宗接代了。”有些人也说那孩子长得跟毛一模一样。这完全是臆测胡说。

我和吴旭君也去医院探望刘。我的工作使我不得不和毛的数位“女友”保持良好关系。刘对我说了叶先前的那

番话。她以为我也认为那男孩是“龙种”。我从未向任何人透露毛早已丧失生育能力之事。

注释：

康生住八号楼，陈伯达住十五号楼。

一九六七年一月，全国陷入一片混乱。武门不断在各地爆发。党组织和政府机关完全瘫痪。工厂生产下降，有些地方则完全停顿。运输交通中断。林彪和江青领着造反派喊出“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口号。工厂和学校分成两派——反党组织的造反派，和支持党组织的“保皇派”。党组织内部也四分五裂。各地党领导彼此攻讦、夺权。但保守派仍占优势。党组织多年来凝聚的力量并不容易被打倒。

这一场革命根本跟意识形态斗争扯不上关系。

一月底，毛告诉我，已经决定要抽调人民解放军，到机关、学校、工厂，去支持革命左派。他说：“左派得不到支持，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了。你告诉汪东兴，要抽调中央警卫团的官兵去工厂支左。支左的情况我要了解，你同他们一起去，随时告诉我一些消息。”短短数月内，两百万的官兵被派去“支左”（1）。

汪所率领的中央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2）——听命于汪东兴。毛直接下达命令给汪东兴，而不需透过林彪或是总参谋部。但毛、汪并没有天天见面，毛就叫我告诉汪。

一九六七年春天，我向汪东兴讲了毛的意见。随即由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组成支左办公室，抽调了近八十名官兵，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警卫团副团长古远新任主任，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孙任副主任，经过北京卫戍区调度，开到北京东郊红朝北京市针织总厂开始军管（3）。

毛叫我去参加军事管制支左，我不能不去。他要我做他的“耳目”，回来向他报告工厂支左的情况。我实在很

不想去。我甚至怀疑，这是江青他们布置的一个圈套，待我钻进，到时候再收紧这个套子。

这一段时间，江青经常宣扬我对文化大革命不积极，只待在中南海内，是个逍遥派。毛让我去，大约是听了江青的这些话。只有这样他才能搞清楚我的态度。他还说，加入革命风暴，是我自我改造的机会。

我于是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来避免卷入政治是非之中。我说：“我是医生，我带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可以成立一个医疗小组，给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看看病，这样可以更容易接近他们。”

毛认为这办法很好。

军管会的官兵进厂几个星期后，也就是七月初，我到工厂。

北京针织总厂位于北京市东郊。从中南海骑脚踏车大约要半个小时，分成南厂和北厂，分别生产棉织和尼龙针织内裤。总厂还外销女性内衣裤到罗马尼亚。纺织厂有将近两千个工人。工人分成两派。厂党委已被斗垮。厂长和副厂长都被批斗后，下放在车间监督劳动。两派正在争夺全厂的领导权。

虽然名义上每个工人都参加了一派，可是实际上每派中间得欢的，只不过百把人而已。其余的人到时仍在进行生产，但看得出车间内的工人们神情压抑。此时两派已演变到武门动手的地步。军管会对此一筹莫展。我一去，他们便想我来调停联合两派。他们可以说我代表毛来的。

军管会的官兵，采取的办法很简单。他们向两派的头头和一些主要分子泄露说：“我们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不信？你们看，毛主席的医生也来了。”这些造反派将毛检阅红卫兵登在报上的照片拿出来，对出了我。又派人跟踪我，看到我回中南海。他们相信了。



这一招很灵，根本用不着什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两派就在军管会的调停下，开始讨论联合了。随即成立“革命委员会”。

我将这事的原委告诉毛。毛笑着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该联合起来。”针织总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两派联合起来，毛为此写了“同志们好”。

我将纸条拿给了汪东兴，他拿给工厂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们如获圣经，欣喜若狂，马上开了一个全厂大会，将纸条亮给工人看。他们邀我坐在台上，我不肯。

工人们听到毛主席亲自写了“同志们好”时，掌声雷动。毛的纸条贴在工厂院内的告示板上，每个人都前去瞻仰。然后厂长将纸条照了相，把照片放大到跟一面墙一样大。放大的照片就挂在工厂入口。

革委会被褒扬为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模范。汪东兴由此获得很大声誉。几周后北京几家大工厂——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北郊木材厂、北京第二化工厂、南口机车车辆厂——便在汪的支左军管之下，很快被宣传是毛亲自领导的典型。

许多人突然一窝蜂的拥到八三四一部队军管的工厂，这是很光荣的。人民大会堂的女服务员和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其中有些是毛的“女友”——是第一批去的人。一一八厅的一位女服务员也去了。这些女孩子们穿上军服，风风光光地去了工厂。各报纸派记者来采访，《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也派了摄影记者。他们很喜欢拍一些漂亮一点的女兵像（4）。

后来江青翻看《画报》，发现有女服务员的军装像，于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质问汪东兴，让服务员穿上军装，假装解放军去支左，谁是这件事的后台。汪回答得很

干脆：“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江青似乎吃了一记闷棍，不作声了。

叶群和当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都到这里来参观，由军管会副主任孙与他们往密切，又到处大加赞扬，说孙该提升为军一级的干部，并要孙去军委和各总部报告军管工作经验。于是孙与叶、黄来往日益密切。叶、黄各派一名他们的秘书住在厂内。

我同江东兴讲：“针织总厂是毛主席抓的厂子。叶、黄插手进来搞，孙与他们来往密切，又到处去报告，这些会不会引起主席的误会，认为是跳槽呢？”

汪东兴觉得应该不会。文革后汪的权势日益坐大，他也在拉拢可帮他达成目标的人。汪仍恨江青入骨，他最后的目标是斗垮江。我陪汪去探望过林彪后，汪告诉我，他又到毛家湾去了一次，这次是毛叫汪去看看林好了没有。

汪说乘这个机会，将自己在毛处这么些年的慰情况，都向林讲了。汪特别向林谈了他自己和江青的尖锐矛盾，和文化革命运动以来，江青利用一些机会攻击汪的情况。林告诉汪，不要忧心，林会照顾他，以后毛处有什么消息要及时告诉林。

我说：“这么办可是危险，走露出去，就会大祸临身。”

汪说：“江青这个人，我不将她扳到，我这汪字倒写。走露风声，谁会走露？我不会，你也不会。”

就我所知，从此以后，汪凡是遇到林彪和叶群的时候，他们总是亲热地打招呼。

我看了很不安。我从不喜欢林彪的领导，也深知毛要求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必须忠贞不二。汪东兴此举无异玩火。

## 注释：

周恩来在与爱德加·斯诺的一席谈话中，确定支援“支左”的军人数为两百万。风前引 EdgarSnow, TheLongRevolution, Ip. 103。

中国的军队皆有秘密代码。许多中国人相信中央警卫团被任命为八三四一部队的原因在于，有位算命师曾预言毛将活到八十三岁（的确如此），他将领导中国共产党长达四十一年之久（自一九三五算起）。就我所知，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说法。

根据中国当局资料，汪东兴的八三四一部队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进驻北京针织厂。

这张照片刊登在一九六八年《人民画报》第四期上。据报导，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成立。

我和毛的关系也开始疏远。毛认为我不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是对他不够忠心。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第一次具体表现对我的疏远。毛那天要去武汉，他没有要我去——这是我做他医生以来第一次不让我随行。林彪建议毛带空军总医院内科主任和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同行。

我觉得危险步步逼近，汪东兴也有同感。汪觉得这其中一定是江青在搞鬼。林彪不清楚状况，不会出这种主意。一定是江青跟林建议的。汪怕江是想趁毛不在时候整我。虽然汪管辖下的六个工厂很平静，但文革的暴行仍在各地蔓延，武门逐步升级。武汉的造反派和支持陈再道的一派群众闹得不可开交。毛泽东亲自南巡，南下武汉。

北京也处在混乱边缘。毛一走，就是江青在主事。汪怕我会被江的人绑架。他叫我不要回针织总厂。江可以派人在那捉我。汪说：“你就住在一组你的办公室。如果有事，你立刻就来武汉”。在中南海里我万一出了事，还有法子和武汉联络。

我搬回中南海，却亲眼目睹了汪的恐惧成真。江青的文革小组向来平静的中南海闹得个底朝天。刘少奇是造反派的主要目标。中南海西门外，有许多造反派学生在示威，喊口号：“打倒刘少奇”，红墙上贴满了打倒刘的大字报。人越聚越多，西门外的府右街断绝了交通。入夜以后，这些人就露宿在街上。府右街完全变了样。

当时是七月，天气酷热，几十万造反派的学生挤在这儿举行“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

街上腐坏的食物，人潮的汗味，临时搭的公厕，混合散发出的臭气熏天，令人作呕。

我睡在我的办公室，辗转虽安，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光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南海从未被包围过。虽然示威群众越来越多，负责守卫的警卫岗哨仍镇定如昔。

七月十八日终于有了巨变。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内看报纸。一中队值班的人跑来告诉我，刘少奇被斗了。我冲到国务院小礼堂前，这一带人都挤满了。警卫团也来了不少官兵。刘少奇和王光美正在草场上挨斗。斗他们的人大多是秘书局的干部。

警卫们袖手旁观。刘的头发被扯乱，上衣扣子掉了两个，被人将两臂向后拉住，腰弯下来，头几乎碰到地上。这就是所谓的“坐喷气式飞机”。这时还有人上来，踢几脚，打了一个耳光。警卫还是没有插手。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刘少奇已经六十多岁，他是堂堂的国家主席。

我走到邓小平住的院子，及陶铸的院子。邓和卓琳，陶铸和曾志，也都在挨斗，但情况没有刘少奇严重。他们都被推来扯去，或是冷嘲热讽，没有人打或踢他们。

杨德中也在场。我向杨说：“怎么突然斗起来了？”杨说：“昨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通知今天要斗争。我连夜打电话给汪（东兴）主任了。现在还没有消息。”

汪其实进退两难。他不能跟毛直接报告中南海的暴乱，这样就无异于与势力庞大的文革小组为敌。那时没有人敢冒大不讳批评造反派。何况，汪与毛的关系因刘少奇的问题长期紧张。一九六三年，汪曾陪刘和王光美访问印尼。此事虽经毛正式同意过，汪回来也向毛如实报告，但毛总疑心汪和刘关系“密切”。汪自然也不想和毛要打倒

的人站在一边。我心中暗自揣度，怎么会毛刚离开北京，就围困中南海，就开斗争会，毛是不是都事先知道？

七月二十一日，汪东兴打电话给我说，空军司令部已经派了一架飞机，在西郊机场等我，要我立刻去上海。

几小时内，我就到一上海，住进毛和其随从人员住的西郊宾馆。毛的警卫密密实实，这是多处来未有的现象。一中队来了有一百多人，还加上上海市公安局的人。

秘书、通讯员人数也大增。西郊宾馆上上下下，满满都是人。

毛有点支气管炎，阴部生了疱疹。毛的“女友”太多，我和他最近不经常在一起，所以无法追踪出传染者是谁。我用中药替他治疗疱疹，注射头孢菌素治疗支气管炎。我跟毛说明疱疹曾经由性行为传染，但毛不听。他觉得没那么严重。

毛问我北京有什么新情况。我将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和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事告诉了他。他当时没有说什么。他的沉默也显示他对北京的事不满意。

入夜，毛又叫我将发以上情况说了一遍。他就：“文革小组做事不打招呼。不要他们当面斗，不听。”我因此知道公开批斗刘、邓、陶是文革小组自作主张。不是毛的本意。他的本意是，背对背斗，即收集刘的各种人证、物证，以据之判定刘是“反革命”。

我跟毛在上海停留了将近一个月。他要再回武汉。毛七月十四日去武汉军区闹了“七·二 事件”。周恩来急忙派飞机来，仓皇送毛到上海。

在此之前，武汉两派人员武斗十分激烈。当时造反派大肆攻击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毛去武汉前，文革小组派了极左分子王力（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和公安部长谢富治去缓和对立的群众，逐步联合。但王力却转

而支持造反派，将对方称为反革命派。支持陈再道的群众大怒，把王力捉了起来。当日周恩来随即到武汉，并劝说释放王力。一些支持陈再道的群众游到毛住的梅园小岛上，想跟毛陈情，被武装保卫毛的战士们把这些人全面关起来。毛知道后，叫人把人放了。造反派就这些群众想谋害主席，但毛相信这些群众真心崇拜他，陈再道也对他忠贞不二。毛的意思是见见两派，调停联合。周恩来很紧张，这些群众都有武器，为了毛的安全，周匆忙将毛送去了上海。

经周协调后，王力被释放。王力和陈再道后来双双去了北京。

八月二十日由上海动身，乘飞机又到武汉。毛在飞机上说：“我看武汉这两派，没有那个是反革命。上次让王力一挑，两派打起来了。我就不信真有反革命派。看来王力、关锋、戚本禹（此三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不是好人。毛为了显示不会有谁谋害他，他是公众衷心拥戴的领袖，从飞机场乘了敞篷吉普车穿行市区，然后到了武昌东湖梅园招待所。我坐在后座，车子四周有上百名便衣武装警卫。两派的群众夹道欢迎，热烈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按毛的说法是“接见了两派群众”。

毛不在北京时，北京完全在文革小组的控制之下。他们将矛头指向外交部长陈毅元帅。陈毅与其他军事领袖曾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召开的“碰头会”上，公开批评文革，不让军队涉入文革，并谴责红卫兵造成“红色恐怖”。八月，王力和关锋在汪青的支持下，组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占领陈毅的外交部夺权，并将英国驻华代办处烧成灰烬（1）。

毛八月回到北京不久，便下令先后逮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戚在次年一月被捕）。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是极左派，属不争事实，但他们也只是替罪羔羊。文革小组的真正权力握在康生、陈伯达和江青三人手中。毛显然对江青有所不满。我们还在武汉梅园招待所时，毛每天看《鲁迅全集》。有一天他突然讲了一句：“叶群是阿金式的人物，江青也差不多。”

虽然毛对江青闹得天翻地覆的行为不安，他还是没有采取任何阻止她的行动。



## 注释：

许多西方人认为“红卫兵五一六兵团”从来不曾存在过。李医生不认识兵团的人，但听过对它的诸多指控。不管怎样，陈毅被打倒，英国驻华代办处的确化为灰烬。

一九六八年春天江青将魔爪伸向我时，毛一开始是袖手旁观。

问题出在娴身上。康生的反革命分子黑名单把娴也列了进去。大家都知道娴的背景，因此康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娴在美国人和英国人底下做过事，有英、美特务的嫌疑。她的家里人在台湾，看起来有国民党的特务嫌疑。在文革碰头会上，康生提出，应该立案审查。

江青也要审查我。江青说，李志绥也有政治历史的问题，是历史反革命，也要审查。我的案子便交到汪东兴手中。

汪东兴回答康和江说，这两个人的政治历史都由警卫局审查过，可以再审查。汪跟我说：“江青这是有意在搞鬼。这事由我来办理，你们都不要急。”但我知道江青不会轻易放过我。

七月一日是中共的建党日，江青主持，在人民大会堂演出革命样板京剧《沙家浜》。散场以后，江青对汪东兴说，牙痛几天了，要找医生看看。汪找我。我说不好办，这是牙科，我治不了，何况江青正在找我的麻烦。再来，我怀疑这是江青设下的圈套。江青闹牙痛也是种政治阴谋。

汪自然也想将江青斗垮，但他目前还不敢轻举妄动。汪说：“给她找个牙科医生看看。你给他组织一下，这样会把关系缓和下来，不是更好吗？”我同意了。

我请了解放军总医院口腔科的洪主任和朱副主任，一同往进钓鱼台。

我们住进去后，一连等了六天，江才让他们检查牙齿。他们认为左下第三个牙齿已极为松动，不能保留，应该拔掉。江同意拔除。洪提出，最好先注射一天抗生素，第二天再拔掉。

下午由新来的护士给江做了皮肤敏感试验，没有反应，便给江注射了第一针。

过了将近半小时，江忽然说全身发痒，立刻叫起来说，这药有毒。护士是新来的，年纪很轻，听得全身颤抖，哭起来。我给江做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徵象。

我取一粒镇静药给江吃。江拒绝了，吩咐秘书给汪东兴打电话。

不久汪由中南海赶来。江见到汪的第一句话是：“李志绥用毒药害我。”汪随即叫我去大厅去等。

过了一会，汪来到大厅，问我详细情况。我讲了以后，汪认为可能是过敏反应。我不以为如此，因为皮肤、血压、脉搏、心脏都是正常的。我说：“我要立刻到主席那里说清情况。”

汪说：“不行。江青要我打电话报告主席，你抢先去讲了，江青会闹得更厉害。不如就在这里，等主席来了以后再说。”汪对毛还不完全了解，毛一向是先入为主，汪不让我先去见毛是错的。

汪说完，就打电话去了。

我独自一个人在江的住所内的大厅等毛来。江青的警卫和工作人员都被江青歇斯底里的行这吓坏了，对我是避之唯恐不及。过了一个小时，毛还是没有来。我真是如坐针毡，心情如同犯人等待处决一般。

这时毛从大厅外走了进来，吴旭君扶头着他。我迎上去打招呼，毛瞪了我一眼，昂头走过去，进了江的卧室。

汪来到大厅。我问他是怎样向毛报告的。汪说：“我就说江青打了针，有反应，请主席来。”

我一听，非常生气。我说：“我同你讲了，身体检查都正常。你为什么不报告呢？这明明是江借机会要整垮我。”

我与汪正在交谈的时候，毛走了出来，仍然瞪了我一眼，走出大门，回中南海去了。

汪对我说：“你回针织总厂，不要到厂子外面去。厂里警卫团的人多。你只要在厂里，江青就不可能派中央文革的人绑架你。”

我赶回家里，娴还没有回来。我给她留了一个条子，只说最近有事，短时间不能回家，然后到了针织总厂。

我在厂里躲了两星期，实在是闷得发慌，又提心吊胆。最后我跑去找汪东兴。以下的情况就是汪告诉我的。

我离开钓鱼台去针织厂后，江青先将她的秘书、警卫、护士、厨师召集起来，让他们“揭发”我下毒的罪行。每个人都签了字。

当夜林彪和叶群来看她。她向这二个人说，李志绥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又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然后将没有用完的药交给叶群，让叶拿去化验，并且一再强调，这是毒药，要写个化验证明送来。

叶是毛回到毛家湾住地，给汪东兴打了电话，说，江青的口气要出一个化验是毒药的证明。汪说，还是找化验部门认真化验，是什么就是什么，这药是从警卫团管辖的药房中取出来的。我们有规定，医生不亲手取、送或使用药品，医生只管开处方。药如果有问题，那是我们药房的责任。

叶将药拿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化验，正式报告为：经过化验，送的药品与标签上药名相符，未验出任何有毒成份。

叶拿着余下的药和这份报告，到了钓鱼台，送到了江青的手上。江青看了报告，勃然大怒，将药和报告扔在地上说，军事医学科学院里有坏人。叶说，这是林彪当面交给院长去办的，他们不敢不认真办。于是不欢而散。叶将化验报告和药送到汪东兴处备查。

此时江青与林彪的关系开始有了裂痕。汪东兴是倾林派的。我只是他们政治争斗中，身不由己的棋子而已。

江青的牙病还没有治完，由林彪和周恩来推荐了吴和卞二位医生。江青将经过的情况告诉了他们，让他们写证明，李志绥使用了有害药物。他们被逼得没有办法，找汪东兴问怎么办。汪说只能照科学态度，一是一，二是二，不能胡邹。结果，江对这二位大为不满，赶他们走了。

江又找了周恩来，拿出秘书和警卫们写的“揭发材料”，要周立刻签字逮捕我。周说，李志绥是毛的医生，如果逮捕他，不先请示毛不行。江让周去请示。

周回来以后，给汪打了电话，商量怎么办。汪坚决主张周去见毛，问毛的意见。并且说，药是从警卫团药房拿的，因此汪要避嫌，不能为这事同毛谈。

周当天夜里去见了毛，将江青要逮捕我的意见告诉了毛，然后表示，李志绥已经在这里工作这么多年了，大家对他很了解，工作中会有缺点，可是不会害人。毛同意周的意见，并且表示：“李志绥一天到晚在我这里，为什么不害我，要害江青呢？害我不是更方便吗？上次江青为了安眠药中有假的，就说医生、护士害她，我说我的也有假的，这办法好，可以吃安眠药。”

汪对我说：“这个事情暂时告一段落。可是江青不会死心，你还是不要回家。江青这个人还会下毒手，找人绑

架你。好在有卫生员小李同你在一起，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我。”

我又到了针织总厂待了两个月。每天都在提心吊胆。江青和文革小组权倾一时，无法无天，连毛都约束不了她。毛对江青的所做所为并不是样样清楚。她可以叫别人绑架我，然后辩说不知情，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我仍躲在北京针织总厂。毛不令他亲自领导的六个工厂组织工人宣传队，由支左的警卫团官兵（即八三四一部队）率领到清华大学，接管清华。

现在毛决定要正式军管清华和北大两所大学。（译注：即“六厂二校”经验）。

清华在国内以理工学院闻名。清华大学学生的造反声势也不落于北大之后。一九六六年春天，王光美是清华工作组的组员。当时她支持党委并反对造反派学生。

一九六七年五月，心怀愤恨的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在清华召开了一场盛大的“批斗王光美大会”。

一九六三年，王光美随刘少奇访问东南亚，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卡诺。王是中国国家主席夫人，因此穿上了件旗袍，戴了项链。红卫兵说这就是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铁证。在这次清华园批斗大会上，王光美被迫穿上一件过紧的旗袍，戴上了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台下数以千计的红卫兵叫嚣着她下台的口号。自此后，清华大学便处以无政府状态。毛决心施行军管。

下午四点，工人宣传队和八三四一部官兵到了清华。本来我是不用去的。但我想亲身体验清华军管的过程。

军管会孙主任负责这次行动。

孙召开全厂大会，由各车间抽人，一共抽出男工一百五十多人，分乘几辆大卡车开到清华大学。其他厂的工人宣传队也都陆续到了。总共有上百辆大卡车。后来据报有三万人之多。在校外临时成立了领导小组，扬德中也到了。整理好队伍，向校内行进。

我和卫生员小李夹在人众中。起初行动得很在秩序，但是快要走近物理系大楼的时候，前面的队伍忽然混乱了。小李到前面打听，是学生们设了路障，不让宣传队前进。

停顿不久，传来命令：冲破路障，继续前进。已近黄昏，周围景象逐渐暗淡。

我随着人潮向前走去。

突然一声巨响，前面喊道，炸死人了，接着抬下来血淋淋三个人匆匆过去。

天色昏暗下来，队伍已经凌乱，仍然慢慢向前挪动。忽然我听到像是刮风的声音，很多人都抱着头，或用上衣将头包起来。我还莫名其妙的时候，小李脱了上衣，将我包住。这时我才发现大如鹅卵、小如鸡蛋的石头像大雨一样从对面抛来。人群四散躲避，天已全黑，石头不断袭来。小李拉着我向后退，到校门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自己的队伍。天色太黑。我向小李坐在路旁，下了暴雨，全身淋透。

打散的队伍逐渐在一起，大家都在昏暗一片的雨淋中休息。

到清晨四点的时候，突然开来一辆卧车，沿途叫我的名字，我应声而起。停下来，毛的司机张从车下来，看到我说：“快走，叫你哪。”我问他是谁叫我，张说：“还不是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也叫学生们的头头去。”

我上了车，随他到了人民大会堂。我一走进一一八厅旁边的随从人员休息室，大家哄然说：“大夫受苦了啊，挨了几块石头？”

我淋了雨，头很痛。吴旭君给我止痛片，又给我清凉油。我用清凉油擦了额角和眉间。大会堂的服务员给我端来一碗热汤面说，先吃暖和一下。



吴旭君又来了说，毛叫我立刻到他那里去。我走进一一八厅，毛坐在沙发上看书，见我进来，立起身。我急忙走过去。我这时感觉到毛是真的喜欢我。

毛拉住我的手，仔细端详我的全身，说：“怎么这样狼狈，全身都湿了。”我说，外面在下大雨。

毛又说：“辛苦了。没有受伤吧？不要哭了。”

我猛然没有明白他的话，稍一沉吟才想到我擦了清凉油，眉心、眼角油光光的，可能毛误以为我在流泪。我说：“我没有受伤，可是有三个人被炸了，不知死一没有。”

汪东兴在一旁插话说：“死了一个，其他两个救过来了。”

毛说：“你先休息一下，换换衣服。我已经叫人通知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阑、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宝来这里开个会，中央文革的人参加，你也参加。”（1）毛决意要“保”我。林彪、周恩来、康生和江青都会参加这个会。我和毛一起参加，是表示我是毛的下属，这样他们想搞暗的也不行了。也许我不用再整日担心被绑架了。

这次会议，江青和所有的人热络地打招呼，唯独对我不屑一顾。她仍为所谓下毒一事怀恨在心。这对我到无所谓。无论如何，目前她奈何我不得。

我算是暂时通过了这次考验。

毛与红卫兵的这次会议在文革中是个里程碑。毛要学生停止武斗，并进行联合。

毛警告说，如果一直分成两派斗争不休，每个学校就会一分为二，成为两个清华、两个北大或是两个北京师范大学。

会的当中，韩爱晶发言说：“现在大家都在引用毛主席著作中的一些话，来证明自己行动的正确性。在引用时，可以有不同的见解，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释。主席在的时候，容易解决。主席不在了，该怎么办？”

韩的话刚完，康生与江青就立刻斥责说：“你大胆胡说八道……”

这时毛接过来说：“这问题很好，我年轻的时候，就爱从不同角度看问题。至于我说过的话，今后肯定会有不同的解释，必然如此。你看从孔老夫子到佛教、基督教，从来还不是分成许多派别，有着许多不同的解释。任何事物没有不同的解释，就不会有新的发展、新的创造。否则就停滞，就死亡了。”

但毛这次会议的目的却没有达成。红卫兵仍四分五裂，毛似乎决定不再信任年轻人。八月五日，毛为表示对工人的关怀，经汪东兴给了他们一些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胡珊送的芒果。毛的这一行动显示毛已对各成派系、相持不下的学生失去信心，转而寄望于工人。不久后，数以百万的中学和大学相继下放农村。毛以为学生该跟贫下中农好好学习，接受再教育。

汪东兴把芒果仪式，唱颂着毛语录的警句，然后把芒果用蜡封起来保存，以便传给后世子孙。芒果被供奉在大厅的台上，工人们排队一一前往鞠躬致敬。没有人知道该在蜡封前将芒果消毒，因此没几天后芒果就开始腐烂。革委会将蜡弄掉，剥皮，然后用一大锅水煮芒果肉，再举行一个仪式，工人们排成一队，每人都喝了一口芒果煮过的水。

在那之后，革委会订了一个蜡制的芒果，将它摆在台上，工人们仍依序排队上前致敬，没有丝毫差别。

我跟毛说了芒果的趣事，他大笑。他觉得膜拜芒果无伤大雅，这故事也很有趣。

注释：

当时西方对此次会谈多有报导，并认为它是毛与造反派学生关系的转折点。

毛虽然又保了我，但我不能每天都见上他一面。他此时不需要我的医疗服务，我每天同卫生员小李和护士背着药箱到车间和工人宿舍巡回医疗，每隔几天才向毛汇报一次。文化大革命虽然仍在进行中，但是从厂内来看，正如毛同我说的：“什么文化大革命，人们还不是照旧结婚、生孩子。文化大革命离他们远行很哪。”

文化大革命对我来就似乎也变行很遥远。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不敢表示出厌烦，可是显然在淡漠下来。但是一些大城市内，两派之间武斗不停，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动用了机关枪和大炮。对这些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依然在不停地进行着。如果中央不插手干预，武斗将无止无休。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一天汪东兴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立刻到游泳池去看毛。

毛牙痛要我去看看。

回一组后，反而有种陌生感。一组完全变了样。汪在他的南楼办公室三楼给我整理了一间卧室。我原来在一组的值班室那排房子，毛远新全用作他的卧室和办公室。毛的随身工作人员全调换了。徐秘书、服务员小周、警卫员和护士长吴旭君全部被毛派去到二七机车车辆厂参加军事管制工作。

身着军服的八三四一部队仍在室内游泳池周围保卫毛的安全。但最令我惊讶的是，毛身边的女友更多了。我不熟悉那些服务员和警卫，但我看得出来那批新人都很崇拜毛，就像我刚替毛工作时一样。我猜想旧的人和我一样遭到幻灭的痛苦——跟毛越久，越无法尊敬毛。只有不断调换身边的人，毛才能保证他会永远受到爱戴。

我替毛检查口腔。因为长年不刷牙，牙垢很厚，牙齿上似乎长了一层绿苔。

没有办法判断是什么问题。

我说：“我不懂牙科，是不是请一位牙科医生看看。”

毛说：“你给看看就算了，不必再找别的医生来了。”

我想，我不懂牙科，马马虎虎治疗，岂不是笑话，何况盲目治疗有害无利。

我又讲：“牙科是一门专科，不懂的人，可能治坏。”

毛不置可否，我退了出去。我走进南楼汪的办公室，他在等我的消息。我将毛的话告诉他。汪说：“自从江青一心想将你打成反革命以后，这可是主席第一次找你看病。身边的人全换了，把你又叫来，你要用心搞好。江青还没有罢手。”

他让我到三楼给我准备的房间去休息。

我走到三楼，突然看到吴旭君。原来江青下命令将吴从二七厂调到钓鱼台。

江青知道吴旭君和我共事多年，一直逼吴旭君写揭发信或签已写好的文件，证明我想毒害江青。吴坚不肯签，江青说他包庇坏人，要审查他在什么问题。吴去找汪东兴，汪让吴搬回南楼。在这种情形下，还能够不顾自己而仗义执言的人，可是太少了。我十分感谢吴。

第二天我同吴一起去游泳池见毛。毛见到吴很奇怪，问吴怎么从二七厂回来了。吴将这些经过告诉了毛，说：“现在我也到了反革命的边缘。”

毛大笑说：“好，我这里专收反革命分子。你们两个反革命就在我这里吧。”

随后毛以说：“大夫你不要管江青的事了，让她自己另外找医生。护士也让她自己去找。”

我问毛，我如果碰到江怎么办。毛说：“远远的见到她，避开就是了。”这点我没有听毛的。此后即使对面相遇，江青视若不见，但我并没有躲避。

北京医院当时仍然很乱。院内分成两派，院长和党委书记都被打倒，还没有被打倒，还没有领导接管。我请任何一派的牙科医生，都会表示我——以及毛——是支持那一派的。我也不晓得该支持谁。因此我从上海华东医院调来一位牙科医生。

我一再向毛推荐上海来的这位医生，最后光火了。他对我吼说：“我不同意让这位医生看。你一再要他看，你这是强加于我。怪不得江青要整你一下。”我心里很不服气，我想：你说我强加于你，可上你是你勉强让我做不是本行的事，还不是强加于我。

我只好一方面请教牙科医生，一方面翻看牙周病教科书给毛治疗。毛的牙床一直在恶化。我能做的只有叫他用消毒水漱口，将表面食物残渣清理干净，在感染患抹药。一个月以后，症状就好多了。

毛的病痛不只是生理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一九六九年四月准备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九大）。此时中央内部矛盾已经完全表面化。一九五六年“八大”所提出的纲领到此时仍未被官方扭转——支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毛思想不再是中国的领导意识形态，并批评毛的“冒进”。这些纲领长久以来都是毛的紧箍咒，而念咒语的人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这十三年来，毛一直想取掉这个紧箍，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他这一努力的后果。在筹备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对毛的个人崇拜已是登峰造极。人人胸前佩戴着毛的像章，手中持着红皮的毛的语录本，背诵毛的语录——甚至在店里买样东西，也要互相背上一段。中国人每

天都要在毛像前鞠躬，“早请示、晚汇报”。上下班时，大家都背诵一段毛语录。毛主席的思想早已超越意识形态，而成为宗教经文。

“大冒进”？毛的大跃进创下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死亡人数。据估计至少有二千五百万到二千万人饿死（有人估计高达四千三百万人）。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国社会大混乱，摧残生灵，拆散家庭、友谊，中国社会的基本联系荡然无存。

国家主席刘少奇不但在文革初被批斗，一九六八年十月开除党籍，还遭到极不人道的虐待。一九六九年四月，我并不知道刘被“关押”在哪里，也不敢问。

后来在“九大”结束后许久，我才知道刘在一九六九年十月被押往开封关闭，重病缠身，到十一月去世前，都没有得到医疗。

邓小平也被流放到外地。政治局党委只有毛、林彪和周恩来没事，其余的都被打倒或“靠边站”。省委被撤销，军队领导的革委会接管省政日常事务。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已大部分被打倒。

一九六九年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扭转了十三年来八大制定的纲领，毛成为最高领导，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唯一意识形态。会中选出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再从委员会中选出政治局党委。毛的意志透过九大党章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尚未正式宣告结束。

我给毛治疗牙周病时，党内已开始在筹备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分成两大派。一派是中央文革小组，另一派是林彪和他的亲信。周恩来则跨在中间，两面调和。为了什么人进入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两派争夺相当激烈。



毛尚未表示意见。

我看得出周恩来颇为苦恼。周从未和我议论过政治，但有天夜里我在南楼遇见周，周关上门问我毛对人事安排上讲了些什么话。我说：“他没有多讲，只说人事安排交给文革小组和文革碰头会办。”文革小组成员全在碰头会里，因此江青在碰头会里正是权倾一时。先前围剿周的事也是江青放的第一把火，我觉得我有必要警告周，江居心难测。

我告诉周：“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的打击目标就是你。江青提出‘文化大革命就是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这是旧政府的还不是你。江青他们鼓动全外交系统反你，主席说‘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要文革召开万人大会说明，不能反你。江青他们几个人到游泳池外间休息室商量说，用不着开不么大的会，找个几十名代表来谈谈就可以了。这不是明显还要搞下去。”

周叹了口气说“我对江青仁至以尽。一九四五年我在重庆，江青要看牙齿，我特地飞回延安将她接来。她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六年到苏联治病，还不是我给安排的。”

周又说：“你的这些话同别的什么人讲过。”我告诉他，除了对汪讲过以外，没有对别人说过。周说：“那好。记住，不要同任何别人讲。”

周恩来对毛处处小心谨慎，唯恐不合毛的意图。林彪有一次当着汪东兴面批评周“像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唯命是从”。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百五十多万，已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

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

我站在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毛的专制极权在毛与周的君臣关系上表露无遗。毛一方面要求周的忠心，事事按毛的意旨办，因此周也才能保住地位，另一方面又因为周过于忠心，毛完全没有将周放在眼里，毛不认为周有摄取权力的野心，所以周能够被打而不倒。

周对江青也是唯唯喏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开会。江青来了，要找周。从延安时期就给周任卫士和卫士长的成元功迎了上去。

成请江青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说：“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只狗，对我是一只狼。马上给我抓起来。”

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就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后来成元功去中央办公厅所属的五七干校下放劳动。

汪东兴是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在江、林争权里，汪支持林彪。一来因为痛恨江青，二来毛仍因汪随同刘少奇去印度尼西亚而疑惑未消。九大召开之前，汪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周与汪平日走得也很近，周起初也支持汪的提名，说凡是参加碰头会的人都是政治局委员。

会议期间，汪东兴突然发作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周要我和吴旭君一起去向毛报告，因为生病的严重情况，只有医生才说得清楚。

当我说到出血很多，比较危险的时候，周说了一句：“汪东兴是个好同志。”

接着唏噓起来。我同吴旭君很难过，也哭了。可是我发现毛一句话也不说，脸上表情木然，似乎无动于衷。

冷场一会后，毛说：“有病就照医生的办法治。别的有什么办法？”

我们走后，毛告诉护士刘说，这三个简直如丧考妣，直是奇怪。我们三个一哭，毛怀疑周、汪、吴及我四人是不是在搞派系。

我将毛说的“如丧考妣”的话告诉了汪。汪说，不怕，我们都是为毛做事情，又没有为别人干事。接着汪说：“你不要以为周总理可靠，他这个人见风倒。周来看这我，说江青、康生不同意我当政治局委员，他们让周总理来说服我。周还真叫我表示态度不当政治局委员。你看他这个人真是见风使舵。”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共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两派最后被迫达成妥协。会上汪东兴由黄永胜出面支持，被选上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林发表政治报告，并被官方钦定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毛泽东思想自“九大”后，成为中国的“指导纲领”。

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也步步高升。会议结束后不久，林立果升任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并被刻意吹捧成“中国革命的第三代当然领袖”，毛的一位女友丈夫在空军司令部工作，他将林立果的一些演讲记录经这位女人交给毛

看。林立果在空军的盛名仅次于林彪。空军内一再宣扬要无限效忠于林彪和林立果。

九大后，我的心情更加压抑。毛要转“八大”路线的目标终于实现。“九大”是毛十三年来，进行政治斗争的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前中央委员会委员被撤职——他们都是我最敬重的党代表——新委员大多是江青或林彪的党羽。我认识的很少了。中国在他们的领导下前途渺茫。

林彪此时越来越接近权力的巅峰，全中国进行全面军事化。军队担任恢复秩序的重任，军管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府机构。原来主管省政府的党委书记，换成省军区司令员或政委担任。中共庞大的官僚体制中，从上到下，清一色都是军人。即使在毛常去的招待所也是如此。全中国在林彪的领导下背诵毛语录，学习解放军，形成热潮。警卫局纳入军队编制，全部穿上军装，我自然也不例外。只有毛还穿着他的睡袍，在公开露面时，有一两次换上军装，以表示支持军队，以后又换回中山装。

那时中国仍有两大敌人——苏联和美国。一九六九年三月份发生了中苏黑龙江边境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数月内，全中国处于备战状态。一些有问题的干部，还有那些遭批斗的知识分子和教师，全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干校的目的在于使下放的人体验农村真实生活，并向贫下中农学习，日出夜息，担负着力所难及的重度体力劳动。谁都知道五七干校名为学习，实为处分。中学生和大学生这些年轻知青则被送去“上山下乡”，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一九六九年八月发起城市中“深挖洞”，以做为空中轰炸甚至原子弹的庇护所。北京市下挖筑了网络密布的地下通道，可以容纳下所有北京市民，而工程兵部队则修建了“五一九工程”。（见前文）就在这时，毛有天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我思考以后回答。毛说：“你想，我们的北面和西面是苏联，南面是印度，东面是日本。如果敌人都联合起来，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进攻中国，那么中国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而且也不知道毛的本意指的是什么。第二天我同他说，我回答不出。

毛说：“日本后面实际上是美国。可是东面的美国，离我们远得很哪。我看，还是照我们老祖宗的办法才好，叫做‘远交近攻’”。

我说：“我们的报纸几乎天天对美国中诛笔伐。越南又在同美国打仗。这怎么能交往得起来呢？”

毛说：“美国同苏联不同。美国没有占过中国一块土地。美国新总统尼克森上台了。此人是个老右派，老反共分子。我是喜欢同右派打交道的，右派讲实话。不像左派心口不一，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样。”

我同汪东兴闲谈时，也谈到毛的这番话。汪以为这是随便说说，并没将这些话当成大事。朝鲜战争于一九五〇年六月爆发后，中美关系持续互存敌意，中国认为美国帝国主义想在亚洲以武力建立霸权，对美帝从未稍缓词色。我根本想不到毛的对外政策，会有大幅度的改变。

尼克森也正在改变美国的中国政策。尼克森总统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给毛带话，美国反对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反对苏联给中国做“根治手术”，即破坏中国在新疆的原子弹基地。毛与尼克森的看法不谋而合。

毛说过：“什么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这是亚洲战争体系，无非是向中国进攻。”

毛还放过狠话，对苏联还以颜色：“中国的原子弹、导弹打不到美国，打苏联可容易得很。”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上旬，周恩来送来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一份报告：波兰华沙举办一个时装展览会，在开幕的酒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向中国驻波兰使馆出席酒会的人

表示，希望同中国驻波兰代办会谈。毛批了同意。这个文件给我看了。

毛说：“中美在华沙会谈，自一九五八年停止，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现在可以重打鼓另开张，认真谈一谈。看来尼克森有诚意，几次他带话来，愿意同中国对话。”

我趁毛想改善中美关系的机会，提出重新订阅美方医学杂志的要求。我告诉毛，文化大革命以后，美国的医学杂志都不许进口，所以我们对医学的新进展一无所知。毛年纪日大，我的保健工作会越来越棘手。我必须尽量吸取国外新知。

毛说：“美国千方百计打听我们的消息。我们就这么蠢，自己将自己捆住手脚。你写一个订外国杂志的报告交给我。”

毛将我写的报告批交周恩来和康生。毛对我说：“我要让他们认真想一想我们的对外，特别是对美国关系。”

中国官方仍不断攻击美国，并举兵帮助北越。中美关系却在台面下暗地展开。

毛正在贯彻他的远交（头号敌人美国）近攻（苏联老大哥）战略。

全中国此时处于备战状态。毛计划和美国缓和紧张关系。毛对他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林彪越形不满。九大结束后不久，我在一趟南巡中，第一次察觉毛对林的敌意。

中南海仍由汪东兴率领的八三四一部队负责守卫。即使人数确有增加，也不容易觉察出来。对我来说，从针织总厂回一组后，最令人注意的是毛的女友更多了。

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毛仍然过着他的一如既往的逸豫生活。

一九六九年五月毛又出巡，一路到武汉、杭州和南昌。招待所的服务员全部换上穿军装的女孩子。这次南下，浙江省文工团的两位女孩成了毛的“密友”。这两人甚至把自己的妹妹分别从温州、绍兴调来，充任毛的服务员。文化大革命时期奉行“简朴”的生活纲领。但党的教条越道德化，毛主席私生活越是“资本主义化”。

就在招待所卧室咫尺之外，身着军服的军人来回巡哨。这次南下时我就发现，军队军管后，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军人。从武汉、杭州到南昌，上自省领导，下至服务员，清一色全是军人。

毛对招待所里换成了清一色的军人，很怀疑这种作法的动机。他同我说过：“搞这么多当兵的来作什么？”毛知道军人会向上级如实报告他的活动。毛自然痛恨被“监视”。他要这些军人撤走。

我认为毛对军人的敌意，来自于他对林彪日益坐大的不满。我将这话告诉了汪东兴。汪说：“这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军队搞军管支左，夺了各级的领导权，自然要换上军队的人。警卫局没有军管，可上穿上军装。”汪一向政



治敏感度颇高，但他不相信毛、林两人关系已渐渐出了裂痕。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发生的一桩小事，使我肯定毛对林持有严重敌意。九月底回到北京，住了不到两个星期，十月上旬出发到武汉。十月下旬起，不断有寒潮南下，气温骤然下降。到十一月中旬，已经很冷了。我从多年经验知道，不开暖气，毛一定会感冒。但他不同意，认为室温低，正是锻炼身体耐寒的好机会。这时汪东兴因病，回北京住院去了。张耀词怕负责任，打电话给叶群，让叶将这件事告诉林彪。

林也建议要开暖气。

张将林彪的话向毛讲完后，毛一言未发，似乎不置可否。等到张出去以后，毛对我说：“什么事都向人家报告。人家（指林彪和叶群）放个屁，拿来当成圣旨。”

从这句话，明显看出毛对林已经有了明显裂痕。

十一月底，仍旧没有开暖气，毛感冒了，不肯让我治疗，于是又引起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不得不接受治疗。毛很快恢复了，这才同意开暖气。

毛叫我给他写一个书面报告，写明这次生病的源起和治疗经过。他说：“这个报告是说明，我这次生病，起源的责任不在你们，是我不让开暖气。”

在此同时，我也替汪东兴与林彪的关系日形密切而疑虑重重。我警告过汪几次，但他不以为然。汪对毛绝无二心，但汪野心勃勃，力求与任何可使他达到政治目的的人建立关系，以扩大势力。在文革的风声鹤唳中，汪意图与林巩固关系是招稳棋。

林彪是毛的亲密战友，林曾说过“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跟林合作也等于为毛做事。这是合理的推论。

但政局又在风云暗起。这次汪东兴竟没有马上察觉。

一九七〇年初，一组内流言蜚语，盛传毛的一位女机要员和毛的某位随员过于接近。汪觉得这影响不好。汪的私生活毫无可议之处，他对他妻子非常忠心。因此他无法了解毛“哪来那么大的劲”。毛既然是个特异人物，汪便也不以一般常理来看待毛。但他对一组的人则是一丝不苟。四月在杭州时，汪要我开个会，批评两人。

我认为这件事办不得。我喜欢那位女机要员，她是个天真纯朴的女孩子。我并不相信那些指控，她和那位随员只是说笑闲聊罢了。而且，开会批评尽管是好意，但受批评的人，心里一定不满意。传到毛那里，毛会认为这是指桑骂槐，因为毛本身就有这个毛病。汪不以为然，说我胆子太小，顶多惹得毛不高兴了，不在这里干工作，还可以到别处去干。他是我的领导，我只好奉命开了会。

事情果如所料，尽管语言和缓，但是批评总使人不舒服。女机要员非常不高兴，于是联合了张玉凤，到毛那里去告状，我不知道她们告些什么。但不久，我就知道我犯了大错。

几天后在从杭州回北京的专列上，毛找我谈了一次。毛说：“你太蠢了，不该你管的事，你要管。我看你还是缺少锻炼。回北京后，你组织一个医疗队，到农村搞搞巡回医疗。多接触社会，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会好一些。”

我决定去黑龙江。现在那里的人正忙着挖深洞的备战工作。我可以观察一下当地备战的实际情况。

能去黑龙江让我松了一大口气。虽然有毛的保护，我在北京的情况仍岌岌可危。

这段期间，我往的卫生部宿舍内，给部长和副部长开车的司机在一九六九年也造反了。他们切断了水源和暖气。这样，日常生活也难以维持。卫生部内另一派抢得了会计室的钥匙，凡是取工资的人，就得加入这一派。我拒绝加入任何一派，保持中立。

我同毛讲了我的困境。毛让我转告汪东兴，将我和吴旭君的人事关系全部转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宿舍也搬到位于西单附近的中央办公厅宿舍内。

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五七干校成立后不久，娴的机关全部搬到黑龙江省离中苏边界不远的肇源县农村中，我只好请一位老保姆照顾两个儿子。

娴不但体力劳累，还得不断承受精神上的打击。她每天从早到晚，要在农田里和年轻的壮年男子一样地耕田劳动，晚上还要参加思想批判会。会上有些人的发言总是旁敲侧击，提出她的政治历史有大问题。我们都知道，只因为我仍在毛处工作，所以才没有将她的名字点出来。可上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真让人受不了。

所以如果我去黑龙江，我可以去看看娴，顺便安慰她。就算我的医疗队驻在不同的地方，总比我在北京要近得多。只要远离北京的政治紧张，我们总能找到法子见面。

我这次去黑龙江是带着被流发的心情的。牡丹江市向南大约一百多公里是宁安县，满清时代叫作宁古塔，是流放政府官吏的所在。因此我选择了宁安作为我巡回医疗的地点。

汪原本不想让我去。汪说：“这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现在北京医院没有恢复秩序，主席有了病，没有地方可以住院。我们已经将养蜂夹道的高级俱乐部（位于中南海外北海附近）接收了，正在这里组建一个医院，名字叫

解放军三〇五医院，这是专这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准备的。已经同意任命你（指我）为院长。”

但我仍为下放黑龙江一事怪汪。汪一定要我开会，导致我的下放。毛已对我日渐失去信任。江青和康生也一直在攻击我。和觉得自己其实是个替罪羔羊。汪东兴跟林彪走得太近，没有注意到毛对他两人都有了戒心。我多次告诉汪，毛对林的敌意时，汪总是嗤之以鼻。这次我确定毛是拿我来代替整汪。

我从北京医院抽了一位内科医生侯，一位妇产科杜，从三〇五医院抽了一位外科医生牛，一位手术室护士小邵，警卫团派了一位大队政委张，加上我和卫生员小李，一共七个人，带上器材药品，六月二十九日乘北京到哈尔滨的直达快车出发。

汪的办公室事先已打电话跟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打过招呼。我们到哈尔滨后，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光参观哈尔滨市就足足有一个礼拜。我们参观了工业区，工厂组成了民兵，发了枪和弹药，随时准备迎战苏联。地下的地道连成一片，开始覆盖上水泥，成为永久性建筑。我们也去看了近郊的几个野战医院，房屋和设备都很简单，但用作急救站是绰绰有余的。我想去看珍宝岛的提议被拒绝。省革委会主任说，中苏边界仍然有时有小型冲突，战争的气氛很浓，还是不要去的好。

从哈尔滨又乘火车到牡丹江市。这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很整洁安静。我们在镜泊湖住了一夜。这是一串湖泊连在一起，景色宜人。当地人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前，这里还有些白俄居住，靠狗熊和东北虎为生，文革以后都离开中国了。由市革委会钟司令招持参观和款宴十天后，我们乘车到了宁安。我们人员增加了，黑龙江省卫生厅派了一位医生，牡丹江市又派了一位外科医生和护士。我们一起在农村走家串户，进行义务医疗。我这下真成了“赤脚医生”。

我住在人民公社的办公室里，和卫生员小李同一个房间。李对我像对父亲一样照顾我。黑龙江的黑土丰沃，适合种植玉米和大豆。

农民的土屋也和南方不同。屋子用泥土砌成，稻草覆顶。屋内有个大坑，一家男女老少都一起在上面吃饭和睡觉。黑龙江省不像国内其他地区，森林未遭到滥砍，因此家家有足够的木材做柴火。炕下有个煮饭的火炉，烟囱冒的热气可以暖炕。

宁安县有汉人，也有朝鲜族人。朝鲜族人有不同的习俗。他们用一种彩纸贴在炕上，让炕台看起来干净，屋内也显得整洁。中国人习惯铺一层稻草在炕上，所以看起来杂乱。公社的农民没有江西穷，但手头也很拮据。没有医生，如果生了病，得走去宁安城里看病。但没有人想到要去看病——医药费太贵，城也太远。现代医疗观念在此并不存在。

秋收时，有天有个老农妇被麦芒扎穿眼睛的角膜，我没有适当的医药或设备，我要她去城里的医院看看。但她没有钱，不可能去。

我是大部分农民平生仅见的医生。我从一村到一村，走家串户，用最基本的器材药品进行义务医疗。他们看到我们时总是笑逐颜开，十分亲近。公社内有两种肆虐——肺结核和条虫病。农民养猪，在田里野放，不设猪圈，常食粪而染上条虫。农民吃猪肉，总不煮烂，因此很容易染上条虫病。

我虽然喜欢这里的义务医疗生活，却没能见着娴一面。娴所在的五七干校由于战备，已经从黑龙江迁到河南省沈丘。我非常思念我的家人。冥冥中，似乎命运的魔掌一直在把我们分隔开来。从娴的数封信中我得知她日子很不好过。我下放到黑龙江后有不少传闻。一个说法是说我因政治问题被调，另一个说法是说我向苏联“投诚”，或遭俄国人绑架。我的家人和我都为这些恶意中伤而感到沮丧。但宁安的封闭生活非常平静。宁安似乎是文化大革命纷扰世界中的桃花源。

我已经到宁安四个月了。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我们正在村子里给农民看病，一辆吉普车开来。钟司令从车上跳下来说：“找你足有两个小时了。我们从一个村子到一个村子，真难找啊。”

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北京中央办公厅来了长途电话，有紧急状况，要我立刻回去。我将医疗队交给张政委和牛医生，同钟司令上了吉普车。到牡丹江市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这一地区只有牡丹江机场）。钟司令一定要给我饯行，我推托不掉。但我一点也吃不下去，我不知道叫我赶回北京是什么事情，会不会有了新的周折。

到飞机场已经快十一点了。一架苏联制伊而六十二飞机停在机场跑道上。我登上飞机，机舱中只有我一个人。抵达北京西郊机场已经深夜二时多。毛的司机老张正有等我。

座车在空荡而黝黑的街道上疾驶向中南海。我仍穿着一身厚棉军衣。车子停在室内游泳池前时，我已满身大汗，对我说：“他老人家坐在大厅里等你。你见过他，我再告诉你详细情况。”



毛坐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的正面沙发上，面色潮红，呼吸急促。他问我在什么地方巡回医疗。我告诉他在宁安，就是满清时的宁古塔。他说，那就是顾贞观写的那首词：“季子平安否”给吴汉槎的地方了。我说是的。他说：“我可是不行了，病了，所以请你回来。你先叫护士长把我的爱克斯光片拿出来看看，明天再给我检查，说说你的意见。”我向毛报告了一下宁安的义务医疗工作，说在那里不苦，做“赤脚医生”是个很好的学习经验。我表示想马上看看片子。

吴旭君在值班室内拿出毛的胸部爱克斯光照片，对我说：“李院长，这回可出了大事了。”

我不禁愕然。我说：“你怎么叫我李院长呢？”

吴说：“是李院长，已经下了任职命令了。”我流放期间，总参谋长黄永胜、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已经同意通过任命我为解放军三〇五医院院长。

我问吴旭君：“到底出了什么大事？”

原来是当年八月到九月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也就是我去黑龙江后不久）的事。毛退居二线后，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一九六九年底，刘少奇遭凌虐至死。林彪想经由此会再次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建议。毛几次打招呼不设国家主席，废除这个职位。

林转而寻求汪东兴的大力相助。后来汪跟我说，上庐山以前，叶群同他打招呼，要主张设国家主席，“否则没有林的位置了”。叶知道毛决定撤除国家毛主席这一职位，便纵恿其他领导人提议。这样主张的人多，毛也不能不尊重多数人的意见。

林彪集团主要成员，除了叶群以外，有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司令李作鹏和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陈伯达。汪东兴告诉我，一九七〇年八月上庐山以前，他们就已商量好，要主张设立国家主席，并要在会议的各分组发言中首先表态，用以左右全会的代表们的发言。

原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事先与林彪和叶群商量好，由陈编选马克思、列宁和毛的一些讲天才的语录，经林彪审定的“天才论”的材料，陈在小组会上宣讲。文中吹捧毛的天才，鼓吹毛复任国家主席，并刊登在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一时会议代表都以为这是毛的意旨，纷纷发言，主张设国家主席。早在一九七〇年初，毛就向政治局党委表示，他决不再出任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但大部份中全会的会议代表并不知道。一旦恢复设立国家主席而毛又不聘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林彪为唯一可能人选。这便是林的如意算盘。林彪这下犯下了和刘少奇一样的政治错误——以为中国可以有两个主席。在毛眼里，想和他齐头并立是犯上作乱。

八月二十五日毛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严厉批评陈伯达，随之开展“批陈整风”（1）。

汪在华北组会上，吹捧林彪，主张设立国家主席。毛发了大脾气，说汪是林彪一夥的。把汪臭骂了一顿，现在汪等于停职反省。汪在家里写检讨，闭门思过，并把叶群找他谈的话全告诉了毛。为些毛表彰了汪，也就解开了怀疑汪的疙瘩。

这期间周恩来同杨德中谈了话，叫杨准备接管警卫局。周想顺着毛的意思，撤消汪的职务。康生则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武建华和在清华大学支左的迟群讲了周的布置。武与迟二人却向汪透露了这个消息。汪因此极恨杨与王良恩。

汪对我说：“我犯了大错误了。现在在家里写检讨。这也好，闭门思过，休息休息。主席已经生气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但汪因此对周恩来和康生恨之入骨，又愤愤地跟我说：“他们这几个人等着瞧。”

汪的事在一组掀起的余波不小。毛还叫吴旭君揭发汪的问题，说吴是汪的一夥。

吴说：“我一天到晚在你这里值班，汪搞些什么，我怎么知道。”吴确实不知道汪的活动。但从此对她不信任了，不让她值班。

毛的女友刘和她两位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朋友，都不再充许进入中南海。刘和叶群、林彪关系密切，毛怀疑刘是林彪的特务。林立果现在空军权倾一时，毛认为她们三人都是林立果派来的。毛有一次对我说过：“这些人都靠不住。”

张玉凤从这时开始，才搬进中南海，给毛正式值班，照管毛的日常生活。

两位外交部的女孩子——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海蓉和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司长兼毛英文翻译唐闻生，几乎每隔一两天来一次。也是从这时开始，毛接见外宾都由她们二人经管。甚至周恩来要向毛呈报一些事，也都经过她们向毛报告，并转过毛的意见。

我有时很奇怪，江青为什么不再来查访毛的私生活。我问吴旭君。吴说，在庐山会议时，毛和江谈了一次话，

有了“协议”，毛向江点明了自己的私生活问题，毛要江不要过问毛的私生活，代价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护江。

八、九月庐山会议所爆发的党内政治斗争余波未平。林彪声望逐日下降。毛像身处往常的政治斗争中一般，在鹿死谁手、局势未定之前，十一月又生了病。

在卢山大闹一场以后，毛就开始不大舒服，到十月下旬越来越重，周恩来派了三位医生来看，照了爱克斯光胸片，已经注射了抗生素。他们的诊断是肺炎。那时毛的迫害妄想狂已经十分严重。毛一听就火了，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是按着林彪的指挥治病，连着发了两天脾气。张玉凤向毛提出来，不如叫我回来看看。毛同意了。汪东兴其实早就想叫我回一组了，但汪不能提，否则疑心病重的毛会将我和汪连在一起。这样我才从黑龙江赶回北京。

我拿起片子看，是肺炎的影像。可是在当时的激烈政治斗争中，毛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和怀疑状态。按照科学态度，应该实事求是说明诊断，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也就成了林彪一夥了。因此我同他讲，看来仍旧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针就好了。

我讲完以后，我看一脸焦虑的神情立刻放松了，然后用双拳猛扣前胸说：“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烂了。你再拿着片子去看这三位大夫，看看他们怎么说。这三位太可笑，一个只管检查，不说话。一个只是说话，不检查。另一个戴个大口罩，既不检查，又不说话。如果是肺炎，我就停止打针，看死得了死不了。”

我去找了三位医生，将我与毛的谈话告诉他们。我说，在日前，如果一定坚持是肺炎，他接受不了，只要他同意继续治下去，就达到了目的。他们都同意了。

中南海门诊部主任说：“我们也不知道卢山上发生了什么事，谁也没有想到将病和政治连在一起。真是倒楣。其实都是总理在指挥。”

我又回到游泳池，向毛说了，三个人都同意我的看法。毛很高兴，当夜请我吃饭。我巡回医疗期间原定是一年，现在毛不要我回黑龙江。毛说：“你不要去了，我这里可能还有事要你办。”我当时认为，我为汪受过，被流放到黑龙江，很不公平。我向汪说：“主席还是用我啊，为什么我的爱人不能回北京呢？”于是一、二周后，汪东兴安排将娴由河南调回北京。我们一家总算又团圆了。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接见了他的老朋友爱德加·斯诺。接见期间，毛对我说：“斯诺这个人，看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让他知道中国的内幕，有好处。”

## (2)

毛利用这次接见机会来促进中美关系，并传达他愿意邀请尼克森来中国或接见美国其他高级官员。他也不想藉此使中央情报局知道，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目前十分紧张，看看美国有什么反应。毛在谈话中指出：“喊我万岁的人有三种。第一种是真心喊，这种人不多。第二种是随大溜，这种人最多。第三种嘴上喊万岁，心里希望我早死，这种人很少，可能那么几个。”

我于一九八八年在美定居多时后，才知道斯诺在一九七〇年访问中国当时，他在自己家乡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中美建交后，他才将这段话转告美国政府。我想斯诺极有可能也不了解毛上段话中的深意。毛指的第三种人正是林彪。

注释：

包括陈伯达和汪东兴在内，无人明白支持林彪出任国家主席，即使议论中的言外之意昭然若揭。议论公开集中是否该恢复设立国家主席。

没有证据支持毛认为斯诺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员的猜测。斯诺对这次与会晤的说法，见前引 *The Long Revolution* , pp. 169-172。

到一九七一年八月时，毛对林彪的不信任达到极点。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的丈夫小苏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通过谢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航队”、“上海小组”和“教道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

小苏要毛注意。毛决心南巡，趁南巡的机会和大军区的领导人及省的领导人打招呼。

林彪个人任命的党羽多半在中央，也分布在各省及军区。毛自信以他的威望仍可以得到省和军队领导人的支持。这点毛讲的很清楚。他行前同我说：“我就不相信，这些司令员们就都跟林彪走。难道解放军就都会造反不成？还是那句老话，如果解放军不听指挥，我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

八月十日专列循京广线南下，途中停过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一路上，毛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毛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有人急于想当中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毛从未挑明想夺权的人是林彪，但他的暗示已昭然若揭。另一方面，毛对林为他大肆吹捧的个人崇拜的背后动机也起了疑心。毛讽刺地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和列宁不是在几十年内相继出现的吗？什么‘大树特树’（指杨成武写，由陈伯达修改的一篇吹捧毛的文章），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指林彪）。 ”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那四大金刚（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

林彪想夺毛的领导权，要分裂党——毛的话中影射这些已明显出现的问题。毛说林彪对这件事（指庐山会议之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但是毛仍留有余地。

毛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得过来，有得可能救不过来。大凡犯了路线错误的人，是很难挽回的。看，陈独秀、王明、张国焘，他们回头了吗？”

此次南巡离开北京将近一个月。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傍晚到了北京丰台。回中南海前，毛又找了北京市和北京军区的负责人做了丰台谈话。主要的内容是林彪。

谈话以后，回到中南海游泳池已经快到晚上八、九点钟了。

汪东兴接到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时，我正在游泳池内整理我的器械装备。那时是晚上十点多钟。

这电话是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由北戴河打来的，说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又名林豆豆）讲，叶群和林立果要绑架林彪外逃。



汪东兴立刻给周恩来打了紧急电话。

周恩来此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接到电话后，立刻奔往中南海。周十一点到游泳池。毛仍不知道这件事。周恩来向主席报告林彪叛逃，我在一旁听着。

周恩来向毛报告。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密报给北戴河的张宏，叶群和林立果绑架林彪上了座车。叶群刚才打电话给周，说林彪要移动一下，但是说没有飞机。但周查了空军，有一架三叉战斗机就停在北戴河外山海关机场。因此周怀疑叶群这是声东击西法，用来掩饰他们的潜逃。这些都说明情况有变。

毛一听到周说林彪要潜逃，全身一震。但他随即表情自若，静听周的报告，看不出他内心的感受。

周建议，毛还是搬到人民大会堂去住。林彪逃走的目的仍然不明，林彪的人在北京不少，如果他们计划政变，可能随时会爆发武装攻击。看样子，人民大会堂比较安全，容易防卫。汪又规定，任何人没有得他同意以前，不许同外面联系，不许外出。

毛的随身工作人员都在凌晨前的抵达一一八厅。汪东兴和张耀词在隔室设了办公室。汪一直在等北戴河的后续报告。周恩来也在等消息。

毛在看史书。

到十三日凌晨零点五十分，张宏打电话来说，林彪乘红旗车跑了。张等开了辆吉普车尾追，并曾对有防弹车开枪，但拦不下来，不起作用。红旗车是十二个气缸，吉普车只有四个缸，无论如何也追不上。半路上那辆防弹的红旗车突然停下来，林的秘书李文普被猛然推下车，车里有

人对他开了几枪。（李后来被送往三〇五医院救治，右臂上中了一枪。汪东兴下令将李隔离审查，后来不知关到何处。）等张他们尾随直追入山海关机场内时，林的飞机已驶入跑道。

周提出要用导弹打下来。

毛不同意。毛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林彪要跑，随他去吧。不要打。”

我们只好等待。

旋即又来报告说，飞机紧急起飞，燃料不够，最多只有一升油，飞不了多远。

而且起飞时，飞机左翼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上的油罐盖。右机翼上的灯撞破，右起落架撞坏，降落会有困难。副驾驶员、领航员、无线电通讯员都没有上飞机。雷达侦测到飞机航路。飞机航向的报告如雪片般冲进汪的临时办公室。

林彪乘坐的那架飞机往西北苏联方向飞去。

凌晨二时，周向毛报告，林彪乘坐的那架飞机已经越出国境，进入外蒙古领空。

飞机在侦测仪上失去踪迹。

毛看上去沉着而冷静，只说了一句：“不过是张国焘、王明以外，再加一个罢了。”

在当天下午，周恩来送给毛，蒙古人民共和国照会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的报告：有架中国飞机，在聂兹而库区以南温都而汗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等到十六日驻蒙古大使馆通知周恩来，经核对牙齿后，确定坠机死者之一为林彪。毛只是轻松地说了一句：“跑得好嘛。”

汪东兴则从内心表现出喜悦，说：“死的好，要不然还会有很大的麻烦。”

确定林彪坠机后，周又说：“这样的下场很好，解决了大问题。”

周恩来负责事后的调查逮捕行动。此时林彪密谋叛变一曝光，大家纷纷和林彪划清界线，以求自保。周其实和林的关系也很“密切”。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毛将我从黑龙江调回，给他治病。等到病好以后，毛又让我开展研究和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工作。我同毛讲，这样的工作，一个人很难成，需要通过国务院，由全国有关医务人员共同协作。这样，就要向周恩来讲清楚。毛同意，但是补充说，告诉周不必同林彪讲。那时他曾对我说过，前一段给他治病的医生是按照林彪的指使进行的，林彪其实心里希望他早死，他怕林彪想毒害他。

这两件事我都告诉了周，并且说，毛对林彪已经有了很大的戒备心，希望周不要同林讲。当时周沉吟了片刻，同意了。但是过不到一个星期，叶群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毛的健康情况，说她和林都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慢性支气管炎的防治工作。

我听叶群的话，很吃惊，我想叶既然可以给我打电话，说明她已经知道了毛的意图。这件事我只告诉周一个人，可见周露了口风。我去看了周恩来，告诉周，如果毛知道了，毛会怀疑是我向叶、林通风报信。

周凝视着我说：“这是我报告林副主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和领导，林副主席是我的领导，我怎么能够不报告他呢？”

等到林彪乘飞机逃跑后，周向毛报告了情况，决定迁移至人民大会堂。行前，周特别向我打招呼说：“李院长，

主席的身体健康情况，我们可是都没有向林彪讲过。这点我们还是有警惕心的。”周这是在警告我，不能告诉毛，周向林报告了毛的健康情况。

周既然可以违背毛的意旨，向林透露毛的健康情况，那么可不可能还向林透露别的有关毛的言行呢？

汪东兴告诉我，他派八三四一部队搜查毛家湾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许多邓颖超、周恩来和林、叶的合照。汪亲自将照片拿给邓。邓则一再向汪表示感谢。

汪也搜到不少江青和林彪与叶群的照片。汪也拿给江青，江叫人把照片烧毁。

毛是二十二日回到中南海游泳池。这时参与林彪密谋政变的人都被捕。

林彪坠机死亡，也说是所谓“九·一二事件”，以后经过周恩来数月的调查查证，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了武装起义计划，代号为“五七一（即武装起义）工程”，策划以武装政变，逮捕或杀害毛泽东，夺取政权，如果不成，就飞到广州，另立中央。

我早就怀疑林彪，小苏也密告过林立果的“秘密组织”的事。林想下手的时机是毛在七一年八月的南巡。毛原本相信地方军区领导人都会支持他，南巡是向他们打招呼。

按照中共中央揭露出的材料，毛泽东八月十四日出发南巡，沿途秘密讲话矛头直指林彪。这个讲话的内容，由武汉军区政委刘永胜密电在北戴河避暑的林彪、叶群。

林、叶立即策划暗杀毛的计划。他们有数个方案——在毛的南巡途中以飞机轰炸火车，在上海由空军军长王维国枪击毛，和以炸弹炸毁上海虹桥机场毛的列车停放处的油库，或在苏州附近的硕放铁路桥下安装炸弹，炸毁通过桥时的毛的专列。

我不晓得这份钜细靡遗的暗杀计划的正确性。

我一向清楚，想暗杀毛可谓难如登天。毛的警惕性极高，行踪秘密而又随时改变，使人无法预测他的行止。在林彪党羽还没有来得及下手以前，毛已回到北京。

在这种情况下，机会已失，全盘皆输，林彪乘飞机北逃。林彪深知成为毛敌手的下场——当时我不知道，刘少奇被单独关押在中南海后运到河南，饱受凌虐、病魔摧残而死。暗杀计划失败，林彪无异是签下了自己的死刑判决。林唯一的生路便是逃往国外。

林立衡密报其父亲林彪是被绑架一事并不正确。林立衡深爱其父亲，却与叶群关系非常恶劣，竟怀疑叶不是她的生母。林立衡无法接受林彪拟定武装起义计划以及会叛逃的事实。

数月后，“九·一三事件”和中共中央文件的披露，对每个人都是极大的震惊，我也不例外。固然如前所述，早在一九六九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我就察觉毛对林有明显的厌恶和戒备心。庐山会议以后，毛的言行，更加说明正在开展一场新的党内斗争。但是想不到有这样的结局。

事后有不少朋友问我，在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陪毛南巡途中，我怕不怕。朋友们很想知道和毛一同藏身于人民大会堂，直至林彪死亡，参与政变的余党被捕为止，那段期间我的感觉。坦率讲，我没有一点怕的感觉，因为当时我只知道毛这方面的活动，对林彪一方面的暗杀计划和行动毫无所知。

林彪的策划武装政变和死亡，对毛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毛将我从黑龙江召回北京替他治肺炎，从此他就没有完全恢复。毛的体质上有了惊人的变化。在林彪的党羽陆续被逮捕，毛的安全确定后，他又像一九五六年反右运动时那样，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表情忧郁。毛话变得少了，无精打采，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步履迟缓，站起来的时候背驼得明显，睡眠更加紊乱。

长期以来，他的血压保持在高压一百三十毫米汞柱上下，低压在八十毫米汞柱上下。这时，偶而高压上升到一百八十，低压则为一百。两个小腿和两脚都有轻度浮肿，在足踝处可以看得很清楚。感冒、咳嗽、浓痰不断。胸部听上去，满是杂音。

肺部显然有反复感染。痰培养没有特殊的致病细菌，只是些正常人都有的非致病菌类。这表明毛本身的抵抗力大为减低，对正常人不会致病的菌类，在毛的肺上却引起了感染。心脏虽然没有杂音，但是有时有心律不齐。

我建议毛做一次全面体格检查，至少照一次胸部爱克斯光片子，和做一次心电图。他不同意。我又向他建议，服用人参，提高全身抵抗力。他说，他不相信中医。

但是肺部的反复感染，不加以控制的话，会越形严重，而且能引发心力衰竭。

我向毛说明，肺部的感染不能不设法控制，提出肌肉注射抗生素。他说，他不愿意打针，只同意口服抗炎药。于是开始口服抗生素。只是吃吃停停，厉害时吃，稍一减轻就又停止。这种办法无异于锻炼细菌抗生素的抵抗力，使肺部感染更加不易控制。毛全身情况越来越虚弱了。

到了十一月二十日，北越总理范文同到北京访问。毛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范，电视上照出毛的行走的步态。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毛走路那么困难，两条腿像是两条木棍子似的在挪动。

毛在床上抑郁终日，此时又在构想新的政治战略。五年多前，也就是一九六六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党内精英凋零殆尽，许多高阶官员被迫害致死，有些人遭批斗。但真正思谋叛变的人竟是毛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许多领导人早对毛发出警告，他们认为林不适合做接班人。他们曾大力反对林提出的对毛的极端个人崇拜，及其所主张的军队骡马化和满嘴空洞愚蠢的政治口号。毛在床上辗转了四个月，他决心要那些被他批斗的老同志回到他身边。

毛计划让大部分的老干部复职。陈毅元帅的追悼会是毛发出的第一个信。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前外交部部长陈毅因结肠癌去世。陈毅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敢谏。他曾痛陈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红卫兵的暴行以及林彪的错误领导。

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对江青及文革小组等提出强烈批评，不满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作法。二月十七日，谭震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他当年不该加入革命的行列，不该加入红军，不该在一九三〇年初和毛一起上井冈山。林彪将这信转给了毛，上加批说“谭震林最近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毛读过信后，召集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这些人，指责他们搞复辟、搞翻案。林彪、江青等人便借机鼓动“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大规模地批整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取代。这一事件被文革小组称为“二月逆流”。

陈毅在那时被迫离职。一九七二年陈毅去世时，仍未平反。（译注：陈毅在一九六八年后蹲点劳动，下放石家庄，一九七〇年中央同意陈回北京治疗癌症。）追悼会在一月十日下午三时在北京西郊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中央建国元勋大都安葬于八宝山。）毛可以不出席。原定由周恩来主祭，叶剑英元帅致悼词。叶剑英送来有关追悼会的文件，请毛审阅。毛看过后，将悼词中“……有功有过……”

四个字勾掉，这等过是让陈平反。



到下午一点多钟，毛睡醒觉，突然决定参加追悼会，而且立刻就走。他的这一突然决定，使我们措手不及。

他那时光着身子，只穿了件睡衣就走。向他说外面很冷，要穿好衣服，他并不考虑。只好用一件大衣穿在睡衣外，戴上帽子。我们陪他上车，往八宝山去。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明这一突然变化，并且叫杨德中立即赶去八宝山设法解决取暖问题。

到了八宝山公墓的休息室，除陈毅的夫人张茜和她的四个孩子在另外一个休息室外，别的我都没有来。毛让张茜和她的孩子们到他这里来。

张茜进来以后，毛的服务员将毛从沙发上扶起来，迎上去。张疾步前趋。毛拉住张的两只手。

张满脸泪痕，向毛问好。

毛挤着眼睛，咧开了嘴，说：“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啊。”

这时周恩来、叶剑英、朱德等人纷纷赶到了。我听到旁边有人说：“毛主席哭了。”大家不禁唏嘘起来，整个休息室充满了抽噎声。

但是我没有看到毛流下一滴眼泪，尽管毛又嚎了几声。我常想，毛是极善于表演的，如果他是位演员，他可以成为一位名演员。他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控制和影响对方情绪的表情变化。

流亡在北京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也来参加追悼会。毛同西哈努克握手，向西哈努克说：“我的亲密战友在去年九月十三日，坐了一架飞机要到苏联去，可是在蒙古的温都而汗摔死了。”接着又说：“我的这位亲密战友就是林彪，他反对我。陈毅支持我。”

毛又说到陈毅是反对林彪、陈伯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由于毛的这番讲话，将“二月逆流”完全反过来，也给一些高级干部的解放铺平了道路。

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在陈毅的追悼会后，前代参谋总长杨成武、前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前北京警备司令傅崇碧三人随即平反。林彪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晚召见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团以上干部，共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宣布撤销扬、余、傅的职务，并将余立金逮捕法办。毛说：“扬、余、傅都要翻案。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

毛还让汪东兴向杨成武转达了他的话说：“杨成武，我了解‘杨、余、傅’事件搞错了。”

罗瑞卿（译注：罗于一九六六年上海会议被批斗后，曾跳楼自杀，所幸只是左腿骨折）亦平反。毛说：“林彪说罗瑞卿搞突然袭击。林彪对罗瑞卿还不是搞突然袭击。在上海，是我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许多问题我听了一面之词，说是不好，我要做自我批评。”

可以这样说，林彪事件的发生，促使毛回头看看这些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干部。

在毛的“干部政策”指挥下，周恩来奉命使大部分老干部恢复工作。由此可见，虽然他口头上并没有承认，但是在客观上，他的这个行动却在某种程度上，起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作用。

一九七二年毛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我们从陈毅的追悼会回中南海以后，毛就生病了。八宝山殡仪馆室温很低，虽然用一大空汽油桶，装满烧红的煤块，但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追悼过程中，毛一直站立着。到追悼会快结束的时，他的两腿已有些抖动，并且开始连续咳嗽。会后，出门上汽车，几次抬脚，都登不上车，最后由我在后面向上搬腿，才算是上了车。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回来以后，明显的肺部感染加重，而且有了低烧。我提出肌肉注射抗生素，他拒绝了。只好口服抗生素。症状没有一丝好转，两腿两脚浮肿越来越重，肺部罗音满布，心律不齐增加。又建议他检查身体，再请医生会诊。毛不同意，而且说：“你是想推卸责任。”

口服抗生素服了五天，毛给停下来了。他说：“吃了不顶用。”

毛已经不能平卧，只能靠在沙发上入睡，而且有时迷迷糊糊，好像时醒时睡。

一月十八日近中午的时候，吴旭君叫我，说，毛的脉搏摸不清。我跑到毛的卧室，细测他的脉搏，已经到了每分钟一百四十跳上下。我立刻打电话给汪东兴和周恩来，并且说，毛不同意做必要的检查，可是毛的情况已经很危急，再有突然变化，就会措手不及。

周决定成立医疗组，任我为组长。从北京阜外医院调麻醉科主任尚德延和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高日新和一些急救护士，暂时住在中南海门诊部。又让我向毛说明，让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吴洁及中南海门诊部医生胡旭东参加治疗工作。又请来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内科主任岳美中做必要的中医治疗。同时让我再劝毛做心电图检查。

我将周的建议向毛说了，开始毛不同意。后来我讲，现在治疗，可以很快恢复，再拖下去就不容易恢复了。他的浮肿已开始向上扩散。毛同意了做些简单检查，但只限定做心电图和体检。

病的诊断是很清楚的，是因为肺部的感染，引起心脏受到损害，也就是发生了肺心病，并且已经有了充血性心力衰竭和肺性脑病。脑部没有足够的氧气，所以迷迷糊糊，时睡时醒。心电图显示有阵发性心动过速。

毛说话还清楚，但是显得十分疲惫。过去，毛见到大熟识的人，总要说几句笑话。这次可不同了。他急躁，不耐烦。中医岳美中给毛看了脉，然后按中医理论解释病情。毛没有等岳说完，说讲：“可以了，你们出去研究。”大家退出去以后，他又将我叫回去说：“我看，中医起不了什么作用，让他走吧。”

我想这很不好办，岳美中是有名的中医，当时已经近七十岁了，对这样一位老中医可不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我和汪商量。汪让我将岳美中送到他那里，给他看看病，同时谈谈毛的病情。

这样才使没有受到精神打击。

我与吴洁、胡旭东商量后，向毛提出要消炎（注射青霉素，即盘尼西林），强心（先肌肉注射，然后口服洋地黄地制剂）及利尿（服用利尿剂）。毛只同意前两项，他说：“不要搞得这么紧张。你们的办法都用完了，下一步就没有办法了。”

毛仍然不放心。他要我去问康生是用什么药治病的，毛想用同样的药。林彪事件后，当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之一的康生，突然陷入重度的精神忧郁症。他待在钓鱼台的房里，整天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一语不发。康的情况和毛的病完全不同。

我找到康生的保健医生顾。他说，康生什么药都不信，只信抗生素。回来以后，将康生的只信抗生素告诉了毛，毛说：“你看嘛，不要用那么多种的药。”因此，洋地黄制剂只注射了一次，就停下来。

只用青梅素注射，当然解决不了心力衰竭的问题。验血报告显示毛缺氧度严重，远远低于正常水平，有生命危险。到一月二十一日，我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明照这样拖不去，很危险，希望周恩来来游泳池，劝毛加强治疗。同时，我又说明，这么多年来，给毛治病，从来不告诉江青。毛一向同意不要向江青讲，免得她干扰治疗。

周同意不向江青讲。

到晚上七点多钟，周恩来到了游泳池，可是江青也同时来了。当时我一怔。江青来了后，去上厕所。周恩来同我说：“主席病重，江青同志是政治局委员，而且是主席的夫人，如果不告诉她，一旦主席出了事，我怎么交代啊。何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我在政治局里，不向她讲怎么行呢？”

我和吴、胡三个人，向他们二位讲明毛的病情，提出如不加强抓紧治疗，就会有危险了。周恩来问得很仔细，特别对治疗方法上提了不少问题。

江青心不在焉地说：“前几天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还不是很好吗？去年一年精神好得很。主席身体的底子好，不会有什么大的毛病。不要制造紧张空气。”

周又解释，从林彪事件以后，毛的身体就不太好。周又提出要我陪他和江青一起到毛的卧室，由我说明需要加强治疗 and 治疗方法。

我第一个走进毛的卧室。毛穿了一件睡袍，前襟敞开，坐在单人沙发上，头靠在沙发上，开着眼睛，嘴半张开，

胸部起伏不止，两臂、两腿伸直，似乎瘫在沙发上，两颊苍黄。

我走到毛的面前轻声说：“主席，周总理和江青来看你。”

我与周、江各搬了一把椅子，围坐在毛的沙发前。周转头看看门外。外面汪东兴、张耀词等人都在张望倾听，周把他们噓走。

毛嗯了一声，大声咳呛，终于有了一口痰咳出来。毛的习惯是别人拿痰盂凑上去，吐在痰盂里。我用痰盂接上去。江青跟毛长年分居，不晓得毛用痰盂的习惯。

江青哼了一声，用小毛巾去接。毛拿手猛力推开江青的手，然后向我送上去的痰盂吐出。

毛断断续续地说：“你们来，有什么事情，讲吧。”

周向江看看。江端坐在椅子上，不声不响。周说：“我们刚才在外面研究了主席的身体情况，想将研究的结果向主席汇报。”

毛说：“有什么好研究的，你们又不是医生，啥也不懂，还不是要听医生的。”

周望一望江青，江仍然一言不发。周接着说：“刚刚他们三位……”

毛说：“什么三位？”

周说：“就是李志绥、吴洁、胡旭东三位医生，向我和江青同志讲了主席的病情。”

周说：“主席受了凉，肺部有感染，拖的时间长了一点，心脏受了影响。还要增强治疗才行。”然后，周向我说：“你再给主席说说病的情况，和治疗办法。”

我答应了一声，还没有开口，毛对着我说：“你原来给我吃的是什么药，弄得我一点也不想吃饭。现在又打什么针，打得屁股上又痒又痛。”

江青这时恶狠狠地说：“一九六八年李志绥用毒药害我，你当时讲‘为什么他只害你，不害我，害我不是比你更容易吗’。现在你看，他害你了。这不是清楚得很嘛。”

毛嗽了一声，对我说：“这你可是立了一大功啊。”

我听了毛的这句话，胸口似乎缩了进去，立刻嘴里干得要裂开，气都透不出来了。

江青马上对我说：“你出去，不要再在我们这里搅鬼了。”

这时我倒坦然无所谓了，下一步无非是将我逮捕，定个谋害毛的罪名，然后处决罢了。我终于得以离开一组了，这就是结局。我慢慢向门口走去。我看周满脸苍白，两手微抖，全身僵住了。

我刚走到门口，毛嗯了一声，大声说：“不要走嘛，有话当面说嘛，有什么话要背着人讲哪。”他这话是以对着江青说的。

当时我真可以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虽然不能说是心花怒放，但是心境开阔。

只要我在场，在毛的面前，我可以申辩清楚。我看周的表情放松了。

我又坐下，说了了句：“目前心脏力量不足，血液回流不好，身上有浮肿，内脏包括胃和肠都会缺少氧气和水肿，食欲自然不好。也因为血液循环不好，打针的地方，吸收药慢一些，是会有些痒痛的感觉。”

毛好像并没有听我讲话，只是摇着头，右手拍着沙发的靠手说：“江青，你送的药给我吃。我吃了以后要吐，你的药也不好嘛。”吃荷梗煮水是康生建议的。

毛说完以后，我可真是心花怒放，全身通泰，喜从中来。我侧眼看江青，她全脸发青，一副煞气，掏出一方手帕，擦着额头，呼吸急促起来。

毛将头完全靠在沙发上，说：“我看你们两个人给我吃的药，都没有起好作用。”

然后对着我说：“所有的药都停了。谁要是再说药的事，就给我滚。”

我放开了心，立刻又缩在一起。毛生病了，不吃药，会有生命危险。他一定得赶快好起来。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刻插话说：“主席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我看江青双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来则两腿缩回，两手撑在膝盖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倾，好像凝固起来。

毛的这些话，明明是将国家的党、政、军大权交给了周恩来，而且是当着江青的面讲出来的。我那时还余悸未定，全身大汗，没有体会到毛那时话中的意思。今日走笔，我想这是毛第一次面对自己的死亡。

毛又说：“就这样定了。你们去吧。”

我随着周、江走出毛的卧室，穿过毛的书房兼会客室厅，走到护士值班室外面的小休息室。汪东兴、张耀词一帮人都在。



江青将帽子往地下狠力一扔说：“这是个特务集团。我要查清楚。”然后对周恩来说：“到怀仁堂，马下召集政治局会议。”说完，气势汹汹地走了。

周对汪东兴说：“东兴同志，马上通知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立刻在怀仁堂开会。”

为时是晚上九点多钟。

到了十一点钟，政治局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汪东兴要我与吴洁、胡旭东立即到怀仁堂东休息室外厅。我们到了以后，吴阶平和卞志强大夫随后也来了。我们坐在那里，相对无言。

过了一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从里面走出来。姚说：“我是受政治局和江青同志的委托，找你们谈谈。吴阶平、卞志强大夫，你们二位没有参加毛主席的治疗工作，也可以听一听，判断一下嘛。”

“毛主席身体一贯健壮。他每次参加集会和接见外宾，我们在发表新闻消息时，都一再说明，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这不是空话。你们看。”姚从皮包内拿出一张毛会见北越总理范文同时握手的照片说：“你们看主席这手握得多么有力。有点感冒受凉，并不是大手病。你们有什么根据，说主席的肺脏和心脏有什么心力衰竭。这明明是谎报军情，动摇人心。只是这点要负政治责任的。”

姚问我们有什么话要说。我没有作声，因为姚的这些话，已经在政治上给我们下了结论，是无理可讲的了。姚转而又问吴阶平和卞志强大夫，有什么判断。他们两人也是闷不说话，不表示任何态度。

姚说：“你们都没有意见，你们回去吧。等政治局会议后，有什么结论，会通知你们。”

我和吴、胡回到游泳池，这时已经是一月二十二日凌晨二时。我们毫无睡意。

吴洁吓得全身颤抖，坐立不安。吴已经六十四岁，比我大十二岁。吴洁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政权以前，是北平医院院长，又是国民党员。为了这两件事，文化大革命

初期，他被批斗，挨打，关进类似监狱的所谓“牛棚”。到一九六九年汪东兴住北京医院时，才将他解放出来。他对我说：“难道又要被抓起来斗吗？”

我劝他不要急，因为急也没有用，何况整个过程，包括体检和治疗，都得到了毛的同意。毛虽病重，但没有死，根本没有谋害的证据。话虽如此，我自己也很焦躁，因为毛已停止治疗，而且我不知道政治局会议，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凌晨四时许，怀仁堂打来电话，又叫我们去。这次我们带上毛停止治疗前一天乘机做的心电图。图形上已看出有间或的心室性早搏和心肌缺血的现象。

这次见我们的是叶剑英和李先念。

叶说：“政治局让我们再同你们谈谈主席的情况。你们不要有顾虑，给我们讲清楚。”叶对我十分尊重有礼，总是称呼我这“李院长”。

我将林彪事件以来，毛的身体变化和目前的状态，向他们讲了。我拿出最后的这次心电图，交给他们。

叶曾经多次住院检查心脏。他学会了看心电图。他将毛的心电图看过以后说：“心脏明明有病了，怎么能说是没有病，怎么能说是医生谎报军情？”

叶又详细问到头天夜晚，我与周恩来及江青向毛报告病情及治疗的情况，然后说：“你们没有错，主席停止治疗的责任不在你们。你们放心回游泳池去，好好准备下一步的治疗。特别注意准备好急救的药品和用具。从今天起我每天到游泳池去值班，你们有事找我好了。”

然后叶问李先念有什么话。李是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而且面无表情。叶于是让我们回去。这时已经是早晨七点钟了。

经过一夜的折腾，心绪极坏。叶的话使我如饮甘露，焦躁情绪一扫而光。吴洁也露出了笑容。我们一边往回走，一边讨论下一步的治疗对策。回到游泳池后，我们随便吃了点东西，就睡觉了。

到下午三点多钟，我醒来时，叶剑英已经到了。我走到大厅，吴洁和胡旭东早已来了。

叶说：“我来值班还要同你们谈谈。”然后对我说：“李院长，你在主席这里已经十八年了，我们都了解你，你放心，大胆去工作。哪一个没有受到挫折的时候？”

又对着吴洁说：“吴主任，你做了几十年的医生，抢救了多少病人。比主席年纪大的，你也抢救过来了。难道就治不了主席的病？”

吴洁立刻说：“只要主席肯治，一定治得好。”

叶笑了笑说：“那么好。主席现在不治，是生了气，气过了还是要治的。”又对胡旭东说：“我不认识你，三个里面你最年轻，要多做点事。”胡旭东那时才四十岁。

叶坐到五点多钟才走。吴、胡三人暂时搬到门诊部。我仍住在游泳池的一间换衣室里。

晚饭后，汪东兴问我今天怎么样。我告诉他，今天没有见毛，要等他消了气，才能说上话。汪同意我的意见说：“不能急，急了只坏事。”

汪跟我说了昨夜政治局会议的情形。

汪说：“昨天夜里从游泳池到了怀仁堂，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都赶到了。江青一入场就大声吼叫，说主席身边有一个特务集团，要政治局审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随声附和，乱成一团。我要讲话，叶帅坐在我旁边，用手按住我的腿，摆动着。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不要这时辩论。周（恩来）说，有话慢慢讲，不要急。江青立刻对着

周说，主席身体很好，你为什么要逼他交权。这时全场又乱起来。江青又说，让姚文元代表政治局，找医生们谈。还提出，叫吴阶平和卞志强两个医生参加，从医学角度判断。”

“这时叶帅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周将毛主席和你三个人谈话，简单说了一下。叶帅说，这有什么要紧，主席身体不舒服，讲几句话，有什么关系。江青这才慢慢安静下来。叶帅提出，他要同李先念同志再和医生们谈谈，而且要每天到游泳池去值班。江青同我讲，主席那里，没有主席同意，谁也不能去。今天我起床立刻给叶帅打了电话，劝他算了，不要去游泳池值班了，免得又惹麻烦。”

汪接着说：“我找你是告诉你，只要有机会，就要主席建议治疗，不能再耽误了。”

我回到游泳池。毛已经醒了。毛现在已不能躺下，只能坐在沙发上睡。呼吸声就像抽风箱一样。醒是醒了，可是坐在那里，有时候又睡着了。

我进去看毛。我走进毛的卧室，他坐在沙发上，头斜靠在沙发上，呼吸急促，痰鸣很响，口唇周围发青，闭着眼睛。毛到此时仍不肯治疗，我只好退出房间。

我走回大厅，安静得很。这时徐业夫秘书走进来。他将送毛审阅的文件交给了吴旭君后，走到我的房间。

徐说：“老李啊，你看滑稽不滑稽。今天江青关照我和张玉凤说，主席这里有个特务集团，要我们提高警惕心。还让我住到里面的小休息室，看守好主席。我说，我不懂医，守在这里也没有用。我同汪（东兴）主任讲了。他说不要听江青的，不能睡在小休息室里。我看他们之间有矛盾。弄得我们不好办事。”徐又叮嘱我，不要同别人说，免得惹事。

从那天起，我真是日坐愁城，寝食不安。毛的水肿越来越重，颈部、前额都有了明显的浮肿。张玉凤每天出去，即使在游泳池，也避不见面。后来我才知道，她正在通过北京市市委书记兼市长吴德，将她父母和妹妹张玉梅的户口由牡丹江迁到北京来。

这样熬过了十天。到二月一日下午，毛要找我到他那里去。

毛稍微睁开了眼睛，说：“你看我的病还有救吗？可以治得好吗？”

我说：“只要你肯治，当然有救，可以治得好。”我感到毛大大松了口气。

毛让我摸他的脉搏。脉很细，而且不规律。

毛说：“怎么治法呢？”

我说：“以前向你报告过了，要采用消炎、强心、利尿的方法。要打针和吃药。”

毛说：“还要打针？”

我说：“不打针，肺部的炎症控制不住，去不掉病根。”

毛说：“那好，开始治吧。”

我心里的阴郁一下子一扫而光，欢喜若狂，精神也为之一振。在毛拒绝医疗的这些日子里，我关心的不只是毛的健康。几星期来一个中国人民仍不知道的天大秘密压在我胸口上。中国历史将会有重大变化。美国尼克森总统将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访问中国。我还有三个礼拜的时间使毛恢复健康。我们立刻展开疗行动。

这里我要回溯到一九七一年。该年三月下旬，世界乒乓球比赛在日本名屋举行，日本乒乓球协会邀请中国派队参加。三月十四日，国家体育运动委员开会讨论。这时中日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会上大多数人认为日本右翼分子和

国民党会捣乱，危及运动员，表示不同意参加。周恩来想派中国队去。周向毛写了一个报告，取得同意。

毛并说：“告诉运动员，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自文革以来，中国第一次派运动员出国参加比赛。

接近比赛结束时，一些美国的运动员向中国队队员表示，他们很想访问中国，希望得到邀请。中国队向国内请示。周恩来批示，告诉美国队，将来有机会访问中国。这是一种有礼貌的拒绝方式。四月六日中午，毛看了周的报告，同意周的意见，并将该报告退回周。但是到了午夜，毛服用安眠药后，开始吃饭。当时毛已经昏昏欲睡，语言不清，他断断续续地讲，让吴旭君打电话给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海蓉，立即邀请美国队访问中国。吴恐怕听得不明白，向毛重复了一遍，毛点点头后，深入睡乡。

这是第一次是中国向美国发出明确而公开的友好表示。周恩来后来说：“一个小球转动了大球。”意思是邀请美国乒乓球队一事牵动了今后世界未来的局势发展。

此事件以后也被称为“乒乓球外交”。

我立刻叫吴洁和胡旭东从门诊部赶来游泳池。自从几星期以前，江青暗指我是个特务后，我明白我不能再单独替毛治疗。这样毛就算出了事，也是我们三人一起分担，江青没法子只对付我。我们让尚德延医生在门诊部准备好急救用具。我给毛在左前臂皮肤作抗生素过敏试验。没有过敏反应。于是由吴旭君在毛的左臂部肌肉内注射了第一针。

过了二十几分钟，毛咳嗽起来，但是咳嗽无力，不能将痰咳出。痰堵在喉咙中，呼吸短促，毛晕厥过去。

大家立刻将毛的上身扶起，胡旭东用拳连续猛叩左前胸，叫喊“主席、主席”。

胡的叩击声过猛过重，毛年纪老了，很容易造成肋骨骨折。我担心他的慌张失措会引起其他在场的非医务人员的混乱。我马上打电话到门诊部，叫急救人员带着氧气瓶、呼吸器和吸痰器来游泳池，同时给毛做静脉输液，加上呼吸和心脏急救药物，并且注入激素，缓解气管痉挛，提高身体的应激能力。

十分钟后，还不见尚德延等急救人员来到。我赶到游泳池外，向门市部跑去。

外面正下着大雪。到了门诊部前面，这些人正在等车。我急了，叫他们随我回去。

赶至游泳池书房内，毛还没有清醒，喉中的痰仍卡在那里。尚德延用吸痰器插入喉部，开动马达，将痰吸出，然后给毛戴上面罩，接上呼吸器。

痰出来以后，毛睁开了眼睛，立即用手扯掉面罩，说：“你们在干什么。”我问他怎么样，毛说：“我像是睡了一



觉。”他发现左肘的输液针，又要去扯。我说：“这可不要去掉，去掉以后，就不能注射药到血管里去了。”毛没有再扯，只是说：“怎么这样多的人在这里，用不着嘛。”于是室内只留下我和急救的医生和护士，其他的人退出去了。

毛晕厥后，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周一听到这消息，当场大小便失禁，都拉在裤子里。等周换好衣服赶到游泳池，毛已清醒过来。

周恩来到了以后，先去看了毛。看到毛已经安然无事，就走了出来。张玉凤拦住周，说有事同周谈。

周同张谈话后，走到大厅，面容严肃。他叫我和吴、胡走到大厅南端谈话。

周首先详细问了发生晕厥的情况和抢救过程，然后说：“张玉凤刚才同我谈了，她认为是打抗生素针的过敏反应。你们再研究一下吧。”

这时尚德延医生走过来，周让尚坐下，又讲了一遍。尚立即说：“这可不是过敏反应。我将痰吸出来以后，主席即时喘过气来，才清醒的。”

周说：“这样吧，你们写一个报告给我，将发生这次危急病情的经过，你们如何抢救，你们的诊断，都写清楚。这样，我可以向政治局报告。”歇了一会，又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政治局还不知道。如果没有抢救过来，可就成了大问题了。像尚（德延）主任他们负责急救，这什么不早点到游泳池来，直到发生了危急情况，才赶来。这多耽误事情。幸好抢救过来了。这是谁的主意？”

我说：“原来张耀词同志告诉我，张玉凤说，主席只同意吴洁和胡旭东进游泳池，别的人不许进。氧气瓶和吸痰器机器，张耀词同志都不同意拿进来。这游泳池里面没有医疗设备，我们进行治疗非常不方便。可是怎么讲也讲

不通，这些事也不可能由我一一向主席说明，经他同意再办。他病重了，不可能想到这些事情。”

周沉思了一下说：“要把游泳池这里面再改进一下，适合医疗工作。我同汪东兴同志讲一讲，你们安装必要的医疗设备。”

给毛继续注射抗生素针以外，又服用了强心剂和利尿剂。张玉凤跑来问什么时候可以排出小便，可以排出多少。我们按照平时的临床经验告诉她，一般四个小时可以排出大约二千毫升（西西）小便。

张玉凤冷笑说：“你们有把握吗？”

我说：“治病不是算命。我们根据病的程度和所用药量能起到的作用来分析。最重要的是，按规定的药量和时间服药。”

张说：“吃药我不管，这是护士长（指吴旭君）的事。”说完，她到书房里面去了。

吴洁问我：“这个张玉凤是什么人哪？说话这么没有礼貌。”

我说：“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了。”四小时后，毛开始排小便，第一次排出一千八百多毫升（西西）。大家都有了笑容。

毛很高兴，叫我们去他的卧房，详细问了他得的到底是什么病。我们将病情向他解释清楚以后，他说：“看来这个病可以治好。美国的尼克森总统要来，你们知道吗？”

我说：“周总理讲过。”

毛说：“就在这个月二十一日来。我能够在这个以前好吗？”

我说：“只要坚持治下去，会见尼克森没有问题。”

毛说：“那好，你们给我治下去。”然后请我们一起在游泳池吃晚饭——清蒸武昌鱼和涮羊肉。我们用餐时，毛问吴洁是不是党员，吴说不是。毛问为什么。

吴洁说，以前加入过国民党。

毛笑了说：“我以前也加入了国民党。这有什么关系？”然后对我说：“你向北京北京医院打个招呼，叫吴洁入党，我是介绍人。”

吴洁就这样入了共产党。

晚上周恩来到游泳池，看到治疗见效，十分高兴，主动同我们照了一张合影，又说：“我谢谢你们。我和小超大姐（即邓颖超）请你们吃春节饺子，外加一个大蛋糕。”临走前，周又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尼克森到北京，你们一定要让主席恢复到能够会见。”

尼克森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抵达北京。从二月一日毛决定接受治疗开始，医疗组轮流昼夜二十四小时待命，尽全力使毛恢复健康。毛的身体大有改善。

肺部感染控制了，心律不规则的现象也减少了。水肿还只消退一部分，只好订做了一套宽大的新衣服和鞋子。但毛仍喉咙肿胀，说话困难，体力很差。毛在尼克森来访的一星期前，开始做身体锻炼。他开始练习起立，蹒跚走路，后来已经可以让服务员挽扶着起立和走一点路了。

尼克森抵北京的那天，我从未见过毛这么高兴过。毛一早起来，眼睛一睁开，就开始不断询问尼克森抵达的时间。周福明给理了发，刮了胡子。头发上还擦了些香味的头油。（毛上次理发到这时，已有五个月）毛坐在游泳池内的书房兼会客室的沙发上等着。报告尼克森行踪的电话不断打进来。等到尼克森的飞机抵达飞机场，毛立刻让护士长吴旭君传话出去，告诉周恩来，立刻会见。周非常为难，在电话中说，要向毛说明，尊重国外的礼宾习惯，客人是先要到住地，稍做休息，换衣服，再行会见。毛对此并未反对，只是不断地催促，并询问客人的情况。

周恩来为尼克森举行了午宴。宴会结束，尼克森回到钓鱼台国宾馆，毛决定即刻会见。

医疗组为这次会面做了万全的准备。毛原来书房兼会客室内的氧气瓶、呼吸器（季辛吉一九七一年七月秘密访问中国后，由他带来的）等医疗用具全部搬走。我们把毛病重时用的大床拆掉，并将医疗用具搬到会客室与卧室之间的内走廊上，又准备了一些小型轻便的急救设备，将氧气瓶藏在一个大雕漆箱里，其他设备则置于室内的大盆景后面。不仔细看是很难看出蹊跷。这样万一有突然状况，

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将急救器具组合起来。周恩来只跟尼克森说毛有支气管炎。但我想美国总统并不完全了解毛当时的病情。毛也只告诉他，他不能很好地说话。

尼克森与周恩来乘坐的红旗车抵达时，我已等在毛书房外的游泳池大厅。翻译是唐闻生。尼克森是第一个进门的美方人员，随后是季辛吉，再来是后来成为美国驻中国大使的温斯顿·罗德（Winston Lord）。我看见罗德时很吃惊——他看起来只像二十出头的大学生。国务卿罗杰斯（Rogers）没有随行。尼克森当时用季辛吉做他外交政策的第一发言人，因此周恩来安排罗杰斯会见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

尼克森总统进门时，我点头打招呼，并随他到毛的书房。然后我立刻到放急救设备的内走廊上。会谈中曾有短暂骚动。随同尼克森的一位保安人员，被外交部礼宾司的人引进游泳池改造成的大厅。这个大厅的屋顶是铝制的，四周门窗全部密闭。

这位保安人员是后进来的，他很急，用报话机同钓鱼台的美国代表团联系不上。警卫人员不懂英语，叫来礼宾司的人才知道，由于尼克森走得太快，这位保安人员没有看见总统到哪里去了。

书房和内走廊只以帷幔相隔，因此我听到了所有的谈话内容。会见尼克森的情况，在尼克森的回忆录里，有详细的描述（这次会晤原本只预定了十五分钟，后来谈了六十五分钟），在此不再赘言。但有一事，我至今仍然印象深刻。毛向尼克森解释，虽然中美关系大有改善，但双方的媒体仍该不断地互相攻讦，放放空炮。因为两国人民敌意已深，不能马上接受结交友好的事实。台湾问题仍悬而未决。

送走尼克森以后，毛十分高兴。换上睡袍，坐在沙发上。毛主动伸手让我测量他的脉搏。脉搏洪大有力，搏动规律。毛问怎样。我说，脉跳得很好。

毛问我：“你听到我同尼克森的谈话了吗？”

我说，我一直坐在书房门旁，听到了。尼克森来中国使我十分兴奋。我想一个新时代来临了。我从小到大受西方教育，对美国深具好感。中美关系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一直十分良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交恶。尼克森与毛会面表示双方愿意结束敌意，开始友好关系。

毛说：“我很喜欢尼克森这个人。说话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不像那些左派，口是心非。尼克森说，美国和中国改善关系，是为了美国利益。这话说得多好啊。这比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心怀鬼胎的人好得多。中国何尝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才和美国改善关系嘛。”说完后，他笑起来。

北极熊的威胁使中美双方为共同利益寻求结合。

电视和报纸发表毛和尼克森握手言欢的合影。不明真相的记者说毛“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许多人认为毛胖了，更觉得那表示毛身体情况良好。知道毛生病、说话困难的美国媒体，则猜测毛是患了中风。但双方媒体都错了。毛患的是心力衰竭所引起的水肿，此时还没有完全消退。

毛打了一次外交胜仗后，健康大为好转。在不间断的治疗下，到三月中旬，水肿完全消退。肺部感染痊愈，不再咳嗽。重病期间戒了烟，咳嗽和支气管炎未再复发。毛的精神高昂。这期间我常和他见面。我仍住在游泳池的更衣室里。

毛谈的最多的是中共和美国的关系。他认为在三十年代初期，国共和美国没有来往，而美国也不像英国、日本、俄国那样在历史上就插手中国内部事务。到三十年代后

期，中共和美国官方还没有来往，可是有了一批像爱德加·斯诺和马海德这样的人通过民间渠道，来到陕北。马海德后来还加入共产党，入了中国籍，娶了中国妻子。

到了二次世界大战期，美国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到陕北，直到大战结束，中共和这个团相处得很融洽。由于这种关系，才能实现一九四五年八月毛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签订了和平建国的会谈纪要（就是双十协定）。

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是与中共保持友好的总统，当然也包括那个时期的美国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美国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些人。罗斯福总统去世以后，杜鲁门总统就任，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大变，给国民党经济和军事援助，要消灭中共。这才使中国内战大规模爆发而不可收拾。如果罗斯福总统没有去世，国共历史和中国历史可能会不是后来发生的那个样子。中共和美国的关系，可能也要重写。

毛还多次谈到日本。他说，我们（中共）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民党）共（产党）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

好多日本人见到我们，都要赔礼、请罪。毛说：“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这就是坏事变好事。

毛又说道，每个国家所遵循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一回事，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是另外一回事。不能因为国家的制度不同，就互不来往。南朝鲜人喜欢吃辣椒，中国的辣椒多得很，每年出口给他们三十万吨，这不是很好嘛。

他认为全球是三个世界之间不断的斗争。美国 and 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整个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美国和苏联的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的国家，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

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最多。中国穷，只能侧身于第三世界。

在这种形势下，战争是要发生的，中国要准备打仗，准备美、苏在世界上闹事。

不能相信有持久的和平，或者所谓一代人的和平。

毛强调，中美关系突破以后，在全世界会发生很大影响，会发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一九七二年毛的另一次外交胜利，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九月抵达北京访问。

中共与日本的非官方关系已进行多年，双边贸易持续增长。

毛说，日本生气了，因为美国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事先没有告诉日本。日本通过廖承志和高奇达之助办事处商谈，已经同意，田中首相九月来访问，实现邦交正常化。

日本内阁首相田中角荣和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在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访问中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毛接待田中首相的礼遇，一如接待尼克森。毛并认为，他与田中的交谈，较之尼克森更为融洽。当田中为日本大战期间的侵华罪行道歉时，毛说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也说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毛跟田中说，他的健康状况不佳，活不久了。这仍是毛的政治游戏。毛仍相信自己会长命百岁，这么说是想探探国外对他的死亡会有反应。

毛说，田中与他相同，都没有上过大学，都是经过艰苦的实践，锻炼出来的，也只有像田中首相这样的人，才有魄力不顾日本自由民主党内的反对中共的传统政策，做出建立中日外交关系的决定。



尼克森总统和田中首相也有一点颇为类似。两人都是在任期之内被迫去职。但毛仍欢迎他们去访问中国，并将他们视为“老朋友”。中美关系没有如毛所原，进展到正式外交阶段。美国对台政策仍未改变。直到一九七九年，美国吉米·卡特总统在内，中共和美国才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那时毛已去世三年。

毛的水肿全消以后，人瘦了很多，好像去掉了一大圈。原来体重是八十二公斤左右，这时只有七十公斤。圆圆的脸变成尖下颌。肚子上的皮垂下来，不再像以前那样丰满。两手手背、掌骨间下陷，显然手上的肌肉萎缩，右手特别明显。

毛很注意锻炼身体，但是身体衰弱，只能由人扶着，由卧室走到书房，或到外面的大厅走几步。两腿、两手没有力气，有时候会自发地颤动。我发现毛口水好像多了，常流出来。

毛感觉，眼睛看东西模糊。看文件和书用的放大镜，倍数越来越大，可是仍然模糊。

我特别担心肌肉萎缩，不自主颤抖，并怕有别的毛病。我向毛建议，最好请神经内科和眼科医生检查一次。讲过几次，毛都不同意，最后只答应让眼科医生给检查一下。

我请了北京同仁医院院长张晓楼医生来检查。毛坚持要在书房中检查，但房间狭小容纳不下各种必要的光学仪器。张院长只好用一个眼底镜和一套验光眼镜进行检查。

张见到毛以后，因为心中无数，所以很紧张。毛先说一些笑话，然后问张的名字，然后说：“你的这个楼小了一点吧。”毛并说，如果张医生把他治好，要给同仁医院盖一栋大楼。

张的眼睛验光检查繁琐时，忙得一身大汗。他发现毛的右眼角膜有轻度角膜云翳。张初步诊断，毛可能有白内障。他提出要再用些仪器检查，以明确诊断。毛不耐烦，说：“查个半天，还不就是这个样子。不查了。”

但张无法得到肯定的诊断，也就无法对症下药。他还需要检查毛的眼底视网膜和视神经。张觉得不弄清楚，说不过去。

我将这些情况，向周恩来说了。周也没有办法。上次病变时，他和江青去讲了，江青反咬他逼毛交权。他觉得还是不插手为妙，不如由我慢慢同毛谈通。眼科检查于是拖下来。

毛大部分时间都和张玉凤在一起。毛自一月病重后便常和张在一起吃饭。江青和别的领导要见毛都得先透过她。江只好通过张玉凤打听毛的情况，传递消息，取得毛的支持。这此，江送给张玉凤很多东西，像手表、西装、衣料之类。甚至张生孩子所用的尿布，江也送去。据同在毛身边做服务工作的孟锦云说，江青让张玉凤在毛面前多说好话，使毛多见见江。但是张不明白毛的心理状态。

张和我一向就相处不好，她对毛的控制力越来越大，我们关系便日益紧张。她要毛每顿饭喝一小杯茅台酒。我反对，怕烈酒容易引起咳呛。但毛说 he 已戒烟，以前已不太喝酒，一点点茅台不会怎样的。喝一点对睡觉可能有帮助。张很喜欢喝酒，在她的鼓动下，毛完全听不进我的话。

一九七二年底，张玉凤怀孕了。张耀词跑来找我商量。汪东兴和他都提出，要好好照护张玉凤，能平安生育下来。

我向张耀词说，毛早已没有生育能力了，何况这时已近八十岁，又在重病以后，体力虚弱，这不可能是毛的孩子。

我说：“在我这方面没有什么照顾好不好问题。张玉凤的行政隶属在铁道部，铁道部有自己的公费医疗医院，她可以去做产前检查，可以在那里生产。”

张耀词说：“正是这件事要你办。张玉凤讲，主席说了，要给她送到一个好些的医院去。所有的费用，由主席的稿费出。”

我看汪东兴、张耀词两个人都是这种态度，再争下去，也没有用处。于是我将张玉凤介绍到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院看到是我介绍的，认为张玉凤来头不小，可能是那位首长的夫人，或是文化革命中窜红上来的“新贵”，自然要待如上宾。

到八月张玉凤生产的时候，给她住进高级干部病房。

张分娩以后，的确有许多政要头贵来探望，其中有张的丈夫刘爱民。江青和张耀词都去了，送了吃的和尿布等东西。江青一再向张玉凤提出，及早回去上班。张产假期间，由她妹妹张玉梅代替工作。张玉梅比较单纯，没法子替江青向毛传递消息。

中国共产党历经长征的建党元勋都在一一老化。毛已经快八十岁了，他的许多战友也老了。

康生是第一个重病的政治局常委。许多党员都不齿康生的邪恶残酷、手段毒辣，并认为他该为文革许多无辜的死者负责。一九六七年康的小姨子苏枚自杀时，有五十多人被审查批斗。北京医院一名负责抢救苏的医生被捕入狱，关押了十三年，至一九八〇年大规模平反冤案时，才被释放。康生的死讯只会让全国额手称庆。

一九六二年五月中旬，周恩来告诉我，康生照了爱克斯光片，怀疑有肺癌。周要我一同去向毛报告康生的病情。我向周建议，不如等确定诊断，再向毛报告较好。

周也同意。接着康生作了膀胱镜检查，确诊为膀胱癌。医生的意见是手术切除。

有一条不成文规定，政治局常委或是毛的一组人员，都得经过毛的同意才能开刀。周恩来负责布置康生的医疗工作，但得由毛批准手术。

毛说：“得了癌是治不好的，越治，死得越快。不要告诉他本人。本人知道了，精神紧张，死得也快。不告诉，不要开刀，还会活得长久一些，还可以多做些工作。”

但康生已经知道他患有癌症，医生也劝他马上动手术。在康生一再催促下，只做了膀胱镜局部烧灼治疗。

周因此也做了身体检查。周照了一次爱克斯光肺片，并劝毛也照一张。毛不肯，我们只替毛做了尿细胞检查。经过反复多次的尿细胞检查，毛的尿液是没有不正常的细胞。但是周的尿液中确定的癌细胞存在。

周的病情是由汪东兴和张春桥向毛报告。开始时毛并不完全相信。他认为好多病情是医生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找来的麻烦。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他曾问我，为什么查尿可以看出癌来呢，而且那么肯定是膀胱癌。他又认为，周外表上看来丝毫没有病容，怎么可能得了癌症。

后来经过多次解释，毛似乎同意了这项诊断，但是对于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仍然抱着不赞成的态度。他说，既然是癌，那就无法可治了，何必再检查，再治疗，给病人增加精神上 and 肉体上的痛苦。不如听之任之，倒可以活得愉快一些。他说：“我得了癌，绝不治疗。”

他坚持不再做检查。他说：“以后不要多查了。查这里，查那里，无非查出一些新的病。谁人晓得查得准不准。你们医生，就是喜欢大动干戈，不闹得鸡犬不安不止。我是不要你们检查。一般看看就可以了。”

此后毛一直拒绝检查身体，心电图、爱克斯光胸片这些最简单的检查都没有做成。

我对周虽然有些意见，但我和大家一样，都很担心周的病情。周精力充沛，长时间伏案办公，主管中央的日常事务，睡眠极少。党中此时优秀的老干部都没有复职。中央只有周真正在做事。周的责任繁重，按照毛的指示总管全国的工作。

汪东兴对我说，在毛的心目中，只有毛一个人不能死，谁死了也无关大局，毛自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杞人忧天吧。

从一九七三年起，毛除去体力衰弱，呼吸急促，视力模糊以外，说话声音逐渐低哑，口齿逐渐不清。毛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稍微活动一下，就喘个不停，口唇发青。我们在卧室、书房都放了大氧气瓶，接上塑料胶管和口罩，间断给他吸氧。他的视力一天天更加模糊，看书少了。江青提出来，将毛的书房改成小电影室，毛便看了一大堆由香港、日本、美国进口的庸俗不堪的片子。毛最爱看的是功夫片。

但毛的头脑很清楚，思路也很敏捷。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毛对邓小平是有意见，认为邓应该“整一整”，但是他从来没有将邓小平与刘少奇等同起来。一九六八年中共八届十二全会上，刘少奇被开除党籍。林彪、江青曾竭力主张将邓小平开除出共产党。毛不同意林、江的意见，而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毛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可是，毛又说邓右得很。由此可以看出，毛对于邓小平，是又打又拉，有褒有贬，使邓能为他所利用。

我是在一九七二年一月陈毅元帅追悼会上，预感到邓有可能复出。那时毛不再与我多谈话，我都是透过汪东兴知道重要政治动态。在陈毅的追悼会上，我听到毛对陈毅的夫人张茜说，邓小平与刘少奇不同，邓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由此给邓的复出打下基础。

周恩来的癌症是促使邓小平复出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则是，林彪死后，政治局势日渐复杂。当时正是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为一方，周恩来、叶剑英为另一方，正在明争暗斗得不可开交。他们双方在林彪事件的看法上意见相左，泾渭分明。

周恩来批林彪是极左，在工作上就要校正文化革命中的极左作法。江青、张春桥等一再宣称林是极右，周则是“右倾回潮”。毛在此事上支持江青。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自一九七二年初当着江青和周恩来的面交代交权后，似乎就对周疏远了。他警觉到周似乎是个修正主义的右派。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毛批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变修正。”毛还说再这样

下去，中国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同年十二月，毛又再度批评了周恩来。（译注：“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批林彪的“左”，整顿经济，情况确有改善。）从此江青等人不断整周恩来，藉批林彪之机，发动了“批林批孔（夫子）”，又进而“批林、批孔、批周（周，明指为周公，实指周恩来）”。江青并说周恩来是“现代大儒”。

周恩来处境危艰。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事务以后，除去毛接见外宾，周作为陪见，待外宾走了以后，才得乘机向汇报请示工作，平常见不到毛。在江青等的围攻之下，他想得到毛的指示和支持，但中间又有张玉凤把关。他因此想通过外交部的王海蓉、唐闻生向毛反映情况，以求得毛的意见。然而王、唐二人与毛的接触自比张玉凤少得多。所以双方较量起来，王、唐要逊一筹了。

一九七三年十日，根据毛的提议，政治局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邓逐渐回到权力核心（1）。毛更进一步让许多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的老干部复职。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十大）期间，我一心一意只担忧毛的健康，没有注意到此会的政治意义。

在开会期间，我们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毛的缺氧症状十分明显。在他乘坐的车内，装备了特制的氧气瓶。为了使毛在人民大会堂的休息室、一一八厅，和大礼堂的主席台上，能保持不断输送氧气。我们在一一八厅下面的地下室内，安装了中心供氧设备。用管道接至一一八厅和主席台。在主席台的幕后，我们还设立了急救站。

在开幕式的那天，散会时，代表们全体站立鼓掌，毛几次试着立起来，都不成功。毛不起立出场，代表们不会循序退出。周恩来很急，问我们怎么办。我们建议，周向代表们说主席要目送代表们退场后，他再回去。等代表们



全部退出后，我们才搀扶毛回到一一八厅。代表们自然不知道毛已患重病。

直到会后，我才了悟领导核心已发生了重大转移。会后，大家议论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其中固然不少是文化大革命是造反起家的人物，但是“老革命”亦复不少。中共中央副主席，只有王洪文和康生两位是原文革小组成员。另三位副主席是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德生将军。所以就整体而论，开完十大后，江青四人帮并没有占据多大优势。毛没给他妻子太大的权势。

毛仍继续他的政治从事调动。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起，中间经过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到二十一日，毛连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2）。这些军区司令员在地方上做了很久、文革期间在林彪领导下，军方权力高涨。毛的讲话对整顿军队有很大影响。

毛的讲话，全文过长，节选如下：毛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搞久了，就油了……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司令员互相调动。”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

“现在请了一位军帅，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吧。你不要这个名义，就当个总参谋长吧。”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有一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你（指李德生），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

“我还可以打仗，要打就打。天下大乱，包括中国。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

“人家的导弹打几千公里，一个氢弹就把北京消灭了。我估计他们不会打北京，美国打日本，选了两个小城市，一个广岛，一个长崎。东京、大板这样的大城市他不打。”

“仗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作皇帝的。”

“我同季辛吉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们美国。一整太平洋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苏联现在又跟我们拉关系。最近有个什么文化部的招待会上，他们跟我们驻苏武官处的人谈话。我们的条件主要是两条：一要撤兵，撤到赫鲁晓夫死时那样。二要承认错误，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

“我们这个党不要杀人，包括反革命。保存活证据，不要杀。犯点错误，改了就好。”

“对内团结大多数，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守纪律，要少数服从多数。对外是要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要坚持原则，但又要有灵活性。”

“布加勒斯特会议是指一九六〇年六月，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赫鲁晓夫带头攻击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上台后，毛因身体日渐衰弱便没有参加任何会议。王海蓉和唐闻生做毛的联络员，向毛报告政治局势，并在毛和周恩来之间来往传送文件。毛退到幕后，但权力并未稍减。

邓小平协助周主持政务以后，江青四人帮加紧他们对周恩来的围剿。一九七四年刚刚开始，就进入了一场“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号召全国学习这一文件。在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在北京分别召开部队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大会。

我藉口毛身体不好，不能离开，没有去参加。

据汪东兴告诉我，会上主要是姚文元讲话，当中江青插话。最后由迟群、谢静宜讲话。讲话的火药气极浓，矛头直对着周恩来和大批老（右派）干部。汪说，最不可理解的是，周还带头喊“向江青同志学习”，还检讨说，这次会开晚，“抓晚了”。汪说周是个胆小鬼。

江青的“批林批孔”运动未形成气候。自从一九四九年解放以来，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一个比一个更风声鹤唳。文革后批斗诬陷，冤狱遍布，连毛最亲密战友林彪也企图武装起义，叛变夺权。中国人民实在是搞疲了，也很厌烦了。

人民了解到，这些政治运动只是赤裸裸的高级权力斗争，和他们一点切身关系也没有。“批林批孔”运动只不过是江青等煽动一些人，谋求打倒周恩来，夺取党权、政权、军权。大家都是应付了事。这次运动是个大失败。

毛对江也有批评。这些批评当时已流传到社会上。我只举一例：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毛见到江给他的信以后，复信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

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我当时全心全意投注在毛的疾病上，无暇顾及这些政治斗争。毛的健康正在迅速恶化。

## 注释：

邓小平一九七三年二月返回北京，四月第一次公开露面。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央委员会正式恢复邓的职位，十二月任命他为政治局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届二中全会正式通过邓的任命，并通过邓为政治局党委和党副主席。

有些消息来源指出，军区司令员互调是邓的主意。传说，毛召见王洪文和邓小平。毛问他们：“我死了会怎么样？”王回答：“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邓回答：“天下大乱，军阀混战。”

一九七四年七月，我们得知毛活在世上的时日不多了。

进入一九七四年以后，毛两眼的视力已下降到只能分辨光亮与黑暗，手指放在眼前都看不见了。说话不清楚，舌头似乎运转不灵，即使相当熟的人，也听不清他在讲什么。嘴经常半张着，口唇很少闭拢。两手两腿，特别是右侧，更加无力，手掌的肌肉和小腿肌肉明显萎缩。

经过多次向毛建议，毛同意再检查眼科，也查神经内科。张玉凤提出，听说四川医学院（原华西协和大医学院）的眼科好，最好请来看看。这很好办，只要肯检查，找那里的医生都可以。我通过卫生部从成都四川医学院请来了四川省立医院的罗医生。他们二位到北京后，都住在三〇五医院里。

在这期间，毛先检查了神经内科。由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黄克维和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新德检查。检查结束，毛问他们是什么病。他们踌躇了一下说，要先讨论，再向毛报告。毛让他们讨论以后，写一个报告。

我同他们回到三〇五医院以后，他们都觉得毛的病很不好办。在检查以前，他们设想可能是帕金森氏症，或者是有过小的中风。但是检查以后，他们共同认为是种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病（motorneurondisease），在西方称之为肌肉萎缩症（amyotrophiclateralsclerosis）。也就是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细胞逐渐变质死亡。他们为了明确诊断，提出最好请上海第一医院的脑神经内科主任张沅昌来共同研究。

张沅昌来了以后，黄、王二位将他们的检查结果告诉了张。他同意运动神经元病这一诊断。在中国人中，得这

种病的人极少，张的临床经验已经有三十年，只见过两个得这种病的人。

我问张，这种病的预后如何。张说，因为他自己对这个病的经验有限，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毛的右侧会持续瘫痪，他目前的病情已到前述阶段。因为喉咽、舌瘫痪，不能吞咽，不能正常饮食，最好早点安装胃管，以保证必要的水量和营养。吞咽困难，食物和水易流入气管而囤积肺内，引起肺部反复感染。最后阶段，无法吞咽，主管呼吸的横隔膜和肋间肌肉麻痹，病人无法呼吸。这种病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只能稍微处长病人的生命。安装胃管可阻止食物囤积肺内。呼吸器可帮助病人呼吸。病人的任何活动都要注意，可能因摔到而导致骨折。

张沅昌的这些话，使我、吴洁、胡旭东都愣住了。这时的问题是怎么向毛写文字报告了。这是一种极罕见的病，一般的医生都难于弄清楚。如何用通俗的语言，说清楚病的所在和性质，使不懂医的领导人能够明白。最重要的是，如何跟毛说他只能再活两年。

我们向江东兴报告检查结果。只是病的名字，就解释了半个多小时。再说到病的位置和性质，他完全不懂了。怎么样说明，也是没有用处。汪说：“怎么得了这样一个怪病呢？”讲到预后可能只活两年，汪不相信。他说：“现在还能吃能喝，怎么会只再活两年？”

在讲到没有办法治疗时，汪说：“你们查了半天，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怎么行呢？总要想想办法。”

第二天我们向叶剑英报告结果。我们带上了神经系统的挂图、脑和脊髓的模型，同时也带上了眼球模型。叶问得十分仔细。他对照着挂图和模型，很快了解了病情。

叶对医生一向十分信任，也比其他大部分的领导人了解我们的解说。他说：“眼睛如果是白内障，好治。如果还有别的眼病，治不好，顶多就是看不见，不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这个运动神经元病，可是大问题了。”他主张在几个大城市里，分设治疗组，专门收治这种病的病人，总结出比较好的治疗方法。

隔了一天，周恩来叫我们向他报告病情。他也很快知道了病的性质和预后不好。

周那时的身体也不好，在等毛批准他动手术。据化验员分析，周每天从尿中要排出不下一百毫升的血。周想做手术，医生们也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是原来毛已有话在前，不同意做手术切除。没有毛的同意，周不敢开刀。这时尿血已经这样明显，没有人向毛报告。最后是邓颖超找化验员小李，让她向毛说明情况，争取毛同意。

小李也是医疗组的一员，因为不是医生，没有“医生专吓唬人”的嫌疑，而且尿血是她在检验，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李向毛说明以后，毛同意了。周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进三〇五医院动手术。

周对毛很关心。周提出可以让在纽约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收集西方这病症的治疗办法（1）。我们说明，美国至今也没有办法。周说：“这说就是绝症了。”

我们都默不作声。最后周说：“你们还是抓紧时间，研究些办法。不能治好，也要想法延长生命。”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我到三〇五医院和医疗组讨论下一步的办法。我们一方面从内科和神经内科定出治疗和急救方案，另一方面又请了北京同会医院院长徐祥和耳鼻喉科主任李春福参加进来，由他们拟出喉肌麻痹，特别是呼吸肌麻痹后的应急措施。最后医生们都同意最好马上安装胃管。



张沅昌特别强调，目前病变的范围涉及控制喉、咽、舌、右上下肢的运动神经细胞，一旦主管呼吸肌肉运动的神经细胞受到病害，立刻就会呼吸停止，有生命危险了。

医疗组开会的同时，政治局会议也在举行。我稍后行知，就是在这个会上，毛批评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个人搞小宗派。这也是“四人帮”一词的起源。

政治局会议结束时，我们正在全力制定治疗和急救方案。张耀词突然通知，毛要到外地视察，立刻准备好，两个小时以后出发。汪东兴说，只同意我、吴洁、胡旭东和两位成都来的眼科医生一同随行。神经内科医生回原来的医院待命。

我愣住了。毛的情况随时可能危急。研究治疗的办法还未讨论完毕，医生们也得写报告，而且仍未决定如何处理所有的紧急状况。毛要走是谁也阻止不了。但专家们应该随行。当前主要的病是神经内科方面的，所以神经内科医生应该去。耳鼻喉科医生也应该去。也要带上内科医生、急救器材和气管插管（以防毛呼吸困难）。

我跟张费尽唇舌解释以上各点。

张说：“汪（东兴）主任说了，停止研究。谁去谁不去，都已经定下来了。再需要，也没有用。就按领导上的决定去执行。”

我看再讲无益，便通知了吴洁和胡旭东，用车将他们接来。又让两位眼科医生打点行装，带上必要的眼科检查器具，一同出发。

我们随同毛乘专列前往武汉。

在武汉一住两个月，症状更加明显。毛的喉、咽部肌肉麻痹加重，吞咽困难，已经完全靠张玉凤喂饭，只能左侧斜卧才能让食物进入食管。有些食物吸入气管，引起肺炎。但毛不肯让我们替他治病，不肯见任何医生。吴旭君

每天见得到毛，总转告我毛的情况。她也代我向毛传话，要毛见见医生，接受治疗。

毛说什么也不肯。

最后我写了一个详细报告，将他的病讲清楚，并附有图表解说。我请张耀词交给毛。但我没有指出运动神经元病的预后情形，中国医生很少跟病人说他患了绝症。

医生们相信对死亡的焦虑会缩短病人的生命。给病人一丝希望，也许反而能延长生命。没有医生愿意跟毛主席说他患了绝症。我的工作就是延长毛的生命。

毛看到这个报告十分不高兴。他说，医生只看到黑暗面，看不到光明面。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起不了好作用。毛认为自己没有大的毛病。他想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在武汉曾因受凉引起声带炎，说不出话来。我同他解释，这两种病不同。但是毛并不相信。他只同意眼科检查。

毛照例和眼科医生说了笑话，态度很客气。但说话不清楚，没有人听得懂。

眼科医生诊断毛得了白内障。

毛问他们，除了白内障，里面就没有别的病了吧。他们回答要动手术将眼内已经混浊的水晶体掉，才能看出眼底、视网膜有没有病。毛听了以后，大不高兴。两位医生退出去以后，他说，让他们走，看来医生们没有什么好主意。从此以后，毛不再叫我们检查，连我也见不到他的面了。

我真坐困愁城。万一毛出了状况，我得负全责。心情低沉，辗转难眠，食而无味。我自觉对毛健康尽心尽力，毛却认为我们庸人自扰。我又跟汪东兴解释了武汉行前我和张耀词说过的话，另外要汪找一位麻醉师和外科医生加入医生组，以防毛有骨折情形。汪最后同意了我的意见。由湖北省委在武汉医学院（即原来在上海的同济大学医学

院)组成了一个以耳鼻喉科、外科和麻醉科医生为主的急救组。但武汉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也没有见上毛一面。

很多人都不相信毛病了。在武汉的时候，毛接见了菲律宾总统马可仕的夫人伊美黛，李先念陪同。王海蓉和唐闻生也来了。她们发现毛口齿不清，常流口水，但精神还是很好。我告诉她们，毛已经有了重病。她们说不像啊。唐闻生说：“主席是个怪人，得了这么一个怪病。”

毛在武汉期间，江青在北京。江仍在大张旗鼓，全力攻击周恩来。江权势日大后，自比为武则天。报刊上开始大加吹捧武则天。江青为了见马可仕夫人，特别制作了“皇帝服”和“太君鞋”。这套打扮难看极了。后来江青自己看了也不像样，没有穿。毛有没有从中阻止，我不得而知。但王海蓉和唐闻生告诉我，这些事她们都同毛说了，毛没有作声。我听了马上知道，毛不赞同江青的行径。

注释：

尽管中国方面努力收集美国对肌肉萎缩症的治疗资料，没有外国医生替毛做过检查。

一九七四年九月，离开武汉到了长沙。

毛要游泳。他决定加强锻炼身体。他说，这样可能会好，用不着检查，也用不着治，在武汉那次说不出话来，还不是游泳治好的。

这引起我们极大的恐慌，因为喉、咽肌肉麻痹，很容易呛水。手、腿本来无力，一旦呛水，控制不住肢体，是很危险的。

毛一贯的性格，决定要办一件事，非办不可，谁要阻拦的话，他不但大发脾气，而且办得更加坚决。一组的人都深知毛的这个性格。最后汪东兴说，劝不得，一劝，准僵。只能准备好救护器具。

毛开始在室内游泳池游泳，医生们立在水池旁准备随时急救。但毛下水时间不长，因为只要他的头没入水中以后，立刻呛水不止，脸胀得通红，由陪游水的警卫挽扶上来。后来毛在长沙又试游了两次，结果一样。以后毛没有再试着锻炼了。

邓小平此时也来长沙看毛。邓回北京后和政治局报告毛健壮如昔，毛主席游了泳。

这次游泳锻炼后，毛活动量更少了，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因为躺的时间长，而且只能左侧向下侧卧，否则就会呼吸困难。左边骨盆凸出的光皮压破了，成了褥疮。每每一处愈合了，另一处又破损。这些褥疮直到毛去世时，都没有消失。毛开始对安眠药过敏，全身出了皮疹，搔痒脱屑。我们换了安眠药，又擦了些外用脱敏药，皮炎才逐渐消退。

在长沙两个月期间，毛不肯见医疗组其他医生，我也只见了毛几次。周恩来生病后，毛对医生的敌意更加深了。周的膀胱癌八月又有反覆，又做了第二次手术。

毛引以为证说：“我说不能开刀嘛，一定要开。现在还不是又开第二次，我看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不到呜呼哀哉不止。”又说：“老百姓有病还不是拖，拖拖就好了。拖不好的病，也治不好。”

北京的政治局势紧张万分。次年一九七五年一月即将召开十一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两个会中将有新的人事布置。政治局常委将通过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和政治局常委，但江青等人大力反对，他们要争王洪文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离开会揭幕日期越近，两派都派了代表来见毛，寻求毛的支持。

王洪文代表江青一帮人到长沙来见毛。这年机要秘书徐业夫因患肺癌离职后，张玉凤接过了徐所有的工作——收发文件（但因毛两眼失明，只能由张读文件给毛听），安排毛的会面——张此时也想正式成为毛的机要秘书。汪东兴不愿意发出任命，但王洪文鼎力支持。王、张两人这时期经常见面。王洪文说张玉凤在毛的身边，又伺候毛，又要给毛读文件，太辛苦了，应另外派人给张玉凤洗衣服、做饭。毛对王洪文给张安排的人事十分震怒。毛说：“谁要干涉我的内政，就给我滚蛋。”王仓皇跑回北京。

十月二日，王海蓉和唐闻生来到长沙。她们受周恩来委托，来见毛，主要是谈“风庆轮”事件。原来在文化革命以前，经过毛的同意，为了发展远洋航轮，周恩来提出，在自行制造的基础上，为运输需要可适当买些货轮。“风庆轮”是一九七四年初于上海组装完成。江青指责买船是“卖国主义”，攻击周恩来。已回到政治局的邓小平支持

周恩来。两方相持不下，直到毛表态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江青才只好作罢。

最后正式决定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由周、王共同主持筹备工作和从事安排。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和王洪文来了，是为两个大会所做的各项准备，向毛报告，取得毛的决定。那时汪东兴已宣布张玉凤为毛的机要秘书。张对周抱怨：“你看，现在什么事都要我管。主席的吃、喝、拉、撒、睡，都要和管。你也不管管。”当时弄得周很尴尬。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稍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意朱德为委员长，周恩来连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出任常务副总理。毛坚持邓的任命，他需要邓来协助周处理中央常务工作。

周的癌症使邓的复出政治舞台成为必要之举。邓于是主管了中央委员会常务工作。

江青一帮人仍未能得逞。

毛仍在长沙，未参加北京的会议。汪东兴也没有回去。汪觉得北京闹得这么凶，这样的政治局会议他没法子参加。

我想回北京。我在长沙起不了作用。我们的人手不足，万一发生突变，需要抢救，很难进行。北京的医疗组仍需一起研究，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急救方案。

胡旭东、吴洁和我于一月初回到北京。我们的医疗组又加入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姜泗长主任。北京医院外科周光裕主任、麻醉科高日科主任，以及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袁兆庄医生四人。稍后，这四位同胡旭东主任去了长沙。

我留在北京，开始向几位高级领导做简报。我先找到叶剑英，希望寻求各领导人的合作。毛不肯接受治疗，我们极需政治局的帮助。另一方面，也该让政治局了解毛的病情。叶元帅很热心。我们聊了一会，谈到我自己负责毛的医疗保健二十一年之久。然后我将外出这半年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我们也商量如何说服毛下胃管，用鼻饲，会减少食物吸入肺内，发生肺炎。

叶剑英一直鼓励我。这段期间我跟汪东兴、张耀词的关系也不好。我将毛的病向汪东兴、张耀词讲了很久，他们一再说不懂。甚至拿了模型、绘图，说了也是白搭。自从毛发现有了这个不治之症以后，张耀词更是一副推卸责任，生怕有些事落在他的肩上的样子。张一再强调，他又不懂医，他只管警卫。

叶的话使我的精神压力大为减轻。叶说，依毛的脾气，恐怕不肯下胃管。叶也提醒我，不要使江青又藉机发动夺权活动。叶记得江在毛一九七二年病重时搞的那场闹剧。



江仍可以再斗我一次。叶并要我不要担心，他答应在江青对我伸出毒掌时，帮我解围。

我长舒了一口气，全身好像轻松了一些。我回到三〇五医院，开始筹备工作。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日，我去三〇五医院的新楼病房探望周恩来。周的病情又恶化了。周去年十二月去长沙前，医生发现他的大便有潜血，当时为了解决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没有告诉他。大会在一月十七日结束，中国这列火车又重新向现代化的路上驶去。这时医生又怀疑他有结肠癌，正准备做结肠镜检查。

周面容清癯，脸色苍白。他不愿整天躺在床上。我见到他时，他坐在沙发上，穿着整齐的中山服。我向周解释，因为他正在检查和治疗，恐怕影响他的休息，所以回北京两个星期都没有来。周怪我不早去，他很关心毛的身体情况。

那时毛已离开长沙前往杭州。北京医疗组第一批人已随毛去杭州。我和其他人员定于明天前往杭州。我不在期间，毛终于同意进行总体检查。

周也和别的医生讨论过毛的病情。毛的白内障好治疗。他问我们，对运动神经元病研究出办法没有。周还是难以接受那是不治之症。我告诉他，对这个病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国外也没有办法。

周说：“可以请中医看看。”

我告诉周，毛并不相信中医。即使看了，熬的汤药，他也咽不下去。现在已经不能喝水，一喝就呛，只能喝像稀浆糊样的稠汤。

周沉默了一会，然后说：“你见到主席，替我向主席问好。”

第二天，我带着十二名护士和十名医生离开——吴洁、两位神经内科医生、三位眼科医生、两位爱克斯光科医生、两位化验医生。耳鼻喉科和外科医生已经在杭州。

毛的总体检查分四天完成。原来按保密规定，给“首长”进行检查治疗，各科医生只能了解和处理本科的疾病，不允许打听别的科的情况。我的工作便是分析各别报告，再拟出一套治疗办法。这条规定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医疗本身是一个整体，各科之间互相保密，就不可能得到全面的判断，特别像毛已经不是一个系统、某一个系统。某一个器官有病，各科如仍互不商量，就会顾此失彼，发生医疗上的失误。经汪东兴同意，这次可以各科分别检查，然后共同讨论做出全面的衡量。耳鼻喉科医生先行检查，再来是内科、神经内科和眼科的检查。做了心电图测试，取了胸部和心脏的爱克斯光片。由心脏的爱克斯光片可以判读心脏是否有扩大的迹象，如果有，那表示有心力衰竭的危险。

综合这次检查的结果，毛患有运动神经元病、两眼白内障、冠心病、肺心病、两肺底部有炎病、左肺有三个肺大泡、左臀部褥疮、血液中的氧气过低。这时候毛还有低烧，咳嗽很厉害。大家商量这次无论如何要下胃管进行鼻饲，这样服药也方便。另外再做白内障手术。

我综合了大家的意见，给毛写报告，说明检查结果、病情分析和治疗对策。二十七日写完，交给了张耀词。张耀词给了张玉凤，让她向毛报告。因为这时毛已完全失明，一切报告都得由别人读给他听。

二十八日凌晨五时半，张耀词把我叫醒，要我和所有医疗组人员立即赶去和汪东兴开会。张玉凤刚传达了毛的旨意。我们纷纷赶到四号楼集合后，张耀词说：“刚才张（玉凤）秘书叫我去。说医生的这些办法，都不顶用。

张秘书已经同毛主席商量好了，要用输液的办法治。输液是很好的补药，有营养，能治疗。现在请你们来商量，立刻就输。”

文革期间，高级领导黄永胜、邱会作等人流行用输液（葡萄糖）和输年轻战士的血做为补药。江青听说年轻力壮男子的血液可增长寿命，便安排了年轻军人捐血来供她输血。张玉凤听说了这些方法，便建议毛采用。

这些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表示态度。汪东兴于是一个个点名，问他赞成不赞成。汪说，只要都赞成，就好办。

在汪的这种高压气氛下，问到谁，谁也不敢表示说不赞成。最后问到我。

我忍无可忍，说：“输液是一种好的治疗方法，特别在急救时很重要。但是现在的病，不是输液能解决的。何况我们的输液方法，还用输液瓶这老办法，不是密封式的，输液后发生输液反应的不少。一旦用一种并非必要的治疗方法，引出剧烈的反应，可上医疗上的事故。那时张玉凤可以说，她不懂医，提出的方法是由医生来决定的。我怎么样交代得过去？”我绝不让步。

张耀词大为光火。他说毛听了报告很不高兴。现在起码毛同意张玉凤的办法。

这下要怎么办？

我很气张耀词和张玉凤两人。我说：“医生提出来的治疗方法，不一定会被接受。但是如果除医生以外，大家都多解释说明这种方法的重要，那么就容易接受。昨天我将报告交给你，我说最好同张玉凤谈谈，说清楚治疗方法。你说不要了，她看报告就可以了。我认为张玉凤与医生合作很重要。”

汪东兴生气了。汪说：“那么就是你一个人不同意了，一个人要听党的，听组织的话。各行其是，要倒楣。”

这件事跟党和组织都扯不上干系。这是医学上的具体问题，属于专门知识，不是张玉凤、汪东兴、张耀词或党所能决定的。我强调毛主席早就说过，有病只好听医生的。

双方僵持不下。汪叫我给毛写个报告，解释为何只有我一个反对输液。让毛自己做最后决定。当天我写了一个报告。张耀词交给了张玉凤。当晚传出话来，毛决定不输液了。

但这下我处境艰危。没有人高兴我的作法。我不能直接见毛，我工作上必须有张耀词、汪东兴和张玉凤的配合，但他们反而造成毛医疗工作上的困扰，毛的病情只会越加恶化。这次如果不拒绝这种蛮横不负责任的作法，以后怎样进行工作？而且出了问题，医疗组得负全责。因此医疗组里的人也忧心忡忡。大家赞成我的主张，但觉得得罪了这三人，以后的工作不好做下去了。

另外还有政治的因素。江青自一九六八年起要将我打成反革命，一直没有打成。

我则终日惶惶，处在刀口上。一九七二年江青又说，在一组有个特务集团。这个事情并没有完结。如果我在治疗上不小心谨慎，出了事可是自投罗网，到那时百口莫辨。

吴洁跟我说：“我们最好退出医疗组，让他们另外找人。否则直要出大事情了。我真替你担心。”

吴洁自然是好意，但是我如果不遵守医疗原则，而出了医疗事故，我是医疗组组长，怎能推卸责任呢？毛的病是不治之症，病情逐渐加重，今后的困难多得很。

我说：“这也没有那么容易。我是组长，想退出退不掉。只要我们按照医疗原则办事，不会出大问题。”

我后来私下去找了汪东兴谈，他当时态度已经冷静下来，也为输液的事向我解释。汪说：“讨论输液的事，我不应该参加，应该由医生们自己讨论。这事情做得莽撞了。不过你也太没有弹性。我想好了，过了春节，只留下胡旭东、耳鼻喉科医生、外科医生和麻醉科医生在这里。你带着其他的医生、护士先回北京，再详细讨论各科的治疗方案。像眼睛的白内障，能治就先治。不过事先要找年龄和身体都差不多的白内障病人都试验，给这些人做手术，写出报告，让主席知道怎么作法，他才能下决心治。别的不容易治的病，可以多方面想想，不能说一点办法都没有。”

汪说要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汇报一次。领导中，只有周恩来和叶剑英对毛的病了解得比较清楚。前阵子报纸上还形容毛“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中国人民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还以为毛没有病。汪觉得如果不报告一下，以后出了事，就不好办了。

江青仍不断在找汪的麻烦。她对毛的病从不过问，反例说，由老汪你们负全责。

汪说这是不怀好意，明明是一旦毛主席去世，她唯我们是问，然后借机会打反革命。

她可以说，主席的病，她和王洪文两个人没有插手，是周恩来、叶剑英和汪东兴在管。是他们的责任。所以这次无论如何要向政治局汇报，要政治局大家负责。

二月八日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汪叫我到他的舱房里去。他问我是不是生气了。

我说：“我没有别的意见，主要的意见就是你对张玉凤过于迁就了。你们都不管她。大家对你们是很有意见的。”

汪听了很不高兴，说：“有些事说不清楚。主席不让她走，我有什么办法。现在主席说话，根本听不清在说什

么，可是张玉凤因为一直在身边，她能听懂。换了别人，还是听不懂说些什么。”

所以张玉凤能持不来耀武扬威，完全是因为只有她听得懂毛主席的话。

回到北京以后，吴旭君离开一组。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五日在人民大会堂，医疗组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的病情，和这次检查身体的结果。

在汇报的前一晚，我到三〇五医院去看望周恩来。我将这次给毛检查身体的结果，和为了输液问题发生的曲折告诉了周。因为医生正在准备给他做结肠镜检查，我劝他不要参加汇报会了。

周沉思了一下说：“还是参加的好。这是医疗组第一次向政治局汇报，应该尽可能参加。江青同志他们可能要提出一些问题，你们应该有充分的准备。输液的事就不要讲了，否则事情更加复杂了。”

医疗组到达大会堂的时候，已经是十五日下午两点多钟。政治局正在开会。过了一会，汪东兴走出来，他问我准备得如何，我说由我先将病情讲清楚，由吴洁讲心脏和肺脏疾病的论断与治疗，黄克维讲运动神经元病，张晓楼讲两眼的白内障治疗，李宣德讲爱克斯光肺片和心脏片的不正常发现。我们都预备了模型和挂图来辅助说明。最后我再综合讲讲各科的治疗步骤。

汪最后叮嘱说：“周总理是带病来的，邓（小平）副主席是第一次听到主席的病情。他的耳朵不好，一般说话的声音，他听不清楚。你告诉大家，说话声音要大。”

我们陆续进了会场。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坐在面正中央的位置上，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围在两旁。我们坐在面对他们的椅子上。我们好像面对法官，在受审。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所以这你的汇报并不困难，但是麻烦的仍旧是运动神经元病。有模型和挂图也不能使绝大部分的政治局委员听得懂。

江青说：“你们说，这个病很少见。那么主席怎么会得上这个怪病？你们有什么根据证明，主席得的是这种病？”

黄克维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解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当然，怎么样会得上这个病，谁也没有办法回答出来。黄只能说，这个病的病因还没有研究出来，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会长这种病。

黄讲到了可能发生的危险，是呼吸肌麻痹。好多人又不懂呼吸肌。黄解释呼吸肌时，无意之中，用排骨肉来说明肋间肌。这引起了姚文元的申斥说：“这对主席太不尊重了。”

姚文元的话讲出来以后，黄克维慌了，下面的话结结巴巴说不下去。大家都很紧张，会场上立时沉静下来。

这时周恩来说：“这次你们给主席做的身体检查，很仔细，很全面。诊断也确定了下来，我们感谢你们。下一步的治疗打算怎么样进行呢？”

我说明治疗的方法和步骤：在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前，预备先进行一些试验研究手术。最后又有一波折，当我说到下胃管用鼻饲的重要性时，江青说：“下胃管用鼻饲，我知道这个办法痛苦得很。你们这不是折磨主席吗？”

邓小平说：“刘伯承同志（中共十大元帅之一）就一直用鼻饲。主席同意了吗？”我说，还没有同意。

邓小平说：“主席的事勉强不得，慢慢地劝，同意了，就做。这样看来，运动神经元病是没有好的办法了。你们再多研究能不能有些治标的方法，能够使这个病进展得慢一些也好，白内障的摘除手术要准备好，各方面的病情都要思考进去，不能只看眼睛，要注意心脏和运动神经元病的问题。你们尽一切力量想办法治疗，需要什么药品和器材，告诉汪东兴同志去办。党感谢你们。”



周恩来附和着说：“党感谢你们。”邓小平又说了一次：“党感谢你们。”我们便退了出来。其他政治局委员毫无反应，他们保持沉默，以免往后得为毛的事负责。当时听上去，大家很高兴，尤其与江青他们的申斥和指责相对照，大家似乎舒了一口气。

但是做“首长保健工作”时间久的人，心里都明白，这种感谢的话，尽管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出来，却是没有丝毫法律上的约束力的，到头来只是一句没有意义的空话。

从三月起，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发起针对邓小平和其他长征老干部的“批经验主义”运动。此时，姚文元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主义基础》，认为在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姚此篇文章是在抨击中共党内的长征老干部。他们绝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但政治经验丰富的老党员。他们的政治实力雄厚，德高望重。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是所谓的党内知识分子，知识水平较高，但政治历练不足。一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江青等人没有争到任何实权职位。因此这个“批经验主义”运动，其实是在文革期间窜红的年轻干部和平反复职的老干部两个派系的权力斗争。所以江等批经验主义的目标，仍然是要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

当毛知道江青的夺权企图后，立即出面加以制止。毛在四月作了以下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说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一种表现。”毛所谓自以为是的教条主义，骂的就是江青一移人。

毛泽东在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讲(毛让张玉凤把他的话记下来,然后交给联络员唐闻生和王海蓉转交政治局):“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叫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邓小平按照毛的意见,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几次批评。江青等四个人都作了书面检讨,算是告一段落。这次邓小平似乎占了上风。

汪东兴这时同我说:“邓这个人很奇怪,这什么不乘此机会,穷追猛打,将这四个人扳倒呢?”

我说:“这事没那么简单。王海蓉,唐闻生告诉我,康生叫她们去问清情况,知道了主席对江青四个人的批评,让王、唐两个人告诉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三十年代都是叛徒,并且有证明人。王、唐觉得这个问题太大,她们到三〇五医院告诉了周总理。总理说:‘这事不能卤莽。主席至今没有松口要批倒江青四个人。如果将叛徒这事报告他,他不同意,康生同志到时可以不承认说过这些话,空口无凭嘛。’

所以真想要把江青扳倒,没有那么容易。“此后邓小平在各方面进行整顿,并且说毛有三条”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修正主义)防修(修正主义),第三、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江青四人帮仍不死心。江利用毛远新频频向毛传话。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提出”我很注意水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汪东兴觉得毛容易听信谗言,在毛远新不断灌输

下，渐渐会对邓小平起疑心。果然不出所料，由九月底开始，毛用他的侄子毛远新作为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而中止了王海蓉和唐闻生的联络员工作。从那时起，邓小平又成了攻击目标，政治局势旋又紧张。二月向政治局作了医疗汇报后，眼科又请来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的两位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眼科医生唐由之和高培质。他们提出应用传统中医的针拔白内障的方法。他们认为毛的身体已经很衰弱，承受不了较长时间的手术。针拔的方法只要几分钟就可以结束，对毛比较有利。但是西医眼科的三位医生认为，针拔的办法仍然将混浊的水晶体留在眼科内，时间一久，会发生别的毛病。讨论好多次，双方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我再说明，毛有运动神经元病，心和肺都有明显的病症。但西医眼科医生认为，这些都不影响白内障摘出术的进行。讨论多次以后，决定先进行一些试验研究手术，将中直招待所的两个会议室改成两个病房，找了与毛情况相近的四十名病人。这些病人是由北京市政府找的，都是些无依无靠，住在乡下，需要劝白内障手术而又没钱的老农民。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为毛主席做的试验研究手术。我们将这些老人都接到中直招待所，住进病房。然后分成两组，一组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一组做白内障针拔手术。我们把两组手术时间、手术后的恢复和效果，分别写成报告，送给毛，由他自己选择使用哪种方法。毛此时仍在杭州，负责的医生是胡旭东。在张玉凤的指挥下，胡旭东开始给毛输液。胡生恐发生输液反应，每次输液都加入相当大量的激素。这样就连续天天静脉输入百分之五的葡萄糖液八百至一千毫升。胡恐输液以后发生事故，几次打电话给我，征求我和吴洁的意见。我们只能回答，我们不在现场，不了解情况，特别在没有血液化验和尿化验的指标下，很难做出具体建议。到四月底，毛从杭州回到北京。这时输液已经是欲罢不能。我建议胡向毛提出做一次血液化

验，根据化验结果，可以说明输液应该暂停。吴洁也说，这样输法是个大问题，不要老毛病没有治，又增加了新病。但张玉凤不同意全停，只好改成隔一天输液一次。五月中旬，张玉凤在《国际参考》上看到中国派到罗马尼亚，给他们一位领导人看心脏病的两位医生，治疗效果非常好。毛同意让二位医生参加医疗组工作。当时他们还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到五月底才加国。我将他们接到中直招待所。原来是天津医学院院长朱×彝和北京医院内科主任陶桓乐。他们说，罗马尼亚的这位领导人，得的是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Subacute bacterial endocarditis，是一种心脏内的细菌感染），只要用对了抗生素，治疗自然有效，并不是什么难治的病。我将毛的病情告诉了他们。他们同样感到很难办，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六月十日我同朱、陶二位到游泳池毛的书房内见毛。我们一进去，毛就叽叽咕咕说了一大套。张玉凤不肯翻译。毛发了脾气，举拳跺脚，张玉凤才说明真相。原来六月八日张玉凤出去了。毛要读文件，等了很久，张才回来。毛生气了，写字条说“张玉凤，滚。”张回骂毛：“我要不滚，你就是狗。”毛说“我的脾气不好。张玉凤的脾气更不好，她还骂我。”

这段话朱、陶二位听完以后，不禁愕然。张玉凤在旁边说：“这些话也要同医生们去讲，有什么意思？”

毛详细询问了他们在罗马尼亚治病的经过。他们尽可能说明病和病不相同，表示毛的病与罗马尼亚那位领导人的病完全不一样，他们尽力治。毛要他们加入医疗组，叫我去安排。

于是医疗组又增加了两位医生。他们说：“你的这个医疗组人才济济，已经可以开个医院了。我们来了，也起不了作用。”

吴洁对我说，来这么多人，有什么用处？我说，出各的老专家越多，越好办，这样就越不容易将我们打成反革命。再有就是，讨论研究病情时，有不同的意见，一定要在医疗组内说明，取得一致，再向“首长们”和亲属们提出，千万不可将医生间的不同意见，直接告诉他们，否则他们，尤其江青、张玉凤这样的人，就可以拉一部分医生，打另一部分医生，后患无穷，开不好，真会成了反革命。过去这样的经验太多了。吴洁同意我的见解。他又说，做保健工作时间长的人，都懂得这件事的利害关系。他要我应该同几位接触“首长”工作少的专家们打招呼。

这时从上海华山医院调来了神经内科主任徐德隆，参加医疗组工作，主要负责在上海进行运动神经元病的试验治疗。

到一九七五年七月底，最后一名治疗白内障的病人出去了。这时传来毛的决定：用针拔的方法。毛说：“这个方法痛苦少，也安全”。

在游泳池大厅内，用布幔隔成一间手术室。针拔白内障手术就在这里完成，由唐由之和高培质医生治疗。在整个手术过程，周恩来和邓小平都在旁守着。

手术前，唐闻之向毛说明整个手术的细节。开始时，毛有些紧张，后来也就放松了。毛说：“元朝人萨都写过‘天低吴楚，眼空无物’。那么做完手术，我的眼里就会有物的了。”

手术很快，从注射麻醉药到针拔完成，一共不过十二分钟。这次做的是右眼，打算两个月以后再做左眼。

手术切口恢复很快，十天以后去掉了盖眼的敷料。刚揭开敷料的时候，毛十分高兴，说：“又见天日了。可是看不清楚。”

唐闻之医生向毛解释，将水晶体拔开了，等于瞳孔里缺少了一个凸镜，所以要眼镜才能看得清。毛同意配眼镜，但是不肯验光。这样只好配了好多副眼镜试验。

此后，毛又自己看文件了。政局随之突变。

原本打算十月中旬要做左眼的针拔白内障手术。但此时江青的“批经验主义”运动转为占了上风，又透过毛远新、张玉凤不断向毛说邓的坏话。汪东兴眼见局势如此，非常担心。汪同我说：“现在紧张得很。江青他们四个人要扳倒邓副主席。主席怎么样下决心，还不清楚。你们这些医生可千万要慎重，不要再在治疗上提出什么新的建议。主席正在一肚子气，你们可不要撞到刀口上。”

这些话我又不能如实告诉医疗组的医生们，因为这是“中央内部的核心机密”。

我只能同大家说，现在毛很忙，我们先按目前的治疗做下去，不急于提出新的建议。

可是医生们非常认真，特别是眼科医生，大家纷纷提出进一步的治疗方法。

汪东兴深恐在医疗问题上，引起毛借题发作。他决定医疗组的医生们，暂时各回原来所在的医院，需要时再行集中。只留下内科医生胡旭东和两位耳鼻喉科医生、一名麻醉科医生和一名外科医生，住在游泳池附近的工字楼，做日常性的照顾。我仍住在中直招待所，继续主持如何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到十月底，毛的病情大变，咳嗽、痰、气喘加重，每昼夜二十四小时排出的尿量不足五百毫升。毛不让我见他，我只能从护士那打听他的病情。尿量不足可能是由于心、肺功能差，或是肾脏有了问题。这时输液成了必须，但需要做身体检查才能确定。

汪东兴又迅速召集所有的医生，决定让内科陶桓乐医生住进游泳池旁的工字楼。

情势十分紧张，胡旭东的压力特别大。他不想待在医疗组，可是又不能走。夜里胡旭东吃了安眠药，烟头丢在棉被上。棉被、褥子、床单、枕头慢慢引燃，产生极浓的烟。胡在屋里，被烟熏，昏厥过去。胡被送去北京医院，诊断是气管灼伤。

胡在院中待到毛去世。

于是我又搬回中南海工字楼。我向张耀词提出要让神经内科的医生住进来，好密切观察。但是张耀词不同意。他说：“张玉凤说了，这些医生不顶用。进来也是吃闲饭。她不同意，怎么好让他们进来？”

我说：“怎么能由张玉凤决定用哪些医生呢？在这样重病下，没有专科医生参加，一旦发生了问题，怎么样向别人解释呢？我想口说无凭，我写一个报告给你，你批了不同意他们进来，我自然照办。”

张耀词叫我不要写报告了，他再去同汪东兴商量。第二天他告诉我，汪同意让这三位神经内科医生全住进工字楼。

毛和张玉凤开始每天在游泳池的书房里看台湾和香港影片。游泳池大厅的北端，也改装成了一个电影放映室。每次放映，一定叫医疗组的医生们都去看，不去也不成。因张耀词说了：“反正大家都看了，不要到时候又揭发，主席重病，我们值班看电影。”有时弄到半夜两三点钟才结束。

反邓小平运动情势升高。一九七五年八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了一封信给毛。信中批评党委书记迟群和谢静宜两人生活堕落，专断独行。刘冰将信拿给邓小平转，邓小平则交给了秘书局，秘书局再转给毛。

毛远新自然袒护迟群和谢静宜，说他们两人切实实践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后来将这封信当成攻击邓小平的箭靶。毛觉得刘那封信的动机不纯，信中的矛头是对着他的，而且邓小平偏袒刘冰。毛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独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的反映。”

十月，毛与毛远新多次秘密会谈，将毛对邓小平的批评做成书面指示。这些指示只在高干之间流传，其中包含不少对邓严厉的批评。毛认为邓的领导方式有重大问题。但毛觉得邓还可以改造，并不想斗垮邓。

此时毛的身体更加衰弱，站立起来都很困难。连续吸氧气时，只要稍有停顿，立刻出现缺氧症状。吞咽十分困



难，但毛仍然不同意下胃管鼻饲。只能在左侧位，使糊状食物流入食管。

为了补充营养，医生们研究给毛静脉输入人体必要的氨基酸（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于是我们通过外贸部门，从美国和日本买来静脉输液用多种氨基酸。

张耀词又传来张玉凤的意见说，医生只会给病人用药，自己却不试试。

吴洁、陶桓乐都说，即使在北京医院，天天治疗高级干部，也从来没有过这样苛刻的要求。这是输入氨基酸，如果做外科手术，难道也要求医生自己先体验一下不成。

最后我挺身而出，接受了静脉输入氨基酸试验。因为进口的数量并不很多，所以只给我输了一次，其他的留给毛用。

到十一月底，周恩来已经病入末期了。毛让我去探望周，向周问好。

我到了三〇五医院，周的医生们告诉我，周除了膀胱癌外，还有结肠癌和肺癌。

周的癌症也是很特殊的。这三处都是原发的，并不是一处癌，继之散播到别处。

我到周的病房，他已经是形神凋疲。我告诉周，是毛叫我来探望，并向周问安。

周让我代他向毛问候，并感谢毛的关心。周又问了我毛的近况，我简单说明了一下。

我没有将当时毛的情况完全讲明。周又问运动神经元病有没有新的疗法，我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周最后说：“我是不行了，你们要好好照顾主席。”

临别时，周甚至举手握手的力量都没有了。这是我见到周的最后一面，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傍晚七时。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在三〇五医院去世。消息传来，游泳池内毫无动静。

医疗组很多医生，在周生前，都给周看过病，希望到三〇五医院向周的遗体造别。我将大家的要求告诉了张耀词。张的回答是，一不允许到医院去，二不允许戴黑纱。

大家对这个回答十分奇怪，都问我是什么原因。我回答不出，只能说，张耀词代表中共中央办公厅，他这样布置，恐怕有他的道理。我再去问张，张并不正面回答，只是说，领导上怎么布置，就怎么做，不要多问。上面的事，我们并不清楚，问多了还有麻烦。

一组的日子依旧歌舞升平。游泳池内，每天照旧放映电影。这年的春节，张玉凤向张耀词提出，要放些鞭炮热闹热闹。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南海内任何人不允许燃放花炮。张玉凤一句话，就打破了这一禁令。张耀词去买了不少的花炮，当夜在游泳池的后院及沿中南海的马路上燃放起来。放鞭炮的事，事前没有通知警卫局值班室和警卫团。他们以为游泳池出了事，纷纷来探询情况。游泳池临近北海大桥，鞭炮引来不少民众在北海大桥张望。由此又引出了传言，毛因周恩来死亡，燃放鞭炮以示庆祝。

周恩来去世，邓小平被批，江青四人帮正在积极展开夺权。现在看来，主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就要轮上王洪文。

但出乎意料之外，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先后亲自提议，并且经过中央政治局通过（实际上，毛的意见，政治局是不敢不同意的），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政治局于二月三日正式出中央文件。

我和许多人一样，对结果非常惊讶。但毛这是一棋高招，表示他思路仍很清醒。

汪东兴觉得毛是在搞调和，既不能用老的，也不能用新的，于是搞出来一个不老不新的三八式干部华国锋。汪说，华国锋这个人，毛选得不错。这个人比较老练；稳当，也谦虚，不跋扈，容易与人相处。看来，江青这四个人又要攻华了。

“批邓运动”未有稍减。三月初，毛透过毛远新在中央发出批判邓小平的“毛主席重要指示”。我很同情邓。邓能力强而聪颖，也许周、毛死后，唯一能领导中国的人。

三月中旬开始到四月四日，许多人自发地集合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花蓝，张贴传单，

朗诵诗词，发表演说，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咒骂江青四人帮。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自发活动。

我很想去广场一趟，亲自参加这历史性盛会。但汪东兴和张耀词一再告诉我，要转告医疗组全体千万不可去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有成千上万的便衣警察，跟踪并暗地拍摄去广场上的人。去了的人被照下像，就有口难辨了。他们并且关照我，因为我有时外出接洽办事，路经天安门时，要将车上的窗帷放下来，免得让人看到。

三月底的一天傍晚，我趁去北京医院办毛的事时，坐上车子在广场周围的马路上绕了一圈。广场内万头动，歌声、演讲声此起彼落。大大小小的花圈和横幅标语，从纪念碑直排以了长安街。可真是盛况空前。司机对我说，他们交通科已经一再传达上级命令，不许到广场，这次能同我不开开眼，是件难得的事。他一再想将车开进广场里面去看看，我没有同意。我告诉他，如果真让人钉上了梢，我们两个人可就倒楣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坐的车子的车牌号码被便衣警察记下来。因为查出来是警卫局的车子，才没有往下追究。

四月四日晚上，政治局会议认为天安门前的群众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毛远新将会议讨论的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毛圈阅了这份报告。于是从四月四日晚开始，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

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前群众和民兵、警察、解放军发生了严重冲突。到晚上九点半钟，出动了一万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警卫部队，封锁了天安门广场，殴打和逮捕集会的群众。

四月五日这一天，江青都躲在人民大会堂内，用望远镜观看天安门广场镇压群众的情况。夜里十一点多钟，江青从人民大会堂拿了茅台酒。花生米和猪头肉，兴匆匆地来到游泳池，先去看了毛泽东，然后跑出来同大家说：“我们胜利了。大家干杯。”还说：“我也要做一个棍子，以后好打人。”

我不晓得她跟毛说了什么。但这是场自发性的群众运动。毛也一再说过不以武力对付群众。我非常厌恶江青的言行和镇压事件。

四月六日凌晨，政治局会议认为这次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决定继续组织三万名民兵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周围，另派九个营的部队在市区内待命。毛远新将会议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表示同意。

四月七日毛远新将《人民日报》记者有关天安门事件的“现场报导”，送毛泽东审阅，毛同意发表。毛泽东说：“这次事件发生在，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房子、汽车）打。这三件使事件的性质变成了反革命。”毛提出，据此撤销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并且提出，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治局根据毛的意见，做出了相应的决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

四月七日晚，汪东兴在游泳池大厅召集一组工作人员和医疗组全体开会。汪宣读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其实大家已经在广播中听到了。汪又传达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开完会，大家散去。汪叫张耀词、我和负责警卫的人留下。

他说：“你们可是要把住关，不要随风倒，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乱揭发。特别是医疗组的医生们，由不同的医院来的，对他们可是不了解。要他们不能乱讲。”

汪的意思很明白，要大家在这次运动中，不要讲出一些对他不利的事。他不知道，当时医疗组的医生们，为了毛的病正在想方设法，延缓毛的病的进展，那里有什么心思揭发批判，搞“批邓小平”的运动呢？

一九七五年十月开始以后，毛的身体又有了明显的恶化，如前所述，每昼夜二十四小时尿量不足五百毫升，经过了多方治疗，尿量也不过八百毫升左右。毛不肯做身体检查，查血更是困难。医生们无法了解他的病情，最后只能用查尿液的各种成分来判断他身体内部的变化。测定尿液中的各种化学成分，是一件很复杂而细致的工作。所幸，三〇五医院已通过外贸渠道，购置了多种生物化学分析鉴定仪器。

这样才算是多少摸索到一些情况。但是却不能凭这些检验结果，作出病情判断。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一日，我和陶桓乐正在游泳池值班，医疗组的护士余雅菊冲了起来。毛的心脏发生了大量的早跳，全身出汗，呼吸急促。开始时张玉凤不让检查，我们深恐毛是心肌梗死，坚持检查。

毛此时仍有意识，但已没有力气阻止我们进行检查。我们立刻做了体检和心电图。打电话到工字楼后，其他的医生随即赶到游泳池。心电图显示心内膜下心肌梗死，心跳不规律。经过抢救，逐渐纾解。毛的护士孟锦云和李玲诗后来告诉我们，主席和寮国总理凯山会谈完后没多久，就和张玉凤大吵了一架。

这时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全都赶到游泳池。他们询问完了发作的情况，当时商定，由外交部发文通知中国驻各国大使馆，为了使毛得以充分休息，今后不接见来华外宾。

华国锋对张玉凤说：“主席年纪大了，有重病，伺候他老人家要有耐心嘛。”

张玉凤嘴里嘟嘟囔囔，很不耐烦。王洪文凑过来说：“小张，好好伺候主席，我们感谢你。”

华国锋当时决定，毛如果发生变化，立即通知他，并且提出今后毛的疾病和治疗，由华自己和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医疗组有任何事，向这四个人报告。

张春桥提出，以后一般的中央文件不向毛报告，特殊重大的事情经过中央政治局决定以后，看具体情况向毛请示。华国锋同意了张春桥的意见，王洪文也表示同意。此后江青四人帮开始握有实权。

心肌梗死虽抢救得宜，但毛情况仍持续恶化。每天的尿量很少，都在五百毫升左右。咽喉麻脾，已经完全不能吞咽食物和液体，只能喂进一点糊状食物。

经过医疗组的要求，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个人在五月十五日傍晚，到工字楼召集医疗组的全体医生开会。我们一再强调，在目前状况下，不下胃管，就不可能保证有必要的营养和水分，药物也吞咽不下去。照这样下去，等于没有治疗，断绝了食物和饮水。

张春桥讲，毛不同意下胃管，谁也没有办法。我们说，现在毛不同意，可是能够接近毛的人，如张玉凤，也不同意。需要她明白下胃管的重要，向毛建议。

但张玉凤不肯来开会。她说要照顾毛主席，分不开身，而且医疗不是她的事，同她没有关系。

几位政治局委员嘿然不语。最后王洪文说：“我去同她讲一讲，让她也向主席提一提下胃管。”

散会以前，华国锋让我们将鼻饲的胃管拿给他看。这是刚刚进口的很细的管子，既柔软，又有韧性。华看了以后，与王、张、汪约好，第二天上午到游泳池大厅，每个人都试一试从鼻孔内将这种管子下到胃里。这样，一旦毛问起下这种管子，难受不难受，就可以将亲身的感觉告诉毛。我们建议，所有在毛的身边工作的人，都试一试，就更容易打动毛。

华国锋同意我们的意见，然后告诉汪东兴通知一组的人也都试一试。

他们临行前，王洪文对我说，珍珠粉是很好的药，可以给毛用一用。王说，他已经打电话到上海，精选一些好珍珠，做好粉，送来交给我。



我与神经内科的医生商量好，上海和北京各找一些病人试服珍珠粉，以确定有没有疗效和副作用。就这样将服用珍珠粉的事拖下来，到毛去世，一直没有使用。

四人中只有华国锋试了下胃管，其他三人各有各的藉口。汪东兴说他在做十二指肠溃疡手术时，已经尝过下胃管的味，他不试了。接着王洪文和张春桥都说第二天有会议，需要参加，如果来不及赶来，就不用等他们试了。

第二天上午华国锋来到游泳池，试了下胃管的味。他说：“并不可怕。管子从鼻孔进去以后，只是过嗓子的时候，稍微有点恶心。主席问的时候，我可以说说。”

华走了以后，医疗组的医生们和一组的工作人员都试过了。只有张玉凤不试。

她说：“我试有什么用，我又没有病。我试了，主席也不一定同意下胃管。”

用鼻饲管的事仍没有得到毛的同意。除去用手去摸摸他的脉搏以外，毛拒绝其他的检查项目。

到五月三十日的夜间，毛又全身出大汗，暂时昏厥。在抢救中，外科医生将鼻饲管从鼻孔送了进去。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做心电图等检查，毛已清醒过来，他立刻用手拔去鼻饲管。外科医生阻止他拔的时候，他握拳要打这位医生，而且要所有的人都出去。

我留下来。因为这次发作的病因不清楚，我同毛讲，最好是查一次耳垂血。毛同意了。结果只知道是血糖偏低，没有其他检查项目，无法作出确切的判断。

我又同毛说明，医生对他的心脏，完全不知道有没有新的变化，这样就很难采取对策。最后毛同意了在他的前胸上贴上一个电极。应用空军研究所制造出来的无线电遥测心电仪器，我们在大厅上，可以日夜不停地监视心电图

形变。这此又调来五位心内科专家，一方面轮流值班监护心脏，另一方面做好心脏变化时的抢救工作。

病到这个程度，张玉凤仍然要毛看电影。我认为应该让毛保持安静，看电影很不相宜。何况有些片子内容荒诞刺激，看个电影又把毛从床上搬到沙发上，恐怕心脏承受不了。但是张玉凤不听。

江青很不赞成。江觉得现在仍然看电影，对毛不利，电影的光线太强，刺激眼睛，而且映久了，空气很不好。还是不要看了吧。

汪东兴一向和江是唱反调的。汪来到游泳池，找到我，要医疗组的医生在工字楼开会。大家到齐以后，汪说：“主席有病，没有任何娱乐，看电影也要受限制吗？你们可以讨论一下，写个报告，说明你们主张看电影。”

我回答说，医生们都不主张不要看。汪当时十分不高兴。这个会又是不欢而散。

事后吴洁同我说：“老李，可不能再忤犯汪主任了。我们的工作，没有他的支持的话，垮台更快。”结果电影仍然照看不误。

毛在这期间表现很烦躁。在床上躺一会，觉得热，起来坐到沙发上。坐不久又觉热，回到床上躺下。江青提出，给毛再做一个床，可以两个床轮流躺，就不至于热了。这时毛已经没有力量自己移动了。于是叫几个人，又抬又推，从一个床上，换到另一个床上去。我认为这样作法很危险，容易摔跤，导致骨折。

六月二十日，毛烦躁不安，一事整天换床换来换去。我怀疑他的情况有变化。

傍晚，我同陶桓乐医生告诉张玉凤，毛的脉搏早跳多，心电监护显示心肌供血不足加重。我们要张玉凤少让毛活动，尽量保持安静。张玉凤说：“我看主席同平常差不多，

发生不了什么问题。”我们告诉她，如果不小心，会发生心肌梗死。张扭头走了，说：“我看没有这样严重吧。”

到晚间七点钟，毛已经服过安眠药，正要睡的时候，换床。刚换没有多久，毛起身坐到沙发上。坐了大约十几分钟，毛又回到床上睡。这时大厅内的心电监护显示心肌梗死。

我与陶恒乐冲入卧房抢救。这时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纷纷赶来。

这次心肌梗死的范围比上次要广泛。到凌晨四点多钟，血压开始稳定，人也逐渐安静。在抢救时，将鼻饲管安放好了。毛这次没有将它拔出来。

护士人手不足，从医院又调来一批，一共有二十四名护士，分成三班~轮换。

我将医生们分成三班，每班三个人。另有两名医生轮流做心电图监护。

华国锋等四个人决定在游泳池值班。华国锋和张春桥一同值白天班，即由中午十二时到夜十二时。王洪文和汪东兴值夜班，由夜十二时到中午十二时。每天中午及夜十二时，他们交接班时，由我报告十二个小时内的病情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江青从钓鱼台搬回了南海春藕齐旁新建的住所。江很少来看毛，也很少询问毛的病情。

张耀词对我说，护士们更多接近毛，护理毛的生活，是不是由他和张玉凤主管，医生则全由我主管。我说这可以，但是现在正是病危，生活护理和医疗分不开，有关治疗必须听从医疗的决定，张玉凤不能横加干涉。张耀词不说话了。

这时游泳池内有不少药品和器材。张耀词同我说，应该由医生负责保管。我不同意，因为医生使用药品、器材，自己保管，以后出了什么问题，很难查清责任。

应该由护士保管。为了这件事，张耀词说我不听组织的安排。所谓“组织”就是指张自己。我说这种安排，不全医疗上的安全责任制。因此争吵起来。张耀词说：“不是为了主席，我不受这个气。”我说：“你可说反了，我正是为了医疗上的安全，不能听你的这套指挥。”此后，在救治毛的过程中，还发后了几次类似的争吵。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华国锋决定，医疗组在游泳池大厅内向政治局汇报发生心肌梗死和抢救的情况。此时距毛发后心肌梗死已有三个星期，虽然没有恶化，但已是无可能恢复。毛肺上的感染没有控制住，肾脏功能不好，心脏还有发生心肌梗死的可能。

会议中，江青说：“已经有过心肌梗死了，怎么还会再有呢？你们医生从来将病情说得严重，等以后治不好了，你们没有责任。主席说是有点气管炎，肺上一向是好的。也从来没有过肾脏病。你们说得这么可怕，是你们自己的思想改造得不好。医生从来就是资产阶级老爷，护士是资产阶级小姐。所以主席历来说，医生的话最多听三分之一。”

江青的这些话，使得大家哑口无言。护士们一个个低下头来。

华国锋说：“你们很努力，很尽职。我和王洪文、春桥、东兴同志四个人值班，很了解你们的工作。这三个星期平安过去了。你们再努一把力，从多方面、多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研究防治办法。我们都不懂医，只能依靠你们。用一切力量将主席治好，党中央感谢你们。”

散会以后，大家纷纷小声议论，像这样的汇报会能起什么作用？虽然华国锋的讲话，意思是给大家鼓气。但是江青的那些话，完全将医疗组当成“反动派”。

史达林死时发后的“医生谋杀案件”的阴影都沉沉地压在我们的心头上。

在汪东兴值夜班时，我将大家的顾虑告诉他。他说：“现在江青很嚣张得很，在政治局会上骂这个骂那个。七

月里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由上海带头围攻华国锋同志。工作已经难办得很了。你看乘主席没有恢复，现在把江青干掉了，怎么办？”

我说：“主席不死，干江青很难。因这主席的脑子没有糊涂，现在右眼也看很见东西了。没有他的同意，怎么能将江青干下去呢？只等到主席死了以后，才能解决江青。”

汪说：“主席死了，说不好弄了。”

我说：“那可不见得。”

汪说：“我同华国锋同志讲过。他说就怕弄不到江青，江青一跑就糟了。我说，让她跑到天边上，我也要把她抓回来。”

讲到这里的时候，王洪文进来了。我同王打了招呼，说了一下毛的情况，就回到毛的书房（这时已改成了病房）。

毛的心脏逐渐在恢复，因为已经有了鼻饲管，所以凡能口服的药物，都由鼻饲管送入。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我回到工字楼，因为疲劳不堪，躺下就睡了。突然整个楼猛烈摇动起来，我张目看到北方一片红光。住在工字楼里的医生和护士都纷纷跑到院子里，在底下叫我下去。这些天来，我实在太累了，正预备再睡下去。

这时床边的电话响了，是汪打来的。他说：“这么大的地震，你们还不快点来？”

我叫了所有的医疗人员，赶往游泳池。

余雅菊、李玲诗、孟锦云和张玉凤地震时都陪在毛身边。地震时，毛的床上下右左颠簸，屋咯咯作响，值班的医生和护士都吓坏了。外面大厅因为是在游泳池上面盖上

木板，震动得更厉害，有的地方已经翘起来。地震时毛还没有睡着。他知道是发生了地震。

汪东兴和王洪文商量，一定要将毛搬出游泳池。王洪文提出不如搬到官园的新房子去。那是在一九七二年毛大病以后，周恩来替毛盖的别墅。但毛不喜欢官园，从来没有住过。

汪便决定搬到二〇二去。我向毛说明，游泳池屋顶不结实，要换个房间。他同意了。自从毛经常换床睡以后，新制的铝合金架构的床，四脚都有轮子，搬动起来很容易。床很快就推到二〇二的一间很大的房间里。这比游泳池的书房大得多了。

各种治疗和检查的仪器都安放得很妥贴，对治疗和检查更加方便了。

当天傍晚下了大雨，又有一次地震。在二〇二这栋屋内，几乎没有任何感觉。

毛的病情逐渐稳定。王洪文开始坐不住了，他说已经给毛进口一台反光式电视机，可以将电视影像投射到一面大银幕上。又说，从香港进来了几部影片，等毛好一些以后，给毛放映。此后，几乎每天晚上要映一至二部影片。有好多次，白天的时候，找张耀词找不到，后来才知道他同张玉凤到二〇二去看电视录像片子。江有时突然跑来，这时电影或电视录像立刻收场。

我曾经同汪东兴谈过，毛仍在病危，他们这样作法，影响大家专心医治。汪说：“他们看他们的，你们治病，互不相干，有什么关系？”

但看电影的确严重干涉到医疗人员的作业。有次他们把毛鼻饲用的压力泵延长线拔走去插影像设备。我当面质问张耀词。张耀词说：“治疗主要靠你们医生护士。那些

人不懂医，一天到晚坐在那也不行。我叫他们在里面装个电铃，以后有事按电铃，就可以了。”

江青也是专门制造麻烦的人物。她每次来看毛，都带来一些批邓小平的揭发材料，叫值班医生写成核桃在的字，一篇篇交给毛看。我同江讲，值班医生事情多，而且还要不断分析变化，不能分心。江说：“主席很平稳嘛，给她看点材料，精神上有助处。”

我将这事告诉了华国锋和汪东兴，希望你们能出面阻止，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

江青知道毛的心脏、肺脏、肾脏和神经系统有病，她一再要我们分批给她检查身体，确定她没有这些病。我同她说，医生值班十分辛苦，很难抽出长时间，再做别的医疗诊断。汪东兴同我说：“江青现在是在医疗组里面给她自己物色医生和护士。”医生们最后还是给她检查了身体，江健康得很。

八月下旬，毛又有了焦躁不安的现象。他只有左侧卧，才能呼吸比较通畅，手和脚却不停地摆动，心电图监护显示早跳增加。大家研究后，调整了心脏用药的药量。虽然有暂时缓解，但是很不稳定。

九月二日下午五时，出现了新的心肌梗死。床边爱克斯光照肺像显示，两肺感染加重。同时，二十四小时尿量不足三百毫升。大家又全力投入抢救治疗。

毛的头脑仍然很清醒。他几次问我，有没有危险。我告诉他，病有些反复，大家还是有信心治好。话虽然这么说，这次的心肌梗死，比上次范围大，而全身的状况已经临近衰竭了。

九月五日，华国锋打电话将江青从大寨催回北京。当晚江来了一下，说太疲劳，就回到春藕斋她的住所，并没有询问毛的情况。医疗组的人都感觉很奇怪，这什么江会



这样对待毛呢？我将这些告诉了汪东兴。汪说：“这不奇怪。江青认为阻碍她取得最高权力的人，就是主席。”

九月七日，毛已进入垂危状态。江青来到二〇二。这时毛刚刚入睡。江不顾医生劝阻，给毛擦背，活动四肢，擦爽身粉，并向值班护士说，要照这样护理毛。江然后与每一个医生和护士握手，连声说：“你们应当高兴。”

当天晚上，江又来，找她送来的文件。因为正在抢救中，这份文件一时没有找到，江青又发脾气，说是让人偷走了。

九月八日凌晨，江青来了，说毛在一个位置上躺得太久了，要给毛翻身。值班的方医生不同意。江一定要将毛从左侧翻向右侧。结果，毛全脸青紫，呼吸停顿，我们大家直到现场，经过急救以后，才缓解。华告诉江，不要干涉医疗组的急救工作。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心电图监护示波器上显出了一条平平的横线，心脏停止跳动。毛主席去世。

终曲权力争斗立刻拉开序幕。

毛的遗体放在人民大会堂供人瞻仰的期间，我奉命出任毛的遗体保护组副组长。

组长是卫生部长刘湘屏。临时办公室设在河南厅。汪东兴那时也住在人民大会堂，负责警卫工作。我和汪东兴迁离中南海后，便不容易感受到政争的每个脉动。但华国锋会通告汪政台的所有动静，汪随后也告诉我。

汪告诉我，自从毛去世以后，江青参加政治局会议，大家对她的态度大变。汪说：“过去江青一到会场，大家都站起来让坐。会上只要江青一讲话，大家立刻安静下来，听她一个人讲，没有人敢于反驳。现在不同了，江青进入会场，没有人站起来，或打招呼，仍然各自交谈，或看文件。江青只好自己找个位子坐下来。她要求发言，没有人

听她的，大家纷纷讲话，毫不客气。这可是同过去大不相同的了。”

我的处境仍很危险。江青知道了我们没有把握能把遗体保存下来，她和毛远新双双表示你们不管这件事。看来江青要在保存遗体上大做文章。汪东兴觉得江青往后想将此事嫁祸于华国锋。这件事要是搞不好，可会吃不了兜着走。

我是遗体保护组副组长，江青自然也可对我大加攻伐。组长刘湘屏和江青接近，因此思前想后，我仍首当其冲，未来的命运阴云重重。

追悼会以后，九月二十三日午夜十二时和二十五日下午四时，江青到工字楼来看望医疗组的全体人员。江青说，要组织大家学《毛泽东选集》。她说，抗日战争以后，毛的文章主要是她写的，只不过没有写上她的名字。

江青又说：“你们都知道张学良吧。他在台湾可以上小饭馆，看电影，上礼拜堂，但是不许同别人谈话。只有一个知心的赵四小姐可以谈话。这样子活着有什么意思？我有思想准备被流放。可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有办法打倒他们。我不告诉你们我的办法。”

二十五日夜晩，我去看汪东兴，告诉了江青的这些话。

汪说：“现在江青这四个人活动得很厉害。上海已经将枪发给了民兵。迟群在清华大学组织民兵师，迟群和毛远新勾结得很紧。潘阳军区有人报告，毛远新正策划调装甲师到北京来。这些就是江青说的，她的办法。看来他们要动手了。”

我问汪有什么对策。汪说：“我已经同华（国锋）主席说，现在不动手不行了。军队由叶帅掌握，我则率领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到中南海逮捕江青四人。动手时由叶帅向北京卫戍司令吴忠打招呼，警卫师是他指挥的，

不要警卫团和警卫师打起来。”姚文无元的警卫是从北京警卫师里调派去的，因此逮捕姚的行动一定要有警卫师的配合。

汪又嘱咐我说：“你一切如常，江青叫你干什么不要拒绝。这事只有我、华主席和叶帅知道，没有告诉别的人。你要小心，各方面都稳住。另外，你不要常往我这里跑，我有事会通知你。”

我也在这决战的最后关头胆战心惊。但汪东兴的警卫团控制了整个中南海，这次的宫廷政变捉拿江青四人帮，将如同瓮中捉鳖。

医疗组的医生护士已收拾行囊，准备离开工字楼。许多人纷纷要求希望能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拍一张合影，留作这一段工作的纪念。我将大家的提议，打电话告诉了汪东兴的秘书。汪告诉我，同意大家的建议，等候通知。

几天后，我更加紧张。十月四日上午十一点钟，张玉凤跑到工字楼来，说江青让大家快些吃饭，饭后到景山去摘苹果，并且要带上《毛泽东选集》，到北海仿膳去学习。

到景山半个多小时后，大家已摘了十几筐的苹果。江青姗姗来迟，晃了一下，然后叫大家随她去北海仿膳。

到仿膳以后，江青说：“本来打算九号才找你们，可是怕你们很快要散了。今天叫你们来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

江让大家发言，但没有人说话。

江青说：“你们知识分子爱面子。昨天我去三七机车车辆厂，工人们争着发言，到下班的时候，都不走。搞修正主义的人，能办得到吗？邓小平就是吴三桂，出卖国家主权，把原油、白布往外卖。白布染一下，就要卖很多钱。主席病重，双目失明，邓小平还迫害主席，送材料给主席

看，说主席同史达林的晚年一样，有意气主席。现在还有人在跳梁小丑，让他跳吧。看他还能跳几天。”

江青的这些话，在我听来，用意十分明显。这分明是江青一夥已经准备好，要“逼宫”夺权了。

我们回到中南海前，汪东兴要大家到中南海紫光阁照像。同时华国锋来电话通知江青去中南海紫光阁照像，然后开政治局会。

江青接到电话通知自言自语说：“要开会，怎么事先不通知，临时通知？也没有说讨论什么事情。”

我们由北海赶到紫光阁。一组的全部工作人员和一中队及服务科值班人员已经都齐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及汪东兴到了以后，照了一张合影。在分散的时候，汪东兴叫了我，同我说，夜里到他那里去，有事情。

我夜里十一点钟到南楼汪的宿舍。我将白天江青在北海仿膳的讲话告诉了他。

汪说：“现在江青他们四处串连，分头活动。他们要动手了。本来想，晚一点再逮捕他们，因为主席去世还不到一个月，恐怕群众接受不了这个大变动。但是现在不能再晚了。时间越久，越容易走露消息。明天是五号，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五号了。六号晚上要在玉泉山召开政治局会，会前逮捕江青四个人，然后再进去通知政治局委员。谁反对就逮捕谁。”汪又嘱咐我，让护士全部回各自的医院。医生能回去的，也都回去，只留三、四个就好。六号以前，中南海留下的人越少越好。

我回到到工字楼已经是日凌晨三点钟了。我准备当天就解散医疗组。没想到，九点钟还不到，张玉凤通知我，江青要医生和护士们再去景山去摘苹果，然后到北海仿膳去学习《毛泽东选集》。大家随即到景山摘了两个多小时苹果。江青来了。

她同大家打了招呼，摘了几个苹果，然后通知大家到北海仿膳去学习，请大家一起吃饭。

正在学习《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汪东兴打电话找我。他十分不高兴地说：“不是已经告诉你日程的安排了吗？怎么还不让护士们回去？”

我告诉他经过的情况。他说：“好吧。你安排护士们回去，全体医生到国务院小礼堂会议室，华（国锋）总理要你们报告主席去世的情况。参加听汇报的还有我和洪文、春桥同志，江青同志也参加。”

九月二十二日的医疗组政治局汇报没有完成。我想这次的会议是华国锋故布迷阵，不使江青等人起疑心的作法。

江青一进国务院小礼堂会议室就问华国锋，为什么不早通知开这个汇报会。华说，上次在人民大会堂开汇报会，没有开成（见前文，此会被许世友打断），让医生们正式汇报一次，再向政治局报告。

华说：“毛主席去世已经二十六天了。他的发病、抢救和去世情况，还没有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报告。现在要大家向我们在主席病中值班的四位政治局委员和江青同志，正式汇报一次。汇报完了以后，你们写一份详细的病情经过报告。你们每个人签上名字，报给我们。我们签名，再报中央政治局。”

这份书面报告，我们早已经写好，而且大家都已经签了字，由我宣读。

正宣读一半的时候，江青立起来，向华国锋说：“国锋同志，我身体不好。听病情报告，听不下去。好在是由你们四位负责值班的。我请假先走了。”

说完以后，江青向门口走去，走时似乎喝醉一样，东倒西歪。我叫了几声服务员，没有人走进来。我只好立起来，扶住了她。

这时我看到汪东兴对我直瞪眼，并且轻轻地摇头。我明白这是他向我打招呼，不要扶江青。汪后来告诉我，华国锋认为我去扶江青，是向江青讨好。我辩解，只有这样，江青才不会感觉到要发生什么事。汪后来同意，那时扶扶江青也好。

江青走后，继续汇报。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张玉凤这时连续催促医生们去北海仿膳吃饭，因为江青在那里等。我们都无可奈何，只好散会。

六月上午，我同剩下的几位医生正在整理病历纪录，张耀词打来电话，叫我把护士们全找回来，江青要跟大家照相。我感到十分困难，五日已将护士们遣散，临时找非常不好办。我问张，这件事汪东兴知不知道。张说，汪在睡觉，还没有报告给他。我让张自己同卫生部办公厅交涉。张说他没有时间，还是要我办。我通过卫生部办公厅，找到了这些护士，同江青照了相，又送她们回去。

后来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这张合影成了护士有勾结的证据。张耀词一口否定是他通知照相的。汪东兴出面后才算了事。

六月晚上八点钟，华国锋叫所有政治局常委和负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江青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华国锋告诉江青等四人，要他们在玉泉山向政治局汇报《选集》的提议。

华国锋和叶剑英早已到了。汪东兴不是常委，他躲在隔壁。

张春桥先到，他的警卫员和秘书都被留在外面。张进来后就由华国锋宣布，将张逮捕。王洪文后到，当华宣布逮捕他的时候，他原来要挣扎，但是两名警卫团的干部将他按住，他全身松懈，已经立不起来了。

当晚十点，姚文元仍未到怀仁堂。由汪派警卫团会同警卫师的人，到姚的家里将姚逮捕。

张耀词带领一中队的人到春藕堂，逮捕了江青。江青当时说：“我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

逮捕行动发生时，我在工字楼的房间里。那晚中南海一片寂静，没有任何骚动足迹象。第二天，一位在警卫团的朋友告诉我，逮捕了江青四人帮，还有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人。

四人帮分别监押在五一九工程内一处小房间内，由八三四一部队派人看守。四人帮被逮捕后，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前往玉泉山怀仁堂通知所有的政治局委员。

没有人反对。

七月我回到家里，此时逮捕四人帮的消息仍未公布。长年以来，我终于第一次睡在自己的床上。我告诉娴，江青这由个人已经被捕了。她惊喜过望，说这下可好了。我说，江青是被捕了，可是政治局还有人说，毛是被害死的（许世友就是一个例子），事情并没有完。共产党内部斗争不会完结，总会有人拿毛的死亡来作文章，我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我新近也树敌不少。张耀词曾明白告诉我，要不是为了毛，他早就整剑我了。

现在毛死了，我完全无依无靠。汪东兴虽然将逮捕江青的计划透露给我，但汪认为我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汪现在权力日大，不再需要我了。

我和娴带着两个孩子，到西长安街的鸿宝楼吃了一顿烤鸭，表示庆贺江青四个人坐了监狱。

一九七七年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又展开了。领导干部大批前往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那时我仍是三〇五医院的院长。张耀词终于伸出他的魔爪。汪东兴和张耀词二人要我去江西省进贤县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那年我五十九岁。我在江西待了一年多，过着农民般的劳动生活。

北京共产党内部斗争不断。一九七八年十月，邓小平东山再起，张耀词和汪东兴因文革期间对邓在中南海内被批斗袖手旁观一事而遭到免职。邓小平一直没有搬回中南海。我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回北京三〇五医院复职。

但我仍受谣言所困。我与汪东兴以前的关系过于密切，许多压力要我揭发汪的过去。如果汪东兴犯了政治罪行，我也有份。

毛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变得莫衷一是。我的过去与毛息息相关。如果毛有任何过错，我也必须分担。有些人说，毛的专任医生对毛的影响太大。反对毛的人说，医生们在救治工作上做了过多的无谓的努力。支持毛的人则指控医生们尽心治疗。

政治斗争仍在上演，此期间毛的死因一直传闻不断。当初值班的四名政治局委员——华国锋、汪东兴、王洪文和张春桥，两名去职。在中共中央内，没有人证明医疗组的工作无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我写信给邓小平，要求解除三〇五医院院长的职位。我在医院里无法发挥所攻，抑抑不乐。最后我在中华医学会挂名副会长。

由于邓小平的“开放”政策，我有多次机会出国访问。一九八八年夏天，我请示前往美国探亲，看看我两个儿子。赵紫阳是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中国那时正值最开放的时期。我获准离境。



我是为了娴来美国的。我们共渡的苦难岁月终于使她倒了下来。一九八八年二月，娴发现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中国的医疗对她帮助极小，娴病势日趋严重。八月中旬，我与娴带着孙女到了美国的芝加哥，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团聚。我们希望美国的先进医术能治好娴的病。娴住院治疗，经过多方抢救，终于因为肾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

娴临终前说服我写这本书。在医院中，娴陷入最后几天的昏迷之前，一再叮嘱我，为了我们的后代，一定要将这二十二年的亲身经历笔之于书。我为此已付出的代价是我一生的年华和爱妻的生命。

一九九〇年，中央警卫局写信来表示要没收我的房子。我坚持不同意。一九九二年，他们还是将房子收回。我分别给前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央警卫局长杨德中、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及总书记江泽民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

我将一生献给毛和中国，但我现在成了真正的无产者。我用哀痛的心情完成数十万言的著作。我写这书，是为了纪念与我患难与共的爱妻娴，也将它献给所有珍惜自由的读者。

唉，闹了半天就为了套房子……

注释：

汪东兴直到一九八〇年二月才被正式免职，被迫辞去党副主席及政治局常委职位。

# 毛泽东之死

——《毛泽东的晚年生活》〔节选〕

【摘自《大地》1992年第8期】

郭金荣

十六、他默默地仰望天空

又是一个夕阳残照的黄昏。宽敞的卧室里依然那样沉静。

毛泽东半躺半靠在那宽大的床上，不知一本什么书吸引了他。他已经一个多小时一动不动了。

小孟坐在沙发上，正在翻看当天的报纸，也许是翻动报纸的细微声音惊动了毛泽东，也许是毛泽东感到了疲劳。他在床上转了个身，顺手把书放在一旁。

正在翻看报纸的小孟，大概是护士职业养成的习惯，毛泽东这一不大的动作和声音，使她马上察觉。她顺着声音望过去，此时，毛泽东正在望着她，她刚要站起来，毛泽东却向她做了个手势，把手向下按了两下，意思是让她坐下来。然后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问道：“报上都有些什么新闻啊？读一段听听，不过，我可不要听什么大批判的成果，要听新闻”。说来也巧，当时小孟也正在看一段新闻，主席的这个要求，也正中下怀。

“您要听新闻，这儿正好有一段，我正想做个记号，等您不看书的时候，读给您听听呢”。

“噢，一个想读，一个想听，巧合，巧合，你就读读看。”

“新华社长春1976年4月21日电：最近，在我国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

“今年3月8日下午，宇宙空间一颗陨石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方向，以每秒十几公里的速度坠入地球大气层中。由于这颗陨石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的摩擦，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发光、成为一个大火球，于8日15时01分59秒在吉林市郊区金珠公社上空发生爆炸。陨石爆炸后，以辐射状向四面散落。”

读着读着，小孟突然发现主席坐了起来，这可是从来没见过的事。

记得有一次，唐闻生送来一份文件清样，读主席接见外宾的名单，因为这个外国代表团是文艺团体，而且有xx夫人参加，所以列上了江青的名字。小孟读完名单之后，只见主席点头同意。后来，秘书问起此事：“主席听到江青的名字，没有提出去掉？”

“没有啊，反正我是念了江青的名字。”

“也许主席没听清吧，他一般不会同意江青去接见外宾的。”

好多次读文件、读报纸，主席都是听听而已。一般他总是静静地听着，很少发表什么不同意见，也很少改变或卧或坐的姿势，所以小孟感到，主席对给他读的东西，多半没有什么大兴趣。

而这一次，主席坐起来听了。小孟感到有些奇怪，忙放下手里的报纸，准备去问主席有什么事，但主席又是用手势制止了她，并说：

“读下去，我在听。”

小孟又接着读起来：

“大量碎小陨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区……最大的三块陨石沿着原来飞行的方向继续向西偏南方向飞去……最后一块陨石在15时2分36秒坠地时，冲破1.7米厚的冻土层，陷入地下6.5米深处，在地面造成一个深3米，直径2米多的大坑，当时震起的土浪高达数十米，土块飞

溅到百米以外……最大的三块陨石，每块重量超过了100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目前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1078公斤）。这次陨石雨，无论是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都是世界上罕见的……”

小孟读完这段消息之后，又开始读另一段新闻，主席马上说：

“小孟，就读到里吧，不用再往下读了。”毛泽东边说，边穿上了拖鞋，小孟上前搀扶，他慢慢地向前走去。

看来，毛泽东被一种情绪笼罩着，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思虑，一种不安，一种激动。

毛泽东在屋里走了几步，让小孟把窗帘打开。这又是很少有过的要求。毛泽东站在窗边，望着那夕阳渐落的天际，望了很久很久，望得那样出神。

小孟见主席转过身来，便问道：

“主席，天上怎么会一下子落下那么多的石头呢？也太巧了，还没伤人。”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回答小孟的提问：

“这种事情，历史上可屡见不鲜噢，史有明载的就不少，野史上的更多了。”

看来，今天主席很有兴致，他又问小孟：

“这方面的记载你见过没有？你们家里人有什么说法？”

小孟摇摇头，她也只能摇摇头，因为她对此确实了解得太少。

“这方面的记载我没有看见过，小时候，听我妈讲过，在我们家乡的一个村边上，一天夜里，突然掉下了一块大石头，有磨盘那么大。后来，这块石头，又被风刮走了。咳，都是瞎说，我才不信呢。”

“噢，你妈妈讲过这样的事，你还不相信。”

“我是不相信，您能相信？”“我相信噢，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化，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

毛泽东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

“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少有的感慨，少有的激动。

毛泽东似乎压抑了自己的激动，转换了个平静的语调：

“不过，要是谁死都掉石头，地球恐怕早就沉得转不动了……”

毛泽东又在屋里走了几步，然后坐在沙发上又问小孟：

“我说的这些，你信不信呢？”

小孟看了主席一眼，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还是不信，那全是迷信，是古人瞎编的。”

小孟说完之后，似乎又觉得没有把握，她也很想听听主席的看法。于是，她又好奇地反问：

“大人物要死的时候，天上会掉下大石头您真信吗？”

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

“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

像是回答，又像是提问。

陨石雨的这一则消息，后来在民间，在老百姓那里，确实引起了不少传说，不少议论：

“这陨石雨，可是百年不遇，听说落下了三块大石头。这三块大石头，就是说中国必有三个大人物要归天了。”

“可不是嘛，三个领袖，周恩来、朱老总、毛主席，

都是1976年逝世。”

“那块最大的陨石，1700多公斤，就是象征着毛主席……”

“那些小的陨石，就是指唐山大地震死的那些人。”

“还真灵验呢。”

“你不能不信，有道理，我看也是这样。”

……

1976年底，陨石雨的消息，还在人们中间这样议论着，解释着。

1976年4月22日，毛泽东听到陨石雨消息的这一天下午，他不止一次地站到窗前，望着渐渐昏暗下来的天空，每次时间都很长很长。

仿佛那神秘昏暗的天空上，有谁书写了只有他才读得懂的文字。

十七、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

1976年7月28日凌晨。

毛泽东安安静静地躺在他那张宽大的木制床上。他均匀的呼吸，那安详的脸庞，那微微张启的双唇，使小孟感到毛泽东今天睡很舒坦，她放心了。

自从7月中旬以来，毛泽东的睡眠总的不好。本来，多少年了，包括那些远逝的战争年代，毛泽东的睡眠就是个大问题。国事、家事、天下事，搅得他常常彻夜难眠，他苦苦地思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在屋里来回踱步，就这样，送走了一个个黑夜，迎来了一个个明天。当然，这种情景是指他早已过去了的壮年时期。为了能入睡，曾想了各种办法。睡前散步，看书看报，吃安眠药，由医护人员按摩，这已经是多年来所采用的办法了。

进入80高龄的毛泽东，入睡，更成了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小孟来到毛泽东身边防工作之后，也常常为他的睡眠而发愁，使他能睡好觉，这成了小孟的一个很重要的护

理任务。不然，如果他睡不好觉，必然要有一系列连锁反应，脾气烦躁，饮食不好，心肺病，脑系科病加重。自小孟进中南海以来，在她的记忆中，毛泽东每天都要服安眠药。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小张、小孟，再加上毛泽东，三个人每天都服一种药，有时毛泽东看小孟吃药，便说：

“怎么，服安眠药，看来是近朱者赤噢，受了我的传染。”

小孟边吞药，边说：

“那可不是，现在吃安眠药都成了瘾，不吃简直睡不着了。”

当然，小张小孟服药的目地是为了抓紧时间休息，每次一共四小时的睡觉时间，若不马上入睡，就很难保证一定的睡眠时间了。

毛泽东服安眠药已有多年的历史，甚至对种药已产生了抗药性，有时不得不超剂量地服用。方能生效。为此小孟曾对他说：

“主席，您天天吃安眠药，会不会产生副作用？听说，总服这种药结身体不好呢。”

“孟夫子说得对，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只能用这种办法噢，任何东西吃了都有正、副作用，只要正作用大，那就可以取之。”

毛泽东很难一气睡上四五个小时，能连续睡上两三个小时也就很不错了。

今天，看到毛泽东睡得好，小孟心里简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不然，她又要在本上写下“7月28日1点 - 4点，睡眠不好”的记录了。看见毛泽东睡得那么酣畅，小孟忽然想起了以前秘书曾给毛泽东提的建议：

“主席，您睡觉之后，是不是可以由护士长来看着您睡觉，护士长比我们的经验多，更会护理。”

毛泽东听了秘书的话，摆摆手说：



“不行，我不放心。”

小孟当时听了这话，心里感到奇怪，有什么不放心呢？打针都可以，护理着睡觉不行？

一年多来，小孟倒是发现了毛泽东的一个特点，毛泽东身边用的人，都是他自己认识的人，他熟悉的人，他自己用惯了的人，他就信任，不是他自己认识的人，他一般不同意用，而且他也不喜欢身边有很多人。小孟又想起另一件事：

有一段时间，小孟感到毛泽东总有一种寂寞孤独的情绪笼罩着他，有时卧室里，大厅里总是让人感到一种沉闷，缺少活力，缺少欢声笑语，毛泽东自己看来并不喜欢这样，所以他自己除了读书，批文件之外，常常让小孟、秘书给他讲点笑话，而小孟又不怎么会讲，一个笑话也不能讲多少次啊。这样，她有一次，便也给毛泽东建议，我看您应该多找几个护理人员。省得您一睁眼，不是小张，就是小孟，人多了，热热闹闹的，今天小张给您讲讲这个，明天小王给您讲讲那个，小张，小冯，小李，都来说说笑笑，那多好。省得您这儿老那么静。毛泽东听了小孟的建议，马上回答说：

“静有静的好处，动有动的麻烦，还是那句老话，甘蔗难得两头甜嘛。”

小孟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也摸不透他是怎么回事，也就不再提出这样的建议。

今天，小孟又出现了这种想法。她想着想着，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忽然，小孟觉得有人在用力摇她的椅子，她被惊醒了，马上站起来，发生了什么事？耳边传来了玻璃震动的哗哗的响声。她发现卧室里的窗帘正在抖动。她往毛泽东的床上一望，看见他依旧躺在那里，很踏实，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只不过，已经睁开了眼睛，神态像是在想什么。

当小孟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护士小李、小俞已经从卧室门口进来了，实际上是急忙跑进来的。只听小俞慌里慌张地说：

“小孟，地震了，大厅里的窗户震得好响。主席怎么样？没事吧？”

按平时的规定，她们不得允许是不能随便进入毛泽东卧室的，但今天是特殊情况。也就顾不得这些了。

也不知是谁的主意，小孟她们几个人，从毛泽东床边的小柜子里拿出一条床单，几个人一人抻一个角，撑在毛泽东床上面，为的是怕天花板上掉下什么东西砸着他。她们一声不响地抻着，几分钟过去了，毛泽东又睁开了眼睛，翻了翻身，他好象忽然发现了自己头上面的那条床单，那条白色的细棉布床单在他头顶上面抻着。他略微转动头，向上面，向左右看看，他有些奇怪了，微微一笑，然后说：

“怎么？抻床单做什么？”

小孟听见毛泽东笑着发问，便马上回答：

“主席，刚才发生了强烈地震，小李他们吓得不得了，赶快跑来，保护您呢。”

毛泽东听了，似乎觉得十分好笑，又很好玩。他不慌不忙地说：

“地震了，越震我倒睡得越香噢，这叫地震不醒安如山嘛。”

小孟说：“我们都紧张坏了，您还有心思开玩笑。”

小俞说：“主席，这次地震可厉害了得很，比邢台那次感觉明显多了。”

“总有一天，会天塌地陷，自然规律么，不用怕。”

“您什么都不怕，我们可害怕死呢，可能还要有余震呢。”

小李也补充了这么一句。

“怕也好，不怕也好，我看你们抻着单子倒没必要。

房子塌下来，一条单子能顶住？”

毛泽东做了个落下来的手势，他用手向下挥了两下，几个工作人员才把单子放下来，叠 = 好放在一边。她们也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莫名其妙。

大约4点59分的样子，张耀祠来到了毛泽东的会客厅。他通知小张小孟：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根据预测，近期很可能还会有余震。主席目前住的房子不太牢固，需要让他马上搬家，搬到新建的202房间去。那所房子安全些。

毛泽东现在住的房子，被称为游泳池。游泳池的住所是60年代用毛泽东的游泳池改建的，房子的四面都有宽大的玻璃窗，毛泽东卧室里的窗户位置很高，平时全用白色帷幔挡住。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和一些熟悉毛泽东的中央领导同志，都知道毛泽东的住处叫游泳池。“游泳池”已成了毛泽东住所的代称。这所房子，他已经住了十几年了，据测不甚牢固，所以又给他盖了202新房，早在地震之前就几次劝他搬家，但他始终不肯。

唐山大地震之后，小孟根据张耀祠的意见，对毛泽东说：

“主席，汪东兴、张耀祠都来过了，他们讲了这次大地震的情况，还讲您现在住的这所房子不太结实，可能还要有余震，希望您赶快搬家。”

毛泽东听了这话之后，对搬家的事没有表态，只是紧接着问：

“这次地震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简报？”

小孟听到毛泽东询问有关地震的情况，她便赶紧把刚刚送来没多久的一份简报清样拿来给他读了一遍：

“……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烈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7.5级，震中

在北纬39.4度，东经118.1度，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毛泽东听了之后，显出一种少有和焦虑，小孟赶紧说：“您不怕，我们还害怕呢，您也不替我们想想？”

小孟故意用这样的话去激毛泽东，没想到这办法还真灵验，毛泽东听了这话，没有摇头，也没有摆手，而是闭上眼睛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

“你们怕，那就搬吧。”

毛泽东终于被说服了。他同意搬家的消息，几分钟后就传到了汪东兴、张耀祠那里。二十多分钟之后，搬家就开始了。所谓搬家，其实，比一般人搬家简单多了。202那所房子，虽然毛泽东一直未搬进去住，但一切都是按随时赤住在管理着，每天打扫卫生，开窗换空气，调节温度，里面的一切设施齐备，只要进来就能住。

1976年7月31日上午，毛泽东搬进了202新房。这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的第三天，但在这里住了不到40天，他就永远离别了尘世。

#### 十八、走向人生的终点（上）

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大多数的人始终认为：毛泽东每天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毛泽东永远是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毛泽东总是如人们在书报上看到的照片那样，经常伏案执笔，批阅文件，在会议室里开会，在工厂家田头视察……

直到1976年9月9日，人们才在不知所措的茫然中结束了这种想法。

其实人们从报纸上，从荧光屏上，从一切宣传的窗口中里，都看不到毛泽东晚年真实的工作情况。

人们只知道，领袖人物，特别是早已被神话了的毛泽东，在决策着国家的一切，在主宰着人民的命运。毛泽东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对历史酿成巨大的波浪，他的任

何一个意念，都会形成滔滔洪水，一泻千里。

在中国这样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在20世纪70年代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具有特别的权力，特别的威望。他在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们的心中，是生命、是希望、是光明、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人们没有完全猜错，毛泽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依旧在工作着，只不过他的工作方式、工作环境已截然不同了。

有一批国民党的将领要特赦。关于此事的文件，名单在1975年12月份就送到主席这里来了，请主席批阅。主席很快就进行了批阅，主席批阅之后，便把文件放在了柜子里，按常规，要等1976年春节时再正式发下去。

快到1976年元旦了，有一天，主席忽然向秘书提起这个文件的事：“关于特赦的文件发下去了吗？”

“没有，应该是春节前发”

“为什么要等春节呢？可以在元旦发嘛，既然决定了，我看早发比晚发好，人家可是度日如年噢。”

毛泽东的最后日子里，他总是去做他觉得应该是他做的工作，包括不断地会见外宾，只要秘书工作人员转告他，外宾请求接见，毛泽东从不拒绝，即使身体状况很坏。在他的头脑里似乎总是盛情难却，而没有量力而行。

最后一次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就是一例。布托已经来几天了，一直等待毛泽东会见，但由于主席身体状况不允许，所以一直没有安排。当布托马上要离开中国，又一次提出见毛泽东时，主席的秘书便不得不把这种要求向主席报告，果然，主席毫不犹豫地地点头同意。其实，当时主席刚吃了安眠药，正犯心脏病，但主席依旧同意安排。因此，才出现了接见时面部表情麻木，直流口水的样子，也因此泄漏了毛泽东身体有病的绝密，这已是无法隐瞒的事

实。

病魔缠身的毛泽东感情依旧细腻丰富，他依旧惦念着亲人，怀念着故交，关心着朋友。女儿来看他，他会久久地深情地拉着她的手，用他不清晰的语音叙别话旧。朋友来看望他，也会引起他的欣喜，引出不少话题。他在最后的日子，也曾关心过金日成。

也许，毛泽东与金日成有着特殊和友情，有着特殊的情感。毛泽东生日时，曾对金日成送来的大苹果久久凝视，寄托一种异样的情思。当毛泽东听说金日成眼睛患病时，特意派曾给他治过眼睛的唐由之大夫去给他治病，那几天晚上，每次都有金日成治病的电报发来，主席总是认真地看。在朝鲜，在这片并不十分遥远的国土上，牵动着毛泽东的情感。

1976年9月8日晚，就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个小时，他还要来了日本三木武夫的电报看了，他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刻，他的心，依旧在想，依旧在思索，他的眼睛，依旧在看，依旧在环视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他不甘心退出，他不愿意退去，他要竭尽全力。

毛泽东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直至他的昏迷——1976年9月8日晚上八时十分。

毛泽东的身体日渐恶化，这是医生们，周围的工作人员早已看到了的事实，而且已是无可挽回的趋势。

十年动乱，林彪的出逃，陈老总、周总理的相继去世，一系列的事件对毛泽东来说，不能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虽然，作为一个领袖，他对一切都很有远见，但他也毕竟具有常人的肌体，他的生理机能也早已开始退化了。

1976年5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这次会见，使小孟、小张大为紧张。本来，因看到主

席精神尚可，才同他讲了李光耀总理要不要全见的事，他当即答应会见，这已是常规了。

那天上午，主席的理发员小周给他理了个发，又刮了脸。在会见前的一个小时，小孟从主席专用的大衣柜里拿出了那套灰色的毛式服装。

“主席，您今天还穿这套衣服吧？”小孟说。

“就穿这个，不穿这个，穿哪个吗？”主席点头回答着。

小孟帮主席脱了睡衣，换上中山装，穿好后，又前后左右地看看，抻抻拽拽把衣服拉得平平整整。看看毛泽东接见外宾之前的样子，小孟反而感到有些新鲜了：头发整齐，服装笔挺，真显得精神多了。

平日的毛泽东，多数是躺在床上，多数是穿着细白布睡衣。头发不理，很有些不修边幅，简直使小孟就感慨不到他是个众目睽睽的一国之君。

“您现在才像个主席了，平时，您哪儿像个主席呀。”小孟象是在开玩笑地说。

“他就是扮成个呢，一扮就像，别人谁也扮不像。”小张刚刚从外边走进来，也打趣地说。

“我去接见外宾，就像演员登台，哪有不化装的？”主席也开着玩笑。

时间到了，小张小孟一边一个，搀扶着毛泽东，走到游泳池会见大厅。他刚刚坐下来一两分钟的时间，李光耀已由华国锋陪同来到大厅，小张小孟把主席扶起来，她俩赶紧退后，隐到屏风后面，为的是不让录像里留下工作人员搀扶的情景。但主席刚刚站起来与李光耀握完手，扑通一下就坐下了。当时小张小孟在屏风后面看得很清楚，不约而同地小声“呀”了一声。会见只有一两分钟、寒暄几句，便匆匆结束。

小孟小张很知道主席的病情，他经常两腿发软，无法

站立，这次突然坐下，是实在无法支撑的结果。早知这样，就不让主席安排这次会见了。

但是，这还不是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有一次，主席会见外宾时，为了怕让外界知道他的健康状况，而不得不把鼻饲管和氧气管拔掉。其实，他早已需要靠这种管子来维持他的生命了，但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如此，不可能完全真实，也不可能永久虚假，许多真实中有一点虚假，或许多虚假中有一点真实，这都是客观存在的。

毛泽东自己也同意把管子拔掉，尽管这会很不舒服，会因缺氧而发闷，但他也不愿用带着插管的形象去见外宾，去公之于众。

这次会见外宾时，等外宾进来的前两分钟才把插管拔掉，他的嘴唇立刻有些发紫，小孟问他：

“您感觉闷吧？”

“有点闷，还可以。”

外宾来了。小张和小孟本来是一左一右地搀扶着毛泽东。小张在右边，小孟在左边。外宾一出现，当摄像机对准主席和外宾的时候，按照惯例，小张和小孟赶快撤走，躺进屏风里面，但这次，小张把手右边的手抽走了，当小孟把载边的手也要抽走时，她感觉主席用胳膊夹着她的手，意思是不要抽走，这样，主席用右手和外宾握了手，而左手还是扶着小孟，就因为这样，新闻纪录片里也留下了小孟的形象。

十八、走向人生的终点（中）

很快，新华社送来了照片和电影片，小孟看到自己也在画面上出现，觉得不合适。她知道自己是个护士，不想过多露面，因而，下次再接见外宾时，她与小张换了个位置，她在右，小张在左。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又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这次会见，毛泽东没有站起来，只是坐着与布托会面。但此时的毛泽东已明显地让人们看出，他面容憔悴，表情麻木，行动不便，更严重的是，他的口水不断从嘴角流出，需一次又一次的取纸擦拭。

封锁极为严密的关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信息，已经不得已而透露出来。

人们从电视中看到了无法再掩盖的真情。

有一个中学老师，看了这个新闻报道的电视和报纸的照片之后，在底下与另一个老师（还是一个比较要好的能说知心话的老师）谈论了几句：

“主席接见外宾时直流口水，好像眼睛都睁不开，看来身体有病。”

“报纸上登出来的照片，也看出身体不太好。”

就是这么几句对话，也在组织动员的交心，向领导揭发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的强大攻势下，交了出来，这就是天安门事件之后的追查活动中出现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会见布托，是他在生命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见。

1976年7月底发生了唐山地区的大地震之后，毛泽东的身体更加恶化，他虽然也还是每天看书，但常常处于昏迷状态。

毛泽东在最后的日子里，依然是既不愿打针，也不愿意吃药。他依旧相信，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能战胜疾病的道理。他依旧坚守着治病也要“自力更生”，因为用药打针，是“外援”。

但越来越虚弱的身体，使他固守的道理已是处于失败，他几乎是水米不进。在医生的多次劝说下，才同意用了鼻饲插管。这种插管很细很细，是从国外进口的。可以从鼻子一直插到胃里去。以此输送营养，维持生命。

“主席，您别老不听医生的意见，人家刘伯承身体不

比您好，用了鼻饲管，效果特别好，您老说靠自己的抵抗力，您没有营养，怎么有抵抗力呀。”

有一天，小孟又对主席进行了一番劝说。

主席这次听了之后，睁开他微闭的眼睛，然后轻轻说：“那就试试吧！”

插上鼻饲管之后，他果然在第二天，感到身上有点力气了。他显出高兴的样子。

“小孟呀，你比我懂得多，我得听你的了。”

已经很少说话的主席，今天显得有些精神了。他已经有五六天都不说什么话。

“您就得和医生好好配合，您的病会治好的，您不是听我的，要听医生的。”

1976年6月中的一天，小孟请假外出回家，去看她已经好久未见面的丈夫，近在咫尺，远在天涯。小孟的丈夫小裴就住在府右街西侧的102号，与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但小孟的工作性质，使小裴常常独守空房，异常寂寞。小孟是晚上5点多钟才到家，二个人情深意切。不知有多少话要说，但又不知从哪方面谈起。

7点15分，突然有人来找，要求小孟马上返回中南海。

小孟回到主席的卧室，才知道，主席犯了病，心肌梗塞，十分危险。只见主席的脸色灰黄，嘴唇呈现青紫，呼吸短促，主席的几个医生都来了，政治局的人也来了，气氛相当紧张，奋力抢救，二十几分钟之后，才脱离险情。

主席和心脏又开始了正常的跳动，每分钟由原来的110次变成了80次。他平静地躺在那里，不一会，又睁开了眼睛。

政治局的几个委员们一直守候在毛泽东身边，看到他睁开了眼睛，委员们一个个上前探望。

张春桥从他前面走过了，姚文元从他前面走过了，王

洪文也从他前面走过了，华国锋……吴桂贤、倪志福、许世友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局委员们都是从他面前过去了。毛泽东只是似看非看的望着他们一个个身影。他是那样无动于衷。无情可动，是他未从病态中缓解过来，还是不想去思考这眼前的事情，人们不得而知。

但当叶剑英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抬起了那双显得又沉又重的胳膊，他的手颤颤地抖动了几下，嘴微微地动了一下，细微得让人难以发现。

还是小张看出了毛泽东所表达的意思，她毕竟太熟悉毛泽东的一切了。毛泽东这些动作表示，他想与叶帅说话。小张的分析是正确的。

小张走到已过去的叶帅身旁说：

“叶帅，我看主席是想和您说话，您去问问看。”

叶帅点点头，又走到了毛泽东的身边。他这次离毛泽东很近很近，叶帅俯下身来，低下头看着毛泽东，毛泽东的眼睛突然显得明亮起来，他那本是黯然无光的眼睛，很久没有这样的光芒了，眼睛是心的窗口，他的心里一定翻动着什么，但他的嘴已是力不从心了。只见他嘴唇在张翕着，但很难听也他的声音。叶帅拉着毛泽东的手，紧紧握住，不停地向他点头。

毛泽东对叶帅讲了些什么？是对他表示了永久的别离之情，还是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还是对永远过去了的岁月的回忆？

毛泽东对叶帅曾有这样的评价：“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曾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关键时刻，起到了别人所不能代替的关键作用。

毛泽东自知已不久于人世，他在这个时候，或许会意识到，中国又将面临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真是这样，是否又要叶帅这样一个关键人物来起关键作用呢？

此时，叶帅办能拉住毛泽东的手，但无论如何，也拉

不住毛泽东的生命。

毛泽东，从8月底直至他的谢世，多次昏迷，多次抢救，在昏迷与抢救的过程中，他渐渐向着另一个世界走去。

谁也无法真正知道，濒临死亡的前几分钟，几秒钟，他真实感受是什么，除非他死而复生过，那他自己也许会说清楚。

9月8日晚7时，小孟来接班，几天来，政治局的常委及委员们，一直在轮流值班，医务人员一直在身边观察毛泽东的病情，量血压、测脉搏、导尿、听心脏、输氧气，不停地进行着。

这时江青也来了，这时，她的到来，不用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毛泽东已没有批准与不批准的精力了。她可以作为家属随时来探望。江青来探望，并不在毛泽东的眼前，而是在其身后，因为在这之前，江青出现的时候，毛泽东只要清醒时，总是有反感烦躁之清，为了不引起新的刺激，江青就在背后看看。

7点10分时，毛泽东的呼吸急促起来，小孟过来，低头给主席按摩胸部，主席用很低的声音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医生赶紧把氧气的管子放在他的鼻子处。他用手去拽，肯定是不舒服，过了几分钟呼吸开始平静起来，这时，医生看见主席的鼻孔里有一点嘎巴儿，就把输氧管先拿下来，用棉花签给他弄出来之后，又给他戴上输氧器时，他就一点反应也没有了，又是处于极度的昏迷。抢救，抢救，四个多小时的抢救，但一直是昏迷，他再也没有醒来。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小孟说的：“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1976年9月9日零时。

毛泽东的卧室去大厅的走廊通道上，那宽宽的通道里，电视荧屏正显示着毛泽东心脏跳动的情况，一道波浪

式的曲线在起伏，在抖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所有常委，所有委员们，毛泽东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静静地注视着荧光屏上的这条曲线。他们没有表情，没有话语，没有判断，没有猜想。

华国锋静静地目视前方，  
王洪文眼睛在不停地睁闭。

张春桥一副冷静的神情，  
汪东兴眉头微皱。

.....

平静、木然、无言、沉默，这也许只是外在的表现。

0时10分，荧屏上的曲线突然变成了一条直线，一条微微抖动着的直线。

十八、走向人生的终点（下）

委员们，工作人员们，家属们，一切在场的人们立刻打破了沉寂——向前倾身，睁大眼睛，死死地盯住荧屏，小声议论。迟疑着迟疑着，判断着。这条直线，这条由曲线变成的直线，表明什么？几分钟过去了，荧屏上一直是一条直线，一条仍在微微抖动着的直线。

毛泽东先停止了呼吸，继而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条直线表明着。

一个护士从毛泽东的卧室里走出来，走得那样轻，她向外边等候的人们说了一句：“主席去世了”。

她的话也说得那样轻，几乎看不出她嘴的动作，仿佛这声音是从口腔内部发出的。

人们一齐走向卧室。

十几分钟之后，医生们退去了，政治局的委员们退去了，家属也退去了。

汪东兴、张耀祠告诉小孟小张，留下来把主席的遗物整理一下。

委员们，家属们都开会去了。

小孟拿起床头小桌子上的那几份文件。那几份主席最后批阅的文件，放在文件袋里。她又拿起那本依旧打开的“三木”的书，轻轻地把它合上了。在这本书上，留下了毛泽东的最后的目光，留下了他最后的思索，留下了他最后的情感。

小孟向毛泽东的遗体望了一眼，她又把目光投到了那本“三木”的书上。她仿佛要在这本书上找到主席留下的目光，留下的思索，留下的印迹。

她悄悄地把主席读过的最后一本书，放在床侧的书柜里。她放得那样轻，那样小心，那样心细，生怕自己的稍重的动作，会抖掉毛泽东在上面留下的痕迹。

小孟把主席最后换下来的内衣服、内裤，叠得平平整整、放在床头的小柜子里。

小孟把主席用过的铅笔拿起来，细细地看着，小周给主席削好的这支铅笔永远不会再被人用了。她真想拿去做个永久的纪念，但她这种念头闪现的同时，一种指责声已在她耳边响起：“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行，不能办这种事情。”

她把铅笔轻轻拿起，又轻轻放下，依旧放在小桌子上。

在主席床头的书桌上，她发现一本厚厚的鲁迅选集，不由得翻了几下，忽然发现里面有一封信，一封没有装在信封闭里的书信。这是李敏写给毛泽东的信。爸爸：

您好，您近来身体怎样？女儿十分惦念，您让我读的这本鲁迅选集，我已经都读完了，什么时候，我想和您谈谈这些杂文的看法，这本书里您画了不少符号，写了一些评注，我都仔细看了，但有些地方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我想抽空找您问问。

祝

愉快

您的女儿李敏

1975年4月15日

小孟把这封女儿李敏给父亲的信又夹在书里，放回了书柜。她们做了些简单的整理，就不知还要整理什么了。

主席的卧室里，此时是这样的空旷，这样的寒冷，从未有过的寒冷。一向是23度的恒温已降至了零度，从空调机里送来的快速风吹动着宽大卧室的角角落落。白绸子的垂地窗帘掀起，落下，落下，掀起。主席房间里，从未有过这么大的风。白色帷幔的舞动，增添了这里的空寂。

主席的卧室里，此时是这样的安静。几小时之前的人影晃动，几小时之前的医疗器械之声，几小时之前的细碎的脚步声，几小时之前的人们的低声悄语，几小时之前人们的咳嗽声，喘气声，几小时之前人们的焦虑……此时都消逝了，都随着主席心脏的停止跳动而消逝了。人们都是回去休息了，政治局的委员们都开会去了。

小孟，身裹棉军大衣，却还感到那样的冷，她呆呆地望着静卧在那张宽大木制床上的毛泽东。他是在这张小孟熟悉的床上安息了。他今天静卧的姿势不同以往，他不再是左侧、右侧躺着。他仰卧平躺，显得那么安宁。只是嘴巴略略张开。小孟用手轻轻地托了一下他的下巴，就合上了他的双唇。他那灰黄色的脸上，还挂着一丝安然的微笑，死神奇迹地还给了他那副安详的脸庞。

小孟坐在离主席几米远的沙发上，静静地望着仰面而卧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身躯用粉红色带梅花的毛巾被盖至胸前。小孟望着望着，仿佛觉得他的胸部依旧在一起一伏，仿佛觉得他的心脏还在跳动，还在粉红色的毛巾被下均匀地跳动。她没有哭。她只是默默地、茫然地望这熟悉的身躯。

是什么疾病夺走了毛泽东的生命？是心脏病？是肺气肿？是综合症？尽管他那么相信他会死，但他又曾那么留恋着这不寻常的人生。

尽管毛泽东的人生历程震撼了空间，吞噬了时间，尽管他具有军事天才和政治才华，尽管死后他的名字还闪着光彩，但当他逝去的时候，也是那么安静。既没有出现狂风四起，暴雨滂沱，也没有出现山呼海啸，地动山摇。

一个伟人，一颗曾闪光夺目的巨星，当他逝去的时候，也是那么安静。

此时，小孟的视线变得那么模糊，她的神智变得那么飘摇，她忘了空间，也忘了时间，忘记了失落的自己。

毛泽东离去了，她不知她将来会怎样，她没有太大的悲痛，更没有心碎神伤，她只感到一片茫然。

9月11日的夜里，毛泽东的遗体就要运出中南海了，毛泽东就要永远离开这个他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

毛泽东的卧室里，灯火十分明亮。壁灯、吊灯都打开了，照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这里聚集的人从来没有这么多过。生前，他的卧室里没有特殊准许从来不让别人进来，只有小张和小孟经常出入。此时，各方面的人士都来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

12点钟，毛泽东卧室外面开来了一辆大型的灵车，用黑绸子制成的黑花缀在车前，花的两边垂下黑纱，车后部，整个是打开的。毛远新跟几个人说了什么，这些中南海干部处的同志们，便上前把主席的遗体抬起来，放在一辆平板小车上，由一个人推着小车，把遗体送出了卧室，送上了那辆大型灵车。

灵车从中南海西门缓缓开出，十几辆小车护送着。

灵车队，在中秋的深夜里，在府右街的路上，缓缓前行，向着人民大会堂流动。府右街、长安街，今夜是这样的干净，这样的宁静，两旁的树木，沐浴在清冷的银色月光下，一动不动，街道两旁今夜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荷枪实弹的战士们，显得格外严肃。

微微的秋风吹动着灵车的黑纱黑花。黑纱黑花在秋风



里飘动，没有哀乐，没有哭声，只有沉寂，只有凝重，灵车已在长安街上，从西向东缓缓流动。

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今夜的路怎么显得这般遥远，这般漫长。灵车队终于到了大会堂正门。

大会堂正面的大厅里，此时已是灯火通明，毛泽东的遗体被抬着放在了大厅中央，早已摆放好了的平台。一面党旗覆盖了伟人的身躯。接着，又盖上了水晶玻璃棺罩，在水晶棺的四周摆放了鲜花翠柏。

人民大会堂里已经没有小孟的事情，她又被汽车送回了中南海。这时，东方破晓，曙光升起，小孟又回到了毛泽东的卧室。她和小张两个人不知该做些什么，整理什么？她们依旧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坐在那张她们曾多次坐过的，那张离主席床只有两米远的沙发上。

毛泽东那张宽大的木制床此时显得那么平整、光滑、洁净，一条白色的单子把它平平地覆盖住。这张床的主人，曾是那么亲密的主人，永远不会在上面就寝了，永远不会在上面看书，与人谈话了。

小孟，毛泽东的半个小同乡，毛泽东身边的最后一名护士，当毛泽东离开中南海之后，她却还留在中南海里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

她不用轮流值班了，她也不用再去服用速可眠。

一个多月里，她每天都是在毛泽东的卧室书房里，整理，整理。

生活用品，文件，书籍，既要封存，又要尽量地留下最后的印迹。毛泽东生活的印迹。毛泽东生活的印迹，要保留着他留下的一点一滴的痕迹，这些书，这些文件，这条毛巾，这床被单，这件灰色中山装，这条肥大的西服裤，这个喝水的杯子……都有一段历史。

中南海，将永远留在小孟的生活里，永远留在她生命的旅途中，永远留在她的记忆里……

#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交锋

作者：李同成

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互相支持，反对美国推行侵略政策，在世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两国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嬗变，由结盟到对抗，其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交锋可谓尖锐复杂，惊心动魄，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 赫鲁晓夫访华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同年9月赫鲁晓夫被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我国国庆5周年庆祝活动。

此时的赫鲁晓夫地位并不稳固，为寻求中国的支持，答应苏联军队于1955年底以前撤出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将该基地交还给中国；将中苏合办的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新疆石油公司、大连轮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于1955年1月1日起完全移交中国，中国数年内用出口货物偿还；苏联给中国5.2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程，扩建141项工程；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防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及《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

10月3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最高级会谈，中方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苏方有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等。师哲与费德林担任翻译。

赫鲁晓夫问毛泽东：

“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吗？”

毛泽东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不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一听愣住了，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竟会出这么个难题。他急忙以无礼的口气拒绝道：

“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须知搞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藏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

毛泽东一听很不高兴，将香烟掐灭：“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赫鲁晓夫不识相，继续以教训人的口气说：“目前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为好。”

毛泽东软中带硬地回敬说：

“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要多进行协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岂不很好吗？”

赫鲁晓夫听了毛泽东的话，竟未作表态。毛泽东见此情景，知道会谈不会取得一致看法，于是便让服务员端上湖南腊肉、松烟熏制的火腿、烤面包和茶点，请客人品尝。

赫鲁晓夫随手拿起松烟熏制的火腿，大口吃起来，边吃边说：“味道真好，好东西，大家快吃！”

布尔加宁、米高扬都自取品尝，不一会儿就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如此不讲外交礼仪，便提醒他：“赫

鲁晓夫同志，你做事要谨慎，说话要注意分寸，要有内外、亲疏、远近之分，不要让敌人抓住话柄，钻空子。”

赫鲁晓夫不以为然，竟哈哈大笑道：“咱们也有嘴巴，也会反咬他几口的！”

在10月3日的会谈结束时，毛泽东问赫鲁晓夫：“你们是否准备到我国的某些地方，特别是南方去看看？”

赫鲁晓夫兴致勃勃地答道：

“一定要走走、看看，你们这里的一切对我们都是生疏的，新鲜的。”

“那你们就到各地去走走、看看，随你们的便，愿意到哪里去都可以，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们也不准备作什么特殊安排，我是喜欢你们自由自在地、随心所欲地活动，无须别人牵着鼻子走！”毛泽东话中有话。

赫鲁晓夫在上海畅游了黄浦江后，自己坐专机来到广州，省委书记陶铸前去迎接，但语言不通彼此只好比划或沉默相顾。

忽听飞机轰鸣，赫鲁晓夫看到陪同师哲走下飞机，像是盼到了救星，便大声喊：“快来救救我们！”

赫鲁晓夫从外地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提出邀请中国参加经互会。

“毛泽东同志，我们希望中国加入经互会，这样既可以加强社会阵营的经济合作，又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毛泽东不容置疑地答道：

“这对中国的发展建设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相反，可能麻烦很多，纠缠不清，还会妨碍建设的进展。”

赫鲁晓夫还想进一步解释，毛泽东不愿听下去了：“中国没有必要参加！中国人多，地大物博，什么都能发展。”

赫鲁晓夫没词了，但他并不死心，以后他又向毛泽东提出，我们在东欧搞了经互会，你们在亚洲搞个类似的东西也好嘛。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不上他的当。

毛泽东说：“国际帝国主义的气焰被煞下去不少，现在在我们有个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它。首先是大力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

赫鲁晓夫起而反驳道：“不！毛泽东同志，帝国主义是不会死心的，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搞颠覆活动。”

毛泽东听了这话，十指交叉，活动着手腕，若有所思地说：“不，赫鲁晓夫同志，有时候我比你高，有时候你比我高。现在我听你说。”

翻译几乎急出汗来，才把这话委婉而不失幽默地译出。事后，赫鲁晓夫曾说：“毛泽东简直是位隐藏自己思想和观点的大师，他有时话讲得过于简单，而有时又讲得十分复杂，使人费解。”

### 赫鲁晓夫求救

1956年2月25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把以前口口声声称为“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暴君”、“刽子手”、“独裁者”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者”，使整个世界震惊，给国际共运带来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55个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朱德。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马上在国内引发了一阵骚乱。格鲁吉亚人在首都第比利斯为了抗议批判斯大林上街游行，后来还发生了军警与群众队伍发生冲突事件。

同年10月，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西欧各国发生了大批共产党员退党事件。

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地位岌岌可危，非常需要在兄弟党内有影响的中共伸出手拉他一把。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

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请中共火速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磋商，特别指名提出邀请周恩来前往。遗憾的是，当时周恩来已安排好到其它国家访问，不能马上赴莫斯科。

中共即组织了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王稼祥等人参加的代表团赴莫斯科。赫鲁晓夫一人驱车到机场迎接。刘少奇等人下飞机后，赫鲁晓夫便急步向前，把刘少奇拉到自己的车里，滔滔不绝地向刘少奇介绍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

“布达佩斯已是一片混乱，匈牙利已成为无政府状态，阶级敌人十分猖狂，共产党和干部被绞死；西方反动势力拥到奥匈边界，窥测动向，蠢蠢欲动……”

赫鲁晓夫情绪激动地讲了一大通。刘少奇表情严肃，只是静静地听，一言不发，始终没有表态。赫鲁晓夫摸不着底，惴惴不安。

刘少奇等人到了寓所，没等洗漱，赫鲁晓夫便把刘少奇拉到桌旁，继续说：“啊呀，真是可怕，太危险了！好在我们驻匈的全部苏军家属和部分苏军已经撤出布达佩斯，撤向边境了。”

这时刘少奇开口了，坦率地指出：“波匈事件同苏联的大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你们对兄弟党指手划脚，横加干涉，使人家感到主权受到损害。在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之间，必须承认独立和平原则。”

邓小平接着说：“不能撤退，撤走了，帝国主义就进来了。要站稳脚跟，坚守岗位，苏军这么大的力量，还对付不了那么几个反动派？要全力扶持共产党内坚定可靠的党员，协助他们掌握住政权，把党员、革命力量、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坚强的堡垒，要掌握军队和警察的力量，让他们守住阵地，保护政权，维持秩序，坚决保卫党和政府机关不受破坏！在这方面苏联军队应起模范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听了这话，摸着了中共的态度，面部的愁云一下散去，顿时笑逐颜开。

“好！好！我得赶快走了。”当时苏共正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他要赶快前去，把这一消息向他们传达。

刘少奇说：“赫鲁晓夫同志，不要着急，我还有话要说。”

赫鲁晓夫这才留下。

刘少奇说：“我们的态度很明朗。但我们对你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处理兄弟党的关系方面，还是有意见的！我打算在你们的政治局会议上讲话。”

“当然可以。”赫鲁晓夫满口答应。

1956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今后将采取措施予以克服。

就在中共代表团抵达苏联的第三天，苏共采取坚决措施，平息了匈牙利的暴乱，使局势恢复稳定。

为了进一步做苏联的工作，毛泽东1956年11月30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谈到中苏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时，引用了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处理张家地界的故事。

原来，张英家人在其老家修建府第时，因地界不清与方姓邻居发生争执，打官司告到衙门。因为双方都是名门望族，县令不敢贸然判案，张家人把争执情况写信告诉张英。这位文华殿大学士以诗代信告诉家人要谦让。两句诗是：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毛泽东针对苏联犯了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巧妙地借张英此诗奉劝赫鲁晓夫要平等待

人，用意极深。

1956年12月31日，克里姆林宫按照惯例举行新年宴会，赫鲁晓夫在宴会上发表祝酒辞，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调子明显发生变化，他说：

“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对待敌人方面，我们同斯大林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

在谈到匈牙利事件时，他说：

“现在有些人想逼我们后撤，不，我们决不后撤！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只能向前推进，决不后撤！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是完全不可能得逞的。”

### “狠狠教训他们一顿”

波匈事件还在发展，赫鲁晓夫的话不灵了，于是再次请求中国帮助他收拾残局，毛泽东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便让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中断了访问，返回北京，准备赴苏，毛泽东向周恩来说：“苏联领导人是被他们的物质利益迷了眼，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

1957年1月7日，莫斯科白雪皑皑，冷风嗖嗖。周恩来肩负重任来到莫斯科。周恩来走下飞机，赫鲁晓夫一个箭步冲上去，同周恩来握手、拥抱，以最高规格请周恩来下榻于克里姆林宫沙皇居住过的宫殿内。

1月8日赫鲁晓夫明确表示，希望周恩来协助他们对波匈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做些工作。于是，周恩来于1月11日访问了华沙，接着于1月16日访问了匈牙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匈牙利人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敌视态度。周恩来到莫斯科，向苏联领导人通报了访问波、



匈的情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诚恳地对赫鲁晓夫进行批评：“维护兄弟党的团结，兄弟国家的关系，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各国、各党内部的事应由他们自己处理。有意见可以商量，不能搞外部压力，干涉兄弟国家内政。赫鲁晓夫同志，你在波兰问题上处理得不太好。波匈事件是沉痛的教训，它们就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激起的。”

赫鲁晓夫这条鲁莽汉，终于“炸”了，他蓦地站了起来，粗鲁地指责一些东欧兄弟国家领导人，说他们要了苏联的金子，还要骂苏联，同西方勾勾搭搭，是“狗屎”、“坏蛋”、“像驴一样”。此时赫鲁晓夫性格中的劣根性全部暴露出来。他瞪大眼睛对周恩来说：“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周恩来巧妙地回敬了赫鲁晓夫一句：“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资产阶级。但是，你我都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赫鲁晓夫听了十分尴尬。他把话题一转影射中国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据说，在越南、老挝，有很多中国人？”

周恩来微笑道：“不少，连国王的祖父都是中国血统的，访华的代表团也有几个是中国血统的，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使他们安心。五项原则加上一条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对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是平等的，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赫鲁晓夫听到这里，一时语塞。

## 毛泽东访苏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亲自率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健步走下飞机,赫鲁晓夫跨步向前,紧紧抱住毛泽东,表示亲切和敬意。

赫鲁晓夫以得意的神情对毛泽东说:“这次我们也给铁托发了邀请,他不来是他自己失礼;如果来了,正好可以批他。”

毛泽东听了这话,说道:“铁托不来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了,肚子里能没有气吗?能饶人处且饶人。”毛泽东吸了口烟问道:“铁托不来,别人来吗?”

赫鲁晓夫说:“卡德尔来,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出自他的手。”

毛泽东很感兴趣地笑道:“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

《莫斯科宣言》的核心问题是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问题,这也是中苏双方争论的焦点。赫鲁晓夫到克里姆林宫看望时,毛泽东主动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对现代战争是一反对,二不怕。古时候打仗没有原子弹和火箭,刀枪剑戟打起来,死人不见得比现在少。”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问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死了多少人?比比看,中国古时候三国混战又死了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

毛泽东看了赫鲁晓夫一眼继续说:“现在有人很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是把人害苦了。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

顾怕，这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到你的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害怕。这就是辩证法。”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面有愧色不表态，将手中的烟轻轻一扬问道：“敌人使用核武器，我们可不可以等一等再还击？”

“不行，一秒钟也不能等，必须立即还击！”

毛泽东笑问：“你怎么能算得那么准，知道人家什么时候放原子弹？”

“能知道，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进攻，我们都将迅速回击！这是我们中央委员集体决定的！”

毛泽东指着赫鲁晓夫说：“你这种说法不对。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要看人家请你没有。谁的决定也不对！”

赫鲁晓夫涨红了脸，他几乎要叫了起来：“我不同意，不同意！”

毛泽东见他太激动了，便转换话题，强调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赫鲁晓夫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故作谦虚之辞：“应以苏中两家为首。”

“我们没有资格。”毛泽东停顿一下，坦诚地说：“你这个人有点胆量，敢碰斯大林，尽管方法不好，可是揭了盖子……”

赫鲁晓夫一听这话，笑逐颜开，毛泽东把话锋一转向他忠告道：“你这个人也能捅漏子，多灾多难，可能日子也不太好过，特别是脾气不好，很容易伤人，像我一样。在兄弟国家之间有什么不同意见，要让人家讲话，慢慢谈，着急不得……”

赫鲁晓夫一向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没等毛泽东把话讲完，就嚷道：“你不了解，有些人拿了我们的东西，还骂娘，真让人生气！”

毛泽东没和他再谈下去，回到住所便派人去叫翻译李越然。这时已是深夜两点，李越然来了，毛泽东翻身坐起，

从床头柜上拿了一个苏联信封，往桌子上一放，又递给李越然一支铅笔，说：“我说你写！”

赫鲁晓夫同志：

我已经睡了，关于文件的事，请明天与邓小平同志谈，我就不参加了，好吗？

李越然写好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笑道：“不是让你写中文，我是让你直接写俄文。”

李越然当即翻成俄文，再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说：“好，就这样行了！”然后毛泽东在信封上签下了“毛泽东”3字，请苏联同志立即转给赫鲁晓夫。

中苏双方对起草《莫斯科宣言》分歧很大，在会议临近结束时，毛泽东决定妥协，在赫鲁晓夫陪他进餐时提议说：“文件可以照顾你们‘二十大’的观点，我们搞份备忘录，算是保留意见吧，你看怎么样？”

赫鲁晓夫正为此发愁，听了这话喜出望外，连忙说：“可以，可以。”

### 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

1958年4月18日，赫鲁晓夫命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信中说：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1958年至1962年间，由中苏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建成这两座中心所需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

毛泽东对此事高度重视。1958年6月7日，他作了如下批示：钱一定要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

彭德怀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明确告诉对方：我们

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既然苏联认为有必要，我们同意建，费用全部由中国承担，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中国，否则政治上不好。看到中共中央这么坚决抵制，苏联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一念头。随后，苏联又向我国政府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

7月22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

他见到尤金时，一反平时探讨哲学问题的友好气氛，严肃指出：“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他接着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者，如果按你们说的办，我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尤金支吾其词，毛泽东说：“你讲不清，请赫鲁晓夫来讲！”

尤金唯唯而退，当即请示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于1958年7月31日来到北京，刚在中南海颐年堂坐下，就先埋怨尤金大使，说他书生气十足，不会办事，曲解了他的意思，然后为自己辩解说：“为对付美国第七舰队，需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这种事对中苏双方都有好处，越快越好……”

“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非常严肃地直指要害问题。

“所谓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的意思，我们希望长波电台尽快建立起来……”

毛泽东把桌子啪地一拍，蓦地站了起来。

毛泽东手指赫鲁晓夫的鼻子问道：“你这一大堆话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赫鲁晓夫有些慌张，不知如何回答，搓搓手，搪塞道：“你别急，我们不过是来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

陪同赫鲁晓夫参加会谈的苏联副部长费德林精通汉

语。他用俄语提醒赫鲁晓夫：“毛泽东可真火了！”

赫鲁晓夫皱起眉头，摇摇头说：“这样吧，我们能不能达成一项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中国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

“不行！”毛泽东斩钉截铁将手一挥，“我们不想再听到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一件事情都达不成协议！”

毛泽东一听这话反而坦然了，他轻悠悠地吸起香烟，坚决而短促地回答：“不能！”

赫鲁晓夫毕竟是超级大国的领导人，他的意志也很坚强，忽然一笑：“假如你愿意的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基地。”

“不要！”毛泽东用力抽了口烟：“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

毛泽东接着像是给赫鲁晓夫上课一样：“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在中国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我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达到自己的目的！”

话说到这种地步，赫鲁晓夫知道没有任何希望了，自找台阶地说：“不同意就不同意吧，我们不提这个建议了。”

随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还是站不住。”

赫鲁晓夫听了面无表情，一言未发。

## “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1959年9月赫鲁晓夫出访美国与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归国途中于当月30日到达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他把“戴维营精神”当作资本，板着面孔教训人：“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在我同艾森豪威尔交谈时，得到这样的印象：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以现实主义态度考虑现实，想缓和国际局势，重新建立国际关系。”

毛泽东吸了口烟，嘴角掠过一丝笑意：“你只带回这些东西？”

赫鲁晓夫面有愧色：“当然，他们是帝国主义，是靠侵略和掠夺……我想起一件事，希望你们考虑释放唐奈与费克吐两个美国飞行员！”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竟公然为美国当说客，把手一摆，果断地答道：“不行，这个事儿不能商量！”赫鲁晓夫见没有余地，突然把话题一转，用抱怨的口气向毛泽东说：“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掉么！”

毛泽东张开两臂说：“那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住他呢。”

赫鲁晓夫接着说：“你们也不该和印度闹么，尼赫鲁这个人还是反帝的，在资产阶级领导人中算进步的。你们应该团结尼赫鲁。你们为了那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冲突，这是很不值得的。”

陈毅激动地站了起来，顶他道：“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迁就主义的态度。”

赫鲁晓夫巧言辩解说：“西藏与印度毗邻，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你们却为西藏与印度冲突，难道这是明智的吗？”

陈毅一下抓住了对方的小辫子，反问道：“你这是什

么意思？是不是让我们放弃西藏的领土主权？”

赫鲁晓夫发现自己走了嘴，知道陈毅不好对付，转向周恩来说：“你是世界著名的大外交家，怎么会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严肃平静，字字有千钧之力：“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能讲团结吗？”

赫鲁晓夫眼珠一转，又找到了反攻的借口：“你们炮击金门就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符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原则吗？”

陈毅反击道：“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领土！中印边境事件，明明是印度侵略，你却偏袒！对炮击金门你耿耿于怀，你难道是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赫鲁晓夫被驳得哑口无言，向毛泽东双手一摊，抱怨道：“你看，你们一帮人对付我们几个人，这种谈判公平么？”

一直在一旁沉默的毛泽东觉得自己该说话了，他微微一笑道：“我听了半天了，你给我们扣了好些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对金门打炮，还说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无话可说，会谈不欢而散。

195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新中国建国10周年大典，赫鲁晓夫站在毛泽东身旁观看盛大阅兵式，苦思冥想对付毛泽东的办法，他想让中国人尝尝不听话的滋味。

在天安门城楼休息时，赫鲁晓夫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从容答道：“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



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更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赫鲁晓夫悻悻回国了，苏联政府于1960年6月20日单方撕毁了这项协定。

中国没有被吓倒，相反更快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进入科研攻关阶段。经过几年的艰苦攻关，中国1964年10月16日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4日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美苏两国由拥有原子弹到爆炸氢弹，都用了10年功夫，而我们只用了3年的时间。

后来，毛泽东曾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 毛泽东接人待物有什么特点？

（《毛泽东生活实录》节选）

李银桥

很有原则，很有人情味。他有一套规矩。“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

“力只可用于法，用于法则有效；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岂惟无效，反动随之矣。”

“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毛泽东与同志、朋友、亲人相交，各有不同特色。

党内同志交往，除非久别重逢，毛泽东很少表现出亲热。基本是威严而不拘礼节的。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言简意赅，直截了当。

对党内同志，毛泽东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我曾观察过，有时国家、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听了几句汇报，才作个手势：“坐么，坐下说。”

如果毛泽东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上不立起身，作个手势让同志们也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话不多。

对于较长时间没见过的老同志，毛泽东要起身迎送握手，但是决不迈出门坎，除去人来时他本来是站在屋子外，否则是不出屋的。对于兄弟党的同志也的如此。

记得五十年代初，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北京

访问。那天上午，值班室电话铃响了。我抓起听筒，是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

“主席起没起床？”周恩来问。

“没有。”我回答。

电话那边略一迟疑，又问：“什么时候睡的？”

“早八点。”

“银桥，你要叫起主席。胡志明来了，有紧要事……”

我来到毛泽东卧室，叫醒他，帮他擦把脸，便跟随他来到颐年堂坐等。不到两分钟，周恩来陪胡志明边聊天边朝颐年堂走来。我在门口小声说：“主席，来了。”毛泽东立起身，走到门口便停下来，不再多迈一步。多迈一步，出门坎了。他等胡志明迈进门坎，才举臂握手。胡志明很热情，讲中国话：“身体好吗？”毛泽东点点头：“还行。你住得习惯吧？”两人就这样寒暄着来到沙发旁坐下。我便将茶水摆好。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客到门口便停下来。胡志明由周恩来陪同离开颐年堂。

我的记忆中，1948年粟裕从前线赶到城南庄参加军事会议，毛泽东大步迎上，迎出户外，同粟裕握手。粟裕显得恭敬、激动而又热烈。两人握手时间很长，我听到一声“……十七年了！”不知是十七年没见还是别的什么意思？毛泽东破例跨出门去迎接粟裕同志，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毛泽东似乎是有意约束自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起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亲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比如同周恩来，合作共事几十年，甚至毛泽东的衣食住行都无时无刻不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照料。毛泽东住的房间多数是周恩来选择的。战争年代和非常时期，毛泽东走过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段看

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周恩来时时要过问。他们的情谊应该说是深厚的。每当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信任地将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是，我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没听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

这一切，与我们党的历史和现状不无关系。长期武装斗争，各解放区彼此隔绝，不得不各自独立作战，求生存求发展，“山头”不少。正如毛泽东所言：“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自己不该有亲疏，也不能让其他同志感觉有亲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党内同志中没有过多过深的私交。

这一来，又免不了生出另一种情况：许多同志，甚至是相当高级的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之后都是严肃恭敬，甚至表现出紧张、拘谨，不能畅所欲言。随着毛泽东威望的是益提高，这种状况也变得更加严重。我个人以为，这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形成某种程度的“家长制”、“一言堂”的根源之一。

彭德怀和陈毅是比较突出的两个例外。

彭德怀与毛泽东相交，带了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真诚、随便、粗豪。敢笑敢吵敢骂。转战陕北时，全党早已叫惯了“毛主席”，唯独彭德怀偶尔还要直呼一声“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他与毛泽东谈话常常手势翻飞，声震屋宇，打机关枪一样。于是，毛泽东也谈兴勃发，眉飞色舞，完全是老朋友“侃大山”的气氛。就是现在年轻人习惯说的那种“侃大山”。这种情况持续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山上最后两次“骂娘”。庐山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再见毛泽东就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拘谨了。

陈毅另有一番特色，每次见到毛泽东，常常脚后跟用力一磕，立正敬礼：“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或者是：“主席，我来了。”毛泽东将手一挥：“坐么，坐下说。”于是，陈毅便璨然一笑，“放开了。”他一放开，

毛泽东的屋子便热闹起来。他与毛泽东有诗词交往，这属于私交。在党内脂与毛泽东建立起深厚私交情谊的，大概也只有陈老总了。他又生性豪放，嗓门粗大，带有诗人那种特有的冲动和热烈的气质，说到高潮处真是手舞足蹈，并且伴随着激情洋溢的哈哈大笑，特别随便，特别富于感染力。陈毅是毛泽东所喜爱的人。七十年代毛泽东只参加过一次追悼会，就是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公开社交，比如游泳，跳舞等活动，毛泽东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而且人多热闹为好。私下交往，毛泽东喜欢与老人，特别是被人们称之为“老古董”的保守色彩较浓的从旧时代过来的人打交道。他尤其器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

在私交中，毛泽东是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的。刚进城时，毛泽东就让周恩来陪同，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陈叔通等。毛泽东对党内同志迎送不出屋门，对于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先生，不但迎送出门，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们携手搭肩漫步。

毛泽东曾说过：“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总是把我当领袖我也受不了。”

有位老先生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同许多知名的民主人士一样，建国之初他也常来见毛泽东。他随毛泽东沿南海散步，走在毛泽东稍后半步，腰身是向前躬着，甩以头伸在毛泽东的身前，竖着在拇指，仰望毛泽东脸色说：“毛主席呵，你真伟大哪，真伟大……”

毛泽东皱起眉头拂了一下手：“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这个样了不好么。”这位老先生面露赧颜。

可是，议政的时候，这佳老先生偏又敢于坚持意见，与毛泽东顶牛了。毛泽东是“吾人惟有主义之争”，“主义这争出于不得不争”，狠狠批了老先生一通。老先生不

认错，毛泽东在主义之争上是决不相让，历来是非他不可。张澜曾为这位老先生说情。最近看报纸，说周恩来出曾为这位老先生出过力，想托人劝老先生做检查过关。其实，毛泽东也没有将老先生怎么样，就是不再听他的“主义”罢了。因为“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毛泽东与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基本无来往。只有陈毅是例外，有诗词交往。毛泽东与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却是私人友情深厚、交往甚频，而工作往来不多。

毛泽东与章士钊书信往来不少。有次，毛泽东看罢章士钊来信，手指尖在桌上轻轻敲两下，转向我吩咐：“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

当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我匆匆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章士钊家里。记得老先生是住一个四合院，房子不怎么样，够破烂。我拎着两只鸡说：“主席送你两只鸡。”章士钊连连点头：“谢谢，谢谢。”我说：“主席看到你的信了。”他举举那两只鸡：“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我说：“很好。”

我有些纳闷，两只鸡怎么是回话？章士钊的信上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当然无法猜到。回来向毛泽东学舌一遍，毛泽东笑而不语，留给我一外终生猜不透的谜。

这是1955年的事。

就在这一年，何香凝还画了一只老虎，用玻璃框框着，送给了毛泽东。这是一只立虎，毛泽东将画靠墙立住，反复欣赏，象是琢磨什么。良久，对我吩咐一声：“是了，这只虎应该放东屋。”

我照办了，却始终不明白为何要放东屋。

毛泽东有躺靠床栏办公的习惯。宋庆龄送给毛泽东一只长枕头，很大，但又不是双人枕头。花条纹，没套子，很软和，是鸭绒的。由宋庆龄的卫士长隋学芳交给我。毛

泽东习惯了荞麦皮枕头，享受不了鸭绒枕头，摆了一段时间便收入储藏室了。

1959年，毛泽东不再任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象是要陶冶性情，休息时便练练书法。这段时间与民主人士的往来更多。

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毛泽东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我去倒茶时，常见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他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练到兴头上，吃饭也叫不应。

大约是真迹太珍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星期便频频打电话询问。电话打到值班室，问主席看完没看完？什么时候还？

卫士尹荆山借倒茶机会，向毛泽东报告：“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

“嗯？”毛泽东掀起眼皮，淡淡的眉毛开始收拢。

“他们……又催呢。”

“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毛泽东将手中烟嘴摔到桌上。当时赫鲁晓夫正在逼债，黄炎培有凑热闹之嫌。

“主席，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

“我看！”毛泽东喝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转缓和些，“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黄炎培又来电话了，电话一直打到毛泽东那里。先谈些别的事，末了还是问那本真迹。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那边的回答不得而知。

小尹挖苦：“真有点小家子气。”

我说：“跟主席计债似的，没深浅。”

毛泽东听了，却愠色全消，换上微笑。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到了一个月，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卫士小尹：“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毛泽东对于亲属故旧，更是坚持“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

那是建国不久，记得是1950年春，毛泽东即对儿子说：“岸英，你回家一趟，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上寿。你妈妈是个很贤慧的人，又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她的交杨老先生是个进步人士，对我资助不少……”毛泽东停了片刻，眼睛有些湿润，哑哑地喃喃一声“我很怀念……”

毛泽东长期地、经常地从自己工资和稿费中拿钱来赡养杨老太太，资助生活困难的亲友。但是，又绝不恩赐任何亲友以金饭碗。建国之初，亲友们都抱了很大奢望给他写信，几十封不止。他的回信是很感人的。他给杨七智的回信说：“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他给表少年时的同窗好友毛森品的信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毛泽东所做诗词《蝶恋花》尽人皆知。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便将他与杨开慧、柳直荀及李淑一的特殊关系深厚情谊全部表达出来。江青曾为这首词大动肝火，毛泽东当面说江青“小资产阶级尾巴没割尽。刀子嘴，是



非窝。”江青为此一连几天不同毛泽东说一句话。毛泽东与李淑一从建国后未断通信，这样深的关系，可是，当李淑一请毛泽东为她说话，要到北京学习时，毛泽东却没有说。他对谁也不改“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公私一定分明。

我跟随毛泽东十五年，未见他替一位至亲故旧向公家要特殊，却不止一次见他对至亲故旧做出特殊举动：

湖南农村一位老太太，是毛泽东家乡的老人，来向毛泽东反映相里的事情。毛泽东一改待客传统，亲自搀扶老太太上台阶，下台阶；搀扶老太太坐，搀扶老太太起。走台阶时，毛泽东象孝子一般双手扶着老太太嘱咐：“慢点，慢点，老人家慢慢走。”这位老太太依靠着毛泽东，与毛泽东用同样的节奏喃喃着：“慢点，慢点，我老了，腿脚不行了。”

老太太对于所享受的这份殊荣，毫宠若惊，却是受之泰然，理所应当一般！那情景，我至今清晰在目。

就我十几年观察而言，毛泽东还是在与我们这些“身边人”单独相处时，最能表现出是普通人。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有次准备接见外宾。是一位友好国家的新任大使来递交国书。

那时递交国书不象现在，递上即可。那时大使要先宣读，国家主席毛泽东要站着听。宣读完国书再递上，很隆重。

隆重自然礼仪多，毛泽东接见前必须先剃须整容。理发员王惠已经上岁数，光头，白须飘然，面孔清癯，极象电影《少林寺》里的老方丈。只是多戴一副大花镜。他剃了一辈子头，除了再剃几年头，大概不会先出什么其他非分的奢望。

王惠戴了花镜视力也不济，总是歪侧着头，伸长脖子，眯缝着两条细长眼左瞧右瞧。那把剃刀难得一挥。他左手

按着毛泽东头顶，侧脸歪头瞄啊瞄，右手慢慢伸出，剃刀停在毛泽东鬓发下沿，象在威胁领袖似的。就那么刀架头上半天不动连我们都有些忍不住了，才“刷”一下。

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说：“你得快点。”

“别着急，别着急呀。”王惠象一切上了年纪的人那样唠叨着，换个位置，刀又架到毛泽东头上，在脸鬓另一侧比量着，握刀的手颤个不停，好半天又“刷”了一下。接着退后一步，欣赏什么杰作一样端详个没完。

“哎呀，王师傅，你快一点好么？”毛泽东开始烦躁，欠一欠屁股，却被王惠从头顶上按住了。仍然慢声细气说：“叫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不误你去就行么。”

好不容易刮完脸，毛泽东以手拂面，大概是出汗了，便抬屁股想起身，却被王惠及时又按住头：“怎么不听话呢？”我叫你不要着急，不会误你……”

“我要你快一点！”毛泽东哭笑不得。

“沉住气，听我的，给你刮干净再去。”王惠说着，居然拿手在毛泽东后脑勺上拍了两下，拍孩子一样随随便便！我们在场的卫士，让这位老先生拍得目瞪口呆！

毛泽东没有发脾气，只无可奈何地叹口长气，王惠得脸似地，边为毛泽东刮后颈，边絮絮叨叨“教训”毛泽东：“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不好人家会说王惠不行，王惠也不光彩么……”

在我印象中，王惠是唯一在毛泽东面前富于自尊，从内心到言谈举止都一贯将自己放在与领袖完全平等的政治地位上的伟大而普通的人物！

## 伟人垂暮

——1976年1月的毛泽东

艾森豪威耳的孙子戴维和尼克松总统的女儿朱莉是夫妻。1976年1月1日他们访华，出乎他们意料，毛泽东要见他们。说实在的，不少外国元首来中国访问，都难得见上毛泽东，而他们虽是卸任总统的儿女，又是一般的美国人，能得到如此荣耀，确实喜出望外。

戴维和朱莉在结束会见之后，乘著轿车沿著中南海奔驰。戴维默默的坐著。朱莉问：“你对他有什么印象？”戴维足足有五分鐘没有开口。来到长安街了，戴维说：“10里之外，就可以呼吸到他的个性。”

当戴维第一眼看到毛泽东的时候，竟微微涌上来一股心酸的感觉。他的客厅很暗，有人影，但几乎完全锁在黑暗之中。随著戴维的走近，一些灯相继打开，毛泽东毫无遮咀地出现在客人面前。他显得很苍老，比他的年龄苍老得多，比人们的想象更加苍老。他的头向后仰著靠在沙发上，头发有些乱。嘴张著，还在动，仿佛在艰难地吞食著空气。

戴维和朱莉很快走到他身边了，一个女护士用手去梳平他的头发。他开口了：“你在看什么？”显然是戴维的凝视引起了他的注意。“我在看你的脸。”戴维说，“你的脸的上半部很……很出色。”

听完译员的翻译，他说：“我生著一副大中华的脸孔。”美国人谈到他的时候，很爱使用一个字眼：巨人。尽

管他们不那么尊重他，但绝对把他看成一位巨人。砸碎一个世界的人就可以称为巨人。他砸碎了，而且相当彻底。可现在，巨人垂垂老矣，连头发都要别人替他抚平。

他们握手，戴维的心一动，他的手不老，很光滑，很温暖，很柔软，甚至有点过份柔软了。这就是那只曾经握住中国历史的手吗？

戴维凝视著他，他依旧坐在沙发里，因而这种凝视就变得居高临下了。极少有人能从这个角度看他。其实，能从这个角度看他，能发现作为一个人的全部聪明才智，戴维此时正有这种感觉。

毛泽东对戴维说：“中国人的脸孔，演戏最好，世界第一。中国人什么戏都演得，美国戏，苏联戏，法国戏。因为我们鼻子扁，外国人就不成了，他们演不了中国戏，他们鼻子太高了。演中国戏又不能把鼻子锯了去。”

戴维终于控制不住自己，脸放晴了。照相机快门声炒豆般地响成一团。霎间，客厅里一片白。

## 二

他们在他身边坐下，朱莉拿出一封信递给他：“我爸爸给你的。”

“总统先生的腿怎么样了？”毛泽东问。

“好多了。”

“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个话转告总统先生。”

戴维插话：“他已经不是总统了。”

“我乐意这么叫他。”他说。戴维无语。

“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他接著说，“有什么了不起？当你手中刚好有一台录音机的时候，录下一次谈话有什么错？谁让你们美国有那样多录音机！”

戴维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政治。”

“西方政治？那是假的。”

戴维耸耸肩，明知说也没用，干脆退却。

他不退却，转而对朱莉说：

“马上写封信给你爸爸，说我想念他。”

“我这句话，可以登报。”他补充说。

戴维的眉毛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这句话不是说给一个人听的了，而是说给二亿人听的。

“现在，在美国，”戴维沉吟道，“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

“好，”毛泽东说，“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他略加重语气，“马上。”

戴维的脸拉长了。他觉得自己被这句话伤了一——作为美国人而不是作为前总统的女婿。

毛泽东又转向朱产：“信里再加上一笔，说我等待你父亲再次来中国。”戴维紧紧地咬著嘴唇，为的是不让一句话迸出来：“如果白宫邀请已经下台的刘少奇到美国进行友好访问，你们会做何感想？”他把这句话杀死在肚子里了。

### 三

“刚才在来的路上，我们看见很多人在听广播，”戴维说，“在听你新发表的两首诗。”

“那是我1965年写的。”

“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认为你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你先是诗人。在延安时，你同她谈过诗。有一句话给她印象太深了。那句话，你是指著自己的鼻子说的。你记得你说的什么？”

几乎是40年前，他站在陕北黄色的高原上对斯特朗

说：“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他指著自己，声音提高了一倍：“这儿就有一个。”

此刻，他脸上浮出沉思的神情，喃喃道：“这儿就有一个。”

“你的诗有很多读者，”戴维说，“但相比之下，你的著作读者更多，因为你的著作印了十几亿册。”戴维想说，“比「圣经」印的都多。”但斟酌一下，改了口：“是地球上印得最多的书。”

“我的那些书没什么好读的。”他说，“我在里头写的没什么教育意义。”

“你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

“改变了世界？”他笑了，“不可能，我没有那个能力。你看，”他朝沙发右侧努努嘴，那儿摆著一个地球仪，“地球那么大，大得象个西瓜，怎么改变的了？”可他脸上分明带著一种切西瓜的痛快神情。“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

戴维笑了：“说得好。”

他突然问戴维：“你们吃中国菜习惯吗？”

“不习惯，基辛格说，美国人一吃中国，肠胃功能就不正常。”

“我的肠胃功能也常常不正常，尤其是在北京。”毛泽东顿了顿，“只有在战争中，我的肠胃功能最正常。”

“中国不会再有战争了。”

毛泽东提高了声音问：“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爱好和平。”戴维为自己得体的回答感到高兴。

“谁说中国人爱好和平？”毛泽东的语调突然变得咄咄逼人。“那是瞎说，事实上，中国人很好斗。”他显然觉得意犹未尽，补充说：“我也是其中一个！”

“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和谁斗呢？”

“不打仗，也有敌人，各式各样的敌人。”

“按我的理解，你说的敌人是指右派，是这样吗？”

他向戴维送来一瞥，笑笑，笑得很神秘。“不，错了。恰恰相反，我喜欢右派。你岳父算是右派吧？在上次美国大选期间，我投了你岳父的票。戴高乐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喜欢他们。将来我还要投他们的票。”

#### 四

一个女护士走进来，把一个托盘放在他身旁的茶几上，盘里有一杯黑水和几粒药片。戴维知道那黑水定是中药。女护士把药片放在他嘴里，然后端起黑水送到他唇边。他呷了一口，皱眉，显然很苦。他呷第二口，微微一动，中药溢出来一些，他胸前顿时湿了一片。

他对护士说：“你去吧，我自己喝。”

“一定要喝。”他点头，几乎是顺从的。

护士走了。他抓住杯子，手抖的很厉害，仿佛抓著一块冰。他握住杯子，不动作。隔了好久，他把杯子拿起来了。晃动，剧烈地晃动，好像要坠落下来，最后稳住，再晃动，再稳住。那只手在挣扎。客厅里一片宁静，让人心里发慌。渐渐地，他脸白了，戴维的脸也白了。他拿的是一杯药吗？绝不是，那是一大杯信念和力量。他把药喝光了。戴维觉得这是一种完成或完善。

他深深地望著空杯子，目光是伤感的。“我老了，我的负担太重了。”

“你的心仍然年轻。”戴维说。

他仿佛没听见戴维说的话，许久，才喃喃道：“一个人如果负担太重的话，死是最好的解脱方法。”

#### 五

空气太紧张了。戴维连忙挑轻松的话说：“我岳父让

我转告一句话：他希望能在美国见到你。”

“美国？”他轻轻地说，把头转向沙发右侧。

地球仪显得沉著而含蓄。面对他的是世界最大的孤岛——澳大利亚。

“我不想去澳大利亚，我想去美国。”

他说：“澳大利亚在地图上看看就怪让人寂寞的。”

“40年前，你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戴维说：“你渴望去美国旅行，特别是加利福尼亚。”

“加利福尼亚让人感到亲切，”他说：“因为离中国最近。”

“为什么你不找个机会去看看哪？”

“到美国去要坐飞机，他们不让我坐飞机。”

“如果我没记错，”戴维说：“你一生只出过两次国，而且都是去苏联。”

他点头。

戴维说：“美国比苏联好玩多了，你真应该去。”

他缓缓开口：“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会谈快结束了，他的一只眼睛几乎是闭著的。

戴维最后一句话是脉脉含情的：“祝你健康长寿。”

他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一脸警觉的神色：“这是什么意思？”但很快又闭上了眼。

他坚持要亲自送戴维夫妇到门口，他被搀扶著，一脚深一脚浅地向前走动。

“我不会送你们什么东西，”他对戴维说，“因为我无求于你们美国。在延安时，斯大林给我们送吃的和用的，可我只送过他一次东西，是一包红辣椒。他送的枪炮和物资，都是工人农民生产的。我送的红辣椒却是我亲手种的。我们打了个平手。”

（摘自《毛泽东与海外人士》）



# 金冲及谈毛泽东与周恩来

张素华 边彦军 吴晓梅

毛泽东与周恩来，这是个说不完的话题。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前夕，我们访问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他从历史和现实的多方面角度向我们谈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同与异。

## 毛泽东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

访问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而周恩来更突出的是一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有人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谋事是毛，成事是周”。对这种毛周之间密切配合所产生的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您怎么看？

金冲及：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的确是不可分离的。说起来很有意思，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常常有两人并称的例子。比如太平天国的洪杨（洪秀全、李秀清）、戊戌维新运动的康梁（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时期的孙黄（孙中山、黄兴）、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南陈北李”等。两个人中总是以一个为主，另一个也有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往往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虽然没有“毛周”这样的说法。但两人关系的紧密是有目共睹的。在两人的关系中，当然毛起着主导的作用。小平同志讲过一句很中肯的话：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对周恩来，我想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周恩来。当然从青年时代起，周恩来一直是很杰出的，但真正能使他在一个正确方向下充分施展才能的，还是因

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这是事实。而对毛泽东，有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说，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相得益彰。

访问人：那么，具体而论，又怎样估计他们两人各自对中国革命、对中国政治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呢？

金冲及：尼克松曾讲过这么一句话，毛泽东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一般来讲，尼克松的话不无道理。我读过不少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和文章，有一个感觉，就是毛重在统筹全局，提出大政方针，那真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而周的讲话和文章更多地给我的感觉是细致周密，入情入理。所以一般说来，毛泽东确实是更多地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而周恩来更多地负责执行和落实。

但这只是相对说的，不能把话说死。毛泽东是不是光拿大主意而对具体工作就不过问？不是的。毛泽东对他认为在全局中有决定意义的一些具体环节通常也抓得非常紧、非常细。他不是说“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吗？在他的前期尤其是如此。反过来，周恩来也决不是一个只能起执行作用的人。他也是一个战略家、一个有着重大决策能力的人。比如，周恩来1924年在法国时谈到“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时说过：“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说明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道理。1930年4月他在德共《红旗报》上写道：“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这些都是很早的事情。中央九月来信对古田会议的作用，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以后，在推动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中，周恩来对于党的许多重大决策的提出一直作出过很多贡献。我举个例子。

在《周恩来传》起草过程中，有位中央领导同志看了后觉得对周恩来在军事上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包括三大战

役中所起的作用没有充分反映出来。因为周恩来当时是军委副主席、代理总参谋长，应当反映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后来我跟邓大姐讲到这一点时，邓大姐说，是这样。她说：“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好后，由他再来贯彻。”确是事实。我们为难的是：写传的主要根据是目前留下的档案，其中最重要的具有战略性决策问题的文件大都确是由毛泽东起草的，周恩来起草得比较多的是一些具体贯彻执行的或配合性的文件。但这是不是就说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在作决策？也不能那样说。档案能说明问题，但档案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在当时军委作战室工作过的一位同志讲到过：当时一般来说，几乎每天所有的军事电报，都是先送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看了以后，考虑好自己的意见，通常在地图上也标明了，然后去找毛泽东，两人一起对重大问题进行商量。做出决定之后，重要的文电由毛泽东亲自动手起草，其他一些具体问题由周恩来处理。当时党的领导集体是五大书记，在军事方面很多重大决策的作出，毛泽东当然起着主要作用，接下来就是周恩来的参与了。周恩来曾说过：转战陕北时，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最小的司令部实际上就是两三个人。另外，在外交等方面，周恩来也发挥了不少重大的决策作用。这不用多说了。所以，说毛泽东是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一般说可以，但不能说死，只是相对而言的。

访问人：“谋事是毛，成事是周”是一般概括性的比较形象的说法？

金冲及：在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也是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多年的老同志曾跟我谈起过一件事：建国初，有一次他曾问

周恩来：“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周恩来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可见，周恩来从国家和革命事业全局的利益出发，甘愿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而他内心确实钦佩毛泽东。也是尼克松讲过这么一句话：周恩来总是小心翼翼地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毛泽东一个人。

访问人：梁漱溟曾讲过，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毛泽东召集会议，特别是建国以后，讲起话来经常是国内国外，海阔天空。讲完了，说，就这样吧。究竟怎样？别人未必明白，但周恩来全明白。余下的事就要靠周恩来去贯彻执行了。梁漱溟的话，虽是一家之辞，但起码说明，在重大决策过程中，毛泽东的主导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之后少不了周恩来这位总理。同样也说明，毛、周二人之间有着高度的默契。

金冲及：是这样。毛泽东的思想博大深邃，有时候不能止于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对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周恩来十分了解，能够准确把握。同时，对周恩来办事的细致周密，毛泽东也很放心。

周恩来对中国政治所起的作用，在毛泽东晚年，还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晚年的毛泽东，一方面越来越少参与党和国家的日常具体工作，另一方面他同实际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胡乔木同志讲到过，有一次他劝主席多到工厂农村去看看。主席说，我怎么去啊？我一去，人都围了上来，是我看工厂，还是工厂看我？在毛泽东晚年这种同实际越来越隔膜的状况下，周恩来在一些方针政策的制定方面对毛泽东所起的补充作用似乎比以往更多一些。

## 说到他们的一致和不一致

访问人：毛泽东、周恩来在党的历史上有一致的时候，也有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们的一致和不一致呢？

金冲及：照我看，他们两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目标是一致的，而且周恩来对毛泽东确实心悦诚服。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之间为什么能建立起这样亲密而默契的合作关系。当然，他们之间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差别以至分歧。但他们之间一直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尖锐的冲突，这和其他不少领导人显然不同。

先讲民主革命时期。国外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央苏区时期党内的主要矛盾是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矛盾。我认为不是这样。

访问人：国外有人讲毛泽东、周恩来的矛盾是权力之争，说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就夺了毛泽东的权。

金冲及：这话不能成立。因为成立苏区中央局是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后几天政治局决定的。书记一开始就是周恩来。他不只是负责中央苏区，而且负责指导全国各苏区和红军。因为那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离不开周恩来，所以书记由先去苏区的项英代理。后来因为“AB团”问题，说项英右倾，再加上项英军事上弱一些，改由毛泽东代理。1931年周恩来到了苏区，书记一职自然由他担任。这怎么能说夺权呢？比如，这个位子本来是你的，你没到的时候请别人先代坐着。你来了他自然让给你。这哪有什么夺位子的问题？

访问人：那么，宁都会议是否存在周恩来夺了毛泽东军权的问题呢？

金冲及：这里讲的军权主要是指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问题。本来，中央军委成立后一方面军就不存在了，朱德任

红军总司令，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是作为中央政府主席随中革军委活动的。后来一方面军恢复了，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朱、王联名提议由毛泽东任总政委。毛泽东是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总政委职务的。宁都会议上多数人要毛泽东召回后方。周恩来坚持将毛留在前方。可以在两种方案中选择，或者由毛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周恩来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或者由周恩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协助。毛泽东个性很强，他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就坚决拒绝周恩来提出的前一方案。周恩来还是先代理总政委，以后才兼了这个职务。这不存在周恩来夺毛泽东权的问题。

宁都会议前关于军事问题的那场争论，前方的周毛朱王四个人意见是一致的，都是和后方中央局的争论。后方说你们不进攻，是消极等待主义。前方认为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急于求战，主张先在那里发动群众，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等待战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前后方之间来来回回的电报多啦，不是一两句话说得完的。

访问人：宁都会议究竟讨论了些什么，有会议记录吗？

金冲及：现在就苦在没有会议记录，具体讲些什么，无从查找。不过看一看后方给中央的电报，也可以知道他们对周并不满意，说他是调和，说他批评项英甚至超过了批评毛泽东。毛泽东的脾气是，既然他们不支持我的观点，我就宁可不干。周恩来呢，他又要服从多数，顾全大局，又要尊重中央，想不通的也要暂时忍下去，继续干。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不同。这一点也可能是周恩来不如毛泽东的地方。

访问人：中央苏区以后，特别是抗战初期以后，他们之间就很少分歧，配合得很默契，创造出一个个奇迹。但建国后，遇到一些过去没有经历的新问题，毛周之间又

产生了一些分歧。

金冲及：大一点的问题可能是两次，一次是1956年前后的反“冒进”，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在反冒进问题上，详细的就不多说了，比如周为什么提出反冒进等等。我这里只讲一点，南宁会议批周批得很凶啊！毛主席讲，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总理检讨了一次又一次。

访问人：总理的检讨，是违心的，还是不违心的？

金冲及：我认为，他有想不通的地方，但也不完全是违心的，他想不通的地方，因为当时确实发生了冒进，这是事实。据说他找主席汇报时两人争得很厉害。主席提出要追加20个亿预算，周坚决不同意。据当时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他写检讨，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内心一定很复杂。但也不能说他完全是违心的。在总理的检讨里，第一句话就是：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我看这个话还是发自内心的。当然是不是完全想通了，也未必。

访问人：他可能是在试图想通，或者努力去想通。

金冲及：问题恐怕就在这里。在周看来，主席高瞻远瞩啊！他可能会想，以往多少次历史经验证明，主席比他看得高，看得远。那么这一次也许是自己错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理的检讨也不完全是违心的。

访问人：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人们议论较多，有的说他是忍辱负重，有的说他是不倒翁，是愚忠，更有甚者，个别人说他是软骨头。对于这些，您是怎么看的？

金冲及：“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一些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没有告诉他，这也是事实，当时他正在忙着华北抗旱。批海瑞罢官，他事先也不知道。后来成立工作组后不久，他又出国了很长时间。不过最初

他对“文化大革命”恐怕是拥护的，实行反修防修，发动群众来消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阴暗面，这些在当时了不会反对。只是在方法上，什么人都打倒，他不会赞成；还有，他当时讲得很多的就是抓生产，生怕在这上面出事。其实，许多人在“文革”中被冲击，被专政，最初也还以为“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对的，后来才慢慢觉得有问题了，大家都有个认识过程，我想这也包括周恩来在内。

访问人：现在在人们心里有个结，毛泽东很信任周恩来，也只有周恩来才能和毛泽东说上话。周明明知道毛有很多做法是错误的，又为什么从不向毛提意见呢？

金冲及：这涉及我们如何理解周恩来的问题。举个例子，1965年，周恩来在审查舞蹈史诗《东方红》时，讲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即使是党的领袖犯了错误，只要没有发展到路线错误，提意见时，也要考虑到方式，考虑到效果，要注意党的团结。这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想到会有后来那样的事，这段话倒反映了周恩来处事方法的特点。从当时的情况看，要周恩来在会议上当场起来反对毛泽东提出的重要意见，他是不会那样做的，那样做也没有效。一般说来，他有不同意见时更可能的是在会下找毛泽东单独交换意见。现在苦就苦在这里了，他单独见毛泽东的次数很多，这在他的台历上有记载。究竟谈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周恩来通常也不会把他有什么不同意见随便对别人说的。我只知道一件事，是王力讲给我听的，他说，周总理给毛主席讲过，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通，路线错误只有“左”或右，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次为什么讲出来呢？因为周总理找王力了解《红旗》杂志的社论提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怎么回事。可见周恩来单独找毛泽东，他会提出个人看法的。这是偶尔露出的一点点。其他的事，照我看，他如果给主席讲了意见，主席接受了，他下来贯彻时，只会讲主



席说了什么，决不会说这个意见是我提的。反过来讲，他提了意见，主席没有接受，他下来还得贯彻毛主席的意见，决不会说，我是不赞成的，我已经提过了，主席不赞成我有什么办法。现在也没有证据说，周恩来向毛泽东提了多少不同意见。反过来也没有证据说，周恩来就没有向毛泽东提过不同意见。谁也没有根据，因为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历史上总有些后人再也无法弄清的事情。

关于说周恩来是不是软骨头的问题，有一次我到某大学给研究生讲课就遇到过，是一个研究生递条子向我提问。讲了这么一段话。我说，现在有些年轻同志恐怕是不大理解、也不大懂得一个对国家、民族负有那么大责任的革命家、政治家，面对异常复杂的环境时，是怎样权衡利弊，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当时的环境多么复杂，存在着许许多多制约因素，对负有这样大责任的周恩来来说，并不是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供周恩来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不赞成那样做，结果是什么呢？那只能是同毛泽东决裂，然后被打倒。另一种就是周恩来在“文革”中实际上所做的，要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而在工作中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并为以后纠正错误准备种种条件。如果采取第一种选择，决裂和被打倒，在当时于事无补。而且我们国家当时处在那样困难和混乱的情况中。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只是至处鼓动冲杀破坏。国家经济生活的维持、外交的联系、一些极端混乱状况的排除、甚至哪里没有煤了要用煤、哪里交通断了要疏通，全得他在那里硬顶着。他身边的得力助手几乎都被打倒或靠边了。如果他下来，国家这些事怎么办？对“文革”中许多事（包括保护老干部和民主人士、制止过分的混乱状态等）当时也只有

他说话多少还能起点作用。对党和国家民族和命运怀有那样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不顾一切地任意采取行动？如果从个人来讲，他这样坚持图的是什么？他没有野心当主席吧，这谁都承认。他没有什么财产，也没有子女。到晚年的政治处境并不是那么好过。1972年以后又病是那么严重。可是他仍然一天坚持十几小时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文化大革命’里，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在前面两种选择中作出后一种选择，对他自己也许是一种最苦的选择，但只能选择这条路，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尽可能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另外在可能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地把一些被打倒或靠边的老同志扶起来，把五年计划重新制订起来，规章制度恢复起来，到最后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他的逝世，在全国人民中间产生那么大的反响，包括四月五日那样的事。所有这些，某种程度上讲是高度韧性的意志的表现。现在看，主席去世以后，我们党所以能够那么快地扭转局面，这里包括着总理在不为人谅解的情况下默默地准备下那么多条件所起的作用。所以在这个选择之外，找任何一个选择，都不会比这个好。既要明确地表示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又能维持团结，这说起来固然痛快，事实上却根本不可能。

访问人：其实还有另一面，林彪和江青也是抓他的，在那么复杂的关系里，也就是周恩来能处理这些矛盾，维持这个大局面。

金冲及：我对那个递条子的研究生讲，陈老总是硬骨头吧，假如周恩来是软骨头，那么陈毅为什么还对周恩来那么尊重。就是因为陈毅能理解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一个伟大的肩负着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家，他在那里所考虑的问题，是不能用那种小市民市侩

心理去猜测的。一看他没有倒，就想他是在保自己的什么，是在怕什么等等。所以就有“软骨头”之类的说法了。还是那句话，一个人不怕别人批评他，就怕别人误解他。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当然可以说周恩来哪一点做对了，哪一点做错了。他也不可能什么都是做得正确的。这些，后人自然都可以评论，但首先总得如实地理解他，决不能轻率地不符合实际地凭着自己的猜测去议论。